

冀鲁豫边区
群众运动资料选编
(上)

李运亨 主 审
谢忠厚 主 编

河北人民出版社

冀鲁豫边区
群众运动资料选编

(下)

李运亨 主 审
谢忠厚 主 编

河北人民出版社

邓小平同志1961年12月27日

《重要的是做好经常工作》

一文摘录

……归根到底要把经常工作建立起来。大量的日常工作是基础，突击运动只有建立在这个基础上才最可靠，没有长期的群众工作基础不行。3年解放战争打胜了，这是在长期的群众工作的基础上集中了一切力量才实现的。如渡黄河，群众把门板都贡献出来，光冀鲁豫的门板还不够，连济南的门板也下下来了。那时群众吃得很差，还是拿出粮食供给人民解放军。这没有长期工作的基础是不行的。国民党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共产党长期联系群众办好事，和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解放战争是人民战争，依靠人民才能做到这一点。

——摘自1991年3月10日《人民日报》第1版

FOO / 20

134031

出 版 说 明

冀鲁豫边区是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重要解放区之一。在漫长而又艰难的岁月里，在边区党组织的领导下，边区群众运动轰轰烈烈，蔚为壮观，为民族的解放和新中国的诞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谱写了光辉的篇章。边区的群众运动是边区革命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冀鲁豫边区群众运动资料选编》以珍贵、丰富的第一手材料，记录了冀鲁豫边区群众运动的发展历史、重大斗争、巨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对于深入了解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推进抗日战争史和解放战争史的研究，有一定的意义。因此，本书既是一部有重要史料价值的编著，也是进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教材。

全书由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冀鲁豫边区群众运动概述》。本文是关于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冀鲁豫边区群众运动的历史进程、主要成就和基本经验的重要总结，是本书的总论。第二部分为专题资料，包括工人运动、妇女运动、青年运动、文联工作、人民武装斗争和学生运动等6篇，均由当年从事此项工作的老同志撰稿和集体修改，最后由负责同志审定。这些专题资料是集体经验和智慧的结晶。第三部分为历史文献资料，包括中共中央、北方局和晋冀鲁豫中央局，冀鲁豫区党委和冀鲁豫行署，以及冀鲁豫边区群众工作负责人的有关指示、文电、报告、讲话、著述等，共81篇（含只列目者4篇）。这是研究冀鲁豫边区群众运动的最重要的资料。第四部分主要为回忆资料，包括冀鲁豫边区20位原从事群众工作的老同志的14篇回忆录。这是他们的亲身经历和体验，是历史的真实记录。另有莘县、滑县、肥城县党史工作部门提供的

有关资料3篇。书末有《冀鲁豫边区群众运动大事记》，供读者参考。

本书所选各篇历史文献资料，按成文日期（或原载报刊日期）为序编排。在坚持存真原则，力求保持历史文献资料原貌的前提下，仅做了必要的技术性处理。凡转载的文献资料，均只列目，标明出处，不录原文。全书一级标题格式予以统一。章节标题及各级序号一般照排，只对标题层次不清及同级序号不一致者进行调整。数字用法一般按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七单位1986年12月31日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执行。对显而易见的错别字，一般直接订正，特殊情况在其后加中括号（〔 〕）予以订正。增补的漏字，用六角括号（〔 〕）标明。对错用或已淘汰的结构助词（的、地、得、底）和时态助词（着、了、过），一般以从俗字看待，不予订正。对无法补正的虚缺字，以数目相应的虚缺号（□）表示；虚缺较多者，插注说明。原文中的隐讳号（×）照排。标点符号明显用错以致影响原意者，按照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1990年3月修订发布的《标点符号用法》予以订正。

对本书各专题资料及所选回忆录，我们本着尊重原作、文责自负的原则，不做内容上的重大修改和艺术加工，仅做必要的编辑处理。对其说不一的人物和事件（含人名、地名和时间），采取并录各说、暂时存疑的办法，未做硬性统一，留待日后研究敲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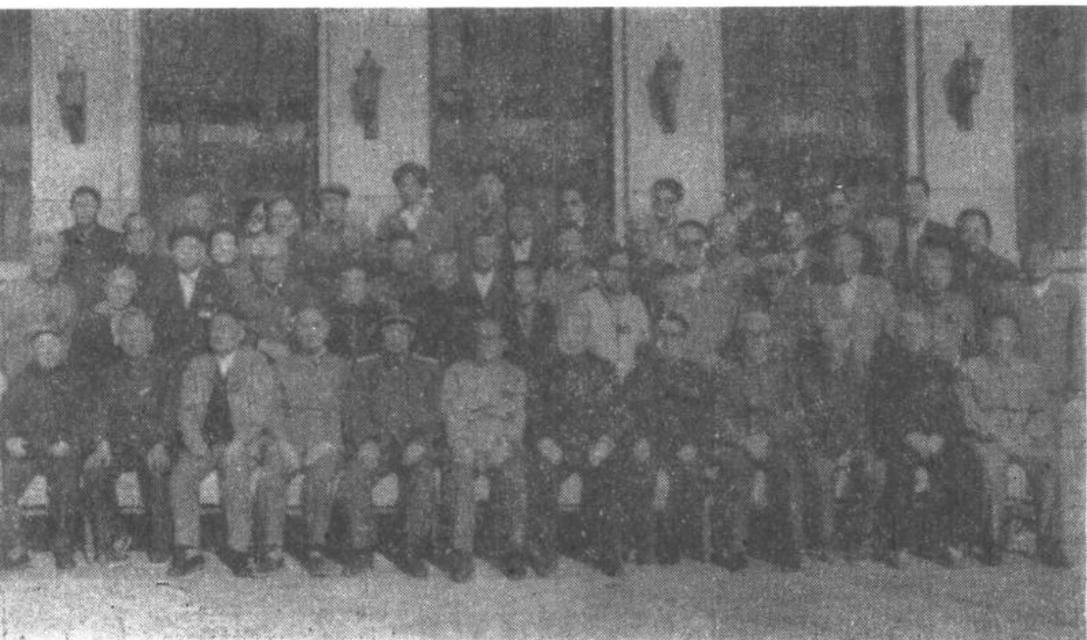
本书的资料收集和编纂工作历时5年。我们虽然尽了最大努力，多方搜集资料，但因当年战争环境残酷，留存下来的历史文件并不完整，特别是抗战前期的文献资料，竟付阙如。由于我们水平有限，在编纂工作中舛误之处在所难免，敬祈读者不吝指正。

本书由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河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部分人员编辑。编纂工作是在徐运北、张承先、郭超、王克东、杨泽江等同志具体指导下进行的，并得到了杨得志、段君毅、赵健民等边区领导同志和原来从事群众工作的老同志

以及王传忠、刘洪声等同志的热情支持，得到了晋、冀、鲁、豫4省党史工作部门和档案馆以及冀鲁豫边区党史办公室的大力帮助。中共河北省委、省政府，河北省出版局和河北人民出版社对本书的出版工作给予了很大支持。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编 者

一九九一年二月



冀鲁豫边区群众运动
宣教工作 审稿会议全体人员合影

1989年4月于河北省保定市

目 录

出版说明..... (1)

第一部分 概 述

冀鲁豫边区群众运动概述.....谢忠厚 周振印 (1)

第二部分 专题资料

抗日战争时期冀鲁豫边区工人运动简况.....方 明 (67)

冀鲁豫边区妇女运动概况.....范世钧 (73)

冀鲁豫边区青年运动概况.....王 克等 (114)

抗日战争时期冀鲁豫文联工作简况.....鲁西良 (161)

冀鲁豫边区人民武装斗争概况...郭乐天 白晶五 冯培昌 (184)

冀鲁豫边区学生运动简况.....陈惠敏 (216)

第三部分 历史文献

鲁西区党委关于群众工作宣教工作的报告 (节选)..... (227)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二日)

如何进行会门工作.....王从吾
(一九四〇年一月三日)

【见《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

第二辑·文献部分(上)第136页】

在鲁西区党委民运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张霖之 (233)
(一九四一年二月)

鲁西妇救总会关于今后妇女工作的决议..... (250)
(一九四一年三月)

- 鲁西农救总会九月主任联席会总结报告…………… (257)
 (一九四一年九月十五日)
- 冀鲁豫边区各救总会关于政民配合的指示…………… (275)
 (一九四一年十月五日)
- 今后边区工运的任务 (节选) ……………高光宇 (280)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
- 冀鲁豫各救总会关于开办民运干部学校的决定……………
 (一九四二年一月五日)
- 【 见《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
 第二辑·文献部分 (中) 第197页 】
- 冀鲁豫区党委关于青抗先领导关系的决定…………… (288)
 (一九四二年三月十五日)
- 冀鲁豫区党委青年运动委员会关于
 迎接华北青运统一准备工作的指示…………… (292)
 (一九四二年四月一日)
- 冀鲁豫边区青年抗日救国联合会关于边区
 青年运动的当前任务…………… (294)
 (一九四二年八月)
- 冀鲁豫区党委关于组织各级抗联的决定…………… (305)
 (一九四二年九月一日)
- 冀鲁豫边区各级工农青妇抗日救国会联合会组织大纲…………… (308)
 (一九四二年九月)
- 边区抗联关于今后妇女工作的指示…………… (316)
 (一九四二年九月)
- 鲁西南三个村的斗争是怎样坚持的 ? ……………苏振华 (322)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 冀鲁豫边区人民抗日联防组织条例草案…………… (340)
 (一九四二年)

- 冀鲁豫边区人民武装抗日自卫队暂行条例草案…………… (346)
 (一九四二年)
- 谈谈群众团体干部的立场问题……………杨泽江 (357)
 (一九四三年一月一日)
- 减租增佃工作中的几个具体问题……………元 贵 (363)
 (一九四三年一月)
- 在濮县、范县工作总结大会上的发言 (节选) ……黄 敬 (367)
 (一九四三年四月)
- 冀鲁豫边区抗联关于村级工作的指示…………… (383)
 (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一日)
- 冀鲁豫区党委关于取消各级民运部
 成立民运工作委员会的决定…………… (401)
 (一九四三年七月十八日)
- 冀鲁豫区党委关于深入检查群众工作的指示…………… (403)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六日)
- 一年来的党与群众工作 (节选) ……张霖之 (406)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二日)
- 濮县、范县四个月群众工作总结…………… (429)
 (一九四三年)
- 冀鲁豫边区抗联关于改善团体领导的指示…………… (457)
 (一九四三年)
- 冀鲁豫边区租佃关系的调查与研究……………郭绍汤
 (一九四三年)
- 【 见《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
 第二辑·文献部分 (中) 第783页 】
- 鲁西南租佃关系与雇佣关系的初步调查……………陶 力
 (一九四三年)
- 【 见《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
 第二辑·文献部分 (中) 第769页 】

- 冀鲁豫边区青年抗日救国联合总会
 对一九四四年边区青运任务的指示…………… (463)
 (一九四四年二月六日)
- 冀鲁豫区党委关于党对群众团体领导
 关系与组织的决定…………… (470)
 (一九四四年二月二十日)
- 在二地委(原冀鲁豫)关于发动群众
 及目前中心工作问题的发言……………黄 敬 (472)
 (一九四四年四月二十五日)
- 冀鲁豫、冀南行署关于减租增佃几个问题的决定…………… (483)
 (一九四四年七月七日)
- 冀鲁豫、冀南行署关于赎地问题的决定…………… (486)
 (一九四四年八月十一日)
- 继续贯彻大胆放手的领导方法……………万 里 (489)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日)
- 站稳脚跟 放下圈子……………张霖之 (496)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 冀鲁豫分局关于对中农政策的指示…………… (502)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 濮县的农民运动及组织领导的经验……………黄 文 (504)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
- 关于冀鲁豫群众运动概况及意见……………张霖之 (510)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
- 滑县查减运动简报……………纪登奎 (522)
 (一九四四年)
- 冀鲁豫分局关于纠正执行大胆放手中的偏向的指示…………… (541)
 (一九四五年二月八日)
- 对泰运工作的发言……………黄 敬 (544)
 (一九四五年四月)

- 农民发动起来，要迅速坚决的
转入生产运动……………高元贵（ 549 ）
（一九四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 在冀鲁豫行署专员联席会上的
总结报告（节选）……………徐达本（ 552 ）
（一九四五年七月九日）
- 南旺接敌区发动群众的几点经验……………李 哲（ 578 ）
（一九四五年八月七日）
- 冀鲁豫边区各救总会为紧急动员起来参战
告各救总会员儿童姊妹团员书……………（ 581 ）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
- 民兵是农民自己的武装……………粟 森（ 583 ）
（一九四五年八月）
- 在分局党校关于土地政策在边区的具体
执行情况的报告（节选）……………张霖之（ 592 ）
（一九四五年）
- 冀鲁豫分局民运部关于老区和新区发动群众
问题的工作通报……………（ 603 ）
（一九四五年九月十四日）
- 减租与生产……………（ 605 ）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 新区情况研究……………李进宝（ 610 ）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九日）
- 清平新解放区（三区）的雇佣运动……………张延积（ 615 ）
（一九四六年二月）
- 冀鲁豫区党委、联合会总会召开边区群运
座谈会，确定新区清算诉苦方针……………（ 660 ）
（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一日）

- 开展深入与普遍的反奸诉苦运动……………郭 超（667）
（一九四六年五月十七日）
- 对菏泽市当前群运的意见……………刘镜西（671）
（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日）
- 大胆使用各种积极分子……………张承先（674）
（一九四六年六月七日）
- 二地委总结群运……………张耀华（678）
（一九四六年七月五日）
- 冀鲁豫行署关于妇女参政问题的指示……………（681）
（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二日）
- 鱼台一月来清诉运动总结……………（683）
（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四—二十六日）
- 定陶政权干部怎样参加了群运……………孔百川（697）
（一九四六年八月三日）
- 晋冀鲁豫中央局为贯彻五四指示，彻底
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指示……………（702）
（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日）
- 冀鲁豫区党委关于贯彻实行耕者有其田
几个具体问题的指示……………（709）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日）
-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布告……………（713）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 冀鲁豫区的减租增佃概况……………（715）
（一九四六年）
- 在民运部长联席会议上的总结发言……………潘复生（724）
（一九四七年一月二十日）
- 冀鲁豫区党委关于深入土地改革群众运动的指示……………（733）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二日）

- 冀鲁豫区党委关于土改主要经验
 向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的报告…………… (738)
 (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九日)
- 在冀鲁豫区党委土改会议上的总结报告提纲……………张霖之 (741)
 (一九四七年五月十七日)
- 湖西游击战中的土改运动汇报提纲…………… (757)
 (一九四七年六月十五日)
- 在听取四、八地委典型汇报后
 关于贯彻复查的发言 (节选) ……………潘复生 (762)
 (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四日)
- 冀鲁豫区党委关于贯彻复查的指示…………… (772)
 (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七日)
- 五地委民运部长联席会上五个月来土改运动的总结…………… (778)
 (一九四七年七月十二日)
- 四地委县书联席会三个月土改复查运动总结…………… (781)
 (一九四七年九月八日)
- 认识新区特点, 大力开辟新区工作……………逯昆玉 (787)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六日)
- 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关于土地
 改革、整党与民主运动的指示…………… (789)
 (一九四八年二月一日)
-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冀鲁豫行署布告…………… (794)
 (一九四八年二月十日)
- 中央局冀鲁豫工作团关于整党与民主运动
 向中央局并冀鲁豫区党委的报告…………… (796)
 (一九四八年五月三十一日)
- 附一: 在五月十五日扩干会议上的工作总结…………… (797)
 附二: 阳谷县三区赵台纠偏经过…………… (804)
 附三: 阳谷县三区冀王庄第一阶段工作总结…………… (811)

- 冀鲁豫区党委关于整党土改工作总结…………… (819)
 (一九四八年六月十七日)
- 冀鲁豫区党委关于会门问题报告…………… (843)
 (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七日)
- 冀鲁豫区党委关于建立青年团工作的指示…………… (849)
 (一九四八年十月十五日)
- 冀鲁豫区党委关于整党与结束土改工作的综合报告…………… (852)
 (一九四九年一月)
- 冀鲁豫区第一届青代大会关于目前
 青年运动任务的决议…………… (861)
 (一九四九年四月十日)

第四部分 回忆资料

- 忆冀鲁豫中心区的抗战活动……………安法乾 (865)
- 关于冀鲁豫边区抗日救国总会和妇女抗日
 救国总会成立前后的一些情况……………安法乾 范世钧 (876)
- 对清(丰)南(乐)大(名)内(黄)
 抗日救国会的回忆……………谷剑侠 马毅之 (880)
- 肥城“红五月”运动
 ……………中共肥城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886)
- 忆抗战时期范县的民主民生斗争……………成润 (892)
- 忆冠县的减租减息与民主民生斗争……………司洛路 (903)
- 莘县境内的借粮
 斗争……………中共莘县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912)
- 冀鲁豫边区群运史上的一项创举
 ——试述滑县雇佃贫
 运动……………中共滑县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921)
- 忆抗战时期湖西地区的妇救会工作……………季凯 (934)
- 忆抗战时期湖西地区的青年运动……………张世珠 (943)

鲁西北和冀鲁边“民先”总队部

始末·····	徐少岩 张汝琦 许 法	(950)
一九三八年至一九三九年直南地区		
“民先”组织概况·····	安法乾 李靖轩	(958)
活跃在鲁西平原上的济南乡师学生抗日		
教导队·····	刘少僂 朱德兴 王 克 宗 明	(963)
我对冀鲁豫边区青抗先的几点回忆·····	郭乐天	(971)
聊城地区民兵斗争述略·····	杨明坤	(975)
关于鄆北抗日民兵联防的回忆·····	李勋臣	(994)
回忆解放战争时期濮阳县五区党的主要工作·····	杨敬仁	(1004)
冀鲁豫边区群众运动大事记·····	田苏苏 王 潮	(1018)
后记·····		(1052)

冀鲁豫边区群众运动概述

谢忠厚 周振印

冀鲁豫边区是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一个重要的革命根据地。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冀鲁豫边区党组织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创建和发展根据地，不断深入社会改革，为民族解放事业和人民解放事业建立了不朽的业绩，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冀鲁豫边区位于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5省的接合部，北界漳河，南跨陇海路，东沿津浦路，西临平汉路，除泰西^①的山峦丘陵和湖西^②的湖泊湾汊外，其余都是一望无际的黄河冲积平原。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和压榨，整个地区日益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境地，经济、文化落后，地主势力强大，会道门很多；且水、旱、虫等自然灾害连年不断，广大群众生活十分贫苦。早在1922年，这一地区就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第一次大革命时期有过农民协会斗争。大革命失败后，这里的工人、农民和青年学生在党的领导下，为抗捐抗税，反对地主、豪绅、军阀、列强，进行过一系列英勇斗争。著名者有：1927年直隶省^③大名县反对“华洋义赈会”，要求按当地价格偿付所占土地款额的斗争；1928年山东省阳谷坡里农民暴动；1929年山东省泰安夏

①泰西，大致指鲁西黄河以南、泰山以西地区。

②湖西，指山东省南阳湖、独山湖、昭阳湖、微山湖以西和江苏省徐州西北一带地区。

③直隶省建制于1928年撤销，改设河北省建制。

张镇农民协会同地方豪绅的算帐斗争，河北省濮阳县千口、化村等村民清算民团联庄团总蔡鸿宾贪污罪行的斗争；1930年江苏萧县黄口暴动；1932年河北省之濮阳、大名、清丰、南乐，山东省之朝城、东明、范县、濮县和河南省滑县、内黄、汤阴等10余县盐民驱逐盐巡出境的斗争；1933年河北省濮阳县姚家农民暴动，等等。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后，面对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这一地区各阶层人民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纷纷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知识青年和乡村小学教师在河北省之濮阳、清丰、大名，山东省之朝城、濮县、泰安、东平、范县，江苏省之沛县等地组织了学生救国会、小学教员救国会、读书会、社会科学研究会、反帝大同盟、抗敌后援会等抗日团体。1935年，为了配合中央红军北上抗日，发动了河北省之大名、濮阳和河南省之滑县、内黄4县边区的游击战争，组建了一支300多人的革命武装。山东省濮县和范县一带，进行了抗粮、分粮吃大户和夺取地主武装的斗争，建立了一支游击队；沛县也发动群众开展了反抽丁挖河、抗税等斗争，建立了一支40多人的地下武装。这些斗争虽然大都遭到残酷镇压，但锻炼出了许多优秀干部，积累了斗争经验。1936年刘少奇主持中共北方局工作以后，大力选派干部到这一地区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中共地方组织广泛团结各阶层人民，群众抗日救亡运动有更广泛深入的开展。这些斗争和工作，在冀鲁豫地区奠定了革命群众运动的基础。

一、抗日战争时期冀鲁豫边区的群众运动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独立、自由、民主与幸福的新中国而斗争。从此，冀鲁豫边区群众运动进入以全民族抗战为主要任务的新的时期。其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七七事变到1940年上半年。主要是宣传与组织边区

一切抗日人民群众，发动抗日游击战争，创立敌后抗日根据地。这个阶段，边区各阶层群众被广泛发动起来，建立了各种群众团体，并实现了统一领导。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共北方局遵照毛泽东“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一切工作，例如民运，统一战线等等，应环绕于游击战争”，“发动全华北党（包括山东在内）动员群众收编散兵散枪，普遍的但是有计划的组成游击队”的指示^①，确立了全党搞武装，建政权，放手发展自己力量的方针；并发出“每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应该脱下长衫到游击队中去”的伟大号召^②。在中共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和号召下，冀鲁豫地区党组织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建立和发展各种抗日群众团体，发动、组织和武装群众，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发动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使群众抗日斗争烈火迅速燃遍了冀鲁豫广大平原。

（一）在直南、豫北和鲁西南地区^③。抗战爆发后，中共地下党员晁哲甫、刘大风以国民党保定行营政训处长张荫梧的名义，在清丰、南乐、濮阳建立冀南抗日救国十人团，宣传群众，发展组织，开展抗日活动，迅速发展团员300余人；并积极组织抗日武装，通过高树勋部队的关系取得河北省民军第二路第四支队的番号。1938年3月，中共直南特委建立清（丰）南（乐）大（名）抗日救国会（会长为马彩三），深入农村，宣传群众，动员枪支，组织武装，建立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自卫团等群众组织。4月间，中共直南特委又建立了濮（阳）滑（县）东（明）长（垣）4县边抗

① 《人民日报》1981年7月7日第1版。

② 《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大事记》第37页。

③ 直南，大致指今河北省京广线以东、邢台以南地区和今河南省清丰、南乐、濮阳、长垣及山东省东明县一带。豫北，大致指河南省京广线以东、黄河以北地区。鲁西南，大致指山东西南部菏泽、定陶、曹县一带地区。

日救国会（会长牛万里），以“保家自卫，防匪缉盗”为口号，通过区、村救国会进行工作，对发展抗日力量起了很好的作用。晁哲甫于1938年2月任清（丰）南（乐）边东县委书记后，与县委的同志共同团结地方士绅成立清丰县抗日民众自治委员会，改造地方民团，建立抗日民众联合自卫团。他还自筹粮款，先后在清丰六塔集和县城举办抗日军政干部训练班。半年间，清丰、南乐的知识分子几乎训练了一遍，救国会普遍组织起来，到处可以听到抗日的歌声。他并根据直南特委指示，在训练班中发展了“民先”队员与共产党员。直南特委为加强对各县抗日救国会的领导，于1938年5月在六塔集召开各县救国会代表大会，到会代表有边东、边西^①、南乐、大名、濮县、濮阳、东明、长垣、内黄等县20余人。大会通过了总会章程和宣言，选举了总会委员和常务委员，宣告成立冀鲁豫边区抗日救国总会（安法乾为总会负责人）。总会下设总务、组织、宣教、农民、青年、妇女儿童、武装等部。当时中共组织处于秘密状态，县、区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多设在救国会内，通过救国会这一公开组织进行工作。年底，冀鲁豫边区农民救国总会（主任姚恒光）、冀鲁豫边区妇女救国总会（付秀香、范世钧任正、副主任）及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冀南分队（队长梁伯琪，副队长李靖轩）相继成立，有组织的群众发展到约30万人，并团结了众多知识分子。同年8月初，鲁西南抗日救国总会成立（会长刘齐滨，副会长程力夫）。在总会领导下，曹县、菏泽、考城等县相继建立了农民救国会、青年救国会和妇女救国会等抗日群众团体。

冀鲁豫和鲁西南抗日救国总会建立后，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做了许多工作：（1）成立半政权性质的组织“战委会”。如1938年5月，冀鲁豫边区抗日战争总动员委员会清丰县分会成立，由直南特委统战部长晁哲甫任主任。它与县救国会合署办公，有力地保证了救国会对农、青、妇、武各项工作的推动和战争动员、部队供给、

①边西，系指南乐、清丰、大名县西部地区。

锄奸、扩军等项工作的开展。在总“战委会”领导下，清丰、南乐先后按合理负担原则，实行了统一累进税，每户每人平均1亩地者免征（南乐县规定半亩地者免征），3亩地以上者累进征收，累进率最高不超过3倍，以适当照顾地主的负担。这一税制改革，得到了贫苦农民的热烈拥护和坚决支持。（2）坚决同国民党顽固分子的反共磨擦进行斗争。1938年2月，直南特委与国民党濮阳区专员丁树本建立了统战关系。在当时抗日高潮的推动和中共的帮助下，丁树本提出统一战线、军民合作、抗战到底三个口号。在中共领导的四支队与丁树本部配合，同日军进行常庄、小濮州等战斗，收复了濮阳之后，于同年夏，八路军办事处、冀鲁豫抗日救国总会迁入濮阳。中共干部主要集中在国民党濮阳专署、县民训科和丁部政治机关及抗日救国总会内，通过各种形式开展抗日工作，开办大批抗日救亡训练班，组织各种抗日救国会，并从抗日积极分子中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1939年春国民党五中全会后，丁树本政治态度急剧右转，抛弃了“团结抗战”的主张，执行“限共溶共”的反动政策。他成立国民党指导专员办事处，取代中共所掌握的政训处；成立与中共领导的抗日救国团体相对立的组织，强迫“民先”队员自首并集体加入国民党；撤换共产党员县长，对八路军三八六旅回民连强行缴械，收缴南乐抗日救国会枪支；扣押、杀害抗日群众代表，强行解散大名二区抗日救国会，公开指责群众供给八路军粮秣是“资敌”。面对这种反共磨擦活动，冀鲁豫边区救国总会冲破丁树本的百般阻挠，于11月在濮阳召开代表大会，组织了盛大的游行示威，向丁树本进行讲理斗争。冀鲁豫边区救国总会派代表团到大名召开县代表会议，恢复了大名二区抗日救国会组织。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原国民党滑县县长贾心斋率领县政府全体成员接受中共的领导，并输送了大批爱国青年，从而有力地回击了顽固派的反共磨擦活动。（3）开展争取、瓦解反动会道门工作。直南、豫北被日军占领后，一些豪绅、地痞利用群众保家自卫心理，公开或秘密组织了大约30余种会道门团体。它们均有武装，遍

及大多数村庄。有日伪操纵和公开投敌的，如黄枪会、先天道、万寿道、圣贤道和大公团一部。有被国民党顽固分子利用的，如大公团、联庄会、大仙会、红枪会、黄香会、白枪会等。九公道、八卦道、南太离、北太离等则纯属愚弄群众、诈骗财物的帮会。反抗敌伪的会门组织，有天门会、大公团和红枪会一部。因此，争取、瓦解会道门组织成为中共团结群众抗日的一项严重任务。1939年2月，中共直南特委分为直南、豫北两个地委后，均专门设立了做会道门工作的委员会。根据会道门的不同情况，分别采取宣传教育、分化瓦解、孤立打击的不同策略，先后争取滑县联庄会和大公团一部参加了抗日救国会，争取长垣县红枪会转变为抗日自卫团，打击了东明县通敌的红枪会，逮捕了清丰、南乐一带在敌人直接指挥下的太阳会、未来道、先天道、后天道的汉奸首领。同时，加强抗日自卫队、抗日救国会工作，把广大群众吸引到各抗日团体中来。（4）发动群众建立武装，为主力部队输送兵源。中共在发动群众抗日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四支队，到1938年6月发展到1000余人，开赴冀南，改编为八路军东进纵队第七支队。在四支队编入主力部队后，又以原四支队一个排为基础，与清丰县抗日武装及濮县、范县组织的冀鲁豫边区民众抗日义勇军等武装合编，组成黄河支队。接着，八路军黄河支队与汤阴县抗日政府武装合编为八路军游击队第二支队。11月初，滑县县委争取的国民党滑县县长陈曙辉的武装，亦编入八路军游击队第二支队，共900多支枪、1300余人。1938年12月，以濮（阳）滑东长救国会自卫队为基础，建立起独立大队，并很快发展到2000余人。1939年春，以滑县县委领导的各区自卫队为基础，又组建了豫北大队，至年底发展到2000余人。

这些抗日群众团体及其工作的广泛开展，有力地推动了冀鲁豫边区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形成。八路军重创顽军石友三部和丁树本部南逃之后，直南、豫北、鲁西南连成一片。在中共冀鲁豫区党委（辖直南、豫北、鲁西南共15个县）领导下，经冀鲁豫边区抗日救国总会筹备，1940年4月17日，南乐、清丰、

濮阳、东明、长垣、大名6县代表在清丰县安庄召开军政民代表会议，成立了冀南6县专员公署，并设立了东长濮（阳）滑4县边联防办事处。1940年5月间成立了冀鲁豫青年抗日救国总会（主任为杨泽江）。至此，冀鲁豫边区各抗日群众团体均已成立。

（二）在鲁西地区^①。1937年10月，在鲁西北^②，中共与国民党抗日爱国将领范筑先建立了统战关系。中共以范筑先六专区游击司令部政训处为基点，以240余名平津流亡学生为骨干，依靠各县党组织，在六专区及周围20余县宣传、动员群众，燃起了抗日烈火，成为全国瞩目的一块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根据与范筑先的协议，在各县建立了政训办事处。各县政训办事处以抗日战争动员为中心工作，自上而下建立农民、妇女、青年、儿童等各种抗日群众组织，发展抗日武装。1938年1月，以中共在堂邑县创建的第一支游击大队为基础，将冠县、博平、范县、寿张等县的武装合并，建立第六区游击司令部第十支队，很快发展成为中共掌握的一支骨干武装。1938年5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鲁西北总队正式成立（队长徐少岩），各县建立“民先”分队。到8月底，队员发展到2500余人。与此同时，农民互助会首先在冠县开展起来，到9月，全县农民互助会发展到13万人。这是农民自己的组织，斗争性很强，发动群众反对平均摊派，改善生活，动员参军参战，还直接领导一支30余人的武装（后发展为卫河大队）。根据冠县的经验，互助会的组织形式在莘县、博平等县也相继发展。这一组织在掩护地方干部工作、锄奸、清匪、维持地方治安方面起了较大作用。在朝城和城北张鲁镇一带，建立了回民抗敌救国会，会员达1500人以上，并掌握一小部分武装。他们发动了要求县长彻底开放民运和反对张鲁镇警察局长贪污的斗争，引起很大震动。临清回民组织也于同年秋成立，会员约2000人。他们组织20余人的文艺宣传队，积极开展抗日

①鲁西，大致指山东省津浦路以西地区（不包括鲁西南）。

②鲁西北，大致指鲁西之黄河以北地区。

救国宣传活动。1938年11月15日聊城失陷，范筑先将军殉国，鲁西北联合抗战受到挫折。在与范筑先联合抗战期间，中共鲁西特委直接掌握的武装发展到3700余人。范筑先殉国后，他们在冠县、馆陶、丘县一带坚持斗争，与国民党顽固分子王金祥部、齐子修部形成对峙局面。临清、高唐一带则以八路军工作团名义坚持工作。一二九师先遣纵队到达鲁西北后，中共地方组织即以八路军武装工作团名义开展群众工作，宣传群众，发展武装，使形势逐渐好转。

在泰西，1938年1月，泰（安）肥（城）山区的抗日游击队组成了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12月，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和汶上县人民抗日自卫队、大峰山独立营等合编成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六支队，开赴东平和东阿、泰肥山区，发动群众，扩大武装，开辟根据地。为统一和加强鲁西北和泰西地区的领导，1939年1月建立了中共鲁西区党委。随后，罗荣桓、陈光率一一五师东进支队挺进鲁西，经过3月间樊坝战斗，开辟了运河以西郛城、鄆城一带地区；经过5月间陆房战斗，使泰西工作更为开展；同时，大力开放民主，改善民生，发动群众实行减租减息，建立农会和抗日民主政权。为贯彻中共中央、北方局开展平原游击战争的指示，中共鲁西区党委于1939年8月小安山会议后，在运西地区广泛发动群众进行破路和改造地形。到年底，巨野、郛城、寿张、东平等县，除敌人据点外，能走汽车和大车的大路，大部改造成了8尺宽、4尺深的抗日沟。在卫东地区，经过发动群众，组建自卫队，改造政权，初步建立起以平原五区为中心的平（原）夏（津）恩（县）高（唐）禹（城）边抗日游击根据地。

1939年和1940年，泰西地区肥城、宁阳、长清、泰安、东平等县和昆山实验区，在中共鲁西区党委、泰西地委的领导下，发动群众，实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开展借粮斗争，群众运动蓬蓬勃勃，称之为“红五月运动”。当时初步实行减租减息与合理负担的村庄达500多个，参加抗日救国团体和自卫队的群众约15万人，这

是冀鲁豫边区发动群众实行“双减”的一次有益尝试，对巩固和坚持根据地的斗争起了积极的作用。在放手发动群众过程中，后期曾出现过一些“左”的政策偏向，区党委、地委进行了纠正。当时，个别上级领导对泰西、昆山等地群众运动中一些“左”的错误进行了过分的批评，区党委缺乏全面理解，曾影响了鲁西群众运动的进一步开展。

1940年春，鲁西抗日军民发起反顽作战，连续取得胜利，并平息了反动会道门的暴乱，使鲁西北、泰西、运西各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鲁西区行政主任公署和鲁西军区先后成立。3至5月间，鲁西妇女救国总会（会长郭军）、鲁西青年救国总会（主任王克，副主任张延积）、鲁西农民救国总会（会长郭英）和鲁西职工救国总会（负责人王震宇）相继成立。至此，鲁西区群众运动开始走上统一领导的轨道。

（三）在湖西地区。抗战爆发后，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与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建立统一战线，成立了国民党第五战区民众总动员委员会（简称“动委会”），特委书记郭子化以社会名流身份任总动委会委员，铜山工委书记郭影秋任总动委会组织部总干事。他们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活动，选派大批共产党员、进步人士和爱国青年参加各级“动委会”，并以“动委会”名义在各地开办游击训练班，组织“民先”、抗日救国会、青年救国会等群众抗日团体。1938年3月，郭影秋以“动委会”组织部总干事身份召开青年代表会，成立了青年救国团，很快发展到苏鲁豫皖边区30余县，参加青年达万余人。在宣传抗日的基础上，群众踊跃参军，各地先后举办农民游击训练班，迅速建立了抗日武装。在党的领导下，1938年5月以后，沛县、滕县、临城、峄县等地抗日武装汇合，组建了苏鲁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一总队，编为3个大队，共600余人。沛县、丰县、砀山、单县、金乡、铜山、鱼台等地抗日武装也进行合编，组建了苏鲁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发展到20个大队，5000余人。7月，中共苏鲁豫特委建立，加强了对湖西

地区抗日工作的统一领导。12月27日，一一五师六八五团到达湖西地区，改称苏鲁豫支队，在丰县西北崔韩庄一举歼灭了公开投敌的汉奸土匪王献臣部，并给增援日军以沉重打击。苏鲁豫特委和苏鲁豫支队乘胜展开全面活动，发展抗日武装，打击伪军伪政权，使湖西地区很快形成了以共产党、八路军为主的抗战局面。同时，对国民党沛县县长冯子固、丰县县长董玉钰等人加强了统战工作，使这一地区出现了联合抗战的局面。1939年1月，苏鲁豫区召开了青年救亡团体联席会议，9个青年救亡团体20名代表共同决定成立苏鲁豫青年抗敌救亡协会（苏鲁豫特委委员李毅负责），选举金乡、鱼台、单县、丰县、沛县等5县代表组成执行委员会。接着，苏鲁豫边区妇女救国会（孔真为主任）、农民救国会、职工救国会相继成立。5月，中共苏鲁豫区党委成立后，苏鲁豫边区总动员委员会随之宣告成立（主任王文彬，秘书长高文甫），统一了对各级工、农、青、妇和自卫团等群众抗日团体的领导。到7月底，苏鲁豫边区群众抗日团体会员达17万人。1940年4月，苏鲁豫边区参议会和湖西专署相继建立，苏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已基本形成。

这个时期，冀鲁豫、鲁西、苏鲁豫三大抗日根据地共有100余万群众加入工、农、青、妇、自卫队、青抗先、模范班和儿童团等抗日团体。各地抗日群众运动的发展和领导的统一，为共产党、八路军在抗战相持阶段的困难时期坚持冀鲁豫平原抗日根据地斗争，打下了群众基础。

第二阶段，1940年下半年到1942年9月。中共地方组织和抗日民主政府发动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为坚持和巩固平原抗日根据地而艰苦奋斗。但由于对中共中央1939年11月关于深入群众工作的决定领会不深，对减租减息的伟大意义认识不足，致使大部分地区群众没有充分发动起来，基本群众优势没有树立起来，影响到根据地的巩固程度。

（一）根据地进入艰苦时期广大群众的英勇斗争。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伪军对边区加紧“扫荡”和“封锁”，国民党顽军、

反动会道门和土匪也乘机兴风作浪。1940年6月10日至18日，日军2万余兵力对冀鲁豫边区进行大“扫荡”。顽军石友三也于6月28日重返濮阳、濮县、清丰、观城一带。驻单县的国民党山东省第十一行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朱世勤也积极进行反共磨擦活动。这时国民党沛县县长冯子固部和丰县县长董玉钰部转向反共，包围袭击抗日武装和抗日群众，企图迫使中共退出沛县和丰县县境。反动会道门头子、汉奸朱存楨等在大峰山区和肥城周围组织红枪会暴动，配合日军向中共进攻。反动“快道会”也在不到两个月内蔓延到濮阳北部、东部和清丰、南乐、滑县及观城一带，对边区抗日根据地中心区造成很大威胁。至1940年底，冀鲁豫区遭受严重损失，抗日根据地缩小了3/4；鲁西和苏鲁豫抗日根据地也进入艰苦时期。

1941年7月，根据中共中央和北方局的决定，鲁西与冀鲁豫两区合并，成立冀鲁豫区党委、军区和行署，隶属中共中央太行分局、晋冀鲁豫军区和晋冀鲁豫边区政府领导；湖西地区划归中共中央山东分局领导，从而统一和加强了发动和组织群众对敌斗争的力量。9月间，鲁西与冀鲁豫两区群众团体也合并统一，边区工教总会（主任王震宇）、农教总会（主任高元贵，副主任许敬贤）、青救总会（主任王克，副主任杨泽江）、妇救总会（主任郭军，后为吴亚男，副主任范世钧）、文联筹委会（主任鲁西良）先后建立起来。

为了粉碎日、伪、顽、会、匪的进攻，坚持和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在边区党和政府领导下，工、农、青、妇、儿童团、自卫队、模范班、青抗先等各群众团体，积极动员群众参军参战、破路、拆楼、打狗、锄奸、配合军队作战。1940年7月，在第二次反击顽军石友三的作战中，濮阳、濮县、范县武工队、县大队和民兵，积极配合主力，孤立顽军据点，消灭零星外出抢粮、抓丁的顽军，发挥了巨大作用。各群众团体配合部队和政府，派出大批干部深入敌区和有会道门的地区发动群众，以各种方式开展反对顽军和反动会道门的政治攻势，广泛宣传、揭露会道门被日伪、顽军利

用，被地主、流氓操纵，来反对八路军，破坏抗战的本质；对正在酝酿组织会道门的地区，规定不筹粮、款，暂停打狗、破路；强调各部队以模范的群众纪律来影响、争取群众，大批干部深入会道门群众中去进行争取、瓦解工作。因此，会道门很快分化，一部分倾向于中共，抗日反顽；一部分转为中立，直南一带的反动会道门相继瓦解，只有少数会道门仍暗中进行活动。1940年8月至12月，国民党顽军6000余人包围鲁西南。根据地党政机关以200余人的武装，在曹县刘岗、曹楼、伊庄为中心的东西不过8华里、南北不过20华里的区域同顽军周旋，坚决依靠群众，利用战斗空隙实行减租减息，充分发动群众，做好统战工作，团结战斗，坚持三村斗争达四个半月之久，创造了坚持平原抗日根据地斗争的范例，在鲁西南广大群众中赢得很高的声望，为以后根据地斗争和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1941年1月以后，广大民兵密切配合八路军主力进行反封锁斗争，先后拔除许多敌人据点，并攻克内黄县城。在对南乐至清丰、濮阳至滑县等敌人公路封锁线进行的大破击战中，广大群众积极参战，给敌人以重大打击。边区各群众团体及其干部在坚持抗日根据地的英勇斗争中，不断进行反“蚕食”、反“扫荡”斗争，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付出了很大牺牲。1942年春，日军对观城县邵庄屯一带“扫荡”，冀鲁豫边区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总会机关部分领导遭敌包围，近20人被逮捕，其中一人受伤，泰西青救分会主任雷清亮和边区文联李育仁光荣牺牲。

在反对敌人分割、“蚕食”、封锁、“扫荡”的斗争中，在中共冀鲁豫区党委领导下，不仅加强了整军和派遣游击支队的工作，而且整顿训练了地方武装和民兵、自卫队，逐步形成了广大群众性的民兵联防组织。若干个武工队深入敌占区，宣传和组织群众，争取、瓦解伪军伪组织，建立秘密的抗日政权和群众组织，开展对敌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的群众性斗争。1942年7月，南乐县东节村民兵乘敌人要民夫之机，混入本村敌人炮楼，打死日军9人，缴获机枪1挺、步枪7支、手枪2支、子弹6000余发，并将炮楼烧毁，受到

军区和行署嘉奖。南乐县张庄集、樊村、李家村、杜家村、阎村、武家村建立起6村民兵联防，在周围敌人碉堡林立的险恶环境下，多次粉碎日伪军的进攻。冀鲁豫行署机关、五分区后方医院、被服厂、枪械厂等都曾在这里设置或驻扎。到1942年底、1943年初，全区组织了142支小部队和游击支队，深入敌占区，发动组织群众，开展对敌斗争。全区参加民兵联防组织的人员由19358人发展到222153人，先后动员8万多群众破路140多次，平毁封锁沟240多华里，在敌占区较普遍地建立了抗日的两面政权。这对于粉碎敌人对边区抗日根据地的进一步分割、“蚕食”，起了重要作用。

这一时期，边区工、农、青、妇、文等群众团体在党的领导下，广泛开展了生产救灾活动，帮助群众战胜敌人和天灾带来的严重困难。1941年4月12日至19日，日军对以内黄县为中心的沙区进行毁灭性的“扫荡”，实行“三光政策”。全区被杀害群众约4000人，53户被杀绝，许多房屋、村庄被烧毁，大批粮食、种子、耕畜、农具被抢走。内黄县被烧毁房屋21159间，被抢走、烧毁粮食66228担；高陵县被烧毁房屋2844间，抢走、烧毁粮食66164担。沙区人民的经济支柱之一枣树被砍毁5万余棵。“扫荡”过后，冀鲁豫区党委、行署、军区和救国总会及一、二地委与专署，立即抽调干部120余名，组成5个善后工作队，到沙区进行慰问和救灾。半个月內，工作团走遍125个村庄，在75个急赈村救济1410个急赈户。行署拨款1万元，无息贷款1万元。各界人民捐助6万余元。边区党政军民机关和人民省吃俭用，捐助了大量粮食、种子、农具、衣服、锅碗、席棚等物资和生活必需品。同时，边区部队对乘机袭扰的敌伪、土匪和会道门进行了打击和镇压。这样，很快稳定了沙区根据地局势。1942年秋，边区遭受大面积旱灾和蝗灾，大批群众饿死，外逃者不计其数。在鲁西北，由于日伪、顽军的残酷掠夺和严重自然灾害，堂邑、冠县、聊城间方圆四五十华里形成“无人区”，南乐县1.7万余人饥饿而死。面临这一严重情况，全区将救灾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广泛动员和组织群众合围扑打蝗虫。政府发放借款、

贷款，领导群众生产自救。在鲁西北和以内黄县为中心的沙区，还发动贫苦农民开展了向地主借粮斗争，并从濮范观中心区运去粮食430万斤，赈济灾民，从而帮助灾区群众渡过了难关。

为适应严酷斗争局面，贯彻中共中央精兵简政政策，区党委于1942年9月5日作出《关于组织各级抗联的决定》，将边区各级工、农、青、妇抗日救国会合并为各级抗联（边区各级工、农、青、妇抗日救国会联合会）。县以上工、农、青、妇合并为抗联后，取消原独立领导系统，设立各级抗联执行委员会、常委会，下设组织部、宣传部、妇女部、青年部和秘书处。根据地基本区的区、村不组织抗联，各救国会仍保持独立组织，归县抗联统一领导。游击根据地和敌占区的区、村组织抗联，但人员较精干。这不仅紧缩了各级群众团体领导机关，克服了头重脚轻的现象，有利于加强群众团体的统一领导和工作，而且选派大批得力群众团体干部加强地、县党委和抗联会的领导，对于切实深入群众和组织群众，开展民主民生运动，有重要的意义。

（二）放松减租减息、发动群众的沉痛教训。这个时期，在发动群众上是有成绩的，坚持了平原抗日根据地斗争，但是教训也是很沉痛的。主要是对实行减租减息、发动农民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措施不力，致使大部分地区基本群众优势没有树立起来，封建剥削制度没有得到应有的削弱。地主阶级占有大量土地，贫苦农民少地无地。在漳河下游地区（安阳东部、临漳、内黄等县）土地高度集中，据调查，战前有60—70%的土地集中在5—7%的地主手里。鲁西南地区土地也比较集中。濮县、范县、鄄城一带土地比较分散，地主拥有的土地也占土地总数15%左右。这种封建土地占有关系，直到1941年、1942年，并未发生明显的变化。据1941年12月对南乐县王洛集、内黄县牛马张固、范县后冯固和李菜园、观城县方庙等4县5个代表村的调查：无地的21户，占总户数3.8%，占总人口2.1%；贫农182户，占总户数33.2%，占总人口31.3%，占总地亩12.3%，每人平均地1.4亩；中农254户，占总户数46.4%，占总人

口50%，占总地亩48.7%，每人平均地3.5亩；富农69户，占总户数12.6%，占总人口12.6%，占总地亩23.5%，每人平均地6.8亩；地主22户，占总户数4%，占总人口4%，占总地亩15.5%，每人平均地14.2亩。就是说，仅占农村人口4%的地主，占有15%以上的土地，而占人口33%以上的赤贫和贫农，只占土地的12.3%。详见下页表①：

地主阶级利用封建土地关系剥削农民，主要通行两种租佃形式：一是大种地，即地主把土地租给佃户，耕畜、农具、种子、肥料等全由佃户负担，土地收获物按约定租率交给地主，一般是对半分，也有将60%甚至70%交给地主的；二是小种地，即土地、耕畜、农具、种子、肥料由地主出，佃户只出劳动力，收获物一般按麦季80%、秋季70%的租率，也有的按麦季90%、秋季80%的租率交给地主。此外，佃户还要义务为地主打水、喂牲口、织布、缝衣、放猪、放羊等。在鲁西南还有所谓课地，即死租地，地主只管按租率收取定额地租，不管生产成本和工具，也不管丰年或歉年，甚至不出土地负担。课地的租率，依据对许寺村的调查，高达80%。搞了减租减息增资的一些地方，地主反攻，退佃解雇，民众情绪低落。如滑县寺台村，佃户20个，雇工19个，退佃7个，解雇14个，不退者多为明减暗不减。高利贷盘剥更厉害，抗战前大多数地区有2/3的农户负债，年利一般在4分、5分，甚至“驴打滚”。地主阶级还利用“黑地”转嫁负担，造成地主地多交公粮少，贫苦农民地少交公粮多的不合理现象。如范县当时的“黑地”占土地面积的60%，地主把负担大部分压在基本群众身上。某村有地30顷，交公粮地仅占17顷，其负担为：地主12%，富农14%，中农12%，贫农62%。在以种枣和花生为主的沙区，地主、高利贷者与商人勾结，以极低的价格收买农民的枣和花生，以昂贵的价格卖给农民粮食和其他必需品，农民不得不借高利贷，“卖青苗”来过活。据1940年

① 《冀鲁豫边区环境形势及村政权建设现状报告》，1942年8月。

冀鲁豫边区4县5个代表村土地调查(1941年12月)

类别	县村数 项目	南乐县 王洛集		内黄县 牛马张固		范县 后冯固		范县 李菜园		观城县 方庙		总计	
		实有数	%	实有数	%	实有数	%	实有数	%	实有数	%	实有数	%
		无地	户数	2	1.4	10	7	2	2.4	2	3.6	5	4.3
	人口	2	0.3	25	3	6	1.2	7	1.9	24	4.2	64	2.1
贫	户数	56	39.7	45	29	32	39.4	15	26.8	34	29.3	182	33.2
	人口	250	35.2	240	28	217	43	67	18.5	162	28.1	936	31.3
	地亩	350	16.5	356	11	314	19	105	8.6	220	8.7	1345	12.3
农	人均	1.4		1.5		1.4		1.5		1.3		1.4	
	户均	6.2		8		9.8		7		6.5		7.9	
	户数	64	45.4	72	47	39	47.5	32	57.1	47	10.5	254	46.4
中	人口	332	46.8	428	50	239	48	243	66.9	254	44.1	1496	50
	地亩	1096	51.7	1511	45	1022	61	788	64.5	893	35.4	5310	48.7
	人均	3.3		3.5		4.2		3.2		3.9		3.5	
农	户均	17.1		21		26.2		24.6		19		20.9	
	户数	16	11.4	19	12	7	8.3	6	10	21	18.1	69	12.6
	人口	118	16.6	98	12	29	6	36	10	94	16.3	375	12.6
富	地亩	598	28.3	770	23	242	14	223	18.2	727	28.7	2560	23.5
	人均	5.1		7.8		8.4		6.2		7.7		6.8	
	户均	37.3		40.5		34.6		37		34.6		37.1	
地	户数	3	2.1	7	5	2	2.4	1	1.8	9	7.8	22	4
	人口	8	1.1	51	7	8	1.8	10	2.7	42	7.3	119	4
	地亩	74	3.5	719	21	100	6	106	8.7	685	27.2	1684	15.5
主	人均	9.3		14.1		12.5		10.6		16.3		14.2	
	户均	24.7		107.2		50		106		76.1		81.1	
	户数	141	100	153	100	82	100	56	100	116	100	548	100
总	人口	710	100	842	100	499	100	363	100	576	100	2990	100
	地亩	2118	100	3356	100	1678	100	1222	100	2525	100	10899	100
	人均	2.98		4		3.4		3.4		4.4		3.6	
计	户均	16		21.9		20.9		21.8		21.7		19.9	

统计，沙区农民把所有的东西全部卖光，也还不清后河村地主的债款。基层政权干部不少是地主、富农或其代理人，有的本身就是恶霸、坏分子。如观城一区，村政权虽经过改造，但63个村的村长中，小商人、旧政权人员、旧军人占1/3，他们多被地主、富农所控制和利用，不能代表基本群众的利益，根本谈不上实行民主政治。广大雇佣贫农生活无保障，经济上被剥削，政治上无地位。

由于当时领导上认识不足，未能放手发动群众认真实行减租减息，对封建剥削制度触动不大，基层政权没有得到根本改造，农村中阶级力量的对比，基本上还是封建地主阶级占优势，基本群众优势尚未形成，广大群众的抗战积极性受到影响。这种状况，严重地影响着坚持边区长期抗战和各项建设，根据地并不十分巩固。在1941—1942年敌伪顽军的夹击下，边区根据地出现了向后退缩的局面。根据地1941年缩小1/3，1942年又缩小1/5。在边区，有敌伪军66300人，据点1098个，国民党顽军3.8万人，公路173条，封锁沟30余条，封锁墙3道，根据地被分割为濮范观中心区和鲁西北、沙区、鲁西南、湖西及泰西与运东等6小块。加之严重的旱灾、虫灾，根据地财政经济极端困难。粮食定量部队减少50%，地方工作人员最困难时每人每天只能吃到2两粮食。冀鲁豫根据地面临空前困难，处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开展民主民生斗争，把广大群众真正发动起来，成为巩固和建设根据地的迫切需要。

第三阶段，从1942年9月至1945年9月。在总结过去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紧紧抓住发动群众这个中心环节，深入开展减租减息、民主民生和大生产运动，为巩固与扩大根据地，夺取抗战胜利而斗争，全边区群众运动形成新的高潮。

(一)全边区中心任务转变为实行减租减息、发动群众。中共中央早在1939年11月《关于深入群众工作的决定》中就指出：共产党必须依靠群众，深入群众工作，获得广大群众的拥护，才能克服投降与反共危险，巩固统一战线，争取继续抗日。并要求在我军活动的区域，实行有利于广大抗日民众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在经济

改革方面，必须实行减租减息，废止苛捐杂税，改善工人生活；在政治改革方面，必须实行民选，改造政权。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共中央于1942年1月发出《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进一步指出党在各根据地的土地政策是：一面实行减租减息，一面实行交租交息。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中共北方局于6月30日在对冀鲁豫边区工作的指示中强调：冀鲁豫边区已进入空前艰苦时期，必须反对空谈，切实发动群众，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在基本区，坚决实行减租减息，反对贪污浪费等，联系改造村政权，整顿或建立党支部；在敌占区，发动群众须从保护群众利益、减轻群众对敌负担、反支差、反“蚕食”开始，号召群众武装自卫；在敌统治薄弱的敌占区，开展隐蔽的游击战争，以维系人心与保护群众利益去发动群众。并指出：发动群众是当前最主要的任务，是开展一切工作的中心环节，只有更进一步依靠群众，才能克服边区目前存在着的严重危险。根据中共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冀鲁豫区党委1942年7月召开了民运工作会议。会议总结了1940年以来未能在全区认真实行减租减息、发动群众的教训。中共北方局宣传部长李大章代表北方局在会议讲话中指出：目前广大群众最迫切要求解决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是“民主民生工作的彻底执行”，群众运动、巩固党、发展人民武装三大任务都是“以民主民生问题的解决为基础的”。这次会议对开展民主民生运动的组织、领导和步骤作出了决定。9月，刘少奇由华中回延安途经冀鲁豫区，又介绍了华中经验，指出了冀鲁豫没有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运动的问题，并提出了批评和具体意见。他指出：你们没有被敌人打垮、挤走，保持了华中与华北根据地的联系，是很大的成绩。同时强调要树立牢固的群众观点，指出：如果不迅速把群众发动起来，给群众看得见的物质利益，根据地就不能巩固。因为得不到群众的支持，总有一天，敌人会把你们挤垮、赶走。没有牢固的群众观念，不搞减租减息，就是机会主义^①。为贯彻中共中央和刘少奇放手发动群众进行减租

① 《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大事记》，第171页。

减息的指示，冀鲁豫区党委在总结本区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把广泛开展减租减息民主民生运动，深入发动群众作为全区的中心工作。10月，根据中共北方局的决定，黄敬调任冀鲁豫区党委书记，湖西地区划归冀鲁豫区党委领导。11月至12月，黄敬主持召开了全区高级干部会议，并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刘少奇的指示，以及自己的调查研究，在会上作了《边区的形势与任务》的报告。他精辟地分析了边区的形势，正确地提出了边区的中心任务是发动群众。指出：抗日根据地建设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中心环节。开辟和创造根据地时期过去后即转入巩固时期，巩固时期的中心是发动群众。

“我们边区自从根据地的局面打开以后，在相当长时期中没有抓紧发动群众这个环子。”“基本群众未得到应有的民主民生利益，因此，根据地的建设与巩固程度未得到应有成绩。”又指出：发动群众是巩固与建设根据地的中心一环，“轻视群众，没有群众观念，是共产党员忘本的行为”。会议对全区发动群众工作做了全面部署，要求在基本区放手发动群众进行民主民生斗争，并针对敌占区、边缘区和敌占区的不同情况，提出了发动群众的不同口号、内容和斗争形式。这次会议，标志着全区党的中心实现了向实行减租减息、发动群众的伟大转变。

（二）濮县、范县等地民主民生运动的试点及在全区的推广。冀鲁豫区党委为了取得开展民主民生运动的经验，以正确地指导全区群众运动，于1942年9月下旬即从区党委党校、行署行政干校、军区陆军学校和边区抗联总会举办的干部训练班中抽调干部500余名，组成政民工作队（亦称濮范减租减息工作团），由信锡华、孙光、刘星、高元贵率领，到濮范中心区（杨节、徐麟村分别任濮、范政民工作队长），开展以减租减息、反贪污、查“黑地”、合理负担、改造区村政权为主要内容的民主民生群众运动。工作队的工作方针是，协助当地抗联发动农民对地主封建势力展开斗争，通过斗争，树立基本群众首先是雇佣贫农在农村的优势。在工作方法和步骤上，可以先从减租减息入手，也可以先从反贪污、合理负担开

始，通过斗争削弱地主势力，改造政权，树立基本群众优势，在新的基础上达到团结地主抗日。在濮县，国民党军队曾长期盘踞，顽固势力从上到下占优势，广大群众包括中间势力具有强烈的民主民生的要求。因此，先从民主斗争入手，即先搞反贪污、查“黑地”、合理负担的斗争，然后转入减租减息增佃，再转入彻底的民主斗争，即改造政权，最后达到发展抗日力量的目的。在范县，共产党、八路军坚持了优势，但未抓紧发动群众的中心环节，基本群众不满意，顽固势力保持着在基层的统治地位，并积累了对付共产党的经验。因此，先从民生斗争入手，即先搞减租增佃增资，在民生斗争中把顽固分子面貌揭穿、孤立起来，把基本群众组织起来，然后转入民主斗争，而后再达到提高抗日斗争水平的目的。到年底，濮、范中心区基本群众已发动起来，民主民生运动取得了巨大胜利。1943年春，二地委总结了濮、范开展民主民生运动的经验。黄敬《在濮县、范县工作总结大会上的发言》中，分析了边区农村各阶层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以及濮、范两县的不同环境，明确地肯定了濮县、范县民主民生运动的试点经验。他指出：以民主民生为中心是正确的，但是各地历史和环境不同，“斗争的道路与斗争的方法是不同的”。又提出：“反贪污斗争、合理负担、查‘黑地’表面上看是民生斗争，实际上是民主斗争，也就是说基本上是政治斗争。”民主民生斗争究竟哪一种斗争先开始，“必须从具体条件出发”。濮、范试点的成功，打开了全区开展民主民生运动的道路。与此同时，纪登奎、金凤、杨节、陈东生等在鄄城县旧城集进行试点，他们认真与群众同吃、同住，向贫苦农民学习，发动群众自己起来开展减租减息增资斗争，改造农村政权，实行民兵联防，加强对敌斗争，也创造了新的经验。

区党委在取得濮、范经验后，即在全区搞不同类型的试点，逐步推广到面，使全区民主民生运动有步骤地展开。1942年9月，区党委宣传部长张承先到鲁西南领导发动群众工作。次年春，区党委组成由抗联负责人高元贵、逯昆玉率领的鲁西南减租减息工作团，协

助开展民主民生运动。他们在深入发动群众过程中，发展积极分子入党，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并组织群众团体，改造由地主掌握的村政权，树立了雇佃贫农在农村的优势。

经过一年的民主民生运动，全边区主要是基本区群众普遍发动起来，农村的阶级关系开始改变，大部分农民参加了农救会，部分青年、妇女参加了自己的组织，基本群众生活得到了初步的改善，政治上有了地位，开始掌握村政权。通过群众运动，农民群众看到了自己的力量，农村党组织得到巩固与扩大，培养了大批干部。但是运动发展不平衡，有些地方运动中出现了包办代替的现象，主要是工作队包办代替地方组织，干部包办代替群众，束缚了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斗争虽然进行了，但群众没有真正发动起来，工作队撤走后，群众工作即陷入消沉，斗争成果难以巩固。

（三）滑县民主民生运动深入发展。根据中共北方局的决定，1943年11月成立冀鲁豫分局，黄敬任书记，宋任穷任副书记，统一领导冀鲁豫、冀南两区党的工作，从而进一步加强对边区民主民生群众运动的领导。1944年春，冀鲁豫分局严肃指出和批评了前段运动中那种不相信群众、缺乏群众观念的包办代替现象。黄敬亲自对第八分区几个村的群众运动状况进行调查，在地委召开的县委书记座谈会上，作了关于发动群众及目前中心工作问题的重要讲话。指出：目前在一些地方，群众工作很沉闷，群众对我们很冷淡，主要问题是前段对发动群众不放手，民主民生运动搞得不彻底。会后，分局从领导上作了检讨，解决了怕群众、不相信群众的问题，决定在全区深入放手地掀起发动群众的热潮。

根据分局的指示，1944年初，冀鲁豫区党委决定实行大胆放手的领导方法，反对不相信群众的包办代替的作风，深入发动群众，开展全区民主民生运动。《冀鲁豫日报》发表《打破消沉局面》的社论，号召大胆放手，在全区广泛开展减租减息、增资、反“黑地”、反贪污的群众运动。4月，冀鲁豫区党委又决定在四地委所辖滑县深入发动群众，进行民主民生斗争的试点，区党委、地委、边

区抗联总会及地区抗联选派李进宝等300多名干部帮助工作。他们从查减工作入手，以民主民生斗争为主要内容，开展雇佃贫运动。通过救济灾荒，解决群众生活和春耕生产问题，把群众初步发动起来。接着，发动雇佃农开展减租减息、增资增佃的民生斗争，即要求地主、富农实行“二五”减租（减租25%）、“分半减息”（月息减至1分半）、“五一”增资（工资增加20%），向前追算到1942年初边区颁发减租减息法令以来地主、债主拒减的租、息和拒增的工资，使雇佃农从斗争中获得直接经济利益，改善了生活，提高了斗争积极性。然后，发动群众开展反贪污、反恶霸的民主斗争，重点打击鱼肉乡民、罪大恶极的地主，改换村长，选举农会干部，巩固农村阵地，并实行累进税合理负担，结合开展查“黑地”的斗争，减轻了贫农和中农的田税负担。还通过掌握地经纪，控制地价，以较低价格从地主手里购买土地，部分地解决了雇佃贫农的土地要求。在运动中，明确提出照顾贫农的原则，多方满足贫农的要求，强调执行依靠雇佃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有区别地削弱封建势力，使雇佃贫农成为农村中的骨干。在运动中，有的先从民主入手，有的先从民生入手。他们大胆放手地领导，改变过去那种包办代替的作法，最大限度地依靠群众，把相信群众、放手发动群众与积极正确的引导结合起来，把农民的“私仇”、“私愤”变成对不法地主的“公仇”、“公愤”，使群众组织起来，形成以雇佃贫为核心的广大农民的运动；先运动起来的村发展其他村，村村发展，联合斗争。因此，在很短的时间里，在全县造成了农民群众自己的规模宏大的运动，有力地削弱了封建剥削制度，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反动势力，树立了雇佃贫农的优势。

滑县在发动农民中，解决了如何依靠贫农的问题，为全区民主民生运动的深入开展提供了一些新的经验。冀鲁豫四地委和冀鲁豫分局相继总结和推广了滑县经验。1944年10月间，在《冀鲁豫日报》上发表了四地委副书记赵紫阳署名的《滑县群众是如何发动起来的》文章。分局通知各地，推广这一经验。滑县经验及其推广，

有力地推动了全区民主民生群众运动的深入发展。1944年底，张霖之在《冀鲁豫日报》上发表《站稳脚根，放下圈子》的文章，要求各级领导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深入实际，站稳脚根，放下“圈子”，真正贯彻大胆放手，并要防止群众运动中出现的偏向。各地在民主民生运动中集中群众的智慧，创造了许多很好的经验和方法。到1945年春，一度消沉的群众运动又在全区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四）边区民主民生群众运动的重大成绩。濮阳经验、鲁西南经验、鄄北经验和滑县经验的总结与推广，使全区不断地掀起民主民生群众运动的热潮，日益深入，削弱了封建剥削制度，基本上摧垮了地主阶级在农村的统治，形成了雇佣贫农基本群众优势，农村的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起了根本性的变化。据濮阳温小屯村1945年的调查，运动前后，6户地主、富农占全村土地由21%降低为15%，94户雇佣贫农占全村土地由8.6%上升为13.6%。据滑县70个村的调查，从1944年4月到1945年1月，原1066个佃户人均地1.5亩，增加到人均地2.4亩，增长36%；原809户贫农中，有227户上升为中农；地主普遍出卖土地，以赔偿群众过去的损失，而雇佣贫农买地却成为一种风气。又如，范县群众查出杨二杂货的“黑地”13顷，罚了4倍，共210万斤粮食，几乎相当于全县公粮，群众和干部都很受鼓舞。在环境比较艰苦的水东地区的一些巩固区，也发动群众进行了赎地和减租减息的斗争。广大群众在斗争中大大提高了政治觉悟和组织程度。如1944年仅运西数县，参加各种抗日团体的群众即发展到12万人以上，灾民合作社社员达3万人，民兵增加到1.2万人以上。滑县黄庄205户925人，其中92人参加农教会，9人参加工教会，22人参加青教会，137人参加妇教会，65人参加儿童团，67人参加姊妹团，267人参加合作社，13人参加民兵。另一方面，在实行减租减息，保障基本群众的人权、政权（政治权利）、地权、财权之后，又实行了交租交息，保障地主阶级的人权、政权（政治权利）、地权、财权，调整了农村的阶级关系，争取地主合作抗日，巩固了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边区民主民生运动的胜利开展和基本群众优势的树立，为战胜困难，巩固与扩大抗日根据地，准备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与此同时，在接敌区、边缘区游击根据地，以反资敌、反贪污、反汉奸、反出夫为内容，采取政府发放贷款粮等措施，有时以公开的抗日斗争为主，有时以两面政策配合武装斗争，团结各阶层一致对敌，从而减轻了群众的损失，大大推动了群众运动的开展。在敌占区，以实行抗日两面政策、开展合法斗争为主，千方百计地减少群众对敌负担，保存民族抗日力量，有效地保护了群众的实际利益。如，尚和县一、二区原来处在敌伪顽的包围之中，经过共产党、八路军发动群众抗旱救灾，开展反贪污、反恶霸、反资敌、减租减息增资等斗争，建立了农教会、妇教会、青教会和儿童团，组织起民兵、自卫队，对敌伪据点实行联防和监视，因而使原来的敌占区变为游击区，游击区变为根据地，连敌人据点所在的村庄，共产党军政人员都能进去开展工作。

提倡大胆放手以后，迅速扭转了群众运动中包办代替的作风。但是，有些干部把大胆放手与执行党的政策对立起来，以为对群众进行党的政策教育会束缚群众，就是包办代替。加之，在民主运动阶段缺乏明确的政策约束，一些地区出现“推平”的作法，侵犯了中农利益。如七分区购买400支枪花300万元，负担几乎全部压在中农身上。一些地区发生了不执行政策、重罚蛮干的偏向。后期发生了消灭地主的倾向，对地主不分罪恶大小，守法与不守法，一律重罚；对富农打击过重。据滑县的材料，被斗地主约占80—90%，富农被斗争的约占50%。冀鲁豫分局在运动中察觉到了这种偏向的严重性，于1944年12月作出对中农政策的指示，指出：为使贫农和赤贫农得到果实而损害中农，这是挖肉补疮的办法，必须纠正。在土地分散，没有地主、富农的村庄，应以贫雇农为骨干，团结中农，共同发展生产。1945年2月，分局作出了《关于纠正执行大胆放手中的偏向的指示》，强调指出：大胆放手是针对着边区群众工作中领

导不相信群众和包办代替提出来的，把大胆放手误认为是重罚蛮干，甚至取消领导，这是一种偏向；要求各级党委认真研究党的土地政策和中农政策，“细心地冷静地检查自己工作中这种倾向并加以迅速纠正”。根据分局的指示，区党委领导各地较快地纠正了上述“左”的偏差和错误，并妥善地做了善后工作。

（五）邓小平关于边区民主民生群众运动的重要总结。由于边区群众运动中一度出现一些偏向，虽经分局和区党委加以纠正，在部分干部中仍存在着不同认识和争议。1945年春，中共北方局派干部分赴滑县、濮县、濮阳三县进行调查研究，并听取滑县县委书记张华、县长程建明的专题汇报。在此基础上，为进一步统一对边区群众运动的认识，正确指导全区的群众运动，中共冀鲁豫分局于6月间召开群众工作会议。邓小平在会上对边区民主民生运动作了重要总结发言。他说：晋冀鲁豫区过去最沉痛的教训是在1940年、1941年没有真正执行中央1939年冬天关于群众工作的指示，“这影响到我们根据地工作的深入和巩固的程度”，“形成一九四二年严重的困难，从主观上讲，这是重大原因之一。特别是冀南，一九四二年后敌情极端严重，丧失了放手发动群众的时机，最为可惜。”邓小平充分估价了边区民主民生运动的成绩，指出：“这次运动是在中央正确路线下进行的，而且获得很大成绩”。第一，这次运动抓住了减租减息发动群众这个中心环节，从而彻底解决了多年来未能解决的减租减息和发动、组织、教育群众的问题。实践证明：不彻底解决这个中心环节问题，“其他各项任务都是很难完成的”。第二，比较好地解决了群众观点问题，克服了过去运动中那种包办代替的恩赐观点，在干部中树立起群众观念，相信群众的自觉性和创造性，因此，真正造成了广泛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群众自己组织起来，培养自己的领袖，运动的规模之大、之普遍，进展之快，是前所未有的。第三，这次运动明确提出了以雇佃农为核心和切实照顾贫农的方针。平原区有约占人口30%以上的贫农阶层（鲁西南有些村庄贫农约占70%），过去长期未能解决他

们的困难，未能把这一富有革命性的广大群众发动起来。这次运动，从减租增佃的雇佃运动开始，在民生斗争中把极大部分斗争果实分给贫农，使他们从长期贫困中解放出来，因而使贫农、雇农发挥了骨干作用，使他们上升到农会和乡村领导阶层的地位。第四，这次运动削弱了地主，打击了封建势力的气焰，而且由于运动的群众性和组织力量，使地主不易分化群众阵线和收买群众领袖，很难进行反攻倒算。第五，教育了干部，培养了大批新的本地农民干部。干部的思想由不相信群众到相信群众，由包办代替到信任群众的创造性和积极性；上级相信下级，使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因此，干部积极性大大提高，增强了上下团结、全党团结，使运动和各项工作出现了生气勃勃的景象。邓小平在讲话中还肯定了南乐县委在民主民生斗争取得胜利基础上引导群众及时转入生产运动的作法和经验，指出该县社会改革转生产及时，人心稳定，兵源充足，支前积极。另一方面，邓小平在讲话中，也指出了运动中存在的弱点和偏向，主要是大胆放手之下忽略了用党的策略教育群众，运动后期产生了“推平”的思想和“推平”的作法，伤害了中农，对地主和富农打击过重，斗争的方式比较简单等。他分析了这些弱点和偏向产生的原因，认为是在执行党的正确路线下所产生的，有些是在大运动中不可避免的。最后，邓小平对全区今后群众工作提出了意见：从全区来说，“仍应以发动群众为中心，务求减租减息的政策贯彻到底”。在原冀南区，这是目前迫切的中心任务。在水东地区，应适当地但是坚决地进行这一工作。在原冀鲁豫区，大的浪潮已经过去，但也不应放松对群众运动的领导，必须切实注意克服不平衡的状况，对不同类型的地区要区别进行工作。已进行减租减息的地区，要注意纠正偏差，切实团结中农，使各阶层安定下来，适时转入生产；还没有进行减租减息的地区，要吸取经验教训，少走弯路，充分发动群众，尽最大努力把减租减息搞得更好。这次分局群众工作会议和邓小平的总结讲话，对于统一全区干部的思想认识起了重大的作用，为全区群众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指出了明

确的方向。

(六)边区群众生产和抗日积极性的空前高涨。边区民主民生运动的开展，激发了群众生产和抗日的积极性。从1943年起，开展了生产救灾和变工互助、大生产运动。由于边区1942年秋季普遍歉收，1943年春荒极为严重。行署指示各级政府成立了生产救灾委员会，组织灾民以工代赈，生产自救；还发放春耕贷款，帮助群众生产渡荒，帮助贫苦农民赎回因灾荒而贱价卖给地主的土地和其他财产，同时，发动贫苦农民向地主、富农开展“借粮”斗争，使灾区人民战胜了春荒。1943年夏季，从边区西北部到东南部发生大面积蝗灾，严重地区飞蝗遮天盖地，一昼夜间就把大片秋禾吃光。经党政军民共同努力，基本战胜蝗灾，保住了秋苗。广大群众响应党的号召，积极实行变工互助，生产自救。据7个专区的不完全统计，参加变工队的有10540人，参加互助组的有90658人，从而促进了边区农业生产和财政经济状况的逐步好转。1942年秋粮征购时，最高的专区完成59%；而1943年麦季征收时，最低者完成67%。1944年春，遵照中共中央和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号召，该区军民因地制宜确定生产项目，组织妇女搞好纺织等家庭手工业，使大生产运动蓬勃发展起来。在群众未发动的地区，贯彻民主民生法令，解除群众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封建束缚，提高生产积极性。在接敌区，大力开展反资敌、反掠夺斗争，减轻人民负担。在濮范观中心区着力发动大生产运动。各军分区先后建立起小型兵工厂、各种民用工厂和农业生产基地，努力做到自给、半自给，改善军队生活，减轻人民负担。这年夏秋，冀鲁豫区又发生大面积蝗灾，各级政府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扑蝗运动，使灾情大为减轻。由于开展生产救灾和大生产运动，搞好“坚壁清野”，有效地防止敌人的掠夺和破坏，使群众渡过了灾荒，恢复了生产，边区财政收入增加，为巩固与扩大根据地，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提供了物质保证。

在开展民主民生和大生产运动的同时，积极发动群众参军参战支前，组织民兵、自卫队，实行民兵联防，配合主力部队深入接敌

区和游击区，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1944年春节后，全面掀起了青年参军参战的高潮。4月份以后，冀鲁豫军民连续展开对敌攻势作战，广大民兵和群众挖沟破路，开展政治宣传，配合部队攻克敌人据点数十处，歼灭大量日伪军，解放了大片地区和一些县城，进一步巩固与扩大了抗日根据地。据不完全统计，1944年全区有民兵103304人，民兵和自卫队配合主力作战的达4.5万人以上，仅民兵即作战1898次（二分区、水东未计在内），毙伤日军小队长以下54名，俘2名；毙伤伪军964名，俘501名，争取反正231名；歼匪66名；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和粮食；查获敌探、奸细484名。1945年4月，在南乐战役中，广大群众慰劳和支援军队，盛况空前。部队所经村庄，群众高呼拥护八路军口号，从村里送到村头，儿童团、姊妹团向部队献酒献烟。八路军攻入南乐后，妇救会、姊妹团、儿童团成群结队担着酒和鸡蛋，用大车拉着白馍、粉条、花生、猪肉去慰劳，并要求到火线去慰劳杀敌战士。虽经劝阻，她们还是派了代表穿过敌人两道火力封锁线，到距敌炮楼仅10米的最前线慰劳战士。从前线到后方医院，每隔二三华里搭一凉棚，由青年妇女、姊妹团员专门招待过路伤员吃饭、喝水。广大指战员很受鼓舞。1945年8月10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区党委、行署和军区立即号召全区军民实行总动员，解除日伪武装，维持社会秩序，保护人民利益，保卫抗战胜利果实。各县遵照命令，立即组织反攻营，扩建基干团。15日，边区抗联发出致各救会员、儿童团员、姊妹团员书，号召立即行动起来，参军参战，立即掀起参军参战热潮。仅金乡、单县、巨野3县就有3000余名青壮年参军。为了促进参军参战工作，行署发出《为使各级学校参加进军总动员工作的训令》，全区约60万名学生立即投入夺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宣传活动中。

在八年抗战中，边区军民团结战斗，取得了辉煌的战绩。至9月，除几个县城仍由日伪盘踞外，东起津浦，西至平汉，南跨陇海路，北连德石，纵横千里的广大地区，全获解放，边区扩大为拥有近2000万人口的根据地（含冀南区）。边区军民也蒙受了巨大损失，全区

(不含冀南区)被敌人杀害、失踪和被抓壮丁者共1331438人,损失物资折合小米(每斤100元法币计)约450.28亿斤^①。边区大规模抗日民主群众运动的胜利和根据地的空前壮大,是人民战争的胜利,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胜利,为全国抗战的胜利作出了伟大贡献。

二、解放战争时期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群众运动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在美国支援下大举进攻解放区,挑起全国规模的内战。中国人民渴望的国内和平民主未能实现,历史进入了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历史转变的关头,中国共产党把面临的种种困难和光明的前途向广大群众讲清楚,同广大群众亲密合作,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人团结自救,为彻底粉碎美蒋的进攻,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而奋斗。因此,冀鲁豫边区的群众运动转入了以完成土地改革为中心、支持人民解放战争为基本任务的新的时期。其发展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45年9月到1946年上半年。在新解放区发动群众开展反奸、清算运动,打垮日伪汉奸结合封建势力的反动统治。这是一个由减租减息向土地改革转变的时期。

(一)边区群众运动座谈会确定群众运动的新方针。面对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的危险,进一步发动群众成为巩固解放区、准备对付国民党进攻的一个关键。这时,冀鲁豫边区新收复区约占全区一半,未进行减租减息或双减不彻底的地区占一半以上,特别是新解放区农民群众过去长期在日伪与封建势力压榨下,生活困苦不堪。如博平县,大汉奸罗兆荣统治达7年之久,仅在3年中就杀害抗日人员家属575人,强占农民土地1479亩,敲诈群众97366468元(伪币),拆烧抗属房屋1498间。广大群众渴望复仇、翻身,迫切要求改善自己的经济生活 and 政治地位。1945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的指示,晋冀鲁豫中央

^①《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大事记》,第227页。

局^①对整个边区的群众运动作了部署，为冀鲁豫区在新的条件下开展群众运动指明了方向。冀鲁豫区党委根据中共中央和晋冀鲁豫中央局指示，在根据地中心区，发动群众，大力扩军，建立和壮大正规军，开展大生产运动；在新解放区，抓紧时机，建立政权和武装，放手发动群众进行减租减息。同时，根据形势的发展，将边区各级抗联改组为冀鲁豫区工农青妇联合总会（张承先为主任，姚会宾为工农部长，王萍为青年部副部长，范世钧为妇女部长），成立冀鲁豫区文联（王亚平任主任）。

1946年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为从政治上、军事上、思想上打下巩固的基础，冀鲁豫区党委和行署进一步集中力量，放手发动群众，坚决彻底地实施民主民生纲领。在老区，把可能抽调的干部集中到新解放区，将机关干部集中于群众工作。在新解放区，首先稳定社会秩序，宣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争取人心；然后，发动雇佃贫农，并以他们为核心，发动全体农民进行民主民生斗争，打击封建势力；在减租减息、回地、增资斗争中，先成立雇佃农、债户、卖地户等代表会，尔后建立农会。但是，由于照搬过去的一些做法，没有深入研究新解放区的实际，脱离新解放区多数群众的迫切要求，致使边区群众运动在三个月时间里没有多大的开展。这时地处边缘的新解放区曹县，创造了反奸、清算的经验，为边区树立了典型。曹县长期受汉奸与封建势力的统治，群众苦难深重。如四区：一般村庄当过伪军的青壮年约占全村青壮年的1/3，朱楼村的汉奸仅分队长以上、旅长以下的就有14个。大汉奸朱晓堂有地七八十顷，全乡240顷地，他占了1/3，但从来没交过公粮、支过差，繁重的负担都压在贫苦农民的身上。因此，发动群众首先从反奸、清算开始，在民主政权帮助下，打垮了几个汉奸统治堡垒。通过反

①1945年8月，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撤销北方局和冀鲁豫分局，成立晋冀鲁豫中央局，同时冀鲁豫与冀南两区分开。晋冀鲁豫中央局领导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个区党委。

奸、清算，全县128个村4600余人涌入了伸冤复仇的浪潮，没收了朱晓堂、王秋濯等9个大汉奸头子的财产，获得果实3471630元。群众在斗争中迅速克服了怕“变天”的思想，提高了觉悟。接着，转入减租减息增资斗争。全县除边沿区外，据5个基本区75个村统计，参加减租减息增资斗争的雇佣农有886人，共获得果实粮420519斤，盐16293斤，款561440元，土地168亩（工人增资数未计）^①。新解放区的长垣、杞县、阳谷、长清等县的农民群众，也自发地起来斗争汉奸、恶霸，清算他们的罪恶，并提出了强烈的土地要求。这说明，在广大的新解放区，必须迅速对日伪时期的汉奸和勾结日伪的恶霸地主进行斗争，不首先打垮日伪结合封建势力的反动统治，群众就发动不起来，减租减息就无法进行。

1946年3月26日，晋冀鲁豫中央局在《关于进一步发动群众工作的指示》中指出：目前新解放区的群众运动从诉苦、复仇、清算、反奸开始，是合于运动的规律的，“带有总结过去（清算犯罪）开辟未来（减租减息）的作用，斗争规模宏大而深入，顺而易举”。为贯彻这一指示，进一步开展边区群众运动，冀鲁豫区党委和边区工农青妇联合会总会于同年4月6日至21日召开边区群众运动工作座谈会。会议总结了前段开展群众运动的经验教训，纠正了部分干部因循雇佣贫独立运动的经验主义，肯定了新解放区开展诉苦清算群众运动的新方针，解决了诉苦清算运动中雇佣贫领导和中农关系及其处理方法等问题。区党委书记张玺在会上作了总结发言，指出边区群众运动三个月来之所以没有更大开展，是由于道路太窄，手脚太小。“这次会议，从下而上的清算了我们的狭隘的经验主义，解决了进一步开展群众工作的道路问题，从思想上清算了我们的片面群众观点，解决了边区从未解决的中农政策问题。”并强调指出：“单纯照顾中农与单纯照顾贫农，都是片面的阶级观点，它不是农

^①《曹县五个月来的群众运动》，载《冀鲁豫日报》1946年3月13日第3版。

民与地主斗争的观点，而是3亩地与5亩地斗争的观点。”会议要求：今后必须打破过去单纯雇佃贫运动的小圈子，从多数群众要求出发。在边沿区，以自卫斗争为主。在老区，要把查减和生产结合起来。在新解放区，未打开局面的地区，要从诉苦清算着手；雇佃贫运动打开局面的地区，要增加清算诉苦的新内容，使雇佃贫运动和清算运动结合起来；雇佃贫运动已经搞起来的，要以此为核心，开展大规模清算诉苦运动；清算诉苦运动已搞起来的，要立即增加减租减息增资的内容，把运动提高一步^①。这次座谈会在冀鲁豫边区群众运动史上，是一次有重要意义的会议，它从思想上破除了狭隘的经验主义，正确地解决了新解放区群众运动的方针和道路问题。

（二）全区反奸清算和查减运动的蓬勃开展。群众运动工作座谈会以后，冀鲁豫区党委、军区和行署即抽调300余名干部分赴定陶、南乐等新解放区，各地委也陆续抽调干部深入新解放区，先行试点，以点带面，发动群众，开展反奸清算运动。行署还发出指示，要求全区各级政府工作人员积极参加群众运动，在新解放区肃清敌伪残余势力，给罪大恶极的汉奸、恶霸地主以严厉惩处。《冀鲁豫日报》5月4日发表《组织起雄伟的力量，向新解放区大进军》的社论。在冀鲁豫新解放区，一个以反奸清算为中心的群众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平阴县20万群众公审处决了大汉奸刘绪安，临泽县4万群众公审处决了大特务刘鉴如，泰安、鄆城、汶上、东垣、单县、宁阳、成武、郟北、曹县、菏泽等10县6万群众向大汉奸吴乃九、李子才、周方略、穆远岐、林荣房、李肇凯等讨还血债，从而大大鼓舞了广大群众“有仇报仇，有冤伸冤”的斗争热情。各地召开群众大会，政府参加群众运动，公开给群众撑腰；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大胆团结和使用各种积极分子，坚决走群众路线，让群众当家做主；迅速斗争处决了一批罪大恶极的汉奸、恶霸分子，

^① 《冀鲁豫区党委、联合会总会召开边区群众座谈会，确定新区清算诉苦方针》，载《冀鲁豫日报》1946年4月21日第2版。

没收其财产，并在斗争中建立起乡、村政权。这样，广大群众不仅在政治上翻了身，在经济上也获得一些财物和土地。如二地委于2月间抽调600余名干部，集中党政军民的力量参加群众运动，对压在群众身上的残余敌伪势力予以坚决镇压、打击。至6月，据济宁、嘉祥、巨野、东平、南旺、汶上、昆山试验区、鄄北、郓北、临泽、郓巨、张秋等15个县的不完全统计，新解放区4120余村中（寿张、张秋不在内），群众已发动和初步发动起来的有2775个村，在177.2万余人口中，工、农、青、妇等各种组织的群众达86638人，参加斗争会4987次。又如鱼台县，在雇佃贫运动基础上，开展反奸清算、反恶霸、倒粮倒息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迅速造成风狂雨暴、排山倒海之势，20天内，仅3个区就获得果实粮2920915斤、款271083元、地7927亩、房屋338间、布16918尺、油坊6个、大车11辆、枪24支、酒馆1个。济宁、菏泽等城市的反奸诉苦群众运动也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如菏泽市，短短半月多，召开大小斗争会14次，参加运动的群众达万余人，包括工人、市民、教员、学生，以及城外的杨庄（南华县属）、水王庄（菏泽县属）等村的农民，获得了大量的果实。仅9家烟厂就检举出汉奸股金300余万元，没收汉奸陈诚、葛敏斋等人财产也不下300万元。

边区反奸清算群众运动的胜利开展，摧垮了敌伪汉奸结合封建势力的统治，造成了农村土地财产关系的重大变化，各地汉奸、恶霸地主的土地财产大部分转到了农民群众手中。广大农民群众在运动中越来越强烈地要求得到土地，不少地方农民自发地搞了每人平均“3亩推平”^①。冀鲁豫区党委因势利导，及时指导运动由反奸清

^①这种做法，反映了广大农民强烈的土地要求，但超出了中共中央“五四”指示中关于处理土地问题的精神，伤害了中农的利益，带有“左”的倾向。对此，区党委采取已平分者尊重现状，未平分者不提倡的政策，强调不得伤害中农利益。后来，由于片面强调平分土地，这种做法发展为全区性的“左”的偏差，1948年全党纠偏开始后才逐步得到纠正。

算转向减租减息、倒租倒息、雇工增资、赎地等斗争，用多种合法形式来变更不合理的土地关系，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并创造了不少成功的做法和经验。与此同时，在老解放区深入开展了复查减租减息的群众运动。在查减工作中整顿群众组织，解决抗战时期的遗留问题，在减租减息不彻底的地区继续进行民主民生斗争，进一步变更不合理的土地关系和租佃关系。新解放区的反奸清算运动和老解放区的查减运动，为边区从减租减息向土地改革的转变创造了条件，也为胜利进行解放战争准备了群众基础。

这一时期，边区群众在区党委和行署领导下，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和反对蒋介石所谓“黄河归故”的斗争^①。1946年2月12日，行署发出大生产的指示，要求机关、学校全年生产达到粮食、经费自给50%，至少也要达到一个至两个月的粮食和部分公杂费的自给。区党委直属机关召开了生产动员大会，要求党、政、军、民领导机关带头搞好大生产运动，减轻人民负担。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全区广大军民掀起了新的大生产运动。南乐、清丰、观城15万妇女恢复草帽辫生产。济宁也积极从事猾子皮生产。1946年12月，国民党反动当局开始在花园口堵口，妄图水淹黄河中下游冀鲁豫和山东渤海解放区数百万人民，“以水代兵”，配合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进攻。为了粉碎蒋介石的阴谋，在中共中央、晋冀鲁豫中央局和晋冀鲁豫边区政府领导下，冀鲁豫区党委和行署发动全区广大群众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菏泽、临泽等地15万群众集会，签名抗议国民党的罪恶

①1938年6月9日，蒋介石为阻止日军西进，下令在花园口炸堤决口，使黄河改道，造成河南、安徽、江苏三省连年灾荒的黄泛区。1946年12月27日，国民党政府下令在花园口堵口，将部分黄水放入故道。1947年3月15日，蒋介石又下令花园口堵口工程合龙，将黄水全部放入故道。他们的企图是用水患来毁灭解放区。在中共中央领导下，冀鲁豫解放区军民奋起进行斗争和抢险。详见《黄河归故斗争资料选》专辑。

行径。共产党在黄河归故问题上赢得了全国舆论的支持，争取了时间。边区沿河人民，在经费、器材严重不足，国民党军频繁袭扰的情况下，抓紧筑堤防水自救，前后有30万民工上堤，完成土方1300多万立方米。在国民党花园口堵口工程合龙前，治河复堤工程已大部竣工，从而保证了解放区数百万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也为后来支援解放军渡河作战提供了条件。

第二阶段，1946年下半年至1949年9月。放手发动群众，完成土地改革的伟大历史任务，参军参战，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这是边区群众运动蓬勃发展，取得伟大胜利的时期。

（一）执行“五四”指示，初步解决农民土地问题。1946年6月，国民党以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发动了全面内战。冀鲁豫区党委遵照中共中央和晋冀鲁豫中央局的指示，在领导全区人民大力支援前线的同时，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运动。还在5月间，中共中央就发出《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将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改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指出：“解决解放区的土地问题，是党目前最基本的历史任务，是目前一切工作的最基本环节。”这标志着解放区土地改革的正式开始。晋冀鲁豫中央局于6月10日在邯郸召开土地会议，贯彻“五四”指示，决定：在腹心区，立即开展土地改革运动，解决贫雇农的土地问题，同时，要团结中农，争取农村人口90%的多数；在边沿区，集中力量斗争汉奸、恶霸，坚决打击“还乡团”，继续进行减租减息；全区要结合土改，进行保卫边区的教育，大量发展民兵。据此，冀鲁豫区党委决定放手发动群众，继续深入开展反奸清算和查减斗争，采取各种方式变更土地关系，在新解放区争取六个月内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在老区以生产运动为中心，在减租减息不彻底的地区继续进行查减运动。6月15日，冀鲁豫行署发出《关于发动群众工作的再次指示》，明确规定了有关政策：（1）没收大汉奸的财产，除留一部维持其家庭生活外，分配给复员、退伍、荣誉军人和贫苦军属、工属及贫苦群众；（2）

恶霸地主非法所得及其非法行为使群众遭受的一切损失，应予清算和赔偿；（3）政府减租法令规定以外的超经济额外剥削应予清算；（4）民国元年（1912年）以后成立之租佃契约，从契约成立之日起，按政府减租法令予以清算；（5）地主隐瞒之“黑地”一经查出，按1至10倍核准处罚；（6）豪绅地主在灾荒期间以贱价取得群众之土地，准予群众赎回。为取得土地改革经验，区党委派出工作团到南华县进行试点。南华县委在工作团帮助下，首先开展反奸清霸运动，为土地改革运动扫清道路。在反奸清霸的斗争中，全县共镇压汉奸、恶霸等275名，对罪大恶极的首犯，召开万人大会公审、枪决。7月上旬，县委在朱楼召开全县土改骨干分子大会，介绍试点经验。从而在全县范围内，处处形成了把群众发动起来，把武装组织起来，与敌人抢速度、争时间，搞好土改，一片“分田分地真忙”的景象。全区出现了没收汉奸、恶霸地主的土地财产，清算、倒租、赎地，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高潮。对清算出的土地财产，多数地区在村一级组成以贫雇农为核心和中农参加的管理委员会，采取“中间不动两头动”（即中农不动，以地主富农财产补充无地、少地农民）的方法，进行平均分配。亦有少数地区将包括中农在内的各阶层的土地彻底打乱平分的。区党委在运动中反复强调党的中农政策，要求保护中农利益，不搞“推平”，以保证运动的健康顺利发展。清丰县仅20天工夫即展开广大的群众土改运动，有组织的群众占全县70%以上。截至10月17日的不完全统计，全县12个区在清算和查减后，共获得土地40889亩（死当地未在内），一般农民每人分得2至3亩土地。军工属每人分得3至5亩土地。到内战爆发时，全区1/2以上的地区〔包括三分区丰县、沛县、沛（县）铜（山）、华山、砀山、成武、巨（野）南、鱼台、单县、金乡、单（县）虞（城）县，一分区的泰安、肥城、平阴县，二分区的东平、郓城，五分区的定陶、复程县，四分区的滑县、清丰、南乐，六分区的茌平、博平县，七分区的嘉祥、济宁县〕已解决了无地少地农民的土地问题，初步实现了“耕者有其田”。

经过贯彻“五四”指示，实行土地改革，农村的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部分地消灭了地主阶级，农民土地问题得到了初步解决，贫苦农民开始翻身做了主人。如博平县周桥村，全村176户，802口人，2139亩地。土地改革前，6户地主占全村土地12.2%，依权仗势剥削和欺压百姓，村民大多数无法生活，不少人相率逃亡。各阶层的状况如下：

阶层	地 主			富裕中农			中 农			贫 农			赤 贫			合 计		
	户数	人口	地亩	户数	人口	地亩	户数	人口	地亩	户数	人口	地亩	户数	人口	地亩	户数	人口	地亩
数目	6	29	260	8	34	169	94	464	1368	64	215	315	22	60	28	176	802	2139
百分比	3.4	3.8	12.1	4.5	4.2	7.9	53.4	57.8	64.1	26.1	26.8	14.6	12.5	2.4	1.3			

在群众性土地改革翻身斗争中，伪乡长王保如4口人，地35亩，给其留地9亩；伪保长周国范3口人，地27亩，给其留地12亩；伪副区长周广善9口人，地33亩，给其留地26亩；伪副团长张高玉全家逃走，地15亩，留与其叔3亩；地主周传诗6口人，地95亩，献出70亩；地主周传训9口人，地100亩，献出60亩。农民共得土地178亩，粮食16300斤，牛1头，柏树7棵。

土地改革后，周桥村消灭了地主，12户赤贫和25户贫农上升为中农。各种群众组织飞速发展，农会会员达210名，妇会会员达190名，儿童团员90名，姊妹团员40名，共530名，占全村人口的67%以上。土地改革后各阶层的变化如下：

阶 层	富裕中农			中 农			贫 农			合 计		
	户数	人口	地亩	户数	人口	地亩	户数	人口	地亩	户数	人口	地亩
数 目	14	44	267	112	530	1560	50	228	366	176	802	2139
百分比	8	5.5	12.5	63.6	66	70.4	28.4	28.4	17			

(二)全面展开土改运动,彻底解决农民土地问题。1946年8月,国民党军队大举进犯冀鲁豫解放区,紧急的战争形势,使全区土地改革一度停顿下来。区党委决定组成黄河南、北两套班子,全力进行战勤、扩兵和游击战争。黄河以南地区要坚持斗争,提出“县不离县,区不离区”的口号,紧紧依靠基本群众,组织民兵、武工队、游击队,控制农村阵地,坚持对敌斗争,保护基本群众利益。但是,战争之初的几个月中出现的担架逃亡、群众情绪低落等事实证明:停止或延缓土改,单纯搞战勤、扩兵和游击战争,只向群众索取,而不给予广大农民看得见的物质利益,是不能持久的。区党委吸取这一教训,使战争和土改紧密地结合起来,在全区全面展开土改运动。9月20日,晋冀鲁豫中央局发出《贯彻“五四指示”彻底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指示》,决定公开宣传“耕者有其田”的方针,放手让群众自己起来解决土地问题,在地主已大部清算但土地问题尚未解决的地区开展填平补齐运动,以彻底实现耕者有其田。由于战争形势紧急,冀鲁豫全区除少部分地区贯彻执行中央局指示外,多数地区在10月、11月土改进展迟缓。11月冀鲁豫区党委对全区土地改革运动作了认真研究和部署,在《关于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与准备游击战争的指示》中,明确提出:不管在敌后坚持游击战争或正在准备游击战争的地区,应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土地改革。在土地改革上要下决心,不能以任何借口忽视或停止进行。在中心区未进行土地改革的地方,要立即进行;已进行而不彻底的,应立即进行翻身检查,实行填平补齐。在游击区,视具体情况,第一步稳定群众,坚持游击战,保持群众优势;第二步实行“一手拿枪,一手分田”。12月10日,区党委又发出《关于贯彻实行耕者有其田几个具体问题的指示》。1947年1月,冀鲁豫区党委召开民运工作会议,总结部署土改工作。会议肯定了战争开始以来群众运动取得的成绩,也检查了前段没有结合战争大力进行土地改革的失误,批评了一度不敢放手给农民土地的右倾情绪,决定了全区工作的基本方针:“立即坚决贯彻土地改革,填平补齐,充分发动群众,结合战

争任务，争取爱国自卫战争的胜利”。要求在土改中依法使用行政力量，逮捕、拘留、镇压地主、恶霸，解除群众顾虑；大胆使用积极分子；彻底消灭封建势力、封建剥削和压迫，实行耕者有其田。在非游击区，备战、参战与土地改革结合，深入开展翻身检查，进行填平补齐，做到不漏一口人，不漏一亩地，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在新收复区，以复仇、保田、反倒算贯彻土改精神。在游击区和边缘区，实行“一手拿枪，一手分田”，组织联防，前边警戒，后边分田、保田，步步向前推进；游击区中已进行土改的地方，亦实行填平补齐。在黄河以南，使游击战争与土改结合，在“反倒算，保田、保粮、保命”的口号下，形成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号召各级党委和广大干部群众放下旧思想、旧圈子，吸收新经验、新创造，除游击区外，争取1947年春耕前完成土地改革，以更好地支援前线^①。会后，《冀鲁豫日报》发表题为《打破土地还家中的障碍》的社论，指出：老区土改尚有空白和死角，地主阶级在经济上还未被彻底摧毁，斗争果实分配也不尽合理。号召各地向阳谷、河西、济（宁）北、观城等县学习，在战斗中领导农民搞好土地还家运动。冀鲁豫行署并于2月1日发布布告，对土地改革中若干政策做了具体规定：没收敌伪公地、大汉奸土地及地主匿报的“黑地”，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及贫苦的军、工、烈属。贫苦农民有权清算豪绅地主的压迫剥削，收回被占去的土地，但不得连带清算地主之工商业。开明地主及革命军人、干部家属自愿献地者，对其生活给予适当的照顾。中农土地不得侵犯。祠堂、庙宇、教会、学田等公有耕地及公山、公荒、湖田、官地，根据当地公议分给农民，要保留社会福利事业所用土地。富农土地一般不予清算。禁止侵犯在减租减息后勤劳发家的新型富农土地。对清算的地主，酌留相当于中农的土地，农具、耕畜应保留一部分。农民分得土地即归农民所有，地主必须

^①参见潘复生1947年1月20日《在民运部长联席会议上的总结发言》。

交出旧契，当众焚烧，并由当地县、市政府发给农民官契，以确定其所有权。在区党委和行署领导下，各地运用政权的力量，将地主集中拘押，培训大批贫雇农骨干和土改积极分子回村发动群众。区党委推广了阳谷县召开农民大会的作法和经验，以区为单位召开几千人、几万人的农民大会，讲党的政策和政府的态度，然后分村在党支部的领导下一齐行动，斗争地主，分配土地。在边缘区，区党委推广了河西县组织民兵联防“一手拿枪，一手分田”的经验。与此同时，边区野战部队也抽调干部组成翻身大队，分赴巨野、嘉祥、金乡、成武等县帮助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因此，全区形成了空前的土地改革高潮。群众发动起来以后，区党委则强调提高农民群众政治翻身和土地改革的自觉性，在运动中建立和扩大农会、妇会、民兵等群众组织，加强基层党支部建设，进行阶级教育和民主教育，巩固土改的成果。

由于冀鲁豫全区土地改革处在复杂的战争形势下，其开展的时间、作法和进度，在黄河南、北各地都有所不同。在黄河北地区：除游击战争的部分区域和少数已解决土地问题的老区外，大多数地区转入翻身大检查 and 填平补齐运动。发动群众深入查田、查阶级，清查遗漏、隐瞒、假卖假分和干部包庇等现象，将地主的土地、房屋等公开财产和埋藏在地下的现金、衣物等追出，重新填补分配给贫苦农民；先将地主“扫地出门”，再经民主评议给其生活出路以示宽大。对干部、积极分子和民兵在前段土改中占取果实过多的部分，采取思想教育、争取主动坦白、群众批评与纪律处分相结合等多种方法，令其退出，分给贫苦农民；少数拒不退出者，给予党政纪律处分或撤销职务。对一些土地过少的贫困村，采取贫富合村、贫富村联合斗争的方法，平分土地，做到消灭赤贫和贫农。在运动中，坚决执行“中间不动两头动”的方针，不搞绝对的推平，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地少补地、房少补房，做到填平补齐。翻身大检查 and 填平补齐运动，打破了前一段只按有无租息、债务等纠纷问题清算土地的办法，公开提出“分田分财，填平补齐，少啥分

哈，穷多富少，彻底消灭封建地主的政策”^①，解决了对地主照顾过多和未能满足农民土地要求的问题。同时，纠正了认为干部、积极分子和民兵有功劳应该多分果实的作法，以及政府、部队、机关、团体占有公地，没收汉奸地，借种地等侵占群众利益的作法，将退出的土地和财物全部交还群众重新分配。因此，这一运动是更深入、更广泛的土地改革，不单是彻底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问题，对于广大共产党员和干部也是一场深刻的阶级教育和民主教育，是一场严重的考验。在黄河南地区，由于敌人进犯后，反动地主复辟、倒算，前段土地改革的成果丧失，因此，随着野战军作战的胜利和游击战争的开展，这一地区坚持了土地改革。根据黄河南各地具体情况，区党委进行了分类指导。在经过开展游击战争被重新控制的游击根据地（多数是原来的老区），区党委根据群众的意见，及时提出从反倒算、反奸复仇入手深入进行土地改革的斗争方针，各地迅速建立和恢复基层组织，严厉镇压和打击向翻身农民反攻倒算的反动地主，收回被他们倒算去的田产、粮食。在此基础上，组织民兵武装，一面准备游击战争，一面开展翻身大检查、填平补齐，深入进行土地改革。在敌我拉锯的游击区，由于争夺激烈，土地改革的基本特点是武装斗争与土地改革相结合，土地改革在武装斗争的掩护下进行，以小部队或武工队代表人民政府镇压反攻倒算的反动地主和坏分子，控制地主和保甲长，召开基本群众会议，表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态度，并强迫地主与农民订约保证不进行报复。在与敌占区接壤的边沿地区，有些地方在党委、武委会的领导下，建立起村与村之间的民兵联防，配合县基干大队、武工队，实行“一手拿枪，一手分田”，把土地改革和反奸防特结合起来，一面打击敌人的进犯，一面掩护群众进行土地改革。1947年1月至2月，在巨（野）金（乡）鱼（台）和豫皖边战役期间，黄河南大部分地区被

①张霖之：《在冀鲁豫区党委土改会议上的总结报告提纲》，1947年5月17日。

收复。在区党委领导下，第二、三、五、七地委抓紧有利时机，迅速在收复区展开复仇反倒算运动，分田分粮，形成了游击战争区域土地改革的一次高潮。后来地区虽再度拉锯，被敌暂时占领过，但大部分地区土地改革不仅没有停止，而且全面地推开了。实践证明，在游击战争区域进行土地改革，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必须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有一定的机动武装，能消灭敌人的地方团队和还乡团武装，使敌人政权不能确立；二是必须运用民兵和地方武装，结合村党支部，领导农民控制住反动地主和坏分子，牢固地掌握农村阵地。否则，即使强令推行土地改革，成果也不能巩固，甚至会给基本群众招来重大损失。

经过五个月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冀鲁豫全区除少数游击区和边沿区外，约占 $2/3$ 的广大地区基本上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目标。黄河以南39个县有30个县初步实行了土地改革或正在实行土地改革，一部分地区开始转入翻身大检查和填平补齐运动。在这些地区，摧毁了封建地主阶级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势力，广大农民从几千年封建桎梏下解放出来，阶级觉悟和政治觉悟空前提高，真正成为农村的主人。但是由于在运动指导上较多地强调了反对右倾思想，而对“左”的苗头警惕和纠正不够，如强调中农献田，追浮财伤及地主的工商业，以及在游击区和边沿区少数不具备条件的地区也推行分田分粮等。这些“左”的东西在尔后土改复查中进一步发展，造成了一些不良后果。

1947年4月下旬，冀鲁豫区党委在向晋冀鲁豫中央局的报告中，总结了全区土地改革运动的主要经验：（1）实行土改，从政治上经济上彻底消灭封建势力，是翻天覆地的大变动。必须在党内党外进行教育和斗争，求得思想上、政治上的统一，才能彻底完成土改，把群众发动起来。（2）几千年来，封建地主对农民的统治像千斤石头压在农民身上。政府要给农民撑腰，给地主以压力，让农民站起来大胆斗争。（3）以区为单位，召开各村赤贫、贫农、中农大会，每区几千人、万人不等，讲明政策及态度，会后分村斗争，

加强村党支部的具体领导。各村一齐斗，群众胆壮，互相鼓励，很快轰开局面。（4）分配斗争果实根据填平补齐精神，贫多富少，少啥给啥；积极分子不能有经济上的特殊，可以搞立功表扬。（5）不能把包括中农在内打乱平分当作我们的政策，必须明确中间不动两头动、不斗争中农的政策，来实现组织农民大多数，巩固农村优势。（6）充分发动妇女，才有农民大多数，才能彻底摧毁封建统治，并把妇女动员到生产战线上去。（7）土改中要加强党支部建设，才能使土改彻底，实现对农民的直接领导。

（三）边区土改复查运动的成绩和“左”的错误偏向。1947年5月，冀鲁豫区党委召开土地会议，总结五个月来边区的土改运动，布置下半年土改复查工作。会议认为，广大贫苦农民从地主手中夺回了土地及一部分浮财，打垮了封建势力，群众翻了身，可是，运动还没有深入下去，土地改革仍不彻底，地主封建势力还在利用合法与非法的各种手段在阻挠这一运动的发展。指出：必须发动农民的大多数进行复查，才能消灭地主阶级，消灭封建土地制度，使农民在经济上、政治上完全获得解放。张霖之在会上作了总结报告，肯定了五个月来土地改革运动的巨大成绩和主要经验，提出了土改复查工作的方针和要求：要面向地主，清查地主阶级隐藏的土地、浮财、组织（地主掌握的假农会），把地主阶级在经济上彻底消灭，在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孤立起来。经过复查，继续以填平补齐的精神分配果实，改善干群关系，联合中农，发动妇女，求得进一步充分普遍发动群众。会后，区党委于6月24日发出《关于彻底复查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放手给群众撑腰，走群众路线，树立和加强贫农领导骨干，联合中农，同地主进行斗争，坚决执行填平补齐，公平合理地分配果实。在区党委领导下，已经进行过土地改革的老区、半老区各地委先后召开活动分子大会，各县召开干部大会、积极分子大会、贫农大会、贫农和中农联合大会，举办老干部、党员培训班，贯彻上述土改复查工作精神。这样，迅速在老区、半老区普遍地掀起土改复查的高潮。各地土改复查工作，一般

经过了以下五个步骤：第一步，教育老村干部放下思想包袱，退出多占、贪污的果实；第二步，充分发动贫农，成立领导复查的贫农组织（有贫农小组、贫农委员会、贫农复查团等名称）；第三步，划阶级，清查漏划地主、富农，并将贫农和中农加以区分；第四步，以贫农为领导骨干，联合中农，从经济上、政治上清查地主、富农，解决部分村庄土地改革不彻底的问题；第五步，按照填平补齐的原则分配清查出的土地、农具和浮财等果实。在区党委领导下，黄河南、北土改复查运动均取得了很大成绩，对于解决一些地区土地改革中的不彻底问题和消灭封建残余势力起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区党委对土改不彻底的情况估计过重，对老区、半老区和游击区、边沿区的不同情况缺乏具体分析，加之崇拜农民的自发性，传播了“中不中，问贫农”的片面性口号，甚至规定农村党支部必须服从贫农组织的意见，削弱了党的正确领导，因此，在复查中“左”的偏向严重发展。有的将地主“扫地出门”而不给生活出路，有的给富农留坏地，甚至发生一些乱打、乱杀的现象；划分阶级成份普遍偏高，一些中农被错划、错斗，如阳谷县11个村588户中农，有257户被错斗，占中农的43.7%；一些地方斗争工商业者，有的在追地主浮财中把其工商业也没收分配了。

（四）纠正“左”的错误，端正政策，结束土地改革。在冀鲁豫区土改复查运动轰轰烈烈展开的时候，1947年10月，区党委参加中央局土地会议的潘复生、张承先、万里、郭超等根据全国土地会议的精神^①，致函张玺、徐运北、刘晏春、申云甫，提出“复查运

①中共中央全国土地会议于1947年7月17日至9月13日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制订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草案），决定结合土地改革整顿党的组织。晋冀鲁豫中央局土地会议于1947年10月2日至12月26日在河北省武安县冶陶召开，贯彻全国土地会议精神，制定了《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实施〈中国土地法大纲〉补充办法》（草案），发动与会人员查阶级、查立场、查思想，批判地主富农思想，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纪律上整顿党的队伍。

动一般的停止（新区除外）”。据此，老区、半老区土改复查工作结束。从1948年1月中旬起，冀鲁豫区党委根据中共中央西柏坡全国土地会议精神和晋冀鲁豫中央局冶陶会议精神，分期分批在县团以上干部、区以上干部中开展了整党运动，发动干部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重点批判地主富农思想。这次整党对提高党员干部的阶级觉悟，坚持依靠贫农、团结中农的阶级路线，起了重要作用，但也一度发生了“左”的错误，形成了思想批判过火、组织处理面过宽过重的偏向，大约有43.6%左右的干部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党内处分^①。

为指导全党及时纠正土改和整党中“左”的错误，毛泽东在1947年12月中央会议上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对土改和整党的政策作了纲领性说明。会后，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老区半老区进行土地改革和整党的指示》等一系列重要文件，要求认真进行纠偏工作。1948年2月1日，晋冀鲁豫中央局发出《关于土地改革、整党与民主运动的指示》，规定在占全区2/3以上的斗争彻底或基本彻底的一、二类地区，不再进行平分土地，只进行抽补调剂，填平补齐，也不再组织贫农团和贫农小组，对干部中的问题在填平补齐中结合整党加以解决；在土改不彻底的三类地区，按《土地法大纲》执行。2月和4月间，中央局又两次召开区党委书记会议，明确提出反对“左”倾冒险主义，并研究确定了纠偏的具体措施。据此，冀鲁豫区党委从1948年2月中旬起开始检查纠正“左”的偏向和错误。3月，冀鲁豫区党委针对各类地区的不同情况，对土改和整党提出了不同要求。黄河南地区的土改，依据我占优势或敌占优势地区，恢复区或边沿区、新区等，分别采取不同形式，如

^①据1948年10月24日冀鲁豫区党委组织部写给晋冀鲁豫中央局的《整党复议总结报告》，依据一期整党统计，参加整党的干部7927人，受处分的3464人，占43.6%，其中开除党籍的1039人，占受处分人数的13%。1948年4月以后，这些问题即逐步得到了纠正。

经过反倒算、反报复、反抓丁、反抢粮、恢复阵地、巩固既得阵地、建立新秩序等，逐步过渡到平分土地。在黄河北老区，一般不再重搞平分土地，只在一定范围内采取抽肥补瘦的办法，调剂土地和生产资料。此后，冀鲁豫区步入了结束土改的阶段。与此同时，老区、半老区农村的整党相继开展。为取得农村整党和端正土改复查政策的经验，区党委和各地委都组织工作团进行试点工作，总结经验，使农村的整党得以健康地开展。

1948年4月间，区党委召开了地委书记会议，贯彻中共中央和中央局关于纠“左”的指示和精神，明确指出：下一步工作方针是以组织群众生产为中心，宣传政策，解除群众顾虑，具体纠正土改、整党政策上的错误，提高群众生产积极性；同时注意纠正在纠偏中将原村组织干部一脚踢开的错误做法。会后，在全区开始全面端正政策和纠偏工作。5月中旬，区党委和行署召开工商座谈会，贯彻晋冀鲁豫中央局关于纠正工商业中“左”倾错误的决定。各地对工商业者一律不搞清算斗争，对土改复查中受到损害的工商业进行退还和补偿，纠正不利于工商业发展的统制、垄断和工人工资过高的做法，切实执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和对内贸易自由的政策。各地工商业者纷纷开业，逃亡商人相继返回。至8月间，濮阳店铺新增加332家，聊城工商业户由解放时的1069家增加到1249家，其他各城镇工商业户亦大多恢复和有所发展。与此同时，行署召开了全区教育工作会议，克服了在文化教育政策上以及对待知识分子上“左”的倾向。为补偿中农和安置地主、富农，中央局冀鲁豫工作团、冀鲁豫区党委工作团和各地委工作团认真开展了重点区、村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工作。各地根据中央重新颁发的《怎样划分阶级》和《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对划分成份过高的作了甄别，重新划分了阶级。区党委又于6月间召开了重点区工作会议，根据中共中央《1948年的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指示，具体分析了黄河以北24个县的情况，认为地主阶级已基本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已不存在，贫雇农已得到相当于平均数的土地，土地问题已基

本解决，决定在这些地方，不再提土改复查，也不再搞“抽补”土地，应以端正政策，恢复与发展生产，完成整党、建党与支援前线为当前工作的中心任务，并明确提出了土改转向生产的具体工作过程。会议强调提出：对错斗的中农和“扫地出门”的地主、富农，采取“坚决补偿安置”的方针。8月，区党委再次召开黄河以北县以上干部会议，检查总结半老区端正政策、结束土改、完成整党工作的情况。经过公开纠偏，把各种“左”的错误在报纸上、文件上、会议上公开揭露，充分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使党员、干部、群众都发表意见，都能及时了解党的政策。这样，各种“左”的错误比较快地得到了纠正，中农得到了补偿，地主、富农也有了生活出路，农村社会秩序安定了，许多逃亡人员被争取回来。据不完全统计，至4月间，二分区逃亡户返回183户，四分区返回3万多人；5月份，伪军伪组织人员自动返回的，东平县一、三、六、七区有300余人，泰西三、四、七区和平阴一区及肥城七区计有259人。到年底，黄河以北各县胜利实现了端正政策、结束土改、完成整党等任务，妥善解决了错斗户的补偿安置等遗留问题，树立了贫农优势，团结了中农和最大多数人，秋收、秋耕、秋种等农业生产也提高了一大步。

1948年底，行署发出《关于颁发土地证的指示》，在黄河以北土地问题已解决的地区，正式宣布了土改结束。土地证的颁发，最后地确定了各阶层一切男女老少的地权、财权，保障其不受侵犯，从而扫除了生产致富的思想障碍，使工作转移到团结生产上去。在黄河以南地区，9月下旬济南战役结束和大部分地区收复后，土改和整党工作迅速展开。根据华北局12月指示精神和黄河以北土改的经验教训，冀鲁豫区党委于1949年2月15日作出了具体政策规定，要求黄河以南地区在土地改革中更要十分慎重地区别对待，必须消灭封建半封建的土地制度，但是必须将地主与富农、大中小地主以及恶霸与非恶霸地主加以区别，将反攻倒算的地主中的首要、重要、次要、胁从加以区别，将地富倒算与中农倒算加以区别，采取

分别对待的政策。在区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在黄河以北老区、半老区及黄河以南老区，以发展生产为中心任务，结束土改及其他工作围绕生产进行；在黄河南的半老区、新收复区，抓紧季节生产，搞好生产渡荒，土改工作也结合生产进行。到1949年8月，全区除黄河以南少数新区外，有2.4万个村庄结束了土地改革，约占全区村数的70%，有近1000万贫苦农民获得了土地。至此，边区土改基本结束，全区工作重心转移到生产建设上来。

经过土地改革，农村的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发生了彻底变化，消灭了地主阶级，农民土地问题得到了彻底解决。在斗争中，广大农民的阶级觉悟、政治觉悟和组织程度空前提高，以贫农为领导骨干，团结中农，绝大多数农民参加了农会，青年团体、妇女团体和民兵及文化团体也有很大发展。广大农民群众不仅将地主从经济上彻底消灭，而且从政治上彻底推翻，真正掌握了农村革命政权，发展了农民自己的武装，全区民兵达10万之众，共产党员达17万。从此，几千年的封建剥削制度和地主统治被消灭，新民主主义的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在广大农村建立和巩固起来，广大贫苦农民真正翻身做了主人。

（五）广大翻身农民踊跃参军参战，生产热情高涨，积极支援解放战争。在土地改革运动的推动下，由于广大干部群众的阶级觉悟、政治觉悟和组织程度空前提高，他们发自内心拥护共产党，许多积极分子纷纷要求参加共产党，全区军民决心响应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号召：打倒蒋家王朝，解放全中国。因此，不断涌现广大翻身农民参军参战支前的热潮。1946年8月蒋介石大举进攻冀鲁豫解放区时，在区党委号召下，不到一个月就有近2万人参军。肥城县二区区委书记石庆瑞、四区区委书记刘运生、五区区委书记刘肖林、七区区长赵亚刚等带头参军，全县仅20天时间报名参军达2000人。在群众性立功运动中，黄河以南地方武装和民兵积极袭击敌人，一个月内共毙伤俘敌军及地主还乡团620余人，破坏桥梁3座，缴获汽车1部。南华县独立营副政委李本立率部在9天内取得了3次战斗胜

利，于菏泽城郊消灭菏泽县敌第四中队，毙俘敌中队长以下20多人，并破坏了敌人正在修建的耿海据点，被授予“对敌斗争模范”的称号。三分区李汝泰武工队于9月间建立，在半年内多次袭击敌人，俘敌70人；在集市、大会上宣传近300次，使10万余群众了解了形势，在40多个村庄领导群众反奸诉苦，倒地700多亩，倒粮6.7万余斤，枪毙还乡团28人；又在单县不少村庄参加土改，把土改与参军、整顿组织、发展党的工作结合起来，为三分区党政军机关返回湖西地区作出了重要贡献，被誉为“武工队的典范”。1947年上半年，由于边区土改运动的广泛开展，有4万人参军，超过原计划3倍。昆吾、南乐、清丰、濮县等地5000余名妇女动员、欢送亲人报名参军，情景十分动人。阳谷县一次英雄大会上，有900名翻身分田模范坚决表示要再当翻身保田英雄，带头报名参军。在游击区，仅巨南、成武就有1500余人参加主力部队。同年11月中旬到12月底，一个半月时间，由于土改复查的开展，据不完全统计，又有5万青年参军。参军运动轰轰烈烈，“参加主力军，一齐下江南，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成为每个有志青年的豪言壮语。冀鲁豫解放区广大翻身农民，在区党委和行署领导下，踊跃参战支前。1946年8月，边区野战军出击陇海路时，二、三、五地委出动1万余民兵随军破路，15.6万余名民工送粮送弹，抬担架，不畏艰险，随军作战，胜利地完成了任务。各地民兵配合主力部队、地方部队掀起了反攻杀敌的热潮。在野战军围攻郛城时，当地民兵在城南的石桥、徐垓、黄龙、引马一带建立了长达百里的联防线，村村设防，昼夜巡逻，不让一个敌兵漏网。7月9日，敌五十五军残部利用青纱帐潜逃，当地民兵和农民蜂拥而上，方圆10余华里杀声四起，将敌80余人全部擒获。整个战役中民兵和群众配合主力作战，取得了歼敌1500余人的战果。在1947年6月，刘邓大军强渡黄河，发起鲁西南战役时，全区各级政府和广大人民全力支援大军渡河作战，修造船120余只，组织训练水手1000余名，先后出动500多万人次民兵、民工，15万头次畜工，对保证渡河战役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据统

计，自1946年内战爆发到1948年8月，全区8个专区、51个县、209个区，除少数未出战勤的县、区以外，共担负战勤总人数达7263986人（壮年720580人），大牲畜374802头，大车184934辆。仅在25次重大战役中，民力负担（不包括治黄挖渠和村内勤务）民工折工为65176751个，畜力折工为6580586个，平均每个壮年出工90.4个，每头牲口出工12.5个。1948年11月间，在淮海战役中，广大军民响应“倾家荡产支援战争”的号召，表现了高度的革命英雄主义和无私奉献的精神，全力参战支前。数以万计的担架队员冒着枪林弹雨，风餐露宿，随军征战；老年、妇女、儿童在后方碾米磨面，赶做军鞋。全区共出动民工30余万人，牲口12万头，担架1万余付，大小车15万辆，运米1.05亿斤，几乎每村、每户、每个有劳动能力的人都参加了支前；并组成了几十万人的担架和运输队伍，跟随大军渡过长江，打到南京。许多人又直下云贵高原，在战争中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刘伯承司令员1948年12月给冀鲁豫人民的题词中写道：“冀鲁豫人民为完成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尽了最大的努力，现在还是努力于支前工作，十分难得，特致敬佩。”

随着边区作为大战场局面的结束，各项事业百废待兴。据1948年上半年黄河以南五分区4个县、三分区10个县、二分区2个县的统计，被抢走的牲口16775头，被抓未回壮丁22844人，被杀2436人，被烧房屋3285间，被抢粮食1613万余斤，被抢大车1764辆。加之水、旱、虫灾严重，城乡经济和生产受到极大破坏。1948年与战前比较，全区牲畜减少 $1/2$ ，粮食总产下降 $1/3$ ，猾子皮产量减少 $3/4$ ，草帽辫产量减少94.5%，劳动力严重不足。为恢复发展经济，医治战争创伤，冀鲁豫行署于1949年1月下旬召开生产会议，制定了经济计划草案，决定大力恢复农副业生产，争取3年内恢复到战前水平。会后，在农业方面，各地以组织劳动互助的办法，解决人力、畜力的不足，积极疏水防涝，植树造林，防风固沙，改良土壤，推广优良品种，并贷款70亿元（冀钞）扶植种100万亩花生，以解决榨油原料。在工业方面，于年初成立了冀鲁豫区实业公司，

统一了公营工厂的经营管理，并经过调整改组，新建了道口油厂、新乡油厂、平原机械厂和安阳振头火柴厂等公营工厂，从而提高了工业生产能力。在税收和工商管理方面，在行署、专署、县三级成立了税务局，县以下成立了税务所，加强了工商行政管理，恢复了集市交易所。在金融方面，在加强农贷的同时，大力开展城市工商业存贷业务，至7月底，发放公营、私营和合作社的工业贷款552.5万元，商业贷款12690万元，冀鲁豫区供销社和各专、县级供销社也先后建立起来，有力地支持了城乡经济的恢复发展。这样，遭受战争破坏的城乡经济逐步得到复苏和发展。

在解放战争取得胜利的形势下，1949年1月，冀鲁豫区党委作出《关于成立各种委员会的决定》，要求地委、县委选配干部，组织工会、青年团、妇女联合会，积极支持他们的工作。同时冀鲁豫区党委召开青年工作干部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决定》，明确了青年工作的方针。会后，在全区有计划、有步骤地展开了建团工作。到3月，区党委、地委、县委三级青年团筹委会全部成立，青年干部基本配齐。3月26日至29日，全区青年代表大会在菏泽市召开，民主选举葛步海、张大乙、洪学玉、史杰、黄明吾、梁步庭、铃风楼、王洪山、高桓（候补）等9人为出席全国青年代表大会的代表，选举葛步海等17人、梁东峰等2人分别为区青联会委员和候补委员，并通过了《关于目前青年运动任务的决议》。与此同时，区党委于1月间召开分区以上妇女干部会议，总结全区妇女工作，明确了妇女运动的方针和任务。区党委又于2月5日召开了妇女代表大会，出席代表150人。会议历时8天，民主选举张秀岩、万丹如等出席全国妇女代表大会的代表13名，候补代表2名；选举董文华、李曙明等出席华北妇女代表会议的代表26名，候补代表2名；改选了冀鲁豫区妇女联合会领导机构，白林、范世钧等15人为区妇联会委员。4月上旬，冀鲁豫区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在菏泽召开，根据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决议，改选了冀鲁豫区职工总会，蒋中岳、李克东等9人为总会执委会委员，明确

了以发展生产为主的职工运动的方针，并选举了出席华北职工代表大会的代表。从此，全区青年、妇女和广大职工，在青年团和青联会、妇联会、工会的带领下，投入了争取全国解放、建设边区、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

1949年8月20日，冀鲁豫边区撤销，成立平原省。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冀鲁豫人民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据不完全统计，仅从1946年8月第一次陇海战役起，至1949年4月支援渡江作战止，3年中，边区有10余万青年参加正规军；出动担架10余万付，大小车39.7万余辆，民工294.6万余人，牲口94.7万余头；民兵作战9435次，歼敌12636人；全区每年负担公粮6亿斤以上，平均每人每年公粮90余斤；还先后6批抽调上万名高中级和基层干部支援新解放区。冀鲁豫边区广大人民群众为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三、冀鲁豫边区群众运动的历史经验

冀鲁豫边区的群众运动波澜壮阔，声势浩大，实质上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农村社会改革的农民运动。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的统治和剥削下，农民过着贫苦和悲惨的生活。要动员农民群众投入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去，就要改善他们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为此，必须进行农村的政治和经济的改革，创造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实现民主政治，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以与农民的迫切要求和客观利益相适应，使农民感到是在为保卫自己的切身利益及其维护这种利益的新制度而战。在共产党领导下，群众运动不断发展和深入，广大群众必然自己起来，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彻底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消灭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的社会制度，建立起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的基础。抗战期间，抗日斗争伴随着争取民主、争取改善生活条件和经济建设的斗争，包括实行减租减息、武装农民和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开展生产运动等民主民生的改革，这是发动人民抗日战争、打

败日本侵略者决定性的基本政策。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或者坚决反对中国农民解决民主民生问题，而使自己腐败无能，无力抗日；或者坚决赞助中国农民解决民主民生问题，而使自己获得占全人口百分之八十的最伟大的同盟军，借以组织雄厚的战斗力量。前者就是国民党政府的路线，后者就是中国解放区的路线。”“动摇于两者之间，口称赞助农民，但不坚决实行减租减息、武装农民和建立农村民主政权，这是机会主义者的路线。”^①解放战争期间，在消灭封建性和半封建性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的原则下，普遍地彻底地解决土地问题，是广大农民群众的迫切要求。彻底地实行土地改革，消灭封建制度，解放农民，“我们就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②。在八年抗日战争和四年解放战争中，中共冀鲁豫区党委领导边区广大群众进行农村社会改革的伟大斗争，创造了一整套群众工作的体系、原则和方法，积累的经验是相当丰富的。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一）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是巩固根据地的中心问题。中国革命是以创造革命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而最后战胜敌人的。革命根据地是进行革命战争的战略基地。革命军队的兵源和供给，支持战争的人力和物力，都要以根据地为来源，行军打仗也要以根据地为依托。没有革命根据地，革命战争就会陷入流寇主义而归于失败。冀鲁豫边区群众运动的历史说明：创建革命根据地，除了必须具备的地理、敌情和时机等条件外，其本身必须具有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革命政权、人民群众组织，这四种革命力量是缺一不可的，又是互相配合的。在根据地巩固阶段，中心问题是发动群众，必须有广大的人民群众作为依靠，形成人山人

①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4月第1版，第978页。

②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同上，第1148页。

海。只要坚决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不论山地，还是平原，建立巩固的根据地都是可能的。正如罗荣桓所指出的：冀鲁豫平原虽无山地作屏障，但有成千上万的民众，成为抵御日本侵略者的人山人海，形成一道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①没有群众的充分发动，没有群众的支持，没有群众作依靠，衣食住行都无法解决，扩大武装、创造根据地、改造政权、培养干部、进行根据地建设以及粉碎敌人进攻等都会变为一句空话，即使有险峻的山川，也是无法生存和坚持的。冀鲁豫平原根据地的创建、曲折和胜利，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是否成功地发动了群众。在根据地和抗日民主政权建立后，由于没有及时地放手发动群众进行减租减息，广大群众没有真正发动起来，致使边区形势日益恶化，一直发展到1942年一些地区可以“一枪打透”的严重局面。1942年以后，由于边区以减租减息为主要内容的民主民生运动不断深入开展，充分发动和动员了广大群众，群众性游击战争广泛展开，边区形势迅速好转，根据地得到巩固和发展。历史经验还证明：群众工作是实现党的路线和任务的保证，群众工作的任务也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党的路线和任务。群众工作的成功与否，根本标准就是看它是否把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调动起来，有效地保证革命和战争的胜利。边区党组织在实践中认识了这个问题，并紧紧抓住了这个中心，在实现各项革命任务过程中，放手发动群众，使广大群众在政治上、经济上得到翻身，提高了觉悟，充分发挥了参战和生产的积极性，从而造成了边区平原根据地牢不可破的群众基础和物质基础，终于粉碎了日伪军的残酷“扫荡”，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继而战胜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猖狂进攻，夺取了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

（二）要充分团结和发动群众，必须正确地执行党的政治、经济政策，在执行中实事求是地纠正“左”的或右的偏向，完成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的历史性任务。冀鲁豫广大的人民群众之所以能够

① 参见罗荣桓1939年8月在晋西区党委小安山会议上的讲话。

充分发动起来，从客观条件来说，是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广大的人民群众不甘当日本帝国主义的亡国奴，也不甘为国民党反动派当牛做马。这是发动群众最广泛最深厚的政治基础。从主观条件来说，是冀鲁豫边区党组织根据中共中央、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正确理论和路线，结合边区根据地斗争的具体实际，执行了一整套正确方针和政策，包括减租减息政策、统一战线政策、土地改革政策，等等。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战争，为了团结一切抗日力量，要坚决执行统一战线政策，照顾各阶级各阶层的利益，又要保证改善农民群众的生活，保证他们在政治上享有民主权利。边区党组织遵循这样的原则，在1942年秋总结一度忽视发动群众进行减租减息的教训后，就一直坚持放手发动群众，开展了以减租减息、反贪污、查“黑地”、合理负担、改造区村政权为主要内容的民主民生运动。在运动中，依靠贫农，团结绝大多数农民群众，要地主减租减息，也要农民交租交息，争取地主合作抗日，而要打击的只是日本侵略者和极少数汉奸、恶霸。因此改善了雇佣贫农的生活，树立了基本群众的优势，又团结了各阶级各阶层一道抗日，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到巩固和加强，调动了浩浩荡荡的抗日大军。进入解放战争时期，冀鲁豫边区又比较及时、深入地贯彻执行了党的土地改革政策。在边区党组织的领导下，在老区实行分地分财、填平补齐、彻底消灭封建半封建土地制度的政策；在新解放区，从反奸诉苦清算开始，充分发动农民土地还家运动，实现耕者有其田。因此，全区形成了规模空前、天翻地覆的土地改革群众运动，不仅从经济上、政治上彻底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摧垮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社会基础，而且使翻身农民的政治觉悟和组织程度大大提高，更加踊跃地投入到解放战争的狂涛巨澜之中。

实践证明，要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就要在执行过程中坚持实事求是地纠正偏差，有右纠右，有“左”纠“左”，注意防止和解决“左”比右好的思想。这是团结和发动广大群众，推动社会改革健康发展的保证。冀鲁豫边区党组织在领导广大群众进行社会

改革的12个年头里，在执行政策中曾出现过一次右的偏向、两次“左”的偏向，一经中共中央指出，区党委都认真地进行了自我批评，迅速地予以纠正。根据地创立时期，边区党组织认真宣传和组织群众，发动抗日游击战争，群众普遍地发动起来。根据地和抗日民主政权建立以后，由于认识不足，缺乏经验等原因，没有集中力量认真地、普遍地执行减租减息的政策和法令，形成了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削弱封建剥削制度的右的偏向，结果，错过了两年有利时机，从主观上讲，成为造成1942年根据地严重危难的根本原因。1942年以后，冀鲁豫区党委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及刘少奇的指示，坚决迅速地纠正了这种右的偏向，发动了以减租减息为主要内容的广大的民主民生群众运动。在运动中，克服了“恩赐”观点和包办代替、强迫命令的错误做法，放手让群众起来自己解放自己。1943年，一些地区又提出反“新贵”的错误口号，把一部分有缺点错误但尚属党内问题的干部一脚踢开或一棍子打死，一度影响了群众运动的发展^①。1944年，一些地区又出现了忽视党的领导，崇尚农民自发性，超越党的政策和政府法令的范围而蛮干乱干的错误作法，如对地主、富农打击过重，侵犯中农利益和侵犯工商业等。对这些“左”的偏向和错误作法，区党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和邓小平在1945年6月分局群众工作会议上讲话的精神，认真地及时地进行了纠正，保证了全区民主民生运动的持续健康深入的发展。这是1942年后边区群众充分发动起来，社会政治与经济的改革不断深入，根据地比较快地得到恢复、巩固与扩大，形成强大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一个基本关键。这个经验说明，必须从具体情况出发，有右纠右，有“左”纠“左”。“左”并不比右好，“左”与右都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违背实事求是原则的主观主义，都是离开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最终同样危害党和人民的事业。共产党

^①参见张霖之：《关于冀鲁豫群众运动概况及意见》，1945年1月。

在反动政权统治下如何领导农民运动，毛泽东曾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提出“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这无疑是正确的，起了伟大的革命作用。在反动政权的统治下，不“过正”就不能冲破反动统治阶级的压迫和束缚，不“过正”就不能打破反动的统治制度和秩序，这种“乱”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在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政权建立以后，党的政策和政府的法令是根据需要与可能，集中了广大群众的意见而制定出来的，反映了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愿望，也是与广大群众的眼前利益一致的。因此，社会的政治与经济的改革只能在党的领导下，按党的政策和政府的法令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必须正确地执行党的政策，必须依法办事。群众运动中自发的超越党的政策和政府法令的蛮干乱斗的“过正”、过左的偏向，不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与扩大，不利于根据地社会秩序的安定，会搞乱革命的队伍。它同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削弱封建剥削制度的右的偏向一样，会严重危害社会的改革和人民战争的顺利进行。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党不是要发展群众运动中的自发性，而是要使党的方针在群众运动中获得实现”^①。

“过去某些‘左’的办法”，“是违反了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的方针和政策，于人民不利的，所以必须纠正。”^②在解放战争时期，冀鲁豫区在土改复查和整党中，再一次出现了更大范围、更为严重的忽视党的领导、超越党的政策和政府法令的“左”的错误偏向，提出“贫雇农坐天下”、“贫雇农说了算”的片面性口号。一些地方乱打乱杀，侵犯中农利益，侵犯工商业，伤害了部分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局的正确指示下，冀鲁豫区党委于1948年3月至1949年上半年认真地进行了公开纠偏，对“左”的错误偏向不掩饰，不含糊，不只在党内、领导机关内和上层内讲了

① 《邓小平文选》（1938—1965），人民出版社1989年5月第1版，第73页。

② 同上，第122页。

事，而是在报刊上、文件上、会议上公开揭露出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使广大群众都知道党的政策和政府的法令，使干部引以为戒。同时，坚决保护广大干部和群众的革命热情，正确地对待干部，正确地对待群众，以教育为目的，重在总结经验和教训，提高政治觉悟和政策水平，只对少数确属违法乱纪的人才给以适当处分。这样，使全区土改和整党较快地端正了政策，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这就更清楚地说明了，那种以为“左”比右好，右是立场问题，“左”是方法问题的看法，完全是违背历史实际的，完全是违反马列主义根本原则的。正确地执行党的政策和政府的法令，实事求是地纠正和防止偏差，既反对慢性病，又反对急性病；既反对右的错误偏向，又反对“左”的错误偏向，就一定能够领导广大群众把社会的政治与经济的改革持续健康地向前推进，把党和人民的事业办好。

（三）要充分团结和发动群众，必须实行群众路线的领导原则和方法，注意培养群众领袖和表彰模范，发挥他们的表率作用。群众运动是建筑在广大人民群众自觉基础上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只有走群众路线，贯彻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和方法，才能把广大人民群众提高到党的纲领、路线和政策上来，使广大人民群众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联系起来，使革命事业成为人民群众的自觉和自愿的运动。冀鲁豫区党委在长期实践中体会到：党的群众路线与党的阶级路线及党的统一战线是一致的。走群众路线，在抗日战争时期，就要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树立基本群众优势，逐步削弱地主封建势力，又要团结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人士，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解放战争时期，就要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地主封建剥削制度，又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和巩固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为此，必须牢固树立群众观点，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相信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当前群众的实际需要和水平出发，用生动活泼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分析，来解答人

们实际生活中所关心的各种问题，不是从概念到概念地抽象说教，而是给群众撑腰，放手让群众自己起来解决自己的问题；既要与群众的实际利益结合起来，又要善于用党的正确的纲领、路线和政策去教育群众，指导群众，提高群众。必须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艰苦奋斗的作风，要与人民群众同甘苦，共命运，模范地遵守群众纪律，接受群众的批评和监督，真正为人民群众谋利益。这样，才能把广大人民群众充分地组织和发动起来，真正形成群众自己起来解放自己的运动，以实现伟大革命的目标。如果不相信群众，不依靠群众，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只从政策、指示出发，或只从某些领导的个人意志出发，去约束和限制群众，就会犯主观主义、强迫命令、包办代替的错误。相反，如果由相信群众走到迷信群众的自发性，以为群众一切都是对的，以为群众能够自己制定政策，群众能够完全自己约束自己，就会忽视党的领导和理论的作用，犯放任自流、蛮干的尾巴主义错误。在长期斗争中，冀鲁豫区党委形成了贯彻这一科学领导原则的一套具体方法。如：坚持党政军民统一步调，做到工农商学兵一齐发动，男女老少一齐发动；注意调查研究，搞好试点，取得经验，由点到面推动运动。区党委调研室的政策研究工作和濮县、范县的经验及滑县经验等，都对指导全区群众运动起了重要推动作用。深入基层，与广大农民打成一片，共同生活，共同战斗，随时向群众学习，了解大多数群众的疾苦、要求和思想，同农民群众建立最密切的联系。根据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任务，针对农、工、妇、青、民兵和知识分子的不同特点，以尊重、关心和爱护的态度去做他们的思想工作。经过访贫诉苦、群众酝酿和教育训练，提高干部群众的觉悟，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群众启发领导，领导尊重群众的实践经验，这样不断地集中群众的意见，又回到群众中去，变为群众自觉自愿的行动，一步一步提高，形成统一的革命运动。召开好坏典型汇报座谈会，让群众自己表扬正确的，批评错误的，这样，优点与缺点公开了，取得共识，发扬与改正起来有更大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加强村党支部

的核心领导，以贫雇农为骨干，团结中农，建立农会及各种群众组织，从而及时形成群众自己的领袖，通过群众团体和领袖去掌握、推动群众运动，依靠大批群众领袖和积极分子，去团结、发动和带领群众前进，使群众在“动”中联合，由小“动”到大“动”，由小的联合到大的联合，夺取一个又一个的胜利，等等。由于边区党坚持了群众路线的领导原则和方法，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将党的政策真正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冀鲁豫广大的人民群众在长期的残酷激烈的敌我斗争中经受了巨大的锻炼，涌现出许多优秀的群众领袖和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如翻身诉苦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创造思想、技术、生活三大互助经验的战斗英雄王克勤，英勇牺牲的东平抗日县长崔益平，越狱英雄罗少雄，被誉为“英雄村”的茌平县张楼村，以及范筑先、刘培桐、徐秋、黄白莹、杨静斋、李贞乾等，还有国际主义战士、加拿大医生哈里逊和日本人民解放同盟冀鲁豫协议会副委员长宫川英男。冀鲁豫区党委、行署还两次召开群英会，先后表彰了王五宝、孙风爱、王耀志、曹清泉、杨风珍、尹玉琢等267名英雄模范人物，以及孔庆均、刘同纪、马学山、刘涛山、时念法、邱长印、王本、鲁振中等83名功臣模范人物。群众领袖和英雄模范是群众组织和群众运动中的灵魂和骨干，他们身上所体现的伟大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大义凛然的革命气节，极大地激励着冀鲁豫人民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振兴而奋发努力。充分发挥他们的桥梁、纽带和表率作用，群众运动才能很好地开展起来和坚持下去，形成规模宏大的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运动，并表现出高度的思想、行动的统一和纪律性，较为容易地克服运动中某些错误和偏差。

（四）社会改革与发展生产紧密结合，是深入发动群众和巩固根据地的一个经常任务。冀鲁豫区党委和行署在放手发动群众实行社会改革的基础上，及时组织群众转入生产建设，在生产建设中继续解决好社会改革过程中遗留的问题，既巩固社会改革的成果，又把群众运动提高到发展生产的新水平。这对于广大人民群众政治地

位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改善，保证革命战争的供给，巩固和壮大根据地，起了巨大的作用。在创建边区根据地的12个年头里，从减租减息、民主民生、反奸清算到土地改革，边区社会改革的群众运动一步一步深化，边区生产建设的群众运动也一浪高过一浪。在区党委和行署领导下，随着边区民主民生运动的展开，边区以农业生产为中心的大生产运动于1944年迅速开展起来。经过1945年6月分局群众工作会议，根据邓小平讲话的精神，明确地提出由民主民生运动转入生产运动的口号，使大生产运动在全区形成一个高潮，各种劳动力组织起来，男女老少一齐动员起来，机关、部队、学校积极投入生产建设，因而使边区的财政经济状况很快得到好转，使基本群众优势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政治上、经济上得到巩固和加强，保证了边区根据地的巩固、发展和对日反攻作战的胜利。抗日战争结束后，区党委和行署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的指示，在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反奸清算和查减运动的同时，展开1946年的大生产运动。短短10个多月，城乡生产有了较大发展，稳定了边区经济，广大人民群众得到休养生息，全区初步医治了过去八年战争的严重创伤，进一步巩固了解放区，为反对国民党军队的大举进攻和全面支援人民解放战争，准备了较好的群众基础和经济实力。到1949年，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支前工作的结束，区党委和行署在土地改革运动的基础上，把恢复和发展生产作为全区的首要任务，明确地提出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争取三年恢复战前水平的方针，并采取了一系列繁荣经济的政策和措施，在全区形成了空前规模的生产建设运动，因而使全区城乡经济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广大人民群众从切身利益上更深刻地体验到跟着共产党走的光明前景。边区群众运动的这一经验表明：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改革与生产建设的关系，是不断深入群众运动的一个关键性课题。生产建设是深入社会改革的根本目的之一，又是广大人民群众的一项基本要求，只有生产发展了，人民生活改善了，才能进一步表明社会改革的进步意义。在社会改革的各个阶段，必须注意

与生产建设密切结合，并要随着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运动的胜利发展和农事季节及时地领导群众转入生产建设。开展民主民生运动、反奸诉苦运动、土地改革运动，以改革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解放农村生产力，这就为转入生产和发展生产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而巩固社会改革的成果必须从生产建设上来解决，使群众在经济上稳定持续地上升，才能够不断地提高群众革命和生产的热忱，巩固地团结在党和政府的周围，巩固发展新民主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反之，社会改革如果不与生产建设相联系，不与生产建设相结合，不及时地领导群众抓紧生产建设，群众运动就会失去目标和方向而陷入迷途，社会改革的成果也难于巩固。

（五）为了广泛团结和发动群众，必须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群众团体的作用，加强军政民密切配合。群众团体的任务是在党的领导下，独立地去进行发动、组织与教育群众的工作，全心全意为群众谋利益，把群众的认识逐步提高到减租减息、土地改革和政治斗争、武装斗争的水平，使群众形成一个自觉自为的阶级力量。冀鲁豫区党委为使边区群众运动真正成为广大人民群众自己起来解放自己的宏大的运动，十分注意尊重群众团体在组织上的独立地位，发挥群众团体的力量，在农村和各基层单位逐步普遍地建立了农民、工人、妇女、青年和民兵等基本的群众团体，教员、学生、儿童、作家、记者、商人、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的团体以及宗教团体，也先后建立起来。农会成为人数最多、最有权威的群众组织，民兵等武装团体成为群众组织的中坚。这些群众团体，既有统一的领导机关联合会，又有独立的组织系统、特殊要求和斗争的方式，在动员、组织农民群众和各阶层人民参加武装斗争和进行农村的各项改革中起着主角的作用。

实践经验证明，只有依靠群众团体的力量，而不是把群众团体当做摆设或附属物，不包办代替群众团体的职能，广大群众才会把群众团体看成是自己的组织，才能真正把广大农民群众和各阶层人

民组织和发动起来，各个村庄才能建设成为在党支部领导下的战斗堡垒，积极主动地完成各项战斗任务，成为摧不垮打不烂的伟大力量。为此，首先，区党委明确提出各级党组织必须始终把群众工作作为经常的主要工作任务，不断加强和改善领导。边区党组织十分强调全党做群众工作，要求党员必须参加群众团体，生活在群众里面，党支部、党员必须从反敌伪、恶霸的斗争中，从执行减租减息、土地改革法令，改善民主民生的斗争中，去团结群众，教育群众，提高群众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从而成为团结和带领群众的核心。同时，特别注意不断改善和加强党对群众团体的领导。1938年中共冀鲁豫省委成立之初就设有民运部，以后边区各级党委长期设有民运部或民运委员会、青委和妇委，各群众团体内设有党团组织。实行精兵简政和党的一元化领导后，为了发挥群众团体的积极性，尊重其独立性，撤销了区党委以下各级民运部，改设民运工作委员会，由各级党委的常委和工农青妇各种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组成，由同级党委书记兼任书记，负责关于民众运动的方针、原则和政策的领导。并规定：民运工作委员会对工农青妇各种委员会是“指导关系”，它的一切决定“交由各教会党团通过公开系统实现”，“不能干涉各教会的日常工作”^①，从而加强了各级党委对民运工作的领导。1944年起，随着斗争形势的好转和根据地的扩大，进一步改善和加强了对群众团体的组织领导关系。在县以上各级党委设民众运动委员会（简称民委会），专门总结群众运动的经验，研究与决定群众运动的方针、任务及某些重大原则问题。区党委设青委会与妇委会，在区党委领导下专门研究边区青年运动与妇女运动的方针、任务，及时总结经验。同时，要求群众团体内的党员和团员，“要无条件的执行同级党委决定，一切关于工作的重要决定，一定要经过党委的核准方能发出，不得同党闹独立性”^②。第

① 《冀鲁豫区党委关于取消各级民运部成立民运工作委员会的决定》，1943年7月18日。

② 《冀鲁豫区党委关于党对群众团体领导关系与组织的决定》，1944年2月20日。

二，区党委十分注意群众团体的自身建设，要求搞好群众团体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和民主制度建设。指出：群众团体是群众自己的自愿的组织，其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各团体在性质和任务上有差异，各有独立的组织和领导系统，但总的任务都是保护群众的切身利益，团结、组织与教育广大群众，领导广大群众参加根据地各项斗争和建设；健全组织和民主制度，是改善群众团体领导的重要环节。在区党委领导下，边区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儿童、民兵和文化界等各个群众团体都制定了章程，规定了工作任务和工作方式，而且建立了边区各群众团体统一的各级联合领导机构。各群众团体内部的一切重要问题都经过一定组织的决定，少数必须服从多数，一经决定，每个委员必须无条件地执行。群众团体的干部要自觉地代表群众利益，站稳立场，深入下层，深入群众，深入工作，为群众解决困难。各群众团体均把工作重点放在村级和基层，大力健全村会和基层组织领导，广泛开展创造模范村的活动，把党和政府的政策、法令贯彻落实到最基层，因而使群众团体真正成为党领导下的广大群众自己的和自愿的组织，成为保证边区群众运动健康深入发展的中坚。第三，冀鲁豫区党委反复强调：群众团体、政府和军队必须密切配合。指出最广泛地团结和发动群众，不单是群众团体的事情，必须在党的统一部署和领导下，政府、军队等各部门紧密合作，各自尽最大的努力，才能真正做到。群众团体和干部要爱护自己的政府和军队，严格遵守政府法令和各项制度，要开展拥军优属运动，积极参军参战支前；政府和军队要积极扶植和保护群众运动，政府和干部不能站在群众运动之外袖手旁观或作“调解人”，也不能站在群众运动之上强迫命令或恩赐、包办，必须站在群众运动之中，树立牢固的群众观点，用法令和政权的力量扶植和保护基本群众的利益，发动群众组织起来，用自己的力量从压迫剥削下解放出来；军队要支持和参加群众运动，开展拥政爱民和大生产运动，爱护人民，减轻群众负担。这些作法和措施，逐步在全区形成了党统一领导下的群众组织、政府、军队密切配合的群众工作

体系。在群众运动中，广大群众得到了利益，政府和军队受到了锻炼，不仅促进了群众运动的深入发展，也大大密切了军政民关系，加强了基层民主政权建设和人民武装建设，保证了各项支援战争任务的圆满完成。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有许多“堡垒村”、“堡垒户”，有许多老大爷、老大娘、妇女和儿童，舍身保护自己的干部和战士。如黄河南地区，由于国民党军队连续进犯，反复清剿，环境非常险恶。为了控制和巩固农村阵地，1948年，南旺县一区的土改整党工作团分为4个小组分散活动，敌人不来时作群众工作，敌人来时隐蔽在群众当中坚持斗争。有一天，在大杜村坚持斗争的董星、贾林两位女干部，在高粱地里化装时被敌军骑兵排长抓住，她们乘敌不备将敌排长击毙，跑到附近大张村老百姓家里。这个情景在地里干活的人都看到了，但当敌人包围村庄威逼群众交出人来时，全村群众谁也不肯吐露一个字。这些激动人心的英雄故事，就是在群众运动中建立起来的“鱼水情”的突出表现。

总之，冀鲁豫区党委在领导根据地群众运动中比较正确地掌握和运用了党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他们始终注意放手发动群众，在发动群众中组织和武装群众；在发动群众斗争中，及时注意整顿和健全群众组织；在完成减租减息、土地改革的任务之后，及时将重心转入群众的政治教育，把群众运动提高到掌握民主政权和发展武装斗争的阶段，使群众形成一个自为的阶级力量，去自觉地参加战争，以巩固既得的政治、经济利益，又把群众的经济、政治斗争纳入统一战线范围之内，即约束在现阶段党的政策和政府法令范围之内；注意在一个大的经济、政治斗争任务完成之后，及时引导群众转入以生产建设为中心。因此，根据地群众运动逐渐由低级向高级发展，逐步把群众提高到自为的阶段，保卫了群众既得的利益，巩固了根据地，实现了人民群众推动历史前进的光辉使命。党的领导是边区群众运动健康发展并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抗日战争的胜利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冀鲁豫边区群众运动和冀鲁豫根据地。

冀鲁豫边区群众运动的成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所制定和实行的新民主主义的一系列正确方针、政策的胜利，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胜利，也是边区全体党员、干部和全体军民英勇奋斗、流血牺牲换来的。冀鲁豫广大群众对伟大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所做的贡献，将载入中国革命的光荣史册！冀鲁豫边区党组织坚持放手发动群众，坚持执行党的社会改革政策，是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抗日战争时期冀鲁豫边区

工人运动简况

方明^①

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创建和巩固起来的，对整个抗日战争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这里工农业落后、文化落后，矿山、工厂极少，产业工人数量亦较小。农村中的工人主要是雇工和手工业工人。全边区人口约2000万人左右，农村工人约计100万左右，与产业工人高度集中的大城市相比是非常分散的。

冀鲁豫边区的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坚定地站在战争的最前沿，在参军参战参政、生产支前、创建和巩固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中，都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冀鲁豫边区的工人运动，在抗战时期始终是以武装为中心任务，初期是宣传动员和发动组织时期。这时鲁西地区和原冀鲁豫地区尚未合并，两地区都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做了大量广泛发动群众的工作。在党的直接领导下，一批铁路工人和兵工工人从城市转移到农村参加了抗日活动。1938年津浦铁路破坏大队刘志明（共产党员）分队配合八路军一一五师东进支队，在平原——禹城间破坏敌人铁路。从江南铁路回河北原籍的工务人员程书法等人，受到抗日热情的鼓舞，在聊城参加了刘志明分队，积极参加了破坏铁路的抗日活动。同年5月，胶济铁路济南机务段地下党员房奎奎宣传动员组织了20多名铁路工人，建立胶济铁路破坏大队第一区队第一分队，由张怀珍任分队长。这个分队经介绍到鲁西配合八路军十支队机枪营开展

^①今名方玉亭。

破路抗日活动，在张夏——崮山两站间弯道下坡地段卸掉钢轨螺丝10余节。黎明前，敌一运兵列车由北向南运行至卸轨地段，机车和十几节车厢翻滚到路基下面，造成日军的惨重伤亡，对当时保卫大武汉起了很大作用。后来这两个分队都编入八路军。当时鲁西的农民运动蓬勃发展，农教会的组织先于工会组织，农村工人都是参加到农会里起先锋、骨干作用。由于工会组织尚未建立，因而还不能发挥工会独立领导工人运动的作用。

1938年5月，我党以爱国人士范筑先为名誉校长，在聊城创办有名的聊城政治干部学校。副校长是曲阜三师校长张郁光，教务长是齐燕铭，讲师多是我党领导同志。学员编有4个中队，每个中队有4个分队。在第一中队中特编了一个铁路工人分队，有27名铁路工人参加。他们在那里学懂了不少的革命道理，出校后成为鲁西工人运动的骨干，发挥了重要作用。

日军占领山东省会济南和铁路沿线城市之后，一些铁路和兵工工人在“不做亡国奴”的口号下，从城市转入农村积极参加了抗日活动，但当时尚没有与鲁西广大农村工人活动结合起来。特别是聊城失守后，形势紊乱，顽固分子对群众团体进行攻击破坏，有的县群团组织被顽固分子直接解散了，群众运动处于暂时消沉时期。

1940年鲁西区党委加强了对工人运动的领导，上下结合，一齐发动，村、区、县工人抗日救国会的组织如雨后春笋纷纷建立起来，为成立鲁西总工会打下了群众基础。经过积极筹备，为迎接“五一”国际劳动节，在中心区×县召开了鲁西第一届工人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鲁西工人抗日救国总会。大会选出了以王震宇同志为主任委员的常委会和执委会，产生了鲁西工人运动的领导机构，鲁西工人运动出现了空前团结和统一的新局面。

1940年8月，王震宇同志随鲁西各界代表团到鲁南临沂青驼寺，参加了山东省各界救亡团体代表大会，会上被选为省工会执行委员。会后山东分局派干部到鲁西，加强对工会的领导，推动了鲁西工人运动的深入开展，对发展和巩固鲁西抗日根据地起了重要作

用。

在鲁西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的同时，经过我党领导下的战委会和工人抗日救国总会的领导发动，并利用国民党的动委会进行号召，原冀鲁豫边区的工运工作也得到逐步深入。首先，是利用各种形式训练大批工会干部，发动工人群众参加抗日，动员工人参军参战，扩大了四支队和八路军队伍，组织了工人自卫队，广泛展开了群众性的对敌武装斗争；结合武装斗争中心任务，开展了增加工资，改善劳动保护和生活，提高工人地位和抗战热忱，积极参加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各项工作，对原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巩固，做出了很大贡献。根据对敌斗争形势的需要和中央决定，1941年7月原冀鲁豫和鲁西两地区合并为冀鲁豫边区，两个区的工人抗日救国总会亦随之合并为冀鲁豫边区工人抗日救国总会。当时冀鲁豫边区面临着日本帝国主义对我抗日根据地的全面进攻，敌我形势是紧张、尖锐和残酷的。在这种严重的斗争形势面前，边区工人阶级以武装斗争为中心，展开了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反击战。

1941年11月，在冀鲁豫区党委指示下，边区工会召开了第一次分会主任联席会议。王震宇主持了会议，宣传部长高光宇代表总会作冀鲁豫边区工运任务的报告。会后，为了贯彻会议精神，总会组织了工作组到各分会帮助工作，推动各级工会组织开展了以对敌武装斗争为中心，提高工人工资，改善劳动保护和生活，贯彻边区政府颁布的《劳工保护暂行条例》，提高工人阶级觉悟的各项工作。为了实现上述工运的任务，总工会领导抓住提拔培训工会干部这一关键环节。总工会工作组帮助各分会对各县、区工会干部轮训一遍，县、区干部回去后又对村会干部采取不脱产的短期轮训班的方式进行培养训练，提高了工会干部的政策水平和工作能力。对新干部的大量提拔，主要是通过各种斗争。从斗争中提拔的干部有其坚定性、积极性，与工会会员亦有较密切联系。

认真贯彻执行《劳工保护暂行条例》是当时的主要工作之一。《劳工保护暂行条例》是根据抗战建国纲领的原则制定的，其中贯

穿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精神。适当提高工人工资，改善工人生活是其中主要内容。因为工人工资太少，生活太苦，地位太低，要发动工人起来抗日，必须提高其工资，改善其生活，不然是动员不起来的。农村一个雇工劳动一年，工资还拿不到200市斤粮食，根本不能维持家庭生活。在提高工资斗争中，由200斤提高到400斤，这是雇主能负担得起的。在进行提高工资斗争前，先向雇工进行阶级教育，破除“穷人命不好，命中该受穷”的宿命论思想，进一步解决谁养活谁的问题，提高了雇工的阶级觉悟。在提高工资的斗争中，也有个别地方发生了提得过高过左的情况，有的提高到600斤，雇主家来客时，雇工要坐上席做陪客等，发现后及时给以纠正。

提高工资的斗争取得胜利后，紧跟上进行武装斗争的教育，动员工人积极带头参加民兵、模范班，组织工人自卫队参加八路军，以武装抗日和武装保卫斗争胜利果实结合起来，这样才能巩固工人群众的战斗情绪。在增加工资、改善生活的基础上，积极动员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掀起了参军热潮。

边区的工人运动是怎样发动组织起来的呢？

开展边区工人运动的方式是上下结合，点面结合，改善生活与参加抗战结合。领导机关开会，发文告，一般号召，主要的还是靠组织干部深入基层到村里去，到工人群众中去，以点带面，所谓“一村开花一片红，朵朵红花开遍城”。首先选择一个影响力大的自然村，做好调查研究工作，发现和做好积极分子的工作，他们以一传十、十传百的串连活动，把全村的工人组织起来，做好斗争前的准备工作，向雇主进行算帐说理斗争，宣讲人民政府颁布的《劳工保护暂行条例》，最后由区人民政府撑腰，务求必胜。喜讯传开，村村都动，最后普遍全城。边区的工人运动就是这样发展组织起来的。

在各级党委和边区总工会的领导下，边区建立了7个分会、40多个县工会、200多个区工会，乡、村工会更是普遍，会员60多万，在国防和国营企业中普遍建立了工会组织。兵工工会和军工工会20

多个，报社、银行、书店印刷工会3个，织布厂50多个，造纸厂30多个，卷烟厂十几个。这些企业工会的主要任务是加强主人翁思想的教育，提高工人的生产积极性，支援前线，支援根据地的经济建设等。在工会的宣传组织下，工人积极性非常高涨，对军工生产和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在微山湖、南四湖、东平湖等湖区建立了渔业工会，进行了反渔霸斗争，提高了渔民的觉悟和积极性，利用湖区优势与敌人展开水上游击战。

冀鲁豫边区的工人运动，完全是在战争时代发展巩固壮大起来的，在发动工人抗日、支援前线、巩固根据地斗争中取得了丰富的经验，值得认真回忆与借鉴。

第一，加强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是边区工人运动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边区各级党委都很重视工会工作，工救会的工作由各级民委会专人分工负责，这样，既有专人分工负责，又加强了民委会的集体领导。这一决定确实加强了边区工人运动的领导，保证了工人运动的健康发展。

第二，工会工作是群众工作，是党与工人群众密切联系的纽带。广大工会干部必须关心工人的切身利益，关心工人的生活，使他们不断增加经济收入，逐步改善工人的生活。只有抓住这一根本问题，才能提高和巩固工人群众的抗战热情，才能推动职工运动继续发展。这是边区工人运动中的一条可贵经验。同时，工人运动亦是整个群众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工会组织必须与其他群众团体密切配合，互相协作，相互支援，特别是工人运动与农民运动更要紧密结合。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工会作用，工人阶级才能起到模范、骨干、带头作用。

第三，加强工会干部和积极分子的培养训练，是开展边区工人运动的关键。没有受过培养训练的广大工会干部和热心工会工作的积极分子，工人运动是开展不起来的，党的工运方针也是贯彻不到工人群众中去的。边区工运工作的初期对这一工作重视不够，缺乏

计划性，缺乏原则性，也没有注意干部质量，有的干部不能开展工作，使工会威信受到损失。第一次分会主任联席会后，重视加强了这一工作，提高了工会干部的质量和数量，从而使工运工作有了新的的发展。

边区工人运动在发展过程中虽然取得了一些经验，但也有工作上的一些失误和缺点。如有的工会干部认为在工会工人中发展党的力量是党的组织部门的事，不是工会本身党组织的任务。有的放松了在农村工人中发展党的力量，削弱了党组织的工人成份，造成党组织中的工人成份比例很少，党的战斗力也就受到影响。在提高工资斗争中，有的地方曾出现过左过高的要求，影响了雇主与雇工间的关系，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是不利的。

冀鲁豫边区妇女运动概况

范世均

一、抗日烽火中的冀鲁豫妇女

(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

1937年7月7日，日军全面发动了对华侵略战争，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7月29日、30日，日军相继攻陷平津，从8月起，开始了对华北的全面进攻，华北各大城市和铁路沿线县城岌岌可危。冀鲁豫黄河以北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和政府要员大部抢渡黄河南撤，各地陷于一片混乱。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洛川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央组织部发布《妇女工作大纲》，提出“以动员妇女力量参加抗战，争取抗战胜利为基本任务”，“从争取抗战民主自由中争取男女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平等，改善与提高妇女的地位，反对一切封建束缚与压迫”为总的目标，并对不同地区、不同阶层的妇女提出了具体的工作要求和策略方法。

《大纲》还特别强调了“培养大批党的与群众的女干部来迎接抗战新阶段工作的开展，是我们妇女工作的中心一环”。党中央的决定为边区妇女运动指明了方向，《妇女工作大纲》更为妇女工作提出了明确的工作方针和奋斗目标。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冀鲁豫边区的妇女运动一直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之下开展的，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 妇女运动的开创 (1937年7月至1940年5月)

这一阶段是边区妇女运动的开创时期，中心任务是宣传动员妇女参加抗日救国活动，培训妇女干部，组建各级妇女组织，支援敌后抗日游击战争。

1. 直南豫北的妇女运动

(1) 党组织的恢复与发展为妇女运动的开展创造了条件

1934年秋，陈少敏受中共河北省委的委派，以妇女代表名义到冀鲁豫沙区工作。她和沙区的妇女党员一起，启发妇女觉悟，组织妇女群众为反对封建压迫、争取妇女解放而斗争。千口村的张栋，中化村的赵兰枝，马集的王爱花，化村的王秀芝、王山兰、王宪荣等妇女党员和党的积极分子，都参加了动员和组织妇女的工作。1935年农历正月十三向清丰县教堂斗争的胜利，给群众以极大鼓舞，并为开展妇女工作做了思想和组织准备。

1937年冬，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各地先后成立了抗日救国会。1938年2月，清南大抗日救国会在清丰梁村成立。总负责人为马彩三，组织部长李升阁，宣传部长刘忻，青年部长刘信善，妇女部长刘翠琴。除各部外，还设有巡视员经常分赴农村，对基层救国会进行具体指导，同时还举办了各种短期培训班（农、青、妇）培训骨干。至1938年秋冬，除少数死角外，几乎村村都建立了救国会。救国会领导下的农、青、妇、儿童团、姐妹团、自卫队和游击小组蓬勃开展。5月，清丰县成立了抗日战争动员委员会，晁哲甫任名誉会长。下设总务、组织、宣传、动员、分配、武装、锄奸、青年、妇女、农民等部。妇女部长是丁素珍、付秀香，工作人员有刘清霜、卢凤香、吴莲茹、张雅林、刘桂森等。

此时期直南地区的共产党组织也由秘密走向公开，取得了合法地位，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5月，直南特委在

清丰县六塔集召开各县救国会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总会章程和宣言，选举安法乾为总会负责人。总会下设总务、组织、宣传、青年、妇女儿童、武装等6个部，妇女部长杨均。1938年8月，总会迁至濮阳城内，杨均调离，陈友菊接任妇女部长。10月，陈友菊调地委工作，范世钧接任妇女部长。

1938年8月，鲁西南抗日救国会成立。在总会领导下，曹县、菏泽、考城等县相继建立了农教会、青教会、妇教会等抗日群众团体。

1938年冬，直南特委根据中共中央发布的《目前形势与华北党的任务的决定》中“在游击战争中必须建立工会、农会、民生、妇教会等系列组织”的精神，决定边区妇教会、农教会均单独成立组织，由边区抗日救国总会负责筹建并主持召开边区妇女与农民代表大会。

1938年12月，边区妇女与农民代表大会在濮阳城内国民党专员公署大礼堂召开。国民党专员丁树本到会讲话，表示凡是抗日的他都欢迎。安法乾代表抗日救国总会讲话。大会选举姚恒光为农救总会主任，付秀香、范世钧为妇救总会正、副主任。大会结束后，到会代表300多人在濮阳城内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庆祝，影响遍及全城并迅速传播到各个县、区。

1939年春，妇救总会成立3个部：组织部长申超臣，宣传部长申戈军，生活改善部长申超臣兼、副部长张巧凤。妇救总会的领导主持召开了干部会议，着重讨论了当时的形势和任务，认为边区抗日斗争在群众发动方面已出现了高潮。在上级党委连续大批地举办抗日救亡训练班的推动下，壮大了群众力量，大部分地区的村妇教会已普遍成立，抗日救国热情极为高涨。农会主任、进步村长、党员、积极分子都动员自己的母亲、妻子带领中青年妇女走出家门，冲破“三从四德”等封建礼教的束缚，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参加抗日救国的行列。中老年妇女手持红缨枪站岗放哨，查行人，抓汉奸，精神大振，面貌一新。农村妇女抗日救国运动已出现了耕

新的局面，抗日歌声响彻云天。会议最后还明确了妇救总会的任务：①在组织发展中做好巩固工作，加强骨干的培养和对积极分子的教育，使她们成为各级妇救会联系群众的桥梁，带头完成各项任务。②在濮阳、滑县等地县委的领导和支持下，妇救总会配合各县妇救会，积极安排，分批举办抗日积极分子训练班，为扩大抗日根据地壮大力量、输送人才，充实健全区村妇救会。③各级妇救会要关心妇女的痛苦，解决他们的特殊问题，维护妇女权益，这是长期的任务。如果有人对妇女参加抗日救国斗争进行欺凌、侮辱、造谣、破坏，甚至打骂虐待，要及时在村政权和农、青救国会配合下，及时给予解决。大力宣传妇女应享受的权利，破除封建制度、旧礼教套在妇女脖子上的枷锁，在民族解放的斗争中争取占人口半数的妇女自身解放，提高妇女经济的、文化的、政治的地位，实现男女平等。④随着抗日游击战的发展，妇救会要积极组织广大妇女群众拥军优属，慰劳伤兵，积极做军鞋、被服，解决部队急需。加强妇女儿童站岗、放哨和情报联系，配合正规军、地方武装有效地打击敌人。⑤为了抗日救国的神圣任务，要深入发动群众，做细致的工作，动员父送子、母送儿、妻送郎踊跃参军参战，保卫祖国，保卫家乡。妇女要参加生产互助，完成农耕任务。⑥积极组织开办识字班、夜校、冬学活动，使其正常化，争取每个妇女能认识几百字，能粗读报刊、写信、简单记帐，提高文化水平。

至此，边区的妇女工作在妇救总会的领导下普遍开展，妇女救国会会员迅速发展到15万余人。妇女培训班相继开办，大批妇女积极分子经过培养、训练提高，充实到抗日救国斗争和妇女解放运动的第一线。

（2）举办培训班，培训妇女干部

1937年冬，直南特委组建抗日武装四支队。四支队的女宣传员董维华等来到沙区，在内黄县千口村老地下党员张栋家办了内黄县第一期抗日干部培训班，学员多是妇女，共20余人，由董维华讲课。这是最早的以妇女为主体的培训班。

1937年11月，平津流亡学生杨均（天津南开大学学生）受党组织委派到清丰县开展妇女工作，住在城里付秀香家。在付秀香协助下，在城北唐营村召集20余名妇女开会，宣传抗日道理。翌年3月，他们总结了唐营妇女未组织起来的教训，认为必须从受日军残害最重的妇女发动入手，首先发动了张拐村（1937年12月曾遭日军洗劫，被杀绝20余户）的妇女，并组织她们到清丰县女子师范接受抗日培训（共培训40余人），由杨均讲课。俟后赵来光、马耀光即在城关区组织起老、中、青妇女小组及姐妹团，活跃在城周围村庄。

1938年2月，在丁树本部任政治部主任的罗士高、民运科长平杰三、组织科长张伟（3人均系共产党员），吸收一批男女知识分子和进步青年先后在濮县、濮阳举办抗日培训班。结业后，一部分学员分配到政治部宣传队，大部分充实到丁树本部队任政工干部。女学员梁伯琪、赵森到直南特委机关工作，赵保云留丁部工作，吴林涛参加了丁部宣传队。

1938年2月，晁哲甫从山西晋城华北抗日军政干部培训所返回清丰县，在清丰简师继续举办军政干部培训班，这时有30多名妇女知识分子参加，如刘清霜、阎双珍等。讲课的有晁哲甫、晁涌光、安法乾，杨均还专为妇女讲课（陈友菊协助）。这种培训班先后举办5期，培训骨干近千名，并从中发展了党员和“民先”队员。经过培训的骨干普遍提高了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组织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敌后根据地等理论的认识，坚定了抗日的信心。这些干部毕业后被分配到党、政、军、民各条战线，充实了领导力量，也为迅速开展农、青、妇等群运工作准备了干部。

在此之后，边东县委的郭献瑞也在南乐县办起了军政培训班，结业后的妇女同志除充实到城关外，大部分到区妇救会工作。

1938年夏末，在清丰县动委会领导下，妇女部在草帽仙庄、六塔、固城及城关周围，由刘清霜、丁素珍负责举办了5期妇女培训班，培训了200多名妇女积极分子。

1938年8月，南乐县妇教会成立，程墨之、阎双珍任正、副主任。由程墨之负责，谷福之、武翠冬、李淑芹等合作，分别在百尺村、近德固、福堪及城内举办培训班，以农村妇女为主体，培训了200多名积极分子，并从中发展了一批党员，这些党员回村后参加支部工作。

1938年7月初，在直南特委组织部长刘晏春领导下，于清丰县梁村（特委和八路军办事处驻地）举办以农村妇女为主体的培训班，赵森任支部书记，赵森、范世钧讲课。学员以清丰县西北区为主，吸收城周围及各区老、中、青妇女及抗日积极分子，其中有少数女教师和女学生，如孟淑庆、马淑美等。

经过培训，老年妇女解放了一大步，兴致勃勃，青年妇女、壮年妇女好像挣脱了封建枷锁，自由活泼。如，当时梁村驻有黄河支队，他们在晚上经常召开军民联欢会，培训班的学员列队踊跃参加，互相拉歌，一阵阵互相高喊：“八路军来一个！”“妇女来一个！”最后共唱“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培训班共办了3期，每期40多人，每期一个月，共培训了近120人。

培训结束后，学员都回到各自的村庄，大部分担任了妇教会会长、委员，有一部分参加了党支部工作，并积极发动妇女建立与健全村妇教会，组织儿童团、姐妹团，组织他们站岗放哨，盘查行人，抓汉奸。

1938年5月，冀鲁豫抗日救国总会成立，8月迁入濮阳县城。总会妇女部设立后，就开始了正规的妇女培训工作。11月，在濮阳县委大力支持下，妇救总会首先在秤钩湾和甘露寺举办妇女培训班。参加学习的均为村妇教会积极分子，其中有一部分是高小和初小学生。每期40人，学习时间三个月。

1939年，继续在滑县举办妇女干部培训班，由妇救总会的申超臣、妇救一分会宣传部长吴林涛和滑县妇教会梁伯琪、江亚民、吴卫汉等共同组织，学员由各村、乡政府选派，学习时间仍为一至三

个月，每学期学员近40人。毕业后，全部分到县、区妇教会工作。内黄县妇教会陈伯仲、栗旭明、盛利、王秀波、王耀民分别在井店、千口、太平、化村、店当、邢固等村举办妇女培训班，培训一批积极分子和骨干。

经过培训的妇女回到县、区以后，又普遍举办了基层妇女训练班或学习班，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培训基层妇女干部，提高他们的政治水平和工作能力，以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

1939年3月，中共中央妇委发布《关于目前妇女运动的总方针和总任务》的指示信，提出：“在坚持抗战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下，目前妇女运动的基本任务是动员与组织更广大的妇女参加抗战建国的各方面工作”，“抗战建国大业假使没有占半数人口以上的妇女积极参加，成功是不可能的”。根据此指示精神，妇教总会于1939年春在濮阳城内外开展妇女培训工作。先以濮阳城西北黄宾为中心，吸收后黄宾、徐北汪、卓北汪、劳北汪、崔北汪、冯寨、胡村集、李家庄等10个村的妇女积极分子办了两期培训班，每期20天，学员是贫苦农民和盐民，由范世钧、申超臣、张巧凤、刘东明讲课。为适应当地的环境，把妇女培训班改成了识字班，组织妇女学文化，结合扫盲讲解抗日道理以发动妇女抗日。这一形式受到妇女群众的欢迎。识字班共办两期，60多人参加。

在其他县、区，以识字班名义对妇女培训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如1938年2月，清南大抗日救国会成立后，妇女部干部刘翠琴、马玉珍就深入农村，走家串户，在清丰西北区组织村妇教会和妇女识字班，使妇女在学习文化的同时接受抗日救国和妇女解放的道理。尤其是宣传动员妇女和女童放足，更受到妇女的热烈拥护。通过识字班这种形式，同样起到了培训妇女骨干的作用。1938年至1939年的两年里，就办了妇女培训班近20期，培训妇女骨干近2000人，发展党员数十名。随着办班活动的普遍开展，妇女的发动也呈现遍地开花之势。“遍地抗日歌声，遍地红缨枪”，正是这种崭新而壮观局面的生动写照。

实践证明，妇女培训班不仅是培养和输送人才的园地，而且是宣传动员群众完成党的中心任务的有效方式，以后的减租减息、土地改革等运动中，都曾通过培训班发动群众，培养骨干，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3）县、区妇救会普遍建立，边区妇女组织形成完整系统

1939年5月，濮阳县妇救会建立，赵森为主任。7月，长垣县妇救会建立，陈伯仲为主任。8月，南乐县妇救会建立，程墨之、阎双珍任正、副主任。9月，滑县妇救会建立，梁伯琪任主任。1939年冬，清丰县妇救会建立，刘清霜任主任。1940年5月，内黄县妇救会成立，张强、盛利先后任主任。新划的卫河县妇救会主任为任守容。顿丘县妇救会主任盛利。尚和县妇救会主任王欣。渭南县妇救会主任柳俊玲。高陵县妇救会主任栗旭明。1940年4月18日，冀鲁豫区党委成立。区党委下辖3个地委：直南地委妇救会主任程墨之；豫北地委妇救会主任陈伯仲；鲁西南地委妇救会主任赵淑林。至此，冀鲁豫地区自上而下的妇女组织均已建立起来，形成完整的系统。

2. 蓬勃发展的鲁西妇女运动

（1）鲁西北的政治形势

1937年抗战爆发后，原国民党山东省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兼聊城县长范筑先，拥护我党的抗日主张，与鲁西北的共产党人合作，守土抗战，并任山东省第六区抗日游击司令部司令。

抗日战争爆发后，以范筑先夫人武治国为会长，组织了抗敌后援会。这是鲁西北最早的妇女救亡团体。1937年秋至1938年春，大批的流亡学生和热血青年，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奔赴聊城。我党以范筑先六专区游击司令部政训处为基点，设立了组织部、宣传部、妇女部、民运部。党通过这个公开的行政机构来领导鲁西北的抗战工作。妇女部的负责人是解彭年（男），后由郝冠英负责。

1938年3月，成立了妇女救国会，范筑先夫人武治国任名誉会长，郝冠英、丁子玉为负责人。1938年4月，从延安和武汉分别派来女干部张扬、杨固、金维、许可和王玄、陈杰，更充实了妇女工作

的队伍。1938年5月，六区政治工作会议决定，政训处改为政治部，妇女部改为政治部民运科妇女股，张扬任股长。随着鲁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形成，以聊城为中心，在周围20多个县建立起抗日政权。在党的领导下，在政府的支持下，各县妇女救国会也逐步建立，至1938年底，已先后在冠县、临清、茌平、莘县、阳谷、东阿、寿张、博平、观城、朝城、堂邑等县建立了妇教会。

(2) 妇女抗日救亡工作普遍开展

各县妇教会组织建立后，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主要是：

第一、动员女知识青年参加救亡工作

当时由于日军进攻，学校停课，一些女教师、女学生大都闲在家里，妇女干部就挨户访问，动员她们参加抗战。范筑先的3个女儿范晔青、范树琨、范树婉也参加了抗战，尤其是范树琨在其弟范树民（青年挺进大队大队长）牺牲后，亲自接任大队长职务，这一行动对妇女抗日活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聊城，经过妇女干部的动员，就有靳祖严、靳祖来姐妹，宋薰和刘氏姐妹参加抗日工作。在六区政治部创办的政治干部学校里，也有不少女青年报名参加学习。王玄、郝冠英都曾在该校担任过大队指导员。在政治干部学校毕业的女学员，大部分成为鲁西北妇女运动的骨干。鲁西党校也培养了许多女干部，如白林、林彬、李虹、丁纳、洪林等，都成为鲁西、运西妇运的主要骨干。

第二、利用各种集会，运用多种形式，开展抗日宣传活动

1938年3月8日，聊城各界妇女和群众2000多人参加庆祝“三八节”大会。范筑先夫人武治国在大会上讲话，号召各界妇女行动起来，团结抗战。郝冠英代表广大妇女向范筑先献上一面锦旗。每当范筑先部队作战归来，妇女部（妇教会）的同志们就组织妇女夹道欢迎，赠送慰劳品以鼓舞士气。

1938年7月，美国驻华使馆武官卡尔逊访问鲁西北时，在聊城、临清受到了热烈欢迎，妇女、儿童的代表都在大会上讲了话。在临清的欢迎大会上，妇教会主任李蕴华和妇女干部赵鹏的母亲在会上

讲话，代表妇女表示了抗战到底的决心，扩大了国际影响。卡尔逊回到武汉后就公开要求美国停运援日物资，后又撰书介绍了华北敌后根据地坚持抗战及他在鲁西北与范筑先会晤的情况，使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了解到华北敌后抗战的一些真实情况。

1938年8月，在济南战役中，范筑先的次子，青年挺进大队队长范树民和参谋长何方壮烈牺牲，广大群众在茌平东门外举行迎灵祭奠，茌平县妇教会也组织妇女参加。当时群情悲愤，哭声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坚决抗战到底”的口号声此起彼伏，极大地激发了群众的抗日热情。

妇教会的同志们经常组织妇女儿童上街张贴标语，演唱抗日救亡的戏剧、歌曲，或利用各种集会向群众演讲，以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动员群众参战，鼓舞部队士气。鲁西北抗战移动剧团就经常深入到农村和驻军营地演出。肖彬、颜菊清、窦秀余、许可、刘敏书、杨固、王惠芳、饶子春等女同志都参加了剧团，随团转战鲁西北大地。她们有时与当地妇教会配合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剧，演唱《流亡三部曲》、《大刀进行曲》等救亡歌曲。她们边唱边解释歌词，边讲解抗日救亡的道理，讲妇女在抗日救亡中的责任和作用，边唱边讲，声泪俱下，台上台下群情激奋，收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

由于宣传工作开展得普遍、广泛，组织工作及时，妇女运动出现了轰轰烈烈的局面。当时临清妇教会主任李蕴华曾写了一副对联：“群英荟萃呼吁抗日天地撼，妇孺揭竿声势震荡临清城”，形象地描绘了当时妇女儿童同仇敌忾的抗战气势。

第三、开办抗日小学

抗战爆发后，聊城和学校大都停办。政训处妇女部在袁家宅子的北屋办起了抗日小学。没有课本，就自己编写联系实际的课本，如《识字课本》中，就教“人”、“中国人”、“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国”等。通过教认生字，使孩子们懂得：我们中华民族有反抗外敌侵略的光荣传统，有无数的爱国志士进行过可歌可泣的斗

争。这样一方面寓爱国主义教育于文化学习之中，一方面又通过歌唱抗日歌曲，向孩子们灌输抗日道理，还通过访问家长，向群众进行抗日救国宣传。

在茌平，妇教会以小学为阵地，向教师、学生教唱抗日救亡歌曲，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发动教师、学生支援抗战。经过宣传动员及学生家乡进行深入的思想工作，有8个学生参加了战地服务团，其中有李贵荣（李康）、宁鸿喜、王在荣等4个女学生。

第四、组织战地服务团，奔赴前线

1938年5月，聊城战地服务团成立，由金维、许可、张扬、范擘晴负责。团员共有40余人，全部是妇女。她们经过一个月战地救护常识的训练，开赴前线服务。

除以上工作外，妇女还编辑《抗日战报》的副刊《鲁西北妇女》、《妇女前哨》，报道和评论妇女运动的情况，扩大妇女工作的影响，推动妇女运动的开展。此外，也做争取团结一些国民党上层军政人员家属的统战工作。

总之，在1937年秋至1938年11月，由于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胜利，争取了范筑先与共产党合作抗日，使鲁西北妇女运动的开展有了良好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从而出现了妇女运动蓬勃开展的大好局面。这一时期的妇女工作有的县、区还多局限于城镇，冠县、临清等县则深入农村开展。1938年11月中旬日军向聊城疯狂进攻，范筑先将军和优秀共产党员张郁光、姚第鸿等700官兵壮烈殉国，聊城沦陷敌手。鲁西北地区的妇女运动从此全面转向广大农村。

1939年秋，鲁西北行政委员会成立。鲁西北妇教会随之成立，李蕴华为主任，组织部长张坤，宣传部长王也甲，生活改善部长樊策。各县妇教会也相继建立。

（3）泰西的妇女工作

1937年10月，泰安县各界抗敌后援会和民众总动员委员会相继成立。1937年11月，泰安妇女抗日救国会筹备会成立，成员有教育界的知名人士、女教师、女学生。女子小学校长周美娇任会长，中

共党员范琳分管组织工作。该会号召各界妇女团结起来，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

1937年冬，在东平县工委书记万里倡议下，成立了东平县抗日救亡协会。最早参加协会的17名成员中，有崔暮冬、万丹如、李蕴石、杨献玲、林楠、李虹等6位女青年。

1938年5月，建立了中共泰西特委，李蕴石任妇女部长。1939年2月，泰西县妇女抗日救国会成立，主任余冰一，副主任武静平。

1939年，郭军和余冰一到泰西县周家村办起了妇女训练班，对全乡有文化的妇女积极分子进行培训，灌输党的抗日主张和妇女解放的思想。训练班办了10多期，每期数十人，郭军亲自组织、讲课。培训结业的女工回到本村组织起妇救会，有的参加抗日工作，脱产干革命。这年冬天，日军、汉奸到周家村“扫荡”，全村30多户被烧28户，群众吃住无着。郭军和余冰一挨家挨户安慰，并和农会一起组织救灾；又亲自召集全乡地主开会，动员他们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粮出粮，从地主那里借粮分到各户，稳定了民心。她们还用日军、汉奸残害群众的事实，教育群众只有对敌人进行斗争才能生存。

在抗日斗争实际锻炼中，涌现出许多妇女积极分子。周家村妇救会主任周二嫂被培养为村长，她当时已50多岁，中共党员，是泰西县第一个妇女村长。塔坊村的李秀梅、明家庄的明旭和武治勇，都离开了家门，投身到抗日工作中。

1938年秋，在中共长清县委领导下，在长清八区赵官镇成立了第一个妇女党支部。支部建立时有女党员10人，王岩、孟淑华分别担任党支部正、副书记。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发动、组织妇女参加抗日活动，给游击队做衣服、鞋袜，支援抗战。

1939年3月，罗荣桓率一一五师东进支队到达泰西，传达了中共中央六中全会决议和中共北方局关于建设泰西根据地的指示。根据指示精神，中共长清县委为进一步发动群众，加强全县的妇女工作，请求泰西特委批准从部队抽调王桂荣、朱慧、边涛、靳涛、张明、董辉、丁纳等女同志到长清县做妇女工作。

1939年6月正式成立长清县妇女工作队，王桂荣任队长，朱慧任副队长，主要活动在县城南山区（一、二、三、七区）和黄河西八、九两区及平阴一区。当时，根据党委布置的中心任务，妇女干部深入到农村走家串户，召开各种形式的妇女会，开展抗日宣传，组织和培养妇女积极分子。1939年初，县妇女工作队在七区房庄举办了第一期妇女干部学习班，人员由各区地方党组织推荐，只要愿意走出家庭参加抗日的妇女，不论文化水平、出身成份，都可以参加。学习班结束后，她们被分到各区工作，都成了妇女工作的骨干，为开展全县妇女工作打下了基础。

1939年7月，长清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张耀南任县长。县农、青、妇群众团体也相继建立。1939年8月，在原县妇女工作队基础上成立了县妇教会，朱慧任会长，原工作队撤销。在县妇教会领导下，各区妇教会也先后成立。从此，长清县的妇女工作，除敌占区外，全面展开。

1939年秋，肥城县妇教会成立，李虹任县委妇委书记、县妇教会主任，徐克为副主任。11月，东平县妇教会成立，王枫任主任。

1939年11月，泰西行政专员公署成立。是年冬，泰西妇教会成立，郭军任会长。1940年初，郭军调鲁西，朱慧继任会长。

（4）鲁西妇救总会的成立

1939年1月，鲁西区党委成立。1939年10月，鲁西区党委召开了工作会议。会议决定：为了发动群众，动员妇女抗战，县以上党委设妇女工作委员会，领导妇女工作。鲁西区党委组织部长赵博任妇委书记。5个地区也于1940年前后健全了妇教会，其负责人是：泰西妇教会郭军、朱慧、李秀梅；运西妇教会白林；鲁西北妇教会张坤；运东妇教会宋伟。

1940年3月8日，鲁西区妇女抗日救国总会成立，郭军任会长，白林任组织部长，万丹如任生活改善部长，林楠任秘书。妇救总会提出两大任务，一是促进宪政，二是加强生产。鲁西的各级妇教会组织进一步发展和健全起来，还成立了昆山县试验区，随即成立妇

教会，会长路宾。至此，全区已有20多个县和大多数区、村成立了妇教会，给抗日游击战争和政权建设以极大的支援。

3、战斗中的湖西妇女

抗战初期，徐州西北区党委书记王文彬为了培养妇女干部适应抗战需要，于1938年3月在丰县举办了妇女训练班。当时参加学习的有王子香、张淑贞、孙秀兰、徐国祥，主要学习了抗战十大纲领和妇女在抗战中的责任等。1938年秋，新四军彭雪枫的部队开到萧县。1939年4月，部队的孔真、张明组织了妇女工作队，在萧县、宿县等地大张旗鼓地开展抗日宣传工作。刚从抗日学习班结业的戴洪慈也参加了妇女工作队，她们都废寝忘食地进行抗日宣传。

苏鲁豫支队打下萧县台儿庄，消灭了很多日军。当时，群众的抗日情绪非常高涨，妇女工作队到处动员，号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发动群众慰劳部队。广大群众和爱国士绅纷纷捐钱捐物，献猪献羊。老百姓几天中就做了四五百双军鞋送给子弟兵。从此，萧县的抗日斗争打开了新局面。部队开走后，在党的领导下成立了农教会、妇教会、青教会。

1939年6月，孔真调到苏鲁豫边区党委宣传部领导下的妇女科任科长，对外称妇教会筹备会。当时，妇女干部有刘莹、郭仙云、张令仪、李伟民等。

湖西区党委建立后，举办了妇女干部培训班，湖西区妇教会又连续举办了两期，郝莲芳、李大侠、李小霞、郭仙云、朱慕兰、季凯等都参加了学习。这几期培训班培训了妇女干部三四十人，结业后分配到各县开展工作。湖边地委妇女部长是常俊亭，鲁西南地区负责人是金彩凡、周子凤等。

1939年8月，湖西区妇女组织在单县时寨召开了妇女代表会议，成立了湖西区妇女救国联合会。孔真当选为妇教会主任。

1939年9月，湖西发生了“肃托”事件，孔真、金彩凡、郭仙云等被逮捕。湖边地委妇女部长常俊亭惨遭杀害。后经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采取紧急措施，制止了事态的发展，

湖西地区才转危为安。

1939年12月，湖西区党委改组，设立了妇委（对外称妇救会），孔真任妇委书记，朱慕兰、张令仪、金彩凡为委员。1940年11月，湖西区党委改为地委，赵雨琴任地委妇救会主任，戴洪慈任副主任。

这一段时间里，湖西局势严峻，斗争相当艰苦。日军疯狂“扫荡”，蒋介石积极反共，湖西处于日伪顽夹击之中；由于“肃托”影响，群众情绪消沉。但妇救会干部在艰苦的环境中，仍然坚持斗争，带领妇女群众，掩护干部，救护伤员，缝衣做鞋，支援前线。部队的干部和战士受到极大鼓舞，他们感动地说：“有你们妇救会支援，我们一定要拼命打击敌人！”

4、妇女运动的开展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游击战争

抗战开始后，冀鲁豫地区从直南豫北到鲁西、湖西，各地的妇女群众迅速觉醒，妇救团体相继建立，广大妇女在上级党委和各级妇救会的组织和领导下，积极投身于抗日救国斗争。

（1）支援前线

在抗战期间，为部队战士做军衣、军鞋，是边区妇女的经常任务。抗日部队的被服、鞋袜，除少量由专业工厂供给外，绝大部分由广大妇女手工缝制。即使专业工厂，也主要由妇女组成。有的地方为部队制作被服还制定了公约。如沙区妇女每人每年为部队做鞋袜3双；清丰县平均每村每年交1—2次军鞋，每个成年妇女每次交2—3双。

1939年前后，部队迅速发展。由于政权掌握在国民党顽固派手中，部队在军需上有很大困难，没有菜金、津贴费和办公用费，衣服破烂。妇救会就发动妇女做军鞋、缝军衣、碾米磨面、洗衣做饭、募捐慰劳战士。如1938年八路军三八八旅在冠县需要军鞋，妇救会即发动妇女在10天内做了3000双军鞋送到部队。当时流行这样一首妇女做棉衣歌：“秋风起，秋风凉，民族战士上战场。民族战士上战场，我们在后方，多做几件棉衣裳，帮助他们打胜仗，收复失

地保家乡。”

(2) 掩护干部、战士，救护伤病员

在抗日战争艰苦的岁月里，在广大的冀鲁豫平原上，许多妇女为掩护干部、战士而舍死忘生。

1939年5月11日，刘克林（当时名叫刘忙活，党员，三区妇救会会长）掩护4个八路军战士，带他们躲藏在一个岩洞里。可她九个月的孩子直哭，她毅然用手把孩子的嘴捂住……直到敌人过去，虽然孩子憋得喘不上气受了罪，但却保证了4个战士的安全。1939年10月在敌人对中心区“扫荡”中，一位大娘为掩护长清县妇救会主任朱慧，就把她当做儿媳瞒过了日本兵。在这次遭遇中，由于群众掩护，100多名干部全部脱险。1940年春天，滑县胡营被敌人包围，为掩护我党干部陈光，村妇救会主任朱大娘指着陈光对前来搜查的敌人说：“他是我儿子，得了伤寒病。”敌人信以为真，慌忙离开了朱家。

为了掩护干部、战士，救护伤病员，妇女群众不惜牺牲自己的身家性命。七区女党员崔二巧被敌人抓去严刑拷打，但她始终不吐一字，保守着党的机密，掩护了滑县县委书记马瑞英和濮阳干部李春彦。敌人把她双腿大筋挑断，用烧红的铁块烤焦了她的双脚，但酷刑始终没有使她屈服。

(3) 传送情报

随着战争向纵深发展，敌我斗争形势越来越复杂，敌人对根据地实行的白色恐怖给我党工作造成了极大困难。由于男同志出走极易引起敌人注意，为了便于开展斗争，妇女就担当起传送情报、联络交通的任务。冀鲁豫地区的李秀真、李二趁、孙九朵、常爱民、于秀莲、宋广趁、苗秀甫，鲁西的贾桂存、李寿玲、李丽等，都是出色的情报联络员。她们英勇机智、出生入死，常常以做生意、开卖铺为掩护，扮作要饭的、串亲戚的、烧香拜佛的去完成送任务。她们想方设法，灵活巧妙地为党组织存放文件，为部队传送重要情报、采购军火，还到敌人据点打探情况。为了夺取抗战胜利，她们

一舍生忘死，贡献了全部力量。

(4) 参加生产，支援前线

发动妇女参加生产，是提高妇女地位、改善妇女生活的一项重要措施，也是增加边区物质财富，坚持抗日战争的必要条件。边区各级妇救会以此做为妇女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1940年，鲁西的妇女生产小组已有182个。多数生产小组与妇救会的小组统一，她们一边生产，一边学习文化，一起开展活动。这样，也便于妇救会对她们的帮助和指导。在未建妇救会的地方，则通过组织妇女生产小组逐步建立妇救会。

妇女们在农忙时，还必须下地劳动，牲口不足，就组织起来拉犁、拉耙。边区的妇女生产还因地制宜，如湖西区鱼台县妇救会就根据当地妇女特长和地理特点，组织了渔业合作社。正是边区勤劳勇敢的妇女在生产中发挥了“半边天”的作用，才能用财力物力支援持久的抗日游击战争。

(5) 送儿女、送丈夫参军杀敌

抗战开始，各地区贯彻中央指示，发动群众，组建武装。发动妇女送子送郎参军是各级妇救会的一项重要任务。

1939年12月9日、1940年1月28日，中央连续发出关于扩大发展革命武装力量的指示，要求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至少应发展武装15万人枪，中原局至少应发展到10万人枪，并建立10倍于正规军和游击队的自卫军。而且由于战斗频繁，部队伤亡大，也亟需补充兵员。在动员妇女送子送郎参军的工作中，妇救会发挥了很大作用，特别是许多妇女干部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带动了广大妇女。

内黄县千口村的妇救会长张栋是1929年入党的老党员，四支队成立时，她带头报名送儿子参军。

金乡县侯大娘（王桂英）把自己的几个儿子先后送到了部队，他们有的光荣牺牲。侯大娘被誉为“英雄的母亲”，解放后被选为人大代表、金乡县的副县长。

单虞县毛楼村开明士绅张老先生夫妻二人将两个儿子张国庆、

张庆玖都送到部队上，后来这两兄弟为国捐躯。

肥城县刘庄镇孙庄的李玉印大娘，自幼过着贫苦生活，1937年她怀着强烈的民族仇恨先送15岁的儿子孙波参军，后又送17岁的女儿参加革命。1940年日军包围了孙庄，两次抄她的家，逼她交出儿女，她始终没有交出。她还经常教育儿子好好干，抗战到底。

边区的妇女深明大义，为了抗击日本侵略者，保家卫国，不惜一切牺牲，送亲人参军的动人事例千千万万。亲人参军走后，她们忍受住感情上的痛苦，挑起生活、生产的重担，积极支援前线，成为我军发展壮大，坚持抗日游击战争的坚强后盾。

5、妇女在斗争中获得初步解放

冀鲁豫广大妇女积极参加抗日活动，在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中，也初步获得了自身的解放。

(1) 学政治、学文化，参加抗日活动

在直南豫北，随着群众运动的开展与妇女培训班的开办，妇女识字班也普遍组织起来。清丰、南乐从1938年就组织起妇女识字班，每天晚上上课，学文化和时事。一些妇女干部常给识字班上课。

鲁西北地区利用农闲时间办冬学，一般是先召开妇救会员大会进行发动，再召开各种小型座谈会说明妇女参加冬学的意义和好处，批判“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观点，讲清妇女要解放必须学文化，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也必须学文化，要建设新中国更需要学文化。这样，把妇女的切身利益与民族的国家的利益密切结合起来，以启发和调动妇女学文化的积极性。从组织上，一个干部要保证动员5名妇女参加学习。有的村由村干部和开明的爱国士绅共同组织冬学委员会，领导冬学的教学工作，主要是请本村的小学教员或有知识的人担任教师。朝北县张鲁集的两处冬学有100多人参加。她们学习热情很高，把冬学课本随时带在身上，没事就拿出来念。在冬学中还学抗日歌曲，讲抗日和妇女解放的道理，既学习了文化，又提高了政治觉悟。

湖西地区的妇女识字班也是因地制宜、因时制宜，不定期地随时举办。他们还编了《办冬学歌》，在妇女中传唱。如：“西北风吹来阵阵寒，收完了庄稼没有事情干。噢！冬学办起来，赶快把书念。睁眼瞎子真困难，处处受欺又受骗，不会写，不会算，你看可怜不可怜！”

自1938年开始，各个地区、各县、区所举办的妇女培训班虽以政治培训为主，但也有文化学习和文艺活动。妇女干部通过培训，在提高政治觉悟，提高政策水平的同时，也提高了文化水平。

许多妇女经过各种形式的培训和学习，都脱离了文盲状态，坚持学文化半年到一年的识字班学员，大都能认识几百字，多的能认识上千字。有的能写信、记帐，有的调到区妇教会工作，还能写简单的工作总结。

(2) 反封建、反虐待，争取平等自由

文化落后、风气闭塞的冀鲁豫广大农村，由于几千年封建思想的束缚与影响，妇女受压迫、受凌辱成了天经地义。“男尊女卑”、“三从四德”、“女子无才便是德”、“女人是赔钱货”等观念根深蒂固。不仅男人以此作为欺压、蔑视妇女的理论依据，连妇女自身也认为理所当然。

抗日战争开始后，妇女干部们走家串户，苦口婆心地动员妇女参加抗战。特别是在遍及全边区的各种形式的妇女培训班中，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主张，男女平等、妇女解放，反封建、反压迫，争取人身自由和婚姻自由等道理，慷慨激昂的抗战歌声，使广大妇女耳目一新。思想上一旦挣脱了封建锁链，旧的传统观念便土崩瓦解，冀鲁豫的妇女以崭新的面貌，带着崭新的观念，和男人并驾齐驱战斗在广阔的平原上，为民族、民主斗争贡献出了巨大的物质力量。

反封建、反虐待，争取妇女解放，主要靠思想教育，提高广大群众的觉悟，改变传统观念，破除陈规陋习，逐步建立民主平等的家庭关系。如鲁西北的临清、冠县等地，许多村妇教会帮助妇女制定了模范婆婆和模范媳妇的条件。由于符合男女老少的要求，这些

条件得到了每个家庭成员的支持，许多新型和睦家庭陆续建立起来，对旧的封建家长统治是有力的冲击，对移风易俗、树立新的风尚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为了使妇女不受打骂虐待，帮助她们争取人身自由，妇救会对打骂、压迫媳妇的公婆和丈夫进行批评教育，情节严重或屡教不改的就进行公开斗争。

对妇女宣传不穿耳、不缠脚，一些妇女积极分子就率先放足示范。鄆城吕庙村的妇女吴桂荣，参加妇救会后，第一个解下缠脚布。很多人笑话她，说她闲话。她说：“我跟共产党闹革命没有错。妇女们应该解掉缠脚布，走路、劳动才方便。妇女们只有起来斗争，才能解除封建势力对自己的束缚与压迫。”在泰西地区，妇女干部向群众宣传缠足的苦处、不缠足的好处，还教她们唱《放足歌》。在冀鲁豫地区，妇救会工作开展较好的村，30岁以下的妇女都把缠脚布放开了，15岁以下的女童不再缠脚。

各地妇救会建立后，便发动妇女把反“推穿”和反虐待结合起来。妇救会召开大会，讲明婆媳应当是平等的关系，儿媳终日在家劳动，婆家就应当管吃管穿，讲明“推穿”是不合理的陋习。

在妇救会已成立的地区，还进行了反对包办婚姻、买卖婚姻的工作，提倡婚姻自由自愿，解除不合理的婚姻。1942年1月，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公布了《婚姻暂行条例》，妇女的婚姻自主权又有了法律上的保障。

（二）妇女运动在曲折中前进（1940年6月至1942年9月）

1940年夏至1942年秋，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阶段。盘踞在冀鲁豫边区的顽军、土匪、反动会道门也趁势与日军勾结或公开伪化，形成对我抗日军民夹击的形势。英勇的冀鲁豫妇女，在敌人残暴的“扫荡”中，英勇顽强，坚贞不屈，以血肉之躯与敌人展开生

死搏斗，显示了中华民族的凛然正气；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坚持抗日游击战争，战胜了自然灾害，开展了民主民生运动，终于为战胜日本侵略者，赢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创造了条件。

1、反“扫荡”中的英雄妇女

（1）惨绝人寰的浩劫

日军对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扫荡”极为频繁，每一次“扫荡”都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每次“扫荡”都给边区人民，特别是妇女儿童带来深重的灾难。数不清的妇女姐妹惨遭奸污、屠杀。劫后尸体纵横，血腥遍野，断壁残垣，瓦砾焦土，完物无存，满目荒凉。被侮辱被损害的土地上永远记录下日本帝国主义的滔天罪行。

英雄的冀鲁豫儿女是吓不倒的，在边区军民反“扫荡”的斗争中，妇女们以血肉之躯与敌人进行了殊死的战斗。

（2）艰苦卓绝的斗争

1941年7月1日，根据北方局、集总决定，冀鲁豫、鲁西两个区党委合并为冀鲁豫区党委。9月初，各界代表选举出冀鲁豫行署领导成员，随之，两区群众团体合并。合并后的冀鲁豫妇救总会主任为郭军，副主任为吴亚南、范世钧（1943年郭军调走，吴亚南任主任），组织部长由范世钧兼任，宣传部长路克里，生活改善部长万丹如，副部长梁伯琪。总会下辖7个分会。

边区妇救总会及分会的组织机构健全后，加强了对边区妇女工作的统一领导。各级妇教会干部，在对敌斗争的艰苦岁月里，向群众传达上级指示，分析形势，鼓励妇女群众坚持斗争。

第一、“坚壁清野”。为了对付敌人的疯狂“扫荡”，群众有组织地进行“坚壁清野”，不给敌人任何有用的物资。妇女和男人一起把家中的粮食、衣服，甚至锅、碗、瓢、盆全部埋藏或转移，特别是公家委托保存的公粮、布匹、文件，给部队做好的大批衣服、鞋袜，更是精心收藏。

冀鲁豫妇救总会的鞋袜被服厂设在内乡县汪魏村，正是日军

“扫荡”的地区，被服厂的妇女同志白天把缝纫机头卸下埋在沙窝里，夜晚再挖出来进行生产。1941年“四一二”大“扫荡”中，妇女们肩扛背驮，转移着机器、被服等物资。

湖西区妇救会在敌人“扫荡”时，组织妇女疏散，用“把东西藏光、人跑光、缸水倒光”的“三光”政策对付敌人，使敌人来了没吃没喝。

第二、掩护干部。在反“扫荡”中，妇女群众舍生忘死地掩护我们的干部、战士，救护伤病员，就是在最危险的时刻也决不动摇。

1941年4月12日，日军对沙区进行毁灭性的“扫荡”。华北民军司令朱程的爱人郝淑斋，因怀孕临产不能随队，就住在内黄县中化村的妇救会长赵兰枝家里。赵兰枝和她的婆母保护着郝淑斋随逃难的群众四处奔跑。22日夜，郝淑斋临产了，婆媳二人为她接了生并一直守护着、伺候着她，直到部队把她母女接回去。

1942年2月，日军两个师团及伪军共3万余人对我南乐、滑县、卫河等县进行“扫荡”。当时我卫河基干大队正在敌人的包围圈中。由于战士都穿便衣，妇女们就到敌人那里去“认亲”，老年妇女领回自己的“儿子”，青年妇女认回自己的“丈夫”。通过认亲，基干大队的绝大部分队员冲出了包围圈归了队。当时卫河县长刘子良，干部谢宝山、靳长印，也都是在敌人的包围圈里被掩护起来的。

1942年3月8日，抗日民军的一个团被日伪军2000余人包围在卫河县瞿固附近，团长万连友手持机枪率部突围时，壮烈牺牲。由于民军身穿军装不能突出包围圈，群众就给民军换便衣，男人的便衣不够，就换妇女的。有的妇女把新婚的衣服拿给民军，有的妇女宁愿赤身盖被子而把衣服脱给民军。赵庄的三个老大娘头上冒着横飞的子弹，扛着便衣送给战士。这次用换便衣的办法掩护民军800多名战士突出重围。

(3) 积极参加对敌斗争

广大妇女不仅鼓励亲人坚持战斗，而且还亲身积极参加对敌斗争。在瓦解敌军，对敌伪军的攻心战中，妇女发挥了特殊作用。妇女和男子一起参加破路挖沟，破坏敌人的交通，使敌人的汽车无法通行。在艰难又特殊的环境中，传送情报、侦察敌情的任务主要由妇女承担起来。

2、生产自救，重建家园

由于日伪顽杂的不断抢掠、摧残和自1941年以来的旱灾、蝗灾，整个边区出现大面积灾荒，灾情尤以鲁西北和沙区为重。我边区党、政、军及群众团体，为挽救人民生命，坚持抗日战争，把救灾作为头等大事。行署颁布救灾贷款办法，发放救济粮、贷款、种子，组织生产自救。广大妇女在生产自救和重建家园中发挥了积极的、重要的作用。

边区的生产自救活动主要是以工代赈，组织男劳力从事运输，组织女劳力纺花织布或编织苇席以换取粮款来维持生活。在鲁西北，妇女纺织积极性极高，她们还组成了互助组，按个人专长进行分工。沙区妇女90%参加纺织，不分昼夜坐在纺花车或织布机前，夜里无油点灯，就燃香照明。沙区妇女在灾荒期间共纺棉200多万斤，织布50多万匹，换回粮食400多万斤。

重建家园主要包括回地斗争和重返家园。回地斗争就是帮助农民赎回被地主乘灾荒之年低价买走的土地；重返家园就是帮助贫苦农民重建家庭，使那些在大灾之年被迫卖儿卖女、典卖妻子而妻离子散的家庭团聚。在回地斗争和重建家园中，广大妇女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三) 妇女运动的高涨 (1942年9月至1945年8月)

1942年9月至1945年8月，是边区群众运动发展壮大时期，中心任务是深入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民主民生运动。由于贫苦农

民真正从政治上、经济上翻了身，群众拥军拥政热情空前高涨。边区的军事斗争、政治形势和经济发展呈现一派大好形势，妇女运动日益高涨。

1、民主民生运动

民主民生运动首先从反恶霸反“黑地”入手，大胆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增资增佃斗争，继而广泛深入地开展了民主民生运动。在这场关系到农民切身利益的斗争中，妇女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通过民主民生运动的深入开展，妇女们认清了封建剥削的根源，懂得了地主为什么富，穷人为什么穷的道理，提高了阶级觉悟，并积累了一定的斗争经验。她们参加对敌斗争更加积极，站岗放哨，生产支前，抗日斗争情绪高涨。

2、参加大生产和拥军支前

1943年《中共中央关于各地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方针的决定》中指出：“在日益接近胜利而又日益艰苦的各抗日根据地，战斗、生产、教育是当前的三大任务，而广大农村妇女能够 and 应该努力参加的就是生产。广大妇女的努力生产，与壮丁上前线同样是战斗的光荣任务。而提高妇女的政治地位、文化水平，改善生活与达到解放的道路，必须从经济丰裕与经济独立入手。多生产多积蓄，妇女及家庭的生活都过得好，这不仅对根据地的经济建设起重大的作用，而且依此物质条件，她们也就逐渐挣脱封建压迫了。这就是在整个群众工作中广大农村妇女的特殊利益的中心所在，也就是各抗日根据地妇女工作的新方向。”冀鲁豫边区各级妇女组织一直把组织妇女参加生产作为重要任务，因此，在大生产运动中，妇女发挥自己特长，因地制宜、因人制宜，积极参加各种生产劳动。

边区子弟兵对敌斗争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边区的妇女，激发了他们热爱子弟兵、拥军支前的热情。1944年4月，我边区军民展开对敌攻势，连续取得作战胜利，边区妇女拥军支前，盛况空前。

抗日战争爆发后，冀鲁豫边区的广大妇女在党的领导和教育下，冲破了几千年封建礼教的束缚，走出了家门，和男子一起参加

了抗日救国斗争，在争取民族解放的同时争得自身的解放。数以千计的妇女知识分子经过培养教育，成为妇女工作的骨干和党的优秀干部，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充分地发挥了聪明才智和桥梁先锋作用；数以万计的劳动妇女，经过培训和斗争实践的锻炼，担当起村、区、县以及地区妇救会的领导职务，为边区的妇女解放事业、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奉献出自己的一切。千千万万的妇女姐妹，经过党的教育，经过战争的考验与锻炼，挣脱了几千年禁锢她们的封建枷锁，以无比的热情，非凡的勇气，为保卫祖国、抗击日本侵略者而英勇拼搏，义无反顾。在思想上获得解放、政治上获得翻身的边区广大妇女，还非常关心边区的政权建设，积极参加选举。八年抗战大大提高了广大边区妇女的思想觉悟，丰富了她们的斗争经验，同时也提高了她们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这为今后妇女运动的开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二、解放战争中的冀鲁豫妇女

（1945年9月至1949年9月）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我边区妇女与边区军民和全国人民一道，经过八年浴血奋战，终于赢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但蒋介石妄图独吞胜利果实，消灭人民力量，不顾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与世界舆论的普遍谴责，悍然于1946年6月发动全面内战。我边区妇女义愤填膺，誓做子弟兵坚强后盾，送亲人参军参战，努力生产，踊跃支前，积极参加反奸清算与土地改革，建设巩固的后方战勤基地。

在解放战争中，边区妇女为保卫冀鲁豫的每一寸土地，为支援千千万万的野战大军，节衣缩食，辛勤劳动，英勇拼搏，流血流汗，与全边区军民共同奋战，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妇女运动也开始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一) 妇女运动在斗争中发展 (1945年秋至1948年秋)

1945年秋，根据形势的发展和需要，边区成立了工农青妇联合总会，张承先任主任，范世钧任妇女部长，以加强对边区妇女工作的领导及群众工作的协调。

1946年6月，边区工农青妇联合总会主任张承先、妇女部长范世钧、菏泽市妇委会主任李曙明代表边区各界先后发表谈话和声明，强烈谴责国民党政府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与帮助下蓄意扩大内战的罪行。

8月28日，国民党军队大举进犯冀鲁豫区，我黄河南岸地区成为敌我双方角逐拉锯的主要战场。我边区妇女围绕着“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战争胜利”的中心任务，在极端艰苦、严峻的形势下，坚毅、勇敢、机智、顽强地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做到了战勤、土改、生产三不误，保证了战争胜利。

1、保田保家，自卫反击

(1) 送亲人参军保家乡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当日，边区各救总会发出告各救会员、儿童团员、姐妹团员书，动员各救会员立即行动起来，参军参战。

各级妇教会根据边区政府和各救总会号召，把扩军、拥军当作中心任务，全区立即掀起了参军热潮。湖西区各县妇教会门庭若市，有的是母亲带着儿子报名，有的是妻子送丈夫参军。在反霸斗争中翻了身的刘大年拉着妇女干部的手，要求帮忙，收她儿子当八路军，而且嘱咐儿子到部队后勇敢杀敌，为老百姓争光。由于广大妇女深明大义，不仅不拉后腿，而且积极支持儿子、丈夫当兵，边区的扩军进展迅速。湖西的金乡、单县、巨野3县就有3000余名青壮年参军。鲁西北的莘县14天内有500人参加了军。阳谷、冠县报名

新兵1000余人。清丰县古城乡梁村的妇救会长梅三芹在两个儿子参加革命之后，又让三儿子马国英带头参加反攻营。到部队后，首长指派马国英代理营教导员，经他带动参军的许多青年都编在反攻营里。

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后，区党委于8月15日发出告全体党员书，号召全区党员和群众积极参军参战，支援前线，安定后方秩序，保证前线供应，特别号召妇女下地生产，代替青壮年，使前方不挂家，一心打胜仗；又于8月20日发出《关于动员参军的指示》。边区工农青妇联合总会、武委会总会也于同日发出告全体会员、团员和民兵书，号召紧急动员起来参军参战，打退卖国贼的进攻，并做好优待军属和参战家属的工作，特别提出妇女会员、姊妹团员和儿童团员要劝说自己的丈夫、哥哥参军，要做劝夫参军的模范妇女、劝哥哥参军的模范儿童，年老的会员要送子参军，争取做模范父母。

在区党委和联合总会号召下，边区妇女积极动员和支持自己的亲人参军杀敌。广大群众自觉行动，形成争相送亲人上前线的热潮。自区党委号召至9月底，仅仅一个多月的时间，全区参军人数即达19590人。

1947年春，参军再现高潮。5月，范县妇女响应县委、妇联号召，送子送夫参军，10天之内即有3400名青年报名；滑县五区魏齐邱村妇女模范黄金朵4次与丈夫商量，终于取得丈夫同意，夫妻双双参军。青年男子上了前线，妇女把后方的生产、保卫任务也勇敢地担当起来。男子参军走后，妇女立即进行生产组织工作，并建立妇女民兵，形成一手送郎参军，一手接枪自卫的壮举。

（2）妇女后方参战支前

在紧张战争情况下，我边区妇女不仅积极地支持自己的儿子和丈夫远离家乡参军参战，或紧随大军担负战勤工作，而且还勇敢地承担了后方支差、战勤、供应军粮、制做被服鞋袜、照顾伤病员等繁重任务，有许多妇女还亲临前线参加战勤工作。

2、反奸清算和土地改革

在中央指示和区党委工作方针指导下，冀鲁豫边区军民在前方打击蒋匪军，广大妇女则在新解放区及后方积极参加反奸清算和土地改革运动。

(1) 反奸清算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我边区部队收复了大片土地。1946年6月，新收复区已占全区一半。新解放区的农民群众过去长期在日伪与封建势力压迫下，生活困苦不堪，广大群众渴望复仇、翻身，迫切要求改善自己的经济生活和政治地位。特别是广大妇女，长期遭受欺压蹂躏，更迫切要求翻身解放。因此，在新解放区，妇女运动的中心就是发动妇女参加诉苦复仇的反奸清算运动。

随着日军投降，反顽斗争日益尖锐起来。盘踞在郓巨二区安兴镇冯庄孙秉贤的保安团卞九部7年多来投靠日军，侵扰我抗日根据地，杀人放火，抢掠奸淫；尤其是1941年活埋我抗日女干部李冉等7人的罪行，郓巨七区的妇女牢记心头。日军投降后，顽军卞九部不但不向日伪进击，反配合日伪军侵扰我根据地。我根据地军民愤怒已极，于1945年9月一举消灭卞九全部，卞九本人被我俘获。9月中旬在一区辛兴集镇，由县政府主持召开了公审大会。卞九的老窝云寺的妇女和群众大批涌向辛兴集，有的还带上剪刀和鞭条。大会上，群众高喊：“卞九是残害李冉同志的凶手！我们要为李冉同志报仇！”“我有仇！”一下子涌出四五十人要登台，竟都是妇女。控诉大会进行了四五个小时，她们边诉边哭边骂，骂了还要打。卞九的小老婆不顾执勤人员劝阻，哭喊着冲向卞九：“我受他多半辈子气，他害死我一家人，我不能便宜他！”她哭着、喊着、又骂、又踢、又打，卞九那张大麻脸又是泥垢又是血点。最后，大会主持人代表政府宣布判处卞九死刑。卞九处死后，郓巨七区的妇女和全县百姓拍手称快，对正在进行的清算诉苦运动和正在恢复和发展的妇女工作及其他各项工作，也都起到了促进作用。

地处边缘的新解放区曹县，斗争了大汉奸朱晓堂、王秋濯等9

个大汉奸头子，没收了他们的财产，获得斗争果实3471630元，全县128个村4.6万余人涌入了伸冤复仇浪潮。平阴县20万群众公审处决了大汉奸刘绪安；临泽县4万群众公审处决了大特务犯刘鉴如；泰安、鄆城、汶上、东垣、单县、宁阳、成武、郛北等县的6万群众向大汉奸吴乃九、李子才、周方略、穆远岐、林荣房、李肇凯等讨还血债，从而大大鼓舞了群众的斗争热情，迅速克服了怕“变天”的思想，提高了认识和觉悟。据1946年6月统计，济宁、嘉祥、巨野、东平、南旺、汶上、昆山实验区、鄆北、郛北、临泽、郛巨等15个县中，新解放区的4120个村中，群众已发动和初步发动起来的有2775个村，参加工、农、青、妇各种组织的达86638人。

边区反奸清算运动的胜利开展，摧垮了敌伪汉奸结合封建势力的统治，在斗争中建立起乡、村政权，改变了农村的阶级关系和土地关系，激发了农民参军参战、努力生产的积极性。广大妇女在参加斗争的同时，更加积极地生产和支前。

(2) 土地改革

1946年6月10日邯郸会议后，区党委即组织干部在华南县进行土改试点，各级妇女干部也参加试点工作。华南县委在工作团帮助下，首先开展反奸清算运动，为土地改革扫清道路。

1946年9月，国民党军队占领我黄河以南地区。河南地区坚持“一手拿枪，一手分田”，边进行战斗，边进行土改。9月20日，晋冀鲁豫中央局发出《为贯彻“五四指示”彻底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指示》，决定公开宣传“耕者有其田”的方针，放手让群众自己起来解决土地问题。11月，冀鲁豫区党委对全区土地改革运动作了认真研究和部署。在区党委和行署领导下，在紧张的战斗环境中，黄河南北广大农民掀起了土改热潮。黄河北的清丰县，仅20天即开展起广大的群众运动，有组织的群众达全县人口70%以上，全县没收地主土地408895亩，一般农民分得2至3亩地，军工属分得3至5亩地。黄河以南的鄆城县张苏尹楼，一部分会员到前线抬担架，另一部分会员在村中进行土改。

各地在土改运动中，都注意发挥妇女的作用。冀鲁豫行署颁布的《妇女分地法令》中指出：“男女在政治经济地位上一律平等，乃我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政策之一。由于过去农民土地未彻底解决，因之妇女政治经济地位之提高亦受到了限制。现为了通过土地改革运动，把妇女的地位进一步提高，以便使之在政治上更前进一步，以贯彻男女平等的精神，特决定在土地改革当中，妇女应与男子以平等地位享受分地之权利（已婚者，即在夫家分地）。如原在出嫁前分得者，亦可于出嫁时自由处理分得之土地，别人不得干涉。”我广大妇女以此法令为依据，更加积极地参加土改运动。

《妇女分地法令》颁布后，各级妇救会组织首先向广大妇女宣传，并组织大家学习，领会精神，以充分享有应得的经济利益。广大妇女还通过土改要求解决妇女的一些特殊权益。对此，冀鲁豫区党委刘晏春同志亦曾撰写《对妇女工作的意见》，刊登于《工作通讯》。

高陵县五区在1947年6月就召开了246名贫农妇女土改会议，会上大家做了四条规定：①不与地主分子通气，不帮助地主藏东西；②妇女有开会和参加活动的自由，家庭不得限制；③男人不准重婚，小老婆要改嫁，不得设阻力；④婚姻要自由，父母不得包办。

阳谷县在1947年初开始了土地改革，地委书记申云浦在万人大会上做了土地改革的动员报告。动员大会后，农民、妇女、青年、儿童都发动起来，把斗争的矛头指向汉奸和恶霸地主。王庄村的农会和妇会联合起来开会，通过诉阶级苦，算剥削帐，广大的农民和妇女进一步认识到，地主吃的饭、穿的衣、住的房，没有一样不是农民的血汗换来的，农民之所以受穷受苦，就是因为地主阶级掌握了政权，霸占了土地，对农民进行剥削。

濮阳县四区召开1500名农民妇女大会，讨论土地复查与解决妇女切身利益问题，560余名妇女热烈发言。

在土改中，妇女组织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巩固。范县五区的400余名青年妇女要求永远参加妇救会；一区吴桥村的妇女会员在几天中

就由55人发展到104人。

在土改运动中，妇女民兵也有了很大的发展。截至1947年底，全区女民兵已有33999人。

在土改中，妇女还结合反封建斗争，争取自己的权益。如清丰县阳邵区副区长孔德社（女）为贯彻冀鲁豫边区婚姻条例，于1947年8月召开300多名妇女的诉苦大会，会后有一部分不合理的婚姻得到解决。

由于妇女在土改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因而得到了群众信任。长垣县八区前小渠村，敌人曾设据点，各种组织被冲垮。经一个月土改工作，农会与妇会均建立起来。妇女领袖史建岩、张庆华被选为村长和农会主任，并组织起民兵自卫队。妇女们表示：男子上前线打老蒋，俺在后方保家乡。

3. 战斗在游击区的妇女

1946年9月，国民党军队占领我黄河以南广大农村和城镇后，区党委为加强黄河以南地区的斗争，组成了黄河南北两套班子。

黄河以南地区的妇女干部，虽经区党委指示可以撤至黄河以北在当地参加工作，但许多妇女干部与群众生死与共，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坚持在游击区战斗。尤其是当地的区、村妇女干部，在与国民党军和地主还乡团的斗争中，英勇顽强，无私无畏，在中国妇女的斗争史上谱写了光辉篇章。

（1）游击战中的妇女

黄河以南地区，为了坚持游击战的需要，不少县都挖了地道。妇女干部便随武工队、民兵一起，利用地道打击敌人。敌占区的妇女利用地道来进行工作，白天蹲在地道里，晚上出来活动，组织妇女开会、动员参军、布置战勤任务等。砀山及单虞县的妇女干部张秀芝、王素芬和芳堂区的女干部领导民兵，加强联防，以地道为依托，昼伏夜出，与丰县顽军经常激战得胜，稳定了砀东局面。

（2）坚强不屈的妇女英烈

国民党军侵占黄河以南地区后，奸淫掳掠，无恶不作。特别是

当地反动武装、地主还乡团更对我清算、土改中的积极分子疯狂地进行报复，其手段之狠毒，惨绝人寰。妇女干部面对严刑拷打及死亡威胁，毫不动摇，大义凛然，视死如归。

肥城县老城乡乔庄村妇女会长曹付兰在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中，立场坚定，站在斗争前列，同地富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地主汉奸对她恨入骨髓。1947年4月的一个晚上，群众抓住了还乡团匪乔兴臣，曹付兰亲自参加于当夜处决了他。还乡团于7日进行反扑，曹付兰母子5人落入敌手。敌人对她进行了惨无人道的折磨，她坚强不屈。敌人当着她的面，用刺刀捅她的3个大孩子，孩子们血肉模糊，惨不忍睹，但她满腔仇恨，斗志更坚。敌人见问不出口供，杀了曹付兰，还把她不满周岁的孩子挑在刀尖上刺死，只有女儿曹桂云被群众救活，一家4口为革命牺牲。

郓巨县汗石桥村西街的妇救会主任关贵芝，是1945年5月入党的党员，在减租减息运动中，她积极宣传、组织、动员妇女参加斗争，受到群众的拥护和爱戴。1946年，国民党军队疯狂进攻解放区，郓巨县被敌占领。还乡团借国民党军声势，到处搜捕我政府干部和共产党员。关贵芝不怕危险，依然坚持工作。1947年2月18日，驻丁官屯的敌人出动十几个还乡团丁到军王庄去抓村里的积极分子。关贵芝当时正在该庄。她一看只有几个敌人，便化装成讨饭婆溜出庄，向区武委会主任王文善报告了情况。王文善当即带领民兵和区武委会的干部包围了军王庄，活捉了还乡团小队长王如林，缴获了4支长枪、2支短枪。

鄆城二区何李庄的妇救会长谌金芝在坚持本地区工作时因地主告密而被捕，还乡团对她审讯20余天，施用各种酷刑，她未暴露丝毫秘密。1947年4月，敌人用绳子把她绑在树上，乱枪扎死在北门外。

无数的妇女英烈为了革命的胜利而壮烈牺牲，她们的精神永远激励着子孙后代奋勇前进。

(二) 妇女运动在胜利中前进(1948年秋至1949年9月)

1948年9月,华东野战军攻克济南,揭开了解放战争战略决战的序幕。边区妇女在“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战略口号鼓舞下,鼓励亲人参军杀敌,全心全力支援前线。全区200万妇女组成声势浩大的支前大军,满怀胜利的喜悦,带着报仇雪恨的激情,不分昼夜,碾米磨面,支援淮海战役,迎送南下大军。在战争连续取得胜利的形势下,边区20万子弟兵编入二野五兵团,横渡长江,进军西南。许多妇女又响应号召,参加南下队伍,跋山涉水,开辟新区。经过4年解放战争锻炼的妇女在斗争中成长,各级妇女组织在斗争中发展壮大。1949年8月平原省成立,冀鲁豫妇女完成了历史使命,开始新的征程。

1、支援子弟兵,解放全中国

(1) 空前的参军热潮

1949年2月开始的参军归队运动中,自2月15日至3月15日,仅一个月的时间即有1.4万余名劳动人民子弟参军。东明县一区刘庄左云邦老大爷参加村里的动员会后,回家召开家庭会。两个儿子争着参军上前线,两个媳妇也争着让自己的丈夫去。最后左大爷说:“别争了,二小年轻,有发展头,还是叫二小去吧!”这样大家才不争了。两个儿媳急急忙忙做鞋袜,做衣服,准备送行。

清丰县第四区张二庄女党员杨亚镇,家有70多岁的老母亲和两个5岁以下的小女儿,她参加村民大会后和丈夫说通,自己保证照顾好老母和幼女,不使丈夫挂心。丈夫思想通了,第二天一早她就到村长那里为丈夫报了名。

这一次参军的1.4万名新战士和归队的1600名离队战士,编为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十七军补训师,于1949年5月4日隆重举行向江南进军的誓师大会。

(2) 全心全力支援前线

1948年11月6日，淮海战役开始。我边区军民全力支持淮海战役。

淮海战役是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和豫皖苏、冀鲁豫、江淮、豫西等军区部队，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至商丘，北起临城，南达淮河方圆数百里的战场上进行的。参战部队60万人，连同民工等，在前线吃饭人数约150万人，每天需用粮食、饲料约350至500万斤。在连续65天的战役前后，边区数以万计的担架队员冒枪林弹雨，忍风雪饥寒，随军出征，夜以继日地运送给养、弹药和抢救伤员。老人、妇女、儿童在后方碾米磨面、做军鞋，昼夜不停。全区先后出动民工30余万人、牲口12万头，组织担架1万余副、大小车15万多辆，运送小米、白面1.05亿斤。可以说，每村、每户、每个有劳动能力的人，都参加了支前工作。

黄河以南的巨南县，在敌我拉锯战中，受到严重摧残。群众听说淮海战役是在长江以北解放军与蒋家王朝的最后一次大决战，蒋家王朝就要垮台，男女老少无不欢欣鼓舞，支前热情空前高涨。他们提出的口号是：“要人出人，要粮出粮，要钱出钱，倾家荡产，砸锅卖铁，也要支援解放军打胜仗！”淮海战役期间，他们支援军粮200万斤，妇女们组织起来碾米磨面、做军鞋，男的把小米、白面送往前方。当时正值阴雨天气，在送粮路上人喊马叫，入夜灯火齐明，广大群众克服种种困难，把粮食送往前方。解放军和南下干部渡江到达江西上饶和湖南长沙、湘潭时，还吃着冀鲁豫人民支援淮海战役的小米。

齐滨县二区妇女接到碾米任务后，争先恐后地干，有的妇女想出很多办法，把米碾得又快又好。如口湾村李进才之妻李大嫂，认为捣米太慢，碾米又少，她发明把豆腐磨子的上扇盖在地上安好的木桩上，磨下边放上谷子，拐出8/10的小米时再在地坑里捣一遍。这样一小时能舂20斤谷子，又快又不烂米。全村很快都推广了她的做法。大李村50多岁的李大娘和老伴把米放在簸箩里用新砖搓，然

后放在地坑里捣，一天能碾好60斤米……

曹县五区后张庄村，70多岁的翻身妇女张秀荣，看见支前的小米急需口袋，便把儿媳妇新婚的被子剪开，做成口袋装米，并对儿媳说：“前方用米当紧，等打倒蒋介石，不愁没好日子过。”

鄄城县妇女碾米磨面373万余斤，做军鞋4万余双。鄄城东南的陈庄只有130多口人，村里分配的军鞋任务是200双，要求7天完成。妇女们说：“为了保卫胜利果实，把敌人消灭在淮海战场，为了使子弟兵在大冷天不受冻，我们坚决完成任务。”她们提出来：“眼熬红，手磨烂，做军鞋，送前线；里也新，表也新，好鞋送给解放军。”全村65位妇女苦战5昼夜，完成军鞋230双，提前两天超额完成任务，受到区政府的嘉奖。

由于解放区人民全力地支援前线，特别是妇女们碾米磨面，缝衣做鞋，在淮海前线敌我阵地上，形成鲜明的对照。天寒地冻，我军指战员早已穿上御寒的棉军装，一天三顿吃的是白馍小米饭。除夕之夜，元旦之晨，大家还包饺子吃；敌人被围在少数村庄里无粮无柴，甚至杀骡马、捉老鼠吃，把棺材板掘出来当柴烧。人心的向背决定了我军必胜，蒋军必败。

2、跋山涉水，支援新区

1948年10月，华北局决定抽调大批干部支援南方新区。1949年2月下旬，区党委、行政公署、军区联合组成南下干部支队，其中有不少女同志，如白林、李敬珍、李蕴华、李子平、陈杰、李耘平、刘秀英、徐广春等。

湖西地委南下500人中，妇女干部就有50余人，其中有吴荣坦、靳向纯、任守范等。这些女同志和男同志一样，历尽艰险，行程数千里，抵达祖国的大西南——贵州，为建设新区再做贡献。

表现最突出的是任守范同志，她是唯一的和男同志一样背着行李行军走完全程的女同志。而且在行军中，她为体弱的同志背行李，宿营时，她又借铺板，烧洗脚水，做饭菜，使同志们及时休息吃饭。每次出发前，她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同志们都

夸她是铁打的。行军结束时，大家一致评她为“行军模范”。任守范到贵州后，和其他女同志一起，参加了土改、清匪反霸运动，并为恢复经济、发展生产而努力工作。1950年3月2日，她在贵阳市鸡场区工作时，被匪徒包围。当时她怀有身孕，但仍然英勇战斗，在突围时，为掩护另一位女同志而光荣牺牲。

3、妇女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妇女干部在斗争中成长

冀鲁豫边区政府一贯重视和支持妇女解放事业，不仅支持妇女反封建、反迫害、反虐待等民主要求，而且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逐步制定并颁布了维护妇女权益的法令，使妇女的合法权益受到法律保护。

1941年11月，晋冀鲁豫行署公布的《晋冀鲁豫边区劳工保护暂行条例》中规定：女工在“三八节”、童工在“四四儿童节”应各休假一日。《暂行条例》对男女同工同酬、青年女工和童工待遇也作了若干规定。同年12月，冀鲁豫行署颁布《冀鲁豫区产妇婴儿保健办法》，对妇女生产前后及婴儿出生之后休息时间、物质待遇等均作了具体的规定。1942年1月，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公布了《晋冀鲁豫边区婚姻暂行条例》，在总则中确定了婚姻平等自愿，一夫一妻的婚姻原则，禁止重婚、早婚、纳妾、蓄婢、童养媳、买卖婚姻、租妻及伙同娶妻。在订婚、结婚、离婚各条中均强调了双方自愿原则，特别对寡妇再嫁及离婚后女方及子女的生活照顾均作了明确规定。边区政府还公布了《冀鲁豫行署关于女子继承权等问题的决定》。

为了解决妇女干部的特殊困难，行署于1944年4月10日发出《关于成立冀鲁豫区婴儿保育院的通知》，并令樊策等同志负责筹备工作。1945年春，为了解决妇女干部生孩子的困难，保育院增设了妇产科，由任苏兼任科长。

1944年9月，冀鲁豫行署发出《禁止妇女缠足》的训令以及《禁止妇女缠足暂行办法》。各级妇教会据此进行广泛宣传并积极组织检查执行情况。过去由于缺乏明确法令，有些地区常常出现反复。

自从有了政府法令，在宣传教育基础上再加以行政措施，放足和不缠足逐渐普遍。

1947年3月，冀鲁豫行署颁布妇女分地法令，更使妇女经济地位得到提高，极大地调动了妇女参加土改运动的积极性。

1946年7月，冀鲁豫行署发出《关于妇女参政问题的指示》。指示中提出各级负责同志及民政部门要经常有计划地吸收与培养妇女干部，并逐渐提高其能力、地位，使妇女参政问题名副其实地见诸实现。

在妇女参政方面，边区妇女组织在战争期间做了大量工作。为加强政权建设，提高妇女的政治地位，打破男尊女卑的封建传统，各级妇救会任务之一就是发动妇女参政。一是动员妇女走出家门参加各级政府的选举，二是推荐和选举有能力有威信的妇女同志担任各级政权的领导职务。如1939年肥城县选举李文甫任县长时，有1/3的代表是妇女，她们都认真地投了票。

随着妇女觉悟的提高、能力的增强和在实际斗争中所发挥的作用，她们中的许多人被选入各级政府，参与国家大事的管理，许多人被选为人民代表，许多人被选拔为各级党政干部。

4. 妇女组织发展壮大，妇女运动胜利前进

1948年5月15日，中央对妇女工作发出指示，提出：重视妇女工作是以完成整个战略任务争取全国胜利出发的。实现党的总政策总路线，没有1/2人口的广大妇女支持是不可想象的。轻视妇女工作，将大大削弱革命的群众基础。因此，指示中特别强调了各级党组织要加强对妇女工作的领导，整顿妇女组织，迅速纠正妇女工作放任自流的状态，把妇女工作的中心放到发动妇女参加生产，在生产中改善经济地位，提高政治地位，切实解决妇女的切身特殊问题，保护妇女的正当权益。

各地委、县委及妇女组织为贯彻中央指示，均对本地区妇女工作进行了研究、总结，肯定了妇女工作在土改、支前、参军、生产等各项中心任务中做出的成绩和贡献，对工作中的问题也进行了分

析研究并统一了认识，决定加强领导，整顿、恢复妇女组织，进一步明确了妇女工作的方向主要是：“组织妇女广大劳动力走上生产战线和男子共同发展生产，实现生产长一寸的任务”，明确了“这不仅是争取全国胜利的战略任务，同时也是保证妇女利益的中心环节。”各县县委在研讨妇女工作后，均制定了具体措施，以整顿妇女组织，纠正抗战胜利后妇女工作自流的偏向。

通过加强对妇女工作的领导和妇女组织的恢复整顿工作，妇女干部受到了教育，思想认识有所提高，政策观念增强，政策界限进一步明确，迅速纠正了工作中的缺点，把广大妇女引导到发展生产、努力支前的工作中，使妇女组织在发展生产，支援战争，夺取全国胜利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1949年1月6日至11日，区党委召开了地委以上的妇女干部会议。范世钧、李若峰（二地委），朱慕兰、苏健（三地委），江岩（四地委），王智（五地委），沙晓鲁、张风全（六地委），董维华、李虹（七地委），刘清霜、江波（八地委），李曙明（九地委），季凯（保育院），张露、吴颜（范县）共16位妇女同志参加会议。会议检查了贯彻中央妇女工作会议精神及区党委妇女工作指示的情况，汇报了妇女参加生产，妇女工作与中心工作相结合的情况及各级妇委的组织 and 建设情况；并对召开边区妇女代表大会，选派代表出席全国妇女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和选举与健全各县妇联组织等工作进行了详细的讨论与具体布置。

1949年2月5日至13日，召开了全区妇女代表大会，妇女代表150人出席。会议选举张秀岩、白林、沙晓鲁、范世钧、万丹如、边涛、李秀真、程悦、李秀等13名代表和2名候补代表出席全国妇女代表大会；选举董维华、李曙明等26名代表及2名候补代表出席华北妇女代表会议。会议还改选了冀鲁豫区妇联领导机构，选出白林、范世钧等妇联委员19名，候补委员2名。会上还讨论和明确了妇女工作的方针。

1949年3月24日，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中南海

怀仁堂隆重开幕。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大会并讲了话。邓颖超、蔡畅在大会上做了报告，高度评价了解放区妇女的作用和成绩。我边区妇女代表李秀真向全国妇女代表汇报了冀鲁豫妇女在战争中英勇斗争的事迹，使与会代表深受感动与鼓舞。

1949年8月20日，中共平原省委、平原省人民政府成立，并随即成立了平原省民主妇女联合会，选举万丹如为妇联主席。1950年6月，万丹如调华北妇联，范世钧继任省妇联主席，并兼任平原省人民政府政法委员会委员。省妇联下设秘书处和4个部，组织部长李曙明，宣传部长冀雨、副部长陈静夫，生产部长李静，妇女儿童福利部长税悦，秘书长戴服劳。

省妇联组织建立健全后，在各级党委和政府领导下，地、县、区、村各级妇联也相继建立、健全。各级妇联干部带领全省500万妇女在完成历史任务的基础上，开始了新的征程。

三、巨大的牺牲，无私的奉献

八年抗日战争和四年解放战争中，冀鲁豫边区500万妇女参军参战，流血流汗，出生入死，英勇拼搏，节衣缩食，支援前线，努力生产，建设边区，为战争的胜利，为妇女的解放，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做出了无私的奉献，出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涌现了许许多多的英雄模范。下面仅举几个典型例子。

1942年春夏间，敌人到鄆城县三区王垓村骚扰。群众刚跑出村就碰到了敌人，区干部冀衡福也在其中，王嫂正巧走在他身旁。这时敌人吼叫着：“抓活的！”“站住！再跑就开枪了！”眼看老冀就要落入敌手。在这紧要关头，老冀听到旁边一位妇女急促的声音：“别怕，你抱着孩子快坐下！”老冀一愣，随即反应过来。王嫂同他并肩坐在一起，看上去像是一家3口。刚坐下，敌人已来到身边，一面用怀疑的目光打量他们，一面想动手抓老冀。王嫂见状大声说：“别吓着孩子！”敌人问王嫂：“他是你什么人？”王嫂从容地说：“俺孩子他爹。”敌人说：“是真的？如说瞎话，连你

和孩子一块杀！”王嫂马上反驳：“谁家会认假男人，谁自己的孩子认假爹？”敌人没话可说，便走开了。老冀脱险后，望着机智勇敢的王嫂，感动得一句话也说不上来。

由于叛徒出卖，优秀妇女干部李冉不幸被捕，敌人对她严刑拷打。她被打得遍体鳞伤，血肉模糊，昏死过多次，但她没有吐出半句软话，坚决保守组织秘密。孙秉贤见硬的不行，就说：“你一个青年女子何苦呢？你还是自首吧，自首书我已给你写好了，你签个字，我就放了你。”李冉大怒：“你想错了，收起你这一套！我不会向你们自首！”孙气急败坏地说：“你真的不怕死吗？”李冉断然回答：“为了抗日，为了救国，我决不怕死！”孙秉贤凶相毕露，大喝一声：“拉出去活埋！”李冉毫无畏惧，迈着坚定的步伐走向刑场。孙秉贤走到李冉面前，指着几个行将就义的同志问她：“怕不怕？自首不自首？这是最后几分钟了。”李冉怒视着敌人：“少罗嗦！我怎样死？”孙恶狠狠地说：“一个样！”李冉立即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然后从容跳进深坑。牺牲时，她年仅22岁。

官四大娘本名李二趁，滑县人。丈夫李昌邦是个雇工，1933年参加共产党，后因与地主进行夺粮斗争而被捕入狱。出狱后在党组织的帮助下，夫妻开了个小酒馆做掩护，建立了地下联络站。

七七事变时，官四大娘已51岁，她加入了共产党，积极进行抗日宣传工作。1941年李昌邦再次被捕壮烈牺牲。官四大娘忍着悲痛，更加积极地为党工作，她多次智斗敌人，营救同志。在减租减息、土地改革中，她积极宣传政策，带领群众进行斗争。内战爆发后，她动员群众参军参战，把一批批青年送上前线。1947年冬，还乡团包围了村庄，搜捕李二趁。她挺身而出，说：“一人做事一人当，我在这里！”还乡团对李二趁严刑拷打，用石磨压住她的手指，用烧红的铁条烙她的全身，但四大娘仍守口如瓶。最后敌人在她脖子上拴住一块大石，把她推下井去。她一家3口为革命献出生命。生前人们称她为“四大娘”，壮烈牺牲后人们称她为“官四大

娘”。一个“官”字，说明她一心为大家，说明她属于人民。

河南省淇县黄洞乡靳月英，1944年支持丈夫冯金海参加了革命。1946年冯金海在一次战斗中因掩护战友而光荣牺牲，年仅25岁的靳月英化悲痛为力量，带着襁褓婴儿，继承丈夫遗志，被誉为拥军模范。土改时她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斗地主分田地，当选为村妇救会主席，加入了共产党。建国后，她是劳动模范，全国“双拥”先进大会代表，模范共产党员；17次出席省、地、县各级军烈属代表会。1959年、1984年先后两次到北京参加全国“双拥”代表会，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和李先念、王震等同志的接见。

在长达12年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冀鲁豫500万妇女艰苦奋斗，节衣缩食，尽所有的物力、财力支援革命。妇女们在操持家务中，宁愿自己吃糠咽菜，也要将小米白面送到前方。大批妇女还直接担负着支前、劳军任务，掩护伤病员及党政军民干部；为部队制做鞋袜被服；参加破路、挖沟、“坚壁清野”，保存军用物资，冒着生命危险坚持反“扫荡”斗争。她们日夜奔走于游击区、敌占区传送情报，侦察敌情，瓦解敌军……在整个战争年代，她们无私无畏，不怕艰难险阻，机智勇敢，百折不挠地完成了各项任务。这一支庞大的妇女队伍，英勇顽强，坚贞不屈，前仆后继，战斗在冀鲁豫广阔的土地上，为党为人民做出了巨大贡献，付出了巨大牺牲，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而广大妇女经过血与火的洗礼，在争取民族独立、民主权利和改善民生的斗争中，提高了政治觉悟、文化水平和工作能力，改变了传统观念，获得了解放与自由。她们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和无私奉献的高尚品德，不仅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光辉永存，而且在新的历史时期也将永远激励着广大妇女为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祖国，为妇女的彻底解放而继续奋斗。

冀鲁豫边区青年运动概况

王 克等

冀鲁豫边区，地处鲁西、直南、豫北的大平原，是延安革命圣地和华北联系华东、华中的枢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起了重大作用。边区的广大青年和其他革命群众一起，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事业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创立了不朽的业绩。

(一)

早在1925年，山东党组织就曾派共青团员徐鹏翥、刘正甫到菏泽搞青运工作，先后发展田位东、孔庆嘉等30余人参加共青团（CY）。1930年6月直南特委成立，成润负责共青团的工作，直南各县相继建立和发展了共青团组织。1932年10月，共青团员沈奎卿联络菏泽、定陶的吴明翔等10余人、经团省特委批准，建立了共青团鲁西南特支。1933年3月济宁省立七中建立了团的特支。1935年春，张增敬任直鲁豫边区特委青年委员，即共青团团委书记，领导直鲁豫边区的青年工作。其他各地区程度不同地开展了共青团工作，并用读书会、书报介绍社、抗日义愤团和出版报纸等合法的形式，在进步青年中进行了工作。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活动日益猖狂，国民党蒋介石实行不抵抗主义，先后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与《何梅协定》。1935年“华北自治”的乌云滚滚而来，中华民族危在旦夕。北平学生响应中共中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发动了举世闻名的一二九运动。全国抗日救国的运动从此掀起了新

的高潮，济南、济宁、大名等地的学生，在中共山东省委及河北、河南省委领导下，积极响应一二九运动，广泛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并成立了“济南市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等青年组织，学生运动如火如荼。1936年2月在北平诞生了抗日爱国青年的先进组织、党的外围“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不久，“民先”在山东各地迅速发展起来，在济南创办了刊物《齐鲁先锋》。聊城、徐州、济宁、开封、曲阜、大名等地的党组织，也积极发展了“民先”组织。老一辈青年工作者，在冀鲁豫广大平原上播下了革命青年运动的火种。1936年11月，党中央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改造共青团，成立民族解放性质的青年群众组织，大批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

（二）

从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到1949年8月冀鲁豫边区撤销，平原省成立，冀鲁豫边区的青年组织，经历了一个由先进青年组成的“民先”组织，转变为广泛的群众性的青救会，再转变为先进的群众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过程。边区青年运动的主要对象则由城市知识青年转变为农村工农青年，然后到更为广泛的城乡青年。这些历史性的转变，为冀鲁豫边区青年运动开辟新局面奠定了基础。在这12年中，青年运动的发展有以下几个阶段。

一、七七事变到1938年。这一阶段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青年运动由城市转入农村，实现了知识青年和广大农民相结合，青年运动与保家卫国的群众运动完全融会在一起，主要任务是广泛发动抗日游击战争。

抗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消极抗战，国民党的部队节节败退，局势混乱，人心惶惶。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救国的大旗，发出发动群众坚持抗战、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号召。直南、豫北和鲁西南、鲁西、鲁西北、泰西以及湖西的党组织，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指示，动员和组织群众，建立和发展各种抗日救亡团体和青年组织，广泛开

展统一战线工作，发动群众，发动青年，动员散兵散枪，组织游击队，使抗日烈火迅速燃遍冀鲁豫大地。

当时，国民党的有些地方政府和杂牌军还没有撤走。根据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方针，我党在不少地方争取了国民党政权的支持，组织参加动员委员会等抗日组织，进行合法的抗日活动。国民党的聊城专员范筑先，是有名的抗战老人。他接受我党的建议，在各县建立了政训处和动委会，共产党员和“民先”队员被派到这些组织及游击支队工作，有的共产党员还被委任为县长，所以群众运动和青年运动开展比较顺利。直南特委也广泛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了冀鲁豫（老）边区救国总会，设立青年部专做青年工作。湖西地区也曾与国民党李宗仁合作，在第五战区组织了民众动员委员会进行工作。我党选派大批共产党员、进步人士和爱国青年参加各级动委会，掌握实际领导权。共产党员郭影秋以动委会组织部总干事名义开办两期青年训练班，召开青年代表会，组织青年救国团；青救团逐步发展到苏鲁豫皖4省30余县，团员达万余人。豫北地区与国民党滑县县长贾心斋也进行了合作抗日的活动。平津沦陷以后，一批“流亡学生”到达山东，经党的安排到韩复榘第三路军的政训处工作。他们响应党的号召，有240人集体到达国民党第六专区（聊城），有200人集体到国民党第四专区（临清）参加抗日救亡工作。济南乡师有学生50多人全副武装经菏泽开到聊城。冀鲁豫边区及其附近城市的爱国青年，也纷纷响应“脱下长衫到农村去打游击”的号召，自发地来到冀鲁豫边区农村，发动群众，开展抗日宣传活动。特别是从国民党监狱中释放出来的一些共产党员回到了边区，成为一支骨干力量，在当地党组织的领导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工作。他们运用各种各样的形式，广泛进行抗日救国、保家卫国的宣传教育活动，开办各种形式的干部训练班，培养抗日战争的骨干力量。如泰西青年工作团，鄂、鄆抗日青年训练班（群众称窝窝队）；单县黄后楼抗日青年训练班；冀鲁豫（老）抗日救国总会开办了大批抗日救亡训练班，在清丰县就开办5期抗日军政干部训练班，培训

抗日积极分子700余人，并发展了一批“民先”队员。1938年5月范筑先采纳我党建议，在聊城建立第六专区政治干部学校，每期学生400人，三个月毕业，4期共培训1000多名干部。各地抗日积极分子经过训练又分散活跃在各地。他们领导武装起义，建立抗日武装，运用各种形式组织青年抗日救国。冀鲁豫边区的各个地区都发展了“民先”，有的由党支部直接领导，有的也建立了基层组织——民先队部。发展规模最大的是鲁西北，到1938年大部分县都建立了“民先”队部，一部分游击支队中也建立了“民先”。1938年5月召开“民先”代表会议，正式成立了鲁西北“民先”总队部，徐少岩为总队长。抗战老人范筑先对“民先”十分支持，担任顾问。总队部出版了机关报《先锋》，是年8月“民先”队员已发展到2500人。直南地区，1938年11月在濮阳城内召开千人大会，成立冀南“民先”分队部，梁伯琪、李静轩分任正、副分队长。边区“民先”队员共发展到4000人，对发动青年参加抗日战争起了很大作用。在地方上建立“民先队”的同时，部队中也建立了先进战士的组织——“朱德青年队”，如鲁西北的十支队，泰西的六支队等，都建立了这种组织。各地区还运用学生会、读书会、十人团等形式组织青年参加抗日活动。有的地区如禹城、冠县、肥城、曹县、鄄城、沛县、丰县等也开始建立青年救国会（团）和儿童团的组织。这一时期青年组织的主要对象，是青年学生、青年教师和知识分子。

二、1939年到1942年9月是青救会发展与巩固的阶段。各地普遍建立了青年抗日救国会，积极动员青年参军、参战、学习、生产，参加创建和巩固抗日根据地的工作。

武汉失守以后，日本侵略军调集部队稳固后方、扩大占领区，对华北开始新的进攻。同时，国民党反动派开始与我闹磨擦，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反“扫荡”、反磨擦的斗争开始尖锐起来。1938年底到1939年初，八路军一二九师和一一五师分别进入鲁西和直南、苏鲁豫地区。1939年1月成立鲁西区党委。同年5月成立苏鲁豫区党委。1940年4月直南、豫北合并成立冀鲁豫（老）区党委，

鲁西南地委划归冀鲁豫区党委领导。各地、县抗日民主政权纷纷建立。1940年4月成立鲁西行政主任公署。1941年1月成立冀鲁豫（老）行署。与此同时，迅速建立了地方军事领导系统，发展了抗日武装。

为了加强青年工作，1938年11月中央青委在延安召开青年工作会议（与西北青救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同时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中华青年救国团体联合办事处。西北青救会第二次代表大会提议，全国青年不分党派、不分阶级、不分信仰、不分性别，在抗日救国的目标下实行大联合，参军参战。大会指出，要收复失地和保卫领土完整，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只有全国人民不分党派、性别、宗教信仰、地域、籍贯，团结起来才能实现；并指出，在新的形势下，要把广大农村青年组织起来参加抗战。参加延安青年工作会议的有冀鲁豫省委的辛明、臧育生、倪宗英，鲁西地区的刘培桐，直南地区的杨泽江。

为了建立和巩固抗日根据地，各个地区都广泛地发动与组织群众，建立工、农、青、妇、文、武等抗日救国群众团体。青救会成了青年群众的主要组织形式。“民先队”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儿童团作为青年工作的一部分也得到普遍发展。从1940年秋天开始，建立了青年群众的武装组织——青年抗日先锋队（简称青抗先）。1941年秋在各中等学校学生会的基础上，成立了边区学联筹委会。

1939年10月鲁西区党委召开全区青年干部会议，决定在县级以上党委建立青委会，各地迅速配备了干部。1939年11月到1940年1月，鲁西各个地委都成立了青委会。区党委青委书记由民运部长徐运北兼任，副书记为刘培桐和王克。1940年3月间，刘调动工作，11月徐去延安，以后长期由宣传部长张承先兼任书记，申云浦也兼任过一个时期。泰西地青委书记是张延积、鲁西北地青委书记是王黎之，运西地青委副书记肖岩，运东地青委书记是王富海。这一时期多数县都已建立了青救会，到1940年4月，据不完全统计，鲁西地

区青救会员已发展到7.6万余人，其中工农青年占80%。泰西青救会主任张延积，鲁西北青救会主任王黎之。1940年4月4日成立了鲁西青救总会，王克、张延积分任正、副主任，组织部长张延积兼，宣传部长黄文，少年儿童部长冯克，军事体育部长梁欲文，秘书长李毓生。同月，运西青救会成立，主任史杰。不久，运东青救会也成立，主任王富海。

冀鲁豫（老）边区青救总会是1940年5月成立的，主任杨泽江，副主任洪学玉，组织部长谢忠信，宣传部长魏光明，生活改善部长洪学玉兼，武装部长刘东明。下辖两个分会，直南分会主任王桂生，豫北分会主任刘东明兼任。早在1939年1月，苏鲁豫区青年抗敌救亡协会成立，不久苏鲁豫青联成立，主任为孙衷文；区党委设青年部，部长孙衷文。1941年1月苏鲁豫区党委改为湖西地委，划归鲁西区党委领导。湖西青联主任为高诚，以后为葛步海、张世珠。

1940年7月山东省召开第一次青年代表大会，成立山东省青年救国联合总会，会长为陈放；王克被选为宣传部长，仍在鲁西青救会主持工作；鲁西的张延积、李学智、田园，湖西的张德超等当选为总会执委。大会前，鲁西会员已发展到16万人，湖西为10万人，儿童团也大量发展。

1941年7月，鲁西与老冀鲁豫合并，成为新的冀鲁豫边区。两个青救会于9月合并，王克、杨泽江分别担任正、副主任，张延积、纪登奎为正、副组织部长，黄文为宣传部长，冯克为少年儿童部长，郭乐天为军事体育部长兼任青抗先总队长，王黎之为青抗先总队政治教导员。

边区青抗先总队部建立后，地区设青抗先区队部，县设大队部，区、村为中队、小队。总队部举办训练班，训练区青抗先干部。至年底，全区青抗先队员发展到近万人。

青救会、儿童团以及青抗先的建立和广泛发展，对抗日根据地的巩固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们在破路平沟，站岗放哨，盘查行人，执行政府公布的合理负担等各项法令政策，优待抗日家属，特别是

动员青年参军方面，起了先锋带头作用。

边区进行了大量的培养青年干部工作。自1939年冬季起，鲁西区党委青委会先后举办了3期训练班，每期百余人，学习《论持久战》、《论新阶段》以及青年运动史和青年工作的有关理论知识，时间为一至二个月。各地县青救会也都举办了训练班。鲁西北青救会举办3期训练班，训练150余人。曹县青救会训练200多人。肥城、长清县的干部培训工作，做得更为出色。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同志曾号召“学习肥城青年，培养干部20万”。他说：在组织青年和培养青年干部上，山东有两个模范县，即肥城和长清，肥城人口60万，青年约6万。他们已组织起来的有1.2万人，两个月培养下级干部360人。他们干部很多，工作便很快推动起来，或者说因为他们推动工作好，所以才能培养出大批干部。这一批人不仅是开展青年工作的骨干力量，而且逐步输送到党政部门，尔后成为根据地建设的骨干力量。

从1941年开始，日军多次推行“强化治安运动”，国民党掀起第二、第三次反共高潮，再加上我们工作上存在一些问题，1942年又遇到大旱，抗日战争进入艰苦的时期。日军对我根据地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反复“扫荡”，不断“蚕食”，国民党顽固派也乘机侵犯，使我根据地在1942年5月比1941年6月缩小3/7。根据地原有人口350万，只剩下200万，而且其中半数以上被迫也向敌人交粮。泰西只剩下纵横不到50里，而且碉堡林立。当时活动的中心区多在黄河两岸沙区，南北只有百余里，东西宽处100里、窄处仅30里，物产丰富的地区则完全被敌人控制。鲁西南除有一小片游击根据地外，巩固的只有刘岗、曹楼、伊庄3个村，从1940年8月开始，一共坚持了四个半月，叫作“坚持三村斗争”。敌人1942年4月3日对南（乐）清（丰）观（城）的大“扫荡”，1942年9月27日对濮（县）范（县）观（城）中心区的大“扫荡”，都使根据地遭到严重的损失。一些干部被捕、牺牲，党政群组织遭到破坏。1942年4月3日大“扫荡”中，冀鲁豫各救总会干部18人

被捕。王克与杨泽江也在其中（杨于第二天途中跑回，王于次年回到边区）。他们被捕后对敌人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泰西青救会主任雷清亮同志光荣殉国。在战争中牺牲的青年工作干部还有王桂生、靖瑞图、郭思九、刘效、张会芬、张德明、胡腾霄、阎庆堂、马功等，华北青委巡视团袁光在昆山工作期间不幸被捕，英勇就义。所有在战争中英勇牺牲的青年工作者，他们永远活在我们心中。1941年1月“肃托”中被错杀的优秀青年工作者、鲁西青救总会秘书长李毓生也永远为我们怀念。

1942年对敌斗争异常艰苦，水、旱、虫灾十分严重，人民生活非常困难，有的地方发生了饿死人的现象，有的卖儿卖女，一斗粮食可以换一个大姑娘。地方工作人员按规定每天只有旧秤12两小米，有些青年工作干部还勒紧腰带，节约出一部分送给抗属及困难户。当时没有洗脸毛巾，一块粗布用一年，没有牙膏，用盐代替；每年发一身单衣，没有染料，用黄泥土染成“紫花”。人人都以身上有“抗日虫”（虱子）为荣，几乎每个人都生过疥疮。但大家都以苦为乐，团结一致愉快地工作。各级青年组织率领青救会员、青抗先队员和儿童团员进行抗灾救灾和生产自救的活动，开展反资敌、打碉堡、割电线、破坏敌人交通的斗争。青年工作一直开展到接敌区、敌占区。如冠县青救会在红十字会内组织“青年小组”，对“扶乩”柳继圣的囤积居奇、放高利贷、勾结日伪等罪行进行评理斗争，取得了胜利。在这个艰苦年代，冀鲁豫边区青年在区党委领导下，和全区人民一道，在各条战线上克服困难，进行了英勇的斗争。

三、1942年9月至1945年日本投降，是青年工作深入发动的阶段。主要任务是动员和组织青年参加减租减息、民主民生斗争，参军参战、开展游击战争。

1942年9月刘少奇途经冀鲁豫边区，在听取汇报后，对革命战略与策略、当前工作、群众运动、党内斗争等问题作了重要指示。他在肯定成绩后指出：如果不迅速把群众发动起来，给群众看得见的物质利益，根据地就不能巩固。如果得不到群众的支持，总

有一天，敌人会把你们挤垮、赶走。没有牢固的群众观点，不搞减租减息，就是机会主义。他还阐述了没有群众工作就没有根据地，以及群众工作必须依靠基本群众的道理。区党委根据以上指示，决定以深入发动群众为全区中心工作，抽调大批干部组成政民工作队，到中心区各县开展以合理负担、减租减息、反贪污、查“黑地”为主要内容的群众运动；并按照1942年9月1日中央政治局《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政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的关系的决定》的精神，作出《关于组织各级抗联的决定》，将根据地县级及县以上的工、农、青、妇各抗日救国会合并为各级抗联，统一领导各群众团体的工作。抗联设立组织部、宣传部、妇女部、青年部和秘书处，分别负责所属范围的工作。区以下组织照常单独活动。各个救国会干部大批参加到统一组织的政民工作队，深入基层，进行发动群众的工作。纪登奎在鄆北发动群众，开展双减运动，创造了新的经验，影响很大。黄文在濮县的工作总结，介绍后效果良好。有的青年工作干部担任了党委工作或抗联主任。双减运动使青年运动和农民运动汇合在一起，青年在民主民生斗争中打先锋、作骨干，在斗争中建立健全青年组织，充分发挥了作用。滑县黄庄，经过斗争锻炼有20人参加了青救会，65人参加了儿童团，87人参加了姊妹团。各地青救会组织，和黄庄一样牢牢扎根在广大农民青年中，并积极动员青年参加青抗先，拿起枪杆参加抗日战争，保卫斗争胜利果实。青年们有组织地支援前线，主动优待抗日军人家属，踊跃参加对部队的慰问活动。在1943年夏季灭蝗斗争中，青救会、儿童团又是一支突击力量。为了战胜灾荒，青年们积极参加生产救灾、变工互助、大生产运动，在抗日沟两侧比较普遍地、有组织地种上了蓖麻子和芥菜，既有利于反“扫荡”中隐蔽活动，又有利于人们生产渡荒。这一时期青年运动在各方面都得到长足的发展。在参军、参战、生产、学习、民主民生斗争等各项工作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经过全党全军全区人民的共同努力，从1943年起，冀鲁豫边区整个形势开始好转。1944年1月，中共北方局发出指示，要求克服

困难，坚持抗战，进一步发动群众进行对敌斗争，开展大生产运动，积蓄力量，准备反攻。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朱德总司令发布反攻命令，命令解放区军队前进，接受日本投降。冀鲁豫行署与军区也联合发出反攻总动员令。各县随即组织反攻营，扩大基干团，数以万计的青年纷纷报名参军。冀鲁豫边区除济宁、菏泽外，东起津浦，西到平汉，南到黄河，北联德（州）石（家庄）铁路，纵横千余里的广大地区全部被我控制。

四、1945年8月到1949年全国解放。主要任务是动员青年积极参加土地改革，参加人民解放战争，争取全国解放。

日本投降，国民党蒋介石匆忙下山“摘桃子”，不让我们受降，企图独吞胜利果实，一面施放“和谈”烟幕，一面调兵遣将，准备向我根据地大举进攻。中共中央1945年8、9月连续发出指示，要求集中力量迫使日伪向我投降，扩大解放区，准备将来对付国民党的大举进攻。冀鲁豫边区立即动员群众参军参战，扩大正规军，发展地方武装和民兵，积极向周围敌人进攻，扩大解放区。从1945年10月到1946年1月，先后解决了菏泽、济宁，冀鲁豫边区完全连成一片。

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通称五四指示），将抗日时期的减租减息政策改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区党委、军区、行署立即抽调300多名干部赴定陶、南华、南乐等地的新解放区发动群众，各地区也都抽调干部到新解放区工作。整个根据地内立即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依靠贫农、团结中农、争取农村90%的群众。青联会（青救会于抗战胜利后改为青联会）根据统一部署，动员青年参加正规军、地方武装及民兵，积极参加土改、生产等各项工作。

1945年冬，国民党为发动内战，以水代兵，单方面决定黄河河水回归故道，1946年3月于花园口正式动工，进行堵口工程。5月间，菏泽、临泽等地15万群众集会，签名抗议国民党这一罪恶行径。沿河群众和广大青年响应边区行署号召，5、6两个月中有21万人上

堤,进行沿河修堤工程。1947年7月,又动员10余万民工上堤,前后30余万人完成土方1300多万立方米,保证了边区数万人生命财产的安全。广大青年积极参加了反对黄河归故的斗争和筑堤自救的活动。当部分黄河水开始流回黄河故道时,边区工、农、青、妇联合总会同黄委会于1947年1月13日发出通知,声讨水淹解放区的罪魁祸首蒋介石,号召边区人民立即行动起来抢险自救。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围攻中原解放区,挑起全面内战。7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进攻的指示》。8月28日,国民党30万军队开始向冀鲁豫边区进攻。我军为了歼灭敌人有生力量,采取了大踏步进退的运动战方针,黄河以南遂成为敌我双方拉锯的主要战场。区党委号召全区党员、群众积极支援前线,参军参战,做好战勤工作。刘邓大军8月出击陇海路,二、三、五地委出动民兵一万多人随军破坏铁路,动员民工15.6万多人送弹药、运粮食、抬担架,胜利完成了支前任务。

1946年9月中旬,在国民党以30万军队占领冀鲁豫边区黄河以南农村、城市后,区党委决定,要不惜一切代价地恢复这一地区。主要领导干部去黄河南坚持斗争,并提出“县不离县,区不离区”的战斗口号。不少地区“一手拿枪,一手分田”,保护群众利益,继续进行土地改革。为了保证部队粮食供应,号召群众藏粮,开展护粮斗争,武工队、民兵保护夏收秋收,青年积极参加了这些活动。

1947年5月11日,新华社发表《全力准备大反攻》的社论,冀鲁豫掀起参军热潮,全区入伍近10万人。1947年6月30日,刘邓大军横渡黄河天险,发动鲁西南战役,揭开了全国战略反攻的序幕。8月,大军越过陇海路,跃进大别山,把战争引向敌占区。华东野战军进军鲁西南。又经过一年的拉锯战,1948年9月,华东野战军攻克济南,菏泽守敌弃城南逃。

1948年11月到1949年1月,我军取得了举世闻名的淮海战役的伟大胜利。在这一时期中,边区青年特别是黄河以南地区的青年同

广大群众一起，积极参军与支前，对解放战争作出了重大贡献。许多青年工作干部转到党政各部门工作，有些带领青年参军。

1948年10月，华北青委在河北省平山召开建团工作会议。中央青委冯文彬和华北青委许世平主持了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冀鲁豫区党委周国玺、鲁西南地委史杰、运西地委常邦国、运东地委王序南、边区学联史常学，湖西及濮阳地委也派人参加了会议。会议明确了青年团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是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是党联系青年的桥梁和纽带，要求各级党组织建立青委会，首先搞好建团试点工作，然后，逐步全面开展建团工作。会后，鲁西南地委在曹县刘岗，运西地委在鄄城县旧城集进行了试点。

1949年1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决议》，冀鲁豫区党委召开县以上青年干部会议。会后在全区有计划有步骤地展开了建团工作。到3月间，区党委、地委、县委三级青年团筹委会全部成立，青年干部基本配齐。从此，边区青年运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1948年青年团华北工委成立。1949年3月26日至29日边区青年代表大会在菏泽市召开，成立冀鲁豫边区青年联合会，选举葛步海等17人为委员，梁东峰等2人为候补委员。会议并通过了《关于目前青年运动任务的决议》；选举葛步海、张大乙、洪学玉、史杰、黄明吾、梁步庭、高桓、钫风楼、王洪山等9人为出席全国青年代表大会代表。4月，在北京召开青年团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冀鲁豫区党委派葛步海、梁步庭、黄明吾、史杰、张大乙等同志参加。

据统计，到1949年7月20日，冀鲁豫边区已发展团员7000人。

1949年8月20日，冀鲁豫边区撤销，成立平原省。平原省委青委随即成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平原省委成立，葛步海为书记，梁步庭为副书记。

1949年1月21日区党委《关于贯彻执行中央建团决议的指示》中明确指出：“我区青年工作，在八年抗战及二年半的人民解放战争中，是有伟大成绩的。”1937年到1949年的12年，是翻天覆地的

年代，是新人辈出的年代。冀鲁豫边区的广大青年，和边区的人民群众一起，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惊天地泣鬼神的英勇斗争，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推翻蒋家王朝，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同时，边区青年运动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造就了大量德才兼备的干部，有些人走上了重要领导岗位。

(三)

边区青年运动的主要组织形式是青年救国会（日本投降后改为青联会），其工作任务除自身建设外，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组织青年学习，教育青年一代，是青年组织的基本任务

列宁说：青年团的任务在学习。边区的“民先”、青救会和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作为党的助手，始终把教育青年一代作为自己的基本任务，对广大青年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理想、革命道德的教育，从根本上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鼓励和引导他们为民族解放事业和人民解放事业而英勇战斗，并围绕各个时期的斗争形势，针对青年的思想实际，用青年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深入浅出地反复地进行教育，提高思想认识，鼓舞战斗意志，把他们引导到火热的斗争中去。没有强有力的、细致而又坚持不懈的思想政治工作，是不可能调动千百万青年投入战争的积极性的。

伟大的抗日战争，关系到整个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关系到四亿五千万炎黄子孙的命运，特别是关系到掌握未来的青年一代的命运。“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青年人责无旁贷，更要一马当先。

抗战初期，主要是进行以抗日救国为内容的爱国主义教育，宣传日本帝国主义灭我中华的野心和惨无人道的罪行，指出亡国灭种的危险，号召“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誓死不做亡国奴”。当时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日本叫嚷三个月内灭亡中国，“亡国论”一时甚嚣尘上，群众万分惶恐。在此情况下，边区的“民先”与青救会等青年组织，根据党委部署，学习党中央的指示和毛泽东同志的《论新阶段》（即《中国共产党在

抗日时期的任务》)和《论持久战》等著作,广泛教育青年,说明抗日战争的性质与前途,形势与任务,以及游击战争的意义与内容等,并用平型关战斗等军事斗争的胜利,说明日本军队不是不可打败的。同时进一步说明“国”与“家”的关系,“国亡”必然“家破”,“卫国”才能“保家”,“卫祖国、保家乡,齐心协力打东洋”,是每个中华儿女的天职,把抗战决心与胜利信念紧密结合起来。

青年人最富有理想,对他们进行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革命理想教育特别重要。抗日战争是千百万人民争取生存的战斗,是正义的人民战争。总的目的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到那时人人有活干,人人有饭吃,不分贫富和贵贱,而且“电灯电话,楼上楼下,点灯不用油,耕地不用牛”。为了争取幸福的明天,必须艰苦奋斗,不怕流血牺牲,向岳飞、文天祥等民族英雄们学习,向淞沪抗战的八百壮士、抗日英雄学习,向近百年来在民主民族斗争中前仆后继的革命先烈们学习。青年们一旦接受这些道理,就毅然参加抗日的队伍,落后的家长们千方百计拉后腿,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当时边区农村有一种传说:“共产党、八路军有‘迷魂药’,年轻人一吃这种药,就不要家了,也不要命了。”这种使青年人革命第一、英勇奉献的“迷魂药”不是别的,正是抗日救亡的爱国主义教育和共产主义革命理想教育。

为了实现崇高的革命理想,还对广大青年进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形成“助人为乐、损人可耻”的社会风气,建立人与人之间的新型关系。正像当时在青年中广泛流传的苏联《祖国进行曲》中所讲的那样:“我们高傲的称呼是‘同志’,它比一切尊称都光荣”,“这儿青年都有远大前程,这儿老人到处受尊敬”。根据地与国民党的“大后方”,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共产主义的道德观培育了根据地内的一代青年。

对青年群众还经常进行政治形势教育,特别是在形势重大变化

的情况下。青年群众的思想有时是复杂的混乱的，而没有正确的认识，就不可能有积极的行动。从以民族矛盾为主的抗日战争到以阶级矛盾为主的解放战争，是革命的重大转变。解放战争初期，在以美国现代化装备武装起来的蒋介石几百万大军的进攻下，广大群众怕“变天”心理相当普遍，惧怕地主、还乡团在蒋军到来时向群众反攻倒算；部分群众还存在国民党中央政府是“正统”的观念。同时，群众对我军以运动战为主的战略不大理解，缺乏胜利信心。此时，区党委着重指出，蒋介石是大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的总代表，国民党政府是独裁、专制的反动政府，揭露蒋介石破坏“双十协定”、进攻解放区的目的，就是要独吞抗战胜利果实，使已经翻身的解放区人民重新回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之下，指出只有打倒蒋介石才能建立独立、自由、繁荣、富强的新中国。同时宣传我军采用的运动战，不计较一城一地的暂时得失，目的是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并用我军的赫赫战果，逐渐消除群众的疑虑，证明“小米加步枪”的人民正义之师，是可以打败用飞机大炮武装起来的反动军队的。这样，澄清了群众中的一些糊涂观念，激发了广大青年参军参战的积极性。

为了完成各项中心工作的要求，青年组织根据党的方针政策，对青年进行广泛深入的教育。如在减租、减息、增佃、增资及土地改革过程中，针对“地主富农养活贫雇农”的谬论，进行“谁养活谁”的教育和讨论，用算帐对比的方法，有力地说明了是贫雇农养活了地主富农，而不是地主富农养活贫雇农。又如在抗战初期的参军工作中，遇到了旧社会“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说法的阻碍，我们便以人民军队与旧社会军队的不同性质和参军抗战是青年的光荣职责来教育青年，而且谱写了“好男要当兵，好铁要打钉”的歌曲教青年们演唱，不仅促使青年争相报名参军，还出现了“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动人事迹。

对青年除了进行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进行政治形势和方针政策的教育以外，还组织青年学习文化和开展文娱、体育活动。

鉴于边区农村文化落后，青年中文盲半文盲的比重很大，于是广泛开展了识字运动。比较普遍而又集中的形式是“冬学”，即利用冬闲期间组织学习。由于多是在夜间进行，所以又叫“夜校”。边区的冬学一般办在地窖里，这里气温比较高，外界干扰少，青年们聚集在一起，学习、唱歌，有说有笑，不仅学习文化，也进行时事政治教育，形成了青年人喜爱的聚集场所。在农忙、半农忙的时候，学习组织形式则多种多样，有的组织青年识字班，以青救会小组、生产互助组或青抗先的班组为一班，由专人负责教学，或拜能者为师。有的开展“小先生”活动，由小学生教哥哥、姐姐、爸爸、妈妈识字。有的开展“一日一字”、“一日二字”运动，有的设立识字牌，挂在村头路口上，以便过路时多看熟记。由于识字运动的普遍开展，使边区数十万青年脱离了文盲状态，并且通过学习，提高了认识，在各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如鄆城青救会员肖银聚，原是文盲，经过学习提高了觉悟，入了党，参加了青抗先，在各项工作中事事走在头里，以后被选为村青救会主任。他能写会算，不久被提为脱产干部。他的先进事迹曾有专门报道刊登在边区青救总会刊物《新青年》上。

在文化娱乐活动方面，根据1940年10月鲁西行署要求各村建立俱乐部的指示，不少地方组织了歌咏队和剧团。他们的文艺节目，从秧歌舞、小歌剧、活报剧、小话剧，发展到一定规模的话剧、歌剧、舞蹈和地方戏，如《白毛女》、《贫女泪》、《血泪仇》、《小二黑结婚》、《亲家母顶嘴》、《兄妹开荒》、《翻身保田》等。这些节目很受群众欢迎。有的还结合实际自编自导了一些节目，以配合中心工作的开展。各地青救会、学生会和儿童团组织，在重大节日（如春节、元宵节、五四青年节、四四儿童节）开展文娱活动。有狮子舞、龙灯舞、踩高跷、跑旱船、地方戏、民族乐器演奏等，锣鼓喧天，载歌载舞，把抗日救国、翻身求解放的思想内容融会贯通于文娱活动之中。在体育活动方面，由于农村条件的限制，主要是开展军事体育活动，进行简单的军事训练，如上操跑步、掷手榴

弹等，还有救护、抬担架的常识教育。有的学校和个别村庄，也组织过一些简易的田径比赛活动。

不论对青年进行教育还是组织学习，一般都注意了群众化的工作方式和采用青年人喜爱的活动形式。从抗战开始，一直广为采用的宣传教育形式是大唱革命歌曲，它在唤起群众觉悟、鼓舞斗争意志方面，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抗战初期普遍流行的歌曲如《松花江上》、《五月的鲜花》、《长城谣》、《黄水谣》、《新编九一八小调》等，揭露了日本鬼子的残暴，激发了群众的民族仇恨，坚定了保家卫国的决心。《义勇军进行曲》、《救亡进行曲》、《土起刺刀来》、《大刀进行曲》、《游击队歌》、《青年进行曲》、《歌唱八百壮士》、《到敌人后方去》、《十家共一把切菜刀》等歌曲，指出“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号召“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我们要一以当十、百以当千，没有后退，只有向前”，“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给了群众以奋起抗战的百倍勇气。在号召参军、拥军及组织生产方面，如《好铁要打钉，好男要当兵》、《戴花要戴大红花》、《送郎上战场》、《五更缝棉衣》、《再见吧，妈妈》（苏联歌曲）、《八路军进行曲》及《二月里来》、《南泥湾》、《兄妹开荒》等，对参军、生产都起了很大作用。《全国动刀兵》、《你是灯塔》、《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东方红》等歌曲，引发了广大青年拥护共产党、热爱毛主席的激情。此外《边区进行曲》、《青年颂》、《青救会歌》、《青抗先歌》，在青年中流行也很广。《边区进行曲》的歌词是：

太阳照红了东方，春风吹荡着麦浪。

我们自由地走，纵情地唱。

在这广大的平原上，

我们没有见过这样的敌人，有过这样的后方。

东至津浦线，西到卫河岸，

黄河边，怒吼着武装抗日的群众一千万。

一千万，游击战，到处打得敌胆寒。
敌人从哪里进攻，
我们就把他消灭在哪边。

《青抗先歌》的歌词是：

中华男儿汉，个个英雄胆，
鲁西的青抗先，英勇又善战。
打倒日本鬼，消灭汉奸队，
卫国保家乡，美名天下传。

当时还收集编印了一些歌谣教儿童唱。有一首歌词是：

日本鬼，太猖狂，奸淫烧杀又抢粮。
又杀猪，又宰羊，闹得鸡飞狗跳墙。
不要悲，不要伤，拿起刀枪干一场。

还有一首是：

日本鬼，喝凉水，打了罐，赔了本。
坐火车，轧断腿，坐轮船，沉了底。
上战场，碰枪子，呜呼一命作了鬼。

所有流传的歌曲，一般都通俗易懂，易为广大青年和儿童传唱。会场、田间和村头，响遍了抗战的歌声，极大地鼓舞了广大青年的抗战热情。除了大唱革命歌曲之外，教育青年的组织形式，还有训练班、宣传队、剧团、读书会、夜校、识字班，以及节日游园会等等。通过这些为青年所喜爱的活动，潜移默化地教育青年，寓教育于活动之中，它的教育效果，要比“填鸭式”的大报告不知要大上多少倍。

对于青年的教育，还有一种形式，这就是组织参加斗争实践，如参战、支前、优属、拥军、减租减息、土地改革、反恶霸、反还乡团等实际斗争，对青年的教育锻炼更为深刻。

对青年工作干部的教育。青救总会和分会都举办训练班，还出版了一些不定期的刊物。如鲁西青救总会于1940年夏出版了《鲁西

青年》，第一期上鲁西行署主任肖华的题词是：中国青年是民族解放的先锋队，抗日救国的主力军。1941年7月两区合并后，边区青救总会的刊物改为《新青年》，社长是黄明吾同志。泰西的《泰西青年》、鲁西北的《青年战线》、湖西的《边区青年》、《青年园地》、《青年阵地》等刊物，对推动青年工作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可惜这些刊物都已散失无存了。

伟大的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是教育青年的大学校，是锻炼青年的大熔炉。边区的广大青年，在党和青年组织的培养教育下，很快地健康成长，不仅在战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而且为新中国的建设准备了不少干部。

二、广泛动员青年参军参战

在战争年代，对敌武装斗争是青年运动的主要任务，边区各地的青救会在动员和带领青年参军参战中做了大量工作，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第一，动员青年参军，壮大主力部队

抗战初期，日军向我国大举进攻，战争的烽火迅速燃遍了冀鲁豫边区的大地。为了救亡图存，在我党的发动、组织下，大批青年纷纷参加抗日部队。青年组织还建立了自己的武装力量，其中有鲁西北的青年抗日挺进大队、青年支队，泰西的青年连，湖西的青年队、青年武装工作团，丘县、莘县等许多县建立了青年连。这些青年武装组织是脱产的，一般都具有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如鲁西北的青年抗日挺进大队，一次遭受四五百日伪军包围，突围中包括大队长在内的21名同志壮烈牺牲，有的在敌人的枪口下喊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解放万岁”的口号英勇就义。青年武装在经过许多战斗后，相继编入了军分区和军区的主力部队。

1938年底和1939年初，八路军一一五师和一二九师的一部分部队开进老冀鲁豫和鲁西地区，军纪严明，秋毫无犯，在梁山、潘溪渡等地打了几个大胜仗，军威大振，广大青年深受鼓舞。在“誓死不当亡国奴”、“保家卫国打东洋”的口号激励下，许多青年报名

参军，使我军兵员得到及时的补充，壮大了队伍。

从1942年下半年到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由于减租减息、民主民生斗争广泛深入开展，广大青年民族觉悟与阶级觉悟以及政治地位都有极大的提高，经济生活也有一定的改善，抗日热情像火山一样迸发出来，参军热潮迅速高涨。这时边区根据地各县，每年都有一次轰轰烈烈的参军运动。这些参军运动的特点，是直接参加主力部队，广大青年高唱着“当兵要当主力军，不是好铁不打钉”的雄壮歌曲，踊跃报名。“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生动场面随处可见。参军青年披红戴花，骑着高头大马，敲锣打鼓，直接送到部队，受到部队首长的热情欢迎。当时的情景，真像过盛大节日一样。

1946年6月，蒋介石向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我冀鲁豫全区贯彻中共中央决定，广泛深入地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广大农民青年的阶级觉悟和政治积极性空前提高。国民党军队及地主还乡团所到之处，疯狂地反攻倒算，残酷地杀害共产党员、革命干部和农、青、妇组织的积极分子，奸淫掳掠，无所不为，白色恐怖笼罩大地。这些暴行激起了青年的极大义愤，在“保卫解放区、保卫土地、保卫斗争果实、为死难的父老兄弟报仇”、“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下，边区一次又一次地掀起了参军高潮。

在党的教育和青年组织的动员下，边区青年踊跃参军的范例不胜枚举。如鄆城旧城集，在1943年“十·一二”大“扫荡”后，一次就有青救会员40多名集体参军，先是组成了抗日青年沿河联防队，不久即升入了主力部队。鄆城六区申庄村青救会干部翟贵勤，入党当了支部书记。他是独生子，家中只有老母亲一人。在1944年春天的一次参军运动中，他以阶级仇、民族恨的道理说服了母亲，毅然第一个报名参加了主力部队——七团。到部队后，他服从命令，作战勇敢，团结同志，被提拔为连长，1949年初在淮海战役中英勇牺牲。这个县在日本投降后，有400多人参加了反攻营，连同县、区武装，共800多人一起参加了主力部队。其中大多为青救会

员，不少区、村青年干部担任了班、排、连长和教导员。1947年秋，400多民兵在鄆城城内一次诉苦大会后，掀起参军高潮，一队紧接一队，当场报名登记参加主力部队的近300人。

又如冠县，1940年夏天，仅一区青救会就动员了100多名青年参加县基干队，秋末全部编入主力部队。1944年9月，仅20天的时间就有182名青年参军。由于冠县青救会动员青年参军任务完成出色，受到上级党委的表扬和鲁西行署通令嘉奖。1938年到1941年这个县参军人数为5950名，1942年到1945年为12410名。一个18万人口的县，平均每10个人就有1人参军，其中多数为青年。

再如阳谷县徐良府村，全体青救会会员集体报名参军，一次报名参军的多达上百人。有些年龄较小的，也积极报名参军，在审批时，不让谁去，谁就不高兴。宁仓小区，报名参军的青年一次就有200多名。南乐县较大的村庄，都是成排成连的青年参军。

参军运动的规模越来越大，参军人数也越来越多，全边区在1946年8月到10月的三个月中，参军人数多达10万余人。

在参军的热潮中，许多青年工作领导干部报名参军。如王黎之，于1945年日本投降后带头参军，担任了七纵队民运部副部长，在解放战争中驰骋疆场，转战南北。又如南乐县青救会主任魏焕斗带领一个反攻营参加了正规军。边区青年组织的各级领导干部带头参军，大大鼓舞了青年的热情，对参军运动的蓬勃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边区青年是边区八路军(解放军)的主要兵源，而且是第二野战军几个纵队的主要力量，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作出了重大贡献。

第二，建立青年抗日先锋队，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青年抗日先锋队(以下简称“青抗先”)是一支不脱产的农村青年抗日武装组织，受青救会和军事部门的双重领导。当时的民兵，分青抗先和模范班两个组织。青抗先队员都是青救会的优秀会员，一方面坚持农业生产，参加青救会的各种活动，一方面肩负对敌武装斗争任务。冀鲁豫边区青抗先的建立始于1940年秋季，在各

级青救会的关注下，青抗先组织得到了很快的发展。凡是有青救会的地方，都发展和建立了青抗先组织，县成立青抗先大队部，区成立中队部，村成立村队部。1941年9月边区青抗先总队部成立后，青抗先组织更加迅速发展，到1941年底已发展到近万人。

青抗先总队部大力抓了青抗先干部的培训，每年要举办两期训练班，主要培养中队一级的干部，每期三五十人，学习七八天，讲抗日形势和任务，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讲游击战术，还针对学员的思想情况请领导同志做报告。他们的政治觉悟和积极性大为提高，回到工作岗位之后，一般都作战勇敢，不怕苦，不怕死，服从组织，联系群众，成为青抗先组织中的领导骨干。

青抗先比较活跃的县，有中心区的昆山、范县、观城，直南的南乐、高陵，泰西的阳谷、寿张，湖西的单县、鱼台，鲁西南的齐滨，运东的东阿等。

在接敌区，青抗先配合模范班及县、区武装开展对敌联防斗争，反击敌人的“蚕食”政策和碉堡政策，有时围困、攻打敌人的据点。没有机枪用鞭炮，没有大炮用土炮，袭击和扰乱敌人，使其坐卧不安。鄄城县五区仪楼、苏楼一带的青抗先与模范班等组成联防，不断袭击敌人，使得仅距3华里的张殿庄据点的敌人不敢轻易出动，保卫了当地人民的生产生活。1941年春天，昆山东城垓、王楼一带的青抗先队员七八十人，在县大队长杨甫同志率领下，配合县大队攻打凤凰集据点。在战斗中，队员们表现勇敢，深受大队和当地群众的赞扬。1941年秋天的一个晚上，实验区大渚潭、傅楼、傅庄等村的青抗先队员10余人，到敌人据点侯集附近作宣传，在回来的路上截击了一股到我根据地抓人、抢牲口的日伪军。经过一阵交火，敌人仓皇逃去，队员们救回被敌抓去的人和抢走的牲口。军分区小报报道了他们的事迹，军分区表扬了他们。1941年冬，驻扎在高陵县杨桑村的军分区被敌人包围，警卫连数次突围受挫，形势紧迫。高陵县青抗先配合区武装和模范班前去增援，从北面路沟打击敌人，军分区机关得以全部脱险。青抗先和模范班都受到军分区的

表扬。

在中心区，当敌人对我根据地大举“扫荡”的时候，青抗先便配合主力部队、地方部队进行反“扫荡”，开展“麻雀战”、地雷战，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1942年“九二七”日军对我濮县、范县、观城进行大“扫荡”，当地的青抗先便积极保护干部，掩护群众转移，主动袭扰敌人。据不完全统计，当地青抗先队员在这次反“扫荡”中缴获日本钢盔9顶、日本旗十几面、步枪3支。后在《冀鲁豫日报》头版刊载了这一战果。1943年“十·一二”日伪军又对我濮、范、观、鄄中心区进行大“扫荡”，各地青抗先同样以反“扫荡”战来回击敌人。当时朝城日伪军300多人，出动汽车、大炮侵占观城的田海村。附近的李家村青抗先，配合模范班阻击敌人，掩护群众安全转移。当天夜里，观城县青抗先大队长何涛带领三四十名青抗先队员，配合该县县大队袭击了住在田海村的敌人。敌人乱成一团，他们原想在田海村安设据点，经打击以后，第二天一早就逃跑了。

青年武装的另一个任务就是锄奸。南乐县的翟村铺，原来是我们抗日活动的中心区，1941年后，周围安设了日伪据点。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建立了一支30多人的青年武装（因系敌占区，没打出青抗先的牌子），最大的21岁，小的只有14岁，有长短枪10余支，他们除掩护干部、传递情报外，锄奸工作干得很出色。伪团长袁志儒是翟村铺人，住在附近的邵庄，清乡、抓人、要粮，无恶不作。翟村铺的青年武装于1942年冬天的一个夜里，与卫河县大队配合，除掉了这个汉奸。安庄的王金是敌人的侦探，干了不少坏事。翟村铺的青年武装于1943年10月配合当地区队处决了这个坏蛋。1940年冬，冠县县委决定处决投敌叛变的汉奸陈文堂。一区青救会主任徐万夫和前小化村的两个青年，到八里庄处决了陈文堂，并将预先写好的锄奸团布告贴在陈文堂的尸体旁，以示对其他汉奸的警告。

1944年青抗先与模范班开始合并为统一的民兵组织，到抗日战争胜利，合并工作全部完成。

第三，广泛开展拥军优属和支援前线活动

战争时期，军民关系十分亲密，边区人民群众把八路军称为子弟兵，八路军把人民群众视为父母，这种关系被称为“鱼水深情”。青救会在拥军支前工作上往往是打头阵的。部队来村，就腾出最好的房子让部队住，送米、送柴、挑水、挑菜。每到节日与部队一起开大会联欢，唱歌、演戏、扭秧歌、踩高跷、玩花船，十分热闹。当部队作战的时候，就组织担架队抬伤兵、当向导、送情报。此外还配合妇救会慰问伤兵，给伤兵送鸡蛋、熬鸡汤、喂药喂饭。当敌人“扫荡”时就掩护伤兵，给部队以精神上的鼓舞和行动上的支援。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我军主力展开了以运动战为主的大兵团作战，边区青年的支前工作也达到了空前的规模。进行一个大战役，所需要的担架队、送粮队、随军民兵就需几万人到十几万人，这时边区大批大批的青年民兵和青联会员，奔向辽阔的战场，和其他支前群众一起转战黄河两岸、陇海线南北。在大杨湖战役中，郟城九区支前民兵一个连（大多数是青年）在区长边运民的带领下，和二野三纵队主攻部队并肩作战，每个民兵提两篮子手榴弹，紧跟突击队投弹手，与敌人展开逐屋争夺战，受到部队首长的嘉奖。

优待烈军属（抗日时期称抗属）是青救会的经常性工作。青救会会员担当了给烈军属代耕的大部分任务，给烈军属拾粪、送粪、犁耙土地、播种、解决种子困难。麦收秋收的大忙季节，青救会更是大力帮助。在日常生活中也常到烈军属家中问寒问暖，挑水送粮送柴，解决烈军属生活中的实际困难。烈军属有人生病，更是关心备至，请医生，煎药喂饭。每逢春节，青救会便发动会员开展大规模的优属活动，排着队，敲锣打鼓，给烈军属送对联和拜年，使烈军属感到无尚的光荣，这对扩大与巩固部队起了重要作用。

第四，破路、平沟、打狗、割电线

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发展游击战争，保护群众，打击敌人，党和政府采取了许多重大措施，青救会都是坚决贯彻执行。

破路。冀鲁豫是个平原。这种地形对敌人机械化部队作战有利，而对于装备处于劣势的我军作战十分不利，使我军小部队的游击活动和群众在敌人进攻时的转移更为困难。为了改变不利的地形，在根据地内普遍开展了破路活动。这是一个长期的浩大的工程，要将村与村之间的道路挖成沟，高可隐蔽人和牲口，宽可通行小车。开始有些群众想不通，说“八路军，真成了‘扒’路军。”青救会员除带头破路外，还经常向群众宣传破路的好处，说服群众积极破路。结果根据地挖得沟渠纵横，像蜘蛛网一样，限制了敌人机械化部队的活动，便利了我军的作战和群众的转移。

平沟。为了分割我根据地，敌人在交通干道上挖了许多“封锁沟”，对我实行囚笼政策。为了打破敌人的封锁，边区军民针锋相对地开展了平沟活动。冠县在1940年冬组织了一次上千人的平沟大“战役”。青教会一马当先，成立了临时青年突击队，在冠县至堂邑的公路上，一夜间彻底平掉了60华里长的封锁沟。泰西区青教会，在三个月的时间里，先后发动青年破坏敌人的封锁沟120华里。

打狗。在抗日时期，我们游击队夜间活动，一进村狗便乱叫起来，起了给敌人报警的作用。狗，成了开展游击战争的一大障碍，因此，边区各地进行了打狗活动，青教会表现得十分积极。而一些群众把狗看作爱物，埋怨说：“青教会不去打日本兵，却成了打狗队。”青救会员们一方面自己带头打死自己家的狗，一方面对这些群众作耐心的说服工作。经过一个时期的工作，根据地里的狗基本上打光了，游击队的活动方便多了。

割电线。为了破坏敌人的通讯联络，打乱敌人的指挥系统，一些县里的青教会还进行了割敌人电话线的活动。冠县青教会在1940年冬天的一个夜晚，组织青救会员四五百人，在冠县至馆陶之间，将十几里长的电线全部割掉。县委、县政府曾召开大会，表彰他们对敌斗争的模范事迹。

三、发动青年参加民主民生斗争及土地改革运动

从1942年9月开始，全边区掀起了以减租减息、反贪污、查“黑

地”、改造村政权为主要内容的民主民生斗争的高潮，边区的青年运动也深入发展起来。

我们建立政权的几年中，虽然作了大量建设根据地的工作，有些地方也进行了减租减息的斗争，但由于没有认真贯彻党中央关于进行减租减息、充分发动群众的指示，致使群众运动没有深入开展，基本群众的政治优势没有树立起来，农民很少得到实际的经济利益，影响了边区抗日根据地的巩固。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区党委下决心将开展民主民生斗争作为中心工作，建立抗日救国联合会（抗联），将大批干部下放到县、区或组成工作队，深入农村，发动群众开展民主民生斗争。边区的青年也迅速投入了这一伟大洪流。

边区的民主民生斗争，1942年下半年主要在濮、范等少数地区搞试点。进入1943年后，在全边区普遍开展起来。在原来没有建立农、青、妇等群众团体组织，或虽已建立过而陷于瘫痪的村庄，一般采取了以建立农会为主，农民、青年、妇女、儿童一齐发动的办法。先将青年农民吸收入农会，在斗争取得几个回合的胜利，青年得到锻炼，一批积极分子涌现出来的条件下，再建立独立的青救会组织。原有青救会组织的村庄，也要重新发动他们与农民一起参加民主民生斗争，在斗争中考验干部，根据其在斗争中的表现决定取舍。同时将在斗争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选拔出来，建立新的青救会领导班子。经过充实与调整，青救会展现了新的面貌，有了新的活力。

青救会工作的深入发展，更广泛地团结了青年群众参加民主民生斗争，壮大了群众运动的声势。在民主民生斗争高潮时期，真是处处集会，村村斗争，游行示威的浪潮此伏彼起，说理斗争的场面悲壮激昂，诉苦的群众声泪俱下，使青年们受到极其深刻的阶级教育，而青救会员也往往在斗争中起着先锋作用。青年们接受新事物快，顾虑少，勇于斗争，特别是广大贫苦农民青年，在扎根串连时是积极分子，在斗争大会上能打破情面抢先发言，成为斗争中的一

支突击力量。张秋县塘子乡于1945年初解放以后，农会召开近万人的大会，斗争投靠日伪、鱼肉乡里的伪乡长、大地主张文元。贫雇农青年在扎根串连、宣传鼓动、清算斗争中起了骨干作用，取得斗争的胜利。在塘子村分配斗争果实时，他们又带头反对按户平均分配，坚持贫苦农民多分的办法，提高了贫雇农的阶级觉悟，巩固了农会，并很快成立了青救会。由于青救会是有组织地参加斗争，一般都是列队进入会场，步伐整齐，气势雄壮，每到晚上，站在村头，便可听到青救会从四面八方传来的集合哨声，激昂的革命歌声和悲壮的斗争口号声，使人精神为之振奋。

在民主民生斗争中，青救会还坚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对地主和富农出身的青年做争取、团结和教育工作。他们当中除少数人对民主民生斗争持对抗态度外，一般都能采取中立态度。有些人还积极向青救会靠拢，一再要求加入青救会，唯恐将其打入“另册”；一旦被批准参加青救会，则表现十分积极。如果家长是斗争对象，便做家长工作，劝其遵守政府法令，满足群众的合理要求，从而减少了斗争的阻力。有些人则从地主、富农的家庭中完全分化出来，成为无产阶级的战士。如鄆城高庄的高连全，后来当了我们的区队长。他作战勇敢，冲锋在前，在一次对敌作战中，他挺身指挥战斗，不幸中弹英勇牺牲。又如鄆城旧城集的邢玉玺，他父亲被斗争过，而他不但在民主民生斗争中表现积极，而且报名参加了八路军。

经过与地主阶级的几番较量，地主阶级的政治统治地位被推翻了，经济上削弱了，农民基本群众的优越性建立起来了，经济上得到了实惠，思想水平也大为提高。人们看到青年在斗争中的力量和作用，对青年的态度也就变了。家长们由过去限制青年到鼓励支持青年参加社会政治活动，并以自己的子女在民主民生斗争中表现积极为荣。青年妇女一般都参加了妇救会组织，有的地方青年妇女也参加了青救会（单独编组）。她们过去受社会的歧视和家庭的限制更大，此时，通过参加斗争解放了出来，有些人成了斗争中的骨干分

子，社会地位大为提高；有的入了党，成了村干部；有的成为脱离生产的工作人员。

在民主民生斗争的过程中，各级青年组织十分注意青年的特殊利益，如青年妇女的婚姻自主与受虐待问题。对于这些问题，一方面要进行宣传工作（歌剧《小二黑结婚》起了很好的作用），另一方面要主动与妇救会、农救会配合，解决实际问题。这对团结教育青年，增强青救会的凝聚力，对倡导家庭和睦，转变社会风气，都有积极的作用。

在民主建政中，大批青年参政议政。在边区基层党、政、军和群众团体中的负责同志，大都是青年人。一些在斗争中涌现出来的有觉悟有能力的青年，被选为村长或副村长，有些还当上了县长、区长。如冠县青救会主任芦成松后来当了县长。鄞城县青救会宣传部长常邦国还被选举为晋冀鲁豫边区参议会的参议员。

由于广大农民青年在政治上翻了身，生活上得到改善，抗战热情更加高涨，参军参战、拥军优属、学习文化、发展生产等活动，都出现了新的高潮。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人民群众欢欣若狂。我军奉命举行大反攻，收复了一些城市和广大农村。群众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土地改革的时期。青年运动也在新的形势下迅猛展开。

从抗战胜利到1946年4月的一段时间里，新解放区的青年和广大农民、妇女一起开展了反奸反霸斗争，惩治了罪大恶极的汉奸分子和依靠日伪势力残害人民的地主恶霸分子。如鄞城县的广大青年和农民群众一起，揭发控诉了汉奸王文宪、李子才、李明奎、孙连科、翟心殿、周方略等人的累累罪行，配合公安、司法机关，分别开了两次公审大会。除王文宪当时没有捉到外，其余5人都在群众的强烈要求下执行了枪决。一些青年在控诉汉奸分子罪行的大会上，有的怀揣短刀、剪子，要亲手杀死这帮汉奸走狗。

在这个时期里，广大新解放区也参照老区的办法开展了民主民

生斗争，采取了青年和农民、妇女一齐发动的办法，待群众初步发动起来，再建立青年联合会。经过一段时间的斗争，青年和其他群众一样得到了初步的发动，为土地改革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46年中共中央发布了“五四指示”，提出要没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这是一次消灭封建、半封建制度的伟大革命。新老解放区的广大青年，热烈响应党的号召，和农民、妇女一起，迅速行动起来，掀起了土地改革的高潮。

在一些新区，土地改革运动开展的初期，少数群众认为“分地主的土地是不义之财”、“地主有好孬之分”，因此在分配土地时，表现得理不直、气不壮。在破除这些错误观念的过程中，青年表现出了顾虑少、接受新事物快的特点，做了不少的宣传动员工作，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在斗争恶霸地主、丈量分配土地、分配房屋和浮财等工作中，充分发挥了突击队的作用。

1946年的秋天，正当土地改革热火朝天开展的时候，国民党军队向我中原解放区大举进攻，我军在陇海线及鲁西南地区英勇反击。我边区青年，特别是黄河以南广大地区的青年，响应党的号召，和全体农民群众一起，参加打倒蒋介石、保卫翻身果实的斗争。在“一手拿枪，一手分田”的口号下，一方面全力支援前线，组织武工队、游击队坚持对敌斗争，一方面坚持进行土地改革。敌人来了就打游击，敌人退了就搞土地改革，终于把土改斗争进行到底。

敌人在占领我解放区的一个时期内，对我翻身农民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其中被杀害的有不少是青救会员和青年工作干部。如鄆城县旧城集的青救会主任张运山，被地主还乡团俘虏后，遭到严刑拷打，他宁死不屈，最后被敌人活埋。敌新五军只在旧城集就抓走20多名女青年，横加摧残和凌辱。敌人的暴行，没有吓倒边区青年，反而激起他们对敌人更大的阶级仇恨，在游击战争中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在配合主力军作战中，捉到许多地主还乡团人员，对那些罪大恶极者给予严厉惩处。

在土地改革和解放战争中锻炼出来的边区青年，政治觉悟空前提高，掀起了更大规模的参军参战热潮，跟随我野战大军南下作战，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四、动员青年参加大生产运动

为了支持长期抗战，改善群众生活，边区军民响应党中央和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的号召，在民主民生斗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基础上，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在大生产运动中，青救会、儿童团表现得很活跃。首先在自己组织内进行充分的动员，讲明大生产运动的意义，树立劳动光荣、不劳动可耻的思想，号召青年、儿童在大生产运动中当先锋。同时运用丰富多彩的文艺形式在社会上宣传，教唱歌曲，编唱快板书，利用秧歌队、高跷队等宣传大生产运动。还有一些青救会组织的剧团，演唱宣传大生产的戏剧，如《兄妹开荒》、《二流子转变》等，在社会上造成气氛，提高了群众搞好大生产的自觉性和积极性。

当时根据地的生产主要是农业生产，而且是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经济，多数青年是作为家庭的一员参加生产活动的，有的青年是家庭中的主要劳动者。他们生产积极性的提高，对家庭生产起到了促进作用。如一些青年积极主动地搞深翻土地、改良土壤，并在温汤浸种、红矾拌种、锄麦、多积肥、积好肥等方面起到了带头作用。

经过民主民生斗争，群众生活有所改善，但在生产上困难仍然很多。有的户有地没有牲口，有的户有牲口而缺乏人力。广大青年遵照毛主席“组织起来”的指示，学习陕甘宁边区的经验，大力开展互助合作运动，组织互助组，实行换工。有些群众对此不习惯，嫌麻烦，有些群众有“买卖好作，伙计难搭”的老观念，怕吃亏，怕搞不好引起邻居间的不和睦，迟迟不愿行动。而青年们则顾虑少，热情高，积极响应号召，说服家庭，率先行动，推动了互助合作活动的开展。

有很多贫民，没有土地或只有少量土地，他们的生活最困难。

青年们率先响应号召，广开生产门路，在信用合作社和供销合作社支持下，开办木工厂、油坊、豆腐坊、弹花坊等。有的利用小本借贷做小摊贩，开小饭铺，解决了许多无地少地贫农的生产、生活问题。

青年、儿童在发展家庭副业方面起着重要作用。饲养牛、羊、猪、鸡、兔活动中，割草、煮食、放羊、出粪一类的活多由青年、儿童来承担。青年妇女多从事纺花织布、做鞋、编草帽辫一类的副业生产，由供销合作社来解决他们的原料供给和产品销售问题。

许多地方的青救会、儿童团还组织了自己的集体生产活动，如组织集体开荒、种树、扩大种植面积。有的利用废水坑种藕，既增加了收入，也改善了环境。儿童团则在所破道路两旁的土堆上点种蓖麻，既增加了经济收入，又起到掩护军民转移、便利游击战的作用。

给烈军属代耕，青救会、儿童团总是走在前列。有的青年以家庭成员身份积极参加，有的以青救会、儿童团集体的名义给烈军属代耕、积肥、割草、打水、拾柴。

消灭病虫害，是发展农业生产中的一项重要任务。冀鲁豫边区1944年秋的灭蝗斗争是一次气势磅礴的群众运动。青救会在这次斗争中，起到了先锋队突击队的作用。

1944年秋天，正当秋禾将熟、丰收在望的时候，在冀鲁豫边区广大范围内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蝗灾。蝗虫到来犹如黄风骤至，顷刻之间，遮天蔽日，晴朗的天空顿时变得天昏地暗。蝗虫降落时像流矢一样飕飕落地，庄稼地里遍是蝗虫。特别是谷地里，谷叶谷穗上爬得满满的，站在地头上，只听得蝗虫吃庄稼时唰唰的一片响声。村内村外的大小树木，也都落满了蝗虫，把一些树枝都压弯了。群众对此又心疼又恐慌。党和政府号召组织起来扑灭蝗虫。一些群众开始没有信心，甚至有少数人散布说：“这是天命，不可抗拒。”这时，各地青救会、儿童团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最先行动，有组织地一面扑打，一面向群众宣传，破除听天由命的思

想。鄆城县旧城集有个巫婆——徐三老婆，过去装神弄鬼，诈骗钱财，民主民生斗争后偃旗息鼓了，这时又乘机大肆活动，说：“这是神虫，打不得”，劝说人们到地里烧香祈祷。青救会便一面对她进行批评，一面向群众宣传。这个巫婆不听批评劝告，不仅在她二亩谷的地头上烧香祷告，还不让别人到她地里打。结果临近的谷子经过扑打保住了，而她的谷子被吃得精光。青救会员抓住这个事例，大量向群众做宣传工作，对动员群众齐心灭蝗起到很好的作用。

在扑灭蝗虫的战斗中，青救会、儿童团的队伍最整齐，行动最迅速，在大兵团围歼战中最听指挥。指挥部指向哪里，他们就打到哪里，有时还边打边唱革命歌曲，做宣传鼓动工作。他们和广大群众在一起，经过夜以继日的奋战，终于消灭了飞蝗，大大减少了损失。群众把这称之为“一个奇迹”。

在大生产运动中，青救会还经常开展评比活动，表扬在生产运动中的先进分子，批评二流子懒汉。一些好吃懒做的青年，在青救会的帮助下，转变为生产劳动的积极分子。一些青年积极分子，由于生产成绩显著，被评为村、区、县级的劳动模范。

(四)

青救会还加强了对学生会和儿童团的领导。

一、蓬勃发展的边区学生运动

边区的学生运动，是边区青年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从一开始就是在边区青救总会的领导和推动下开展起来的。在全民抗战热潮的鼓舞下，学生运动成为边区青年运动中朝气蓬勃的一个方面军。

在边区抗日根据地里，随着各级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和巩固，教育事业得到了恢复和发展。除比较普遍地建立了小学以外，还建立了一些中等学校。最先成立的有筑先学院、边区抗日联中、湖西中学、鄆城中学、卫东中学、齐滨中学、泰西中学；后又合并成立运西中学、濮范中学、筑先抗日中学、泰运公学等；最后经过调整、

合并，建立了边区一、二、三、四中学，冀鲁豫抗战学院和筑先师范前身的第五中学。到1949年8月，各级各类中等以上学校已发展到22所，在校学生已达7626人。随着边区中等以上教育事业的发展及学生队伍的迅速壮大，学生运动也波澜壮阔地开展起来。

边区青救总会于1941年秋冬之间，召开了边区部分中学学生会干部的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筑先学院的陈惠敏、满丰，鄄城中学的常邦国，边区联中的吴建模、马冠堂等。会议由边区青救总会王克、纪登奎主持。会上交流了各校学生运动的情况，讨论了今后的工作，成立了边区学联筹备委员会，推选王克同志兼任主任，陈惠敏任副主任。研究了筹备工作的具体问题，决定尽快召开代表大会，成立边区学联，以统一边区的学生运动。后因形势的变化和任务的改变，代表大会未能如期举行，筹备会在以后的3年里主持了边区的学生工作。1943年调陈惠敏和运西中学的学生会干部苏本善专职作边区学联筹备会的工作，直到1944年底才召开边区学生代表会，成立了边区学联。边区一中的在校学生胡少华担任了边区学联的第一任主席。

在边区学联的组织推动下，各个中学先后成立了学生救国会。学生会是青年学生抗日救国的自治组织，它的根本宗旨是组织青年学生学习政治、学习文化，积极参加各项抗日救国活动，维护青年学生的正当权益。学生运动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开展：

- 1、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在党组织的领导下，配合学校行政，积极开展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

当时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内容：一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打日本，救中国，誓死不当亡国奴，坚决拥护共产党，真诚热爱八路军。二是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教育，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些基本观点，使青年学生逐步树立革命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思想政治工作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除了组织学生听政治课和学校领导的政治报告外，还经常请边区各级党、政、军领导同志作报告。黄敬、晁哲甫、段君毅、杨得志、王卓如、戴晓东、张承先、邹鲁风等同

志都亲自到学校作过报告，讲形势，讲任务，使大家坚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心，提高了抗战的热情。学生会经常组织一些讨论会、演讲会、辩论会，提高青年学生的思想水平。筑先学院曾就唯物史观的重点问题“是英雄造时势还是时势造英雄”进行热烈的大辩论，还就“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的区别，新三民主义与旧三民主义的区别”进行大规模的讨论。在运西中学曾进行民主集中制的大讨论，讨论什么是民主集中制，民主与集中的关系，怎样实行民主集中制。在讨论时大家各抒己见，发言热烈，有时争得面红耳赤，最后请指导老师或学校领导来作结论。通过讨论澄清了糊涂认识，提高了政治思想水平。边区中等学校的教职员和青年学生，绝大多数是抗日的、追求进步的，但某些学校在建校初期，也有少数国民党顽固派观点的教职员和学生在进行活动。1942年春，在运西中学有一个地主出身的学生仪振江，在坚持反共观点的国民党员、数学教员彭子风等人的支持下，拉拢少数学生，吹捧国民党为正统，攻击我党我军，与我争夺青年。在此情况下，学校党组织决定按照既团结又斗争，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对其进行适当的斗争。在党支部的领导下，由学生会出面组织。通过这次斗争，青年学生中少数原来跟仪振江跑的人，也站到学生会方面来，仪振江、彭子风也承认了错误。

2、动员学生努力学习，保证学校教育计划的完成

冀鲁豫边区的斗争是十分艰苦的，特别在1942年前后，敌人对我抗日根据地分割包围，反复“清剿”，边区的中学大都是频繁地行军，教无定所，露天作课堂，背包作板凳，膝盖作课桌，门板作黑板，教材多为老师自编，学生学习全靠笔记。此时生活也非常困难，粮食不够吃就挖野菜、摘榆叶、喝稀粥。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坚定的信念和抗日的热情是坚持不下来的。学生会根据党组织的布置，运用各种方式向学生进行宣传鼓动，在学生中树立以苦为乐、以苦为荣的思想，树立为抗日救国而努力学习的思想，提高了学生学习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行军走到哪里就在哪里上课，课余时间，

劳动休息时间，都有很多人抓紧学习，绝大多数学生保持了高涨的学习情绪。

教育学生明确学习目的，端正学习态度，是学生会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在一个时期里，一些学校在学习政治与学习文化科学知识的关系到上，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并引起了争论。边区三中有的人提出应“以数学课为中心”，有的提出“中心工作就是中心课程”。在筑先学院，曾出现过所谓“课外派”与“课内派”的分歧。一些担任学生会等职务的学生，有的忙于服务工作，认为战争年代，学了数理化也用不上，因而放松科学文化知识学习，被称之为“课外派”。而另一些学生，不担任什么职务，文化科学的学习抓得紧，但不重视社会活动和轻视政治学习，被称为“课内派”。其他学校也不同程度地有类似情况，有的已影响到两方面学生的团结。在这种情况下，边区学联筹备会在边区青救总会的指导下进行了一次专题讨论。王克同志在这次讨论会上作了题为“为什么学？学什么？怎样学”的长篇总结性发言，正确地阐明了学习的目的、学习的内容和学习的方法，解决了学习政治与学习文化科学的关系问题。学联筹备会将王克同志的讲话印发到各校学生会，开展了一次端正学习态度大讨论。通过讨论，统一了认识，端正了学习态度，克服了一些人思想上的片面性，增强了学生之间的团结。

3、组织带领学生参加实际的抗日救国斗争

(1) 参加对日武装斗争。有的学校适应对敌斗争的环境，组织和行动都军事化了，学生也是身穿军衣，发有步枪、手榴弹，担任站岗放哨等军事勤务，虽不担任主要作战任务，但在敌人的“扫荡”、突袭中实行自卫作战。卫东中学于1942年6、7月间的一个晚上，在朝北县的于家庄遭敌突袭，学生马昂和15岁的孙涛正在放哨。敌人攻上来的时候，二人沉着抵抗，掩护全校师生安全突围。马昂、孙涛在该村群众的掩护下脱险，事后受到学校领导的表彰。该校学生共产党员张耀奎，在反“扫荡”中与敌人遭遇，不幸被俘。敌人对其软硬兼施，毒打、放狼狗咬。他遍体鳞伤，血肉模

糊，但坚贞不屈，痛斥敌人，最后被绑到靶上遭轮番点射时仍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表现了中华民族优秀儿女的英雄气概。

(2) 参军。边区各中学的青年学生，在政治觉悟不断提高的基础上，响应党的号召，踊跃报名参军。边区一中的学生于1945年春和1945年秋，两次报名参军100多人。边区三中的学生先后3批270多人报名参军，参军后大部分做了文化教员和连指导员。这两个学校参军的学生中，已知的就有冯道显、罗燕棠、冯子器等15人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英勇牺牲。

(3) 支援前线。1942年9月在我军攻打鄆北张殿庄伪军据点时，运西中学的学生自动组织担架队到前线救护运送伤员。边区一中在1945年秋，50余人组成战地服务团，分赴鄆城、郟城、菏泽一带作战地服务工作。抗日战争末期，我军攻打菏泽、曹县时，边区三中的学生组织担架队运送伤员和参加战场救护工作。解放战争开始，我军发起陇海战役，边区三中20多名学生参加兵站工作。他们组织了运输组、护理组、洗衣组、喂饭组；学生杨吉安等冒着敌机的轰炸抢救伤员；阎有信、李振华等给伤员洗血衣、端屎端尿，战役结束后受到县领导的表扬。

4. 运用文艺形式，广泛开展革命的宣传活动

各校学生会根据青年学生的特点，积极组织各方面有专长的学生广泛开展文化娱乐活动，进行社会宣传。在这方面，筑先学院、边区一中、边区三中都搞得十分出色。各校的精彩文艺演出，给根据地带来勃勃生机，给人民群众带来异常的喜悦，收到很好的宣传效果。

各校文艺活动形式是丰富多彩的，主要的有：歌咏队、业余剧团，还组织秧歌队、高跷队到各村镇进行化装宣传。除此之外，出版墙报、门板报，写宣传标语，画漫画，到冬学、识字班去讲课作宣传更是经常性的活动。特别是1944年五四青年节在边区青救总会和边区学联筹备会的组织下，举行了边区空前规模的青年大联欢，

历时5天，黄敬、宋任穷、杨勇、徐达本等党、政、军领导同志都出席了开幕式。边区中心区中等学校的学生及一部分小学学生参加了大会。会上除进行体育比赛、军事体育表演外，主要由各中等学校学生作了丰富多彩的文艺演出。它对鼓舞青年学生的抗战热情，增强青年学生的团结起了很好的作用。

5、参加民主民生斗争等各项群众活动

1944年夏季，边区一中的学生组成若干分队下乡作群众工作，一部分到朝城、昆吾等县参加减租减息斗争和推行合理负担，另一部分赴鲁西南的东垣县搞征粮，与敌人进行夺粮斗争。1945年冬季，三中学生到复程县参加民主民生斗争，发动群众斗争地主，帮助农民翻身，并多次参加了与敌人的夺粮斗争。

在民主民生斗争的鼓舞下，有的学校的学生在学校内部开展了反贪污斗争。如运西中学的学生，于1943年春，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由学生会出面揭发了总务主任张效鲤的贪污行为，组织了声势浩大的赴专署请愿，受到专员邹鲁风同志的鼓励和支持。专署即派工作组结合学生代表清查了张效鲤的帐目，并对其作了惩处。这对学生也是一次生动的政治教育。

6、参加大生产运动

边区各中等学校的学生，每逢麦收和秋收季节，都有组织地帮助群众割麦和秋收，还积极参加灭蝗战斗，节衣缩食支援灾区群众。在学校内也积极地发展生产，以改善师生的生活。边区三中的学生，响应毛泽东同志“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积极开展生产活动。专署划给100多亩地，拨给一些生产基金，学生就拉犁耕地，种上庄稼和蔬菜，还自己动手打井。一些女同学缫丝打线，织毛巾，打袜子。有的还熬小盐，做醋，放羊，取得了好收成。除改善了伙食外，秋后还给每个学生做了件棉衣。边区一中也在范县刘奶奶庙一带建立生产基地，在王化云校长的带领下，学生们从濮县县城运砖打井，并拾粪、种粮、种菜，改善师生的生活。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边区的青年学生响应党的号召，

服从组织分配，一批又一批地走上了战斗岗位。只边区一中和三中毕业生就达2000多人。有些人在战争年代壮烈牺牲。如运西中学学生会主任苏本善，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两次被俘，前次经营救脱险，后次坚贞不屈，英勇就义，表现了共产党员的崇高气节。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边区时代的青年学生遍布全国，从中央到基层，各行各业都可找到他们的足迹，许多人当了各级领导干部。

二、战斗在边区各地的儿童团

在抗日战争时期，随着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以及民主民生斗争中广大群众的充分发动，在边区各地青救会建立的同时，儿童救国团也普遍地建立和发展起来。

儿童救国团简称儿童团，是广大儿童进行抗日救国活动的组织，也是儿童接受党的教育和进行自我教育的组织。当时参加儿童团的年龄，一般为7至14岁。儿童团受青救会的领导，青救会根据儿童的特点来指导儿童团的工作。县以上青救会都设有儿童部，县设儿童团长。各村的儿童团除了受青救会领导外，党支部、村政权和农会、武委会也都直接向儿童团布置任务，因此儿童团往往发挥着多种多样的作用。

儿童团活动的内容，在许多方面和青救会是一致的或近似的。主要的有以下几方面：

1、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

儿童团进行抗日宣传的一个重要形式是大唱抗日歌曲，首先自己学唱，再互相教唱，然后到各种场合去唱。有的会唱几十首，甚至上百首。儿童特别喜欢唱的歌还有儿童团歌：“小兄弟们呀，小姊妹呀，我们的力量是了不起呀，快团结起来，到前线去吧……”一唱起这支歌，他们便精神抖擞，分外神气。儿童们唱歌不分时间、地点，下地干活唱，走路唱，甚至吃着饭也唱。集合操练、开群众大会、外出宣传，更是他们大唱抗日歌曲的时机，互相拉歌声此起彼伏。所唱歌曲，有激昂慷慨的进行曲，也有抒情内容健

康的抗日小调，群众从这动听的歌声中受到了抗日救国的教育。

有的组织了儿童宣传队，用踩高跷、玩花船、说快板、演活报剧等方式作宣传工作。鄄城县旧城集的儿童宣传队在开展对敌伪政治攻势中到张殿庄伪军据点附近作宣传，民兵、区队封锁着敌据点，儿童宣传队就在离据点半里远的村子里演唱了半天，使敌占区的群众受到抗日教育。

2、站岗放哨，送信带路，是儿童团的经常任务

在根据地各个村庄里，到处可见到站岗放哨的儿童团员，他们手拿红缨枪，雄赳赳气昂昂，十分认真地盘查行人，目的是监视敌人的活动，防备敌人突袭，同时也防备汉奸敌探的侦察破坏活动。他们很喜欢自己手中的红缨枪，也喜欢唱《红缨枪》：“红缨枪，龙格龙格龙，红缨枪，龙格龙格龙，枪缨红似火，枪头放银光，拿起了红缨枪，去打那小东洋！……”过往行人往往被他们这种战斗精神深深感动。

当时区、乡的党、政、武机关的一些通知、信件和情报，往往要儿童团去送。他们对执行这种任务非常热情，又非常认真。信件、情报只要交到他们手里，不管白天黑夜，不管刮风下雨，二话不说立即出发。白天送信还要背上个草筐，以作掩护，顺便还可侦察敌情。你若问他为什么这样干，他会斩钉截铁地答复你：“听党的话，打日本鬼子，不当亡国奴！”

3、积极参加拥军优属活动

边区各地的儿童团和青救会员一起积极开展拥军活动，平时经常对儿童进行热爱八路军、支援八路军的教育。只要我们的部队一住下，儿童团就配合青救会、妇救会多方面地开展拥军活动，其中募捐劳军是这方面的经常活动之一。泰西肥城的儿童团曾在一次劳军中募捐数百元，一些儿童把自己积攒的压岁钱也捐了出来。他们抬着募捐来的鸡蛋、军鞋、瓜果、梨、枣等慰问品，敲锣打鼓地慰问部队和伤病员，有时还演出点节目或唱几支歌子。战士和伤员常常被感动得热泪盈眶，高呼口号，表示一定要练好本领，英勇杀敌，

感谢小弟弟、小妹妹的热爱之情。在与部队举行联欢活动时，儿童团表现得特别活跃，唱歌、拉歌、呼口号、演节目，大大增加了欢乐的气氛。

在参军运动中，儿童团也积极作宣传工作，有的儿童还动员自己的兄长参军。他们给报名参军的大哥哥们戴红花，牵大马，敲锣打鼓地送到部队。稍大些的儿童，有的积极要求参军。他们多报年龄以示其岁数大，踮起脚跟以示其高。当批不准时，就急得跺脚，眼里流下泪来。有的儿童偷偷跑到部队要求参军，又被部队派人送了回来。有些儿童团中的小英雄，还自发地组织了游击小组，侦察敌情，参加战斗。1939年，泰西区曾有3个儿童，在敌人“扫荡”中，凭着20颗手榴弹，打退了二三十个敌人的进攻，为此受到军分区的表扬。

在优属工作中，儿童团表现得更为积极，常常与青救会开展竞赛，而且常常跑到青救会前头。平时给烈军属抬水、扫地、拾柴、拾粪，春节时和青救会员一起，排着长队，喊着口号，敲锣打鼓给烈军属送对联、拜年。

4、积极参加文化学习

儿童团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学习文化。首先是教儿童识字，扫除文盲。有小学的村庄，动员儿童团员上学，鼓励他们好好学习。没有小学的村庄，动员他们上冬学、上识字班。儿童团员大都能认真学习，弄不到课本，就自己抄写，弄不到笔和纸，就用小棒棒在地上写。有些儿童团员学习进步很快，不用很长时间就达到脱盲的程度。

许多儿童团员不仅自己学，到家中还帮助父亲、母亲、哥哥、姐姐认字。许多村庄的儿童团在村头站岗的时候，身边都挂着一个识字牌，过往行人要会读牌上的字才予放行。这对边区扫盲工作的开展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5、好好劳动，努力生产

在大生产运动中，儿童也是一支不可小看的力量。儿童团向团

员讲大生产运动的意义，讲劳动光荣，懒汉可耻，教唱《兄妹开荒》、《二流子转变》等歌曲。儿童团员们相互开展劳动竞赛，表扬积极分子。对劳动不好的，有的加以规劝，有时在开小队会时给以批评，被批评者往往表示“知过必改”，随后便有明显的转变。

儿童团员生产的内容，主要是拾粪、拾柴、割草、放羊及帮助父兄干些农业上的辅助劳动，但有时也搞集体性的劳动，如小片开荒。当时最为突出的就是点种蓖麻子，有集体点种的，也有个人点种的，房前屋后，地头坑边到处点种。特别是在所破道路的两旁，密密麻麻地种满了蓖麻子。一到秋天，道路两旁一片葱绿，果实累累，不仅增加了经济收入，而且有利于改变地形，掩护群众，便于我军机动灵活地作战。1944年秋，边区各地的儿童团还在灭蝗战役中立了大功。

6、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

在民主民生斗争和土地改革运动中，儿童团员们表现得非常振奋，活动也特别频繁。他们经常集合、唱歌、操练；讲民主民生斗争及土地改革的道理，讲恶霸地主剥削压迫农民及农民进行斗争的故事；编唱一些诸如“土地回老家，合理又合法”之类的歌谣。这样，既教育了自己，也向群众作了宣传。他们积极参加农民群众的游行示威和斗争恶霸地主的大会，高呼口号，威慑恶霸地主，打掉地主阶级的威风。有的儿童还登台发言，揭发和控诉恶霸地主的罪行。在禁赌活动中，儿童团也表现得十分积极，他们首先在团员中作动员，然后查赌，发现有人赌博，或向农救会、青救会报告，或直接抓了赌具，进行批评，使根据地各村赌博恶习迅速收敛，有不少村庄赌博绝迹。在破除迷信活动中，儿童团是一马当先。青救会指导儿童团，对团员进行无神论的教育，使其懂得破除迷信的意义。儿童团员们一旦接受无神论的真理，就积极行动起来，他们不但积极开展宣传活动，还参加实际的破除迷信的活动。他们捣毁巫婆、神汉设的神像与供桌，警告其不得再装神弄鬼欺骗坑害群众，对屡教不改的还要配合农会、青救会对其开展斗争。对于那些散布谣言蛊

惑群众取神水、拜大树的人，也给以揭露和打击，使封建迷信活动大为收敛。

由于儿童团作了大量的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儿童团员的地位大大提高。起初人们看不起儿童团，认为组织起儿童团不过是唱歌、跳跳、玩玩，凑个热闹，大人的事不让他们参加；后来认识了儿童团的作用，不但有任务放手交给他们去干，而且吸收儿童团长参加村里重要的干部会议，打破了那种“嘴上没毛，办事不牢”的旧观念。过去儿童们在家里地位低下，一些家长动不动就训斥、咒骂，甚至动手就打。他们严厉限制孩子参加儿童团，限制孩子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后来看到儿童团的集体力量，眼见儿童团办了许多好事，而且使自己的孩子受到很好的教育，能够健康地成长，同时加上农会、妇会、青会的帮助教育，这些家长才改变了对儿童团及儿童的态度，由阻挠、限制变成了支持，甚至以自己的孩子在儿童团内表现积极而觉得光荣了。

冀鲁豫边区的儿童团，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作出了宝贵的贡献，在边区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荣的一页。同时，通过斗争的锻炼，儿童们也茁壮成长起来，许多儿童团员以后成为革命和建设的有用人才。在长期的对敌斗争中，有不少儿童团长和团员在战斗中光荣牺牲，在刑场上英勇就义，这些小英雄们永远值得我们怀念。

(五)

边区的青年运动，经过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光辉历程，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也积累了许多经验。今天研究这些经验，对青年工作的继往开来是很有意义的。

一、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围绕中心任务开展青年工作

青年组织要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开展工作，同时又应保持青年组织业务工作上的独立性。边区的青年组织是在党的领导下建立、发展起来的，它是党领导青年运动的得力助手，是党团结、领导广大

青年进行革命斗争的坚强纽带。毛泽东同志曾经讲过：“夫青年乃国家之精华，进步青年尤属抗战之至宝”^①。边区各级党委对青年工作是十分重视的，为青年组织的建立和发展调配了大批优秀干部，并及时给以政治上的领导和工作上的支持。这是青年工作得以迅速发展和健康前进的根本保证。边区的青年组织也坚决拥护党的领导，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勤奋工作，完成了党所交给的任务。

党委对青年组织的领导，主要是政治上的领导，即根据各个时期的形势，指明政治方向，规定斗争任务和斗争方式。这并不排除在具体业务工作上，青年组织保持自己相对的独立性。在日常工作上青年组织应根据自己组织的性质、任务和青年的特点来进行工作，充分发挥组织的作用，完成党所给予的斗争任务。为此，就需要正确处理党的中心任务与青年组织部门工作的关系。党的中心任务，事关革命全局，青年组织应全力以赴，保证中心任务的完成，青年组织的部门工作要围绕党的中心任务进行。边区的青年组织，无论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都是按照这个精神来进行工作的。在各个时期，党的中心任务如参军参战、民主民生斗争、大生产运动、土地改革等，青年组织都积极参加，运用自己组织的力量去完成应负的责任。青年组织对完成中心任务作出了重大贡献，同时也锻炼提高了自己。

青年组织还有其本身的具体业务工作，要关心解决青年群众的特殊利益和要求，诸如青年群众的学习、体育和文娱活动以及青年的婚姻自主问题，反对虐待青年妇女，等等。这些问题一般应在参加党的中心工作的过程中结合解决，但必须抓紧，不可忽视，否则便会缺乏对青年的凝聚力。解决了青年群众的一些切身利益，满足了青年群众的一些特殊要求，就更有利于调动青年的积极性，

① 《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4月第1版，第682页。

更有利于在党的各项中心任务中发挥青年组织的更大作用。

二、摆正青年运动与农民运动的关系

青年运动是党所领导的整个群众运动的一部分，同时它又有其特殊的性质和任务。两者之间既有共性，也有个性。因此在实际工作中，青年运动既要以一个方面军的姿态参加斗争，又要保持其独立的组织和执行特殊的任务。

当时边区的青年运动，其主体是青年农民。农民是以阶级来划分的，青年是以年龄来划分的，青年仅仅是农民阶级的一部分。在当时激烈的历史大搏斗中，起主导作用的还是整个的农民运动。青年只不过是作为农民阶级的一部分参加战斗，离开整个的农民运动，青年的翻身、解放是不可能的。因此在民主民生斗争和土地改革等重大斗争中，农会是唱主角的，青年组织应率领自己的队伍积极投入运动，在斗争中首先求得整个农民阶级的翻身和解放，同时也锻炼自己，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同样，在大生产运动中也脱离不了整个的农民运动。落后的小农经济与先进的工业经济不同，是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在一般情况下，农民青年是家庭中的次要成员，有些青年还只是辅助劳动力，在组织互助组、变工队、参加合作社等问题上不能起决定作用。因此在生产运动中，要教育青年积极参加家庭劳动，在农业技术的学习推广中起积极作用，不要单独组织搞生产。

但青年运动毕竟有它的特殊性。青年有特殊的利益和要求，它有独立的青年组织，它有青年工作的特殊方式和活动内容。因此，还应保持其组织上的独立性，使其在整个群众运动中发挥突击队作用的同时，用青年化的工作方式来解决青年运动的特殊任务。

三、采取适合青年特点的工作方式

青年工作应研究青年的特点，采用适合青年特点的工作方式。

关于青年的特点，毛泽东同志曾概括地说过：“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的一部分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他们最肯学习，最少保守思想”。根据多年的实践体会，青年工作应根据青年的以下特点来

开展。

第一，好奇。他们年纪轻，知识不多，没有老框框，最少保守思想，最喜欢新生事物，最容易接受新鲜事物。他们对老一套的工作内容和陈旧的工作方式，往往产生厌倦情绪。所以我们在进行工作的时候，要注意不断补充新的活动内容，采取新的活动形式和工作方式。

第二，好动。青年是长身体的时期，精力充沛，浑身是劲，爱动不爱静。所以进行青年工作，要尽量避免开长会，作大报告，不论进行教育或其他活动，都要多在动态中进行。如运用唱歌、演戏、体育活动、参观、调查访问及青年们喜闻乐见的其他形式，寓教育于各种生动活泼的活动之中。

第三，好学。青年人是长知识、长才干的时期，所以他们最喜欢学习，要求进步，渴望得到更多的科学、文化知识。青年组织应该通过一切活动，贯彻对青年的教育，使其有崇高的革命理想、优良的道德品质、坚强的工作能力和英勇的斗争精神。

第四，好胜。青年人富于理想，勇于进取，不甘落后，具有强烈的竞争心理。青年工作应抓住这个特点来组织其活动。如在一些活动中展开竞赛，表扬先进等，使其蕴藏的力量充分发挥出来，更好地起到先锋队的作用。

四、根据斗争任务改变组织形式

组织形式服从斗争任务。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斗争任务，青年运动采取不同的组织形式是完全必要的。抗战开始，为了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动员更广泛的青年群众参加抗战，取消“民先”，建立青救会，起到了团结各阶层青年共同抗战的目的。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进行土地改革，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成为中心任务，斗争的性质是阶级的大搏斗。此时，青救会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建立先进青年群众性的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后为共产主义青年团）就是十分必要的了。

除了“民先”、青救会、青年团这些不同时期的青年运动的主

要组织形式外,还应建立团结广大青年共同斗争的其他组织形式。如根据不同地区、不同职业、不同爱好组织起来的青年联合会、学生救国会、青抗先、读书会、青年宣传队、青年剧团和青年俱乐部,等等。这些组织总的斗争目标是一致的,但它适合不同青年的爱好,丰富了青年运动的内容,更有利于充分发动青年去完成共同的斗争任务。

青年运动的主要组织形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应根据形势的发展需要而有所改变,但必须始终坚持先进青年要团结广大青年群众共同前进的原则。青救会是抗日青年的群众性组织,其组织的成员十分广泛,表现也有很大差异。但青救会很注意培养积极分子充当领导骨干,并对其深入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在先进青年中发展党员,源源不断地为党输送新鲜血液。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是先进青年群众性的组织。在强调先进性的同时,也不可忽略它的群众性,必须牢记团员以外还有更加广泛的青年群众,团结、教育整个青年一代,是青年团组织长期、艰巨的任务。

五、继承发扬党的传统作风

在边区从事青年运动的广大干部和先进青年,在党的教育培养下,经过长期艰苦的革命斗争,继承和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是边区青年运动深入开展的重要保证。

第一,继承党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思想政治工作是党的传家宝,是完成各项任务的基本保证。为了取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最基本的是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理想的教育,提高青年参加斗争的自觉性与主动性。任何工作都要思想领先,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在教育方法上,要注意青年的特点,寓教于青年所喜爱的活动之中。要注意发挥积极分子的带头作用和干部的表率作用;以身作则,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就能够带领广大青年前进。

第二,激励无私的奉献精神。要革命就要有奉献,没有奉献就没有革命。要教育青年学习革命先烈和民族英雄的高贵思想品德,“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助人为乐，公而忘私，为了忠于自己的革命理想，可以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在战争中一批又一批的青年为新中国的诞生，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铺平了道路。

第三，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战争年代，斗争极其残酷，环境极其恶劣，生活极其困难，随时都有失去生命和家破人亡的危险。由于发扬了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广大青年不退缩、不动摇，坚决迎着困难上。当时大家睡草窝，吃小米，甚至几天吃不上饭，破衣烂衫，虱子一大把，不仅毫无怨言，而且以苦为乐，以苦为荣，革命意志坚不可摧，充分表现了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第四，建立亲密无间的革命友情。在战争年代里，经过生死的斗争和艰苦的磨炼，在青年同志之间（包括上级与下级之间、干部与青年群众之间）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大家同甘苦共患难，情同手足。这对克服困难，战胜艰险，坚持斗争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大大增加了青年们对党的向心力和青年组织的凝聚力。

以上这些作风，是青年运动的优良传统。继承和发扬这些优良传统，是当代青年的光荣职责。

* * *

历史的长河奔流不息，转瞬已是40余年。回忆往事，心潮澎湃，往日那种炮火连天、前仆后继、英勇奋战的景象，历历在目。此时此刻，我们特别怀念那些在革命战争年代牺牲的青年战友。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他们献出了自己最宝贵的青春和生命，为后来的青年一代作出了光辉榜样。

青年运动中的烈士们永垂不朽！

（本文由王克、史杰、高桓、常邦国4位同志起草，冀鲁豫边区青年工作老同志座谈会进行了审议。大家认为本文如实反映了历史面貌，总结的几条经验也很好。根据大家的意见，会后王克等同志作了充实、订正，杨泽江、李运亨同志认真进行了修改。）

抗日战争时期冀鲁豫文联工作简况

鲁西良

冀鲁豫边区在抗战前是战乱频仍的贫瘠之地，然而在解放战争开始时，这里却是晋冀鲁豫地区的主要战场，是刘邓大军南下的前进阵地，是第二、第三野战军逐鹿中原进行淮海战役的后方基地，前后出了正规军百余万人，战勤民工几千万人。谁能料到这一贫瘠之地，竟有这样大的战争承受力呢！

这首先是由于有了党、军队、政权工作的建设，有了广泛的群众运动的发展，同时也由于有了文化教育工作的深入和发展。今仅对文联工作叙其梗概。

当抗日战争进入敌我相持阶段，华北解放区处于极端困难的时候，原鲁西区党委和小冀鲁豫区(直南、豫北)两个地区党政领导实行合并，成立冀鲁豫区党委，下设文委。在文委领导下，鲁西、小冀鲁豫、湖西的文教会通过全区文代大会，产生冀鲁豫文联总会。

文联总会的办事机构是在1941年3月18日成立的。

文代大会根据鲁西文化界救国会组织大纲增补新内容。其中宗旨是：团结鲁西文化职业者、文化工作者及文化团体，建立鲁西文化界统一领导机关，结成抗日文化统一战线，为新民主主义文化而斗争。其中关于会员、会员权利及义务规定甚详。改为冀鲁豫文联后，文教会组织大纲其他项目基本未变。

文代大会选出：主任——鲁西良（原鲁西日报编辑部主任）；组织部长——马诚斋（原运东地委副书记）；宣教部长——袁复荣（原鲁西南地委宣传部长）；出版部长——孙景濂（字仰周）。

文联总会决定出版刊物《文化生活》，任命王行之（姚天纵）为编委会主任。另成立美术组，由陈丁波、杨扬负责；秘书处——张荷清、于近青。

文委给文联总会的任务是：争取群众，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反对妥协投降；建立农村新文化基础，先抓已有的基层团体，如剧联、教联和军政机关的文工团、剧团；加强联系，加强交流，定期会演，宣传新文化运动的意义和性质。

文联成立后，首先让干部集中休整，认真讨论文化运动的政策、性质和具体入手的工作方法。学习文件有《新民主主义论》，讨论新文化的内容及其重要性，分析了新文化运动的“五性”，即：抗战的，民族的，民主的，大众的，科学的。从新文化的性质，进而认识它的重要性：文化是政治经济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从宏观上看文化工作，在国家政治经济基础将要发生性质变化的时候，文化工作往往是革命的先导，因而每一个青年应看到自己的时代责任；具体讲，文化工作是党的宣传工作的组织者、先行者。

在认识任务与责任后，文联总会全体同志除个别留机关外，均下基层调查边区过去的文化基础，了解在农村文化活动中，有多少是封建的、反动的，有多少是可以提高，可以改造，可以利用的，以及所有调查对象的思想动态。

一、战前的文化基础

冀鲁豫区在抗战前，文化落后，交通闭塞，千百年来一直是南北战争的接合部。春秋战国时期有桂陵之战和城濮之战，楚汉相争有垓下之围，三国曹操屯田，秦晋淝水之战，以至唐朝黄巢起义，宋朝梁山水泊，清末则有冠县18村义和团起义，黑旗军宋景诗起义。民国以后，这里军阀多，土匪多，会道门多，基督教、天主教的“教案”多，人民群众贫苦愚昧，受着兵、匪、会多层压迫。

五四运动以后，在山东聊城、直南大名、豫北濮阳、鲁西南的菏泽等中小城市有省立师范和中学，尽管省教育厅的领导腐旧，但

学校中的青年开始有民主革命的酝酿并有人加入国民党，随后有了共产党的地下组织。由于马列主义的传播，在冀鲁豫平原上不同程度地吹起了新文化运动的春风。

早在1922年鲁西南南华中学就有中共党小组。1927年大名七师的谢台臣、晁哲甫就在学生中宣传马列主义。聊城师范进步校长孙葆贤，教师王祝忱、韩侍桁、李光家、阎仲容，把五四精神引进了聊城。而在广大农村，人民教育喘息在军阀封建势力的统治下，小学校没有私塾多，每县不过三五所。农民读不起书，90%以上是文盲。小学教师待遇低，城市每月24元，农村只有3元，仅能糊口。

二、抗战一年后的新文化

1937年秋，日军沿交通线入侵华北地区，冀鲁豫边区全面展开抗日保家运动。日本侵略军先占领津浦、平汉铁路的点线，内地广大平原上，军阀、官僚和地主、豪商们避风南逃，农村多年的封建统治一时陷入混乱。农民拿起枪来，参加抗日。大杆土匪集拢起来，自封为“义勇军”，“司令”多如牛毛。会道门划地称霸。

八路军一二九师、一一五师一部进入冀鲁豫边区，执行抗日统一战线政策，扩大抗日力量。

在鲁西，原山东六区专员范筑先奉韩复榘命，退过黄河南下，但在下属中共地下党员和平津流亡学生劝阻下，转回来与中共鲁西特委联合抗战。一年后，他从一营的兵力发展到了35个支队3路民军的抗日游击队，有5万多人，建立地方县政府35个。沧石路以南，平汉路以东，津浦路以西，陇海路以北连成一片。经过抗击小股日军大小数十战，初步形成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此时，中共组织迅速发展（以鲁西为例，原有党员百余人，发展到万余人，每村都有三五名党员）。在此形势下，新文化运动也随之发展。

当时，各种抗日力量并不是统一的，敌、顽、友、我的力量时有变化，军力各有消长。但新文化运动，以民族大义、抗战第一的思想在根据地和游击区公开地、秘密地展开活动，尤其是在各中小

城市、部队、机关组成了各种文工团、训练班。全区恢复乡镇小学，举办抗日中学，并举办各种短期训练班。

1938年5月1日至6日，六区政训处在聊城召开政治工作扩大会议，参加的有鲁西北各县政训处代表，各游击支队代表，政训处各直属机关代表等44个单位，300余人。这时鲁西北已有万余人的文化大军。会后，在聊城设政干校，由政治部接办军事教育团，5月1日出版了敌后第一张铅印的《抗战日报》和16开刊物《战地文化》。新文化运动，在城市上层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正当根据地初步稳定的时候，蒋政府又派山东沈鸿烈来敌后“摘桃子”。沈先在鲁西南曹县“试探”，嗣后到鲁西的东阿“巡视”，带着原山东省保安二十八旅吴化文的手枪旅和中央农工银行的印票机，以巡回宣传的名义招摇过市，不想遭遇日军被围。范筑先以抗日大义为重，在收复东阿县城后，迎沈到聊城，为其设立省府行辕。但是沈鸿烈居心叵测，先是以国民党中央正统要范服从，继而收买范部各支队，买通范之参谋长；国民党CC分子王金祥叛范，要求把游击队改为保安大队，终于鼓动阳谷会道门忠孝团，长清、齐河九县黄沙会叛范，不久使聊城失陷，置范筑先于死地。蒋沈这一反动逆流，打乱了鲁西城镇上层文化发展步骤，广大爱国青年必须深入农村，做更艰苦的工作。

在直南、豫北地区，1926年秋河南省委派人在大名七师发展党组织。1927年，一些知识分子党员深入农村宣传革命，建立农村支部，成立农民夜校，并出版秘密刊物。1938年夏，在直南特委领导下，成立冀鲁豫抗日救国总会，发动群众，建立各县工农青妇文群众抗日团体。

鲁西南地区，1925年有共青团组织，1927年建党，开展农运和学运工作。

总之，在抗战一年后，日军回师“扫荡”，占领中小城镇，国民党制造反共磨擦，革命的新文化运动必然要深入农村，深入基层。冀鲁豫党组织由地下转入公开，领导抗日斗争。经过1939年的

艰苦奋斗，战争进入相持，而政治思想方面，则在敌、顽、我、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夺群众之战。日本实行“强化治安”，搞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瓦解抗日根据地的阴谋。蒋、沈国民党则搞三次反共高潮，使根据地的磨擦升级，由限共到灭共。石友三、文大可、王金祥等顽军搞“敌伪默契”。会道门与地主、民团大兴“土围子”，大搞封建迷信。在敌伪“铁壁合围”的“扫荡”下，我们的新文化运动受到了不小的损失，但是另一方面也激发了群众的觉悟，锻炼了干部。

文联总会成立后的各项文化工作均有很大发展。具体地说：

（一）新闻出版工作

在新区建立时，根据党的传统，在新文化运动中首先是抓报社、出版社，进而抓教育、文艺各方面。

冀鲁豫区的新闻工作，可分三个时期：抗战初期，1939年后和1943年后。

1937年，冀鲁豫各地抗战形势不同，新闻工作的形式也不同。

鲁西地区，因为中共鲁西特委联合范筑先合作抗战，很快开辟了几十个县的根据地，建立了几个游击支队，把聊城建成了抗战中心，形成了抗战的范筑先及其司令部对不抗战的沈鸿烈及其省政府斗争的复杂形势。鲁西特委半公开地参加全区的军政领导，因而《抗战日报》得以铅印出版，成为敌后最早的铅印报。报社由司令部秘书申仲鸣任社长，中共党员齐燕铭任总编辑。

直南特委先出油印小报《创造报》，后改出《卫河日报》。

这时期，编辑工作既要照顾各种政治力量，又要有“主心骨”，不然就会成为“公共汽车”。同时还必须注意密切联系群众，不然，就可能形成“跳裸体舞”。

《抗战日报》在组织上虽说规定社内有社长、总编辑、记者，但并不拘泥于旧形式。成立社外的社论委员会，成员都是党的主要骨干，掌握宣传的“大政方针”。发展冀鲁青年记者团，以建立社

外通讯网，补社内记者的不足。报纸的首要任务是，在一定时期“要掌握重大思想动态”。除特委秘书长赵伊萍同志定期指导外，社外的社论委员会定期开会，把党的一定时期的重大政治思想具体表现在报社的社论里。当时，在重大政治思想上，对外的统一口号是：“抗日、团结、进步”，而具体掌握上，则是在抗日战争中要求民主，要求革命。特别在中共中央提出在敌后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的问题以后，在聊城也讨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性质问题，确认敌后的民主政权是人民选择的政权，敌后人民的抗日意愿和利益高于一切。党报在宣传上必须掌握这一基本原则。而沈鸿烈则说敌后抗日政权必须服从国民政府，强加给敌后人民尊重蒋氏正统，尊重一个政府、一个党、一个领袖。而范筑先则要求承认和老西北军、老第三集团军（韩复榘）的历史关系，接受抗战纲领也要接受蒋政府现实领导关系，这实际上仍是接受蒋正统的思想。

《抗战日报》则义正词严地坚持政权性质是人民政权，不同于“旧六区专员公署”，也不同于沈鸿烈省府的“六区保安司令部”，而是鲁西的游击司令部。为此，特委秘书长赵伊萍同志署名在《战地文化》上发表了《论抗日政权性质》的文章。

当时报纸宣传的具体策略是，反对“反共”、“限共”、“溶共”、“限制异党办法”的反动思想，对范筑先的“哥们义气”、“良心抗战”，不提倡也不正面批评，而是等待和尊重其觉悟。

抗日民主政权的性质，决定《抗战日报》的性质。《抗战日报》的严正立场，确定了她在根据地的地位。这是鲁西在党报工作上的一个创新。

《抗战日报》面临的斗争是复杂的，因而在宣传上也要创造新的形式。如在宣传保卫大武汉上，报纸9月就刊载了冀南军区发出的各线敌军增兵，各地军民准备反“扫荡”的系列报道，而对发动保卫大武汉的宣传则有所节制。所谓保卫大武汉是沈鸿烈幕后提议，由石友三出面召集敌后进攻济南的所谓鲁南新泰会议，明为牵制敌军南进，保卫大武汉，实际上沈、石企图使敌后各抗日部队上

钩，暴露实力。

再是在复杂事件面前，注意策略性宣传，即认清事件的本质，在宣传上有所选择，注意后果。

新泰会议，范筑先并没有参加，只派了一个处长去，沈鸿烈却大加“表扬”，说范“深明大义”，扬言要向“国府”报功请赏。于是李树春（沈鸿烈的民政厅长）对范进行“苦劝”，王金祥从内部鼓动，说什么在“战斗中整军”，终使范筑先“服从”，组织14个支队的兵力，连挺进大队的娃娃兵也开赴长清、齐河前线。果然是造成了范部与长清、齐河九县的黄沙会的频繁冲突。接着就是坡赵庄战役，范部遭到重大损失，包括他爱子范树民的牺牲。《抗战日报》报道了这次损失的真相，同时也报道东进情况（当时就受到读者批评，认为游击队攻入济南市区是夸大，说用手榴弹炸毁几架敌机，是没有军事常识）。

当然这次东征客观上也有意义，那就是在失败面前，在敌占区有的群众领着日军攻击游击队，抄杀我军伤病员的悲剧面前，范觉悟到失败的原因。他说：“不发动群众，没有群众监督，是不能整军的；不整军，是没法打胜仗的。”范筑先令女儿范树昆代弟出征整编挺进大队，而且调到冠县后方归属鲁西北地委张炳元领导，并学习冠县农民互助会的组织经验。这时，《抗战日报》大量报道了鲁西军政会议进行整军、整政、整理财政的消息。

还有借纪念日进行重点宣传，如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时，进行重大宣传，使爱国主义思想深入各县区的群众。

报社内部的组织领导是：报社宣传大政方针的决定，由总编辑齐燕铭、特委秘书长赵伊萍和社论委员会主任张郁光负责。平时决定重大稿件的常务领导，由赵伊萍和管大同（特委宣传部长）负责，有时也请示省代表张霖之。报纸版面取舍和大样审查则由齐燕铭和莫循负责。社长只管印厂和日常事务。

在社外，大力发展冀鲁青年记者团。这个团本是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组织的，领导都是党外青年。待大批进步青年和共产党员、共

青团员参加后，这个团就成为报社记者的地方大军。他们不仅能完成报道任务，而且是组织基层通讯网的有力骨干。

聊城失守后，鲁西的敌、伪、顽军事力量一时大增，侵扰频繁。报纸必须适应形势，于是改铅印为油印，下放到农村，继而改为《鲁西日报》，成为区党委的机关报。为了应付敌人的分割，各专区都出版地委领导的报纸，如《泰西日报》、《卫东日报》。

初期的《鲁西日报》是下放地方秘密印刷的。那时“地下版”的组织领导分三摊：

经理部：管印报，送报到县区交通站，并取回地方投稿。大力开辟地下印厂，建立铅印厂。负责人先是孙景濂，后是张鲁泉。

编辑部：负责编辑稿件，分派记者，请示领导和采编领导层的新闻线索。编辑主任由鲁西良担任，直接向区党委宣传部长张承先同志请示报告。

报社社长、编辑主任和主要编辑都分别随区党委活动。

在敌人“扫荡”频繁的时候，有一段时间《鲁西日报》没法隐蔽出报，只得把电台、收音机、油印机驮在马背上，随区党委机关行军。在行军休息时，抓紧编报，开机收听延安广播，及时编印出版报纸。

各地委报纸也灵活机动，抓紧基层通讯工作。

《鲁西日报》放到昆山以后，区党委派王绍云同志任社长，对报社建立铅印厂有很大推动。

在这期间，报社完成两大建社工作：一是抓紧建立地下工厂，准备铅印，要“狡兔三窟”，以适应长期在根据地出报的形势；二是发展农村通讯员组织，在情况允许的形势下，发展县、区直至农村的通讯网。

1942年后，边区地方部队和八路军一二九师平定了石友三等顽军后，中心区出现了大片根据地。《鲁西日报》与直南的《卫河日报》合并，改为《冀鲁豫日报》。

这时的形势是，蒋军主要在旧黄河以南地区搞磨擦。蒋军35万

人与我军第一、二野战军形成拉锯战。我军大踏步进退，因而报社编辑部也一分为二。

在黄河北，主要报道农村土改、双减、反霸、参军与战勤和民主运动。在黄河南成立新华社河南分社，报道我野战军反磨擦自卫战争的胜利和地方武装的成长。尽管报纸在不同时期宣传中心各有不同，但它总是成为地区的文化领导和文化统战工作的主力军。

鲁西地区与原冀鲁豫地区合并后，区党委加强对报社的领导，千方百计地为出报建立地下工厂，并准备铅印厂。

将《鲁西日报》、《泰西日报》、《卫东日报》与《卫河日报》的印刷力量合并，建立了3个地下印厂，以承担全区的地下印刷工作。

建立地下印厂是相当困难的。在干部配备上都是挑选干练的。在聊城时的铅印厂是齐燕铭同志苦心经营，购买了两个私人印所，建立起了《抗战日报》印厂。聊城失陷后，印机被埋在城郊，工人分散到各地委报搞石印、油印。经过1939年的战乱，隐蔽在城郊的印机没法再用。这年冬天，我们的地下党从济南动员了一批铅印工人，他们以在泰安办印厂名义，买了四开铅印机一部，圆盘印刷机二部，混合字架一部和一些零用工具，以运煤为掩护，将印机运至长清东菜园村（因为随来的印刷工人中有7人是这个村的）。经过泰西专署和长清抗日县政府，将印机转送至东平湖西岸的昆山，又经过抗日部队接送到湖心的小土山。

在土山，报社印厂和鲁西银行共同使用，但发现铅字不足，不能印书印报，又派人到济南去买。1940年这个印厂才和在昆山县的《鲁西日报》联系上。在戴庙附近小村挖了地窖，经试车后，仍不能印报，仅能印书。文联总会出版的36开本《文化生活》就是这个地下印厂印刷的。为了满足石印的缮写，印厂和报社共同成立油墨缮写室，将《泰西日报》、《卫东日报》、《卫河日报》等报社的缮写组调来合用。这个印刷厂，实际是边区文化运动的后勤部。印厂最初是孙仰周负责，后由张鲁泉负责。

（二）文联基层组织的情况

因为各分区抗战形势不同，文联组织的建立和发展也是不平衡的。现以鲁西北文联分会为例。

鲁西北文救会是1940年成立的，主任是丹彤，负责人还有鲍廷干、张风彩、尚中夏、乔晓波、黑若仙等。下辖四个县文救会：莘县文救会主任冯锡惠，冠县文圣五，朝北王子栋，朝城由尚中夏兼。

文救会的会员和团结对象，主要是中小学教员、青年学生和热心文化工作的积极分子，还有爱国的开明士绅，后又发展到农村说唱艺人。有的县组织到几百人，有的县发展了上千的会员。

为了争取更多人参加抗战，争取国民党“还政于民”，在鲁西北地区曾发起促进宪政运动。文救会当即召开宪政讨论会。鲁西北著名人士，如冠县的崔竹轩，朝城的赵锡九，莘县的李洪五，聊城的刘建侯都来参加大会。还有从敌占区赶来参加会的。会上揭露国民党政府独裁、反共，消极抗战。会员在会上踊跃发言。各县、区的文救会，也都分别召开这样的宪政促进会。

当时，环境艰苦，从聊城转来的《抗战日报》停刊，群众迫切要求抗战信息，文救会便编辑、油印小册子、传单，发到各村镇。又通过一些会员的关系动员堂邑、聊城刻印古籍的木板印刷工人，组织他们缮写、刻印毛泽东著作《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还编印一些宣传抗战的小册子送往敌占区，承印全区冬学教材，出版不定期刊物《启明》，内容有时事新闻、评述、文艺小品。鲍廷干用历史小品专栏借古说今，宣传爱国主义思想。

农村基层的文化组织，过去没有人去组织，有些小组是自发的。据1940年的调查，农村群众自发组织的有武术队，平时在村头挖一个地窖，每晚练武，逢年过节出来亮场；有玩狮子、踩高跷、跳大神、聒皮猴、请紫姑。请紫姑是青年妇女的一种秘密娱乐。平时她们一起纺纱，在节日，半夜里秘密举行。举行时，是用紫衣服穿在扫帚或拖把上，两个姑娘拉着走跳，其他姑娘也跟着跳。忽然，

紫姑扑地，即有一人说是紫姑伏身，要求姑娘们向紫姑诉说苦情，她要回报天庭紫姑娘娘，记下姑娘们的苦情，以后会得到拯救。然后，她们就起而唱歌、跳秧歌舞，欢送紫姑。

这些形式带有迷信色彩，然而可以改造利用。如果组织起来，加强领导，给以新内容，这些人能够成为支前能手。

后来，有文化组织的村庄，在节日或开会前都能组织起歌咏队、拉拉队。

（三）艰苦的教联工作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敌后党领导的教育工作成为政治斗争的一个方面。各地区、各级党都坚持抓教育建设。在抗日政府，行署设教育处，专署设教育科，县里也有督学等设置。但仅有行政领导，还不能代替教学本身的研究、提高。这时的学校设置，一般较大的自然村要设小学，县设抗日中学，实施抗日、文化教育。在敌占区，日伪要求恢复小学，叫做“新民小学”，推行奴化教育，宣传“共存共荣”、“王道乐土”来欺骗麻痹群众。顽占区，则利用国民小学灌输反共教育，宣传“宁亡于日，不亡于共”。显然，学校成为政治宣传的争夺阵地。

我们的抗日教育，因为地区分割，战事频繁，必须加强横的联合，加强普通教育的战斗风格，教育救国会应时成立。开始几个村，以后又联合几个县，成立教联，基层教联归县教联和地区教联领导。

当时对我区教育的估计是：抗战教育四年艰苦奋斗，国民教育已有相当的发展，逐渐走向正规，社会教育已普及农村，广大农村群众经过抗战熏陶，政治要求不断增长，文化提高已成为普遍要求。教育工作亟需进一步发展和提高。

鲁西文化界，在1940年拟定文教会大纲的同时，也拟定了教联大纲。因之在鲁西文教会成立之前，教联就成立起来了。它的组织大纲中规定的宗旨是“本会以团结（教育界、学校教员）从事教育

工作者，建立统一领导机关，加强国民教育事业，巩固鲁西抗日民主根据地，以期完成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伟大任务。”

大纲中规定关于动员私塾教育与教会教育的处理办法。关于私塾，在有小学校的村庄，由村教育委员会动员与小学合并，私塾教员经过短期训练后，仍回原学校任教。没有学校只有私塾的村庄，则动员改为学校，教师经短训后，仍回原校任教，与学校教师享受同等待遇。关于教会学校，应一律向抗日县政府备案，学校所用教材，要采用鲁西统一编订的教材。教会学校的教师，应由政府委派、调动与训练。

教联的对象，主要是小学教师。他们一般文化政治水平不高，但是工作很繁重，除教学外，还有社会工作：办黑板报、农民夜校、识字班、街头评论及传播秘密信息的“咬耳朵”……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提高，必须经过共同研究，相互提高。有的一片村庄，几个学校的教职员举行定期或不定期会议，会议形式不拘，赶集、探亲、会友，交流教学内容和社会活动内容，交流与所在村的工、农、青、妇、儿童工作的配合。

这时期的抗日中学更艰苦些，规定在一定时期完成普通中学课程，而又要随着政治形势的需要，增加政治活动的内容，如减租减息、合理负担等。教师要把抗日内容与普通课结合进行。如数学课讲减租减息、合理负担、累进税率的算法，语文课选读鲁迅、茅盾、郭沫若等人的现代作品。每班学生约四五十人，教职员和年龄大些的学生都配备武装。师生们仍侦察、行军、催餉、宿营，完全像部队的小分队。有时与敌人遭遇，和部队一样展开战斗。如卫东抗中，聊城四中、清丰抗中都遭遇过战斗，而且有的师生光荣地牺牲了。

教联成立，包括抗中，但因地区分散，学校又经常移动，不易联系。

（四）活跃的剧联工作

鲁西抗日剧团的工作，是有一定基础的。早在1937年9月，金

肇野、刘定一就在平津流亡学生政训班中组织了流动剧团到鲁西北工作。到聊城后，又成立了“孩子剧团”。随后又有党员邹鲁风、周持衡参加了山东省政府的“巡回剧团”，范筑先十支队成立了“冲锋剧团”，还有陈荒煤领导的从大后方来的剧团和八路军一一五师的“战士剧团”。

以这些剧团为基础，以后又组成各种文工团，主要是演话剧，但都包括文、音、美、艺各种宣传干部，随时编演活报剧、抗日歌曲、杂技等多种宣传节目。

冀鲁豫区是联系山东、河南、河北的枢纽，一些部队首长和延安、山东文化界人士常来常往，带来各地区文化界许多信息，提高了我们文工团的思想，丰富了活动内容。

有人说：文工团的组织，是在抗战中产生的特殊形式，是战争中的文化轻骑兵。

聊城失守后，这些剧团、文工团随之变成武装宣传队，分散到农村，随时随地进行宣传工作，也是与日军、顽军作周旋的武工队。一些演员，后被提升为抗日政府的干部，但是他们在农村却播下了艺术的种子。

1940年，在根据地中心地区的文工团、宣传队、剧团都很活跃。他们在大的乡镇、八路军驻地组织群众性剧团。当时大的团社有军区的“战友剧社”、八路军南进支队的“前锋剧社”等。

一些中小城市的戏班也整理旧剧目，成立新剧社，如濮阳的“民主剧社”、“民友剧团”等。在这一地区流行的旧剧班有豫剧、河北梆子、京剧、丝弦、大鼓和山东快书、琴书等。这些从业人员有了一定的民族觉悟，同时也为了谋生，都争取在抗战阵营一露身手。文联总会成立后，有计划地将他们组织起来，整理移植剧目，改革唱腔、音乐、武打。

文联总会为了工作的提高，进行试点，成立了直属的“大众剧社”和“冀鲁豫文工团”。前者以演传统的豫剧（河南梆子）为主，后者则吸收各种艺术人才，演一些新的节目。在上级领导支持

下，调来一批文化宣传干部，如军区夏川、丁汾、周子芹等同志都是自愿离开军区工作，到艰苦的岗位文联来的。夏川同志、丁汾同志是文联总会直属冀鲁豫文工团的正、副团长。文工团吸收了一些抗日中学的学生，经培训作为团员。剧团多演文工团自编的街头小剧、歌唱、相声、朗诵诗、小杂耍、小魔术等，逐渐上演一些中型话剧。

冀鲁豫剧联于1941年10月15日在范县境内召开成立大会，到会代表及来宾500余人，会期3天。会议决定剧团宣传方针和组织章程，并规定文联总会有帮助建立基层组织的义务。大会建议：建立健全县、区剧联组织，加强定期联系、会演，交流经验。在群众自愿与需要的基础上，成立村镇剧联。帮助与相邻的驻军机关联系，请政工宣传部门给予人员、演出及用具等方面的协助。在条件许可下，文联总会组织会演、交流、观摩。会议中，交流了建社、建团及演出的经验，还交流了一些剧目。

参加会议的各剧团，急需得到有关编写剧目、培养演员及管理文工团的经验。前锋剧团做得好，会上，由该团团长冯组华、指导员冯森作了介绍。

南进支队，由平、津、保一带的青年组成，组织派他们常驻冀鲁豫区。他们来后，人地生疏，但很快就能与当地群众打成一片，军民关系很融洽。同时，他们又与晋察冀老解放区的文联、剧联保持密切联系。

“前锋剧团”是1939年春成立的，开始时30多人。从冀中军区借来了一位导演讲授戏曲表演艺术，又派小团员到军区“火线剧社”去学海军舞、儿童舞、士兵舞等。当时，剧团只能演“纲目剧”，即只有提纲、大致情节、人物关系，稍加排演，即可演出。有时演员在台上即兴发挥，只要表演联系实际即可。该团所以能够发展壮大，是因为：

加强了政治领导和教育——开始建团即成立党支部，每周上党课一次，党员过组织生活一次。剧团团员生活是军事化的，更多的

是做驻地的群众工作。

部队领导也很关怀，支队司令员赵承金经常与剧团联系，对剧目的内容提出修改意见，鼓励剧团“多演戏，演好戏”。他送3个女儿（13岁、11岁、9岁）参加学习和演出。支队政委谭冠三的爱人李光明是红军老战士，到剧团做宣传员，生活俭朴，团结同志，把老红军的优良作风传给团员。

及时编演新剧——部队首长常讲：部队的文化工作是提高战士素质、增强部队战斗力的一个方面，演出节目必须具备发扬爱国主义、团结同志、鼓舞士气、瓦解敌人的意义。演出的剧目有：宣传抗战的《夜12点钟》、《侵华泪》、《反战》、《第五纵队》；瓦解会道门的《一心堂》、《二郎神大闹佛堂》；反映军民关系的《可以来往的朋友》、《王老五逛庙》；鼓励参军的《拴不住》等。

全军支持演出——剧团本身虽有不少人才，但演出真实，要求提高，因而需要借调实际工作者配合演出，曾借用过战士、炊事班长、侦察员和道具服装等等。剧团只要提出要求，就得到部队支持。剧团发现需用的人才，也可通过组织调入。如在庙会发现纸扎匠张元祥，就调他入团扎制布景。

剧团人员一专多能，充分发挥工作效用——1941年至1942年，该团增至60人，除队长、政治指导员、各种教员外，下设戏剧组、歌舞组、音乐组、女生组，并在增加新的演出任务时设导演组、创作组、美术组。在演出时，还设有前后台主任、灯光、效果、服装、道具、布景化妆等，一人兼数职，各部门都有人各司其事，保证演出成功。

积极创作戏剧与节目——剧团一建立，就注意创作新剧本，并注意整理和挖掘旧剧本；积极创作现代歌舞、现代京剧，改编历史剧；创作新曲艺（京韵大鼓、西河大鼓、快板书、莲花落、相声、太平歌新词等）。

团员从十四五岁就培养成多面手，如15岁的靳士衍，会说相

声，能演《儿童万岁》，演《拴不住》的女主角，演《侵华泪》中的阿布中将妻。这个团以演话剧为主，传统剧目次之，曲艺新词多少不拘。

演员角色多了，就能够多演新剧本，根据时事宣传的任务，增加新内容的节目。如百团大战期间，编写了《夜12点钟》，故事是我军向同蒲铁路线发起猛攻时，我部队派一营长化装进入豆玉车站，通过党的地下关系，做铁路工人工作，与敌伪展开惊险的智斗，直至夜12点钟，里应外合，发动总攻，大获全胜，拿下车站。

剧本《抗日高于一切》取材于报纸，写一个八路军伤员在房东掩护下，战胜敌人。剧情是：一个伤员正在群众家养伤，突然日军小队闯入，房东大娘说是儿子病了，儿媳又忙说丈夫病了，伺候吃药。日本兵恶毒地命令儿媳当场与伤员亲吻。儿媳内心斗争，言语搪塞，拖延时间。当日本兵要掀被抓人时，她机智地猛扑伤员，狂吻而且大哭，日本兵被瞞。这时，民兵赶来，将日本兵消灭。这创造出一幕动人心弦的活剧。

地方发动参军运动时，剧团编演了歌剧《拴不住》。情节是：老两口思想保守，儿子立志参军，老两口立即给儿子办婚事，叫媳妇拴住儿子。不料，媳妇是个思想开朗的进步妇女，小两口以大义亲情说服爹娘。这个歌剧，刻画人物性格突出，生活气息浓烈，歌词生动，感人至深。

京剧组排练的《侵华泪》，内容是日军在“百团大战”失败后，日本天皇召开御前会议，派阿布中将为特使，到南京汪政府摸底，寻找对策。阿布深感战争无前途，夫妻相对悲叹哭别。在南京的汪精卫夫妇却只会向阿布阿谀逢迎，一筹莫展。阿布微服出访，遇到的是中国人民的抗日激情和对日军的仇恨，还有日伪军的反战情绪，社会各阶层对八路军、新四军的颂扬。这个剧1940年元旦演出。

京剧《陆文龙》是根据旧《陆安州》剧本（即潞安州，王佐断臂、说书，陆文龙起义）改编的。根据抗日战争中争取伪军起义的

政治要求，突出陆登年的殉国，加强乳娘、王佐、陆文龙的唱腔，文唱武打都很成功。靳士衍扮演陆文龙尤其出色。

《陆文龙》改编成功，鼓起整理传统剧目的勇气，因此进而整理了《吴汉杀妻》。主要情节是：王莽用药酒毒死汉平帝，吴、姜两大臣不服被杀。王莽假意将两家遗孤收养，认姜氏女为义女，招吴汉为女婿（驸马）。吴汉长大，文武全能，莽以为心腹，使镇守潼关。刘秀起兵，部将马成四处联络起义，路过潼关被俘。吴汉想将马成献给王莽。吴母告以前情，吴汉答应放走马成，回房杀妻。妻姜氏也说出真情，吴不忍杀害。但汉兵围城甚急，吴母为坚定儿子起义决心，自缢身亡；姜氏也为坚定吴汉起义信心，自刎而死。吴汉反出潼关，投奔刘秀。

以后冀鲁豫军区“战友剧团”排出《李秀成之死》，“大众剧团”排出《血泪仇》等大型话剧与歌剧。

（五）基层剧联的情况

基层剧联比基层文联还普遍些。在中心区或边沿区的村庄都有剧联基层会员。村里召开大会以前，拉拉队请他们出演节目。较大村的剧团能演出歌曲、相声、快书、小调、秧歌、曲艺等。

文联干部李坤在《文化生活》上著文，提出在有基础的村庄成立俱乐部，开展歌咏比赛、讲故事、演小戏等活动，以加强村剧联的工作。王勉在鄆城总结农村剧团的发展，首先是配备适当干部加强领导，再是抓住青少年的模仿与争胜心理为组织基点，发展村际竞赛，竞赛内容尽量选择现实题材。关于农村的戏剧形式问题，李枫林、李刚同志经调查提出，鄆城的旧戏有“高调”、“四平调”等，大部分是现实内容，但也有些历史剧，如《米建游宫》则错误百出，《黄皮脸卖嫁妆》是脱胎神话剧，《苦良民》是脱胎《捉放曹》，指出这些剧的道白、动作、音乐都有封建糟粕。基层提出要求解决新剧本，说明群众的积极性很高，而我们的文艺干部在基层是很缺乏的。当时，冀鲁豫边区在平叛之后，新区扩大，更需要

大量的精神食粮。

文工团集中各方面的文艺人才，能及时创作新剧目、节目。而如何提高基层水平，实属当务之急。经验证明，会演是提高剧联水平的好形式。1943年，当时形势允许召开大型会议，区党委在红庙开会，会期两个月。文联总会决定集中全区几个大剧社，“战友”、“前锋”、“大众剧团”、“民生”、“民友”等，给大家充分的交流时间。会间出演数场。闭会时，“民生剧社”侯桂仙演出《辕门斩子》，“战友剧社”演出《李秀成之死》，还有许多曲艺、歌咏节目，演至深夜，北风凛冽而无人离场，影响极好。会后，各剧团反映“收获很多”。

经过戏剧界的不断演出听到的反映和《文化生活》收到的来稿中都提出了一些前进中的问题，如对文工团演出大型历史剧，大布景、大乐队……县剧团不敢问津，影响到各地方剧团，剧越演越大，农民负担过重，对大型历史戏本身也存在如何使历史与现实相结合，如何与人民生活结合得更密切的问题。

基层文联的发展是很不平衡的，有的发展很大，如民间艺人联合会，本是文联的民间文艺部，后改为民间艺人联合会（简称艺联）。

抗战胜利前夕，报社记者访问了艺联负责人张富忱。他与各县民间艺人有联系，对改造民间艺人有许多创造和成绩。如他们派出的笙笛音乐实习班，实习效果很好。观城副县长李守诚来信说，观城县决定成立一个30人的艺人训练班，希望艺联帮助创办。记者问到当年的工作时，张富忱说，今年已派出4个实习班，一班音乐班去阳谷县，由笙笛研究会主任李玉喜、副主任××率领，在安乐镇等地活动，组织小型宣传晚会，或参加区、村各种会，以新谱、新段、新词向群众宣传，获得群众欢迎；二班洋琴班，8个人由班长郭之城率领去观城，在后方医院五分院18个所巡回演出，慰问伤员；三班去聊城；四班是魔术班，到观城，由当地政府分配任务，配合土改、复查、战勤、生产等中心工作。他们下去半个月时间，有3万多人次受到宣传教

育。

在艺联受训的，还有马戏班，魔术、洋片班，准备将来作扩展工作的骨干。

在年画改造方面，一方面刻印毛主席像五彩版试版，同时年画研究会派人到冀中辛集参观学习，加强年画的研究工作。

艺联设一研究室，出版民艺通报，沟通各方面联系，介绍各地民艺工作动态。

关于旧艺人的节目内容，张富忱同志谈道，除一部分是不满旧社会的讽刺作品外，多数是封建迷信、淫荡等低级趣味的东西，但一经改变内容，就为群众喜闻乐见。

艺联还动员城镇知名艺人为反攻城市做准备。如观城打洋琴的邓九如、郟城“单弦拉”王殿玉、南乐唱坠子的乔清秀等。张富忱讲，民间艺人遍地皆是，改造好，到处皆宝，改造不好，遍地皆毒。

二、新文艺运动点滴

冀鲁豫的新文艺运动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呢？《文化生活》编辑室曾通过采访和开座谈会了解了一些情况。

追溯到1928年，在鲁西聊城师范，校长孙东阁从济南请王祝忱，从北平请韩侍桁、阎仲容来聊讲学，韩讲世界文艺史，阎讲《红楼梦》，王讲社会进化史。这使聊师学生开始接触到俄国18世纪文学和苏联国内战争时期十年文学。韩介绍了《毁灭》、《铁流》、《战争与和平》、《复活》、《母亲》、《第41》等作品，同学们欢迎这股新思潮。聊师校刊《东风文艺》发表一些诗歌、小说等文艺作品。1929年，到北平读书的郭奇、孙景廉、杨真等先进同学购买大量的“翻版书”，通过聊师高年级同学张致恭、张凝、孙宝树等以书版介绍社名义廉价卖给同学们，并代订北平出版的《语丝》、《沉钟》，上海出版的《拓荒者》、《创造》、《太阳》、《太白》等文艺刊物。这时期可以算是新文艺的播种期。

“九一八”以后，进步同学纷纷赴北平。孙景濂（笔名孙耕者）参加北平“左联”，与潘训、陈北鸥等联系，鲁西良在中国大学中共党员、教师孙席珍和齐燕铭的影响下，参加北平作家联合会，向《文史月刊》、《中流》等进步刊物投稿。当时，这些进步青年在寒暑假分赴农村作调查。鲁西良试作《初选》（揭露国民党地方选举丑态）、《替》（揭露乡村建设派在农村训练地主武装的失败）、《博士回家》（揭露国民党省党部要员回家祭祖的封建思想）等小说在《文史月刊》和《中流》等进步刊物上发表。

这时期冀鲁豫在外求学的知识青年参加新文艺活动的已有不少人，如河南××县的王亚平在北平出版诗刊；河北丘县的何风文（袁勃）在北平中国大学读书，经常向外投稿。

七七事变后，在聊城聚拢了大批文艺青年。《抗战日报》文艺副刊首先提倡新文艺运动，号召以小说、报告文学、文艺通讯、诗歌、小品文反映政治思想，针砭时弊，并提倡树立自己的风格。半年多的时间里，发表了不少的文艺作品。当时只要求文艺上的真实性，提出小说要写时代的真实；报告、通讯必须实事求是；小品文则要注意策略、时机，配合实际斗争。一切文艺作品，都要注意政治思想、政治斗争的深度。

这一时期，除《抗战日报》副刊外，还有《战地文化》上刊登过张凝的《东征》和高境的小说、王玄的诗歌等。有些同志去延安学习时，写通讯、小说发表在延安、武汉等后方报刊上，吴伯箫写的《一坛血》是反映鲁西北人民反对齐子修投敌后的暴行的，解放后被选入中学语文教材。原聊师学生刘荫昌（改名晋驼）被校长资助逃往东北，后又到延安，写了不少小说、文艺小品，后出专集。

1941年《文化生活》出版后，根据当时环境困难、战事紧张、作者工作分散的特点，编辑部要求在小说写作上，作者要“深入生活，加强政治观察力”。题材可以自由选择，但内容不仅仅是“身边琐事”，而要注意积累资料，反映有历史意义的事。

当时，从全国各地到抗日根据地来的爱好文艺的青年有：北平

来的夏川、广东来的姚天纵、南洋来的马山、四川来的李育仁和周子芹、上海来的丁汾，还有南进支队的冯森、冯祖华等。他们都是创作和组织工作的骨干。如夏川曾在《文化生活》上发表《获道》、《不死的战士》等；冯森介绍晋察冀文联活动情况，他们批评写作中的“文艺至上”和文艺脱离实际的倾向，给边区文艺工作者以启发。

在写作形式上，大家一致认为战争环境中产生的新文艺作品，一定要注意短小精悍。小说可以写墙头小说，提倡写人物特写；诗歌提倡写街头诗歌。

在《文化生活》上发表过不少小说，比较长的有《湄南河的烽火》、《风沙儿女》等。许多小说注意故事曲折，以情叙事。也有反映群众对敌斗争机智性的，如《埋死狗》的故事。还有幽默性的小特写。如一地主，在减租减息工作人员去他家查人口时，他先说儿媳身子不舒服，不能见人；待工作人员说明“我们是查合理负担”时，地主马上叫出儿媳站在工作人员面前，指着儿媳的肚子说：“这是两口人！”

在发表的诗歌中，影响较大的是濮阳小学教员孙明的诗（《文化生活》第2期）。他的《赠给小学教师》，热情地歌颂小学教育工作者的愉快心情。也有长诗，如田兵同志越狱归来，以强烈的感情叙述越狱经过，歌颂战友在越狱斗争中深厚的阶级情谊。

1945年我军围困开封时，诗人、小说家王亚平，记者赵纯、许鲁野，画家赵××翻越城墙来解放区。后来王亚平主持文联总会工作，出刊《平原文艺》，新文艺运动更有进一步发展。直南、鲁西南、湖西各地区都办有综合性刊物，培养出不少青年作者。

报告文学，在《抗战日报》时期，报纸上就出现了，不过那时与文艺通讯不分。到《文化生活》和《冀鲁豫日报》副刊出刊后，报纸上发表过《李汝泰武工队》和《朝城××》，《文化生活》上发表了《民族母亲》（写民族英雄马本斋母亲的壮烈牺牲）。在刘邓大军南下进驻鲁西南时，发表了大量的写自卫战争的文艺性通讯，

“立体地”反映了战争、战勤和地方武装的工作。

关于小品文，《抗战日报》副刊曾经大力提倡，那时主要是对沈鸿烈顽固政府和范司令内部的顽固分子的斗争，以及对落后农民的落后思想的批评。从1938年6月到11月，每期副刊都登载一两篇，揭露沈鸿烈收买范部支队，霸占县政权，特别是对王金祥、沈鸿烈破坏13支队，杀害共产党员事件给以严厉抨击，使当时副刊起到正刊起不到的作用，“小品文”起了与读者“通气”的作用。

在《文化生活》上，小品文也有提倡。1943年冀鲁豫区党委书记黄敬写的《整风随笔》（英雄主义与奴才主义），对某些干部存在的错误思想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冀鲁豫文联总会为了组织《文化生活》的社会撰稿人和交流文艺思想，讨论研究文艺写作的基本问题，曾考虑成立“文协”。但由于条件、时机不成熟，有些爱好文艺的军、政工作负责干部抽不出时间参加研究会议，因此《文化生活》便成为交流文艺思想的园地。二分区专员邹鲁风、湖西专员郭影秋把他们在抗战中多年的诗作送《文化生活》选用。

在敌占区、顽占区，为了联系进步青年，成立了文艺小组。

当时文艺界对艺术的性质和任务的认识也有不同（当时尚未见到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多数认为文学艺术是反映政治经济基础的，反映方法可以有所不同。从本质上讲，文艺是不能脱离时代的。古今中外，所谓传世之作，都是反映了它的时代，有历史真实，有时代意义。因而文艺必须为政治经济基础服务。但在具体执行中，又有各种理解的不同。如文化工作的阶级路线问题，为谁服务问题，都未讨论清楚。《文化生活》编辑中有同志说：刊物对象应是小资产阶级，因为只有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看得懂。另一方面，又有人片面地强调无产阶级立场。如有的学校不许地主子女入学，甚至不许边区行署主任晁哲甫（1927年的老党员）的儿子入学，说他祖父是地主。

1943年，为了迎接抗日战争的胜利，边区掀起学习热潮。文联

组织大家学习“三论”（《实践论》、《矛盾论》、《新民主主义论》）、“一个讲话”（《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学习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解决为谁写作、为谁服务的问题。

1944年，从太行、冀中等根据地传来文艺工作经验，从延安传来整风文件，不久冀鲁豫也进入全面整风。

抗日战争时期的新文化运动的生命力是坚强的，尽管日军不断地疯狂“扫荡”，顽军处处搞磨擦，天灾（旱灾、蝗灾、涝灾）人祸扑头盖面而来，我们民族的新文化仍然顽强地发展。但是我们永远不会忘记革命的文艺先驱付出的代价。1939年筑纵文工团团长马骏和8名男女团员在车轴战役中献出年轻的生命。1941—1942年日军4次“强化治安”，“铁壁合围”我根据地中心区，冀鲁豫文联总会两任组织部长马诚斋、鲁森被俘，《文化生活》主编姚天纵、李育仁，编辑王勉、田横等同志被俘，文联宣传部长袁复荣、教育部长孙仰周牺牲，杨扬失踪。“战友剧团”团长胡痴被俘，“先锋剧团”政治指导员冯森流尽最后一滴血，演陆文龙的靳士衍被敌人包围后，高呼口号拉响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文联总会直属的冀鲁豫文工团团长夏川被俘，副团长丁汾牺牲。“大众剧团”团长王鸿猷牺牲，副团长魏广安受伤。

文化界的损失是巨大的，工作环境更困难了。然而先烈的英勇，更增加了幸存者的战斗决心。他们没有跑散，没有弯腰，而是接过牺牲者的接力棒，继续前进。被俘的同志，机智地越狱、逃跑，千辛万苦地回到冀鲁豫人民的怀抱，继续灌溉这里新文化的幼苗。

正是因为有了前面先烈们的英勇牺牲，才有后继者的创造和成熟。“战友剧团”的时乐濛、“冲锋剧社”的张世德、“大众剧社”的万苇舟等同志在音乐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夏川在军事电影、军事文学等方面，田兵在少数民族文学的整理上都有很多建树，还有许许多多同志走上新闻界、影剧界、教育界、文艺界……成为全国解放后的新文化尖兵，继续贡献着力量！

冀鲁豫边区人民武装斗争概况

郭乐天 白晶五 冯培昌

冀鲁豫边区位于河北、山东、河南三省及苏北、皖北之接合部，南跨陇海，北靠漳河，东缘津浦，西临平汉，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之一，是联系山东、华中、华北和延安的枢纽，在解放战争时期，是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前沿阵地，也是第二、三野战军同国民党逐鹿中原后方基地之一。边区民兵是在党的领导下，紧紧依靠部队的大力支持，在和敌人进行长期复杂的斗争中成长壮大起来的，为保卫边区，扩大解放区，在前方直接配合主力军、地方军作战，在后方参与民主民生斗争，保卫农村社会秩序，保护农民生产，拥军优属，支援前线，带头参军参战，和边区人民一起，为解放战争准备了粮源兵源，作出了巨大贡献。

一、人民武装的组织状况

人民武装是指战争年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的自卫队和民兵，是不脱离生产的群众武装组织。在抗日战争初期，由于地方政权没有掌握在我们手里，我们党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在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基础上，宣传群众，动员群众，组织各种形式的救亡团体，扩大八路军游击队，广泛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1939年到1940年，日军回师华北，对冀鲁豫连续“清剿”、“扫荡”，国民党退守后方。此时，抗日民主政权相继建立，县成立基干大队，区成立基干中队，乡村成立不脱产的抗日自卫队，村青教会成立了青抗先。

1941年，冀鲁豫、鲁西两区合并。为了加强抗日根据地的军事建设，军区成立了人民武装部，军分区设人民武装科，各县也成立了人民武装科，区设武装助理员，村设自卫队队部。军区武装部部长由张西珩、曾宪辉先后担任，乔明甫任副部长。同年秋，青抗先总队成立，各基层组织也相应建立。总队长郭乐天，政治部主任王黎之，各分区区队长有赵亚侠（二分区）、吴英（三分区）、楚云峰（四分区），其他多由分区武装科负责同志兼任。总队部受军区武装部、青救总会双重领导。

各级人民武装组织建立以后，由于形势的变化，在机构设置上也经常出现变动。军区武装部开始设组织动员科、宣传科。组织动员科科长孙大坤，宣传科长耿廷舟。不久，组织动员科撤销，改为组织科、军事科、宣传科。组织科长夏德义，军事科长孙大坤，宣传科长宋辛夷。1942年精兵简政，军区机关缩小，军区武装部改由行署、军区双层领导，部长乔明甫。原来部属的3个科，改为军事科、政工科，政工科长宋辛夷，军事科长粟森。1942年冬，民主民生运动深入发展，为了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适应群众运动的需要，各级人民武装组织改称临时人民武装委员会（简称武委会）。边区武委会主任乔明甫，原来部属的科改为部，军事部长粟森，政工部长冯培昌。青抗先、模范班统称民兵，青抗先组织就此取消。

1945年夏，正式建立地区武委会。主任乔明甫，军事部长粟森，政工部长郭乐天，副部长冯培昌。

1946年，粟森、郭乐天先后调出，军事部长白晶五，政工部长冯培昌，副部长杨万奎。一分区武委会主任张裕民，二分区武委会主任由周贵生、孙正乾先后担任，五分区武委会主任由宋励华、杜恩训先后担任，六分区武委会主任赵克强、谢天民，七分区武委会主任×××，八分区武委会主任由冀炳南、郭乐天先后担任。

1946年7月20日，晋冀鲁豫后防战勤总指挥部成立，乔明甫任副司令员，张耀汉任边区武委会副主任，主持全区人民武装工作。

1947年6月15日，区党委决定，将武委会系统并入军区、军分

区，成为军区、军分区所属的武装部，主任改称部长。区、村一级的武委会，改在党内设武装委员，领导民兵及自卫队工作。没有军分区的地区，地委设武装部长，部长为同级党委委员，武装部实际担负军分区的任务。

二、民兵的形成和发展

人民武装建立初期，主要是以自卫队的形式出现。当时，18岁到55岁的男子组织起来，拿起大刀、标枪、土枪、土炮，负责站岗、放哨、盘查行人，捉拿汉奸、特务，协同部队作战，担负向导、运输、通讯、抬担架等战勤任务。由于斗争形势变化，敌人经常到村庄清剿、抢掠。为了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自卫队自动成立了名称不同的钢枪班、基干班、游击班、锄奸组。1941年11月7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军区武装部为贯彻中央军委的指示，在军区的领导下，专门召开分区武装干部会议，解决扩大民兵队伍，建立健全各级人民武装机构，以及统一名称等问题，提出自卫队先进分子参加模范班，青救会先进会员参加青抗先。这样，青抗先、模范班成了当时的两大民兵组织。

12月12日，军区在观城县朱家庙举行民兵大检阅，除一、四分区因受敌人封锁不能参加外，其他地区都有民兵参加。接受检阅的民兵约有5000余人。在大会上，杨得志司令员为扩大民兵队伍，发展人民武装，作了重要讲话。青抗先总队部在大会上授予六面队旗以示鼓励。民兵大检阅后，在各地党委的领导下，在群众团体大力协助下，边区民兵得到空前的发展。1942年边区民兵由原来的不足1万人发展到两万多人。各地抗日联防组织成员（多指自卫队员），由原来199338人发展到222155人。1946年边区形势好转，大片土地解放，民主民生运动普遍开展，群众情绪高涨，民兵扩大到103204人。民兵比较集中的村镇，多利用冬季农闲时间进行民兵整训，搞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教育，讲拥军优属、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教

给民兵射击投弹、利用地形地物的军事动作等。在解放战争时期，民兵大量参军，但边区民兵仍有发展。据1948年不完全统计，共有民兵107728人，其中女民兵33989人。

民兵发展起来之后，最突出的问题是缺少武器。解决武器的办法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筹钱到敌顽区买枪。如鄆北联防，为了解决民兵的枪支，他们在“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枪出枪”的口号下，规定有百亩地以上的富户买钢枪一支，50亩以上的富户买土枪一支，或几户合买一支枪。其他按照合理负担摊派，集资买枪。有私枪的经过动员拿出来交给民兵使用。不到三个月，联防各村都有十几支枪。枪的种类很多，有“日本大盖”、“水连珠”、“湖北造”、“中正式”、“套筒”、“老铅牛”、“独眼枪”等。

（二）自制武器。开始主要是依靠军队系统的兵工厂、修械所制造枪支，后来，不少地方把农村能工巧匠组织起来，进行仿造。民兵最主要的武器是手榴弹，凡是过去有“化铁炉”制造农具的地方，就把当地的工匠组织起来，建立炸弹厂，制造手榴弹。民兵把村里的麻秆、火硝、木材、破铜烂铁收集起来，送给炸药厂，换取手榴弹。沙区炸药厂是个老厂，建于1940年，原属军队系统。厂长李远有是个老红军，领导100多人专门制造手榴弹，为民兵建设作出了贡献。1944年以后，各分区武委会相继建立了军械修理站和手榴弹制造所，以解决民兵的武器问题。

（三）收缴敌人武器。民兵每逢打仗，都想多缴敌人的武器来武装自己。特别是在解放战争时期，我军大量地歼灭敌人，缴获了大批武器，使民兵的装备大有改进。据1948年不完全统计，民兵拥有步枪44590支、轻机枪281挺、掷弹筒74个、“六〇”炮15门、短枪1175支。

三、民兵的地位和作用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我边区民兵采取多样的战术，积极

配合我作战部队，在对敌、伪、顽、会道门、土匪、地主封建势力的斗争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在一个相当时期内，根据地特别是中心区大后方，农村的社会秩序井然，盗窃案没有了，吸毒、贩毒、赌博害人案绝迹了，违法犯罪现象大大减少。人心安定，有时可达夜不闭户的局面。每个村上都有民兵，每个民兵手里都有捍卫农民利益的武器，在村支部的领导指挥下，随时警惕敌伪军的进攻破坏。抗日根据地日益巩固。

泰西地区和直南地区都是开展人民武装工作较早的。泰西地区从罗荣桓同志1940年一次动员报告后立即行动起来，全面发动群众，凡年满18岁至45岁的青壮年都编入人民自卫团，地区成立人民自卫团司令部。司令由分区司令员兼任，武装部长或科长任副司令员，县长兼人民自卫团团团长，县武装科长任副团长。团员除站岗放哨盘查行人外，还作些支前支军、运输、侦察、通信联络、警卫、维持地方治安等工作。全区自卫团发展很快，在自卫团里也发展了青抗先、模范班，整个泰西地区抗日武装形成两种形式，一种是脱产的武装，一种是不脱产的武装。脱产武装是军分区武装部队、县区基干队和脱产的游击队、游击队小组等，不脱产的是各县区村的人民自卫团。1942年后，地区情况有些变化，对敌斗争激烈，靠近边沿地带的有觉悟的团员，纷纷脱产加入游击队、游击组，有的参加了主力部队或县区武装，不脱产的联防斗争就很难坚持下去了。

直南地区的自卫队普遍建立后，因有濮范观中心地的依托，随着形势和斗争的需要得到相应的发展，在一个时期内较好地开展了联防斗争。在模范班、青抗先的基础上，民兵发展很快，武器装备越来越强，能够配合主力、地方军作战，并能够独立作战。

（一）发挥民兵的优势，积极配合部队作战

实行主力军、地方军、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是履行人民战争最有效的组织形式。主力军是骨干，地方军与民兵则是强大的后备力量。三者各有专长与特点，有机地互相结合，对建军作

战、开展群众工作、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巩固和发展敌后抗日根据地，都是十分有利的。

1940年鲁西南斗争形势恶化，当地党政领导机关和部分军队被挤到曹县的曹楼、刘岗、伊庄一带。东面十几华里、南北三四华里的狭小地方，受到土、杂、顽7000余人的包围。曹楼、刘岗、伊庄一带的民兵、自卫队，配合分区独立团一个营坚守了120多天，打退了敌人无数次的进攻，保卫了地县党政机关和群众的安全。1941年的春节前夕，我新三旅七团、八团开往该地，粉碎了敌人的包围，打开了鲁西南的局面。曹楼、刘岗、伊庄的对敌斗争，受到军区的表扬，后来成为有名的“红三村”。

1940年1月，考城县葛庄村的民兵，配合县大队攻打王桥梧据点。民兵因为对敌情、地形及群众的情况都很熟悉，所以配合部队作战都很得力。他们为部队提供情况，行军担任前哨，作战冲锋陷阵，使这次战斗取得很大胜利，共毙伤敌人100余名，活捉中队长以下280人，缴获长短枪216支、马8匹、马车8辆。为此，葛庄的民兵受到鲁西六分区的表扬，并获得奖励。

1941年4月12日，日军在沙区进行灭绝人性的“四一二”大“扫荡”，当地民兵积极配合部队坚持腹地斗争，掩护领导机关和群众转移。主力部队转移外线作战时，民兵积极配合我军一个团打到了清丰，攻克了白仑、疙瘩店等据点，毙伤敌伪军百余人。

抗战以来，边区的群众武装、自卫队、民兵等有了一定的发展，但不够普遍、不够平衡，成份上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当边区出现严重困难局面时，有些群众的武装便垮下来了。1942年上半年，军区抓紧进行整顿，淘汰了一些流氓地痞，完善了各种制度。9月1日，区党委发出《关于支部对民兵领导的决定》，加强了党组织对民兵的领导，建立了民兵的政治工作。1942年底，边区颁布了《人民抗日联防组织条例》，规定根据地中凡年龄在50岁以下、16岁以上者，不分性别，一律参加联防（妇女自愿），进行抗日、锄奸、防匪，以保卫根据地。随着边区民主民生运动的开展，以及游

击战争中的实践，到1943年上半年，民兵组织得到了发展与提高，联防也发挥了较大作用。1943年7月30日，行署、军区发出《关于1943年下半年人民武装工作的方针和指示》，要求大量发展民兵，从斗争中和民主民生运动中提高民兵的军事技术、政治素质，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准备配合主力部队实行大反攻。在边沿区和群众基础薄弱的接敌区，要大力组织联防，切实掌握联防的领导权。各地区根据上级指示，加强了人民武装工作，使人民武装在对敌斗争、维持社会治安、保卫抗日民主政权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冠堂地区，是鲁西北的战略要地。这里是比较富裕的粮棉之乡，而封建势力雄厚，是日伪的“模范区”。我们在这个地区开辟工作时遇到了敌伪顽杂拼命的抵抗。1939年、1940年期间，天天有敌情，处处有枪声。有时敌伪顽杂联合起来向我根据地进攻，经常有小股敌伪向我骚扰。这里，我们地下党基础好，自卫队、青抗先、模范班、游击小组、民兵队，在农村已经形成了保卫农民自身利益的拳头，组织了联防配合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粉碎了敌人无数次的“扫荡”侵扰，消灭了大量的敌人，拔除了许多碉堡，平毁了敌人的壕沟封锁线。游击组、民兵配合主力与地方武装联合战斗，不计其数，著名者有：清水刘屯、汤村战斗，小郭庄战斗，曲掌固战斗，西焦庄战斗，孔村战斗，张柳绍战斗，乔庄战斗，吴海子战斗，贾镇战斗，廿里堡战斗，解放堂邑城战斗等。解放聊城、临清等地的战斗中，民兵中也涌现了王西元游击队，梁文焕武工队，吴兴、柴龙、韩洪林敌后武工队等大批能打善战的民兵模范班和神枪手。

1942年春季，朝城敌伪军对我中心地区进行“蚕食”进攻，在县内四面建立起40余个据点，敌人向南发展，直达我观朝县第三区境内。这时，在县武委会直接领导下，朝南联防很快组织起来，以十五庙为中心，赵楼、桑庄、杨行、李行、刘行一线，长约20华里，自卫队、模范班、青抗先共约800余人。每次敌人来犯，一村击鼓，四面支援，正面堵截，左右侧击，杀声遍野，使敌人望风而

逃。一天，我民兵派出侦察，探得日军与文大可伪军300余人拟于2月15日到十五庙杨行抢粮抓夫，立即报告县委与南下支队32团。32团决定14日夜主力在十五庙杨行设伏，令刘行模范班在该村隐蔽，待敌至杨行打响后，实行前后夹击，以彻底歼灭来犯之敌。15日拂晓，敌人进至杨行村口时，我主力部队全线开火，敌死伤数十人，仓皇败退。我刘行模范班全队出击，夹击败逃的敌人，在激战中，和敌人交手混战，敌伤亡10余名。我刘行模范班刘德清、刘××等3人不幸牺牲。战后观朝县政府、县长王树成对十五庙刘行模范班通令嘉奖，在刘行村召集联防区全体队员举行追悼大会，追认抗日烈士，对其家属进行抚恤。自此，朝南联防更加巩固，成了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使朝城敌伪军不敢向南侵犯一步。

自1943年起，我军正确执行了“敌进我进”方针，主要表现在敌向我根据地进攻，我则向敌后进攻，派出大量武工队、民兵游击组和小部队深入敌占区，建立隐蔽的根据地，变敌之后方为我之前线，变我之被动为主动，从而有效地扭转了退缩的局面。

从1942年秋季开始，边区认真组织抗灾救灾工作。在行署抗灾总会指挥下，各级政府救灾委员会，从中心区调集1000万斤粮食，组织民兵、民工和县区武装护送运粮车队，冲破敌人层层封锁线，先后将350万斤粮食运往鲁西北，将600余万斤粮食运往沙区。在敌人封锁围困下，保证了人畜、粮食与车辆的安全，圆满地完成任务，为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灾民解除了燃眉之急。

1943年11月16日，濮阳县民兵配合我七、八团和南支三个团袭击八公桥孙良诚部，全歼孙良诚部八大处、警卫团、骑兵营，俘虏官兵3000余人，缴获马300余匹、迫击炮2门、轻重机枪30余挺、长短枪2000余支，还缴获了兵工厂和其他战利品等。

郓城县黄楼村共80余户，400多人，党的基础较强，群众觉悟高，党群组织健全，工作非常活跃。敌人早已把它看作向我中心区进攻“蚕食”的障碍。8月1日，城内的汉奸头子刘本功部伙同侯集、刘口等据点敌人400余人，突然向黄楼进攻，并从东、南、北三面包

围。支部书记张全建、自卫队长张绍兴，立即率领 15 名基干民兵把守寨墙，进行激战。汤垓民兵闻讯前来支援，民兵撤退到院落进行巷战。敌人连续数次攻击，死伤 20 余人。战斗从上午 7 时一直坚持到下午 1 时傅庄洼、刘庄、孙沙窝等实验区的民兵赶来增援。被围民兵一部乘机撤出寨外，11 名民兵因伤势过重，光荣牺牲。党对黄楼民兵英勇杀敌的光荣事迹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政府授予 11 名民兵“民兵英雄”的称号，追认为烈士，召开追悼会，并对家属进行抚恤慰问。馆陶县六区塔头村的民兵，是久经严酷斗争锻炼的武装，素质较强。其骨干民兵中，有步枪、手枪，有三八式套筒、湖北造等，也有些土枪土炮，战斗力较强。1941 年 6 月的一天拂晓，日军把村子包围，妄图一举消灭该村民兵。民兵立即据守村寨，顽强地战斗了四五个小时，终因经验不足，最后从村西面撤走。这一次，遭受了重大伤亡，30 多名民兵负伤和牺牲，从而更加激起了人民和民兵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1943 年秋，馆陶敌人要在七区法寺村修碉堡。县委得讯后，教育群众不出人，不出粮，不出物资，决不给日伪效劳。全村实行“坚壁清野”，把粮食统统埋入地下，青壮年离开本村，地方武装、民兵队不停地对敌军进行袭扰，并监视地主、坏分子的资敌通敌活动，使敌人大大推迟了安“钉子”的时间。随后敌人又到八区南拐村安“钉子”，在群众、民兵的抵制打击下，敌人的阴谋同样没有得逞。这两个立足未稳的“钉子”无法存在，不得不撤退。上级把这个经验通报全区。

1944 年是边区军民向日军发起进攻的一年。5 月 11 日至 17 日，昆山县的民兵配合部队向伪军展开了强大的政治、军事攻势，先后拔除戴庙、张博士集、大小安山村据点，攻克碉堡 51 处，毙伤伪军 150 余人，俘伪军中队长以下 1000 余人，解放了昆山大部分地区。

（二）联防作战，共同抵御来犯之敌

由于部队跨地区作战，而广大农村主要由民兵自卫，为了有效地进行自卫战争，边区广大农村在党的号召下普遍建立了联防。数

村组织一个联防区，制定联防公约，一村有事，数村支援，违者受罚。鄆北联防在边区是比较好的。它1941年成立，初期只有几个村庄，后来发展到几十个村庄，形成一条东西长70余华里的联防线，一直伸到敌占区的边沿。为了充分发挥联防的作用。他们积极改造地形：没有寨墙的地方，把胡同用泥土垒住，留一空眼瞭望敌情；村边的房上、墙上插满了圪针条，留下大路口，来往行人非此不能通行；村与村之间挖成5尺深的路沟，有的还挖了地道，战时用来掩护；院落之间互相连通，进入一家就能走遍全村。村里村外扯上地雷线，有真有假，叫敌人望而生畏，不敢妄动。敌人来了，一处枪响，四处支援。打胜了，把敌追到据点里去；打败了，四处分散，搞得敌人晕头转向。1942年9月27日，日伪军万余人分8路向我濮、范、观中心区合击“扫荡”。鄆城县伪县长王文宪率伪军500余人尾随日军攻占东店子、西店子联防村，妄图摧毁我联防阵地。我联防民兵在区队的协助下，展开了阻击战，从上午打到下午3点。敌人久攻不下，只得退回据点。1943年2月25日凌晨，王文宪又带领伪军攻打梅坊村。县大队两个连，五区队和栗屯、店子、仪楼的联防队立即赶来支援。伪军见势不妙，落荒而逃。县大队、联防队撤走后，敌人又来攻打梅坊村。当时梅坊村有3个民兵班、二十几支枪、几门土炮。民兵们一面掩护群众转移，一面与敌人展开激战。当敌人快爬上寨墙时，民兵把准备好了的铁钉、耙齿装在土炮里轰击敌人，毙伤敌18名。王文宪见久攻不下，便亲自带领伪军往上冲。当敌人打进村庄时，民兵早已分散了。敌人气急败坏，烧毁民房400余间而去。

南乐县是抗日战争时期敌人摧残比较严重的县。这个县盘踞敌人几千人，县境内公路纵横，碉堡林立，还有很多封锁沟，县内大部分地区变成了敌占区。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南乐县的张庄集、樊村、李家庄、阎村和武家村于1942年建立了6村联防，森严壁垒，敌人几次进攻都没有得逞。在八年抗战中，这里是南乐县坚持对敌斗争较好的地方。沙区高陵县，为了粉碎敌人的“治安强化”

和“蚕食”，于1940年普遍建立了联防，对伪军孙步月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由于民兵联防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强大的威力，致使敌人非常害怕，稍有风吹草动，就惊慌失措。1941年×月，鄄城县伪县长王文宪在日军的配合下，率伪军进犯我鄄城县东西刘楼、赵庄。区队和联防队坚决抵抗，子弹打光了，赵庄农会会长急中生智，背起大鼓，爬上寨墙擂打起来。敌人听到激烈的鼓声，以为联防队反攻，急忙撤回县城去。

内黄县的民兵联防，从1941年开始建立，由村与村联防发展到县与县联防，与滑县结成了联防县。村联防既有村各自为战的领导，又有统一指挥的准则，成为一支强大的对敌伪有威慑力的人民武装力量。一般情况下，没有日军对根据地的“扫荡”，伪、顽、会、匪、杂等是不敢轻易向根据地进犯的，偶而进犯或向根据地骚扰，也是遭痛击后而逃窜。1941年秋，城姜村住了几个地方工作人员，东庄伪军得知后，当夜派出100余人偷袭城姜村，企图捕捉我地方工作人员。当伪军摸索到工作人员住户附近时，我值勤民兵发现，鸣枪报警。民兵队长马上指挥民兵，高喊：“一连堵住东门！二连堵住西门！”紧接着，东西姜村、太平、野庄等村民兵立即鸣枪响应，并派出武装民兵跑步前去支援，伪军吓得四散逃窜。事后，几位地方工作人员说，亏了民兵防范严密，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区与区之间也有民兵联防和联防公约。对于联防公约，各村民兵形成自觉遵守的好风尚。这种强大的民兵联防又为主力军作战创造了有利的条件。1942年秋，敌人实行秋季大“扫荡”，沙区根据地主力军转入外线打击敌人。东庄、内黄县的伪军数千人乘隙联合向沙区进犯，伪军已深入到千口、大柴村、店堂一带。内黄县各区民兵主动联系，配合主力迅速向伪军发起总进攻，枪声四起，伪军丢下抢夺的物资溃逃。我追杀近20里，伪军旅长唐××逃至野庄时被击毙。

内黄与滑县的联防成立大会是1941年秋季在滑县召开的。滑县

县委书记赵紫阳、武装科长田×民、内黄县安子成参加了会议。会后，赵紫阳提出建立民兵联防核心领导，党团书记由赵兼任。当时，党组织对民兵武装的领导是非常重要的。

1942年某月，观城县二区武装干部李永成到康庄工作。朝城伪军7个连到小郭庄一带“扫荡”，李永成就叫民兵吹号，周围的联防村都吹起来了。敌人听到周围的号声，以为大军来到，不战自退。

1944年，我军对敌人连续发起进攻，民兵紧密配合，联防队成了联攻队。一年里，边区民兵计作战1898次，毙伤日军小队以下54人，俘3人，毙伤伪军964人，俘501人，争取伪军反正231人，捉匪66人，缴获机枪377支、掷弹筒3个、短枪44支、地雷36个、手榴弹5361枚、子弹3893发、牛79头、自行车24辆、电台2架、造枪机床1架、电线100398斤、粮食81669斤，查获敌探奸细484人。

在联防作战中，我边区民兵也付出了重大牺牲。一分区茌平县张楼村的民兵联防，在一次对敌战斗中因寡不敌众，被敌攻入村内。民兵、群众333人英勇牺牲，271人受伤，264人被抓走。张楼村的民兵、群众誓与敌人血战到底的爱国主义精神，深受冀鲁豫人民的赞扬。该村被上级命名为“英雄村”。

（三）根据平原特点，机动灵活进行战斗

1、交通战

冀鲁豫边区地处平原，为了坚持平原游击战争，边区民兵和广大群众在党的号召下，每年秋冬两季开展破路运动，把交通要道都挖成5尺深的路沟，做到村村相连，路路相通。打起仗来，敌人的汽车、坦克无法畅通，而我们却可以利用路沟掩护群众转移，有利于对敌人展开游击战。1943年秋，朝城县日伪军300余人到观城县田海、奶奶庙一带“扫荡”，南乐县李家村（位于田海以北三四华里）的青抗先、模范班三三两两顺着“抗日路沟”向田海村打枪。敌人惶惶不安，如临大敌，把田海村的树砍了不少，堵住村路口准

备固守。当天夜里，观城县青抗先大队长何涛在当地组织了三四十名民兵，在县大队的配合下袭击了这个村庄。敌人乱成一团，第二天一早就逃跑了。

在挖“抗日路沟”的同时，边区民兵和广大群众不断破击敌人的封锁线。敌人为了推行“蚕食”政策，修了不少公路，公路两侧挖封锁沟，筑封锁墙，公路附近设了不少据点。据1942年的统计，边区境内有敌人公路173条，共长8800华里，封锁沟30条，全长1400华里，伪据点899个，兵力6万，日军据点199个，兵力5000。另外，顽军37000人驻扎在濮阳、滑县一带，经常袭击我们。边区根据地被分割成几块。为了打破敌人的封锁，开展反“蚕食”斗争，边区军民展开了破击战。1941年3月，沙区军民大破南（乐）清（丰）、南（乐）内（黄）濮（阳）滑（县）等公路。部队袭扰敌人的据点，民兵掩护群众破路，一夜之间，把敌人的公路挖得不能行车。8月间，又组织群众2000多人，在民兵的掩护下，一夜之间分段破击了南（乐）清（丰）之间的公路和封锁沟。

1942年春天，朝城敌人对我中心区实行“蚕食”进攻，到处设据点、修碉堡，扩大敌占区，缩小和封锁我根据地，企图消灭抗日武装力量。这时，我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采取分散游击方式，小部队活动，白天休整，夜间进击。敌进攻我时，我小部队插向敌人后方进行活动。民兵也组成游击组、武工队，夜间插入敌人后方进行干扰。朝城二区以民兵英雄“二太监”（赵启明）和张振海为首组成民兵游击组，活动在南朝公路上，经常出没在敌伪碉堡之间，打伏击，捉敌探。他们还经常给砖庄、吉祥寺等碉堡伪军上课（训话），讲形势，讲我军对敌伪军的政策，以争取瓦解伪军。他们通过侦察，摸清敌人出发时间和“蚕食”计划，以争取、瓦解与镇压相结合的方法，摧垮了40余村的伪政权组织，配合主力部队收缴10余个据点的枪支，争取自首或停止资敌活动100多人。由于广大军民积极开展对敌斗争，敌人的“蚕食”进攻逐渐破产。

2、地道战

时刻准备着

边区民兵在长期的抗日斗争中，之所以能够坚持就地作战，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开展了地道战。1941年至1942年，敌人以强大兵力对冀鲁豫边区连续“清剿”、“扫荡”，根据地缩小，大块大块地被分割。民兵为了坚持内地作战，开始挖了些地窖、地洞进行防御。后来感到不保险，一旦敌人发现便无招架之力。于是，他们学习冀中地道战的经验，在军区武装部的领导下，开始挖地道，在锅底下、炕洞里不易被敌人发现的地方留了进出口，专门挖了“气眼”（通气孔）。有的还在地道内安上了“土电话”（设置各种暗号），以便于指挥。这样，地道成了民兵坚持腹地斗争的有力阵地。鄆北、南乐的联防之所以能够坚持到抗日胜利，地道确实起了重要作用。1947年在土地改革过程中，各地结合进行地道建设和民兵联防组织的建设，收到了可喜的成果。地道在对付国民党大军压境及疯狂的进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区党委把建设地道作为游击战争手段之一。当时五分区在土改结合地道建设上取得了较好成绩。三分区和其他几个分区，学习推广了五分区的经验，逐步使地洞与地道相贯通，户与户、村与村都连结成网，由单纯地躲藏到能躲能打，能守能攻，一个时期内成为游击战争的重要依托。

1947年4月中旬，国民党第六〇〇团和还乡团等部约2000余人，向我三、五分区有重点地进攻掠夺，手段极其残酷。他们用刀砍、活埋、五牛分尸、铡刀铡死、剥皮等手段，残杀我革命干部和民兵。五分区安陵集一村，敌人刀砍村干和民兵12人，不让收尸，不让掩埋。兰封县一个区队被俘20余人，全部被砍死。中心区刘岗、曹楼等10村，一次即被杀害50余人。第三分区鱼台县被敌侵占后，还乡团大肆捕杀地方干部和民兵，并用地方干部、民兵的人头活祭国民党鱼台县长吴品山。在沛县，敌将我干部民兵杀害后，把人头挂在城门上示众。第五分区菏泽县民兵队10余人在地道内被毒死，敌人将尸首挖出来，又用铡刀铡。仅1947年一年内，我二、三、五、七分区被杀被俘干部、民兵和积极分子即达500余人，被抢粮达1720余万斤，被掠去牲畜16472头、大车1764辆，被烧毁房屋32842间。

1947年12月，国民党整编八十八师一个团和碭山保安团共约2000余人，携带大炮等重武器，向碭山县贾庄、后王庄同时进攻。开始时敌以炮轰击，后在机枪掩护下发起冲锋。我民兵队和区乡地方干部百余人，坚守地道，一枪不发，待敌人接近时，集中火力，猛烈开火，将敌人击退。一直坚持到傍晚，我先后打退敌人4次进攻。战斗进行两天一夜，共毙伤敌137人，而我无一伤亡。敌连续几次受挫后，又从徐州调来一榴弹炮团和第八十八师全部，以数十倍于我的优势兵力于12月23日发起疯狂进攻。坚持地道的干部和民兵，在打退敌人数次进攻后实行突围，但因许多地道被敌炮火摧毁，又因众寡悬殊，除少数突围外，民兵和区乡干部68名被俘，其中区委书记以下35人惨遭杀害。

1947年冬季，区党委、军区吸取了对敌斗争的经验教训，确定了军区部队对敌采取疲惫削弱、歼其零星小股的战法，积小胜为大胜；分区武装以营、连为单位分散活动，县区武装坚持中心区斗争，成为支持民兵队、武工队坚持农村阵地的骨干力量。民兵队、武工队则组织群众依靠地道、地洞、路沟等捕捉零星敌人，镇压特务，控制地主还乡团的破坏活动。单县曹马区民兵5天作战15次，其中一次解放了被抓壮丁及妇女60余人，截回马车一辆。这个区的范庙武工队，在区武委会主任张守全的领导下，依靠地道、地雷杀伤敌人60余人，并击退有3辆装甲车装备的敌整编第五师一个营的进攻。成武县民兵20天作战52次，毙敌20余人。五分区军民在国民党整编第五师等7个旅的合围奔袭下，不分昼夜地反复对抗敌人之“清剿”、“扫荡”。

在大量敌军压境，残酷斗争之际，各县区干部战士和民兵出生入死，忍饥受饿，保卫群众利益，与群众同生死、共患难，深受群众支持爱戴。有的群众自觉地向地道里送水送饭，有的为掩护民兵或干部，以全家性命作保，许多妇女、老人被敌人吊打，坚贞不屈，一字不吐。这种军民鱼水之情感人至深。

荷泽县五区武委会主任杜金铃，率领民兵作战，被敌人包围。

因众寡不敌，弹尽粮绝，他率民兵11人集体自尽。在整个战争残酷斗争的年月，边区军民奋不顾身，英勇战斗，创造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1947年一个时期内，冀鲁豫边区在敌我双方兵力经常保持在50万人左右以及敌人严重摧残的艰苦条件下，参战支前民兵、民工数量巨大，仅民兵即占116.9万个工日，民工占3801.7万个工日。参战民兵伤亡数字很大，都按行署颁发的《民兵民工参战伤亡抚恤损失赔偿条例》及时做好善后工作，保证了民兵队伍的稳定和高昂的战斗情绪。

3.地雷战

地雷战多用于边沿区。因为敌人经常出来窜扰，为了防止敌人的偷袭，民兵就将自己制造的土地雷埋在村庄周围，拉了很多地雷线，有真有假，有的把石滚搭上地雷线当成大地雷吓唬敌人。敌人提心吊胆，不敢偷袭。后来又将土地雷推向敌人碉堡附近，把地雷、快火手榴弹乘夜埋在敌人出入的地方以封锁敌人。

在内地，地雷主要用于敌人“扫荡”时，让它“看家”。敌人进行“扫荡”时，民兵将地雷埋在自己家的门前门后，有的把地雷埋在粮食屯里、衣柜里，有的门上挂个手榴弹，敌人一见就溜之大吉。

平原作战多用踏雷，由于当时的物质条件、技术条件、地理条件的限制，冀鲁豫边区的地雷战没有普遍开展，只是在物质、地理、技术条件成熟的几个点上开展起来。

（四）敌占区的民兵英勇顽强，坚持斗争

1942年7月8日，南乐县东节村的民兵为了拔掉敌人在东节村的据点，与县大队配合，巧扮泥瓦木工，到据点内突袭日军，打死9人，仅1名日军和1名翻译逃脱，缴获轻机枪1挺、步枪数支，受到了军区、行署的嘉奖。7月30日，日军80人，伪军400余人包围了东节村进行报复，用刺刀挑死8人，活埋180人，烧房800余间，制

造了有名的“七三〇”惨案。但是，东节村的民兵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对敌斗争，在敌人继续占领东节村的情况下，于1944年配合县大队，又一次拔掉了这个据点。

翟村铺是南乐县西有名的大村庄，全村共有五六百户人家，1940年前曾是抗日游击区。1941年，国民党丁树本部一个营长杨发贤投敌叛变，任东亚同盟自治军第三旅旅长，下辖3个团，共2000余人。他们在翟村铺周围安了不少据点，远的十几里，近的五三里。在敌人的包围下，翟村铺党支部很坚强，组织了三十几人的青年武装。大的20多岁，小的十几岁，其中多数是共产党员。他们自己拿钱购买了“底把盒子”十几支，主要任务是掩护地下工作同志。县委书记魏明光，宣传部长陶鲁正，区委书记赵东甫，区长李敬轩和李祥等同志都在这个村里活动过。这里是他们从事地下工作的落脚点。翟村铺的青年武装为了保卫地下工作同志的安全，维护当地群众利益，除掉了不少坏蛋。安庄的王鑫是敌人的侦探，经常给敌人通风报信，干了不少坏事。1943年秋，青年武装配合区队除掉了他。邵家庄驻伪军一个团，团长袁志儒是翟村铺人。邵家庄离翟村铺不到5华里，袁志儒常带着喽罗到翟村铺活动，与该村反动势力相勾结，清乡、查户、派款、要粮，作威作福，甚是嚣张，群众恨之入骨。翟村铺的青年武装，奉上级党委的指示，在外地民兵的配合下，于1942年冬除掉了勾结袁志儒的地主、国民党分子周兴斋，当地群众无不拍手称快。翟村铺位于冀南、冀鲁豫两区的边界，是两区联系的纽带，护送干部、传递情报是该村民兵经常担负的任务，他们从来没有出过差错。他们的斗争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

（五）维护地方治安，保卫民主民生运动

为了广泛地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解决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冀鲁豫边区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先后掀起了反贪污、反恶霸、改造村政权、减租减息、增资增佃、合理负担、查“黑地”、借

粮、赎地等群众运动。随着群众运动的发展，工、农、青、妇、文、武的群众组织也得到发展与壮大，民兵组织普遍得到充实，已经形成农民自己的有力拳头。在民主民生运动中，民兵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为了充分发挥民兵的作用，边区民兵进行了几次整顿。1942年9月1日，区党委发出《关于支部对民兵领导的决定》，要求各地支部都把领导民兵当成一项重要任务，党员要在民兵中占1/3或1/2。民兵指导员由村支书或副支书担任，以保证民兵质量和民兵教育训练的实施。1943年，区党委又作出《关于整顿、健全各村民兵组织》的决定，使不坚定分子退出民兵队伍，枪保持在政治上可靠的人手里。当时叫做“枪换肩”。经过整顿，民兵队伍大大加强，成为群众工作的得力工具。民兵在群众运动中，控制地主，维护治安，处处事事站在群众运动前列，为群众撑腰，保证了各项运动的顺利进行。

（六）保卫大生产，实行劳武结合

为了作到战争保卫生产，生产支持战争，边区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展开了大生产运动。每逢春、秋两季，民兵积极保卫抢耕、抢种、抢收。为了充分发挥民兵的保卫作用，提高民兵素质，民兵实行了劳武结合的制度。一是变工互助。民兵保卫群众生产，群众有义务保证民兵生产不受耽误。民兵出勤时，群众代民兵积肥、收粮、抢耕、抢种。二是民兵不出勤时，在家积极生产，不仅是作战的英雄，而且要做劳动生产的模范，克服“二流子”现象。三是民兵边生产，边练武，一手拿枪，一手种田，随时准备打仗。

民兵的生产问题，按行署规定执行，互相换工，集中作战算工，战勤押运担架算工，剿匪维持治安算工，开会受训不算工。经常集中的武工队则以代耕方式解决，防止随便换工乱用民兵（因没有区队者多用民兵代替），战争空隙禁止浪费民兵。

在劳武结合的同时，边区武委会还号召全区民兵开展神枪手活动。阳谷县民兵李延隆，是神枪手，打枪百发百中。一天夜里，民

兵到敌人炮楼附近活动，炮楼上挂着敌人的“救生灯”，他一枪就把它打掉。由于李延隆枪法好，出了名，有的部队作战时还专门请他去配合。边区武委会抓住这个典型，号召全区民兵开展神枪手活动，提倡民兵在生产间歇期间加强练武。从此，神枪手活动在各地区展开，不少地区涌现出一批神枪手、神枪班来。特别是1943年以后，随着民主民生运动的深入发展，这样的活动更为普遍了，民兵的军事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1944年4月以后，冀鲁豫军民连续展开对敌攻势作战，广大民兵和群众挖沟破路，开展政治宣传，配合部队攻克敌人据点10余处，歼灭大量日伪军，解放了大片地区和县城，进一步巩固扩大了抗日根据地。据不完全统计，1944年全区民兵共有103304人，民兵自卫队配合主力部队作战达4.5万人次以上，仅民兵单独作战即达1898次（水东区未计在内），杀伤日军小队长以下54名，俘敌3人，杀伤伪军964名，俘伪军501名，争取反正231名，歼灭土匪66名，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和粮食，查获敌探奸细484名。

（七）参军参战，支援解放战争

1945年8月中旬，冀鲁豫三路大军对日伪展开反攻。我边区民兵除了积极支前外，还配合地方武装围困腹地城镇日伪据点。8月10日，日军无条件投降。为了保卫胜利果实，对付国民党可能发动的突然事变，8月12日，边区行署武委会发出紧急通令，要求全区民兵、自卫队紧急动员起来，迎接新形势，迎接新任务。各地遵照通令，立即行动，组织反攻营、反攻团，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同时，还积极配合公安部门搞好治安防谍工作，严防溃散的伪军伪组织人员侵入，保卫根据地的安全，巩固后方。

日本投降后，分区、县和区的地方武装都升级为主力部队，各县的反攻团、反攻营、反攻连分别代替了各级地方武装。县武委会主任执行县大队长职务，分区武委会主任执行军分区的任务。一纵北上之前，为了充实主力部队，边区武委会决定派军事部长粟森去中心区的寿张数县，动员了千余名民兵，编为一个民兵团，参加了

一纵主力部队。

1946年4月1日，蒋介石公开撕毁停战协定，我边区军民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准备反击国民党的进攻。边区武委会向民兵发出训令，指出从元月13日停战令生效以来，国民党正规军及其他武装向我区进攻101次，使用兵力4万以上，要求民兵配合部队，坚决消灭来犯之敌，加强边沿区的防卫工作。据上半年统计，国民党军队向我区进犯300余次，使用兵力10万人。我区民兵、地方武装站在自卫的立场，被迫与敌人作战231次，毙俘国民党军5100人。

6月26日，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边区民兵先后参加了陇海、定陶、巨野、鄆南、滑县、豫北、金（乡）鱼（台）巨（野）等较大战役，担负着护卫数以万计的担架、运输以及破击陇海路、配合部队作战等光荣任务。

各地民兵配合主力部队、地方部队掀起了反攻杀敌热潮。在野战军围攻郟城时，当地民兵在城南的石桥、徐垓、黄龙、引马一带建立了长达百里的联防线，村村设防，昼夜巡逻，不让一个敌兵漏网。7月9日，敌五十五军残部利用青纱帐潜逃，当地民兵和自卫队员一拥而上，杀声四起，将敌兵80余人全部擒获。在整个战役中，民兵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共歼灭国民党军官兵1500余人。

10月28日，为了反击国民党军队的进攻，消灭沿平汉线北犯之敌，我晋冀鲁豫军区集中6万余人的兵力，发动了邯鄆战役。我边区民兵、民工10万人，昼夜支前，送粮、送弹，抢运伤员，有的民兵营、民兵团在部队的统一布置下配合作战，为邯鄆战役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1946年5月，南旺县（梁山）荣庄青年民兵班配合县大队截击敌人军车，歼灭敌军1个班，俘敌中尉军官1名，士兵、驾驶兵共12人。

1946年8月，刘邓大军出击陇海路，我二、三、五地委共出动民兵1万多人随军执行破坏铁路的任务，并动员了民工15.6万人，送弹药，运粮食，抬担架，胜利地完成了支前任务。

1947年7月，为了配合刘邓大军南下作战，边区武委会从东阿、博平、聊城、清平4个县调出4个民兵团，组成民兵支队，随同华野部队在单县、鱼台、金乡、成武一带与国民党新五军周旋作战一个月，胜利地完成了支前任务。9月初，奉战勤总指挥部命令，将民兵支队3个团撤回黄河以北休整，并指定博平团随华野十纵队参加围攻沙土集的歼灭战，一举将敌五十七师全部歼灭，俘敌师长段茂霖，毙伤俘敌军共500余人。我民兵团配合主力攻进敌营，占领把守敌机要部位和物资，守候枪弹仓库，转运伤员，押解俘虏，动员群众掩埋现场敌尸，清理散失武器和逃避隐藏的敌特、还乡团分子等。经过3昼夜，民兵团把战场清理完毕，圆满地完成任务，受到战勤总指挥部的表扬。

在沙土集战役期间，为了保证战役的全胜，冀鲁豫第五军分区部队和各县民兵队、民兵连动员并带领数千名群众，破坏民权至柳河间铁路华15里，将铁轨拆除，将电线全部割断，使敌人铁路运输中断，全线瘫痪，迫使敌人前后不能接应，无力再战。

在大力支援前线的同时，我边区民兵还积极配合地方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争。1946年9月中旬，我黄河南的民兵、武工队，在坚持县不离县、区不离区的斗争中，依靠地道打击小股敌人，对付敌人大军过境，袭击地主还乡团和区、乡公所。截至10月底的统计，一个半月的时间出击敌人150次，歼敌35人，初步打开了鲁西南的局面。在同一时间里，考城县的民兵在打击国民党地方武装、还乡团中，俘敌100人，受到边区武委会的表扬。

1947年黄河河防指挥部成立后，齐河、河西、寿张、范县、鄄城、昆吾6个县成立了河防营。300华里的河防线都是民兵营把守，真如铜墙铁壁一般。7月，敌新五军攻克了我河东之东平县城，企图在我河防线东部东阿县城打破一个缺口，以便向黄河对岸攻击。我河防营民兵一排30余人以攻为守，到河对面迎头阻击。敌来势凶猛，民兵边战边退，至黄河边时，敌人已把码头口岸所有船只撤走，宣布戒严。上有飞机轰炸，下有敌新五军追赶，在这紧急关

头，民兵队长命令全体民兵脱去衣服，背好枪弹游水过河。敌追至河边时，我基干大队在北岸用机枪掩护。我民兵队无一伤亡，受到了县和指挥部的通令表扬。

1947年1月，冀鲁豫区党委召开民运工作会议，总结部署土改工作。在游击区，备战参战与土改相结合，深入开展翻身检查，进行填平补齐，做到不漏一口人，不漏一亩地，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在收复区，在复仇保田、“反倒算，保田、保粮、保命”的口号下，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在边缘区，更好地实行“一手拿枪，一手分田”，组织联防，前边民兵警戒，后边分田、保田，争取春耕前完成土地改革，更好地支援前线。

1947年7月9日，敌整编第五十五师溃兵利用青纱帐四处潜逃，行至郟城田场、李合庄一带。第一、二区民兵立即将他们包围起来，当地农民也扛着锄头、红缨枪蜂拥而上。顿时，方圆10里的土地上杀声震天，敌80余人全部就擒，武器弹药全部被民兵缴获。

我军收复定陶县城时，当地民兵积极配合，英勇阻击敌人援军。7月6日，敌整编三十二师一部沿单虞、单杨两公路北援。单县、成武、华山、杨山等地民兵和区小队，设伏在公路两侧，布设地雷，阻敌前进，使援敌两天只前进了100华里。我民兵缴获汽车1辆，毙俘敌连长以下50余人。整个战役期间，二、三地委各地民兵、自卫队配合主力部队捕捉敌人溃兵，共俘获官兵1500余人。

1947年3月6日，临泽县基干队和三区民兵于菏泽至郟城公路间的都司集一带，一举歼灭敌人一支汽车运输队，缴获汽车18辆、炮弹54箱、大米300包，俘敌50人。军区通令表扬，并号召各县、区武装民兵向他们学习。

同年3月9日，七分区十九团一个营，在嘉祥县大队和两个民兵连的配合下，袭击盘踞在双凤村的敌人，击毙保安旅长阎忽以下45人，俘27人。

1947年7月8日，我一纵队攻克了郟城县城，敌五十五师一个正规连夜间逃跑迷失了方向，集体坐在一块高粱地里，被我郟七区区委书

记刘芝带领的民兵小组发现。杨集民兵杨乃武急步冲到敌人面前，向天空鸣枪示警，并迅速抢过敌人一挺轻机枪，将枪口对着敌群。敌人一连人乖乖被俘。此次共俘敌121名，缴轻机枪3挺、自动步枪4支、步枪100支、子弹万余发。参战的民兵小组受到县和分区的通令嘉奖。

为了配合大部队作战，我边区民兵除保护地方治安外，还担负着大量的后勤工作，如各级战勤指挥部、兵站、随军办事处等等，都有民兵维护。在黄河归故斗争中，21万群众复堤，黄河渡口以及堤防安全都靠民兵维护。1947年春成立了黄河河防指挥部，将齐河、河西、寿张、范县、鄄城、昆吾6县划为河防线，全长300华里，共设置渡口码头10个，大小船只300余只，每县调集民兵一营组成河防营，每营400余人，负责沿河联防，保护堤坝、船只、码头设施，防止敌特破坏，维持口岸治安，保卫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这个斗争经过几年时间，直到打垮蒋家王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黄河联防始告结束。1948年8月，我刘邓大军出击陇海路，黄河南二、三、五地委出动民兵组成随军担架队、运粮队、救护队、运送弹药队和破袭铁路民工，共计15.6万人次。有的随军支前半年不下火线，随军过了陇海路，又过了黄泛区。很多民兵民工要求参军，消灭蒋家王朝，解放全中国，后来编成了一个民兵团，火线参军，编入主力部队。

民兵是部队的扩大。部队补充兵源、升编和减员的补充，主要来自民兵。为了扩军，区党委向全区人民发起几次参军运动，1946年下半年至1947年上半年3次参军就达7万人。1947年11月中旬至12月30日，一个半月的时间参军5万人，参军的绝大部分是民兵、自卫队员。不少村庄的民兵，在干部带动下，几乎全部参军。1947年全区民兵总数为107728人，共参军27908人。解放战争后期民兵总数只有79820人了，代替他们的多是新发展的女民兵。各级武委会干部，大部分带头参军，有的随军支前，有的带民兵打仗，为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随着游击战争的发展、深入，民兵在边沿区、游击区由零星的单独活动逐步走向联防，形成了有机的对敌斗争网络，成为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拳头。冀鲁豫的民兵组织，适应了游击战争形势的需要，在斗争中逐渐发展壮大起来。据不完全统计，到1947年底全区民兵共有107728人，其中男民兵73729人，女民兵33999人，装备步枪44590支、轻机枪28挺、掷弹筒74个、六〇炮15门、短枪1175支。民兵已成为打击敌人、保卫群众利益、维持治安、坚持根据地的一支重要的生力军了。

军区人民武装部于1948年12月30日公布战绩，全区民兵两年共作战9532次，参加人数2.4万多人，歼敌12419人，其中配合部队作战3125次，单独作战6407次。我区民兵完成了坚持腹地斗争，配合野战军、地方军全部解放黄河南地区，保卫500里黄河堤防，镇压特务、破坏分子和反动会道门的活动，稳定社会秩序，支援前线，掩护运输，保护兵站、粮站等任务，但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在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初期，仅湖西地区11个县三个月内被惨杀群众即达1.1万余人。1948年2月到6月，黄河南17个县被抓丁3.8万余人，被杀害干部、民兵、积极分子3000余人。我边区民兵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不怕流血牺牲，前仆后继，苦战12个春秋，为党为人民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们为人类的解放事业，付出了很大代价，有的全家老少被敌人杀害，有的在战斗中光荣牺牲。他们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将与日月同辉！为国捐躯的民兵战士永远活在我们心里！

四、人民武装的思想政治工作

（一）抗日战争时期民兵的思想政治工作

随着人民武装组织的建立，人民武装政治工作体制也随之确立。各级人民武装组织机构内，都设立政工机构（边区武委会设政工部，分区武委会设政工科，县武委会设政工股，区武委会设政工干事等）。各级政工部门设有一定数量的政工干部，在进行政治

思想工作中，对提高民兵政治素质、民族觉悟、阶级观念、战斗意志，以及对民兵组织的巩固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对抗日战争中搞好联防，配合主力军作战，保家卫国、支援前线、参军、土地改革等起了重要保证作用。

抗日战争初期，根据毛泽东同志《论持久战》的伟大战略思想及党中央和冀鲁豫区党委关于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指示，结合当时对敌斗争情况，冀鲁豫全区普遍对广大人民和自卫队、民兵进行爱国主义、保家卫国的民族主义教育。当时的政治口号是：坚持抗战到底，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抗日爱国的农民组织起来，对日本侵略者和汉奸卖国贼开展武装斗争。在农村各阶层民主人士、开明士绅中提出：团结抗日，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枪出枪，誓与日本侵略者和一切反动组织斗争到底；持久抗战，胜利属于中国人民。

根据地建立后，敌人开始对根据地“蚕食”、进攻、“扫荡”，设置封锁线、碉堡进行烧杀抢掠。刚建立起来的村民兵组织，感到以村为单位抗敌力量不足，于是自动联合邻村共同御敌。武委会发现这个办法很好，就号召以中心村、以区或以县组织民兵联防，以多胜少，打击来犯之小股敌人。只要一村枪响，联防民兵即群起而攻之，使敌人不敢轻易出动骚扰。这对保卫群众利益、安定社会秩序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当时，根据敌强我弱的斗争形势提出：民兵联合起来，以多胜少，坚决打退小股来犯之敌；一村受害，八方支援；坚决执行联防公约，联合对敌，保卫群众生命财产。由于敌人残酷镇压，根据地广大群众对敌无比仇恨，民兵联防在各地很快组织起来。这是民兵对敌斗争的很好形式。

民兵是不脱产的农民武装，军事训练素质差，武器装备更差，只能对小股零星敌人或坏分子进行打击镇压。在残酷的抗日战争中，特别强调依靠和配合地方部队、主力军共同打击敌人。因此，对民兵经常进行“向地方部队学习”，“向主力部队学习”，“配合大部队作战时，坚决执行命令，听从指挥，完成任务”等教育。

民兵的教育训练，一般在冬闲或战争中（脱产）集中进行，总

结战例对民兵的教育更为深刻。教育内容主要是：形势教育、思想政治教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阶级教育、政策教育等。军事训练内容主要是：队列，武器使用与保养，开展神枪手运动，“麻雀战”、伏击战术等。

在战争环境中，结合政治思想工作，民兵经常开展杀敌立功运动。各民兵队制定杀敌立功考绩簿，定期评比总结，战绩显著者通报表扬，发给奖状，奖给武器弹药等。这对激励民兵开展杀敌立功活动起了积极作用。

发动政治攻势，瓦解敌伪军。根据不同时期形势变化，组织民兵对敌伪开展不同的政治攻势。如对伪军炮楼宣传“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中国人为日本侵略者卖命——可耻”，“当汉奸办坏事绝没有好下场”等，争取伪军消极应付敌人，为我所用，待机立功。在 frontline 作战时宣传我军优待俘虏政策，对日本兵唱《满江红》歌曲，使其厌战思乡。当德国法西斯战败后，我则广泛宣传“德国法西斯被打败了，你们是兔子尾巴——长不了，快投降吧”，“放下武器，投降人民，立功受奖”等等。在对敌伪开展政治攻势的过程中，广大民兵也受到了教育。

土改后农民翻身，民兵队伍得到了壮大，素质也相应提高了。在土改斗争中，广大贫雇农分得土地与浮财，阶级觉悟大大提高，纷纷要求参加民兵，保卫土改胜利果实。原民兵立场不坚定，贫雇农不信任者，予以更换。因而民兵队伍更加纯洁，政治素质得到提高，数量也有所增加。这是民兵队伍质的变化。民兵真正成为翻身贫雇农的阶级武装。民兵中的武器也调整到立场坚定者手中，使队伍更加巩固。整个土改过程就是对广大民兵进行阶级教育、政治思想教育的过程，这是巩固壮大民兵的关键。

民兵是拿枪的农民，平时，以农业劳动为主，战争需要时轮流脱产，为战争服务。因此，要经常教育民兵“生产是能手，参战是英雄”，“一手种田，一手拿枪”，劳武结合；一旦需要，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要时刻密切群众关系，决不能因手中有

枪而对群众蛮横，决不能因为参战，要求互助代耕而过分地增加群众负担。

日本投降后，发动民兵大参战、大参军。为了收复被敌伪占领的大片土地与城市，以及受降日伪军，需要大批军事力量。民兵除完成配合主力军作战，大量支援前线外，还需大参军，以扩大主力部队。当时的政治口号是：“大反攻的时机来了，好民兵要积极参加，支援前线，服务战勤”，“民兵要带头参军，当主力军光荣”，“八年抗战的胜利果实要巩固要扩大”，“没有根据地的巩固与扩大，农民既得利益就无法巩固”，“没有人民政权，便没有人民利益，人民军队是人民政权的坚强后盾”，等等。在地方党委领导及武委会组织下，在各人民团体大力支持下，按区按县组织民兵营、团，开赴前线，配合主力军作战。许多民兵在人武干部带动下，大量参军，有的整班、整连参军，涌现了父母送儿、妻子送郎上战场的参军热潮，扩大了主力军，支援了大反攻。

抗日战争后期，冀鲁豫行署发布民兵参战中伤亡残废抚恤条例，这对鼓舞民兵积极参战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二）解放战争时期民兵的思想政治工作

解放战争时期黄河又归故道，黄河南处于我军和国民党军队拉锯作战地区；黄河北处于相对稳定状态，一面进行支援解放战争，一面进行土地改革运动。由于环境不同，任务不同，因而思想政治工作内容、形式也不同。

黄河南：处于大拉锯、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的频繁战争中，国民党军大量抢掠人民财产，杀害我干部、群众，给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人民全力支援解放战争，农民的生产、生活、生命处于极不稳定极不安全的状况下，思想状况非常复杂混乱。为了稳定群众情绪支援战争，在民兵与群众中，我们集中宣传“打运动战，消灭敌军有生力量，不在一城一地得失”的道理，鼓舞群众“在困难面前，要看到前途，要看到光明；动员一切力量去争取胜利”；当

我军打了大胜仗后，就宣传“美国是纸老虎，蒋介石也是纸老虎”，“蒋军必败，我军必胜”。当刘邓大军渡过黄河挺进大别山时，我则宣传“到敌人后方去，把敌人引到后方，分散敌人，待机消灭之”。当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大胜后，我则宣传“大反攻开始了，蒋家王朝的末日到了”。这样，在淮海战役时大量动员民兵参战、支援战争勤务就容易多了，思想工作民兵也容易接受了。除此之外，还根据民兵执行任务中临时出现新情况新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思想工作。

黄河南大堤，由民兵团分段把守防护，防止国民党军和坏人破坏，实行每日24小时值班站岗，对民兵们大讲蒋介石“以水代军”，企图阻止我军前进的阴谋诡计。护堤就是战斗，对一切毁堤行为坚决打击。民兵要一面护堤一面参战，对敌探、还乡团、小股敌军坚决镇压打击。

黄河南各县在战争环境下，普遍组织武工队，一面保卫党政机关及群众安全，一面对敌作战或支援前线。黄河北各县之民兵营、团，轮流到黄河南参战。当时，思想教育内容主要是：我和敌军的战争是两个阶级两种社会制度之争，为了保卫农民翻身的利益，必须积极参战；解放军为保卫人民利益而战，为解放全中国而战，向解放军学习，配合解放军共同打倒国民党军，等等。

黄河北：当时环境相对比较稳定，一面积极支援黄河南参战和服务战勤，一面集中全力进行土改斗争。当时，对黄河北民兵和群众进行教育的内容是：战争是为了解放全中国；没有黄河南的战争胜利，黄河北的土改和环境稳定就保不住。黄河北的土改斗争胜利，大大鼓舞了民兵和自卫队的参战、支持战勤的积极性。土改中的阶级教育对民兵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也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同时，教育民兵和农民，要彻底解放必须推倒“三座大山”，消灭国民党军就是推倒三座大山的当务之急。民兵和农民认识提高了，于是自觉地进行土改斗争，积极支援黄河南参战，主动地服务战勤。

民兵的思想政治工作，完全是在各级党委直接领导下，在各级工、农、青、妇群众组织密切配合下，在人民武装政治工作体制下进行的。这是进行政治思想工作的最有效方法。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动员广大群众和民兵参战参军，支援战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配合解放军，消灭国民党军，没有强大的思想政治工作是不可能的。主力军、地方军、民兵三位一体，以根据地有高度觉悟的农民作后盾，确实体现了“兵民是胜利之本”。

五、人民武装斗争的基本经验

边区党在抗日战争中之所以能做到发展自己，战胜敌人，最根本的原因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发动群众组织武装斗争的理论原则和冀鲁豫边区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坚定地贯彻执行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战略部署，灵活运用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根据边区实际情况开展广泛的人民武装斗争。现概述如下：

（一）充分发挥人民武装的优势，铸成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

战争年代，必须首先发动群众建立武装力量，创建革命根据地；根据毛泽东同志“兵民是胜利之本”的指导思想，更广泛地发动群众，建成以主力军为核心的三种武装形式——主力军、地方军、民兵的武装力量，对敌开展全面战争。

在革命根据地里，组成人山人海的战斗集体，铸成抵御日本侵略者的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在边区发动各族各阶层人民武装起来，全民皆兵，把敌人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最后战而胜之，这是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战胜敌人的唯一有效办法。

实行主力军、地方军、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是实行人民战争最有效的组织形式。主力军是骨干，地方军与民兵则是强大的后备力量，三者有机地相互结合，对建军、作战、开展群众工

作，巩固和发展敌后根据地都是十分有利的。

全民皆兵由三大部分组成：①主力军；②地方武装；③人民武装队伍。三种武装各有优势，又各有弱点。主力部队主要是打击敌人主力而不便分散对付各零星之敌，更不能作到维持解放区的治安。地方武装只能对付小股敌人，镇压地方的反动势力。只有人民武装起来（尤其是民兵），才能担负起村村抗击敌人，维持地方治安，支援战争勤务的浩繁任务。为了有效地打击敌人，三种武装力量必须互为依托，密切配合，才能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

人民武装组织起来就是全民皆兵。根据群众的政治觉悟、阶级成份、年龄、性别而担负战争与支援战争的不同任务。以群众中觉悟最高、年轻力壮、阶级成份又好者组成民兵，可直接参战打击敌人，维持地方治安。其余青壮年人则为支援战争服务，站岗放哨，保卫黄河渡口，坚持拉锯战中保护群众，盘查敌特、坏人，缉私押俘，守库，护送伤员，指挥群众防空；组织并带领担架队支援军队作战，送粮送弹药，缝制衣服被褥鞋袜等。

民兵是不脱产的人民武装，武器较少，素质较差。为了有效地阻止敌人向解放区进攻，各村民兵联合起来共同作战（简称联防），这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是一个相对由弱变强、制服敌人的有力武器，在抗日战争时期，形成对敌伪的强大威慑力量。

（二）民兵是不脱产的拿枪农民，既有其军事性，又有其群众性，必须照顾这个特点

民兵一面抗击民族敌人，镇压阶级敌人，维持社会治安，保卫广大贫苦农民利益，同时，又是不脱产的农民。

民兵组织的发展壮大，民兵思想的巩固提高，是和农民运动、农村一切群众工作分不开的。民兵既是武装队员，又是村里工、农、青、妇群众组织的成员，农民的一切利益和民兵是直接相关的。因此，依靠与加强村党支部对民兵工作的直接领导，是非常关键的。

民兵是不脱产的农民，除战争需要临时脱产外，绝大部分时间是务农。因此必须时刻教育民兵种好田，多收粮；敌我争夺的边缘区、游击区，民兵一手拿枪，一手种田，负担是很重的，村党支部和民兵队要特别注意这个问题。敌情缓和时，要注意劳武结合，认真种好田，过多靠农民代耕是脱离群众的。民兵和脱产的人民军队不一样，他们的衣、食、住、行完全靠自己双手劳动解决，因而对民兵的政治教育、军事训练、任务安排等，均应照顾其特点。

（三）人民武装工作必须在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下，才能发展壮大

冀鲁豫区党委1942年9月1日曾明确指示：“加强支部对民兵的领导，把民兵掌握在党的领导下，是开展与坚持游击战争，结合发动群众与游击战争与建立民兵政治工作的主要关键，也是实现党员军事化的主要武器，支部应当把领导民兵当成一个重要任务”。

根据指示精神，从边区到村都设立人民武装组织。各级人民武装组织在同级党委绝对领导下进行工作。村级党支部设武装委员，直接领导村人民武装工作。这是开展人民武装工作的有力保证。

农村共产党员合乎民兵条件者，应积极参加民兵组织。冀鲁豫区党委1942年9月曾指示：民兵中共产党员要占有 $1/3$ — $1/2$ 比例。党员是民兵的核心。村民兵中的党员组成党小组或党支部。村党支部副书记兼任民兵队指导员，主要从事思想政治工作。村党支部还经常讨论与检查民兵工作。民兵中的共产党员，在民兵活动中起骨干带头作用。民兵中的武器主要掌握在民兵党员手中。

（四）人民武装体制要适应形势的需要

人民武装机构体制是随着客观需要及斗争形势发展而不断变化的，如边区武装部、武委会，先后由行署、区党委、军区分别领

导。当群众未发动起来，靠政府行政命令进行战争动员时，由行署及各级政府部门分别领导；当群众发动起来后，人民武装变为群众组织，由区党委及各级党组织直接领导；当解放战争频繁进行时，由于战争的需要，又由军分区、军区直接领导。这些及时的处理变更是适时的，所以人民武装组织形式、隶属关系服从斗争的需要，这是行之有效的作法。

冀鲁豫边区学生运动简况

陈惠敏

冀鲁豫边区在以武装斗争为中心内容的根据地全面建设工作中，党和政府一直十分重视发动青少年学生的革命运动。党领导下的各级学校为我党政军群系统培养了一批干部战士。学生运动的广泛开展为巩固和发展边区抗日根据地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适应形势的发展，恢复和新建中小学校

1940年10月，鲁西行署制定了《国民教育计划》。1942年6月，鲁西行署又发布了《鲁西目前文教工作实施方针》、《鲁西教育宗旨和实施原则》。1943年7月，冀鲁豫行署发出了《加强中学教育的决定》。根据这些指示、决定，边区各县尤其是中心区各县，一村或联村建立了初级小学，一县建立了若干处中心小学、一两处完小或抗属子弟高小，使大批辍学的少年儿童获得了受教育的机会。

中等学校也逐步发展起来，最先成立的是鲁西筑先抗战学院。1939年初，经鲁西区党委决定，在聊城政治干校基础上成立了鲁西筑先学院，但不久即停办。1940年春，在鲁西行署直接领导下，重建了筑先学院（内设中学部、师范部），随后又相继建立了若干中等学校；4月冀鲁豫边区抗日联合中学成立；12月在单县建起了湖西中学。1941年初，在鄄北成立了鄄北中学。1942年初，在鲁西北成立了卫东中学（1943年底鲁西北划归冀南）；同年底，在鲁西南成立了齐滨中学；泰西中学也于是年冬在泰西建立。

适应战争形势和培养干部的需要，边区学校的建制多次变迁。它们的教育方针是：把学生培养成为有民族觉悟、有民主思想、有知识技能、能担负起抗战建国任务的战士和建设者。学校的招生对

象，除在编高、初小学生，知识青年和小学教师外，还招收了不少已参加工作的青年战士、文工团员和青年干部。我就是1940年底经组织批准，离开工作岗位，到筑先中学部学习的。中小学生学习年龄普遍偏大。中学生一般是十七八岁，少数二十几岁和十五六岁；高小学生一般十五六岁。所以，中学和高级小学都建立了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的群众组织——学生抗日救国会，为学生运动的深入开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下边就凭自己的记忆对1940—1944年边区学生运动作片断回忆。

二、筑先抗战学院学生会

根据地的中等学校，都是以八路军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为榜样，办抗大式的新型革命学校。筑先学院一直随同抗大一分校进行活动，更是处处向抗大学习。学生按军事化编队和管理，全部穿军服，配备有自卫武器。以班级为单位，编为区队，下设若干分队。全院编一个大队，由军事大队长（兼军事教师）统一指挥。学生会的工作，也以抗大校歌所倡导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艰苦奋斗、英勇牺牲”十六字校风，作为自己活动的规范。

（一）学生会的组建和发展

筑先学院学生会是在学院重建大约半年后组建的。先是像抗大各学员队一样，成立了一个救亡室，推选主任和委员若干人，统一组织学员的课外活动。一年级学员董凤鸣（现名董克夫）担任救亡室主任。1941年初，在鲁西青救总会的指导下，建立了筑先学院学生会，救亡室随告结束。自学生会成立到1942年底毕业离校，我担任了两届学生会主任，罗英（现名罗英朝）任副主任。

学生会的宗旨是：团结全体学生，为抗战建国，坚持在敌后游击战争环境下学习，把自己培养成有爱国主义思想、有知识的抗战建国的革命战士。学生会的组织按民主集中制原则，实行委员制的集体领导。委员会设主任和专责委员若干人，组织全院学生开展各

种课内课外的学习等活动。

1942年初，筑先学院中学部扩大到3个年级4个班的编制，学员近300人。第一届学生会任期满，要进行改选，组织第二届委员会。为便于工作，先以班级为单位，成立学生会分会，再开全院学员大会，选举产生院学生会第二届委员会。

（二）学生会的活动内容和方法

学院历届学生会都开展了许多工作和活动。它的主要任务是协助学院做好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执行学校的教学计划，开展各种课外学习活动。其经常工作有如下几点：

1、贯彻教学计划，组织课外复习。学生会的学习委员，除协助各科任教师检查督促语文、史、地、数学等课程的复习作业外，着重抓政治理论课和时事政策课的复习讨论，这也是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重点问题还要组织联组或班级大讨论。现在印象深刻的有两次：一是唯物史观课的重点讨论，是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一是新民主主义课的重点讨论，共产主义同三民主义的区别是什么（包括新旧三民主义的区别）？这两次大讨论，都是在教师指导和学生会协助下，全班学员有准备地展开了几天的大辩论，最后归结到课文的正确结论上来。参加讨论的每个同志都受到了深刻教育，提高了做人民公仆、为民族民主革命献身的觉悟。出版墙报，交流心得，是由学生会组织的，也是课外复习的一种形式。当时有两种墙报：一是围绕课程复习的学习墙报，一是重大节日的纪念庆祝的墙报。各班都推选了语文水平高的同学办报。满丰（“九二七”反“扫荡”中牺牲）、杨子远、徐金宝、范新平、邹玉明（现名丁曼）等都是编辑组的骨干。开始一段时间，投稿者用几页纸写好粘在一起，贴到一块布面上，在墙上挂起来。以后办报水平高了，就将稿子集中起来，由编辑组设计好版面，请擅长书画的同学书写大小标题，绘制报头，办成图文并茂、非常醒目的墙报。各班墙报都有自己不断变更的报名，如“火炬”、“熔炉”、“锻炼”、“号

角”、“突击”、“挺进”、“海燕”等。

2、开展各种文体活动。学生会的文娱、体育委员的工作，就是按照同学们的不同志趣，根据可能条件，组织多种多样的文化娱乐和体育活动。

唱救亡歌曲，是最普及最经常的文娱形式，也是最有效的宣传鼓动。和抗大一样，我们筑先学院学员也是走到哪里，唱到哪里。上早操、日常点名、饭前、课前、开会、集合都唱歌。各班组织有歌咏队，他们是先去抗大文工团学新歌，再回到班里教唱，班级开展歌咏比赛。大集合时，同抗大各学员队互相拉拉唱歌。经常唱的有《抗大校歌》、《八路军进行曲》、《游击队歌》、《跟着共产党走》、《青年进行曲》、《冀鲁边进行曲》，以及《黄河大合唱》中的几段曲子。我们当时不仅口唱其曲，而且心领其意，从中受到教育，大大激发了我们爱国主义热情，坚定了我们抗战到底的决心。

体育活动，当时以田径、篮球、排球、单双杠为主。各班都组织了多种体育锻炼小组。全院组织了一个篮球校队，从各班选拔身强力壮、球艺较高的球员组成。其中孔祥（现名赵长文）、杨耀久、张宗武、程永康、王正兰是校队的五员“上将”。这个球队，除同抗大军事队球队比输球多些，同不少球队比，包括行署、军区球队，都是常胜的。筑先学院大约在1941年秋冬间组织过一次运动会，进行了各种体育比赛和射击、投弹、班排攻守等军事技术比赛。各项比赛，都进行了严格的评奖。

学生会还从各班选了一些爱好文艺的同学，大约30多人，组织了一个名叫“海燕”的业余剧社，朱克华任社长，吴广新任导演。为提高艺术水平，除就近请文工团给以指导外，1942年春节还去野战军前锋剧社学习过一个多月。经过学习提高，他们逐步能演些街头小剧，并能按剧本演出多幕剧。1942年五四青年节时，以海燕剧社为主，组织了一场丰富多彩的文娱晚会，演出一个名为《狱》的剧和其他一些小节目。此外，也曾同抗大文工团共同组织过两校联

欢晚会。

3、监督师生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学生会民运委员的经常工作，就是每到一驻地，即督促大家清扫街道、院落，给房东、抗属和老弱孤寡打水，做家务劳动，并带领标语组刷写新标语。每次行军前，民运委员带领检查组到各家房东检查群众纪律，检查结果随时评比，在队前表扬和批评。以上这些，当时已形成了一种制度。被同学们称为“民运疙瘩”的郝振绪，曾连任院学生会的民运委员。每年麦秋两季农忙，学校都是全体总动员，停课帮助农民抢收抢种。每年秋冬之交一次全民性的破路活动（挖新交通沟或整修旧交通沟），学校也是全部停课出工，参加突击破路。在以上两项活动中，学生会的任务是协助院部做好思想动员，组织劳动竞赛，鼓舞劳动热情，圆满完成任务。

4、协助司务长搞好伙食。学生会生活委员的经常工作，就是参加伙食委员会，随时反映学员们对伙食的意见和要求，帮助司务长出主意、想办法，在物质条件困难的情况下，尽量改善伙食，让大家吃饱吃好。另外，就是组织学员轮流值班帮厨做饭。我们许多同志都学会了烧火、焖小米饭、炒大锅菜。

5、列席院务会议，监督学校工作。学院领导很重视发扬民主，联系学员群众，为此，吸收院学生会主任列席院务会议，班分会主任列席班务会议。这在臧君宇任副院长主持工作期间，定为一条制度，通过这个渠道，随时倾听学员的呼声，以检查改进各方面工作；也通过这条渠道，将院部和班里的重要决议随时传达到学员群众中去。记得曾发生这样一件事，中学部三年级的一位级任教师，因一名学员一再答错问题，罚他围着一个打谷场跑步，答不出问题不让吃饭。这种封建体罚的管理方法，引起师生的不平。院学生会知道后，非常气愤，非要拉着这位教师去院部讲理，并开会斗争了这位教师。这一方面表现了我们争取民主权利的勇气，另一方面也表现了我们年轻幼稚，不讲方式方法。还是院领导出面做了工作，说服教师承认错误，同时教育我们学生会干部，照常尊重老师上

课。体现根据地青年学生民主权利的还有一件事，即1941年秋鲁西、冀鲁豫合并后，召开边区各县代表会，选举新的行署领导人。我曾荣幸地被推选为学生代表，同王克、杨泽江、黄文、冯克等青年代表一起，出席了会议，投了庄严的一票。

（三）学生会的领导关系

筑先学院学生会是始终在鲁西青救总会、冀鲁豫青联总会领导下工作的。体现其领导作用的方法有三条：一是吸收筑院学生会干部参加有关会议；二是发给筑院学生会有关的文件；三是负责人写信指导我们的工作。同时筑院领导也有专人分工指导学生工作，教导主任高衡（已病故）和党支部政治指导员沈建图（1955年飞机失事遇难），随时给我们具体指点和帮助。

（四）筑院学生工作的一个短暂插曲

记得1941年春学生会成立不久，又仿照抗大朱德青年队，在学生中组织了一个“民先”式的青年先锋队。青先队在党支部领导下工作，青年委员孔祥任队长。学员中的党员、党员发展对象、学生会的活动分子作为第一批队员，大约30多人。只活动了几个月，根据区党委张承先的指示：为广泛团结青年学生，应充分发挥学生会的作用，不要另成立“民先”式的少数人的青年组织，青先队就不声不响地解散了。

三、边区学联筹备委员会

鲁西、冀鲁豫两区合并时，在濮范观中心区已有筑先学院，边区联中和鄄城中学等几所中等学校，以及中心区各县完小或抗属子弟高小，都建立了学生救国会。这样一支发展着的青年学生队伍，引起了各级青联会和教育部门的重视。为便于对学生运动的统一领导，这些部门已在考虑着手加强学生会的工作。

（一）学联筹备委员会的发起和筹备过程

1941年秋冬间，边区青联总会召集中心区几所中学学生会代表举行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边区联中的吴建模、马冠堂，鄞城中学的常邦国，筑先学院满丰（还是罗英？记不清了）和我。青联总会主任王克主持了会议。会上交流了各校学生会工作情况，讨论了如何加强各校学生会之间的团结和联系等问题，选举成立了边区学联筹备委员会，推选王克兼任主任，我是副主任。最后商定了如何着手进行边区学代会的准备工作。这次座谈会和边区学联筹委会成立情况，由纪登奎整理了一个文件，印发到各级青联会和各中小学校学生会，并抄送各级教育部门。

第一次筹委会会议后，又连续开过几次会议，讨论了学代会召开的时间，具体筹备工作的分工。议定边区第一届学生代表会于1942年3月18日（即“三一八”纪念日——1926年北洋军阀镇压北京学生运动的日子）召开。参加筹备会的几个单位的学生会，分工起草学代会文件。筑院学生会负责起草边区学生联合会组织章程。会后我曾就此请教过高衡同志，请他介绍了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情况和北平学生联合会组织章程。在他的具体指导下，我写出了边区学联组织章程（草案）草稿，还专程到青联总会就草稿征询过意见。

由于根据地战争环境日益艰苦，财政经济日益困难，各级党政军群机关都在贯彻党中央精兵简政的指示，注重抓好基层工作，故学代会未能如期召开。在以后近3年时间里，青联总会就通过学联筹委会来推动学生会工作。1943年，我和运西中学学生会干部苏本善（在解放战争中牺牲）先后毕业调到青联总会做学生工作，至1944年秋又先后调离做其他工作。这年年底，召开了边区学代会，成立了边区学联，边区一中在校学生胡少荣任主席。

（二）学联筹委会3年的主要工作

学联筹委会建立后半年内，进行了学代会的具体准备工作。学

代会延期后，就转入以团结教育为主要内容的经常性工作。3年中，组织或参与组织了以下几项活动：

1、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宣传教育。战争年代，一切服从于革命战争的需要，一切为了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因此，进行爱国主义宣传教育，就是学生会第一位的工作。动员组织全体学生学好政治理论和时事政策课，是最现实最有效的爱国主义教育。根据地中小学都把政治时事课列为主要课程，不仅注重课堂上学，还特别注意学习报刊上重要文章，请各级党政军领导同志做报告。学联筹委会曾交流了这方面的经验。黄敬、晁哲甫、董君毅（段君毅）、杨得志等边区一级的领导人曾亲自到筑先学院、边区联中、边区一中和抗大陆军中学视察，向师生做政治报告；张承先、戴晓东和其他一些专区级领导同志也曾到自己所辖的二中、三中、四中做过报告。学生会对这些领导同志的报告，都认真组织学习、讨论，从而提高了对当时国内外形势的认识，明确了自己的斗争方向。学习先烈的英雄业绩，更是形象的爱国主义课。各校学生会都充分利用报刊上登载的抗战烈士的事迹，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学联筹委会也传播这方面的做法和经验。当时影响大、教育深的是向左权将军学习；还有1943年10月在鲁西南反“扫荡”战斗中牺牲的分区司令员朱程、专员袁复荣，1944年2月在鲁西北病逝的回民支队司令员马本斋，学联筹委会和各校学生会都组织认真的学习讨论。利用纪念日或庆祝节日，也是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的课堂。每年“五四”、“一二·九”，还有九月某日的国际青年节，各级青联会和各校都举行纪念活动。学联筹委会也发过纪念青年节的通知等。各校按照青联、学联筹委会的布置举行纪念活动，进行街头宣传，从中接受生动具体的爱国主义教育。

2、引导学生端正学习态度。学联筹委会曾针对当时各校学生中在学习动机和方法上存在的偏差，组织过一次端正学习态度的大讨论。问题首先从筑院反映出来。当时筑院学生中曾出现过所谓“课外派”、“课内派”的争论和分歧。担任学生会职务和区、分队长

职务的一些活动分子，有的轻视某些文化课如代数、物理、外语等的学习，认为战争年代学了也用不上，被称为“课外派”。而有些什么职务也不担任的同学则是所谓“课内派”，他们中某些人轻视政治学习，甚至有厌恶课外活动的情绪。这两种倾向显然都是错误的，在其他学校也有程度不同的反映。青联总会负责人认为这是学风不正的表现，便组织学联筹委会进行了一次专题讨论。王克在讨论会上做了题为“为什么学？学什么？怎样学？”的长篇总结性发言，正面地阐明道理，批评了错误观点，在当时有很强的针对性和说服力，使参加讨论的同志深受教育。会后经过整理将这个发言印发到各校学生会。筹委会又发动各校学生开展了一次端正学习态度的大讨论，使原来的分歧趋向一致，学习态度得到端正，加强了学生间的团结。

3、加强各校学生间以及同校外青年的大团结。通过学联筹委会这个纽带，建立起各校学生会之间的联系。筹委会曾有组织地在各学校间互派代表观摩访问，有条件的还组织了联欢活动。通过学联筹委会组织的这一活动，增强了各校学生的友谊。还有一件明显的事例，1943年边区教育界选举参议员，筑先中学、运西中学、濮范中学、财校一分校，各提候选人1人，从4人中竞选1名参议员。在竞选中发生了分歧，个别教职员相互攻击，产生了很不好的影响。学联筹委会对4校学生会干部进行了工作，通过他们做4校学生的工作，收到了良好效果，4校学生的友谊没有因此受到影响。同时，在筹委会倡导下，各校学生会都主动利用帮助农忙、办冬学以及利用各种节日文体活动，加强同农村青年、机关和部队青年的联系。

4、积极参与组织边区青年大联欢。1944年五四青年节时，在范县龙王庄举行了一次规模盛大的边区各界青年大联欢，边区党政军领导同志黄敬、宋任穷、杨勇、徐达本主持了开幕式。这次活动的主要组织者是边区青联总会和行署教育处，学联筹委会也做了一些工作。具体参加筹办的有青联总会王克、苏本善和我，以及行署教育处高敬如，运西青联分会王黎之，运西专署教育科长黄居易（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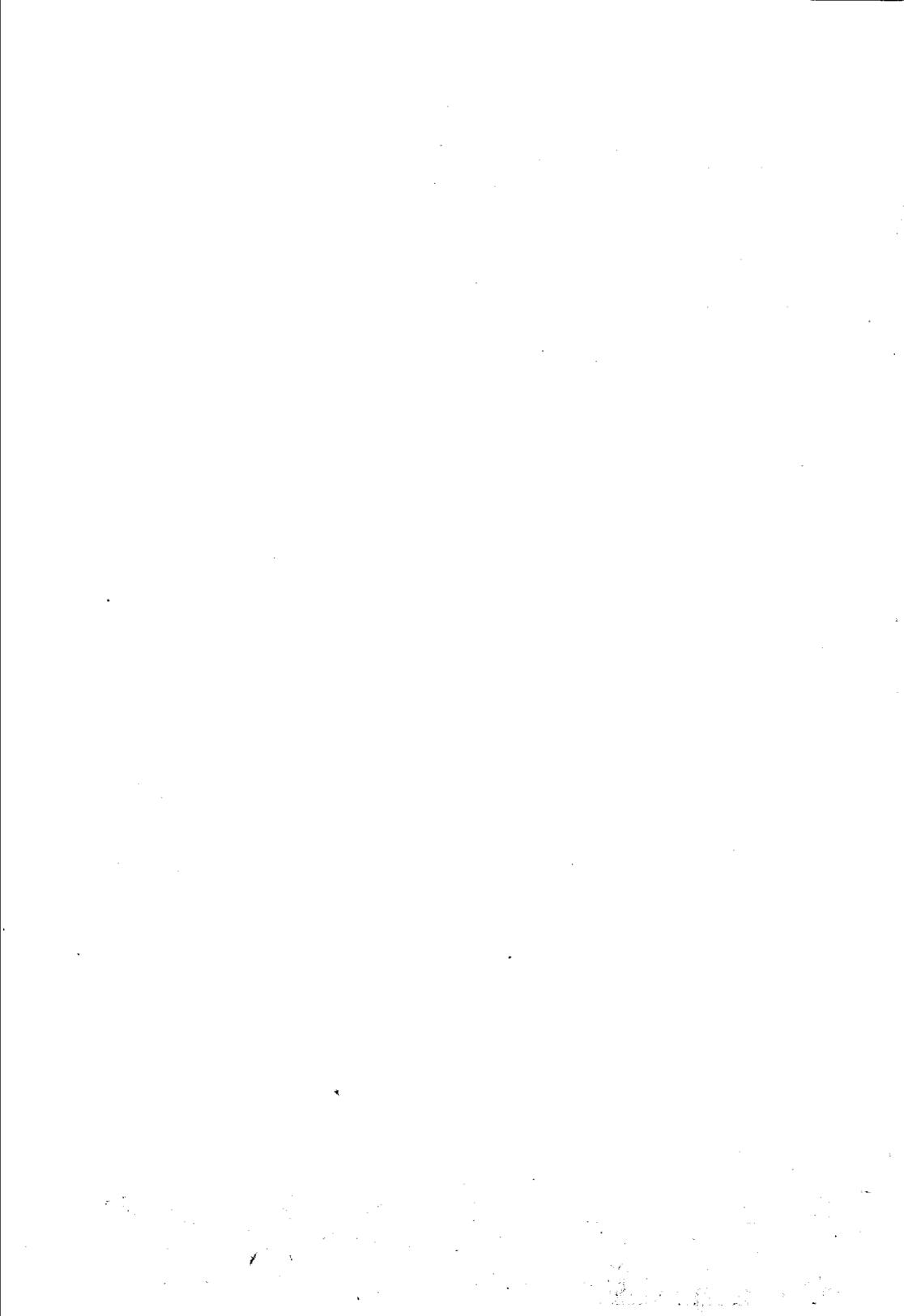
也是活动的最早发起人)，还有濮、范、观、鄄、郓各县青联主任、教育科长。驻中心区的各中等学校、中心区各县完小、抗高的高年级学生，以及驻中心区的边区一级、专区一级机关青年、部队青年，中心区各县部分青抗先队员、青救会员，共约五六千人参加了大联欢，历时五六天。会前各中小学进行了时事政策测验，会上公布结果，会中进行了各界青年间的体育比赛、文艺会演。部队青年和青抗先还进行了军事技术表演。报纸对此进行了大篇幅报导。这次活动，有效地促进了各界青年的团结，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三）学联筹委会的领导关系

以各校学生会为团体会员的学联筹委会，它本身又是青联总会的团体会员，接受青联总会的直接领导。学校专职干部属于青联总会的编内干部。学生会工作的大政方针，由青联总会制定，会议由青联总会召集，文件由青联总会印发。

学联筹委会的工作，也得到行署教育处的直接指导。筹委会一些大的活动事前都征得教育处的同意。我们曾多次向管振秋、张维之处长请教工作。高敬如科长也给我们多方面的具体帮助。

学联筹委会的工作，得到各个学校领导同志的大力支持。筹委会经常联系的筑院、联中、筑中、运中和一中，这些学校的主要负责人如筑院的臧君宇、高衡，联中、筑中的卞慎吾、李玉慈，运中的阎训、官钧民，一中的王化云、张叔诚（已故）等，他们都是战前学生运动的前辈，又是当时边区学生运动的热情赞助和支持者。他们的大力支持使学联筹委会工作得以顺利进行，也给边区学生运动以有力的推动。



鲁西区党委关于群众工作 宣教工作的报告（节选）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二日）

群众工作报告之二

一、鲁西群众的落后性。鲁西是一个交通蔽塞、文化落后的地方，先是张宗昌的压制，后有韩复榘的统治，这中间虽然受过汹涌澎湃1925至1927年大革命的洗礼，就是说在当时虽然组织过什么农民协会、妇女协会，但那究竟是牌子，官办的，和整个的革命一样，群众被当做国民党员升官发财的工具而出卖了。那些群众组织好像昙花一现的就过去了，以致鲁西广大的群众仍然是落后、封建与黑暗的境地。

二、政工人员与鲁西的群众工作。事变后从济南来的政工人员，一到鲁西便分发到各县成立政训处驻各县办事处。办事处的工作主要的是配合行政当局开展群众运动，动员群众。办事处本身更利用画报、讲演的方式作一般的宣教工作，同时更派个别同志到各区武装及民团中工作，主要的是推动封建武装到抗日的路子去。这当然是偏重于武装工作，同时以政训处公开合法的名义来组织群众。不过由于当时鲁西形势的不稳定，主要的工作是进行下层统战工作，争取豪绅地主，推动封建民团抗战。如在南镇战役时的高唐民团王子范部，茌平民团池宗安部，都是政工人员发动的。少数的县份里也有群众组织，茌平、博平都有青年救国团的组织。

三、有历史意义的政工人员大会。〔民国〕27年5月初在聊城召开了全鲁西政工人员的大会。这个大会是有历史意义的。当然在争取范推动范的进步，在统战工作上，在政权工作、武装工作都有

了大的收获，尤其在群众工作来了一个彻底的转变。就是在这个会上总结了过去的工作经验教训，并特别提出群众工作的重要，并详细的布置了以后的各县具体工作。从这个会议后，各县政训处以动员群众组织为中心工作，各县都是自上而下的组织妇女、青年、儿童、农民，各种群众组织都统一在政治部领导下。

四、动委会的成立与政治部各县办事处的撤销。根据国民政府颁布的法令，动委会是敌后方动员民众、组织民众总的领导机关，是公开合法的东西。当时顽固分子对各县政治部不仅工作上常常发生磨擦，而且攻击不遗余力。为着对他们在形式上让一步，为着求得工作上更好的开展与更大的开展，便在8月1号自动的撤销了各县办事处，而集中力量作动委会的工作，就是经过动委会来动员群众。

五、群众工作视察团。为着广泛的组织群众、动员群众，为着督促检查各地群众工作，经过总政治部组织群众工作团，首先到了阳谷，帮助阳谷同志在动委会中取得领导地位，帮助阳谷县青年救国团争取公开合法地位，和三青团斗，并撤换了朝城办事处干事，健全了朝城的领导机关。视巡〔察〕团是以县为单位，这样在开展群众工作上起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

六、前方政治部的设立。在8月中旬范司令袭击济南的时候，长清、齐河的老百姓一方面由于过去没有组织，没有施行民族教育，一方面被汉奸利用，同时范的部队纪律不好，以致老百姓组织红枪会，不仅阻止了袭击济南，而且与部队直接冲突。在平东部，齐河、长清西部，当时红枪会声势相当浩大的，几次发生了与军队武装冲突大流血的惨案。政治部配合着范对济南的军事行动，组织了前方政治部，经常在潘店一带工作。前方政治队办了几期青年干部训练班（在潘店一带），成立了妇女、青年、农民各种救亡团体，长清、齐河一带半汉奸化的广大群众实施了武装教育，调剂了军队与群众的关系，部分的组织和教育了群众。

七、在对济南军事行动的过程中，一方面暴露了范的部队纪律太坏，一方面暴露了广大群众的没有组织。在好些血的经验教训

中，就是在好些接近敌伪的地方，群众组织起来直接与我们的部队冲突，在好些地方老百姓反作了敌人的耳目，带领敌人打范的队伍。所以范在对济南军事行动之后，深深感觉到组织群众的必要。所以范回来马上召开县长联席会议。在县长联席会议上，范令各县县长在一个月內把各县的群众全组织起来。虽然不久即遭到了聊城事变，但范对群众工作重视和号召，在那短的时期是有相当意义的。

鲁西的群众工作是经过政治部、动委会，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开展起来的。关于各种组织和具体工作是这样：

（一）农民互助会

这是农民的基本组织，也是当时群众工作中的中心一环。组织的方式是自上而下的发动，自下而上的配合。当时各县的工作具体情形是这样：

1、冠县农民互助会。冠县是受水灾匪灾最厉害，人民受的痛苦也是最深的。冠县地方党首先抓紧群众的需要来组织劳苦群众互助会，所以冠县农民互助会的成份是相当纯洁——多劳苦贫农，一产生即是斗争的，首先和行政当局斗争，其次和豪绅地主、顽固分子斗争。当时县政府认为群众自动组织起来请愿，改选乡村长，逮捕汉奸、土匪等是危险的。豪绅地主、顽固分子更加造谣，认为互助会是共产党组织起来，就要分地均粮等。不过由于基础的巩固而终能战胜谣言，克服一切困难，组织扩大起来。后冠县农民互助会县总会以下各区都有支会，乡村分会也都相当的普遍。据去年9月份统计，全县互助会人数共13万，占全县人口大多数（全县为20万）。互助会所作的工作主要是改善人民生活，实行五—减租、分半减息，反对平均摊派（给养捐税……）。其他像动员新战士配合主力扩军、募捐等工作也都作了一些。同时，在互助会底下有直接领导的武装——农会特务队（人数30余）。这一地方武装不仅起了掩护地方工作的作用，而且在锄奸清匪、维持地方治安更起了相当大的

力量〔作用〕。后来这一部分武装扩大为卫河支队，形成卫支的骨干。

2、莘县农民互助会。莘县农民互助会完全是经行政的发动——县政府与动委会的上层号召才组织起来的，基础不是完全建筑在劳动群众上，以致成份复杂，村分会会长还有些地主村长及流氓。后来全县农会发展到5万会员，由于缺乏斗争，形成了自上而下的官办和组织的不健全。当聊城失守，县政权被顽固分子摧毁，农会亦顿形瓦解。

3、博平农民互助会。博平首先在城西成立了博西农民互助会，发动了向富户借粮的斗争，但组织仅限于10数村。后来虽然城内建立了总会，但由于干部问题，博平农会始终未能普遍的组织起来。全县会员人数共4000余人，博平失守后，农会随之瓦解。

（二）妇女工作

妇女工作在鲁西并没有普遍深入的开展起来，只是以各县政治部为中心，把城市〔内〕的妇女组织起来。但临清的妇女救国会在各个群众团体里边起了先锋作用，在和顽固分子——国民党指导员谢灿章、汪伯言作斗争〔中〕，她们更积极的起了领导作用。冠县的妇女工作比较深入，村分会共建立30余处，会员共4000多。其次莘县、馆陶、博平、茌平妇女工作也都有有一些，但都未能深入。各县妇女救国会的工作一般的是发动慰劳、募捐，帮助军队制棉衣、鞋靴等。四区（鲁西北特委）由于长期的被顽固分子统治，以致群众工作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除去临清的妇女救国会起了相当作用外，在临清乡下只有少数农会的组织。濮县也在顽固分子的统治外，几次成立农民救国团，终未公开，组织亦未能普遍。

（三）回民工作

鲁西（包括四、五、六两区）的回民散布的区域只八九县，人数最多的县聊城、临清、丘县、冠县、朝城、莘县、恩县等7县，人口

约计七八万人，于〔民国〕27年7月间，以六区政治部□□组织朝城、临清、冠县、丘县等4县的回民群众。各县具体情形是这样：

1、朝城：回民分布在城内和城北张鲁镇一带，于去年5月间，由六区政治部的工作同志将该县回民抗敌救国会组织成立，会员约计1500人以上。当时准备以该县为基础，发布抗战行政纲领与成立宣言，号召组织全鲁西的回救团体，动员全鲁西回民群众参加抗战。该会由我们同志领导，总会以下设分会，分会包括若干小组，内部组织有总务、组织、宣传、民运、生活改善、武装等部门，并有主席一人负总责，更有一小部武装作为该会的武装部分。这一个团体组织后，曾发动过要求县长彻底开放民运的斗争和反贪污（张鲁镇的警察局长）的斗争，但以其他困难条件，都未能彻底胜利。后因在朝〔城〕负责回运的同志被调与县长对该会的破坏与镇压，所以目前已名存实亡。

2、临清：临清回教的成立也在去年秋季，人数约计2000人，大部在市内与卫河西岸。组织的情形与朝城相似，但文教工作比较好，经常有20余人代表回教宣教部在省间与会内进行宣教工作。今年秋有一次全体会员参加了拥范（范筑先）反胡（胡学仁）的示威运动，在临清曾有一度的政治影响。但以后经过胡专员的破坏与威胁，加之以敌之“扫荡”，该会未能长期坚持而终归消灭。

3、冠县：朝、临回教相继成立，冠县亦经当地同志组织成立，会员未详，但因干部缺乏，内部工作一直未能建立。

4、丘县：回民都集中于城东南陈村一带，于3县回教成立后，该县亦相继成立，会员约计1000人以上，一般都能站岗放哨，作盘查行人的工作。但于聊城陷落后，在敌人的“扫荡”下，也未能继续存在。

聊城失守后的群众工作

聊城失守后鲁西的形势是一个极端紊乱现象，到处是溃兵土匪

和敌人的骚扰。范司令牺牲了，各县县城失守，有的是顽固分子和我们更加对立了。过去支持群众工作的机关——各县动委会也被解散了。各县群众组织有的是陷于极端秘密和困难的环境中，如茌、博、阳、聊一带，有的是被顽固分子直接解散了，如莘县、朝城等县。馆、冠两县虽然是我们活动的区域，也是由于形势的紊乱和群众情绪的恐慌，群众团体也无形中消沉下去。后来我们改用在各县组织八路军工作团直接掩护工作，尤其是支持群众团体，但遭到顽固分子的造谣破坏，也先后解散了（濮、范、聊、阳）。

经 验 教 训

一、从和平状态中组织的群众是没有力量的。在聊城未失守前，鲁西组织起来的群众总数为30万，但多数是未经斗争的，不仅是对领导战争没有受到战争的锻炼，□本身的斗争都是很少的，都是由各县政治部、动委会或经过政权的系统组织起来的，再加上教育的不够，生活的不健全，群众没有彻底的认识，以致战争一到来，形势一紊乱，便无形中瓦解了。

二、开展群众工作在方式上固然一面由上层的号召，主要的还靠下层的发动与民众生活的改善，启发群众的自动性，造成改善与参加抗战的热潮，这样才会有力量。过去鲁西群众工作多半是靠上层的号召，群众生活未能真正改善，以致战争一到，便无形瓦解。

.....

在鲁西区党委 民运工作会议上的报告

(一九四一年二月)

张霖之

第一部分 鲁西群众工作的检讨

一、从去年2月区党委第二次扩大会议到9月区党委活动分子大会

(一)去年2月区党委第二次扩大会议，有划阶段的意义，为了巩固党与深入群众工作，强调的提出了群众斗争，严格的反了右倾，但没有明确的具体的提出防止“左”的办法，而在“左”的支配下，开展了群众斗争。因为这些斗争是在“左”的支配下发动起来的，所以只是一时的呈现了群众运动的表面活跃。去年5、6月的群众运动，就是这种表面活跃的典型。

(二)各级党对党的路线研究的不够，掌握的不稳，而在群众运动中又犯了严重“左”倾错误。群众团体随意捕人、罚款、处决案件，到处盛行着开“公审大会”和戴绿帽子游街。在某些地区，并发动了租地借粮斗争，以致社会秩序紊乱，破坏了社会统战，使社会上大多数群众不满意我们。某些地区，就在这种“左”的行动中，使工作受到了严重的损失，而陷于消沉与垮台。

(三)由于群众运动中的“左”的支配，所以在领导上及工作方法方式上是强迫与命令，而以自己的愿望代替群众的要求。在群众团体并存在着严重的“宗派观念”与“行会色彩”，因此群众团

体没有巩固的基础，只是一种虚浮的形式的群众组织，经不起任何的挫折与打击。在今天，群众运动的消沉与群众组织的减少，是没有什么奇怪的。

（四）在这一个时候，区党委虽然曾经在文件上与口头上，对这种严重的“左”的错误提出纠正，但当时还没有引起我们全党同志的注意，到了8月才开始纠正这种错误，9月区〔党〕委活动分子大会上才提出“具体深入、系统细密”的新作风。从此以后，群众运动就转入了另一个阶段。

二、从去年9月区党委活动分子大会到现在

（一）在去年9月区党委活动分子大会上，对鲁西群众工作提出“具体深入、系统细密”的新作风，并严格纠正了“左”倾错误，同时由鲁西主任公署颁布了保障人权条例。

（二）自从新作风提出后，一般的群众工作干部开始深入下层，并着手整理与巩固村级组织。在这一方面虽然〔取〕得显著的初步成绩，但认真深入群众工作还是非常差的，这可以说是“深入乡村而没有深入群众，深入群众而没有深入工作”。

（三）自鲁西主任公署颁布了保障人权条例后，各地又呈现了右的倾向。在政权工作方面，不敢大胆的镇压汉奸及反动分子，以致在某些地区汉奸半公开的活动，反动分子大造谣言，极尽其挑拨伎俩。

在群众工作方面，也严重的表现着这种错误。首先表现在整理组织上，在许多地区，曲解群众组织的自觉自愿原则，放弃了教育与政治动员。部分干部主张取消所有原有组织，重新征求会员。这是一种因噎废食的办法，是要不得的。其次表现在领导上，在各地地区，放松与放弃了群众的反汉奸反顽固分子的斗争及群众中合法合理的民主民生的斗争，致使群众运动陷于消沉，有的垮台。

（四）各级党及群众团体的党团，对9月活动分子大会所提出的关于群众工作的方针与方向局部化，于是放弃斗争，实行和平整

理。总结起来说，鲁西群众运动常在“左”右中摇摆，是形成今天群众工作不深入的主要原因之一。

（五）由于以上的错误，妨害了群众工作的深入与巩固，所以在这次敌人残酷的“扫荡”中，暴露了我们群众工作的严重弱点。这是值得我们鲁西全党同志高度警惕的——没有群众的支持，我党就没有物质基础！

第二部分 今后的工作

一、工作方针

今后鲁西群众运动的总方针，根据过去的检讨及山东去年联救大会决议的精神与目前的需要，应当是开展合法合理的群众的民主民生斗争，以深入工作，巩固既有组织，发展新的组织。这是一个比较长时期的方针。

二、深入群众工作的几个原则问题

（一）全党同志首先要认识，我们此次在反“扫荡”中暴露的严重弱点，就是没有能够动员起广大的群众进行反“扫荡”斗争——政治的军事的与物质的，因此也就未能获得更大的胜利。其中固然有许多原因，但是最基本的问题，就是我们的群众组织不巩固，工作不深入，没有能及时的解决基本群众的切身痛苦，没有把基本群众组织起来，所以也就未能动员起群众的伟大潜力，以更有力的粉碎敌人的残酷“扫荡”。这就是我们此次反“扫荡”斗争中的最大教训。鲁西全党同志应当高度的认识到这一点，警惕自己。

（二）克服此种严重弱点的中心关键——就必须鲁西全党同志认真的切实的去领导群众进行合法合理的民主民生斗争，以合法合理的群众的民主民生斗争去深入工作，整理与巩固既有组织及开[发]展新组织，在合法合理的群众的民主民生斗争中去锻炼群众、教育群众与武装群众，以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用群众力量

去打击敌寇、亲日派、反共派的联合进攻，并应付全国性的突然事变，在任何困难的环境下坚持阵地。这就是我们鲁西全党同志的严重任务。

领导群众的民主民生斗争，是为了解决基本群众的切身痛苦，改善其生活，提高基本群众的抗战热忱，进而把他们组织起来、武装起来。不在群众的民主民生斗争中去进行整理与巩固既有组织，深入工作，则巩固组织、深入工作的口号是空虚的无力的口号，结果还是深入不了工作，巩固不了组织。开展群众的民主民生的斗争，是深入工作与巩固组织的有力武器（关于这一点，在具体工作中还详细谈）。提出民主民生的斗争，就有些工作同志把民主民生斗争与参战脱节，忽视甚至忘掉参战工作，这是不对的。在前边曾谈到，解决基本群众的切身痛苦，改善其生活，就是为提高抗战热忱，发挥抗战力量。也只有在群众的民主民生斗争中，才能使群众更深切地认识到，非武装自己把鬼子打出中国去，不能求得自身之彻底解放。

现在为什么又提出合法合理的斗争？这是因为过去只提斗争，结果是在“左”右错误中摇摆，斗争不能纳入正轨，所以才提出合法合理的斗争来。什么是合法？是说一切斗争要不超越主任公署法令所允许的范围。它的标准是：①斗争不侵犯政府的权限；②斗争不破坏政府的行政；③斗争不代替政府。过去所领导的租地借粮斗争，拔烟苗、折烟袋杆的斗争，都是不合法的。减租减息、实行合理负担等斗争则是合法的。

什么是合理？它的标准是：①斗争能得到社会上大多数群众的同情与赞助；②斗争不破坏统一战线；③不超越现实。如过去在××县，儿童团团员由于他爷爷干涉其行动，就把他的爷爷当顽固分子，并叫他爷爷老同志，以争取政治上的平等。这种斗争是不对的，所以也就是不能得到社会大多数群众的同情。社会主义是真理，但在目前中国就把社会主义的办法拿来实行，就是超现实。我们还要了解这一点，在我们根据地里，合法就合理。但有的事情不在条文，但斗争是合法的，即要求是拿当地的习惯法，那就叫合理

合法。譬如去年××县所发生的还粮斗争，群众借地主之粮，原定秋收时还，但秋收因湖水泛滥，一无所得，不能如期还粮，地主却□迫苦索。群众有组织的到政府请愿不还（等下年秋收时还），这个斗争胜利了。这种斗争也是合理的。

（三）实现这一严重任务的中心环节，是在领导合法合理的群众的民主民生斗争中，展开反“左”右倾的残酷斗争。“左”倾与右倾都是我们的敌人，“左”倾与右倾给我们的损害是一样的，同志们要高度的警惕这一点。现在提出合法合理的群众斗争，是为了纠正过去的“左”倾与右倾，但这一新的口号提出，还有可能发生新的“左”倾与右倾，这又需要同志们提高警觉性，注意严防。

在合法合理的群众斗争提出后，有的同志可能变成合法主义者及把合理庸俗化，这是严重的右倾现象。合法主义者要求一切斗争必须依照法令条文，凡法令所未提及者就不能斗争，斗争就是违法。我们知道鲁西主署之成立将近一年，所颁布之法令，实不能顾到社会生活之全部，欲求所有群众斗争合乎法令条文，实一难事。把合理庸俗化了的，机械的了解合理的第一个标准——斗争要得到大多数人的同情，处处要迁就群众的落后性，放弃政治动员与教育及领导作用，变成群众的尾巴，忘记了我们是先锋队是领导者，在很多场合要求群众跟着我们前进；另一方面，在合法合理的群众斗争提出后，还可能发生“左”倾现象，认为斗争既是合法合理，就拼命的去斗，不顾政府威信，不讲方法方式，不讲手续，甚至代替政府，破坏政府的威信等“左”倾现象。在我们抗日民主根据地内的群众斗争，应取得政府的有力的配合与互相之间的帮助，但互相之间不要代替。坚决领导与开展合法合理的群众的民主民生斗争，对“左”右不良倾向展开残酷斗争，是深入工作与巩固组织、开展组织的锁钥。

（四）组织斗争的重心，应当放在农民身上，因为我们的基本群众是农民，同时敌后抗战的主要力量也是农民。毛泽东同志说过：“抗日战争实质上是农民战争”。因此，我们全面的群众工作，应

加紧农会的工作，把广大的农民群众组织到农会中来。这一口号的提出，并不是削弱与妨害工青妇的工作，也不是为了加强农会工作就把工青妇的干部抽出一齐做农会工作，停止工青妇的活动，而是加强党对农会工作的领导，就是要求各级党及农会党团，要切实的研究农民之大大小小的一切问题及痛苦，并要设法把他们组织起来，参加改善自己生活的合法合理的斗争，动员他们参加抗战，以解放农民大众。同时只有农民运动的开展，才更有力地推动工青妇工作的开展。关于这一点，我们同志要清楚的了解，否则就会在工作中发生一些不必要的纠纷与错误——一种是平均使用力量，工作失掉中心；另一种就是顾此失彼，妨害了全面工作的开展。

三、具体工作

（一）关于民主民生问题

1、民主民生的具体内容及其相互间的关系与推动作用

关于以上的三个问题，在我们群众工作中，很少讨论与研究。因此对它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所以在进行工作时常常是脱节的。

（1）民主民生的具体内容。有些人把民主民生孤立起来去认识它，以为民主运动只是属于政治的，民生运动只是属于经济的，没有认识到这两个范畴的具体内容都是建筑在物质条件上的，都是解放劳苦大众的武器。如果没有物质作为这两种运动的基础，那末也就没有而且也不会有这两个运动的发生。

（2）相互间的关系。由于这两个运动建筑在一个基础上，是一个目的，因此，它就不能不发生密切的关系。在我个人了解，它们相互间的关系是这样的——民主运动没有民生运动来配合，民主运动就没有内容，只有昙花一现，空虚飘浮，不能持久深入；民生运动没有民主运动来配合与支持，民生运动也就没有前途，得不到保障。这就是民主与民生的相互关系。

（3）相互推动作用。民主运动的开展，给了民生运动以有力

的推动与保障；民生运动的开展，也就给民主运动打下基础，民主运动也就有了内容，容易开展。这就是他们相互间的推动作用。

只有清楚的了解以上三个问题，才能正确的掌握民主民生的运动，才能有力的开展民主民生的运动，才不致使运动孤立空虚、受到损失。因此，在群众运动中，就要反对两种倾向——一种是空虚的政治号召；另一种是纯经济主义。因为这两种倾向的存在与发展，都会妨害了我们的工作。只有民主民生运动的密切联系与正确的配合，才能开展民主民生的运动。但民主民生运动的开展，还要依靠广大群众的斗争来做推动机。

2、民主民生运动的具体问题

(1) 关于反贪污斗争，这就是一个民主民生运动的具体问题。能否正确组织与领导这一斗争，就会决定我们能否迅速开展农村群众工作。

①怎样认识这一斗争。这个斗争，一般说来，是属于民生方面的，但又具有民主性质。因此，这一斗争的组成基础是很广泛的，是包括各阶级各阶层的。

②正是由于组成的范围较大，成份较复杂，所以在这种斗争中，必须以基本群众来作骨干，支持斗争，团结各阶级各阶层的群众，孤立顽固分子，以求得斗争的胜利。

③胜利后，对退回的东西（金钱或物质）的处理，应照顾到统一战线，使各阶级各阶层都得到利益。单纯的强调贫农利益是不对的。退回的东西完全归抗属与贫农，就会使富有者不高兴再参加斗争，破坏了统一战线，削弱了斗争的力量，给顽固分子以反攻的空隙。

④胜利后应加紧整理与巩固自己的组织（工农青妇各团体）。没有组织的地方，要抓紧机会开[发]展组织，并要在群众情绪高涨时，开展民主运动，经过民主的方式，改造政权，成立民意机关，组织村政委员会，把斗争的果实拿在自己手里，以巩固斗争的胜利，保障群众运动，并推其向前开展。此外，整理与组织自卫队、青抗先

等群众武装，把斗争提高一步，把反贪污反坏分子的斗争提到武装反汉奸反敌人的路上来，兴奋群众情绪，巩固群众组织，以防反攻。这就是民主民生的相互关联与推动作用。

（2）关于合理负担斗争

①这一斗争的基本群众，是贫农与中农，地主是反对的。因此，一般的说内容单纯些，易于实现。

②争取斗争的胜利条件，首先是从经济上政治上去教育群众，鼓动其斗争情绪，坚定其斗争决心与胜利信心。其次，应强调提出这是政府的进步法令，使反对者在政治上处于不利，以争取同情者，孤立最顽固的家伙。

③这一斗争常与改造村政权的斗争联系着。因为旧村政权多是代表地主利益，不改造村政权，就不易彻底实行合理负担，即能实行，也是在政府法令逼迫之下不得已而为之，常出现拖延、昧地、不彻底等现象。因此，这一斗争的发展常常是与改造村政权密切联系起来。如有这种情形，斗争就比较复杂，要争取胜利亦比较费力。这也是民主民生运动相互关联与推动的另一实际问题。

（3）关于增资斗争

①要从政治上认识这一点。雇农是乡村的无产阶级，我们必须代表其利益，坚决领导这一斗争，加强工会组织，树立我们革命的骨干。但在斗争中反对一些过火的苛求。

②这一斗争范围较小，成份单纯，利害一致。因此，加强本身的团结，是斗争胜利的主要条件。

③斗争胜利后，要加强其阶级教育，启发其革命情绪，巩固其组织。

（4）关于减租减息的斗争

①这两种斗争的基本群众主要是贫农，所以组成部分较小，容易一致。

②在鲁西，租佃关系是相当复杂的。我们要彻底弄清各地的各种租佃关系，根据实际情形，依照政府法令原则，提出更具体的口

号。譬如说大种地按五一减租，小种地就应该五一增粮，如同样按五一减租，则地主所得太少。在鲁西北还有一种包种地，有时租价并不大，如仍照五一减租，则地主所得不够拿救国公粮的。这两种例子都与农村统战有关，我们应该展开讨论与研究。

③减息斗争，是最难实现的一种斗争。自减息法令实行后，借贷关系变为极秘密的事情，连借债人都不愿声明，这又是值得我们研究的一件事。据目前情形说，各地减息斗争都不活跃。因此，对减息斗争可按分半减息进行，但须规定还息的义务。

(5) 关于改善青年、妇女、儿童的生活

①改善青年、妇女、儿童的生活，尤须照顾到各方面，因为青年、妇女、儿童受拘束，不自由，无地位。基本上是社会问题；同时是家庭问题，但是次要的。社会问题得不到合理的解决，家庭问题也不能得到彻底的解决。

②在各地改善妇女、青年、儿童生活的运动，有时妨害了家庭利益。如青抗先与儿童团，整日上操、会哨、唱歌，不顾及家庭的生产事业，造成与家庭的对立，这是一种“左”的倾向，应严加纠正。我们上操、会哨、集体唱歌，但不能成为专门“职业”。除上操、会哨、唱歌外，还应当发动青年、儿童生产竞赛及集体生产等。

③所以在进行改善青年、妇女、儿童的生活时，就需要照顾到民族利益与家庭利益，否则就破坏了社会统战，造成青年、妇女、儿童与家庭的对立，这是于我们的工作不利的。

④但这并不是不关心青年、妇女、儿童的生活改善，并不是放弃他们生活改善的斗争。对于那些对青年、妇女、儿童的一切非理苛待，应当进行斗争。但是斗争不要破坏了统一战线，不要与家庭造成对立，妨害了工作的进行。

(6) 关于村政建设

①村政建设的基本内容，是民主民生的运动，是在民主民生的斗争中去实现，所以要领导与开展民主民生的斗争，才能完成村政

建设。因此，一方面可用政府法令去推动；另一方面，要用群众斗争来保证。

②从民主民生斗争中来建立村政委员会及村代表大会，这才有基础有内容，否则就成为形式或昙花一现，不能持久。实验区的经验教训曾告诉我们，在有的村子实行普选，建立村政委员会，群众厌烦，认为是一种负担，这是与民生斗争联系不起来的原因。

（二）关于春耕运动

1、以上所谈的民主民生的斗争，是我们鲁西工作中相当长时间中的一个经常的中心工作；春耕运动，是我们目前一定时期中的中心工作，这一点需要我们同志弄清楚。要把经常的中心工作与临时的中心工作相互配合起来，才不致顾此失彼，使工作受到损失。进行临时中心工作，不要忘掉经常的中心工作；只有加强经常〔的〕中心工作，临时中心工作才易于完成。不要忘掉了临时中心工作，才能推动经常的工作。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同志们首先要了解清楚，否则工作就受到损失。

2、动员广大群众参加春耕运动，主要目的是提高群众生产热忱，增加抗日财富，增加群众的收入，富裕群众的物质生活。这对于坚持鲁西抗战与巩固鲁西抗日根据地，有严重的政治意义。我们的干部，尤其是政府与群众干部，要起模范作用，帮助群众春耕及植树、养鸡等。

3、在春耕运动中，要广泛的组织农民互助小组、代耕队、合作社等。组织互助小组，主要的是组织贫农间的与中农间的互助，同时还要注意到贫富间的互助。不过这种互助如果掌握不好，可能使富有〔者〕吃亏，也可能使贫苦者受剥削而减低生产热忱，由互助变为互斗。所以无论哪种互助，都要基于自愿原则，反对任何强制。代耕队的代耕对象，应是贫穷抗属与无力生产的老弱。要以这种群众组织为基础，进行政治教育，把普遍的组织提高到政治的组织上来。

（三）加紧整理与巩固村级组织

1、村级组织是我们的组织基础。如果村组织不巩固，只求数量

的增加，只在上层打圈子，那就无异沙地上盖洋楼，是不能持久的。整理与巩固村级的重要，早已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但终究用什么办法来整理与巩固呢？这是极需要解决的。

2、在这里我们可想到5种办法：

(1) 根据各地的工作经验，主要是从斗争中去整理与巩固，和平说教式的整理与巩固是没有什么大效果的。只有在群众斗争中，才能使群众认识反动分子与顽固分子的真面目。只有在群众斗争中，才能提高群众的政治水平，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力量及出路。只有在群众斗争中，才能实现基本群众的利益。只有在群众斗争中，才能发现有威信的好干部。同时，也只有在群众斗争中，才能暴露干部及工作的错误和弱点。只有在群众斗争中，才能巩固我们的党，才能锻炼我们的党员和干部。也只有在群众斗争中锻炼出来的组织，才能打不垮、摧不毁，算是巩固的组织。

有的同志或者要问，去年5月里各地掀起群众斗争，但结果引起社会紊乱（在某些地区发生红枪会的暴动），破坏了社会统战，以致在某些地区使工作垮台，这又怎样解释呢？但这不是〔说〕群众斗争是错误，而是在领导群众斗争中犯了错误。现在我们又强调了群众斗争，去年那些错误是否又会产生呢？如果我们不能好好的掌握斗争，不能高度警惕去年的错误，而去年斗争中的错误重演是完全可能的。为预防起见，将领导群众斗争的几个原则提供如下：

第一，要有理——只要我们领导群众斗争是有理的，那么对方就一定没有理。只要我们的斗争是有理的，就容易动员广大群众参加斗争，就能得到社会上的同情与援助。这样，斗争就不会破坏农村统战，我们就不会孤立无援。所以我们第一原则就是有理。俗话说“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无理取闹的群众斗争应坚决反对与制止。

第二，要有利——有理是我们斗争的有利的条件，但不完全等于有利。使有理的事情变为完全有利，那就需要我们了解当时当地

的具体情况，就要动员群众参加斗争，加强本身的组织，并要在政治上社会上动员舆论，争取同情者，孤立对方。总之，要把斗争变为完全有利，就必须通过群众，形成广大群众的运动，胜利才有保障。以个人行动代替群众运动的英雄主义，是最危险的一件事，每一领导同志应高度警惕。

第三，要有节——我们党中央曾一再指出，我们斗争是为了统一，为了有利抗战，因此，在群众斗争中不要提出过火的苛求，不要做出为社会多数人所不能接受的事情。总而言之，群众斗争的一举一动，要照顾到社会上的舆论。如果我们做的事情过于突出，超过了现实，为社会上多数人所不满，就要破坏统战，孤立自己，以致遭受失败。所以斗争要照顾到社会舆论、群众情绪，适可而止，就叫做有节。这是我们每一工作同志所应当注意与研究的。

(2) 加强教育，提高会员群众的政治水平，这是一个很艰苦的工作，要把这一问题提到政治原则的高度去认识它。过去各教对教育工作没有引起最大的注意，也给工作以损害。教育内容包括以下几点：

①加强会员的组织观念，引起爱戴与拥护自己组织的热情，这就需要严格组织生活，并进行以下教育——入会与出会的手续，征收会费，必要时进行登记和宣誓等。

②加强现实教育，指明中国目前抗战情形，抗战中资产阶级的两重性及最近皖南事变的原因，中国共产党对皖南事变的态度（中共中央提出的12条）及全国人民应持的态度等。

③加强前途教育，指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内容与前途，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情形等。

④加强国民教育。国民教育包括小学教育和社会教育。各救团体要广泛的组织俱乐部、识字班，在各村建立识字牌。群众教育是在鲁西各种教育中最薄弱的一环，我们要克服这一弱点。

(3) 厉行群众锄奸运动，肃清汉奸敌探分子，巩固自己。

(4) 从生产建设及合作事业中去整理与巩固村级组织。

(5) 武装群众。我们要在群众的民主民生运动中把运动提高一步，因为群众运动走向中和状态时，就发生消沉与垮台的现象。因此，欲使群众运动向前发展，必须把群众斗争提高到抗日道路上来。这就需要我们组织与领导群众进行对敌人的武装斗争，广泛的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扩大抗日军，以提高群众情绪，巩固组织。

3、对于整理与巩固村级组织的办法，同志们不要机械的了解与运用，认为整理与巩固村级组织不分青红皂白，不管主客观条件，认为必须由第一种办法开始，做到第五种办法，其中缺一不可。我们要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整理的办法。如在我们已经巩固或相当巩固的村级组织村庄中，已经没有奸细的活动，我们还要煞有介事的从锄奸工作中去整理组织，这不是天大笑话吗？还有在工作很好的村子中，各种进步法令都已经过斗争实现了，群众武装也组织的很好，并很活跃，那就不能无事生非故意制造斗争。这就需要我们加强各种教育，开展生产建设事业，从教育中、生产建设事业中去整理。关于灵活的运用各种办法去整理与巩固村级组织，需要同志们深切的了解。

(四) 关于组织及领导问题

1、关于组织问题

(1) 群众团体建立自己的垂直领导问题

各群众团体应建立自己的垂直领导，在同级党的政治领导下独立的进行工作，制定自己的工作计画（计划〔须〕取得同级党的同意），使各团体总会的工作计画能顺利的推行到村级，纠正一切事情都依赖党的心理及作风。在建立自己的垂直领导与独立工作时，要严格防止不与其他团体配合或不受同级党在政治上的领导的过火现象。同时下面的同级党的领导，不要妨害群众团体的行政。

(2) 群众团体的干部调动问题

群众团体的干部调动，是属于行政范围内的，应由各群众团体决定，下级党委不能自动调动其干部。下级党委如对同级群众团体

的干部有意见，应报告上级党委，再转上级的群众团体调动。

2、关于领导问题

(1) 工作作风问题

要切实执行去年9月活动分子大会所提出的“具体深入、系统细密”的作风。这一口号虽已老早提出，但至今仍未为一般同志所真正了解。有的认为“具体深入”只是巩固既有组织，于是就死守基点，不求任何发展，不知深入工作巩固既有的组织，正是为了发展，就是要巩固的发展，也就是发展一村就要巩固一村，也就是把一村的工作从不好弄到好，从好弄到更好，使成为一个打不垮摧不毁的组织，以这些组织为资本去开[发]展新的组织。也就是把一件事从头弄到底，弄到有了结果，得出经验，以这些经验去领导其地区，使其全地区也都把这件事弄好。这就是“具体深入、系统细密”的内容和意义。

在这种作风下，就需要我们“一点一滴”的去做工作。一点一滴是“具体深入、系统细密”〔的〕具体表现。有的同志认为一点一滴的做工作，就是慢慢的去做，这是一种错误，应严格纠正。

(2) 深入群众与深入工作问题

①首先在意识上求得彻底转变。这就是说，与过去那些不能深入群众与不能深入工作的不良意识作残酷的斗争。在过去，有些群众工作干部常这样想：“我是工作人员，不是群众的一分子”，于是对群众讲话，就说群众是你们，说自己是我们，一切行为不和群众一样，不欲与群众为伍。又有些干部，认为深入工作是不需要、是不可能，不习惯于“系统细密”的工作，给群众解决问题不耐烦不细致。又有些干部，对工作的责任心不够，工作好坏认为与自己无关，不愿追求工作失败的原因，不愿细心研究工作的方法与方式。这是一些意识不好的例子。这些意识不求彻底改变，深入群众与深入工作都等于空喊。

②干部群众化——要在生活上行为上工作上与群众一样，不要特殊化。但我们与群众一样，并不是处处迁就群众的落后意识，变

成群众的尾巴。我们与群众一样，是为了便于接近群众，与群众打成一片，领导他们前进。

干部群众化，就是要我们的干部在意识上要成为群众的一员，要把群众的痛苦当做自己的痛苦，群众的幸福就是自己的幸福，要为群众着想，要处处代表群众利益，在危机中不忘掉群众，要有与群众同生死共患难的决心和勇气。只有具备了以上的条件，才能深入群众，才能深入工作。

③工作具体化。工作具体化，主要的包括两个问题，一是了解具体情况，一是具体解决问题。不能了解具体情况，也就不能具体解决问题。不能了解具体情况，也就不能正确的执行与实现党的路线。洛甫同志说：“我们常常在工作中，找不到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具体办法，这在同志中也可能发生各种各样的借口，然而仔细研究起‘无办法’的原因，主要也是我们不了解当前的具体情况而来的。只要真能透彻的了解当前的具体情况，办法也就会有有的。”（《党的工作中一个基本问题——了解具体情况》）怎样了解具体情况呢？洛甫同志也答复我们说：“为了了解各种具体情况，我们必须常常注意于各种具体材料（不论是口头的或文字的，物质的或精神的，现在的或过去的，实际经验的或抽象原则的，历史的或理论的，正面的或反面的材料）的搜集。要达到这一点，必须要有不怕麻烦、不怕琐碎、实事求是的探讨的精神，要到处去访问，要多找人谈话，要多看材料，要多检查工作，要注意实际经验。但了解具体情况，不就等于许多具体材料的堆积与描写。为了真正了解具体情况，我们必须依靠马列主义的理论去分析与研究这些具体材料，从这具体材料中，去把握到现实的一定的规律，再根据这些规律来定出自己的具体任务。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要有马列主义的创造的批判的精神，要多研究、多考虑、多倾听人家的意见，多同人家交换意见，要反复思维。这里要有打破一切成见、一切陈腐的公式的勇气”；“具体情况（现实）是非常复杂的具体情况，绝不能一次被了解清楚，而且具体情况本身也是变化的、发展着的，所以今天

正确了解的具体情况，明天可能已经不正确了，所以我们不应也不能等到具体情况完全了解之后，才开始我们的工作，不是的。具体情况，只有在实践中才能一步一步的了解。而对于具体情况这一一步一步的了解，也就更能帮助我们的实践，达到胜利的目的”。（《党的工作中一个基本问题——了解具体情况》）我们了解了具体情况，就需要我们具体解决问题。我们要解决工作中一切大大小小的问题，特别是困难问题。也只有具体的解决了工作中的困难问题，工作才能前进。因此，我们在领导上不是隐蔽困难，而是要发现困难，并要细心去研究困难的原因，找出解决困难的具体办法。只有这种精神，才是领导者的精神；这种领导，才是具体领导，工作才能具体化。

（3）原则领导与具体帮助问题

原则必须适合于具体工作，具体工作必须合乎原则，这两个范畴不是矛盾的，相反的倒是相辅而行的。

在领导上，除原则领导外，必须具体帮助下级。在目前鲁西群众工作的下级干部，无论在政治上在工作上都很脆弱，只有原则领导而无具体帮助，他们将掌握不住工作的中心问题，会使工作受到损失。

（4）建立制度领导，严格纪律，反对自由散漫问题

在目前鲁西各群众团体中，尚无制度可言，团体纪律也未十分注意到，所以在各团体中特别是下级，充满了自由散漫的现象。去年主任公署宣布了制度领导，有很多群众干部感觉到不方便，受拘束，这是一种具体表现。我们为了建立领导，深入工作，急速克服这种现象，所以要求各团体严格建立各种制度，如会议、汇报、检查等，制定团体纪律，严密团体生活，消除工作中一切不良现象。

（5）创造基点及使用基点问题

创造基点是我们加强领导与深入工作的一种方式，但不要死守基点，使基点孤立。我们要以基点影响其周围地区，以创造基点的工作经验，领导全盘工作。

(6) 创造新的工作方法方式问题

国内外形势是急速的变化着，工作的发展，也是不停的前进，只墨守过去老的工作方法与方式，对工作是不利的。为了加强领导，深入工作，推动工作前进，我们要求：

①干部同志都要有高度的创造性与独立工作的精神，在任何困难的环境中都要独立坚持工作，反对看不起自己，对工作没有信心，同时也反对“老子天下第一，自高自大”的现象。

②掌握住形势的变化及工作发展的特点，要及时的总结工作，随时交换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及时改正一些不合乎时代不合乎工作需要的方法和方式，要创造新的方法与方式，以适应新的环境与新的要求。

鲁西妇救总会

关于今后妇女工作的决议

(一九四一年三月)

鲁西妇女工作，随着鲁西抗日战争的发展迅速的开展起来。由于干部的经验缺乏，工作走上了强迫命令、依靠政府的错误路线，以致整个工作虚浮形式。为了深入工作，于去年“红五月”间总会曾提出了积极开展斗争的号召。但因没有明确的提出防止“左”倾的错误，工作是在错误的支持下发展的，所以妇救会代替了政权，在斗争中随便打人、罚人、游街公审，并且查放足、“争取继承权”的斗争超过了现实的条件，以致形成“左”倾幼稚病的错误，不但扰乱了社会秩序，而且破坏了统战，引起社会人士对妇女工作的不满。

在第一次分会长联席会后，总会曾指出了“左”倾错误的严重，但未得及时纠正。去年9月间，在第二次分会长联席会议上，提出了深入下层，整理村会，建立精致细密、具体统一的作风后，工作开始深入，粗枝大叶的作风得以转变，“左”倾错误得以纠正。但到今天，干部仍然深入农村而不深入工作，并且曲解自觉自愿，曲解合法，不积极领导妇女去进行为改善自己生活的斗争，停止发展工作，和平迟缓的整理组织，以致工作陷入了异常消沉的状态。

总之，过去的工作一直是在“左”倾错误的行动中，直到今天，妇女群众并未紧密的团结在我们周围。为了建设与巩固鲁西根据地，及时粉碎敌人的“扫荡”，为了积极改善鲁西的妇女生活，为了正确掌握斗争，巩固组织，因此关于今后工作有总会如下的决定：

一、政治方面

(一) 我们全体同志应深刻认识, 这次所以未能动员妇女群众配合政府、军队全部粉碎敌人“扫荡”, 得到反“扫荡”的全部胜利, 是因为我们的工作不深入, 没有切实解除她们的痛苦, 没有把她们的潜在力量启发起来。

(二) 克服这个问题的中心关键, 在于深入工作, 切实进行合理合法的、民主民生的、解除自己痛苦的斗争。通过斗争去巩固村会, 开展组织, 教育干部, 并用妇女的坚强的组织力量去打击亲日派, 准备全国性的突然事变, 随时粉碎敌人“扫荡”, 巩固扩大鲁西根据地。

(三) 实现这一任务的中心环节, 在于领导合理合法的、民主民生的、解除自己痛苦的斗争。在斗争中要防“左”、右倾。“左”和右都是我们的敌人, 对工作的损害是一样的。因此, 在干部中我们要开展残酷的反“左”右倾的斗争。

(四) 组织斗争的重心应放在劳动妇女身上, 因为劳动妇女的痛苦最深, 要求解放最迫切, 斗争亦最坚决, 并且我们的最终目的亦是為了广大劳苦妇女的解放(因此平素亦要加紧劳动妇女的教育)。

二、具体工作

(一) 妇女应参加一般的民主民生的斗争

1、民主民生的斗争与妇女解放运动有密切的关系。(1) 彻底实行民主政治, 才能获得政治上的一切权利, 才能提高妇女政治地位, 才能保障妇女经济利益。妇女运动广泛开展, 广大妇女才有民主的要求, 才能保证民主政治之彻底实行。(2) 改善人民生活, 才能减轻妇女痛苦和负担。只有发动广大妇女参加民生改善的斗争, 斗争才更有胜利的把握。(3) 因此, 我们不止领导妇女为改

善妇女生活而斗争，而且领导她们参与一般的民主民生的斗争（反贪污和增资，合理负担）。我们反对只看到妇女问题的一方面的狭隘观念。

2、民主民生斗争要正确联系，密切配合。民主的开展给民生以保障，在旧政权下是不能改善民主的；民生斗争发展起来，给民主斗争打下基础，有了群众基础，开展民主是很容易的。我们领导妇女斗争，要切实注意到这个问题。只有这样，才不致使民主空虚，民生孤立。因此我们反对空虚的理想的政治号召，也反对没有政治条件的单纯的经济号召。

（二）领导妇女的合理合法的斗争，是我们今后工作的中心任务

从和平中发展起来的工作，是未经过锻炼和考验的；只有通过斗争，才能活跃巩固组织。因此，领导妇女斗争是我们今后工作的方针。但必须认清，妇女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她〔们〕所受的压迫是旧社会制度的压迫，家庭的压迫是次要的，因此在解决她们痛苦的时候，要照顾到家庭利益。强调政治口号而不照顾家庭统战，不照顾社会统战，作出来的情况是超现实的，是不对的。在今天，改善妇女生活，应该在合理合法的原则下去进行。

1、什么是合理的？我们所做的事情：（1）要照顾到社会舆论；（2）不破坏家庭的统战与社会统战；（3）不要是超现实的。是否强调了合理，就抹杀了真理呢？不是的。在现实条件还没有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超过现实就会脱离群众。因此必须经过合理的斗争，逐渐提高群众的政治水平，才能达到真理之实现。

2、什么是合法的呢？凡在主任公署颁布的法令范围以内，为执行进步的法令而进行的斗争，都是合法的；凡合理的，虽未经主署颁布者，亦是合法（合乎习惯法）；凡合法的也都是合理的。但在执行时，应看现实条件如何而决定。

此外，注意合理合法的斗争在方式上与对斗争的处理上，亦必须合法（不侵犯政府法令及权限）。

（三）关于妇女斗争的几个具体问题

1、关于妇女财产继承的问题

妇女财产继承权是主任公署的法令，是合理的亦是合法的，但在今天现实条件很差的时候，除了在特殊情形之下（模范地区，群众觉悟特高，妇女工作特好，广大舆论同情，有足够的胜利条件），一般的不应该积极发动。因为：

（1）财产继承权还没有经过一相当的宣传教育阶段，还没有引起社会舆论的同情。

（2）今天鲁西的群众还相当落后，男子继承权是几千年的积习，妇女争取继承权，容易引起社会统战（旧封建势力）与家庭统战（父母兄嫂）的破裂。

（3）现实还不能为广大群众所接受，是超现实的。在今天争取财产继承权的中心点，应放在宣传教育上，经过一定的阶段（大部群众能接受时）再去执行。

2、关于婚姻问题

中国的婚姻制度在旧制度的包办买卖之下，是十分黑暗痛苦的（如老夫少妻，或老妻少夫，并且关系往往维系在金钱上，同时对旧的礼教的罪恶往往誉为美德）。改善婚姻生活，亦是我们的严重任务，但因此必须□□□下面的计划去进行：

（1）经常进行关于包办婚姻及早婚之害的宣传，并强调政府婚姻法之正确及森〔庄〕严。

（2）对一般人不要强调自由恋爱，对身感痛苦之妇女，揭露旧社会制度之罪恶，使积极参加解放事业。

（3）对一般的婚姻纠纷，应采取息事宁人，促进家庭团结的态度。

（4）特殊受虐待的妇女，在已引起舆论不满，斗争已成为群众

的要求〔时〕，应按照政府保护妇女法令，积极领导斗争，并在斗争前后进行深入教育。

(5) 经我调解，双方自愿离异者，必经法律手续，不能擅自处理。

(6) 如果为虐死或被暗害之会员，我应积极发动妇女进行斗争，并联名向政府请愿或公告，要求保障妇女权利。

3. 关于放足问题

放足问题是政府法令，亦是目前最严重的问题。缠足恶习必须彻底铲除，才不致影响后辈健康，妇女才能行动自如。关于放足问题，亦必须遵照如下原则去进行：

(1) 展开广泛的宣传形式〔势〕运动。

(2) 与政府配合建立各级放足委员会（吸收士绅名流及有威望的妇女参加），促进放足运动。

(3) 在模范地区，举行放足竞赛，妇救会保证自己的干部、会员起模范作用，并向落后会员进行说服。

(4) 在模范地区，经过一个教育时期，放足已为群众所接受时，由政府进行检查。

(5) 有意破坏及故意违犯者，应进行斗争。

4. 关于妇女参政问题

妇女参政是民主斗争的主要组成部分，正确领导妇女参政，不但可保证民主斗争之胜利，而且可提高妇女地位。但我们必须知道，参政并不等于掌握政权。我们今天领导妇女参政，应从教育上，从最下层着手。

(1) 对妇女进行政治教育，启发其参政要求。

(2) 发动所有会员参加政府普选，与破坏者作斗争。

(3) 将我们最有威信、最优秀的会员竞选到村政委员会里去。

(4) 有计划的培养妇女政权人材，不应临时乱抓。

(5) 妇女参政与改善生活密切联系起来。

(6) 开展妇女参政中反倾向的斗争，〔清除与克服〕好高骛

远，只求掌握政权的错误观念或不相信妇女，不敢叫妇女参政的现象。

(四) 春耕运动

春耕运动是目前临时中心工作，但不要妨碍了经常的中心工作。只有加强经常的中心工作，才不致顾此失彼，才能易使临时中心工作完成。只有努力〔作〕临时中心工作，才容易把经常工作建立起来。在春耕运动中：

- 1、每人至少种树1棵，养鸡1只；
- 2、多下力开荒；
- 3、围绕春耕运动，组织妇女合作社；
- 4、增加生产，提倡家庭副业，普遍建立生产小组。

三、加紧整理村级组织

(一) 从合理合法的斗争中去整理组织，是我们今后工作的方针，因为只有从斗争中整理，才能提高群众的认识，暴露工作的缺点，锻炼我们的干部。但必须依照下列原则：

1、斗争要有理。只有有理，才能有社会舆论的同情。我们反对无理取闹。

2、斗争要有利。要具体了解情况，动员妇女群众参加斗争，反对干部代替群众。

3、要有节。斗争是为了统一，不要做出大多数不能接受的苛求，要适可而止。

(二) 从教育上去巩固、整理村会

1、严格入会出会手续。

2、要加强其组织观念，加强现实教育及战时教育，并与妇女解放联系起来。

(三) 利用各种教育方式(会议、俱乐部)巩固组织。

(四) 从生产事业上去巩固，特别是生产小组，应提高其政治

教育，使成妇救组织的核心。

这些整理的方法，要互相推动，哪一个合适采取哪一个，中心问题就是要通过斗争。

四、组织领导问题

(一) 建立垂直领导，严格各种制度，定期检查、回[汇]报、总结。对上级决议，执行坚决，对下级帮助要深入具体。

(二) 干部的配备调动，应通过上级批准施行(深入两级)。

(三) 在领导上，要深入群众、深入工作。

1、从意识上转变，反对官僚主义的领导。

2、深入群众，干部要群众化：

(1) 意识上群众化；

(2) 生活上群众化；

(3) 行为上群众化，深入群众，提高群众。

(四) 严格组织纪律，反对自由散漫的现象。

(五) 要求每个干部在领导上要有创造性，不要物[墨]守陈规，依赖上级。反对自暴自弃，自高自大，要耐心的、大胆的、虚心的领导工作。

同志们，这是总会关于今后工作的决议，希望你们接到后，进行深刻的研究讨论，并配合当地环境认真执行。我们必须负责与保证把决议挨级传达，深入到村，并求得工作上的实效。

鲁西农救总会

九月主任联席会总结报告

(一九四一年九月十五日)

第一部分 总的总结

壹、总的成绩

三个月来鲁西的农会工作，在全体同志的一致努力与艰苦工作下面，在各方面都获得了不少的成就。这些成就具体表现下列各方面：

甲、接受了5月扩大会的精神，统一了鲁西农会的领导

(一)传达了扩大会的精神。扩大会后各都传达了大会的精神并进行了讨论，提高了干部工作情绪与信心，做了深入工作、转变作风、纠正缺点的动员。

(二)初步的转变了作风。扩大会后，一般的同志认识了漂浮、不实际、不深入、不群众化对工作的危害，认识了只有深入工作，转变作风，切实解决群众切身问题，纠正工作中的单纯方式与主观现象，才能极好的开展工作。由于干部在意识上有了这种认识，就开始了对坏作风（不实际，不深入，不群众化，不关心群众问题）的纠正，开始了对工作的研究，开始了深入工作。这具体的表现在：

(1)为了便于深入工作，接近群众，区级取消了伙食单位，分别在群众家、在会员家里吃饭。

(2)开始了对村级工作的研究，并深入了村会工作。

(3)个别投机分子怕深入、怕艰苦、怕困难，在深入工作中

被刷洗，提高了干部质量。

(三)统一了领导，纠正了各自为政的现象。扩大会前由于总会的健全，在领导上还没有很好的统一起来。虽然3月决定在鲁西统一领导上起了它很大的作用，但在彼此的联系上，各地经验交换上，步调的齐一上还非常不够，还存在严重的各自为政的现象。5月大会后，这种现象是纠正了。

乙、在培养干部与对外宣传工作上有了显著的成绩

(一)提拔培养了干部，建立了组织。一个月中各地都开办了训练班，大批的训练和培养了干部(特别是不脱离生产的区委员)，部分的健全了组织。

(二)对外宣传上也起了不少的作用，配合进行了政治攻势与各纪念日的各种工作的宣传，在瓦解敌伪、揭破谣言、提高群众的政治认识与抗战信心上，都起了它的作用。

丙、开展了民主民生的运动

(一)大力进行了主署改造工作。在5、6月，农会是号召了整个组织进行了这一工作，在这一工作中农会是起了它应有的保证作用。在个别地区保证了普选，形成了群众的选举运动，提高〔了〕政府的威信，提高〔了〕群众对民主的认识。

(二)配合政府进行村政权的改造。这一工作一般是在民主民生运动中进行的，各地都有具体的成绩，仅运西就改造了□□□村政权。这些被改造后的村政权，大部分都是农会本身踊跃的负起了村政的工作，这是农会的光荣，是值得我们发扬的。不过选举的方法还未能完全依照政府所规定的村政建设的步骤来进行，个别的还有以简单的推选方式来进行的。

(三)领导了反贪污反瞒地的斗争。这一工作在数量上以鲁西北为多，仅莘县就检〔举〕出“黑地”××亩，减轻了群众的负担，增加了救国公粮的收入，改善了群众生活，增加了抗战力量。

貳、缺点

上面总结了我们的总的成绩，但在缺点这方面也是很严重的。主要的缺点是未完成三个月的工作计划。

三个月的计划是在大会上经各地同志共同详细讨论制定的，是扩大会上的共同决议，但现在根据各地同志的报告总结起来，完成之程度还不到计划的 $1/2$ ，这是值得我们严格的检讨，提起高度警惕的。没有完成计划的主要原因：

甲、总会的领导不够

三个月中，总会的领导表现了十足的官僚主义，没有到各会进行检查和帮助工作，没有及时发现偏向，给下级解决问题。这固然是由于总会的不健全，在客观上存在着很多困难，但另一方面，想尽各种各样的办法克服这些困难，使在领导上起它更大作用，还是不够的。

乙、缺乏工作责任心

同志们对工作计划的重视是异常不够的。有的同志知道有个三个月计划，但计划的是些〔啥〕便模糊不清楚了。有的同志抱着工作好坏与他无关的心理。另外在各级领导上亦未能有计划的有步骤的按期检查和总结工作，及时纠正工作的偏向和缺点，想尽一切办法保证这一计划完成。

以上现象表现我们对完成工作计划的忽视，没有高度的工作责任心来保证计划的完成，表现了我们工作责任心的不强，表现我们实现决议的精神差，执行决议不坚决，轻视和忽视工作纪律。

丙、大会的精神传达不深入、不细密

大会精神一般的是传达了，但是深入细密是很不够的，因此，干部也未能全部接受大会的精神。不少干部对大会精神是一知半解的，特别是泰西，对大会的精神是相当模糊的，因此在工作上不可免的要发生偏向，影响工作，妨害着计划的完成。

丁、临时的突击工作与会议过多，牵扯了干部的力量

各种突击工作中，突击公粮等，有些干部离开了自己的工作的岗位，专作临时突击工作，和经常工作脱节，因而临时工作既没有很好的完成，经常工作却受到大的妨害。同时对会议没有很好的计划，没有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会议，致使会议过多，影响工作。

叁、对各地区的估计

甲、对泰西分会的估计

泰西的工作历史较长，工作基础较好，工作也较普遍，在客观上很多有利条件，但是由于接受新的工作精神差，使工作不能深入，影响工作的进行与发展，在工作方式方法与新的精神上表现落后。这固然是由于客观环境的限制，但是我们不应该强调客观的环境而原谅自己，抹杀主观的努力，□□克服困难。

乙、对运西分会的估计

运西分会的工作，原有工作基础是比较薄弱的，但三个月的进步〔是〕很快的，在某些地方形成了活跃和朝气，这是了解和接受新的精神的结果；但另一方面，在掌握工作、认识问题〔上〕还有些缺点。因此，运西今后应大大地发扬现有的优点，使工作大量的发展，继续深入巩固，使全部工作活跃起来；另一方面加强各方面的修养，使在政治上工作上提高一步。

丙、〔对〕鲁西北分会的估计

鲁西北的工作历史较久，基础较好，但正是由这原因而在工作〔上〕表现了老大高傲，大大的障碍了工作进步。自今春虽接受了新的精神与作风，但转变的非常迟缓，进步非常慢。

丁、对运东分会的估计

运东的工作三个月来没有什么进步，相反的由于环境的恶转，某些地区在敌人和叛军进攻下，不能坚持而遭到了垮台。这一方面表现〔了〕工作的脆弱，经不起环境的考验，另一方面表现了领导上的不强，未能起到领导上应有的作用。这是运东最大的缺点。

戊、对昆山县的估计

昆山的工作，在工作基础上讲是不够强的，但工作是比较正规深入。但另一方面由于某些干部的落后，致使工作表现松懈、平板，进步慢，未能更彻底的转变作风，更艰苦实际的深入工作，因此妨害了工作的进步〔和〕很快的实现“创造昆山县为模范县”的口号。

第二部分 几个具体工作的总结

壹、武装工作

甲、三个月来武装工作的成绩

三个月来，开始纠正了农会不关心武装工作，忽视和轻视武装工作，甚至不愿意进行武装工作极端错误的现象，认识了武装工作特别是人民武装工作的重要，开始了对武装工作的重视与领导，并在部分的地区以大的力量进行了人民武装的工作。一般的在农会中对武装工作是有了初步的转变，因此在武装工作中取得了一些成绩，具体的表现在：

（一）组织和领导了人民武装

（1）组织和领导了脱离生产的农民武装，打击了敌人。这一工作以曹西北做的较有成绩，组织了脱离生产的农民武装，人数共251人，并领着进行〔了〕十几次战斗。干部对人民武装工作的重视上以及领导武装对敌斗争上，都为其他地区所不及。

（2）组织了农民游击小组。这一工作各地都有成绩，而鲁西北、运西、昆山成绩较佳。计鲁西北38个（原有在内人数没有统计）；运西21个，共78人；昆山7个（人数未统计）。成立的方式：经过动员自动参加的，部分的已有枪支，并在打击敌伪叛匪上起了它的作用。特别是在莘县部分的地区，形成群众自动的武装，保护了群众的利益，展开了对伪叛的斗争，打击齐子修，造成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例如武装保卫耕锄、保卫收割，每次敌、伪、叛、土匪

出来烧抢时，必予以打击。有一次，150余土匪出来抢东西，被击败，土匪死、伤10余名，我们也有3个会员光荣牺牲，并有5名受伤。再又如某次伏击敌人的战斗中，缴获了敌人子弹、牛、驴、大车、电线等。

(二) 会员在人民武装中起了模范作用

(1) 在自卫队中，农会稍有基础的村庄，会员一般的在自卫队能〔起〕模范作用，在昆山、鲁西北、泰西等地，都有很多的例子。特别是运南莘县，会员领导打敌人。

(2) 在游击小组中（不是农会领导的）也同样的起了模范和保证作用。在有农会的地方，游击小组的组员大部是农会员，比如在昆山的某些村庄，会员占游击小组人数的 $2/3$ 。这些游击小组都能英勇打击敌人、土匪，在群众中建立了高度的威信，成了群众打击敌人、打击土匪、保卫家乡的自卫武装。

(三) 动员了会员和农民参军。这一工作各地都有成绩，但未能精确的统计。同时，这一工作也是武装工作中成绩最小的、工作最弱的一环，我们应该很好的提起注意。

乙、武装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

上面总结了我们在武装工作中是有了些成绩，但是这些成绩还很不够，并且目前还存在着严重的错误和缺点，我们必须无情的指示〔出〕，作彻底的纠正。

(一) 还存在着忽视武装工作重要性的偏向。目前敌人正以新战略方针积极的向边区进行极残酷毒辣的进攻，在军事上的分区“扫荡”，采取“清剿”、烧杀毁灭，由外向内密设据点，修筑公路，作长期的彻底摧毁。政治上的诱降、麻痹、自首政策，特务的各种活动，文化的毒化教育，“治安运动”等，使边区的环境日益紧张，斗争日益尖锐。在这种极度紧张的环境下，我们只有大量发展与建设武装特别是人民武装，和敌人开展以武装斗争为主的各种斗争，才能坚持与建设边区抗日根据地。但是我们某些同志，对边区的环境没有足够的认识，尚在异常麻痹，对大量的开展与建设武

装特别是人民武装，开展广泛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是坚持和建设边区的唯一保证，没有清楚的了解，同时存在着忽视武装与不愿意作武装工作的极端错误严重的现象。

(1) 武装工作在我们的5月大会上曾作了报告和进行了讨论，并决定为7、8月份的中心工作。但是这一工作并未能引起全体农会工作同志的应有注意，对这一工作还是表现了相当的忽视。我们没有从上而下的在干部与会员中进行很好教育与动员，没有具体的切合实际的布置这一工作，没有有计划的对这一工作进行检查和总结，因此这一工作未能收到应有的成绩与效果。

(2) 在部分的干部中尚存在着认为群众基础差，群众落后，便不能进行人民武装工作的观点。因此在意识上不愿进行这一工作，害怕作这一工作，尽可能在和群众谈话时避免讲关于武装群众的字样。这种现象在昆山、运西实验区，在部分的干部〔身〕上严重存在。这些同志好像是瞎子，好像失掉知觉，没有看到群众对武装的要求（不□群众的武装要求有时不一定是直接要求抗日）。这种现象必须给以彻底的纠正。

(二) 冒险的军事行动。某些地区群众在敌人的残酷摧残下，武装起来了，战斗情形〔绪〕提高了，但我们未能对群众进行战略战术的教育，有时领导群众去干，如运西的自卫队，在敌人出来时，拿着红枪追敌人，□□走了，没受到损失。又如某些地〔区〕游击小组的全部牺牲（虽不是农会领导的，但应该警惕和教育）。鲁西北人民武装和敌坚持战斗，这虽表现我们的英勇，但是这种冒险的行动是会使群众受到不可估计的损失，降低武装斗争的情绪。

(三) 对正规〔军〕的爱护与优待工作做的很差。这一工作是我们武装工作中最忽视、最没有成绩的。比如我们对进行爱护正规军，掩护和照顾伤员的教育，与动员逃兵归队以及优待抗属、慰劳部队的工作，都做的很差，这会给我们大量发展与补充正规军以莫大的妨害。

丙、人民武装工作的经验

(一)掌握群众武装的要求。群众对武装的要求，不管哪地区都存在着，如武装抗日的要求，武装反叛军的要求，武装防土匪、强盗的要求等，并有些地区是非常迫切的。不过他〔们〕对武装的要求，是根据当地环境与保护其切身的利益而出发的。我们必须善于掌握着他们的要求而进行武装组织，然后逐渐提高他们，由保护切身利益保卫家乡联系到国家民族利益，联系到抗日。适当掌握群众的要求，是最容易组织和发动群众武装，开展对敌斗争的。有很多经验告诉我们，如泰西、昆山的利用防匪，莘县利用反叛，运西南的利用反敌伪，都大量的建立了人民武装，开展了对敌伪叛的斗争，与打击和消灭了土匪，保卫了地方安全，增加了抗日力量。

(二)培养人民武装的群众领袖。土生土长的、在地方有威信的武装干部，是最容易发动、扩大与巩固人民武装，并在打击敌人上也是能发挥更大的作用的，这点我想用不着证明。因此我们应该选择好的干部，很好的培养与扩大他在群众中的威信，并在必要时计划的有条件的抽调在群众中有威信的干部领导人民武装工作，以期大量发展人民武装，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

贰、村会工作

甲、三个月来村会工作的收获

扩大会后，村会工作是引起了同志们相当的重视，一般的强调了这一工作，因此在村会工作中收到了显著的成绩，纠正了村会消沉垮台的现象，部分的整理和巩固了村会，初步的建立了村会工作基础，使一部分村会走向活跃。具体的表现是：

(一)一般的是深入了村会工作，开始了对村会工作的研究，注意了对村会工作的领导。三个月中我们的各级干部对村会工作的认识上有新的转变，克服了过去的强迫命令、上名册的村会工作方式，开始了有计划、有步骤的、有内容的进行村会工作。干部开始了深入村会工作，具体帮助领导了村会工作，注意了对村会工作的研

究,部分的做到了面向村会,深入村会工作,一切工作要通过村会。

(二)整理巩固了村会,建立了基点。各地区都以大力量进行这一工作,取得了成绩。根据各地区的报告,以运西较优。各地区的数目除运东、泰西无统计外,共计如下表:

地区名	整理村会数	巩固村会数	基点村数	备注
鲁西北	91	23	10	
运西	30	11	23	
昆山	10	11	6	
共计	131	45	39	

统计中,村会有的还没有达到我们的决定的各种条件,如整理村会最低要求,巩固村会的条件等。

(三)获得了初步的方式方法与经验。上面我们说到对村会工作有了新的转变,因此在村会工作的方式方法与经验上,也获得些初步的成绩。比如在整理、巩固村会中,认识了必须有计划的、有步骤的、有内容的和建设抗日根据地的工作密切联系起来进行,才是正确的整理、巩固村会的办法。在创造基点中,必须了解创造基点村的意义与选择基点的条件,适当的配备基点村的力量,加强基点的领导,基点才不致流产,才能起基点的作用。在发展村会工作上,我们逐渐采用了新的方法,如利用各种有利条件,通过能解决群众的切身各种问题与经过各种斗争,以开展村会〔工作〕,使发展的一村就是巩固的一村。

乙、村会工作中的缺点

村会工作我们是有上述的成绩,但是我们的缺点也不少,并且这些缺点还异常严重。

(一)村会工作和抗日根据地各种建设工作没有密切联系起来,在整理和巩固的村会工作中未能通过抗日根据地各种建设工作

去进行。因此在三个月村会工作中存在着严重的组织任务与政治任务脱离的现象，因此也就使得我们整理巩固的村会不能真正的巩固与活跃起来，同时大大的妨害了抗日根据地各种建设工作的发展。这是我们应该立即纠正的。

（二）村会工作中的几种偏向

（1）村会工作中狭隘关门的现象。三个月来，村会工作中表现出狭隘关门现象。比如在鄂南某村5个老的农民会员，因年龄大些，表现的不积极不活跃，不严格遵守会议制度，我们的同志便将这5个很好的、很愿意加入农会的老会员开除了。比如运西实验区×××基点村，一般的各方面都起了基点的相当作用，但就是不发展，以致现在还是半年前的40多个会员。在该村有人亲自向我们农会的同志讲：“你们农会只是代表穷人的利益，但是实行进步法令不也是同样的代表富人的利益吗？”“你们为什么光说代表穷人利益，不说代表富人利益呢？你们不会说个代表富人利益吗？”又如范县某村的发展村会是在没有工作的地区用个别谈话个别扩大的方式，在一个村住了20多天，发展了7个会员，经过严格登记宣誓的结果只剩了3个。这样加入一个群众团体，甚或比加入一个政党还要严格些。另外例子还很多，我们不多谈了。

这种狭隘关门现象，会大大的损害了农会工作，会使农会形成孤立，会严重的妨害着工作的发展。我们要严格的纠正这种错误现象。

（2）机械形式的进行村会工作

A、整理巩固忘记发展。鲁西北的朝城，根据报告全县共有7个区，有工作的有3个区，3个区中只有2个区有区农会的组织，但在三个月中没有发展。在报告中只有一个区提到发展问题，发展的一个是巩固的一个。

在鲁西实验区，这区的工作一般的还深入，创造了一些经验，收到了些成绩，但是也同样犯了忘记发展的毛病，从春天就是〔十〕几个村会，到现在还是十几个村会。

在观城县，在6月中的报告中发展了24个会员，但是也开除了

23个，净存1个。

以上真是我们没有想象到的严重现象。

B、机械的了解情况。运东、东阿在整理村会中光单纯的了解情况就20多天，每天出去了解，但还没有了解清楚。了解情况是在工作中了解，单纯的了解情况，是不会了解清楚的。

C、机械的搬运整理村会的几个步骤：登记、宣誓、民主改造，不知道根据村中的具体情况，通过各种工作，灵活的进行村会工作。

D、机械的了解乡村统战，将士绅庸俗化。如运东的某些村子，整理村会必须召开本村的士绅座谈会，好像是将士绅座谈会也成为整理村会的一个重要步骤，好像不开士绅座谈会就不能整理村会似的，同时将士绅庸俗化。每个村子都有很多的士绅，这样虽然进行了士绅工作，但会将我们某些群众过去办过公的、识几个字的农民关在农会之外，这是要不得的。

(3) 县会直接创造基点。县会直接创造基点这种方式是不好的，因为县会直接创造基点，势必妨害对区会的领导，妨害区会的领导，形成包办。因此我们决定县会不直接创造基点。但有些县的同志，没了解到这点，仍旧直接单独的进行创造基点的工作，如鄞城□基点。这种现象虽不普遍，但值得我们提出。

(4) 忽视会费工作。交会费是每个会员的义务，是加强组织观念，是巩固和考验村会的一个方法，因此我们在5月大会上曾强调了这一问题。但未能引起同志们的注意，对收会费的工作还表现着很严重的忽视，始终没有很好进行收会费的教育，对收会费工作缺乏了信心，个别认为收会费影响和妨害工作，特别是还有在收会费中表现了自流现象。我们的同志在村会中交会费是随便的，不愿交就散，这是不应该有的现象。今后应当很好的进行教育，纠正转变这种错误观点（详见收会费的指示信）。

丙、两个主要经验

(一) 深入了解情况，大胆的有魄力的解决问题，是巩固与开

展工作的先决条件，就是说巩固与开展工作首先将具体情况作深入的、详尽的了解，发现大小问题，认真的解决这些工作问题。在解决问题中与解决问题后进行我们的工作，那是最容易收到大的效果的，特别是在发展工作中，如果能注意这些问题，有魄力的解决了这些问题，一定能提高我们的威信，大量的发展组织，并可做到发展的一村是巩固的一村。同时这种影响还会逐渐扩大到四面八方的群众，〔他们〕都来找我们解决问题，我们且可利用这些问题，大量的开展工作。比如范县的八区的问题，有一家人被土匪架走弄死了，土匪怕受告，他先告了主家，结果主家被政府扣押起来，受了罚，一般群众敢怒而不敢言。我们知道了，便抓紧与解决了这问题，提高了我们的威信，推动了工作，提拔了干部，这种经验我〔们〕应该好好的接受。

（二）把群众的经济要求与抗日根据地的各种工作密切联系起来进行村会工作，村会才真是巩固的。各地的经验告诉我们，有很多村会因某件事情群众的某点要求，村会工作（下缺33个字——编者）因某些刺激而活跃的村会，如不抓紧进行工作，经过一个时期消沉垮台是必然的，是不会长期活跃的，因为它没有正确的认识，没有和它本身的问题特别是经济问题经常的密切联系起来。但这些同志没有认识到这点，即会对村会发生动摇，失掉信心。如群众的经济要求与抗日根据地的各种建设工作联系起来进行的巩固起来的村会，是经常活跃巩固的。今后我们应很好的接受这一经验，很好利用这一经验，来开展与巩固我们的工作。

叁、生活改善与生产建设工作

甲、生活改善与生产建设方面的成绩

（一）减租减息工作。这一工作每一地区都引起了注意，并发动和领导了减租斗争，收得了些具体成绩，部分的改善了群众生活。减租以运西较为活跃。根据各地已统计来的数目如下表：

地 名	运 西	鲁西北	昆 山	共 计
减租数目	882.3石	27户	94人	
减息数目		10户		
增资数目	750元			

(二) 合作社方面的。三个月来没有多大成绩，只是做了些宣传与教育工作，有了些成立合作社的对象，如范县，但未正式成立。

(三) 生产互助方面的工作。三个月来有了些开展，生产小组、互助小组由于同志〔们〕较前重视，是有了成绩。在某村庄提高群众的生产互助热忱，可惜除鲁西北、昆山外，各地都没有统计，并且没有总结，因此没得出更多的经验，仅得范县的一两个作简单的介绍：

互助小组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人力与牲口力共同互助。这种多半是这几家感情很好，有人无牲口，同时一家买牲口又买不起，于是几家共同出钱买一个或两个牲口，将几家的活共同在一起作。也有的几家只有一个牲口，活做不过来，几家筹钱再买一个，结成一犋。另一种是人力互助，就是几家共同在一起做活。这里介绍两个小组，一小组是7个农会员，在一起互助，活大时在一块，活小时分作两班。吃饭是各人吃各人的，吃饭时抽一个人回家取几家的饭，吃饭时照例是先把好的吃光，水是做谁家的活谁家供给。有一次这组的3个组员一齐被派差了，出去好几天，恰巧这几天正在忙着收高粱。在家的这4个组员，看到他们3个出差了，先商量一下，先收他们3个的。等他们回来后高粱全给他们收到家去了，于是这组的互助劳动情绪更高了。据村会长的报告（当然不够精确），他们5天可以省一天的工。再一个是几个佃农在一起互助，他们事先谈好，和东家也谈好，趁哪天在家的活松时或是晚上，他们几个合

起来做一家的活，积极紧张的干，在最短时间内将活做完，再快去给东家做。另外佃户的家中也进行互助。这种互助既不妨害地主的生 产，又能解决了佃户的困难，是可以采用的。

生产小组，几家在一起磨粉、养猪，4家共有400多块钱，春天已成立，因我们没有很好的领导，也没有什么发展。

乙、生活改善与生产建设工作

虽然是收到一点成绩，但是我们对这一工作的重视还是很不够的，特别是生产建设工作，更为同志们所忽视、所不注意，因此大大的妨害了这一工作的发展，影响我们工作的开展与巩固。在这一工作中表现了以下不可漠视的缺点：

(一) 在民主民生的斗争中，存在着严重的不能深刻透彻的了解斗争情况，甚至不研究领导斗争的技〔艺〕术，且不通过群众路线，多是包办代替。我们的干部强要求群众起来斗争，和对方打官司。正是由于这些缺点，使得民主民生的运动不能很好的开展，妨害了我们在群众中的威信，减低了干部领导斗争情绪，影响了工作。

(二) 对生产建设工作没有足够的认识，因此对这一工作忽视与不注意

(1) 合作社的工作，我们没注意（特别是生产合作社）没领导，因此新的合作社没有开展，而旧的合作社反垮台了。因此有好多组织生产合作社的有利的条件，便利我们开展生产的组织，如造盐、造纸、织布以及有利于抗日根据地各种生产组织，特别是家庭副业性质的，但是没有注意。

(2) 合作社的官办现象。由于我们的同志对合作社的性质模糊，不清楚，不了解合作社是群众自身的经济组织，不是农会的一部分，因此产生了合作社的官办现象。我们的同志操纵合作社，支配合作社，直接处理合作社的问题，因此使群众脱离合作社，认为合作社不是自身的组织，对合作社不关心，没兴趣，这样合作社不能很好的开展是必然的。

(3) 生产互助工作，我们进行的也是异常不够。互助是农民的要求，农民中互助的形式是很复杂的。我们根据我们规定的组织形式，组织农民进行互助，一定能提高生产情绪，增加生产。上述例子，已可证明，但我们没有注意经常的做这一工作，更谈不到劳力与武力的结合问题。

丙、生活改善与生产建设工作未能很好的开展所给我们的损害

(一) 群众生活不能适当的改善，村会工作缺乏经济基础，因此村会工作不能更进一步的巩固与活跃。

(二) 物质方面给我们很多的困难。目前我们的吃饭、穿衣与各种日用品，以及抗战的一切供给都增加了困难，我们如不加强开展这一工作，将会遇到更困难的局面。我们应该高度警惕。

肆、会员教育

甲、三个月来会员教育工作，有了一些进步，这些进步表现于对会员教育引起了注意重视，初步纠正了过去忽视、不进行会员教育的现象，开始了会员教育工作，因此在会员教育〔上〕收得了一些初步的成绩：

(一) 制定了教材。会员教材除总会编印了一种外，各地还制定了些教材提纲，虽然这些教材还有些缺点，还不一定切合实际，但总算是注意了这一工作。

(二) 进行了些会员教育工作。会员教育，各地零星的进行了这一工作。在会议上，在整理村会中，对苏德战争的教育、前途教育都进行了一些，收到些效果，加强了会员的认识。在个别的村会，经过教育进行了整理，并活跃了个别的村会工作。

乙、会员教育是我们工作中最弱的一环，存在严重的缺点。会员教育是较前注意了，但还只注意，并未能有计划、有步骤配合各种工作任务与政治任务来进行会员教育工作，更缺乏适当的方式方法。因此在会员教育中，表现了很多严重缺点。

(一) 无教材。教材的缺乏，总会应当负绝大部分的责任。虽

然有很多客观的困难，如有教材没人写，没油印工具，但不管怎样，总会是要负责的，而且应当负责的。

(二) 会员教育无计划，无布置，无检查，无总结，这种现象各地都是如此的（就是个别地区布置了会员教育的工作，也是皮毛的、主观的指示几个要点）。因此在会员教育中，呈现着自流现象，下级干部没教材作依据，不知怎样进行教育，不得不自己知道什么就讲什么，想起怎样讲就怎样讲。如运西有个这样的例子，在村级的训练班中，我们的同志作了一两天的政治报告，从国际到山东、到鲁西、到运西的那一套都搬出来了。

(三) 会员教育工作与政治任务、与组织任务脱节。这一严重的缺点不是一般的，用不着我们详细的申述，上边的缺点可以证明。同时同志们只要想一下，就可详悉这一缺点。如在组织工作中的教育（农会的组织教育、会费教育），武装工作中的教育，生活改善与生产建设中的教育以及其他工作的教育，临时的某种教育等，都没有计划的进行。

(四) 缺乏一套会员教育的方式和方法。目前我们在会员教育上，极缺乏经验，还难确定哪种教育方式最适合于农民的要求，更没有创造出新的方法方式来，□建立会员教育制度。

丙、努力〔做〕会员教育工作，创造一套适合会员要求的方式方法，今后应值得我们去重视。

伍、领导问题

甲、三个月来领导上有了很大的进步，这是不应忽视的。无论是对领导的重视上，对领导的研究上，对领导的方式方法的运用上，都和过去有显著的不同，这是值得我们提出并继续发扬的。这些进步表现在：

(一) 建立制度，领导了工作。在各种的制度的认真执行〔上〕，虽然还存在着些缺点，但是会议、汇报、检查一般的是建立了，并有大部已开始执行。同时在具体的帮助上也有个转变，干

部开始具体帮助工作，深入下层领导，在整理巩固村会与建立基点中，我们的各级干部都具体帮助下级的工作。

（二）开始了领导上的研究，初步的运用了领导方式。开始根据各地情形决定领导方式，并注意了提拔干部与培养工作的总结和缺点的纠正。三个月来各地都这样进行的，特别是昆山与运西。

（三）纠正了某些领导上的缺点。鲁西的农会由于各级领导机关的不健全，特别是总会机关建立较晚，因此在领导上存在着很多的缺点。这些缺点在这三个月中有了些纠正，比如初步改变了工作作风和纠正了上名册、强迫命令的发展路线。

乙、领导上的缺点，官僚主义

领导上的官僚主义，首先从总会检讨起。总会对各地的深入具体领导，对各地具体情况的了解都是很不够的，因此就无法实现正确的领导。同时各级农会也同样的存在着这种现象，如领导的包办代替，不通过群众路线，不够深入实际，自高自大，民主作风很差。

（一）掌握不稳中心工作与中心地区。我们在掌握中心工作与中心地区〔上〕都是很差的。在掌握中心工作上，往往因临时工作而放弃中心工作，没有想到中心工作是不能轻易放弃的，不能掌握中心工作，而加强临时工作或突击工作。另一方面抓着中心工作，但又忘了和其他工作的联系，这也是对工作大大不利的。在掌握中心地区〔上〕也是同样，在领导上都是平均使用力量，而忽略了对中心地区的掌握、抓紧和加强中心地区而推动全面工作。

（二）没有注意健全区级的领导。我们分会、县会同志大半是对区会的领导上不能很好的通过区，帮助与推动区去进行工作，多半是包办和代替区，甚至和区干平分工作。这样就一定不能实现区会的领导，一定妨害对区级干部的领导、帮助与培养，妨害区会的领导威信。

（三）领导的事务主义。领导的事务主义也是我们丝毫不容忽视的。这一现象以县区级为最厉害，不能很好的研究与讨论工作，

有计划、有步调的进行自己的工作，而形成跑腿主义与整天办理粮票，收菜金、津贴的事务，不能很多的克服事务上的一切困难。

丙、三个月的工作计划没有胜利完成，检讨起来主要原因应该归结于领导脆弱。我们应当清楚的认识这一点，并对今后的领导提起高度的注意。

冀鲁豫边区各救总会

关于政民配合的指示

(一九四一年十月五日)

各分会、县会负责同志：

自今春敌人开始所谓“强化治安运动”以来，对华北与边区的进攻，在其战略指导上有了基本的改变——敌寇采取了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强调所谓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一元化的总力战，对我根据地采取了彻底毁灭政策。这种改变，在今年4月中旬沙区大“扫荡”与最近对我泰西的平阿、泰肥两山区的“扫荡”中，表现得十分明显。为了应付日寇的新进攻，为了建设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要求我政民间有高度的密切的配合。因此，经各界救国联合总会详加讨论，作出如下的指示：

甲、〔对〕过去配合的检讨

自总会为了加强领导，深入工作，发出建立垂直领导号召以来，各级同志是坚决拥护了这一号召与执行了这一号召，至今无论在领导上工作上都收到了些不可抹杀的成绩，但也发生了一些值得警惕的偏向，如：

(一) 有些同志认为：群众团体有群众团体自己的独立工作，政府的法令与我们无关，政府的法令是由政府的工作人员来执行。这样，就对政府法令采取消极态度，不研究法令，不彻底执行政府法令。

(二) 有些同志只顾在根据地内来作整理与巩固村会的工作，而忘掉向接敌区、敌占区进攻，从开展接敌区、敌占区工作中去巩

固我基本地区的工作。在某些地区竟发生了这种现象：部队与政府前进，克服了据点，开展了边区工作，要求群众干部去配合，群众干部以“没有总会的指示”为借口而拒绝之。

(三)(以下脱落约23个字——编者)，就不能参加别的工作，不管这种工作是自己应作的还是不应该作的。因此，在各地区有些军政民共同紧急任务，需要群众团体动员干部和全体会员去参加，则竟以“恐怕妨害自己的工作”而不去参加。

(四)有些地区的负责同志本位主义很大，对于曾经过总会决定应派出参加某种工作之共同代表，竟争执不下，互相推诿，逾期不派出。如各级优待抗属委员会，总会曾决定各级各群众团体应共同派一次要干部经常驻会以支持工作，但至今已有数月之久，有很多地区尚未派出，致使优抗工作受到损失。

(五)有些同志认为：今后为了密切政民间的配合，为了避免发生无意义的纠纷，要求上级政府和群众团体遇事联署下指示信，竟忘掉政府与群众团体的正确关系，模糊了群众团体的地位。因为政府是立法机关，群众〔团体〕则不是立法机关；政府是统一战线的组织，代表着全体人民的利益，各群众团体是一部分群众的组织，只代表一部分群众的利益；政府的一般法令与指示，群众团体是不能联署的。

(六)还有些同志不明白政府与群众团体的正确关系，认为地区是我们开辟的，先来者居上，或认为政府是老大，我们是老二，以致在工作中□□政府，侵犯政府权利，破坏行政系统，而损害抗日民主政权在群众间应有的威信，这是动委会旧时代的旧作风的残余，是极端要不得。

上述这些偏向，应该尖锐的指出，加以严格的纠正，以建立政民间高度的密切的配合关系，为粉碎敌人新进攻与建设巩固的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以下脱落约22个字——编者)的损害，□□民族解放区史上的罪恶。

乙、今后配合的原则

为了建立政民间的正确配合关系，总会指出以下的原则，希各级同志应根据着对过去配合工作的检讨，展开热烈的讨论与研究，并在今后工作中切实执行。

(一) 政府所颁布之各种进步法令，群众干部要深入的去研究，并以自己的组织力量，保证彻底实现。因为现在的抗日民主政府，是我们人民自己的政府，它代表着各阶级和全体人民的利益。在实行中如发现个别法令的缺陷，应站在爱护政府的立场，向政府建议，请求政府加以修正。但在未修改前，仍得坚决执行。

群众团体在政治主张方面、政策方面，是应该服从抗日民主政府的，所以群众团体的各种工作，如组织群众、教育群众、动员群众参战、改善群众生活等，固然是群众团体自己的事，但要依据于政府的法令，不能超越政府所应许的范围。法令是政府政治主张和政策的具体化，群众团体一定要研究法令，彻底执行法令。

(二) 我们要号召各级干部和全体会员严格遵守政府的各种制度，尤其是财政经济制度。群众团体的干部和会员，是奉公守法的模范，那些以群众团体为护身符而企图破坏政府各种制度的坏分子，在各群众团体中是不容许存在的。

(三) 关于政府所颁布的各种法令和条例，总会于必要时，为了提高干部和会员对这些法令的认识，为了给以更具体的执行方法，要发出指示信，但有些是不写指示信的。指示信有与否，各级干部要遵照行署的训令彻底执行，切不可“无总会指示”为借口而拒绝执行，或采取不关心的态度。

(四) 因各地区具体情况不同，各地区有些具体工作和紧急任务。关于这些工作与任务，总会实不能一一指示，各地负责同志应与同级政府及当地驻军共同讨论，切实执行，并随时报告总会。

(五) 有些个别村、区行政人员，任意破坏上级政府的法令与制度，贪污腐化，欺压群众，鱼肉乡民，群众团体可以号召群众反

对他、改造他。这并不是破坏抗日民主政府的威信，相反的是反对个别坏分子，刷新村、区行政机构，建设村、区政权。

（六）在工作申请要坚决反对不执行上级政府的规定；对群众干部的“抓一把”的现象。因为这种现象，不但妨害群众工作，同时也妨害政府法令的彻底执行。如有这样现象发生，应迅速报告总会，求得彻底解决。

丙、几个具体工作的配合

在今冬有几个具体工作，如破路、抵制仇货、优待抗属和屯积秋粮等，需各级部门号召全体会员，保证政府法令的彻底实现。

（一）破路——要遵照行署训令，规定10月15日到11月15日为破路月，10月15日到22日为破路突击周。在突击周内，实行抗日戒严。除及时深入的动员工作外，号召全体会员与群众积极参加外，并派出干部负责督促检查。

（二）优待抗属——要遵照行署训令，各分会、县会派主要干部参加优抗委员会，并共同派全次要干部，代表各群众团体经常驻会，以支持工作。各区会除派主要干部参加优抗委员会外，并主动的与同级政府及部队共同商讨驻会人员，因为区优抗委员会，只需要一个人经常驻会。关于这一个驻会人员，如真需要群众团体干部驻会，各群众团体就应坚决的共同派干部驻会。

各级优抗委员会的驻会人员，津贴菜金由政府负责。

（三）抵制仇货——抵制仇货是开展对敌伪经济斗争与繁荣根据地的有利武器，各级群众团体要遵照行署训令，派干部参加宣传与检查。这些干部最好多由会员中不脱离生产的干部中抽调。这样可以培养与提拔新干部。

（四）屯积秋粮——屯积秋季公粮，有关军民食，要遵照行署训令，各分会要共同派有力干部3人（最好是生活改善部的人）参加秋粮屯集委员会，并有计划的分派干部到各地督促与检查屯粮工作。这样检查和督促与检查群众工作联系起来进行。这是干部力量

的使用问题，各分会要严格注意。各分会要共同派干部参加（至少10人）。这些干部是由会员中与不脱离生产的干部中抽调，粮票、菜金由政府负责。各村会干部要紧急动员起来，积极参加这一工作，并领导会员与群众，保证屯粮工作的如期完成。区级因为只负责转运公粮，〔所以〕不组织屯粮委员会。但各团体要及时讨论这一工作，详细的布置这一工作。

冀鲁豫边区农民抗日救国总会

冀鲁豫边区工人抗日救国总会

冀鲁豫边区青年抗日救国联合总会

冀鲁豫边区妇女抗日救国联合总会

冀鲁豫边区文化界救国联合会筹委会

今后边区工运的任务（节选）*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

高 光 宇

一、边区形势与我们的总任务

日本帝国主义在“总力战”的方针下，已经对华北各个抗日根据地展开了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特务的全面进攻，掠夺华北的资源，实行“南进北进”，进行新的冒险战争，企图用新的更毒辣的手段达到确保占领地的目的。敌人接受了4年来“扫荡”失败的教训，在对我进攻中，产生了许多新的特点。敌我的斗争形势是更紧张、尖锐和残酷了。边区的严重形势已经到来，而且将来会更加艰苦，这是无可怀疑的。

在目前严重的形势下面，我们必须加强对敌斗争，以我们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战、全力战粉碎日寇的“总力战”，粉碎日寇任何毒辣的进攻。没有对敌斗争的胜利，我们便不能完成建设根据地的任务。

我们怎样开展对敌斗争呢？在目前敌后战争的环境中，主要的应是开展对敌的武装斗争，以武装斗争为中心，展开政治经济的文化的全面斗争。没有广泛的深入的对敌武装斗争，其他各个战线上的斗争便不能展开，我们也就不能取得对敌斗争的胜利。因此目前边区党政军民的中心任务，便是积极的展开对敌武装斗争，造成广泛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

*本文系高光宇同志在冀鲁豫边区工人抗日救国会第一次分会主任联席会上的报告。

我们工会工作，同样的要围绕着这个中心任务，为完成这个中心任务而斗争。但是发动对敌武装斗争，是不能脱离其他工作孤立的进行。我们必须从提高工人地位，加强工人教育，改善工人生活中去完成，不然便不可能。

根据以上的要求及我们目前工运的发展阶段，决定了我们今后的总任务，是深入工人合理合法的民主民生运动，改善工人生活，以大量发展新组织，巩固既有组织，广泛的动员工人参战参军，参加民兵、自卫队，开展对敌武装斗争，造成群众性的游击战争。

和二次工代大会所确定的任务基本上是一致的，现在不过根据形势，特别加强了武装斗争。

二、我们的具体任务

(甲) 积极动员工人参军参战参加民兵，组织工人自卫队，是我们今后的中心工作

开展对敌武装斗争，广泛的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是边区党政军民的中心任务。我们的中心工作便是根据这点而确定的。但是，我们怎样来完成呢？

1、建立健全各级武装部。由于干部缺乏及我们对武装工作的重视不够，各级武装部尚未建立起来。今后我们为了加强武装斗争，各级应积极建立武装部，并努力加以健全和充实。区会及村会要设立武装委员，使各级有专人负责。

2、深入武装斗争教育，使我们的各级干部及广大会员了解武装斗争的重要。中国革命特点之一，便是武装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不广泛的开展武装斗争，便不能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完成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在目前我们便不能粉碎日寇的进攻，打开边区的严重局面。总会编有武装工作的教材，各地要有计划的进行教育。

3、有计划的动员工人参加八路军、民兵和自卫队。八路军是坚

决抗日的军队，是工人阶级的武装，使工友明白八路军和我们工人阶级的血肉关系，有计划的动员工人参加八路军，动员工人参加青抗先、成年人参加模范班。我们号召优秀的工友到民兵去，在民兵里边并且要起模范骨干作用。在规定年龄的工友，要一律参加自卫队。只有我们武装起来，我们民主民生方面的利益才会有保证。在武装斗争中，我们工人应当站在先锋的地位。

4、切实执行优抗工作。优抗工作的好坏，是我们能否动员人民积极参军的重要条件。各地的村会要大量的组织优抗小组，给抗属以劳力的精神的优待。为抗属挑水、种地，配合政权及各团体解决抗属的各种困难，使抗属能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使他们感觉到愉快和光荣。反对轻视忽视这个工作，认为这只是政府的事情的现象，反对单纯的粮食优待。

5、组织工人自卫队。在公营企业中工作的工友，要积极组织工人自卫队。工人自卫队的任务，就是加强工人军事教育，以工人自己的力量保卫工厂，厉行锄奸。公营企业的工友要赶快把工人自卫队组织起来。

军区武装会议的决定，工会今后不能单独领导工人武装，这个决定是完全正确。我们要防止个别干部便由此而放松武装工作、消极怠工的现象。

(乙) 大量提拔、培养干部，充实、健全区级领导

目前工会的干部，是非常可怜的，不但数量少，而且质量差。“干部决定一切”，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我们今后只有很好的解决干部问题，提拔、培养大量有才干有威信干部，才能开展工会工作，这是一个关键。

过去我们在提拔、培养干部方面，是有不少严重缺点的。一般的说起来，我们各级领导机关对提拔、培养干部，都重视不够，

缺乏计划性。个别地区注意了这个工作，也缺乏原则性，提拔干部没有最低限度的标准，以致所提拔的干部不但不能开展工作，而且使工会的威信受到损失。乱提拔，不加选择，不管其动机如何，来的就要，不从工作中斗争中提拔，只注意动员工会脱离生产的干部，以上的严重缺点必须纠正，提高计划性原则性。

3、我们怎样去提拔、培养干部呢？我们必须克服目前的许多缺点，并防止新的缺点，如感情用事、越级提拔。提拔干部要反对只看金字招牌，但也反对一点也不注意成份的现象。我们要从斗争中、工作中发现积极分子，特别加强教育，培养其威信，提拔、培养一批优秀的干部。提拔干部要有最低限度的标准，不能滥提：①要忠实于民族解放及工人解放的事业；②要有责任心，工作积极负责；③要与工人群众有联系；④要有一定的工作能力。提拔干部我们反对单纯的技术观点，主要的应从政治上着眼；但既然是干部，就需要有相当的能力。

4、我们怎样培养、训练现有干部呢？①我们要特别加强干部教育，建立干部学习制度，克服干部不愿学习的现象，提高干部的政治文化水平，□□帮助下级干部总结工作，吸收工作经验，提高干部的工作能力。现在我们很多干部，不会总结工作，做了就完了，不管胜利或失败，都没有经验教训，这是不能提高干部能力的。②开展自我批评，克服干部中的许多缺点及不正确的意识，提高干部的品质。目前干部间无原则的和平共居的现象应立即停止，对现有干部加以轮训。我们要求现有干部能够普遍的提高一步。

5、区会要实行民主改选。过去的区会委是委派的和任命的，今后我们要认真的进行民主改选。只有如此，方能提高会员的积极性，增强会员的组织观念，并能发现大批有威信的、和工人有密切联系的干部。经过民主改选的区会，我们要求：①有健全的区委员会；②至少有一个脱离生产的称职干部；③不脱离生产的干部能够工作。

(丙) 彻底执行劳工保护暂行条例，改善工人生活

1、劳工保护暂行条例，是根据抗战建国纲领的原则制定的，不但照顾了工人的利益，而且照顾了厂方的利益，贯彻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精神。其目的就是为了巩固阶级团结，提高工人的生产与抗战热忱，增加抗战力量。劳工保护暂行条例我们应当在干部中展开深刻的研究，并加强会员教育，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

2、执行劳工保护暂行条例是我们目前主要工作之一。因为工人的生活太清苦了，地位太低了。我们必须对工人的利益加以切实的保护，否则便很难进行其他的工作。

3、劳工保护暂行条例的中心问题，是工资问题，但工人工资的增加却远远的落在物质〔价〕高涨的后面。工人每年所得的工资甚至不够个人的吃穿，家中老少陷于饥饿之中，所以增加工资是一个非常急迫的问题。今后我们为着适应战时物质涨落不足的情形，要实行粮食工资制。粮食工资是最合理的，不论对雇主雇工都有益处。在增资中我们要掌握正确统战原则，过左过右都会使我们遭到损失。我们不能只顾工人一时的利益，要照顾到工人的职业问题，不但只看目前，我们要看更远一些。

4、劳工保护暂行条例第二个问题，是劳工保护问题。我们坚决反对打骂与侮辱工人，□□保护女工、青工和童工，缩短学徒年限，改变学徒店员的待遇。工人得了疾病，资方要负责补助其医药费。提高工人的地位，尊重工人的人格，改善工人待遇。

5、彻底实现劳工保护暂行条例是一个艰苦的斗争过程。①要加强工人教育，提高工人觉悟，没有工人本身的团结和积极争取，便不能实现。②要召开雇主座谈会，并利用各种宣传方式，向各界进行广泛的宣传解释。③干部要加强劳动政策的研究，防止“左”右的倾向。④方式方法要灵活，工会要站在调解的立场去处理劳资问

题。⑤要有中心有基点的去实行。政府颁布了劳工保护暂行条例，但是距离彻底实行，尚有一个艰苦的斗争过程。

6、增资以后工人的生活待遇得到改善了，我们就要特别强调执行劳动纪律，以巩固阶级团结。工会要保证执行劳动纪律。我们暂且规定以下三条，以后可随时根据需要加以充实和修改：①积极工作，增加生产，反对怠工和偷懒；②要爱护生产工具，爱惜并节省原料；③遵守劳动合同。

(丁) 加强会员教育，提高会员文化政治水平

1、提高工人的文化政治水平，是我们工会的重要任务之一。在阶级社会中，工人阶级是没有受教育的权利的，工人绝大多数是目不识丁的文盲。我们如果不积极的提高工人的政治文化水平，丰富工人的革命知识，工人阶级便不能完成其领导革命解放人类的历史使命，工会也不能走向巩固和活跃。只靠增加工人的经济利益，不提高工人的政治觉悟，是非常错误和危险的。因此，加强会员教育是我们工会工作重要任务之一。

2、已往我们各级组织对会员教育的重视是非常不够的，呈现了没计划、不系统、零乱不正规的现象。今后要为建立正规的会员教育而努力。总会要负责编印课本及教材，要大量开办流动训练班，组织识字组、夜校、俱乐部。但是，工人的学习不要妨碍生产。

3、在目前，我们要以大力动员工人参加冬学，抓紧冬季这个良好的时机，通过冬学来实行会员的文化政治及组织教育，巩固活跃工会组织。冬学运动广泛深入的开展，将使会员教育奠定初步基础。

4、健全宣传教育机构。我们的宣传教育机构是非常不健全的，有不少县份，根本没有一个人负责。这样怎能够深入会员教育工作呢？因此我们要积极提拔、培养宣教干部，充实宣教机构，加强对会员教育的领导。我们除有计划的吸收先进的知识分子参加工作外，我们还须要努力培养一批工农宣教干部。非知识分子不能做文

教工作的观点，是不对的。

(戊) 加强国防企业与手工业工会的领导，提高工人的生产热忱(略)

(己) 开展生产建设事业

1、经济建设是根据地各种建设中重要的一环。我们如果不能发展工业，农业及商业，繁荣根据地的经济，富裕根据地的财富，在经济上取得自足自给，我们便不能支持敌后长期的斗争，供给战争的广大需要，在日寇的封锁及蹂躏之下，我们将发生重大的困难。在经济建设中，我们工人在发展根据地的工业上负起重要的责任。我们必须积极的参加生产建设事业，在大发展根据地的经济的任务下完成我们工人所负的重大责任。

2、我们一方面要发展各种手工业，另一方面我们要努力开办各种日用必需品的工厂。但是我们怎样开办呢？①有管理工厂经验的失业的老工人，可向银行贷款，自己经营；②可以和地方士绅共同经营，由他们出一部分资本，帮助政府开办。我们有计划的动员工人参加工作。这些办法都可以。当然，在今天敌后的环境开大工厂是没有这种条件的，但小规模工厂是完全可能建立的。

3、我们要有计划的吸收敌〔占〕区的工友到根据地来参加工作。敌占区的工友在敌人的蹂躏之下，他们是不甘心的。我们应当努力吸收他们到根据地来参加工作，在〔把〕他们从火海中拯救出来。大城市沦陷以后，流落内地的失业工友，我们也应积极的把他们动员出来。

4、我们要加强技术的研究。手工业工会及开办起来的工厂的工会，要成立技术研究委员会，在现有基础上努力改良技术。

(庚) 为争取30个模范村工会而斗争

1、创造模范村会是我们巩固深入工作的一种方式，是带有竞赛

意义的。在一定的条件下及一定的时期内，号召各村会争取模范，使我们的工作提高一步，使之更加巩固活跃起来。今年下半年，我们要为创造30个模范村会而斗争。

2、模范村会是有一定的条件，只有完全达到了这些条件，才算模范。我们的模范村会有六个条件：

- ①保证会员参加自卫队、民兵；
- ②保证会员□□归队；
- ③保证实行劳工保护暂行条例；
- ④会员要受到两次流动训练班的训练；
- ⑤会员要爱护村会，村会能讨论问题；
- ⑥有健全的村委员会。

3、我们怎样争取这个计划的完成呢？首先我们要进行深入的教育动员，使会员明白模范村的意义及作用、模范村会的条件，发动会员自己起来努力争取。其次要发动革命竞赛，造成竞赛的空气。再次我们要加强村会的领导，深入工作，转变作风。只有如此，我们才能争取计划的完[圆]满完成。

冀鲁豫区党委关于青抗先 领导关系的决定

(三月十五日)*

目前边区青抗先工作已获得相当发展，树立不少成绩。但由于未能建立独立系统，与各方面关系不明确，领导上的混乱，对青抗先的独立性、民主性认识不足，缺乏教育与训练等，致使青抗先工作陷入不应有的消沉无力与进步迟缓的状态中。区党委为了改善对青抗先的领导，在领导关系上有如下决定：

甲、明确认识青抗先的性质与任务，建立正确的领导观念

1、青抗先是青年群众自己的不脱离生产的半武装组织，是以工农青年为基础、力求武装全体青年的独立群众组织，因此必须保持与尊重青抗先组织上的独立性与群众性，青抗先工作方能得到很好发展。所以，青抗先有其独立组织系统，可以单独的颁布行文，有自己的关防公章。

2、但同时青抗先是民兵的组成部分，今天又必须是抗日战争任务的担负者，所以在军事的指挥与领导上，执行抗日战争的任务上，应绝对接受抗日政府武装部门的领导，应服从民兵斗争的统一性。当各地人民武装自卫委员会未建立时，青抗先有其独立组织系

*原件无年份。据当年参加过冀鲁豫边区青运工作的同志推断，此件应为1942年的文件。

统，接受武装部门的指挥与领导。在武委会建立的地方，则青抗先各级队部合入武委会，成为武委会的青年武装部。

3、青抗先工作是民兵工作的重要一环，这不只是青年工作部门的工作，而是党政军民的共同任务。所以在人民武装工作中不只注意游击小组与模范班，对青抗先同样予以注意与帮助。

4、青抗先是青救会的组成部分之一，是青年运动中的坚强骨干。为了满足青年的共同要求，加强其领导，各级青抗先一定要接受各级青救会的政治领导。

乙、为了克服过去错误，今后青抗先 与各方关系有以下具体规定

1、青抗先与青救会关系

a、青抗先是青救会一个组成部分，在政治上受其领导。但青救不是直属上级，青救无权力直接指挥调动青抗先。要切实克服过去包办代替或切断上级队部领导的现象，尤其不应在进行青抗先这一中心工作时放弃对青年全面活动的领导，把青抗先工作独立起来。

b、青救会要领导青抗先积极参加青救会全面活动，满足青年共同要求，解决队员困难；对非会员的队员亦应经过说服教育，吸收他们参加青救以及青年的全面活动。至于青抗先的政治、文化、娱乐工作，更应通过青救进行。因此，要反对在发展青抗先中非青救会员不要的关门现象，及青抗先不参加青年全面活动的单纯军事观点。

c、青抗先要按时向青救会报告工作，参加一定会议，接受青救政治领导；同时，青救亦应按时向其指示工作。当双方意见不一致或不团结时，应向各自上级报告解决。

2、青抗先与武装科的关系

a、青抗先在军事上要绝对统一于武装科指挥与领导，但武装科不是直属上级，一定要尊重青抗先的独立性、民主性，不得干预其

组织上的独立性，抹煞青年群众的特殊要求。

b、青抗先是民兵的骨干，青抗先工作计划应服从于武装科在武装工作上的统一计划。青抗先不得强调独立性，与整个武装计划相抵触。武装科亦应重视青抗先工作，把青抗先工作作为自己武装工作的重要部分，及时的给青抗先工作以方针，帮助实现青抗先工作计划。

c、青抗先须按时向武装科报告工作，参加武装科会议。武装科应经常指示、检查青抗先工作。

d、青抗先弹药供给问题应由武装科统一计划，与游击小组同一待遇，尽量解决其困难。

e、青抗先干部的生活供给由武装科负责。

3、各级青抗先干部的住址问题

a、为了统一对敌，加强武装斗争的领导，克服青抗先组织上的散漫现象，适应今后严重战斗局面，已经组织起来并建立了青抗先队部的地区，在武委会未建立时，应争取其与武装科靠近活动，共同生活。但这一要求的实现是一个工作过程，不应简单命令从事，要进行充分的动员工作。青救会应动员其接近武装科，武装科应加强其帮助，密切彼此关系，在不引起青抗先队员不满的情况下，达到青抗先与武装科共同行动之目的。目前已住在武装科的青抗先队部，即应仍住在武装科。青救负责动员、说服青抗先干部安心接受武装科的军事指挥与领导，并仍应加强青救对青抗先的政治领导与帮助，密切与青抗先的关系。同时武装科也应转变领导作风，改善领导关系。

b、但估计到某些地区青抗先工作方在开始，青抗先的发展尚须更多依靠青运的开展，这些地区在青救内仍应设立武装体育部，负责开展青抗先工作。青抗先队部难独立成立时，初期仍可与青救体育部一块办公，随着青抗先的发展，求得逐渐建立青抗先的独立组织系统。对这些地区的青抗先工作，武装科仍应加强领导与帮助，解决其困难与供给问题，不应有所例外。

丙、切实树立青抗先系统工作， 打破目前消沉、混乱现象

1、树立青抗先独立组织系统，严密组织，加强领导，是活跃青抗先工作的重要关键。故除青救要配适当干部作青抗先工作、建立青抗先系统外，各级武装科亦应负责适当配备干部。

2、青抗先的组织路线仍是大量发展，但在有相当基础的地区，亦应加强教育训练工作，从巩固中求得发展。提高现有干部质量，是巩固、活跃已有青抗先的重要保证。

3、青抗先切实要执行总队部规定制度，树立各级队部独立工作，充实工作内容，深入下层，严整组织。

4、树立青抗先特殊作风，除队风、队礼、队歌、队旗逐渐实行外，要创造一套青年化的活动方式、工作方式，以活跃队员、干部的情绪。

各级党委接到此指示后，即负责解决关于青抗先各种问题并改善对青抗先的领导。

冀鲁豫区党委青年运动委员会

关于迎接华北青运统一

准备工作的指示

(一九四二年四月一日)

各级党委转各级青委：

一、北局青委决定今年8月成立华北青联筹备会，并召开党的青年工作会议。其主要任务与目的是总结抗战来华北青运经验，确定今后青运发展方向，准备统一华北青运，依靠华北青年团结统一之模范精神，积极推动全国青年之团结统一。我们边区亦准备派3至5个代表参加盛会。目前即须加强具体实际的准备，以实际工作的成功来迎接大会的开幕。

二、为了能更确实完成准备任务，我们要求各级青委认真进行下列工作：

(一)贯彻1942年的工作计划与精神，以1、发展1万个坚强战斗的青抗先；2、完成1500个有工作内容的村青救；3、胜利的民主改造各级青救组织；4、完成两个与4个村的调查，作大会的献礼。

(二)要根据边区青联制定的《统一华北青运宣传提纲》，经常有计划的通过“五四”等各种机会，运用各种力量，采取各种方式，联系自己工作，在组织中进行不厌倦的广泛深入的宣传鼓动工作，使全体干部、队员、会员深刻了解统一华北青运的实际意义，主要是求得各地工作深入平衡发展，推动与深入本身工作，展开对敌尖锐斗争，活跃会员生活，鼓舞干部情绪，教育广大群众，并非求得简单的形式化或一时的热闹。

(三)实际的迎接大会，还必须展开深入的调查研究与总结工

作的巨大工程。望各地同志根据青联制定的调查提纲、总结提纲，有计划的抓紧每一个时间，对一定地区（特别是接敌区、敌占区或基本区），对一定问题（干部、文教、抗先、武装、儿童、对敌斗争等）作出调查与总结，随时寄来区青委。5月底前各级青委须彻底的详细的完成这件工作。

三、各级青委要通过这一工作来正确认识下层问题，转变主观主义、形式主义作风，以实际工作祝贺这次会议的成功。

冀鲁豫边区青年抗日救国联合会

关于边区青年运动的当前任务*

(一九四二年八月)

第一、对边区青年运动的认识

边区青年运动发展的现状进入极不平衡的状态，许多不同类型的地区中都有着显著的差别，就是在同一性质的地区内，县与县，区与区，甚至村与村之间亦有显著差别。特别在两边区合并后，群众运动与青年运动的发展，更有其特殊不同。

边区工作这种发展的差异性，使我们工作布置、领导方针、一个运动、一个号召不能同样贯彻，齐一步骤，统一行动。过去我们没有掌握了这个特点，空想造成全区青年运动的大热潮大运动，因此流产了，碰了壁，这是第一。

第二，边区青运发展较晚，基础还薄弱时，就遭受了敌人、叛军的打击和摧残；更由于在青运每个阶段的工作环节犯了某些缺点与错误，造成了我们工作发展赶不上形势的发展。边区青运3年来并未充分发挥对敌斗争应有作用，敌人“蚕食”开始时，在我们麻痹情况下，造成青运有基础地区退出、垮台和大部青救消沉的严重现象。目前由于敌人对华北进攻的方向是由西到东，由北到南，再加上边区在华北所处的战略地位及敌人统治较薄弱，敌人的大规模进攻也就迟缓（这只是暴风雨的前夕），使目前青运有可能利用这一空隙时间，我们就应该迅速紧张的抓紧这空隙时间开展工作。这

*本文系边区青联8月决议。边区抗联于9月通过，并通知各抗联分会根据这个决议和当地具体情况布置工作。

种发展趋势，使我们不能搬运其他先进根据地青运的一般发展规律，机械争吵什么“巩固”为主“发展”为主的问题，而应按边区环境，工作复杂性、不平衡性等具体情况，提出不同工作方针和方法方式，而又必须抓紧敌我斗争变化的时间性来改变方针。

第三，两个地区（老冀鲁豫和鲁西）青运发展表现着显著的两个特征、两条不同的道路：

（一）鲁西区：强调了青年组织的独立性、特殊性，超过了一般群众运动而畸形发展，造成了突出孤立与“先锋主义”不良倾向。

（二）冀鲁豫区：强调了群众运动的统一性、一般性而取消了青年运动独立性，犯了限制青年运动发展的错误。

两个地区合并以后一般趋势，又一致的强调了青年运动的独立性和特殊性，同时青运脱离了政治任务，又没有掌握住边区工作特点，也未掌握住根据地群运只有农运得到发展，青运才能得到顺利的发展，只有一般农民生活得到改善，青年生活才能得到改善的规律，而片面的强调青年特殊痛苦的解决，□□“活跃”“先锋”求得青年群众的发动，使这种畸形的群众运动发展到一定程度，使青运陷入了消沉停顿状态，并将由局部进入全部消沉状态中，是值得我们高度警惕的。

第四，青年统战的组织成份表现了严重的关门主义。在边区青运中开始发展时，只组织了一部先进知识青年，以“民先”为主体的所谓青运的“黄金时代”，是关门主义的青运阶段。1940年提出“深入工作，创造以广大工农青年为基础的青年运动”后，青年干部又抛弃了组织知识青年。长期埋头于下层工农青年工作，极端的发展，又使青年运动转向了第二种关门主义、宗派主义（目前青运阶段）。特征是：（一）地主子弟、知识青年关在门外；（二）真正贫苦青年、雇工佃户青年未被发展起来；（三）青救组织80%以上是一般的中农、贫农成份，形成青年运动广泛的统战未开展，而工农青年亦未占有确定的优势的畸形状态。

第五，青运表现宗派关门的原因和边区青年干部的质量特点是不能分开的。

边区青年干部75%（今年2月统计）是中农小知识分子（高小程度者），工农干部全地区仅15名。这些成份的主要特点是斗争的坚持性和彻底经常性不够，社会经验贫乏，不关心农村青年痛苦，造成一方面脱离广大工农青年现象，另一方面则清高的脱离了农村知识分子，甚至以鄙视的宗派主义态度排斥他们；就是在少数的先进群众中也未生根，只是站在群众头上的“工作员”，以致环境艰苦时情绪低落，甚至悲观失望。

第六，这些小知识分子的特色，反映在领导上的显著特征是严重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与空谈主义，整天在领导机关空谈，发指示，闹配合，闹特殊，闹独立，闹本位，闹不团结，高谈“□□”“发展”“巩固”等名词，对实际工作则漠不关心，因此使边区工作受到了很大的损失。这种空谈主义与官僚主义实质上是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

上面6个问题，也说明边区目前青运的大缺点和力量薄弱的状况，在边区敌我斗争形势处于重大变化，暴风雨的前夜时，我们应抓紧有利时机，工作“老一套”的领导应当打碎，必须创造边区青运发展的新道路。

第二、目前边区青运任务

一、“开展民主民生运动，改善青年生活，发动与武装青年，开展游击战争”，是边区青运总方针，和边区党政军民的总方针“开展民主民生运动，发动群众性的游击战争”是一致的。具体的讲，这个方针包括改善青年生活和发动组织青年参加武装斗争两个基本内容。但是在这里必须防止可能发生的偏向，只注意工农基本群众的发动，忽略了或违背了青年统战的原则。因此在根据地执行这一方针，就必须明确的分为三个具体任务：（一）改善青年生活；（二）发展巩固青抗先；（三）团结知识青年、地主富农子

弟。三个问题如何联系，究竟如何执行呢？

(一) 开展民主民生运动，改善青年生活

这个口号的本身就是说，从一般民主民生运动整个农民生活改善中求得青年特殊痛苦的解决、生活的改善。这就是要发动青年和农民坚决执行土地政策，坚决执行减租减息，反贪污，清理村财政与改造村政权的群众运动。

怎样开展民主民生运动，怎样求得青年特殊痛苦解决呢？

1、我们认识，农民生活得到了改善，青年农民生活也就得到了基本上的解决，因此，对民主民生运动我们应发动青年积极参加。因为青年社会地位低下，社会经验缺乏，由于民生斗争是一种农民和地主（减租减息）、工人和雇主（工资）的斗争，而青救本身是各阶级各阶层全体青年性的统战团体（这是和农会、工会不同的），它不但要照顾工农青年利益，同时也得顾及团结地主富农子弟，因此在斗争上一般应以农会为主，青救配合动员工农青年参加，而优秀会员、干部与有独立经济地位的青年，应亲身领导，成为民生运动的主力。同时应争取与教育地主富农子弟同情与帮助这些工作。我们的口号是：“青年应成为执行法令的模范！”

民主斗争是全体性青年的要求，如反贪污，改造村政权，反恶霸，反不平事件等，青年应成为这些斗争的积极参加者和支持者，成为斗争的骨干与先锋。至于全体性的民主要求，如合作社赈济，青年也应积极参加。

关于民主民生政策、斗争策略、工作方式与步骤，我们要向农会学习，要与农会齐一步骤去作，不可幼稚、突出与漠不关心，要坚决克服右倾与今后可能发生的“左”的行动，以达到在民主民生运动中改善青年农民生活，发动工农青年参加抗战的目的。

2、在民主民生运动中提高青年斗争情绪，求得青年特殊痛苦的解决，这第一个重要前提，是深入的调查研究与了解发现青年的细小痛苦的要求。青年目前的痛苦，最明显的是家庭束缚学习要求，政治地位低下，□□繁重，早婚与过□劳动问题（参看两对青年生

活的调查)。但这些要求是复杂的多样的，个人与个人的不同，各阶级的不同，知识与劳动、富有与贫苦青年不同，各地区的不同。因此我们要研究这些问题的本质，想出解决的办法。

解决青年痛苦要能掌握住当时政治条件、政府的法令原则和群众的要求三个条件，也就是要根据当时环境，遵照政府法令（并可加以发挥），为广大群众有利与同情的三个原则，同时要与其他团体配合与发扬民主。

具体的方案与具体改善的方法方式，应根据有关青年利益的法令去执行。应在不断的斗争中去创造与积累经验，一般的应注意青年统战与家庭和睦，利用和平的说服调解与必要的对坏分子（人民痛恨者）打击来达到目的。

的确这一工作的开始很困难，因青年群众觉悟程度低，有怕事心理，因封建思想的束缚与风俗习惯的传统，青年常常提不出要求，我们干部亦随之而说“青年没有痛苦”，或者只知道青年的唯一要求就只是手榴弹。我们应提出：说青年没有痛苦的人是官僚主义者，现有问题不能解决是不下决心解决；中心问题在于我们青年干部对这一个改善青年生活工作有没有下苦功夫。

（二）关于发展巩固青抗先问题

青抗先是否是中心工作？民主民生和青抗先究竟哪个工作为主？这就必须了解青抗先工作所以陷于停顿消沉、部分垮台的原因，除干部少、关系不明确、恐青救包办等外，基本原因由于青年生活没得到改善与广大基本工农青年群众没有发动起来，青年受着多方面的束缚，不能发挥其积极性。所以青抗先工作脱离了群众要求，硬成为中心工作，是不妥当的。我们应按具体情况执行，可分轻重迟缓〔缓急〕。

在根据地一般应以民主民生工作为主，从民主民生运动中抓紧一切机会开展与巩固青抗先。但在接敌区对敌斗争尖锐地带，青年武装要求迫切或实际已在无组织的进行武装斗争。我们应首先积极建立联防，已有联防地区，又须紧接着开展民主民生工作，树立民

兵骨干，以充实巩固联防与联防内的青抗先工作，发挥青年在联防斗争中的突击先锋作用。

我们干部必须学会掌握这一方针。我们要在民主民生运动中抓紧一切有利机会建立青抗先组织。8月份，县县青救学会了这一方针，在□□减租运动中发展的抗先数目，相等〔当于〕过去一年的二倍，特别的完成了计划，充分证明了这一方针的正确性。

这里我们必须纠正过去青救、武装科双方宗派本位的观点，统一青抗先发展道路的认识，一致扶植领导青抗先的发展，包办、忽视都是不对的。

至于抗先工作其他更多问题，一般的可执行过去抗先的指示与参照下面各项进行。

（三）团结知识青年：

知识青年包括两部分，小学教员、学校学生（中学、高小）及失散在农村的广大知识青年。这些是青年运动中主流之一，过去是被我们严重的忽视，关在门外的，在目前争取与团结知识青年的意义在于开展青年统战，团结青年一代，使之成为开展接敌区、敌占区工作的桥梁，推进农村国民教育、青年教育的第一助手。

1、团结农村知识青年

广大知识青年失散在农村，由于，①根据地群众工作基础尚弱时，就受到敌人摧残、打击而沦陷为敌占区。②有大部分地区与敌军交接，或由于顽固反共，对知识青年争夺的积极，更由于我们忽视，乃使部分知识分子为顽固思想所蒙蔽，对我们怀疑、恐慌，主张什么“南来北来都应付，老老实实做好人”的等待时机观点。③中小知识青年受家庭的束缚，参加了劳动。④主要原因还是我们宗派主义，对他们的排斥与忽视。就是做了一点，也是和王农青年一样看待，开些无意义的会议讲八股，很难适合他们的口味。

成千成万的知识青年长期在农村，5年来，在敌我与反共派三方面争夺下是起了一些变化。一部分参加了抗战，一部分参加了劳动或上私塾，所谓不多事的好人，一部分则逐渐流氓化或参加三青

团,受了顽固反共派思想的影响.但在一般的讲,在思想上的特征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但个别被汉奸利用者除外),部分受了顽固反共派和封建思想的蒙蔽,思想极不稳定,大部虽同情抗战,却等待时机而积极性不高.对争取团结青年知识分子,我们仅根据某些地区经验提出以下意见:

(1) 我们开始这一工作,首先选择些有很多的同学关系者,对有威信的学生展开拜访联络交朋友工作,或号召学校学生会开展互助失学青年学习工作,先组织少数先进同学,号召他们发展组织,再扩大组织.这里须特别注意团结知识青年,要从满足学习要求做起,再解决其各种困难,同时应注意他们前途教育,说明国共两党长期合作问题,根据其怀疑心理坚定其抗战意志.

(2) 组织形式应根据下列三个原则:①知识青年根据自己要求而自动结合;②顾及到他们的特殊地位与特性;③注意防止其宗派主义脱离工农群众.

从这个原则出发,我们可采用以下各种形式:

个别的可聘为村青救指导员、青救宣传员、青年文化教员或文化娱乐委员等团结他们.

集体的组织不可拘泥于一种形式,应按他们的要求结合,如泰西的珠算会,鄄城同学抗日救国会,□区的读书会,寿、范、朝、阳边的青年农余学社等,还可以用冀鲁豫日报读书会、写作小组、冬学文化教育组及其他形式去组织团结他们.这些小组或团体受村青救或县区青救领导,但需发挥其活动的特殊性.

较大知识分子,可聘为青救顾问或总会分会直属会员.

(3) 知识青年组织的任务,一是自身学习修养,二是开展农村文化活动,三是和工农青年一齐参加抗战工作.这三个任务执行,在开始组织时,应强调其自身学习重于本身利益,再逐渐提高和工农青年的接近,开展青年文化活动,担负村青救文化教育工作,管理俱乐部,进行冬学教育,以逐步提到对敌斗争的更大任务.

2、团结小学教员

这工作过去是空谈，现应从头作起。我们须了解边区部分小学教员的落后性（如“安生”“发财”的思想），因此：①第一步，是得将青教和文教科的互助条例及行署青联对青教、文教科、儿童团、小学教员的关系决定，在教员中深刻传达，为他们所深刻认识。②可聘请他们为青教指导员（隆重的发给聘书）。此外，我们的干部可通过教育科，用教育科的名义检查帮助小学教育，或密切与各县教联联系，互相帮助工作。③特别应注意动员儿童上学，照顾解决他们在生活上学习上工作上的困难，使青教逐渐成为开展国民教育的第一助手。

3、学生会的工作

最近学运有些发展，个别学校开展了对不合理事件的斗争。这种民主精神与保卫学生利益的行动应高度发扬。目前学运的中心问题是整顿学风，满足学生的学习要求，展开更多的社会活动。此外还有一个重大问题：“学运应求得统一”，鲁西北运西分会首先应成立学联分会，其他地区亦须加强对学教领导。

以上三件工作一定要和文教科、文联、教联取得配合。我们在掌握上，学生工作应确定县级以上机关负责，下层干部要注意普遍的团结知识分子，并有重点团结小学教员，防止“抓一把”与平均使用力量。

团结知识分子工作在开始时遇着两个困难，也是两个基本问题：

第一，青教与三青团的团结问题。争取与团结三青团大多数团结抗战，是青年运动的既定方针，因此我们对三青团应慎重调查，分别其内部抗日分子和反动分子，以分别进行工作。对大多数三青团〔员〕应帮助其学习进步，推动他们参加青年团体，或组织其他青年团体，或公开活动，互相帮助，一同抗战。对其反动顽固青年，对破坏抗战的特务，一方面抓紧其事实与证据，在广大青年中揭露、开展斗争。在知识青年中应有计划的教育，消除他们怀疑心理，达到团结抗战目的。

第二个问题，我们青年干部的宗派主义严重的存在，成为团结知识青年的最大困难之一。我们应在整风浪潮中与宗派主义开火，彻底将它肃清。

二、根据边区总方针，在接敌区、游击根据地的方针，是从切实保护青年切身利益，反对敌人残害青年的各种斗争中，发动广大青年积极参加游击战争。其具体任务是：

(一) 切实保护青年切身利益，团结广大青年。敌人对青年的残害是十分毒辣的，假如不认真保护青年切身利益，则根本不能达到团结、组织、武装广大青年的目的。因此必须根据敌人对青年迫害的花样（抓丁、抽丁、劳役、奸淫等），以及敌人给予青年的家属亲属的各种压迫等，在不同地区灵活展开合法、非法、和平、武装的各种斗争，减轻敌人对青年的迫害，减少对敌负担。

(二) 组织青年积极参加群众性游击战争。在游击根据地、我占优势接敌区，我们应动员青年参加与开展游击战争；在敌人统治薄弱区与劣势接敌区，亦必须进行隐蔽的武装斗争，组织游击小组，发挥青年在斗争中的骨干作用。

(三) 加强青年政治文化教育与进行尖锐的思想斗争，配合政治攻势进行“今年打败希特勒，明年打败日本”的教育，克服悲观失望情绪，提高胜利信心。

执行以上三个任务时，在开始须先注意保护群众切身利益，以团结广大青年，恢复青年情绪，再逐渐提高到群众武装斗争，并随时贯穿对敌政治斗争与深入青年教育。根据此方针与任务，在组织形式与领导上应求得适当改进，并随时准备恶劣环境到来时的及时转变，减少不必要损失。

1、在能公开活动地区，组织村抗联统一领导各教，划分工农青妇小组，或按街道分组，或不划小组，并可组织各种灰色组织补助之。但须注意适当的发挥青年特殊系统工作。

2、不能公开活动地区，采取多种多样的组织形式，不拘泥于一种形式。公开的和秘密的应划分清楚，避免遭受摧残。主要的还是

利用各种合法组织开展敌伪青年团体中工作。于必要时，可组织抗日非法组织，但力求短小精干。

3、随时准备环境恶转，由公开活动转为秘密。因此我们要注意群众思想，动员准备职业干部，转变村会组织形式。在开始首先转变活动方式，隐蔽的对敌斗争。当敌人已不注意时，我们应即时根据群众要求自下而上的组织各种有内容的，经济、学习、政治、职业的灰色组织，并掌握本村迷信落后团体，大量求得转变。当敌人进一步控制，强制组织自卫团、新民会、青年团，抓青年训练时，我们应有计划的打入掌握，争取长期隐蔽与合法地位。这里干部及组织不易领导时（成为敌占区时），可适当处理之。

4、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是我对敌斗争的总任务。我们必须有组织的发挥青年武装斗争作用。在能公开活动地区，仍建立青抗先，但在领导上与武装科统一进行。村级和模范班须取得一致行动，统一组织，共同选举一人统一领导。同时，这些地区发展民兵时，可根据青年觉悟程度与青年要求，适用多种多样形式武装青年。为准备坚持残酷斗争，在民兵内应建立秘密游击小组，并加强与自卫队团结，防止突出孤立。在敌统治薄弱区和我们占劣势接敌区，应转变和组织游击小组，开展隐蔽的武装斗争。

5、在干部领导上，从村到县组织抗联统一领导。早些准备秘密干部，求得职业化。在平时教育他学会斗争方式，密切其与广大青年的联系。在环境恶转时，公开干部应调整隐蔽，红的干部必要时应抽出工作。同时应强调干部和群众进一步密切联系（因干部与群众打成一片是保证干部坚持斗争的首要办法）。至于灰色组织要由职业干部负责，不可和公开〔组织〕混乱。县与区，区与村，领导机关与职业干部间应建立秘密交通联络站，加强及时领导，抓紧有利时机对敌斗争。

在领导上的分离和干部不团结的现象应最后肃清，这是坚持接敌区与游击根据地工作重要保证之一。

第三、转变领导与整顿“三风”

最后实现问题还是决定于干部和领导问题。我们目前转变领导基本问题，还是在于实际深入工作，转变作风。这个口号在1940年就提出，但转变迟缓，拖延直到今天收获不多，其原因首先由于空谈主义、官僚主义。现在为实现转变领导提出两个实际问题。

一、确实深入工作。过去空谈深入而无人深入，现在我们要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是头大脚轻，现在我们要彻底简政，充实县区级。过去我们各团体本位、分离，浪费力量，现在我们实现统一领导。为迎接严重形势的到来，实现这一口号，我们就必须在领导上求得彻底改革。最近各救总会决定组织抗联，我们青年干部要拥护执行这一决定，做深入工作的模范。某些同志强调独立，不满意这统一，对青运悲观失望，不安心工作，是不对的。我们为了统一而放松了青年工作，也是错误。反之，我们了解这次决定的真正精神，正是为了更有力的开展青年运动。我们要坚持青年工作岗位，正确掌握青运的统一性、独立性，提高每个干部的工作效率，保证青运在开展民主民生运动与加强农民运动中得到转变与开展。

二、领导转变的中心问题，是彻底转变“三风”。我们青年干部应根据群众运动的整风计划去执行。整风在边区青年运动中有非常伟大的意义和作用的。边区青运是在进步力量占优势的农村，主要采取了自上而下的搭架子的方式发展的，没有真实内容。全体青年干部是知识青年新干部，对下层实际情况了解极差，人情、风俗习惯、社会状况亦不大懂得，故在工作上最易产生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只知要求青年抗战，不解决青年痛苦；只主观想象，空洞的发号施令而不注意各方面的条件，周密考虑各地不平衡的特点；只满足组织少数青年而不善于团结广大青年；只知空喊组织独立、特殊而不知道和别人配合工作；总是老一套而不灌输新的实际内容；宁愿先进分子包办，不愿充分发挥民主群众作风！

以上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形式主义严重的威胁着我们的工作，我们一定坚决肃清这三股阴风。

冀鲁豫区党委 关于组织各级抗联的决定

(一九四二年九月一日)

一、为了迎接今后边区残酷斗争局面，彻底实行精兵简政政策，紧缩各级群众团体的领导机关，克服头大脚轻现象，并将群众团体中之大批有力干部派到下层去，加强下层领导，切实的深入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以及为了群众团体统一使用力量，实现目前党的总方针，“开展民主民生运动，发动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区党委特决定将各级工、农、青、妇抗日救国会合并为各级抗联（冀鲁豫边区工、农、青、妇抗日救国会联合会）。

二、各级抗联的组织与职权，规定如下：

甲、组织

1、县以上工、农、青、妇合并为抗联后，取消独立领导系统，由各级各教会原有之执行委员组织执行委员会。

2、县以上各级抗联执行委员会，可选举（在战争环境下亦可由上级抗联指定）各级抗联常委会，总抗联常委5人，各专区抗联3人至5人，各县抗联3人至5人。

3、县以下区村组织，可分为两种情形：在游击根据地与接敌区，区村级亦组织抗联；在根据地的基本区，区村级不组织抗联，各救仍树立独立组织系统，归县抗联统一领导。

4、县以上抗联设组织部、宣传部、妇女部、青年部和秘书处，游击根据地与接敌区之区村抗联设组织、宣传、妇女、青年各委员，不设秘书处。

乙、职权

1、组织各级抗联后，过去工、农、青、妇各教会的全部工作，归各级抗联统一领导，各级执委或常委讨论各种工作（统一的和特殊的）时，都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最后决定，原来各教执委或常委无任何最后决定权。

2、为了尽量发挥青年工作与妇女工作的特殊性，县以上各级抗联常委会可召集青年执委或妇女执委的单独会议，其决议由各级常委会负责执行。（日一第...二四六一）

3、组织各级抗联后，工、农、青、妇的所有干部，统归各级组织部管理与调动。但调动青年干部与妇女干部时，必须征求各级青年部与妇女部的同意。如有不同意见，由常委会作最后决定。在未组织区村抗联的地方，各教会的工作仍归区村各教会单独讨论与决定。在组织区村抗联之地区，为了保持各教会的原有工作，为了发挥青年部与妇女工作的特殊性，原有各教会干部仍尽量作各教工作，不要长期使用，但在环境恶劣条件下例外。

5、各级抗联设青年部与妇女部，是为了经常掌握青年工作与妇女工作，研究与积累青年工作与妇女工作的经验，所有关于青年与妇女的组织、宣教工作归各级抗联组织部、宣传部掌握。

三、各级各教合并为抗联后，在干部中可能发生一些不正确的了解，在工作上也可能发生一些偏向，宜事前注意克服。由区村合并为抗联后，大批的干部被派到下层去，可能有些干部认为是降级，发现虚荣心和地位观念。我们要事前在党员与非党干部中作深入的动员工作，教育党员和非党干部认识到深入下层是最实际的工作。

四、合并为抗联后，有些干部（党员与非党员）认为是取消了工农青妇各教会。这种了解与认识，是不正确的。组织抗联，并不是取消各教会，而是各教会的合并与统一领导。这种统一领导，可以节省干部，在工作效率上，也是肯定会加强的。同时大批强有力的干部被派到下层坚持工作，独当一面，上级领导机关并还有更多的

时间去考虑问题，研究问题，使领导更行加强。

3、在今后工作中，可能强调农民工作的一般性，而忽视了青年工作与妇女工作的特殊性，也有可能原来各教会干部仍强调各教会特殊性的工作，而使一般任务落空。这些偏向，都会给将来的群众工作很大的危害。在今后党对群众工作的领导上，要切实注意克服这两种偏向。

4、在紧缩群众团体领导机关与好的群众工作干部到下层去的号召下，可能过于削弱各级领导机关，使各级领导机关不能实现自己的正规领导。这个偏向，也值得我们严格的注意。

四、关于各级抗联的组织大纲、工作条例和其他重要问题，由总抗联讨论与决定。各级党接到这一决定后，应提到各级民委会和各级各教会党团详细讨论，并保证彻底执行。

冀鲁豫边区各级工农青妇 抗日救国会联合会组织大纲

(一九四二年九月)

第一章 总 则

(一) 依据边区敌我斗争形势的发展及工作上的需要, 将边区各级工人抗日救国会、各级农民抗日救国会、各级青年抗日救国联合会与各级妇女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各教会)合并为各级工农青妇抗日救国会联合会(简称抗联)。

(二) 各级抗联之名称为:

(1) 冀鲁豫边区工农青妇抗日救国总会联合会(简称边区抗联);

(2) 冀鲁豫边区第××专区工农青妇抗日救国会联合会(简称专区抗联);

(3) 冀鲁豫边区××县工农青妇抗日救国会联合会(简称县抗联);

(4) ××县第×区工农青妇抗日救国会联合会(简称区抗联);

(5) ××县××村工农青妇抗日救国会联合会(简称村抗联)。

(三) 各级抗联成立后, 即取消各级各教会之独立领导系统, 过去各级各教会之全部工作, 归各级抗联统一掌握与领导, 但在必要时, 仍可用各教会之原来名义对外。

(四) 各级抗联成立后, 除在根据地之基本区, 各教会之区村组织仍保持独立领导系统, 允其使用原来之各种戳记外, 各级各教会

之各种戳记，一律作废，并依照边区抗联所拟定之各种戳记式样和名称全文，制定新的戳记。

(五) 各级抗联之组织原则为民主集中制。各级领导机关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村抗联由会员大会选举)，但在战争日益频繁，敌我斗争局面日益严重的条件下，可由上级领导机关指定。

第二章 组 织

(甲) 县以上各级抗联之组织

(六) 县以上各级抗联之执行委员会，由各级各教会原有之执行委员合组而成。

(七) 为了发挥青年工作与妇女工作之特殊性，县以上各级抗联仍保留原有之青救执行委员会与妇救执行委员会。

(八) 县以上各级抗联常务委员会之人数规定如下：

(1) 边区抗联5人；

(2) 专区抗联3人至5人；

(3) 县抗联3人至5人(游击根据地与接敌区只限3人)。

(九) 县以上各级抗联设主任1人(必要时设副主任)，下设组织、宣传、青年、妇女4部与秘书处。各部长由各级常委兼任，如常委不足分配，可兼职。秘书处之秘书长(或秘书)由适当干部担任之。

(十) 边区抗联之各部可设干事2人；专区抗联如工作需要，可设干事1人至2人，但须经边区抗联批准；县抗联不许设干事。

(乙) 接敌区与游击根据地之区村组织

(十一) 在接敌区与游击根据地，各区村原有之各教会组织合并为区村抗联。

(十二) 区抗联之执行委员会，由原有各教会之执行委员合组而成，如无各教会组织之新开辟地区或恢复工作地区建立区抗联

时，执行委员至少3人，区抗联之脱离生产的委员，不得超过7人，从长期着眼，应尽量职业化。

(十三) 区抗联可设常务委员3人，内部分工为主任、宣传委员、组织委员、青年委员与妇女委员，由3人分别担任。

(十四) 村抗联设委员3人至5人，内部分工为主任1人，组织、宣传、青年与妇女委员各1人。如人数不足时，可根据工作情形减去一种或两种委员。

(十五) 村抗联以下之组织形式，根据环境好坏，分为下列三种：

(1) 如环境许可，则设雇工小组、农民小组、青年小组与妇女小组，如村内有手工业工人，亦可设手工业工人小组；

(2) 如环境恶劣，则根据街道划分小组；

(3) 如环境更恶劣，则不划分小组。

(十六) 为了迎接更残酷的环境，及时转变组织形式，村抗联与各种灰色组织同时存在，经过村抗联掌握与领导各种灰色组织。

(十七) 在环境恶劣不能公开或半公开组织村抗联时，则组织灰色团体，此种灰色团体之领导方式另定之。

(丙) 根据地基本区之区村组织

(十八) 根据地基本区之区村，仍建立各教会之独立组织与领导系统，以发挥各教会工作之特殊性与独立性，使各教会工作迅速发展起来。

(十九) 各教区会组织如下：

(1) 各教区会之委员会，由各教区代表大会选举3至9人组织之。

(2) 各教区会之脱离生产的委员，农会不得超过3人，青教会不得超过2人（青抗先除外），妇教会不得超过2人，但在特殊条件下（如开始工作或集中力量突击工作）可临时酌量增加。

(3) 各教区会除脱离生产的委员外，另设不脱离生产的委

员。

(4) 各救区会除设主任1人外(必要时设副主任), 不另行分工。

(5) 区儿童团不设立脱离生产的委员, 归青救会领导。

(二十) 为负责执行县抗联之一般决议, 掌握统一性的工作与统一使用力量, 在根据地基本区除建立各救区会外, 可组织区抗联。

(二十一) 区抗联由各救区会主任组织之, 区抗联设主任1人、组织委员1人、宣传委员1人。

(二十二) 各救村会之组织如下:

(1) 各救村会设委员3人至5人, 皆不脱离生产, 由各救会员大会选举之。

(2) 农救村会设主任1人, 组织、宣传、雇工与生活改善委员各1人。

(3) 青救村会设主任1人, 组织、文教、儿童与军事体育委员各1人。军事体育委员由青抗先队长兼任。

(4) 妇救村会设主任1人, 宣传、组织与生活改善委员各1人。

(5) 为了加强配合工作, 可组织各救干部联席会, 主席一般由农会主任兼任。

(丁) 工会与农会之关系

(二十三) 各级抗联组织后, 原有之各级工会与农会干部统一使用, 每个干部都负担两重任务, 做农会工作, 同时做工会工作。

(二十四) 在根据地基本区之区村组织, 工会与农会实行合并, 取消工会名义, 原有干部统一使用。

(二十五) 为了开展公私企业工会工作, 在专区以上各级抗联必要时设专人负责。

(二十六) 各县之手工业工人, 可以个人资格参加村农会。在

村农会下设手工业工人小组。如一个地区手工业工人较多，同时可组织某种手工业工人（如铁匠、木匠等）抗日救国会，参加县抗联或区农会为团体会员。

（二十七）各县之盐民，基本上是农民，可以个人资格参加村农会。如一个地区较多时，同时亦可组织盐民抗日救国会，参加县抗联或区农会为团体会员。

（戊）团体会员与青抗先

（二十八）各教会合并为各级抗联后，原来各教会之团体会员即成为各级抗联之团体会员。

（二十九）县以上之青抗先队部，受同级抗联之政治领导，其工作由各级青年部掌握。

（三十）在根据地基本区，因青教会仍保持区村级的独立领导系统，青抗先受青教会之政治领导。在接敌区与游击根据地，因青教会无独立领导系统，青抗先又与模范班统一领导，其领导关系另行规定。

（己）各级秘书处之编制

（三十一）边区抗联设秘书长1人，会计1人，事务1人，文书兼收发1人，交通员4人至6人，油印科5人。

（三十二）专区抗联设秘书〔长〕1人，会计1人，油印员1人，交通员2人至4人。

（三十三）县抗联设秘书长1人，交通员2人至3人。

（三十四）各级抗联之交通员，可以与同级政府交通班合并，合并后，可再行减少。

第三章 职 权

（三十五）县以上各级抗联之执行委员会，为各级抗联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之最高权力机关，其职权如下：

- (1) 决定该地区群众运动之总的任务与方针；
- (2) 负责执行代表大会之一切决议；
- (3) 选举与罢免常务委员；
- (4) 决议召开代表大会。

(三十六) 县以上各级抗联之常务委员会，为各级抗联闭会期间之最高权力机关，其职权如下：

- (1) 负责执行执委会之一切决议与青救执委会、妇救执委会之一切决议；
- (2) 负责执行上级的指示与决定；
- (3) 负责领导一切日常工作；
- (4) 负责检查下级工作；
- (5) 掌握与使用干部，并决定干部之任免；
- (6) 决议召开执行委员会、青救执委会与妇救执委会。

(三十七) 县以上各级抗联之青救执委会与妇救执委会，由常委会决议召开，其职权如下：

- (1) 决定该区之青年运动与妇女运动之总的任务与方针；
- (2) 研究与总结青年运动与妇女运动之经验教训；
- (3) 负责研究与讨论上级抗联关于青年运动与妇女运动的指示与决定。

(三十八) 在根据地基本区之区抗联因与各救区会同时存在，其职权较县以上各级抗联为小，其职权如下：

- (1) 负责执行与传达县抗联之一切指示与决议；
- (2) 决定该区一般工作的计划；
- (3) 掌握各救区会之统一性的工作；
- (4) 统一分配与使用各救会的干部；
- (5) 负责总结该区之全面群众工作。

(三十九) 在根据地之基本区，因有专区抗联存在，各救区会之职权规定如下：

- (1) 负责执行县抗联关于该县教会工作之特殊指示与决议；

(2) 负责执行区抗联的一般决议与计划；

(3) 决定该救会之工作计划，但不得违反区抗联之决议和计划；

(4) 调动与使用干部，但须经区抗联同意；

(5) 决定下级干部的任免；

(6) 有向区抗联汇报工作之义务；

(7) 负责执行该救区代表大会之一切决议。

(四十) 在敌区与游击根据地之区抗联，因为各救区会存在，其职权比基本区之区抗联为大；

(1) 负责执行县抗联之一切指示与决定；

(2) 负责执行区抗联代表大会之一切决议；

(3) 决定工作任务与计划；

(4) 决定干部调动与使用；

(5) 决定召开区抗联代表大会。

(四十一) 村各救干部联席会之职权如下：

(1) 统一全村工作步骤与计划；

(2) 解决统一性的实际问题；

(3) 召开全村会员大会。

第四章 会 议

(四十二) 各级抗联之代表大会与各救区会之代表大会，如环境应许，工作需要，经上级抗联批准即决定召开。

(四十三) 各级抗联执行委员会之召开日期，规定如下：

(1) 边区抗联执委会，每年开会一次；

(2) 专区抗联执委会，每半年开会一次；

(3) 县抗联执委会，每两个月开会一次；

(4) 敌区与游击根据地之区抗联执委会，每月开会一次，如环境不应许，即延期召开；

(5) 根据地基本区之各救区会，每月至少开会一次。

(四十四) 县以上各级抗联之青救执委会与妇救执委会为不定会议，必要时即召开。

(四十五) 县以上各级抗联之常务委员会，每月至少开会一次。根据地基本区之区抗联会与接敌区、游击根据地之区抗联常务委员会，每半个月至少开会一次。

(四十六) 村抗联与各救村会，每10天开会一次。

第五章 附 则

(四十七) 本组织大纲，由边区各救总会之常委联席会通过施行。

(四十八) 本组织大纲有未尽事宜，由边区抗联常委会修改之。

边区抗联关于 今后妇女工作的指示

(一九四二年九月)

(一)十个月以来，我边区大部分地区农民群众已初步发动起来，广大的农民在民主民生斗争中已获得实际利益，在政治经济地位上已得到某种程度的提高和改善，这是与边区妇女利益紧密联系着的。从妇女与农民家庭经济利益的一致性来看，随着农民生活的改善，妇女的生活亦相继得到某些保证，这是开展妇女工作的有利条件。同时在部分地区如灾区，在号召妇女参加生产的实际工作中，也团结了多数妇女群众，博得了社会人士的同情与帮助。这都是我们工作中的收获，是我们干部深入群众，埋头苦干的成绩。但由于我们认识上的偏见和主观力量的不足，大大限制了妇女工作的开展，甚至有些地区根本不作妇女工作。这表现在：以农会为主，就放弃了妇女工作，“只作农会工作，不作妇女工作”，认为“农民发动起来后，再发动妇女不晚”，或“巩固农民会时再提妇女工作”，强调干部不够分配，就忽视和忘记了妇女工作；或有的地区即便作一些，也多是站在利用妇女群众的观点上，未进行组织和教育等，因此大部分地区造成了妇女工作完全停止的状态，新生力量既未组织，旧有力量也趋向垮台。这二种认识上的错误，造成了工作中严重损失，应提起我们高度注意与深刻反省的。

(二)今后妇女工作方针是：“在发动农民的基础上广泛的动员与组织妇女参加生产，从生产中加强妇女教育，提倡家庭和睦，改善妇女生活”。应根据各地区具体情况分别布置：

甲、在农民基本上已发动起来，农民政治觉悟已初步提高，妇

女也有某种程度的发动，妇女所受封建束缚在群众自觉的程度上已有了某些改变，应动员妇女大量参加生产，进一步组织妇女文化工作，如建立识字班，唱歌，加强妇女教育，大量吸收青年妇女参加组织。

乙、在农民已初步发动起来，农民痛苦部分解除，但政治认识还低，妇女问题未得到很好的解决，或妇女一度发动过，妇女组织形式上建立，应继续发动妇女，解决妇女问题，与参加与援助农民斗争。同时要抓紧斗争火候，根据群众要求，号召妇女大量参加生产，从生产与斗争中整顿原有组织。

丙、农民开始或尚未发动的村庄，应动员妇女参加农民斗争，解决妇女问题，启发妇女觉悟，进一步从生产上号召组织团结广大妇女。

丁、在接敌区、游击区主要是对敌斗争，减轻对敌的负担，应动员妇女配合，并提出家庭和睦口号，调解家庭纠纷。按情形不同，亦可组织生产。

（三）几个具体问题

甲、组织妇女参加生产的问题

1、各地区主要以组织纺织生产为主，鞋袜编织、草帽鞭〔辫〕等则根据当地情形组织。至于农业生产，则带有季节性的，于麦收秋收时号召。

2、生产方式。开始组织时原则采用个别生产方式，根据妇女的觉悟及要求，有重点的创造集体生产方式，鼓励妇女生产。如：有的纺，有的织，“个别纺，集体织”，“共同纺织”等。在生产中要注意纠正妇女自私、偷、滑、懒等不良现象，加强妇女团结，增进生产效能，提高生产情绪。

3、贷款（贷棉）与自由集资。过去各地区生产工作，差不多绝大部分是由贷款（或贷棉）——公家的，与分配斗争果实的一部分——刺激起来的，今后应力求转向以自由集资为主，防止不经贷款即不能组织妇女生产的偏向。但目前经过斗争和继续领导斗争的

村，仍应提出斗争果实之一部做为妇女生产贷款之用，同时贷款或贷棉时要按其生活程度不同，分别等次，贷给穷苦妇女，并及时检查，防止不生产，吃了，花了及不织卖布的现象。对自由集资的妇女亦应给予实际帮助，由我们统一介绍购买原料及成品推销的地方，加强妇女的团结与彼此间的联结性。

4、生产工作的组织领导

生产小组应成为妇救会的基本组织，可力求与妇救生活小组统一起来。生产小组的划分应根据居住的邻近，感情的融洽，以家为单位，自愿的结合，小组人数最多不超过9人。

生产工作可由生产委员负责领导，经常检查督促妇女生产，从生产中发现与解决其中困难问题，并在生产进程中发起号召与组织竞赛（如开展展览会，小组与小组竞赛），奖励劳动英雄，激发生产热情。同时在生产小组中还可建立一种不定期的会议制度，进行互相批评检查，与有计划的灌输妇女政治教育，克服过去领导上自流放任现象及纠正妇女的单纯经济观点。

5、加强对工商管理局、合作社的配合，互相建立一定的关系，对合作社、工商管理局我们是介绍与保证的关系，纠正过去某些自己经营的事务包办的现象。工商管理局、合作社负责业务上的指导与帮助，如贷款或贷棉，原料的供给，成品的销售，工具的改良。各地干部应主动的取得配合，研究具体办法，以利妇女生产工作的开展。

乙、领导妇女参加群众斗争的问题

1、首先我们干部应从意识上转变过去忽视从斗争中发动妇女的观点，要抓紧每一个斗争环节，只要与妇女有利害关系的每个问题，我们都要去认真的发动她们，如减租、反贪污、查“黑地”、反恶霸、改造村政权等，经过这些斗争去组织与教育妇女，使其了解政府法令。加强穷苦妇女阶级教育，从参加实际活动中提高妇女社会地位。

2、在各种斗争中，要善于动员与抓紧□□妇女、孤寡妇女、中

老年妇女及积极分子家属，以她们为骨干去团结其他妇女。

3、要与各救密切配合，要在村积极分子中深入动员，说明妇女扯腿现象对工作的妨害及妇女发动后对斗争的帮助与其作用，加强他们发动妇女的信心与决心。

4、对地主、富农妇女，要动员她们在舆论上同情斗争与不阻挠斗争，必须善于利用妇女的富于感情及慈悲心打动她们，帮助斗争进行。

5、在斗争中要注意发现与培养积极分子，成为组织妇救会的骨干力量。

丙、解决妇女问题

1、各地应接受过去的经验，在处理妇女问题中防止不“左”即右的两种偏向，主要是右，表现不敢与不愿去处理。今后我们应掌握家庭和睦的原则，大胆去处理妇女问题。要认识，今天的工作基础已给予我们处理妇女问题不少的有利条件。

2、方式——原则上是调解说教，如果为群众所痛恶的反虐待反压迫的问题，应坚决领导斗争，在群众面前揭发，教育妇女，教育群众，但应不违犯家庭统战和社会统战，即是说不要侮辱对方的人格，要能达到争取教育的目的，以博得社会大多数人的同情。这就是说，必须经过斗争前后耐心的从双方动员与群众中的动员，才能保证斗争的胜利。

3、不要片面的站在妇女利益的一方面，要根据群众的意见，既合理又合法，以使各界人士了解妇救会是代表妇女利益的，而不是女的可以压迫男子、婆媳平等等，造成妇救会孤立的现象。

丁、妇救会的组织问题

1、目前妇救会的组织路线应以大量发展为主，在组织上要克服过去宗派狭隘的现象。除中老年妇女外，要大量发展青年妇女，吸收地主、富农妇女参加。在开始组织时，要拒绝吸收为群众所仇视的“破鞋”参加，以争取社会人士的同情与赞助。经过多方教育后，妇女对“破鞋”有了初步的认识与转变，可个别吸收并改造“破

鞋”。如原有组织成份不好，可重新组织或改组，找出其中积极分子，团结与组织其他妇女，以求组织上的大量发展。

2、发展方式。应采取个别登记、小组登记或通过积极分子介绍，从下而上的建立组织，以防止成份的复杂，影响妇救会的发展。必须深入调查妇女的成份，普遍宣传妇救会的主张，以打破过去对妇救会所抱的成见，如认为妇救会是“破鞋”会等，争取各界人士认真帮助，动员自己家属参加妇救会。

3、妇救会的领导成份，最好以中年青年妇女为主，以保证妇救会的活跃与巩固，并可各个吸收地主、富农妇女参加，纠正不相信她们和对她们关门的现象。

4、妇救会的组织形式

①村委员会分工：主任、组织、宣传、生活改善、生产各委员，可根据组织情况、工作需要增添副职或减少（生活改善可负责解决妇女问题、放足等，生产委员专门领导生产工作）。（凡会员在15人以上可设3委员。）

②妇救小组以7人至9人为合适，青年小组划开，婆媳不同组，妯娌不同组，姑嫂不同组。

③年龄：15岁以上妇女参加妇救会，14岁至7岁儿童妇女不参加儿童团，可组织姊妹团，受妇救会领导。（妇救会组织简章另定。）

（四）妇女干部的作风

甲、要加强调查研究的精神，要深刻了解妇女生活，分析各阶层不同年龄的妇女生活特点与要求，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团结教育与组织广大妇女，及时解决妇女问题，克服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工作作风。

乙、纠正对妇女工作的不正确认识，如认为做妇女工作落后琐碎，愿作农会工作，认为做妇女工作地位低，不吃香，要求调动工作等，这都是不对的，这都是不了解我们所担负的重大任务。今天我们不仅自己要坚决为民族解放、妇女解放去埋头苦干，深入工作，而且还要动员与争取所有一切力量去帮助妇女工作。因此，如

果我们不去作与不愿意去作妇女工作，这伟大的任务放在谁身上呢？

丙、我们要有朴实、艰苦的生活态度，我们要有深入实际的工作作风。我们要耐心的从工作中培养当地妇女领袖，我们要抱定决心从群众中锻炼自己。这是我们的妇女干部应有的优良作风，是开展妇女工作的先决条件。

鲁西南三个村的斗争 是怎样坚持的？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苏 振 华

鲁西南是边区最南端的一个分区，是冀鲁豫边区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直接威胁着敌人的交通要道——陇海路和敌人的战略据点——开封、归德，贯通东与巨南，东南与苏鲁豫边区，南与水东区的直接联系，为华北华中的交通要道与阻止顽固反共军北进反共的门户，在坚持边区抗战、巩固边区抗日根据地的意义上来说，是起着战略支点的作用。

正因为如此，鲁西南也就成了敌我顽三角斗争的尖锐刀锋。在1939年秋，鲁西南曾经在四个多月短兵相接的反顽斗争中，只剩下了三个村庄。当时仅有的100多地方武装在数十倍敌人的围攻下，坚持了整整四个半月的斗争，而且终于胜利的粉碎了敌人的围攻，创造与发展成为今天的鲁西南抗日根据地，建立了6个抗日县政府和统一的专署，发展了30倍以上的抗日武装，把鲁西南广大的群众从敌伪顽的铁蹄下解放出来了。

目前，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敌我斗争形势，正处于空前紧张残酷的阶段。敌人正集中一切可能集中的力量，向我各抗日根据地进行着轮番残酷的“扫荡”、“清剿”和“蚕食”。个别地区受到了相当严重的损失，根据地地区的缩小和分割形势更加严重了，根据地游击性增加了。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坚持敌后斗争的某些同志对坚持敌后抗战失去了信心，对抗战两年就能胜利的正确启示表示怀疑，右倾情绪在生长着。当着这样的的时候，介绍鲁西南坚持三个村斗争的经验，并进一步研究与学习这些经验，这对克服悲观情

绪、继续坚持敌后（特别是平原）抗日根据地的抗战是有很大的意义的。

（一）坚持鲁西南三个村斗争经过的简略叙述

鲁西南是处在冀、鲁、豫三省交界的接合地带，由于地区偏僻，文化落后，封建迷信极为浓厚，在中国历史上是有名的土匪会门极端盛行的地方。抗战前每到青纱帐起，土匪即四处蜂起，绑票勒索，社会秩序极为混乱。抗战后更成了土匪会门的汇集地（特别是曹州府，是有名的出响马的地方）。同时，地方杂牌部队也到处活跃，牵牛架户，烧杀抢掠。人民痛苦，不堪言状。直到1939年秋，我冀鲁豫支队五大队进入鲁西南地区，积极的打击了日寇，取得了数次战斗的胜利，摧毁了日寇的伪政权，从敌人的手中收复了广大的失地，兴奋了鲁西南广大的群众，传播了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坚持了鲁西南的抗战，社会秩序逐渐稳定。当时只有几个县城有敌人据点，除县城附近地区以外，我们部队到处都可活动。在我们这种胜利的影响下，一部分上层分子都积极的帮助我们组织武装，老百姓参加八路军打鬼子的热潮，在怒潮一般的猛烈地高涨着。因此，很短时期内就发展了相当数量的抗日武装，建立了抗日县政府，组织了部分的群众，于1939年的秋天就建立了鲁西南抗日游击根据地。

但当抗日政府刚建立不久，群众的抗日热潮尚未普遍高涨起来，群众尚未完全组织，党的工作基础还很薄弱，根据地的建立还只有一个雏形，会门土匪还很活跃的时候，日寇就开始了残酷的“扫荡”。接着，顽固反共派石友三也率领大军北上，并先后占领了濮阳及其以南地区，鲁西南与边区的联系就被顽固军所切断而处在孤军无援的游击环境之中了。尤其严重的是在当时政策上犯了严重的错误，如没有建立根据地的观念，乱打汉奸，乱罚款及所谓要钱要人要粮要枪的“四要”主义的严重错误，以及过左的乱杀人、暗杀等的锄奸政策上的错误，没有及时发动群众巩固已经发展起来

的武装。在敌人大“扫荡”、顽军北进反共、我主力北移的形势下，部分挨过打、受过罚的□□地主就抓住了我们政策上的错误，利用了顽军暂时力量上的优势，积极组织会门，配合石友三积极的反对我们。又加上我们当时主观力量上的薄弱（当时只留下少数地方党政干部和不到100人的游击队），同时也由于只注意了单纯的军事斗争而忽略了政治上的争取，结果会门问题不但没有解决，而且更加严重了。会门由开始提出“只打群众团体，不打八路军”的口号，而更进一步到“只打新八路，不打老八路”的口号。我们就处在顽军和会门的相互夹击之中了。

到1940年顽军联合进攻、会门暴动的严重形势下，鲁西南的工作就无组织无计划的退却了，鲁西南就被敌伪顽所暂时掌握了。除了少数几个地下党员之外，公开工作就全部垮台了。

这个时期斗争的失败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于没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观念，不讲政策，不从长期打算，不从爱护群众利益出发，只顾自己本身的一时的狭隘的利益，严重的脱离群众，发现错误不立刻纠正等的严重恶果。

1940年秋天，冀鲁豫区党委和军区检讨了鲁西南失败的教训，重新提出了恢复和建立鲁西南抗日根据地的方针。一方面对退出来的干部进行了训练，进行党的各种政策的教育，指出了鲁西南过去失败的错误，提出了恢复鲁西南工作的有利条件和存在着的严重（但是能够克服的）困难；另一方面，首先派遣了少数有社会关系的干部秘密的回到鲁西南进行了对各种情况的了解，经过很短的准备时间，把退出的干部和不到100人的游击队又重新回到鲁西南，经过两个多月的时间，恢复了纵横不到20里的一块游击区。但由于敌我力量的悬殊，工作尚未打下基础，敌伪顽（主要是顽军）向这块游击区的第二次进攻又开始了，这就进入到了三个村的斗争和坚持。在坚持三个村斗争的开始时，敌我力量的对比是相距很远的。当时，除所有县城完全被敌人控制之外，包围我们的顽军就达8000人以上，顽军占据的地区幅员纵横200余里。而我们仅有脱离生产

的游击队120人，不脱离生产的群众武装，几个村最多不到80支枪，合计不到200人，而且均未受过任何军政训练，大部分都是刚脱离生产的农民。我们能活动的地区，东西不过七八里，南北不过20里，其中基础最好的只有刘岗、曹楼、倪庄等三个村庄。因为这几个村庄的群众曾受过一年多敌顽伪军的残酷压迫和无限制的敲诈勒索，再加上土匪的骚扰，群众的生命财产已经感觉到了没有任何的保障；另一方面又由于我们政策上的转变，群众已切身经验和认识了共产党八路军才是真正坚决抗日并且真正能保护他们的利益的，而日寇、伪军和顽固反共派只有使他们走向更加悲惨的道路上去。群众已经感觉到，顽军除了对他们压迫敲诈之外，再没有任何的好处，唯一的出路就只有依靠八路军和武装自卫，才能保护自己的生命财产。这就打破了群众过去希望中央军来保护他们利益的幻想，而将这种希望寄托在八路军身上了。当时我们的力量虽然占着绝对的劣势，但政治上占了上风，取得了绝大多数群众的同情和拥护。有了广大的群众为我们的依靠，在社会上取得了合法地位，广大群众接近了我们，部分进步的上层地主及开明士绅对我们的态度也开始转变，极少数反共分子所煽动起来的会门，也开始瓦解了，这就是坚持三个村庄斗争的客观条件。然而，顽固反共派仍然利用着他们军事上的暂时优势，直接或间接的配合敌人继续向鲁西南根据地作全面的进攻。斗争从1940年8月开始，到1940年12月30日止，一共进行了四个半月。当时我只独立团有140人，枪120支，县政府不到60人。在力量的使用上，独立团全部集中作骨干，轮流移驻各村，看哪里敌情紧张即使用到哪里去，其余的都分散在各村里，在武装上是非常少的。如倪庄、景王两个寨共7棵枪，刘岗自卫队6棵枪，梁集李楼15棵枪，独立团集中在曹楼。当时除西北还有一点空隙之处，是全部的处在敌人的四面包围之中了，与边区仅有某种程度的书信上的联系，在斗争与工作上是处于完全孤立无援的境地，不能取得外部任何的援助与配合。

在顽军的联合围攻开始时是异常猛烈的，如游击分队长张二把

持守曹楼，王子魁带了400多人去进攻，冲到寨门边，把整个寨子都包围起来了，同时用迫击炮向村内轰击。但几次的连续冲锋，都被张二把持指挥全村的军民英勇的反冲锋击溃了。但部分群众因感到我们的力量太小，对敌人严重进攻都表示了恐慌。特别是倪庄的群众，在少数的地主活动下，部分开始动摇了。于是我们的领导干部就分别的深入到各村去，召集群众大会进行动员，向群众解释了胜利的条件，特别强调群众有反对土匪、坚守围寨的经验，顽军的不统一和内部的矛盾等等。经过这次动员之后，群众的情绪提高了，群众就决心坚守围寨，都抬出土枪土炮来，同时大家砍枣树修围寨，添设鹿寨，谁也不吝惜自己的东西。

然而敌人的围攻却一直的继续着，顽军在几次的进攻被击退之后，仍企图以长期围困的办法整死我们。我们则在群众的拥护和帮助下，和群众一起战斗着，生活着。没有粮食了，群众借给我们粮食；没有弹药了，群众就从地窖里刨出他们埋藏的子弹来；没有棉衣布鞋了，他们就单衣赤脚在风雪中坚持着战斗。情况最紧张的时候，宋大牙和战士们常常在深夜里卧在冰雪上监视敌人。敌情最紧张时，全村的老百姓不分昼夜都动员起来了，老太婆鼓励着自己儿子，妻子鼓励着自己丈夫，小孩子则给自己的爸爸拿烟送茶。每个村不分男女老少，也都按联庄会的形式自动的组织起来了，并且成立了自卫队，至少选出100人看寨，紧张时每夜最少四班（平时二班）。为了防御敌人的袭击，村子的寨墙上都点上数百红灯，每到天光暗淡、星月交辉时，红灯耀眼，与枪上红缨相映照，刀光闪闪，人影依稀，炮声、梆音遥相应和，大有中古戍边之遗风。

在坚守中，我们曾经失去了两个寨子，一个是赵连城的大户庄。当时大户庄所处的形势是很孤立和突出的。守大户庄的是一个农民出身的干部王化理同志，一个非常坚决的和勇敢的革命战士。当敌情已万分紧急时，他几次奉命撤出战斗，都被全村的男女老幼含泪痛哭、跪在他的面前留住了。王化理同志最后只好攒着泪决心死守，终因势孤力弱而陷落了，王化理同志也就英勇的战死了。其

次一个寨子，就是大小寨，也同样的被攻陷了。

在大户庄及大小寨失守之后，群众的情绪又恐慌和动摇起来了。但这时不干下去也是不行的，同时紧接着两个村子的陷落，我们马上就进行了新的动员和解释，指出两个村子失陷的原因（如有奸细活动，工作组织不好等）。经过一番有力的鼓动之后，群众的情绪又提高起来了。这时顽军进攻的精神也大大减弱，虽然仍常常用二三百人不断的向我们进攻，而我们的抵抗却更为顽强和坚决。每个人都抱着光荣战死的决心，英勇沉着迎击着敌人的进攻。因此，敌人每次进攻被两三个游击队员就击溃了。

正当着这前无进路，后有追兵，欲前不得，欲退不能的时候，敌人的“扫荡”又开始了。敌人分兵数路，合击曹楼、倪庄等三个村庄。敌人一来，顽军就将三个村庄退让了出来，我们也就相机转移，跳出了敌人的合击圈。等到敌人“扫荡”扑空而回的时候，我们又回到那儿去。顽军看我们并没有被敌人消灭，又将我们死死的包围起来，我们的处境是更加困难了。

在这一时期中，在顽军内部，因历次进攻的失败，彼此的矛盾是更加尖锐起来了。我们就抓住了这一时机，对顽军进行了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作，进行了对顽军内部的争取和分化。首先就利用了与胡老头（地方实力派）的关系，向胡老头子进行了统战工作（王道平的老婆和胡的老婆结成了干姊妹）。胡老头子中立了，马逢乐（地方民团的头子）也就停止了□□的活动。赵云祥（杂牌军）虽然有2000多人，但他这时主要的还在于保持他自己的地位，只要不侵犯到他的利益，他是不会积极的配合王子魁的（虽然他并没有明显的表示态度）。从北面来进攻我们的戴四跛子（土匪头），也因将他的老婆捉来了，和我们论交情，释放了他的老婆，也停止了他的进攻。这样一来，只剩了反共反八路最坚决的王子魁的2000多人了，顽军联合进攻的力量基本上是分化了。

但是顽军仍然在曹楼、倪庄、刘岗三个村子的周围将我们围困和封锁着，我们仍然是处于绝对的劣势。在风雪交织中坚持三个村

的军民，虽然忍受了一切苦难，克服了严冬所给与我们的无数的困难，然而当冬去春来的时候，一个更为严重与复杂的问题又发生了，这就是群众的春耕和下种问题。当时群众是看得很明白的，仅靠我们当时的一点力量是无法把顽军的围攻打破的。围攻不能打破，他们就无法进行春耕和下种。但如今年的春耕下种无望的话，那就只有坐地等死了。因此，对这一个问题群众都在忧虑着。显然他们并不怕顽军的围攻，而却害怕不能种地。老百姓心焦这一个问题，领导斗争的干部也心焦这一个问题。而同时还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粮食的问题。老百姓的粮食眼看就要断绝了，没有饭吃饿着肚子是不能坚持斗争的。可是这又怎么办呢？特别是当戴主任（地委）到河北去开会时，群众都欢喜得很，都说戴主任到河北请救兵去了。但开会回来时，老百姓看到并没有带了救兵来，戴主任仍然是光着身子回来的，群众就灰心失望了。于是陈老五（争取来的一部分土匪武装）的一部分游击队拉走了，当了皇协军。王道平（争取过来的一个大土匪头）哭了两天两夜。战士们都是忧虑着，哨兵看到领导同志，无精打彩的绷着眉头，不说一句话。人们感到前途是迷茫起来了，坚持是已经不可能了。可是，不坚持又怎么办呢？

就在这样的時候，新三旅南下增援了。当时新三旅是伪装十军团一八一师南下领子弹的名义来的。部队已进到顽军的附近了，他们还不知道。群众都半信半疑，看到这个队伍纪律特别好，买卖公平，说话和气，不大相信是十军团的队伍，直到第二天拂晓，看到抬着梯子向王子魁的驻地出发了，才认出是八路军。老百姓马上就兴奋起来了。

就在增援来到的时候，宋大牙在城墙上就大唱大笑起来。他不说一句话，只是引腔高歌。大家问他，也不回答一句。当时敌情是很紧张的，老百姓都抱着一颗紧张的恐怖的心在跳跃着。但当他们看到宋大牙这种狂欢和歌唱时，都跳起来了，大家都叫着，互相传说：“宋司令唱歌了，不要恐慌，一定有办法了！”

新三旅向王子魁进攻的炮声打响了。王子魁拖着一部分残兵败将，光着屁股跑掉了。三个村庄的斗争，就这样得到了胜利的结果。

（二）三个村庄为什么能坚持至四个半月之久呢？

第一，有了单独坚持鲁西南斗争胜利的信心和决心。在斗争开始时，上至主要负责干部，下至群众（不分男女老幼），都进行了充分的政治动员，说明了坚持鲁西南斗争的重要性和能够坚持这个斗争的一切有利条件，正确的估计了敌人的力量，指出了敌人的弱点（敌人内部的矛盾和不统一，群众对他们的反对，敌人孤立等），也正确的估计了自己的力量（如群众拥护，我们内部是团结的，只要坚持到一定时间，就有主力援助），说明了过去鲁西南群众同土匪斗争胜利的实例，鲁西南群众有反土匪斗争的经验（一个寨子被土匪包围了五个月，最后击破了土匪的围攻的光辉例子）。并指出了当时的严重困难（如力量小，处境孤单，群众还未经过严重的考验），同时又指出了在坚持斗争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危险。经过了深入的动员之后，上级与下级，军队与群众，甲寨与乙寨，都有了一致的深刻的认识，提高了坚持胜利的信心，在思想上打下了誓死坚持、“同患难”、“共艰苦”、牢不可破、誓死不屈的坚强意志，造成了军队与群众间一切为着斗争胜利的一致方向，造成了军队与群众牺牲一切坚持到底的决心。

第二，真正的保护了群众的利益，依靠了群众。当时的群众受了敌人的残酷压迫和敲诈，已经感觉到不能照旧生活下去了，群众要求反对顽军底压迫的斗争情绪如火如荼的高涨了起来，造成了我们动员与组织群众的有利条件。当时在领导上抓住了群众这一迫切的要求，提出保护群众利益，反对敌伪顽压迫老百姓、掠夺老百姓的财物，“八路军愿与老百姓一块同生死共患难，誓死坚持鲁西南的斗争！”在这样的口号下，把几个村庄的群众发动和组织起来了。在坚持严重的斗争过程中，虽然环境是那么样的紧张的处在敌

人的四面包围里，仍利用了一切的时间进行了改善基本群众的生活，实行了减租减息，把减租减息与坚持斗争的胜利联系起来，抓住了顽军压迫群众的具体事实和我们保护群众利益的实际行动，在实际斗争中教育了群众。由于群众得到实际的利益，受了革命的教育，在严重的斗争中，表现了群众的伟大力量与参加斗争的热忱，这样军队与群众的结合就更加紧密了。如群众对部队说：“你们离不开俺们，俺们也离不开你们。”又如，有不少的老太太鼓动着自己的儿子上围寨去放哨，说：“八路军帮俺们减了租，俺们才得多分一些粮食，过些好日子。要是顽军打进来了，俺们老百姓又得受顽军的压迫了。”还有些老太太每日早晚烧香拜佛，求神保佑八路军同志和她的儿子的健康，保佑他们打胜仗，不要受伤，求神降罪，顽军死光。（曾有一个村子，在四个多月的斗争中，只买香钱就花了好几百元。这虽是一种迷信，但也可以看到群众对军队的爱护与热忱，与对敌人的愤恨。）另一方面，部队艰苦卓绝的模范行动和斗争精神，也给了群众以极大的感动。在非常困难时与紧急的条件下，部队中无论干部或战士都宁愿忍受痛苦，不愿损害群众一点利益。在整个的严冬里，他们没有穿棉衣，赤着脚在严寒的冰天雪地里，在朔风的怒吼中，没有一点畏惧的在寨墙上看守着寨子。干部也同样的不畏严寒与风雪，昼夜不息的查岗查哨，领导和坚持对敌人的斗争。有时群众送给一些白面慰劳部队，为了表示部队可与群众共艰苦，把白面送还，同群众一起吃黑窝窝。由于这种艰苦卓绝、爱护群众的模范行动，激发了群众对我们生死与共的友爱互助精神和死也得死在一块的决心，军队与群众更加坚固的结合成了不可战胜的力量，造成了三个村子的斗争能够在几十倍敌人的围攻下坚持到胜利的主要条件。否则，仅仅依靠百余枪弹、粮食都没有充分准备和来源的游击队，要坚持这样严重的斗争局面达四个月之久，是不可能的。

第三，正确的执行了党的政策。从决定退出的干部回到鲁西南恢复工作、建立根据地时，第一项工作，即是向各阶层各党派宣传

解释我党坚持敌后斗争的方针及建设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各种政策，并在适当的会议上，承认我们过去在政策上所犯的错误。经过了一番艰苦的宣传解释工作，并在实际行动中改正了过去的错误，使党的各种政策付诸实行，纠正了“左”的锄奸错误，执行了保障人权法令，停止了罚款、捉人、要枪等的错误作法，实行了合理负担、统支统筹的财政经济制度，纠正了吞并地方武装的错误，认真建立了军分区的工作，扶植与保障了地方武装的发展和巩固，真正的保护了群众的利益。同时，并揭破了日寇及顽固反共派的造谣诬蔑，收回了过去坏的政治影响，表示了我党我军代表群众利益的实际行动，而且吸收了广大群众和各界人士与我们共同抗日（如几个地主亲身参加坚持三个村的斗争），孤立了极少数的顽固反共分子，正确的执行了我党对顽固反共派破坏团结抗战、反共反八路军的政治的斗争原则。鲁西南坚持三个村庄的斗争，当时主要的是顽固反共派的军事进攻。顽军力量虽有8000人以上，但有其不可克服的矛盾和弱点，表现在：

A、各派顽军在反共反八路军的总的目标上虽然是一致的，但因自身的利害关系的矛盾，在其反共的实际行动上，在反共的积极性上，都有其程度上的差别，这就使他们的步调不能协调和一致。

B、顽军中大部分都是当地的封建地主武装（杂牌顽军），地位、地盘与力量大小之争是很厉害的。由于他们之间存在着这种深刻的矛盾，也就给了我们争取与打击、拉拢与孤立的机会，造成了我们分散与瓦解敌人力量，联合一部，打击一部，各个击破的客观条件。

C、有的顽军虽直接或间接的与敌人勾结，但尚未公开投敌，和敌人仍然还有矛盾，敌人仍采取对顽军实行威胁、“扫荡”，逼其公开投降。这就无形使顽军的力量受到一些牵制，不能全部的集中进攻我们。

D、由于顽军过去对群众无限制的压迫与剥削、敲诈，除极少数的反动地主帮助顽军外，广大的群众及极大部分开明士绅与顽军

是对立的。对顽军斗争策略上，具体的分析与把握了以上的特点，开始斗争时，即抓住了顽军这些特点，在反对分裂，反对倒退，团结抗战的方针下，对各派顽军采取了争取一个，麻痹一个，打击一个，孤立少数，争取多数，各个击破的斗争方针。在这种方针下面，只要能求得暂时和缓或中立，不管其出于何种立场，都进行了统战工作，与其暂时妥协或力争其中立。经过了艰苦工作，就争取了好几股顽军暂守中立的局面，集中了主要的力量，打击了最顽固的。开展了广泛的统战，进行了交朋友的工作，在有原则的条件下作必要的让步。当敌人“扫荡”这些暂守中立的顽军时，我们虽然只有百余武装，为表示积极配合友军作战，实行自己的诺言，曾经几次主动的配合其作战。由于我们这种宽大诚恳的态度，感动了几股顽军中下级军官及士兵对我们的同情。这种艰苦的统战工作的结果，有的顽军暂时中立了，有的顽军对我们的进攻也暂时的消极下来，剩下反共最坚决最积极的就只有以王子魁为首的2000多人了。在这样的条件下，就集中了军事上政治上的一切力量，于1941年的春天，配合了三旅南下，彻底解决了王子魁的全部力量。自此，顽固反共派联合围攻我鲁西南的反共阵线被粉碎了。经过1941年和1942年的斗争，顽优我劣的形势改变了（顽军由8000人削弱到2500人，我则由100余人的游击队发展到3000人）。顽固政权自此瓦解了，鲁西南的抗日政权就建立了起来，抗日力量继续增□的扩大，顽固势力日形缩小到一个很狭小的地区了。

第四，有了同群众有密切联系的群众领袖。鲁西南坚持三个村庄的斗争所以能够取得胜利，其中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有同群众有密切联系的地方干部。几个庄寨领导干部虽不全部是地方人，但是经过了长期的工作，已经与群众建立了血肉不可分离的联系。如地委书记戴晓东（老百姓叫戴主任），司令宋励华（老百姓叫宋大牙），都是群众最爱戴、最亲近的领袖，没有5岁小孩不知道戴主任和宋司令的。群众对他们的信任从以下的事实中就可看出来：如群众之间遇有大的纠纷不能解决的时候，都跑到戴主任或宋司令那

儿去，请他们解决。甚至连一些家庭小事，夫妻因争嚷一件小事吵嘴或打架，也都跑到戴主任那里去要求帮他们解决。而这些事情只要一经戴主任或宋司令几句话开导开导，双方当下就和解了，纠纷也就平息下去了，夫妻关系家庭和解，也就亲亲热热的回到家里去。

当坚持三个村的斗争最危险的时候，群众中有的对斗争的胜利表示怀疑，少数的在几十倍的敌人的围攻下，开始有些畏惧和动摇，有的终日愁眉苦脸或叹息，但只要戴主任或宋司令给他们一讲话，群众的情绪就立即稳定下来了。群众对他们有着一种坚固的信念，群众相信他们有办法的。特别是情况最紧急的时候，他们脸上的诚实的笑或嘴里的歌声，就是这种办法的标志。因此，每当大家很苦恼或对坚持斗争表现忧虑的时候，只要一看见戴主任或宋司令脸上的那种坚毅沉静的微笑或听见他们的歌声，群众的情绪就立刻稳定下来，战士们也就更加□有了一切的信念和决心，沉着的抵抗着敌人。群众也就会欢笑着：“宋司令唱歌了，胜利有把握了！不要害怕敌人，一定打不进来。”这样，整个的群众也就会马上活跃起来，紧张起来，战斗起来。

除了这些主要负责干部之外，其余的干部，差不多全是当地的干部，与群众都保持着密切联系。但这些干部为什么有那样好的联系和建立了那样高的威信呢？

A、真正的帮助群众解决了群众的切身问题。在艰苦奋斗和实际工作中，不仅帮助了群众解决他们经济上、政治上的迫切要求，而且用了一切可能，关心到群众最细微的家庭小事，成了他们的教师或良友。

B、干部的以身作则、艰苦奋斗的模范行动。如宋励华同志在坚持三个村庄的斗争中，一冬里身上没有穿过棉衣，脚上没有穿过袜子。有时群众送给他一些白面等东西，他自己不吃，而同群众一起吃黑窝窝头。在斗争中，昼夜不息的同群众在一起看守围寨，打仗时冲锋在前、退却在后等艰苦奋斗的行动，给了群众以最深刻的

教育和感动。在三个村的斗争最后胜利时，群众自动的向宋励华献□献棉衣棉裤。这里，可以看出群众对他们的热忱拥护。

C、很虚心的倾听群众的呼声，解答群众的难题。只要是群众向他们提出的问题，不管正确与否，总是耐心的解释和说服，从没拒绝过群众的意见。同群众接近时，总是以群众的态度、群众的语言向群众解释问题，因此群众也最容易接受，同时也从群众中学习了不少的经验和知识。

第五，争取和团结了游民分子。整个鲁西南，特别是菏泽（曹州府），由于军阀和地主残酷剥削，黄河水灾，农村经济破产，农民生活极度痛苦，在历史上曾发生过有名的农民起义和义和团暴动与匪乱。在抗战前旧政府时代，抢粮□□、“土匪抢□”是一种经常的社会现象。因此，在鲁西南地区游民阶层（流氓、兵痞、土匪）占有相当的数量，而且他们□□□□□互相间都有一定的联系。地主阶级为保存自己的身家（性命和财产），与游民首领都有密切的联系，暗地里掌握着这些游民武装。所以这个游民阶层有相当的力量。旧政府官吏上任，如果不同这些游民分子巴结，不去拜访他们，即有□位的危险。在坚持三个村的斗争的过程中，由于掌握了鲁西南这一社会的特点，进行了争取游民分子的艰苦工作，把这一批有相当力量的游民分子都争取到我们方面来了（如在争取的人中，有当过35年的大土匪头子和青帮头子），参加了坚持三个村庄的艰苦斗争，经过了长期的改造，而且成了今天地方武装中一部分干部。这一部分人的被争取到我们方面来，不仅是削弱了反共顽固派一部分的社会基础，安定了鲁西南根据地抗日秩序，而这在今天反对敌人利用游民（特别是游民领袖）发展与成立伪军来反对我们，亦有很大的作用。敌人在鲁西南伪军不能很快发展起来，这批游民分子争取在我们手里是很重要的原因。那么如何争取游民分子呢？其争取的经验是什么呢？

A、从政治上提高他们的民族意识，逐渐改造其流氓思想。一般的游民分子的文化程度都很低，头脑简单，但社会经验却很丰

富。他们长期过着无组织、无纪律的散漫的流寇生活，养成了怕组织怕纪律的散漫的生活习惯，因此，特别害怕组织生活，不愿学习，不愿听长篇大论的演说。因此对游民分子的教育方式，在初期须要很好的讲究，多采取个别谈话或写信，有计划的解释一些政治问题。这种方式教育的效果是最大的。

B、游民分子的家庭一般的都是很贫苦的，而他们的花消应酬则很大，因此必须适当的照顾他们家庭的困难和个人方面应给予必要的特别待遇，或给以适当的职业，这样才能停止他们的绑票、抢夺，安置他们的生活。要是领导上不注意这些，既不允许他们绑票架户、违犯政策，对他的家庭问题和他的生活问题又不给予解决，而这些游民分子一天没有钱花就不能过日子的，这样就很难团结他们一道共同抗战，并且有跑到敌人方面去的最大危险。

C、抓住进步的首领，去孤立与打击不可争取的个别坏分子，经过他们去争取更多的游民。同时，对个别极坏的游民分子，在多数的游民分子同意之后，要给以必要的打击和镇压。

D、游民首领彼此之间都有密切的联系，有计划的训练几个主要首领，经过他们去争取其他游民分子，也能起很大的作用。

E、发展起来的武装不要强编，要经过他们同意后，派遣政治坚定、思想意识正确的坚强的干部，建立政治工作，发展党的组织，进行政治教育。但进行工作仅是求得与他们商量，是尊重他们的意见，给他们权利。只要经过艰苦的政治工作，土匪武装是可以改造的。边区已有不少的土匪武装建立了政治工作，改变了原来土匪的本质，成为有相当战斗力的地方武装。对土匪武装不去进行艰苦改造与争取工作，采取简单的强编土匪武装的办法，是愚蠢的，其结果既不可能巩固，又容易逼使土匪部队的首领脱离我们，甚至跑到敌人方面去，更会影响着争取其他的土匪武装。游民分子特点之一，讲义气，重感情，奉承上级，爱戴“高帽子”。抓住这一特点，主要负责干部需找其个别谈话或写信，方式要活泼，多谈些政治问题，对其错误进行个别批评，对其功劳给予适当的鼓励，以这

种方式去教育最深刻。

第六，认真的武装了群众。在绝对的敌优我劣的形势下，只要依靠广大群众武装，就能坚持最艰苦的斗争，就能够战胜敌人和一切困难。鲁西南坚持三个村的斗争的经验，完全证明了这一真理，显示了群众武装的伟大力量。在保护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反对敌人的压迫和掠夺的口号下，把几个村的群众全部武装和动员起来了。凡是青年壮丁都参加了自卫队，协同我们一起作战，老头子、小孩子亦全部参加了战时服务。在武器的使用上，发挥了一切旧式武器的效能，如土枪、土炮、大刀、长矛，甚至以镰刀、木棍、□□当作武装使用。不管武器的好坏、作用的大小，群众每人都有一件武器。在四个半月的艰苦斗争中，几乎完全是依靠群众的这种武装力量（子弹打完了，群众就将自己家里从前埋藏的子弹拿来给军队用）。当时百余人（原件自此以下脱落 两行半，约 49 字。——编者）也就成为坚持三个村斗争的群众武装的骨干和群众依靠的唯一主力。另一方面，在单独坚持斗争的地区，如果群众已经武装起来了，对脱离生产的武装不要绝对分散，应注意适当的集中使用。全部分散就失去群众武装斗争的骨干，在危急的时候就没有突击力量，这就会造成单纯的防御，可能遭受到敌人各个击破的危险。

第七，领导机关特别注意了鲁西南单独坚持斗争的严重局面，随时指示了如何坚持斗争的一些具体办法，鼓励了他们单独坚持鲁西南斗争中的英勇模范行动，给了他们一些国际国内重要生动的政治情况和新闻消息。每逢情况非常危险，领导干部感到没有办法，群众情绪低落的时候，恰巧总是接到军区、区党委给他们的指示，告诉了他们各方面的有利条件，给予他们政治上、精神上很大的鼓励，立即就兴奋了全体干部和群众的斗争情绪，坚定和提高了坚持斗争的胜利信心，解决了他们不能解决或没有想到的困难。这里告诉了我们领导同志一个经验：凡是坚持单独斗争的地区，如果不能及时给予具体的指示，鼓励其斗争情绪，并供给各方面的有利情况，就可能使下面同志在严重的局面下迷失方向，缺乏应付严重斗

争的办法，甚至丧失坚持斗争的意志，以致遭受失败。

第八，正确的执行了锄奸政策，严厉的镇压了奸细分子的活动。三个村庄斗争一开始，即在党内外群众中进行了锄奸教育，提高了党和群众的警惕性，对奸细分子采取了坚决的镇压，对少数尚可教育的坏分子进行艰苦的、耐心的争取和教育。因此，在严重的斗争环境中巩固了自己的斗争阵容，保证了没有一个投敌逃跑，严密的保守了秘密。虽边境离敌人不到5里，近者有二三里路，在四个半月的斗争中，敌人始终不知道我们究竟有多少部队及我们内部的一切情况。□□□□不坚定的□□□□□□的分子，在群众的监视之下，也不敢活动。

第九，斗争进行到严重的阶段时，要尽一切可能给予实际的援助，坚持斗争的地区要组织局部的进攻。鲁西南三个村庄坚持到四个半月之后，人力物力已经达到很大的消耗，经过了长期紧张艰苦的斗争环境，群众情绪已达到极大限度的疲劳。当时摆在群众面前的切身问题，是1941年的春天即将到来，快到群众耕地下种的时候，但如继续下去，势将影响春耕和下种，这就严重的影响到群众的生存条件。即使部队在这样的条件下，也将无法维持最低限度的物质保证而坚持这种斗争的。但正在这样的严重形势下，在千钧一发的危急的时候，新三旅南下增援了。这就援助了鲁西南的斗争，粉碎了敌人的围攻，解决了群众的春耕问题，提高了群众的情绪。经过这一次艰苦严重的斗争，打开了鲁西南的局面，建立了鲁西南抗日根据地。

第十，解决了会门。当鲁西南在坚持三个村的斗争的时候，除了顽军的联合进攻外，其次威胁最大的就是会门的疯狂与坚决反对我们。鲁西南关于会门起因和发展情形虽有它的长期历史，但爆发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我们政策的错误。当时鲁西南会门的本□与群众的切身利益虽是对立的，但一部分反动地主和顽军却利用了我们政策上的错误，抓住一部分群众的落后心理，积极煽动与组织起来了。他们企图利用这种落后的封建迷信组织来坚决的反对我们。但

是，顽固反共派这一套借刀杀人的阴谋毒计，最后终于被群众的切身经验所识破了。顽固反共派一方面利用会门反对我们，一方面却又利用会门加紧压迫和剥削群众，促使手执长矛的老百姓走向枪林弹雨的战场上送死。群众经验证明了，组织会门的村庄，结果只是敲诈、压迫、无限制的沉重的负担以及无代价的繁重的差使，土地的荒废，人命的牺牲，除此之外一无所得。而会门首领敲诈了老百姓无数的财富，取得了自己的高官厚禄，过着逍遥自在的腐化生活，并且逐渐的与敌人勾结，接受了敌人的委任，当了汉奸，出卖了会门群众的利益。群众认识了参加会门不仅不能保护他们的利益，而且弄得家破人亡，在会门首领的指使下，替他们效劳作汉奸。由于群众有了这样的觉悟，因而会门自身开始走向瓦解，内部发生了很大的分化，多数会门群众开始倾向我们，会门首领汉奸面貌更加明显，与群众更加对立，更加孤立了。这样就形成了解决会门的客观有利条件。但在坚持三个村斗争时，当会门正在疯狂严重的时候，由于对会门的处理采取了冷静慎重的态度，研究了会门内部的情况，分析了解决会门的有利条件和如何才能解决会门的具体办法，由于正确的执行了党的政策和艰苦的工作，终于会门被我们解决了。

解决会门主要经验是：

A、抓住了会门本身的弱点和其内部的矛盾，利用了各种关系。如利用了士绅、亲属、朋友写信或个别谈话，或利用各种群众会议散发传单，揭破了顽固反共派反共首领的反动阴谋，从政治上打击了最坏的会门首领和个别的村庄。同时又广泛的宣传我党各种政策及对会门的态度，提出了宽大为怀，不咎既往，“过去杀了八路军人员的人，只要不继续反对八路军，能自新悔过，绝对不报复”等口号。经过了这一广泛宣传解释，就揭破了会门的罪恶，传播了我党的政治影响，解除了顽固反共派欺骗群众、组织会门的政治资本。

B、根据了会门反共程度的不同及其内部矛盾，各会门力量大

小不一的特点，采取了以政治说服和争取为主，以打击威胁为辅的政策，对绝大多数的会门采取了长期耐心说服争取的方针。只要他们不主动的向我们进攻，我们绝不以武力去解决他。即使有时被迫与会门发生冲突，俘获其人、枪时，给予优待，经短期的训练全部释放，绝不杀害一人。经过了这种艰苦的工作，争取了大多数会门村庄同情我们，走向中立。对个别争取无效，不听说服，□□□□□，为大多数群众所反对的村庄，则集中力量给予歼灭打击（不打则已，一打必须彻底）。对愿意派代表与我谈条件，但不愿我部队接近的少数村庄，表示愿意讲和时，威胁的部队即自动撤退，以示我们的诚意，但须迅速实现谈判条件，严防拖延时间、重整旗鼓来反对我们。

C、纠正报复主义。由于会门与我们尖锐的对立，过去杀害过我们不少的同志，打过我们的部队，收缴过我们的武装，侮辱过我们的部队和政府，因此，无论部队或群众对会门的仇恨都是很深的；再加上我们党内大多数是农民成份，最容易反映农民的狭隘报复主义。解决会门，主要是依靠正确的政策和耐心艰苦的政治工作，单凭单纯军事的打击和简单的镇压报复，不但不能从政治上、组织上瓦解会门，而且会更加促使会门仇恨和恐惧我们，而且给了敌人欺骗群众的政治资本，给解决会门问题增加了更多的困难。

在处理个别会门村庄时，虽然他们过去曾经杀过我们的人，打过我们的部队，只要他不继续反共反八路军，宣布解散会门组织，我们保证了不报复，不咎既往。由于宽大政策的实施，不仅是争取了过去对我们仇恨最深、反共最坚决的会门，而且解除了其他会门对我们的恐惧心理，表示了我党宽大为怀的政策，感动了被欺骗的会门群众，从思想上解除了会门的武装。

鲁西南经过了坚持三个村庄的艰苦斗争，不仅是最后的战胜了一切困难，彻底的粉碎了敌人的进攻，坚持了鲁西南最艰苦的局面，而且创造了今天的鲁西南抗日根据地，成为坚持冀鲁豫边区抗战，保持华北、华中底联系的一个坚强的堡垒，同时也是我们将来举行反攻的前进阵地，与整个华北敌后抗战的坚持是不可分离的。

冀鲁豫边区人民抗日 联防组织条例草案

(一九四二年)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人民抗日联防之组织是以适应民众抗日、锄奸、防匪、保家之迫切需要，发动人民联合武装自卫，群〔策〕群力，守望相助，安定社会秩序，保卫家乡，保卫抗日根据地为目的。

第二条 本联防系根据人民参战之义务，为发扬民主，建立人民自卫武装之独立领导系统，统一民兵、自卫队之行动与配合之组织，呈请政府备案后须享有合法之地位与合法权利。

第三条 本联防之任务规定为：甲、袭扰敌之据点，封锁敌人之交通，打击小股出扰之敌伪，肃清盗匪。在敌出动“扫荡”时，掩护群众退却。乙、站岗放哨，盘查行人，捕捉敌探，检举内奸，防止奸细活动。丙、担负担架运输、传达情报等战时勤务，并进行空室清野藏粮等战争动员工作。丁、配合主力军或地方军作战。

第四条 本联防之组织原则，系根据民主集中制，各级领导机关均由本地人民武装代表并吸收士绅名流选举成立之（选举法另定之），并经民主讨论制定联防公约，一经通过，参加联防之人民均有遵守之义务。

第二章 组织细则

第五条 本联防之领导机关为人民抗日联防委员会。边区、县、区三级得由同级人民武装代表大会选举成立之，专署级不成

立。在一行政区眼下不易成立区联防委员会时，若干村可成立中心村的联防委员会。

第六条 各级联委会的组织如下：

甲、边区级联委会由13人至15人组成，并为处理有关抗日联防之经常事宜，得设驻会委员3人至5人，主任委员1人。

乙、县级由11人至13人组成之，设主任委员1人，副主任委员1人或2人。

丙、区级由9人至11人组成之，设主任委员1人，副主任委员1人或2人。

丁、中心村联委会由7人至9人组成之，设主任与副主任委员各1人。

第七条 为便利执行联委会之决议，并负责进行民兵、自卫队之作战教育、经费供给及武器、弹药之分配等事宜，得在县〔以〕下各级联委会设立指导机关。其组织如下：

甲、县设大队部，设大队长1人，副队长1人，教导员1人。下分四股：

①第一股军事股，股长1人，干事若干人，负责指挥作战、侦察、联络、通讯、军事教育。

②第二股政治股，股长1人，干事若〔干〕人，负责宣传教育、锄奸、敌伪工作。

③青年武装股，设正、副股长各1人，干事若〔干〕人，负责该区青年武装之领导。正、副股长得由同级青抗先队长、指导员兼任之。

④第四股供给股，股长1人，干事若干人，负责武装、弹药及财粮供给及伤亡抚恤等事宜。

乙、区级设中队部，设中队长1人，副队长1人，指导员1人。下分设军事、政治、青年、武装、供给干事各1人。在区以下，因地区过大，为便利防务，得设中心村队部，设队长1人，副队长1人，指导员1人。村以自卫民兵为联防之下层基础组织。

第八条 为各级队部便利执行联委会之决议起见，各级队部之

队长或政治负责人，得由同级联委会主任或副主任兼任之。

第九条 各级队部工作人员之任用，军政主要负责干部，得由同级人民武装代表会议推选之。股长及干事，得由各级队部聘请，经联委会之批准任用之。

第三章 编 制

第十条 在联防区不脱离生产之村民，得按自卫队组织条例编制之。联防队部执行过去自卫队部之任务，并可组织半脱离〔生产〕的民兵，如模范班、青抗先，其组织见各自组织条例。模范班、青抗先受联队部指挥。联防不设脱离生产的常备武装，以区中队执行支持配合作战任务，但联防可成立轮训队，担负一部常备任务。

第四章 职权及与军政民之关系

第十一条 本联防之最高权力机关为边区人民武装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为边区抗日联防委员会。该联委会乃权力机关。因边区不设军政机关，故须同时执行之职责与权利。因此对各级队部为领导关系，统一作战教育，统一经费筹划及武器、弹药之筹划与分配等事宜。在边区联委会未成立前，各地联防之最高权力机关，属于各级人民武装代表大会。各级联委会职权如下：

甲、县区联委会乃权利〔力〕机关，向各该级武装代表大会之决议负责，并有督促同级队部切执行之权。

乙、有维护与执行联防公约之权利。

丙、按照下级及同级队部所提交之案件，有讨论、批准或否定之权利。

丁、下级联委会在不妨碍上级联委会之决议之原则下，得制定自行公约，经县府批准后，有维护与执行之权。

第十二条 各级联委会正、副主任委员之职权如下：负责执行联委会之决议，处理本会日常工作事宜，并负责召集联委会开会。各

级联委会正、副主任及委员，得兼任各该级队部之军政主要负〔责〕人。

第十三条 边区联委会为边区人民武装最高权力机关。根据民主原则，对县区联委会无直接领导关系，但有指导关系，而县区上下联委会之间亦无垂直领导关系，而是指导关系。各级联委会与其同级队部之关系，联委会为领导机关，联防队部为执行机关。联委会之一切决议决定概应由同级队部执行，而各级队部接受联委会之决定，应保证实现之。但联委会不干涉联防队部之独立系统与内部生活，并不得代替队部直接指挥民兵、自卫队。

第十四条 抗日政府对联委会为领导机关，联委会选举之后，须经呈请政府批准备案（县区级统向县政府备案），始得行使职权。各级联委会应接受同级政府及其武装部门对各该区民兵、自卫队军事、政治作教育之领导。凡有关政府法令范围事宜，需提交政府处理，联委会无权自行处理。但与联防有关事宜，联委会或队部有向政府提出建议之权利。政府须保持联委会之独立性，不干涉其内部生活，应重视联委会之决议与提议，并负有帮助解决各联防区内之武装、弹药、粮款、伤亡抚恤等实际问题之责。

第十五条 军区、军分区与县区级军事机关，负有对联防之军政机关进行军事政治教育、指导帮助之责。并在作战时，各级队部应接受主力军或游击队所给予之配合作战之命令，但军队不得干涉民兵及自卫队之独立系统与内部生活，并有负责帮助解决有联防之武器、弹药、干部等实际问题之义务。

第十六条 为加强联委会之统一领导作用，并因目前边区以民兵组织武装还在开始发展的过程时期，因之，在各该联防区内之民兵自卫队等人民武装之作战教育等事宜，均应统一于各级队部领导之下。模范班的领导系统建立到县。模范班、青抗先在军事指挥上绝对统一于联防队部，在组织〔上〕须着重其独立性，青抗先各级队长须兼任青年武装股长；模范班各级队部〔长〕兼任军事股长之职，参加各级联防队部工作。当青抗先、模范班是直接系统，与联

防队之决定发生抵触时，青抗先得报告上级队部，由上级队部与联防队部讨论解决；在未得上级指示以前，必须遵照同级联防队部之决定。

第十七条 联委会对其群众团体为配合关系，群众团体应动员其会员积极参加联防，并起模范作用，而各联防队部应负保护群众团体之责任，并帮助开展群众工作，建立群众组织。

第五章 教育训练

第十八条 本联防民兵、自卫队之教育训练，统由各该级政府武装部门协同联委会之军事股及政治股负责人员统一计划办理之，并在县级政府得组织巡回教育团分赴各区实施民兵自卫队之普训。在村级得暂请本村之小学教员为文化教员，任文化教育事宜。

第十九条 本联防得以区为单位建立轮训队，轮〔训〕队抽调各该区之民兵、自卫队实施训练（人员与时间另议）。

第二十条 县联防之教育训练经费，由县级政府统筹统发之。

第六章 供给及伤亡抚恤

第二十一条 各县联防之一切经费，统由县政府□同联委会统筹之。

第二十二条 各级队部之工作人员待遇，均与同级政府武装部门之工作人员同，各级队部之办公费□另定之。

第二十三条 本联防之武装弹药之筹划与分配，均以县为单位统筹之。

第二十四条 本联防区内之民兵、自卫队作战伤亡，遵照阵亡将士抚恤〔办法〕办理之。如有被敌人烧杀过重之村庄，得由各级联防区之联委会讨论，经政府批准，酌量抚恤之。

第七章 会议及任期

第二十五条 本联防之会议如下：

甲、县级定期为一年一次，区级联委会半年一次，中心区三〔个〕月一次。

乙、各级联委会之会期。边区常会半月一次，县级联委会定期为三〔个〕月一次，区级联委会定期为两〔个〕月一次，村武装委员会定期为一〔个〕月一次。如遇有临时事宜，召集临时会议。

丙、边区联委会由驻会委员，县、区、村级由主任召集之。

第二十六条 各级联委会之委任期与各级武装代表会期同，但得连选连任之。

第八章 联防公约

第二十七条 本联防为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得由武装代表讨论制定联防公约。

甲、凡是年在50岁以〔下〕16岁以上，不分性别，一律参加联防（妇女自愿）。

乙、凡参加联防之村庄，一律站岗放哨，盘查行人，封锁袭扰敌人，服从联防委员会之领导，执行联防队部所指定的任务，违者以违犯联防公约论处。

丙、各联防村，必须侦察敌情、奸细活动，传送队部，如发现放纵与□□事情，以违犯公约论处。

丁、如遇不联防一村发现敌情者，联防村有在队部指挥之下无条件的互助相应援之义务。如遇情况紧急时，就近邻村应驰援之，如故意迟延不到者，以违犯公约论处。

戊、凡违背公约者，由联委会讨论决定〔以〕纪律制裁之。

附 则

本条例由各级武装代表会讨论，经政府批准后施行之。

冀鲁豫边区人民武装抗日自卫队

暂行条例草案*

(一九四二年)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该队定名为冀鲁豫边区人民武装抗日自卫队。

第二条 该队为不脱离生产的义务的人民武装组织，依据政府法令在一定年龄内之男女公民均须编入人民武装抗日自卫队，并在执行基本任务上接受政府之指挥，但在其组织性质上仍为人民自己之抗日武装组织。

第三条 该队以组织及加强广大人民武装自卫力量，保卫家乡，保卫抗日根据地，保卫抗日政权、抗日团体，保卫人民利益，争取抗战胜利，实现独立、自由、幸福的三民主义新中国为宗旨。

第四条 该队基本任务如下：

甲、配合抗日军队作战，进行群众游击战争；

乙、维持抗日根据地的治安；

丙、担任抗战勤务；

丁、加强军政教育训练，踊跃参军参战。

第二章 队 员

第五条 本边区抗日人民凡年在18岁以上50岁以下之男子，18岁至45岁之妇女，除患神经病者、重残废及被政府褫夺公权者外，其余不分性别、种族、信仰、阶级，均应登记参加编制为该队队员

*原件无日期。据内文推断，当是1942年的文件。

(妇女暂以自愿为原则)。

第六条 该队队员有下列权利:

- 甲、选举权、被选举权及罢免权;
- 乙、参加本队会议者有发言权、表决权;
- 丙、对本队一切问题有建议权。

第七条 该队队员均有下列义务:

- 甲、遵守纪律;
- 乙、坚决服从上级领导指挥;
- 丙、坚决执行命令与完成任务。

第三章 组 织

第八条 该队于边区、专署、县、区、村各设人民武装抗日自卫委员会(以下简称武委会)。边区武委会委员由9人到11人组织之(互推常委5人);专署武委会由委员7人到9人组织之(互推常委3人至5人);县武委会由委员9人组织之(互推常委3人至5人),区武委会由委员7人至9人组织之(互推常委3人至5人),村武委会由委员5人至7人组织之(不另设常委会)。

第九条 边区、专署、县、区、村各级武委会设主任秘书1人,下设作战部、组训部、青年武装部,各部设部长1人,干事若干人。边区级与县级武委会附设妇女干事1人(没有妇女自卫队者不设)。村级武委会直辖以下各队:

民兵队	{	模范队(班)
		青抗先(游击小组)
自卫队	{	普通自卫队
		妇女自卫队

第十条 该队组织原则为民主集中制。

第十一条 边区至区各级武委会均由各级武装代表大会选举之(在未正式成立武委会前得成立临时武委会),村级武委会由队员

大会选举之，临时武委会产生由各级武装部门、各级抗联、各级政权军区军分区代表推选之。

第十二条 村级武委会为该队之基本组织，村武委会主任为该村行政委员会当然委员。

第十三条 边区至区各级武委会委员任期均为一年，村级武委会委员任期为半年，得连选连任。

第四章 编 制

第十四条 凡合于本条例第五条之规定者施行男女分编，男子编为民兵队（自愿为原则）与普通自卫队，妇女编为妇女自卫队。

第十五条 编制：5人至15人为一班，3班为一小队，3小队为一分队（以行政村为单位，如有过大过小村庄，2班或5班可编一小队，2小队至5小队可编成分队）。班设正、副班长，小队设正、副小队长，分队设正、副分队长，皆不脱离生产。

第十六条 普通自卫队之分队、小队及班得以下列标准编成之：

甲、18岁至23岁编为青年队；

乙、24岁至45岁编为壮年队；

丙、46岁至50岁编为老年队。

第十七条 妇女自卫队之小队、班得依下列标准编制之：

甲、18岁至25岁之妇女编为青年队；

乙、26岁至35岁之妇女编为壮年队；

丙、36岁至45岁编为老年队。

第十八条 民兵队——青抗先、模范班或游击小组合称为民兵。民兵为人民武装中高级组织并依自愿原则参加而组成之，执行比普通自卫队较高之任务，即农忙时从事生产，农闲时从事训练，战争时参加战斗，成为人民武装中之骨干组织。其编制标准如下：

甲、18岁至20岁之男子参加青抗先；

乙、21岁到35岁之男子参加模范班；

丙、21岁到23岁之男子参加青抗先或模范班，依队员本身自愿决定之，但不得同时参加两种组织。

丁、15岁至17岁之男子组织少先队，由青抗先领导之。

第十九条 凡参加民兵者不再编入普通自卫队之组织。

第二十条 普通自卫队之三大任务：

甲、站岗放哨、锄奸缉匪、抗日戒严、维持地方治安；

乙、担架运输、空舍清野、侦察、通讯、担任后方勤务；

丙、破路拆堡、构筑工事、救护伤病员，在“扫荡”时掩护抗日工作人员。

第二十一条 妇女自卫队之五大任务：

甲、站岗放哨；

乙、缝洗慰劳；

丙、侦察锄奸；

丁、救护掩护；

戊、空舍清野。

第二十二条 民兵之三大任务：

甲、袭扰敌伪，配合作战；

乙、破坏交通，掩护群众转移；

丙、侦察锄奸，封锁据点。

第二十三条 民兵除主要执行其三大任务外，平时也可执行自卫队之任务，但为了便于执行其高级任务，应尽量减轻其对普通任务之执行。

第五章 职 权

第二十四条 本队最高权利〔力〕机关为边区人民武装抗日自卫队代表大会；代表大会闭幕期间为边区武委会。

第二十五条 各级武委会正、副主任职权如下：

甲、领导与推动各部门工作，召集本会各种会议；

乙、命令与指挥军事行动；

丙、对外交际。

第二十六条 各级武委会各部职权：

甲、作战部——①负责侦察敌情；②指挥作战；③研究民兵战术；④爆破技术指挥等；⑤并进行军事教育及送信联络等工作。

乙、组训部——负责组织调查统计及审查配备干部及平时战时的政治教育、宣传鼓动等政治工作。

丙、战勤部——负责担架、破路人力动员及民兵供给等工作。

丁、青年武装部——负责青抗先工作。

戊、妇女武装部——负责妇女队工作。

第二十七条 边区到村各级青年武装部在各级武委会的领导下，依据武委会之统一方针、决议与教育计划，根据青年特性，负责青抗先工作，但任免干部、作战指挥等统一于武委会，青抗先无单独行文发布命令之权。

第六章 人民武装部门与各方面的关系

第二十八条 武委会与抗联之关系

甲、各级武委会主任为各该级抗联当然常务委员（村级救国会则为武装委员），出席会议，报告、讨论群武工作及领导上的配合问题，不兼抗联主任，不讨论此种性质问题时可不出席。

乙、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是群众工作的全部任务，因此，抗联须将群众武装工作作为自己部门工作的重要部分。群武部门得领导武装保卫群众的经济利益、政治利益，从日常工作中发动群众参加民兵，参加武装对敌斗争。

丙、抗联与武委会得互相委托到下级指导及随时注意检查工作，互相交换文件，交换经验，以取得工作之配合与帮助。

丁、武委会在通过群众运动组织民兵时，须依据抗联工作方针去进行群武工作，但抗联不得干涉武委会内部行政。

戊、抗先工作统一于武委会领导，各级武委会设青武部长，不

另有垂直系统。有青教会地区，青武部长应是同级青教会委员之一，青武部干部之处理、调动得商同青教会，但最后决定权在武委会。

己、青教会必须注意给青武部配备得力干部，妇教会给妇武部配备得力干部，并帮助发〔展〕妇女自卫队。

第二十九条 武委会与军队之关系

甲、武委会系人民武装领导机关，与军队无隶属关系，但在军事活动上，人民武装应该接受各级军事机关之指挥，但必须通过各该级之人民武装领导机关，不得乱加干涉。

乙、各级军事机关及部队，对人民武装教育训练有协助之责，并应带领人民武装对敌进行斗争。

丙、各级军事机关之军政会议及武委会之会议，得互相派人参加，以便讨论有关武装建设及军事斗争结合问题。

丁、武委会于每一工作阶段得向各该级军事机关汇报群武工作与军队之配合情形，但军事机关亦须向群武部门报告领导及建设人民武装事宜。

第三十条 武委会与政府之关系

甲、武委会系人民武装领导机关，对政府无隶属关系，但在执行人民武装基本任务上，如进行群众游击战争，配合抗日军队作战，维持抗日治安，担任抗战勤务等，武委会必须接受同级抗日政府之领导。

乙、武委会有领导人民武装保卫抗日政权之义务。

丙、武委会应协助各级公安机关进行锄奸工作及协助各级工商管理局进行缉私工作，但均不得直接处理案件。

丁、各级武委会在侦缉盗匪、烟、赌、逃兵、走私等工作上必须接受同级政府指挥，并须将案犯送交政府处理，不得自行处罚，违犯者须受法律处分。

戊、各级武委会主任须兼各级政府之武装科长、助理员，出席政府重要会议；武委会之重要会议，同级政府之主管人或民教部门

负责人也须参加，以便讨论武装与政府结合问题。

己、人民武装之组织训练、干部调动、上下行文，武委会不经政府，自行处理之。

庚、政府负责供给武委会经费，武委会须向政府造预计〔决〕算（脱离生产干部是省粮款，民兵弹药地方粮款）。

辛、各级武委会须向同级政府作定期与临时之工作报告与经费报告，政府对武委会之开支有审核权。

壬、为了适应现实情况，便利工作，供给问题，各级武委会自行伙食单位（游击区之区可与抗联同伙），专县级武委会可向同级政府造领粮食经费，区级可由区部按规定代替造领，伙食单位须根据需要与某部门结合或自己单独。

第七章 会 议

第三十一条 本队边区、分区、县、区级代表大会一年召开一次（在临时武委会期间暂不召集），村队员选举大会半年一次，均由各该级武委会召集。

第三十二条 各级武委会召集会议时间如下：

甲、常委会，边区到县均为一月一次，区以下均为半月一次。

乙、执委会，边区到县均为半年一次，区三个月一次。

丙、联席会，边区召集分区半年一次，全区召集县半年一次，县召集区三个月一次。

第三十三条 各级代表大会、村队员大会及各级武委会于必要时召集临时会议。

第八章 纪 律

第三十四条 本队全体队员及全体干部均须遵守本队条例，服从命令，完成任务。

第三十五条 违犯纪律者得按其轻重予以教育或处罚（批评、警告、处罚勤务、撤职、罢免等处分）。

第九章 经 费

第三十六条 本队经费来源如下：

甲、政府供给；乙、胜利品一部或全部。

第三十七条 本队经费由武委会统一预算，经政府批准，并由政府直接开支之。并须按月向同级政府报销，政府有审核本队经费之权（县以下统一于武委会开支）。

第十章 附 则

第三十八条 本条例由行署、军区共同颁布，自颁布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

第三十九条 在本边区人民武装代表大会未召集前，本条例之解释权与修改权属于行署、军区。

附 件

- 一、各级临时武委会的产生法；
- 二、各级临时武委会的编制及经费供给之决定。

各级临时武委会的产生法

一、在边区人民武装代表大会未召集前，边区到区暂成立临时武委会。

二、边区到区各级政府负责召集同级军政民机关团体代表会议，推选各该级武委会委员及主任委员，成立临时武委会；村武委会是由自卫队队员大会民选产生之。

三、各级武委会的委员标准最好是：

1、边区武委会委员由行署、军区、抗联各产生1人，武委会正、副主任，各部部长，秘书为委员，并吸收分会3或2及县会主任1人为委员。

2、分区武委会委员由专署、军分区、抗联分会各产生1人，武

委会主任、各部部长及县会主任1人为委员。

3、县武委会由县府抗联基干队各出1人，武委会主任及各部部长及区会主任1人为委员。

4、区武委会主任由政权、区基干队、抗联各1人，村会1人，武委会正、副主任，各部部长为委员。

5、村武委会由武委会主任、模范队长、抗先队长、妇女队长产生之。

各级临时武委会编制

一、边区武委会

1、主任1人。

2、组训部长1人，干事1人，妇女干事1人（暂不设立）。

3、作战部长1人，副部长1人，干事1人。

4、青年武装部长1人，干事1人。

5、秘书1人，缮写员1人，油印员1人，管理员1人，通讯员3人，伙夫1人，马夫1人，马1匹，公用自行车3辆，油印机1架，共计干杂人员16人。

（如各级武委会经费统一由武委会造报预决算，得增设会计1人）

二、专区武委会

1、主任1人。

2、组训部长1人。

3、作战部长1人，副部长1人（爆炸）。

4、青年武装部长1人。

5、秘书1人，通讯员1人，伙夫1人，公用自行车2辆，油印机1架，干杂人员共8人。

三、县武委会

甲等县

1、主任1人。

- 2、组训部长1人。
- 3、作战部长1人，副部长1人（爆炸）。
- 4、青年武装部长1人。
- 5、抗勤部长1人。
- 6、秘书1人，通讯员1人，伙夫1人，自行车1辆。共9人。

乙等县

- 1、主任1人。
- 2、组训部长1人。
- 3、作战部长1人，副部长1人（爆炸）。
- 4、青年武装部长1人。
- 5、抗勤部长1人。
- 6、通讯员兼伙夫1人，车子1辆。共7人。

丙等县

主任1人，干部〔事〕2人，通讯员1人，共4人。

四、区武委会

基本区

- 1、主任1人。
- 2、组训委员1人。
- 3、作战委员1人。
- 4、青年武装委员1人。
- 5、抗勤委员1人。
- 6、通讯员兼伙夫1人，共6人。

游击区

主任1人，干事2人，共3人。

五、村武委会

- 1、正、副主任各1人。
- 2、组训委员1人。
- 3、作战委员1人。
- 4、爆炸委员1人。

5、青年武装委员1人。

6、妇女干事1人。

7、抗勤委员1人。

村级按工作之需要得设干事若干人。

谈谈群众团体干部的立场问题*

(一九四三年一月一日)

杨 泽 江

(一)什么是群众团体?群众团体干部的立场是什么?群众团体与军队、政府以及广大人民的关系怎样?在边区有许多不同的认识。这些认识有的是正确,但也有不少是错误的,同时又在几年工作中不断改进这种认识的。因为群众团体的立场是决定群众工作任务、工作方式与各方面关系的根据,所以过去在工作中便产生了种种的错误。

现在仅根据几年来的经验,对群众团体干部立场问题作一初步的原则研究,并希望能引起各地同志进一步研究与讨论。

(二)过去我们有些什么错误认识呢?

第一,认为群众团体干部与八路军、抗日政府干部一样,认为群众团体只是军队与政府的御用机关。这是一部分干部尤其在民国29年动委会时代前后厉害的一种错误认识。因此,突击屯粮、募捐、扩兵等成了主要工作任务,行政命令,威吓压制群众便成了□□□□工作方式。由于他们认为自己是“便衣八路军”或“七路半”,便产生处处谈政民配合,与军政比地位,比享受待遇,甚至相互垮[拆]台的现象。这样的结果就使群众团体与军政各方面的关系至今没得到正确解决,并使群众团体干部在衣食言谈作风上十足八路军化、官僚化了。

第二,认为自己是先进的人,是“群众领袖”,是工作员,是

*本文原载于冀鲁豫边区抗联1943年1月20日编辑出版的《工作研究》创刊号。

上边派来的，而认群众为阿斗，为落后农民，因此群众便应将自己看作是上级，是领袖，甚至是老谷，是“官”，这在过去几年中是相当厉害的一种认识。

从这立场出发，□□抗日，高喊民兵联防，向群众要东西，发展组织，巩固整理组织便成了主要任务，自上而下的、偷偷摸摸的□□作风或强迫命令，便成了主要的工作方式。因此，脱离群众的空谈主义、官僚主义，抗战□□的坏作风便相当长时期的在群众团体中占了统治地位，在衣、食、住、行、言谈各方面创造了与军政尤其与广大群众不同的特殊化的一套习惯。这样的结果就造成了群众运动的长期消沉，会员越组织越少的严重现象。

第三，在开始开展民主民生运动转变〔为〕群众运动的时候，一部分人的错误认识是：认为自己是上边派来的工作员，是为农民作好事的，是准备将来当“群众领袖”的，而自己不是群众，群众的力量也是不可相信甚或是无力量的，因此便产生了干部包办代替群众斗争和过分依靠政权的严重错误，严重的阻碍了群众的发动与民主民生运动的实现。

第四，对农、青、妇各教会的认识不同，立场认识不明确，在目前仍是十分严重的。过去曾认为农会应照顾各阶级利益，青救、妇救应将全体各阶层青年和妇女利益一般的平等看待，都是不正确的。

以上四种认识的共同错误是：

1、自己是工作员、八路军、群众领袖，甚至是统治者，并不是老百姓，因此可以站在群众头上“屙屎屙尿”。

2、群众的痛苦不是自己的痛苦，群众的呼声和要求不是自己行动的根据，而只有“抗日救国”要东西，才是自己的主要工作。

以上四种错误，是随工作的发展逐渐发展和形成的，在各个不同地区、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主要错误认识。在目前来说，一般的是以第三、第四种为最严重。

（三）为什么产生这些错误认识呢？我认为主要原因在于：

第一，边区群众团体主要是在树立起抗日根据地以后自上而下建立起来的，群众团体的干部又多是小资产阶级中小知识分子和中农以上的农民，真正的工农干部是少有的（个别也腐化了），他们在长期合法保障情况下□□□□与实际群众斗争，与工农大众发生血肉不可分的联系。因此，干部未得到彻底改造，也就形成为产生以上错误认识的主要根源。

第二，边区群众基本上未真正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干部也未真正的领导群众斗争，造成干部对群众力量、群众利益认识不明确，对群众作风、民主作风在群众运动中的必要性认识不足。更由于抗日战争对人民的要求十分频繁，干部多用强制命令进行工作，因此就产生了“群众落后”、“群众无力量”，只有军队枪杆、政府法令、工作人员的强制方式才是力量，才能作出工作成绩的荒谬认识。

第三，我们在实际锻炼上，在革命理论修养上，是幼稚的年青的。这是一部分干部对群众斗争、群众力量，对群众团体的立场、工作任务，组织□□□□□□□□发生错误认识或认识不足的原因之一。

（四）我们群众团体就是老百姓的团体，干部的立场就是老百姓的立场。因此，农会应是农民的团体，就应代表农民利益；青救和妇救应是青年和妇女的团体，就应代表全体青年和妇女首先是大多数工农青年、工农妇女的利益。因此，各教会的干部就是老百姓，就是工人、农民、青年和妇女，而不是政府、军队干部，更不是官僚了。

因此，群众团体就应有自己独立的组织，□□□□□□□□要求，独立的斗争方式与独立的人格；军队、政府□□□□□不应包办他、代替他，群众团体也不应机械的学习军、政、党的一切。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将农民阶级和广大人民真正发动起来参加抗战建国事业，成为社会的主人，成为摧不毁打不烂的伟大力量。

因此，我们还应注意下面几个问题的实现：

第一，应将群众的痛苦当作自己的痛苦来负责解决，应将群众

的要求当作自己行动的根据，应将保卫群众利益当作自己第一等任务，当作团体工作任务提出的出发点，要随时随地为群众利益着想，绝不作一件违背大多数群众利益的事情。因此，我们就要耐心的听取群众呼声与意见，要随时随地都知道群众心里的跳动、呼声与要求，并切实领导群众为满足自己要求去斗争，绝不空喊和以无丝毫价值的单纯允诺给群众。

第二，抗日民主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八路军及任何抗日军队是人民的军队，我们应拥护他爱护他帮助他，并亲密的团结起来，为执行政府的一切法令，响应党军政的一切号召，以及为打倒日本法西斯，建立新民主主义新社会的共同任务去奋斗到底。

当某些法令和事情与群众利益、群众要求相抵触或暂时抵触时，我们一方面应耐心说服群众，克服眼前利益、局部利益与长久利益、全部利益的矛盾，一方面应随时随地向上级团体报告或向政府、军队建议，求得合理解决，绝不可漠然视之、置之不理，或侮骂群众为“落后”为“顽固”，更不可不尊重军政法令与威信的原则的乱批评。

在这方面，群众团体干部没有任何合法团体和人民以外的特权（如捆人、罚款、杀人等违法行为）。我们应作执行法令的模范，应经常接受党军政各方面的指导与扶助，但绝不可在工作上形成配合机关或特殊人物，同样也不可运用军政同样的权利与方式去对待群众、领导群众。

第三，我们应善于根据群众的现实政治经验去领导群众前进，绝不可命令群众、强制群众，犯先锋主义，以避免脱离大多数群众，形成“光荣的孤立”状态。因为认为自己是上级团体，是“群众领袖”（？），群众就应绝对服从自己的观点，是不认识群众，不懂得民主，不懂得组织原则，不懂得领导艺术的脱离群众的封建等级观念或官僚主义。

我们应认识，群众是实利主义者，有浓厚的保守性、□□□□当群众未感觉到需要以前，是绝不会行动起来的，如果施以强制命

令，必会遭受到相反的结果。同时我们应认识，当群众认识了真理时，必然会形成一种强大的不可制服的力量。因此当群众失去了正确的政治领导时，必会引起组织涣散，行动不统一，以致失败的危险。

所以在领导群众的方式上，应善于发扬民主精神，服从大多数群众的意见，并应善于不断反复的说服教育群众，提高群众的政治经验，并根据大多数群众的觉悟程度去领导群众前进，只对破坏群众利益的个别破坏分子、顽固不化分子才采取强制方式。

所以群众落后论是错误的，干部包办代替群众斗争，对群众的官僚主义态度以及强调群众自发斗争的尾巴主义观点都是不正确的。

第四，我们不但要善于领导群众，同时应该虚心、诚恳的不断向广大群众学习。因为大多数干部的生产斗争知识与社会斗争知识比起广大工农群众的知识来说，是相差甚远的。过去历史的发展，历史的奇迹，历史上的英雄及现在的伟大抗战与任何一事业，离开群众力量的积极发挥与支持，是丝毫不能成功的。过去的一切伟大发明、伟大斗争，以及群众运动的组织形式、斗争形式、工作方式，离开广大群众的创造性，是无法发[实]现与进步的。就是所谓“理论”，也是数千年来人类斗争经验的科学总结，而不是从天上掉下来或一个伟大人物空想出来的。因此，我们的工作离开理论固是不能正确的行动，同样应认识，我们的工作与理论离开了群众斗争，亦是无法创造与前进的。

因此，我们在领导群众斗争中应不断向群众学习，并从群众行动中、经验中来不断改造自己，改善工作与团体的领导。因此，部分干部认为自己的一切比群众强，自己只是群众的先生，不是群众的学生的自高自大英雄主义，是应在群众斗争中即刻消灭与克服的。

第五，为了正确掌握群众团体的立场，干部必须与广大群众生活在一起，使自己的生活水平与群众一样，使自己的服装群众化，言语通俗化，并在待人接物生活习惯上尊重群众的传统，绝不特殊

化，绝不脱离群众，以保证随时随地保持干部与会员和群众的密切联系。

这问题虽不是转变群众运动的中心问题，但如不注意，必会增加工作的困难，造成脱离群众的错误。

最后，我们大家应认清，群众团体干部脱离了群众，就是丧失了自己的立场，就会全部丧失自己的力量与丧失团体存在的可能。因此，希各地同志们对此问题提起高度注意，并不断改进我们的认识与全部工作。

减租增佃工作中的 几个具体问题*

(一九四三年一月)

元 贵

在濮、范减租增佃工作中，遇见了几个具体问题。这些问题，在我们未开始工作前，是想不到的。这些问题，在其他地区的减租增佃工作中，可能也将遇到。兹根据濮、范工作经验，提出下列解决办法，以供各地同志讨论。

(一) 里打一股(即里打一劈)的增佃问题

里打一股是小种制中一种比较隐蔽的超经济剥削，在濮、范一带，佃户把它叫做“养老股”，是有很大大意义的。里打一股的办法有两种：一为东家(小种地的地主俗叫东家)参加部分劳动，里打一股；一为雇用廉价雇工里打一股。在第一种办法中，东家只参加部分劳动(不是参加一个人的全部劳动)，分粮时却当一整股来分。更其甚者，东家只参加辅助劳动(指打水、喂牛、赶大车等)，或叫不成年的子弟与年过五六十的老头子参加部分劳动，分粮时分正[整]股。在第二种办法中，东家雇用劳动力不大的雇工参加劳动，这种雇工因为劳动力不大与纸币跌价的原因，工资是很低的，东家就从这里来渔利。这叫做两头(佃户与雇工)吃亏、一头赚便宜的办法。

增佃办法是先实行二五增佃，再教育佃户把里打一股改为破股

* 本文原载于冀鲁豫边区抗联1943年1月20日编辑出版的《工作研究》创刊号。

——就是少出力少分粮，多出力多分粮的意思，雇工要实行以粮代价。在才开始减租增佃的地区，为了减少地主的阻力和易于发动佃户，对已实行里打一股者，暂不改变，等群众已初步发动起来，再领导改变里打一股的斗争。但增佃后，地主为了报复而里打一股时，则坚决反对。

（二）干半劈的增佃问题

什么是干半劈？就是小种制的佃户在东家吃饭，把每年应分的粮食拿出一半，给东家当饭钱。这种干半劈怎样增佃呢？于是就成了两种主张：一种主张把增佃的粮食同样分给东家一半，另一种主张把增佃的粮食全部归佃户。在这两种主张中，我们的意见还是以第一种主张比较好些，因为佃户吃东家的饭，不论年景好坏，收成怎样，都是给东家一半粮食（自己应分粮食的一半）。是否吃东家饭，可由佃户自己决定，如佃户感觉不合算，可以不吃东家的饭。

（三）多给铡草喂牛的佃户几斗粮食的增佃问题

在濮、范常有这样的租佃关系，一个东家觅好几个佃户，其中有一个佃户除耕种土地外，还负责给东家锄〔铡〕草、打水和喂牛，照例东家每年多给几斗粮食（有4斗、8斗和一布袋不等）。增佃办法，除按应分之粮食实行二五增佃外，多给之粮食亦增加25%。

（四）二地主增佃减租问题

二地主分两种，一种是大地主出租给二地主，为大种地制或定额地租制，二地主再出租给佃户时为小种制。这种二地主是应〔允〕许存在的，因为小种制是比大种制或定额地租制比较进步的生产方式（主要原因是二地主参加经营）。增佃减租办法，是二地主对大地主原则上实行二五减租，但主要的还是佃户对二地主实行二五增佃。

另一种二地主，是大地主出租给二地主，为大种制或定租制，二地主出租给佃户时，亦为大种制或定租制。这种二地主很少，要遵照边区政府土地使用条例，严加禁止。其减租办法，是佃户直接对大地主实行二五减租，就是根据大地主出租给二地主的租额，实行二五减租，不是根据二地主出租给佃户的租额去减。

（五）老幼孤寡与抗属减租增佃问题

有些老幼孤寡，因自己无生产能力而将自己土地出租，佃户一般的说中农以上者居多。对这种地租，我们主张根据具体情形，以调解方式不减、减一成、减一成五或减二成，其负担依照政府规定办理。贫农抗属出租土地时，减租增佃办法与老幼孤寡同；如抗属系中农以上者，仍根据法令实行二五减租增佃，不得将减租增佃问题与优待抗属问题互相扯皮。

（六）瓜田与菜园减租问题

瓜田原则上实行二五减租，如佃户不愿减则不减，因瓜田都一年一说，又无一定租额，地主可随便提高地租。如因天旱不收（如今年），所得不足成本，可根据土地使用条例第三十条，用调解方式进行减、免租。

菜园有一定租额（比普通地租高），可实行二五减租。

（七）战前战后租额问题

减租增佃是根据战前租额去减，这是每个同志所熟知的事，但在工作中遇着这样几种情形，即：

- ①战后租额变化，同时副产物的分配与负担问题也起了变化；
- ②战后因土地变坏而降低租额，或因土地变好而提高地租者；
- ③战后租额变化，而副产物的分配与负担问题并未起变化；
- ④同样劳动条件同样土地，而租额不同。

对这几种情形，我们减租增佃办法是这样：

第一种，要根据战前租额实行二五减租和增佃，但副产物的分配和负担问题也同时按战前分配情形与负担情形去解决，就是战前副产物怎样分配就怎样分配，战前怎样负担就怎样负担。如政府有特别规定者（如行署规定在范县大种地与定租地实行二五减租后，地主负担8分，佃户负担2分），就依照政府规定实行负担。

第二种，要根据战后租额来减，因为土地变坏，地租就应该降低，土地变好，亦应提高地租。这种情形在黄河两岸地区常遇着。如不因土地变坏或变好而改变租额时，就依照战前租额来减。

第三种，根据战前租额实行二五减租增佃。

第四种，不管租额相同与否，要依照战前租额实行二五减租增佃。因为要使全区或全县租额划一，是不可能的事情。关于大种制与定租制地租不得超过375%的规定，在边区政府最近颁布的《关于减租减息的几项重要规定》的布告已无规定，只是规定依照战前租额实行二五减租，如地租低于375%者，亦实行二五减租（详见边府《关于减租减息的几项重要规定》的布告）。

（八）变更负担问题

有些地区并未实行任何合理负担，或已实行合理负担而政府未明文规定负担办法者，大种制与定额地租制实行二五减租后，不变原来负担。如负担战前战后有了变化，可仍按战前负担办法实行负担。在范县这次减租增佃中，大种制与定租制实行二五减租后，地主负担8分，佃户负担2分；在濮县因为实行了简易合理负担，则地主负担6分5厘，佃户负担3分5厘，都是因为政府有明文规定，各地不可机械的采用。

在濮县、范县工作 总结大会上的发言（节选）

（一九四三年四月）

黄 敬

一、农村各个阶层的分析

首先了解划分各个阶层的根据。其根据在哪里呢？就是根据他生活资料的来源主要是依靠什么方法得来的（通俗说即用什么方法弄到吃喝）。这是确定为哪一阶层的唯一标准。

马克思主义对这一个问题的分析，是以劳动得来的或不劳动得来的（所谓靠天、靠命、靠祖先都是错误的）。世界上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是从劳动中创造出来的。有的劳动，有的不劳动，就产生了剥削与被剥削经济上的不平等，社会上就分成了阶级，但基本上就是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不劳动与劳动）。不劳动的人去剥削劳动的人，所以一般的说，劳动的人就是被剥削的，不劳动的人为剥削的。剥削阶级的生存是在打击他人抬高自己，他的幸福是建筑在他人的痛苦上的，这就产生了他们剥削阶级的意识。

其次就是分析农村有哪些阶层。大体来说：

（一）从经济上来划分为：地主阶级、富农、中农、贫农、游民、手工业者、商人和某些自由职业者。现在分开来讲：

1、地主

地主的生活资料来源，是不劳动的，是剥削阶级。他的剥削方式是封建剥削得来的，主要是依靠地租和高利贷两种东西（而地租更主要些）。把地主当作一个阶级来说，在民主革命阶段中，是革命的对象，不是一个革命的动力。因为他是一个封建势力，而中国

的民主革命就是要解决封建势力。但是要看到，中国的地主，特别是今天的地主阶层有很显著的不同，主要的是：由于中国民族矛盾是主要的矛盾，并且在整个民主革命阶段民族矛盾都是主要的矛盾，因为中国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状况，产生了上层大地主与中小地主的矛盾，因为他们与帝国主义的关系不同，帝国主义对大地主拉的近，对中小地主拉的远，中小地主受帝国主义的压迫最厉害，另外，大地主与帝国主义勾结，在经济力量上比较大，他就形成农村的实际统治者。中小地主在一般的情形下，在政治上是无权的，这就发生了中小地主与大地主争权夺利的矛盾；地主的一举一动都是为了经济上的利益，为了进行经济剥削，同样也剥削了中小地主。一个是 有钱有势，一个是无钱无势，就产生了地主阶级的不同阶层，就产生了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的矛盾。在今天的抗日战争中，地主一般都感觉到敌人的威胁，尤以大地主的威胁更大，因为他是当权者，有钱有势。因此就产生了投降派及顽固派（亲日的大地主及抗日的大地主）。但投降派的大地主还有很多的不同，与日本的关系不同，就有动摇的、后备的、坚决的诸种不同的程度。

（1）关于顽固的大地主。他的特点是抗日，但怕日本，感到抗日是抗不了的，再加上感到减租减息新法令的威胁，所以抗日〔是〕动摇的。但是基本上还是抗日的，特别在今天知道日本不能长了，更增加了他的抗日方面。

而投降派则对一切抗日的力量与人民都反对，已成为民族的敌人。而顽固派的大地主是农村的当权者，一切斗争都会遇到他，民主民生都从他那里去取得，因此他就感到痛，就要反对。但是这种反对是有限度的，只要我们一拉他，还可以回头合作而不到日本方面去。因为虽然我们取得了“上座”，还要保障他的人权财权，所以需要懂得阶级矛盾服从民族矛盾的道理。只要我们的策略运用的好，就可以放手去斗争（必须有一定的方法和条件）。因为我对顽固地主的斗争，是为了救他不作亡国奴，是“治病救人”。

（2）中小地主。不仅抗日，而且赞成民主，但是并不赞成民

生。但是他和顽固地主是有区分的：他赞成民主，顽固地主则反民主。这是我们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基本依据，也就是今天新民主主义的完成与“三三制”政权在全国实现与否的问题。有些同志以中小地主反对民生，则把他看成顽固势力，这是对中间势力要求过高的。我们只能要求他与我们一同对顽固势力斗争就可以，而不能要求他同我们进行改善民生斗争。

但是我們也不能把他们反对改善民生与顽固势力不赞成民生看成一样，是有基本上的不同：因为中间势力在民主问题上存有希望，这就缓和了他们的态度和反对的程度。同时，民主也可以改善他的民生，他可以少负担一点，可以改善了他的生活，就是说在民生中失去一些，在民主斗争中又得到了补偿。

就是顽固势力反民生和反民主，但是他还希望我们去抗日，保住他的大部财产。因为民族矛盾是主要的，所以，只要我们的政策好，他仍可以被我们拉回来共同抗日的。

2、富农

基本上来说，他可以算作资产阶级中的一个阶层。他的生活来源，主要是依靠剥削雇佣劳动，因为这是资产阶级剥削的特点。但是中国的富农有着比较不同的特点，就是中国农村资本主义未得到顺畅的发展，所以富农是带有封建性的资产阶级，表现在他也放一些高利贷，剥削雇佣劳动中夹杂了一些封建的办法，比先进资本主义的国家剥削更厉害，更带原始性。

富农是受着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压迫，特别是受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压迫。因为帝国主义统治了中国的金融与市场，农产品则卖不好价钱而洋货更贵。一般说富农在农村是无权（也有例外），但富农是今天中国经济上一个不可缺少的力量。今天中国正是冲破帝国主义及封建势力的压迫发展资本主义，而富农就是其代表。同时，富农在政治上有抗日民主的要求，因此在民主革命中争取他们同我们一道今天抗日，实行民主，在抗战后实现全国的民主。他是一个民主的势力。

3、中农

他的生活资料的来源，主要的是依靠自己的劳动，一般说并不剥削他人。他的生活是自供自给，有时还有些富余，或者爬到富农，或者扩大再生产，或者放一点高利贷（在生活来源中不占重要地位），有时也雇几个短工，这一般的是富裕的中农。

由于战争及封建的压迫，一般的说中农是向下低落的阶层，上升的机会很少，因为资本主义不发展，这也就是贫农逐日增多的原因。他的受帝国主义及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压迫剥削，往往以商业形式、土地关系形式、政权形式上来出现。有时买地也受到大地主的排挤（买不到好地，自己的好地反可以□□□）。有时年景坏了，还受到高利贷的剥削。中农因为土地较少，在政治上无权，因此他们的政治表现不仅抗日，而且赞成民主及改善生活，在民生改善中可以□□改善其生活，减息以后可以借到一些钱。特别是当封建势力削弱以后，他可以有大量发展的可能。他们具有强烈的民生要求、民主要求及抗日的要求，因此他们是我们可靠的同盟者。不仅今天可以共同实现民主革命，即在社会主义革命中也是我们的同盟者。“因为他人多地少，□了也不要紧。”但这又表现了他们的自私自利还有顾及〔忌〕。他们不爱惜别人及公家的东西，包含了一些资产阶级的思想，企图打击别人上升。这种思想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很容易发展的。同时，农村的地主资产阶级的思想主要是经过中农传到党内来的（在农村）。只有加强民主教育、改造以后，才可以变好的。

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害怕中农，不仅在民主革命中，即社会主义革命中，中农对我们的态度都是革命成败的关键。虽然他有弱点，但基本上是一个劳动阶级；虽然可能产生地主资产阶级的思想，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是可以克服的。在根据地民主民生斗争胜利以后，贫农有了保障，即可以上升为中农，因此对中农的政策更加要引起我们的注意。克服中农的思想不是从打击与排挤他们，而主要的是接近他们教育他们，克服他们〔的思想〕，叫他们了解只有与

无产阶级一道，才可以有利他们，求得与我们合作到底。

4、贫农

是一个劳动阶级，完全被剥削的阶级。一般说没有地或地很少，不够吃，须要作些短工、小生意或小手工业，或者吃一些糠，甚至要一些饭，诸多方法以补其生活的不足。有的同志把贫农认为就是佃农，这是不对的。因为佃农不是一个单独的阶层，主要的虽是贫农，但也有中农，甚至〔有〕个别的富农。这不是一个划分阶级的标准。

贫农经常受到生活的威胁，经常在饥饿线上挣扎。他们受着中国一切的剥削，是比中农还厉害，在□□最没有地位，最痛苦。因此他们的革命情绪□□，仅次于雇农，是农村的半无产阶级，是我们的天然同盟者，比中农更可靠些，在数量上并不少，是革命的主力军。

5、雇农

是农村的无产阶级。他们的生活资料来源是依靠出卖劳动力。他们的痛苦也最深，受到三方面的压迫（帝国主义、封建势力、资本主义）。富农的一切损失都尽量转嫁到雇农身上去。所以雇农是今天农村中最坚决最彻底的阶层，最有觉悟性，没有家室之累。但雇工也有他的弱点，如：

（1）农村的雇工很少。因为中国农村资本主义尚不发展，加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压迫，则其文化程度很低。

（2）由于农村大规模的富农经济没有出现，他们处在分散的状况，成为中国农村雇工在质量上很差的弱点，组织性及纪律性都不强。

（3）很大一部分从贫农破产而来，小生产者的意识在他的头脑中或多或少的存在着，很年轻的无产阶级。这些弱点往往成为对方进攻的弱点。我们应很好的教育与改造他们。

6、知识分子

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也有不同的情形。由于中国之殖民地半殖民

地及半封建性，使中国民族有不可终日现象，目前则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社会生活也是不可终日的，使民不聊生，直接威胁到知识分子，感到失学失业，没有出路。

另外，由于中国不民主，文化落后，中国的工农文化很低，所以知识分子就起了特殊的作用。许多科学的知识，都要依靠知识分子来传播。他们政治感觉比较灵敏，文化水平较高，所以在革命中他们往往起先锋及桥梁的作用。如清之康梁变法、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首先都是从知识分子开始的。所以，革命的知识分子对中国的革命是很可宝贵的。

但是知识分子也有他的弱点，就是其知识主要是从书本上得来的，没有经过实践的考验，他们的实际经验很少，理论与实际结合不起来。另外，由于知识得来容易，把一切事情都看的很简单很容易，看不起工农群众，轻视物质力量，自高自大，非常空虚，经不起挫折，困难来了容易动摇，只相信自己，易犯主观主义、英雄主义。这就必须把知识分子改造，把他的理论经过实践的考验，克服他的无组织性无纪律性，把知识分子、工农结合起来，知识分子才有活力，才是可宝贵的。

知识分子在农村中是不可缺少的，必须以大力来争取他。因为工农没有文化知识，而革命是有理论、有战略与策略的，这就须要以知识分子的文化来提高工农的知识。二者必须结合起来，才能把两者的缺点克服。这就要求党很好的注意争取与改造知识分子的工作。

在抗战以来，从党的主力都转入了教育部门，强迫很多学校教员参加国民党。他们很了解，思想阵地一丧失，则一切都丧失，就永不能翻身。因为思想是推动人进步的力量，所以我们与他人斗争，首先要争取思想阵地。而今天的国民党员都退到小学校中去，等待“天时”。因为小学校教员是农村思想领导的中心，我们就万万不能忽视这一工作。在农村中，封建势力有丰富的经济、文化力量，我们必须承认，可是我们过去对文化工作做的很差。例如，小学教科书找不到“共产党”三个字，而共产党则是新民主主义的灵

魂。今天边区群众反而害怕共产党，这就是由于我们文化工作的落后所致。

中国的知识分子受到帝国主义及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压迫，一般的说，他们可以参加革命的。除了一部分为帝国主义、大资产阶级及封建势力服务以外，一般的知识分子可以争取来参加民主革命的。所以我们就必须区别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其知识分子的子弟。他们的子弟往往大部分可以革命的。只要我们政策不错误，则可以争取他们参加革命的。我们对知识分子的耐心争取与改造工作，二者都不应当偏废。

7、手工业者

即自己出卖劳动力，有着生产手段，独立生产。他们的上层可能雇佣少数人，下层则一般是不雇人的。他们受到帝国主义、高利贷及商人的压迫。他们是可以参加革命的（下层革命性更强）。他们一般与中农差不多，只要我们的贸易工商政策不犯错误，他们也是可靠的同盟者。

8、商人

有两种：小商人不剥削人，主要的靠自己；少数上层有少数的剥削。前者比较好，后者比较差。只要我们贸易政策不犯错误，他们可以参加民主革命的。一般商人大体同富农差不多（大的商人除外）。他们若没有土地，则与村政权的关系不密切。他们也具有民生要求，反对苛捐杂税；而小商人则更有民生的要求，更加接近我们。

（二）总结起来对这些阶层作了经济上的分析，现在再从政治上区别他们，基本上有四种：

1、投降势力（亲日派）

他们的社会基础为大资产阶级及大地主，及少数的游民阶层，内部成份复杂，经常在政治上起变化的。

2、顽固势力

在政治上的表现是抗日的。不赞成民主民生，当他处于优势的

时候，想尽办法阻碍之；处于劣势的时候，则不得不承认我们的优势，但搞不好，则可以跑到投降派方面去。若我们的政策好，在民主民生实现以后，顽固势力不跑掉一个，并且部分的或个别的转化为中间势力，表现他们在民主运动上的积极性。他们的社会基础基本上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但也有例外，在一定条件下，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不是顽固势力，如李、白、阎等地方实力派。当我们的斗争仍限于国内当权派时，并且对他们有利时，他们为中间势力；但当斗争转到对他们的时候，则为顽固势力。在农村中也可以找到这种人。此外，本身为顽固势力，不一定为大地主，但他是当权者，斗争到他的时候，则表现一定的顽固性，但又同大地主的顽固性不同。所以我们不能把对顽固分子之态度机械化了，应当尽量把某些个别的顽固分子争取转化为中间势力，运用中间势力的旗帜打击顽固势力，是重要的武器。

3. 中间势力

在经济上基本上中小地主及富农、商人和作坊主（中等资产阶级），而在政治上中小地主即为开明的地主，但个别的大地主也可能为开明的。对商人，只要我们政策正确，是可以争取为我□商人的。因为目前敌人对商人的苛刻是空前的（天津倒闭了3000家商店），如低物价政策下，商人的痛苦是更大的。

中间势力在政治上不仅赞成抗日，并参加民主斗争，但不一定赞成改善民生。在将来，中间势力的范围可能起些变化的，但在解决土地问题的时候，中小地主则可以转化为顽固势力。但在新民主主义整个革命阶段中，不会发生基本变化的（个别变动是可能）。

4. 进步势力

雇工、无产阶级、农民（主要指中农及贫农，富农在内）、知识分子（一般来说是进步的，部分为帝国主义及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服务的）、小手工业者、小商人等。

（1）游民阶层的划分。他们的立场很不明显（有乳就是娘），但是游民是无产阶级的一个落后的阶层，只要我们的政策正确，可

以成为进步势力。从我们的政策与他的可能发展的前途，是进步势力；从现状来看，他是动摇的阶层。

(2) 青年的阶层的划分。青年与其父兄往往不是一个阶层，不了解生产的关系，他有进步心，有知识（一般都念过几年书），受到帝国主义及封建压迫（即宗派关系及社教），在这一点上说，成为进步势力的可能性极大的，比其家属进步性是大的。因此，边区的青年运动有特殊作用。

(3) 妇女阶层的划分。妇女与她的公婆及丈夫不同，她受封建的压迫（婚姻的不自由，没有财产权及宗法社教的限制等）。妇女是各个阶级的，在争取之下有很大可能成为进步势力。

二、对濮、范两县环境之不同的认识

甲、两县在发动群众以前有何不同？

(一) 濮县：经过了顽军长期的盘踞，叛军走了不久即开始了民主民生运动，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由于顽军的存在，从阶级力量之对比来看，顽固势力不仅在农村有他的优势，就濮县全县来说，有他总的优势，上下是一致的。但由于濮县的顽军比一般的顽军更坏，在农村里顽固势力上下勾结，鱼肉乡民，许多中小地主及富农因而破产下降。而当权者及与顽军有勾结者则不同，进步势力则只感到活不下去了。长期□顽军盘踞，消耗了顽固势力的政治资本，不仅进步势力反对他，中间势力也来反对他，顽固势力的政治资本几乎耗尽了。因而引起了中间势力与进步势力在民主民生上的极大不满，他们有了共同的要求，长期的锻炼了群众，提高了他们的政治觉悟，使他们具备了强烈的民主民生的要求。所以在长期反顽斗争中就建立了我党我军的高度威信。在局面一打开，他们就要求实现民主民生。所以我们的干部一去，民主民生斗争即广泛的开展起来了。

(二) 范县：抗战以后，一般的说，我们坚持了这个地区优势，顽固势力长期处于劣势地位。但当我们取得了初步优势以后，

并未抓紧继续发动群众开展民主民生斗争的中心环节，长期的维持了我上优（有总的优势）下劣（下层为顽固势力）的形势。在这种形势下，深深的锻炼了顽固势力，他们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他们就采取了两面政策来对付我们。

其两面政策的特点：对上层则阳奉阴违，对下层则采取蒙蔽政策，在新的斗争形势下来保持他的剥削统治，采取口蜜腹剑的办法来压迫群众、剥削群众，使群众的民主民生的痛苦都转到我们共产党、八路军、抗日政府身上来，因此弄得不仅顽固分子不满意我们，即基本群众也不谅解我们。同时对我们的阳奉阴违，也麻痹了我们自己，一切都听士绅、名流的话，实际到了村里，完全是两样。例如合理负担在范县实行得最早，隐瞒的土地在60%以上，在群众看来是认为实行了40%。村长给他少报了几亩地，很感激，但结果地主瞒了很多的土地。有了“黑地”，则我们的收入要减少，则势必加重群众的负担，这样就造成了群众对我们的不满，而地主则乘机扩大事实，进行破坏宣传。

对当村长花样也很多，例如以轮流的办法当村长，其口号总是“□□”来支应我们，造成我与群众的直接的对立，共产党、八路军的威信大大的垮下去。地主不仅把群众争取过去，甚至我们的共产党员也争取过去（支部的变质），结成一个顽固的统一战线。

由于范县局面打开以后我们没有真正实行了民主民生，使得地主有很多的办法来对付我们。地主有了丰富的斗争经验，而基本群众则在□□过了几年毫无办法。这就造成了与濮县完全不同的条件。

虽然濮、范两县有这样的不同，而范县的中间势力及进步势力都没有地位的，他们所受的压迫并不低于濮县。问题在于他们尚不了解，基本群众附民生要求客观上都是存在的，因此以民主民生为中心的还是正确的，但斗争的道路与斗争的办法是不同的。当然，范县的中间势力及进步势力对顽固势力不满，但比起对八路军来则还近一些。但这一点揭穿了，群众会恍然大悟。

乙、两县在发动群众上，经过了什么不同的道路？

（一）濮县：基本势力与中间势力对我们有高度的威信〔信任〕，他们有高度的民主要求。合理负担即为民主斗争，经过这一民主斗争，可以达到他们的民生目的，所以这一工作很快的完成了。同样，反贪污斗争也是先由民主斗争而转到民生斗争，增佃减租，然后再到彻底的民主斗争，最后即可达到抗日的斗争。

（二）范县：开始是从减租增佃增资入手，在民生斗争中把顽固分子的面貌揭穿，把顽固分子孤立起来，把基本群众独立组织起来，划清了与地主的界限，然后即转入民主斗争中去，而后即可过渡到抗日的斗争。

以上是两县经过的不同路线，而两县的波折也是不同的。

在濮县，党在长期反顽斗争中有了经验，加以群众对顽固分子的不满而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我们的同志易为这比较平衡的发展所迷惑，而忘记了平衡中的不平衡，所以对于打堡垒的问题、干部的使用问题都缺乏周密的计划，对口号的提出上、力量的使用上都不够恰当的。所以，濮县的斗争发展比较普遍，但深入性不够。

在范县，则因为阻力特别大，顽固势力特别高明，广大的群众在鼓里生活着，中间势力紧跟在顽固势力后边跑，所以发展不平衡的现象比较显著。群众一旦觉悟了，则情绪很高，而未动起来的地方仍甚消沉。由于这种不平衡，就不得不使范县的党采取打堡垒的方式，干部不得不集中使用。但也因过于强调了打堡垒，忘记了其他方面，这就是抓住了环子而障碍了对链子的掌握。所以说两县群众基本上起来了，而濮县比较平衡，范县则严重的不平衡。

三、为何反贪污、合理负担、查“黑地”

性质基本上是民主斗争？这样认识对

边区发动群众有何意义？

在最初发动群众的时候，农村的优势没有在我们的手里，首先

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从哪一种斗争开始。有的主张从反贪污、合理负担、查“黑地”开始，有的则主张从减租减息增资开始。决心的不易下，就是因为民主斗争与民生斗争有性质的不同。民主斗争在发动斗争时到人较多，后一种斗争则比较少，增资仅是雇工，减息主要是债户，增佃主要是佃户，而这些人在一般的条件下，都是占的比较少数（有的例外）。

但是由于两种斗争质量上的不同，则发生了争执。反贪污、合理负担、查“黑地”等各种斗争，在雇农佃户未觉悟以前，参加这个斗争是不大积极的，参加积极的为中小地主、富农和中农。在农村中无产阶级及半无产阶级，加上中农，尚未组织起来形成独立的力量时，加以基本群众很多先天弱点，如文化水平很低，政治经验及社会经验都很少，技能也差的远，在思想上组织上未形成一个独立的力量，所以在这些斗争开始时，其领导权往往落在中间势力的手里，要不即为干部所代替。所以，这种斗争虽然可以吸引较多的人数，但质量差。基本群众虽然参加了，但是他尚未觉悟起来，而中间势力与顽固势力很容易妥协，特别在顽固势力很大，基本群众未发动起来，往往会出卖这一斗争。而增资减租减息则不同，斗争以后基本群众很快会形成独立的力量。当这时，中农则大量的倒过来（与前者不同）而成为无产阶级的后备军。这样过渡到下一个斗争，则有了骨干的保证。我们去的干部若比较弱，当基本群众与地主的界限还很含混、顽固势力的蒙蔽力还很强、中间势力尚未分化的时候，先开始反贪污、合理负担、查“黑地”，往往是失败的（范县即如此）。而当顽固势力已经比较孤立条件下，则前几种斗争即可以开始。所以，究竟哪一种斗争先开始，各县各区都是不同的，各有它基本上的不同特点，所以，这就必须从具体条件出发。

所以，反贪污斗争、合理负担、查“黑地”表面上看是民生斗争，实际上是民主斗争，也就是说基本上是政治斗争。但民主斗争不是为民主而民主，是为了不受帝国主义的压迫与封建剥削，结果

还是经济利益，但不等于经济利益。这样就可以确定斗争的果实处理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在处理果实时必须慎重。

究竟怎样进行这三种斗争呢？首先就是在群众发动的时候从民主斗争开始。但在斗争开始的时候，领导权往往在中间势力手里。这时我们要了解，中间势力的参加这种斗争，是由于他也活不下去，非斗不可了，参加斗争是真实的，不是假进步。虽然他们是真实的，但是他们的幻想很多，只要顽固势力相信他们的地位的时候，〔他们〕也可以一脚把基本群众踢开，与顽固势力妥协的。所以，在顽固势力的引诱下，基本群众要起来的时候，〔他们〕出卖这个斗争的可能是非常大的，带有很大的动摇性和不彻底性。

我们的态度是无产阶级立场。当这个斗争开始了的时候，虽然没有取得领导的地位，我们也要去参加这个斗争；虽然在基本群众与中间势力的界限未清楚划分以前，也要毫不犹豫的参加这个斗争。但是决不是永远作为中间势力的尾巴（尾巴主义），而应努力在这个斗争过程中把无产阶级的界限及中间势力的界限划分清楚，并在可能条件下争取斗争的领导权，使基本群众由被动到主动，转换阶级力量的对比。这是我们的基本态度。只有这样，才能从民主的环子过渡到下一个民主斗争的环子。只有这样，才能有一个健全的统一战线，就能有保证的过渡到彻底的民主改造的斗争中去。而争取这种形势的转换，基本的一点就是把斗争的果实更多的在民生上着眼，使群众看清反贪污、查“黑地”、合理负担的斗争对他们有利。我们要更多的照顾基本群众的利益（防止绝对化），但不要叫中间势力绝望。这样就能够把基本群众及中间势力的界限划清。因为在这些斗争中，中间势力更多的照顾他自己或者完全照顾他自己，而基本群众则更多的照顾他自己，两者的界限在斗争中就可逐渐划分开。但是我们对中间势力决不应因此界限而放松了对他的争取，正确的态度是一面斗争，一面联合。

在斗争开始的时候，行政的力量可以多用一点，以上层的优势帮助下层的劣势，这是完全可能的。当条件未成熟的时候，可以隐

蔽的发展力量，要善于运用政权的形式、自上而下的方式配合自下而上的斗争，但不能过多的强调行政方法。另外，派去的干部要积极的去宣传教育群众、组织群众，找积极分子建立农会，把群众的腰竖起来，启发其阶级的自觉，就是自下而上的方式（但干部配合他们，不是代替他们），和中间势力联合起来，树立自己的力量，以便条件成熟时争取优势，求得民主民生的彻底实现和建立正常的统一战线。

关于组织形式，如算帐委员会和合理负担委员会（严格说来这是领导政权的形式），它的任务不是执行政权中的一切任务，而是专门解决每一个专门斗争的内容。参加的人应该是“三三制”的，有基本群众，有中间势力，所以这一形式不等于农会。在这个组织中，共产党员及进步力量可以比中间势力大一点。在我们力量比较小的时候；我们的力量可以小一点，使中间势力有说话的机会，可以各得其所，启发其积极性。所以农会代替算帐委员会则是不好的，但是必须以农会来动员基本群众以公民的资格去参加算帐委员会。如农会弱一些，则可以由政权出头，但应以“三三制”的政权面貌出现。

另外一个条件，即在民生斗争基本上已经实现了的地方，则我们在进行反贪污、合理负担、查“黑地”的斗争，则在一种不同的情况下，就是农村已经产生了雇农、贫农、中农，已经结合为联盟，形成初步的独立的政治力量。中间势力则在我们民生斗争以后对我们有些不满，特别民主斗争，比较“左”的条件下（即便在好的条件下，也不会很满意的）。但另外他还希望在民主斗争中及抗日的斗争中来补偿他的损失，这样，他的不满可以消减一些。但在过左的情形下，他将怀疑是否要“共”（即实行共产）。总之，他会□有不满、恐惧与希望三种情绪在交织着。在顽固势力则更不满和恐惧，因为他有“病”，没有了解我们的斗争是为了“治病救人”。他就尽量利用中间势力的不满与怀疑来组织他的同盟者，组织力量准备阻止民主斗争，因为他最不能忍受的是民主斗争。但是他基本

上还希望抗日，在这一点上，他还有一点希望，然而有一部分也就动摇了。基本群众在这时候则大不同，特别农村的雇农、贫农情绪非常高。中农也感到这些好事而要求民主了。游民分子也来为自己的利益打算了，开始觉悟起来，但是程度还不高，特别由于多少年来的压迫，产生一种报复的思想，斗争的策略性还不高，只看对手的好〔？〕处而忘记了其坏〔？〕处，往往表现过左的行动。在这时候，我们的干部也往往只顾到立场、群众观念而忘记党的策略，为小利所迷惑。但对小利的争取是好的，必须服从大的利益，必须注意今后强调了民主而忽视了民生（群众的小利），而在群众头上泼冷水。基本群众关心他们的切身利益（小利）是对的，但小利必须服从他们的远大的永久的利益才是好的，贪小利则不对。

所以，关于这个斗争在民生完成过渡到民主斗争时，领导上必须注意解决三个问题：

1、基本群众进一步求得力量的较大与巩固，而巩固是主要的。这时群众的策略性是不够的，我们不是打击他们的积极性，而是把策略性赶上积极性，对他的积极性还是要发展，不过其中心环子是在提高其策略性。两者都应当继续提高，而不是在压低其积极性去符合其策略性，而是提高策略性到积极性的高度。在组织上也是以巩固为主要环子，发展为次要的，来真实的把农会改造一下。选举时慎重举行，加强会员的组织观念，在大会上应宣布各种必要的事情，区县农会最好参加。把农会划分为小组，走上正常的状况，重心是巩固，但不停止发展。这时应以教育为主，要训练积极分子、会员和提高干部。

2、我们提高策略的目的是为了达到基本优势的发展与巩固，在于发展进步势力中求得中间势力的联合，达到孤立顽固势力。这时候双方都来争取中间势力，这就须要注意方式与给以利益，同时还要有力量。所以，对中间势力的政策要慎重，但是我们也不要害怕，因为农村无产阶级已实现了它的领导权，基本群众有了力量，已经开始取得初步的优势。另外，从中间势力本身来说，也不要怕，

他与我们走比同顽固势力一同走有利（濮县就是例子）。一旦有了中间力量，就可以教育中间势力，揭破顽固势力的罪恶，从各方面来孤立顽固势力。

3、对顽固势力事实上要侵犯他，这是不可免的，但方式上一定要讲求，尽量的使他不破裂，少痛一点。这是为了作下一个环子的准备，即达到大家团结来共同抗日，发展普遍的游击战争及正常的统一战线。若搞错了，则会遭到很大的痛苦。但是民主一定要实现，决不应因为他不高兴就放松了对民主的争取，即在基本情况未改变以前坚决进行下去，但方式一定讲求，叫他少难过一点。

所以这一个阶段中的领导，三个环子的中心是争取中间势力。但防止对基本群众的积极情绪泼冷水，去讨好中间势力，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要提高基本群众的策略性，并发展他的积极性，同时在思想上、组织上来扩大进步力量。把发展与巩固不应机械分开，但是我们发展进步势力的目的在达到对中间势力的争取，所以把策略性及巩固为中心环子。而同时顽固势力之能否孤立，就在于能否把中间势力争取过来。争取了中间势力，才能巩固基本势力，才能争取革命的胜利。

但是，对顽固势力的孤立还要区分，斗争中还有拉，应根据具体条件出发。对中间势力，当我们已经取得实际的优势的时候，必须在方法上及形式上以平等待人的精神对他们，以启发其积极性，而不是降低我们的优势去迁就他。

四、发扬民主主义的精神和作风，是保证 群众运动的发展与深入的中心一环， 也是一切胜利的保证（略）

冀鲁豫边区抗联

关于村级工作的指示

(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一日)

随着边区群众工作的开展与逐渐深入，建立村级工作是在目前万分需要解决的问题了。一切工作在于村，村是一切决议、法令、指示的最后执行者，村是各种组织的基层，村是直接与群众联系的基础，这些已经是肯定的答案。村，它不仅是我们活动的战略基本单位，而且是一切物质供给的主要渊源，它不仅是一切具体法令实施园地，而且是统一战线的真实政策“三三制”政权实现的基本园地；团结与联合各阶层共同抗日，又必须在村中来具体实现；至于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教育群众，发挥广大群众的抗日积极性，又必须认真的在村中来作。如此，村级工作是非常复杂而繁重的了。正因为村级工作这样的复杂与繁重，它更加重了目前村级工作的重要性。

目前我们的工作虽然有了日渐开展与逐渐深入，但它还是有极大的不平衡，是以有的地区与个别村庄民主民生工作根本没有开展，群众没发动起来，抗日组织根本没有建立；有的地区则进行了减租减息、反贪污等民主民生工作，群众有了初步发动，而抗日组织亦有了初步建立。同时在这些地区，在发动群众程度上又有所不同，有的还需要我们继续发动，有的则需要我们进一步的来作些深入巩固工作。正因为我们的工作发展的不平衡，在村级工作的复杂性上则更增多了，是以在我们工作较好的村子便产生了少数积极分子的包办代替、强迫命令，影响工作不能深入，上级决议、计划便不能实现，在落后的村子或在我们工作较弱的村子，便是封建统治者

当权或地痞流氓专政，来镇压农民、阻止群众运动。在我们县区级的领导上不是包办群众，便是包办村级干部，甚至于多数领导同志看不起村级干部，因此，就忽视培养村级干部，以致工作混乱，便发生乱干蛮干的现象。除此以外，在我们中心地区，由于工作逐渐开展，工作范围与内容逐渐扩大与复杂，现有干部数量未有增多，新生干部未曾提拔之际，力量不够使用，工作上顾此失彼。在这样条件下如何实现村级领导，已成在我领导机关或干部中议事日程的中心了。

因此，我们就必须解决村级工作问题，充实村级工作内容，加强对村级工作的领导，使村级工作向着正确的道路发展。特别是目前开展群众运动中的村级工作，更有它丰富的内容，在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工作方针与不同的领导方式、不同的作风。这样就需要我们在村级工作上一切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要从现实出发，从具体出发。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坐机关，下命令，必然会遭受到回击与碰壁，必然会使工作造成恶果与受到历史的惩戒。

根据目前工作需要及工作发展不平衡情形，关于村级工作，特作如下指示：

第一、几种不同类型村会的工作方针和具体工作

由于我边区群众工作发展的不平衡，故在不同的工作地区应有不同的工作方针和不同的工作方法方式。根据目前情形，我们提出以下的四种不同村会和具体工作：

甲、没有我们工作的村庄和我们工作初步开始、群众尚未发动起来的村庄。在这些村庄，一般说来表现有以下的特点：

一、封建势力在村中占统治地位，村政权为少数人所操纵或为地痞流氓所把持。

二、农村中阶级关系没有很大的变动，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封

建势力都占统治地位。

三、群众对抗日民主政权与抗日军队没有明确的认识，时常被顽固势力所欺骗和蒙蔽，模糊群众的视线。

四、由于几千年来的封建统治压迫与束缚，群众没有认识到自己的组织力量，甚至不能相信自己有力量，不敢向农村统治者进行斗争。

在这样的地区和村庄，我们的工作方针应是大胆放手的开展民主民生运动，发动与组织广大农民群众，动员青年农民与农民妇女参加民主民生运动，使广大农民建立起自己的组织——农会。同时我们在这种情况下的农会组织，可让青年农民与农民妇女参加（地主的儿子和妇女除外），在农会内不单独建立青年小组与妇女小组，以免妨碍今后青年运动与妇女运动的开展。

在这种地区和村庄的工作，应根据不同的情形、群众不同的切身要求来进行，一般说来在这样的地区和村庄可以从减租、反贪污等工作开始，用来满足群众的要求，改善群众生活，使群众为着个人生活的改善而敢于向封建统治者作斗争，发挥群众的斗争性和积极性，以教育农民，组织农民。

乙、我们已开始工作，群众已开始发动或初步发动起来的地区和村庄。在这些地区和村庄，它表现有以下的特点：

一、在我们的帮助和发动下，群众敢于进行民主民生斗争，如减租、反贪污等，同时在斗争中一部分贫农有了组织——农会，但这时的农会组织一般说来是比较宗派、比较狭隘的（因这时农会会员多半是贫农）。

二、部分群众特别是贫农，开始认清了自己所处的地位和组织力量，能在农村中形成骨干，能向封建势力作斗争。

三、封建势力部分的被削弱，无论在政治上或经济上的统治，开始有了动摇。

四、在工作开始时往往是先进行民生工作，如减租，由民生工作转入到民主工作，如反贪污、改造村政权。当群众进行民生斗争

时，顽固势力往往在经济上采取某种程度的让步，在政治上仍设法维持其统治，但到群众进行民主斗争时，顽固势力则拼死挣扎，千方百计的来顽抗，形成斗争最尖锐形势。

在这样的工作地区和村庄，我们的工作方针应是继续深入民主民生斗争，进一步发动与组织广大群众，特别是争取中农参加农会，在可能范围与具体条件下建立单独的青年与妇女组织——不设青年与妇女小组，团结各阶层群众共同抗日，准备树立群众的抗日优势。

在这种地区和村庄的工作内容，一般说来应是：

一、继续进行民主民生斗争，如反贪污、清查“黑地”、改造村政权，解决雇工复工问题等。

二、加强群众教育，特别是阶级教育与组织教育。

三、在下列的条件下可建立独立的青教会与妇教会：

1、广大中农参加了农会，他与贫农、雇农结成了统一的联盟，形成独立力量。

2、在农会里青年农民与农民妇女有了自觉的力量。

3、在斗争中培养与提拔青年农民与农民妇女的村级干部。

4、农村中的中间势力团结在农会的周围。

从群众的民主民生斗争中，提高群众的武装斗争，进行组织自卫队、模范班等人民武装。

丙、经过了减租增佃、反贪污等斗争，群众已初步发动起来，并且群众已初步树立抗日优势的村庄。在这样的村庄，它的特点是：

一、基本群众已有了觉悟并进行了减租增佃、反贪污等斗争，群众已得到应得的利益。

二、村政权得到了改造（有的是建立了“三三制”村政委员会，有的是抗日积极的农民来掌握村政），自卫队、模范班有了组织，并且在抗日的进步分子掌握着。

三、村农会有了比较健全的组织，农民已认识到农会是自己的团体，在阶级认识上有了明确的政治方向，敢于向封建势力作自觉

的斗争。农会能给农会员解决问题，并在村中有了威信。

四、中小地主同情我们，并有的富农要求参加农会，但顽固势力还企图“复辟”。

在这样的地区和村庄，我们的工作方针应是调整农村中的阶级关系，防止农民的过左行为，加强农村阶级团结，巩固农村统一战线，从加强农会员教育中（特别是阶级教育），从生产中（如组织合作社等）巩固农会组织，以树立群众的抗日优势。

在这些地区和村庄，我们的工作一般说来应是下列几点：

一、调整农村中的阶级关系，以巩固乡村统战，团结各阶层共同抗日。

二、进一步加强会员教育，从思想上提高农民的阶级觉悟，使农民们为保卫既得利益而继续进行斗争。

三、在有青救会与妇救会的村庄里，对青年农民和农民妇女应着重进行阶级教育，但对地主的儿子和妇女则应着重进行民族教育。

四、加强会员的民主教育，以平等精神对待各阶层人士，建立村会的经常工作，无论在组织上或在政治上巩固村会组织。

五、动员会员参加与掌握民兵，进一步改造与监督村政权，使其真正保卫群众利益，以防止顽固势力的“复辟”。

六、根据群众要求与具体条件，建立农村合作社，从生产上来巩固农民利益、巩固群众组织。

丁、经过群众斗争（如减租、反贪污等），村会有了雏形组织，但群众未发动起来的村庄。在这样的村庄和地区，它的特点是：

一、在群众进行斗争时，不是群众性的而是少数积极分子的包办代替，根本没有把群众发动起来。

二、少数村干部的独断专行，不民主，包办群众，摆官架子，看不起群众，甚至有的干部被顽固势力收买利诱，以镇压群众。

三、在斗争中没有抓紧时机进行教育，群众认识不明确，不能相信个人的组织力量。

四、在进行斗争时单纯的经济观点，没有提高到政治眼光来估计和评价。

在这样的地区和村庄，我们的工作方针一般说来，应是耐心的说服教育，动员群众继续深入民主民生斗争，从解决群众的迫切要求与细小问题中来重新发动群众。至于具体工作，一般说来应是：

一、加强村级干部与积极分子的教育，使其与群众打成一片，真正能代表群众利益，为群众解决切身问题。

二、纠正少数村干部的不民主、独断专行、包办群众的官僚现象。应以仁至义尽的态度，以民主精神来说服教育，对本质不好与不称职的村级干部，应适当的民主改选。

三、抓紧群众的迫切要求，不放过群众的细小问题来进行斗争（如减租、减息、反贪污、反恶霸、反“黑地”、反对村干的不民主等），发动群众。

第二、村会教育问题

甲、教育方针

目前我们群众教育工作的基本方针是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对广大农民及青年农民与农民妇女应加强阶级教育，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但对地主的青年和妇女应进行民族教育，以巩固其抗战胜利信心，不为某些严重困难所影响、所动摇。目前我们的群众教育工作，必须使民族教育与阶级教育联系起来，忽视阶级教育是不对的，但把阶级教育孤立起来而忽视民族教育，也是不对的。

乙、教育目的

群众教育的目的是在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使之在思想上巩固与我们的联系，以新的思想武装群众的头脑，巩固村会组织。我们要教育群众，目前不仅是为了抗战，而且为了将来建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国。如果没有群众教育，不给群众以新的思想武装，这个任务是不会完成的。

丙、教育内容

一、思想教育

1、打破广大人民“靠天吃饭”、“事由天定”、“命该如此”的宿命论思想。

2、介绍苏联革命前后不同社会制度下劳动人民的不同生活，特别要有系统的介绍今日苏联人民的生活，使广大人民对苏联有羡慕与景仰的印象。

3、指出农民们过去所处的社会地位的不合理、现在所处的地位以及将来的地位，用群众的实际经验来教育群众。

4、确定群众应有的人生观，应走的政治方向。

二、阶级教育

1、什么是阶级？阶级是怎样产生的？

2、中国有些什么阶级？各阶级都是怎样生活着？

3、农民的贫穷是怎样产生的？为什么要受冻受饿？

4、农民们要想不挨冻受饿，应当怎样办呢？

5、中国农村中的阶级分化。

6、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是什么？

7、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解放的先锋队，我们要跟着共产党走。

三、组织教育

1、农会是干什么的？什么人才能参加农会？

2、参加农会有什么好处？

3、农会的组织原则是什么？内部怎样来分工？各委员都是干些什么事？

4、怎样划分农会小组与领导小组工作？

5、怎样做个好的农会会员？

四、统战教育——包括民族教育与民主教育。

五、策略教育

用实际的生动例子向农会中的积极分子讲授（在此暂略）。

丁、教育方式

一、主要的是从实际斗争中，抓紧现实用群众本身所体验到的来进行教育。

二、开办脱离生产的训练班，训练农会中的积极分子或村级干部（怎样开办另有指示）。

三、举办不脱离生产的农会员流动训练班。

四、通过会员大会或农会小组会议进行教育。

第三、村级组织建设问题

甲、村会组织形式及其职权

一、村农会

在村农会中一般的有会员大会，村委员会，小组会，小组长联席会等。

1、会员大会

A、会员大会的职权

①为村农会最高权力机关。

②对村农会委员及委员会有选举、罢免、改组的权利。

③对村委员会之决议，有重新讨论通过否定的权利。

④有提出新议案，讨论通过交村委员会执行的权利。

B、村农会会员大会召开的程序及议事规则

①经村委员会讨论决定后召开。

②全体会员有 $1/4$ 的人数向村委员会提议，村委会得立即召开大会。

③会员大会必须有 $2/3$ 的会员到会才得宣布开会。

④讨论问题表决时，有 $1/2$ 以上的人数举手赞成，才算通过。

2、村会委员会

A、职权

①为全体会员大会闭会期间最高权力机关。

②研究和执行区农会（抗联）的工作指示和决议。

③执行村会员大会的决议。

④负责召开村会员大会。

⑤经常研究和解决会员及农民的□□□要求的问题。

⑥负责对全体会员进行教育。

B、村农会委员会的人员及其分工（即村会组织形式）

①主任委员

负责召开村委员会；

推动和检查各委员的工作，保证对村委会决议的执行；

在一般情况下，为村农会对外代表，特殊情况时，需经村委员会讨论通过委托之。

②组织委员

负责执行村委员会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

登记和统计会员，整理发展组织；

负责划分小组；

注意会员的优点、缺点，及时提出鼓励、批评和纠正。

③宣传委员

负责对会员进行教育；

调查和收集外界舆论和谣言；

统一会员对外的宣传口号。

④生活改善委员

经管农会自己的财产（经管办法由村委员会决定）；

代表农民利益提出讨论关于全村公共财产的处理及村中财政经济的意见；

注意和研究如何使会员及全体农民生活得到改善，积极进行生产。

⑤武装委员

负责研究和解决会员及农民对于武装对敌斗争的问题；

研究和解决战争动员和支差的问题；

代表农民利益协助自卫队长、模范班长工作。

C、几点说明

①关于村委员会委员数目问题：一般应是5人，大村最多可到11人，小村及开始组织时，最少不得少于3人（主任、组织、宣传），超过5人以上时，可设副职，或分别执行委员与常务委员。

②村农会武装委员，在村自卫队已有组织时而且自卫队长系农会员时，自卫队长可兼任村会的武装委员。

③村农会的生活改善委员，在村中已有合作社组织而合作社社长系农会员时，〔社长〕亦可兼任村农会的生活改善委员。

3、小组会

A、小组会的性质——是农会员过组织生活做工作的组织单位，是农会的组织细胞，但它不是一级组织。

B、小组会划分的原则

①每组以5人至7人为限。

②划分小组时，一般应注意到街巷居住远近及农民的生活习惯、感情结合等。但应注意其发生宗派现象、互相包庇的毛病。

③村委员会的委员应参加小组过生活。

④父子不同组，亲兄弟不同组，婆媳不同组，妯娌不同组，男女不同组。

⑤以富力分富农组、中农组、贫农组是不对的。

⑥在斗争中为了便于掌握，使积极分子不过于分散，划一两个积极的作核心小组，也是必要的，但不应是公开的，以免孤立。

⑦在整理农会时，为了工作方便，也可划出不保险分子为一组，或只将最多嫌疑的划分一组，以便整理教育。但应注意：第一，其组长必须是忠实可靠的；第二，不可使他们知道自己是孤立、是外皮。

C、小组内设组长1人，由全组组员选举之（开始时也可暂时指定，有机会即再经全组通过或重行选举）。

D、小组长的职权

①传达村委员会的决议和指示。

②领导小组开会并当主席。

③领导小组进行工作，完成委员会给的任务。

④对小组组员进行审查和教育。

4、小组长联席会

①性质：不是权力机关，只集体汇报小组组员情形及工作情形，接受村委会传达布置工作，不作决定（但在整理不健全农会时也可暂代替村委员会职权）。

②小组长是推动小组活动的枢纽，必须是坚强可靠的积极分子充任之，尤其在斗争中须有先锋作用。

5、各种制度

村农会的工作制度，我们不能机械的来规定，这主要的是看工作需要与否，由各村自行规定，自行建立，但根据一般情形来看，提出以下几种制度：

①小组会7天一次、10天一次或15天一次（主要看工作需要，需要时可1日一次或1日数次），但平时最长不应超过15天要开一次会，否则组织会由松懈涣散下去。

②村委会7天、10天或15天〔召开一次〕。

③村会员大会，临时召集，暂不定期。

④组长联席会，临时召集，不定期。

二、村青救会

1、村青救会一般的亦有青救会会员大会，村委员会，小组会，小组长联席会等。至于各种会议的职权，详见以后的村青救会组织简章。

2、为了建立独立的青年组织，在目前村青救会中可设下列委员，各委员的职权详见青救会组织简章：

①主任委员；

②组织委员；

③文化教育委员；

④社会服务委员；

⑤青抗先队长。

三、村妇教会

1、村妇教会一般的亦有妇教会会员大会，村委员会，小组会，小组长联席会等。至于各种会议的职权及其他问题，详见以后的村妇教会组织简章。

2、为了建立独立的妇女组织，目前在组织妇教会的地方可设下列委员：

- ①主任委员；
- ②组织委员；
- ③宣传委员；
- ④生活改善委员。

以上各委员的职权亦详见村妇教会组织简章。

乙、会员成份及年龄

一、农会

1、农会是农民的阶级组织，参加农会的人一定是只限于出劳力的农民，换句话说，不出劳力的地主即不能参加农会。过去有的地方地主来参加农会，这是不对的，这是没有认清农会是阶级组织的错误认识，我们必须纠正。

2、我们组织农会与吸收会员时，必须注意到以下问题：

①当农民未发动起来，特别是贫农在农会中未形成骨干力量时，一般的是不吸收富农参加农会。

②当贫农在农会中能形成一种骨干力量时，我们应吸收和争取广大中农参加农会。

③当雇农、贫农、中农结成统一的联盟，在农村中形成一种独立力量时，农民已发动起来。应吸收抗日的同情农民利益的富农参加农会。

3、村农会会员年龄

①年在25岁以上的农民均可参加农会。

②年在22岁至25岁的青年农民可在其自愿原则下，参加青教会或农教会。

③年在22岁以下之青年农民均应参加青救会。若没有青救会组织，可参加农会；若有独立的青救会组织，则必须动员说服使其参加青救会。

二、青救会与妇救会

1、青救会与妇救会是农村中各阶层青年和各阶层妇女的统战组织，参加青救会和妇救会的人，是包括各阶层的青年和妇女，即是说地主的儿子和妇女均有资格参加青救会与妇救会。

2、在建立青年和妇女工作时，必须注意到以下问题：

①目前是以建立与巩固农会为主，故一般说尚不应提出建立青年、妇女组织的问题。因青年和妇女组织的建立，根据一般经验，是在农民发动起来以后，农民发动不起来，青年与妇女工作是很难做好的，故目前青年与妇女工作只是个别地区和个别村庄的事情。

②在未提出建立青年、妇女组织之前，并不是农会拒绝青年和妇女参加农会，而且是欢迎与争取他们参加农民会，但这只是以他是农民的青年和农民的妇女，才吸收他参加（因是农民的一部分），而不是因为他是青年、是妇女而吸收。换言之，地主及其他不参加农业生产的青年和妇女，农民应拒绝吸收，因为在农会内的青年和妇女，应一律把他们看成是农民。为了工作上的方便，生活上的一致，可以将他们按年龄、按性别划为一组过生活，但他们这一小组应是农会中的农民小组，而不应另眼看待他们成为青年小组和妇女小组。在村委员会内，不特设青年委员和妇女委员，但是农会中的青年会员和妇女会员，均有被选为委员之资格，那他仍是以农会会员的资格而当选，不是因是青年或妇女而当选。这就是说，应当把青年和妇女参加农会和将来青年、妇女建立独立组织看成两回事，不要将青救会、妇救会和农救会混为一谈，这样是会减轻将来妇女和青年工作的独立性，影响青年和妇女工作的开展的。

③青年和妇女独立组织的建立，应是在上述（见第一部分乙项）地区及村庄具备上述四个条件时（见第一部分乙项工作内容第三节1、2、3、4各条），即可提出和建立自己独立的组织，以满足

这一人群的特殊要求。这时农会应完全以平等的态度和地位，来帮助他们建立他们自己独立的组织。

丙、村会领导成份问题

一、农会

1、农会的领导成份必须掌握在可靠的真正代表农民利益的积极分子手里。

2、当农民未发动起来的时候，农会的领导成份必须以贫农为主。

3、当农民已发动起来，农会的领导必须有中农参加。

二、青救会和妇救会

1、村青救会与村妇救会的领导必须掌握在青年农民与农民妇女手里。

2、当村青救会与村妇救会中农以上的成份居多，而大多数贫苦青年农民与贫苦农民妇女还没有参加组织时，村青救会与村妇救会的领导成份上必须以贫苦的青年或贫苦的妇女为主。

3、当各阶层青年和各阶层妇女大部分参加组织，同时青年农民或农民妇女在组织上占优势时，这时领导成份上除以青年农民或农民妇女为主外，必须有条件的（抗日的，赞成民主的，同情青年和妇女解放事业，并同情和拥护青年农民和农民妇女利益的）吸收其他阶层参加领导，在数量上不得超过全领导人的1/3。

第四、群众团体与各方面的关系

甲、正确解决群众团体与各方面的关系。这首先必须明确认清群众团体本身的任务与工作范围。分开来说：

一、农会。农会是被剥削的劳动农民代表农民自己利益的组织，是合法的农民自己的团体。因为农民从来是被剥削的阶级，政治地位不平等，遭受重重压迫，必须有单独的组织来保证农民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地位。因此农会除对农会本身及会员指示工作，进行教育外，对农会以外的人民没有任何强制人家执行农会意见的

权利。

二、妇救会。妇救会是各阶层妇女的联合组织，所有妇女只要服从妇救会的章程，就有权利加入妇救会。因为妇女受着共同的压迫，有着共同的要求，主要是男女平等、婚姻自主，或要求生产以及解除其他束缚等。因此妇救会的组织就必须解决妇女这些不同要求，以团结各阶层妇女共同抗战。

三、青救会。青救会也是各阶层青年的联合组织。所有青年他们的共同的迫切要求是学习，我们的任务就要在思想上改造这一代青年，满足各阶层青年的共同要求。

四、所有这些群众组织，就是在政府所颁布的进步法令范围之内共同奋斗，求得群众的合法权利。所以，一切群众团体的共同奋斗、求得合法平等权利的实现，就是要使群众自觉的实行政府法令。群众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也就是实现政府法令。地主资产阶级几千年来以法令压迫群众，不许同他们平等，而抗日民主政府则是以进步法令给群众以合法的斗争武器，改善群众的政治经济地位。

乙、群众团体与政权的关系

一、村政权对群众团体是指导关系。村政权不能干涉群众团体内部工作（在法令范围内），同时，村政权应帮助群众团体，使群众团体健全巩固，以便利村中工作的容易进行，但不能支配与利用群众团体，而应是尊重群众团体，因他是群众自己的组织，且是进步的抗日的组织。

二、群众团体对村政权是拥护、帮助、监督，但主要是应经过自己会员去作，不得形成群众团体的事务主义和包办代替。

三、农会会员被选为村长，或为全体农会拥护而选出的村政权，农会应以工作发展阶段之不同，进行不同程度的帮助。

1、在民生斗争阶段和民生斗争阶段后，农会对自己拥护选出的村长的帮助应特别多一些，因为：

①我们的村长经验能力低，如我们不大力帮助，会使他因困难

很多而灰心丧气，工作消极。

②因他虽在农会中不错，但一离开农会，和村中士绅地主各样人士打交涉，可能阶级意识模糊起来，以至于腐化，为人家收买。

这时的帮助，应从各方面帮助，但方式应注意，不要形成包办代替，应注意培养他的独立工作能力和威信。

2、在民主斗争阶段之后，村政权的独立工作能力大了，这时应严防包办现象。对村政的帮助方式是通过农会员，保证村政工作顺利完成。

3、农会开会时，必要时可以请村长来列席参加。如村中召开群众大会、干部会、村政委员会，开会时，也应请农会长参加，发表意见，以帮助村政工作的改进。

丙、村农会和人民武装的关系

人民武装，它是群众的武装组织，它是政权的组织部分。农会和它的关系，在工作落后的地方，人民武装没有很好的建立起来或建立了而不起作用，农会的武装委员对人民武装工作应更多的负责，通过自卫队及会员积极模范的保证作用，整理自卫队，建立模范班，甚至领导人民武装对敌斗争。但至人民武装的负责人民民主选出后，并能负起人民武装工作的责任，则农会应领导自己的会员积极在自卫队、模范班中起模范作用、保证作用，不应代替包办武装系统。

丁、群众团体与合作社的关系

一、村合作社是群众的经济组织，合作社的社员是包括了农村中各阶层人士，因此合作社又是包括各阶层的统战组织。村各教会合作社不是领导关系，而是通过自己的会员在合作社中起保证与领导作用（特别是农会员），而不应包办代替合作社。

二、村各教会应扶持与帮助村合作社的发展，这主要的是应动员自己的会员来参加合作社，在参加合作社时各教会员应起模范作用，以扩大合作社，使合作社向独立方向发展。

戊、村农会、村青教会、村妇教会的各种关系

一、村农会、村青救会、村妇救会，彼此间的关系是配合关系，而不是某一村救会可以领导其他村救会的。过去有的地方村农会包办村青救会或包办村妇救会，就是不对的，是错误的行为，我们必须纠正。

二、农、青、妇的要求不同，我们讨论各团体的工作时则应分别开会，不应混在一起。如减租斗争是农会的事，在发动农会进行减租斗争时，青救会与妇救会应动员青年与妇女响应减租斗争，到减租实现后，应在群众中进行解释教育，向农民说明青、妇出力的事实；等到青、妇讨论本身事情时，农会就应当帮忙。这样不但能增加工作效能，并且能加强农村群众团体的相互团结，如此有计划有步骤的来进行工作，比混在一起好得多。

第五、关于提拔村级干部问题

甲、各地应大胆的提拔新干部

一、干部的提拔条件

- 1、有新的民主民生斗争经验；
- 2、有能力，有发展前途；
- 3、是真正积极可靠的农民分子；
- 4、在群众中有威信，没有坏的影响。

二、提拔手续

1、应是由小组长、村委员、不脱离生产干部或区执委等逐渐的提拔。

2、由村委员提为区干部时，必须经县会批准。

3、目前提拔是暂时的，以后须经会员大会选出才是正式的。

乙、待遇

一、以不脱离生产为原则。

二、必要时可以按他的需要、工作能力、进步速度给予一定量待遇（由区报告县级，讨论通过后经分会批准）。

第六、深入村级工作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甲、认识村级工作的重要，明确村级工作观念，加强调查研究工作，是实现村级领导的基本问题

我们在实际工作中体验到，领导一个村的工作是不容易的。现在还有的干部对下层情况不知道，即使知道的也是少数，他们到了村里不作调查研究工作，不从细密处着眼，根本不问具体情况，把个人关在房子里主观想象的一套计划搬出来了。在会议上，同志们同胞们讲了一套，就分头下去各作各的去了。这样的村级工作是不会建立起来的，这样的现象是必须纠正的。

乙、发扬民主作风，反对包办代替，是实现村级工作的中心环节
在过去的村级工作中，包办代替现象、独断专行行动是相当严重的，因此在村级领导上不是包办村级干部，便是包办群众，以至于在村中蛮干、乱干、瞎干、胡干，致使工作不能走入正规。有的地方群众没有发动起来，村中新贵当权，镇压群众，骑在群众头上撒尿，这样村级工作也是不会建立的。是以我们必须彻底发扬民主作风，反对包办代替，反对少数干部不民主、独断专行，建立村级正常工作。

丙、深入检查、具体指导、具体帮助，是实现村级领导的实施步骤

我们要求在今后的村级工作中，区抗联同志要具体深入到村，到村会小组中去。在深入村会中的领导方式上，区抗联委员应参加村会委员会，为村会委员，将区抗联的意见在村会中讨论，变成村会意见来执行。其他在区的工作同志应参加村会小组会，或为副组长，将自己的意见在村会小组会中来讨论执行。这样容易发现问题与培养干部，同时更具体的帮助了工作。

在帮助工作上要具体，要多想办法，要多让下层同志发表意见，每件事要作记录，要多搜集下层材料。

以上是关于村级工作的意见，望各地同志接到后深刻研究，具体在村中来执行。如有不妥之处，望多反映意见，以便提出修正。

冀鲁豫区党委 关于取消各级民运部 成立民运工作委员会的决定

(一九四三年七月十八日)

(甲)区党委遵照北局、分局指示，为了发扬群众团体的积极主动精神，尊重其独立性，与避免对群众工作的双重领导，特决定自区党委以下各级民运部一律取消(个别初开辟地区，如特别需要，可暂时保存)，民运部长应通过各救团体公开系统被选为各救团体主要负责人，民运部工作人员一律分到各救工作。

自区党委至县委，成立民运工作委员会，分区委只许设青年委员与妇女委员，支部只许设青年干事与妇女干事，以领导区村级青年与妇女工作。农会与工会工作，由分区委透过党团直接领导。村会归支部领导。

各级民运部取消后，要注意防止因民运部之取消而形成党内对民运工作忽视的现象。取消民运部，成立民运工作委员会，正是为了加强各级党委对民运工作的领导。关于这一点，各级党必须加以深切的认识，并对各级民运工作党员干部作深入的解释。

(乙)民运工作委员会的职权

民运工作委员会，是党委会的组织部分(并非办公机关，这是与民运部不同的地方)，其职权如下：

- ①研究计划与决定党在该地区的民众运动方针。
- ②受同级党委会委托，检查与督促各救党团工作。
- ③统一工农青妇各委员会的工作步调，求得适当的配合。

民运工作委员会的一切决定，交由各救党团通过公开系统实

现，不能干预各教会的日常工作。其对上级报告和对下级指示，均通过同级党委会。

（丙）民运工作委员会的组成

民运工作委员会，由各级党委会的常委与工农青妇各种委员会之重要负责同志（书记或副书记或各救党团书记）组织之，人数由7人至13人，由同级党委书记兼任书记，必要时可设副书记（党委委员及其他条件适合之干部都可以担任）。民运工作委员会应定期开会，确实负起关于民众运动方针、原则与政策领导的责任。

（丁）与工农青妇各种委员会的关系

民运工作委员会对工农青妇各种委员会是指导关系，可以听取各委员会的报告，以资讨论与决定民运工作的整个方针与任务。同时各委员会有向民运工作委员会作报告的义务，各种委员会的决议与指示，不能违反民运工作委员会关于民运工作方针与任务的决定。

关于各种委员会的干部之调动问题，可以提出讨论与决定，但调动之权是属于党委会，民运工作委员会不能直接调动。

（戊）与各救党团的关系

各级群众团体领导机关应成立党团，人数不可多，在目前说以3人至5人为适宜。各地过去成立的各救团体的联合党团，不合乎组织原则，应立即取消。

各救团体的党团，是归各级党委会直接领导。民运工作委员会，可以受同级党委会的委托，检查督促各党团的工作。关于各党团干部之调动，亦可以提出讨论与决定，但调动之权属于党委会，民运工作委员会不能直接调动。

（己）各级党委接到这个决定后，要切实讨论与执行。各级民运工作委员会限8月15日以前成立起来，并将成立情形报告区党委。

冀鲁豫区党委关于深入 检查群众工作的指示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六日)

(一)此次敌人“扫荡”，是对一年来群众工作的一个具体测验。为进一步的认识我们的工作与领导，要求各地委各县委接到此指示后，拿出一个月的时间，进行一次深入的检查工作（检查工作不是消极的挑毛病、找错误，而是积极的发扬成绩，扩大成果，研究问题，解决困难，反省自己，帮助下级解决问题），作为讨论及执行区党委扩大会议之具体准备工作。

(二)检查工作的内容提出以下几点，作为各地参考（关于敌占区、游击区检查内容，各地委自订）。

(1)关于改善群众生活方面，我们不能盲目的、一般的说我们经过了民主民生斗争，已改善了群众生活，必须从实际上去了解其内部真相，才能真正认识了群众工作做到了什么程度，才能正确的领导今后的群众工作。不要为假相所迷惑，不要怕暴露自己弱点，自欺欺人。因此，就要检查：

甲、减租减息工作是否彻底，有无明减暗不减的情形，“扫荡”后有无倒租退佃勾地等情形（对明减暗不减者，需从去年应减数目减起；今年已还息者，要组织倒息）。

乙、增资工作是否执行？

丙、反贪污、查“黑地”斗争是否彻底？（好些地方进行了反贪污斗争，没有建立村的民主制度与财政制度。查“黑地”中有的村干部甚至区干部为地主迷惑或收买，“黑地”未报，有的查出后应罚不罚。）斗争的果实分配是否落在基本群众手里？（好多地方

为区村干部所把持或独吞。)

丁、合理负担、支差问题执行的是否彻底?是否合于党的政策?(有的地方仍是按摊派或只是公粮实行合理负担,村款仍为摊派。在支差问题上,有的村干不支差,富有者不支差,以及出车时草料自备,跟人不算差等,引起中农之不满。)

戊、经此次“扫荡”,敌灾严重地区群众生活及非灾区基本群众生活仍无办法,如何救济,如何给基本群众生活打开生路?

己、合作社的工作是否已与群众的经常利益及生产结合及如何结合?

(2) 关于组织与教育方面

甲、组织工作与教育工作是否能与改善群众生活的斗争及政治任务相结合(即从满足群众切身要求入手,逐渐从组织上教育上提高群众的政治水平,适合我们的政治要求)?或是与改善群众生活斗争及政治任务不相关联的单纯的技术工作(主要指组织工作),或空洞的教条主义(主要指教育工作)?

乙、如何加强组织工作?

丙、支部教育与群众教育如何进行?

(3) 关于领导方面的

甲、支部一元化的领导情形怎样?

乙、英雄主义的包办代替,给予我们工作中的危害如何?

丙、如何发扬民主作风?

丁、改造新贵的经验教训。

戊、对政策的执行是否有忽“左”忽右的现象?

(4) 在检查工作中应注意的几点

甲、我们在检查村级工作与领导〔时〕,与检查自己的领导联系起来,反省自己,把一切错误全推在下级身上与己无关的态度是不对的,只抱怨支部与村干也是错误的。

乙、对新贵的问题,我们应有正确的认识,这主要是由于领导机关、领导干部英雄主义,包办代替的领导,不关心群众痛痒所造

成。只为新贵不检查自己与改造自己的领导，新贵问题是不能解决的。改造新贵必须领导机关、领导干部具有强烈的群众观念与朴素的民主作风，才能彻底改造新贵。

丙、要有重点（不要企图把所有支部检查一遍）。地、县、区三级各只直接做一两个村庄，作全面的深入的检查，即从支部、小组、党员、群众、村会、村政权、地主、士绅〔入手〕，然后把各方面的材料做详细研究与分析。

丁、因为检查工作不是消极的找毛病，因而在检查工作帮助下级解决问题〔时〕，要注意领导上的一个基本思想，即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原则，要掌握住从满足群众在经济上政治上的切身要求中去提高群众。

一年来的党与群众工作（节选）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二日）

张·霖·之

第一部分 一年来发动群众的研究

壹、一年来发动群众的估计

一年来群运的发动是很不平衡的，原因很复杂，有干部多少、领导的问题等等。所以估计只能是一般的（多限于基本区）估计。一般的说，一年来群众只是初步的发动。其表现：①部分或大部分的农民参加农会，部分的妇、青有了组织。②进行了许多民主民生的斗争（当然还有许多不彻底）。因此，群众生活有了初步改善，使基本群众的政治地位有了提高，开始改变了农村的阶级关系。③群众已经相信了自己的力量，初步由自在阶级走向自觉自为。根据这几个条件，可以说初步发动了。有些地区已超过了这些标准，有些地区还不够。

一年来群众之发动有了大的成绩。去年高干会后，我在进行民主民生斗争中扩大与巩固了群众组织，在斗争中也扩大与巩固了党的组织。在群众斗争中，部分清洗了隐藏在党内的异己分子、投机分子、太落后分子。在群众斗争中，也暴露了顽固分子的一切黑暗与罪恶。群众认识了，也提高了群众的政治水平，宿命论已得到了一部分的解决。群众了解了阶级的剥削。同时，在一年的斗争〔中〕，也加强了干部的群众观念，初步的改善了党的组织成份，由过去60%、50%的中农，到贫农雇农占到80—90%。也初步改善了党与群众的关系：过去群众受痛苦，我未予以解决，感到我党不能给群众以东西，对我很冷淡，党与群众的关系很不密切，今天敌

“扫荡”中埋我们的人、驱逐我们人的现象没有了。今天当然还是很不够的，今后争取光明，克服困难等等问题，都需要更加依靠群众。

一年来群运中，我也培养了大批的干部，丰富了我们的领导机关与群〔运〕，初步摸到了发动群众中一般的发展规律。

这些成绩就给予我们今后边区斗争上以有利的物质基础，这说明去年高干会的报告之正确性。但是我们还存在着许多缺点。

从区党委的领导上讲，在发动群众中当有以下缺点：

①对边区发动群众中所处的时机、环境、特点、困难等等的估计是不够的。对敌情的严重所给予的困难估计不足，不同于1938年、1939年，这给发动群众以大的困难。〔对〕几年来在战争中群众的疲惫、经济上的损失，估计也不够。严重的环境，更加要使我们发动群众中万分注意，使群运要更加正规，稍一不慎就要翻天。我既要发展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力量，孤立顽固力量，这就要有高度的策略指导。高度的策略指导运用不好，不与具体条件联系起来，就往往又限制群众的发动，限制群众的自动积极性。

②对包办代替给群众的危害认识不够，因此去年对群众工作的要求是过高的，在今天的条件下这是要求过高的。此即区〔党〕委之缺点。

从下面的执行中来看，也有以下的缺点：

①即包办代替的问题。未看到发动群众是把广大群众一齐〔动员参加〕斗争，一齐运动，一齐提高起来，只看到几个干部、少数积极分子，未放到广大群众身上。所以有些地方斗争进行了，〔但〕未发动起群众来，发生了强迫命令。只看到少数干部的积极，群众工作未得到应有的成绩。积极分子必须是能联系中间分子，提高落后分子，否则不叫积极分子。

②高度的策略指导与具体情况未能结合起来。发展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力量，打击、孤立顽固力量是正确的，但这仅是策略指导。更要看群众是否了解，是否觉悟，是否拥护你的策略，同情你的策

略。有些顽固头子小恩小惠，群众并不了解要反对他，有些中间力量倒为群众反对。我们并不顾忌群众的要求，捏着群众的鼻子非去斗不可，这也就妨碍了群众自动性，限制了群众的积极性。我对中间力量并非不斗争，而是斗的要适当。这是为了提高群众政治觉悟，达到斗争大地主的目的。

③这些缺点就不能不使我们今年重新提出继续发展与深入的问题而延误了时间。

貳、在继续发展与深入的方针下，提出以下之几个问题

第一，对农村阶级关系的认识问题

目前中日民族矛盾是第一位，一切斗争要服从于此。阶级斗争要约束在统一战线范围之内，这是为了达到抗日。依靠顽固地主、中间力量抗战到底是不可能的。地主能否坚持抗战，要看基本群众的力量。要把村庄变成抗日堡垒，不发动群众也不可能。这都必须有阶级斗争。现有农村是封建的监牢，内部充满着矛盾，主要是地主与农民的矛盾，还有顽固力量与中间力量的矛盾，中间力量与自己与农民的矛盾，还有家长与家人，农民与青年，男人、女人，婆婆、媳妇等矛盾。农村又是层层统治层层矛盾的。但这种矛盾局面主要是地主所造成。矛盾的支配权也攥在地主手里。主要的矛盾是对地主，地主把主要矛盾再分散到他种矛盾，以维持其统一的统治。我之农村工作即用一切办法揭穿这些矛盾的真象。地主把阶级斗争变成宗派斗争、姓氏斗争、宿命论以维持统治，我要揭穿这些矛盾，把矛盾的支配权转到抗日人民手里。打破地主的支配矛盾，唯一的武器是抗日与民主，以此揭破地主的暗幕，这就是发动群众建立正常统战。不是此后就无矛盾了，而是我要支配矛盾。

第二，在民族敌人深入国土下，在各种地区发动群众的规律不同

(1) 基本区

甲、其特点：我建立了抗日秩序，敌人经常直接的威胁较小。农村阶级矛盾主要是农民与地主。地主用封建办法造成复杂的矛盾局面，限制了抗日的发展。我要在农村建立抗日堡垒，必先做反顽固势力的斗争，摧毁了封建的统治（政权），建立抗战与“三三制”〔政权〕，以巩固抗战力量，建立正常统战。基本区农村不把封建统治摧毁，抗战力量〔就〕不能巩固。担任这个斗争的主力是雇农、贫农，以基本群众为核心，团结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基本群众走向政治舞台，抗战力量才能巩固。所以基本区必先发动农民打垮封建统治，发动基本群众进入斗争，树立群众的政治优势，〔这〕是一个非常艰苦的宣传鼓动工作与细密的组织工作。否则树立优势是不可能的，把群众从封建统治下拖出来也是不可能的。地主尽量掩饰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所以宿命论是发动群众的主要障碍。宿命论是封建思想的最大迷惑，不把思想问题解决，发动群众是谈不到的。恩赐的减租是不行的。要求是一回事，敢不敢、应不应该又是一回事。发动群众是由不敢到敢、由不自觉到自觉。这就是说，没有宣传鼓动工作，就不可能到自觉。因此每个同志谁看轻了宣传鼓动工作，工作一定无成绩，这干部也不一定是好干部。不会宣传鼓动者，就一定不能成为群众领袖。不会宣传鼓动工作者，就要包办代替，就要强迫命令。无宣传工作，群众就不能认识自己是〔一个〕阶级，也就不能组织群众。宣传鼓动也非盲目的，必须注意两个问题：①即调查研究，这才不会无的放矢，搔不着痒。要调查本村地主统治的黑暗及其事实，调查群众的政治经验，看群众的觉悟程度（对地主黑暗的感觉），调查后加以研究。有些群众觉悟很低，我要把群众对地主的低级的模糊的私仇私恨，提高到明显的高级阶级觉悟。对党的教育，基本上是教育党员从阶级的观点去看问题。不把群众的阶级觉悟提高，在抗战中就不能把握稳局面，要犯“左”犯右的错误。②关于鼓动的方法与技术也要注意。根据搜集的材料进行准备

与计划，为考验其效果，先找十几个群众或干部试验一下，如听者无形于色，即是失败了，材料的搜集就是成问题了。给群众讲了以后，还要征求群众意见，补充自己的不足。在宣传鼓动中，不要光说大道理，要举出实际例子（必须是与本村情形符合），讲话要通俗、新奇、生动。为了使群众更对我之宣传易于接受、体会，必须反对先生讲学生听的办法。讲到群众痛痒时，要予以深究回味的的时间，使群众讨论。刺到群众之痛楚，群众一定会交头接耳，一加讨论就能激发其愤恨与情感。在宣传中为使上下呼应，接〔结〕合双方情感，在讲到群众之痛楚时，下面要先布置积极分子，激发群众的情感，使我宣传鼓动者的情绪与下层密切结合。但由于长期的封建统治，即使启发了其觉悟，鼓动了其情绪，但真正行动起来，撕开脸皮干就不行了。这时要用反激法，很容易使农民走向斗争。喊口号时可以用引导办法，利用催眠方式……。过去我们就忽视了这些办法。

乙、基本区发动群众的规律

农民是群运的主力，抗战的主力军是基本群众。①一般说群众参加斗争必须与其切身利益相联系。代表基本群众利益的主要是减租减息、合理负担、增资等。我要从基本群众入手，一般的因合理负担已经实行了，故应从减租减息、增资等入手。减息如只按中央规定是不相同的……从此来满足群众的要求。在斗争中再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进一步做组织工作，提高其政治地位，形成一个抗日力量。

②在减租息中，开始起来的是贫农，中农还不甚积极。贫雇农斗争后，形成力量后，中农才可以起来参加农会，这样就构成了抗战中的基本力量。

③这时做了几个斗争，与地主对立了，就有了武装的要求，用武装保护自己，镇压敌人，保卫自己的既得利益。这时因大局未定，中间力量动摇着或依附顽方，群众要继续斗争，争取中间势力，所以武装的性质还只是农会系统的（这时不可强调武装的独立系

统，而把武装与区武装与自卫队长发生一定的联系，准备逐渐的独立起来，等顽固分子孤立了，中间力量过来了，再建立独立系统）。

④这时群众开始撕破了封建的统治，震撼了全部封建统治（基本群众形成了独立力量），基本群众很兴奋，一切被压迫者也很兴奋，青年与妇女尤其受波动。我们的任务〔是〕进一步扩大进步力量，吸收中农参加农会，用一切力量争取中间力量。这时是策略指导的中心一环，这就是反贪污恶霸，改造政权实行“三三制”。中间力量与顽固力量在民主上是有矛盾（中间力量对我之矛盾，亦须适当斗争）。

⑤又由于群众撕破了封建统治，妇、青欲动，我即应组织青年与妇女，这时可减少我组织他们的困难，错过时机，很难组织。因农民有反顽固斗争的要求，也有其浓厚的封建思想，〔所以〕他不能以平等的精神对待其青年、妇女、妻子。这时候农民的力量尚未巩固起来，要想巩固尚须要更大更多的力量。青年、妇女必须出头，动员的力量越大，对顽固势力的打击就越大。青、妇这时参加这些运动，与农民的利益是一致的，故易组织。如这时期过去了，再组织青、妇就往往与农民〔发生〕矛盾。故我要竭力组织青、妇，并借机提高其地位与威信，批评与打击轻视青、妇的言论、行动，给农民以启发教育，打击顽固派造谣。故青年运动亦不能反家庭。青年〔提出〕生产学习，妇女提出家庭和睦——必须平等，才能和睦，和睦就是平等，不是约束妇女甘受压迫，而是要经过斗争。故青、妇的发动与巩固必须与反封建的斗争相结合，否则妇女不能积极参加生产。家庭和睦达到，则即转入生产，不要过度解放。妇、青之参加组织与斗争，就是革命运动深入发展的表现。

⑥当中间力量争取过来，村内即民主问题了。青年、妇女是在民主中最积极的，农民不那样积极。在吸收中间势力、顽固势力的子女上，对中间力量也是一种争取与团结。青年接受真理快，〔这〕对于顽固分子也是进一步的孤立了。于是他就不能不老实，不能不

与群众站在一起做公民了。这样正常的统一战线就告一段落了。这时我们的任务，就是实行“三三制”，彻底民主。由以上的发展规律，说明过去机械的在一县一区一定时期内进行一种工作，这是不合乎群众要求与发展规律的（这也并非否认一般号召，只是说要看具体的条件，有中心工作，有按具体情况规定的工作）。

⑦今后的工作就应转入巩固工作。现在有些把巩固工作神秘化。巩固工作不是主观要求，而是根据群众的要求集中上来，制成计划，坚持下去，和发展是一样的。为什么群众要求巩固呢？因为〔在〕群众要求下，群众组织起来了，个人的幸福就寄托在这个组织上了，该组织的任务也就是群众的要求，否则就不是其组织。该组织之参加者是为要该组织满足其要求，巩固这一新组织，就是为满足群众的要求与利益。凡组织不合乎群众利益者，□都须予以改造。如实行民主改造，反对新贵，改选负责人。故我不能以为民主民生斗争完成了，群众工作就完了。组织工作就是不断的提高群众，不断适合群众要求，离开群众的要求与利益，是没有什么组织工作〔的〕。新贵把持组织，群众要求不能满足，就不会服从组织，不会拥护组织。过去就是组织工作脱离了群众了。组织工作所以并非是神秘的。

⑧再说到改善群众生活问题。做了减租息等工作后，并非说以后就不改善群众生活了。组织是一定始终不能脱离群众的要求与利益的，不能改善群众一些生活后，就转而一味向群众□□要求。由于群众痛苦从两面而来，一因社会存在着剥削制度，一因天灾与自然限制，因此改善群众生活必从两面着手。一面要做彻底的民主民生斗争，改革剥削关系，改善生产关系，刺激群众的生产，〔一面要〕提高群众生产力，便于生产力往前发展。没有减租息、合理负担，贫中农生产情绪都不能高。执行了民主民生斗争，改造了生产关系后，使生产关系较合理后，就转向生产问题，发展生产力。但有很多困难，如物价暴涨暴跌（合作社要解决这问题），群众生活就要受到大的痛苦。不解决此，生产力亦不会提高，地主亦可从

中发财，补救损失。所以合作社不能搞起来，就不能刺激生产，群众仍在痛苦中，你向他要求一些东西是不行的。这个任务就是〔搞〕合作社。其次增加生产亦非空话，必有一定资本，如挖井、肥料、种子、劳力、牲畜等等。不解决此，生产力亦不能提高，根据地财经就枯竭。在此情况下，中心转入生产，我之组织工作就要服从此任务。必须要保护生产，保护资财，防敌抢劫，故民兵建设就必须提出来，武装保护生产。生产是科学，可从中打破靠天吃饭论，必须予以教育。

掌握这一规律，可以少走弯路。

（2）在灾区之发展规律有所不同

灾区的问题就不是减租减息、合理负担之类了。救灾不是从农会开始，而是从合作社开始，由合作社从事生产。这就必须供给生产资料、垫底粮，但我又不能完全供给，于是又进行借粮斗争。过去在沙区救灾时，对贫农照顾不够，如只供给本钱，中农可以，贫农就不能维持了，有的把贷款当路费走了。再一个即借粮，由游民分子领导，游民欺软怕硬，真正有粮的未借到，中农的倒借出来了。斗争果实往往为游民分子所吞噬大部，但这是个别的。沙区的斗争大大改善了党与群众的关系，但教育组织工作弱，群众了解自己力量不够，认为我是慈善机关。

（3）接敌区群运的发展规律与基本区不同

敌人、伪军直接抢掠、威胁、烧杀，这就改变了农村的阶级关系。故反敌人、汉奸、投降派就成了群众的普遍要求。我发动群众的任务就须根据这个情况领导之。这种情况下，受到威胁的地主可以搬家，富农可以搬家，中农最成问题，贫农不在乎。虽然大家都受到威胁，但程度不同。中农是最迫切了，贫农在反汉奸、敌人、投降派中得不到什么利益，地主易妥协，中小地主常成为领导者。贫农因不能改善其生活，妨碍其劳力的发挥，未能从民族斗争中改善基本群众生活。在我无工作的游击区之联防，在性质上是维护中国人的利益，安定社会秩序，是使基本群众走向政治舞台，开展民

主民生斗争的前奏。社会秩序现已安定，即应马上由进行反汉奸、投降派的斗争转入民主民生斗争，使群众走向政治舞台，转换武装领导权。在敌情严重地方，亦可以武装封锁敌人，进行反资敌、贪污，反投降派，从中组织民兵，再求得安定社会秩序。故接敌区一定要从反投降派、反汉奸斗争中打开局面，再转入民主民生斗争。

叁、在我们的群运中，还存在着许多不正常不健全的现象与严重的缺点。这是由于领导上的问题。领导上严重的缺点，主要是英雄主义、官僚主义的领导的妨碍，缺乏经常的正确领导

官僚主义领导的表现：去年即提出开展群运必须先加强群众观念，但目前官僚主义的第一表现，就是不关心群众的生活，不视我区群众之疼、饿、死为自己的责任，因此就不了解群众痛苦，就不能了解群众的迫切要求，也就在领导上不调查群众的具体情况。这样领导就不会从群众中来，工作的任务与计划不是向群众去找，而是向上级去要，这样的工作计划与任务就一分不值。反之，工作计划一从群众中集中分析而来，而制定计划下去，就是不可阻挠的力量。“充实组织工作，下级一定要向上级报告工作与情况，这是个一定的任务”（联共）。官僚主义者希望自己一段工作搞过了，再等待上级再来个计划，不向群众中去问。我们等上级，群众呢，却有很多问题还没有解决，还等待着解决。不是下面没有问题，而是有问题我未看见。我们只知道对上级负责，而不知道还要对群众负责。上级指示下不来，他的结论就是埋怨上级领导不及时，或埋怨群众落后。有的认为租息都减了，其实都还未彻底，这是根本不了解情况一种官僚主义。再一种，群众一有要求，他就〔用〕宣布法令的办法，只要少数干部或几个先进分子一拥护，就百事大吉，心满意足，宣布斗争已经胜利了。这就是我们领导思想上不面对群

众，只停在先进的少数分子身上。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只有一般号召，无具体的帮助，无具体的检查。（这是最严重的官僚主义啊！）

英雄主义领导的表现：他没有群众观念，也没有组织观念。他主观毫不受客观的限制，强调主观的能动性。他一定要碰钉子。他不把主观的能动性去掌握客观的发展规律。他的眼里没有民主，但对上就要民主，对下要下级的民主，但到自己身上的时候，就要集中了。自己做到民主，对小资产阶级的虚荣心是一个严重的斗争。这种人的法宝，不是依靠群众的经验与要求，而是依靠自己的地位，依靠自己的法令，强制命令群众。有地位观念者在领导上一定要强迫命令，他可以强迫群众执行与群众切身利益无关或有害的事情，他不能把上级的指示具体化，他不教育、不说服。每个工作如不与群众切身利益相结合，就一定做不好。英雄主义不了解群众要求，不提高群众，不教育群众，不向群众学习，不顾群众利益，单纯去命令，所以在工作上常常与群众利益违犯，当群众尚不能接受我之领导意见时，他不做宣传鼓动教育，而大骂群众落后。

总之来说，我们的眼睛都是往上看的，所以简单化。眼睛向下，领导才能丰富。中央领导方法的决定乃是党20多年来斗争的结晶。由于以上之恶劣的领导方法，故在实际工作中出现了以下的毛病：

各种法令之执行是非常的不彻底，如减租减息、合理负担。会后应按区党委深入检查工作的指示深入检查。我处群众生活之不活跃，就是生活改善的程度不够，斗争的果实不能全为群众所得。由于生活改善不够，故群众对自己的组织高度的热情是缺乏的。这因为我之领导上的毛病。此□由于英雄主义的领导，群众观念薄弱常基于自己的风头主义。他只看到少数的干部，他未把领导放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自动性之□才是高明。他只看到了几个少数积极的干部分子。因此经过了各种斗争的地区，也是以恩赐的观念进行的，未宣传鼓动，未启发，群众的自动性、积极性很差。由于这种领导

的结果，在斗争中走向政治舞台的不是广大群众，而是少数的站在群众之上的所谓新贵分子。新贵的产生就是我们制造出来的。领导者的思想、观点、方法就自然的影响到下级，领导者强迫，村干部也就强迫。所以新贵〔的产生〕应从我之领导上来检讨。

再即新贵缩影与地主复辟问题。村中的新贵的产生，是因为有新贵母。英雄主义，无群众观念，无民主，无组织观念，他的领导就产生了小新贵。在群众中吹播自己的英雄，对群众以老子自居，村中的一切工作完全归功于自己。区级干部亦如此。（县、分区又何尝不如此？）自以为就是群众的财神和恩人，所以他就要求特权和优先权。不认为斗争是群众的力量，不认为共产党改善民生领导斗争是本分，因之他要求在群众之上，不在群众之中。反贪污、查“黑地”的果实他要保存，减免他有优先权，免差有优先权。除优先权外，他有特权，如抽头，免减有指定权，有捕人权。他无时无刻不站在群众之上。区干部到村要求村长弄油水给他吃，对村干部的领导是老子对儿子的态度，对群众是老子对孙子。县级干部对区村级的这些问题，因为自己有新贵观点，也看得惯。区干部在地主家吃饭，□了“黑地”不罚。反贪污果实村干部存放，自己从中赚小，自己吞噬。还有借一还四之放高利特权的（用反贪污、查“黑地”的果实）。由此看我们的领导，有的对这些事不知道，有的知道而漠然置之，群众因而怨恨，感到自己是牛马，是为他人做嫁衣裳，在村干部面前不敢讲话，敢怒而不敢言。我们是新贵，新贵看新贵就看着顺眼。牺牲群众利益，满足新贵要求，结果跟新贵一齐倒霉，这就是我们英雄主义、官僚主义领导的危害。所谓新贵缩影即一般如此。县级、地区级就是英雄主义。这就是不能以平等待人，就是新贵。把一切功归自己，失败在他人不听自己的话。摆资格，自命不凡，吞噬公粮，买钢笔，做背包，拉官腔，假传圣旨，说官腔，瞒上欺下，牵连上级，抱粗腰，压迫人，信仰个人，小看群众，轻视劳动，封锁群众……每个同志应据此来检查自己思想上是否有这些东西。我们没有，下面也不会有。新贵发展的结果，每

天过鬼的生活，群众敬而远之。群众要求反新贵，就因我县区干部也有些贵，所以贵气相投，鬼鬼相贵，结果官逼民反，旧鬼复辟，应运而起。斗争的果实落在新贵手中，农会便有名而无实，新的组织就永远不会巩固，永远无广大群众的支持。（村干部产〔生〕不出来，是群众无发动。）我推翻了旧统治阶级以后，代之而起来者系少数新贵，而非群众的统治。至时反新贵成为地主与群众的要求，过去的老冤不冤了，光棍无法了。我是冤，现在还是冤，这就造成众多老冤的反抗，旧统治者乘机兴起。这时我们要转移斗争，强压着转移，结果来回拉锯，无有结果。新贵看青偷青，给地主复辟的机会，中间力量不满，我不针对处理即不能垮掉地主复辟的基础。由此可见，地主复辟是乘我们内腐之机。要杜绝，必须先把我内部搞好。反复辟必先从此搞起。今天我在农村经济上是劣势，我改善群众生活还不够，群众之一部还须依赖地主过活，这也是地主复辟的原因之一，但非主要的。政权在我手，只要我内部巩固，就可以战胜地主这一优势。打走地主的统治是容易的，但肃清几千年的封建传统意识，改造小生产者的落后地位，是极不容易的。故不要以为初步斗争胜利就完事大吉。

从农民运动的历史上来看产生新贵的原因及共产党与农民的运动的关系问题：

从主观上检讨是因领导的官僚、英雄而产生新贵，但在客观上农民的特点也是主要的客观原因。艰苦朴素、忠实勤劳为其优良品质。广大农民生在封建社会中，受到地主无限的剥削压迫，他是最痛苦的阶级，因而他是革命的，故他是无产阶级可靠的同盟军，能始终跟着我党走，他们是我之基本群众。我党应时时照顾其利益，代表农民的利益，这是我之责任。（不顾其利益，不关心其利益，向他们要报酬，这就是无立场无群众观点！）没有基本群众与我在一起，我党即是空架子。这是农民的作用。但不能否认，农民有严重的缺点：落后、保守（压迫者剥夺了其受教育的机会）、眼光狭小、自私自利；封建思想，贯之于等级观念；宿命论，造成其不主

则奴的观念。对他们这些缺点应有足够认识。其落后与保守妨碍了其创造性与建设性。他们多是狭隘经验论，其眼光狭小、自私自利，故不能看到远大的前途，不能正确地结合个人利益与全局利益，常常是牺牲团体利益服从其个人利益。所以历史上独吞革命果实，投降统治阶层的事情层出不穷。因他们受了封建思想的蒙蔽，他不能平等的待人，也不能平等待己。从历史上农民的革命运动中，可以找出以下规律：即统治阶级压榨剥削得农民不能再忍受时，即非用武装推翻其统治不可时，他才起来。〔由于〕农民的保守性，起来是不容易的，不压得他无办法时，他是不起来干的。这时为打倒共同敌人，他能以同舟共济的精神团结起来，其内部阶级划分并不明显。但在享受革命果实时就斗争了，杀掳同伴，镇压群众，领袖已由群众爬到群众之上了，成为了新的统治阶级，反回来再压迫群众。这即是同患难而不可以同富贵的历史教训。新贵出身时并非都是坏的，当他被压迫时，可以同群众一起打掉顽固力量。但政权夺回来以后，新贵即可执之再镇压群众。政权夺回后，落在多数革命者手中，就是镇压反动派的，落在少数人手中时，就用于镇压群众，使少数人成了新的统治阶级。今天我之农会村政权是否是群众的，群众是否有权，应好好回味反省。

但农民的弱点是可以克服的，历史的规律之覆辙可以避免。这只有靠共产主义的教育，以民主的精神去领导农民运动。这必须有共产党的领导，并把农运中最积极的分子，提高到无产阶级先锋的水平，吸收他们入党，作为农运骨干，团结多数分子，再逐渐提高他们。在农运中不发展党是多么危险呢！没有党的领导，要把农运发展下去是不可能的，叫农民得到解放是不可能的。今天我要检查党在各村中对群运的领导作用怎么样。今天在群运中，在党内出了不少新贵之原因——为什么在共产党领导之下还会发生新贵呢？

这固是我英雄主义、官僚主义的领导，主要还是我们群众观念的薄弱，看不到广大群众的力量。这是尚未深刻了解革命是广大群众的要求与广大群众的事业。故革命必须有广大的群众，群众运动

的标志就不能看几个领袖，几个积极分子，而要看广大的群众是否解放了，有权了（权到谁手里去了），有饭吃了，是否真诚的拥护我党及其革命的组织了。这应该是衡量群运中的基本的标志。积极分子提高中间、争取落后一齐去革命，但积极分子一脱离了群众就无力量了，就无意义了。我们应以阶级为转移，以群众为转移，但我有了公粮吃，忘了问题就此发生，群众也不为我所看见了。不从组织〔上〕提高广大群众的积极主动性，改善群众生活，而只看见了几个少数的积极分子，这就是英雄、官僚的原因。眼里没有群众，基本问题是我之政治觉悟还不高，在处事处人处己〔方面〕，未能完全站在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立场，一切行动思想尚未约束在无产阶级的范围以内，这是每个党员应检讨的。这是阶级的问题，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眼里就不会有群众。我们还未完全弄清我是为阶级为群众服务的，我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一员，因此就不能以阶级利益为利益、以群众利益为利益。在群众之外，就必然要在群众之上，只有在群众之中，才能做到这一点。因而领导机关与干部口中的阶级与群众只成了名词，因为他未〔在〕群众之中。一旦自己的团体的利益与群众的利益矛盾了，他就讨厌群众了。因我并非以阶级出发的，而是以群众是〔否〕能满足我之要求为出发〔点〕，所以群众观念抽象了，说可以，但实际的去服从群众利益就完了本事了。犯这些毛病的不自觉性就是没有阶级的立场，地主资产阶级从未可怜过群众。

政治觉悟不高，其原因：

第一，从领导干部本身来找：边区干部绝大部分是出身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又多半于抗战后入党，过去未受过严格的阶级教育、组织生活。他们没有或很少经过旧社会严重的政治的经济的困难与压迫，所以在阶级社会中无产阶级劳动群众之真正的痛苦生活，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没有自己遭受过，谈到群众痛苦故无所痛于心，了解的不是那样深刻，似乎群众解放不解放都可以。

第二，还有些干部出身于贫苦农民，他们遭受过困难与压迫，

对于旧社会有些体验，但他们当时还是青年，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参加革命后，很久了，到今天成了干部（他们当然是党的宝贝），生活上改善了，他们多在部队，有枪杆，可以不受饿，他们对群众痛苦也就有些消逝了，也就轻视物质了。抗战后，我强调了抗战与阶级利益服从民族利益，在国共合作抗战中，强调了联合忘了斗争，缺少提到阶级上来认识这些问题，也〔是〕形成阶级意识模糊的原因之一。在这种情况下就产生了官僚主义。

第三，中国历来没有民主的习惯，也助长了英雄主义与新贵。所以反新贵必须首先从领导机关与干部本身反起。这虽是我进步当中的弱点与错误，但不予以注意，对将来的进步就是致命的障碍。我们要反省过去在群众观念上、在领导作风上的错误与缺点而克服之，如此才能有我党的健强的领导，才能〔有〕正确的农民运动。转变领导就是把群众意见集中起来，再回群众之中坚持下去。当然不是尾巴主义。坚持就是依靠宣传鼓动说服群众，不是抹煞党与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

鲁迅说：领导者“也用权，却不是骗人，他利导，却并非迎合。他不看轻自己，以为是大家的戏子，也不看轻别人，当作自己的喽罗。他只是大众中的一个人，我想，这才可以做大众的事业。”（《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

肆、在我们的群运中存在着不健康的现象

由于我农会的组织与内容尚不完全一致，还未做到其应做的许多工作。

在我们的农会中，中农占着主要的成份，形成不健康的现象。这种现象与我们的工作发展阶段有关系。一个斗争与哪一阶层的联系密切，该阶层就一定积极。在减租中□中农并不十分积极。在减息中中农与贫农亦不相同，要求的积极性不那样迫切。增资则主要是雇工，在（合理负担中，在）反贪污、查“黑地”中亦多分配于贫农，中农在领导这些斗争中都比较差。但到生产与合作社中，中

农就较积极。由于领导成份主要在中农，形成一种比较消沉的状态，雇工、贫农的生活改善并不彻底，他们关心雇贫生活差，雇贫农尚未提高其政治地位。我们的斗争主要□□于贫农有利中。这就引起我们的注意，教育中农，引导其积极性。

还有在中间力量领导下的群众组织，富农、中小地主，这种群众斗争与组织之特点，多半是从反恶霸、贪污，改造政权等斗争开始组织了群众，中间力量取得了领导权。〔对〕这些斗争中的中间力量应有正确认识，即他们与中间基本群众有矛盾。这种情形说明我政权尚无基础，群众尚未形成独立力量。因为中间力量领导的斗争代表了群众，他也就团结中农以上的群众，把旧统治者推下政治舞台，自己取而代之。他在斗争中不会有民主，他控制着基本群众向顽固力量作斗争。他自己实行民主是不可能的，只有在基本群众力量下才能参加民主。当他登上统治舞台，因为他团结了群众，掌握了政权，故我们的法令往往受其阻碍，果实亦不能分给基本群众。中间力量领导斗争之目的即控制基本群众，去报复顽固派的私仇私恨。中间力量本身有浓厚的压迫统治的本性与恶习，他们领导群众斗争常是站在群众之上。当群众向他要求民主与改善生活时，他就要镇压基本群众。所以我对中间力量领导的斗争不能抱过高的希望，对中间力量的团结，必须是在基本群众形成独立力量向他进行过适当斗争以后。过去我常对中间力量抱幻想，帮助其建立力量与威信。但如顽固力量很大，群众不敢动，中间力量与顽矛盾深，中间力量是可以用的。〔要〕给群众以启发，不要以中间力量为主去进行组织，而〔应〕迅速转入民主民生斗争，以贫雇农为主去组织。

为流氓分子所掌握的组织：多半形式的，组织上只是少数流氓分子借组织之名狐假虎威，迎上欺下，贪污腐化，群众则对之貌合神离，对流氓分子敢怒而不敢言。这由于流氓好脱离生产，他的生活来源，依靠欺骗、敲诈、投机，没有一定的阶级立场（阶级是由经济来决定的）。光棍不吃眼前亏，见冤不捉一律同罪，这就是流

氓的处世哲学。老实群众在□流氓中是眼子，就要被捉。当我发动群众和顽固分子斗争时，这就成了流氓分子出头的机会。他们参加斗争的企图是从中搞鬼，混水摸鱼。由于流氓的这些特点，所以上层流氓常成为统治阶级的走狗，和统治者一齐压迫群众，引起了广大群众对流氓不满。他们在村中无地位，群众很讨厌，顽固势力常用损人利己的办法。顽固分子常喜平静，一般中下层的流氓分子又喜乱，与勾结地主的上层流氓有矛盾，要求打破现状，故也决定他能参加革命运动，他们常处在接合部中过活（？），故我对流氓应正确认识，流氓分子之上层成为地主狗腿，中下层则一般的说尚属于进步力量，有改造的可能，否则对流氓不会有正确的政策与方针。因此对流氓分子一般的不用打击对立的办法，应采取教育争取的方针。在争取教育中当有斗争，对上层流氓经争取不回头来，也应以适当斗争与打击。由于群众对流氓不满，因为他欺软怕硬，所以非至孤立的他无办法时不能争取，故不能放之于领导地位，这样群众会不满，限制群众斗争的参加范围，或者流氓借领导地位欺压群众。故我要用明提暗离的办法，名义上夸耀之，实际上将其与村组织离开，勿使在群众组织中占地位。如流氓胡作乱为，则采〔取〕明打暗拉的办法，或用群众力量打击，暗中拉之。对流氓分子要用群众力量改造之——采取不理态度。掌握群众后，他才对你俯首贴耳。因流氓不参加生产，改造他的中心是使之回到生产。发动群众起来以后，更缩小其欺诈的范围或杜绝其欺诈之路，然后给以出路，给他想出生产的办法（如贷款租地等等）。“光棍洗了手，饿死狗。”已经改造的流氓有了觉悟了，他们也可以成为干部。

伍、关于树立农村基本群众的优势与发展富农的问题

第一，基本群众发动起来与树立优势。在农村中树立政治的优势，在村中顽固势力退位了，即政治上的优势取得了。利用政治优

势逐渐再削弱地主的经济优势（不是维持其现状，更不是扶植）。政治优势是否巩固，也即看能否从政治优势下再逐渐建立经济的优势，削弱封建经济。政治是经济的集中反映，在实际工作中，在村内要树立坚固的政治优势，首先要看农村的经济变化怎样，基本群众生活的改善程度怎样。只有改善基本群众生活，基本群众才会起来拥护组织，参加政权。否则就是空架子，政治优势也就是不巩固或未建立。忽视群众生活的改善去谈政治优势是不行的。政治优势的不巩固、未建立，群众生活未改善是一个主要原因。群众情绪的不高，对其经济生活的改善是不够的。不削弱地主，群众生活不能改善；不增产，群众生活也不能改善。削弱地主要用我之各种政策削弱之。变动地主土地就谓之“左”，是不正确的。农民革命基本上〔是〕土地问题，故对大地主土地还是没收的。但我又非盲目的经济主义，以满足群众要求为准。所以我又须从满足群众要求中去提高群众的政治水平与觉悟，去组织群众树立真正的民主生活，产生真正的群众领袖。过去我未了解到这些东西，所以只是政治上的号召多，而从如何改善基本群众的生活上是不够的，所以号召常落空。在估计群众政治优势也常从组织形式上、群众情绪一时的高涨上去估计，或从片面的反映上去看，而从经济变化上去看是没有的。因之在估计农村政治形势上就失之过高。还有的只注意了群众生活改善，但对宣传鼓动组织工作不够，群众的组织与政治觉悟不高，所以不要只去看形式，而要看实质。

第二，关于发展富农问题。中央提出按吴满有的方向前进，吴满有贫农出身，土地革命后得土地，由贫农、中农直发展到富农。他是共产党员，又是劳动英雄。他是自己勤俭劳动走向富农的，他是完全拥护党的政策的。目前为什么要发展富农：①从中国革命性质上讲，我是民主革命，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是扫荡障碍资本主义发展的封建势力，资本主义是私有的。②从各面的需要上来说，无论改善民生，无论抗日供给，无论从革命前途的发展上说，都需要发展富农，发展资本主义，打下走到社会主义的基础。同时，这是

与群众要求相适应的。把农村经济只限于中农是不行的，进一步改善生活必须发展到富农，使用进一步的生产工具，增加生产。这样的资本主义与旧的资本主义是不相同的。旧的资本主义是在资产阶级专政下发展的，是剥削工人的；我们的发展资本主义，是在“三三制”政权下发展的，它是照顾各阶层的，是富农、雇工利益兼顾的政策。强调发展富农不顾雇工是不对的；强调增资不顾富农亦不对。再即根据地政权在我手。此外，发展富农是否减弱革命的基本力量？我是要使贫中农上升，这是否是减弱革命的基本力量？政权是我所掌握，把贫中农升为富农是要经过了许多斗争的，在斗争中基本群众已得到了启发，他从中农走向富农是在党的领导下，这就给了地主以很大的削弱，给了他们以共产主义的教育。这样发展富农才能把群众积极性提高。目前边区政策上要照顾富农经济发展，但中心任务不是发展富农。因广大基本群众尤其是贫农生活还很痛苦，所以边区中心问题是如何改善贫农生活及雇工生活的问题。

陆、关于借粮问题

从几年来各地借粮斗争的经验上可以得到如下的几个问题：借粮斗争一开端容易引起社会秩序的混乱，给农村经济的发展以大的震撼，地主富农厌于生产，对地主富农刺激很大。但也不能否认借粮给了群众临时困难以解决，给了群众以兴奋。其原因：由于这一斗争无一定经济条件的约束，即一般的贫苦农民对富有者借，所以斗争一起就马上普遍到各地，两面政策的掌握非常困难，主观力量难于控制；流氓分子借机活动，在斗争中积极，多掌握了领导权，尤其在我工作薄弱地区。游民分子又常常欺软怕硬，所以中农就倒霉了。这就违犯了政策，损害了群众利益，波动了社会秩序。由于借粮无一定条件，所以又往往助长了懒汉〔思想〕，果实为流氓大吞大吃大喝。由于这些情形，借粮问题只有在极端严重的灾荒下不〔才〕应进行这一工作。只要我有办法救济，就不应采取这些办法。因而去年在濮县的借粮是考虑不周到的。在沙区及鲁西北的借

粮则是正确的。该二区处在极端严重的灾荒下，死者甚多，地主富农囤积居奇，从中渔利，引起社会人士的不满，我们无其他办法很好的救济，这样的借粮可以引起广大的同情。在灾区进行借粮中，应注意以下问题：要尽量争取社会舆论同情，争取合法，借时应立约予以保障，很快的转入正常的借贷关系，安定社会，争取同情，并给地主以一定的利息，减少地主恐慌，争取舆论同情。已借到的果实，要即刻从事生产，勿坐吃山空。

柒、今后群众运动中的策略指导

首先要解决群众自动性、积极性的不高的问题。边区环境严重，必〔须〕使群运正规化，既不过分刺激地主，又要充分的发动群众，这是矛盾的。因此在指导上就要解决这一矛盾，这就必掌握以下的原则：

第一，要切实掌握住民族形式的武器，就是说要把阶级斗争以民族的形式出现，在各种斗争上就要强调为了民族与抗日。地主阶级在抗战中是动摇的，抓住民族形式就是打击地主之动摇方面。地主之要求抗日是我所联合的，是其光明面，也是其迷惑群众的〔一面〕。但其动摇、投敌、资敌是其黑暗方面，脱离群众的一方面，也是我们要打击的一面。在敌后，故我应强调抗日，反投降，反汉奸，表扬抗战，打击投敌行为。在政治上、经济上削弱他，都要以民族形式出现，这才不过分刺激地主。政治上予以揭发，抓住投敌、勾敌的顽固分子，大量发动群众向之斗争，甚至没收其财产，使群众斗争在不破坏统战下掌握了民族形式，把它提高到最高度。

第二，抓住民主的武器：由于地主的封建统治与专政，其不民主造成他〔与〕广大群众和中间力量的矛盾。他最怕用民主打他。民主是广大群众与中间力量的要求，这即是我争取中间力量的基础，共同的要求、共同的利益、共同的斗争就是民主的内容，这是打击顽固分子、团结中间分子的有利武器。民主是建筑在平等的基础上的，必须有了平等，才有对事对物自由选择的权利。没有平等

就谈不到民主，要求民主就是要求平等，反对少数人的特权与压迫。这与顽固派的利益是完全对立的，这就是打到了他的要害。民主政权的出现也就是地主统治的垮台，在顽固派统治的村庄就绝不会有民主，有了民主也就不叫做封建统治。只有基本群众的优势建立后，才能实行民主。争取实现民主的条件，须经过严重的斗争，获得平等地位以后，才能谈实行民主，故应把争取与实现民主分开。所以在顽固力量统治的村庄，实行民主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在基本群众未形成力量时，是争取民主问题，而非实行民主，故称之为民主民生斗争，在经济上政治上削弱地主统治，改善群众生活、取得平等地位。在此期间有关贪污恶霸等等民主法令中，应抓住这一点，充分发扬群众的积极性，特别是反贪污斗争，〔要〕充分的发动群众。群众的最后发动，积极性最高，往往就在反恶霸斗争中。这时群众就再无所顾忌了。这也能争取群众舆论同情，充分发挥群众的积极性。

在基本群众形成力量、中间力量转向我们时，即是群众已取得了平等地位，我已具备了实行民主的条件，即应大胆的实行民主。其意义：首先是巩固我之组织，发扬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刷洗我组织中之一切黑暗，保护群众的利益；其次，进一步的摧毁封建统治，〔使〕民主范围扩大，顽固分子的活动缩小。反之给顽固分子留下进攻的空隙。基本群众政治上已经提高了，每人都可站在本身立场上发言，不会为地主利用。开始实行民主，不管对内对外就不可以压制民主，实行民主的困难亦即在此。而且极端民主的现象也是难于避免的，而是如何纠正的问题。实行民主是非常不容易的，党必须有真正的民主精神，有关本村的事情必须尊重大众的意见。大家表决的决议与支部决议违背或不符合时，一面检查自己的决议，有不对者应予以改变，如果是正确的，党员应根据支部决议向群众解释，使之放弃错误意见，拥护正确。如群众实在不拥护，我党员应投反对票，绝对不能采〔取〕任何非法行为制止群众表决。既通过后，党员应无条件的服从，但仍要说服到群众了解时，

再经一定民主手续改变，绝对不能用任何非法手段。从此可以看出三个东西：一即民主精神，即平等待人的精神。只有如此，才能实行民主。二即民主的内容，即共同的要求，共同的利益，共同的斗争，不能形式化，不能强制群众，违犯着群众的利益去“民主”。三即民主的制度，少数服从多数，民主集中制度。三者不能孤立，无制度即可极端民主化，无内容必形式化。因而在支部中实行民主，必〔须〕注意克服支部对村内政民各种问题不调查，主观的制计划，做决议。强调党员无条件的执行党的决议（这当然是应该的），再加之党员无民主精神，这就形成对无条件执行党的决议之执行，在大会上公布，压制民主，不允许别人发表相反的意见，强奸民意，这即引起群众对民主的失望——党员不用宣传工作争取群众，而是强制群众。其次在支部党员中，把支部决议变为群众决议，要在多方面搜集群众意见，支部要加以研究。为慎重起见，可先将支部意见交小组讨论，搜集党员意见，再去搜集群众意见，然后再形成决议。这即一切决议从群众出发，把群众意见集中综合。

第三，掌握合法合理的原则。在民族民主形式之下可以发挥群众的积极性，但把二者孤立起来则易“左”，故□必须掌握合法合理问题。合法即斗争必以政府法令为依据，这即须对被斗的顽固分子找到法令根据、犯法事实，以杜绝其反攻，而麻痹地主。但政府法令尚不能包括群众生活的全部，在法令所不及的范围内，我应依据群众的习惯法，群众情绪、舆论及风俗等，这即是合理的原则。即大多数人的同情，适合群众的要求与赞助，使群众起而维护了真理。在合理合法中具体的应注意到：

①任何斗争，能得到多数人的同情和赞助。斗争的对象是否群众痛恨？斗的方式方法是否合适？

②不破坏统一战线。

③不做超现实（即群众尚不了解、不能接受的，目前尚做不到）的斗争，口号不能过高，但也不是尾巴主义。

第四，掌握速战速决的原则，这包括：①不过分刺激地主，充

分发动群众，打的时间越短越好，打后即拉。尤其是在对中间力量的斗争上，勿零打碎敲。②不给地主以反攻的机会，不要经常刺激。③这也可以保持群众情绪，斗争之缓而长者，群众常常疲惫。

第五，高度的策略原则必须与具体情况相结合。例如，掌握村政权者非顽固力量，但亦很坏，但不能因是中间力量就不斗，但并非不要策略指导。只从具体情况出发，不照顾策略，也要发生“左”右偏向；照顾策略指导，往往会限制群众斗争的积极性，缩小斗争范围。

捌、关于我各种政策的实施问题

边区工作发展不平衡，故各种政策应照顾边区不平衡之特点。如民生未改善者，负担面就不能要求到80—90%，应按工作发展的条件，否则常会妨碍群众工作。为此各县委应注意本县特殊情况，及时反映到上级及区党委，这才能配合群运的开展。应把行署法令好好的研究，不适者应迅速反映上来。为了适应工作的不平衡，县可制定纯地方性的法规。在民主民生政策上，主要掌握：为改善民生必须进行增资减租的斗争，是□□再即掌握合理负担，从增加基本群众收入及减少、除免群众负担的两方面着手。减息问题必须与合作社结合起来，息减了之后，要马上组织合作社，举行信用贷款，否则为害群众生活不小。工商局银行勿单纯营利，要扶植群众生活。

第二部分 关于党的工作（略）

濮县、范县四个月群众工作总结*

(一九四三年)

第一部分 濮、范两县的形势特点

壹、工作开始时的形势特点

基本上两县的局面已经打开，在总的方面取得了优势（党、政、军、民各种组织都有了一套），但下层农村仍为封建地主掌握着，所以农村中各阶级对我们的关系不够经常：地主对我们不满，但表面应付我们，暗中反对破坏；中间力量有的跟着地主走，有的采取观望、消极的态度；而广大基本群众没有发动起来，所以对我们也是消极、观望、不十分信赖的态度。因此，虽然我们基本上取得了优势，各种法令虽已实行，但不够彻底；加以主观上对政策执行的某些缺点与错误，使广大群众对我怀疑，不敢依靠我们，使我们陷于孤立，我们的统治力量表现的非常薄弱。

（一）范县。因为执行政策上与工作上的缺点，使我们几年来的统治表现出无力量，从各阶层的表现可以看出：

甲、地主。民主民生工作虽已部分实行，但地主在政治上经济上的统治并未削弱，他们采取了以下三种办法，来维持他在乡村的统治地位：

1、利用其上层人物（士绅）掌握我们的弱点，作为他们统治的护身符。如我们在统一战线中，过去只看士绅脸，没有站稳立场，

*本文原载于冀鲁豫区党委出版的《党的工作》第13期（增刊）。

甚至有些领导干部，把士绅的意见当成群众呼声。

2、利用他们的传统地位，瞒上欺下，阳奉阴违，来达到他统治的目的。我们统治上层，他们统治农村，利用他几千年来的统治经验。我们的法令下去即变质。

3、利用游民作其爪牙，欺压乡民，增加群众负担，嫁祸于我，造成群众对抗日政府的不满。地主为避免战争中的动员与差役，不直接掌握村政，而用游民作为统治的工具，地主在背后操纵，保持了他在农村的统治。我们实行合理负担，他瞒“黑地”。葛口全村共30顷地，合理负担地17顷。其负担的百分比为：地主12%，富农14%，中农12%，不但如此，并贪污分肥，把负担的重点放在群众身上。

乙、富农。因为地主把法令变质及他们的无权，负担较重，加上增资工作的推行，而其本身对民主的要求又未能满足，所以他们对我们是消极观望的态度。

丙、中农。负担与富农差不多，支差繁重，在农村中历来无地位。他们要求民生与民主，我们因为没有给他解决问题，表现对我冷淡，在斗争中前顾后盼。

丁、贫农与雇农。过去减租虽然减了，但马上发生的便是退佃解雇。减租增佃是他们的要求，我们对他们保证的不够彻底，因而对我们不相信，不敢依靠。

戊、游民分子。不仅没有被我们改造，也没有被掌握得住。

一部分游民被敌人掌握对付我们，到我基本区抢掠破坏，扰乱社会秩序。

另一部分被地主掌握，做为自己的爪牙与打手，在农村中横行霸道，欺压群众。

再一部分打入我们组织内部——区队、区政权等下层组织，以我们的招牌为非作歹。甚至白天是我们的人，夜间是人家的人；白天抗日，夜间作非法的勾当。

因为以上原因，群众没有发动起来，使得广大群众对我们感到

无味，我们的一切工作也就得不到群众的支持。

(二) 濮县。由于叛军的长期盘踞与蹂躏，我们虽然已基本上取得了优势，而广大群众的创痕未复（只听到我们的，没见到我们的，群众还没有在他的切身政治经验中了解到我们是他们创痕的唯一的医治者），所以，对我们的信任与依靠也不坚决，我们的力量也不十分大。

甲、地主。土地经济萎缩得较厉害，土地变更了1/3。贫农下降速度较小（多做小生意来弥补损失），生活也十分差。

1、当权的地主大部分与叛军勾结，狼狈为奸，将负担利用买红条贪污，或买叛（请客送礼）等方法，不但弥补了他们的花费，而且还可从中渔利，把负担转嫁到广大群众身上（如贪污等）。

2、在野的地主，他们的确有一部分是下降了，即所谓“干尖子肉头”，中小地主（谁也不啃骨头，都是要吃肉）只一部分下降而为富农了。

乙、富农。在叛军在时，除受叛军的欺压外，还受地主的白眼与压迫。经济下降很大，一部分为了逃避负担，将土地出租，甚至因土地的减少逃往外乡。因此，他们要求民主。在反贪污中表现积极，然而对增资工作则不感兴趣。

丙、中农。在经济上一部分起了质的变化（变为贫农），即未起质的变化的，在生活上已达到极贫苦的境地（吃的坏，出卖劳动力，甚至出外行乞），而在土地上的变化不大，因多卖牲口与农具。

丁、贫农。在这一时期下降的比较差，原因是：叛军在时出差繁重，他们可以出卖劳动力来弥补一部分损失。但他们的生活也极贫困，可是他们不出差。

戊、小商人。叛军在时他们最赚钱，生活也最好。

己、游民分子。在叛军在时，虽一部分与我有关系，帮助我们（这时他们被好汉□掌握，与我有关系，是为了保存他们的利益），但未被我们掌握；大部在叛军与地主之养育下，疯狂的活跃

起来，叛军走后对我们怀疑与畏惧。

濮县在叛军的长期蹂躏与地主的统治与压榨下，广大群众对我虽好，因为只听到我们的，没有见到在实际上给他们解决问题，所以，在开始时对我们也是观望。

贰、经过了四个月的工作，濮、范形势起了些什么变化？

（一）濮、范各阶级上起了什么变化？

在执行了合理负担，减租增佃及反贪污以后，濮、范各阶级力量开始起了基本上的变化。在濮县农村，广大群众基本上已经发动与组织起来，在范县是部分的地区基本上发动起来。

甲、从广大基本群众来看：

他们在思想上开始了解到自己的痛苦，想在斗争中去摆脱。如群众说“过去他比咱高一丈，现在咱比他长5尺”；“我们穷了半辈子，今天才知道是怎样穷的了”。过去是听天由命，现在知道迷信是不能解决问题，统治者给的穷苦，只有斗争才能得到解决，一斗即斗出粮食，这是个实际问题，“慢慢的天就晴了”。

在政治上有了觉悟，敢向地主进行斗争，认清了地主与自己的界限，了解到自己是个阶级（了解到咱们是一伙，要对他们那一伙斗斗）。

在组织上，开始有了组织（四个月中组织了将近2万人，改善生活600万元）。这些组织是在斗争中觉得组织的需要而组织起来的。这些群众基本上已团结在党的周围了。同时，在斗争中党发展了二三倍，不仅在数量上的增加，从成份上与觉悟上来说，也是较好的，打下了巩固党的基础。

所以说，广大基本群众已发动起来，是在减租增资斗争中组织起来了；是农村中无产阶级与半无产者组织起来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力量。广大的中农由对增资减租同情（但怕落人，不表示态度，

待倒粮后，他们说“是应该的”），到公开的拥护与声援，直到依靠的地步。游民分子说：“八路军政府是向穷人的。”〔他们〕向我们提出要求改善他们的生活。但因为我们没有照顾到他们的问题，发生了一种偏向——偷，捉住了就承认：“是我偷的，因为穷，没的吃。”

乙、从中间力量（富农、中小地主、不当权的实力派）来看：在四个月中，他们与顽固势力开始有了分化。他们对于民生改善虽不甚满，但他们要求民主亦甚迫切；更由于广大基本群众已经形成了一个强大力量，在此情形下，他们便动起来开始分化。他们积极参加反贪污，反对农村当权派。这是今后树立我们优势的 决定 因素。顽固分子已孤立起来，于是他们则大叫“现在是赵匡胤溜河沿——兴龟不兴龙了”，“老百姓不安分守己了”，“扶保纣王，不嫌纣王无道”，“天不能光黑”。

而中小地主等中间势力则说：“恶有恶报，善有善报，善恶不报，时候不到。”基本群众认识到了组织的必要，如说：“人多心不齐，干啥也无力。”当权派的地主，看到群众力量的伟大，反对也不行了，便说：“倒就倒了吧。”“你们调查调查我这个人怎样？”“问问县里对我有什么意见没有？”并自报“黑地”。

因此，在发动与组织群众上，基本上已完成了任务。

（二）我们干部在这次斗争中起了什么变化？

全体干部在群众运动中锻炼与改造了自己，初步检讨了自己，交流了经验，对今后自己的工作岗位有了新的认识。

甲、党的工作干部

在过去单纯的作了些技术工作，把工作庸俗化，技术化，脱离群众，脱离了现实，党不起核心领导作用，仅仅成为法定的领导干部。如对支部了解非常表面，不深入，模范支部起着□□作用。对干部的审查，仅限于填表，而不是在实际斗争中去了解干部。

乙、政权干部

过去部分的干部认为，政权机关是个“向群众要东西的机关”，

是个森严的衙门，继承了统治阶级不少的恶劣办法，反认为自己有了政权工作经验。而今天认识到，要推行我们的法令，必须经过群众路线才能实现。过去未能耐心的去组织与发动群众，却说群众“赖狗扶不上墙”。如禁止资敌，出一布告，只是简单的命令，结果群众由公开资敌变为秘密资敌。

政府片面的向群众要，模糊我们是代表群众利益的，就必须与〔为〕群众着想，来解决群众问题，因而在过去，我们的政府是有威有权无力。经过了四个月的工作，解决了群众的问题，群众对我政府的威信是提高了。

丙、群众工作干部

过去的群众干部把群众团体与群众分开：我是农会干部，你是群众；我是工作人员，你是群众。侠客作风：“他妈的，我给你减租，我一个粮食也不要，你还不愿意，非要不行。”不是站在群众当中为群众谋福利，而是站在群众头上。也有一部分干部只会“同志们，同胞们”，不懂法令。过去认为群众简单，群众落后，实际上证明这是错误的顽固思想。群众是最复杂最有办法的，不论在对付地主时或算帐中，都有很多的新鲜办法。如葛庄农会拒绝地主参加农会，说：“你是读书的文人，我们都是握锄把的人，说话粗声粗气的，怎能参加一个会！”又如我们说25%，群众不懂，佃户只说“4斗灌1斗”，大家都听懂了。过去认为边区群众落后，所以工作做不好，是不对的，工作做不好，应该严格的检讨自己。

丁、武装干部

武装干部在实际斗争中得到很大锻炼，克服了不注意群众工作、简单化的工作方式等弱点，了解到农村是不简单的。

在此工作中，使党、政、军、民的干部彼此交流了经验。

（三）在实际行动中初步地看到，党八股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藏身巢穴，体会到大众语的伟大，真切的初步认识到了什么是知识分子与什么是理论。

甲、有些干部到村中去八股的讲话，就是主观主义，不了解群

众的实际问题。甚至有些干部完全脱离群众，到农村中吃不到饭，则骂群众落后，不满意制度。而实际上群众则给了他以严厉的批评，如有人说：“疮长在胳膊上，你偏偏往腿上去扎。”不了解情况，就一定会碰钉子。

乙、大众语的问题。群众最能了解其意义，如对合理负担说：“送葬的掉了裤子，有哭的，有笑的，还是笑的多”；对减租增佃中的问题说：“又要叫马将，又怕日死马，要想叫马将，别怕日死马”（意谓：对落后群众别顾虑太多，处处沾便宜）；对减息时说：“放帐的不经官，帐多不必愁”（意谓：还不起还该不起呀！）；在反贪污中，地主威吓算帐委员会的人说：“出头的椽子先烂”（意谓：现在你领头，将来我得势了先找你）。这些话比咱们文诌诌的名词有力得多，群众容易了解与接受，这是值得我们很好学习的。

丙、知识分子与理论的问题。许多知识分子到农村中成了没知识。有些学的理论不少，到农村中吃不上饭，骂群众落后。有些不感觉新事物，整天醉生梦死，不到群众中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甚至有的干部整天想吃好的，赶集上店，自寻消遣。还有的被地主麻痹，住在地主家不出来，或被地主收买跟地主走，认为地主苦（合理负担，减租减息都要他的）。这种干部丧失了共产党员的立场，在民主民生斗争中淹死了，处处表现着无知。在工作中证明了农民是有知识的，比站在群众之上的干部更有办法一些。更有些自称的“工农干部”不了解乡村问题，不懂得农民心理，那只是空辱农民干部的名义。这些毛病与缺点都是值得我警惕，须在实际斗争中去纠正。

（四）改善了党与群众的关系

广大群众已在初步的亲身经验中敢于依靠我们，了解了党是爱护他们的利益的，这说明了党与群众的联系决不是主观愿望所能达到的。这就是过去我们未能发动起群众的基本原因。因此，党的口号必须放到群众中去考验。只有党的口号一旦为广大群众所掌握

时，才成为伟大的物质力量。濮、范四个月来可以说党与群众结合起来了，基本上都已团结在我们的周围。农会的建立就是今后濮、范工作继续发展的物质基础。

第二部分 过去策略的检讨及今后的策略运用

壹、过去的检讨

（一）几个具体工作中的策略介绍

甲、合理负担。在濮县25天完成了370村庄，占全县88.5%，这是边区的创举。

1、为什么实行简易合理负担？

叛军走后，各阶级有两个要求，一是平均数，即叛军在时多出负担者，现在和少出的平均一下，主要是地主；二是改善生活，中农以下的广大群众，要求减轻负担，改善生活。其次是我们的要求，是迅速屯粮。叛军走后曾宣传实行每人去1亩的合理负担，各阶级都很兴奋。当时派粮320万斤，每人去1亩不能完成，准备改为平均摊派，这个消息传出以后，广大群众不满。这时我们便研究了一个村的情形，估计了全县〔情况〕，确定实行简易合理负担办法，其特点：

①以田赋地亩为计算标准，并保证在田赋地内无“黑地”。其他“黑地”不着重查。

②按田赋地之分级（如河压、河占、堤压等地质之好坏）评议之。

③多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以完成屯粮为主。

2、实行简易合理负担后，基本上打破群众冷落消沉的状态，在农村中起了很大的变化。贫农说：“不实行合理负担，咱得逃荒；实行了就不逃荒了。”所以在合理负担计算好后，贫苦者自动拿公粮，怕合理负担不实行了。中农说：“有哭的有笑的，还是笑的多。”地主说：“合理负担，我看最不合理。种1亩拿1亩，这种1亩

拿2亩，不合理。”

3、简易合理负担不仅保证了征收公粮任务〔的〕完成，并且打破了边区合理负担执行的记录，而特别重要的是锻炼了干部，使干部了解哪是广大群众的要求，哪是少数人的要求。当时干部认为平均数是广大群众的要求，这因为干部接近的都是地主富农少数人，只听到他们的跳叫，而听不到群众的要求，不接近群众——一部分人认为要减轻人民的负担，不能实行简易合理负担。有些干部在执行中采取中立态度，个别受地主影响随地主跑。自执行后，我们对简易合理负担的认识：

①实行简易合理负担不但不影响屯粮征收，而且促进了公粮的征收。

②清楚看到了贫富斗争的各种办法，基本群众负担减少，可以从富有些的身上补救起来。贫苦群众积极拿粮，少数人不拿也没话讲，好像母鸡下蛋似的脸一红就下来了。实行合理负担后，基本群众真正掌握到我们手里了。这由尚和县与濮县的比较可看出来。尚和实行平均摊派，造成广大群众与我对立，并〔且〕屯粮计划只完成一半。

③合理负担的合理性应根据主客观的力量有所伸缩，□□□□的合理只能是幻想，过去的合理负担只在书本上合理，在脑中合理，实际上实行不了。

④因工作地区不同，实行的方式上也有所差别。在空白地区，以自上而下的方式多用政权力量，更多的注意启发群众情绪，把广大群众拉到手里，使群众认为抗日民主政权与旧政权不同；在有工作的地区，时间上许可，群众对我认识，可更多的采取自下而上的工作方式去执行。

在范县的合理负担——有1000顷“黑地”，地主实行倒累进率。地主在政治上经济上都占了便宜，并且还争取了群众来对付我们。而现在的合理负担办法极不统一，应很好的统一起来。

乙、减租增佃（以粮代价工作同时进行的）

1、濮县的减租增佃是在合理负担执行以后实行的，广大的基本群众已经起来依靠我们，同时在合理负担中便了解了租佃关系，所以在进行的时候也就比较容易。

在范县的减租，以粮代价工作则不好作。由于过去对减租后的永佃权保证不够，地主勾地解雇，干部包办代替，加以教育工作的不够，则造成了地主富农的报复，故佃户与雇工有很大顾忌。

在濮县减租增佃以后，地主则感到很大威胁，警觉性很高。范县地主开始麻痹，减以后则表示恐慌。

2、今天检讨这一工作有如下的特点：

①减租增资斗争中，主要是地主与佃农，雇工与富农，斗争双方比较明确，所以就直接引起了农村的阶级分化。在斗争中创造了骨干组织，造成今后斗争的有利条件。同时必须认识，减租不是单纯的地主与佃户的斗争问题，广大的中农是会同情拥护的，并在政治上及舆论上加以声援；在斗争中改善了农村无产阶级及半无产阶级的生活，形成了一个独立的组织力量。

②利益明显，斗争比较直接，所以群众容易发动，也容易掌握，有的认为这只是个别的顽固分子不高兴，实际上这只是看到容易的一面，因而忽视了艰苦的教育与组织工作，造成轻视对方的观点与机会主义。

在范县二、四区几个大的村庄打开以后，就改变了群众过去的消沉懈怠的心理，组织了部分的群众。在斗争中，中农在开始同情，但不敢公开表示出来；到倒粮时，中农则公开表示拥护；最后看到退工解雇的问题有了保证，中农则大批参加农会。

斗争开始时，动员雇工及佃户的过程是由不该到应该，由希望别人代做到自己干。减了以后并在法令上给以保证，这是雇工与佃户最高兴的时候。

地主这时的表现，一听说减租，对干部封锁不理，不给房子住，不令佃户与干部接近；斗争既起，则表示对佃户如何好；在倒粮以后，则提出对佃户的威胁，说“这是砂锅子捣蒜，一锤子买

卖”，对佃户精神封锁，不给工作，不给说话，说佃户把牛喂瘦了，或说调戏他家女人了等加以罪名，来退佃解雇。所以，如作的不好则会明减暗不减，双方都不满意。因此在工作中必须防止“内奸”，保证地主不勾地。

③今后应注意的

A、检讨起来，一般的不应将减租增资在同一村庄同时进行，否则会多树敌人（与地主、富农同时对立），应分别先后进行，以便各个击破，防止他们联合起来建立反动堡垒。

B、在减租增资以后，佃户和雇工可能成为农会的主要成员，这是不可免的。只要我们注意对中农的争取团结工作，在新的斗争中不难扩大广泛的农民组织。

C、反贪污问题。（略）

（二）这一时期我们的策略指导与检讨

甲、群众工作的特点

在工作开始时，濮县为叛军退出区，范县有我们的部分群众工作基础，但这两县的共同特点，是在于群众基本上尚未发动与组织起来。

我们抓紧这一特点，就是首先应当把基本群众发动与组织起来。那么压迫基本群众的是谁呢？是地主，就须向地主去斗争，争取民主民生的实现，以取得基本群众的优势。

乙、我们对地主的方针基本上是联合抗日，因此不能过分伤害他。一方面为了改善群众生活，取得民主权利及树立基本群众优势；另一方面还要地主能生活下去，共同抗日。为了启发与组织广大农民群众，就必须进行一适当的斗争。

目前濮、范基本上把群众发动起来，并初步的大量的组织了群众，因而我们基本上是完成了发动群众的任务。但有其缺点：

1、对顽固势力与中间势力分不清（顽固势力是农村当权派，要求抗日，反对民主民生；中间势力要求抗日与民主，反对民生改善）。有的同志把地主、富农弄为一谈。顽固势力与中间势力不仅

是程度上的不同，而且是本质上有区别的。对富农〔是〕发展的方针，但对其封建剥削的一面是反对的，因而斗争的程度也不同。对中间势力不满意，民生改善认为是假进步，都是不正确的。因此在斗争中没有掌握好分寸。

2、在斗争中，对地主的斗争认为是打落水狗，也是不对的。

（三）今后的策略运用

要想达到发动与组织群众的目的，必须正确的掌握住策略，从不断的领导民主民生斗争中去完成。

甲、今后几个具体工作的特点

1、目前反贪污斗争中的特点

①反贪污斗争本身是广大群众对少数贪污者的斗争问题，但必须看到：贪污分子的特点大部分是运用村政权，或者与村政权有关系的来进行贪污。反贪污斗争本质上是民生问题，但反贪污斗争又常常联系到改造村政权。因此这一斗争不能单纯看成是经济斗争，它必须与改造村政权问题联系起来。

根据濮、范现有工作基础，农村的无产阶级及半无产阶级已经组织起来。按目前濮县的反贪污斗争就与改造村政权的斗争结合更为密切了，包括了树立基本群众的优势及争取与团结中间力量，揭发与分化顽固势力的问题，而这一问题的关键就看我们是否犯错误的问题。

②在进行反贪污斗争中，首先要找到主要分子是谁，找到后台。有的村长是游民分子，但后台为地主，利用牌长掌握村长，或者用帐先掌握，或者以破落户充任村长，地主露面。因此就必须分清主要与次要分子，不是所有在朝的都斗。同时在处理斗争的果实的时候，不仅照顾到基本群众的利益，还要注意到中间势力的利益，应当通过村民大会去处理。

③改造村政权应改造它的一套，不仅改造一个村长就算完了。

2、在反贪污斗争中应注意的几点

①不要笼统的把在朝的贪污分子当成对象，须要分清主要次

要，以便打击主要的，争取次要的，去孤立最顽固的。

②算帐委员会要以“三三制”去组织。他是代表全村所有参加反贪污斗争人民的意见去进行工作，因此，农会不能直接指挥算委会。农会对算帐委员会或个人有意见，可以号召农会的〔以〕团体名义或号召农会会员以村民的资格提出意见。

③反贪污的果实不应交农会，应交村民大会，农会起保障作用。但农民大会通过由农会处理时不在此限。

乙、减息斗争问题。边区目前灾情严重，合作社少，借贷所没有，群众所迫切需要的不是减息问题，而是能否借到钱与粮的问题。所以我们必须先了解情况，不是一味的强调这一工作。想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在以下三种条件下才有可能：

- 1、灾荒问题有了具体解决办法。
- 2、金融问题解决，统一了货币。
- 3、农村合作社有了组织。

目前年关减息也是群众迫切的问题，可以采取拖延办法，有纠纷可以调解之。如果成了诉讼案件，则可执行分半减息的法令。

在减息中债权人与债务人是复杂的，必须注意。如濮县的债务人多〔为〕地主，债权人多为鄄北小商人及范县的富农。

丙、救灾问题。边区的灾区相当大，濮县中农的粮食只能维持到年底，贫农则更难维持生活，所以在灾区应以救灾为中心工作。赈灾不是基本办法，主要的是给灾民找出路。这一问题应与边区的统一货币联系起来，把法币排挤出去，把一切非必需品运出去，换回必需的粮食来与敌人作经济斗争。但这一工作是十分复杂的工作，必须有政府的贷款与群众团体领导，难民才能解决生活问题。因此政民要共同去调查，农民干部要农民化。可以将农民组织为运输队，干部参加领导。

丁、优待抗属的问题。这一工作也必须成为群众工作中的最重要的工作。这不仅关系到部队的巩固问题，并且在群众中还该涉及到一部分贫苦农民的生活问题，并且这一部分群众与我们有特殊的

关系，我们不仅爱护他救济他们，并且应提高他们的地位。优待抗属的顺序应当首先是正规军、地方军，最后为工作干部。应马上纠正只优待自己，不优待别人；只优待地方军，不优待正规军的自私的宗派观点，并应分别家庭经济状况来予以物质的帮助与精神的安慰。

以上诸问题，应当根据具体的环境特点来灵活的运用，而不应机械的搬家。

贰、对今后形势的估计

（一）对战争形势的估计

目前是在与敌人争取时间。敌人对我基本区（濮、范）的进攻与占领，不是可能与不可能的问题，而是时间的早晚与地区先后的问题。敌人迟来一天，对我们有利一天。我们应抓紧时机发动组织群众，巩固力量。估计敌人将来的进攻可能采取的办法大概为：

甲、“铁壁合围”，不安据点，短时间便走了。

乙、由四周向内“蚕食”，步步为营。

丙、由于我们地区的广大，敌人可能先占领几个主要的点线，向外发展到面的占领。

丁、像“九二七”〔大“扫荡”中〕的八分区一样，率领绝对优势的兵力，大量的安据点，使根据地变质。

布置工作要估计到以上的情况，但基本情况未变动以前，我们要大踏步前进，同时准备敌人到来时的工作方式。领导干部应更多考虑这一问题，布置工作千万不要麻痹。

（二）对农村三种力量动态的估计

甲、顽固势力。顽固势力的特点与进步势力的分水岭：顽固势力是农村的当权派，要求抗日，不赞成民主，更不赞成民生。大地主投降派是降日反共；中小地主及在野的地主则要求抗日与民主，反对民生。我们对顽固派斗争时〔要〕分别对象，分别程度。目前顽固势力之特点是感到恐慌，今后可能：

1、主动的退却，拖延时间，等待时机。被迫退却或主动退却，在斗争中掌握群众情绪，什么方式都可以，但用其他方法挽回损失，掌握村中的权柄，并来麻痹我们。

2、坚决与我们斗争，甚至结成联盟、找后台（如仙庄附近的村开了20多个村的村长会，又如范县士绅200多在葛口请县长的客），联合起来反对我们。此时出面者常常是被动者，操纵组织者常在背后。

我们的目的〔是〕分化揭发之，使之结不成联盟，找不到后台。

3、下毒手，改变斗争方式。对方计划最后无有办法时，他们可以〔用〕最毒辣最卑污手段：

①利用流氓或土匪打黑枪（黄河两岸的特点）。②作内线工作，打入我们组织，甚至打入我党，从内破坏我们。③收买利诱腐蚀我们干部，破坏我们的工作，如吃喝、给钱。我们有些干部提出“吃孙喝孙不谢孙”是不对的，吃的多了，便在腐化堕落中淹死了自己，如某些干部消极或逃跑回家了。

我们同顽固分子斗争，同投降派斗争是有区别〔的〕。对顽固势力斗争是抗日统一战线内部的斗争；对投降派是对汉奸的斗争。因此，打“落水狗”的办法是不对的，“打得地主缩也缩不回去”的观点是错误的。

乙、中间势力。与顽固势力的分别，不但是抗日而且要求民主，中小地主、富农及在野的地主，谁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就跟谁走。对中间力量的估计：

1、与顽固势力结成联盟来反对我们。因为我们既没有答复他们的要求，也没有在反贪污中照顾他们的利益，觉得我们不够朋友，加上顽固分子竭力拉他，这是对我们极不利的，广大优势的树立则不可能。

2、同我们一块走，与顽固势力分化开，来依靠我们。这是在我们不过分伤害他们的利益时，减租增佃后保障了劳动纪律，而且在

反贪污中照顾到他们的利益，答复了他们的要求，让他们不仅有义务，而且有权利，感到我们可靠，这是树立优势的焦点。这是我们应该力争的。

3、中间势力起分化，绝大部分是中立的态度。这是我们不能较圆满的答复他们的要求，也不过分的损失他们的利益，但对他们的地位尊重不够，态度上不够诚恳，有些地方感到伤心与被利用；同时我们与顽固势力的力量都很大。这是我们所不希望的。

总之，我们对中间势力是争取与团结，而不是发展他，而是发展自己。即便有些斗争，也是为了争取与团结。

丙、进步势力。不仅要求抗日民主，而且要求改善他们的生活。他们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原动力，包括了中农以下的成份。我们不仅改善他们的生活与答复他们的民主要求，还要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把他们组织成一个强大的组织力量。

对濮、范进步势力动向的估计：

1、在不断的斗争中组织与巩固起来。取得优势就必须：

①把现有组织提高一步，把广大群众由经济利益斗争提高到政治利益斗争，继续组织广大群众，在发展与组织路线上不发生错误。

②在揭发与分化顽固势力，争取与团结中间势力〔上〕不犯错误，把中间势力争取过来。

③抓紧时间集中力量。

2、停留〔在〕现有基础上，不仅不发展，相反的还要削弱。这在下列条件中是可能实现的：

①这就在我们不能把广大群众的经济斗争提高到政治斗争，不能组成一个独立的力量，单纯的经济观点。

②不能提高基本群众及干部的阶级觉悟及斗争能力。干部包办一切，自己当“太上皇”，当“诸葛亮”，站在群众头上，脱离群众，使群众运动变质，内部分化。

③不培〔养〕群众的组织观念，不会运用组织力量（组织农会

为了减租，减了租便冷下去了），不了解组织就是力量。

3、现有的基础消沉、分化、崩溃，已得的成果失掉。在下列条件下可见到：

①已得的经济利益得不到保障（减租增佃后，粮送回或退工解雇；在反贪污后将款送回）。个别地区已发生这现象。

②已有的组织不团结，四分五裂，闹内讧。

丁、游民分子的问题

一般是属于流氓无产阶级，有时不固定属于哪一阶级，所以说游民是一个阶级又不是一个阶级。

1、游民分子的来源

①城市的失业的工人及职员，没有正当的职业，特别是抗战以来都跑到农村中来。

②农村经济的破产，使多数的农民的生活下降，一般贫苦者无法生活，不能不另想别途。

③历年来长期内战，制造了大批的游民出来。

2、游民分子的特点

生活来源是用一种不正当的办法取得的，如骗子手、娼妓、闯江湖的、卜者、巫婆、土匪、流氓、土棍、经纪等都是（但应与部分是依靠不正常的正当办法取得生活资料的区别开来）。游民分子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在社会上无地位，对社会不满，又无身家性命的顾虑，就产生了革命性；一方面因为他在生活中不占地位，又具有强烈的破坏性，捣乱社会秩序，缺乏建设性，是反革命的，不是社会动力。因此我们必须善于运用他的革命性，改造他的破坏性。他们的组织口号是“有奶便是娘”；行动口号“此地不养爷，别处养爷处；别处不养爷，回家卖豆腐”。

3、目前在濮、范对游民分子的处理产生了偏向：

①因为不了解什么是游民分子，扩大了游民分子的范围。如将好吃、好喝、好嫖、好赌、好穿、有流氓习气的人都划到游民分子范围之内。

②忽视了游民分子的两重性，忽视了他的革命性，只注意到他坏的一面，没有去改造他，教育他。四个月来无有大胆的运用他，掌握他，对他们是关门的。

我们对游民分子的态度，对最坏的应当镇压与打击；但对大部分都应设法争取与改造之。基本办法是叫他们参加生产，改造与恢复他们的阶级意识，使他们成为基本群众的一部分。争取游民分子也就是取消了地主的爪牙与打手，可以缩小敌伪对我进攻的空隙，并且还可争取一部分的游民去对敌斗争。否则为顽固分子所掌握，则成为阻碍群众进步的力量。因此我们必须很好的去掌握与改造他们。

（三）根据目前工作现状，决定我们目前的策略

甲、从斗争的对方来看（基本势力与顽固势力）

1、首先从顽固势力看。四个月斗争使他们起了如下的变化：在开始时认为是小民捣乱，不关痛痒（如说“简直是井底蛙想吃天鹅肉”）；在群众已经发动起来的时候，就马上看到他们的地位不稳，逐渐下降，便起来以息事宁人的办法企图取消斗争；如群众再进一步干下去，则内部起分化。中间力量〔是〕以群众为转移。

2、从基本群众来看。几千年来没有社会地位，没有组织与斗争的经验和信心，也感不到自己力量的伟大，并回忆考虑着叛军的创伤及将来敌伪的威胁。而在四个月斗争中也已经部分的组织起来，有了觉悟和敢公开进行斗争。

在斗争进行到短兵相接的时候，应占领阵地，争取先机找出对方的弱点，坚决予以打击，求得斗争的胜利。首先注意他们的分化，组织与团结自己的力量。

乙、从目前的工作现状及今后工作的发展上来看，目前基本上发动了群众与部分的组织了群众。发动起来以后，就要树立我们的优势，建立正常的局面。树立优势的标志在于：

1、在思想上，把农民由自在的状态达到自为的阶级，在思想上提高一步，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觉悟到自己是个阶级）。

2、在政治上，使农民能够在同地主斗争中取得胜利，并在斗争中去丰富自己。

3、在组织上，由无组织到有组织，把广大农民组织到一定组织中去。

目前游民分子已不只在政治上认识了我们是能解决他的问题，而且在组织上感到了有组织的必要（一村反贪污后，一游民分子要参加合作社，不让加入，竟跪下来求）。

树立优势的目的，就在于打开统一战线的正常局面，即由无产阶级领导农民基本群众占优势，把中间势力争取过来，包括了顽固势力，组织成共同的统一战线。为此，今后的策略指导应当由民生的圈子过渡到民主的圈子上去。因为中间势力要求民主，而基本群众也必须从经济斗争（民生）提高到政治斗争（民主），否则已发动起来的群众是很难巩固的。

丙、如何具体运用策略？

我们对中间势力的斗争是为了争取；对顽固势力的斗争也有争取。

1、打。打击顽固分子是为了分化与揭发他们。对下毒手的地主我们必须予以打击，揭发他的阴谋。一般的说，在基本上对他不利的时候，顽固分子对我们的斗争办法不正面出头，采取两面派的态度，阳奉阴违，把法令变质，利用我们的空隙，上拉下打，采取防御的进攻来对付我们。在我们打中了他的要害时，也有正面斗争，常以“肉头”地主与我们斗。对这种地主应争取，无效时须以斗对斗，用斗来争取他（目的在于分化与团结他们），斗以后使他反悔，使他认识是“上了谁的当”。不分对象，不研究情况的乱打是要不得的。

2、拉。我们不仅要看到斗争对象的现象，而且要认识其本质。对怕群众力量的地主，可以用群众力量来争取他；对在斗争后暂时消沉，暗中仍在想办法的，应予以揭发；对愿意和缓局势，改善与群众的关系，动摇想回头的，我们应大开方便之门，不记前仇，团

结与争取他，集中力量去打击主要对象，达到分化与争取的目的。

3、以理斗理，以力斗力，但不要过火。应着重推动群众组织力量，来完成斗争的胜利；不在不得已时，政权不出头，着重以理斗理。今天的斗争要合法，但是单纯的法律观点是不对的。

地主最怕的是打官司、登报、开会，因为他们没有理，是少数人压迫与剥削大多数人。地主的力量是经济力量，我们的力量是组织力量、政治力量与法律。今天我们就是要以群众的进步力量来对付他的经济力量。

第三部分 组织与领导上的几个问题

壹、坚决克服包办代替现象

（一）包办代替的具体表现

甲、政民工作队是代替包办了濮、范两县的工作。工作队本身就是不适合的，在空白地区假若没有一套组织形式便应建立，已有组织不够充实的，就应加强与充实之。工作队往往产生工作队在，工作有，工作队走，工作无的毛病。如果是为了着重建立开展这一地方工作，应帮助本地领导机关培养原有组织的威信。到那里工作的同志，都应参加当地的各种组织进行工作。

这次在濮、范工作队干部较强，则影响了本县原有组织对工作的领导与威信，加以工作队本身分工不清，责任不明，更采取了军队的一套组织形式，影响到工作效率的发挥与干部的工作情绪。

工作队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采用，如专门做一种调查研究工作或负有其他特殊任务时可以用，一般是不适用的。所以，在濮县的流动教育团，范县的“扫荡工作队”，都是值得考虑的。

乙、干部代替群众。在斗争还不成熟的时候，即开始斗起来，形成了干部的蛮干；又没详细的调查研究，对情况有时只看现象不看本质；否认了在斗争进行中阶段之间的距离，而主观的蛮干，或想超阶段的一下干成；这都要碰钉子的。

在每一个斗争中必须经过由不应该到应该，再到人家干，到自己干的这四个阶段，也就是说由宣传鼓动，再到组织，最后进到行动。在这四个阶段中间都有它的距离，有它一定的工作，在每个阶段有它适当的口号，忽视了这四个阶段的发展，而要求迅速完成这一斗争，必然会产生盲干。干部动群众不动，即偶然胜利，这胜利也不能很好达到群众的发动与组织。

丙、个人代替组织

1、干部到农村去领导工作，在无群众组织的地方，应该发动群众迅速建立起来；在已有组织的地方，自己便应参加到里面去，尊重原有组织，帮助他们进行工作、解决问题。

而我们干部到村里后，站在群众之上，当“太上皇”，当“诸葛亮”，不听取群众意见与呼声，以个人意见来处理问题，代替群众与组织，更没有注意到发现积极分子，培养群众领袖，提高村干的工作能力，障碍了农村已有组织的进步。

2、到各组织去时，这一干部即算原组织成员之一，事事应以少数服从多数之原则来进行工作及提出意见。若该地决议违犯上级决议时，可制止并提出意见。

而我们干部则自以为高明，不听取组织意见，不服从决议，以个人意见来代替组织领导，不经过当地组织便布置工作。

丁、党政军民互相代替

政府给农会布置工作，群众团体私自逮捕人，党不经过党团布置政府工作与群众工作，结果在工作上是互相乱抓一气，因此，造成了互有意见，不团结。这完全是由于各部门没有认清自己的工作任务与范围。

（二）产生这种错误的原因

甲、不了解民主集中制的真实内容，不了解没有真正的民主便没有真正的集中。在个人与组织的关系上是组织服从个人；在少数服从多数上是多数人听他自己的意见，认为多数人的意见对他是个压力。不了解即便自己的意见是对的，也必须经过多数人通过，成

为大家的意见才能执行。

乙、对上级的关系上是以个人为转移。对下强调集中，对上强调民主。总之，认为自己是个天才家，只有组织不好，甚至采取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的办法来达到个人的私欲，不了解自以为能便是无能，自满就是不满。

丙、一切都从个人愿望出发，不是根据客观实际的要求，自己想怎样便怎样，把希望与可能当成现实，不了解由可能到现实的转变中间是一个艰苦的工作过程。当遭到失败的时候，更不虚心检讨自己而归罪于客观。

丁、不了解工作发展的规律，在工作中是由无到有，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规律与领导方式。

以上四点其思想根源，根底上是个人英雄主义的具体表现。所以这是观念意识上的问题，看不起群众，看不起上级与下级，只作不听，只说不看，好简单，怕麻烦，以致使工作未能达到应有的效果。

（三）如何克服缺点，求得工作顺利开展？

必须从观念意识上做起，克服错误就应首先深刻认识其错误的严重性，才能克服它。

甲、关于党的领导问题。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无产阶级最高的组织形式，应该领导其他一切组织，而不是包办代替，是要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来实现领导。对政权与群众团体的领导，是通过党团经过党员的活动及党员的模范作用去实现领导，党委和党的机关没有权力来直接命令政权及群众团体。因此就必须纠正过去对政民领导上包办代替的现象。

党是无产阶级战斗的参谋部，对无产阶级的领导要掌握政治原则、路线与政策，才能起核心领导作用。这就是说各级党委应成为实际的领导者，不应成为法定的领导机关。所以，各级党委与各级领导机关，必须很好的研究党的路线及政策，才能使党起保证作用与核心作用。为此必须：

1、健全党委的领导机关，实现党中央一元化的领导，还要吸收军政民的主要负责干部参加党的领导机关，在数量上质量上都要加强。今后濮、范可经常保持三个以上的党委〔成员〕进行经常工作。这并不是说让三个党委〔成员〕整天坐在机关里，他们的领导责任在经常了解情况，讨论问题，总结经验，保证工作顺利的进行，防止错误的发生，更要建立各种制度及具体分工，实现领导掌握全面工作。

2、建立与健全县区政权及抗联的党团工作，以便实现党委的领导。党委应定期的布置工作与检查工作，而党团本身要定期的向党委做工作报告，以便建立党对他领导上的正常关系。

3、建立与健全县委的民运部门，适当的抽调干部来充实这一部门工作。如无专责干部，可由抗联主要负责的党员干部兼任。

4、濮、范两县都要有一个公开的党员出现（在群众中有威信的），宣传党的主张，扩大党的影响，解释党的政策，使群众对我党有一新的认识，以解群众对我之疑团。在一般情况下不代表县委，仅以党员面目出现。

我们应该了解，党的政策与政治主张都是公开的，只有组织是秘密的。我们应广泛的对群众加强宣传与教育。

乙、关于政民工作队取消（3个学校的）建制，统一于党的领导的问题。今后工作取消，各个单位的界限打破，所有干部统有〔由〕县委分配，无论哪一部门哪一地方的干部，都要安心的去长期坚持濮、范工作。

无论在何地都是同样的工作，只有站在对敌斗争，发展我们的力量，解决群众问题上来看才是对的，站在个人进步上也是对的。因为〔只有〕在广泛的群众运动中才是我们的实际大学。

丙、关于政府对民主民生工作的态度与责任。政府必须将目前的民主民生工作当成自己的中心任务。过去部分干部认为是群众工作，政权只是配合，这是错误的。但这并不是包办代替群众团体，更不是与群众团体混为一谈，各人应该站在自己的岗位。必须作到

的几点：

1、张贴布告，翻印有关民主民生的法令。

2、认真将行署建立调解委员会的训令实现起来，建立各级组织来调解民主民生中发生的纠纷。我们应密切配合这一工作，个别干部只机械的按法律处理问题，结果给群众头上泼冷水，今后应当注意纠正。

3、处理民主民生中发生的问题时，必须站稳立场，更多的采取仲裁方式与调解方式。

4、应当求得村政权的初步改造，应创造一套适合区政权领导村政权的办法来。

丁、群众团体必须将民主民生斗争当成自己的中心工作，从这一群众运动中达到名符其实的群众团体，不是少数工作人员的独占机关。应注意下列四点：

1、在群众运动中，群众干部应站稳自己的立场，不是站在群众之外来替群众解决问题。所以，工作员便是群众的一分子，言语、行动、服装必须群众化，坚决克服“我是群众团体干部，你是老百姓”的观点，否则便会遭到王先生到农村去一样的失败。

在工作中不放松对我党主张的宣传与教育，在行动上必须以群众意见为依据，与群众共甘苦。我们的意见还可在斗争经验中去通过，如此善于领导群众，才能成为群众领袖，绝不是站在旁边说风凉话，自充高明的人所能取得的。干部政策上要看干部与群众的联系如何而定，不是依据我们对干部的要求。

2、发动与组织群众是广大的农民群众，而不是其他。在这次民主民生工作中，不但整理与改造过去的，而且要大量开展与建立新的。必须知道，没有广大农民的彻底发动，要想建立其他组织是不可能的。农民组织是群众组织中的中心一环，目前应抓住组织农会，其他组织（青、妇等）必须在下列条件下才能建立：

①中农以下的绝大部分农民已参加了农会。

②农会不仅有了一套，还能接受任务，自动推进工作，解决内

部的一般问题，在与地主斗争时基本上取得胜利。

③农民妇女及青年有了独立组织的要求与必要时。

在这三个条件成熟时，可提出青年、妇女的单独组织。必须经过一定的手续，经过支部讨论，得到分区委的同意。区要成立时，分区委讨论，县委批准；县则经过地委批准。在农会条件不成熟而过去有的青会、妇会不应削弱。不能单独工作时，可在农会中设青、妇小组，注意培养其工作能力，作为将来正式建立青会、妇会的基础。

3、既定以建立农会为主，则应认真研究村农会的组织形式、工作方式以及上级对下级的领导关系。

4、彻底研究一下区农会对村农会的领导方式。

戊、武装问题

抓紧目前群众相当高涨的武装情绪，提高一步。在整理自卫队中建立游击小组、模范班，〔使其〕逐渐走上抗日斗争。在民主民生斗争中去建设人民武装。目前解决的问题：

1、整理组织。自卫队，打更坐夜，解决支差问题。

2、建立与健全自卫队、游击小组，接着是模范班、青抗先，由防匪锄奸，慢慢提高到抗日斗争。

3、武器问题。把富家的枪动员到自卫队来，一方〔面〕自卫队有了武器，而且可转移枪口对外，并应领导群众改造与使用旧武器。

为了解决人民武装的武器问题，濮、范可成立炸弹厂。

己、建立军政民联席会议，以解决相互配合上及彼此间的关系问题，求得工作上的协调与顺利开展。

贰、应如何使用力量？

（一）用打堡垒的办法进行工作（即工作要有重点）。一个是找出首领村（即复杂的，问题多的）进行工作，去影响其他；一个是在一村从头到底，着重创造经验，再传播到其他村子运用。为什么呢？

甲、为了同敌人争夺时间，选择重点，集中力量做个彻底。因为在时间上的宝贵及环境的紧张，必须求得全胜与速胜的办法。

濮、范两县工作虽都有重点，但范县是将这一环抓住了，失掉了链子，对整个工作抓的不紧；濮县的重点是带脚的，随着工作任务跑，放弃了重点村，是抓住了链子放松了环子。

乙、基本区应站在发动群众的观点上来打堡垒，传播经验，不是孤立突出的。正是为了全面工作的迅速开展，应抓住中心环子推动整个链子，但不要过分强调打堡垒，使之发生另一偏向。在纵深的工作里，须注意工作向全面平衡发展。

丙、如何使用堡垒

1、把堡垒作到名符其实，以此村去影响周围地区的工作。干部要多而强，以便打开堡垒影响他村，并吸收经验介绍给他村以为参考。但传播经验是根据其地区的具体环境的需要，而不是机械的搬家。

2、堡垒打开后，应抽调干部到其他地区工作。在工作中应注意提拔干部，培养干部的能力与信仰，以便继续支持工作。打堡垒时不能集中力量是不对的，但过于长期的集中也是不对的。

3、濮、范干部已抽走1/3以上，今后更要掌握堡垒，用打堡垒办法领导全局。

干部减少了，中心村是否可减的问题，是值得考虑的。

（二）干部问题

甲、干部决定一切。只要把堡垒的情况已经估计了，办法及干法也足了，则一切决定于干部。干部使用的好坏，则决定工作的快慢与好坏。所以，应选择基于干部（群众观念与组织观念较好）去掌握堡垒，并配合次要干部人数，先打大堡垒，然后抽出去再打小堡垒。要使工作作到“一步一个脚印”，克服过去干部走工作也走的错误。

乙、新干部的发现、培养与提拔。我们应该知道，工作中没有大批土生土长的干部和与群众有密切联系的群众领袖，我们的工作

是不易作好的。为了培养与吸收本地干部参加当地组织为领导骨干，我们应注意：

1、如何发现干部。在每一个群众运动中都有他的群众领袖，那就必须注意去发现并善于选择一个统一的群众领袖。在统一的领袖未产生之前，要很好的去注意各个积极分子，适当解决他们之间的关系，发扬自我批评的空气。如其中有党员，应起模范作用，使他团结在党的领导下共同工作，加强教育，防止内讧，使他们了解团结就是力量，并在他们中间找出统一的领袖来。

2、如何培养干部

①选择的条件：A、与群众有联系的。B、能够牺牲个人利益服从大家利益的。C、成份好，说真理的，顽强不屈。文化低些没有关系，只要培养与教育他也能成为最好的干部，因为他的立场稳。

②首先培养他的威信。教育他们一些具体办法及总结一些经验，培养他们的团结精神与工作能力，注意他们的英雄主义脱离群众的倾向。要以广大群众监督他，开干部会、小组会，倾听大家的意见，少数服从多数，注意不要“老妈妈坐飞机似的只顾抖起来”。

③培养干部的办法。可以开短期训练班及工作中带领积极分子一同检查与布置工作，以便从实际工作中去培养与教育。

3、提拔干部。原则上是慢慢的来，任务不要过高，给他学习时间，不要随便调动，以免影响干部情绪。区应注意多提拔不脱离生产的干部。

叁、在领导中应建立的几个制度

（一）四个月来领导上的经验教训

甲、几个经验

1、确定任务前的准备工作，必须考虑总的任务是什么，当前的具体任务怎样干。应预先进行调查研究，了解主客观力量如何，时间多久，工作怎样配合，各种工作的关系。否则，只是一般原则是

不会解决问题的。弄清情况作好准备工作，一方〔面〕根据工作需要，一方〔面〕根据下面意见。

2、旧任务检查总结与新任务的提出。

3、如何开会与搜集材料，无准备与不提出问题、不解决问题的会就不开。

4、作一村不巩固战果就转移，结果那村没成，这村也凉了，不能巩固胜利。正如“狗熊掰棒子，掰一个掉一个”。

乙、几个教训

工作队开始时所提出的任务过高，是主观主义的，原计划两月，结果用了四个月。转变村的优势那7个条件是不对的，达到了这七条只不过有了工作基础。

提出急行军是不对的，结果完不成，应该提的任务少些。如濮县的教训，是在减租工作中来准备减息，但减租已结束，减息还未调查出来。

（二）领导者应有的责任

甲、调查研究情况决定任务。

乙、过去干的什么？现在干什么？将来做什么？预先来布局。
常说：“吃不穷，花不穷，计算不到就受穷。”

丙、我干什么？大家干什么？我怎么干？大家怎么干？

丁、总结工作，传播经验。

（三）建立几个制度

甲、会议制度。县委应将常委会与执委会定期召开，好好分配时间。

乙、建立检查制度。上级检查下级，亲自去或调来；同级互相检查，下级检查上级。

丙、总结制度。应一个工作一个总结。大队部做了，但各同志自己作日记都未作总结，这样不能将自己提高一步。希望同志们今后更多的注意，不仅是上级要求下级，而是自己要求自己。

（根据信锡华同志传达整理）

冀鲁豫边区抗联关于 改善团体领导的指示

(一九四三年)

自从各救会改组抗联以来，各地团体在统一团结上，在深入工作上以及各部门关系上均有了很大的进步，因此在大部分地区开展了普遍的民主民生运动，发动与组织了大部分群众，奠定了进一步发动与组织广大群众的基础。然而由于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遗毒，由于对各群众团体性质、任务与各方面关系缺乏明确的认识与恰当的解决，由于团体组织不健全与团体内部民主制度未确实建立，尚十分严重的妨害着群众运动的开展与妨害着群众团体进一步发展成为群众自己的自愿组织，形成一个伟大力量，因此抗联特作如下决定：

一、各救会是群众自己与自愿的组织，各团体在性质与任务上虽有些差异，但其组织都是独立的，其任务都是保卫群众切身经济政治文化利益，组织团结广大群众，教育与提高广大群众文化政治水平，并领导群众参加抗日根据地各种建设。因此，团体应有自己的组织任务、工作方式与日常工作，与各部门的关系，必须明确解决。

政府是根据地的权力机关，是代表全体人民利益与领导全体人民抗战建国的机关，因此我们必须遵守政府法令，拥护抗日民主政府，协助战争动员工作，而不得违犯法令，不得代替政府捕人、审讯、征粮、罚款，形成二政府的错误。

政府除保护与帮助群众团体工作外，也不应干涉团体的内部事宜（在不违法的条件下）。

八路军是边区人民的子弟兵，是根据地的有力支柱，因此团体应拥护与爱护军队，帮助军队作战，优待抗日军人家属，不得代替军队扩兵、催粮，形成军队支差机关；军队也不应干涉团体组织与工作。

但是与党、政、军的工作又必须密切配合，统一步调，达到团结一致、巩固根据地的目的。

二、广大的群众尚未发动起来，我们大部分干部对农村和农民了解与联系不足，因此今后各级抗联应将调查研究农村具体情况与各阶层群众的要求及其变化当成经常工作之一，并以此作为发动、领导群众与决定政策、任务的主要根据——在了解中要有重点，要细致，要经常及时，并掌握其变化特点，向上级及时汇报。

这是团体领导作风的特点，是决定团体工作任务的主要依据，是考验团体领导正确与否的主要标志，是克服团体领导上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的首要办法，而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倾向都是目前各级团体领导上的主要缺点之一。

三、团体的活动，主要是广大群众的活动，团体工作的好坏决定于村级工作的好坏。目前广大群众尚未发动起来，大部分干部主要应切实的、经常的进行村级工作，这是各地进一步深入群众、团结群众的重要步骤。因为脱离村级工作，即必然的脱离群众；不会作村级工作，即不能领导群众前进。在领导村级工作的方式上应注意：

- 1、在开始发动群众的时候，可用自上而下的方式（必须与强迫命令区别开）进行了解情况、宣传鼓动群众、发现积极分子的工作。当部分群众已初步形成组织时，就应通过这一组织领导此村工作，转为自下而上的方式，绝不可在形式上通过，实际上包办，继续以亲自出头为快。

- 2、在群众已经发动组织起来的村庄，一切问题由村会决定，一切服从村会决定。一方面在村会中积极发表我们的意见，求得大多数通过执行，一方面应协助村会解决村会所不能解决的问题，绝不

可包办代替。在群众已发动起来的村庄，应尽一切可能培养村级组织能力，区抗联要经常指示检查工作。

3、一个区在大部分村庄群众已发动组织起来时，为培养提拔群众领袖，巩固群众，可由下而上的召集代表会议，正式成立区救各团体。目前干部包办群众斗争，代替村会组织现象十分严重，致使群众不能很好的发动与组织起来，使群众不能形成自觉的组织力量和地方干部无法提拔。区干部长期包办村会，群众情绪时高时低，因此区会如何领导村级工作，必须迅速改正〔此现象〕。

四、团体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实行民主集中制是改善领导的主要环节，因为过去未贯彻执行，成为过去产生各种错误的基本原因之一。过去无组织无纪律的极端民主现象，或主任代表制，少数操纵现象已使工作受到不少损失，今后除进一步加强干部与会员的民主教育，克服封建等级观念的残余外，必须树立集体领导与〔建立〕一定的制度，建立各级团体的日常工作。

1、一切问题必须由一定组织决定，如果发生争论时，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解决之。因此必须有定期的常委会，在委员不能全部出席时，县以上抗联必由3人以上，区会、村会必有过半数常委出席，才有权力决定比较大的问题。在村会中一切较大的问题（如新工作的决定，干部的选举、罢免等），必由村委会提交会员大会通过才可执行。

2、一经决定，每个委员必须无条件的执行，如保留意见时，可于下次会议提出重新讨论，不得故意违犯决议。上级决议下级必须执行，如有原则不同意见，须经上级团体允许后方能修改。

3、下级团体须定期和及时的总结工作，向上级团体汇报工作，并应不断的在书面或会议上正式提出对上级团体的批评，上级团体必须诚恳的处理，并经常检查、帮助下级工作，征求下级意见。目前村委会应定期向会员大会报告自己工作和随时总结斗争结果，以发动群众监督干部，防止新贵产生。

4、县干部调动必经总会批准，区委员和区各救主任调动，必经

分会批准，下级团体如有新的原则性的决定，必须上级团体允许后方可执行。

五、抗联是工、农、青、妇的统一权利组织，不是取消青救、妇救，使抗联变为农救。目前以农会为主，不是以农会统一各救会，故根据目前工作发展阶段，为开展青年、妇女工作，特决定：

1、首先应认识青年、妇女工作是充分发动群众与巩固农村统战的必须工作，过去认为开展农运与青年、妇女工作间是机械的两阶段，取消村青救已使工作受到损失，是应引起警惕的。

2、县以上抗联必须执行边区各救会关于改组抗联的决定，不得任意调动青年、妇女干部，或把青年、妇女工作推到青年、妇女部，或一直不管。

3、区级各救组织应是：

①群众开始发动，青、妇工作甚差的地区，区抗联可参考县以上抗联的组织性质和任务，执行自己〔的〕任务。

②大多数农民在部分村庄已发动起来，青、妇救已在少数以上树立工作时，本区抗联应指定适当数量的青、妇干部，以青、妇救面貌用力量进行青、妇工作。而区抗联应负责对青、妇工作的领导，并推动全体干部发动与组织青年、妇女。

③群众开始发〔动〕，多数农民已在大部分村庄发动起来，抗联的性质、组〔织〕、任务，应按各教会的改组抗联决定执行，以便于进一步深入青年、妇女工作。

④群众开始发动，过去青、妇工作尚有一部分基础的地区，区抗联性质、组织应按边区各救会决定执行。但抗联应统一讨论农、青、妇工作，统一使用力量，通过村会发动农民改进原有村会工作，以逐渐由下而上改进农民与青年、妇女的组织与工作。

六、改善以上领导是发动群众与转变整个领导的关键，县会以上的团体不转变，则一切都是空谈。因此其领导方式应注意：

1、在一区一县范围内，大堡垒未打开，群众情绪未起大的转化，干部经验缺乏，或新的任务布置时，应着重具体帮助一齐搞村

级工作。

①以分区、县区为单位均须有重点，不得平均或乱跑（如×分区已受到损失）。上级团体除传达决议、检查工作外，应以当地组织为主实现领导，并可参加同级委员会共同决定与推动工作，但应注意推动当地组织并多提供意见，培养当地组织的能力与威信。同时应及时将工作进度向当地或县抗联（如分会帮助区村时）汇报，不得包办一切，把什么都垄断起来。如××县工作，分会干部包办了，已使工作受到损失，应引起警惕。

②帮助工作必须有计划与具备三个目的：

甲、帮助下级具体实现上级决议。

乙、锻炼自己，培养干部与下级组织的领导能力。

丙、总结经验，推动全区工作。

2、工作局面已打开，干部经验较丰富时，主要应及时检查总结工作，及时指示其工作发展方向与具体办法，必要时具体帮助解决比较大的或新的困难，将各级正规领导制度与日常工作逐渐树立起来。

3、在领导单位多的地区，除抓紧重点外，应：

①及时将重点经验传达给其他地区，这不但是学习最好办法，也是一个重要领导方式。因此总会决定加强《工作研究》，各地干部都有向《工作研究》写稿件的义务。

②必须及时了解该地情况，抓紧时间研究指示该地工作。某些地区分区、县干部钻到村会中，对其他地区分、县会领导不管不问是不正确的。

③在重点打开后，于可能条件下，应以一定时间具体帮助其他单位，不得死守重点，形成孤立。

七、因根据地分割和游击性增加，特决定：

1、个别游击县经总会批准后，可提高其工作权力（在总方针下及时决定任务，调动干部，然后报告），但必须定期向上级团体报告工作，取得密切联系，不得放任不管。

2、分会可增添需要干部辅助工作。泰西分会在不违背总会规定方针下，可决定本地区工作任务与县干部调动，但事后必须报告总会。

八、各分区、县抗联，要根据此精神与各地具体情况，检查过去领导，有重点有中心的改善自己〔的〕领导。

冀鲁豫边区青年抗日救国联合总会 对一九四四年边区青运任务的指示

(一九四四年二月六日)

一、根据边区群众运动的总任务，今年边区青年运动的任务是发动与组织广大青年。在全边区是以“发动青年”为主，在某些发动起来的地区，应及时进行巩固工作。各县区应根据当地工作情况确定自己的主要任务。

今年（秋收前）基本区的青年运动，发动青年的中心问题是展开民主斗争，巩固组织的中心问题，是开展生产运动，但切忌把中心孤立起来，脱离和其他工作的联系。因此，在发动青年与巩固组织时，应正确认识以下三点：

（一）青年的责任在学习，故教育青年是青救会的基本任务，是一个经常的工作。

（二）青年是热爱民主的，必须把民主精神贯串到青年日常斗争与日常生活中去，以提高青年的自觉性与积极性。

（三）青年也热爱武装，应及时掌握青年的武装要求，开展青抗先工作。

总之，要把中心工作和其他的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切实掌握青年的要求，把青年运动开展起来，深入下去。

二、发动与组织青年问题

去年7月已有详细指示，希重新加以研究，并参考《工作研究》2、3期上的两篇文章。在此只提出以下几点：

（一）过去半年来的青年工作，有了不少收获，但也存在许多缺点。在此特别指出的，就是在开展青运中发生了严重的“阶段

论”观点，直至现在还在不少干部中存在着，致使农村抗战与青年工作受到很大损失，并影响到整个群众工作的开展和影响到农村的□□。这些痛苦的教训，应引起今后高度警惕。

(二) 在开始发动农民时，就应注意青年工作，发动农民青年参加斗争，在斗争中锻炼他们，并注意培养青年领袖，划分青年小组，设立青年委员，作为建立青救会的基础；到农民初步发动起来，就应建立青救的独立组织，及时建立区县青救会。

(三) 发动与组织青年，首先要掌握民主斗争的中心环节，争取青年的抗日自由，否则就很难或不能进行青年的武装、生产与学习。因此，对青年争取抗日自由的民主斗争，必须抓紧开展，打破家庭束缚，反对恶霸欺压，并争取参加社会活动，以提高青年在家庭中、社会上的地位。但同时应注意农村团结与家庭团结，并与生产和学习结合起来，或很快的转入生产工作，以团结家庭及争取社会人士的同情。

(四) 什么是青年发动起来的标准呢？

1、提高了青年的民族觉悟与民主认识，多数青年自觉的参加了斗争，相信了自己的力量。

2、初步改善了青年的政治经济生活，取得了抗日活动的自由，开始提高了青年的地位。

3、大多数青年，自动自愿的参加了青救会，会员能爱护自己的组织。

这几个条件和农民工作是分不开的，不能把它孤立去看，不够这些条件的村会，应该继续发动。

三、巩固青会的组织问题

青年在发动和组织起来以后，应及时的进入巩固阶段。

巩固青年组织的中心，是开展生产工作，其次是继续深入青年民主斗争，强调青年学习，加强青年教育与改进青救会的组织领导，以进一步满足青年要求，改善青年生活，使青救会组织更进一步为青年服务。关于生产工作以后详谈，在此只谈：

(一) 继续深入民主斗争

1、应随着青年工作的发展与青年民主要求的提高，继续深入民主斗争。在青年发动起来以后，已提高了民主认识，增强了办事能力，应进行青年参政的工作，参加村政权的选举，参加村代表会、村政委员会等，去关心与管理村里的事情；并展开广泛的社会活动，参加各种抗日工作，继续提高青年的地位；再随着整个工作及妇女工作的开展而提出青年婚姻自主问题，直到摧垮封建制度的下层基础——家长制度，求得青年的彻底解放。

2、把民主的精神贯串到一切工作中去。不论在学习、生产中、武装斗争中以及青年日常生活中，都要随时注意青年的民主要求，解除青年所受的压迫与苦闷，以发挥青年的积极性。同时在青救领导上也要高度的发扬民主作风。

(二) 强调青年学习，加强青年教育

1、教育内容主要有三：

一是民族民主教育。在民族教育上是坚定民族立场，鼓舞胜利信心；在民主教育上，是从其日常斗争与生活中进行反封建的教育，并在青年思想上为战后作准备，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罪恶行为，深入新民主主义教育，使在共产党的光明旗帜下，走向新的中国。

二是进行生产教育，提高生产热忱和互助精神。

三是进行组织教育，提高青年的组织观念。至于文化教育，亦应经常进行。

2、冬学结束后，应建立青年夜校或青年识字班，继续青年学习，并应注意文化娱乐工作，加强对农村剧团的领导。

(三) 改进组织领导

1、在领导上要克服包办代替的官僚主义领导，高度发扬民主作风，深入了解情况，具体帮助村干部，培养村委会的独立工作能力。

2、健全村的民主生活，建立民主制度，选举真正为青年所爱戴的领袖到村委会去，并开展自我批评，以此为团结进步的武器。

3、会员小组的划分，基本上应根据青年的要求和工作的需要

亦即斗争任务的需要。因此，在发动青年时，是进行民主斗争，加强青年团结，必要〔须〕将贫富青年混合划组；而到青年发动起来，一般的解决了青年团结问题后，就应做必要的变动。在生产工作中，应以劳动互助作为划组的根据，使组织形式能适合于斗争任务的需要。

四、今年上半年的三件工作

（一）扩军工作

扩军是边区上半年的中心工作，扩军对象主要是青年，这就更加重了青救会的任务。各级青救应坚决保证当地扩军工作计划的完成，并加强与党政军各救的配合。

如胜利完成扩军工作，必须继续深入拥军运动、提高抗属地位，造成青年参军最光荣的热潮；再具体确定对象，找其知心的青年伙伴去鼓动，解决其思想上的疑难，提高其政治认识，使其了解青年参军是最光荣、最模范的；并配合政府及各救解决其家庭一切困难。

在扩军工作中，要反对一般化与老一套，创造与运用青年化的工作方式。不仅在鼓动工作时要说出青年心里的话，在欢送时，也应广泛运用青年所喜欢的方式，如召开盛大的欢送会，锣鼓喧天的欢送他，让他骑马或坐轿，排着队喊着口号，一直送他到新兵招待所。在这盛大的欢送中，提高青年参军的情绪，深入拥军运动，并可杜绝参军后逃亡的道路。

（二）生产工作

在群众发动起来的地区，应大量的开展生产运动。青救会应动员广大青年积极参加生产，并在生产运动中巩固青救组织。

青救领导青年生产，有下列几个内容：

1、普遍号召深耕勤锄多上粪，提高青年的生产热忱，争取青年在生产中的模范，并号召青年儿童拾粪、种树、养鸡及进行家庭副业，以求在青年的积极生产中，提高青年的地位。

2、在群众发动较好的地区，配合农救会及合作社共同组织劳动互助（以家为单位），组织“合伙合俱”；并可有重点的进行安

家计划。

3、号召青年积极参加合作社，并可在不妨碍家庭生产的条件下，组织青年的集体生产组织（如范县张庄的□红薯芽子组）。为广泛开展生产运动，应创造劳动英雄（青年与农民一样），以提高群众生产情绪。劳动英雄的条件，主要应是群众公认的劳动模范，具体说应包括以下几点：（1）是模范公民；（2）是群众生产劳动中的模范；（3）是生产运动的推动者与组织者。

劳动英雄的创造，应□□□的进行。抓紧劳动模范而给以教育帮助与鼓励，提高其生产的计划性与积极性，提高其在群众中的威信，逐渐提高其为劳动英雄。企图开始就发现吴满有那样的劳动英雄，而忽视培养创造的观点是非常错误的，我们应在长期生产中创造之。同时企图创造样样皆好的劳动英雄也是很困难的，我们应分别其特长创造之，如农业劳动英雄，制盐劳动英雄等。

至于儿童不必叫什么劳动英雄，可创造儿童劳动模范，如拾柴、拾粪、养鸡、种树等儿童模范。并注意儿童劳动模范的条件不要忘记了学习。

最后特别提出，要在生产工作中，加强全体青年干部的劳动观念。因此应亲自动手，帮助群众生产及进行机关生产，在生产中改造自己，丰富自己的生产斗争知识。

（三）庆祝“五四”中国青年节

在青年已发动的地区，应号召广大青年庆祝“五四”青年节，以三、四两个月青年参军及生产工作的成绩，及武装对敌和学习等实际活动，来迎接“五四”青年节（另有指示）。以上三大工作，应正确掌握其彼此间的联系，使其密切结合起来，在进行以上工作中，求得青救组织的发展与巩固。

五、抗先工作与儿童工作

（一）青抗先工作

过去一年对抗先工作放弃领导，半年以来又是严重忽视，致使青抗先工作未得到应有发展，使青年运动受到不少损失。今提出以

下几点意见：

1、大量发展青抗先——在保卫生产的口号下，动员与组织积极分子青年，建立青抗先，开展对敌斗争及保卫群众资财。

2、基本区的抗先会形式，今后除在反“扫荡”的实际战斗中锻炼外，平时有两大工作：一是保卫生产，维持秩序；一是加强军事教育，提高青年尚武精神，锻炼青年身体，如下操、瞄准、投弹演习、野外演习与夜间演习等。否则，平时没有锻炼，战时必恐慌发抖，质量永远不会提高。但应注意，军事活动不要妨碍生产。

3、各级青救会要加强对抗先工作研究与领导，并加强与同级武委会的配合。

（二）儿童工作

半年来的儿童工作虽有了某些开展，但在青救领导上仍是采取了自由放任的态度，使其自流发展，对儿童斗争中的“左”倾现象和儿童团的工作内容漠不关心，致使儿童一时发动起来而停滞不前，失去了方向。今提以下意见：

1、发动农民的开始，就应注意以文化娱乐活动去组织儿童。发动儿童也应该注意进行争取抗日自由的民主斗争，并与学习、生产密切结合着进行。

2、儿童的任务是学习，儿童团的主要任务更是教育儿童，培养新社会的主人。我们应掌握这一最基本的中心工作。在儿童发动起来以后，要大力动员儿童入学，配合政府解决儿童的学习困难；对实在不能入学的儿童，可实行半日制、间日制的上学和进行组织教育；并普遍运用文化娱乐的方式进行儿童教育，创造儿童学习模范。

3、对校外儿童应鼓励他们参加生产，辅助家庭劳动；创造儿童劳动模范，也不应忽视儿童学习。

4、儿童团的组织：村为连，几个连为一营，一区为一团，团部受区会的领导。

六、欲完成以上任务，必须转变领导，改造干部

（一）克服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与英雄主义，加强干部的群众

观念，深入青年群众，成为其中的一员。把自己的感情和青年群众的感情结合起来，群众哭了自己也流泪，群众笑了自己也欢笑，和群众在一块斗争与工作。只有向群众学习，才能教育群众。

（二）克服主观主义的领导，了解下层情况，深入了解阶级关系与青年生活，从青年群众的政治经验与切身要求出发，去实现上级所给的任务，把两者具体结合起来。

（三）青年工作越开展，工作内容越复杂，如武装、生产、学习、文化娱乐等各种工作，我们都应去领导，因此必须加强自己的学习，丰富自己的知识，提高自己。此外，随着工作的开展，需要大批的干部，因此大批提拔与培养干部，就成了边区青运的重要任务。

冀鲁豫区党委关于党对群众 团体领导关系与组织的决定*

(一九四四年二月二十日)

关于各级抗联性质与各教会的关系，已讨论决定，并由边区各救总会公布。关于今后各级党委对群众团体的组织领导关系，区党委决定如下：

1、区党委设青年运动委员会（简称青委）与妇女运动委员会（简称妇委），在党委领导下，专门研究边区青年运动与妇女运动的方针、任务，及总结边区青年运动与妇女运动的经验。在目前，地委以下都不设青委与妇委。

2、为了专门总结群众运动的经验，研究与决定群众运动的方针、任务及某些重大原则问题，在县以上各级党委下设民众运动委员会（简称民委会）。民委会可由同级各教会、合作社主要党员干部组织之。同级政府党团负责同志，必要时亦可参加。人数由5人到11人。民委会书记，由党委委员（一般是民运部长）兼任。

3、在抗联未改变性质（由集中的权力机关改变成配合机关），即工农青妇各教会未恢复独立组织时，抗联设党团；但在已经改变抗联性质与恢复各教会独立组织时，为了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与充分发挥各教会的积极性及适应各教会的特殊性，取消抗联党团。县会以上的各教会，因驻会委员不多，各教会党团会常不够法定人数（可吸收各救委员参加党团，一切日常工作可由党团书记与党委民运部负责人商讨决定）。各教会召开执行委员会、干部扩大会

*本文原载于冀鲁豫区党委出版的《党的工作》第60期。

与代表大会时，则召开党团会，保证党委决议的彻底执行。

4、群众团体的支部，各教会共同组织一个。

5、各级党委要严格纠正过去对群众团体的包办代替，一切对群众团体的决议，要经过群众团体的党团去执行。对于上级群众团体的决议，下级党委要无条件的保证执行；但上级群众团体之指示，未能完全适合于本地具体情况，下级党委必须在不违反上级群众团体决议原则下，加强对同级群众团体的领导，使上级决议具体化。对群众团体干部的调动，一定要经过群众团体系统去执行。总之，党对群众团体的领导，不要包办群众团体的日常行政；同时群众团体内的党员及党团，要无条件的执行同级党的决议，一切关于工作的重要决定，一定经过党委的核准，方能发出，不得同党闹独立性。

在二地委（原冀鲁豫） 关于发动群众及目前中心工作 问题的发言*

（一九四四年四月二十五日）

黄 敬

区党委在发动群众中的个别指导是没有的，因此我这些意见不见得靠得住。我在最近看见几个村的工作以后，心里很着急。我的意见没有多少根据，没有经过区党委讨论，只供大家去研究讨论。

过去最大的弱点是下面的创造没有很好吸收，而且几乎没有很好注意，都是下面你错了，错了！新贵一点好处都没有。下面都错了，一切是你自己对。你的对从哪里来的？从书上看来的，或者是从脑袋中来。拿什么来批评新贵呢？政治资本又多了，好像高干会的官僚主义的一套都能拿来，但怎样爱护群众的创造是很差的。大家都喊从群众中来，而从群众中来还只是停留在口头上。我仅提出这个问题找出这个方向来向下面学习。今天向群众学习也很模糊，群众是抽象的，群众摸不着。谁是我们的群众呢？县委对地委来说是群众，但我们现在到处说群众不对，现在不敢说群众落后了，于是到处说新贵落后。拿我自己来说，向下级学习这点就很差。

就两个问题说，我们对下面积极东西看的很少，消极的东西看到的很多。我们对自己积极的東西看到很多，消极东西看到很少，

*本文系记录稿，未经修改。后发表于中共冀鲁豫区党委1945年9月30日编印的《群运指示汇编》。

这就是整人不整己。我们是要拿工作中存在的好东西去克服工作中存在的坏东西，不然你有什么基础呢？今天我们到下面去检查，是根据上面来的一套，所以一看就这这也是毛病，那也是毛病，下面的这些毛病只是给我们的概念作注解，如“可不是！没有群众观念”，“可不是！这个违犯了领导方法的那个原则”，而不是从具体的分析得来的，所以中心区工作的转变就很迟缓。用原则来看，指出的缺点一般都对的，但是能不能解决具体问题呢？就要打问号！问题在哪里呢？就在于我们检查工作不是从实际分析得出来的结论，而是先有结论再找现象的。但是这影响到工作，使工作不能引起很大的转变。我提起这个问题，我们大家要警惕这点，这样下去，我们的工作就积重难返。检查工作在许多地方还是单纯自上而下，先有结论，把现象作为结论的注解。用任何结论来找现象是都能找到注解的，如张青营的支部那么坏，如果先有结论是百分之百布尔什维克化了，我们也可以来找到事实去证明；但一找到证明后，主观的结论就更加定型，更加固定化了。事实上村里的问题不一定这样，结果我们就很容易脱离实际，群众希望是这个，我们偏要做那个。为什么和群众接不上火呢？我们认为要做的，并不是群众要做的，先有定见，换句话说，就是从主观出发。这是我们工作态度上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走马看花，于是把更深入的亲自下手调查研究，就看得不重要了。我们好像也得到了新的东西，其实不然，还是没有什么转变——我感到这是我们本身的毛病（这个主要是我自己的一个反省）。我为什么没有亲自下手？就是觉着我的结论很对，自己感到很深刻，结果周密的进行调查研究，从头到尾的个别指导就忽略了。究竟这些工作在自己工作中占了多么重要呢？就是疑问。我口头上承认个别指导重要，实际上没有认识，认为自己这样跑一跑，也能解决许多问题。这个主要是我的自我反省。

拿这个时期发动群众来说，群众在今天确实得到很大利益了吗？你说群众得到一些吧，他也没有得到；你说地主削弱了吧，那又没有削弱；你说搞得很坏吧，他又有些成绩。群众工作很沉闷。

今天给了新的任务，新的任务就转不上去。生产吧，群众根本还不知道生产在哪里。区级干部、群众不凑他，他一来，群众就走，对他非常冷淡。〔在〕这种冷淡下，号召生产运动，怎样能动得起来呢？如果只说“这是中心，不然就要丧失时机”，但你是不是能搞起来？生产运动并不是把粮食种在地里就行，而是要能组织起来改变一个生产的样式，要使和过去的生产有显著的不同。如果能做到，能把生产改换一个样子，这才能成为中心。对这一点我是悲观的，能改换吗？肯定是不行的。生产是不是群众的要求呢？当然是。但群众是不是相信你换呢？这是怀疑的。再说群众是不是有信心进行集体生产呢？具体的在你这个农会长的领导下，群众说：“搭伙谁不知道好，但人心不齐怎么办？”“买卖好做，伙计难搭。”这就要说明，我们群运究竟是不是达到了这个阶段。今天农民的个体还是照样，你说让他组织起来，但他还没有看到组织的力量，因此生产是搞一些，但做中心，就要怀疑（中心是要能动员最广泛的群众力量）。我感到这就是发展生产的最大障碍。今天我们不是要农民生产不生产，而是怎样去生产——变革生产关系。当然，这中间还有很多问题，贫农没有土地，没有贴底粮，没有吃的，没有种子等问题，如把生产中心〔放在〕大量搞劳动集体化，这个口号是过早的。生产内容究竟是什么呢？10亩地种1亩棉花，那可有什么值得我们做为中心呢？而劳动集体化在全区大部地区要落空。因此，我认为生产今天不能做为中心，什么时候把障碍解除了，什么时候才能做为中心。但生产是不是要搞呢？能做地一些，还要尽量地做，并不是说生产就不要了。生产要做，但不是今天的中心。

群众为什么对我们这样冷淡呢？一小部分跟地主，一小部分跟新贵，大部群众是观望的。这个两头小中间大又是脱了节的，没有联系的，有时还是对立的（这和领导方法决定上的三种人不同）。今天这三种人方向还不很明确，为什么这样呢？我感到今天对工作对新贵还要重新估计的。为什么会搞成这样呢？我考虑有这么几个问题，群众运动不透彻。我感到在发动群众中有这样几个倾向（我自

己也有)：第一，多少有点怕得罪地主(特别是怕群众来得罪地主)，基本上我们有个怕群众的观点，怕群众做错了。事情还没有做呢，就说：“不要错呀！”好一点的是提醒一句，更差的是“你别搞了，让我来搞”。区干部把村干部踢在一边，村干部把群众踢在一边，上级怕下级错，一直支配下去就要代替斗争。为什么这种倾向在边区没有得到纠正呢？就是我们往往以为自己的动机好，而麻痹了自己隐蔽的黑暗的一面，以为自己是对党负责，光明正大。我感到这种态度从上到下，连区党委也都有。所以群众问：“这事能办不能办？”我们干部回答说：“你等等，我问问区里去。”就是要群众等我问了以后你再动，群众没有感觉。粮食埋了不对，应该分吗？一提就是你等等我问问，下面的创造性就束缚住了。这个我们不要只认为是村里新贵的问题，新贵从哪里来的呢？他们成份并不比我们坏，新贵首先就是从我们自己本身来的，首先就是从我“人家没有做，我就怕人家错”〔中来的〕。

等人家用你的意见做或他自己做了的时候，当然会有一些毛病，(谁又有不犯毛病的呢？)但我们又不是用鼓励的态度，或是走个样子给人看，给他揉〔揉〕痛苦，耐心地帮助他，而是迎头一棒。做了以后，就是消极的批评。批评的根据是在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上，这样看起来群众的毛病当然是很大的。拿一个抽象的标准去看一个新生的力量，怕群众弄成什么结果呢？就是怕创造，结果就创造不起来。只看到消极的黑暗的一方面，没有看到积极的一方面，做错了，也只是消极的批评。这是自己在领导方法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其实，新出来的东西，好像一个小孩拿成年人来比，他是很幼稚，有很多缺点；我们不要拿最高的标准去要求他。怕得罪地主，就是怕人家在策略上犯错误，但开始时有很高的策略水平是不可能的。问题〔在于〕我们对群众的缺点采取什么态度。另外，怕得罪地主，从政治观点本身来说是右的。地主卖地，我们为什么怕他卖地，为什么可怜他呢？他“黑地”粮交不起或是反贪污粮交不起，为什么可怜他呢？一方面怕群众不能掌握策略，所以领导

上抓的紧。但领导上并不是要自流，而是不要在人家还没有行动时就说错了，（这是唯心论的，不在行动中怎样能知道错和对呢？）总希望把群众教育好了再斗争，这就是国民党训政时期的理论。这中间我们各人都有错误的认识，不过程度不同，这就出来好多论调，所谓教育万能。究竟你认为对的是不是真对呢？这还是个疑问。如查“黑地”，指示分果实的问题，主要应由我来负责。人家还没有把粮食到手，就怕他乱吃掉，只觉着自己比群众高明。为什么不把粮食交给群众以后再搞生产呢？这就是要叫群众跳一步。再说由会员团结非会员，这不是更高一步的想法，从希望出发，他没有走就叫他跑，你那个东西在抽象上是正确的，在解决实际问题上就有了问题了。由这里来找就有很多问题了。当然，这个指示也不是说全都错了，但分果实为什么就没有执行呢？这里面我想大家也要好好反省一下，在研究过去群运中反省一下自己在思想方法上有什么问题，不能说都是新贵不好，你一拳我一脚，这样新贵就太倒霉了。怕群众犯错误，这是群运没有发动起来很重要的原因之一（下级对上级说都是群众）。为什么发生这个呢？原因很简单，就是自己不犯错误，再刻薄一点，就是自己比别人高明，轻视群众，自己是个先生态度，教育者的态度，不向人家学习的态度，只对上做学生，不对下做学生，归纳起来就是从抽象的原则来要求人家符合他的原则，用尽美尽善的原则去处理问题。这个问题，我们大家再反省一下，我们提出意见是根据什么？是根据他的能做不能做，还是从一个抽象的标准？如果用抽象的标准来看，马克思和毛泽东也能找出一万个缺点。认识干部，认识下级，都是有一个抽象的框子，你如果找，是没有一条满意的；自己则是策略家、战略家，结果群众的要求，群众在斗争中的新创造就吸收不进来，真正群众的斗争，他还没有看到。□说“群众力量伟大”，但结果是群众不知道东西，一切是从我来。干部中的言行不一致是我们的很大弱点，一套套能讲，但不解决实际问题，名词知道越多就越难转变。现在发动群众为什么比抗战开始要难呢？原因之一是现在都有一套很多名词，

没有从前谦虚了，总感觉自己很高明。形式越多，就越障碍他接近新的事物，认为说来说去总脱不了“集中上来，坚持下去”。这说明今天教条主义的毒中得相当的深。因此自己自负，对下面的事情不注意，自满，只看到消极的，看不到积极的，或是只看到积极的，看不到消极的，来回在这两端动荡。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在这个问题下面，就产生了好多具体问题。

果实处理问题，大部没有处理好。这果实包含很多减租减息，保证不退佃也是果实，不取消零件也是果实，要地主不改换形式向农民进攻，就是取得果实。如何巩固果实？现在很多是丧失了或变相丧失了（应享受的没有了，有报酬的没有了），没有巩固住，又弄回来了，果实就难于巩固。同志们在这些地方比我更清楚。濮范观群众是不是起来斗争了呢？是起来斗争了，但是果实呢？却没有分。为什么要种树呢？是为了开花。假如果实都叫别人弄去了，不是白闹一场！让果实都烂掉了不分，结果再种树就没有兴趣了。胜利品没有很快的为群众得到，或者埋在地里，或者让地主拿回去，没有及时分配果实，没有巩固住果实，果实一般来说是没有处理好，这就是超功利主义的表现。问一问究竟群众为什么嗷嗷叫呢？他是因为肚子饿，他的斗争是要达到一个目的。而咱们的目的，好像和群众的目的不一样。如有的干部问：“发动群众究竟是个手段呢，还是个目的呢？”在我们干部中像是个手段，还是要利用群众，把群众发动起来，达到我这个目的，不是为群众的。为什么粮食埋的那么久，而群众饿的锅盖揭不开，而我们还不着急呢？减租的果实，为什么不注意巩固呢？就由于我们不管群众的目的，“成败利钝在所不计”。什么是巩固工作？就是巩固我们已得的胜利，巩固群众的利益，如把这个内容抛掉，巩固工作就成了单纯的选举，而不巩固已得的果实。所以，去年提出巩固工作以后，群众工作反而消沉（当然区党委本身有毛病，对群运估计过高），这样巩固工作就成了形式主义的巩固。以后区党委提出检查工作，要去找果实究竟跑到谁手里。在执行检查工作中有好多毛病，区党委没有抓紧追，各

地没有强调果实究竟到谁手里，没有抓紧解决许多的悬案，特别是没有把检查工作成为群众性的检查，还是自上而下检查，没有成为一个行动。我们这种不在行动中检查，不在行动中巩固的倾向，直到现在还是存在着。群众有毛病没有？是有的，但是一定要群众在行动中才能得到教育。俗话说：“打兔子是打跑不打卧。”群众只有在行动中才能暴露他的弱点，才能得到教育，而领导者不从行动中也不能向群众学习，集中不上来，这样就要脱离实际斗争的内容。斗争达到一定目的，又没有去巩固果实，这样群众积极性焉能不消失呢？群众就要起不来，群众的创造性没有发扬，领导者本身就不能丰富自己。每开会时都是那一套，“官僚主义作风还没有转变”，这些要求还是没有做到，别人也照例说“原则很对，实际做不到”，如此局面就要打不开。

第三，对地主的反攻没有给以应有的反击。地主的反攻从两面来的，为什么能反攻呢？地主利用了两个东西：一个由于群众积极性没有保持住，没有充分发扬起来，群众消沉下去，这是地主一个利用的东西；再就是利用了我和群众的脱节，干部开始在孤立。地主就抓住这两个东西，在这两个基本〔东西〕上来反攻。当然地主任什么时候都想反攻，但能够反攻不能够反攻，却要有一定条件，所以今天对复辟问题要强调干部问题，强调干部和群众的联系，把反对复辟当做群众性的问题来解决。如果只是用强迫的压力，□□□也还是新贵的办法。行政的处罚也还是要的，但是行政的处罚，要建筑在群众的斗争基础上。所以今天对于运用政权力量要有正确认识，不从群众性的基础出发，就要成为官办，就要认为自己是站在群众之上。因此地主的反攻在某些地方得到成功，表现于他得到了一部分群众，群众都说他是好人。地主争取群众的工作，我们要很好的学习。如彦村铺的当权地主黄成太刮着大风送新战士，牺牲点暂时利益，来保存永久利益；如把自己的地一顷多当给穷人，救穷人，这就得到了群众的拥护。地主反攻一成功，群众的情绪就更加消沉。反攻胜利，群众消沉，干部孤立，就更加增加了地主的反攻

资本，于是我们的阵地一步步往后退，地主就能一步步向前进展。再就是我们对反攻的态度有很大的毛病，没有用自我批评的精神检讨自己，没有看到地主反攻在我们内部的原因，前期我们是单纯打击地主（压干部），后期知道了内因，但对自己的反省不深刻，感到这是下级的问题，别人的问题，下级又有下级，但今天又不能说群众落后，结果村级干部就受到三面夹攻（上级、下级、地主）。新贵流□不利，所以，强调内部原因中还有宗派主义观点，舍己求人的态度，新贵因此就不能心服。检讨起来区党委是有毛病的，但下级也不能因此就把责任全推到上级。向来中国的传统对上则是“逆来顺受”，上面反新贵越厉害，新贵批评群众也越厉害。为什么新贵反不掉呢？“整人不整己”，结果人也整不好的。严格说来，新贵就是官僚主义倾向，这个优先权，不应先摆在村干头上，应先摆在自己头上。反新贵为什么落空呢？这就是原因之一。光叫下面说，〔不〕首先反省自己，而自己不脱裤子，光叫下级脱裤子，结果还是流于空谈了。反官僚主义倾向，都没有着重从自己反起，这样反常的现象就来了。我们越不进行自我批评，下面的错误也越难纠正，结果领导与群众就越难结合，成了干部的蛮干，少数人着急，多数人不着急，我们老以为自己着急是对党负责，总以为自己着急下级不着急，反过来，下级也觉着自己着急上级不着急，这样领导就和群众脱节，走到不正常的状态。于是，工作没做好，责任在人而不在己，下面的好处就越来越少，下面的坏处越看越多，而对自己的一套就越有信心，结果下面的创造就越看不到，越脱离实际。这个问题还没有引起我们的警惕，我自己就犯这个毛病。我在高干会中对边区一年来的创造很少表扬，甚至把创造较多的也打下头了。但高干会到下面传达后，领导方法上也没有引起一个转变。为什么原则对实际转变慢呢？就是化不了，就是从积极方面总结边区的经验少，鼓励少，由此领导上许多问题就停留在口头上（如反官僚主义，巩固工作，检查工作）。一要行动，就要表现干部的蛮干（如濮县东牛桥把着会场不准群众走，实行民主实际上是对民主的

讽刺)，不满足于空谈时就成为蛮干。下面好的东西上不来，领导机关的领导从什么出发呢？从一般出发，还没有到村，就有了斗争计划，还没有情况，就有了计划，还没有具体就有了抽象，这都是领导上的反常现象。领导机关的一般号召，往往没有足够的根据。此外，一般号召有了，怎样使他向个别转变呢？这个转变中，今天我们到村工作往往把群众看作一堆，只有抽象的群众，没有具体的群众，群众中的个别问题不给他解决。我们领导机关可以订出×月×日要同时实行减租，而减租究竟和每个个别怎样结合，就很少注意。所以，我们的斗争口号对群众来说往往是抽象的东西。我们忘了一个东西，我们农民是个体的生活者，养成了很大的自私自利性，也养成了其个别的很大特殊性，所以发动农民中，首先的一个问题，是照顾到私（他首先看到的个体），使他沾光。他参加农会是为了解决他的切身问题，越能满足他的切身利益，也就越能使他逐渐认识阶级，认识组织。如先要他公，是不可能的。提高农民觉悟也就是这样。农民不敢斗争，也是因为他只看到自己，没有看到别人。所以，一般与个别的结合，在农民运动中是更重要的。鄂北的合作社搞起来，就是因为他从自己的利益中看到了公。我自己过去对这个问题了解不深刻，满足于抽象的解决问题。

总起来说，发动群众的毛病，就在发动群众又看不见群众（看的不大真，没有真正看到群众），总起来说，就是群众观念的问题。问题也就要从这里解决，不要怕群众，只有群众动起来，才能向群众学习，不然教条是打不破的，真正群众的发展趋势是看不到的。

今后意见：

〔第一，〕我有这样的提议，目前一般不以生产为中心（并不是不做生产工作），今天的生产〔中心〕问题还是民主民生工作问题，主要还是解决悬案，生产工作才能做好。贫农的生产，先要处理果实、贷款，如不把领导和群众关系弄好，就不能好好的分配。我的意见暂不以生产为中心，继续作民主民生工作，而在这个期间，要附带解决生产问题。村中究竟怎样做，我们今天还不肯定，这是要看村中

今天障碍生产的是什么？解决了这个障碍，继续来弄生产。根据中心区情形，今天生产的障碍没有全除去。生产的障碍，一个是农民的封建束缚，再就是群众政治上对集体还没有自信的时候。因此，我们要在民主民生工作中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再有即是生产中的准备工作，改变农民彼此之间的关系，即是组织起来的精神。我们不能在前一个没有解决的时候就跳到后一个去，这是跳不过去的。怎样做？一句话，是从实际出发。今天中心区一般情况，群众处在消沉状况，村干部比较孤立，生产工作做为中心是搞不起来的（这是根据最近以来的几个汇报而来的，究竟在每个具体县中怎样办，还须看具体情况）。去年年景不十分严重的地方，要搞生产就要搞集体化，但我们到村中去还要看村中的实际情况，不要先有定见，具体的县区村要从该地的具体情况来定。

第二，要强调个别指导（从区党委起到下面各级），但我们不要只看“指导”二字有兴趣，要知道个别指导也就是向个别学习。我提议区党委专搞一个县，这问题回到区党委时还得好好研究；地委本身也应这样；县本身也要集中力量搞一个区。我们上下级要来一个竞赛，看是地委搞的好，县委搞的好，还是区党委搞的好。个别指导先由区党委自己作起，学习则要向下级学习，下个大决心来突击一点，创造经验，不然的话，我们还是会始终有恃无恐，说话总是非常圆满而秩序，下级的好处就看不到。只有到群众里面去，才会对自己有个真正估量。这个问题要提起我们的注意，边区全党要认真执行领导方法的决定。

第三，改变我们的观念，要走着瞧，不要人家没有行动就说人家不行，就是要在行动中来看究竟是谁对。不要怕群众犯错误。当然我们也不要故意去犯错误。群众只要动起来，不要怕他而限制他的行动，究竟谁错还是值得考虑。这个观点在我们干部中应很好树立。

第四，克服干部中的片面索要观点。这种观点，就是从愿望出发，减租中也有这样，要群众你干这，你干那……这就是单纯自上而下的方式，是片面索要的具体表现。这样一级级脱离下去，一级

级的片面索要。我自己就犯这个毛病。这就是不发扬群众的好东西，倒过来说我们给群众的东西，就看做是恩赐工作方式，就必然是包办，如意的人就很少，对群众就是利用的观点。所以减租减息〔中〕当我们能给群众时，工作还能搞起来，而现在地主把果实要了回去，恩赐也赐不彻底，于是村中发生两种倾向，一是群众没有得到东西，于是他看到的就是失去的东西，党员就要被迫作模范，于是一层层的强迫群众就出来了。党员中一种是硬抓群众当模范，再一种就是鞭打快牛，谁积极谁到霉。这两种党员都是难能可贵的好党员，如我们硬说他是新贵，也是难忍的，问题在我们自己还有问题。但这种党员还是很少的，农村中的有些党员，就把这套原封不动的向群众索要，他自己不作模范。因为我们领导上脱离了群众生活向前发展趋势，农村中的党员也脱离了群众生活的向前发展趋势，群众还可以照他原来的式样生活，但党员不行，他有党的纪律在管着他，就鞭打快牛，党员赔不起，抗日抗穷了。党员又不能照群众的生活式样生活下去，也不能照上级的式样，于是发生了他的两面性，形式上是你的式样，暗地里搞鬼，于是贪污等问题都来了，这又是产生新贵的一个原因。这就是我们片面的索要观点，脱离了群众的要求。

村中的积极分子出来了这三种，一种是撑劲不沾光，一种是消沉“落后”，再一种就是撑劲又沾光。新贵有什么可恨呢？他又不是地主，又不是富农，也不是奸细，他还是基本群众，因此村级干部就相当为了难。照群众式样生活呢，是家庭观念；照我们来办呢，他又顾不了家。因此对新贵现在还不是惩办打击的问题，而是如何检讨自己，加强帮助他们，单纯从愿望出发，动机不会好的。这个一般不是从具体中来的，因此也就不能回到具体中去。

什么叫做积极分子，要搞清楚。〔对〕积极分子是不能把他和群众脱离来看。他们积极，他是群众中最先进的，又是最能和群众联系的；积极分子，比谁都干在头里是对的，但还要紧紧的联系群众。积极分子，他比谁更能，带领群众上来看，这不只看愿望，还要看效果。

冀鲁豫、冀南行署关于 减租增佃几个问题的决定

(一九四四年七月七日)

各专员、县长、办事处主任：

在边区租佃关系上还存在着一些不正常现象和一些未解决的问题，所以经过减租增佃后，各地不断发现地主非法辞退佃户事件，使佃户生活受到严重威胁。其次，在租佃关系中（特别是小种地）还存在着繁杂额外剥削，如打水、扫院子、走亲戚、泥房子、喂牲口、出粪、锄〔鋤〕草等，使佃户担负许多无偿劳动。第三，减租增佃后，地主强制佃户出差，增加无偿劳动。第四，有些地主为了反对增佃，把带有奖励生产，提高佃户生产积极性的老规矩取消。最后，在副产物的批〔劈〕头上，小种地多未按规定增佃。根据以上情形，为进一步贯彻减租增佃法令，切实解决租佃关系中的现存问题，特作如下之决定：

甲、关于非法退佃问题的处理，确定的原则：

一、因减租增佃地主解退佃户，不合修正土地使用暂行条例之规定者，应一律复佃：A、已另找新佃户者，地主并应以同样之土地出租于新佃户；如事实不能时，应负责赔偿新佃户一季以上两年以下之损失。B、另雇雇工耕种者，地主对于雇工不能辞退，如事实不能雇工时，应给雇工一部或全部之工资。

二、地主出卖或典当土地，未履行土地使用暂行条例第20条之规定手续，地主应负责赔偿佃户一年以下之损失。

三、地主出卖或典当租期已满之土地，买户仍须出租或雇工经营，原佃户有佃种或被雇用之优先权。

四、以破坏租佃关系为主要目的所为之一切行为（如出卖典当收回的种等），均得依佃户之请求宣布其无效并延续其租佃关系。

五、在过去减租增佃后，地主辞退佃户，当时虽经政府处理，但不合于修正土地使用暂行条例之规定者，得根据地主佃户任何一方之请求重新处理。

乙、根据边区情况，小种地（伴种地）在柴草分配上尚未实行增佃，一般习惯是分柴不分草，草随牲口走，而柴的范围又限定太窄，逐年加深，极不合理。为此规定：

一、柴的范围（即什么是柴）除依习惯之规定外，应将豆秸麦秸两种按柴计算（有的地区按习惯计算柴），过去某些地区只将高粱秸、玉米秸算柴是不适当的。

二、草归喂牲口的一方（习惯分草者从其习惯），柴按正产物分配比例分配。

丙、在种佃关系中（特别小种地）尚存很多额外剥削，为了彻底取消并照顾土地生产，应该是：

一、佃户除参加所佃土地生产外，其他地主家庭的一切零活，如打水、喂牲口、扫院子、泥房、拉土垫庄子、走亲戚、锄〔耪〕草、出粪等，均为额外剥削，应当取消。但为照顾地主劳动力之缺乏，对于有关生产之出粪、锄〔耪〕草、喂牲口等活计，经双方约定佃户可以担负一部或全部，但须给佃户适当之报酬（如管饭、给工资等）。

二、禁止地主无代价着佃户替支差，但如管饭、给工资雇用佃户替支差者，政府不加干涉。

三、佃户因生产向地主所借口粮的高利贷剥削，应严加禁止，违则依法处理。

丁、为了增加生产，改善地主佃户关系，各地原有的带有奖励生产、支持佃户生产力的老规矩不能取消，如：

一、垫底粮不得取消，地主无理取消者应立即恢复，实行补发垫底粮。

二、开锄粮（或称借口粮、把锄粮）不得取消，仍须按旧办法办理。

三、开锄饭、钉镰钱、四季饭、打平和、过中秋节等习惯均应保持，以利生产。

戊、本决定适用冀鲁豫边区。

冀鲁豫行署主任	晁哲甫
副主任	徐达本
	贾心斋
冀南行署主任	孟夫唐
副主任	王任重

冀鲁豫、冀南行署关于 赎地问题的决定

(一九四四年八月十一日)

二、三、四、五、六、七各专署、县政府：

冀南由于敌人残酷的焚杀掠夺及天灾的袭击，造成民国32年以来的空前严重灾荒，且延续已有2年之久，广大人民〔为〕生活维持（特别是贫苦农民），因而典卖土地求生者比比皆是，但土地典卖之价格为数寥寥（有的几个窝窝即换地一亩）。此种土地变动，显非一种正常现象。兹为保护贫苦农民不丢掉土地，能渡过灾荒生活下去，在照顾农民统战原则下，根据冀南当前具体情形，特决定此种土地买卖与典当之回赎原则如次：

一、本决定适用于民国32年以后灾区灾期土地之买卖及典当，以前之土地变动情形不得援用。

二、同等阶层富力相等买卖之土地得改为典当关系。

三、地主富农买中贫农之土地，准由卖主按原价赎回，如买主尚未耕种一季者，由卖主按卖价二分行息归还买主。

四、中贫农买地主富农之土地不得赎回，如买主生活确难维持者，按双方富力情形进行调解。

五、中农买贫农之土地，准贫农赎回一半，一半改为当契。

六、贫农买中农之土地，准中农赎回一半，或一半改为当契。

七、依本决定改为典当关系或原系典当关系者，典当均以2年为限，期满即准出典人以原典价赎回；低于2年者按原约处理。贫农买中农之土地改为当契者，典期得改为3年至5年。

八、非灾区人民到灾区购买之土地，如买主系中贫农且亲自动

手耕种者，准按五、六、七各条之规定处理；如买主系地主或大商人，应准卖主按原价赎回。

九、出卖或出典之土地为青苗地者（麦田或秋苗），收割与负担归卖主或出典人，买主或承典人分受土地收获正产物不得超过20%。赎回土地如系青苗地时，收割及负担均归买主或承典人，卖主或出典人分受土地收获正产物20%。收割时参加劳动者按工资给价或酌量多分。

十、村级干部以贪污得款所买之土地，除犯罪行为依法处理外，该项土地应予没收。如卖主为中贫农时，准以原价赎回，地价归公（村款归村处理）。

十一、汉奸、奸商以不正当所得所买或典之土地，一律准卖主随时按原价赎回。如系以强迫或威胁等方式构成之买卖或典当关系，除土地准予赎回外，卖主所受损失并应由买主或承典人负责赔偿。

十二、土地回赎应由原卖主或出典人亲自经手。卖主或出典人死亡或□出无音信者，除直系亲属外，他人不得代赎。

十三、卖主或出典人承典人双方同意愿将卖地或典地改为正常买卖或典当关系者，准按目前市价找补，重立新约。

十四、贫苦农民赎地无钱时，在买主同意下改为借贷关系，三分行息或改为典当关系。此项典地出典人有承租权。

各专县应根据地区不同情形，划定灾区范围，灾荒期间，并具体讨论布置，深入到一村一户，土地回赎应根据地区性质（基本区、工作薄弱区、接敌区）以不同方式执行之。如个别区域仍未摆脱严重灾荒（如水灾蝗灾），经专署讨论得缓期执行。本决定的基本精神是以调解方式进行工作，如调解不成立时，由政府负责处理（但须很好征求村干及群众意见）。在执行中所发现的问题及获得经验，专署负责收集报告行署。

冀鲁豫行署主任 晁哲甫

副主任 徐达本

冀南行署主任 贾心斋
 副主任 孟夫唐
 王任重

继续贯彻大胆放手的领导方法*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日)

万 里

八分区自大胆放手的领导方法提出后，经过一个时期的实践过程，对包办代替的领导有了些克服。因此，各县群众运动有较普遍深入的开展；但群众观念的建立，是很不容易的事，所以大胆放手的领导方法贯彻还是不够的。其主要表现在：

一、我们过去是站在群众之上来发动群众的，对群众的领导关系，多是站在指挥的地位上，实行片面的说服，群众是被作为一个“阿斗”来摆布的，领导者从群众之中来集中意见，服从群众多数来决定问题，是不大经常或不能这样去做的，因此就形成严重的包办代替。自从提出大胆放手强调相信群众后，由于过去包办代替的领导方法所纠缠，一般同志是不容易接受和转换的。以后由于某几个区或村放开手后，群众的确也能自己决定问题，解决问题，自觉的热烈斗争，完善的处理了斗争果实，因此大家才以为放手是可以的。但由于长期包办代替，对群众的创造、群众的力量还没有足够的信心，开始是“放手”不“放心”，对群众的行动，如履薄冰似的小心的注视着，稍有与自己所思所想不合者，即来“说服”群众，“启发”群众，仍叫群众回到自己所想的圈子里。这里所谓“说服”与“启发”，只是我“说”你“服”，我“启”你“发”，群众的意见是不能启发与说服我们的。因此就只有群众“服”与“发”，如不服不发，则出而包办，使群众的积极性受到很大限

*本文后发表于《冀鲁豫日报》第392期（1945年5月12日）第4版。

制。

提倡大胆放手的压力，使不信赖群众的行动和言论的确吃不开。有些地区真的放开了手，群众真的自己运动起来，并干的轰轰烈烈，简直是翻天覆地，的确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文雅”与“有秩序”。这里就有部分干部（党政军民都有）觉得很不顺眼，他们看惯了旧秩序，对于在急烈的变化着、一向很听说的群众，这时也不如自己的意了，就对群众怀着仇视与气愤，对曾经压榨过群众、罪恶深重的被斗争的顽固分子抱着怜悯，于是大叫“过左”、“过火”、“不要统战”，出来对群众打“拦头鞭”，加以批评纠正，结果泼了冷水，使群众的积极性受到很大的打击。

二、有的把大胆放手了解为重罚大干，以为大胆放手是对党的政策大胆放手，以为向群众进行党的政策教育即为包办代替，产生了领导思想上的“左”，公开宣布，今天的政策与法令有不适合群众要求的地方，只要群众想干啥就干啥，政策与法令是不能限制的，主张“头大帽子长”，把政策法规与群众对立起来，大有认为过去群众发动的不好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政策与法令限制了似的。因此在斗争中，个别村庄或个别地区发生不论错误罪恶大小，把开明分子与顽固分子分不清，把守法地主与一贯违法的地主分不清，以致对斗争对象的处理发现不适当之处。同时在斗争顽固分子时，让群众把自己的私仇公愤结合起来，进行说理与报复，提高群众为一个自觉的阶级行动，彻底从政治上打垮他，也是不够的；个别县份，又严重的发展到相当普遍的斗争中农，重罚中农，使中农恐慌，脱离了我们。

相反的还有少数干部，则产生另一种唯心观点，把法治与民治对立起来，教条的为法令服务，不顾及目前群众情况与要求，不了解群众执行法令当中的某些毛病基本上与顽固分子故意犯法是不同的，不了解群众起来后有些过火是必然的，因此执法者应当为群众服务，某几个不适合群众大多数要求的法令，应加以修改。他们不严重检讨自己的立场与群众观念，而抱怨群众与抗联，给犯法者以

口实，以抵抗群众的斗争。

三、有的人在大胆放手后，以为不能站在群众之上来领导群众（这是对的），于是便跑到群众的外面，不敢到群众里面去，只站在群众以外来观看（实际看不到真东西）。如一个干部说：“过去我们是演戏的，是导演的（？），今天是看戏的了。”正是因为是看戏的，所以有的跟着斗争，各村跑来跑去，就不能深入到群众中去进行教育组织工作，提高群众。在台子外边看到群众中一些弱点，不能纠正，心中光发急，背后检讨，群众则说我们为“事后诸葛亮”。纠正过急，则泼冷水；不吧，看不下去；教育吧，又因为当时群众内部的情况、思想的变化、觉悟的程度不了解，只能拿几个干巴巴的原则来说，与具体事物距离太远，群众当然不能自觉的接受。因此就觉着“不包办即自流，不自流即包办”，整天在苦恼着。

这些现象，都是没有把大胆放手的领导方法深刻的认识，这是由于领导上及时进行思想教育不够，否定了包办代替的领导方法，但新的领导方法没有建立起来和贯彻下去。关于今后继续贯彻大胆放手的领导方法，有些县已创造了不少的经验，弱点是在不断的克服着，因此有些县里发动的群众确较深刻、广泛，主要的经验是：

（一）从群众之上深入到群众之中，是贯彻大胆放手领导方法的中心关键。因为大胆放手的领导方法，中心意思就是从实际出发，通过群众路线，也即是发扬民主，服从多数的问题。但哪里是“实际”呢？群众多数人的要求与意见即是“实际”，就是要出发的地方。难处就在于我们不了解群众多数的意见是什么，所以常常犯主观主义。为什么不了解？就是因为我们在群众之上，群众不给讲，或者我们不愿听，站在群众之外听不到。我们愿意了解群众多数的意见，要真正的站在群众之中。这里所谓真正站在群众之中，不但在形式上（这也必要），而且在心里在意识上觉得与群众是完全平等的，不是群众的“上司”、“领导人”、“一切比他们强”，而是群众的忠实服务者，是受群众多数意见支配的。有了这

样的群众的立场，我们才能真正站在群众之中，群众也就拿我们当他们中间的一个，群众才会对我们“不外气”，“自己人有啥说啥”。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随时跟群众学习，了解情况，知道大多数人的心情、要求、思想，这才能从群众出发，有的放矢，领导的意见才是集中的群众意见，坚持下去才有充分的群众基础。

(二)充分的群众酝酿，坚决的服从多数，是我们在群众之中最重要的领导方法，这样才能解决不自流即包办的困难。酝酿就是群众的民主启发，也即是积极分子、中间分子、落后分子的变化与结合过程。没有充分的酝酿，中间分子以下的多数群众的要求不会明显，因历史与现在的种种原因，群众开始常常不能吐心腹话。假若我们深入他们之中，耐心的启发与诚恳的关心，再经过积极分子的酝酿，是可以大部分酝酿起来的。没有充分的酝酿，则统一自觉的共同行动不能形成，那就必然形成干部或少数积极分子的包办。大胆放手后的领导，如何促成这种过程，是很重要的问题。这个过程即是我们集中群众意见，我们思想与群众思想结合的过程。这种过程走的对，作的完善，就能克服我们的主观主义。

这种群众的酝酿，开始主要是交谈，干部与积极分子，积极分子与群众，群众与群众，“商量商量”、“嘁喳喳”、“闲谈”、“拉背场”，然后才是我们所习惯的小组会与群众大会。

我们的领导即在群众的酝酿中实现，在群众的酝酿中不断的了解情况，受群众的教育，群众启发我们，我们也不断的集中群众的意见，启发群众再来酝酿，如此不断反复，一步一步提高，群众的决定，即是我们的决定，也即是民主集中的结果。

但有时我们的意见与群众的意见发生矛盾，还有可能是我们的意见正确，多数群众的意见不正确。(多数人意见正确是一般的，经常的，错是个别的。)这种矛盾的解决办法，是无条件的服从多数群众的意见，大胆的跟群众一块走，和群众一块做，把我们的意见还不断的在群众行动中启发，耐心的等待着群众的觉悟。如果是我们的意见不正确，就更应服从群众，在行动中来纠正我们的脑

袋。我们不当以为自己是工作人员，是上级，因此自己的话是“圣旨”，认为服从群众意见就是“丢人”、“失掉威信”。我们除了真理与群众外，是没有不可丢掉的，在一向有统治群众思想的人看来，才会怕“失面子”与“损害威信”哩！

（三）在过去总结、检讨、纠正毛病、发扬优点与传达布置工作时，多是领导者站上面来对下层“训示”的，这种办法也是包办代替、不大胆放手的领导方法。事实证明大胆放手后，群众自己做的比上面推下去的更好些。他们在每次行动后，自己检讨哪里办对啦，就表扬，哪里办错啦，就批评，群众自己的表扬是正确的，自己的批评也是中肯的有分寸的。这种自己表扬与批评的办法，比我们好的地方是具体，实事求是，群众很容易学的具体，改得具体。公认的好与坏，发扬与改正起来就带有更大的自觉性与积极性。群众公认的积极分子，就是群众领袖。

有些区里斗争中农与重罚较严重时，采取了各村干部联席会，各村报告了各村情况，由大家评议谁的好，谁的坏，为什么好，为什么坏。经他们自己热烈的讨论和检讨后，在各村的一些弱点就由群众自己纠正了，好的东西，群众也会自动的模仿起来，这样比我们去纠正人家力量大多了。我们常常总结一大堆缺点和成绩、经验和教训，在群众未做之前即防止“这”防止“那”，给群众划成一个圈子，群众执行起来也很不带劲。这主要是在于没有通过群众自己的思想变化、认识过程，与具体的榜样不结合，群众是奉命执行，不是自觉的执行。

最近县委与地委兴开了一种会议形式——座谈会。这种会议形式是一种民主集中的好方式。会议多是由下边的好坏典型的汇报开始，然后座谈，交流经验，并提出问题大家讨论，大家决定。我们提倡座谈中的争论批评，许多思想问题与组织问题，常常是解决的较深刻具体，会议的总结，仅把大家已决定的东西整理一下就完了。根据最近一年来的经验，这种领导方式是较好的。这种方式的好处是：1、民主，大家有言就发，无顾虑（因为没有总结在那里限

制着大家)。2、表扬与批评联系密切,而且是到会的大多数的批评与表扬,容易公认优点与纠正弱点。如一个同志在未开会前几次个别谈话,均不以为自己的决定有毛病,而在座谈会上,经大家发言后,就深刻认识了自己的毛病,这种力量是相当大的。3、经验交流具体深刻。4、思想便于统一。其弱点是:1、开会时间长;2、掌握不好,容易失掉中心。

(四)大胆放手后,还要及时建立群众自己的领导。这个问题包括三个问题:1、建立支部核心领导,特别以佃雇贫农成份为主的建立支部。2、树立佃雇的独立运动,形成农民运动的骨干。3、培养群众领袖,自下而上的建立群众团体的组织。这三个问题是相结合的,都是不可少的。在此,前二者不谈,只谈第三个问题。

过去对自下而上的建立群众团体的组织,是长期被忽视了的,老是由上而下的委派各级领导机关,也是一种严重的包办代替。包办代替,群众运动就不能真正形成群众自己的运动,群众就不能很快很好的发动起来。不从下而上的建立群众自己的组织,就不能很好的集中群众的意见,我们的领导意见也不能很好的变成群众的意见并很好的坚持下去,党的政策也不能很好的变成群众自觉的政策。由下而上的建立群众自己的组织,经过群众自己的组织去掌握与控制自己,群众运动才能表现高度的纪律性,能及时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如发现偏向和错误,也能及时纠正,纠正又不致于形成泼冷水,打“拦头鞭”。自上而下委派的群众组织,因与群众究竟有些隔阂,所以不能很好的做到这点。在各县工作中,群众运动起来,常常发现村与村、区与区的矛盾,在某些问题的决定与处理上,也常发现村与村、区与区的差异。解决这些矛盾与统一这些差异,经过自下而上建立的群众自己的组织,是一种最好的办法。自上而下委派的群众组织,因对群众的困难与要求体贴不够,就不能很好的负起这种责任。这些问题,各县的特别是濮县的经验,告诉我们很清楚。群众领袖是群众行动与群众组织中的灵魂,没有群众领袖,群众运动就不能很好的开展与坚持下去。群众领袖在群众运动中,

有头等重要的作用。

我们主张：群众有行动，就应该有组织，有组织才能行动，群众行动由一村扩大到一片村（所谓小区），就应该有一片村的群众组织（小区委员会或小区代表会），群众行动扩大到一个区一个县，就应该有一个区一个县的组织（区与县的委员会或代表会）。在群众运动中及时自下而上的建立群众自己的组织，濮县曾创造了很好的范例。濮县已经由小区到区到县建立了各级仝雇代表会，有些区已经正式建立了农民联合会，产生了大批的地方干部与领袖，这些干部与领袖大部分不脱离生产。自下而上的建立了群众团体的组织后，外来干部就可大批的调出，开展新地区工作。

由下而上建立群众团体的组织，要尊重它的独立性，显示它的领导威力。在八分区，现在为了发扬新的群众领袖的作用，强调提出尊重群众团体的独立性，在县以下已提出“群众工作交群众团体”的口号。

总之，大胆放手是一种领导方法，这种领导方法是始终贯彻着群众路线的，即领导主要靠启发集中多数人的意见及靠多数群众自觉的行动的。因此大胆放手执行中，必须有坚强的群众立场，更深入群众进行艰苦耐心的教育组织工作。党的政策是与群众利益更加结合，万不能了解为不需要政策，这是今天应当明确认识的。

站稳脚跟 放下圈子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张霖之

领导与群众相结合说起来很容易，执行起来很困难。真正能实行了这种领导方法的，工作就搞得好；只在口头上喊，在实际上不能实现的，工作就搞不好。

这两者的分野说来很简单，但追起根来又很复杂。前者是以群众为前提，自己完全站在群众之中，成为群众之一员，与群众在一起共进共退，在任何情况下不脱离群众。他不站在群众之前太远，也不落在群众之后，而是站在群众之中，又站在群众之前。他的领导是从群众切身利益与群众现有的政治经验出发，善于凑近群众，善于等待群众，在一道行动中去提高群众。后者是以主观愿望为前提，自己不是站在群众之中，不是群众的一员，而是站在群众之上的“高等人”，或是站在群众之外的局外人。领导不是从群众自己切身利益及现有的政治经验出发，而是从自己的主观愿望出发，自己首先肯定了一个固定的原则与规律，即一种抽象的“是”做为武器，站在说服教育群众的立场上，要群众来服从自己的“是”，要群众在自己划定的“是”的圈子里行动做事。群众的行动稍不如自己所想象的“是”一样时，就认为群众的行动为“非”、为“落后”。这种圈子圈住了自己，也圈住了群众，也圈住了工作，所以这种圈子就成为我们目前工作中主要的障碍了。

这种圈子的来源有两种：一种是单纯的从书本、从上级的指示及别地别人总结的经验中搬运来的，不问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群众的要求、群众的政治经验，硬向群众头上扣，硬要群众接受自己所搬来的那一些主观要求与规律；另一种圈子就是根据现在或过去

一时一地的成功经验，当做了天经地义，丝毫不允许改变的，使所有村庄所有的群众按照自己的经验做事，一丝一毫不能错步。

以上两种圈子在我们边区来讲，前者是主要的、普通的，后者则是次要的、个别的。这两种错误的领导方法共同的特点是，只对书本、对死人、对上级的指示、对别人及自己的经验负责，不对当时当地的群众负责。所以自己的耳朵没有听听当时当地的群众呼声，眼睛没有看看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更没有从当时当地的群众处境去想办法（即为群众设身处地的想办法）。所以我们就常常主观的处于一种“主动”的地位去命令群众，群众则经常的处于一个被动的地位被播弄，结果我们“主动”恰成了被动，我们所要求的，我们要做的事情，常常与群众的要求、群众要做的事情相抵触。这是因为我们想要做的事、想的办法与群众的具体情况不符合。我们只从一般真理出发，只从抽象的“应该”、“不应该”（如某个顽固分子该斗不该斗，该罚不该罚，而不看群众要斗不要斗，要罚不要罚），群众则是从他们的切身经验、具体情况、目前的处境来判断是非，处理自己的问题。我们常以最高标准、跑步的速度要求群众；群众呢，则以目前的可能一步一步的前进。

由于认识与方法上的错误，常感到群众“落后”，“死狗拖不上墙去”。主观上为着群众利益，为着工作，所以“不得已”采取强迫命令、包办代替的工作方法，强迫群众“上墙”，或用一切办法引诱群众入圈。放合作互助贷款，就强迫群众合作互助，不合作不互助就不贷款，结果群众是为着贷款而给我们合作互助。还有群众反对农会长的不民主，要求民选农会长，我们就非要群众查“黑地”（上级给的）不可，否则就不能改选农会长。所以群众为了改选农会长，就答应查“黑地”（查“黑地”是被迫的承认，不是自愿的）。还有群众要反对地主走狗，我们就非要群众查地主的“黑地”，群众不同意，我们就拼着死命去说服，不服不停。总之就是群众不入我们的圈，就不答复群众的要求，不准群众办理自己所要作的事。我们不习惯于从群众目前需要、现有的政治水平出发，在

行动中提高群众，更不善于等待群众（所谓等待不是不领导群众，而是耐心的一步一步的工作）。因为群众的革命事业是建筑在群众自觉的基础上，只有自觉的行动，才能提高群众，强迫命令、包办代替群众运动，群众是不会提高的。这是忘了一般必须与具体相结合。我们不习惯于从小到大（大处着想〔眼〕，小处着手），从低到高（从高处着眼，从低处着手），造成与群众的隔阂。我们来冷静的研究一下，我们多数的同志都是很好的，真的要为群众谋利益，真的要想把群众发动起来，但由于自己立场与方法上的错误（好多是不自觉的），反而脱离了群众，工作没有搞好。然而这种未从群众切身利益及现有的政治经验出发，要求过急过高而脱离群众的这一点，很难为自己所认识。这就是目前主观主义的圈子很难放下，领导上不易转变，工作不能深入的最主要原因。

我们这种主观主义的领导方法来源何在呢？首先从认识上来讲，我们的干部多是知识分子，缺乏对封建社会里残酷的压迫与剥削之亲身的体验，因此，也就缺乏一个明确的阶级立场。由于知识分子出身，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即知识能力的来源存在着很大的片面性。知识分子的知识能力多是来自书本上，片面的强调了书本知识与能力，不知道知识与能力是多方面的，是从书本上（即别人的经验），从自己的实践中、各种各样的生活斗争中所得来的，不了解实践的知识是最真实的知识，实践中所得到的能力，才是最真实的能力。毛泽东同志说：从书本上学来的知识只是一个“半知识分子”，因为片面的强调了书本知识，自然对自己从书本上所得到的那些知识与能力就自命非凡、得之非易、奇货可居了。反之，那80%以上的文盲农民，在我们知识分子看来，自然是无知识无能力的“愚民”。知识分子忽视了广大的农民在阶级社会里阶级压迫下的生活，就是他们实践的斗争生活，他们有丰富的阶级敏感，有在劣势下应付封建势力的知识与能力，同样他们一旦组织起来后，他们也会与封建势力进行斗争，他们更懂得与封建势力斗争的各种策略。这是为我们知识分子干部所不了解

不认识的地方。由于对农民认识不足，认为是文盲“愚民”，那么革命的大事业他们也就“当然”不会了解，更不会领导革命了；

“当然”对他们也就不会放手了，他们的话也就没有听的必要了，革命的大事业他们更不能做主了；我们知识分子服从多数文盲的意见是多余了；我们领导上的不民主，不放手，看不起群众，不相信群众，不服从群众，不执行少数服从多数的组织原则，领导不能与群众结合，当然也就没有甚么奇怪了。这是值得我们深刻反省的。

还有一种人，是只靠自己经验做工作，把自己的经验绝对化，故步自封，同样是看不起群众的。领导不从群众出发，把自己经验当成了圈子，自然领导也便不能与群众相结合了。

其次，在我们的领导上，好从想象出发，从一种最美妙最圆满的要求出发，对下面的工作总不满意，总觉着下面错误多、成绩少，总以为下面干部都不如自己，怕下级错，不敢放手，在工作上、组织上过分限制，束缚了下级的积极性创造性。各级不能发挥各级的作用，造成只对上级负责，不敢从实际出发，也是领导不能与群众相结合的一大原因。这也是值得我们反省的。

再次，我们的干部生活处境与群众的生活处境存在很大的不同：我们是脱离生产的干部，在生活上一般的来讲是有相当保证的，在今天的社会上是有地位的人、被尊重的人；群众呢，在社会上是没有地位的人（在群众未发动的村庄或发动不充分的村庄），他们在农村里仍旧受封建势力的统治与压迫，他们还没有脱离封建势力的羁绊（政治上、经济上）。由于生活处境的不同，所以我们多是从上面，从有权力的方面看问题，想办法；群众是从下层一个无权力的方面看问题，想办法。也就是我们还没有站在群众之中，从群众的现实处境看问题，想办法，尤其是没有站在当时当地自己工作周围的群众处境去看问题，想办法，而常是站在一般的抽象的群众之中，脱离了当前的具体群众。这也是领导不能与群众相结合的另一根源。

最后一个根源，就是我们立场不稳。群众观念已喊了好久，似

乎在群众观念上已不成问题。从发动群众的过程中，才感到树立一个明确的群众观念煞非易事。所谓“代表群众利益”，“为群众服务，为群众的解放事业而奋斗，耐心的听取并尊重群众的意见”，“相信群众的力量与能力”，“服从群众的多数”，常是抽象的，一旦是实际的碰到群众的困难与痛苦，真的为群众服务时，就变了样子，言行不能一致。自己知道农民受封建势力的剥削与压迫，我们应帮助农民从封建势力的剥削压迫下解放出来，但一个村庄没有实行减租增资或减增的不彻底（明减暗不减，明增暗不增），以及地主的无故退佃解雇，自己看到听到封建势力的这种违犯行为，并不感觉是什么了不起的事；但另一个村庄的群众为执行与贯彻政府法令，在减租增资或反退佃解雇的斗争中稍微激烈了些，自己就认为“过分”，怕伤害封建阶级的面皮而大惊小怪的骂群众“左”，“太野蛮，太粗鲁，太不懂政策了”，而恶意的去禁止群众的革命行动。于是发动群众变成一个空洞口号。

长期的处于一个对敌伪残酷的斗争中，强调统一对敌，这是对的，但因此而模糊了自己的立场，而抱着一种超阶级的思想，对于群众的革命行动（如减租增佃及反贪污斗争），认为是“破坏社会秩序”、“不安本分”、“乱民暴行”等错误看法，这在我们的长期对敌斗争而从新恢复了的地区发动群众时，几乎成为一个不可免的现象。这种现象不纠正，群众就不能发动起来。

以上可以看出，我们对于封建势力的关心与体贴都很具体很细致；反之，对在封建势力压迫剥削下的广大群众痛苦之关心与体贴，都很抽象。这种模糊的立场、抽象的群众观念，也就是领导不能与群众相结合的主要根源。只有正确的立场，才有正确的方法，只有完全的站在群众的立场上，成为群众的一员，才能真正的认识群众是革命的唯一力量，才能看到群众的真实痛苦，体贴到群众的喜怒哀乐心情变化，才能认真的关心群众的痛苦，尊重、相信群众，从群众的实际利益出发，真正为群众解放事业而奋斗呀！

我们的脚跟要站的稳，在任何时期都要站在群众的方面，丝毫

不动摇。一切以群众为前提，只要方向对（如减租减息等），群众干，群众在干中一些不可免的错误，应该给以无条件的原谅，耐心的从继续行动中，在提高群众的觉悟性与自愿的原则下纠正错误。我们的领导作用是从群众中找出方向，指出方向，走吗，还是让群众自己去走。事实证明，群众自己会走，而且走的好。

最后再重复的提一下，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基本原则是服从群众的需要与自愿（即一般与具体相结合），服从群众的大多数。服从多数成为制度（自己认为对要服从，自己认为错亦应服从，服从群众是为了团结与提高群众），这就是群众的立场与从群众中来的领导方法。

冀鲁豫分局关于对中农政策的指示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群众发动，从提出大胆放手后，对纠正包办代替，收到很大成绩，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大大提高，这是好的方面。在某些县、区对大胆放手发生误解，错认为大胆放手就是大干，故意制造激烈斗争，否则就不满意，以致模糊阶级，放松了对群众的阶级与阶级政策教育。在村提出斗争“好户”（没有地主富农的村，中农成〔份〕是“好户”），以致斗到中农身上，对中农实行破产削弱，引起基本群众内部裂痕，演成宗派斗争，给封建势力以反攻复辟机会。这是把大胆放手弄成圈子，硬套群众的另一种强制包办。

对中农认识与政策有以下的说明，望各地委研究执行。

中农基本上是一个被压迫被剥削的阶级，他是基本群众（是目前民主革命的基本力量），他不但赞成新民主主义，而且也赞成社会主义，在农村里一般的没有地位，自己从事劳动，这是他参加革命与赞同革命斗争的基本因素，我们绝不能忽视这点。但中农是有缺点的，他还能勉强维持生活，因此在对地主斗争上，不像贫农与雇工那样尖锐与坚决（尤其是民生斗争）。在工作开始（工作不深入，贫农、雇工尚未组织起来时），中农存在着看不起贫农与雇工的思想，对贫农、雇工的关〔信〕心不够，以致对斗争采取观望等（尤其是民生斗争）。这是事实，但不能因此忽视中农，甚或排挤中农。我们对中农的政策是扶植发展的政策，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照顾到他们的利益，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伤害他们的利益。为使贫农与赤贫得到果实，对中农斗争，采取破产削弱，这是挖肉补疮的办法，必须纠正。

在土地分散、没地主没有富农的村庄，统治者多半为中农，他

们的统治是带有封建性（这是因为社会关系）及黑暗的地方（如贪污、瞒“黑地”等，但一般不大——因为他经济不突出，政治压迫也不会突出——不多）。对这黑暗点采取政治斗争，发扬民主进行教育是可以的，在经济上不采取削弱政策（适当的赔偿是可以的），而是共同发展。应以贫农与雇工的领导为核心，把中农紧紧的团结在贫农与雇农的周围，与封建势力进行斗争，共同发展生产（中农在生产上常是很积极的），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

有个别的中农系恶霸，多数群众仇恨，要求大斗（不是我们干部制造，是群众自愿），我们也不能制止群众。在纠正对中农政策上的错误也不能泼冷水，这首先要我们干部明确认识对中农的政策，然后在群众中进行教育，由对中农的破产削弱（这多是我们干部制造，因为中农与贫农没有什么不得了的仇恨，因为我们在土地分散村庄没有强调生产，贫农无出路才乱斗，纠正比较容易），转向团结、发扬民主、共同生产上去，巩固基本群众的组织，才能团结一切抗战力量。

濮县的农民运动 及组织领导的经验*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

黄文

农民联合起来

农民对地主说是一个阶级，村村之间的农民有自然的联系（不仅是阶级的联系，还有亲戚朋友的联系）。因之，农民运动绝不是一个村的孤立的行动，而是广大的农民阶级的联合行动。只有这样的运动，才有力量，才能鼓舞着广大农民卷入运动潮流，争取减租增资等彻底实行，才能在运动中团结起来，成为支持抗战的坚强力量。

然而农民行动起来，绝不是一下子把全个地区全个农民阶级全都运动起来。农民运动是由其中的某一阶层到另一个阶层，以至发展到农民整个阶级；农民运动是由一个村到一带村，最后发展到一区一县。在农民运动中树立佃雇贫农领导骨干，是万分重要的事情。农民运动若没有农村的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作为领导骨干，农民运动就没力量，不巩固。如何把农民统统运动起来，而又有坚强的农村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领导骨干，这是今天边区农运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农民运动在可能情况下，应从佃雇运动开始，因为佃雇运动起来以后，首先便打着了农村封建统治者，使他们低了头。雇佃政治地位的空前提高及其生活的改善，就必然给其他农民

*本文后发表于《冀鲁豫日报》第401期（1945年6月9日）第5版。

阶层以很大的启发及斗争勇气，这样，整个的农民群众就联合起来了。这是濮县农运的一个很重要的经验，兹较简要的介绍于下：

（一）农民运动是包括各个农民阶层的运动，农民中的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佃户、雇工、贫农）运动起来之后，农民中的小资产阶级（中农）便与封建统治发生了裂痕。濮县是以雇佣运动为基础，开展贫农运动，贫农佃雇联合起来，继续运动。这样便发挥了佃雇斗争上的策略性，又发挥了贫农斗争上的彻底性，这样就使农村的封建统治者真正在群众面前低头。佃、雇、贫农在行动中成了农村一个坚强堡垒，使运动深入，把中农团结起来，于是农民都组织起来。农民联合起来，农民运动的领导骨干也一定是佃户、贫农。

（二）农民运动从佃雇开始，斗争和罚了不法地主，贫农看着眼红，愿当佃户、雇工，愿与佃雇平分斗争果实，佃雇和贫农便发生矛盾。这时，便从佃雇运动发展到贫农运动。贫农也斗争，也罚，不法地主卖地，就影响到佃户退佃和雇工解雇，又和佃雇发生矛盾。运动由这个阶层发展到另一个阶层，就产生这个阶层与另一个阶层的矛盾。发生这些矛盾是不可避免的。这些矛盾只要适当解决，农民各阶层就会团结起来，农民就会联合起来。谁看不清这些矛盾，不及时解决这些矛盾，任矛盾自流发展，便会使农民间发生裂痕，不法地主会乘机反攻。

（三）农民运动由一个村发展到一带村庄，发展到一区一县的范围，就会产生村与村、区与区执行政策上的差异及村与村、区与区的矛盾。（甲村斗乙村不法地主，乙村农民怕甲村农民分走果实，产生甲村农民和乙村农民矛盾。一个不法地主好几个村斗，这村农民怕别村农民分走果实，产生好几个村农民和这个村农民矛盾。）发生这些差异、矛盾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各村各区情况不同，政策具体执行也不同；因为不法地主罪恶不仅在一村，有的不法地主恶迹在各村都有，农民觉悟了，不仅清算本村不法地主的罪恶，还要清算他村不法地主罪恶。这些差异和矛盾也不可怕，是可以适当解决的。若是佃雇在运动，运动发展到一小区，成立一小区

佃雇组织，发展到一大区，成立一大区佃雇组织，佃雇有了自己的组织，便可求得政策上的统一，解决各村间的矛盾。若是广大农民在运动，运动到一小区，成立一小区农民联合会，运动到一大区，成立一大区农民联合会，农民联合会便可以解决各阶层之间的矛盾及各村之间的矛盾，统一各村政策。对这些差异和矛盾看不清，不解决，长期政策上悬殊太大，会使农民不满，不法地主抓住当口实，破坏农民运动。长期村与村、区与区矛盾，也会造成农民之间裂痕，不法地主也必乘机反攻。

农民在行动中组织起来，涌出领袖；

农民组织和领袖又领导运动

（一）佃雇运动产生佃雇联合会，佃雇联合会领导佃雇运动；贫农运动产生贫农代表会，贫农代表会领导贫农运动；广大农民都运动，就产生农民联合会，农民联合会领导广大农民运动。农民在行动中组织起来，组织起来又行动、做决议、订规矩，农民运动是有组织的运动。

农民运动始于一个村，发展到一带村、一区、一县。运动在一个村开始，就成立一个村的组织，领导一个村运动。运动发展到一带村、一区、一县，就须要自下而上的成立一带村、一区、一县的组织，领导一带村、一区、一县的运动。自下而上的建立组织，即能涌出新领袖，制定新规矩，统一政策，解决村与村之间矛盾、区与区之间的矛盾、各阶层之间矛盾，使农民联合起来深入运动，约束运动。同时这个组织是在运动中自下而上建立的，农民认为是他自己的组织，所以农民对它特别拥护、爱戴、支持，这个组织力量就非常大，就能集中农民意见，它的决议农民必定执行。因此，原组织（指自上而下委派的农会或抗联）和老干部扶持农民起来后，原组织应及时的和新组织结合，老干部适当的具体的到新组织中去，新组织没有老组织去包办着，就能发挥开力量。

由于农民是好几个阶层，运动又是从这个阶层开始发展到另一个阶层，因此农民运动开始，会出好几个组织（如佃雇会、贫农会），这几个组织才能代表各阶层农民利益。又由于农民是个整体，有统一要求，运动深入，各阶层农民必定都运动，农民各阶层联合起来，这时农民联合会是农民联合的一个极好组织。适应农民运动这两种情况，濮县农民组织有佃雇联合会，这个组织该长期保持；有贫农代表会，最好也保持这个组织到相当时期；有农民统一的组织——农民联合会。农民联合会下分主任、组织、佃户、雇工、贫农5个委员，村小的委员可兼并，村大的委员可设副职。这3种组织，既能维护佃、雇、贫农利益，又能统一维护整个农民利益。

（二）农民在行动前的互相酝酿、互相了解，就有自然领袖。农民行动中组织起来，组织中选举“头”，“头”就是领袖；领袖在运动中涌出来，又领导运动。有没有真正农民领袖，成为是不是农民自己运动的显明标志之一。

领袖的作用除去毛主席告诉我们的3条（带头、桥梁、骨干）以外，农民运动中的领袖刚一出现，对不法地主就是个打击。领袖地位愈高，各方拥护愈力，对不法地主威风的打击也愈凶。拥护领袖也是对不法地主一个斗争方式。

领袖作用大得很，培养领袖工作重要的很。领袖培养绝不是单靠上级“提拔”，主要靠领袖自己活动，群众自然往外涌。一个村的领袖，能解决一带村、一个区群众的问题，就能成为一带村、一个区的领袖。一个佃雇领袖能解决贫农、广大农民及全体人民的问题，就能成为贫农、广大农民及全民的领袖。这是领袖涌出的根本办法。除此外，领导上还应注意：

首先不要包办领袖，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所谓包办领袖，是指在运动中不给领袖职位，或者有了职位是个空的，没有权利，因之领袖就不能发挥能力，也就无法培养领袖。正当的办法是农民组织起来一个小区，选举一个小区的“头”，领导上就给他小区职位，给他小区权利，县、区可类推。领袖有职位，有权利，就能活动，

就能发挥能力、提高能力，就能推进运动。

其次领袖刚出来，应多给以活动机会，多让他解决问题，不要“严格分工”，这会限制了领袖活动。因为一个农民刚刚到社会从事活动，也像在家里一样，谁有事都管，这样领袖作用才能发挥开。再就是多给以活动场合，给领袖以荣光，如开大会献花、献酒，请领袖讲话，特别是政府尊重领袖，如请客，见领袖握握手，会使领袖地位无形提高。

复次，是注意解决领袖困难。农民领袖困难一般有两个：一个是生活困难。解决办法，靠斗争，靠群众，最主要是领导上照顾领袖生产和工作矛盾。应强调一个领袖既应当工作模范，又应当生产模范，一般情况下工作和生产矛盾时，应服从生产。另外一个是不识字、缺乏计划。识字的干部应帮助他们，甘心当秘书，解决这一困难。

最后是既要看到群众领袖长处，又要看到领袖短处。一般领袖短处，是个人英雄主义，对这短处，应用群众改造，领导上也帮助改造。

贯彻大胆放手的精神，农民运动起来

濮县转变了领导，“大胆放开手”以后，农民才运动起来。关于这个问题，有这样几点经验：

（一）大胆放手的前提是相信群众，但在农民运动中相信谁，就是个问题。有的笼统主张相信农民，有的抽象主张老实农民。这种主张在行动中就会使中农成为领导核心，结果农民发动不好，还须再发动。经验证明，在农民中应首先相信佃雇贫农，他们办事最有才能，革命最彻底。农民运动在佃雇贫农作为核心的领导下，对摧垮封建统治、减轻封建剥削才能干得彻底。

确定相信群众的观念，仅有可能使农民起来，只做到这一点还非常不够，必须启发农民觉悟，首先启发佃雇贫农觉悟，让他们倒苦水，想办法，领导上就根据他们的苦处和想的办法，规定政策，

坚持下去；再扶持农民组织，首先扶持佃雇组织，组织起来为自己要求而行动。

农民组织起来就行动，农民在一个村行动，就让农民自己领导一个村，行动发展到一带村、一区、一县，也就让农民自己领导一带村、一区、一县。

目前，“放手”一个村让农民自己干，做的不错，但“放手”一带村、一区、一县也让农民自己干，还差的很。

（二）农民开始行动，各庄农民都根据自己要求，把政府法令具体化，所以同一事情，各庄处理不一样，区与区之间也同样发生这样事情。领导上应认清这都是对的，因为都是政府法令的具体化，都是不违反政府法令的原则。运动深入，农民要求提高，农民组织自上而下的建立起来，农民就要求统一行动，统一办法，互相约束。这时村与村间、区与区间的办法，就可逐渐求得一致。政府可根据群众这一致的办法，订为单行法规或条例。农民在行动中，不但把政府法令具体化，并且充实了政府法令。目前最大的问题是不能把各庄或各区农民的要求、想法集中起来，求得一致，再坚持下去。原因是还没放开手让农民自己领导一区、一县的行动，在行动中统一要求，统一办法，约束自己。

（三）农民行动起来，错误是不可免的，有的错误还很重，如斗争到乱斗，斗上中农；罚款到乱罚，没个准。但领导上不要怕，不要埋怨，也不要放任不管不问，应该看到这种错误，深入调查研究，用具体事实和领袖商量，经过领袖酝酿，形成群众决议，逐渐在行动中改正，诱到正路上来，这样才不致“泼冷水”，打“拦头鞭”。目前最大问题是放开手不管了，任群众自流行动，不深入，漂浮，使运动又走了弯路。

关于冀鲁豫群众运动概况及意见*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

张霖之

一、群众运动演变概况

过去把群运当中心认真执行很少，实际自1942年开始，区党委决定后，刘少奇同志又谈了华中经验，认识上更明确。于是从党校机关抽出500干部组成政民工作队，开展濮、范两县工作。但当时重要的是代替包办，干部下去后代替了地方原来组织。冬天黄敬同志到达此区，开高干会传达北局决议，解决了统一战线观念问题，过去对照顾各阶级等了解是右的。其次解决了群众观念问题，这一点比过去也明确了。

1943年春，二地委召集总结濮、范工作，以为濮、范群众基本上已经发动起来了，同时以为群众未起来以前应强调群众观点，已发动后则强调策略。在这个会议上，很厉害的批判了斗争“干尖肉头”地主——中间势力，事实上是把策略抽象了。以为我们斗争应以（原件自此脱落一行，约21字。——编者）自发斗争中，民众看不见背后操纵的统治者，首先是斗争新起富农等小气的人。故干部指导斗争多是按我们策略要求，而民众接受不了。故我们斗争，群众不要求斗；群众斗，我们不要斗。故当时提反包办代替毫无效果。

1943年冬，高干会以前，怕“左”的思想很厉害，高干会上亦然，因之我们的策略很严，对群众的创造奖励比较少而指摘批评较多。这时群众运动中又有极盛的反新贵时期，领导上自己没有自我

*本文系会议记录稿。

批评，只责备下级干部，于是村干部大倒其霉。这些作法束缚了干部的手脚，限制了群众的创造性。有的同志说：“上级说的，不听吧，党性不好，听吧，执行不通。”八地委及其他地委亦说：“高干会原则太高，执行不了。”当时对群众发动估计过高，实际发动很不够，主要缺点为部分中农及部分雇佃的群运，贫农落后，问题没得到解决。

1944年春贷款，强调了贫农观点，反对怕贫农的思想（过去工商管理部门贷款只给中农，怕贫农不用到生产或还不起）。黄敬同志到冀南后，这一观点更明确起来，回来讨论了我们对中农的态度与认识问题。我们在当时强调了贫农观点，但以为中农不应当排挤，故对组织上的中农领导不能代替，实际上仍为中农路线。如当时鲁西南反映说，生产中民众最需要牛，我们以700万作耕牛贷款，结果都给了中农，反映了支部的情绪完全是代表中农情绪的。所以，当时空谈贫农观点，而组织上是中农路线，故实际解决不了问题，贫农对我们仍甚冷淡。冀南旱荒后，提倡打井防旱，民众无此要求，以为是给我们打的，贷款数目很大，结果仍贷不给贫农，执行不通，“打井不成反成坑”。打井后，我们不让民众种菜，要变为水田，个别民众把地荒了。民众情绪很低，地主反攻，退佃解雇。滑县寺台村佃户20，雇工19个，增资减租后退佃7人，解雇的14个，而不退的很多为明减暗不减。退佃解雇的对农会很不满，说：“斗争时，农会让开会即开会，让喊口号即喊口号，现在解雇了，你们不管。”农会对此所以不关心，即因中农领导。鲁西南曹楼退佃解雇的1/2以上。各地非常严重，村干部以外的人都退了。这时发现贫农问题为很大一个问题。怎么解决呢？我们觉得很苦闷。曹楼调查：地主11户，富农25户，中农98户，贫农199户，赤贫48户（估计鲁西南贫农应当在1/3以上）；无生产力地主3户41亩地，经营地主543亩，富农808亩，中农1600亩，贫农1500亩；人口：地主66人，富农159人，中农520人，贫农981人，赤贫150人。行署统计，冀鲁豫每人平均2.2亩（不对），地主人口7%，土地

26%，富农人口9%，土地15.6%，中农人口□%，地39%，贫农人口35%，土地12.6%。当时我们让贫农开荒地，贷给民众款，结果民众不开，费钱每亩5000元。民众说：“5000元作生意，早好了！”

1944年4月，感到民众消沉，到处都碰到新贵。反了旧新贵，出现了新新贵，以前很好的，成份也很好的，也成了新贵，使我们也很难。八地委召开群众座谈会，对新贵问题有了新的了解，开始检讨领导，对包办代替思想有了进一步的揭发。从区党委的领导开始：（一）为不相信群众、怕群众的问题，说明群众是领导者与被领导问题。地委即区党委的群众，但地委不被区党委相信，地委又不相信县，一切集中到区党委，而区党委了解下层又不够，故毛病很多，这是中心。（二）为生产问题，是违反群众路线的。（三）怕地主，是右的。（四）新贵问题，说这主要是领导问题。黄敬同志自己说是“新贵田”。这次发言对干部思想解决了些问题，否定了生产为中心的方针，承认了对群众运动估计过高，规定重新发动群众。此后，即在此精神下提出“大胆放手”，写了打破消沉局面的社论，提出积极分子问题。当时部分人反对上层，而群众又反对他，这种人是否是积极分子，研究后以为不算。积极分子必须与群众联系，且每个运动有其特殊积极分子，佃雇运动应当有其自身的积极分子。此后，滑县查减运动开展，搞的比较成功，南乐、寿张工作亦有开展，开始打破长期消沉局面。滑县的佃雇独立组织，打下了乡村贫苦民众的领导权的树立，有了新的启发。反“左”的问题，对打□□□的问题，我们以为这个问题没什么，但是否有“左”的问题，我们让他们自己考虑。我们提出的是：1、大动中可能把我们的缺点掩盖了，我们切忌自骄自傲；2、一定要减租减息。下边同志考虑以后（比较明确的说了“要政策不要群众”的思想——彭涛），以为这个问题很大。赵紫阳同志最后以为不是“左”（但下边是反了“左”的）。“扫荡”中，地主未敢动，民众情绪很好。此后毛主席报告，滑县工作总结，给我们领导方法上一些启发。我们又

写了《站稳脚跟，放下圈子》的文章，克服了我们的右的思想，对民众的自发的行动与创造建立了学习的态度。对群众行动，首先问群众为什么行动，在什么经济、政治情况下说的，干部对群众每一句话、每一个批评都虚心研究。

12月时，八、九地委群众行动成为热潮，“300里地战线无村不动”，“无村不斗争，无人不运动”。行署机关干部思想很紊乱，有人怀疑党的政策。干部家庭被斗争的，说群众运动是流氓斗争的。民众说：“知法犯法，罪加一等”，对参议员等都斗争了。

二、群众运动中几个问题研究

（一）贫农观点的确立与土地政策的执行

（原件自此脱落一行，约23字。——编者）了农民问题即土地问题。如无土地，贫农问题即无法解决。所以我们这次群运一定使贫农登上政治舞台，得到经济利益（解决土地问题）。根据这个新的观点，如何执行土地政策呢？感到我们过去对土地政策的了解是抽象的、教条的。过去我们以为如因执行各项政策，使地主卖了土地，即“左”；因公粮问题，不够吃，卖了地，即为“左”。如给土地减免负担很多，民众很不同意。如范县杨某70多项地，公粮一减即2000斤。实际上是保留发展地主，非削弱地主。鲁西南公粮尾欠都是地主的，基本群众尾欠的扣了，而地主欠粮我们无可如何。下级扣了，上级还要处罚干部。因之，我们对于执行土地政策，实际上是右的。

过去我们对保障人权问题认识也有偏向，把对农民保障以后才保障地主的也忘了。过去一般的提保障是不对的，保障人权成了保障地主的护身符。一专署这次参议会还提出保障人权，□下去了。

去年经济会议，给贫农算了帐，争论贫农问题以农业为主以副业为主问题，很久不得解决。后来有人讲了农民问题是土地问题，给了我们启发。但农民买地很贵，约1万至2万元1亩，如何保证农民得到土地呢？后来滑县用了压低地价问题（掌握经纪），觉得尚

是个办法。我们给中心几个地区打了电报，□在民生斗争树立贫农骨干，在民生斗争中使贫农获得土地，反贪污，决定地主不正当收入及其利息一概追回。从此，民生斗争就有了经济的内容。根据这些认识，法令上也有些变更。查“黑地”问题，起初我们提出起模范作用，干部党员报了，上层未报，党员受骂。提的原则为“罚、追、减、缓、免”，罚的最多不超过1倍，提成，追交的归政府，提奖1/10，罚款提40%，而鲁西南未提，民众不满，查的不很多，后改为追罚，民众抽一半。后1944年7月下边提议规定全部归群众，后提出罚款10倍以下（追2年半的10倍）。

地主跑了或卖地，过去即认为“左”，这时我们以为跑或卖地不一定“左”。过去查“黑地”处罚1倍，现在处罚10倍以下。由于以上种种变动，加以毛泽东的报告，□□的土地改革，下级干部都以为政策变了，要土地革命了，大革命的前夜了。如果这许多不变的话，大家就不会发生这样政策变了的认识。

（二）大胆放手的问题

开始大胆放手的提出，是根据黄敬同志提的不敢让群众、不相信群众的错误，反对代替包办中提出的。提出后，很多干部怕群众斗乱了。寿张感觉很苦恼，不信群众能作的很合适。但考虑了过去重点村都工作不好，而有的地方没有专人领导，倒好了。但觉得放手，让民众错了，对不起党。后分区委以小村去自己斗争，开会时偷听。发现起初很乱，后集中了起来；但斗争对象来后，说住群众，群众斗不好；第二天又斗，惩了地主，分委才相信了群众的力量，相信了群众的创造，工作才开始转变。南乐在讨论大胆放手时提出，支部决议、党的决议，群众不接受怎么办？县委指出，如经过说服无效时，坚决执行群众的意见。但大多干部不同意，县委会坚持了这一原则。后来发现群众很多心情与我们是不同的（如民众要给斗争对象戴孝帽子，而我们要褫夺公民权，民众不同意）。这些事给干部很大的刺激（滑县群众要了草帽以后，摇手呐喊，兴高采烈，我们干部则以为太刺激地主），教育了干部。这样大胆放手

的一个时期，得到不少效果。我们参加了八地委的县书座谈会，精神是“什么工作作不好，即是大胆放手不够”，缺乏了分析的精神，我们提出了意见。同时，大胆放手是不讲政策，是大干，是斗了再斗等思想也发现了。这时提出大胆放手是领导方法，是针对纠正代替包办的一个具体口号，不是脱离组织领导。后来分局写了纠正大胆放手中的偏向的问题。以后（群英大会期间）提出大胆放手是贯彻群众路线问题，是“领导组织化”的问题。以为：①大胆放手是“站在群众之中，站在群众之上，站在群众之外”的问题。②大胆放手是少数服从多数的问题。“多数意见对是经常的，而少数对是特殊的”。“照顾少数也必要，在实际工作中解决之”。③建立组织问题。成立小区，以群众教育群众，以群众领导群众，群众影响干部。濮县县委深入村庄，开小区干部会，让一个村报告，大家讨论，这样说服了群众，缺点很容易纠正。④是领导与群众结合的问题。

（三）佃雇独立运动、贫农运动

照顾贫农，各处皆然，但自觉的组织贫农骨干，只有濮县有贫农组织。佃雇运动后，我们提出：“佃雇受封建剥削是最直接的，表现在日常生活中，看的很清楚，故阶级觉悟较高，觉得比贫农还好。同时佃雇要求一致，中间没有矛盾，故把他们组织以后，可以打败地主，但分散后，即易招致地主反攻。雇佃比贫农流氓习气少，土地一转入佃雇，即可以很快转入生产。”故我们主张首先由佃雇作起，采取联合斗争，使地主在这部分人面前低头。同时佃雇斗争后又要与地主一块生产，故其策略性也最高。中央表扬典型，我们更强调了雇佃的核心领导，企图把佃雇成为核心，领导农民反封建。以后黄文到濮县成立贫农代表会，提出单独的贫农的运动，体验了一些东西，钻了很多问题，使佃雇贫联合领导，不同意贫农流氓性大、比佃雇坏的意见。

（四）贫农与中农关系

黄文同志以为贫农比佃雇好，贫农胆大包天。“我们什么都不

怕，就怕没饭吃。”佃雇斗争后，贫农红眼，要求当雇佃，反对佃雇订约长，希望与雇佃轮着干。濮、鄄贫农向佃雇挤地，找农会要求解决他们的问题，使他们起来，他们则要求推平，均地。如何让他们动，即成为问题。研究后觉得2亩地以下的登记组织贫农小组，组织代表会，佃户出粮帮助他们。回去即领导查“黑地”等斗争，然后再吸收中农成立农会，解散贫农会。在斗争中，一个贫农得了3亩地，每天去看两次。濮县一个贫农8年未吃过肉，一个人一生未坐过席，有的无名。“贫农是佃雇的后备军，又是佃雇的收容所”，一生三部曲，为“雇工，佃户，饿死”。雇工1/2一生娶不到老婆。贫农长期贫困。滑县贫农说：“提出好主×他娘，穿粗布嫌拉的慌，光穿绸缎新衣裳。人是一样人，穷人真冤枉，睡下烂草窝，起来破衣裳，走来走去饿的慌。”其所以穷，未觉悟，以为是命。我们工作后，觉悟了，知道所以穷就是没有地的缘故，故要求土地非常迫切。有了土地即有了一切，故很自然的产生了朴素的均地思想。这种思想是好的，这是其革命性的源泉，而我们要善于诱导他走上正确道路，使合于党的政策是很重要的。贫农斗中农，在范县引起了问题，故濮县对此问题很注意，但仍斗了。原因：①查“黑地”开始，斗了中农，有了样子，贫农困的很，就自发的斗。“策略解不了渴。”②民主斗争拖的太久，也必斗到中农。③干部有重罚思想，掌握不紧。贫农为什么斗争中农，原因是贫农与中农生活相差很远，中农对贫农也有压迫的。因封建社会提高自己就要压迫别人，故富裕中农为了急于往上爬，对民众的压迫剥削无微不至，民众一损伤他一点即打贫农，贫农对之很恨。为防止斗争，我们提出给部分村庄贷款，让斗争外的援助少的，在不妨害中农情况下，在两利原则下组织合作社。贫农眼中的中农是四面光，落好人，成见很多。中农看不起贫农，不愿其领导，以为贫农是小偷、流氓、坏人，说自己是统战干部，满足于圆滑，说贫农领导了不得了。在贫农教育中进行策略教育，说明中农多数不可惹，很重要，可以说服贫农。故以雇佃为骨干吸收贫农参加不好，以三者为领

导，吸收中农参加比较好。

三、对群运估价及今后工作

在这个运动中有几个问题：

(一)在实际斗争中贯彻了贫农观点，贯彻了扶助贫农政策。过去我们搬教条，如延安吴满有方向传出后，冀南发展贫农，但贫农毫无改变。现在我们以为中心问题仍为扶助贫农，解决贫农生活问题，成立贫农骨干。过去已把领导落在中农的地区也有了改善，就是因为建立了贫农观点及其领导，对目前大规模的发动群众作用很大。

这个运动与过去运动不同，过去只部分贫农满意，大部贫农未受到利，“两头不好中间好”，我们的贷款很大部分都是给了中农。这次斗争中，贫农最激烈，不像我们想的那样文雅。我们对此事如何处理呢？如戴孝帽子，我们不提倡，要说服，但不能强制群众。我们经验：斗争对象如果罪恶不大，说服比较容易；如罪恶大，即很难说服。群众未发动以前，容易说服，但并非思想上解决问题；而发动以后，说服困难，但说服下去即是思想上解决了问题。就因为我们执行了这样的政策，故党得到了最基本的广大群众的支持，为过去群众运动所没有。常是中农较好，大部贫农不好。但群众运动发展的不平衡，部分县斗争了，但群众未发动起来。

(二)滑县工作总结以后，给了我们领导很大启发，知道民众会自动纠正错误。如滑县某村退粮太多，联合村各佃雇干部批评了，他回去退了。这样是经过群众的路线，因之民众的行动与纠正错误始终贯彻了群众的自觉自愿，如群众尚未自觉，即适当的等待，等待中启发教育群众。在领导思想上如此，但并非贯彻到所有地区。我们了解，群众运动应成为阶级运动，故应自觉的促成其联合，群众有群性、群胆。过去在联防对敌中亦有此经验。但联合斗争中，民主斗争中，以本村为主，力量弱时，邀请外村参加最好。反客为主，则一定不能成功，反会引起村与村之间的矛盾。由于联

合斗争，我们部分的作到群众启发群众，群众启发干部，克服了过去的包办的恩赐的观点。

（三）群众运动基本上是群众自己的运动。所以这次的运动规模比较大，表现了农民的无限的权威。过去一斗争即跑上层，这次斗争谁跑上层即加重处罚。群众斗争进展迅速，势如破竹，使部分县阶级关系变化。地主看到封建地主一个个倒了，谁反抗谁倒霉，这时即想到软化有利，同时又怕外村斗，故软化。过去地主对群众初抵抗，不成即收买干部，不成即暗杀，不成即当公民。现在地主掌握农会，主动的施行假斗争，拿出地来收买干部。如××村即如此。这种办法，给我们工作很大困难。这些村干部，是先斗争后改造呢？还是先改造后斗争呢？根据濮县经验，是先改造，不能改造，即组织贫农骨干去进行斗争，在新力量起来以后，再争取改造他。范县即没有斗争，地主给了贫农东西，斗争不起来，群众不向我。又一种情况，农民起来要斗，地主马上低头，少数人斗。故非依靠群众，多数人不动，干部很易蜕化，工作亦甚困难。

基本群众中还起了一些变化，起初对地主怕，斗则必依靠群众，干部包办也要依靠上级，组织酝酿很长且很秘密，积极分子很怕孤立，很怕走里分子，开会开场白都是说：“我们是自己人，话哪说哪了，谁跑风打谁。”斗争中也与群众关系很好，□走里分子约束很严。但斗过两个以后，方式简单化。我们觉得这样作也没有啥，一定要他复杂也困难。斗争普遍后，起初斗争的时候即公开，送条子告诉地主，不依靠群众，只依靠儿童团、姐妹团喊口号。斗争过了，群众未组织未行动，工作也很困难。但挽救是可以的，即斗争果实不公平，在分果实上来发动群众，进行组织教育，批评干部，改造组织，可以补救。

在大规模运动中，麻痹了干部，到处看斗争，干部漂浮，教育组织工作脱节，成为被动（组织工作搞好可以解决，濮县有3个村3个村联合，有10个村10个村联合，即可以主动，一个半月从下而上把区县群众组织建立了起来）。但基本上做到了领导与群众相结

合，建立了群众组织。当然有部分干部有坏习气，这是不可避免的现象。如在地主掌握之下的假斗争，果实也不会合理，在分果实时，发扬民主亦可以补救。

（四）这个运动中的缺点

在领导上来讲，如村干贪污浪费不民主，都是领导上的责任。总起来讲，可归纳为包办代替、放任不管同时存在。如把包办代替、放任不管克服，可以把这些现象克服至最少限度。违反了中央领导与群众相结合，一个为站在群众之上强迫命令群众行为，工作一定出毛病，一为站在群众之外看热闹。如在范县，开始第一炮打杨杂货，群众要求多罚。我们说最多不得过1倍。群众查他的“黑地”，共查出13顷，同时我们已提出罚10倍以下，罚了4倍，210万斤粮食，几乎相当于范县全县公粮。这个村大富，民众非常兴奋，干部也高兴。又斗争了南宫登封，3顷罚了2顷，民众亦很好。大胆放手，从查“黑地”开始，佃雇问题未解决。查“黑地”展开，以杨二杂货、南宫登封为准绳，把中农都搞的很恐慌。区县干部观看，以为斗中农也没什么：“一个中农破产，发动了农民，也是可以的。”中农整个阶层恐慌。我们给地委写信去，让他们警惕。后来区党委亦去人，找分委汇报，“很多中农斗了，中农情绪很低，在家吃坏的，到集上大吃大喝”，“不生产”，“希望中央军来，八路军走”，“搬筋斗吧”！我们与县委讨论了这个问题，提出免、减、缓、运等纠正方法。县委思想上未接受，半月以前才开始接受。中间一段不敢公开斗中农，迫中农入合作社。今天情况比较严重。这都是取消领导的结果。包办则无群众性，无群众积极性创造性。另一种为放任的形式，包办的实质。包办的原因是不相信群众，不相信组织。有些地方佃雇会等不起作用，不用这个组织，即属此种。同时也有部分同志盲目的相信群众的自发斗争，或□放任大胆放手，看不到群众的要求与心情，失掉了领导的资本。如昆尚村，县里不知道村的情况（南乐则很吃力，但了解情况多），运动在群众中有方向，我们未集中起来，故失掉方向，且当事时未建

议，事后民众不容易听我们的意见。

但有一点，民众只要动，斗争中农不可能没有，除非不动，但领导好可以减少。

现在一般大地主，基本上打击了，基本上反封建完成了任务。当然有毛病，但我们不大惊小怪，不泼冷水。但是要纠正，纠正要及时，方法要讲究。纠正的好可以弥补毛病，使工作提高。

其次领导上一个缺点，即通过组织领导以群众教育群众等不够。这个时期我们与八、九地委接近，联系多些，冀南开过地书会，十地委、十一地委情况不了解，十二地委亦才动，估计可能没多大问题。分局只顾开会，与地委联系很不够，把群众路线、群众教育群众等方法贯彻的很不够。且了解了一些情况，不敢马上就写指示，研究了再写就已经完〔晚〕了。现在我们发了《民运通报》，比较好些。但整个领导被动，忙不过来。

其次对边沿区工作情况不了解，工作研究很少。据说，地委离铁路2里地都斗，游击小组把斗争对象拖到根据地斗，影响城市工作很大。部分地区地主跑一二百。部分地区已退出来了。

根据以上了解与估计，封建势力削弱完成了，把农民扶上了人的地位，现在可以保障民众的人权地权财权了。保证方法是使民众自己组织，保障自己权利。今后民主民生斗争不再作为中心，起码八、九分区如此。如不及时转，则中农被斗，阵营错乱。应提出新方针，弥补运动中缺点。

转向生产。没完成的民主斗争在生产中去解决。斗争得利容易，要收回来必遇到抵抗，收要相当力量。方法：主要利用党报党刊。《冀鲁豫日报》今后方针，一为报道战争，一为报道生产。

团结中农。一方面组织中农业生产，参加合作社，吸收中农〔入〕农会；伤害了中农的村，首先在贫农中进行教育，在群众自觉情况下，对中农让步，未拿的减、免，部分的可以退，以不伤害贫农情绪为主，确保中农各种权利。

对中小地主，今后应当争取，以生产为中心即对之是个稳定。

以县为单位搞，召集士绅座谈会，承认过去的事实，现在让他们发表些意见。

贫农生产尚有困难，如何解决尚为很大问题。

租额与增资问题。租额减的低，但民主中对地主斗争削弱厉害，现在为执行转生产方针，暂时不改。冀南可以修改。增资两个条件：1、地的生产费；2、劳动技术。最高增资不超过10亩地。旧习惯以村为单位恢复。衣服鞋袜不要，发给布（5至7丈）。

滑县查减运动简报*

(一九四四年)

纪登奎

包办代替，会把活的群运变成死的。滑县3年来的群运教训是：群众的解放事业，要群众自己去做，就是要把群运变成群众自己的运动。滑县的这次查减运动，是这样做了——大胆放手，让群众解决自己的问题。群众处理的民主很恰当：自己酝酿，自己斗争，自己查减，并在行动中建立了自己的领导组织，拥护自己爱戴的领袖，使斗争很快的发展起来。因为这样，滑县的查减运动搞得很好。

一、群众自己酝酿的方法比包办的方法好

查减办法，在干部中动员了，经过干部带回了各个村庄，就产生了两套方法：一种是用群众的意见自己酝酿成熟的，一种是简单命令群众起来。前一种是群众自己创造的方法，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是民主的；后一种是简单命令的，是单纯自上而下的官僚主义的。

群众自己酝酿，是把上面的法令并不按照原条文搬下去强制群众执行，是积极分子提出来（如喂牲口、倒柴），启发佃雇大家的觉悟。因为老辈子没这些事，剥削已成制度，所以一开始，多数佃雇不接受或不表示积极。积极分子多是经过算帐的办法（里大股，外小股，劳动相差，喂牲口，外佃给里佃“背包”——实际上是便

*本文原载冀鲁豫区党委民运部1945年编印的《群运材料》。原文未注明成文时期，据推断，当是1944年的文件。

宜了东家），在佃雇中间展开自然的争论，这样群众就敢说心里的话。比如曹起营，群众讨论了两夜，真正反映出来了群众的要求和意见。因为有的要求高，有的要求低，大家又很负责的把意见统一起来，并征求了县长的意见，群众认为政府是根据人民的意见颁布法令的。这样酝酿方法的长处，是不大口声声以法压人，而是让群众大胆提出自己合理的意见，政府代表群众意见颁布法令。他们知道政府的法令是保护人民利益的，所以他们便敢提出自己的要求，创造许多摆脱自己痛苦的具体方法。

在干部中间，常常是三句话不离法令：“政府法令不叫我们喂牲口，叫我们倒麦秸。”某同志给佃雇讲：“政府法令谁也得执行，大户不执行是顽固，穷人不执行是走狗。顽固的斗争，走狗的开除。”反正是“法”硬要实行。群众怕当走狗，不赞成（还不了解）也不敢不执行。他愿意实行的倒不敢提，恐怕法令上没有那条，那就只好照法办事，为法令而行动了。也难怪，地主责问佃雇：“为什么减租增佃？”佃雇一致的回答：“上边叫办，谁敢不办。”地主讽刺的很巧：“法，民能不从？”群众是为“上面”干的，怕当走狗；地主是怕“上面”来查，怕当顽固；只有工作员最威风了。

群众自己酝酿，是先把法令化成群众意见，然后根据大家觉悟程度去执行。群众开始斗争觉悟程度很低（特别是新村庄），并不要求那样多。如某庄开始只要求倒粮倒柴，其他喂牲口、反剥削、恢复□□□等，都不愿提及，群众愿办一条再说一条。他们在行动中表现了力量，就会启发出更多要〔求〕，这也是酝酿和行动结合。

但是有些同志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他们在一次会上就提出二三十条，来要群众执行。九区开始时普遍用一种固定的方法进行鼓动工作——先个别鼓动，再开小组会鼓动，接着小组长联席会，大会评议会（三三制的，评议是否合理），最后再开村民大会，大家同意后才准群众行动。然而群众总是不合工作员的意，因此，群众

情绪越低，我们的同志就越怨群众“成问题”、“落后”，鼓动就更加油起来。

所以产生这种现象，一来是怕群众干不好，二来是因为主张：“不搞就不搞，一搞就搞彻底，搞不彻底还不如不搞。”——这是“一次斗争结束”的“一次彻底”论。但群众觉悟是不能一次提高的啊！“彻底”是对的，但应逐渐“彻底”，想教育好再行动，这一定脱离群众。

群众经过自己酝酿认识了这是自己的事，须自己去干时，一村讨论好就要联合邻村。他们了解如果一个村实行力量薄弱，即使有收获，也不易巩固（不能成为社会的制度）；各村不一致，也会引起地主的怨言和农民的不满。因之，“统一”便成为大家的要求了。如寺台佃农小组出去联络各村，曹起营雇工出头召开邻村佃雇大会，特别好的是大紫上雇工——老王，领导全村佃雇，传道般的活动邻近十几个村，联合实行减租增佃。大家互相活动，互相接洽，互相联合，等到互相同意以后，就开各村正式代表会，商讨统一办法，和决议召开佃雇全体大会讨论。

但有些小区（划定10余村为一联合小区），抗联每人把持一村，就算没有包办，实际上已隔断了村与村的群众联系。他们一切依赖工作员，抗联号召群众下命令（下通知）。开佃雇大会，到底为什么？好的群众只知道“抗联叫干，掏老虎也去”。

两种不同的酝酿方法，显然群众自己（走群众路线）的方法，比我们首先划上一个圈子“说服”群众的好处：（1）把法令认为群众意见，群众是为自己事斗争，不是为法令而行动；（2）酝酿和群众行动结合，在行动中慢慢提高，不是教育好再行动的“一次斗争论”；（3）一村商量好，联合邻村，互相联合，产生领袖，号召统一，不是“找抗联”，等待工作员。

二、集中意见（创制新法），壮大力量，农民联合起来

意见从群众中酝酿来了，很杂乱，很无秩序，需要经过一个集中的过程，统一起来，成为比较完整的正确的意见。力量分散在各村是零星的，薄弱的，群众对自己的力量没有自信心，因此，需要经过一个壮大的过程，集小为大，成为运动，并运动起来。

在下面两个例子中，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区北组，以梁二庄为中心，附近11个村，200余个佃雇，在柏树林里开会了。主席是佃户李守义，他说：“为了翻身，不受压迫，大家有啥说啥，没有别人……”一个雇工提：“东家今年没有给我衣裳。”（说的不给钱管穿）说时有些害怕，伙计都安慰他：“不要怕，都是自己伙计。”高喊：“谁向东家说谁是走狗！”“老母狗！”主席解决的很干脆：“回去向东家要。”“行，行！”（大家齐说）

又一个佃户说：“我是×里人，姓×叫××，说我的事吧！俺东家是俺姑，头年俺爹快要死在床上了，我磕了两个头，都不借给一升半合。俺爹临死吃了个糠窝窝。（大叫起来）伙计们想想吧！东家和咱两个心眼儿啊！这是俺的亲姑，我卖了一辈子力，还是这样穷骨头，当儿子的把爹娘饿死了。”哭着，晕了过去。伙计们把他扶了下去，稍休息会儿，又上来。大家说：“醒醒吧，为啥不敢说呢？谁给东家说是走狗。”

大家“反对！反对！”“打倒！打倒！”呼喊成一片，一个接一个诉苦：“喂牲口不合理”，“支差不应该”，“一请也不请了”。主席对大家的意见仔细听，很关心，比如朵朵粮一件小事，没听清，要仔细高声重诉，说完一件讨论一件，讨论后就马上解决。“朵朵粮为啥取消？因为咱们不抱头（不团结之意）。以后按老规矩，一石抽一升。”大家“同意！”正喊着，事解决的很圆满。主席又连问带解释的说了一遍。

各村分开选代表，大村2、小村1，共举了16人，成立代表会领导这个工作。代表会决议5天完成，怎样干法，主席讲的很明确：

“难剃的头先剃，活捉活拿，先揭黑嘎巴儿，压倒他再提条件。回去可大顿，不要顿出圈儿。”

会要散了，×庄一佃户提：“俺东家退了我的佃，大家能帮帮忙吗？”大家说：“中！”主席就领着几百人一喻而上，把地主请出来，斗嘴，讲理，喊口号，粮食倒出扛到了会场。大家亲眼看到了自己的力量。

“5天后，柏树林里再见！”呼喊散了，天色已晚。

六区中心组，12个村佃雇172人，早饭后开的会。开始大家乱吵，乱提，时间拉的又长，还不解决问题。一佃户提：“咱大家说了一条〔再〕说一条好吧？”大家同意，才守秩序了。

佃雇们一点不拘束，提一条，讨论一条，就解决一条。相同的就不提了，不同的再提，再讨论，再解决。整整一天，解决了麦秸、退佃、股份、喂牲口、播锄地、老雇工、打里手、独手活、被斗顽固分子卖地要退佃、工具供给、立约、垛垛粮、扫雪面、雇工吸烟等18个大问题。

争论的很激烈，如倒麦秸，岳营辛庄要每亩按50斤，胡营要每石按180斤，曹起营1石要150斤，孔村要每亩70斤，小寨石庄按每石40斤，大家很不统一。争论问题有两个，一是按地亩折合麦秸，一是以收粮折数。最后大家认为，地折数不能照顾收成好坏，应以收麦计算，收麦多，麦秸也多，收麦少，麦秸也少。大家一致通过以麦计算，每石麦铲麦180斤，删麦150斤（大家都举了手）。

再如股份问题，争论的最热烈，对养老股最恼恨。大家决议耽误一晌再补上一晌，如果不补，即扣除一晌的粮食。佃户成天开会，耽搁活，大家说这是公事，为公事开会算作抗战“公活”，里股开会抗战不扣除，佃户办私事扣除，这对养老股很大限制。

他们对自己问题的处理是很慎重的，如黄庄的黄守义提倒出喂牲口（三分股粮）不给二活（里顶股）分，大家都反驳，不同意，

最后黄守义服从了多数。李××代表曹起营佃户提要腰带，大家不同意，争论的相持不下，最后也服从了多数。

天晚了，大家举出了代表会，分了工，每个代表领导两个庄，决议3天完成，一天讲理，一天倒粮倒柴，一天立约。最后区抗联同志讲话：“大家商讨的办法，很好，我把这些办法提到县里，出个法令，号召全县向大家学习。（“对呀！”大家说。）这办法和共产党想的办法一样。”

“拥护共产党！”随呼随散了。

这两个会议，开的很成功，县里曾传达各区向他们学习。全县20余联合小区，多数的工作是好的，还有的更好（如大紫上老王领导的）。少数不好，对大胆放手让群众自己处理自己问题的民主精神，接受的很少，对大胆了解为大干，放手了解为放任，满足轰轰烈烈开大会，用民主形式通过一下我们主观想好的事情。雇工提要棉衣，“同意！”佃户要“腰带”……“也通过！”通过的就“打倒”。一个会议全是“打倒”、“取消”、“同意”、“通过”、“干”、“走狗”，群众随声附和，做了一大堆“左”的决议，并没有采取负责任的态度，认真讨论。所以回去后，有些人便不受任何的限制随便乱要，有些人便不执行。

综合全县佃雇联合行动，有些什么经验呢？

（一）大会开的好，依靠酝酿的成熟，在一定地区（以区为单位），大部分村庄，都有了酝酿和准备工作。群众已知道说甚么，怎样说，大胆发言，提出联合准备。有些组，群众根本不知道，没有联合要求，就搬运这种形式，那是从主观出发，是错误的。

（二）选择一个佃雇领袖主持会议，开始不要怕群众乱，群众要求正规时再正规。××组，摆桌子凳子，排场子，这场合的本身，就对群众是一种压迫。应该不拘形式，诉苦、提问题报功都可，但应抓住典型讨论。比如提出股份，就讨论，就解决，就决议；与此不同的问题，待股份问题解决以后，再讨论，再解决，再决议，解决了一个问题再换另一个问题。

有的干部主张把问题提完，分几大类，光讨论大问题，不要提小问题，这是学生讨论问题的方法，结果都失败了。

（三）一个问题提出，群众吵吵一番，这是联想到本人和本村情况，和别人交换意见，是一部分人集中意见的过程。农民最习惯的形式，叫“唧咕唧咕”，主席应停止发言一会儿，使群众有酝酿、回味的余地，然后再讨论。

（四）发生争论，坚〔僵〕持不下，是群众发言最乱最热烈、民主形式最具体的明显表现，也是群众对问题负责的真实态度，不同于随声附和，不应停止，更不应着急和讨厌。在分散讨论时，没有把意见集中起来，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办法来解决分歧意见。如黄守义和李××服从大众，对群众教育意义最大。

（五）群众意见和政策法令发生抵触时，悬殊太大，如我们意见牲口减里股三分，去秋不倒，追一季麦，群众坚持倒秋要求，佃户也要腰带——5尺黑布，我们应指导地方干部提意见，和群众讨论。群众坚持，可服从多数决议，有原则错误，事后说服，或指导群众请求上级处理，切记不应当场泼冷水。

（六）在争论不下或发生消沉、跑了中心等等现象时，新提拔的地方区干，应积极在群众中启发、带领群众正确讨论。许多事实证明，地方干部发言，群众当作自己人看待，敢提争论，但抗联老干部一插嘴发言，群众即认为是“上面”的办法，用不着争论，不言不语了。这不是说抗联干部都不应发言，而是因我们作风不好，群众还没有和我们商讨问题的习惯，还需要逐渐改变。

（七）最后选出领导机关——代表会，来办理大家事情。由群众领袖来综合起大家意见，说明群众的意见正确，说明老百姓的意见也就是共产党的主张，进行一些党的教育，并且要指出斗争办法和工作的计划（如黄守义的号召）。

方法虽然有这么多，但真理只有一条，“民主就一定成功”。群众问题让群众自己讨论，自己决定。只要我们诚心诚意把问题交给群众自己处理，群众就会讨论，就会认真负责。可怕的是我们光

从定见出发，群众认为我们工作人员有了固定成见，是上面“规定”，群众是不发表意见的。真心让群众商量，就得给群众留商量余地，这是民主精神问题。佃雇大会前应酝酿，为求得意见一致，需要邻村商量讨论时，时时刻刻给群众交换意见与回味的机会，这就是商量余地。

有些村，根本不让群众商量，在思想上不让他们作准备。他们认为是“上面”规定，应随声附和，会从头到尾是“中”“行”“打倒”“取消”等“左”的答复。提出问题，不让议论，不给答复，群众对“工作人员”只有服从的习惯，没有讨论的习惯了。

用民主精神讨论，一定很具体，很圆满。

经过联合大会的行动把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使群众认识到大家齐心干的力量，先进村庄给落后村庄、落后群众增加了勇气与信心。这种从群众觉悟程度提高的办法与我们硬用教育提高的办法是不同的，因为这种提高的办法，是群众在行动中丰富了经验，看到了自己的缺点，在行动中并选举了行动的领导组织——代表会，成为一个阶级的行动。这联合大会给予农民以力量，使他们不单依靠政府、抗联，而是主要依靠“大家”、“周围村的群众”和“自己的领袖”。

原来“心不齐”，现在“心齐了”，这是大会给予佃雇的思想变化。——过去找抗联，“找主任”，现在则是找群众中产生的自己的领袖了。

群众的意见是正确的，群众团体把这些意见好好的学习研究以后，提到政府通过，制定了一个新的法令。这个法令，是根据边区行署《关于减租增佃问题的决定》的精神并根据滑县的情况，把它更加具体化了。除全部贯彻行署政令外，补充下列7项：

(一) 佃户喂牲口问题，一般有3种情况：(甲) 佃户喂。地主没有雇工，佃户喂牲口。大地主一个佃户管喂管使，叫“把式”顶大股。小地主一个佃户喂牲口、扫院子、担水，其他杂活不管。佃户一般承认“喂”、“使”是重活，应顶大股，所以确定佃户股

份不动，地主拿出1石5斗到2石5斗粮食由佃户分劈，这样佃雇容易统一，不发生矛盾。此1石5到2石5的机动权，根据牲口多少、活的轻重来确定，并应根据地主的大小，来不同的处理。（乙）雇工喂（里搭股）。雇工喂牲口2顶1股活，或顶1股大活。这种处理办法，雇工顶1大股活者，首先将里搭大股或外佃股份推平，如里10分外8分，先将里大股满2分，成为里外停。外佃股份有差额者，可根据雇工做活情形评定股份，而后再减里股内 $3/10$ （再减去8分的 $3/10$ ，即2分4厘，尚余里股5分6）。“里外停”者，减里活 $3/10$ 。前种后种，麦季地主多分的3%的粮倒回按股分配（新股），今后（今秋劈头开始）按新的股份分粮，那前一种是外8分里5分6，后一种是按17分劈，里7外10。股份推平的理由，是先求得股份合理；减去3分的理由，是雇工各顶1股活，给地主喂牲口、担水、做杂活耽误很多时间（在 $1/3$ 之上），不能成整股，减去3分，是外佃户“背包”的代价。如雇工喂牲口，同时又能与佃户同样做活时（如忙时三晌下地），3%可不减或少减。（丙）半股活喂。半股活是吃地主的饭，按劈头分5分粮，劈5分粮算工资，给地主 $1/2$ 的饭价，他顶1股活，实际上给地主喂牲口、担水、做杂活，外佃给他“背包”。半股活有的顶1股活，有的顶1股大活。处理办法：顶大股去和外股推平，但确定半股活（雇工1股份不动），比如，里10分外9分推平，里应减1分。由于佃户股份确定不动，只能减去地主半分，成为里分半、外9分，推平后再从里股减 $3/10$ ，减地主成〔股〕份，佃户不减，保持股份不动。麦季地主多分的大股粮和 $3/10$ ，应倒回按新股份再分配，今后（从秋开始）按新确定的股份分粮。

喂牲口还有忙时一个佃户喂，闲时几个轮流喂，或忙时地主喂，闲时佃户喂等，但这是居少数，一般都根据上面精神处理，佃户轮流，地主管饭。

（二）股份调整问题。股份大体有两种——一则是地主和佃户股份不等，里大股外小股；一则是佃户内部股份亦不等，悬殊极大。

如寺台杜老泼，里2股10分股，外2股6分股。曾比起营大部是里8外5或里7外5、里6外5不等。再如中冉大言家，佃户15个，8分股者1个（把式），7分股者1个（活头儿），6分股者11个（1个佃户），4分股者2个（新佃）。关于股份处理，对前一种地主搭大股应取消，和外佃股份推平；后一种佃户股份不均，一面是地主用股份不等，并逐渐提高股份来刺激佃户生产积极性（加重剥削），一面是佃户劳动技术熟练与不熟练亦有差别，如采取大小股一律推平，必促成佃户的内部矛盾，减弱对外斗志，因之佃户不积极要求。如佃户提出要求解决，采取调整方式，按劳力大小、熟练技术相差，调整一下股份。

（三）抽地和里搭股问题。抽地与里搭股，是一个问题的两面——一是抽地，一是抽股，两者都等于退佃一部。

（甲）抽地。地主有的抽一部自种，有的抽出大种出去（在契约期内），这等于退佃一部。退佃后（抽地后），佃户受的损失，地主赔偿。即过去未分的粮倒回，今后土地收回，不管抽与不抽，均按原劈头分粮，抽出之地，不管种菜种瓜，皆按粮食劈（劈粮标准以地邻收粮为标准）。

抽出变为大种，大种佃户（指对半劈），按“二五”增佃，得“六二五”，原被抽地佃户仍按“三七五”分，地主一无所得，两者落空（柴不倒了，因佃户没劳动）。这是对地主非法抽地的一种处分。但如×区在佃雇会已通过在地主所得粮食内抽 $1/3$ 或 $2/3$ 给原佃户，不再改变其决议。

（乙）“里打股”和抽地是一个问题，减少佃户土地，这叫“抽股”。这也有两种方法：一是地主添股，总股未动，里股增加，外股减少；二是对佃户股份不动，地主股增加几份，这就是七区地主所实行的——你“二五”增佃，我“五一”添股，结果等于不增。对于这个问题的处理，确定在立约期间，租佃关系不得更动，不得增添里股，因地主添股和抽股佃户所受的损失，应当赔偿，即将地主多分之粮倒回，按新股分配。

(丙)一般退佃问题，按总会指示执行即可。

(四)能刺激佃户生产积极性的旧习惯恢复。恢复有利于佃雇的旧习惯，必先取消超经济剥削。取消哪些，怎样取消？政府已有确定。这里再补充几个意见，与生产有联系的额外活（拉粪，推土等）管饭，与生产无关系的额外活（泥盖房子、走亲戚、赶集等），除管饭外，并应给工资。

有利习惯恢复，基本上以村为单位出发，但如这一带村庄都有，少数村庄没有，佃雇积极要求，可成立新规矩。有利的旧习惯过去取消的是否倒呢？确定下面几种主要的倒回：（甲）铡草粮、垛垛粮，一石抽一升倒回。（乙）短工由佃雇双方负责，从土堆除，过去佃户单方负责者倒回。（丙）月粮借够。（丁）看青粮地主负责，佃户出过者倒回。其他细小枝节问题就不倒了，如热天过了不再倒草帽子。

(五)佃户中其他几个问题：（甲）生产工具镰、锄头、鞭等，由地主负责。副产物：地主〔从〕怕劈柴考虑，不种高粱只种麦，应按往年一般种高粱几亩能劈柴多少照劈，无高粱秸以秆草补充之，麦秸算柴倒回。（乙）应重新订立新约，旧约废除，要慎重，争取3年以上。（丙）棉花、瓜对半分，红薯、萝卜、绿豆角、麻、花生高于“三堆停”者，按原高数“二五”增之，低于“三堆停”者，应提高劈头成为“三堆停”，再“二五”增之。

(六)播锄地（青苗锄）的佃户，在“三七”小种制超经济剥削取消后，一致要求改变关系为“三七五”或最后确定再增“二五”，即麦“一九”成为“九一五”〔一五八五〕，佃户一五，地主八五，秋“二八”变为“三七”。

(七)雇工问题：除合理规定一年工资外，（甲）从去年10月1日到明年清明下工，多做五个月工的，工资按原工资增20%，即是按原工资每月增4%（多做两月增8%，三月增12%……）计算。（乙）老规矩：赶会3次每次馍2斤，草帽1顶。此外腰带1个（5尺布），□年3□，手巾1条，管吸烟，压岁钱，过年1筐子馍，铡草

给雇工腿带1副，牲口降小驹1套衣服，买牲口“没笼头钱”抽1%，筛豆糠粮、淘麦糠粮归雇工，女工鞋面布、刷锅钱等都恢复。

（丙）吸烟应以8包为限，合800元左右，不吸者要求两双鞋两双袜。（丁）医药费依法处理。

三、坚持下去，开展斗争

意见从群众来了，再集中以后，要用分散深入的方法贯彻下去，因为农民具体对象不同，具体要求不同，觉悟程度亦不同。要农民的行动成为自觉自愿的行动，就必须从具体出发，只有这样才能深入。

大会决议，是农民一定时期的斗争纲领，但执行的多与少，从具体情况出发，群众应对大会决议负责，这就是民主集中，少数服从多数，群众需服从大会决议，大会决议在各村执行又需照顾群众水平。此问题的解决方法，应注意联合村庄群众水平差不多，以求统一。在联合大会后，各村斗争在同一时间展开，我们干部责任是帮助群众执行大会决议，不是包办和隔绝群众联系。

斗争形式，各村农民选择了自己所喜好的。有的村佃户个人找地主倒出粮食，集合检查；有的村分小组倒粮；有的集体倒粮，倒了一家再倒另一家；有的采取打击一个最坏的，再倒一般的；也有采取劝□开明的自动交出影响一般的。群众愿意怎样做，就怎样做。比如梁庄佃雇参加联合大会回去后，就马上要干，我们干部怕弄不好，一定要演习演习，要他们提大问题，要给他们算算帐。一个佃户说：“同志，你不要摆弄了，俺找人算帐。俺和小抓钩一样，先抓住他顶门盖，叫他说不上话来。”后来开村民会时，佃雇和地主要讲理，佃雇向干部说：“同志你不用去。”“弄坏了俺可不负责。”佃雇自己干了，一条一条讲的是理，大家拥护，地主们都承认了。最后又集中力量揭××地主的黑嘎巴儿，他们说：“出差不管吃饱，说俺大肚子。”“说新五军（伪孙殿英部）快来了，威胁吓唬。”“去年开删（删麦）吃的糠窝窝。”你一嘴，他一舌，结

果地主承认了错误。

情绪高到极点了，又要求“抬垫脚”管饭。地主说：“抬一筐两筐土，赶不上吃饭的时候怎么办？”有的说：“垫脚就得吃饭。”

“赶不上吃饭，犯法，可怎么？”因为大家脑子太热了，当时谁也怕说“当走狗”，事后，背地给我们干部说：“同志，这抬两个‘垫脚’不算回事。”“趁锯口拉吧”，马上就集体让两家分散倒了，立了约后，自己开个总结会，算了帐，表扬了好的（张法最好），批评了坏的。

一般的各村斗争经过，是先讲理，再倒粮、倒柴，最后检查立约。进行3个步骤时，在讲理中，地主一般的不正面抵抗，有劣迹的大地主不反抗，中间势力也让步，不满也不讲，和我们有联系的分子，感觉过重，背地里唧咕。一般有两个疑问：一是说政府“偏心”，对佃户有利就干；二是说立过合同订过条件，又来二次增佃，法令常变。佃雇们则反驳说：地主捣鬼我们要检查，如伙计增佃，地主倒地，伙计增柴，地主不种高粱；合同立了，你们不实行，剥削不取消还加多，你们说话不算，还说我们“变了”，其实是你们“变了”，我们来检查弄个明白。所有规矩，都是双方有利，不光对佃户“偏心”。讲理罢倒粮倒柴，伙计们自己和东家算帐，自己本身特殊问题，在算帐中和东家一一讲清（叫斗嘴）。这一特点，表现了深入、具体，不仅解决了一般问题，而且个别地主和个别佃户特殊问题也得到了解决。不过有些佃雇“顿出圈儿了”，雇工要棉衣，麦秸全归佃户，雇工已吸了半年烟，又倒一年烟钱，麦过了还倒吃开删饭（4个碗1瓶酒）。在争执的时候，亲叔亲父都撕破了脸。

最后是佃雇代表分头检查，解决未解决的问题，并进行立约。全县统一的契约分为四项：（甲）正产物分成；（乙）副产物分成；（丙）年限规定；（丁）喂牲口办法（或减股，或给粮食）。最后附件，佃户和东家双方任何一个特殊问题都可写。新约立好，旧的就废除了。

此外，在坚持下去的斗争中还有个顶要紧的问题，是群众对走狗（落后分子）打的很凶。这是群众发动起来大家都关心的问題。“走里”妨害着群众的团结一致，因此大家对这种行为很不容易，就打击反对。这对群众内部是一种阶级教育，对佃雇组织是一种巩固，是很难免的事。多数群众对少数分子的限制是不可怕的，没有民主集中，群众行动就没有纪律，纪律是在群众自觉自愿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走里”分子是属于封建宗派和长期历史关系两种：一是老年老代的走里，一是拐弯抹角的亲戚、近邻、本家本族，还有什么“走肉里”（和东家女人有来往）等。其实他们对民主〔生〕改善基本上赞成，但不愿揭脸，他认为东家对他并不那样薄。我们对他应是争取对我同情的态度，对落后“走里”的所为（破坏组织，破坏纪律，向东家告密），在群众中批评他，纠正他“走里”行为，并且给他指出前途。如×庄某雇工走里，开会回去东家问他：“你的腰带，要白的，要带色的？”雇工说：“看着办吧。”第二天东家又问：“要白的，带色的？”雇工答：“看着办吧。”后来全村雇工都要出来了，要拿着开大会陈列，可是那东家还那样问。雇工大急说：“你不愿给，散伙。”结果，撕破脸，比一般雇工还干的凶。

这件事告诉我们，对落后分子要照顾他觉悟程度，在行动当中从他切身经验当中提高他，使他体会到两个问题：一是暴露地主的薄，使他的假仁假义破产。因为地主对雇佃收买只有一个目的，多剥削少出东西；而佃雇不管怎样落后，他也愿意多要东西改善生活，当他提出和佃雇一样要求时，地主面孔会变色的。那时，他会了解：地主对他并不那样厚道。地主对他厚的时候，他会“以厚对厚”，地主对他薄的时候，他也会“以薄对薄”的。二则斗争中了解自己力量——落后分子提高是个过程，而且要耐心等待他，给他以实践体会的机会。停止他破坏行为是对的；代替他做，单纯打击是不对的。

四、检查总结，表扬模范，建立自己 领导组织，检查、总结和庆祝胜利

胜利了，各地佃雇召开庆祝大会，一为了检查总结过去经验，二为讨论今后工作进行，三为选举领导组织。

各地佃雇，把全部胜利品都带到大会，头上戴着新草帽，手里是新手巾新扇子，打着鼓锣，高高挑着5尺长的腰带，上面写的标语：“拥护共产党”、“佃雇是上等人”、“伙计们一心团结”，有的画个“王八”，写着“打倒走狗”。这好像是雇佃最喜欢的举动（然而干部觉得很小气），到会场陈列起来，互相参观，津津有味。

一开会，是各村向大会报告，怎样干的，数目多少，大家讨论，批评好不好，对不对。比如×村麦秸全部归佃户，“顿出圈子”，大家批评他。他们则说：“抗联×同志眼看着叫俺犯错误他不管，倒多的，回去俺退还东家吧！”他们自己约束自己，不是外力强制的。

汇报的汇报，打的打，算的算，当场做了总结，各地佃雇领袖总结都很明确的指出两个结论：（一）靠着大家联合；（二）有政府法令保证。李守义总结时说：“几顷地也打不了这多粮食。”他问：“为啥胜利呢？”大家呼：“团结一心！”“李守义领导的好！”他说：“对了，抱住头，靠着膀，有政府法令保证，以后还得齐心。事还大呢，小心咱的二斤半（指头）。”晋兴广总结说：“咱12个庄联合，倒了粮124石6斗、柴47890斤、钱11500元，伙计172个，每人合9989元。”接着说：“我掌柜叫李身修‘里外停’（里5分外5分），倒去秋喂牲口粮1石7斗2升7，倒麦3斗9。小利（指垛垛粮、铡草粮）每石倒1升，抽麦1斗8，抽秋4斗9升，麦秸600斤，去秋1/3折成麦（因在东家放没生利）是5斗，共倒麦是1石6斗4，倒秋1石3斗3升7，合洋10970元，连麦带老规矩合12000

元。”总结完讨论今后时，大家提出：“防止地主反攻”、“买地选农会员当经纪”、“改选不好的农会长”、“参加模范班”。梁庄联合大会决议：（一）扛枪参加模范班（民兵内参加雇佃1/2），下地时扛着枪；（二）不兴地主无故卖地假当，他有理由卖，咱伙计买；（三）多操农会的心，咱倒粮人家眼红，回去想办法，反贪污查“黑地”给贫人（指一般贫农）挣口粮；（四）村长不给咱办事，咱打倒他。这4条回去要办到，小心地主唧咕，咱订个规矩，5天一开会，开会不到：（一）批评；（二）警告；（三）开除；（四）追粮食、“卷行李”、“卷铺盖”。（群众情绪高涨，规矩订的严，实际上是不适用于平时的。）

五、表扬模范，选举自己领导组织

自己检查了，总结了，并讨论了今后方向，谁来领导大家呢？他们又从领导大家斗争的代表会中推选了总代表（5人7人不定）——叫代表会，领导10余村佃雇，也领导农民。

六区和三区是用表扬模范的方法提高这些代表的地位，示范于大众，推动工作前进。当时群众选了很多模范佃户、模范雇工。六区中心组选了5个模范，黄守义被选为模范第一。黄守义（黄庄佃户）向大家讲：“我参加农会，参加反贪污、倒粮、增佃，劈了12石5斗。前年我是个无产，去年和俺叔合家有4亩地，又买了3亩。秋前我省吃俭用的存下了一部分麦子，秋后要了地，好打个井生产。我到死也不投降，不妥协，跟着共产党走！”

大家选举他，不只是生活改善的好，还表扬他几条：（一）不投降，不动摇；（二）劳动积极，勤俭节约；（三）不新贵，讲民主；（四）到死跟着共产党走。千余群众给他送礼，送西瓜，敬酒，妇女献花，扭“黄守义秧歌舞”，唱“黄守义的小调”，还给他“抓钩一个、镰、鞋一双”做奖品。

还有很多模范，我们只是表扬表扬算了，没有总结他们史略、事迹、经验，培养他成为工作、生产的新榜样，推进工作。当时不了

解这是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式”，所以热闹一时，就算罢了。

在六、一、九区，群众把这些模范、自己拥护的领袖和抗联有威信的工作同志，选举〔到〕自己领导机关，大家叫“工农联合会”。

六、抗联取消，扶植联合会领导

全县发动了群众地区，都产生了这种领导机关，采取了这种组织形式。

工农联合会，是工农自己产生的组织（工农已独立），10村到15村的小区联合，是一级领导，在开展工作时适宜的。随着农民这一联合形式，反“扫荡”备战中，武装、民兵选择了联合指挥部，统一这小区的民兵行动，起极大作用。青年联合会、妇女联合会，亦在运动中产生。政权的有力配合更适合当地情况深入领导，可有定期村长联席会议。一切政、武、群众团体的党员，皆统一于中心支部领导。中心支部，由一中心支书和较好村庄优秀支书组成。农青妇联合会，有党员干部参加或列席会议，以统一意见，实现“一元化”的领导。

中心支部建立和联合会产生以后，抗联干部有威信的当选联合会委员，或留一人参加中支领导。原来抗联小组任务：帮助区检查领导工作和培养、教育、提高联合会的干部；一切服从中支决定、联合会的领导，没有任何操纵和包办权利，有意见提出，由区发指示给联合会。联合领导树立了，留一部干部参加领导，其他都调往□地区。

全区的各个联合会全体委员开会，组织区筹备会，准备区选，并展开拥护领袖运动，召开代表大会，产生区农会、区工会（当时因大家忙于别的工作，把此民主选举推迟了）。

工农联合会及其他团体，都是地方干部，人数又很多（每小联合会各团体委员就十几个），为着照顾公家财经困难，不能都脱离

生产，但又适应工作需要，脱离一部，所以确定各主要干部（中支书、农青妇工）脱离生产。群众拥护□来的群众领袖，多是极贫的，动员其脱离生产专来从事抗战工作是有许多复杂困难的。一般困难我们还容易克服，中心困难是“脱离生产”问题，即如何离开土地，离开房屋、老婆、猪鸡，谁替经营与家庭生活维持问题。大家共同意见是：脱离生产者一个任务是工作，一个任务是家庭的生产，两者做的都好，就是模范干部。工作斗争站在前面，生产作模范，平时做工作，忙时多做本村工作兼顾生产，并组织别人对他互助——这些方法大家是同意了，干部涌现出来很多，究竟通不通，还需要实践中具体解决。佃雇和一些干部实在不能脱离生产，又能担负很多工作，应通过群众路线，多予物质奖励，公家再给予些帮助。他们可以发挥更大的力量，创造一些模范事业（如模范斗争互助组、合作社），以好的榜样，带领大家前进。

我们深深觉得：地方群众领袖作用大，是因为从事劳动，群众看作自己人，他们和群众保持着自然的密切联系。我们应好好培养这种朴素、踏实、农民化、地方化的新作风，并在政治上教育提高他；否则他会发生变化，或者新事物面前、困难面前、群众情绪发生变化中，固守老一套，保守、做不通，情绪低落下去，便会回家或者“洋化”起来，脱离了群众。目前已在发生了这些偏向。

这一级联合会组织，在大踏步破坏和建设一度时期是必要的，但永久存在下去也不〔会〕妨碍工作深入。因之，在村的组织健全、区级组织以民主产生，并在群众中有很好威信的条件下，可考虑转换或取消。

小 结

滑县的查减运动，所以比过去我们工作员领导的好，原因是放手让群众自己去做，因为能从群众水平出发，所以领导方法就最正确。——经过酝酿，把群众意见收集起来，再把这些杂乱的不系统的意见，经过全体佃雇讨论集中起来，成为正确的，制定成法令，

再将正确决议坚持下去，最后检查总结，改革了抗联包办的新的领导。这要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的具体实践。

如果说滑县群运是有缺点的，那就是大胆放手的主要阻碍，还是包办代替。一种是老毛病、老形式，有些干部仍然把群运定在一定格式里，把活的变成死的，把运动成为摆布，仿佛不用复杂形式，就不能胜利似的，对群众不相信，说群众不讲策略，水平太低、过“左”，于是走调和路线，拿评议代替斗争，就不让群众说话。

大胆放手提出后，新的形式出现了，但却是新的形式旧的本质，把“放手”理解为“放任”，“大胆”理解为“粗枝大叶”。不了解我们放手，也不是故意让群众犯错，这是否认领导的尾巴主义。这也说明了除“强制”而外，没有别的办法，领导没有说服精神。如此，造成了政策混乱和“左”的偏向。

查减刺激了赤贫、贫苦中农，他们要求生活向上，斗争积极性提高了，要求看青粮的“二五”增加，民主斗争果实不分给佃雇，退富裕佃雇，挤股，轮种，并积极无孔不入的寻找开展斗争，甚至和佃雇中发生些裂痕，眼热，嫉妒、排斥外庄人。这就需要以佃雇形式核心，雇佃领袖来领导他们走向正确道路——在民主斗争中取得果实，并开展生产，使大家在新的斗争道路上统一起来。

查减村各种运动推进了一步，反贪污、反“黑地”、反恶霸斗争普遍的开展起来，妇女也开展反虐待斗争，民兵壮大了，村政权改革了，青年儿童很多“扭秧歌”跑步下操，歌声唱到夜静。

目前的问题，是注意改变纠正“左”及责备群众的错误，并反对领导上认为“群众生活改善了”的自满危险，更进一步和群众利益结合，发扬群众自己的创造。

冀鲁豫分局关于纠正 执行大胆放手中的偏向的指示

(一九四五年二月八日)

从去年4月提出大胆放手,反对包办代替及发下毛主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与滑县群众运动中各种经验介绍以来,从八地委所得材料,他们在改造领导方法、发动群众上得到不少成绩。群众观念较前更加明确了,相信群众力量,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并把群众意见集中起来再去指导群众,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革命方法已初步树立。自以为比群众高明,看不起群众,轻视群众力量,惧怕群众行动等思想已大大减少了。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也大大提高了,群众领袖、各种英雄工作模范者也逐渐涌现出来,群众运动开始蓬蓬勃勃的活跃起来,并较普遍的开展。这是思想的转变,群众观念加强的结果,这是很好的。

另方面,在执行大胆放手中,在干部的领导思想上也发生了一些偏向,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把大胆放手误认为大干(重罚为快)、不管(取消领导),盲目的相信群众的自发斗争,否认领导,否认党的政策与政府法令,有所谓“头长帽子大”,“要群众不要政策”,“要群众不要法令”,“群众作啥算啥”,把政策法令和群众对立起来。不敢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和政府法令,认为党的政策、政府法令是拘束群众、包办群众的东西,忘记这些政策法令是从群众中集中上来的,是代表群众利益的,而且群众为着现在和将来的利益,须有自己的政策与法令,问题在于我们如何把党的政策与政府法令变为群众自己的,及执行政策法令的步骤和方法如何(当然有的法令规定

的不适当，须要修正，各县在不违犯行署法令原则下经地委批准可制订单行条例），不是党的政策与政府法令限制了群众运动。

（二）特别值得我们严重警惕的，在八地委的范县，由于对阶级政策认识上的错误，流行斗“好户”的口号，因而在无地主的小村斗争中农（大村也有），对中农实行破产削弱办法，引起中农恐慌不安，对生产消极，被斗争的中农盼望中央军来，这是严重的违犯了党的阶级政策。这不但打击了中农，而且也堵住了贫农上升之路，对贫农也是一种打击。这样我们就失去依靠的群众基础了，这是我们最严重最危险的偏向，必须万分警惕，耐心的大力纠正。我们对中农必须掌握住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损伤中农利益的原则，并要随时注意增进中农的利益，把中农团结在雇工、佃户、贫农周围，与封建势力进行斗争。

（三）由于对党的政策及政府法令了解上的模糊，否认政策与法令的结果，在群众斗争中党的政策与策略性极不明显，对地主不分大小，不按罪恶轻重，不问守法与犯法，不管开明与顽固，一律实行削弱几分之几（有的中小地主因罚过重不能维持生活），过分的伤害中小地主的利益，使守法的开明的中小地主没有出路，无所适从。过分地打击富农以及消灭地主思想的滋长及某一些事实，在争取团结中间力量上发生很多困难。（并不否认争取中间力量要靠基本群众之发动，优势之树立。）这样就妨害了孤立削弱大地主，争取中间力量，发展进步力量的政策之顺利进行。

（四）年来解放区扩展很大，我党的威信大大提高，我党的力量也增大了，有些同志怀疑到党的土地政策是否有基本上的变动，是否要实行土地革命等思想发生。我们地区扩大，力量的增长，我党的土地政策目前未因此而改变，仍是从政治上经济上削弱地主，而不是消灭地主。

大胆放手是一种领导方法，是反对不相信群众及包办代替的具体方法。把大胆放手错认为大干（如重罚、消灭地主的的思想，主张斗中农等），取消领导，取消政策与法令，这是转变中的一种偏

向。这种偏向有的地区犯的小，有的地区犯的大，情况不同，纠正时亦须按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步骤与方法。

转变中发生偏向，常是不可避免的，不应大惊小怪，被它吓倒或因噎废食；但不警惕，让偏向自流发展下去，就会形成严重错误与危险。所以危险在于我们领导上看不到转变中的偏向，或者看到了采取熟视无睹的态度，或者看到后手忙脚乱，莽撞急躁，不从政治上思想上去帮助下级与群众去认识这种偏向，并冷静的研究纠正的步骤与办法，而单纯的采取组织手段去制止，这样不管自己主观上的想法如何，实际上就是给群众泼冷水。

以上偏向主要由我们领导上负责，要从检查、改善我们领导作起，不能怪群众。纠正偏向必须在加强群众教育（即领导）、提高群众政治水平及群众自觉自愿的原则下纠正之。

为便于认识在转变中所发生的偏向，希望各级党委细心的研究中央关于土地政策的决定及分局关于对中农政策的指示，并细心的冷静的检查自己工作中是否有以上的偏向及犯的程度如何，怎样纠正。希注意并报告我们。

对泰运工作的发言*

(一九四五年四月)

黄 敬

《工作通讯》编辑说明：第一部分对敌斗争，略去了。发动群众部分是根据高元贵同志记录抄下的，未经分局和黄敬同志审阅，但可供各地群众工作重要参考。

(一)开始发动群众的条件，这里不谈，只谈干部“左”群众右的问题。譬如减租，是群众的要求，但开始群众顾虑很多，不敢动，这时群众不是一下子就敢干的。我们往往不考虑到群众的这些实际困难，我们干部本身是没有这些顾虑的（有些干部顾虑到不敢放的程度是失掉立场）。这时群众依赖干部的心理很重，像有的群众减租，愿意叫干部出头。这时痛苦特别深或赤条条无牵挂的人常是积极分子。能出头的人很少，这就容易造成包办代替，使干部看着群众非常落后（实际上这是一种假相）。这时最坏的办法是县区干部只依靠法令去进行，连村里积极分子都不要。这种方式最近一二年已经很少了。另外有的只抓住几个少数积极分子，一种是老干部和老支部，一种是白板区临时发现的积极分子。这些新的积极分子很快成为村干部。这些人很快的又得到县区支持，于是就得起劲来。他们得到区的支持，就无所顾虑，他们都说根在上边，谁也得让他三分。

只积极分子与地主斗争，和广大群众与地主斗争，条件是不同的。斗争以后，地主怕的是少数积极分子，是怕他上边有根的。所以村干部借粮使牲口，都不成问题，地主对他们毕恭毕敬，他们也

*本文原载于1945年4月出版的《工作通讯》第3期。

无所顾虑，群众就不然，这些顾虑都存在着。我们只看到这几个积极分子，看不到广大群众的困难，就往往以少数人的积极代替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这就产生了干部“左”的蛮干。抗联到底是啥，群众弄不清，只当做是八路军的，是上级派来的。抗联不是以群众自己的组织出现，而成了恩赐机关。

总而言之，为了上边。这个上边不是群众自己集中起来的，上边，而是从外边来的。许多地方就在这样情况下开始了；开始时也是轰轰烈烈的搞起来了，搞到一定时期，就变了。

等村干部地位稳定了，区干部也走了。但是村干部与群众的联系，□村干部与群众的情绪不一样，村干部是为上边。这时地主往往拆散村干部与群众的联系，把村干部稳住后，就偷偷的向群众反攻。群众找村干，村干因自己的问题解决了，就不管了。有时村干还提一提，但找区干，区干也不管。因为上边的工作是一段一段的，上级的任务是新的，也就不管，因为怕破坏了工作秩序，紊乱了工作阶段。干部不是依靠群众去解决问题，而是等一等，我去问一问，结果一问就没有了。我们不是鼓励干部去听群众意见，而是鼓励村干光听上边，脱离群众，久而久之，习以为常，就不管了；群众也就不支持村干，村干孤立了，区里更不了解情况了。

村干部当了家，就认为取得优势，村干部生活改善了，就认为群众的生活改善了。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就是因为没有考虑到县区干部和地主斗争，老村干部同地主斗争，这同群众和地主斗争的条件是不同的。

除此以外，障碍群众的发动，是害怕群众的观点。我们干部领导斗争都希望照自己原计划进行，区里有一定格式，希望照自己想的格式去做，等群众一动起来，就怕群众这、怕群众那。我们这样□□，就成了群众的束缚，不是为了开展群众的斗争，于是群众不动就说右，一动就说“左”，只得包办代替。怕群众破坏政策、破坏抗战，于是强调干部去搞、政府去搞，而不是研究与总结群众的斗争经验，拿群众自己的东西去教育群众。不是去爱护这些东西，

而是从群众外边拿些东西来，于是党的政策不是群众自己的。有时要群众去打，而自己去拉，群众的纪律也就不能变成自己的纪律了。

有的同志认为，群众往那里一站就表现了伟大，但出主意想办法是我们的责任，结果群众仍是渺小的。

这样，就束缚了群众的创造性，结果干部的创造性也没有了。因为没有群众的创造，就没有干部的创造，就只有等外边的东西，等上级的东西与指示。

所以这一阶段，群众运动中的弯路就走下来了。干部没有到村就有了工作计划，一去就不是群众自己的东西。村干部也学了这一套工作方式。

村干部斗争起来有两个依靠，一个是群众，一个是靠上级。村干部主要是依靠群众（如滑县），就□□团结，很好的听群众的意见。而我们包办代替的领导方法，村干部不依靠群众时也不害怕，就靠上层。所以我们的领导方法与工作方针不符合群众要求，不是有利于群众的。于是，村干就强迫命令，就包办代替。我们的民生工作（如减租）就在这种情形下，有时倒把群众的生活改坏了（如退佃），因为我们不采取群众路线，是采取包办代替的路线。还有一种不深入的原因是右，在此不谈。

（二）我们采取群众路线，群众发动起来，我们能遇到什么问题，到研究滑县经验时再详谈，一分区很快的就可用到。这里只谈一个问题，群众“左”的问题。

只要群众发动起来，群众一定“左”，按部就班，如我们想象一样一步一步走是不可能的。在此有两种偏向，一种是干部跟着“左”，一种是干部右起来，从外边强制群众不叫“左”。这两种情形都容易发生。

群众的积极性和策略性是依靠群众自觉的，群众的策略性也是依靠群众自己培养出来的。在滑县查减运动中可以看到这样的问题，并且有很好的例子。如不要“顿出圈”，倒多了柴火回去又自

觉的倒给人家；增资多要了棉衣，又自觉的提出（见第2期《工作通讯》）；如黄庄提出过左的口号不能为大家所通过等，这都是政策为群众自己所掌握。滑县在民主斗争中，我们的政策不为群众所接受，就是政策没有变成群众的自觉。

当群众高潮时，有时中间分子跑到积极分子头里，比积极分子要求还“左”，最怕领导者抓紧这种情绪，制造很多决议。此种群众情绪，我们以领导平素运动方法已经得不到中间分子的同情，但等高潮一过，就看出中间分子、积极分子与落后分子之间的矛盾。因为群众的“左”，不是能长期下去的。如佃户和地主斗，也不愿意长期闹下去，他愿意把关系弄好，即以斗争求团结，多数群众也想有适当的调整。因为现在又不能消灭地主和富农，还存在着这种关系，所以佃户雇工不能长期和地主闹下去。群众最高潮时的情绪过去以后，群众自己也要求调整关系，这是群众性的要求。群众发动起来了，中间分子和积极分子的距离往往被我们忽视，这就产生了群众“左”干部也“左”的偏向。

另外一种情形，是群众“左”干部右的问题，多半没有依靠群众自己教育自己，培养群众的策略性，建立群众自己的斗争秩序，约束自己。斗争到后来就形成自流，没有领导，无组织，无秩序，就是没有群众统一的纲领，没有自己的组织，没有把积极分子吸收到党内来。这样群众就不能约束自己。对这种状态，如果我们不从根本上解决，即不培养积极分子、组织积极分子、吸收他们入党、经过他们联系群众，不产生群众自己的组织，只站在外边恐吓，用自上而下的命令的办法制止，就叫做泼冷水。

这两种现象，在群众发动起来以后都是很危险的，故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群众自己的纪律，自己约束自己，是非常重要的。

在鄆北、滑县都有这样一个经验，群众由一村行动到数村联合行动，并产生自己的纲领，自己的组织，自己的纪律，这样来约束自己。他们感觉到有统一的必要，如低了，人家说是走狗，高了，地主容易进攻，自己孤立。于是在共同行动中，就组织了积极分

子，吸收党员，组织中心支部，这个党是群众的党。群众把东西退回去，并没有打击了群众的积极性，因这时策略性是群众自己的策略性。产生了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的统一领导机关，群众对这组织，绝不是过去对抗联那样。关于群众自己对自己的约束，我们是不能忽视的。

破坏了旧的秩序和生产关系，就要建设新的秩序和关系。男女关系、家庭关系也是如此。这时群众是须要建设一个新秩序，我们在这一方面常常忽视。

群众的“左”，若长期固执下去，群众也不愿意，常造成积极分子的孤立。在今天政策允许范围内，我们不在乎破坏旧的关系，但要根据群众的需要建立新关系。如不这样，群众发动起来后，不是听其自流，就是用外力来压制群众，对群众泼冷水。

建立新的关系就是第二个组织起来，无论在工作方式方法方面都有一套新的，这点我们还没有很多经验。但整天跑，整天开会，就耽误了生产。

（三）关于法令问题，政权干部有些错误认识，开口要守法，实行法治，不能超出法令。这样把法治与民治对立起来，把法律了解为超阶级的。我们承认民主，但又说人民之上还有法治。

民主政府法令是人民自己对自己的一种约束，假如此法令不能满足人民利益时，就要改革这种法令。人民制出法令是约束自己与巩固自己的胜利，照顾地主富农是基本群众自己照顾地主富农，是从基本群众利益出发，吸收地主、富农参加，是基本群众吸收的。我们政权干部公开说“一手托两家”，站在各阶层之上，是自己麻痹自己。很多共产党员参加到政府去，不知自己是干啥的，这是失掉立场的。以后县上制定单行法，可多吸收群众参加讨论（滑县是小规模的吸收群众参加），这样群众也知道法令是自己的，才自觉的去遵守。

农民发动起来

要迅速坚决的转入生产运动*

(一九四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高元贵

自提出大胆放手的领导方法后，在八、九分区，很多县于比较短的时间内，先后把农民发动起来。其他分区（如第十、十一分区）也有某些县，农民发动的很好。在这些农民已经发动起来的县，要迅速的坚决的领导广大农民转入生产运动。

在农民发动起来的县，一般的说，减租减息（赎地在内）增资是彻底实行了，反贪污反恶霸等也做的比较深入普遍。广大农民以雇工佃户贫农为骨干组织起来，形成一支坚强的革命力量，显示了他们无孔不入无坚不摧的威力，贯彻了各种法令，分得果实，得到生产资本。农民的生活改善了，同时把不法地主恶霸等顽固势力从自己的头上推倒下来，并进一步压倒他们的威风和气焰，制止他们的不法行为，最后使他们服服〔俯伏〕在地，奉公守法，农民的社会地位是大大提高了。总而言之，一般的完成了减轻封建剥削、摧垮封建统治的任务，农民翻了身，在农村阶级对比中，树立了优势。这时候，只有迅速坚决的转入生产，才能团结农村各阶层，巩固农民的优势，建立农村正常的统一战线，并进一步提高生产，增加根据地的财富，一致对敌，准备反攻。当农民发动起来，若不抓紧火候，迅速坚决转入生产运动，则发动群众的斗争长期拖下去，就一

* 本文原载于《冀鲁豫日报》第395期（1945年5月21日）第1版。

定发生这样的情况：

(1) 贫农产生“推平”、“均产”思想，顺着锯口往下拉，势必波及中农，斗争中农，使中农感觉无发展前途，基本群众内部发生裂痕。(2) 开明士绅、守法地主则感觉到，就是开明、守法也找不到出路，失掉与农民合作前进的信心。(3) 社会长期波动，各阶层（特别是广大农民）生产情绪降低，产生大吃二喝浪费挥霍的风气，使根据地财富受到损失。在这种情况下，就阻碍着新的社会秩序的建立、农村正常统一战线的建立，对抗战不利。

由发动群众转到生产运动，不是轻而易举的事，要碰到许多困难：首先，有些干部满足于群众的情绪高涨和活跃，慢慢麻痹起来，认为这样下去还不错；其次，群众留恋于斗争，认为斗争最容易、最省力，可以解决一切，不愿去从事生产；复次，干部与群众都没有组织生产的经验，对生产运动没有信心。这些困难，在某些县开始或已经证实了，我们要作足够的估计，用最大努力消除这些困难。干部满足于群众的活跃，要以长期不转入生产的损害，惊醒他们的麻痹，打通思想。群众留恋于斗争，不愿生产，要深入动员说服，说明长期斗争下去，对自己很大的不利，在减轻封建剥削后，只有努力生产，才能进一步改善生活，达到丰衣足食。干部与群众没有组织生产的经验，要掌握重点，埋头苦干，创造经验。这就是领导的作用，在大胆放手的领导方法中，也是不能忽视的。忽视领导作用，就形成放任与自流；放任自流，就一定造成错误。

由发动群众转到生产运动，因一县的工作常常是发展不平衡的，不必等到全县农民都发动起来，再去作全盘转变。我们主张一村一区的转变，一个村农民发动起来，就在一个村积极酝酿生产，一个区农民发动起来，就号召全区群众，推动全区农民组织去进行生产。发动农民时期未彻底解决的问题，在生产运动中，还可以继续去斗争。企图在发动农民的斗争中，把一切的问题都彻底解决，然后转入生产，即是把发动群众斗争与生产运动划为不相衔接的两个阶段，是一种机械的领导方法，与客观事实不会相符。

根据某些县的经验，农民发动后，生产情绪最高的是贫农（佃户雇工包括在内），因为地主富农还在恐慌，中农也不够稳定，而贫农则在斗争中，除减轻剥削，推翻压迫，分到果实，得到生产资本，改善自己的生活，提高自己的地位外，别无一失。所以在转入生产时，固然应该做一般的号召，动员各阶层积极参加生产，但要着重依靠贫农，大力支持贫农，使他们首先在生产战线上积极起来，同时组织中农生产。事实上贫农积极生产起来，中农就感觉有了发展前途，一定也积极生产起来，逐渐使农村各阶层都积极生产起来。我们要在生产运动中，也树立雇工佃户贫农的领导骨干。

由发动群众到生产运动的转变，是群众运动内容的转变，是工作方针的转变。大胆放手的领导方法，在发动群众中考验了，是一种很好的领导方法，是合乎党中央关于领导方法决定的各种原则，它同样适用于生产运动。在生产运动中，我们也要坚决反对包办代替，要相信群众力量，相信群众的创造性与积极性，把生产运动形成真正群众自己的运动。在生产运动中，也要站在群众之中，不要站在群众之上或群众之外。这就要求我们干部亲自参加生产，与群众共同去生产，并从群众现有生产经验出发，在解决实际问题中，一步一步的提高群众，不要机械的搬运先进地区的生产经验，好高骛远。在生产运动中，也要从下而上的建立群众的生产组织——互助组与合作社。生产运动在一个村开始，就建立一个村的生产组织；生产运动扩大到一片村、一个区、一个县，就建立一片村一个区一个县的生产组织。在生产运动中，在自下而上的建立群众生产组织中，大量培养劳动英雄，表扬与奖励劳动英雄，并首先教育现有的群众斗争领袖积极参加生产，努力生产，由群众斗争领袖变为劳动英雄。他们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威信，先由他们来领导生产，生产运动就能很快的开展。

在冀鲁豫行署专员联席会上的 总结报告（节选）

（一九四五年七月九日）

徐 达 本

这个总结报告是根据会议讨论整理出来的。会议开了两个月，讨论的东西很多，我整理的如与专联会上讨论的或署务会议讨论的有些出入时，请大家指出。总结内容主要是扶植群众问题，里边分五部分：

- 一、政民关系问题；
- 二、法与行政力量的使用问题；
- 三、帮助群众改造与掌握村政权，建设“三三制”的村政权；
- 四、组织领导和干部问题；
- 五、生产问题。

一年来，边区群众运动搞的轰轰烈烈。运动的结果，农村中已起了基本变化，群众的地位已从压迫之下解放出来，走上了各阶级平等，生活已得到很大的改善，封建统治被推翻了，群众的优势已在农村里树立起来，群众的情绪及抗战生产的积极性已空前的提高。根据地有了这样觉悟的有组织的群众支持，比以前是更加巩固了。我们进一步建设繁荣的根据地，特别在发动群众比较好的地区，已有充分的基础。

在运动的过程中，政权与群众关系有了极大的改善，关系是更加密切了，一方面，群众在政府法令保障下，用自己的组织力量取得了和争取着应得的利益，这是政府和政府干部对群众运动的扶植；同时，在政府和政权干部本身也创造了不少的经验，得到了相

当的锻炼，从群众出发的作风与群众观念都增强了并继续增强着，在群运本身及政权扶植群众均有很大的成绩。

但我们不能满足已有的成绩，从整个边区来看，发动群众比较好的地区还不到一半，完成全区的发动群众，还需要今后更大的努力。

今年在全区范围说，发动群众仍是中心任务。完成这一伟大的任务，党政军民不仅必须用最大的努力先把根据地群众发动起来，而边沿区也必须进行发动群众。坚持边沿区斗争与开展当时当地所允许的群众运动，不能分离。大块根据地是应该当做重心尽先把群众发动起来。

政府的中心任务应该与全区的中心任务一致，换句话说就是政府今年仍得以大力扶植群众运动，而且应当把群众发动的更快更充分。我们为了完成这种任务，政权工作与作风还需更大大的改造。群众运动使农村起了基本变化，政权工作即不能不跟着变化，长期处在群众未发动状态下的一套政权工作，很多是不合时宜的。

这个会议所研究的群众运动中政权工作的新创造是应该很好发扬的，这种创造对于缺乏新经验的政权工作者更加宝贵。我们的缺点还很多，其来源除来自思想病外，还有缺乏经验与政权建设的历史条件所带来的（当然思想病——群众观念不明确，对旧的东西不自觉，主观上应负主要责任）。这次总结的精神，主要的是以发扬成绩和经验来克服缺点，从历史上和领导上来检查，以启发干部思想上的自觉。

兹先谈谈政权建设一些特殊情况，这对我们接受历史经验以励[利]将来是有好处的。

政权建设特殊情况是什么？首先，我们的政权是八路军来了后自上而下建立起来带临时性的统一战线政权，不是（也不可能是）群众用革命手段推翻旧的统治自下而上建立起来的，也不是（当时也不可能是）由动员群众用完善的民主方式实行普选而建立起来的，因此政权建立的当时，群众没有发动起来，村政权依然为封建势力

所掌握，仍是封建政权，它与上级政权在性质上根本不同。同时各级政权的组织机构基本上又是沿袭着旧政权的形式，维持了独任制，这是与民主政权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不相称的。政权内部的民主既无民意机关监督，又无民主集中制的集体领导来保障，独断专行的毛病是难免的。政权的部门组织基本上是老一套——民、财、建、教、司，一开始就平均主义的或形式主义的都建立起来了，不是需要作什么就来什么部门。在各部门分工上也没有脱离旧一套，但是工作是新的，内容不一样。旧政权是要如何统治人民，保护压迫者的利益，我们是发动群众，给人民利益，保护人民利益。看问题的方法不一样，旧的是保守不变的，孤立割裂内部联系的，我们的方法是一切事物都是发展的，互相联系的。如果说旧的是利于互相牵制，互不联系的话，那我们的就是利于统一配合。因此，旧的形式，新的内容，在分工上弄不清，常常扯皮，一直到现在这个东西还研究不好，工作效率受很大影响。

其次，政权干部几乎完全是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里面，有外来的学生，农村出身的学生，当过教员的，在旧政权当过职员的，开明士绅等。这些干部多数革命热情很高，有为抗日民主而奋斗的信念，他们仍是建立政权不可少的力量，而且现在以至今后还是政府干部里的主要力量。不过他们在工作上，新政权的经验很缺乏，旧政权的经验传统倒是或多或少知道些。在旧政权作过职员的当然熟悉旧一套；开明士绅过去多与旧政府有较密切联系，小学教员也经常与旧政府打交涉，也知道一些；就是学生，因久在旧政权统治之下，也不免沾染些旧的作风。因此，大部分政权干部可以说新的经验还没有，旧的经验倒不少。大家都有决心创造新的东西，可是由于缺乏新的经验，对旧的缺乏鉴别和批判能力，结果自觉的过多沿袭了旧的东西。

政府建立就担负繁重紧急的战争动员工作，一开始就是向群众要东西。当时为了供给战争，要东西是对的，是同群众的基本利益一致的，同时抗战初期抗日高潮中战争动员是与群众当时要求相结

合的。就是因为如此，政权当时的工作是很有成绩的。

以上这些，据我知道的地区，大体都是这样。

但是在工作进展上，我区与先进地区有很大的差别，基本问题就是我区很长时期群众没有发动起来。各个先进地区，紧紧的在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之后，就转入发动群众。群众发动起来，群众从被统治被压迫的地位走上平等的地位，实行了普遍自下而上的改造了政权，从上到下一直到村政权都是完善的抗日民主政权。群众生活改善了，生产情绪高涨，经济生活欣欣向荣……就使根据地的面目一新。

我区发动群众曾经失掉良机，曾经走了许多弯路，长期没有真正把群众发动起来。差别就从这里产生，政权建设上的问题也就从这里来了。

(一) 抗日民主政权建立之后，在村子里长期存在了封建统治、封建统治秩序与抗日民主政权及抗日民主秩序相矛盾对立的局势。工作不通过村政权不行，通过村政权，封建统治者表面上应付，实际上给变了质。法令规定群众应得的利益，被封建统治者劫夺，进步法令反而被他们所利用，作为加重对群众压榨统治的东西。抗日民主政权同群众的联系，就这样被封建统治者人工的割裂开了。封建统治者把自己应负担的转嫁于人民，并用残暴的强制手段对付人民，在人民痛苦的基础上完成“任务”以应付上级。因此群众在长期〔悲〕惨痛苦的生活里，高度抗战热忱逐渐冷下去，根据地群众情绪长期的陷于消沉状态。

(二) 根据地统一战线政权的形成，开始表现在各抗日民主阶级代表人物在上层政权里联合执政，这点在根据地的建设上是非常重要的。因此，统一战线的政权在根据地就成了团结各阶级共同抗日的旗帜。

但是根据地的统战，应该是以广大工农为基本势力的农村统战，统一战线，重要的是农村统一战线。广大的工农群众发动起来，在各阶级平等的基础上，形成农村广泛的群众性的统战，这样

统战才有力量，才是胜利的保证。如果长期停留在发端的状态，甚至把上层统战当作最后目的，那就错了，这样统战是没有力量的，只依靠上层统战是没有前途的。

可是边区由于群众没有发动起来，统战停留在上层干部中间的时间是太长了。上层干部间是合作，可是农村里是封建势力残酷的统治和剥削，长期存在着这种上下极不相称的局面。尽管在上层人士间民主团结都很好（当然民主团结是好的），但是工农群众还是没有得到解放，在这点上（这是基本的一点），实际上是脱离群众的。

（三）临时性质的抗日民主政权，这一段拖的太长了。同时，在组织形式上没有从开始建立时就采取委员制，政权于干部长期在政权里，没有民主集中制的组织纪律，没有觉悟的广大群众有组织的监督，政府里长期没有工农群众领袖参加；在工作上，繁重的战争动员工作以及老于战争动员而不可少的财物管理、优抗、抚恤、家属救济……久而久之，形成一套片面向群众索要和直接服务于战争的工作秩序。政权干部长期处在这样一种组织环境、工作环境里，在思想意识作风上，是难免〔于〕不受影响的。所以，政权干部群众观念薄弱，民主作风差，是有其特殊原因的。

几年来，政权工作是有成绩的，特别是在战争动员上，成绩是很多的。根据地就这样依靠八路军和党政民干部的努力坚持了，在这一点上，广大人民是满意的，特别是上层。因此就来了一个问题：在封建统治下面，没有起来的群众，内心的意见说不出来，也不敢说，政府不断听到的是颂扬和称赞，特别是来自上层的多。对这样情况我们不自觉，以致麻痹自满起来和发生了错觉。

夸大和满足已有的成绩，认为成绩是靠上层统一战线得来的，因此在民主问题上与上层商量多，与下层群众商量的很少，开士绅会多，向群众讨论问题少，听取上层意见多，听取群众意见少。有时政府决议与群众利益发生矛盾，即便已经知道不对，往往是强调政府威信而不加改变。出入多是上层之门，与上层联系很密切，有

所谓“统一战线作风”，实际上就是同上层联系的作风。为了使上层看得起，穿的住的都要讲究一点，待人接物也讲究旧的俗套，相反的，对如何联系群众下的工夫不多。总之对上看的重，迁就，对群众是忽视，或者认为成绩是靠政权力量得来的，因而习惯于使用自上而下的强迫命令方式，即所谓：群众落后，不强制不成，或强迫命令收伟大效果等。几年来强迫命令在政府好像成为体系，什么都是政府高明，“你听我的”或“我给你办”。作出成绩是应该的，是由于领导高明，出了毛病就是下级不行，群众不行，单纯批评责备，以至于打击，鼓励是很少的，养成干部对上负责与对群众负责对立起来。

总之，我们是不真正了解力量是从群众中来，群众是有无限的力量和智慧。过去我们没有把他发动起来，集中起来，对革命事业的损失太多了。这个当然首先应从领导上检查，领导上的不自觉，应该负主要责任。

目前群众轰轰烈烈的起来了，我们亲眼见到、亲身体验到群众的力量了，推翻了封建统治，正在用自己的力量创造新的农村。政权干部必须自觉起来，广大的群众才是可靠的力量，群众的创造力量是无穷尽的。我们必须依靠群众，相信群众，克服单纯依靠上层、依靠政权力量、强迫命令的缺点。

在运动里我们已经创造了一些宝贵的经验，下面分开几个问题谈。

第一部分：政民关系——政府与人民的关系，政府与群众团体的关系

抗日民主政府是“三三制”的统一战线的，是属于抗日人民的。抗日人民包括各个抗日民主阶级的人民，其中广大工农劳苦群众(占人口90%)是抗日民主的基本势力。他们在民族民主革命里最坚决，他们的利益与抗日民主利益最能一致，也就是政府所依靠的基

本势力。因此政府代表各阶级利益，首先就应该代表工农劳苦群众的利益，照顾各阶级，也应该首先照顾劳苦群众的利益。他们处于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同压迫阶级同样照顾显然是不公平的。必须把他们先扶植起来，政治上要平等，经济上要改善，从压迫下解放出来，才能发动他们抗战的积极性。过去我们不真正了解这一点，同样的照顾和代表各阶级利益，结果是封建统治、封建剥削原封不动，群众依然过着痛苦的生活。尽管讲政府是属于人民的，还只是我们自己讲，群众没有得到实际利益，是体会不到这一点的。因此过去群众称政府是您的政府，同政府的关系不正常。政府必须给群众以利益，群众与政府的关系才能密切。但给群众利益用恩赐的方法是不好的，必须发动群众组织起来，用自己的力量争取，用自己的力量巩固，政府则是予以扶植和保护。这次群众运动中已充分证明这一点是正确的，群众得了利益，政府与群众关系即大大改进，群众称政府是咱的政府了。

下面接着谈几个具体问题：

第一，关于与上层关系问题。过去搞的有对处，也有毛病。与上层适当联系是对的，人家说我们与上层联系多，与群众联系少，实际上是有这样偏向的，前面已经谈过了。但这不能责备下面的干部，也不能忽视过去历史条件而以现在的观点批评过去，今天主要的是把这个问题明确起来，建立正确的关系。

对上层应区别顽固与开明，尚在抗日的顽固分子有抗日要求，可是由于他反共反人民，妥协危险很大，因此应坚决反对其反共反人民的一面，发扬其抗日的一面，以争取团结他们共同抗日。开明人士是赞成抗日并且赞成民主改革的，同意并可以参加反对顽固分子的斗争；他们在经济上政治上的封建性，和人民是有矛盾的，站在抗日民主最高利益下，是可以调节〔解〕的。因此，对开明人士团结是主要的，开展适当的批评（斗争）也是必要的。

总之，对上层应该是有团结，也有斗争。符合于抗日与民主的一面，要团结；违抗抗日与民主的一面，就应该批评。团结与斗争

应该站在政策法令立场和广大群众立场上，政府应该严肃的坚持政策法令，区分守法与非法，守法的应加以保障，非法的应予以制裁。团结不是单靠我们，主要的是靠民众，批评也要依靠群众。团结与斗争，政府和群众是一致的，政府应与群众相结合。虽然群众的方式与政府的方式不一定完全一样的，但并不妨害二者之间一致性，如果从上面（来自政府）和从下面（来自群众）二者巧妙结合，效果是会更好的。

过去我们的毛病不是与上层联系错了，不是讲团结错了，错就错在只知道团结而忽视斗争，同时缺乏群众观念，没有同群众相结合，孤立讲团结或进行斗争，或是我们讲团结，群众要斗争，政府与群众的意图不一致，二者相对立。

至于私人关系或私人感情是否要呢？当然要。只要立场站得稳，它对工作也会有好处。用私人关系进行团结，好团结；用私人关系进行批评，可以批评的更深刻一些。应该利用私人关系进行团结和批评，简单的采用决裂的办法是不对的，应该使私人关系为革命服务。与上层人士的来往也不应采取拒绝的态度，来往是对的，但应该慎重的。应该了解群众的情感，应与群众感情一致，特别是在群众运动里，不要因之而影响了群众的情绪，因之有某些不善良的人们惯于借口与抗日政府来往以欺压群众。当然政府不能拒绝这样的人来，可是他不来就不要去找他，他要来了，就应该教育他批评他，帮助群众进行些工作。至于送礼、请吃饭、住房子等问题，我们认为除去自己家里亲戚、老朋友出于至诚的以外，只是由于我们是政府干部而与上层建立的一般关系，就不应收人家什么礼物，不应吃人家的饭。如果是有错，企图找来说情，即便是亲戚，是朋友，要给以教育和批评，东西当然不应该收。我们政府对错误是不留情面的。在住房子问题上，不要尽找好房子住，应注意如何能更好的接近群众。一般的说高楼大厦本身对群众就是一个压力，住在里面很容易脱离群众。总之，在衣食住行上，我们要养成接近群众的习惯和风度。对于过去的和现在的“工作关系”，这个在新解放区和

边沿区是很多的，他们对抗日作过或还在作着有利于抗日的工作，但是他们有的与群众关系不好，甚至很恶劣，群众起来要追究，我们怎样办呢？我们应分别具体对象，深入了解他同群众的关系，就是说我们不只要了解他们作些抗日工作这一方面，还要看他与群众关系。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同群众一起团结他很好的工作和进行适当的斗争。我们对“关系”应该经常帮助、教育他守法，只要守法，政府会保障的，对非法行为不予保障。

第二，关于政府与群众团体的关系。政府是属于人民的，团体是群众的组织，当然政权应该保护群众的组织，群众团体应该拥护自己的政府，为群众服务，政民应团结一致。下面分几个具体问题来谈：

（一）政民团结问题。政府与群众团体应互相尊重，特别政府应强调尊重群众团体。扶植群众团体的威信，就是对群众运动的一个扶植。过去有相互尊重不够的现象，有所谓“老大”、“老二”的说法，那都是不好的。到底谁大呢？谁都大！谁都第一。今天应该把它的组织与任务联系起来看，组织与任务要统一。今天以发动群众为中心任务，就应以抗联为主，任务是第一，它就为主；政府工作来了，如征粮等是政府为主，政府就是第一，大家就要围绕政府进行工作。离开任务单往组织上去比较谁大谁小的想法是不妥当的，只有互相尊重，才能更好的团结，任何一个有轻视的态度都是不容易团结的。为了完成发动群众的任务，必须政民团结一致，有分歧的意见和不团结的现象，应当多召开几次联席会，把分歧点公开出来，大家面对面的检讨一下。只要相互虚心的检讨一番，就会团结的更好。几个分区这样作的很有成绩，应该推广这样作法。特别某些地区由于过去反“左”，政府作的有些蛮，对抗联与群众泼了冷水，使政民关系不太好，值得特别注意。政府应多检查自己，并把反“左”中某些处理不当的案子加以纠正，是哪级处理的由哪一级纠正，行署处理的专署可提供具体意见。这个问题如不很好的处理，定有碍于今后群众运动和政民团结的。

应该把抗联（群众团体的领导组织）与下层组织，干部与群众当作一个整体看。过去有的把抗联与群众分裂开来看，抗联是抗联，群众是群众，相信群众可以承认，但相信抗联就不舒服，对群众运动不能在背后指手划脚的批评了，但批评目标转向抗联了，这是不对的，这是相信群众这一观念还不够完整的表现。抗联是群众组织的领导组织，是代表群众团体的利益的。对群众运动不能背后批评；对抗联也不能背后批评；对群众运动不能自由主义，对抗联也不能自由主义；尊重群众独立自主的运动，就应该尊重抗联对群众运动独立自主的领导。群众运动是群众自己的事，是独立自主的，不能干涉，不能包办代替。群众真正起来之后，包办代替就会碰钉子。如果我们不自觉的认识这一点，不坚决割掉包办代替这条尾巴，就会发生纠纷。假如这样出纠纷，闹分歧，主要应由政府干部负责。

（二）群众自己干，到底干啥呢？这是政民分工问题，是政民配合问题，主要就是在群众运动中政府作啥的问题。政府是属于人民的，政府的权力是人民给的，不是和人民对立的，而正是为人民服务的。用权力保护群运，用政策法规指导群众运动，群众自己的事情交给群众自己办，这才是完整的为群众服务的观念；只是“我给你办”，是片面的恩赐观点。

在群众运动方面，政府干部感觉苦，感觉闲的苦、拖的苦等，基本原因是不相信群众，放不开手，总是怕这个怕那个。可是群众在政府扶植下、抗联领导下，当真自己运动起来，创造了许多新的东西、好的东西。这些新的好的东西过去我们没有见过，没有经过，就有些不惯，总是想不如我给你办的妥当（代替包办的想法放不下）。实际上假如我们不保守，不自以为是，相信真理的话，群众是对的。我们今天应该深入到群众运动里边，不要自以为是。虚心学习群众的创造，根据群众的这些经验，很好的加以总结，再从群众的经验水平出发，扶植群众起来办自己的事情，这样才能更好的领导群众，服务于群众。我们可以把过去与现在比较一下，过去

权力向上集中，对群众运动不大胆，我们代替包办，效果如何？现在是政府扶持和把群众的事情大胆的让群众自己起来办，依靠他自己的力量，自己去办理，效果如何？很显然，过去一年的群众运动当中，解决了多年来未能解决的问题，群众情绪高起来，根据地有了朝气。事实证明，我们的工作离开群众运动是不成的，离开群众力量是不成的。

相信群众，群众自己的事情让群众自己办，不是政府不办事，相反的，群众要我们做的事情很多。从职务上讲，政府有人民赋予的权力和人民委托的职责。要把所有职权都谈谈不可能，只就下面几个问题说，哪些应该政府作呢？

1、杀人问题，应该是政府作的。这个权力只有专署以上的政府才有，非经过专署以上政府批准，不能杀人。

2、扣押、封门、查封财产，也是政府职责，一般的是县级以上的政府才有这个职权。但为了便于扶持群众运动，群众案件经群众要求，区以上政府可以执行扣押和封存财产，必要时可以委托村政权作。因此，村要自己作，须经过区里批准。

3、肉刑在政府在群众都是要禁止的。至于运动中个别发生的抬戴绿帽子、游街或撒尿抹屎等，那是群众在一定的具体情况下，对付少数非法分子，出于义愤，不得已采用的具体的斗争方式。这样个别事件，政府不能认为群众这办法不妥（当然形成风气就不好了）。

这是不是有违保障人权法令呢？

保障人权是保障社会上有平等的人权，不允许非法危害他人人权。当社会上还存在着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时，保障人权首先〔是〕保障被压迫者的人权不受欺侮。当前群众为了解放自己的运动，就是争取和保障自己人权的运动，是符合保障人权基本精神的。在运动里群众在反抗某些恶霸分子，行动起来时有些过激行动，是很难免的，不能说群众违犯保障人权法。

运动里也曾发生过“死”和群众自己扣押、封存财产的事情，

虽然是个别的或是极少数的，也确乎值得我们注意和研究。

群众自己扣押人和封存人家财产事件，主要是由于政府在工作中有官僚主义或者因为来不及而发生的，政府应该自我检讨，不当责备群众，而要积极想法把这种事情作适当处理，应该把被扣的人转到政府去或合法委托村公所代办。除上述情况以外，还有解决问题方便不方便的问题。由于过去政府与群众关系不够密切，群众出入政府之间总有些不大胆，群众为了解决问题快，就把对象关在屋子里，双方商量解决的办法，待双方意见一致时，问题就完结了。我们为了斗争及时和便利，也可采用村监狱的方式，把斗争对象委托于村管理。

“死”的情况也很复杂，有的被斗争后自己寻死，有的是老早有病以致死，这些“死”，群众是没有任何责任的。还有的是因为对方行为太恶劣，又很顽强，政府帮助得不及时，以致引起群众激愤的行动，不慎以致死。这种事情是不好的，政府应适当加以处理。处理的原则应该是：

首先，群众反抗这种坏分子的斗争精神应当予以鼓励，对群众的高度热忱应该爱护；对对方应把他的错误指出来，加以责备；还应该很好的检查我们的领导。总之，不能单纯批评、责备群众。然后，通过抗联领导，由群众自己检讨，由群众自觉的接受政府适当的处分。但政府的处分原则上应从轻，最后对死者的家属加以安慰。处理群众运动中的偏向不要形成法，不用文字向外公布，主要是要我们政权干部了解这种原则，有问题就向抗联直接谈，通过抗联教育群众。根据过去经验，要有问题不先在群众中酝酿，不等群众自学即用法来限制，实际上就给群众泼了冷水，予非法分子以口实，向群众进攻。已经过多少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应该很好接受过去的经验。

同时政权干部在群众运动中，思想上右的倾向是严重的，因而对政权干部的教育应强调群众观念，强调群众的创造性，相信群众，把群众发动起来，这是当前基本问题。

（三）政府与群众团体在发动与组织群众上的关系

发动与组织群众是团体自己的事情，政府应加以扶助。

群众运动是群众在统一战线内部于法令保障下独立自主的、解放自己的运动。群众解放自己和执行政府法令，二者是一致的，是相结合着的，目的是为群众的解放。片面的说群众运动是执行法令的运动也是不妥当的，那不是法令为群众服务的看法，而是头脚倒置的看法。政府与群众运动的关系是很密切的。政府的责任就是要贯彻法令，扶持群众的翻身，这是一个艰苦的组织工作。集中群众经验要及时，颁布法令要恰合时宜，过早过迟都脱离群众。法令颁布后，要把法令变成群众自己的。一般来说，法令为群众接受和掌握以后，就开始行动，行动中的困难，政府应予帮助解决，整个过程中要贯彻着群众路线和政府力量与当前群众力量相结合。我们欲掌握的好，就非自己深入到群众中去不可。

政府干部要相信群众，要亲自动手，经过亲身体会，才能更亲切的了解群众真正要求。我们只走抗联干部路线，法令交给抗联就算完事，只靠抗联干部反映群众意见是不够的，还需政府干部与抗联干部相配合，深入到群众运动中去，在整个过程里协同工作。这样法令与群众相结合，政府力量与群众力量相结合，会考虑的更周到，解决得更完善。

有的说在群众运动中插不上手，事实并不是这样。根据下边的经验，证明可以作的事很多，了解情况，研究情况，讨论和决定进行工作的步骤，对群众进行法令教育，帮助群众讨论法令，听取群众对法令的意见，集中群众的意见去充实法，把法令变成群众自己的，启发保护群众的积极性，扫除运动前和运动中的障碍，领导村政权为群众服务或协助群众建立新的政权，不断总结经验，提出任务等等，政民协同进行都是有好处的，工作多得很，作不完。插不进去，恐怕是没插。当然也有政府不便着手的，如群众内部的组织问题、教育问题和群众斗争，这些都应由抗联领导，只是在斗争中需要政府出面时，政府可以出面解决问题，答复群众的要求，代表

政府宣布判决等。这样做是因为政府不应该干涉群众组织内部问题和在运动中不应放弃政府的面貌。

在群众运动里，政民的任务是统一的，立场也是一致的，目的都是把群众发动起来。但是因为群众团体是群众自己的组织，各个团体是以一定群众利益代表的面貌出现的，而政府是统一战线的，是以代表各阶级利益的面貌出现的。

政府以代表各阶级利益的面貌出现，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代表抗日民主利益，政府面貌就是抗日民主的旗帜，是团结与可能团结所有的抗日人民的旗帜。过去的毛病不是因为政府与群众团结的面貌不同，而是因为群众观念不明确，没有把被压迫群众利益强调起来，大力加以扶持，而是同样照顾，同样代表，结果维持了压迫者剥削者的非法利益。政府与群众团体面貌混同是不好的，这对于团结所有人民是有影响的。只看到群众目前的利益，忽略群众远大利益是不对的。同时，群众团体是群众自己的组织，政府是权力的组织，二者混同起来，便会形成无政府状态，或使群众模糊自己的组织和自己的力量，对群众运动本身是不利的。

第三，政民配合上的组织形式问题

政民联席会在发动群众及工作排列上共同研究总结经验，这是个很好的形式。光从思想上解决问题还不行，必须在组织形式上大家都有义务和权力，才能达到好的分工，共同负责任，这种民主形式是很好的。在传达布置工作，总结经验，政民共同召开下级干部联席会，这种形式也很好，精神容易一致，了解问题会更全面，并且可以互相学习。召开下级干部及士绅联合座谈会，在群众已经发动起来地区，大家以平等精神座谈，各方面交换交换意见，对大家都是个教育，对团结是有好处的；但在群众刚刚发动的地区，少开或是不开才好。

共同深入村里进行工作，有的采用小组的形式（内部尚有分工），有的是不采用小组的形式，分别而有意识的配合工作。总之，在精神上都是协同下去进行重点工作，互相配合；至于什么形

式更好，还需要大家研究，以后才能作结论。

.....

第四部分：组织领导与干部问题

(一) 组织领导——主要谈如何集中力量扶植群众运动问题

甲、加强专署权限问题

今后行署着重掌握政策和原则及关于全区性的调动和调整。在行署领导下，各个专署独立自主的进行工作，在进行工作中，使专署权限更扩大一些。过去有些东西应交专署决定的，没有交给专署，行署决定了，结果有些工作搞的晚，不及时，或是解决不恰当。

加强下级权限，更要强调下级服从上级，以发挥统一的力量。全区性的制度必须依照行署的制度，普遍性原则性的新问题要行署批准才行。上级对下级也要更尊重及相信，在工作上，上下级的联系更应密切。过去这些地方做的不够好，上级官僚主义比较严重，这一点行署要检讨；下级不反映情况，自由主义，下面也要检讨克服。只有自下而上的注意，今后在领导上工作上才能发挥更大的效能。

1、财经工作

A、统一的负担办法由行署制定，专署制定新办法或改变行署的办法，应经过行署批准后再颁布。

B、保证上解任务，坚持分区自给原则。根据行署的规定，各专署根据自己的财政情况，在不超过行署规定的原则下，可以机动处理。专区特殊开支，由专署协同有关方面自己决定，特殊情况非行署补助不可的，可以调剂。有特殊收入的，还可以增加上解任务。

各级政府的人员，仍根据四次简政的编制，给专署以机动权，可以适当增减。专署增加勤务员，区设司法助理员，专署民、教分科等问题，由专署根据财政情况与工作需要决定。不过这里要注

意，关于工作需要问题，希望各专署进行比较深入的研究。这联系到三个问题：一个是工作问题，工作要精，过去的工作还很繁，应很好的注意，使之更精一些；第二个是作风问题，官僚主义，脱离群众，文牍主义，致使工作效率不大，工作要精，作风也要转变；把这两个东西研究之后，再看组织问题，看是需要增加人还是需要减人。离开工作问题、作风问题，该组织问题是不会解决的。研究结果要报告行署，财政有困难，但不是说应当办的事不办，要联系起来考虑，要在我们现有条件下分别缓急处理。

C、工商建设组织问题没有作决定，等行政委员会讨论后再决定，现在仍维持原状。

D、预决算由专署核批，半年向行署报销一次。军队由分区负责，向军区报销。地方机关团体由专署负责。

E、县级军政民的粮食问题可以由县掌握，由专署讨论决定。

F、银行资本应保证全区统一调动，不经上级批准的不准借用，已决定的生产贷款由专署自己决定处理。

2、干部任免与区划问题

A、干部任免问题改为一级负责制，专署干部由行署负责任免。县干部由专署任免，区干部由县任免（指委员），任免以后向上级报告。至一般的管理、教育、了解工作，要再深入一级，行署深入到县，专署深入到区，就是说在管理上仍是两级制。至于县长，一则过去实际上是专署任免，再则将来一般的委员都要民选，所以也交专署委任，至于委员与科长的问题，今后改成委员制以后，科长可能有些当了委员，有些由于“三三制”的关系，可能当不了委员。我们认为，科长、局长与委员在委任权限上应统一起来，根据一级负责制的精神，科员就可以由各级委员会负责任免。今后这种委任，应当由委员会负责，而这一级干部管理的经常工作，应由民政部门负责，并经常报告行委会。局的干部工作，要经常向民政部门作报告。

B、行政区划，县与区的变动，县与县之间的变动，增加区，

增加县，统一由专署决定，报告行署。区与区之间的小变动，不涉及机构人员开支的，可以由县决定，报告专署。牵制到两个专区，专署不能解决的，由行署决定。

乙、集体领导与分工负责问题

各级政府逐渐改为委员制，区村由下面进行选举，县及专署委员由上面委任，能进行选举的，就进行选举，县成立县议会、专署成立代表会进行选举。

委员会与独任制到底有什么不同呢？委员制不但思想上要少数服从多数，要个人服从组织，在组织上也是如此。维持独任制，从思想上解决问题是否可以呢？我们的思想上都多少有点毛病，好简单，怕麻烦，自高自大，而独任制在组织上有最后决定权，如判行制度等，会更助长这些东西发展，不愿听人家的意见，不愿与别人商谈，对发扬民主有很多限制。改成委员制后就不同了，在组织上就特别强调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因之今后必须估计到独任制对我们的影响。养成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的习惯，不是容易的事情，群众观念薄弱，就要很好的锻炼一下。成立委员会后，今后有许多东西是要加以改变的。

分工问题上，独任制时，县长与科长是上下级的领导关系，成为委员会是集体领导，大家的工作都是对委员会负责，在委员会中的权利是相同的；职责方面有不同，主任委员多负责全面的，其他委员多负责对于具体工作的考虑。领导同志与部门负责人同志，彼此应互相尊重。领导同志要在具体问题上更多的尊重其他委员的意见，在全面问题上，部门负责人同志要更多的尊重领导同志的意见，遇有问题互相协商，互相学习，互相领导。

这样改了是否就不好领导了呢？不是的。过去常常是用组织手段解决问题，好像没有什么问题，可是民主会一开，意见可多了，所以并不是没有意见，而是问题没暴露。这主要是个民主问题，如真能帮助同志解决问题的话，他一定尊重你，不给他解决问题，就一定不好领导。今后改为委员制，有些同志就自大起来，就不尊重

领导，也不应该。

丙、集中力量扶植群众运动问题——主要谈扶植群众运动与部门工作结合问题

扶植群众运动已确定成为我们的中心工作，这里有很多特点。

群众从没有起来到起来，情况就发生很大变化。群众发动以前，封建统治把群众与我们的联系人工的割断着；发动群众以后，群众成为村中统治势力，我们直接有了自觉群众组织作依靠。随着环境变化，□个应来一个革命，否则就犯了主观主义。这是农村中基本变化，也是我们工作环境的一个基本变化。在群众发动以前，没有一个新的可作依靠的村政权；群众发动以后，有了可依靠的村政权。这种变化，不是群众发动以前和以后断然分开的，而是在群众运动过程中，群众的情况就在一点一点的变化着。这在我们的工作上，就应自上而下的跟着来一个变化，跟的越紧，越不失时机。在现在来检查，我们的工作是有落在后边了。因此部门工作与群众运动的密切结合，是改造部门工作的基本关键。可以说哪个部门工作与群众运动结合的好，就一定有成绩，结合的不好，必然没有进步或者进步的不快。部门工作同志要尽最大可能深入到下面去，在总结群众工作经验中改造我们的部门工作。下去之后要注意在扶植群众运动中，根据群众的变化、群众的要求进行部门工作。分配干部下去，要分配到最适宜于他的部门工作的地方去。

这里要注意几个偏向：

群众运动本身与部门工作的密切关系，这一点没有搞清楚，因之对部门工作同志也说不清楚，致使部门工作同志未能了解这点。首先要依靠部门工作同志的自觉去进行工作，如干部思想上的一切问题没给解决，思想没有打通，单纯用组织力量、组织手段，就觉得拉的苦，工作就很难有成绩。这从领导上讲，还有脱离干部的现象。

再则，把部门工作放在中心工作之外。领导上没有把中心工作贯彻到各部门中去，首先行署就有这个缺点，下边就觉得任务繁，

很为难：服从群众运动好呢？还是服从上面好呢？行署领导上对各部门的情况了解也不够，在作啥？到底应该作啥，了解也不够，因此就不能很好的使之与中心工作相结合。从部门出发，是从群众出发，不调查研究，便要他结合，是主观主义。

各个局与各科有不同处，工商局、公安局、交通局也各有不同。交通局是送信，越快越好，这就是与群众相结合。不能抽出一部分干部去做群众工作，但住在村工作是可以的，作村庄工作，还可以整一下群众观念。工商局、公安局各有其单独的任务，领导上应照顾。不过所谓单独并不是离开领导、离开群众运动而独立，相反的，群众运动广泛开展了，合作社大量发展，群众锄奸运动的开展，工商局、公安局深入到村，深入到群众运动里去是非常必要的。

在领导关系上，各局是统一在各级政府统一领导之下的，局对政府的服从是无条件的，下级政府应服从上级局的指示、决议并保证执行。如决定违背了上级局决议，这不是下级局对上级局的问题，而是下级政府对上级政府的问题。今后在上下级政府的权限上应划分清楚一些。

部门领导同志与其他同志的关系，是个人负责制，是集中领导下的发扬民主问题。部门直接服从委员会，主要是执行，执行中发扬民主，与大家商量。部门负责人同志，对不牵涉到委员会决议的问题，有最后决定权，但不要把最后决定权随便使用，要多与大家商议。

（二）干部问题

过去的缺点，是干部的不自觉与客观上的原因结合起来产生的。在干部思想上有些啥问题呢？

首先看干部成份，绝大部分是知识分子，是来自各方面的，过去如此，到现在还是如此。那末干部路线是否错了呢？基本上是对的。在群众发动之前，提拔大批工农干部又不可能，这些干部这几

年来绝大部分是好的，是有很大功绩的。我们已经历了极残酷的环境，这些干部坚持了工作，许多干部牺牲了，应该很好的表扬他们的功绩，应永远追慕他们的精神，并循着他们的道路前进。许多同志特别是在敌伪斗争尖锐地区坚持工作的同志，是出生入死，经历着无数困难、危险……他们吃了许多苦，为了抗日民主事业，我们应该给他们安慰；他们锻炼的更坚强，应该珍贵他们，爱护他们，很好的帮助教育他们进步。

我们在干部工作上是有缺点的，对工农干部在认识上就有偏向。因为他们的文化水平不能胜任政权工作，只有知识分子才能干，因之从改造工作上以〔对〕吸收工农干部注意很少，对工农干部帮助培养提拔很少注意。有几个工农干部工作中很有功绩，但就是在政府吃不开，结果调换了工作。其次是吸收干部从我们的需要出发多，很少从群众要求出发，重视技能条件，忽视他与群众的关系。因此在群众运动中暴露了一个东西：我们干部中间有些就是群众不满意的人、在运动里与群众对立的人，有的跑到政府被我们委为干部了，这个做法是脱离群众的。当然真正想做工作的，我们应该帮助他，如果想回头打击群众、为群众所反对的，可以撤换，但这应该是少数的。

其次，对于干部只向他们要成绩，很少检查工作方法，使干部为了完成任务，不讲究方法；批评多，鼓励少，使干部对上级负责与对群众负责对立起来，只等上级，不习于创造；注意技术多，忽视政治思想教育，造成干部在技术上进步快些，在政治思想上进步慢……

过去一开口就责备干部思想上问题多，群众观念薄弱，脱离群众，强迫命令，官僚主义……作风不好，今天检查起来，那是不妥当的。首先应该检查领导，领导上在干部工作上的缺点，应负主要责任。因此有些地区新解放出来，在发动群众里有些问题，有些还没认识到，还没了解，看着不习惯，是很难免的，应该加强他们的教育，启发他们自觉，企图用组织手段来一个大换班，是不能解决

问题的。假如干部自觉的要求调动，可以调动一下。

干部思想上到底有哪些毛病呢？是统治阶级思想与小资产阶级思想两个东西。一般的说，小资产阶级思想是主要的；又因为知识分子出身的小资产阶级多少与统治阶级是有关系的，二者往往是结合着的。表现在对群众关心不够，对统治阶级的剥削黑暗不清楚，甚至于原谅：“人家几辈子积累的东西，来得不容易。”对这方面关心倒很周到，感情很容易接近统治阶级。

小资产阶级思想由于阶级地位是不上不下，在旧社会里有一点点上升的望头，但在旧社会里跌下去的危险也很大，所以有其革命性，而又怕大的波动，遇到大的波动就动摇。他喜欢抽象，好空洞，对群众的疾苦不了解或了解的不深刻；忽视群众力量，强调个人作用，好站在群众之上命令群众，解决群众问题视为自己的恩赐；以为自己高明、群众落后，对群众的意见不爱听，以自己的意见圈群众；事情好搞时，他兴趣很大，有了功绩夸自己的功，成绩是自己的，搞不好，毛病是人家的，事情不好办时，即自由主义，躲开，闪在群众之外，指手划脚，说长道短；由于他强调个人作用，私情观念厉害，交朋友，靠朋友作事，只相信自己的关系、自己的私朋友，牵连到自己的家庭、朋友关系，思想就打不通；参加政权工作之后，有吃有穿有地位，以及其他的个人要求解决了，就以为革命已成功，对群众的痛苦就麻痹；几年来在工作上形成了一套，满足于这一套，以之圈群众，满足于包办代替，长期的包办代替作风成了体系了，很熟练周密；当开始参加工作时，自己办法少，知道的不多，还虚心些，学习精神还好，现在就不同了，自己有了办法，忘了是学习而来的，就不那么虚心了。

这就是我们思想病的根源。

由于思想上的毛病，政权建设客观带来的弱点，就使得政权工作上形成群众观念薄弱、包办代替、强迫命令等官僚主义的现象比其他组织里严重。因此在政权干部中，反官僚主义倾向的斗争是比较艰苦的。

怎样开展反官僚主义呢？

首先，官僚主义是政权系统里整个的倾向，不是少数干部的问题，领导上思想教育很差，领导上应负主要责任。反官僚主义，整思想，应首先从领导上整，从领导机关开展到下级，从领导干部开展到全体干部。检查领导要发扬民主，不只是自己检查，要吸收干部参加检查。机关开民主会是比较好的形式，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尽量让干部提意见，领导上要虚心倾听，讲得对要很好的接受，不对，等干部把意见讲完，再同他好好商量。以这样态度不但可收整理领导整理自己的效果，实际上起了启发干部检查自己的作用，各专署可以自己研究采用。

其次，应该加强政权系统的思想领导与思想教育。今后领导上要注意总结下面经验。过去总结经验是不够的，这样是群众观念不强的表现。我们苦于教育干部无教材，实际上是我们没有把经验集中起来，没有注意下面经验、干部自己的经验是最好的生动教材，单用外面的东西与上面的东西教育干部，是不容易接受的。今后领导上应把总结教育干部当作重要任务之一。

另外，今后应用适当的方法轮训我们的干部，行署专署都应该作。今后决定学院训练县级干部，专区的中学训练区级干部，教育内容着重总结干部经验，表扬成绩，整理思想。

再次，要强调深入下层。知识分子出身干部需要经大运动的锻炼，必须深入到群众中去，才会使我们听到群众的呼声，体验到群众力量是伟大的，群众创造是无限量的，借此才可把我们的灰尘洗一洗。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领导干部要亲自带领干部下去，任何困难都要想办法克服。

最后，在大运动中涌现出大批的群众领袖，这都是干部的后备军，□□□□□把政权工作加以改革，以适应和吸收工农干部参政，政权极需增加一批联系群众的干部。

第五部分：关于生产问题

根据参议会的决议及过去的工作，提出几点意见：

（一）在民主民生运动告一段落以后，应该转入生产。民主民生运动以后，产生了一个新的生产关系，要巩固这个生产关系，必须从生产上解决。因此生产是一个继续深入群众工作的问题，又是巩固群众运动中群众既得的成果问题。假如不从经济上进一步上升，新的生产关系就很难巩固。我们能领导群众在经济上继续上升，才会使得群众觉悟程度进一步提高，在实际生活里更深刻的体验到跟着共产党走，跟着抗日民主政府走，是有好处的。觉悟更提高，他的组织就更巩固。

大运动之后，强调团结。根据地的人民都喜欢生产，生产越好，也越团结。经济力量越强，根据地越繁荣，局面也就越好，团结全国人民的重点作用也就越明显，扩大解放区更容易。

民主民生斗争以后转入生产有好的条件，就是群众已经组织起来了。从有组织的群众来发展生产，比较容易。没有前一个组织起来而进行后一个组织起来，不是不可能，但没有那样容易。群众在民主民生斗争中，生活得到改善，生产情绪提高了，而且群众有了自己的领袖，这许多都是转入生产的好条件。

另外也不是一点困难没有，还有困难，主要的困难是群众生产的困难还太多。由于生产情绪高，要求也高，困难也就多。以前只要求贷点款，能卖花生就行，以后呢？有地了，要用耙，要用锄、牲口等，所以是困难更多。这就说明民主民生运动以后，群众生活改善了，并不等于政府支持生产可以少费些力，相反的，要扩大支持才能满足群众要求。因此政府还要大量贷款，予以支持。困难最多的还是赤贫和贫农，其次是新上升的中农。我们要着重支持这些人，解决他们的困难，主要是扶持他们组织起来，贫农与贫农互助，中农与贫农互助，以解决人力、畜力、工具的困难，组织合作社调剂资本上的困难。比如贫农有地了，没有牲口，可以用人拉

犁，这就出来个耨拉犁的组织形式。不过领导意见不一定马上被群众接受，变为群众的意见，就需要我们倡导、干部的以身作则和通过群众领袖在群众中进行酝酿，酝酿成熟，基于群众自觉自愿，不能用任何强制方式。组织形式以及组织内部关系，主要是由群众民主讨论解决。领导的责任是帮助总结经验，从群众经验水平出发，领导群众前进一步，逐渐的提高。

转入生产时，打通思想是一个关键。短期的运动，解决问题比生产快又多，群众体验的非常深刻；同时生产困难多，新的生产方式没有经验，因此从斗争转入生产，这个弯子转过来不是容易的。所以，首先在干部思想上和生产经验上早作准备，并随时教育群众，在民主民生运动过后适时的提出生产号召，造成生产空气是非常必要的。在作法上，在群众运动中，可以一个村为单位，领导转入生产，这样及时的转入生产，不及时会出些毛病。同时在群众运动的过程中，抓紧几个村子，准备经验，用之去指导别的村，这样到整个转时，会转得比较顺利些。

（二）北边几个专区在组织群众生产中把灾荒渡过了，领导生产的经验比南边几个专区多，群众在组织起来上已有很大锻炼，就是说，北边生产上有好的条件。可是在民主民生运动方面，才刚刚开始，所以要这些生产组织的巩固，还需要进一步的发动群众。因此在北面也要进一步的发动群众，政府很好的扶持群众运动。不过，扶持群众运动与生产如何结合的问题，也是很重要的。在及时转入生产上，北边的条件比南边的好得多，斗争果实容易很好的用到生产上。因之在群众运动中不应放弃生产，应该让群众把斗争果实很快的投入生产中去，使群众运动与生产很紧的结合起来。

北边的群众虽然在进行着互助生产，但由于民主民生斗争没有很好的开展，农民的问题没有很好的解决，因而农民的积极性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扬，互助生产还作的不好。贫农在农民里本来是革命最坚决的阶层，在革命运动中很容易成为群众领袖的，由于过去民主民生斗争没有很好的开展，贫农政治地位很低，经济力量也很

弱。我们工作上虽曾特别强调了扶持贫农，但由于我们对贫农的困难了解不够与贫农在村子里没有权力，致使他们得不到扶助或得到的很少，农民的根本问题并没有解决。今后在民主民生运动中，如能很好的把贫农扶持起来，情况就不同了，在群众运动中，定会涌现出大批贫农积极分子及贫农领导的互助组织。贫农在生产技术上比较差，经济力量少，缺的东西也很多，只有依靠组织才能解决问题，因之，他们对互助组织是积极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切实帮助贫农解决困难，培养他在互助组织中的领导作用，成为领导骨干。过去中农领导的互助组织，对贫农只是从恩赐观点出发，而不是从贫农出发。在贫农居于领导地位后，他才容易反映出他们的切身要求，政府扶持贫农也才会更切合；再加上他们在群众运动中已经树立了威信，我们对他们的扶持就可能变为群众性的，对贫农问题就更容易解决。

（三）在群众民主民生斗争中或以后，群众生活得到些改善，但贫苦群众在农业生产上，由于土地不足，不能完全解决生活问题，就不得不搞副业。同时贫农在农业生产上劳动力是过剩的，不搞副业，劳动力没处使用，甚至农忙时也离不开副业。因此必须采取农业与副业结合的方针，很好的发展贫农与中农的互助。这样的互助是最利于农业与副业相结合的。在私有制基础上集体化，组织互助，贫农与中农结合是主要的，它标志着农村中新的生产关系。这样互助越广泛越好。

（四）发展农业生产要接着群众运动来开展。北边要消灭荒地，恢复元气，争取增产粮食。南边由于刚刚转入生产，主要是扶持贫农，应强调如何解决贫农生产上的困难。目前主要是组织起来的问题，要更多下力勤耕勤锄；至于技术可以研究，以备将来，目前大力提高技术也是困难的。全区都要警惕防蝗、防灾。灾荒对我们威胁，由于生产条件的限制，还是严重存在的。

（五）争取边区手工业的自给自足问题

群众生活改善以后，对日用品（手工业品）的要求也扩大，这

就要求边区的手工业发展，不然就不能满足要求，就必须很贵，与农产品价格变动不相适应。如用过多的粮食换过少的日用品，在对敌斗争上也是不利的，会给农业以打击；同时农业没有手工业的发展，农产品的销售、农产品的加工制造都是受限制的。

当前手工业生产很有利，应该抓紧时机组织群众手工业生产，这于公于私都是有利的。过去在手工业生产中过分强调发展的纺织太单纯太集中，生产多了，利小，出口又困难。虽然纺织发展很广泛很有成绩，这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今后要提倡多种多样的手工业，因为我们的需要是多种多样的，群众的技术也是多种多样的。这样才能与群众相结合，达到自给自足的目的。但是重点还应该有的，应该根据需要确定着重扶持的项目，并且可以组织小型的公营工厂，借以提倡。

（六）生产的领导问题

目前在生产领导中主要是合作社问题。

合作社是一个独立的组织，统一领导合作和互助。我们对合作社的关系大体与对抗联一样，要尊重它的独立性。有县区合作社的地方，应帮助县区合作社领导村社；没有县区合作社的，帮助它逐渐建立独立的领导系统组织；在没有建立起来以前，可以直接帮助村合作社。

对各专区同志最后提出一点希望：

北边的同志，根据讨论群众运动的精神，把生产经验总结一下；群众运动开展后，生产已经搞了些的地区（八、九、十一专区），把生产经验总结一下。这些经验对推动今后生产作用一定是很大的。

南旺接敌区

发动群众的几点经验*

(一九四五年八月七日)

李 哲

南旺是去年9月间划成的新县，在郓城以东，汶上以西，是郓汶边接合部，大部分是敌占区和顽占区，只有一区是个完整的区。黄□子（现已撤走）、杨庄集两据点，还直接威胁着一区的中部和南部。这里的群众运动，是经过长时期的斗争才开展起来的。我们提出以下几点经验，作为边沿区发动群众的参考：（一）新收复的地区的群众运动，领导者必须随时随地倾听群众的意见和更加慎重。如距杨庄集15里路的××楼，掀起了一个反贪污、反恶霸的斗争，当时群众有些怕，当夜要把斗争对象监视起来。但这个意见未被我们的干部采纳，反而禁止群众监视，结果斗争对象逃跑投敌了，投敌后把村农会长的侄子抓去了。自此这个斗争便消沉下去了，群众埋怨情绪很高。后来干部每到这个村子进行工作的时候，群众一看到就溜了，再也不敢接近我们。因为这个村子的群众遭受打击，在那一带村庄影响很大，使工作上增加了不少的困难。另外在××庄的反贪污斗争，是群众自己处理的，经过群众讨论决定罚粗粮7000斤。斗争刚一结束就“扫荡”了，斗争对象跑到据点里去了。群众听到这个消息很恐慌，后经他们自己讨论决定，对斗争对象少罚一点，从速处理，同时通过各种关系把斗争对象从据点里叫

*本文原载于冀鲁豫区党委民运部1944年12月辑印的《群运材料》，后发表于《冀鲁豫日报》第425期（1945年8月7日）第4版。

出来，结果罚粗粮2500斤，结束了斗争。在边沿区，群众这种轻罚速决的策略是值得学习的。从这两个斗争中看出，斗争对象的选择和斗争形式的确定，必须让群众自己讨论，但也不能忽视启发、教育、领导的作用。我们向群众提出意见，而不能硬叫群众执行。群众不接受我们意见时，要跟着群众走，假如我们是对的，可以耐心的说服群众。（二）没有实行合理负担的新地区，群众在支差、出伕、打更上往往要求较高的待遇。政府规定破路粮每丈2斤，打更每夜每人半斤，在新地区是执行不通的，如强制执行，基本群众吃亏，同时也会影响战争动员工作。如让群众自己讨论规定，多半超过政府规定数目以上。有的村子群众讨论规定的破路粮每丈4斤至10斤，打更粮每夜每人2斤至4斤。群众的这种过高要求，是因为在生活上没得到改善。在已经实行合理负担的村子，应教育群众主动的减少。像这种新地区在执行政策上，应先强调有钱出钱，实行了以后，再强调有力出力，这样才能照顾基本群众的利益。（三）组织形式上，群众容易接受旧的灰色组织形式。麦收前，县里决定从组织看青队当中发动群众。这一组织形式提出之后，很快的就被群众接受了，七八天的时间，组织了17个村子的看青队，192个看青队员；因为对统治者、对敌人刺激不大，并且能得到大多数人的同情。在组织看青队的过程中，注意吸收了贫苦农民，防止了老看坡的操纵。如果被老看坡的掌握了领导权，以后提高到农会的组织便困难了。看青队刚组织时，村子里的统治者支持着老看坡的破坏看青队，在这时候须要经过一番斗争。斗争胜利之后，看青队员多半要求背枪。他们这种武装要求，基本上是为了保护自己。在领导上应抓紧群众的要求，解决枪支问题，同时进行教育，启发阶级觉悟，很快就会提高到民主民生的要求。张桥从看青当中发动了反贪污斗争。斗争胜利之后，他们对敌人抓户更加警惕了，对敌斗争的情绪高涨了。经过这样的过程，看青队无形中过渡为农会的形式，群众不敢接受农会的名义，不敢对统治者进行斗争，怕敌人等恐惧心理也自然打消下去。（四）边沿区的发动群众必须斗争与生产结

合起来，因为边沿区的群众工作特点是逐村发展，要想搞起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是困难的。有的村子斗争过去，群众就要求合作生产。我们应抓紧群众的生产要求，个别的村子应及时转入生产，有的村子继续开展斗争，以生产合作巩固群众的既得成果，以继续斗争逐渐向边沿区开展工作。生产与斗争结合的不密切，便会使群众运动脱节。

冀鲁豫边区各救总会 为紧急动员起来参战 告各救总会员儿童姊妹团员书*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

工农青妇各救会员，儿童团姊妹团团员们：

苏联8月9日向日本开了火，日本8月10日就撑不住劲，向盟国投降了。我们8年流血苦战，毛主席正确领导，现在马上就胜利，这是一件多么大的喜事啊！可是在这眼前就要胜利的时候，还有很多非常要紧的事情，需要我们去办。我们要快快动员起来，争取胜利。

工会会员们：要加油干，不叫机器闲一分钟，多多生产枪炮弹，供给前线去打仗。多多做鞋做袜做衣裳，不叫一个战士缺鞋少衣裳。还要多多印刷报纸、宣传品，叫每个人知道胜利的消息及该做的事情。

年青力壮的农青会员们：成班成排的参加主力军去，参加民兵去，拿着我们的枪炮到火线上，缴日本鬼子、汉奸的枪，占领大小城市、铁路公路，打垮汉奸伪组织，解放我们的同胞。

民兵除了参加主力军前线作战，在家里的要参加担架队，抬伤兵，把受伤的马上抬下来治疗，不叫一个伤兵多流一滴血。参加运输队，运粮食，送子弹，保证前线粮食吃不完，子弹打不完。还要参加后方的警戒，注意汉奸坏蛋的活动，把造谣捣乱军心民心的汉

* 本文发表于《冀鲁豫日报》第439期（1945年8月23日）第1版。

奸坏蛋抓起来，把破坏后方生产运输的汉奸坏蛋抓起来，把后方治的安安稳稳。在生产上还要加劲干，抓紧一切时间，下地干活去。

妇救会员，年老的农会员，儿童团、姊妹团团员们：自己的兄弟、丈夫、儿子上前方去，我们千万可别拉腿！因为他们上前方是为我们早过安生日子，到前方去的越多，我们胜利的越快。他们上前方去了，家里的事情，我们就要多辛苦，加劲生产，多锄地，多积粪，不荒一分地，比往年要多打粮食，好送上前线。

战争有功受伤回来的伤兵，我们要好好照顾，不叫他们热着，不叫他们凉着，不叫他们饿着，不叫他们渴着，捐东西慰劳他们，扭秧歌演新戏给他们看，使他们很高兴，好好养伤，要保证随时解决伤兵的困难。

我们也还要格外留心汉奸活动，盘问来往行人，留心外来人、本村的坏家伙，听到谣言，追根到底。在这任务紧急的时候，更不允许一个汉奸坏蛋破坏我们。

工农青妇各救会员，儿童团、姊妹团团员们：

这就是我们顶要紧的事，一定要完成。要完成就要团结起来，组织互助，在后方的帮助前方的，生产和打仗连到一起，保证去前方的粮食不少打，家里的事不少办，和抗属一样照顾他们。我们要拼命的干，互相比赛，后方与前方赛，老的和小的赛，女人和男人赛，创造大批的好的民兵英雄、劳动英雄。

胜利就要到了，都加足了劲吧！动员起来！组织起来！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中华民族解放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总工会 总农会
冀鲁豫边区
青 联 妇 联

民兵是农民自己的武装*

(一九四五年八月)

粟 森

一、民兵是在农民运动中产生的

不管任何时候，任何地区，只要有农民自己的运动，他们在运动以前或以后，就一定要求把自己一伙里边的最精干的一部分武装起来，捍卫自己的利益，给运动以支持或保护，这就是今天民兵的真实内容。

中心地区农民的翻身斗争，是极其艰苦的一件事。对封建统治势力的顽强，农民作了慎重的估计，丝毫不轻视的。农民在翻身斗争中，往往先把武器拿起来，组织在行列的最前线。有了枪杆子给他们作开路先锋，他们的勇气和信心，不知增加了多少倍，给他们的队伍添了好多声色和威风。或者在农民翻身斗争胜利后，为提防封建统治势力的暗算和反攻，叫自己的能干战友出来拿起武器，作最有力的警戒及镇压。以上就是中心地区民兵产生的根据。

边沿区的农民群众，是处在两种灾难里：首先是敌伪的抢掠烧杀，使他们日夜不安；其次伴随着而来的，就是封建统治势力的剥夺与压迫。这种地区的农民，因受中心区农民翻身斗争的影响，要与敌人撑，也愿与封建势力的剥削压迫作斗争。因此形成这样的特点：即是一般农民群众，积极的愿意武装起来，进行对敌斗争。他们的意思是：“先撑住敌人，后再闹翻身。”而少数封建统治者，

*本文原载于冀鲁豫边区临时武委会出版的《民兵工作》创刊号。

这时则多方限制与破坏，他们的目的则是：“宁愿受敌人的蹂躏，也不准农民翻身。”他们把自己的对敌负担，不折不扣的嫁祸于群众的头上。可是农民群众们是极端勇敢的，他们的行为是出乎少数统治者的意料之外。农民在起初是极端秘密的酝酿着自己的运动，在秘密酝酿中，就把自己的武力首先组织起来，一出头就带着斗争的双重性，既展开对敌伪的武力斗争，又掩护着群众进行了翻身斗争。这也是今天边沿区民兵的特色，从前是没有过的。

农民在生产运动中，也把自己武装起来，建设了自己的靠山——民兵，来保卫他们的生产组织及劳动果实。

总之，民兵是解放区乡村中阶级关系转换中的产物，是农民翻身后的直接结果，它是农民自己的武装，是农民阶级的耳目爪牙，更是乡村抗日民主政权的支柱。无怪民兵英雄张盈臣同志伸出了大拇指说道：“民兵是农民自己的，他打日本人也是为了农会。”这话的意义是很深长的，我们过去还没意味到。

二、民兵正在农民运动中改造着

在农民未翻身以前，在中心区与边沿区也有所谓民兵。这种民兵一般的说是行政命令组织起来的，领导权掌握在封建统治势力手里。在农民翻身运动中，这种民兵就要经过改造。农民的运动是一次又一次的深入着，民兵也一次又一次的发展着、改造着。在农民运动中，民兵发生两种变化——一种是民兵领导权的转换，领导权从封建势力手里转换到农民手里，另一种是民兵骨干的变化，以中农为骨干的民兵变为以贫农为骨干的民兵。

在中心区，农民群众在未翻身以前，以行政命令组织起来的民兵，领导权掌握在封建统治势力手里，与群众的关系是很淡薄的，它甚至扛着枪杆子，在群众面前显威风，摆架子，群众对他们则抱着不理的态度。但一到农民翻身起来，去推翻封建压迫的时候，民兵就随着农村阶级关系转换而被改造，领导权掌握在统治阶级手里的民兵，即是不保护农民利益的民兵，就被农民把它解散了。因为

他们对旧的民兵很不放心，怀疑着不是他们自己的心腹武装，而代之新起的，则是农民自己亲手组织的，坚决维护农民利益的民兵。

在今天边沿区群众对敌斗争中，是很明显的，在农民未翻身及生活未有改善以前的民兵，是很可怜的，大多数是从上而下强迫命令组织的，是雇佣式的，没有或缺乏广大群众的支持。待把敌伪驱逐、斗争对象消失或敌伪压力过大时，往往就垮台。但当农民把敌伪抵抗住，进行自己的翻身斗争时，他们就要改造这样的武装，使它成为自己的；一旦得到改造之后，坚持边沿地区的斗争，是非常顽强及持久的。

在这次中心地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中发生了这样的现象：由于广大群众实行了彻底的翻身运动，彻底推翻了封建统治与减轻了封建剥削，广大贫农（佃户、雇工在内）在运动中，发挥了自己的积极性，起了领导骨干作用，他们的政治地位空前提高了，生活大大的改善了，他们为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积极参加民兵，在民兵中也形成骨干，使过去中农成份占最多数的民兵，变成雇农贫农占最多数的民兵，领导成份也由中农占多数，变为贫农雇农占多数。民兵这种与领导骨干的变化，使民兵更坚强，更能为广大群众服务。

三、民兵对上级负责与对群众负责不是对立的

出席今春群英会的全体民兵英雄，特别严肃而且尖锐的争论了这个问题，并且批评了一些反常的情况。哪些情况呢？据他们的反映：首先是被封建统治势力掌握了民兵。这种民兵直接和群众或农会形成对立，如九分区×地干部领导着民兵要与农会开火，有的双方相持不下，有的被农会缴了枪，八分区濮县七区×辛店的青抗先，被不法地主掌握着，以武力镇压群众的斗争。其次是因为分配斗争果实与农会闹矛盾，如八分区观城×区民兵要求把果实买武器，农会则主张分了吃，结果在大会上区干领导着闹起来。再次是强调民兵不能与农民在一起斗争违法地主，说民兵是抗日保家的，不能警卫群众斗争大会，不能武装着参加群众斗争，壮大群众的声

势，更没有权利捆人，押人，捆绑都是违法的，要不得的。上述这些现象据英雄们谈是很普遍的。

这些情况反映到领导上，就是武委会干部与抗联干部的矛盾了。我们在口头上都曾喊过，民兵不是旧团务，领导权也属基本群众，可是一接触到实际具体问题，就不问青白的大叫农会太岂有此理了，说什么抗联称霸了，觉得自己丢了面子，没权利，吃不开了。因此就闹关系，就不情绪，就不做工作，睡大觉，怨上级，恨党政都看不起这个工作。这样一来，曾使工作遭受了不可补偿的损失。

今天检讨上述反常情况产生的原因，绝不能单纯埋怨我们下级组织及干部，更不能咒骂民兵是脱离群众的“新贵”，而应该从最高领导机关检讨起。我们对民兵是农会的基本力量，是农会的组成部分的这问题，认识的很不明确，不懂得民兵应该积极参加群众斗争，武装着参加群众斗争大会，警卫会场，是为了坚定农民的斗争信心与壮大农民革命的威风；有时为了推垮封建统治，广大农民翻身与建立抗日民主的新社会秩序，农会在斗争中命令民兵把罪大恶极的恶霸和反动分子捆起来押起来，并不见得是过分。可是我们领导上是如何态度呢？民兵英雄张盈臣同志这样回答了我們，他说：“上级武委会的人，老是嫌我们斗争得太厉害。”这是值得我们警惕的。

在群英大会上，民兵英雄们反省得特别深刻。他们一致认为，关于民兵是农民自己的武装问题，过去是不认识的，于是单纯的对上级负责，与群众对立，认为自己还有很多理由。一个区干在群英会上这样反省，他说：“我一贯强调民兵就是武委会的，农会不能指挥民兵及过问民兵的事。”他又说：“民兵与农会的对立，几次甚至是我硬制造出来的。”今后的事情是很明显的，民兵与农会是否能稍有分割及对立呢？民兵英雄们的结论：是不能的，恰恰相反，应当把民兵组织完全放在农会的绝对控制下，服从群众的大多数。英雄们的结论，更特别严肃的指出：“反对农会的民兵就应重

新审查鉴定，若被反动势力利用了或收买了的民兵，坚决缴枪解散。”因为他们的经验，是在农村中，被打败的反动势力是很不甘心的，往往专门去瓦解收买民兵，企图做他复辟的“尖兵”。英雄们又指出这样的真理：“民兵真正成了农民自己的武装，民兵的困难才能成为群众自己的困难，群众才一定坚决的积极的解决这些困难。如果民兵与农会对立的话，困难就特别多，而且上级武委会几乎就根本没办法解决这些困难。”所以民兵真正成为农民自己的武装，民兵与农会相互间提的合理意见，双方才能很痛快的接受，自然形成民兵与群众的尊爱运动，一定团结得很好的。

过去在领导上，关于民兵对上级负责与对群众负责问题，认识不深刻，把武委会指挥民兵与群众控制民兵对立起来了。

四、民兵的发展道路不同，特点也不同

伴随着群众的各种运动，产生了各种类型的民兵，因此也各具有不同的特性。

第一个类型，是从农民翻身运动中建设起来的民兵。他们表现的特点是：（1）阶级觉悟比较高，成份大部是贫农，他们了解到，自己的武器不只是用来打日本，还用来镇压反动分子向他们进攻与破坏他们的组织——农会。（2）能联系广大人民，尊重群众的意见，接受农会的指挥，执行农会的决定。（3）自己受到了翻身斗争的考验，内部有经常的民主生活，善于与大家讨论问题。（4）对抗战一切工作热情高，不是应付及雇佣观点，而认为是自己的责任。（5）因为对敌战斗少，战斗经验较差。（6）在未深入生产时，本身组织的活跃性、集体性表现的不够经常。

第二个类型是从群众生产运动中组织起来的民兵，表现的特点是：（1）因了民兵组织与经济内容结合的结果，家庭愿意叫自己的子弟参加到民兵组织中去，没有扯腿的顾虑。（2）因了民兵经常在一块互助生产，彼此在情感上结合起来，团结好。（3）集体性大，军事活动比较好。（4）如未经翻身斗争，领导成份则中农

以上占优势，阶级觉悟不够高。

第三个类型的民兵，是坚持边沿〔区〕斗争的民兵。这类民兵有三种：一种是从对敌斗争中翻了身，改善了生活的。他们表现：（1）战斗性特别顽强，有战斗经验，战术高，甚至他们能够自己组成了联防而单独作战。（2）领导成份仍以中农占优势，在群众中有威信。（3）因为能打，有成绩，容易骄傲，如看不起县区武装等。其次一种是群众未经过民主民生斗争，可是这种斗争空气已影响到的边沿区。他们表现：（1）大多数群众正积极酝酿翻身斗争，地主则小恩小惠，收买民兵。（2）民兵内部矛盾，贫农成份与其他成份意见对立。第三，内地群众斗争影响不到的地区，则表现：（1）旧团务色彩浓厚，雇佣性大，成份老军伍多，不参加生产。（2）与群众联系不多大，主要依靠政府支持。（3）领导权多被上层分子掌握。

五、领导上单纯的“武装工作主义”

由以上问题可以看出，民兵工作的内容是处在非常复杂的情况下，过去在领导上，不但没有在现实的规律内，根据不同的特性，引导向全面的高级发展，反而被领导上的主观想象割断及限制了，把他限制在我们狭隘的圈子里。这种圈子就是“单纯的武装工作主义”。不论时间与空间的情况而决定工作的重心，是一味的要求民兵“活跃”、“管来”，所以把民兵与群众的翻身运动脱离开来，民兵与生产运动以及与各种他们自己的要求撕裂开来。这种不问时间不问地区更不问广大群众什么要求，而规定千篇一律的工作内容及方法，就是民兵工作多年没跳出的圈子。如在接敌区要求民兵打仗，在中心区也要求民兵军事活动与接敌区一样活跃，甚至把检阅演习就当成民兵工作的唯一内容，还说：“没有敌人有啥法呢？”在接敌区，不管民兵有没有饭吃；在中心区，也不关心民兵参加民主民生斗争的事，甚至认为这是抗联的事情，自己不管这一着，所以一味硬要民兵经常站岗放哨，会议制度，集体活跃。看见民兵与农会

有问题时，不能领导着民兵商同群众或农会去解决，反而冲动的领导着民兵与农会对立，甚至在农民面前显威风，骂抗联。这种领导上单纯的索要，就是因为单纯的“武装工作主义”而来，而广大民兵是不满意自己的领导机关与干部的。群英会上民兵英雄们说：“民兵有时要听了上级武委会的意见，就在村里受到打击。”这是对领导上深刻的批评。

六、民兵发展的三种环节

不论哪一类型的民兵，跟群众运动一样，都不能是静止着的，是在向前发展着的，我们的领导责任，是促成这种发展更快一些更好一些，脱离了正确的发展方向，就要出波折闹乱子，甚至垮台。这种发展方向是什么呢？就是民兵要在民主民生运动、生产运动与对敌斗争互相结合中发展起来，锻炼出来。

农民翻身以后，民兵组织起来，就应迅速把它再组织到生产中去，更进一步的去建设。企图在民主民生运动中，民兵获得些果实之后，民兵组织就可以经常变成强有力的战斗组织，而坚持下去是不可能的。因为它脱离了生产，就失去了经常的经济内容，民兵与家庭的矛盾就可能重新发生，民兵组织就不能继续巩固下去，结果民兵的对敌斗争（如反“扫荡”时坚持腹地斗争）也就成了空洞无力的口号。如果说经过群众翻身运动，获得斗争果实的民兵活跃起来的话，那就需要有连续的果实来分配给民兵。这种连续的果实，就是民兵从自己的互助生产中取得的红利，及其家庭得到的劳力帮助。

不经过农民民主民生斗争，而一开始先从互助生产着手而组织起来的民兵，是可以达到经常的活跃及集体的军事活动，可是他们阶级觉悟不高，对贫苦农民成份的吸收也是很少的。因它不是在农民翻身斗争中锻炼出来的组织，对自己的枪是为了打敌人也是为了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的认识，是不够明确，一旦对敌斗争很激烈时，是有很大的危险性存在的，经不起严重的考验。这样的民兵必

须再通过民主民生斗争锻炼它或改造它，才可能成为坚强的民兵。

边沿区民兵一贯是对敌斗争的，我们领导上也一贯忽视他们的生产运动及翻身运动，所以形成极大的不巩固。边沿区民兵英雄们的经验告诉我们，这种地区民兵互助生产的充分发动及适当的开展群众的翻身斗争，是完全可能的，而且有的地区正是这样干起来了，不然我们坚持边沿区斗争是没有保证的。必须使民兵向这方面发展，成为战斗坚强又与群众密切联系的民兵，代替那些一时的、雇佣式的或脱离了生产部队式的低级民兵。

总之，民主民生运动、生产互助运动与对敌斗争三者的互相结合，互相补充和发展，才是民兵发展的完整方向与具体道路。这样才保证了民兵真正是群众的尤其是广大农民自己的武装，才有了真实的工作内容，持久的活跃起来，才能谈到积极的对敌斗争，才有可能在技术上、战术上高度的发挥与创造。

七、民兵的领导机关必须民兵自己 去自下而上的产生

因为民兵是农民自己的武装，是群众性的组织，所以它的领导机关应当自己起来自下而上的产生。在农民未翻身以前，自己的农会组织都没有，他们的军事机构——武委会，是谈不到自下而上产生的。但他们一旦翻起身来，农会在村中成为农民的权威组织时，民兵的领导指挥机关——武委会，就应大家来自下而上的选举，把农会中的有才干有胆识的，并能替大家办事以及忠实农会的人，选到武委会中去。武委会机构与农会到底是甚么关系呢？民兵英雄们是这样的意思：“在起初民兵的领导人员应该完全是农会的好会员。凡属于本村范围内有关民兵的事情，武委会的干部应该执行农会的意见或决定（当然不能与上级指示矛盾）。上级的军事任务，农会应通过自己的会员保证绝对执行。”所以，民兵对农会负责与对上级武委会负责并不矛盾。因此民兵英雄张盈臣同志说：“武委

会的负责人，必须是农会中的负责人才好。”这样才能把村中武力完全的控制 在农民手里，才能把民兵的问题成为大家的问题并及时予以解决，才更能保证上级武委会的指挥与调遣。“全区多数村有了真正选举出来的村武委员，即应选举区会。不管哪里来的人员，选不上的，就不能当领导人。”这也是他们很肯定的意见。这种意见是很正确的。

八、民兵的武器弹药应该自己来解决

民兵英雄们对这个问题争论得是很热烈的。一个英雄说：“过去我们民兵专靠上级发武器弹药，可是民兵一多，上级是发不起的。”那么为什么有这种情况呢？他们认为就是民兵在村里与群众不密切联系的结果。甚至他们争论时，这样反驳了过去对武委会不正确的认识，他们说：“武委会是民兵的指挥领导机关，不能看成它是我们的支应局。”

民兵是农民的，他们有责任关心民兵武器弹药的解决。民兵英雄们对七分区白庄白凌霄的合作社以公益金给民兵解决子弹，是很感动的。民兵英雄袁景林、王思岭亲自领导开辟“民兵军火田”，大家更加羡慕与赞扬；并且一致认为，他们这样举动是将来民兵武器弹药解决的新方向。

九、把“尊爱运动”开展起来

民兵英雄们不但彻底的反省了自己的立场，揭发出许多毛病，而也提出了些民兵的冤屈，如民兵外出作战时对其家务及生产照顾上不够，勤务的过重，得不到应有的安慰等，都很正确的提出了。我们不可否认，今天广大群众对民兵的体贴关心还是很不够的，他们要求上级号召各方面更多的爱护民兵，民兵更加尊重群众，更加痛快的为大家为农会服务。

在分局党校关于土地政策 在边区的具体执行情况 的报告（节选）*

（一九四五年）

张霖之

第三部分：边区执行中央土地政策 的估价，也就是这次大规模群众 运动的检讨与估价

一、从这次运动的实际结果来看

这次运动是在执行中央土地政策的正确路线下进行的，得到很大成绩，但也发生了一些缺点与错误，而且在某些方面缺点与错误是相当严重的。

（一）成绩

1、抓住了当前中心环节有利时机，进行大规模群众运动，并较快的解决了几年来没有解决的问题。中心环节就是发动群众。不发动群众，一切法令贯彻都办不到，不可能。但过去只限于口头上，没有实际做。

原冀鲁豫区，1941年以前，没有这样做，没有认真发动群众，使1942年以后对敌斗争与根据地建设上遭到很大困难。冀南也是如

*原件无月份。据内文推断，当是3月以后8月以前的文件。

此。目前的大规模发动群众是抓住了国际国内有利时机进行的，现在不做，以后反攻时，顽固分子进攻来了就没办法。这次运动，不是零打碎敲的，而是大规模的群运，在边区是空前的。濮县五区，当时是无村不在斗争，无人不在运动，成为一个热潮，比较快的完成了减租减息、查“黑地”斗争与发动群众的任务。

2、较好的解决了群众观念，相信群众，相信下级，这是这次运动最宝贵的收获。过去我们在党的建设党的发展上最大的困难是思想上不相信群众，一级级的都是如此。过去区党委在干部管理上规定县级干部调动非经区党委批准不可，就是一个表现。事实上区党委是很难了解的。过去党员不相信群众有策略，所谓相信群众是抽象的。

这次运动，给我们为群众服务，团结群众，打下了基础。在这一基础上，才发动了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包办代替有了转变，而这一运动成为群众自己的运动，成为一个群众性的阶级运动。农民阶级联合起来了，群众解放事业由群众自己来做，成为事实，群众感到自己是新社会的主人翁，权威者，看到了自己趾高气扬与威力，看到了自己的阶级力量与组织力量，发挥了群众的创造性与积极性，用群众自己的力量摧毁了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封建地主在群众面前低了头，由怕政府转到怕群众；而群众这一伟大的动力，摧毁了最顽固最坚强的大地主堡垒。过去濮县有1/2的白板村，总会同志去了觉得丝毫没有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味道。现在五、七区没有一个无工作的村庄，推动了几年来没有工作的落后地区与村庄。

群众进一步认识了代表他们利益的共产党八路军与抗日政府。“抗日政府是咱们的政府”，这一响亮的口号在这次运动中才听到了。

今后这种相信群众，相信下级，为群众服务，向群众学习的作风，能够保持，不自傲自骄自满，更虚心的重视客观实际，重视群众，那末这次在运动中的缺点与错误，我们相信是可以克服的，可以把工作提高一步，否则〔主〕要成绩，就可能变成主要错误。

3、贯彻强调了扶助贫农政策，强调了树立农村无产阶级与半无产阶级领导，斗争果实落在农民手里，一部分村庄贫农尤其是赤贫阶层消灭了。有的村庄，社会秩序安定了，不看秋了，对以后生产工作影响很大。贫农领导权的树立，给我们深入群众运动很大推动。这次运动规模宏大、彻底，是与贫农核心领导分不开的，这对今后根据地的建设及生产工作以有力的支持。过去在农村党的组织，中农党员占的数量很大，形成组织上的软骨病。这次运动吸取了贫农入党，有意识的培养贫农的核心领导，逐渐的在医治这种软骨病，向健康的大道前进。在贫农领导下，团结了中农，参战拥军的空气为前所未有的。南乐战斗中群众爬城墙、架梯子，妇女在前线上劳军，青年妇女给伤兵喂水喂饭，爱护支持慰劳八路军是空前的自觉自愿，为抗战以来所未见。没有阶级觉悟的提高，这种情绪是不会有有的。

过去生活最痛苦、最无地位的贫农，生活得到了初步改善，而且抬到领袖的地位，这是农村的一个基本变化，在封建社会里不会有的，因此党获得了革命最坚决的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4、显出了群众的威力，使群众相信了自己，自己进行了削弱地主的斗争，用自己的力量打击了地主的气焰，改变了农村生产关系，减轻了封建剥削。封建的生产关系不改变，生产无能提高。这一成绩的获得是很重要的，摧毁了几千年农村的封建统治，建立了新的统治。少数人的统治被拉下来了，现在是大多数人统治少数人，给我们新民主主义“三三制”政权打下了基础。

5、教育了干部。群众是革命的渊[源]泉，有许多天才家，这是列宁常说的，这次在实践中证明了。

领导方法上有了改变，过去从书本上从自己脑子里来的教条方法有了改变，因此，改变了上下级的关系。自己没办法了，向群众领教，吸取下级参加领导，在下级面前认错不认为是耻辱，下情可以上达，加强了领导。

（二）我们的缺点和错误

1、抓住了中央土地政策的主要点——扶助农民，减轻封建剥削，提的特别突出，这是对的。但突出的时间太长，而且有的地方操之过急，群众只要敢斗就行，对次要方面提的不够，发生了偏向。对偏向有的地方提的不够及时，因此在实际斗争中，有的地方与中央土地政策不相符合处，即某些地方是违犯了目前战略方针的，如斗争中农，对地主对富农的实行过分的破产及领导上的重罚思想等。

分局在政策的指导上来讲是有毛病和错误的。首先来谈在民生政策上“二五”增佃：在敌情严重情况下，不过分刺激地主是应当的，但在环境较好又是中心区，始终执行“二五”增佃、小种地的租额，由于对成本费过分的扩大（成本费规定25%是过高的），这种减法（太少）对群众生活改善上、提高群众对减租斗争的热情与削弱封建剥削上都缺乏积极作用。由于民生政策的右，不能解决群众问题（群众生活改善及地租变动都很小）。另方面对减息回地工作认识注意不够（抓紧减息工作可以解决非雇工佃户的贫农的部分土地），后来又未能在修正减租政策上下工夫，为解决贫农问题而决定在民主斗争中来弥补民生政策中之不足，同时，对民主斗争缺乏明确的约束和严格的规定（民主斗争中，群众与斗争对象不像民生斗争那样有明显的经济关系与约束，易发生乱斗，了解不够）。如对地主政策没有明确提出，究竟甚么样地主可以消灭，削弱，又削弱到甚么程度；对富农的政策也是很模糊的。分局这一时期，研究领导方法较多，具体政策的研究较少，认为只要思想上解决了，各地可以自己执行。当然，分局很具体的规定出能完全适用于各县〔的政策〕是不可能的，但大的原则可以确定，分局并没有做到这一点。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在民生斗争中出了右的偏向，而在后期民主斗争中搞的“左”的地方较多（群众动起来，后期“左”，领导上在后期的自满麻痹关系很大）。群众起来一定“左”，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群众自己本身带来的“左”是不可怕的，问题在于我们干部与群众一起“左”下去。我们干部不是站在战略范围的

圈子内指导群众，而是站在战略范围圈子以外指导群众，这就推动了群众的“左”。表现在我们对中农问题上，犯了严重的错误，相当严重的伤害了中农利益，斗争中农现象相当普遍。尤其在后期，强制中农在合作社入股，中农花钱免祸除灾。出枪款比罚款还多，莘朝买枪4000支，花钱到两三万万元，支差代耕，拥军募捐，都很严重（八地委决定政府人员不准代耕是对的）。村经费开支浩大，滑县一个村的民兵的费用等于5个常备兵，村款负担占中农负担之40%。在土地分散的情形下，这些负担多加到了中农身上。

加上贫农的推平思想与干部的重罚思想相结合，对大胆放手，误解为大干，部分村庄实行了均产。土地集中的村庄，打击的重点是地主，问题还不很大，土地分散的村庄就直接打击了中农，这是这次运动中最严重的错误。这次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中的危险也在这里。斗了中农，中农比地主的态度还顽强，这是必然的。因为中农是辛辛苦苦兢兢业业得来的东西，不是靠剥削来的，因此对农会斗他非常仇恨。但一旦我们照顾了他的利益，还是跟共产党走，这是我们过去照顾了中农利益，享受了民主，中农相信我们。

凡是伤害中农、对中农照顾不好的村庄，转生产也非常困难。发生这种错误的根源有以下几点：首先在我们领导上，有憎恶中农的思想。以我个人来说，在领导权上有憎恶中农的思想，在与别的同志谈话中也听到这种思想。于是中农是外皮的说法出来了。在分析中农与贫农时，分析成像两个对立的阶级，扶助贫农上升，犯了急性病，希望一下子解决。有些同志说，贫农得了3亩地，这当然是好的，但以此为满足，就出了毛病。

在领导上、指示上不够明确，没有把贫农自己的均粮思想揭发出来。事实上贫农除了怕没饭吃以外，不怕别的。领导上对贫农的胆大包天及对群众策略上原则上的局限性与片面性认识不足，因此我们的集中与坚持不够。

对土地分散的小村的工作问题没有解决。大庄斗争给小庄很大刺激，于是斗“好户”，谁比我好斗谁。斗好户，就没阶级性了，

尤其在后期的民主斗争上。

2、领导的重罚思想,不要法令和贫农的推平思想相结合,以至于运动后期在民主斗争中过多的削弱与消灭地主,形成共产空气,消灭地主太多,应引起我们的警惕。在运动的策略指导上,运动有节不够,同时加强党在群众的威信,加强群众跟着共产党走的教育不够,使顺利发展进步势力受到阻碍。今后执行中央土地政策,发动群众,削弱封建,主要的应约束在以下几点上:

第一、民生斗争应约束在减租减息增资增佃上。这些斗争应按照行署法令规定执行,不应超过行署法令,只能具体化,这样才能有理有节。

第二、民主斗争应约束在反贪污、反恶霸、查“黑地”上。反恶霸按其阶级成份、罪恶大小、错误大小、群众仇恨程度处分;反贪污处罚按行署规定,处罚不超过6倍;查“黑地”的处罚统一规定,处罚原则按原冀鲁豫区党委查“黑地”指示实行减免受罚政策,对中农减或免应是肯定的。

第三、民主斗争在互相间(群众与斗争对象)因缺乏一定的经济约束,执行起来易模糊阶级,形成乱斗的,故在民主政策上,更应注意加强对群众的教育,把民主斗争约束在阶级的斗争范围内。我们对这次注意的不够,掌握的不紧,后期民主斗争出了不少的毛病与乱子,给予工作上一些损失(如民主斗争中斗到中农等)。

对政策,分局、行署要有大的规定,但今后主要靠县委具体化。县可颁布单行法规,但不应超过行署法令范围,并经地委批准,这样斗争才能有理有利有节。

3、对富农的政策不明确。过去斗富农与斗地主混为一团,过重打击了富农,对富农生产上的进步方面认识不够,照顾较差。

4、工作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整个区域来说减租减息等工作是不彻底的。不能抽象的认为全区群众已经全部发动起来了,具体到一个村时,测量群众是否充分的发动起来,应根据下列三点作为依据:第一,群众生活得到改善,即进行了减租减息、反恶霸反贪污

等斗争；第二，显示了群众自己的威力，群众相信自己的力量，产生了自己的领袖；第三，真正实行了民主，以贫农为核心的团结了各阶层，群众跟共产党走。真正实行了民主，有以下意义：封建势力不打倒，说不到实行民主，这是对外而言；其次，真正的民主是使每个群众都能无顾虑的敢说话，村里的事真正的由群众的多数来讨论作决定，这种农村的组织才能成为代表多数人利益的组织，这种组织才有力量。

5、对边缘区的工作研究不够，把中心区的一套搬到边缘区，忽视了敌人的骚扰、社会秩序的不稳定。执行政策是要有一定力量的，力量就是秩序，力量就决定于武装斗争。

不了解中心区是经过几年的工作才造成这次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在边缘区这些条件是没有的，因此造成边缘区大批地主的逃亡，边缘区群众不敢要地主的地。这给了伪军伪组织工作、边缘区群众发动增加了很大困难：地主依靠敌人镇压群众，成为敌人进攻我们的内线，伪军伪组织与我们疏远等。

二、从领导上来看

这次运动，群众有很多创造，我们应当加以总结与表扬。到后期，在民主斗争中，由于我们领导上的自满与骄傲，也出了一些毛病。我们发扬群众的创造，检查我们领导上的毛病，才能把今后工作成绩提高一步，把群众与干部提高一步。兹将成绩与缺点错误分述如下：

（一）成绩

1、大胆放手发动群众的口号，对长期不相信群众、不敢放手让群众行动的包办代替作风起了一针见血的作用，对干部是很大的压力，使干部由不自觉的被迫的相信群众，到自觉的相信群众。群众的实际行动教育了我们的干部，逐渐克服领导上的包办代替，是边区思想上的革命。这改变了过去只从上级指示及书本出发，不从群众出发，不结合实际的教条主义，建立了干部眼睛向下的作风，从群

群众实际要求出发，执行群众自觉自愿、等待群众的领导方法，并建立了为群众服务、关心群众经济利益的概念。这对克服我们官僚主义领导有很大的意义，因此初步做到了领导与群众结合，相信下级与群众，建立了自上而下的领导与组织，出现了群众领袖。下级汇报要带原则的问题，我们要坚持非原则的事物大胆让下级去试验与创造，初步建立了从具体到抽象、从实际到理论的作风。如滑县、濮县、南乐的干部开始注意研究群众每句话每个行动，不是先敲铜子后量头，培养了领导上的民主作风与民主空气。表现在对下工作指示不像过去那样武断，给下级以考虑思索之余地，能够虚心听取考虑下级意见；在领导上虚心了，改变了领导上的平均主义。1942年以前我们的平均主义很厉害，那时是指示滚滚下，任务纷纷来，下面是汗流浹背，一事无成。这次运动是有重点，有中心，提出问题（如贫农问题）与推动工作，领导上就比较主动，收到了些成果。

2、抓住了发动群众的中心工作与环节，突出的强调了解决贫农问题及树立贫农的核心领导并加以贯彻。

3、开始做到了群众参加领导，监督领导。八地委几次召开县书联席会，地委与县委混在一起，打成一片，商讨研究问题，这种办法很好，各地都可以学习。这样上下情况很容易结合，尤其下边情况就充分反映上来了。这样就加强了领导，克服下情不能上达的缺点。

（二）领导上的缺点与错误

1、把大胆放手简单化了，把工作中的一些缺点全以未大胆放手来套，对组织工作及组织领导注意掌握不够。在斗争的前期，经过秘密酝酿才斗争，以后就没有酝酿工作与组织工作，因此地主就组织假斗争来应付我们。斗争注意讲理，这对提高群众、打垮地主作用很大。我们相信群众的策略性和原则性，但对群众的策略性原则性〔的〕局限性认识不足。一个村的斗争，在本村斗是有策略的，在他本村看是对的，但从全区全县来看有时表现出照顾全面不够。

因为群众活动的范围有限制，同时因文化水平的低下，妨害了接受外区及别人的经验。后期把大胆放手扩大为领导方法（这点主要由我负责），使干部对中央的领导方法研究不够，大胆放手后，不自觉的相信群众到自觉的相信群众，曾经过由群众之上跑到群众之外的一般旁观斗争的放任现象，使工作形成自流。后期组织工作、组织领导、与斗争对象讲理抓的不紧，群众斗争趋于简单化，也给了我们今后工作一些困难，即地主削弱了或消灭了，群众未发动起来。我们从上边看的问题大而宽，但是空，群众从下边看的近、小，看的具体。在后期由于我们麻痹，对群众的问题集中不够，所以坚持也不够，在策略上出了一些毛病。

2、领导上一般化，不能伴随着群众运动变化而变更我们的领导。如群众开始不敢斗，要我们打气撑腰，兴风作浪；可是群众发动起来以后，发生了“左”，就不能打气撑腰、兴风作浪了，这时需要我们耐心的教育说服群众的“左”，不能再兴风作浪，随着群众一道“左”下去。这次在这方面注意不够，产生了我们干部的“左”与重罚不要政策等。

3、为胜利所麻痹，发生自骄自傲现象。开始群众是劣势，所以我们的领导也是唯谨唯慎的，到了群众有了发动、有了些成绩、群众有了优势，就自大起来。分局的领导都是如此。自满以后，对别人的意见不能虚心考虑接收，军队政府提了意见，认为是“你们看不惯”，最后在民主斗争中发展成消灭地主的思想。当自己唯谨唯慎的时候，正视客观就能胜利，当自己自骄自傲的时候，轻视客观就要失败，这应做为今后领导上的主要教训。这不仅在群众运动中如此，在政府在部队都应以骄傲自满为戒。

4、强迫包办的现象仍然存在，把中心区的一套搬到边缘区强制群众执行，结果地主大批逃跑。另一方面是不了解群众领袖与群众组织的作用，不相信他们。群众组织与领导在一个村庄做的较好，即有斗争有组织有领导，但在一片村庄的群众运动，建立一片村的群众组织领导机关，产生领袖，一般的做的不够。因此群众教育群

众、群众约束群众、群众的纪律性和组织性都表现不够，发生乱的现象。滑县和濮县做的较好。濮县群众领袖了解了不能斗中农，他就很负责的去纠正斗中农的现象。群众观念还不够强，对群众的负责精神还不够，在领导上还犯了自由主义，对运动放任的现象，即站在群众之外看斗争。

5、我们的组织形式不适合于工作的需要。从分局来说，领导12个地委，八地委领导18个县，领导单位太多，地区太大，照顾不过来，这也是客观上的困难。

另外，分局对行署的领导，把政权力量组织到群众以内也不够，政权在斗争外边站着看。对军队力量的组织也不够，所以军队不了解，看不惯，以致发生部队干涉群众斗争与打抗联干部的事。这些是不对的，今后应当坚决停止。这种现象发生，部队本身当然有责任，但主要的责任是由于分局对部队领导不够，这个主要责任也应由分局的领导来检讨来担负。

（三）发生缺点与错误的来源何在？

1、运动本身带来的副产品，是无法避免的，即所谓矫枉过正，如贫农均田均粮思想的爆发与滋长，群众发动后的“左”。

2、对大规模群众运动没有经验，没有办法，是在实践中摸索。分局的领导上不深入，大规模群运开展时，忙于开会，经济会议、练兵会、地书联席会等，有些下边同志发现些材料没时间汇报，因发现的迟，写出以后已成明日黄花。有些问题发现后，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少、不具体。

3、主要的还是我们领导思想上存在着很大片面性，在错误思想上主观造成的：

第一、民主政策不够明确，有的明确规定了，也没贯彻与坚持，主要是思想上忽视具体政策之研究，尤其是在民主政策上。对说服教育提高群众做的不够，有的没有明确规定（如查“黑地”的处罚倍数），领导上有憎恶中农的思想，不是扶植贫农与地主斗争中显示力量走向领导，而是在斗争中农打击中农中转换领导，尤其是

K 269
10
:

把不能代表群众利益的中农干部扩大到与中农阶层的斗争。在运动中扩大党的组织，建立党的领导，使群众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这一点做的不够，加上民主政策不明确，于是不□观点、不要政策、重罚思想都来了。

第二、从内在环境群众目前利益出发多，从外在环境群众远大利益照顾不够。内部斗争对敌占区对全国发生甚么影响没有很好考虑，教育群众约束在这个范围以内也很不够。

第三、领导上包办代替与放任不管所造成。包办是不相信群众，放任是对群众负责精神不够，是对群众不关心，不能及时了解群众在大规模运动中产生的缺点。今后在领导上加强组织领导，认真培养群众领袖，及时的自上而下建立组织，那末这个缺点是可以克服与减少的。

以上的三个来源主要是由第三个原因所造成，我们应着重在第三个原因上来检讨。

冀鲁豫分局民运部关于老区和新区 发动群众问题的工作通报

(一九四五年九月十四日)

日寇宣布接受投降，我解放区猛烈扩大，大块新的解放区随之出现；这种猛烈扩大仍在继续发展。因之，巩固这些新解放区，并使之很快生长新的革命力量，已成为我们重要工作之一。

由于距我老解放区远近不同，新解放区又有两种情况。接近根据地（或为我根据地包围）地区，群众对我根据地情况了解较多，多数群众对我羡慕，渴望建立革命秩序，领导他们解除痛苦，改善生活（如阳谷西北部地区）。这样地区在已经安定社会秩序之后，应迅速转入发动群众。离根据地较远〔地区〕，群众对我根据地真实情况知道很少，或根本不知道，敌伪顽长期统治，造谣欺骗，在群众中造成了对我深刻的隔膜与误会；不但与敌伪顽勾结的上层地主对我恐怖，即多数贫苦群众对我也很疑惧。这种地区首要的工作是安定社会秩序，介绍根据地群众的幸福生活，介绍我们的各样政策法规，特别是我们的负担政策、减租减息政策、民主政策、自愿兵役制政策（这种地区群众最怕扩兵，不应过早提出扩兵口号）、锄奸政策，使各阶层都安心生活；在社会秩序已经较安定时，应即抓紧时机转入发动群众，但不能操之过急。必须根据新解放区政治情况之变化而具体的决定我们政策与策略，避免造成大批地主逃亡（个别逃跑是很难免的）。

发动群众首先应抓紧增资减租问题，将佃雇农发动起来，树立基本群众的领导权。在新解放区能否打下基础，要看增资减租工作是否彻底，佃雇农在群众中是否建立了威信与核心领导而定。在灾

荒中群众失掉土地，因此回地也是群众最紧迫的要求，亦应贯彻执行。

其次，汉奸恶霸分子对群众的压榨与贪污亦须清理，但这些必须以雇佃为核心，雇佃贫共同领导，团结中农，争取进步的中间分子，才能彻底完成民主斗争及〔树立〕群众优势。因此不能以为首先进行雇佃斗争就等于建立了雇佃的核心领导。雇佃核心领导的建立，必须加强雇佃与贫农之联系，实现雇佃贫的共同领导，团结中农参与领导民主斗争。过去雇佃站在民主斗争之外或未成为核心，而民主斗争实际领导权落在其他阶层或走里分子手中，这些分子在斗争中代表了群众利益，取得了一部分群众之拥护；但本身极不民主。这使群众今后优势的树立，工作的推动，遭受到严重的困难，在新解放区发动群众时应切实注意之。

在新解放区还要注意大量发展党，普遍建立党的组织；特别在减租增资斗争中，更应抓紧。过去很多地区不在群众斗争中发展党，而在运动之后，不是在斗争中发展的，未能把斗争中的积极分子吸收到党内来。克服此缺点必须在雇佃运动中大胆的发展，把斗争中积极的雇佃吸收入党，以建立我们党对农民的领导。

为了实现上述工作，各地委、县委应有计划的调干部，要下决心抽调有群众工作经验的干部到新解放区去工作，以便不失时机的放手发动群众，壮大基本群众力量，巩固我们新解放区的革命阵地。新解放区放手发动群众在巩固阵地上有头等决定的意义呀！必须纠正过去在向新地区抽干部时的应付思想。在老地区要大胆提拔地方干部，培养与群众有联系的新干部去坚持老地区工作。

调往新解放区的工作同志，必须十分注意培养本地干部。有些同志一到新解放区之后，会感觉新地区的干部与群众落后，不是耐心的去培养提拔他们，而是对他们瞧不起、不满意。告诉这些同志要认清一个事实，就是不提拔大量的本地干部，就不能与本地群众建立密切的联系，工作就搞不好，群众就不能充分发动起来；在将来不能建立起以本地干部为主的工作，这些地区就不能巩固。

减租与生产*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日寇投降后的四个月，是抗战以来最紧张的时期，我们曾集中力量，收缴日伪武装，扩大解放区，又曾为了保卫边区，被迫的反对国民党的进攻。这些工作我们都作得很好；但减租与生产两件大事，却有些放松了。国民党正准备或正进行更大规模的内战，我们依然面临着保卫边区、反对内战的严重任务。然而，只有今冬明春抓紧时机，集中大力，把放手发动减租运动与准备明年大生产两件大事办好，才能保卫边区，制止内战，否则边区无法巩固，内战无法迅速打退。

边区近二三年来发动群众的工作，曾有很好的创造和积累了不少宝贵经验，在多年摸索体验中，找到了较好的道路。其主要特点，就是明确的提出了雇佃贫的核心作用，与运动的群众性、自动性和规模的宏大。这两个特点的结合，就造成既深且宽的、有领袖有群众的、群众自己的伟大运动。

目前边区的新解放区，几近全区之半，未减租或减租不彻底的地区又超过全区之半。那里广大人民久处在敌伪及黑暗反动势力压榨下，如牛如马，如洗如劫，天灾人祸，灾难重重，土地被伪顽人员掠夺霸占，荒年中被贱价兼并，租额日增，工资日减，高利贷吞没了许多人的良田庐舍，捐派贪污逼得许多人卖妻鬻子。总之，黑暗贫困不堪容忍，一旦得到光复，像怒火一样要求翻身复仇、解放自己；如不能放手的减租，就不能解除他们的枷锁，改善他们的政

*本文系《冀鲁豫日报》社论，原载于该报第526期（1945年12月27日）第1版。

治经济地位，提高他们的革命热情。因此，必须求得在今冬明春把新解放区的群众放手的发动起来，巩固解放区，造成制止内战、打退反动派的有力阵地。

根据过去经验及目前情况，谨提出下列意见参考：

(一)一般的先从减租增资赎地等斗争开始较好，这几个斗争可以结合进行。发动雇佃贫，把他们首先组织成一个独立的力量，这是群众中的中坚部分，并可从中培养群众领袖。然后以雇佃贫为核心发动与组织广大群众，进行减息、反恶霸斗争，以便把广大群众充分的发动起来，把那些依靠□□为非作歹，无理无法，压榨人民的少数反动分子的气焰与统治打垮下去。

(二)要放手的发动，不要束手束脚。减租减息，决不应是政府恩赐或者群众干部包办的结果，而应是群众自己斗争的结果。要发挥过去运动中群众性、自动性和规模宏大的经验，选择优秀的积极分子，酝酿成熟，放手的交给群众中的积极分子领导群众诉苦水、说冤仇，自己鼓动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主持开会，自己掌握斗争。村内要深——把雇佃贫及广大人民都发动起来；对外要宽——联合行动、互助互勉、提高信心与勇气，求得速战速决，打垮反动统治的各种阵地。并把教育与行动结合起来，一面提高群众觉悟，一面提高群众时局认识，使大家了解政策，掌握政策，打退内战。不仅要斗争，也要团结；斗争了少数反动分子之后，就应该争取过去抗日今日民主的各个阶层的分子，把他们团结在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的政策周围。

(三)两种新解放区的不同特点，必须加以照顾、加以解决。一种是与老解放区的邻接地区，并有工作基础。这里曾直接受到老解放区发动群众的启示，又受到敌伪反动势力的摧残压榨，两相对照，分外鲜明，一个天堂，一个地狱，前者恨不能立刻实现，后者恨不能立刻打垮。这里群众不是不愿动、不敢动，而是如何发动的好。这里应多用典型示范(典型的主要条件应是酝酿成熟，领袖健全，发动充分，政策明确)，来影响并推动一般，并可开各村联合

大会，互相观摩，表扬好的斗争、好的干部，批评差的斗争、差的干部，并需在运动过程中从雇佃贫里培养真正优秀的领袖。另种是与老解放区相距较远且无工作基础的地区。这里有敌伪反动势力长期统治压榨的历史，对群众欺骗蒙蔽重压恫吓，对解放区造谣诬蔑、颠倒黑白。因此光复之后，反动分子一面恫吓群众，一面隐蔽自己；而广大群众则一面对我怀疑，一面对当权的反动分子害怕，有话不敢说，有泪不敢流。因此，这里的问题，主要是群众敢哭敢笑敢说敢斗的问题。首先就是树立革命的新秩序，建立我们的民主政府与武装，肃清伪组织，镇压罪大恶极的汉奸分子，必要时没收其财产，分给贫苦人民，争取一般的伪人员自首登记，交出隐藏之武器，弃暗投明，转变自己，施行初步改善伪负担，支差合理，救济灾民等；宣传我们政策法规及老解放区实际情形，使社会上层分子解除顾虑，使群众有依靠敢依靠，有榜样学榜样。法令就是翻身的武器，政府与武装就是说话的靠山。然后从群众的觉悟下手及其可能接受的形式组织群众发动斗争，从一区一村突破，打开局面，推动一般，并把斗争逐渐展开提高。这里特别应把武装斗争与减租结合起来，县区武装与群众武装配合起来，防止反动派的进攻与扰乱，安定社会秩序。

（四）把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结合起来，各部门干部配合起来，集中力量发动群众。为了在新解放区发动群众，必须从老解放区抽调大批有能力有经验的干部到新解放区去。这里外来与本地干部的团结合作问题，就需要解决了。因为一面是有经验不知情况，另一面是无经验熟悉情况；一面是工作熟练群众生疏，一面则工作生疏群众有联系，如单靠一面，谁也搞不好，谁也得走冤枉路。因此必须互相帮助，互相学习，把经验与情况结合起来，把干部与群众结合起来，只有结合才能搞好工作。而结合的关键在于干部思想的一致性（互相打通），与大家都亲自动手在实践中去学习。各部门干部配合办法，可在县区两级组织民运工作委员会，以群众团体为主，并吸收同级党政军干部参加，统一思想，集中力量，除照顾各

自日常工作外，都应以大部力量，到〔乡〕村中去，到农民中去，搜集材料，宣传法令，教育群众，组织群众，使群众起来为实行法令解放自己而斗争。

（五）今冬明春仍然处在国民党所发动所扩大的内战局面之下，我们必须不失任何时机的放手发动群众，决不能因为时局紧张而把这一重大任务搁浅起来。

边区的生产有这样特点：人多地少，土地瘠瘦，纯产粮食，粗耕粗作，副业较少，因此形成无地或地少的贫苦农民经常处于半失业和半饥饿状态。因此劳动合作互助必须找到剩余劳动力的出路，这是边区劳力组织起来（生产组织）的基本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基本出路是土地由瘦变肥，副业由少变多，以农业为主以副业为辅的农业与副业相结合。土地的由瘦变肥，主要办法是深耕细作，多施肥，多锄草，选种，不误农时及可能的水利等等。副业的由少变多，主要方向是来自农业，用于农业，取之生产，帮助生产，如纺织、粉业、豆腐、油类、制造与改□农具、靛料等等。副业又应以手工业为主，商业为次。以农业为主，副业为辅，系指全年经济而言。不同季节应有不同的结合。如麦秋两季，显然是农业为主，但为副业作准备；而冬季和春初的农闲时期，又应以副业为主，并为农业作准备（如积肥）。

生产互助的发展与提高必须从群众的需要与自愿出发，根据群众的历史习惯、技术经济条件及周围的情况，从群众“能够办”，“能发财”的生产作起，随着群众的实践经验把互助逐渐提高，由小到大，由低到高，由不记工到记工而到细订工，由小组作起，然后走到小组与村合作社相结合。互助必须是互利，合作必须是民主，任何强制、独裁、包办的办法，都会使互助合作归于失败的。互助必须是互补，人力与畜力，力气与技术，财产与能力，农业与副业互相结合，互相调剂，解决了一人一家不能解决的问题，提高了生产技术，增进了劳动热情。

必须把查减与生产结合起来。发动群众中的许多悬案（如果实

处理和内部团结问题等），有的尚未解决，封建顽固势力无时不在想复辟，想打反攻。减租减息是不断检查不断斗争的过程，所以在老解放区里，今冬明春在集中力量，发展副业，准备农业大生产的运动中，必须与查减结合起来，发动尚未发动的群众，解决群众中的悬案，防止封建顽固分子的打反攻。

必须把生产与斗争结合起来。在战争的空隙里，集中力量进行生产，何时何地当国民党向我进攻时，那时那地就应把生产与战争相结合，用劳动互助的形式，把群众组织起来，从群众的互助组中轮流派人负担战争动员，在外者参加人民的自卫战争，在家者从事群众的生产事业，既可担负战争勤务，又可不误农时，不荒耕地。

为了在老解放区集中力量组织群众生产，可在县区村组织生产委员会，以政府为主吸收军政民的干部参加，统一思想，集中力量，干部亲自到乡村中、农民中去，了解生产情况，学习生产知识，亲自下手，并总结经验，指导群众生产。

新区情况研究*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九日)

李进宝

我分区关于发动群众问题，没有作详细总结，具体材料一时统计不出来，现在只将新区几个特点提出来。

一、新解放区的两个主要特点

第一，敌占区解放后，阶级关系变化很大，并对我们不利之一面多，领导上不很好注意，不但群众不好发动，反会出现许多肮脏活来。

1、当权派（地主）与中间势力矛盾缩小，一致盼中央抵抗我们的一面增大。本来当权派对我们不满是不奇怪的，中间势力对我们却是出乎意外之抵抗。他们认为是：有法的即斗，只要地多有钱就罚，并且要打萝卜摔鸡子。同时他们亦对发动群众规律了解一些，一见我们发动雇佃，他们即说：“这没有啥，只要不斗就行。”我们一组织农会，他就认为有法的大祸临头了。卫南二区位头一个中间势力80多亩地，对当地一个区长说：“农会组织不好，俺不害怕；农会一组织好，俺几个‘户家’都要跑咧。反正八路军的法是为了粮食和地，我那80亩地看着办吧。事定了，我就回来，只要躲开摔鸡子就行。”一般中间势力大有地就是祸之感。

由于对我发动群众想象过分严重，一组织农会，或搞民主斗争稍一不慎，或形势稍一紧张，地主即大批逃亡。一个村三五个不等，卫南二区地主跑者不下百十个。他们一跳〔跑〕，与群众增加了

*本文系李进宝同志的一封信，后收入冀鲁豫各联总会宣传部出版的《工作通讯》第20期。

顾忌，减弱了翻身的勇气。有的则主动让步，以争取群众。如滑县城附近我们未去，地主即将土地分与他近门了，并且是全村统一的步骤。有的更加紧统治与威胁，使群众不接近我们。

总之，地主富农，甚至富裕中农，对我态度，是认为我们：有法的必斗，斗必打，斗必罚，罚后留点生活。

但当权派与中间势力矛盾并未消除，有了空隙，或者我们打了当权派未打中间势力，中间势力还极力表明他的态度。如卫南二区士绅会上，提出了五六个问题，其中有的是开明的与不开明的不能一样看待，进步人士应允许参加农会。我们征求他们对反恶霸的意见，他们许多都提出：如谁谁，别说你们要整他，我们说也该整他，并嫌我们整的太轻；但由于过去“推平”影响太大，反恶霸未很好开展。当权派与中间势力基本上是站在依靠中央，一致对抗我们的一面。

2、中农是不说我们好，又怕我们。怕我们的（主要是富裕中农及贪污后上升者），好的一面说我们负担轻，办法合理，军队政府都好；怕的一面，说我们管的太宽（包括工商政策，运输不便，组织妇女儿童……），小题大作，如地头地脑的拾把庄稼闹纠纷，或不让穷人拾树叶，不让跟着车拾粪等，〔碰到这样的情况〕就斗争。“那谁一辈子没有一点错，不得罪一个人呢？”就是倾向我们的，在开始接近时亦有些顾忌。不少的中农反映：“这会儿弄的俺谁（指我们与地主）也不敢挨，一挨谁也不是。”总之，中农目前动态基本上是中立，有些对我们有顾忌。

雇佃贫亦是在“有法的必斗，斗必打、必罚，罚后留点生活”的影响下发展。这本是贫农本身特点，由于根据地斗争影响，这个特点在解放后就合理化。只要干的话，一见有法的就眼红，见错就提出，一提必罚平。如果走过去的老道路，我们一掌握政策，群众认为不解渴，地主认为早晚得平，不如和平的拿出来，地主愿意拿，群众愿意要，如自动^①粮食，土地，结果有些地方将领导者扔

①当时称“自动献出”为“自动”。

到外边，地主与群众在这些地方倒是心投意合。

根据地发动群众时我们不讲政策、策略，群众还可以顺利的发动起来，但在新解放区就不同。由于目前环境变化了，地主出路自以为比过去多而大了，在发动群众中看着不重，即在家等着，不重不拿腿；基本群众则是不动则已，一动即要求吃大馍。同时由于中农中立，地主富农共同抵抗我们，群众就不容易控制他。雇佣贫要求高，对地主不好控制，这是一个矛盾。搞不好，不只是政策过火不过火问题，而是搞不起来。

第二，顽杂之游击小组作乱，社会秩序不易稳定。游击组主体是伪顽旧部下，顽伪大股有的被我打垮，目前在家无出路，“中央军”一勾结，认为旧梦发作的机会到了，一个、二个、三个五个即起，一方要粮要款，加重群众负担，另一方面与我对立（滑县2个农会干部被捆走）。农村中基本群众对地主是敢怒不敢言；一般中间势力对他们也不满，但又怕他们走后中央军不来，我们又去发动群众，因此基本上是抱中立态度，有些还赞助我们；流氓、保长、当权地主、地痞等与他们勾勾搭搭，通风报信，掩护他们，增加了其活动的便利，增加了地主的抵抗力量，增加了基本群众的顾忌。（农会员说：“不在农会，不怕狗咬；在了农会，狗一咬就睡不着觉了。”）现在滑卫新解放区到处均有他们，对我威胁很大。

解放区解放后即由大多数与当权派的矛盾，马上转到雇佣贫与地主富农的紧张的对立中。地主警惕性很高，解放后即积极准备，也是布置一个叫我们不好下手的局面。这一形势在开始时不求得一个转变，就会弄成雇佣贫孤立恶战，地主逃跑，游击组遍地，社会秩序紊乱。

二、形成的原因

第一，是根据地“推平”与“武斗”的影响。

第二，顽杂军有流氓及地主作为基础。

第三，刚刚由民族斗争转到阶级斗争，一方农民与地主对立加

深；一方在我军事上采取自卫原则下，各阶层变天思想的严重，因为没有在长期斗争中证明国民党不能来。

因此地主力量大，出路多，刺激越狠，他有力量抵抗，不易作更大的让步。

三、工作中的两个问题

第一，道路问题。新解放区发动群众应分两步作，开始要建立比较稳定的社会秩序，争取人心向我。

第二步是正规发动群众。

稳定社会秩序最基本的问题是争取多数人心向我，稳定少数；因此我们必须从各方面执行宽大政策。为了稳定少数，就要过去宽；为了争取多数向我，就要今后严，维护多数利益。在工作上，除过去提出的实行善政，伪人员自首，宣传政策与形势外，整理村财政亦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这个工作未引起注意。现在的白板区，我们正在这样做，结果如何，尚不敢说一定。兹将道口镇情形简单报告如下：

共11保，一百三四十户，2顷地以上者地主四五户，多系商人。统治者苑会轩与吴兰田、李旭东有些拉拢，他统治了十几年，下有几个保长腿。在平常负担上除贪污并不纳款外，还有使商人最痛恨的便是，随便确定各商号的应负担份数，这样土商号及外来的大商号便吃了亏，与他有拉拢的则沾了光。另外是奴役剥削小贩。如：有一个剃头铺纳不着负担，但姓苑的剃头向来不拿钱；一个担水的白尽义务的给他担水；开小饭铺卖馍馍的，他随便吃不拿钱。

我们打开道口很长时期，11保的阶级关系本与以上所谈的无大差别，中小商号很害怕，但我们先搞的是整理村财政，这样大中小商人都敢到我们这方面来了。由于变天思想大，商人对苑会轩不敢有大刺激，不敢当面查帐说理。结果是每甲派代表查帐，查出毛病来，过去作罢，主要是今后摊派办法要合理，以投票方式决定了今后负担办法与开支办法。结果11保负担办法解决了，人心大快。同

时这也是中间势力领导的，基本群众也插了进去。虽不是基本群众领导（开始恐不可能），但当权派的锋芒受挫了，争取了大多数的人心向我，比□苑会轩的专制强多了。

这个搞法我们现在卫南二区作试验，根据道口经验及农村一般阶级动向，在安定社会秩序工作上重视这一工作是很必要的。在农村先作这一下，一方面可以改变“推平”与“武斗”的影响，争取多数人心向我，也可减少群众负担。因根据农村了解，负担问题也有同样情况。

第二，我分区新解放区发动群众所走道路，有的走旧路，但旧路政策非常难掌握的，一方面因为敌占区黑幕太多，同时根据发动群众影响太大。新道路现在准备走，过去也提出来要走，但未走成，这里边最大问题是打通干部思想。有些干部对旧道路留恋，因他们对先民生后民主较熟习，也易解渴，也热闹，领导上根本不向新道路上升。但群众因受根据地的影响，自发的要求是民主，干部要求与群众要求发生脱离，这样干部民生热情就冷了半截，决心动摇，工作松懈。群众自发的是向民主方面继续发展，要按旧道路行动，一行动就过火；干部怕违犯政策，就说服动员，实际上是起了限制群众行动的作用。结果干部束手束脚，只嫌群众“左”，领导上又指不出一个群众能接受的正确方向来，群众的要求我们不能答复，我们意图群众不能接受。时间一长，地主看出了上边宽，下边严，但严不能实行，地主主动让点步，弄点粮食给群众。根据这种情形，为了坚持走新道路，一方应使干部认清新道路的必要，同时领导机关应很好的帮助重点突破第一炮，不然这个道路也很〔难〕实现。

这些意见主要是我个人意见。

清平新解放区（三区）的雇佃运动

（一九四六年二月）

张 延 积

写在前面

目前我们冀南雇佃运动已经过去了，清平三区的雇佃运动可以称为我区，特别是新解放区的模范，它最突出与成功的地方就是：走群众路线，从群众的觉悟程度与水平出发，并由此涌现与培养了大批的群众领袖，及高度发挥群众的能力与智慧，而创造了规模宏大，威力雄厚的运动的典型。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理论在这里实现了（当然也不否认它还有某些缺点，正如作者文中所说）。因此虽然我们冀南目前绝大部分地区的雇佃运动已经过去，但它的领导精神与某些领导方法还深值各地在其他运动中研究，参考与学习。

作者——张延积同志，以自己领导实际运动的亲身体验，能够很生动很深刻的把运动的全貌，群众的活动，领导者与群众领袖的活动及各方面写出来，这不能不归功于作者深入实际的工作与写作的技巧，此点也值得各地同志学习。

冀南区党委民运部

二月十九日

一、环境的特点

——国民党反动派自豪的敌后“小重庆”

此区是鲁西北国民党反动派——萧健九的老巢穴，从七七事变起至日本投降后一个月为止，8年来在他们长期盘踞之下，坚决的执行着“联日防共”的各种反动政策，与临清敌伪订有“共同防共”协定，拚命的拔兵买马，作为西进南进我解放区的基地，并自豪称这一带是国民党敌后的“小重庆”；除此之外，并出刊物、发宣言，大肆造谣污蔑我党我军，说什么“共产共妻”、“拔兵抽丁”、“杀人放火”……

他们依靠着地主阶级，来残酷的统治着群众。全区的地主，尤其是大地主，不是这些反动派首领的亲戚，就是他们的盟兄盟弟，乡村政权都是他们的人。这些家伙又多是国民党员，所以有门子，负担就可以不出，就可以在村中说一不二，独断横行。这些乡村的当政者，他们是欺压群众的魔王，他们是鱼肉人民的老祖宗，几年来他们贪污发财，因此群众气愤的称这些乡村长为“揍穷人的长”。在这里大地主或与衙门有勾结，或是国民党员就吃的开，他们便是当朝的执政者。而这里的群众，尤其是贫苦群众，可就遭了殃。杨村庄贫农李逢文，因为在灾荒年实在没法，欠了大乡长150元的公款，大乡长高玉贵便硬逼着他拿公款，威胁说：“你如果不拿，就到康庄据点里去说话了。”李逢文知道，到康庄去还不得杀头吗！迫于无奈，将自己的老婆卖了抵帐。尚武营贫农伊希法，因为欠公款被小乡长逼得没法，把自己的老生子卖到博平来拿公款。康庙地主王以录，是中学毕业生，是国民党县党部的总务干事兼当村长，对群众最坏，在要公款时，逼着贫农王金昭没法，去上吊。因此，群众们特别是贫农们为了缴纳顽军的苛捐杂税，去卖掉自己的老婆孩子，饿死自己的母亲、父亲，逼得妻离子散，逼得廉价出卖土地者，真是村村皆有，使听者发指，见者落泪。谈到他们们的生活处

境，那就更悲惨了。他们除了身受与贫农一样的痛苦之外，还有其本身特殊的痛苦，就是地主和富农们的封建剥削，由于顽军长期盘踞比前更加重了。因为一般的地主和富农要给顽军出过重的负担，结果他们便把亏空加在雇佃身上了！佃户（这里都是小种地）的劈头都是麦“一九”，秋“二八”，劳动一年还得挨饿受冻。正如油集佃户述说自己的生活说道：“驮大车，垛大垛，场院里关了门，分子还脱不了挨饿。”雇工的活价更是稀松，一般每年只挣三四千元的伪钞，折合起来连件棉衣就买不了。他们是终日过着牛马的生活，正如杨村庄工人张书林所说：“东家拿着我们扛活的白天里当牛驮，黑夜里当狗使。”就是说白天给雇主干一天活，晚上还得给东家打更、站岗，当看家狗使唤。由于一般的小地主和富农与顽军没有“门子”，他们一般的说，在农村中没有政治地位，他们也是咬着牙来对付顽军的苛政，因出负担而下降的倒也不少。不过他们的家当总是富裕的，还能忍受的住，而最可怜的还是贫中农了。在此种情形下，谁说八路军一个“好”字，不是活埋，就是入狱。杨村庄贫农王二祥因为连到河西去卖了两次布，村里国特发觉了，加上勾结八路军的罪名报告给冯八爷（二皮之弟，当时任区长），给活埋了。我们解放区工人增资的法令传到这里后，他们便造谣说“八路军增资是为了拔兵”，企图用谣言来迷惑群众。

去年10月间我军相继解放了清平、临清后，地主阶级所依靠的上层优势——伪顽军和政权被打塌了，于是他们便恐惧发抖起来。头号的大地主及一些顽固要员（如胡里庄及齐楼的大乡长），便马上窜到天津、济南或禹城去了（因为萧健九残部跑到禹城去，冯二皮残部跑到济南去）；但不久清平的顽县长冷玉朴带着他的主子何思源的圣旨窜到博平后，一批第二号的地主及顽固要员，便都跑到博平去“保险”，去到博平来想法破坏我们。第三号的地主及一些小顽固头目，仍然在家里住着“装好人”，采取“笑里藏刀”的办法，表面上恭维我们的政权，而背地里在造谣生事，与冷玉朴勾勾搭搭接关系，吓唬群众，为了抵挡我们的发动群众政策，便赶快的

设法卖大牲口、分家，减少目标；另外便找贴自己的亲信穷人公开出头执掌村政大权，而自己便暗中操纵，当“后台老板”。一般小地主及富农由于长期受到反动派的欺骗宣传，摸不清底，表现也很恐惧。由于此区不接连我们的根据地，因此基本群众只是听说我们好，而没有亲身见到过我党的好处；又加长期受反动派欺骗宣传的蒙蔽，因此基本群众对我们是采取又喜欢又怀疑的态度。同时地主在村中严厉的统治，使基本群众不敢接近我们，不知道咱们到底是卖什么药的。总之，各阶层群众两只眼睛都在注视着我们的政策。

工作的开始是集中一切力量去肃清伪顽军的散兵和小股土匪，及进行伪军伪组织人员的悔过，以便给发动群众工作扫清道路。因为这些工作对地主阶级的利益危害不大，或是没有什么危害，因此当时各阶层是处于沉默状态当中。

二、杨村庄燃起了斗争火焰

此时全区只有3个干部：区部里有一个区长、一个助理员和一个新派来的区委的委员。政权干部专门进行肃清伪顽散兵的工作，而这个区委同志只好叫区长介绍到他的村庄——杨村庄上去工作。因为别的地方个别人员是不能活动的，只有带着少数武装才能活动，真是无立足之地。由于杨村庄是区长的村庄，当着萧逆统治时区长的家属流亡在外，本村有个别的群众到过解放区，我党对待穷人的好处听的多些，并且怀疑心比别的村轻一些，因此群众是敢接近我们的。区委同志便在这村找灾荒年卖出土地的贫农李庆田、李逢文、田庆福等人进行谈话，讲解政府的赎地法令。这些人因为身受大乡长高玉贵的气很大，在灾荒年逼着为欠公款而失去了土地，他们喜欢的要命，便积极进行串联工作。不到几天把全村25家赎地户都串联起来了，选了他们3人当代表，划分了3个小组，赎地运动便逐渐的由秘密串联走向公开。大乡长高玉贵是当乡长贪污发家的（富农），和地主唐善明（过去的大乡长，贪污发财）着了慌，

造谣说：“八路军可兴不长，你们这些在事的（指代表），中央军来了得抄你们的家。”并积极走上层拉拢区长。可是以李庆田为首的代表和赎地户，不被他的谣言所吓倒。他们说：“明天中央军来了杀了我的头，今天我也得赎地；有八路军就有俺，有俺就有八路军，不怕那个。”

从此，群众翻身斗争的火焰，便首先在有抗属的村庄，在群众对我们怀疑心小的村庄开始了。大乡长高玉贵眼看到统治不稳当了，就积极走上层，对下面威吓起来。但这时的波动，因为只在一村，对全区没有什么影响。可是五区河南里的雇佃运动，轰动起来了，地主们听说了，就知道是早晚脱不了，为了防止在三区的实行，就普遍造起谣言来，威胁工人说：“增佃吧！增了就拔你们去当兵。”或说：“增了资到郭庄爬圈子去。”

三、沉底炮第一发打响 六个村雇佃获胜利

县里为了着手发动三区的群众，派来了6个抗联干部，决定先从开展雇佃运动入手。干部便确定方针是先搞杨村庄，通过赎地户的积极分子去串联本村的雇佃，向赎地户中响亮的提出：“要想赎地必须把雇佃串联起来才行，因为光咱们二十几家赎地户力量太单薄。”赎地户都感到这种意见是对的，便去积极的串联本村的雇工。由于雇工不是赎地户院里的弟兄，就是自己的亲弟兄，即便是外乡人，但由于长期在一块，也熟的很，因此都很相信赎地户的话，两天的工夫就把全村10个雇工串联起来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雇工当中出现了一位积极分子，名叫李长田，他年青积极，相信我们。但其他工人的劲还不如赎地户，是因为对拔兵思想还有点怀疑。

此时在领导上便决定向外村扩展，但并没有提出用群众串联群众的方针。干部组长赵宇光同志便到油集村去了，为了便于接近雇佃，便住在地主王克达家里，抽空去和一个佃户谈话。谈话内容开始是谈家常，问他家是哪里的？有几口人？为什么在这里种地？是

什么劈头？与他计算今年能劈多少粮食，是否够吃的。谈来谈去佃户便把他的穷苦生活详情一一告诉给赵同志，并说：“刻下家中就没有吃的，东家很狠心，一点就不借给。”接着赵同志便把康庄及五区河南里雇佃怎样联合起来要粮食的情形告诉给他。佃户说，人家东家给吗？赵同志说，这是政府的法令，只要大家伙联合起来，谁敢不给呢？佃户心里很喜欢。上午下晌后，几个雇工都在牛棚里吃饭，干部便趁着这个机会过去与雇工谈话，最后约定晚上在这个牛棚里开个会商量一下。到了晚上，干部便带着杨村庄工人积极分子李长田一同到油集来开会。参加会的有10个雇佃，其中有一个是杨村庄人，与李长田同庄，很熟悉。第一个讲话是李长田，他介绍了一下杨村庄工人与赎地户联合起来的经过。油集雇佃都感到杨村庄办的真好，很高兴。（注：这说明了久受压迫的雇佃最喜欢“群胆”。）接着赵同志便提议叫大家都述述家常。很显然的，雇佃的家常还不是成年成月的挨饿吗？还不是半辈子连个老婆就娶不上吗？述来述去很多人就想落泪。特别是谈到灾荒年使他们更寒心，更难过，他们有的直到现在连棉衣还没有着落。工人油梦俊说：“×他娘！一年挣的钱还不值一身衣裳钱，白天干活，晚上还得打更。”当每个雇佃谈到他本身的苦处时，赵同志表现了最关心，最能体贴他，及时的询问当时情形。最后赵同志启发说：“咱们光难过也不能治饿啊！咱们得想个办法。”工人油梦俊马上说：“×他娘！咱得干！干的时候我领头。”由于从述家常引到倒苦水，到会雇佃的阶级觉悟空前提高了，都异口同音的赞成油梦俊同志的主张，特别一看油梦俊要领头干呢，更高兴了。接着赵同志向雇佃启发了三个问题：第一，是要求雇佃得打破情面。问大家情面治饿，还是粮食治饿呢？雇佃们的回答是粮食治饿。第二，叫大家想想：地主除了割肉疼之外就是什么疼？大家想了半天，都说是拿粮食疼。赵同志说：“你们说的很对，地主向外拿粮食心疼的很，为了省小米，就造谣吓唬你们说：‘增加了小米，八路军就拔你们当兵去。’告诉给大家，八路军的兵都是自愿干的，没有一个是拔来的，可别听那

个话。”又向他们指示：“东家如果看的咱们大家伙起来了，吓唬不行了，就可能收买咱们。”工人油梦俊说：“你放心，说啥不拿800斤小米是不行的。”李长田说：“我看咱们两村联合在一块力量不大吗？”油集雇佃很同意。当时便举油梦俊当组长，决定每个人再串联一个人，谁与谁最好就串联谁去。最后老雇工曲辰站起来嘱咐大家：“即便别人不敢干了，咱这一伙也得抱住心干到底！”（曲辰家是外乡人，曾当过小学教员，为穷所迫在本村扛活。）第二天就把全村22个雇佃都串联起来了。在串联时，他们都学会了昨天晚上的开会内容，都是照样的述述家常，倒倒苦水。从此油集的局面算打开了。

杨村庄赎地户李逢文自己到范尔庄串联雇佃去，找着李得武（杨村庄人，在范尔庄扛活）。当时范尔庄地主造谣很凶，吓唬雇佃说：“增资吧！增了资就拔走。”全村24个雇佃被吓走了8个。当时李得武是吓走了刚回来的。李逢文便揭破了地主造谣，述说杨村庄、油集雇佃马下如何团结起来的。经过解释后，李得武心中摸到底了，便认了头，并决定再串联人。此后，我们干部郑同志就特别抓紧李得武进行串联。两天之后，李得武便串联了5个人。

杨村庄赎地户的积极分子李庆田、李逢文、田庆福又到了宋庄和田庄，都找到对象并谈了话，都算有了线索。

在这种群众和干部相结合的酝酿串联方式之下，杨村庄、油集的雇佃已经组织起来，宋庄、范尔庄已经有了积极分子，田庄已经有了对象了。为了对对头，互相壮壮胆，便决定去田庄召集5个村的雇佃开会。届时到了30个人。在会上由于杨村庄、油集两村的雇佃酝酿串联已成熟，思想问题已初步解决，因此他们表现的最好。其他村由于受地主谣言的迷惑，对是否拔兵一事心眼儿里还有点“二胡”。凡来的都是大胆些的，对拔兵或不拔兵还有些试探性质。可是他们见到外村里都来了，又见到杨村庄和油集成立的这么好，对拔兵怀疑思想减轻了，心比较“着实”一点了，但还没有彻底解决。

在会上首先由抗联万同志揭穿了地主的谣言，并说明共产党八路军是代表雇佣利益的，与雇佣是一家人。

接着马同志便用问答的方式进行教育。他当众面前询问一个工人说：“说八路军增加了小米拔兵，是你说的吗？或你听说是谁说的呢？”工人回答说：“不是我说的，是好户说的。”又指一个老年雇佣说：“像你这么大的年纪能当兵吗？”全体雇佣都笑了。又质问大家：“好户为啥造谣言？”大家齐声回答是“为的省粮食”。又问大家增资增佃是否合乎道理？一个工人马上说道：“东家吃穿都是我们扛活的分子（即佃户）做到家来的，没有俺们就饿死他们了，怎么不合理！”当时运用这种问答式的教育方式，对雇佣教育极大。因为每一个问题的提出都关系着群众眼前所最迫切要求解决的思想问题（如拔兵），可以说是一种启发引诱与群众商谈相结合的方式，比起干部讲群众听来要好的多。

在讨论到怎样联合人和怎样干法时，有的主张叫村长叫去，大家都不加思考的回答说：“可以。”我们必须估计到，此种主张完全是依赖别人而自己不愿意出头的思想，在雇佣刚刚发动尤其不愿当头的思想未解决之前，最容易产生此种主张。然而，我们有的干部由于不了解这一点，就认为这是从群众嘴里说出来的话，这是群众中来的意见，因此也就没有进一步的去启发雇佣纠正依赖村长办事的办法。结果马佛寺、田庄都是村长领着挨门叫的，其他村是自己叫的。

第二天，5个村共来了40多人，只有马佛寺的雇佣一个也没有来。但我们这时在领导上不检讨马佛寺不来的原因是因为干部只进行了一天工作，外村雇佣又未去串联去，是因为酝酿不成熟的缘故，此时干部便启发去接去。40多人执行了干部的意见，直奔马佛寺去了。可是一直接到村里还没有见出来人。走到庄东头，只看见一个干部在街上出头露脸的集合着雇佣，约有20人，但劲头都不大。因为这多是干部亲自出马挨门叫出来的，雇佣们都很害怕，多是不敢出来，不知“所以然”的缘故。此时干部心里很着急，光怕自己担

任村庄的工作落了后难看，在包办代替的思想支配之下，就把群众路线抛在九霄云外了。本来有几个比较成熟的对象，假如说启发他们去叫，没问题，人一定集合的多。到了外村的雇佣去后，干部更着急了，便亲自指示着外村雇佣去捆一个女东家，因为她闷起来了3个工人。外村雇佣素的一声都去了。这时候她作起大难来了，心里想不闷了吧，可是工人不敢参加，怕拔兵；不献出雇佣吧，可是外村的雇佣非捆不行。无可奈何便与外村雇佣讲起价钱来了，要求缓她一时。谁知道她安人找了大胆的贫农来当假雇工（据后来调查，马佛寺一村就有6个假雇佣）。外村雇佣们在大街上到处敲门，到处高喊着：“找扛活的，找分子。”但本村已集合起来的20多个雇佣却一点事不管。后来勉强的把集合起来的20多个雇佣带到田庄来了。

过午各村里都选举了代表，但只有马佛寺的雇佣不选代表，因为他们害怕当头，害怕拔兵。傍晚在讨论到明天怎样串联人时，他们都主张晚上回家去分头串联。这种意见他们虽然没有说出口来（因为我们干部包办着，感到说出口来对干部不体面），但他们已体会到用生拉硬卷的办法是不成的。还好，我们领导上赞助了这种分头串联的办法。群众这种分头串联的办法，实效大的很，不到两天的功夫便把6个村168名雇佣串联起来了，并选举了油梦俊、李长田等人为临时联合代表，准备行动起来。

马佛寺失败的教训告诉我们，任何一个村庄不经过充分的酝酿工作（即便是任何一个群众也是如此），不解决雇佣群众们所怀疑的“拔兵”、“变天”等思想问题，就借用外力去硬拉、硬卷，结果便惹得雇佣们害怕起来，更助长了他们怕拔兵的怀疑心，使真正的雇佣不敢出头，出现了假雇佣。这些假雇佣，都是赤贫或贫农。其中有的是老年人，因为他料想到即便拔兵拔老头有何用。还有一种是有胆量的赤贫，其中有个别是当过伪顽军的。他们的用意：只要小米混到手里，家中不挨饿，真拔兵也去。这就告诉给我们，在领导上操之过急的做法，必然会产生严重的包办代替，把生动活泼的

运动造成僵局了。同时也告诉给我们，由于在领导上接受了群众的意见——白天集合、夜间分村串联的办法之后，两天的时间就把6个村168个雇佃串联起来了。这说明了分头串联的办法是群众最习惯的，也是最喜欢的办法，它最能启发群众的觉悟。

6个村雇佃联合起来后，集体的行动便开始了。这时候，各村的雇佃眼看的人愈来愈多了，在“群胆”的鼓舞下，在干部再三用事实解释下，雇佃们最焦虑的拔兵思想问题被逐渐的铲除了，全体雇佃便集体从田庄出发到王集大集上去游行示威，在游行中高喊着：“穷人大翻身，亏了八路军。700斤小米，棉花100斤。分子麦改三七劈，秋改四六分”响亮的口号。由于这口号是根据雇佃的要求代表们自己提的，因此喊起来都很挂劲。

游行返回后，便决定以村为单位集体要粮，如果谁不给，6个村就联合起来斗争他。由于他们全体行动起来后，在田庄开了整整的4天大会，6个村的地主雇主都害怕了，知道反正是脱不了，便赶快的在家里碾米、称花、做准备工作。因此，6个村原来计划3天之内要齐，但不到两天就要齐了，没有一个敢不给的。粮食是以村为单位雇佃在一起集体要的，地主们都要求代表们提早过他的，恐怕过晚了叫丢人，忍痛之下还说着什么：“□动哩！你们出一年力不容易。”杨村庄大乡长高玉贵和地主唐善明都准备下好洋烟来招待全村敛粮食的工人。这说明了雇佃们集体联合的行动的结果，使着6个村的地主富农们开始低了头，感到吓唬威胁的办法吃不开了，就改头换面企图用收买利诱的办法来软化雇佃。

虽然在运动中某些地方仍有严重的包办代替（主要是马佛寺），发动的不够充分，但不管怎样，雇佃的联合行动第一炮算打响了。然而由于与三区靠近的都是新解放区，因此这6个村的联合行动形成“孤军深入之势”。只是在这6个村的地主首次的见到群众威力，并且开始低了头，而对全区地主阶级来说，只是有了刺激，并未因此而吓倒，相反的他们便想尽各种办法（主要是造谣）来抵挡我们的政策。第一炮打响后，对基本群众特别是对雇佃的影响是很大的。

久受顽军欺骗宣传的基本群众第一次体验到共产党、八路军对待人的好处了。我们首次从封建统治下获得了一部分群众，给我们发动群众工作开辟了新园地。

此时在领导上根据第一炮打响后情况变化的分析，接受了6个村已往的经验，便明确的决定了运用已起来的6个村的雇佣力量，开展大规模的串联攻村运动，并向全体干部指出执行这一方针时机不可过失，要趁热打铁，愈快愈好。为了创造串联运动的经验，便首先在几个村庄实验一下。区抗联康主任便亲自到油集去了，先打通了积极分子李开泰和油梦俊的思想，在本村的胜利大会上便进行启发酝酿工作。李开泰和油梦俊对全体雇佣说道：“光咱6个村添东西，全三区外村都没有添东西，东家假如问咱，咱就没话答复了。”又问大家：“外村里还有穷伙计、穷分子吗？”大家回答是：“还有。”接着说道：“穷伙计、穷分子不是咱们的亲戚，就是咱们的朋友，咱能够白看着他们挨饿吗？咱们别光看着自己吃饱了，要想想还有很多人挨饿呀！咱要永远多添米，必须把咱全三区里的雇佣都串联起来才行。”他俩这种动员因与油集雇佣本身利益结合起来了，所以大家都很赞成。李开泰、油梦俊并当场说，明天他俩就到康庙去。第二天区干部便去油集与李、油两代表商量怎样串联的问题。开始两代表的意见是带着油集22个雇佣一同去“卷”去。干部启发说：“咱们大家好生想想，因为地主造谣，马下雇佣很害怕，假如咱们20多口人都去了，雇佣不害怕吗？”他俩接受了干部的提议，觉得还是用串联的办法好。接着又讨论到去找什么人，都是说啥。讨论结果决定去了先不进村，在坡里游逛，专找驶大牛的，因为驶大牛的都是伙计或分子。李开泰去后，在家后地里见到地主王宝庭家的伙计正在犁地，开泰便用借火吸烟的办法接近了他，并说自己是油集的，到康庙来赶兔子的。开泰问他今年扛活多少钱，他说只5000元的黑票（伪钞）。开泰便帮他算帐，算来算去5000元的黑票连件棉衣还做不上。接着开泰便述说了油集6个村联合起来添米的情形。老雇工眼红了，嘴里不住的骂村长，

埋怨村长为何不给他们斂。开泰便说，指望着村长啥事也办不了，他不与咱穷人一个心眼儿，只有联合起来才行。最后老雇工答应回家马上串联人。这一天李开泰和油梦俊共接近了4个雇工，天到傍晚，两人很兴奋的回到油集。两人并讨论了一下，为了便于在地里接近雇佃，明天再去时，每人要扛一棵打兔子的枪。

第二天小区总代表约定在王集集上开各村代表会议，主要内容是汇报各村在要粮当中是否碰见困难和什么时期开胜利大会问题。在会上村代表李开泰向大家提出：“光咱6个村力量太单薄，别光看着咱吃饱了，咱得看看全三区的伙计、分子都在饿着啊！”接着他很兴奋的述说了他与油梦俊到康庙去串联的经过。各村代表都称赞李开泰的提议很对，特别羡慕他们到康庙去了一次。范尔庄小组长李得武（他虽然是小组长，但他比村代表就积极，他已是范尔庄雇佃的小领袖）马上接着说：“明天我要带人到十二里屯串联去。”马佛寺代表刘恒志说：“我到王大人庄串联去。”约定后天6个村胜利大会上汇报。因为经过李开泰的启发之后，各代表都感到光咱实行别村不实行是不中的，他们亲身体验不串联不中了。因此，他们对于串联的劲头是很大的。

胜利大会召开了！由于每个雇佃的粮食都要到手里，雇佃们的情绪非常高涨。会上选举李得武、李开泰等5人担任代表，并推他俩为正、副主任。他俩向大家提出串联外村的问题，李开泰便报告了他与油梦俊到康庙去串联的经过，接着李得武便报告了他到十二里屯去串联的经过。最可喜的是马佛寺代表刘恒志在两天之内把王大人庄串联成功了，王大人庄的代表并与恒志一块来参加胜利大会。很显然的由于刘恒志的工作成绩最现实，对全体雇佃的刺激实在是不小，尤其是鼓舞起两位李主任积极去领导串联的信心。会议一直开到傍晚，每个雇佃都带着“出发串联”的精神高兴而归。散会后总代表专门召集各村代表留下开会，具体讨论串联村庄的分工问题。李得武说他到十二里屯、左叙店（西部村庄）一带去串联，因为曾到十二里屯串联过一趟，再说他曾在十二里屯扛过5年活，很熟，他

现在范尔庄扛活，西边的伙计特别多。李开泰便说他仍到康庙去，因为他已经去过两次，有些成绩。特别他有这样的心思，就是感到康庙是个大庄，有三四十个伙计，做好了露脸。刘恒志说他与王大入庄的雇佣去串联找军营、赵坊去。李长田愿意到谭庄去。宋庄的代表愿意到孟店去。由于田庄当时代表是佃户的“大头脑”（佃户头，贴里分子），不积极，代表会也没有布置给他工作。

四、地主遍布谣言阵 工作到处受挫折

在田庄等6个村分头要粮以后，在我们掀起布置串联运动的短促时间之内，整个三区的地主阶级□着我们普遍的展开了谣言攻势，造谣说：“谁要是添米，八路军就拔谁当兵去”，“八路军出这个主张，好是好，可是拔兵了不得”，“谁要增米，博平罗章龙过来就杀谁的头”。并流行着这种传说，说是在五区河南里开雇佣胜利大会时，抗联干部问群众道：“增资增佃是谁给你们办的？”雇佣回答说：“是八路军。”抗联干部又问：“八路军好不？”雇佣回答说：“好。”抗联干部又问：“可是我有一点事你们能给办理一下吧？”雇佣回答说：“只要你提出来，没有办不到的事。”干部说：“到郭庄（当时正是我大军围困郭庄之时）爬围子去，你们去吧！”还有什么“大闺女都得上学，不能找主”，“老妈妈得轮流和男人睡觉”，“八路军兴活埋老头”。总之，谣言百出，花样翻新，但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拔兵谣言。此种谣言普及全区每个角落，由于雇佣们长期受其欺骗宣传，再加上萧健九顽军在本区时拔兵抽丁的坏印象，也就真的认为八路军拔兵了。在这种谣言的攻势之下，各村雇佣大批的逃跑。如找军营村吓跑了14个，相庄只有4个雇工就吓跑了3个。村村都有吓跑的，多则吓走了一半，少则吓跑了1/3，剩下一部分没吓跑的被东家严密的看守着，不叫我们干部接近。我们干部即便偶然接近上雇佣，但雇佣们说什么也不承认，说是亲戚、朋友，或是打短（日工）的帮忙的，很多地方简直形成老鼠（雇佣）见了猫（干部）似的，使干部难以插手。干部简直是

苦闷极了，有的竟愁的饭也吃不下去。地主阶级（尤其是国特）遍布下的这套谣言攻势，给我们干部接近群众上造成了严重的困难。但狡猾的地主有的故意装善人，如蔡庄地主吴兰东、吴桂东（大知识分子）暗地里监视我们干部，使我们干部摸不着雇佃，而表面上故意的问干部：“雇佃运动做的有成绩吗？”在我们干部面前故意说他的雇工、佃户如何进步，而实质上他们早把雇佃收买妥当了，是典型的贴里分子。这样在个别的村庄，只有个别的雇佃冲破了地主严密的封锁，去接近我们的干部。这些人家是老解放区的人，或是曾经到过解放区，摸清底知道增资不拔兵的人。

由于我们第一炮打响的局面大有孤军深入之势，便被地主阶级的谣言攻势占了上风，压倒了我们第一炮胜利的影响，工作中的严重障碍摆在面前。

五、掀起了全区大规模的串联运动

（一）10天之内冲破了地主的谣言攻势，全区雇佃联合起来！

这种严重情况的出现，更激发了我们开展大规模串联运动的勇气。因为很显然的，地主们的谣言攻势蒙蔽住了雇佃们的眼睛。雇佃们只看到我们干部身上有“疼人毛”，不知道抗联是卖什么的，不敢接近我们。这个真理是很自然的摆在面前，那就是只有由获得现实利益的群众去串联说服受欺骗的雇佃，他们才容易接受；只有用群众的亲身经验去粉碎地主的谣言，才更有效力。为此，我们的干部应当适应着开展串联运动去工作。根据这个方针，便把干部优势的力量放在向外串联的范尔庄、油集等6个村了，区里的领导人都集中在这6个村。根据田庄小区在胜利大会上各村代表自认向外串联的村庄，领导上更明确出3个串联突击方向来：1、由小区联合会副主任李开泰和代表李长田领着油集、杨村庄、宋庄3个

村的雇佃向三区北部——康庙、松林一带去串联；2、由小区联合主任李得武带领范尔庄雇佃向正西和西南方向——左叙店、胡里庄一带去串联；3、由联合代表刘恒志、张延祥率领马佛寺的雇佃向东南方向——蔡庄、相庄一带去串联。当时领导上并选择向外串联的3个重点，即：油集、范尔庄和马佛寺，规定干部的责任是如何帮助雇佃进行串联问题，并指出：“培养积极分子、群众领袖是开展大规模串联运动的中心一环。”哪个干部专门培养谁，都分了工。另外并规定分配在各组的干部□在□地进行工作，以便与出发串联雇佃彼此相呼应，待外村串联找好对象之后，干部马上抓紧趁热进行启发教育，运用新村去串联新村去。

第一、在串联运动当中锻炼出来了两位出色的领袖——李开泰和李得武

1、笔者与向北部方向串联的李开泰的谈话纪要：

在我们6个村开完胜利大会的第二天，俺们油集的雇佃便分两起向外出发串联。一起由油梦俊领导到胡里庄串联去。我带着几个人又到康庙去了，到了那里便找着前几天已经串联好的那个老伙计，叫他召集了20个人开的会。我首先讲的话，先把俺油集、范尔庄等6个村怎么联合起来增加小米一节从头到尾述说了一遍。我说我家是宏毅县人，俺那里添米早已实行三四年了，就根本没有拔兵的那一说。如果真叫你们当兵去，我下了坑还能再叫你们下坑吗？那都是好户们怕拿小米造的谣。别说你们害怕，俺油集的雇佃一开始也害怕，都是害的一样的病，都得顺的一个药单吃药才能把病治好（这时大家伙都笑了）。我谈完后，他们很高兴，都说：“经过你这一说，心里可不闷的慌了，家里大人、孩子可到了吃顿饱饭的时候了！”接着选举王兆明当代表，划了两组人，傅建领、陈三两人担任组长。最后我说给他们，要想赶快把粮食得到手里，还必须向外村串联去，人愈多愈好办。他们都愿意到二区尚武营去，都说那里的伙计、分子多。我并约定明天再来和他们一齐去。到了第二天早饭后，我便带着油集的5个雇佃同康庙全体雇佃22人一齐

到尚武营去了。到了那里，先找的庄长，告诉他说：“没有别的，俺们是来串联伙计了，请你把你们村里的伙计找找。哪个东家想闷伙计就决不客气，罚了他，还得叫他到二区戴绿帽子游街。”不多会便找来了□个伙计，我便说明了好户的谣言全是为的省小米，又把俺油集等6个村联合起来添米的事情述说了一遍，他们才不害怕了。当时规定康庙的村代表明天再来一趟，帮助再开个会。我又推动康庙的村代表王兆明把马章的雇佃也串联起来了。隔了两天，我在康庙召集了康庙、尚武营、马章3个村的雇佃开的会。在会上我首先问他们：“去年咱们雇佃开会添小米了吗？”他们说：“没有。”我又问：“为啥没有？”他们说：“因为八路军没有来。”我说：“对了！只有八路军过来才给咱添小米，八路军就是咱们穷人的头。他向咱，他想拉咱一把，叫咱往后不挨饿。你们可别相信拔兵那一说。别的地方咱不知道，我家是河西宏毅县，我不知道吗？俺那里是八路军的老地方，俺那里穷伙计、穷分子添了米，就根本没有拔兵那一说。”会上还规定各村回去之后，赶快把本村所有的雇佃都串联起来，准备开全区里的大会。

经过三四天的时间，李开泰带着油集的几个雇佃便把康庙、马章及二区的尚武营都串联起来了。因为是他亲手领导串联起来的，雇佃们对他的印象是非常深，非常好，形成这一带自然雇佃领袖了。

2、笔者与向西南方向串联的李得武的谈话纪要：

第三天在田庄开胜利大会，选举了我和李开泰当主任。过午，油集、马佛寺都报告了串联人的成绩，我感到比我办的好。我心里想，一定和他们比赛一下。大会后第二天，我同张福和又到十二里屯去了。这时他们有点好转，有几个人想出头干。地主看风头不顺，就着了慌，抓住了一个积极分子好喝酒的毛病，便请了他的客。可巧那天俺们去了，迎头就遇着刚刚吃完客的这个老佃户。他喝的东倒西歪，口里老喊着：“要宽地主两天。”我便与抗联同志研究这回事，想到如果不抓紧教育就会撒气，便决定晚上通过没吃

客的积极分子召集人开会。到了晚上，并把龙庄的两个伙计也叫来了，共到10个人。我首先说了俺田庄小区6个村联合起来的经过，马下粮食都得到手里了，拔兵是东家不想拿粮食造谣吓唬人，别听那个，只要你们联合起来就能办到。并问他们过去为啥不请喝酒，现在为啥请喝酒，他的目的就是为的省小米。大家说，小米能养家供口，吃一顿饭就能饱一辈子吗？我说完之后，龙庄的伙计朱大哥也很有认识，接着谈了几句。十二里屯、龙庄的雇佃气足了，都说要干，要串联人。十二里屯决定把本村所有的雇佃都串联起；龙庄朱大哥明天决定到左叙店串联去。这时吃客喝醉的老佃户也醒过酒来了，见到大家都说干，影响了他。他当场说：“别看我喝了他的酒，咱该怎的是怎的，决不客气。”从此后，龙庄、十二里屯算打开了。我们到小半夜才回到范尔庄。（注：这次会极为重要，一则是揭穿了地主收买的阴谋，使十二里屯和龙庄雇佃联合起来。二则是在第二天朱大哥便攻开了左叙店。按左叙店我们干部被地主监视，地主并收买工人，不能入手，但朱大哥一次就串联好了。）第二天十二里屯就串联了张芳庄。因此那天晚上一次会，可以说打开三区西部的局面。

回来后的第二天晚上，在田庄召开了5个村的串联工作会议，各村都见到成绩，很高兴。最后发起的比赛，我们范尔庄自认串联元伍营和齐楼去。回来后便召集组长开了会，决定由村代表张福和、组长王殿卿带着人去。他们的成绩也不小，一天的工夫，就把两个村串联好了。

第三天是胡里庄大集，听说这里雇佃虽然成立起来了，可是干劲还不大，我便带着张福和、王殿卿两人去了，把胡里庄、元伍营、齐楼3个庄的雇佃召集起来开的会。在会上我说：“你们还害怕吧？”有的说：“还害怕拔兵。”我说：“拔兵是地主怕添粮食吓唬人。俺增加了粮食，为啥不拔兵？别听那个。你们怕小米咬手吗？”他们说：“哪能怕小米咬手，早就盼望着增加了。”我又说：“俺串联叫你们增加小米为的啥？给我们吗？还不是为了咱们

都是穷兄弟们，怕你们挨饿吗？”下面齐声回答“对”、“是”、“可不”。我讲完后，王殿卿又讲了几句，大家的劲头很足，决定赶快串联人。（注：这个会议对鼓舞这3村雇佃翻身勇气极为重要，并启发他们要翻身必须快串联人。过后胡里庄便把曹寨、赵监庄串联起来了。）午后我便同史区长一起在集上登台讲的话。台下的人见我穿着破大袄，很注意。我先说我是范尔庄的伙计，俺那6个村如何联合起来增加了粮食，这是政府想扶助咱们穷弟兄们过好日子，有的说拔兵，那完全是胡说八道，老少爷们别听那个的。（注：在新解放区此种举动真是奇闻。散集后附近村都知道扛活的也讲话了。此种举动给顽固地主造谣者以严重的打击，助长了未翻身雇佃们进行翻身斗争的勇气。）

从胡里庄开会回来的第二天，又听说谭庄抗联同志老长时间插不进手去，我便又带着张福和、王殿卿又到谭庄去。去的先见马同志了解了一下情况，我们便分头串联人，去把三妮（小名）等4个伙计叫起来了。他们害的一样病——怕拔兵。我们照例的进行了解释，他们的脑筋才想开，选三妮当组长，并告诉他们串联人。（按：谭庄地主极狡猾，威胁收买雇佃，使我们几个干部长久不能入手，但李主任一去就成功了。）

于庄有个雇主叫孙八，把工人吓唬走了。我听说后，叫村代表张福和去发动这个工人。现已发动好了，开大会时就叫他来。

（二）介绍对他培养的经过

首先在领导上明确提出：培养积极分子、群众领袖是开展雇佃串联运动中的中心一环。确定当□□小区特别抓紧培养3个人，而他便是其中的一个。因为他具备着当领袖的条件：第一、他有积极工作的精神，并大胆敢负责任。第二、是要饭出身，扛了22年活，有天然的阶级觉悟。第三、是岁数相当，是中年人。因为一般的说当领袖年纪太小了不压众，年纪太老了行动不方便、火力不足。目的是把他培养起来，叫他领着范尔庄的工人去援助西半部村庄的雇

佃运动。因此特别叫田庄小区干部组的副组长跟着他，给副组长以专门培养他向西部村庄进行串联运动的责任，并在小区干部会议上，专讨论如何进行培养的办法。从后来经验证明了这一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副组长常与他交谈问题，帮助提高他，说明共产党对穷人的好处；在清平建设一块同南边一样的根据地，天决不会变；援助外村穷弟兄翻身也正是自己的翻身，因为光一个人一个村是翻不了身的。串联以前和串联以后每天都交谈问题，要体贴他，要帮助解释他思想所不了解的问题，有时候同他一起出发（如到十二里屯和胡里庄），解决问题、出头讲话都叫他办理。开始他只敢在本村雇工中讲话，可是咱们干部一去就羞的讲不出来了。但串联了两个村之后，就能在几个村的雇佃大会，甚至在胡里庄集市上敢讲话了。因此在串联运动中，他很快的得到锻炼和提高。他很高兴的对同志谈：“再待几天我就能同你们一样呱呱的讲话了。”现在西部10余村庄都知道范尔庄有个李主任。在这里我们必须指出，对他的培养这只算是开始，还必须要求我们干部继续耐心的提高他尊敬他，还必须要求他为本阶级弟兄利益奋斗不息的努力工作，只有这样，才能成一个更好领袖。

第二、串联捷音到处传

另一路向北串联的是杨村庄的小区代表李长田，他带着高长安、张二、老魏向松林集串联去。他们把松林集串联起来后，又把尹庄、孟店串联起来了。这样一来，三区北部的局面算全部打开了，并都在康庙与李开泰会了师。

在马佛寺代表刘恒志和张延祥的领导下，负责向东南方向串联的成绩也很大。刘恒志串联起王大人庄之后，又把找军营串联起来了。张延祥串联了赵坊，刘少日串联了赵庄，张景文串联了丁庄。

田庄虽然改换了村代表，但在串联运动的头几天一点成绩也没有。为了刺激田庄雇佃们去进行串联，小区代表李开泰和李得武便召集各村在串联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开会，叫田庄全体雇佃都参加这个会议。各村都按秩序汇报了串联的成绩。最后小区代表叫田村代

表汇报,但他们一点就没有做,怎样能汇报呢?两位李主任便面对着田庄雇佃把出发串联的重大意义再三的解释了一番。这个会议对田庄雇佃刺激极大,第二天便出发去串联。在新代表田文忠、田成德、田廷玉3人的努力下,5天之内把王集、十八里庄、元伍营都串联起来了。

从11月27日到12月7日整整的10天,是三区开展雇佃大规模串联运动最紧张的日子。在这6个村庄中,尤其是油集、范尔庄、马佛寺及中期的田庄,每天总有三五成群的雇佃出发串联。马佛寺有3天的光景每天出发串联的雇佃都在10人以上。在路上,在村里,时常见到三五出发串联的雇佃在活动,把串联运动真正形成雇佃本阶级的运动了。这6个村的雇佃们不仅是自己去串联别人,而且还帮助推动新村去串联新村(如油集串联了康庙,康庙又串联了尚武营和马章等),使着全区雇佃们到处在“串”,到处在“联”。在短促的10天过程中,地主遍布的谣言攻势被粉碎了,有40个村庄里的500余雇佃已经串联成熟了,雇佃们都瞪着眼睛期望着全区大联合行动的早日到来。

我们在这次三区进行大规模的串联运动中,体验到了三个问题:

首先一个问题,就是证明了群众串联群众的路线,是在发动群众时期的一个最宝贵的领导方法。这种方法最容易使运动形成宏伟的运动,使雇佃运动形成整个阶级的运动。因为群众与群众之间没有一点隔阂,群众去串联群众中,尤其是熟习的人串联去,经过解释之后,对方很快就接受了。通常是出发串联的(因为他已有觉悟了)把自己的思想变化过程告诉给被串联者。因为他们本身就是群众,因此他们时时刻刻善于抓着群众的心理。比如李开泰在开会时常常说:“雇佃们都是害的一样的病——怕拔兵,都得顺的一个药单去吃药,才能治好病。”他给雇佃们讲话,开头一句常常说:“你们还害怕拔兵吗?”这说明了李开泰的讲话最能从当前雇佃觉悟的水平出发,最能抓着了雇佃们最担心的大事——拔兵。他这种说

法是多么深刻啊！所以串联运动的成功也就在这里。同时也更清楚的告诉给我们，在发动群众时期用群众去串联群众的办法是农民最习惯的（如历史上农民自觉的联合起来抗拒官府的斗争，会门蜂起防匪自卫都是用农民串联农民的办法），因此也是农民最容易接受的。这也就最容易使运动造成宏伟的、大规模的农民的联合行动。所谓串联，就是用已经从政治上有了觉悟的群众，去说服没觉悟的群众，从政治上说服对方，解决对方所疑难的思想病，提高他的阶级觉悟，达到自愿自觉的去参加翻身斗争的目的。这种群众串联群众的办法，对造谣违法的地主来说，对他们真是打的准！打的快！用群众的亲身经验，用群众的阶级觉悟去粉碎了他们的谣言攻势。地主阶级只注意从正面去提防我们的抗联干部，却不料雇佃们向他们从侧面开了刀。雇佃们串联的这样快，组织的这样好，实在是出乎地主们的意料之外。

其次一个问题告诉给我们，要想掀起大规模的串联运动，必须把出发串联与本身的翻身利益结合起来，使雇佃们了解到，要想自己翻身，必须联合外村，必须联合全区。经验证明，哪村把这个问题结合的好，哪村雇佃串联的劲头就特别高涨（如油集、马佛寺、范尔庄即是如此）。反之，哪村结合的不好，劲头就小或是没有干劲（如宋庄）。有的村雇佃在进行串联时光专门找村长，走村长路线，而不去向被串联的对象进行艰苦的说服动员工作。用依靠村长去代替串联，那是不妥当的。然而，如果有的村庄村长与违法地主勾结压制或吓唬雇佃，或者是闷起雇佃来的情况下，外村雇佃前去威胁村长一下，那是对的。可是把串联运动当成走村长路线，那就不对了！

再次，经验说明了我们干部在领导串联运动时，要注意两个问题：第一、要把干部力量的优势放在出发串联的重点村，并分配强有力的干部住在有领袖的或者准备培养成为领袖的积极分子的村庄。干部的责任就是如何帮助领袖（或积极分子）领着雇佃到一定方向串联去。与领袖或积极分子时常交谈串联中所碰见的问题，帮

助他分析他思想上想不通所疑难的问题，向他有计划的谈些共产党的主张，力量有多大，天决不会变，穷人怎样才能联合翻身；援助外村，援助别人的翻身也正是自己的翻身等问题。凡事应当跟他商量去办，善于启发征求他的意见，解决问题，出头讲话，主持会议，我们都放手叫他去办。我们切忌包办思想和行动，在必要时（如被串联的村庄已找到了线索时）我们干部可跟着他们一块出发，当他们的参谋（如李得武到十二里屯，油梦俊到胡里庄都是如此）。第二、分布在没工作村庄的干部小组，仍然在那里进行工作，不能因为开展群众串联运动而搬家。干部的责任就是在那里与出发串联的雇佃彼此呼应，步调一致。出发串联者找到了线索或者是已经组织起来了，便把此种组织关系介绍给干部，干部马上就抓紧已串联起来的对象就进行启发教育组织工作，尤其是启发他们再串联更为重要。在三区北部8个村都是用这个办法搞起来的。另外，在个别村庄，或因我们干部接近启发群众的能力强，或因地主统治薄弱，基点村不去出发串联，也找不到对象，并局部的组织起来了，但拔兵思想，不愿出头、不敢干的思想在作祟，使工作难以进展。此时干部便来请基点村的领袖或积极分子前去开会，讲话援助他们。但领袖们一去，问题就很快解决了，并推动起他们再串联（如齐楼、十二里屯、龙庄等都是如此）。在谭庄地主很狡猾，4个干部做了5天，没见一点成绩。干部与领袖李得武谈了谈，李得武去了，头上午就打开僵局了。

六、全区五百余雇佃集体诉苦喊冤、游行 示威，革命先锋创河山

为了商讨全区雇佃大联合的行动，便于12月8号召开了40个已经串联成熟的村代表开会。会议是由在串联运动当中涌现的雇佃领袖——李开泰和李得武主持的。这是全区雇佃代表第一次的“大碰头”。代表们看到全区各村都起来了，高兴极了。根据着前些天在串

联运动当中串联的关系，产生了小区代表。由于在串联运动当中都是以一带村为单位搞起来的，不是你串联我，就是我串联的他，彼此都很熟悉，当时便都推选了小区代表，小区代表又推选了6个领导全区雇佃联合大行动的临时总代表。为了决定10号在田庄开大会，所有的雇工、佃户、女工统统的都来，哪村里还有没串联起来的，回去赶快再串联，保证开大会都来。都认为这个大会少是3天多是4天，伙食为了好管理，规定以小区〔为〕单位。

田庄在12月10号那天热闹极了。从早晨起各小区的雇佃们都陆续的涌进了田庄村。每个小区雇佃的行列里，都照样的扛着两三面大旗、一套锣鼓家具。大地主田孟兰家的深宅大院里成了大会场。

干部随着群众都来到后，□抗联便召集干部开会，研究如何领导这个大会的问题。首先确定大会应当由几个领袖自己主持，我们不能包办。但我们干部也不能因为由领袖自己主持会议而放任不管，干部应当与所在村工作的雇佃在一起，因为这是集体接近的一个好机会。要抓紧向群众进行教育，帮助代表执行全区临时代表的一切决议。接着就研究了大会进行程序问题。在此问题上有了争论，有的主张先讨论增资增佃的法令，理由是：雇佃们最迫切的就是小米问题，应当先解决这个问题才对；有的主张先进行倒苦水，理由是：先从诉苦当中来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助长他们进行翻身的斗争勇气。经过争论后，大家一致的意见还是先进行倒苦水的理由正确，并确定倒苦水之后就讨论法令，最后才是游行示威。

领袖和代表们开会了，经过干部的启发之后，他们同意先进行倒苦水。为了启发大家把个人的苦水都倒出来，李开泰和李得武便说他俩先打头阵，做个榜样。每个小区里都找两三个受苦最重的人来，以便在两位李主任诉完之后，好接二连三的倒下去。

（一）倒苦水

在全体500余雇佃大会上，第一个讲话的是李开泰。他首先讲明了开会的意义：“今天开的是全三区穷伙计、穷分子大会。政府

里有法令叫咱们添小米，可是地主们吓唬咱们，直到现在还没有添。家里的大人孩子饿的吱吱叫，这都怨地主的王八蛋吓唬咱们，是不是？”（下面齐声回答：“是！”）接着他又说：“咱这些到会的恐怕没有一个家里是好户的，都是挨饿受气长大的，都有说不清的苦楚。现在共产党八路军来了，叫咱们穷人翻身了，谁有苦赶快的说说吧！可别在心里闷着了。我先说我的苦楚吧！我今年34岁了。我从12岁就给人家扛活，共扛了22年活了，家里还是老辈子那3亩半地，到现在连个媳妇就娶不上。人家好户的孩子还没有出胎毛，就有说媳妇的哩！像咱这老了还脱不了饿死。”接着李得武说：“咱谁有苦楚都在这里出出气。我的苦楚很多。我小时候家里没有地，要饭为生，每天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我今年36岁了，从14岁扛活，共扛了22年了。这22年我得流多少血汗，但现在家里仍是挨饿受苦受冻！我一年只挣5000元的黑票，能买什么！像这样的扛活法，有宅子还赔了地吗？”经过他俩诉说自己的苦楚之后，会场中便严肃起来了，每个人在回忆着自己的苦楚。

□□□林善里很带劲的站起来，气昂昂的说：“我把我的苦楚对大家说说吧！我父亲扛活扛了50年了，出了一辈子力，收了多少百万的粮食，但后来老了，扛活扛不动了，便只好回到家里去，不幸前年灾荒时饿死了！（说着眼泪就落下来了。）那时我在胡里庄扛活，挣100块钱已经支完了。俺爹饿的要死，我给掌柜的借10斤红高粱就不借给，不讲良心狠心的掌柜的（声音高了）！我的70多岁的爹，几天摸不着一点粮食吃，临死时在炕上还吵着‘饿！饿！’唉呀！我……我……我的70多岁……多岁的爹啊！”这时他已经哭的不成声了。停顿了一会儿，他忽然高声的说道：“这！这都是地主好户王八蛋压迫剥削咱们穷人造成的。我想起，把这些家伙杀几个也解不过我的恨来。”（注：此种说法是阶级仇恨的怒火激动起来的。）这是多么凄凉而残忍的事情啊！这时500人的会场没有一点声音，好像半夜三更时的肃静。他说完后，“哼、唉！”叹气声充满了会场，很多雇佣和我们干部眼里含着和本阶级兄弟同情难过的

泪珠，这种阶级仇恨刺痛了每个人的心。接着雇工康秀领说：“俺掌柜的是水成屯李连明，吃的饭食没一壶，一天三顿米饭黑窝窝、老酸咸菜，连点油珠都没见。过个五月节，掌柜的一家子都吃饺子，叫我吃豆芽包的团子，连一点油也没浇，仅给了我7个小饺子。这合理不合理呀？（大家如雷似的答复：“不合理！”）这是一节。割麦子时，吃两头黑的饭食。上午吃一顿包皮干粮，早晨晚上都是吃黑的，仍是那老酸咸菜。天又热，割麦子又累，吃黑饼吃不下去，我说：‘三掌柜的（李连明），我实在再支撑不了，好几天吃不下饭，头晕眼花，受不了，我得走。’俺掌柜拿起杈来就打我，并说：‘正过麦忙的时候，你给我捣蛋，我看你敢走。’吓的我不哼声，更不敢走，被迫不得已，咬了咬牙，瞪了瞪眼，拾起镰来还得割，干了一天差一点没死了。到晚上还得替掌柜的打更，到明我觉得实在受不了，连工资也没要就跑了。我给他编了个歌谣，大家听一听：‘饿死饿活，不给李连明扛活。早晨吃的黑饼子，上午吃的黑窝窝，晚上吃的新干粮，还说伙计吃的多。老酸咸菜浇点水，油上别说□差□的别提，过节也摸不着。伙计喂着头口吸袋烟，还挨了一顿说。并说我这里是个□□铺，干活不怕多。过麦伙计有了病，他说我捣蛋不干活。我在麦地里头晕眼花就要走，掌柜里拾起杈来就打我。吓的我病也不敢走，咬了咬牙，瞪了瞪眼，拾起镰带病还得割。我说要下工，掌柜里说：‘秋后再说。’秋后伙计不下工，掌柜里死夹磨。”这个歌谣是他根据自己亲受的痛苦编出来的，来刻画地主的刻薄心肠。孙六说：“我没一亩地，我给我亲大爷扛活。下雨有下雨的活，刮风有刮风的活。吃的饭食不好那就别提，一年到头没有一会儿闲着。我穿的这样破，连一件衣裳不给添。提起来呀！唉呀！唉！春天没事，从坑里挑土垫场，挑仨月的土。夏天还不叫息晌。秋后没事了，你猜怎么样？包地头。咱又没衣裳，冻的手上很多裂口，用三齿一捣，手上裂〔的〕口子里光冒血，您寻思寻思难受不难受。这是我的亲大爷，他跟俺爹是一娘同胞，还这样狠心哩！看起来谁有了是谁的。

灾荒时跟他要个饼子给俺娘，他说剩了一块了，我见了还有一大筐子，唉！”几乎落下泪来。扛饭的耿王氏说：“我今年78了，扛饭扛了21年。我这么大的年纪，还得伺候人。俺掌柜的两个小孩子，撒尿倒屎都是我，弄沙土，洗土布袋。老东家光往裤子里拉屎，每天我得拆洗，还得侍奉老妈妈。我抱着那小孩子每天早晨饭时得到西头找娘吃奶（因他娘在西头住），回来我再吃饭，饭都凉了。夏天里，做好饭还得往地里送。我的命真苦，比黄连还苦哩！阿弥陀佛，可来了八路军救命哩！我一听说增资，喜的我一夜没睡着。”把两手一拱谢天。这时天也不早了，你一言我一语的乱说自己的苦楚，互相诉苦倒冤，每个雇佣都吐出了内心里的冤屈。从倒苦水中提高了雇佣的阶级觉悟，增长了对地主的仇恨，每个人都摩拳擦掌，准备明天游行示威，要粮食。这是整个大会最成功的一点，一倒苦水，提高了阶级觉悟，启发起干的精神。

苦水共倒了整整的一天，在大会上倒的有30多人。开始倒的是总代表，他们一方面诉说自己的苦楚，另一方面是向大家带有启发性的动员。接着他们而讲的就是那些受苦受难最深重的人。如此便影响的全体雇佣都要诉苦了，简直造成了倒苦水的热潮。每个人总觉得只有在几个人的面前诉诉苦喊喊冤才能出气，因此都争先恐后的争着倒。因为还要讨论法令、游行，全区代表会便决定一般的都不在大会上倒了。但会后三五成群的都在一起互相诉苦，似乎不能在大会上倒，但与别人谈谈也能出气。

经过倒苦水，把500余雇佣的阶级觉悟空前的提高了。他们回想起过去和现在的悲惨生活，伤心落泪。他们第一次了解了这是地主的封建剥削所造成的恶果，而不是什么命运！他们清醒了，一致认为这是地主们造下的恶果。他们的志愿正如工人郝士路在大会上所喊的口号一样了：“要吃饭，必须大家干！”“要想不挨饿，只有大家联合起来干！”

我们认为，要想把群众发动起来进行翻身的斗争，首要一环，就是要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要想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必须倒苦

水，因为倒苦水是用群众的亲身经验集体教育群众的最好的办法。这比从干部嘴里说出来的群众的苦，对群众教育的实效来说，要强于百倍的。另外，群众的倒苦水，对我们干部特别是地主富农出身的干部来说，是一个生动的阶级教育的教科书。我们干部在从群众的倒苦水当中，来进一步的体贴群众的痛苦。

我们干部在启发领导这种倒苦水时，应当是先通过积极分子先在受压迫最深最重的群众中进行启发酝酿工作，叫这些人打头几炮最要紧。如林善里大哭之后，对于全体雇佣阶级觉悟刺激极大。在头几炮打响之后，其他群众便会争先恐后的倒起来，就能够把倒苦水形成一个群众性的热潮。他们都感到如果不倒，一肚子冤气到哪里去出呢？

（二）讨论法令

14号开始讨论法令。由于田庄小区早已增加了粮食的影响，又加上都是他们出发串联起来的，尤其田庄小区在王集集上大游行时，高喊着“穷人大翻身，亏了八路军，700斤小米，棉花100斤，分子麦三七，秋是四六分”响亮的口号，给外村雇佣们的印象都很深，所以法令只是具体讨论的问题了。在讨论时，是以小区为单位进行的。小区中的雇工、佃户、女工分组讨论的，因为要求不一样，分开讨论更加具体。

第一、关于雇工增资的决议。

工资以小米为计算单位。分三等：甲等700斤；乙等600斤；丙等500斤。等级的划分应当依据雇工本身技术和劳动力强弱，经小区代表会讨论评议划分。籽棉100斤，专门作为全年的衣服鞋袜用。为了照顾一般中小富农不因增资而影响其生产情绪起见，决定雇主种60亩以上的算甲等；40亩到50亩地的算乙等；种30亩地的算丙等，但100斤籽棉不改。就是说某一个雇工按其技术说，头口全活是甲等，可是他的东家只有30亩地时，为了照顾这种小富农，便算作三等；他在四五十亩地的东家扛活便算为二等；他在60亩地

以上的东家才能算是甲等。如果有技术能力的雇工，在小户家扛活觉着吃亏，到明年雇佃会可以调换一下工作。在左叙店小区工人们讨论的最具体，某一个工人从几月里上工？在东家干了几个月？忙时候还是闲时候？都加以具体的讨论。这样就更合理了，因为一个工人只干三四个月，和干一年的增一样多的米太不合理。

第二、关于佃户（都是小种地）的决议。

麦三七分，秋四六分，如种山芋、花生时，主佃是对半分，因为这两样佃户出的力大。草跟牲口走；柴火麦是三七，秋是四六。拾花钱过去完全是佃户拿，现规定佃户劈多少花就□多少花的拾花钱。忙时过去觅短工完全由佃户觅，现规定佃户雇1个，地主也得雇1个，一拿锄把，地主就得预借给两石铺底粮。闷股里工出差一概取消；打里工时，如管饭每天给4斤小米，如不管饭给7斤。

第三、关于女工的决议。

共分三等：头等小米400斤，二等小米350斤，三等小米300斤，都是70斤籽棉作为衣服鞋袜之用。

（三）游行示威

15、16两整天，是进行游行示威斗争的时候。15号吃过早饭后，500余雇佃真是一支浩浩荡荡的大军，在李开泰、李得武的领导下，到王集去游行了。游行的雇佃一直从田庄摆到王集（2里路），荡得路上尘土飞扬，一起一起的锣鼓喧天。这种500多人游行示威的大军，共游行两整天，南到胡里庄，北到松林，东至马佛寺，西至左叙店，游遍了全区。他们不仅是在地主面前“亮兵”，向地主们放信号枪，而且他们简直成了一支用群众力量宣传我党政策的大军。凡到一村，照例的开民众大会，小村开一个，大村两头开。主要内容讲的是：一、地主剥削下雇佃的苦楚，增佃增资的合理性；二、拥护政府的法令，对违法地主怎么办；三、对假卖或假当地、无故分家的怎么办？

在两天的游行示威当中，几个领袖很自然的有了分工。李开

泰、李得武、孙延柱、张茂荣 4 个人专门讲话，他们简直成了雇佃的演说家。他们不仅在一般村讲，而且在王集、松林成千人的大集上，仍然是毫未被束缚的讲。郝士路在两天当中，形成了喊口号的专家。他不管讲话，不管带队，而专心一意的编口号，高喊：“雇佃齐了心，联合大翻身。雇佃真苦情，粮食更稀松。出了一年力，家里没吃的。政府叫添米，真正是合理。东家吓唬咱，为的省东西。要想要东西，一定干到底！”他的口号编的很及时，他是根据几个领袖讲话的内容而及时喊出来的。比如最后一天到胡里庄去游行时，又增加了一个新的主要内容，那就是揭破地主们想用假卖地、假当地、分家，来想减少目标，辞佃解雇（很多地方已发现）的阴谋。几位领袖有力的揭破了地主们这个阴谋。李开泰说道：“谁要是打算假分家，目的掐伙计，赶分子，谁分到三下里，就给他按 3 个伙计，3 个分子；谁要是假卖地，假当地，查出来全区开大会斗争他处罚他。”郝士路便根据临时代表这段讲话，马上喊出来：“好户定巧计，把地当出去，为了赶伙计，装穷假卖地。我们不愿意，无论地主出啥法，不能叫他随便掐伙计，不能叫他随便掐分子。”大会的最后一天，尚武营（二区）的工人伊希顺便学习了郝士路这一套，也会编口号、喊口号了。在斗争欺压工人康寿领的雇主李连城时，就是他领导的。这种宏伟的游行示威的举动对几千年封建统治来说，是一种破天荒的举动。我们认为此种举动有下面三个意义：

第一、这种游行示威的举动，锻炼了雇佃。在领导雇佃当中，涌现了几个出色的领袖——李开泰、李得武、孙延柱、任然堂，出现了大批的积极分子，在“群胆”、“群力”的鼓舞下，惩办了 3 个违法地主和富农，进一步相信了团结力量的重大，相信了自己的力量。没觉悟的雇佃见到游行的人群，自动的都找了来，如河魁张庄找来了 7 个。

第二、地主们在游行示威雇佃们的面前弯了腰。他们从娘肚子里就看不起群众力量，也没有见过群众力量，今天算是第一次见面

了。在游行当中由于惩办了3个违法的家伙，那些企图违法或已违着法的家伙手忙脚乱，害怕极了，赶快的把闷的伙计向大会上送。如过午斗争的于庄孙元，傍晚左叙店、谭庄送来两个雇工，马佛寺送来了5个（已闷起半月了）。田庄有两个闷工人的，当晚上有人给他贴在雇佃居处的门前“黑帖子”。

第三、游行的大军高喊着“穷人大翻身”的口号，大大的刺激了贫农们。贫农们看游行的人最多，脸上带着微笑，指手划脚的说：“八路军真好，你看人家扛活的分子可享了福了。”他们看见雇佃们获了利益“眼红了”。

我们认为这次在领导全区雇佃大会上，可以说是比较成功的一点，就是贯彻群众路线比较好一些。但这不等于完全摆脱了包办代替思想与行动，相反的，在某些地方仍然存在。如我们在每一个问题上，都贯彻叫雇佃领袖去主持会议、去解决会议上的一切问题做的不够；对群众刚建立的组织和领袖相信、尊重、放手叫他们去办理大会上的一切问题还不够；最大的缺点就是雇佃领袖的主动性还不够。他们的主动性表现在两种情况之下：就是在游行示威中，在惩办违法地主中，领袖们很积极。为什么呢？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干部没在眼前，因此他们就主动的大胆的处理了，不在眼前也就不依靠干部。但如果佃户们在住处没有出发，我们干部都在家里，他们便依靠干部，动不动找找某某同志商量一下去，而不是代表们主动的去商量处理解决。有些事情我们不是采取首先与领袖商量的态度，打通其思想，然后他自觉自愿的去召集人开会，而是我们干部召集人开会。最典型的一次是人家区临时代表正在开会，讨论处理斗争罚款问题，一致的意见是买手巾、买帽子，而我们有位同志去了，□说：“罚斗争对象唱戏合适。”代表们当时多数愿意，但征求一下群众意见，群众不愿意。这种方式就是不从启发诱导方式谈话，而是拿自己主观意见硬往代表们头上按。因此，我们说这次大会只可以说脱离了严重包办代替的领导，包办代替思想和行动的残余仍然存在，某些地方还很严重。这是整个领导上的毛

病。这就告诉我们，要领导运动，尤其这种大规模的运动，相信群众，尊重群众的领导和组织，把手放给他们去领导群众，是个大问题。经验证明，哪些问题（游行示威、惩办违法地主）把手放给他们了，他们不仅是带劲干的好，而且有很大的创造（如演说、喊口号），哪些问题（在住处处理一般问题）还包办着一部或全部，领袖们便不主动，不积极，不能发挥他们的领导作用。这就需要我们的干部（尤其领导干部），从坚定的树立群众观念、群众组织问题上去痛加铲除个人的包办思想，从每个具体问题上纠正包办代替，时刻注意发挥群众领袖的领导作用，发挥群众组织的独立领导作用，明确我们的干部责任是进行启发引导的立场，什么问题都要放手叫领袖们去办理。

在与水城屯、齐楼两个违法地主和雇主的讲理大会上，也是有缺点的。首先我们干部没有考虑到这种情况，就是这是刚开辟的新解放区，群众没进行过讲理，不知道怎样讲法，没有进行一下“预演实习”，拉过来就开了。但是在斗争中几个领袖不知道怎样领导的，诉苦者孤立发言，群众力量未显示出来，是相当失败的。但我们讨论了这一个缺点之后，决定重斗，先预演实习一下，有的假装违法地主，有的专当诉苦的，有的专当领袖，互相咬理。接着又重开了一次斗争会，很成功。

全区大会共开了4整天。临散会前，李开泰、李得武的讲话中指明各村的任务是：以村为单位集体要粮食，谁不给就联合小区斗争他；小区不行，全三区都去。还有些落后不觉悟雇佃，咱都是穷人，不能看着他们挨饿，咱还得串联他们。

七、集体要粮、集体过秤的办 法好，地主的阴谋应警惕到

在全三区500余雇佃宏伟的行动下，地主们都知道一个真理，就是：谁违法谁就难看。知道公开抵抗法令行不通了，所以在雇佃在

田庄4天的大会过程中，地主们便在家中碾米、称花，作准备工作。雇佃们回到村后，全区两天之内都把粮食要齐了，有的村一天都要齐了，在要粮当中一帆风顺，没遇见一点困难。在大村雇佃们都是以村为单位集体要的，小村因为雇佃少，力量太单薄，都是联合附近村在一块集体要的（如尹庄、马章、孟店就是在一块要的）。各村都是把粮食、棉花统统的都搬到一个大场里，代表和组长们专门扶秤，一家一家的轮流过。待全都过完之后，大家便都下手帮助本村里的雇佃运到家里去，外乡的雇工都从东家驶大车明天运走。这种集体要粮、集体过秤的办法很好，发挥了雇佃们的团结力量，特别给明增暗不增的一个致命的打击（经过各方面调查结果，直到现在还没有发现一家是明增暗不增的）。

真的不拔兵了，全区雇佃联合起来了，粮食马上就要到手里了，过去被地主谣言吓唬住的、神经过敏的雇佃眼红了，便走马加鞭的去找代表诉说自己当时脑筋太死，要求代表把他参加进去。比如河魁张庄6个雇佃开大会返家后，那4个被地主吓唬的雇佃马上找他们去了，村代表便把他4个人的名字去胡里庄告诉给小区总代表李林。大部分村庄都有此种现象。谭庄雇佃在要粮食时，打听东四小章还有5个雇工之后，村代表老姜和琴虎便到那里串联去，雇工见到他俩亲热极了。当时就帮助他们组织起来，选举了代表，并具体帮助他们评议数目。由于该村地质不好，雇工又多是小户，根据此村的具体条件，大家确定工人最高的工价不超过小米500斤，棉花与别村一样。在自动的找代表和再串联的两种方式下，有100多名雇佃又发动起来了，这是全区雇佃集体大行动影响的结果。先进群众影响着落后群众，从思想上自觉起来，这比生拉硬扯的卷泊不好的多吗？因为这种先进的行动，活生生的现实利益摆在落后雇佃们的面前，落后雇佃们的眼睛发红了。此种影响作用过程，实质上就是落后雇佃想翻身的酝酿过程，或者说给发动落后雇佃开辟了捷径。

农村中在这个时期与前相比，有两个不同的特点，值得我们在领导上去注意。首先就是雇佃在农村政治地位空前的提高了，开始

形成农村革命中的骨干力量。其次就是地主阶级很快的转变了策略，由神圣的威严、强硬的态度一跃而转到对雇佣恭而敬之、说好话收买上来了。如尚武营雇工在要粮时，很多雇主故意多称上几十斤，其目的是软化人心，表示宽大。可是有个别爱贪小便宜的雇佣，就不知不觉的上了当，口口声声的说：“马大掌柜的真好。”然而，可不了解这是“笑里藏刀”，毒辣的阴谋。胡里庄小区临时代表林善里，被齐楼大乡长家请他吃了一顿客饭，就把他买迷糊了，替大乡长打掩护，工作消极起来。范尔庄工人小组长王殿清（在串联运动中的积极分子），被他的东家傅桂生收买住了。傅桂生每顿都叫王殿清到客厅里用饭吃白馍，每天晚上还叫喝小壶酒。傅桂生错误极大，他吓走了女工，他不给其他伙计立文约，工人要斗争他，王殿清便积极的替傅桂生打掩护，成了走狗。此种现象的产生我们认为难免的，因为在运动的巨流中，不可避免的要有某些人落伍、掉队。然而我们在事先对这方面的估计是不足的，因此在全区大行动时期，没有响亮的向雇佣们提出去警惕地主的阴谋收买，以打下反“走里”的思想基础。

我们干部在此时期应当进行以下几个工作：

第一、要进行深入的查增。要每村到几个雇佣家去，深入了解是否把粮食、棉花搬运到家中去了？是否还有明增暗不增的现象？

第二、从思想上进一步的去加强教育。以村为单位开会讨论，粮食是怎样得来的，进行拥党、拥政爱军的教育，说明党政军与雇佣的关系。进行阶级团结教育，讨论地主们的“好”是真好还是假好呢？

第三、进一步的去健全雇佣组织。为了培养雇佣在农村革命中的领导骨干，必须大量的多选代表，把在运动当中涌现出来的一批积极分子选为代表。一般以3人或5人的比例，都可以选出一个代表。雇佣应当是各自编组，并有各自的代表。因为在运动的开始，大家都为了要米，利益是一致的，然而运动逐渐的深入逐渐的复杂起来了，雇工、雇佣、女工各自有各自的特殊要求（如雇佣要求铺

底粮，不仅要保持此种习惯，而且还要增加，需要与地主订立生产合同；而雇工上下工日期，明年工资，医药治疗，必要的调动等问题），因此，就应当有独立的小组，各自的代表。待各自代表选出后，共同再提出联合代表总的负责人，以便行动上发挥雇佃联合的威力。如胡里庄共有雇佃55人，其中32个雇工选举了5个代表，17个佃户选举了1个代表（注：佃户代表太少），7个女工选举了1个代表，共有7个代表。他们7个人推选雇工李林为联合会的主任。

八、从立约斗争、串联贫农的工作中 去进一步的深入巩固雇佃运动

（一）立合同

雇佃增资、增佃胜利后，接着进一步提出了要求。在雇工来说，是如何确定上下工的时间，明年的工资数目，支领时间问题。在佃户来说，是保证今后的佃权、明年的劈头问题。雇佃们要求的重心便都转移到这几个问题上来了。特别是按这一带的老规矩来说，雇工即是腊月初一为上下工的日期。东家要不要，雇工干不干，到这一天就该“说话了”！佃户的老规矩是凡是到封地的那天（上了冻，犁不动地时），就打算盘。届时东家请佃户给东西，佃户如不干了，就说给头脑（佃户头多是地主的亲信贴里分子），东家不要了，也说给头脑。这时正是十一月（旧历）十五以后，到腊月初一，和封地已经很接近了，干不干呢？这时候就该拿主意了，每个雇佃都焦虑着这个问题。这时候有这几种思想存在着：（1）有的雇佃还愿意干，这多是发动的比较充分的，认为这真叫咱翻身了，老辈子到哪里摸这种好事，还害怕小米咬手吗？这样干法，过两三年就能真不挨饿了，也娶个媳妇。（2）发动的不充分的村庄，变天思想仍然存在，特别是怕博平的汉奸罗章龙过来。因为他们听说四、五区罗章龙惨杀雇佃的事情，他们就不愿意干了，怕有意外

之事。如尚武营有35个雇工，就有20个要下工。（3）有些雇佃户真是穷人乍富、挺腰凸肚，看到700斤小米100斤棉花，就感到这可富起来了，够过的了，还扛什么活。再说八路军反正是向穷人，于是常常吸洋烟、买零嘴吃。（4）还有雇佃是有真实情况，家中不能脱身的。如临清市区的工人家中赎回地来了，或是本区人灾年出卖了土地，眼看不久就能赎过地来，家中有地了，愿意家去过日子。还有的因为年老体弱，不能在外扛活的。

根据这四种思想的分析，领导上便下大力进行立合同工作。

首先是打通领袖和代表的思想，因为代表和领袖的思想不通，是难以处理立合同问题的。例如：范尔庄由于小组长王殿清要下工（被地主收买，并有变天思想），他积极的拉拢李得武一块下工，说什么下工到一起做个小买卖去。李得武思想动摇了，也愿意下工。我们干部曾与他商讨半晌，给他打算盘，下工后家中能否顾着口了？一计算家中只有7亩地3口人，怎能顾着口呢？又计算了一下与王殿清做生意没有本怎样能做？赔了怎么办？再说现在自己是小区的领袖，领着头下工也不好，人家谁还赞成？经过动员，他的思想打通了，便开全小区雇佃会研究这个问题。首先由他和油梦俊进行了一下启发，大意是——共产党八路军有力量，天不会变，不要有穷人乍富挺腰凸肚的想法，每个人都要打打算盘，算算帐，不扛活够吃吗？特别是启发大家想想灾荒年父母妻子被饿死的光景，最后启发说：“咱还得扛活种地才有饭吃。”进行启发后，便以村为单位进行漫谈，各述说各自的算盘主张。经过李得武、油梦俊的启发及漫谈家景之后，全小区168个雇佃中，只有几个不干的，有的是年老了，有的是临清市区人，家中赎过地来够过的了。接着全小区雇佃、女工都分头讨论各自的合同怎样立法。下面这两个文约便是经过分组讨论之后，代表们草拟的（因为雇佃中有些在村里问事的人，懂的事多）。

雇工：立合同人×××，今有地××亩，因耕种不过来，今觅到×××做活一年，经雇佃联合会评议是×等工人。言明，明年工

资小米××斤，籽棉××斤，分四期交清：二月二交米200斤，五月份交小米200斤，八月节交棉花100斤，到明年正月十五算清。雇主不能无故解雇，雇工也不能无故不干。打更出差都不是雇工应当做的事，雇工有不参加的自由。雇主不能随便花地，如有特殊情况必□得雇佃联合会批准才能花地。恐口无凭，立字为证。

雇主××× 雇工×× 村雇佃代表×××

注：（1）全区雇佃大会上确定工人明年的工资与今年同，因为今年的工资都是经过小区代表会评议的，比较合理。明年的工资与今年同，这是肯定的精神，这样使雇主会稳着心去生产，雇工心里也有底。

注：（2）在增资之后，为了保证雇工不失业，在合同上言明雇工不能随便“花”地是对的。

佃户：立合同人×××，有地××亩，因无力耕种，今租于×××。言明，今后每年收入按麦三七、秋四六分，棉花柴是对半劈，秫秸是四六分，草跟牲口走。为了增加生产起见，地主每年每亩得上粪一大车；如无粪时，得上豆饼60斤。觅夫工钱、拾花钱按分粮数去摊派。出差、闷股一概取消。在开锄时，地主应当预先借给两石铺底粮（谷子、玉米各一石）。佃主不能随便卖地辞佃户，佃户也不能随便不干。佃主如“花”地时，须经雇佃联合会批准才能花卖。恐口无凭，立字为证。

佃主××× 佃户××× 村代表×××

注：（1）为了保证佃户不被辞佃，在合同上说明今后都是一样的劈头是对的，因为此区都是小种地。另外，限制地主不能用假卖假当办法去无故掐佃户。真有用项卖地得经过雇佃会的批准才行。

注：（2）佃户最担心的就是怕增佃后地主不施肥，因此在合同上也应当按本地一般施肥数目加以规定。此种数目的规定，应当是不高不低。

最后决定立文约以村为单位，各村雇佃都找一个先生代笔写，

写妥后主、雇都得按上手印，每人拿一张。田庄小区有两天的工夫都立妥了。其他小区接受田庄小区的经验，也是两三天都立齐了。

我们感到立文约是雇佃增资增佃胜利之最迫切的要求，但由于部分雇佃存在着变天思想，或□□买卖思想，或者是某些地主故意给脸子看，在这几种原因的作祟下，部分的雇佃便要下工辞佃。他们这种人的思想，还影响着愿意干的人们的思想。如组长王殿清不光自己要下工，还拉着雇佃领袖——李得武也下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领导上如果抓紧去解决这个问题，就可以用愿意干的人们的正确思想去纠正那些没有正当理由不愿意干的人们的思想。反之，如果不抓紧，就可能叫歪风压倒了正气，造成很多人下工辞佃的危险，给雇佃运动造成了困难，给地主以可乘之机去分散我们的力量。

在领导进行这一工作时，最重要的就是形成雇佃自觉自愿的去进行立合同工作。这就首先要求我们打通领袖和代表们的思想，然后由他们向雇佃进行启发，以村或以小区为单位雇佃分头盘算家常，讨论如何不挨饿，各人打打各人的算盘，尤其启发他们回想灾荒年对他们刺激最大，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思想，加以具体的解决。我们要求的是绝大部分雇佃不下工，不辞佃，但其中有极少数有正当理由的（如赎回土地、年老等），经过联合会讨论是可以下工的，其雇主如果还能觅起伙计的话，联合会应当派人去。

（二）违法地主与进行斗争

在这时期，为了进一步的深入雇佃运动，为保卫既得的果实，就必须向违法的地主，向残酷欺压雇佃的恶霸进行必要的斗争。在要粮食之后一周内，以小区为单位又进行了大小10个斗争。田庄小区10个村200余雇佃，头一个便是联合斗争了马佛寺地主张海春。张海春当着全区雇佃刚发动起来后，他就在心里打了主意，企图把佃户张延顺辞去。但是怎样辞法呢？于是他就想法赶快假卖地，几天之内卖去20亩。全村都立文约了，只有他不立。村代表张延祥亲自

找他两次，他就不理。有一天佃户张延顺到他家说理去，他威胁张延顺说：“你们四六劈的东西，将来中央军来了还得倒出来！”张延顺看到他这样说法，知道他不是好东西，又加他的地很薄，便决定不给他种地。后经村代表和干部进行启发后又回去了，地主见了生着气对他说：“怎的又来了？”这句话气坏了张延顺，马上便到范尔庄找小区代表李得武去，一一述说后，要求李主任生法解决。李主任便召开小区联合代表会。在会上，代表油梦俊说：“这家伙想用贱卖地的办法来掐分子，又不立文约，咱去他又骂咱，他这不是骂的咱大家伙吗？咱们人翻的啥身呢？叫我看非联合斗他不行！”李主任和其他代表很赞成油代表的主张，大家决定斗争他。本来开始佃户张延顺的心情是又想解决，但又怕得罪人，表示很犹豫，但经过代表们解释后，心里想开了，便同意斗争他。会上代表们分了工，油梦俊说：“我捆！”李长田说：“我揍胳膊！”李得武说：“我拉腿！”张延顺说：“我领路！”接着便讨论与他讲理和怎样处罚他的问题。先叫张延顺报告他的家境，代表们的初步意见罚他1万元左右不算多。决定今天晚上分头下去把10个村雇佃动员好，明天早饭后都到马佛寺集合，捉起来带到王集大会（唱戏）上讲理。第二天，各村200多雇佃都去了，把地主张海春捆住，在大街上喊着：“不立文约的是坏蛋！”“吓唬佃户的是坏蛋！”“假卖地掐佃户的是坏蛋！”在庄当中便召集了群众开会，大家和他讲理。讲完，雇佃的意见非再到王集大会上游行讲理不行。接着便都到王集去，在戏台底几千人的大会上又讲的理，最后罚他1万元，找人保出完事。从此后，田庄的小区的地主富农们都知道不立合同、假卖地、假分家非得难看不行。第二天，趁着王集大会200余佃户又斗争了范尔庄地主（也是大恶霸）傅桂生。他有两大错处：一个是把一个女工吓唬跑了；二是不立合同。在群众会上，该女工申诉傅桂生如何把她吓唬走的经过，讲毕一致意见罚他200顶帽子。

胡里庄小区联合斗争了曹寨村两家顽固富农，他俩的主要罪过

是吓唬伙计。带着这两个家伙游行数村，游行完讲理，有一家罚300斤馍馍，另一家罚1石8斗麦子。当天上午在小区代表主任李林提议下，大家都在胡里庄过的阳历年（因为他们知道干部过阳历年，他们也过阳历年）。

左叙店一个地主，并且是恶霸，曾当过大乡长，企图用假分家掐佃户。全村雇佃联合起来与他讲理，罚他一口大猪。贫农过去因为受他的气很厉害，见到他被斗了很高兴，都说罚的还太少。

总之，全区除了康庙小区由于领导上没有抓紧这个工作外，其他4个小区都进行了大小不同的斗争。这些斗争是以小区为单位联合进行的，因为在全区雇佃都发动起来以后，强调以小区为单位去进行斗争，比较才容易领导。

从这些斗争中，告诉给我们这样几个问题：

首先，地主阶级看到雇佃宏伟的行动胜利了，他们知道公开镇压雇佃不成了，但他们并未因此而甘休，他们主要的用假当地、假卖地、假分家来企图赶快的疏散土地，减少目标，装穷蒜，来辞雇解佃。其次就是还有别的，千方百计的闷工人，拒绝立合同，或积极的买雇佃，这可以说是地主阶级在有计划的退却中的进攻战。他们这种举动，就大大的阻碍或破坏了运动的前进，成为广大雇佃们所焦虑的问题了。因此我们必须发动雇佃积极主动的向这些家伙开展斗争，用“打马骡子惊”、“先发制人”的办法去破坏他们这种把戏。在广大群众中，由雇佃领袖无情的揭穿他们这种阴谋，去继续从斗争中锻炼雇佃的团结力和组织力。因此从斗争当中去进一步深入雇佃运动，实在是必要的。

其次，我们必须了解到，在雇佃的深入运动中，对这些违法地主进行必要的斗争做的越好，雇佃群众力量发挥的越大（当然不是乱斗蛮干），就会给下一个环节——贫农运动打下有力的基础。

再次，三区在进行斗争中是有弱点的，主要的毛病就是酝酿工作做的不够成熟。例如：范尔庄斗争地主傅桂生时，在代表会上发生了争执，村代表张福和（是新发展之党员，敢干，顾虑性小）等

愿意斗，而小区代表主任李得武就不同意，原因是李得武顾虑心大，怕得罪人。区主任李开泰也未表示坚决的意见。后来只是部分的积极分子愿意坚决的斗，而李得武和李开泰只是勉强的打通了思想，因此在第一天斗争时，领袖们的责任心非常不强，群众的干劲也不大。所以要领导一个斗争，先打通主要领袖们的思想，把酝酿工作做的足足成熟之时再行动最要紧。如此领袖们才能主动的计划负责领导进行斗争，群众的干劲才更足。

（三）帮助开展贫农运动

要想深入巩固雇佃运动，必须使雇佃去帮助开展贫农的翻身斗争。如在三区当着立完文约，进行了一些必要的斗争后，以村为单位或以小区为单位在开胜利大会时，便响亮的提出了帮助串联穷人的赎地工作。如蔡庄组，在小区胜利大会上，王代表向大家提出：“咱们在村里老看着人太少，翻过来掉过去还是咱几个。咱的人简直太少了，咱们回来必须赶快的去串联穷人，进行赎地。”很显然的，全区或小区雇佃联合行动的威力，对地主来说，是占压倒优势的力量。然而一分散到各村，一般的说，我们雇佃的力量就是翻过来掉过去光是那几个人活动了，所以封建地主在农村仍占着统治地位。雇佃以村为单位来说，是处于少数与孤立的地位。我们必须在要粮彻底胜利了，立了文约，并进行一些必要的斗争后，赶快的转入贫农运动。我们应了解，转入贫农运动也正是为了巩固雇佃运动。为什么呢？因为虽然说雇佃政治质量强，但没有一定的数量是不行的。贫农被雇佃串联起来了，雇佃看到一个心眼的人多了，他们的干劲便自然高涨起来了。如在谭庄，雇佃把15家赎地户串联好后，在雇佃和赎地户的联合大会上，雇佃们都说：“往后事可好办了，有帮手了。”赎地户带着羡慕雇佃的神色说道：“人家雇佃有办法，动不动就斗争。”从这里就告诉给我们，只要是粮食要齐了，立了文约，进行了一下必要的斗争，有了这3个条件后，应当迅速坚决的转入贫农运动（如赎地、减息等）。在领导上不要犹豫

不决，或幻想把雇佣彻底搞好后再转吧！这样会使雇佣运动长期陷于停滞的状态，对运动来说是并不利的。

九、胜利大会上验文约、选领袖、 进行串联贫农的大运动

12月25日在田庄召开了要粮胜利大会。全区有租佃、主雇关系的45个村庄，有地主□户、富农279户、雇佣630个、雇工450名、佃户139、女工41，这天雇佣全都来参加了。会上共进行了以下内容：

（一）全区共有雇佣630人，共增加粮食303667斤（由雇工增加了251835斤，佃户43652斤，女工8180斤），□棉99029斤。会上一致通过正月十五为上下工的时间。雇工们都一致认为这时候（旧历腊月初一）下了工，做生意没本，拾粪顾不住口，又没有觅短工的；并说咱们工人给东家忙一年，到了过年吃好东西时，又赶咱下工了，真冤枉！还是正月十五下工好，到那时候地也快开了，即便下了工，也容易找活做。

（二）汇报了要粮胜利的总结后，紧接着便是选领袖。临时代表召集各村代表讨论的结果是：代表的产生应当以小区为单位，雇工、佃户分头选，各选自己的代表。雇工共选出5个代表：因为全区共有5个小区，每个小区产生1个代表。因为全区佃户少于雇工数目的1/3，确定只选3个代表。佃户的分布只有田庄、左叙店、胡里庄3个小区多些，而蔡庄、康庙小区只有几户佃户的不选了。以上3个小区，每个小区选1个代表。根据这个原则选举了代表。在几百人的大会上，群众一致拥护李开泰（工人）为全区雇佣联合会的正主任；田文忠（佃户）、孙延柱（工人）为副主任。

联合主任李开泰用高大的嗓子说道：“咱们不是都立了合同吗？大家都可以拿出来看一看。”他的话刚说完，600多雇佣都马上从腰里掏出来了，统统的都用粗黑的胳膊举起来。此时愉快的心

情充满了会场，都感到不光是把粮食要到手里，而且也有不辞佃不解雇的保证了。

（三）午后专门进行雇佃如何去串联赎地户的动员工作。三四个代表都反复的向大家解释：“咱不能光看的咱吃饱了，咱要想饿死人的那一年，无数的穷人把地贱价花光了，直到现在他们没地种，他们没饭吃。咱不能白看着他们挨饿，咱得赶快的串联他们去。”联合主任李开泰强调的指出：“光咱雇佃人太少，咱必须赶快的串联赎地的，把他们串联起来，就是咱们一个心眼里的人啊！”联合副主任孙延柱指出：“咱们心里可别认为串联赎地的是帮忙，办不办没关系。要知道咱们都是穷人，还有什么帮忙不帮忙啊！那就是咱的工作。咱大家想，赎地户都起来了，咱们的人多了，谁还敢欺负咱们呢？”最后由史区长讲解了一下政策和法令。

（四）在傍晚将要散会时，联合主任李开泰号召全体雇佃都武装自卫起来。他说：“现在博平的大汉奸罗章龙，在五区四区那里抓咱们的雇佃，杀咱们雇佃。咱们大家想一想，保护咱自己的身子最重要。咱回去每一个人要向东家要一棵红枪，村里局子里有手榴弹的把它要出来，咱们雇佃拿着。咱晚上得集体打更。咱还不能和好户家在一块打，各人打各人的，因为好户家没好心眼子。”李主任的意见，大家都认为很对，回去一定这样办。（注：这说明了咱们建立的人民武装，是农民阶级的武装，应当根据本阶级的需要而提出，过早过晚都不对。本来当着李开泰向大家提出来时，领导上很担心，恐怕雇佃为此而害怕，但后来结果很好。现下全区雇佃都已经打起红枪大刀来了，李开泰并到处检阅去。）

十、雇佃怎样去串联的赎地户

在三区雇佃串联赎地户的工作中，出现了3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就是在雇佃把粮食要到手里后，以村或以小区或者是大区开过胜利大会后，在会上经过了启发，雇佃们便去积极的进行串联工作。在三区来说，这是最主要的一个方式。试举胡里庄

为例来谈谈吧。本村雇佃在参加全区胜利大会回来的第二天，小区联合主任李林便召集全村代表小组长会议，启发进行串联赎地工作。大家便研究，好年景胡里庄得多少粮食能买1亩地？大家算了算，得4石麦子。灾荒年只多少粮食买1亩地呢？大家想了想，那时一般的价钱，只60元的黑票（伪钞）买1亩地，只合当时2斤小米钱。又讨论灾荒年什么人卖地，大家意见都是穷人卖的地。后讨论到穷人为什么要卖地时，在代表和组长当中，就有6个人是灾荒年出卖土地的，他们马上说话了，都述说当时是因为挨着饿，穷够了劲，没有法子而出卖的。可是怎么回呢？光你们就能办得到吗？代表曹树邦（他是卖地户）说：“咱得串联人，像长疥疮的一样传染起来吧！”大家都同意这个主张，于是代表和组长们都分了工。第二天正下着大雪，曹树邦冒雪而串联去。因为那年谁卖地他都知道，他走到别人家去说：“我虽然增资了，家里有吃的了，可是我的地灾荒年都卖去了。”但他这时不说对方你是不是赎地户，他的目的是引起对方的动机，叫他自己说。于是被串联者马上说话：“可不，那年我也卖地了！”曹树邦说：“你听说了吗？这兴赎了！”对方说：“兴赎，可是光咱俩可办不到啊！”曹树邦说：“咱只要把人串联起来了就办的到，像俺雇佃联合起来怎么把粮食都要到手里了呢？”于是他们就分了工，规定谁串联谁去，何时完成。曹树邦用这个方式1天之内串联了30家赎地户，当天晚上就在牛棚里开的会。雇佃联合主任李林也参加去了，并讲了话。会上主要的内容是谈当时卖地的情形，为什么要卖地。没问题，只要谈到当时卖地的情形，他们是会难过的。决定再串联人，过了两天，东西头都串联起来了。东头是雇工张代表（赎地户）和组长孙□贵（不是赎地户）串联起来的，他俩共串联起来了70家。大街上和后街上是联合主任李林（不是赎地户）和工人张金斗（赎地户）串联起来的，他俩共串联了20家。再加上西头曹树邦串联起来的30户，如此全村120家赎地户都串联起来了（注：全村共有716户），共划分了9个小组。接着召开全体大会倒苦水，由干部作启发，叫大家说那年卖

地时的苦楚。首先由一位四五十多岁的老太太说：“那年我把地卖光了，才到河南里逃的荒。到了那里没有法子，还得把孩子送给人家了。”说着就哭起来了。另一位老太太说：“我把3亩地卖给地主郭金乡家，文书上写的当时交足，但他并不给足，只得三番五次的和他要他才给。”说着她也大哭起来了。另一个老太太接着说：“民国32年我家3口人，饿死了两口。在那时没钱买棺材，把地卖光了。当时我卖地时，真与刀子割心的一样，我哭了好几天。”说着嚎啕大哭起来。在倒苦水当中，抱头大哭的有七八个人，没哭的都含着泪难受。雇佃联合主任李林说：“这多么难受，这就是咱穷人做的难啊！”说着李林也哭起来。最后他激发大家说：“你们都是卖地的，我没卖地，但是我一定坚决帮助你们办理。你听听咱们穷人多难受啊！”

第二种方式：是赎地户去串联了雇佃，雇佃胜利后，又去串联帮助赎地。为什么产生了这种方式呢？这主要的是，10月间临清市区颁布了赎地法令，曾有部分的群众自动的进行了赎地，对此区影响极大。有些赎地户在我们搞雇佃运动时，就接近了我们，并成了积极分子。当时很多村（如蔡庄、左叙店、相庄等）是赎地户个别最积极，而雇佃在地主的谣言攻势之下是很害怕的。因此当时便由赎地户去串联了雇佃，而雇佃胜利后，又串联和帮助了赎地。如相庄当时雇佃很害怕，干部便接近了赎地户谷朝吉。经过谈话后，他串联十几家赎地户。但这时雇佃被地主谣言吓的很害怕，不敢接近干部，谷朝吉等就把雇佃串联起来了，并帮助他们开了会。在会上谷朝吉发言最积极，对雇佃的启发教育极大。雇佃胜利后便启发雇佃，可别忘记了人家赎地户，当初一日要不是人家帮助串联咱，咱怎么得到小米。经过雇佃帮助，串联了28家赎地户。一天晚上，雇佃、赎地户共同开大会，彼此强调说：“咱们今后可别分家，你帮俺，俺帮你。”雇佃代表张茂荣说：“你们假如〔有〕不赎给地的，咱们雇佃都去帮助你们开斗争会。”雇佃们说：“你们别心急，还得和我们一样亮亮兵呢！”（即是游行示威）赎地户很兴

奋。现在赎地户都很尊重雇佃代表张茂荣，因为他经过雇佃运动懂的事多了。

第三种方式：是在全区雇佃胜利后，使一部分赎地户红了眼，他们一听说有赎地一说，或是见到赎地的布告，自动的串联起来了。如上集赎地户的酝酿串联工作，我们干部并不知道，是贫农齐文汉、张土匠领着自己串联起来了20户。他们串联起来后，便去找买主去。买主说待几天再说吧！又找庄长去，庄长说我不管那个事。没有法了，他们便去找抗联去。

根据三区的经验，在掌握雇佃运动与赎地运动的关系上，有这样几个问题：

第一、在集中力量开展雇佃运动之时，我们发现了赎地户，尤其是其中的积极分子，应当是与他们商讨，启发他们串联去。我们不当因为开展雇佃运动而根本不理他们。有时候假如雇佃工作难作，我们还可以运用赎地户中的积极分子去串联雇佃去。但在领导上我们必须明确我们所进行的主要的运动是雇佃运动，而不是赎地运动，赎地运动是次要的地位，基本上应当是服从雇佃运动的。（如叫赎地中的积极分子去串联雇佃去。）

第二、雇佃联合行动要粮胜利了，并立了合同之时，应当是以村为单位去转赎地，在雇佃中提出串联赎地户的工作。固然以小区大区为单位，去召开大会启发动员转赎地，但在这里从村情况出发，也很必要。

这次三区由于注意了以上两个问题，因此赎地的串联酝酿工作进行得很快，在全区雇佃开胜利大会号召转赎地时，全区已有30多个村庄串联了赎地户（多只是串联了一小部），500余赎地户已经串联成熟了。

第三、在雇佃串联赎地户中，雇佃中最积极的是灾荒年出卖土地的，因此我们应当特别抓紧他们，培养他们成为赎地运动当中的领袖。另外，在雇佃串联当中还要善于发现与培养赎地中的积极分子或领袖。

冀鲁豫区党委、联合会总会 召开边区群运座谈会 确定新区清算诉苦方针*

(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一日)

【本报消息】区党委、联合会总会为了进一步开展边区群众运动，特于本月6日召开群运工作座谈会。到会者有各分区各级联合会干部和群众领袖60余人，边区级机关团体负责同志亦均出席，本报部分同志也参加座谈。会议由区党委诸负责同志亲自主持。座谈历时11天，经过与会各同志热烈争论与深刻钻研，获得巨大胜利：自下而上的清算了狭隘经验主义，肯定了新区清算诉苦的群运新方针，解决了清算诉苦运动中树立雇佣贫领导的问题，解决了中贫农关系及处理方法，从思想上清算了片面的阶层观点，并且检查了党委对群运工作的领导，提出了不少意见。党委根据大家意见作了深刻检讨，认为过去对群运工作具体领导不够，在组织力量上小手小脚，并进而从思想上进行了批判。指出：这是由于认为边区发动群众有了多年经验，有了大批富有经验的干部，因此，感到发动群众在边区没有问题，产生自满、麻痹，不是兢兢业业的去搞群运，而是放松领导，忙于其他任务，不是集中力量发动群众，各部门办各部门的事。因此，使弯路走大了，时间推迟了，使边区工作受到很大损失。最后，张玺同志作了总结发言，指出：边区群运三个月来所以没有更大开展，是由于道路太狭、手脚太小。接着指出：今后

* 本文原载于《冀鲁豫日报》第617期（1946年4月21日）第2版。

必须打破狭小圈子，从多数群众要求出发。边沿区应以自卫斗争为主；老区要把查减和生产结合起来；在新区未有打开局面的地区，应从清算诉苦着手；雇佃贫半打开局面的地区应增加清算诉苦新内容，使雇佃贫和清算结合起来；已经由雇佃贫搞起来的，以其为核心的开展大规模清算诉苦运动，清算诉苦已搞起来的，立即增加减租增资，把运动提高。在新区发动群众上，号召大家回去后首先打通干部思想。并且指出：要求从具体情况出发，避免向干部硬套，贯彻这次座谈会向群众学习和群众教育群众的精神。16日会议胜利结束后，全体干部信心百倍，欢欣异常。湖西某区干说：“这样做，运动保险就搞起来。”边区群众运动，就此将划一新的阶段。

边区群运座谈会经过

边区群运座谈会，经过与会同志11天的努力，已于16日胜利结束。张玺同志在其总结报告中指出：“这次会议，从下而上的清算了我们狭隘经验主义，解决了进一步开展群运工作的道路问题，从思想上清算了我们的片面群众观念，解决了边区从未解决的中农政策问题。”因此，自上而下，信心百倍，从思想上涌现出一种新的气象。

这次会议之所以获得空前胜利，张玺同志指出：“由于三个月来全党同志实际努力，在实践中取得了不少经验和教训，由于会议的领导打破了传达、汇报、讨论、总结的老一套，采用了典型报告、一般检讨、酝酿、争论、小组与大会结合的从群众中来的方法。”因而高度的发挥了大家的积极性，普遍地集中了群众智慧。

一、从一般情况中提出问题

区党委接到了中央局指示，亦得到了不少实际情况，本区群运中急待解决的问题，是比较清楚的；但并没有把上级指示和自己的见解去限制同志们的思想。主席潘复生同志在座谈会开幕时，只用

了5分钟的时间，扼要的说明了这次座谈的重要意义，并强调指出：“会议开的好，必须大家多发言。”他号召大家：“有话即说，想到就讲，不拘题目，不讲形式。”

座谈是通过了3个典型发言把问题引出的。这3个典型代表了新区3种不同情况，也代表了新区发动群众的3个道路。

第一个典型是平阴三区。该区是前年秋即解放了的游击区，群众曾有过比较彻底的增资、回地、短工变价斗争，各村均有一套自己的组织，并经过长期对敌斗争的锻炼。但在开始重新发动的时候，正是内战严重时期，群众一般恐慌异常。在这样基础和这样的群众情况下，他们首先抓住平汉大捷，开展大规模的政治攻势，奠定了群众信心，从而发现工人的增棉衣要求，发动了全区工人，又以这些工人联合佃贫为骨干，展开全区反奸复仇，轰动了全区。在运动高潮中，突出发展组织，选举领袖。最后，在有领袖、有组织、群众情绪十分高涨情况下，转上生产。

第二个典型是平阴六区。该区是去年秋解放的白板区，最初采用了佃雇贫道路，结果经过了两个多月发动，群众连句真实话都不给我们说；相反，地主却以土地、金钱，甚至自己的女儿普遍的收买群众，使我们几无立足之地。后来根据90%以上人们的反奸要求，改变方针为清算诉苦，于是15天内发动了全区的广大群众。

第三个典型是菏泽炎黄区。该区是土地分散的邻接区，工作开始基本上走的是佃雇贫的道路。三个月中，前半期主要是进行减租增资，干部与群众都碰了不少钉子；后半期改为“佃雇贫一齐下手”，但工作开展的仍是很慢，发动的群众在广大群众中遭到孤立。

典型发言后，潘复生同志又以四五分钟时间向大家提出：“看看自己县、区情况是怎样搞的？”至此改为小组酝酿。经过一天半的分组座谈，大家普遍的将问题提出，接着又集中起来，以分区为单位逐一汇报。汇报中，各分区均从具体事实中说明了清算诉苦确是群众要求，从佃雇贫着手碰了不少钉子，但有的也打开了局面。

这样就形成了一方面认为新区方针应当是清算诉苦，一方面又认为佃雇贫方针并不错误。

潘复生同志这时又向大家提出：“到底哪个路对？”于是，道路问题便展开了争论。

二、两条道路的热烈争论

经过多年敌伪压榨的新区群众，多数要求清算诉苦，大家对这一情况的估计，意见是一致的，但走清算还是佃雇贫道路，却有不同见解。

一种意见认为：新区群众90%以上要求清算诉苦，所以应当毫无例外的从此入手，否定佃雇贫道路。

一种意见认为：佃雇贫方针没错，过去所以没有很快打开局面，是领导上没有把佃雇贫结合起来运动的结果。

第三种意见认为：清算诉苦方针比较好，佃雇贫方针也可以，因此没有搞的就从清算做起，已经从佃雇贫搞起来的仍旧搞下去。

争论展开了，认为毫无例外的要搞清算诉苦的同志，进一步提出：三个月来所以没有打开局面，是由于走了佃雇贫道路，脱离了多数群众，使少数群众遭到孤立，因此大规模运动不能形成，虽然也有部分发动，但却得不偿失；肯定过去的毛病不仅是领导上的问题，而且主要是佃雇贫的方针问题。

认为佃雇贫道路并无错误的同志，更从历史上找出种种实例，说明没有佃雇贫核心的运动，必然形成游民分子运动和中农运动，没有佃雇贫领导，即没有群众翻身。

否认佃雇贫道路的认为：以佃雇贫为核心是正确的，走佃雇贫道路是错误的。坚持佃雇贫道路的认为：佃雇贫道路是从历史上创造出来的，为一般干部精通熟练，今天运动中也说明能够搞起来。慢确是缺点，但这是领导问题，联合斗争即可克服这个缺点。清算虽在某一处地方证明较好，但未被普遍证明，因此不能一般的强调，应由具体情况决定。至此产生了另一种意见，认为过去佃雇贫

是个圈子，现在从清算入手也是个圈子，二者都不对。过去主要毛病是没从群众出发，现在应是群众要求什么就干什么，不应有什么道路的确。争论愈来愈热烈，意见很多，但问题中心只有两个：即从多数要求出发或从经验出发。在双方争论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潘复生同志提出：从历史上找一找佃雇贫道路究竟在什么情况下总结出来的？它的好处是什么？坏处是什么？

于是争论便转向对佃雇贫道路的清算。大家从各方面认识了佃雇贫是来自滑、濮民主大动之后，本身带有极大查减性。这个运动在经过民主大动的滑、濮当时说来，确实把运动提高了一步。这个方针的提出时的情况是：一般地区民主大动中放松了领导，因而形成乱斗、乱罚的偏向，但没认识到这是领导问题，而把游民分子、中农看得很可怕，于是把佃雇贫经验绝对化，特别是把它搬到新区，就成了个狭小的圈子，造成多数愿意起来的我们硬压，少数不敢起来的我们硬抽〔挡〕，以致使运动没有求得更大开展。但不能因此否认佃雇贫经验的可贵，相反在今后清算运动中还应十分注意树立佃雇贫骨干。

从思想上历史上佃雇贫的经验和今天的佃雇贫道路界限划清后，清算诉苦方针便在一般同志思想上明确起来。于是潘复生同志又提出：“回去如何干？”把会议提高一步。

一般方针和具体情况一结合，立即产生了“谁领导”的具体问题。它妨碍着大家对新的方针的肯定，不敢大胆的接受清算诉苦方针。

谁领导的第一个问题是“游民分子专权”。在这个问题上一般的肯定清算诉苦参加的成份复杂，容易陷于游民分子领导，把运动搞翻。但这又有两种不同认识：一〔种〕认为没有佃雇贫的核心，虽然轰动一时，但不能解决问题，因此，诉苦清算方针应当考虑。一〔种〕同样承认这种危险，但肯定这是领导问题，如果领导上深入群众，通过大会给群众撑腰，提高了群众，群众就会检举与改造游民分子。另外，有的认为清算诉苦容易为中农掌握，不易树立

佃雇贫领导骨干。原因是中农数量大，办法多，它在敌伪统治下又最受压迫，因此在诉苦中它又最积极。还有的认为新区和老区情况不同，新区最痛苦的是贫农，因为第一，那里没合理负担，摊派贫农吃亏最大；第二，那里劳役负担最重，因此贫农受苦最痛，所以清算诉苦中贫农最积极。一分区平阴经验证明此点，并创造了“如果诉苦中领导成份没把握，即可建立组织”的防止游民分子和中农专权的办法。

经过了一个整天的争论与钻研，共同认为：必须明确方针和必须从群众要求出发，据此具体确定了边沿区应以自卫斗争为主；没有搞开局面的地区应立即着手清算诉苦；从佃雇贫半搞开的地区，应增加新的内容，和清算诉苦结合起来搞；从佃雇贫搞开的地区，应立即以之为核心转向大规模清算运动；清算诉苦搞起来的地区，应即增加减租增资新的内容，把运动提高。

然中农“参不参加领导”问题，又成为普遍疑问。因为它关系整个中农政策，也决定着运动的成败。历史上曾因此产生了乱斗的偏向，今天亦因此而对佃雇贫方针不敢大胆放弃。新的方针从各方面肯定后，中农问题则特别显得突出。因而潘复生同志提出：道路问题解决了，政策不解决还不行。他号召大家集中解决中农政策问题，会议乃转向清算片面的群众观念。

三、纠正片面的阶层观点

研究中农问题时，大家争论尤为激烈，而且都是针锋相对，反映了中农问题在实际工作中的严重存在。

争论由中农“参不参加领导”开始，争到“中农该不该斗”，由“阶级分析”转到“历史清算”。最后一致认为：中农和雇、佃、贫是同一命运的，中农是基本群众中的一个阶层，但中农和雇、佃、贫又有区别，中农的动摇性大，没有佃雇贫斗争性强。因此，领导骨干应以佃雇贫为主，但必须吸收中农中的积极分子参加领导。

中农和贫农确有矛盾，但这是群众内部的问题。中农有错误应当斗，但必须认识这是群众的家务事，应在群众内部采取仲裁、赔偿、调停、谅解等方式解决。至于少数乡村内之中农成份的统治者、个别中农成份的汉奸，都已经超出中农范围，不在上述中农之列，但也必须区别于一般地主和罪大恶极的汉奸。

张玺同志在这个问题发言中指出：历史上，由于我们不了解贫农比中农更苦，因此对贫农的照顾不够，形成中农领导。后来在运动中发觉此点，提出了贫农问题，这应当是边区一大进步；但转得太过了，转向了“不要中农”，并且自觉不自觉的认为贫农运动必然妨碍中农利益，因此造成长期违背中农政策的严重错误。张玺同志结论说：单纯照顾中农与单纯照顾贫农，都是片面的阶层观点，它不是农民和地主斗争的观点，而是以3亩地向5亩地斗争的观点，这是立场不稳的表现。

开展深入与普遍的 反奸诉苦运动*

(一九四六年五月十七日)

郭 超

新解放区群众工作座谈会的精神传达给区村干部后，各县区干部同群众均得到很大的鼓舞，情绪振奋起来。领导方向与广大群众要求相结合，将成为不可抗拒的力量。8年来群众所受到的敌伪的压榨与痛苦，已在不少的村庄群众敢于起来诉苦伸冤，个别地区已开始形成全区性的反奸诉苦运动。但由于这次座谈会的精神，部分干部还未能领会，因而某些地区未能成为一个广大群众行动，对反奸诉苦的道路带有极大的怀疑，不愿抛开已走过的老路——孤立的雇佃贫道路。

这次听到临泽、鄄城、嘉祥同志的简单汇报后，在新解放区，由独立的雇佃贫转向为反奸诉苦道路的初期，对反奸诉苦的领导提出以下问题，同各县区实际领导反奸诉苦的同志共同研究。

一、进一步明确新解放区从反奸诉苦 着手发动群众的方针

从临、鄄、嘉等县的汇报中，说明反奸诉苦在认识与执行中还需要进一步把它明确起来。当前领导思想上存在两个问题：

第一，是把反奸诉苦仍拘泥在孤立的雇佃贫（甚至说是雇佃）的狭窄圈子里，以孤立的雇佃贫狭窄的残余思想来领导反奸诉苦，

*本文原载于《冀鲁豫日报》第642期(1946年5月17日)第1版。

把绝大多数人的诉苦运动变为孤立的少数人诉苦、多数人恐惧，即就是说斗争对象多于参加斗争的群众（临泽三区×村100户，15个农会会员斗争了31户）。结果是绝大多数群众的痛苦是没有申诉出来的。

第二，是把新解放区的反奸诉苦混同一般的民主斗争，群众对于敌伪人员以及依仗敌伪欺压群众的特务与封建势力，不能伸冤诉苦，而代之以孤立的少数人的报仇诉冤的行动，甚至把反奸诉苦当作恶霸与一般的封建地主，个别的斗富户现象。少数人的孤立行动激起广大群众的不满与恐慌，特务分子乘机同我们争夺群众，部分群众在对我不满情绪下，会一时背离我们的。这样一来新区群众运动是不易跳出狭窄圈子的。这种残余的领导思想严重的障碍着群众运动的开展，必须迅速克服。首先在干部中明确认识，反奸诉苦是具有民族民主性的、划清忠奸敌伪界限的斗争，凡是受敌伪以及敌伪爪牙欺压的人，均应组织到反奸诉苦运动中去，伸诉仇冤，讨回血债以及讨回被残杀的人命。斗争对象是汉奸伪军伪组织人员，领导上应善于分清主要与次要、主犯与盲从、发号施令与杀人的刽子手，把多数人的仇恨善于集中到极少数的罪大恶极的身上。在处理上，对主要分子既斗争又重罚，甚至严惩；对盲从次要分子，听取群众处理，领导善于启发，以政治揭发予以悔过自新之路。其次反奸诉苦在新解放区发动群众工作上，是个不可缺少的步骤，是个翻天覆地打垮敌伪统治、促成被压迫群众解放的革命行动。新解放区，绝大多数群众均受敌伪欺压，因此决定反奸诉苦，必须是绝大多数人的诉苦，不是少数人的诉苦，因而也不能是孤立的少数雇佣的诉苦。当然不能否认，在长期敌伪统治下，贫农雇工受的苦最深，他们对敌伪的仇恨最大，在反奸诉苦运动中，很自然的就表现得积极，如果领导上有意识的培植，就很容易形成运动中的骨干。而在多数人参加的反奸诉苦运动中，只要善于领导，树立无产阶级或半无产阶级的领导骨干，不会怎样困难的。因此在运动中，雇佣贫必须与广大群众相结合，否则仍然会重复孤立的雇佣贫道路。

二、政府与军队应坚决的给群众撑腰

某些县区政府在这个短短期间内支援与参加群众运动，是创造了不少的范例。嘉祥、济宁在这点上是有成绩的，负责干部亲自动手，组织群众进行反奸诉苦，并有力的鼓励群众，给群众撑腰。但某些个别县份，仍是以单纯配合观点，被动应付，站在群众运动外仲裁评判是非，领导干部并没亲自动手，结合诉苦群众的情感，及时给群众解决问题。最坏的是同情斗争对象而压抑群众的情绪，把群众的伸冤勇气变成对地主的恐惧（地主反攻），有理不敢申诉，已起来的群众又冷落下去。这种恶果是值得痛痛反省的。

县区部队的整军与参与群众运动的矛盾，应无条件的服从群众运动。这是再也不能拖延下去的了。新解放区的秩序在特务积极破坏下日益恶化，刚刚抬头的群众，被血的恐怖镇压下去，个别县区干部与部分群众情绪是遭到摧残而消沉。反奸诉苦开始，政府与县区部队应以最大努力给翻身群众撑腰，鼓起群众勇气，敢于诉苦与斗争。为此，政府与县区部队应充分动员所有组织力量，卷入反奸诉苦实际运动中去，主动的协助群众、组织群众伸冤诉苦。县区部队除消灭打击特务武装，保卫群众翻身事业不受特务摧残外，并且把战士群众组织到反奸诉苦运动中去，扩大群众声势，迫使敌伪以及封建反动者迅速向群众低头。

三、把可能组织起来的力量迅速 组织到反奸诉苦运动中去

区党委以及一、三地委抽调与组织大量干部开赴新解放区去，这点给我们很大的启发，使我们进行深刻的反省。在组织力量上二地委魄力是不够的，为补救这个缺陷，决定即再从中学、师范、教导队中抽调500个生力军，在最近开赴新解放区参加群众运动，并号召各县委检查自己领导，是否把可能动员起来的力量组织到反

奸诉苦运动中去。再次搜集在乡可能动员的力量（老解放区村干、积极分子，新解放区抗战中途回家的干部），领导上应注意其一技之长，只要当前于群众运动有利的，均可大胆的使用与提拔的。在工作作风上，贯彻深入艰苦、大胆有魄力的作风，一时一刻也要把领导精力运用到群众运动中去。在这斗争的初期，应以最大的气魄给群众撑腰，继则把反奸诉苦运动普及各个村庄，掀起绝大多数群众的反奸诉苦运动，把领导干部的情感同受压迫群众的痛苦结合在一起，汇成一条不可抗拒的巨流。

四、集中力量突破一点，发动 大规模的反奸诉苦运动

领导上由于受到调整组织，平均使用干部，工作上重点又不够明确，没有轻重缓急之分，结果在某些县份的反奸诉苦运动，限于此起彼伏、零敲碎打的少数人行动的局面。在具体布置上，缺乏从一点突破、推及全区的指导思想，个别地区的斗争形成自流现象是很严重的。领导上并不是有计划的组织联合的群众行动，用群众行动推动全区性的反奸诉苦运动。在今后领导方法应迅速予以纠正，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带有战略意义的区村重点，适当的调整干部，集中优势力量，从一点突破，创造经验，推动其他区村的反奸诉苦运动。在具体进行中，应有详细布置，从何村什么对象着手，进一步发动小区的联合行动，掀起全县大规模的反奸诉苦运动。

对菏泽市当前群运的意见*

(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日)

刘镜西

菏泽市自从进一步明确了诉苦复仇方针，弄清思想上的糊涂观念后，在各区同志们深入积极的工作中，全市群运大大的向前推进了一步，开始轰开了局面。

从西、北两区联合行动时算起，半月来大小斗争14次，几乎每天都有斗争，甚至有两次的，参加运动的群众万余人，包括市民、工人、小学教员、三高学生，城外杨庄（南华县属）、水王庄（菏泽县）村民都赶来参加诉苦复仇。斗争果实，仅9家烟厂汉奸股金检举出300余万元，加上汉奸陈诚、葛敏斋、赵荫堂、刘永庆、杨寿三等财产也不下300万元。在行动中群众扶老携幼，争先恐后，轰轰烈烈。

全市的空气变了，在短短半月多的运动中，谣言煞了，街头巷尾充满着斗争汉奸的谈话。早先群众不敢接近我们（怕遭孤立），现在开始亲近我们，并敢于主动向我们提供材料和意见。在群众压力下，汉奸结合封建势力的统治残余开始破坏，其统治组织已形成紊乱。

但这仅是开始轰开局面，不能以此自满，尚须领导者及全体同志作风更加深入，努力将运动进一步的发展和提高。为此，提出以下几点意见：

一、政策上更加明确，对逃跑汉奸，屡次争取限期不归者，立即通缉并没收其财产分给群众。对于群众十分痛恨，要求枪决的大

*本文原载于《冀鲁豫日报》第645期(1946年5月20日)第1版。

汉奸，如陈诚、三坏等应及时处理。当然政策是要依靠群众力量来执行的。

二、要抓紧时机，在运动中加强群众的阶级觉悟与政治教育。群众在开始大多从经济要求出发，这是群众的革命要求，但仅仅停止在这一点是不够的。领导者的责任在于结合群众革命的经济要求，开展深入的阶级教育与政治教育。只有群众在政治上的提高，才能更积极向汉奸进行斗争，索还被汉奸刮去的膏血。否则将没收汉奸财产认为“碟子外边的菜”，这样群众觉悟不提高，运动就无法向前开展。

三、要深入工作。在局面未轰开时，虽然我们下最大决心与苦力要深入，结果碰了壁，因为当时群众怕孤立，不敢接近我们。今天情况变了，不是我们如何找群众的问题，而是广大群众找我们，我们应接不暇的问题。这时领导上最容易漂浮自满。在这个关头，领导上要特别警惕，要坚决深入下去，要与广大群众接触，及时了解群众的苦处，跳出少数人的圈子，更小心更具体的组织有积苦隐痛的广大群众，否则会限制运动的开展。

四、要注意组织群众。在群众未动时号召组织，我们落了空，因这不是当时群众的要求。但今天群众在行动中，我们号召组织起来，是达到群众诉苦复仇，清算已往损失的目的。这是必要的，是符合于群众要求的。领导上千万不要沉醉于目前群众的轰烈行动，否则便成昙花一现，一阵轰动过去之后，群众领袖没有培养出来，一哄而起，一哄而散，结果群众仍旧没有发动起来。

五、在处理果实时，积极分子、代表等多分一点是可以的，因为他们都很穷，都是小商人，他们在调查研究、开会等耽误很多时间，应该在分配果实时照顾他们。但不宜过多，越多越突出越脱离群众，因为群众会觉得他们是利己的。分配果实应在群众中民主讨论，集中群众的意见而后决定。

在分果实中奖励积极分子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应按贫富的标准，确定贫者多分的原则。同时要号召群众勿将果实一花了事，

要加强生产。如号召工人购买股票，以免由没收汉奸股子引起工厂倒闭致工人失业，这样工人生产情绪会更提高，劳资关系也进一步协调。

大胆使用各种积极分子*

(一九四六年六月七日)

张承先

西王楼是定陶孟海区北部的一个村庄，过去是王子杰残部傅善伦活动的顽占区，现虽为我收复，但国特掌握的游匪仍不断活动，各村伪顽残余势力仍是很大，广大群众在这种恶势力镇压下仍是不敢动。

西王楼的乡长王存仁，当过顽军王子杰的催征队长，与伪顽中的营长、队长多是仁兄弟。因此，他虽为恶多端，群众也是不敢说啥。他不仅在催款中打人、押人、罚款，押的人释放也得要去笼头钱。他指使着乡丁截路，他征粮中每亩多征粮食5斤、柴价4毛。他诬告王兴文等杀人，弄到顽军县政府钉死了两口，兴文被打的死去活来，弄得倾家荡产。总之，王存仁是无恶不作，是那一带群众所愤恨的家伙，但是群众谁也不敢咋着他。

八路军来到，民主区部安到韩楼后，王楼一班子不甘心受气的人，就偷偷的活动组织农会。他们的出身虽然不同，他们的想法虽然不一样，但是他们都要求着翻身。王兴文几乎死在顽军县府，出来后也不敢回家，不得已跑到卞团（顽军）当兵。但是，王存仁还用了通八路的罪名抄了他的家，真是弄得他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王存德是个老村长，地主吞了粮款，还鼓动着反他的贪污，空了3000斤麦子（地主吞了），打的他抬不起头来。他两人是决心要报仇的，又胆大敢干。王存心因在家受气不过，出外卖肉给子（食物），

*本文原载于《冀鲁豫日报》第760期（1946年6月7日）第1版。

几年不回家。他娘死了，回家出丧还不让出，只得各家磕了头，人家才准他出丧。王存心伤心地说：“穷人不是人，□有几个娘？埋娘只一回，叫人家欺负到这一步，真是有泪肚里流。熬到现在，八路军来了，穷人要得翻身，我功不成名不就，日子也不过了……”真的，他为了全心全意的办穷人翻身的事情，联合人，买卖也不作了。王存心有高度的觉悟，他看清楚了封建恶势力的压迫，他明白了今天是翻身抬头的日子。王玉亭、王存五，都是垄地皆无，没有饭吃。胡启方给人家扛活，家中几口人还得要饭为生。除了以上这些人外，还有几个投机分子，怕干到自己的头上，他们也随声附和的跟着干，但他们有时也到地主面前去买好。这伙要求翻身的人，都被王存心团结起来了。开始他们偷偷的活动着。可惜，我们那时候只搞减租增资，没有注意支持他们，他们就决定先帮助佃雇倒粮，而后成立农会。

地主为了破坏他们这个组织，便叫走狗王玉忍（现时的村长）、王存禄（地主王存仁的亲信佃户）成立了假农会，并率领一伙人堵住王存五的门说：“你们成私农会不行！”户家还放出风去：给农会（假农会）抽枪，要活埋这几个人。可是他们并不怕，泼上“二斤半”（头）不要了，他们宣了誓：8个人只要有一个死不了，也要报仇！粮倒了，但是20多个佃雇都不大起劲，只有胡启方还较好点。地主的凶焰还是很高，8个排〔牌〕长也参加了王玉忍成立的地主农会，并派了枪支。

自从我们领导上提出反奸诉苦后，干部才主动的支持积极分子，才把王存仁押起来，用政府力量撤销了村长王玉忍及8个排〔牌〕长，并直接宣布了地主农会是不合法的。当王存禄武力威胁雇工代表胡启方时，区队马上派枪去警告坏蛋：“如果发生差错，你要负责。”由于政权的配合，积极分子的气更壮了。农会长王存心说：“过去咱们是井绳，今天咱们是竹竿了，是铁筒了。”他们敢在街上大喊大叫的反王存仁了。不过这时反王存仁的群众还是不多，除少数积极分子外，大部群众尚未参加。在积极分子的脑子

中，想更多的依靠我们的撑腰，还不相信群众的力量（这当然很奇怪，没有集体行动的体验），对群众还是感到不可靠。所以几次叫他们扩大组织，扩大力量，他们总没有作。我们怎样使积极分子面向广大群众是个重要问题了。怎样办呢？于是对各个积极分子进行谈话，开积极分子会，用各种办法说明团结的人少是办不了大事的。我们告诉他：“王存仁在区里说：‘王兴文等要告我，他打死人被王子杰抓了谁不知道？他在卞团当兵，抢过俺的麦子。他是傅善伦的谍报，我还要告他哩。’你们看，王存仁的花枪多厉害！你们在一块空口无凭还吃他的亏呢！咋办呢？大家伙的眼明，只要群众起来作证，不怕他。”积极分子明白了，那得赶快联合人。真的他们先联合雇佃，动员他们参加农会，又把看青队组织起来，借了1000斤粮分给队员。王存心向大家穷兄弟动员：“只要我王存心有饭吃，就不能叫大家饿着。”这样，农会员很快的扩大到50多个。他们扣起了走狗王玉忍、王存禄，揭发了他们破坏农会和要想害人的错误，并争取他们回头，说明他们过去是上了地主的当。反动团体开始分化了，连8个排〔牌〕长中的人，也有的要求参加农会了。农会长王存心心里有老底：虽然叫他们参加农会，但还得提防着他们，有些斗争的重要问题，是先积极分子会上讨论，然后再分小组讨论。在斗争王存仁的大会上，基本群众保证了斗争的胜利。

分配斗争果实的时候，很明显的看到，那些私仇大、敢干的积极分子，只顾个人利益。王兴文说：“光赔我就得80万。”王存德说：“得赔我3000斤麦。”群众听了他们这些话，是不满意的。我们提出了分果实的四个原则：一、苦主一个人翻不过天来，胜利是大家的力量，果实大部应归农会，个别苦主由大家讨论照顾。二、积极的由大家推出翻身模范，提出奖励。三、穷的多分，能过的少分。四、地主光了，雇佃不能吃亏。并再三强调，分果实要民主，权利在会员身上，不这样，大家团体抱不紧，果实也保不住。少数自私分子也不能不服从大多数人的意见。原来与群众联系好，先公后私的王存心，便成了很自然的群众领袖。那些一时敢干的打手，

是不能左右群众的。

从西王楼的斗争中，除得到给群众撑腰等一般经验外，主要的就是关于大胆团结与使用各种积极分子和坚决走群众路线的经验。在新解放区，反动势力的压力很大，开始一般老实农民，动是很难的。他们在思想上：“看远一点吧，吃亏人常在。过去的事就过去了，别提啦。”他们满脑子里是顾虑，没信心。那些吃了大亏为报私仇带点光棍味道的一贫如洗的人，他们是比较胆大敢干的。他们敢拚命，他们能起革命的先锋作用。我们过去由于怕流氓、怕新贵，把他们拒之革命之外，这是很不应该的，在打开新区局面上，曾造成了很大的困难。我们应重视他们的革命作用，大胆的团结与使用他们。这是不是就算走流氓路线呢？就一定培养了新贵呢？不一定的。最主要的是看我们领导上走不走群众路线，是不是凡事都让大家做主。我们过去单纯的责备流氓本人，不检讨领导是不对的。实际上，新区这部分带光棍味的人先活跃，是实际情况的自然现象。只要我们不是只单听几个积极分子的话，只要我们及时的接近和启发广大群众，一切大的事情都让大家做主，就不会使流氓当道，也不会把积极分子培养成新贵的。当然走群众路线也不放弃积极分子会，有些重要问题，还是先让积极分子讨论后，再让大家讨论。不要事办不成反走了风。我们常常看到在运动前面大喊大叫的并不一定是群众领袖，只是那些爱出风头的打手（也有叫筒子头、二杆子、光棍的），群众并不十分听他们说，往往真正的群众领袖是在背后掌舵、出主张的人。

召开十五县活动分子会议

二地委总结群运*

(一九四六年七月五日)

张耀华

中共冀鲁豫二地委会，于上月4号召开新区活动分子会议，检查和总结四个月来（2月到6月）新区的群运。到有济宁、嘉祥、巨野、东平、南旺、汶上、特区^①、郟城、郟北、临泽、郟巨、张秋等15个县的县书、县联合会主任和县妇会主任等50余人。会议历时20天，于23号结束。根据不完全的统计，具体成绩为：在全分区新区4120余村内（寿张、张秋不在内），已发动起的或初步发动起的有2775个村，在177.2万余人口中组织群众86638人（包括青年、农会、妇女等各种组织）。四个月来共斗争次数4997次，斗争对象1613个。而在运动中创造的经验也相当丰富，特将主要几点介绍出来，供大家研究。

一、集中党政军民的力量参加群众运动，这一点是比之过去有了极大的进步，并且也有很大的收获。首先是政权参加群运，是过去没能解决的问题。过去我们认为政权不能参加群众运动，〔否则〕会失掉“三三制”民主政权的立场，没办法进行统战。这种思想在党委的领导上严重的存在着。特别在反包办代替上，更是严重限制了政权，只怕政权干部下去后要犯包办主义，因而就不敢使用

*本文原载于《冀鲁豫日报》第688期（1946年7月5日）第1版。

①系指昆山实验区。

政权的力量。但从这次政权参加群运中，证明它对群众运动的开展起了极大的作用。因为新区的特点是：虽然敌伪的上层政权不存在，但在下层，敌伪的残余还在压制着群众，使群众不敢动。民主政权在群众中威力极大，对压在群众身上的残余伪势力，应予以坚决的镇压打击。像群众怕汉奸，我们就打击汉奸，罪大恶极的就枪毙了。群众有顾虑，县长就出头讲话，表明政府的态度。群众要武装，我们就给他枪支。这样，政权具体为群众撑腰，就大大增加了群众翻身的勇气，推动新区群运迅速的发展。事实证明，政权参加群运，不但没有妨碍统战或失掉立场，而且在群众中的威信更加提高，民主政权更加受到新区广大群众的拥护。这里必须说明，政权为群众撑腰需要看群众的要求。如果群众不敢动，需要我们政权撑腰，那么，我们就大胆撑；假如群众动起来，就不要再像初期那样撑，否则就要包办代替，这时我们需要进一步的去建立民主的村政权，永远维护群众利益。

在军队方面，过去我们认为军队不能参加群运，因怕妨碍整军。在这次群运中，不少军队在极不安定的新区进行剿匪、镇压奸细，给群运以极大的支援。特别是汶上大队，更创造了直接参加群运的榜样。部队参加群运有这样几种作用：（1）军队本身对特务、坏分子是个镇压，在运动中临时为群众撑腰。汶上大队的战士对群众说：“您干吧！不要紧，有俺呢！”（2）发动群众对部队本身是个很大的阶级教育，也是保持人民军队本质的实际教育。汶上大队在参加斗争中，指导员就说：“这就是上政治课。”汶上大队在群众运动中提高了战士的觉悟，改善了军民关系，发扬了人民军队的本质。

二、使用上层优势为群众撑腰，与深入群众，启发教育，提高群众自觉相结合。几年来，我们为反包办代替所束缚，不敢使用上层政权及军队力量，以扫除群众头上的障碍，只是深入下层，进行点滴教育，而没有上层的撑腰，一切依靠着群众的觉悟，结果造成了许多困难。在这次运动中，两种方式结合起来了，使得运动得以

飞快的发展。

三、解“疙瘩”的经验。当群众不动的时候，必须认识“疙瘩”在哪里。由于过去新解放区发动群众曾失掉了时机，使运动走了弯路，形成新区的“疙瘩”，阶级情况起了变化，而给了统治势力以预备和对我群运作进攻布置的机会。他们散布变天思想，把我们的某些毛病扩大化起来，使群众对我们不敢接近。另外在组织上也准备了一套假农会，对群众进行收买。另外，特务武装勾结顽固地主，对我们农会积极分子进行暗杀。这些东西使我们增加了许多困难。但我们对这些情况认识不足，结果碰了壁。在这方面，我们的具体经验是：（1）进行有组织的宣传，从群众思想上解除对我党的误解，特别使用政权力量起作用更大。在巨野，县长曾到处开会宣传，表示态度。另外还需要了解群众情况，群众需要啥就给他啥，从深入群众里来解除群众的思想顾虑。（2）反收买。收买现象在新区极为普遍。由于地主的欺骗、造谣、制造变天思想和群众对我政府的误解，竟使中农以上的阶层感到和地主有同样的被斗危险。谣言是：“有两亩地的都脱不了挨斗……”因此，我们必须进行揭发，以使主谋者孤立和遭到打击，使群众觉悟，争取教育广大群众。（3）掌握武装问题。过去的会门在下层保持着很多的枪支，这是地主阶级用来镇压农民的武装，以致使群众不敢起来，但□枪转到群众手里，就会使群众很快的起来。领导上应当有魄力的抓紧群众要求及时登记，把枪支转入基本群众手里。在巨野作的就很好。（4）假农会问题。主要是地主结合残余的顽伪势力，用来欺骗群众对付我们的，它使我们在组织广大群众上受到很大限制。过去我们认为农会是自己的组织，谁说农会坏就不高兴，但却不去检查农会是否有毛病。根据这一段的经验，必须经常深入的检查我们的组织，从整理清洗中加以改造，打破地主的蒙蔽，使广大群众得以提高。

冀鲁豫行署

关于妇女参政问题的指示

(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二日)

各专员、县长、市长：

我区过去妇女工作由于整个群众运动未有普遍深入的开展，一般妇女觉悟程度亦未随之提高，在政治上的要求亦不明显，因而在她们参政问题上也没引起我们应有的注意。除行署有个别妇女同志被选为行政委员参预领导外，对有计划培养与吸收妇女同志参加政府工作，就目前实际情况而言，我区6个专署，3个市，71个县，500多个区，其中之妇女干部则寥若晨星（不占1%）。即有少数妇女同志，也只作些带有技术性的，如文印、收发、会计、出纳等工作，担任比较负责工作者则从来未有。这是如何一个严重问题！我们也知道妇女是遭受双重压迫者，受痛苦最深，在社会上最没地位的，她们须要解放，男女应该平等，但在人民政府组织成份上，对吸收拥有人口1/2的妇女参加，则熟视无睹，认为妇女的事情麻烦而多狭隘、不好团结等等。由于认识上的片面性，所以对妇女参政问题变为抽象的教条接受而不能见诸具体行动，从领导思想上检查是存在这种偏向的。

妇女是有参政要求的，特别是广大群众已经发动以后，这说明客观条件已经具备。同时，形势的发展叫我们这样去作，不允许再继续保守与关门。特提出如下意见，供参考：

1、妇女同志到政府来，应该采取积极欢迎态度并须分配以适当工作，并不得降级使用。

2、对妇女干部要求不应过高。她们刚到政府工作，还不熟悉，

我们必须帮助其逐渐进步（这与我们转到其他系统工作是一样的）。

3、对孕妇及自养小孩之妇女同志尤须特别照顾，在工作时间上不能要求过高，更不得因她们工作效率低、事情多而表示不满与鄙视。

4、由军党民武学校各系统转到政府工作之妇女同志，在等级上应予以照顾，不得降级待遇与使用。

5、各级负责同志及民政部门应经常有计划的吸收与培养妇女干部，并逐渐提高其能力与地位，使妇女参政问题名符其实的见诸实现。

主任 段君毅

副主任 贾心斋

鱼台一月来清诉运动总结*

(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四——二十六日)

《冀鲁豫日报》编者按：鱼台群运在报纸上报导了不少，但只是部分的报导，它的工作环境，它的整个工作过程，它的领导上的措置，它的全部经验，恐难系统的了解。今特将其月来的群众运动总结报导出来，以供参考。当然这免不了与过去的报导有重复之处，这里为比较全面的报导，不能顾忌了。

(一) 运动的概况与今后方针

鱼台县群众运动开始较早。在2月初下手组织力量百余人，以西部新区为重点，进行雇佃贫独立运动。全县9个区，4个整区（西部）为新区，东部老区有4个区，1/2以上的村庄没有工作，1/2村庄经过去年春季的初步发动，1个区有1/3的较好村会，一半村庄也没工作。以上初步发动的在秋冬两季扩兵运动后活动消沉，今年2月开始转为贯彻发动群众为中心任务，经三个月的（2、3、4）雇佃贫运动，到5月的反奸诉苦运动才轰开局面。

1、在三个月的雇佃运动基础上走向反奸清算的新道路

三个月来对群众，尤其是对雇佃贫进行了大力的翻身教育，法令宣传。村民会说明来意，区村干会、全区群众大会结合庆祝和

*本文原载于《冀鲁豫日报》第706、707、708期（1946年7月24、25、26日）。

平，讲党的发动群众的主张，宣布政府法令（减租、增资……），号召穷弟兄要翻身。继续召开全区雇佃贫大会，启发阶级教育，倒苦水，鼓动行动，并加以组织。这样明确了我们的主张，扩大了影响，减除了群众的一些怀疑。同时组织上，各区建立了区的雇佃组织，如谷亭、旧城、武台、老寨等都有区雇佃委员会的领导组织。李阁区没有，也建立了村的雇佃会或小组。有些村进行了减租减息增资的斗争，并得到了不少的果实。

下表是7个区的统计（缺罗屯、旧城）：

7个区减租减息增资斗争所得果实统计（缺罗屯、旧城）

	粮	款	地	布	其他
增资	113940斤	10800元	22亩	5270尺	
减租	55170斤		271亩		
减息	11740斤		10亩		
其他	75200斤	13000元	514亩		
合计	256050斤	23800元	817亩	5270尺	

以上果实统计仅系大数目，零碎项目未统计在内。

从这些行动中发动和锻炼了一部分积极分子，树立了骨干领导。

群众思想有了变化。群众说：“增资法令很好，都是实话。”“反正要跟老根据地里一个法。”地主说：“看样要搭把。”有的高了兴，有的害了怕，而多数对我们观望。

但发动的人很少，雇佃贫组织孤立，雇佃开会有的不敢从街上走。这因为“农会是孬种会”蒙蔽着群众，邪气当道；我们又是叫一部分群众起来（雇佃），不敢大胆起来，叫大部分群众等待（广大的贫、中、富农）。

在干部中经过多次的动员，当时对雇佃运动尤其树立雇佃骨干

领导有明确认识，对个人享乐思想及不深入工作作了最大的检查与批评。同时干部已组织到群众中去，下了力气还是搞不起热烈的运动来，这使干部以至县委在领导上不得不怀疑到方向问题（雇佣运动），不适合新区广大群众的要求。3月15日分书联席会议曾企图变动方向，“从群众要求出发，先搞民主开路”，打几个小仗鼓动情绪，但又想到“雇佣贫方向是正确的”，束缚了自己而未敢动。

因此雇佣运动时期，干部的努力，若干是有成绩的。三个月的辛苦血汗不能抹掉，给今后反奸诉苦打下了基础。未能掀起广大群众的热烈的运动，是领导上的圈子把群众套住了，走了一段弯路。痛苦的教训：必须“从当时当地群众最迫切要求出发”，而提出了反奸诉苦、清算复仇的新道路。

2. 走反奸清算的路子，迅速造成狂风暴雨、排山倒海的群众运动

响亮提出：“有冤伸冤，有仇的报仇，欠债的还钱，杀人偿命。”干部说：“以前多局促的慌，这可出开身了。”群众说：“您早做啥来？才想起来！”我们各村动员组织新力量，南北调兵遣将，开大会。县委提出：“向封建堡垒大进军！”局面顿然一新，由苦闷到喜悦，由急躁到兴奋，由低到高，由小到大。全县代表会对汉奸恶霸缪慕海（外号缪麻子）的说理斗争，伸张了正气，以理服人，人人服气。谷亭区3000余人锣鼓喧天、旗伞高举的游行，更鼓舞了群众。在罗屯区反伪区长张清泉的联合斗争上，人人诉苦、伸冤，政府接受群众要求判以死刑。更组织了鱼、金、丰边的1.5万人向死汉奸李怀扬的翻身复仇大会，诉苦清算，□□、□□、拉碑，大快人心；继而大大小小的，乡的、联乡的，一村、联村的反奸斗争展开了。紧张行动的20天，上午大斗争，下午各庄小斗争，群众说：“头麦的活不忙，先紧这些事吧！”普遍掀起了反奸斗争、清算热潮。同时结合了一部分减息、增资、倒租的斗争，一连

串的雷雨交加的斗争，运动起来了。

20天参加和卷入斗争的群众约8万多人。旧城、武台、合集3个区的斗争次数的统计：

反奸	反恶霸	反贪污	增资	减租	减息	合计
103	55	10	1	14	41	272弱

以上3个区斗争对象成份的统计：

地主	富农	中农	贫农	合计
117	101	67	11	296(个)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战犯的惩办已大体结束，并大批的进行了清算、反恶霸等斗争，解决了更多的问题，发动了更多的群众。群众得到了大批的果实（雇佣时期包括在内）：

粮	款	地	屋	布	油坊	大车	枪	酒馆
2920915斤	271083元	7927亩	338间	16918尺	6个	11辆	24支	1个

在斗争中群众组织起来。（接下页全县会员统计表。——编者）

依上表（见下页。——编者）可以看出：据李阁、城关、武台、罗屯、旧城5个区共有自然村585个，已组织570个，已组织村占自然村97%，全人口162151，已组织的35843，占全人口22%。

斗争中群众思想提高了。开始群众对我们及农会的印象是：“八路军啥都好，就是斗争会不怎样。”“您哥哥啥都好，当紧别成斗争会！”（贫苦抗属老大娘说）有一个老头对他儿说：“我杀了你，也不能叫你在会。”一个老大娘说：“我不跟人，也不在这个农会。”加上地主用盖房子，送粮食，软、硬、明、暗的破坏，群众怕“变天”。一个会长领人家斗了争，自己却没增资。

经过斗争后，群众说：“一镔动土，百镔也是埋，干就干了吧！”普遍的反映：“翻身是亏了共产党！”群众从依靠地主吃饭，

全县协会会员统计表

项目	数	区 别										合计
		李 阔	临 湖	城 关	合 集	武 台	罗 屯	老 寨	旧 城	谷 亭		
工	57	58	141	43	168	191	25	196	432	890		
农	1717	1418	1845	1215	2288	2185	425	1640	3517	16177		
青	370	57			37	10	157	20	115	829		
妇	291	627	1073	217	1042	573	497	349	1965	6782		
儿	892	774	1195	350	1140	1044	643	666	1489	8253		
姊	43	95	86	74	198	260	120	89		740		
民兵	16	62	42	250	147	110	152	102	301	1253		
总计	3426	3019	4380	2122	5004	4373	2073	2955	8491	35843		
全人口	19087	13486	17049	14818	25008	35130	12271	25639	26000	162151		
百分比	18%		24%		20%	13%	17%	12%	32%	21.3%		

到靠不住；从对我怀疑，到坚决依靠我们。经济上得到了利益，组织上联合起来，提高了阶级觉悟。农会影响扩大了，政府威信提高了，共产党的政治影响普遍的印在广大群众的心中。

3、根据月来运动的概况，全县今后总的工作方针

不能不继续贯彻减租、减息与开展反恶霸、反贪污、反“黑地”的群众运动。迅速解决土地问题，深入（分村斗争解决问题）、全面（青、妇、儿、姊、民兵）的发动与组织群众全人口的60%，并在运动中大批训练提拔干部（村干），树立领导。

（二）怎样搞开局面、掀起斗争？

1、意志集中、力量集中

这对群众运动的开展是个先决条件。党政军民武的干部到群运工作组去，不是站在群运之外看群运，一致的意志是怎样才能把群众迅速充分的发动起来。定期离职，县委为各部门干部撑腰，不负原工作责任，丢掉一些工作在所不惜。县委委员、县长、武委会主任、区长大都直接担任工作组长，亲身领导。尤其政府干部大胆撑腰的工作做的好（有个别区仍很差），逢会讲话，镇压坏分子活动，解除疑虑，加之群众干部的深入动员教育。

抓紧组织新力量及决心抽调一切可能调出的干部，在“帮助新区穷弟兄翻身”的口号下，号召三个月的大进军。

全县组织参加群运的力量，原有脱离生产的老力量和新动员出来的（村干）新力量共573人，全县分布了68个工作小组。

这样布满全县各区的工作组，相距3里至5里，声势很大，对邪气、坏分子是个镇压。

在领导上，加强分区委领导。在全区作群运的干部中，选择强

有力的干部重新组织分区委，原有较弱的可任副职。不管地委、县委或各部门下去的干部，都由分委领导。这样可以迅速把工作搞起来，对原有分委同志是个学习与锻炼，不是包办代替了领导，正是领导者示范。

2、大力为群众撑腰，镇压邪气

首先是办悔过所，全县设9个，每区1个，把伪组织的区长、办公处主任、保管委员会委员、乡长、保长、伪人员，伪军中班长以上的队长、营长、连长、小队长及阻碍群运的流氓、街滑子、个别坏地主、土匪等，全部拘捕进悔过所，使其反省悔过。据临湖、武台、合集、老寨、谷亭5个区的统计，共逮捕伪军伪组织人员及阻碍群运的坏分子364人。宣布不准保，说明是替他“净身子”、“揭疮疤”，只要真正痛改前非，就可交群众悔过清算处理。向群众说明，是穷人翻身的日子到了！这些“三朝元老”对群众威胁很大，于是群众反映：“充人的不充啦，我想这些人不能算完呢，要不都当汉奸啦，该清清底了！该咱出头的日子了……。”这是我们替群众“掀石头”。群众起来，分别不同的对象，一般轻的悔过释放，有清算斗争褫夺公民权的。进行诉苦反奸要给群众以权利。惩办了战犯，管制了他们，有些回去守法表现尚好，再三要求入会。

其次在悔过〔者〕入悔过所时，群众不了解为什么这样。抓住这个要求召开各种会议展开宣传，说明是惩办战犯，受屈的要诉苦清算，结合追悼“四八”烈士进行反“变天”思想教育。各村村民会开了一遍，有的用花鼓、竹马、高跷队、锣鼓大声大气的普遍宣传。有的区在“五四”完小学生竞赛会上发动学生去新区宣传。更召开各区雇佣大会，教育鼓动农民大联合，天下穷人是一家，“翻身靠大家”，转变农会是“弄种会”的错误认识（特别是新区），推动已有的佃雇组织成为反奸清算的骨干，使继续查减与有组织的串通。

因此，~~群众~~抬头，扬眉吐气了，地主坏蛋销声匿迹了，谣言少

了，镇压了邪气，铺平了充分发动群众的道路。

3、放下圈子，没“把死鹤鹑”

放下圈子，群众要求啥就干啥，也不限制于反奸清算，反恶霸、反贪污、减息等，都结合着搞，因此20天的斗争很复杂（见斗争统计）。在斗争的领导上，群众自己作的很漂亮。我们也没一套调查研究与计划去支配群众，一切是“走着瞧”，在运动中掌握，在运动中领导，于是运动的局面很快的打开。干部兴高采烈的说：“投准簧啦，这会〔儿〕可敲准麻骨啦！”群众反映说：“早这法，早制完啦。”我们的圈子万万要不得，运动的进展与提高，在于不断的发现、抓住群众迫切要求，不断的解决群众要求。

4、私仇公愤结合成联合斗争

反奸清算以至反恶霸等往往不是一村的问题，敌伪势力及封建统治的压榨剥削是复杂的、成片的，特别是新区痛苦是一致的。采用联合斗争，把每人的私仇与一致遭难的公愤结合起来，各村则易于互相影响、互相带头，为广大群众所同情，打破一村孤立沉寂的局面。而且轰动局面、鼓动情绪最有力，规模越大越热闹越快越好，这样就不怕局面乱了。轰轰烈烈的大行动确实是乱，很难和我们想象的那样有秩序，但这种乱是对旧社会秩序的革命行动。“只有把水趟混，鱼才能露出脊梁骨来。”只有在大行动中才能发现各种问题、积极分子与领袖村，而且这种积极分子与领袖村是看斗哪个与哪一片的关系来确定，不是死的，领导上不能死啃自己确定的一套（当然深入工作中对一定有意义的领袖村、中心村的建设也不能忽视）。只有这样，才更快更普遍更热烈。斗争李怀扬是李阁区的李阁、路屯、李楼，而斗争缪慕海则是谷亭区，其他一个乡或联村斗争都是这样。

联合斗争中，“打虎先打头，打头先打牙”。因而斗了缪慕海以后，群众反映：“他顶缪麻子口啦。”于是斗争展开了。

大行动中也能适当解决土地问题，也是重点带起一般的办法。领导上要更好的划分范围，充分使用我之上层优势。我们态度要明确，必要时一定干部出头亲身领导掌握。干部是群众的一员，参加公开主席团领导不是包办，正是更好的在群运中掌握提高。同时由于易于出岔子发展宗派斗争，更须要领导上及时教育与纠正。

5、领导对干部放手，干部对群众放手，大胆使用各种积极分子

放下圈子后，还必须给干部以不怕犯错误的勇气。“只要工作搞起来，犯了错误不要你负责。只有工作搞不起来，才是天大的错误。我们不愿犯错误，同时我们也不要怕犯错误。”县委这样给干部卸下了“金箍帽”（这是雇佃运动时给干部戴上的，现在必须拿下来）。还要教育干部不怕群众行动违犯政策，放手让群众搞，切忌我们干部的支配及约束。群众行动起来，过火是免不了的，错了以后再教育。实际运动中对中农没大削弱，有些中农成份的伪人员经济上削弱很轻。对地主只要留够生活的，群众要求多削弱一点也是可以的。斗争中有些打的厉害，但群众都说：“应该！不屈！”不如此不足以使群众伸冤复仇（其中有个别流氓或顽皮的儿童一呼百应的打，是不好的，应加以区别）。农会安办公室，设儿童团部，模范班集体住（一时为着看押需要），斗争胜利打枪、镇场，都是群众翻身的行动，不应过多批评泼冷水，以后在逐渐教育中自然会走上有组织有秩序的行动。

对积极分子使用是各方面的，从各方面用人，“人尽其才”。有看押的，喊人的，呼口号的，形形色色都组织到斗争中来；有要求倒租的、清算的、减息的、追赃的，受欺压的，或死人偿命的。有些看不顺眼的流氓在一定斗争中也有作用，往往他是开路先锋，在前面行动打开局面。被难的苦主是最好的积极分子，是斗争中的主角，只要发现有点积极要求，就大胆使用，对斗争终是有利的，

且可带起更多的斗争来。

(三) 几个问题的体验

1. 联合斗争与隔村斗争

反奸诉苦的大行动中，由于敌伪及封建统治势力的压榨剥削，统治的复杂，不限本村、本区，联合斗争成为反奸运动中的突出特点，但也不同于无经济内容及抢夺果实带侵略性的隔村斗争。飞斗，会影响起村与村的宗派矛盾，对发动被斗村群众有害无益。但这不是如何制止的问题，过去单纯制止无出路，而是从教育中掌握，说服“穷人是一家”，“翻身靠大家”。对本村说明外村帮助是应该的，不应怕外村分果实；而在外村参加本村斗争时，有的因为本村操纵地主斗争对象，“只承认本村意见，不承认外村意见”，一时竟无意中受地主利用。而另外，对外村应教育群众不应单纯想果实，“不叫人家独吞而想自己独吞”，应联合翻身。一般的一切斗争以本村为主，外村有意见去参加，先进村去轰动，本村不应拒绝；外村也不应抢斗，且外村如是个别人意见，可以调处解决。果实处理应以本村为主，对外村是赔偿、减租、减息，按法令执行。本村亦不能独霸果实，外村也不应提出无理要求。其主要问题还是从双方进行翻身思想教育，克服“单为钱来”的想法。

至于“料[撂]炮”问题，是在运动掀起时地主早走一步，用威胁或收买办法严密掌握，我们攻不进去，甚而工作组住下亦搞不出问题来，这时可用先进村力量来一个进攻，就是“料[撂]炮”，来一“启蒙作用”惊醒他。“翻身炮打到门口来啦！跟着干吧！”但要很好掌握，不然会“一炮炸闷”。要一定是公认难开的堡垒村；内容要真实，有直接经济内容；算帐、追赃、讲理的方式，亦能使本村农会真是讲理会；应是“杀人偿命，欠帐还钱”，免使本村见资财外流而红眼。不挖稀泥，打击被斗村的堡垒对象，这种方式是工作初步阶段采用的方式及最后手段。这在旧城区的王庙对小

乡，张集对高升店，“料”[撂]了一炮，即震起了张庄及裴店。

2、放下两个圈子，在运动中掌握

不怕流氓分子在农会，不怕流氓分子爬上领导，就怕我们不加强教育，不掌握。

这要首先区别流氓分子与一般带流氓习气的基本群众不同（尤其集镇上）。流氓分子不生产，不务正业，流荡滑皮，没立场，唯利是图，反复无常，要认识这些特点并掌握住他。大胆干，敢作，敢为，对旧势力无顾忌，在一定斗争中用他冲开局面带起多数群众是有利的。当然不要走流氓路线，可以为群众办事情，所以大运动到他们参加农会，甚而爬上领导地位是不可免的；但不掌握，继续下去又会毛病百出，吃喝充人，黑斗争，私罚款等（如郑庄刘玉湘等）。我们及时掌握，在群众面前不“封”（表扬）他，而背后多作诚恳切实的个别教育。特别斗争中采用主席团集体领导，不叫他在主要领导地位。进行民主翻身教育，则应该更好的掌握。

其次一般带流氓习气的基本群众，要大胆吸取，争取团结改造他，自己受过痛苦压迫，觉悟好，不能拿纯农民□□的框子去看。

重要的是群众要不要他。群众要他，群众叫他出头，是群众的力量；在他不好时，群众可以监视，以至罢免。

不怕是真农会、假农会，就怕工作不深入，不警惕。

在群众大运动中，大部分村庄在情绪高涨时而组织起来，自动进行斗争。但有些地主操纵群众成立假农会，以避免外村斗争。我们不怕假，只要成立，一律承认，可以抓住这一组织进行教育。一般的假的是村干，会员不可能都是假的。只要会员是基本群众，就具有阶级觉悟的程度，与地主统治有矛盾，我们深入工作，掀起反假农会斗争，结果就“弄假成真”了。或外村发觉假农会假斗争，一套假货，就扣押假会长悔过反省，向群众认错，揭破面目教育广大群众，改造成真农会。这样不管真假，终是“有”比“无”强，可以通过它去接近群众。但怕的是干部工作不深入，不警惕。

3、组织群众大多数

在热烈的运动火口，行动与组织应密切结合，抓紧时机号召动员参加农会，充分组织群众大多数。有以下几个不同的组织方法：

新区经雇佃贫运动稍有农会基础的村庄，通过农会教育组织苦主“喊冤诉苦到农会去”，农会很好的办。同时对多数没发动起来的群众，要开会教育，不要认为落后不管他。对“我死不在农会”，图清闲、少开会的思想，应从教育中解决，说明眼前大局，破谣言，打通思想。最好有会员入会前后的思想变化反省材料更有力，必要时要多开两次。另外，对汉奸大烟鬼等滑子皮也单独开会进行教育，争取同情，防止破坏，使全村群众思想亮堂起来。旧城农会就这样发展了10倍（212人）。这种分摊开会的方式，会员先进思想对落后思想的影响有些割裂，带头不密切，作不好也会有强迫的作用。

新区经过几次教育及斗争，少数积极分子不大胆，地主的封锁严，统治深，邪气还是优势。“减租、减息、增资啥都中，就是不在农会。”群众动摇观望。我们应大声疾呼的在斗争胜利后，响亮喊开：“农会是好人会，伸冤复仇会！”“翻身要在会！”召开大会大力宣传农会是干啥的，什么人能参加，破除疑虑，压倒“农会是弄种会”的邪气，为积极分子撑腰壮胆，坚定多数群众。号召报名在会，当场评定成立农会，并且会长要求“亮兵”，打锣鼓、旗伞。（××庄农会，到附近各村游行，以示农会成立，扩大影响，刺激附近村。魏堂小组是这样打开的局面。）

半老区有农会基础，又经过这次斗争的胜利影响，群众要求组织。可推动原有农会召集全村会员及非会员全体大会，分拨坐开，会长动员：“伸冤报仇翻身靠的谁！共产党的领导，民主政府给撑腰，要紧的还是俺团体在会的心齐。”号召：“大伙联合在农会。”能在大会上报名踊跃参加，农会里看够条件的鼓掌欢迎；剩下没在会的，会长还要勉励，今后跟着农会干。在武台区的于屯小

组，这样发展的很快。

老区农会有基础，斗争很好，但组织不大，怕变大，怕麻烦，果实没分等顾虑及不满，要从思想上解决，在老会员中动员典型的入会前后心理变化的反省示范，在村民大会上报告，影响教育非会员。明确老会员的思想，进行阶级教育，转变了情绪，争先报名参加。谷亭区的老村会采用发动思想自觉提高觉悟的路线，很彻底很有效。

以上层力量的动员号召，农会自己扩大及思想反省提高群众的方法，都必须结合会前的个别教育，分别动员，还可用“兵扩兵”村干比赛等多种方式组织群众。

在大行动中必须发动全面组织的方式，才不失时机。农会起来还要带起青、妇、儿、姊的工作，农会的动员：“翻身必全家，在会必全家”的口号。不过在全面组织群众中，还要抓住武装要求，适时的组织武装民兵，巩固胜利的保卫果实(斗争果实问题略去)。

4、在运动中把群众行动提高一步

一切问题要从多数群众出发，从农会出发，不单从少数积极分子出发，不单从儿童团出发。这样能更掌握多数群众的心情及要求，更严肃阶级斗争的场面，不跟随个别积极分子脱离多数群众的要求而起伏，坚决领导大多数。

群众行动由被动到主动，由散漫到有组织有秩序，从无纪律到有纪律，我们应掌握提高到群众自己有组织的行动上来。

干部是群众的一员，为了斗争胜利的必要，可以公开参加，直接出头协助领导，特别是庞大的联合斗争，不应犹豫而坐视群众情绪冷下去或起不来。因为这不是包办代替群众行动，而是对群众的领导义务、壮胆及撑腰，而主要又依靠干部的政治鼓励。

大会上的一呼百应带有很大的冒险性，“挨两下好不好？”“好！”“脱光脊梁好不好？”“好！”“罚15石好不好？”“好！”这不是广大农民喜爱的斗争形式，很容易松懈斗争的场

面，而提出罚数多不稳当。因为这多是个别流氓分子或顽皮的儿童团先锋主义的活动，而应该事前酝酿，大会才好掌握，或在斗争中斗争后拉开小组活动，唧咕唧咕，终比大会上一呼百应的贸然行动更美满。

每次行动事前有布置，当中有领导（开起会来干部不要一边溜），事后有检讨的教育，实际上是发扬建立农会内部的民主生活。我们也要抓紧斗争罢的机会，进行集体的检讨教育（鼓动斗争）。

呼口号不要千篇一律、凑火口，不乱喊，不打乱苦主的哭诉，不松散说理的高昂情绪，更鼓□一把兴奋人心。有些群众自发的口号呼的很合时宜。这要教育干部不打先锋，教育流氓好喊口号的看火口，更要组织群众中的积极分子。

整理斗争场面要加强儿童工作，教育儿童的顽皮性。

为提高群众阶级觉悟，走上充分说理，以理服人，如打骂，跪桌子，压拖车，光脊梁，爬地，头顶砖，戴红绿帽子、红胡子等，不要听其自流，也不要大惊小怪。有些行动是群众要求，合乎“罪该”，“理当”的。有些是干部或个别积极分子脱离群众心情的要求，应视为偏向，加以教育掌握与纠正。这次运动中是向正常的说理充分方面走的，但理到痛处打骂是不可免的，而少数斗争中的场面弄成笑话，必须纠正。

群众性的活动安办公室，设团部，模范班集体住，斗争中打枪镇场，见面喊会长、会员，都是翻身的行动表现，但也要防止为个别村干发展新贵道路，集体吃大锅的饭是不合乎多数人要求的，不需要的，应从思想教育提高。

定陶政权干部怎样

参加了群运*

(一九四六年八月三日)

孔百川

未下去前克服几个困难

上级扯腿。在定陶搞雇佃贫运动时，政权干部曾经抽调一批去发动群众，一科长直接兼四区区长，专作这一工作。到今春，由于专署行署开会很多，各科局长都先后去开会，一开十几天，下不去，开会回来都各自强调部门工作。

县级各部门不健全，群众没有发动起来。下层组织更差，大部分区没有公安、行政、教育、财政等助理员，只两三个区有。不开会布置，又怕上级认为不尊重。随后由各部门直接开会，但因区级各部门不健全，完全由区长或副区长来代替，遂使他们也整天忙于上来开会。

干部不愿下去。清诉方针明确后，又决定用全力来发动群众。县委强调政权干部无例外的作群众工作，到群众中去“洗礼”，加强群众观念。县府在活动分子会后，又开会，讨论今后如何作群众工作。司法科长说：“司法案件，是为群众服务，如果处理不好，工作会受损失。我下去使整个工作受到损失，全县工作总是比一个区的工作重要。”这意见是留恋于工作职位舍不得。工商局长接着说：“下去不兼自己工作，没法办！配合改造集市，来完成新经济封锁，光单个下去不中。”公安局长发言：“我知道不把群众发

*本文原载于《冀鲁豫日报》第714期(1946年8月3日)第1版。

动起来，啥都作不成。我到行署开会回来，才强调公安工作的特殊性与重要性，将干部抽出，以作部门工作为主。”这是把部门工作不能服从中心工作。秘书接着谈：“咱下去是扶植群运，就是帮助的味道，下去几天又回来，实际未下到运动中去，光听听汇报，起到看一看检查工作的作用。群众知道咱是某某科长、局长，不接近咱，真苦恼！”用这种钦差大臣的工作办法，就是会苦恼啊！一科长兼区长说：“我深入工作三个月，最多不过20天在村里，亦只能主持会议，提出意见，在会议上解决干部思想问题。既是领导，不必要下到村里去同联合会干部一样跑工作，那样也不能照顾全面，更不能发挥区长的威力。”这种拉不下架子，怕屈才的思想在作祟，就不能深入工作。

针对着上面的几种思想，曾提出以下问题的研究：

一、政权的根扎在哪里？讨论后一致认为：“应扎在多数群众身上，应站在被压迫者的多数群众立场上。”

二、领导干部亲自动手的精神何在？议论结果：应该是从亲自动手中体会群众心情，考验我们政策、法令、决议、制度等是否正确，是否执行得通，或是应修改。

三、中心工作与部门工作关系问题。讨论的统一意见是：工作须有主要次要之分。部门应服从中心。有抓紧的有放松的。把中心工作搞好才算有成绩。

四、最后并研究出各科局只留一二人，在机关掌握工作，实行集体办公，有事大家商量办，并由秘书负责领导。执行结果，事半功倍，机关经常工作并未削弱。

政权干部参加群运后的主要问题

政权干部在这个时期参加群众运动，有当小组长的，有兼副主任的，有当常委的，总之，无论在各方面都是与联合会干部一样在干工作，没有你政权我抗联之分，只有工作好坏之别了。但在参加之后，能作的好坏，要看对群运工作的出发点与态度的正确怎样而

定。

一种是单纯的从政策考虑出发，不能体贴群众情感。这个问题在马继臣案件中，表现最为突出。马继臣系敌伪顽统治势力中的一个典型人物（见第666期）。当群众将马继臣扣起来与之〔算〕总帐，因怕跑用绳捆破手皮，由群众代表与民兵解县暂时寄押时，公安局某些干部则说：“干部打人，坚决反对！手捆烂，人快死（实际是因大烟瘾上来装死），不收！”（别的干部也不管）“你到城关区去找县长吧！”就这样推出来。后由宋局长来安插收下，但公安局某些干部则仍说不收，“就是该死应怎样，这样如果死到县府如何办？”随即去请医生给斗争对象看病，并给另找一间屋子住，将绳子也松开。这样给黄店区的群众代表与民兵看了，在情绪上是一个很大打击。群众回去一谈，就要来闹政府，干部亦相当恼火，部分群众纷纷要求公安局陪绑。

在12个乡的群众对马所酝酿的恶迹汇集起来，呈请专署批准枪毙时，专署提出些宽大政策与手续问题后，也未批准。

可是在群众诉苦中，5000余群众，异口同声的要求枪毙。公安局长看到群众情绪实难压抑，允许杀，又怕上级批评掌握政策不稳，因此躲到一边不管。区长为了缓和群众情绪，拿了个棍子，在大会上打马继臣几下，企图打几下可缓和群众情绪。谁知群众不但没有理会，却马上有好几百群众围着区长讲理：“区长！你整天说，啥事由群众当家，这会儿不叫群众当家了。告诉你说吧，区长！你不杀马继臣，咱今后就不是一家人了。他杀咱12个人，咱就不兴杀他1个。你把人给俺，上级不同意，哪怕叫俺偿命也中。”区里仍不敢答复，最后群众要将人夺去自己处理，区里迫不得已而答复枪毙了。

这个案件为什么弄到如此下场呢？问题很简单，我们的情感与群众的情感格格不入。我们考虑问题，光从政策法规出发；而群众考虑问题，是从具体罪恶与实际需要出发。其实我们的政策法规是具体的，为人民服务的，问题不是机械死板的。为了完成政治任

务，咱们的政策、法令、制度是可以有所变更，不适合工作发展的需要即应修正。领导上就不愿意这样干，只要公布了法令决议，就百事大吉，不去组织执行。作一个好的领导者，必须要能体贴群众的心情，爱护群众情绪。咱们情感与群众情感结合一致，工作才能搞好，否则很难称为一个好的领导者啊！

一种是主动参加群众运动，实际给群众撑腰。政府在处理案件中，是与群众一家还是两家？是扶助群众情绪还是打击群众情绪？这是最现实最具体的问题。我们这个时期将所有犯人名单、罪恶事实交给群众酝酿，我们参加群众的酝酿，参加各个斗争、诉苦会，帮助群众想办法，领导着群众走向胜利，翻身起来，解决他们的痛苦，最后领导群众起来保卫果实……。这样，我们才是从实际上给群众撑了腰，因此，群众运动普遍开展了。所以，政权干部的参加群运，必须是从群众出发，而不是单从政策出发，是从主动积极参加群众的实际行动，而不是空喊扶助群运才成的。

下去后的收获

才一下去，群众不接近咱，咱苦恼。二科长说：“我下去头一个礼拜，苦闷极了！作这么多年工作，不会接近群众。人家联合会干部一谈，群众都围上去了。咱说给群众不听，后来群众知道咱是作联合会工作，才敢接近。”司法工作的同志，一深入下层，情感变了，知道群众观念是什么了。许多久悬未决的案子，得到解决。这时才体验到马锡五走群众路线的审判方式是中了。这比坐机关、下命令，显然不同。像贾庄的杀人案，不到20天工夫，即完全弄清。如果光高高在上，要区里供给材料，几个月弄不清一个事有的是。公安局长原先苦恼，在马继臣案件中，专署批评掌握政策不稳，县里批评群众观念不强，区里要求公安局陪绑，弄得三方面不落〔好〕，非要求调换工作不可。现在一深入工作，走群众路线可中了，几天即将几个无头案破获。这会儿才认识到过去给群众撑腰太差了。人家杀咱那么容易，那么残酷（眼挖了，耳朵割了，脸上

皮刮了，头用刀破了），咱杀人家那么难，怎中！群众当面说我们：“你不杀，俺不再提意见了。你光宽大，斗争后放了，谁还敢斗？”二科长体会过去提拔干部吃的饭与怕斗争对象跑而打的铐子，上级应报销，制度应服从中心任务，如有妨碍，即应修改。各部门都体验到工作须走群众路线，才能完成任务与将自己提高一步，否则就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官僚主义领导者啊！

晋冀鲁豫中央局为贯彻五四指示 彻底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指示

(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日)

五四指示兴奋了广大群众和干部，数月来创造了许多经验，获得很大成绩。约有1/3地区1000万人口中间实现了耕者有其田，掌握了团结中农，照顾多数，争取90%以上的人同情。但距离全部实现尚远，还需继续努力贯彻五四指示。各地可公开宣传：耕者有其田为我党土地改革的方针，放手让群众自己起来解决土地问题，不要顾虑太多，不要预先怕群众违犯政策。只有把群众首先发动起来，将地主阶级彻底打垮之后，才可以谈照顾地主，过早的提出照顾地主会妨碍群众运动。五四指示批准是主要的，照顾在群运初期不应过分强调，批准与照顾不能平列。目前主要问题仍是如何放手发动，不是过火的问题。有些地区发生自满情绪，认为群众已彻底翻身，土地改革已经差不多，遂即停止土地改革运动，转入生产，更是不妥当的。改革必须彻底。过去群众几起几伏，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因对群运成绩在一定时期估计过高，放松贯彻，结果土地问题未解决，群运消沉。此种教训必须记取，“差不多”思想必须纠正。有些同志尚拘泥于“三分封建七分资本”是削弱封建不是消灭封建，“联合地主抗日”约束在统一战线范围之内等已经不适用了的理论，以致束缚群众手足。有些同志把五四指示批准和照顾平列看待，过分强调照顾，想把群运做的有条不紊，文明而有礼，要纳入正规，亦障碍了群运。须知发动群众一定要把旧秩序打乱，要乱一顿，这是正常现象，不可怕。有些同志因地主豪绅的叫嚣，中间分子的建议和一部分老党员的指责和批评，以致不敢放手实现土地改

革。今后领导群运的干部对这些站在运动以外的叫嚣，可以置之不理，建议和批评则加以解释和教育。有些地区固执先减增，锻炼出骨干后再大干，或只是先反奸，不解决土地问题，限制群运的规模和速度。推进土地改革运动，实际群众可根据其切身要求，采取一揽子斗争方式一气呵成，从反奸清算退租息等一直实现耕者有其田。有些地区对新区发动群众所下资本（干部）仍嫌不足。至于在自卫战争紧张区域，须将参军参战任务作为临时中心，但仍应抓紧一切空隙进行群运。只有实现耕者有其田，发动农民大多数，才能支持长期战争。

新区群运在大发展阶段后，要普遍进行翻身大检查，实行填平补齐运动，坚决贯彻五四指示，全党支持群众运动，争取于今冬明春在全区彻底实现耕者有其田。

执行五四指示后，各地发现下列一些问题，须适当加以解决。

（一）有些地区地主土地已大部清算完毕，土地已大部从地主手中转入农民手中，但得到土地的仅占应分得土地的农民中的少数或半数，多数或半数未得到或得到很少土地，干部、积极分子、民兵多于普通农民，大佃户多于赤贫户。为了补救这一缺陷，可实行一次填平补齐运动，依照贫苦程度，人口多寡，实行填平补齐。在检查中，重新由地主手中清算和斗争出来的土地，分配给未得到或得到很少土地的人，没地分地，没房分房，地少补地，房少补房，经过群众的民主评议，分配务要普及全面。如果群众认为干部、积极分子、民兵拿的太多，不满意时，则应动员说服他们自动拿出一部分来还给群众，以免转向他们斗争。但切记不可清算和斗争干部、积极分子和民兵，不要重复过去反“新贵”的错误。有些地区群众将其斗争果实的一大部分拥护了政府部队机关（有的占其果实的15%），实际群众很不满意，应即退还，并在以后斗争中禁止此种现象发生。

（二）富农自耕部分，系指富农自己亲自动手劳动耕作部分，并包括雇工经营部分在内，土地改革后，应予保留。在清算斗争

中，除消灭其封建部分外，对其雇工经营部分亦难免削弱一些，但不可过重打击，应鼓励其以后发展；过去已经削弱的不再追究，应予批准。一般应教育干部和群众保留其自耕部分，保留其工商业部分。

（三）经营地主问题。如果经营地主在政治上实际起封建统治作用，而且作恶多端者，则应按对付恶霸办法予以清算，推翻其封建统治，清算其封建剥削。这样做一定要削弱其经济，甚至消灭其雇工经营部分的土地，但只要得到多数人的同情，则不可怕。对一般的经营地主则应进行增资清算，其所保留的土地，不能少于中小地主所保留者，须与封建地主有所区别。

（四）给地主保留必须〔需〕生活问题。有的地区在清算后给地主留得土地过多，且质量亦好；有的地区对应当照顾的地主未加照顾。为了实现耕者有其田，并适当照顾地主在土地改革后必须〔需〕的生活，以缓和地主逃亡，分化地主内部，并顺利实现耕者有其田起见，对各种不同的地主，应大体划定保留土地的标准。我区大体可作如下规定：

中小地主在清算后，每人所保留之土地以等于中农每人之2倍左右为宜（如中农每人3亩，他则每人5亩到6亩9分）。革命军人和干部家属如系地主，每人所保留之土地以等于中农每人之2倍半到3倍为宜。鳏寡孤独无劳动力之地主，每人所保留之土地亦以等于中农每人之2倍半到3倍为宜。大汉奸土地财产应予没收，大地主予以彻底清算，但应给其家属留下维持生活所必须〔需〕之土地。以上地主所保留土地数量，如因土地不敷分配，可依当地具体情况酌量减低。

（五）献田问题。不要把献田运动代替了群众自己解决土地问题的运动，这易形成强迫献田，恩赐群众，模糊群众的阶级意识，易形成地主假开明，投机取巧，换取政治地位和信任。恶霸地主尚未清算时，更不应用献田了事。改革土地问题的主要方法是群众自己起来进行清算反奸退租退息等。献田运动只应鼓励觉悟的共产党

员和干部劝说其地主家庭进行，以加强党和人民的联系。献田还可以在群众已经发动起来，土地问题已经大体解决，只剩一些尾巴的地区进行。比如老区抗日干部家属、开明士绅等的土地如未清算，可用献田办法解决之，既保持了这些人的面子，又可解决土地问题。

（六）对反正与俘虏参加我军人员的政策。此事关系发动群众和巩固部队，必须谨慎处理。凡这些人员，若确有危害群众行为者，部队不得袒护，应让群众斗争，但应说服群众采取将功折罪，从轻处理的政策。在群众中影响坏，在部队中影响亦坏者，部队应开除军籍，送交当地群众处理；在群众中影响不好，在部队中很好者，可由部队指出其过去违犯群众利益的不对，教育说服使其自动坦白，承认错误，送交地方处理，地方则将其参加我军后表现好的情形向群众介绍，把事情弄清，从轻处理。

（七）改革土地中，某些地区表现富村与贫村之间有矛盾：富村土地多，贫村不敷分配，贫村群众欲到富村斗争，富村群众则加拒绝。解决这一矛盾可试行将贫富村合编为一个行政村，经过群众共同协议，共同斗争，共同分配果实（如冀鲁豫）；或在干部和群众中经过民主讨论，富村自动赠送一部分土地给贫村（武安）。这一问题相当复杂，应多加研究，创造经验，寻找更多办法解决。

（八）边沿区发动群众，重点应放在武装斗争上，开展群众游击战争，建立联村联防，解决汉奸地主的反动武装，保卫人民利益，反对反动地主还乡团及抢粮抓丁，建立反奸反特统一战线，集中力量向罪大恶极而为人民所痛恨的汉奸特务恶霸作斗争。对一般地主只进行反贪污反讹诈及减租减息发动群众，不实行耕者有其田，以免在游击战争和拉锯式斗争过程中，造成赤白对立。在顽化区及接顽区，研究进行合法斗争，保护群众利益。

（九）天主教堂及其神甫等为帝国主义侵掠中国的工具，且多兼做特务，抗战中又多帮助日寇，罪恶昭彰，对教民剥削更残酷，应发动教民和被害群众进行清算斗争，策略上不涉及教务及教民信仰。应特别抓住外国神甫洋奴走狗的战争罪行及奸淫妇女、霸占人民

财产等罪恶，给以彻底清算，赔偿群众损失。犯罪的外国人经过法律手续驱逐出境，洋奴走狗依法处理。教堂土地经过教民同意予以分配，教堂医院、学校、育婴堂等准予保存并准予传教，但必须服从民主政府政令。

(十)中央指出，党对工商业是发展方针，不能采取消灭办法，但新区工厂、商店，为了实现劳资合作，共同发展生产，对工人、店员应首先加以发动，提高其觉悟程度，以便平等自觉的与资方合作。除可共同进行反奸外(不是清算)，还可普遍进行反对包工头师傅压迫及废除打骂虐待等不合理制度等，但斗争不可拉的太长。斗争后，应发动工人入股，并采分红制度，迅即转入正常生产与经营。工运方针不论公营私营，都是劳资合作，劳资两利，公私兼顾，发展生产。适当增资，应经过厂方工会三方面根据成本利润加以计算，在资本家有利可图的原则下决定之。三方面共同努力，达到“原料足，成本低，质量高，产量多，销路广”，即是工运方针。不是不管工厂能否赚钱，预先规定工资应该多少(如说养活两个半人)，而是应首先估计成本高低，利润多少，能否再生产等情形，来决定工资。商店工作方针与工厂同。在群众运动中，只清算地主的封建剥削，应保留其工厂、商店。清算后，并应尽量鼓动地主将资本转到工商业方面来；政府则宣布保障经营工商业的自由。有些地区用清算地主办法，把工商业家一并清算，定名为清算无土地的大地主，“3亩地以下的大地主”，对解放区极不利，应即停止。

(十一)反对包办代替，保证完全执行群众路线，争取90%以上的人同情土地改革，是发动群众的重要关键。许多干部犯急性病，恩赐观点，单纯分配土地，不发动群众，不培养本地干部，工作队一走，工作即垮台。不进行酝酿，简单从事，结果土地问题解决，地主消灭，群众发动不起来，造成没有土地问题的空白区，明分暗不分，给后来工作以更大困难，此种偏向必须克服。

新区群运大体可划分为大发展与巩固两个阶段。大发展阶段，

各区可按具体发展情况，在适当时期加以结束，转入深入与巩固的阶段，进行普遍深入的翻身大检查：群众已否翻透了身？是否有地主假卖假分或自动“开明”，欺瞒群众情事？是否有干部包庇地主而未彻底清算？是否〔有〕分配不公现象？是否只有干部、积极分子和民兵得到土地，其他广大群众还未得到土地等现象？要按家检查。继续贯彻五四指示，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实行一次填平补齐运动。内容：（1）反复检查未清算之地主恶霸等，将其土地清出，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2）大发展阶段中照顾群众不够，干部、积极分子和民兵得到土地过多，应耐心的善意的说服他们拿出一部分来，交还群众，但必须做到自觉自愿。（3）在这一运动中，应特别注意照顾中农群众，照顾工商业家。

老区分两种不同地区进行：（1）已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地区，不进行填平补齐运动，以生产为主，但须进行调查研究，清理尾巴。个别未解决的土地问题，用调解仲裁方式解决之。内部纠纷不团结问题，亦用同样方式解决之。特别注意，不要损害中农、富裕中农和抗战中发展起来的新富农的利益。（2）解决土地问题不彻底和地主反攻的区域，应根据实际情况决定，亦进行一次填平补齐运动。

在土地问题已经解决，群众已经彻底发动的地区，应专门划定一个时期，对群众进行系统的思想教育，巩固翻身，并加强支部和各组织的建设，进行冬季生产，准备开展明年的大生产运动。（1）教育内容，永远跟着毛主席走，跟着共产党走，用翻身大回忆提高阶级觉悟，总结出过去穷苦是谁给的，今天翻身又是从何而来的。挖穷根（消灭封建）后要安置富根、发展生产（新资本主义）的教育，并进行提高阶级觉悟的时事教育。（2）大量发展农会会员，发展党员，建设党的支部，发展并建设民兵，改造村政权。重点则放在民兵建设和支部建设上。（3）及时的组织互助合作，提倡吴满有方向，转入生产运动。必须给群众反复说明，填平补齐，只进行这一次，以后再不进行。届时边府可颁布保障人权地权财权的法

令，号召群众进行生产，勤俭起家，发财致富。召开生产座谈会、劳动英雄大会，发动新区群众到老区参观，交流生产经验，克服无止境的均产思想、靠斗争吃饭和二流子习气。

冀鲁豫区党委

关于贯彻实行耕者有其田

几个具体问题的指示*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日)

自爱国自卫战争以来，我区动员广大的群众力量，支持了战争的胜利，这是有成绩的。但也考验了我们的工作：在紧张的爱国自卫战争中，站岗放哨封锁敌人，实行戒严都弄不起来，而特务活动，人心动荡，担架逃亡，群众情绪低落，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原因在哪里呢？基本问题在于官僚主义领导，没有结合贯彻土地改革，没有放手领导群众的翻身斗争，给群众的少，向群众要的多。我们解放区，除一部分进行了比较认真的土地改革外，很大一部分是只经过大运动、反奸诉苦，或干脆的白板区。广大的农民，土地极少或没有土地，生活未得改善，加上水淹，受着没饭吃、没地种、没有房子住的威胁。在我们单纯的参战备战工作上，自然是冷淡，不积极，不热情，反而感到是一种压力，是一种负担。在范县、观城、朝城这些老区，群众反映“不兴争斗”，“反正穷人该受穷”，锄奸上不能走群众路线，给群众撑腰（如范县朱楼），形成有些地区或明或暗的为特务坏蛋所把持。至于村干部也处于极大的为难中，好的孤立，着急，差一点的便应付，两面态度，或退缩，个别的甚至逃跑。形成群众情绪低落，我们领导高高在上严重脱离群众的现象。群众说“一年没开过会了”、“一年没唱过歌了”。而我们领导上呢？至今还没认识到这个局面。因为他只根据少数村

* 本文发表于1947年2月1日出版的《工作通讯》第26期。

庄，少数群众，以及已往的概念，认为“中心区的土地问题已解决的差不多了”，而麻痹、骄傲，过高的估计了中心区的工作，把土地改革、决心给农民土地的中心问题冷淡的放过，而孜孜于一些次要的、琐碎的工作。中央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公布已半年多了，有些地区到今天还没着手，这是严重的右倾思想，必须立即检讨纠正。另外有些地区，虽然曾进行土地改革，但不彻底，而在领导上未能抓紧贯彻实行查田，填平补齐，以致工作中断，群众未分到果实而又冷下去，使工作遭受损失。

我们深究，为什么不能继承大运动的精神，把中央关于耕者有其田的指示放手贯彻下去进行土地改革呢？这首先是区党委负责，对土地改革中心的坚持贯彻不够，对解决土地问题是解放区工作的万事之本认识不足，因而不能把土地改革与游击战与战勤等工作结合进行，以致受到损失。我们认识了这个问题之后，就要不失时机的彻底进行土地改革，未进行的立即进行，把反官僚主义、备战、参战与土地改革结合布置，一面土地改革，一面备战参战。在游击区是一手拿枪，一手分田；在已进行土地改革的地方，应深入查田，填平补齐，要在精密细致的统计上，不漏一口人，不漏一亩地，在填平补齐这个环节上，要把土地问题解决得彻底。各级党委要马上组织力量，并亲自动手进行土地改革，求得在旧年年底实现耕者有其田，组织大多数群众参战、生产，并准备旧历正月的大参军运动。各地在进行土地改革中，应根据中央局的指示执行。今将几个具体问题的意见提出，供参考。

一、耕者有其田的政策，主要是解决无地和少地的农民的土地问题。因此斗争果实的分配，主要是填平赤贫和贫农。土地、房院、耕具、木料、牛犍车辆，应配给赤贫和贫农。粮食、钱或日用器具等相当的分给中农，以加强劳动者的团结和刺激中农的生产情绪。过去一律作价分钱的办法是不妥当的。

在斗争中要及时分配果实。过去因不能早分配果实，以致果实浪费掉，影响群众的斗争情绪。今后应随斗随分，要树立为群众兴

家立业的观点。不管积极不积极、会内会外，一律是填平补齐。

二、在中农问题上。中农是劳动阶级，耕者有其田的意思，就是劳动吃饭，反对剥削。我们应很好的教育贫农，对中农很好团结，不但不侵害，并且分给一定果实。但因内中个别贪污、恶霸、抢掠、剥削分子，为广大群众所痛恨，群众起而清算，我们应领导清算，但应着重政治上的揭发，经济上从轻。

三、大村小村问题。大小村土地过于悬殊，小村土地问题不易解决或解决不好的，领导上要一定耐心说服，在其双方协议的原则下，坚决调剂。今天多费点劲，多解决一个人的问题，将来就少作一个人的困难。其方式最好是联合斗争，联合分田。

四、党员干部及政府工作人员，其家庭系地主的，应首先自动献田，作执行政策的模范。某些将土地偷卖、隐蔽、分散的应反省检讨，把地拿出来献给农民。在土地改革中必须认真进行这一工作。没有自己的彻底献田在先，就难以坚决的贯彻土地改革运动，也难以发挥农民的土地改革热情。

五、关于在群众运动中把杀人权放到县级的的问题，前曾决定，今天再为提起。在土地改革、群众运动中，有关群众情绪的案件，如大恶霸、特务、杀人凶犯，群众万分痛恨，群众要杀，我们为爱护群众情绪，给群众撑腰，由县委切实负责，可以先执行而后报告。惟方法上必须是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由群众公审斗争枪毙，一定要走群众路线，并保证不错杀一人，如果杀错了则县委会负责。

六、工作的进行，必须是土地改革与参战相结合的方法。在土地改革群众斗争中成立各级指挥部，干部分工，村干分工，相互照顾。区干少了，多发挥村干的力量。二者结合是相辅相成，单纯的参战、备战，不进行与土地改革相结合的办法，是错误的。我们不能麻痹和一误再误了。

七、土地改革中干部应注意：（一）不得代为保存果实，不得购买和接受群众果实。（二）不吃地主的请，也不吃村干和群众的

请,不借用群众的被子、衣服和款项。(三)不住地主房子。(四)自备灯油、纸张,及时清理各村零星饭帐。这不但传达给干部,并要传达给村干,以便群众起而监督。

八、关于拆房子问题。除个别为群众痛恨的斗争对象,其住宅系高楼(砖的),群众非拆不行的个别房子可以拆除外,其余的不必拆毁,应连宅基带房子分给贫苦无房住的群众。

九、外庄土地房产,如系地主者,可协同原村群众清算收回给农民。

十、农会是农民的阶级组织,地主、斗争对象虽然降为中贫农,亦不得参加农会。有些地区单纯地追求数目字,组织多数竟把斗争对象吸收参加农会,这是不对的。今后在斗争、整理组织中,必须加以清洗,以保持农会组织的纯洁。

总之,各地委县委要认识土地改革的重要意义,立即组织力量,大胆放手的实现耕者有其田,充分发动群众,不能再失时机。只有彻底实现耕者有其田,发动了群众,才能更加有力的准备反攻,争取战争的胜利。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布告*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反奸清算，减租减息、实现耕者有其田，是我解放区实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政策。只有彻底实现耕者有其田，才能粉碎美国反动派和蒋介石的进攻，保证爱国自卫战争的胜利，建立富强、独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国。人民在执行上述政策法令中所收回之果实，均为合法神圣不可侵犯的，政府应予法律之保障。

根据各地边沿区反映，在蒋军进攻我解放区时，有大部分地主尚能深体此义，安分守己，遵行政府法令；惟有小部分恶霸及不明大义之地主，在蒋特促使蒋军配合之下，组织“复仇队”、“还乡团”、“爱乡团”等，杀害威胁农民退出应得果实，进行反动的“倒算”运动。似此非法罪行，当为政府所严禁。为此特布告如下：

(一) 凡农民在反奸、清算、减租、减息、实现耕者有其田的运动中所收回之土地、房屋、财产，均为合法之所有，任何人不得借口予以剥夺或侵犯。

(二) 凡地主遵守政府法令拒绝“倒算”及自动隐藏躲避“倒算”，或慑于奸特蒋军威胁被迫“倒算”而在本布告后自动退回农民者，政府当对其生命、财产予以保障。

(三) 凡被人民控诉，清算过之汉奸恶霸，安分守己、不再受奸特利用欺压人民者，政府当不咎既往，依法保障其人权、地权、财权。

(四) 凡死心塌地勾结蒋特，依仗蒋军一时之势力，组织“爱

* 本文原载于《冀鲁豫日报》第838期(1946年12月22日)第1版。

乡团”、“复仇队”、“还乡团”、“倒算队”等,反抗政府,杀害人民,抢夺人民依法取得之土地、房屋、财产,除发动人民来清算外,并依法予以严惩,决不宽贷。

以上各端,我政府一本团结爱民之旨,望我全区人民一体周知,三复斯言,勿谓言之不预也!

此 布

主 席 杨秀峰

副主席 戎伍胜

冀鲁豫区的减租增佃概况*

(一九四六年)

一、土地分配与租佃制度

本区土地分配是少数地主富农占有了大部土地，而多数劳动农民却极缺乏土地。如下列三个表：

第一表：滑县4村，内、曹、菏泽县各1村的土地分配统计

项别 阶 层	户数	%	人数	%	地亩	%	每人平均地亩
地主	121	9.3	610	9.9	9984.8	39.9	19.3
富农	102	7.8	619	10.0	4542.5	18.1	7.4
中农	366	28.1	1815	29.4	6852.9	27.3	3.8
贫农	609	46.7	2790	45.1	3677.0	14.7	1.3
无地户	106	8.1	345	5.6			1.17
合计	1304	100.0	6179	100.0	25057.3	100.0	

倘若把一表地区称为土地集中区，二表地区称为次集中区，三表地区便可称较分散区。比较这三种地区，我们可以看到：土地越集中，地主占有土地比重越大，个人所占越多。而贫农无地户的户

*本文原载冀鲁豫各联总会宣传部出版的《工作通讯》第19期。

原文无日期，据内文推断，当为1946年。

第二表：范县 2 村鄆城 1 村的土地分配统计

项别 阶数 层目	户数	%	人数	%	地亩	%	每人平均地亩
地主	16	4.6	114	6.1	1681.7	22.8	14.8
富农	34	9.7	183	9.8	1651.6	22.4	9.1
中农	157	45.3	803	43.0	3016.7	40.9	3.8
贫农	121	34.9	703	37.6	1021.9	13.9	1.5
无地户	19	5.5	65	3.5			1.33
合计	347	100.0	1868	100.0	7371.0	100.0	

第三表：南乐 2 村观城 1 村土地分配统计

项别 阶数 层目	户数	%	人数	%	地亩	%	每人平均地亩
地主	4	1.1	18	1.1	322.0	5.3	12.4
富农	33	9.3	23.8	14.9	1970.4	32.6	8.3
中农	231	64.5	902	56.4	3146.4	52.3	3.5
贫农	82	22.9	423	26.4	594.9	9.8	1.3
无地户	8	2.2	20	1.2			1.34
合计	358	100.0	1601	100.1	6633.7	100.0	

数便越大，越缺乏土地，个人所占越少。地主富农与劳动农民的幸福和痛苦是相反的，地主富农越幸福富裕，劳动农民便越痛苦贫困。地主富农的幸福是建筑在广大农民的痛苦上面的。到过滑县、

内黄、鲁西南等地区去过的人，都知道地主的楼院和农民的泥棚是何等悬殊，一是地上天堂，一是人间地狱。土地集中区，地主一人所有土地，相等于15个贫农的；次集中区和分散区，地主每人所有地还相当10个贫农。土地分配太不合理了，这是农民不得受地主封建剥削的根源。

本区租佃制度，主要的是小种制，出租制很少。据濮县25个村的调查，全部36251亩耕地中，只有1424亩采取出租制，占全部耕地的3.9%。据濮县9个村调查，10167亩耕地中，就有2753亩采取小种制，占全部耕地的27%，相当出租制的7倍。

小种制有三七小种、青苗锄、赔牛地3种形式。其中以三七小种地最普遍，青苗锄次之，赔牛地最少。据濮县91个村调查，全部33106亩租地中，21180亩采取三七小种，占64%；11926亩采取青苗锄，占36%，没有赔牛地。另据濮县5个村的调查，赔牛地只占全部租地的5%。

三七小种地，也有叫作拉鞭地、稍种地、甩手地，名称虽异，内容是一样的，都是佃户供给全部劳动力并自带镰、锄、镢头等手用工具，地主出牲口、种子、农具和肥料。“种地的”整年拴在土地上，吃自己的饭，穿自己的衣，所得甚微，不过分麦2/10，分秋3/10。凡是佃户只管锄苗、收割、打场而不管犁、耙、耩的叫做青苗锄，佃户分头更小，麦一九，秋二八。佃户除出全部劳动力并又出牲口者，叫做赔牛地，劈头为三七到底。由此可见，不论哪一种形式的小种制，佃户所得劈头都是很少的。何况小种制最普遍的地区，是在漳河和黄河两岸，经常遭水灾，以致佃户白出一年气力，啥也不落。小种制佃户还得忍受地主残酷的超经济剥削，地主可以随意征用佃户的劳力而不给任何报酬。据濮县91村调查，全部838户佃户中，无地佃户占1/5，每户5亩以下的佃户占2/5，10亩以上的佃户不到1/5。残酷的剥削，使小种制佃户陷入贫困中。

出租制有大种地、死租地和帮工租地3种形式。其中以死租地普遍，大种地次之，帮工租地很少。战前，每亩死租地，大都交1

大斗麦、2大斗秋的租子，约90斤，占收获量的60—70%。大种地名义上是对半分，因佃户出了一切成本，又给地主支差、纳税捐；故实际租额占收获量的70%左右。帮工租地更加残苛了，帮1个整人工，只换得种5亩地，还有以普通租额租几亩地为条件，而规定必须供给地主随意使用佃户的劳力而不给任何报酬，这是劳役地租的变相。此外，还有所谓包租地、札地，不过是地租的形式，实质上是极苛〔刻〕薄的高利贷剥削。

总之，在这封建性的出租制和小种制地租剥削下，佃户只能过饱一顿，饿一天，一生不能穿长棉袍的苦寒生活。何况再加上高利贷和商业的联合剥削，真够苦透了，所以佃户自称为——受苦人。

二、减租增佃的经过

1942年上半年以前，减租增佃基本上并未实行。虽然抗日民主政府成立不久，就提出了减租增佃，且于1940年在个别地区和个别村庄曾经突击过这一工作，也曾热闹了一阵，但由于领导上的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不曾发动佃户，对于增佃减租认识不足，只是突击了一下，未曾使用大力贯彻下去，以致绝大部分是明减暗不减，个别积极的佃户因退佃勾地而失业了，有的减租后又暗地给地主送回去了。佃户的痛苦是加深了，对我失望怀疑了。

1942年下半年，自从组织政民工作队，开展中心区濮、范群众工作以来，减租增佃才算真正开始实行。

从抗日政府成立到1942年的解放区，处在日益严重的局面中，许多地〔区〕变质了，或是被迫退出来了，保存下很小一块中心区，群众还未发动，农民最迫切的要求还未满足。我们从长期的痛苦中认识发动群众的必要，不发动群众，就无法坚持解放区的残酷斗争，认识到过去只把发动群众，组织农会、青会、妇会当成完全是群众团体的事是不对的。因此，从1942年下半年开始，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集中大批力量，推动军、政、民各组织进行发动群众的工作，加强军政民干部的群众观念。于是，在1942年冬和1943年

春，先后在濮、范、鲁西南及各地掀起轰轰烈烈的减租增佃运动。仅就濮县来说，佃户所得的粮食，可以供全家吃三个月，暖暖饱饱的度过了闲冬荒春。然而由于领导上严重的代替包办恩赐观念，群众并未得到充分的发动。怕群众思想，怕群众行动，怕群众不懂策略，以致代替了群众的思想 and 行动，束缚了群众运动。结果，减了租增了佃，群众不认为是自己的力量，〔而〕是上面给的，是干部办的。再加上我们对小种制了解不够，只提出保障租种权，而忽略了如何处理里打股、无偿劳动及超经济剥削，所以当我干部离开，工作中心转移之后，地主马上进行反攻。有许多地区，减了一季之后，又复原状，变成明减暗不减，严重发生退佃勾地，使佃户失业。工作基础最好的地区，地主不敢明目张胆的退佃勾地，也利用无理打里股，以致佃户得不偿失。这种情况一直发展到1944年春，佃户合法利益受到严重侵犯。

1944年中期，提出大胆放手，反对包办代替，掀起查减运动。根据各〔地〕经验，由行署公布《关于减租增佃中几个问题的决定》，进行了复佃斗争，倒柴倒粮，实行把锄粮垫底粮，里活管饭给资，取消养老股干股，出几份力吃几份股，严禁里打股外包憋。首先收到丰富成绩的是滑县，随后各县均已开始了这一工作。

在这个时期的佃雇运动中，转变了过去的领导方式，有了较明确的政策，领导上和佃雇生活在一起，及时的发现了问题，广播了经验，又及时的发现了偏向，通过积极分子去得到了纠正，领导上抓的紧很深入，集中上来坚持下去运用很灵活，政策紧紧的吸引群众的要求，又约束着群众的行动，佃雇工作得到了进一步的开展。

三、土地变动

减租增佃之后，佃户的生产情绪大大提高了。出租制的佃户，有不少已组织互助组，进行集体劳动，打了井，提高生产量。小种制佃户的生产情绪也大大提高了，但由于他们下力增加的生产，大部被地主夺去，这种小种制的生产方式便成为佃户提高生产量，改

良生产的限制了。佃户要“活变死”，即把活租地与小种地制都变成死租地。鲁西南菏泽小种制佃户提出，要求地主把小种改成死租，若实在不改，也要实行包产的办法，就是说同样一亩地，划出一亩由佃户上粪深耕细作或是打井，多生产的归佃户，其他那一亩合计什么收成佃户就包什么收成。

减租增佃之后，地主以封建地租剥削佃户的情绪低落了，对于土地的生产情绪确实降落了。这是必然的，不可怕的。地主另一种生产情绪——投资手工业生产和经营商业高涨了。鲁西南有些地主卖去三五亩地，开一个纸场得利顶30亩地的收入。中心区的地主，多卖几亩地，开油房〔坊〕、花店，〔搞〕运输等。

减租增佃和开展民主民生斗争以来，本区土地分配是起了一点变化的，总的趋势是向着分散发展，如鄆北十三庄。

十三庄各阶层买入土地统计

买 入 年 代	贫 农		中 农		富 农		地 主		总 计	
	户	地	户	地	户	地	户	地	户	地
1943	11	30.6	13	85.1	4	22.6			28	138.3
1942	7	24.9	15	65.4	4	22.2			26	112.5
1941	6	10.1	5	26.1	1	1.0	1	1.7	12	53.2
1940	1	3.0	7	15.9	2	7.8			10	26.7
1939	2	4.7	4	11.0	3	13.5			9	29.2
1938	1	1.9	2	6.6	2	1.6	3	27.0	8	37.1

贫农中农富农这3个阶层，抗战以来买入土地逐年增加。若以1938年买入土地作为100，那末贫农买入土地的指数为1610，即增加16倍还多。中农为1290，即13倍，富农为1414，即14倍多。故和买入土地的指数为增加率贫农最大，富农次，中农又次之。以买入土地数量来说，中农最多。

十三庄各阶层卖出土地统计

卖年 出代	贫 农		中 农		富 农		地 主		总 计	
	户	地	户	地	户	地	户	地	户	地
1943	2	8.6	4	10.2	2	14.5	4	33.6	12	66.9
1942	1	7.0	4	13.6			4	14.2	9	34.8
1941	3	9.1	1	1.0	1	8.0			4	12.1
1940	1	1.5	4	16.8					5	18.3
1939	3	6.0	5	28.9	2	10.0			10	44.9
1938	3	10.2	4	10.5	4	45.6			11	66.3

据表可见，卖地阶层和买地阶层，恰恰相反。地主富农是卖出地亩的主要人物。

年 代	当 出 地 亩				当 入 地 亩			
	富 农		中 农		贫 农		中 农	
	户	地	户	地	户	地	户	地
1943					2	11.4	5	16.1
1942			2	4			1	5.0
1941	1	2			1	2.0	1	2.7
1940	1	6			2	3.5	1	1.0
1939			1	2				
1938			1	2				

1943年发动群众以后，当入土地者也成为中农和贫农了。

滑县六区曹起营买卖地统计

	买 入 地 亩			卖 出 地 亩		
	1937年	1942年	1945年	1937年	1942年	1945年
地 主		15.5			312.5	233.8
富 农	4.4	22.8	63.0		5.0	140.5
中 农	30.0	83.6	192.3	11.0	42.3	21.6
贫 农	11.0	50.1	79.6	3.0	16.2	
合 计	45.4	172.0	334.9	14.0	376.0	395.9

郵城芝麻刘庄买卖地统计

	买 入 地 亩			卖 出 地 亩		
	1937年	1942年	1945年	1937年	1942年	1945年
地 主		6.5	1.4		108.7	204.4
富 农	8.5	24.7	19.3	24.8	68.8	56.0
中 农	27.6	178.3	124.4	12.0	185.4	15.9
贫 农	19.0	93.0	53.3	3.0	37.2	13.3
合 计	55.1	302.5	198.4	39.8	400.1	289.6

据上表，中农所有土地由占全部土地 $1/5$ 增加成 $2/5$ ，这是土地分配合理化的指标。两头减少，中间增大，这就是民主主义社会必有的发展趋势。这和旧社会国民党统治的社会，成为极其显明的相反的对照。在旧社会及国民党统治地区，土地向专以地租剥削为生的地主阶级集中，而在解放区，即在新民主主义的社会里，土地分

配却日益合理化，耕者有了土地。劳动农民现在成为买入土地当入土地的阶层了，地主封建经济逐渐受到削弱，这是改变历史的大事情，是农民自由独立繁荣的标样。

在民运部长联席会议上的 总结发言

(一九四七年一月二十日)

潘复生

(一)

中央五四指示传达到边区，已有半年多了。在这半年多的时间当中，由于边区全党同志的努力，有些地区已掀起了土地还家运动。如过去的三分区，老一分区泰安、肥城、平阴、茌平、博平，五分区定陶、复程，四分区滑县、清丰、南乐，二分区东平、郟城等县，都曾有轰轰烈烈的运动，规模都很大。在运动中，农民得到了一些土地，群众情绪提高了。我们在这一基础上胜利的进行了一次参军运动，并不断的进行参战支援前线，保证了战争的胜利。这个成绩是很大的，应该表扬并应该提高。特别是去年8月以后，边区战争形势紧张，战勤繁重，我们能以上成绩，是更值得表扬的。

但检查一下，半年来我们在执行土地改革中是否还有缺点？我们说缺点是有的，甚至还有错误。中央局指示我们说：“你们战勤繁重，某些地区推迟执行土地改革是有原因的，但应结合战勤进行。”我们说边区战勤任务繁重是事实，但不能因此忽略主观上对土地改革执行的努力，并放松对工作的检查。由于主观努力不够，使贯彻土地改革受到损失，表现在某些地区，土地改革进行得很不彻底，农民还没有完全得到土地，果实没有完全分给农民，对消灭地主封建势力认识不足。地主没有政治上经济上彻底被打垮，农民没有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得到彻底翻身。有的县份如朝、范等老中

心区，很长时期不进行土地改革，现在才进行，领导上被旧的观念、旧的圈子阻碍着、束缚着，不能用新的方法方式及时去进行。在边沿区除六地委河西县外，其他地区土地改革没有结合对敌斗争，没有实行一手拿枪一手分田，因而形成了退缩。在游击区，有的地委决心的坚持，创造了经验，以保田保粮保命，反对地主倒算，坚决镇压坏分子，给农民撑腰，开展了群众性的游击战争。有的地区，我们还没有进去坚持，或没有将游击战争与保田保粮、土地改革紧紧结合起来，以致未能形成更广泛的群众性游击战。这都说明了我们对于贯彻土地改革结合战勤和游击战争认识不足，致工作遭受损失。我们要承认和肯定我们的成绩和创造，但我们必须正视贯彻土地改革中的缺点和错误。我们要表扬成绩，发挥创造，但必须克服我们的缺点和错误。

为什么在贯彻土地改革中有些地区执行不够？为什么我们有以上的缺点和错误？

首先是领导上的问题。从区党委本身来检查（首先是民运部和我个人），对在任何情况下要贯彻土地改革认识不足，对下面的丰富创造没有及时总结集中与交流。具体表现在土地改革开始时，三地委及五地委创造了新的经验，但没有用大的魄力坚持贯彻传播这些经验，以致许多地区仍旧限制在老一套的狭隘经验主义的圈子里，小手小脚，不能以新精神新方法大胆放手地去进行土地改革，甚至有的不虚心，排斥接受新的经验，造成很大损失。另外表现对老地区的工作估计过高，认为“差不多”，应搞生产，因而就没有抓紧贯彻土地改革。由于区党委对土地改革这一个战略任务，土地改革是一切工作的基础，是万事之本，认识不尖锐不深刻，到后来战争时期抓紧土地改革结合战勤便没有信心，所以战争开始时，就停止土地改革，单纯进行战勤。后来在战争紧张的时期，提出全区备战，也没有提出结合土地改革。这是造成土地改革不能贯彻的主要原因。另外没有组织大的力量进行土地改革，政府和军队至今仍站在土地改革之外，有时期土地改革的中心工作不明确，这基本

上是区党委应负责的。今后区党委决心纠正，希各地各县也要在今后任何情况下不放松土地改革。

除领导原因外，边区党内在思想上对土地改革还存在着一些糊涂观念。这些观念是：

一、对土地改革这一新问题，还拿着老一套老观点去看，残存着减租减息，雇佣贫诉苦清算的老圈子、老观点，没有认识今天是实行耕者有其田，是彻底消灭农村封建势力，所以对地主搞的不狠，观点不明确。在方法方式上仍沿用老一套，不敢放手的大胆去搞，整个把自己束缚在狭隘的经验主义的圈子里。

二、“差不多”、“没搞头”的思想。尤其在老区，以为群运在1942年就开始搞，到现在几年了，地主没大有“啥”了，因而不执行土地改革，推迟执行土地改革。这种对自己的工作估计过高，认为“工作差不多了，该是搞生产了吧！”实际上自己只看到几个村或几个村干，就以为工作已经不错，而对于农村地主没有被消灭，农民没有土地则看不见，对自己的工作估计没有科学的根据，单凭自己的概念或小资产阶级的感想。这种对工作不认真，对党不负责和对群众不负责的思想是可怕的。因此现在要提出注意，要眼睛向下，实事求是，大力贯彻土地改革，填平补齐。

三、“特殊思想”。认为我这里是沙窝，土地分散，土地改革没啥搞头。好像那个地方不是阶级社会，岂知那里也有压迫剥削，也有被压迫剥削的人。所以我们要反对这种特殊思想，应该毫无例外的实行土地改革，填平补齐。

四、认为“农民不敢要地”，说农民有变天思想。这不是群众的思想，农民是要地的，这是问题的本质。农民不敢要地是农民有顾虑，这是现象。我们不能为现象所迷惑，抹煞了本质。农民的问题，基本是土地问题。只要我们能给农民撑腰，农民就会起来要地。

五、工作上单打一简单化的思想。认为搞战勤即不能搞土地改革，认为打游击，不能进行土地改革。这种单打一简单化的思想，

不是从群众中来的想法，不是代表群众利益的，因为群众要求解决土地和出担架一齐搞。事实证明，只有土地改革结合战勤和游击战，则工作才能搞好，不然一定要失败。

以上都是我们执行土地改革的障碍。为什么有这些糊涂思想？其来源乃由于我们对农村基本情况认识不足，虽然我们生于农村，长于农村，我们对农民是不熟悉的。农村问题就是农民和地主的问题，而农民和地主基本是土地问题。只有将地主的土地拿出来，消灭了地主封建势力，农民才能翻身，农村基本情况才能改变，才能使封建社会变为新民主主义社会。所以土地改革就是农民的革命运动，不要怕乱，不要想四平八稳，按部就班，不要想象出什么运动纳入正规〔轨〕，制造什么阶段论，这样当不了要出岔子，因为这是不合运动规律的。我们正是要农民起来打乱这个封建社会，由〔于〕思想上没解决问题，就小手小脚，不能大胆放手而约束了土地还家运动的开展。

另外由于干部党员出身不同，对农民痛苦以及对农民的细小利益体贴不够，因而在贯彻土地改革中对地主打得不狠。如不要分地主的浮财，有的认为农民要浮财是“抄家”，是“反了”。他们总是可怜地主没法过，而没有想到贫农怎么过活！（对地主的怜悯，就是对农民的残忍！）这是立场问题，也是出身问题。有的人还存在着剥削阶级的意识，在土地改革中多留地，甚至贪污或收买果实，实行混水摸鱼。我们要坚决反对这种剥削阶级意识。

总之，在贯彻土地改革中是反对右倾情绪，不敢放手给农民土地。我们应坚决给农民以土地，在任何情况下不放松土地改革，这是战略任务。只有这一任务完成，才能充分发挥人民的力量，争取爱国自卫战争的胜利。

（二）

立即坚决贯彻土地改革、填平补齐，充分发动群众，结合战争任务，争取爱国自卫战争的胜利，这是基本方针。不管任何地区、

任何情况都须贯彻这一方针。除了游击区外，都要在春耕前完成土地改革。

在中心区，要以新的精神、新的方法贯彻土地改革。这一新的精神是：打破老圈子，大胆放手给农民土地。（参考二分区汶济边经验，六分区阳谷新经验，八分区观城的经验。）

一、实行一揽子斗争，对地主一锅端，集中地主罪恶一次总清算，包括土地及浮财，要狠要彻底，不要零打碎敲。

二、撑腰问题。大胆使用我之合法形式，政府出布告到处去贴去念，使土地改革、实行耕者有其田家喻户晓，不要偷偷摸摸攒[钻]牛屋去攻。对群众痛恨的地主恶霸要逮捕，或成立拘留所、悔过所，给群众“搬石头”。处理要经过群众，群众要放就放，要清算就清算，要镇压就镇压，这不是包办代替，是群众的迫切要求。

领导上要给干部撑腰，在执行土地改革中，不要怕犯错误。不贯彻土地改革，不发动群众才是错误。只有执行土地改革，发动了群众，有点把子错是可以原谅的。凡是贯彻土地改革发动群众的，领导上都应予以表扬。对干部要放手，使干部敢于大胆的为人民群众服务。只有领导上给干部撑腰，干部才能给群众撑腰，然后才能放得开。

三、大胆的大量的使用积极分子。如阳谷、观城、汶上及过去定陶和三分区的办法，领导上首先打通思想，要相信群众，以区为单位召开积极分子会议。在新区吸收贫农、赤贫、雇佣参加，一村找七、八、十来个（不要只两三个，一个区一般干把人），不要特务狗腿，只要领导上注意就可；在老区不要光要老村干老积极分子，也不要一脚踢开老组织，要发动大量贫农积极分子参加。会议内容不要有框子，但领导上必须明确自己的态度和政策，主要是打气撑腰。不要作长报告，要说明坚决实行土地还家，为群众撑腰，中农不动，“共产党要举办一件大事，帮助兴家立业”就行。不要拘泥形式，要放手启发群众酝酿（唧咕）。老地区一定放下老圈

子，如老村干路线或先搞悬案，由内而外等等。要放下老重点主义四面开花的圈子，只要把积极分子会开好，积极分子气足，我们的干部即随着积极分子回村，刮大风的宣传，到处点火。只要村内积极分子敢领头，群众敢跟着干，就行动起来。领导上掌握先进村（先动起来的），传播经验，这就是重点。

四、分果实，过去曾走了弯路，分几等几级，积极不积极等等老观点。今后应该以贫多富少，少啥给啥，使群众兴家立业为基本精神。村组织果实分配委员会，确定不经全体群众通过，不能动用一粒粮食的法律，经过委员会组织群众小组酝酿，大会民主讨论通过，十分公平合理；张贴黑红榜，公布谁该拿东西，拿多少，谁该分东西，分多少。在这里要注意农民与地主的清算讲理，以撕破农民和地主的脸，提高觉悟。果实分好后可以发动量地运动、搬房子运动、立约运动（退旧约，烧旧约，订新约），锣鼓鞭炮，弄得很隆重。这也是阶级教育。这样才能撕破农民对蒋介石的脸皮，所谓“刨蒋根，拔蒋牙”。这才能使农民得地得的干脆，最后还可以举行土地还家庆祝会。

五、土地改革要给农民土地，但还必须尖锐注意要结合进行农民在政治上、思想上的翻身。如在某种情况下（汶济边），先分土地而后教育也行，但最好是结合进行。一定要在政治上打垮地主，撕破农民和地主的脸皮。为求得在经济上政治上打垮地主，在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农民彻底翻身，所以，除军工属外，一般不采用献田的方式，因为献田是取消斗争的。土地改革后，应抓紧积极分子训练班，追穷根追富根，讲翻身道理，提高农民觉悟，教以如何掌握政权、民兵及防止地主的反攻。要抓紧发展党，可采用集体教育个别吸收的办法。至其他组织，均应抓紧火候及时扩大和巩固起来。

六、政策问题。在土地改革中，要彻底消灭封建势力、封建剥削和压迫，另一方面实行耕者有其田。因此对地主主要消灭，应防止地主明分暗不分。地主的工商业部分应保留，至于油坊酒坊，农民

认为地主保留过多时，可以拿出应留得之土地来换得保留。对富农除真正新式富农外，其他旧式富农，群众要求清算时都可清算，但留下其自耕部分（不包括雇工部分）。中农不动，但有两种情况，中农而为汉奸恶霸者可以清算。至于小村土地分散，富裕中农为统治者，我不应发动清算。但其自动土地可以接受，但处理应从宽。贫农赤贫要保证能得到土地、粮食、耕具、牲口、房屋，兴家立业，并保证消灭赤贫。所以政策上基本是中间不动两头动，执行时要策略。拆房子，除了少数罪大恶极的地主的砖砌高楼，群众非拆不行可以拆外，一般不拆，应将房子（宅基场院）分给无房的贫农和赤贫住。总之，一定要解决贫农和赤贫的土地、粮食、房屋、耕具等问题，达到耕者有其田。

七、边缘区，“一手拿枪，一手分田”，发扬河西经验，组织联防，前边警戒，后面分田、保田，步步向前推进。但发扬这一经验中，应注意策略，打的面要狭，得到的面要宽，以防止赤白对立。

八、游击区，必须使游击战与土地改革结合，造成群众性的游击战，口号是：“反倒算，保田、保粮、保命”。没有实行土地改革的地区也是“一手拿枪，一手分田”。领导上必须撑腰，政府可以出布告（如巨野出了3个条示，作用很大），明确农民既得利益任何人不得侵犯，如有侵犯者政府严办，坚决镇压组织倒算的坏分子。这里的先决条件是，一定要坚持阵地。由于群众“怕我们长翅膀”，因此我们必须表示决心和群众同生死共患难。

九、收复区工作，我们曾走过一段弯路，主要是我们没有抓紧群众的主要痛苦与要求，脱离了群众。群众要复仇，我们则搞反蒋统一战线；群众要收回粮食和地，我们则搞善后救济（政府搞一点粮食，只能聊表寸心，是不能解渴的）。群众要我们表明态度是否坚持，是摸“底”，我们偏不表明态度，不给“底”；群众问：“蒋军还来吗？”我们却答：“不来了！”“不知道！”“问这干啥？”群众要求温暖，而我们是冷酷，如讽刺群众落后，“蒋军可给你们上了一课”等等。这说明我们与群众对立，我们严重的脱离了群

众。为什么这样呢？基本是右倾思想，干部怕蒋军再来，怕坚持，不相信群众，不敢正视群众的要求，不敢领导群众复仇清算。因此我们干部应马上向群众表明态度，过去没有和大家一块坚持，使大家受了很多苦，真对不起，今后决心和大家一起坚持，不再走了（不要到处开会，只要表明态度即可）。

收复区的中心工作是复仇、反倒算、贯彻土地改革。要给群众撑腰，对首先出头迎蒋军的、组织倒算的、群众痛恨的要镇压。只要农民提出痛恨的，都可拘捕成立悔过所，群众要怎样处理就怎样处理，要农民出口气。被杀的村干积极分子（烈士），要召开大规模的追悼会，沉痛追悼，为烈士复仇，以镇压邪气，扶植正气，彻底的复仇反倒算，贯彻土地改革。对没有倒算的应宽，对组织倒算的，不但要倒回来，还要清算，就是要严。宽严要明确，是非要分明。至于恢复组织，要在复仇、反倒算、土地改革中去搞，不要先恢复组织，后倒算，也不要老一套的善后工作。要抓住收复区工作的中心是复仇，反倒算，群众马上会起来。

十、在土地改革填平补齐中抓紧建党工作。过去忽视这一工作，使农民起来后，失掉党的核心，失掉了方面〔向〕。在游击区证明，没有支部的地方工作不好办，有支部的地方就好办。过去实际上是一揽子会，农会代替了党，而农会又是斗争会，斗争完了，工作也完了，使工作受很大损失。今后必须纠正。

（三）

关于领导问题，今后应：

一、明确责任。全区党员干部及各级党委都须要全心全意贯彻土地改革填平补齐，结合战争，为人民服务，为人民立功。如有哪级党委、哪个党员推迟或阻碍及不执行土地改革，就是对党对人民不负责，应受到党的处分。在党内要反对剥削阶级意识，凡多留地、多分地、分好地、收买果实、贪污自肥的，都是错误的。对这些同志，要经过说服教育，使之吐出来，以求作到密切党和群众的

关系。如果严重贪污腐化，经说服教育不改的，应受党纪处分。对坚决贯彻土地改革，为人民立功的模范的党委和干部应坚决表扬；有的送来区党委在全党表扬。

二、在土地改革中，提倡精密细致的统计工作，作到不漏一户不漏一人的统计报告。每村每户每人都要有统计，以便了解土地改革完成的程度。要提倡认真和科学的作风，今后各地汇报必须要有精确的统计材料，反对“一般”、“大约”、“差不多”思想。

三、反对领导上的简单化和“单打一”思想。这种思想不管部门工作，不管中心工作以外的次要工作，土地改革不与战勤结合，游击战不与土地改革结合，这不是群众的要求，是领导上的主观。群众要求这两个工作结合起来，这在观城四区的经验已证明了这一点。“单打一”思想不是从群众来的，这种思想反映了干部对工作的简单化，怕麻烦，这是脱离群众的。我们在组织上也同样是简单化，搞一揽子会就取消了其他的组织。今后应转变我们的工作方法方式，要善于根据群众要求，把各种工作结合起来进行。突击工作应提高到经常工作，突击工作要打下经常工作的基础，因此要将群众的各种组织在运动中及时的建设起来。

四、提倡立功选模（选举模范）运动，反对官僚主义。过去提反官僚主义是对的，但当时的提法是有其片面性的，光有打倒的一面，没有建设的一面，光消极的向后看，没有积极的向前看，这就失掉了明确的方向和榜样，就使干部感到工作没有前途。今后要提倡立功表模作为榜样，但政治上腐化变了质的分子应受到党的处罚，这才能是非分明，大家来拥护是打倒非，建立起党内的原则空气，作到赏罚严明，黑白分明，把我们老大迟缓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的颓风挽转过来。

因此，我们要提倡学习。向群众学习，重视群众的创造，来丰富我们。要学习党的指示及党报党刊，来掌握方向，不断的提高自己。大家开动机器，多作工作，多想办法，把边区的工作活跃起来，争取爱国自卫战争的胜利。

冀鲁豫区党委关于 深入土地改革群众运动的指示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二日)

一、土地改革群众运动，在区党委民运工作座谈会后，全区轰动起来，规模大，运动快，群众情绪高，成绩很大。这主要是由于我们：

(一)大胆使用行政力量，给群众撑腰，“搬石头”。政府出布告，刮大风的宣传；地主集中悔过所；群众则家喻户晓，行动分地。这种做法正合乎群众要求，启发了群众的自觉自动。

(二)大批的训练与使用积极分子。一区几千人，一村几十人，集中启发其自觉自动，说明土地还家、物归原主合理合法，说明中间不动两头动。回村后积极分子敢领，群众敢跟，就行动起来，局面轰开的很快，真是到处点火，村村冒烟。阳谷又进一步把积极分子会发展成为大规模的农民会议，使运动开展得更充分。

(三)领导思想上打破了老圈子，所以能大胆放手，大手大脚的放得开，克服了过去不敢大喊大叫，不敢使用行政力量而单纯的自下而上的攻的方式，克服了死守重点、四面开花，老村干路线等小圈子。正是因为从思想上去除了这些障碍，能从实际出发，能走群众路线，所以才能这样迅速的轰起大规模的土地还家运动。

二、可是运动的当中，也发生了一些偏向和不够的地方。

(一)干部在领导农民翻身中，对自己的主要责任是启发群众自觉，在群众自觉自动的基础上领导群众行动，再启发群众的再自觉，把群众运动提高和深入发展的作用认识模糊，以致有的强迫命令、包办代替，不放手让群众行动。

(二)有的地方没有真正领会新的精神，甚至传达到村变了质，走了样。有的不宣传，不拘押地主，不“搬石头”，就开积极分子训练班，群众不敢来，区长就下命令要，结果来了许多中农，甚至有地主富农。有的积极分子受训回来不带领群众，就少数人动手，啥话不说，先号房子又号树，个别的村把中农的树也没收，蛮干一气，可是群众还大眼瞪小眼，不知怎么回事。

(三)在搞浮财、分粮分地中，忽视结合诉苦清算，不注意启发群众的自觉自动。强调了群众的经济利益是对的，但忽视群众的思想政治提高也是不对的。

(四)时间限制的很短，因此县区干部感到压得重，逼得紧，这就容易产生求成过急、简单从事、包办代替，结果欲速不达。个别地方分了地，没发动群众。

三、对以上偏向，我们不应大惊小怪，或是消极批评泼冷水，应该发扬优点，在运动中从积极方面想法克服，把运动提高一步。为此提出以下意见，望各级党委根据当地具体情形研究执行。

(一)时间问题。不受时间限制，主要把土地改革搞得彻底。已经清算出来的土地，春耕前要迅速完全分给农民，保证种上，并且种好，不要荒着地无人种，因为这是脱离群众的。至于没搞彻底的，还要接着彻底进行，不为时间拘限，不要急躁潦草。刚才动手的地方更不要着急，啥时候消灭了地主封建势力才算完(当然也不要以为没时间限制，就放松了，慢牵牛)。至于对春耕生产的要求，只是要求农民互助，种上地，保证不荒地即可，不要做过高要求，目前主要是集中力量彻底进行土地改革。

(二)关于消灭地主封建势力问题。许多地方还是对地主封建势力打的不狠，有的对地主还相当客气，还叫他住在高楼好房里，还给他留好地、留近地，还只搬了点桌凳，至于地主分散荫蔽的地和浮财，还没彻底追出来。我们决心彻底消灭封建地主的剥削压迫的认识还不够，因此就不狠。今后在运动中，应集中力量，强调彻底消灭地主封建势力，以满足群众的要求。除给地主留生活外，其

余的东西应彻底清算，并说明土地还家、物归原主是合理合法、理直气壮。党内某些同志可怜地主，一见地主老婆孩子哭叫，就心软说：“他好歹也是个人，这不是抢了吗？”这都是阶级观点模糊，阶级立场不稳。

分地分粮是不是抢呢？土地还家、物归原主怎么是抢呢？要说是抢，那倒是地主抢的农民的。有的地方说是抢，是很不策略的，是不对的。

我们不但在经济上对地主不狠，而且在政治上也不狠，不注意从政治上揭发地主封建势力的罪恶黑暗，彻底打垮他。有人甚至说：“这个地主没啥罪恶。”其实地主就是罪恶，应该让农民对其彻底清算，打垮地主的统治，撕破农民和地主的脸，提高农民的阶级觉悟。要认清，不彻底从经济上政治上消灭地主，则农民即不能在经济上政治上彻底翻身。

（三）中农政策问题。有个别的地方伤害了中农利益，但不应大惊小怪，消极批评、泼冷水，应该从积极方面解决问题。

为什么每次农民起来即伤害一些中农利益呢？这主要是我们未能满足贫农要求，未能把中农政策贯彻到群众中去，成为群众的行动。因此，今后：

一是集中力量向地主封建势力下手（打击对象十分明确），满足贫农要求。这是基本的方向。

一是注意大村向小村调剂土地，启发大村积极分子和群众自觉自愿向外村调剂，以解决小村贫农的土地问题。

民运工作座谈会上确定的“小村土地分散，富裕中农统治者，自动少数土地可以接受”一条，容易引起向中农要地，给违犯中农政策开了口。因此，决定修正，对中农坚决不动。

一是要走群众路线，把掌握中农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启发群众了解中农是自己人，使群众自觉的掌握中农政策。

一是已经违犯中农的利益、果实未分的，则启发群众自觉的退回，不是强迫，不是泼冷水，已经分了的坚决不退回，而是在今后

分果实时填平补齐中补偿中农损失。这一件事，应该让贫农和中农面对面的谈个清楚，互让解决，而不是领导干部包办命令，以致引起中农埋怨贫农，贫农对领导不满。不要重复过去的错误。

（四）从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充分发动群众问题。

只有彻底消灭地主，群众才能在经济上彻底翻身。斗争果实要及时分，分干净，绝对不准浪费贪污，如有违犯，即应执行纪律。有的地方打算留一部分果实扩军，这是错误的，应即纠正。分果实对贫农要少啥给啥，填平补齐，以便使贫农兴家立业。

要在行动中抓紧每个环节，步步提高群众觉悟。应该认识先政治后经济，或先经济后政治都不恰当，而是应该经济政治结合进行。至于在群众行动中究以何者为主，主要看群众要求。

诉苦会、想想会、庆祝会等是群众教育群众，是领导启发群众自觉，是群众路线的好方法。问题在于我们领导上不要有圈子，群众要先分地后诉苦，我们偏叫先诉苦再分地，那就错了。应该看火候，看群众的情绪和要求灵活进行。

在运动开始，强调用行政力量自上而下的撑腰、“搬石头”是对的，这正是群众要求，不是包办代替，只有这样才能启发群众自觉自动。但当运动已经紊起来，就该随着运动的发展，强调群众自觉，强调走群众路线。不包办代替，也不是任其自流，而是充分的发挥群众的自觉性、自动性，运动才更饱满。

在运动中建立和扩大各种组织，这也要不失时机，抓紧火候，抓紧群众的要求，随时进行组织教育，建立和发展农会、妇会、民兵、支部，以及其他各种组织，达到组织多数。组织起来以后，必须经组织推动工作，使组织起作用，不要放着不用。在组织里还必须实行民主选举，进行大伙当家的民主教育。对村干积极分子，可以用座谈会、短训班等方式加强民主和组织教育。

总之，在土地改革发动群众中，经济翻身、政治翻身是群众的要求，但必须认识诉苦、提高、组织起来也是群众的要求。如果不

认识是群众的要求，我们的干部往往好简单，怕精密细致的组织工作，而忽视教育和组织，以致群众发动后，不能巩固。

（五）干部时时保持虚心冷静，深入群众、相信群众的问题。

当群众运动轰动起来以后，干部情绪随着高涨起来，这是必然的，但往往被胜利冲昏头脑，随着群众的热烈而飘起来，老看好的，光喊好，不再深入群众，不再虚心向下，想歇歇，满足于轰轰烈烈，不再耐心的钻问题、发现问题，结果运动自流下去。这样在运动中发生的许多偏向和问题，得不到解决，运动即难以提高一步，已得的成绩不能巩固深入，以致一活跃二疲塌。这是我们的老教训，今后必须不再重复，不再走弯路。我们不只是看积极的、好的，也要看中间状态和落后状态的（不好的村或是犯了错误的村和白板村），从全面和具体出发，以先进的带起落后的。所以当运动起来以后，就应根据情况及时对干部强调提出深入群众，虚心冷静，勿骄勿躁，始终和群众一同把运动提高。

（六）在土地改革发动群众中，要开展立功表模运动，提高干部的积极性创造性。完成好的地方要记大功，明令表扬。在运动中为人民立功，为工作模范的好干部，应及时表扬提拔。至于在运动中贪污，收买群众果实的，则应及时执行纪律。只有赏罚严明，则干部情绪才更加饱满。

冀鲁豫区党委关于土改主要经验 向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的报告

（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九日）

（一）实行土改，从政治上经济上彻底消灭封建势力，是翻天覆地的重大变动，在党内党外引起了很大震动（运动深入一层震动一次）。特别党内存有地主及小资产阶级意识的党员，看不惯这种变动，自觉不自觉的可怜地主，反对农民，这是土改主要障碍，必须进行教育及斗争，求得在思想上组织上的统一，才能彻底完成土改，把群众发动起来。

（二）几千年来封建地主对农民统治淫威，像千斤石头压在农民身上，组织农民向地主斗争有很多困难，特别对恶霸地主斗争，农民顾虑更多。对历史遗留下来的淫威，除组织农民斗争，还需我们用行政力量对地主给以压力（即搬倒它），把农民拉一把，就是政府要给农民撑腰、“搬石头”（扣押等），让农民站起来大胆斗争（即打）。经验证明，撑腰、“搬石头”工作做的好，农民发动就快，且彻底深入。

（三）工作方法，后期多采用农民大会。这是以区为单位，召集各村赤、贫、中农民大会，每区几千人万人不等，大会上讲明政策及态度，会后分村斗争。这样可迅速集中上来与坚持下去，很快展开局面。各村一齐斗，可免群众怕突出怕孤立的顾虑，群众胆壮，可互相鼓励；但深入彻底必须分村斗争，支部领导，把农民大会一般号召与分村斗争及支部的具体领导结合起来（清丰四〔区〕这样作的很好）。

（四）此次土改是公开（法令）提出分地分粮，在分斗争果实

上根据填平补齐精神，贫多富少，少啥给啥的办法，是正确的。过去积极分子多分果实的办法，缺点在从政治上着眼不够，且易引起内部不团结，积极分子易含假相。在填平补齐、贫多富少、少啥给啥分配果实的办法下的积极分子，比较真实（没有经济的特殊）。积极分子的提高，可用立功表扬办法。

（五）妇女运动此间初步经验

甲、只有充分发动妇女，农村才有大多数，才能把工作提高一步，彻底摧毁封建统治，才能把妇女动员到生产战线上，以弥补因青壮参军及战勤动员所发生的劳力不足。

乙、充分发动妇女须明确以下问题：（1）须有明确的阶级观点，澄清妇女组织为统一战线的模糊观念，才能发动广大的劳动妇女对地主斗争。（2）必须澄清我们干部的封建思想、大男子主义，这是妨碍充分发动妇女的主要障碍。因为妇女充分发动是要改变许多旧规矩，这些常为我们干部看不惯（比土改还看不惯）而泼冷水。（3）须尊重妇女组织及放手让妇女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如反虐待斗争，争取继承权、参政权、婚姻自由等。

（六）土改中支部建设问题

经验证明，只有坚强的支部领导，才能把土改彻底，把群众提高一步，才能实现党对农民的直接领导。但此间在土改中一般的对支部领导忽视，多满足农民大会、一般号召，偏重区与小区的直接领导。因此党的领导多限在区以上，因而村级工作软弱无力。此点必须在深入土改中强调提出，求得弥补。

（七）中农问题。对中农政策此间有一个时期不够明确，曾允许接受富裕中农自愿献田，但事实证明，中农“自愿”献田是不存在的（献田是被迫的）。领导上对中农有点开口，就必然伤害中农。伤害了中农，农村就没有了优势。因此不能把包括中农在内打乱平分当做我们的政策，必须明确中间不动两头动、不斗争中农的政策，来实现组织农民大多数，巩固农村优势。

（八）在游击区一手拿枪一手分田是完全可能的。经验证明，

在游击区不敢分田或认为时间过早的，基本上是我们的干部思想问题。但游击区分田必须有两个条件，即坚持游击战争，大力控制地主。这两点能做到即可分田。一旦分了田，群众更敢大胆组织起来，并参加武装斗争。

中央局对今后土改明确提出填平补齐、查地、查财、查阶级等很好，我们同意。只有抓住以上工作，才能把工作深入并提高一步。

在村级组织问题，以我区实际情况，在执行上述工作中，应强调支部建设、多发动妇女为重点。

在冀鲁豫区党委土改 会议上的总结报告提纲

(一九四七年五月十七日)

张 霖 之

第一部分 对过去五个月土改 运动的简单总结

回顾五个月来的土改运动，一句话：成绩很大。这些伟大成绩的获得，是全体同志努力和艰苦工作的结果。

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广大贫苦农民得到了土地。封建剥削阶级借以压迫剥削农民的工具——土地，真正还了家。在进行复查中农民还得到了一部分浮财，因而改善了群众的生活，使今年大部农民没有感到春荒的威胁。另一方面，群众的政治地位和政治觉悟也提高了，主要表现在农村中真正看到了民主，农民成了主人，过去的旧统治者被打倒，在政治上已划清了农民和地主的界限，农民已自觉自愿的走向阶级自卫战争的前线。从这次扩军中可以充分看出：

此次扩军是建立在群众高度的阶级觉悟上的，扩军的数目可以证明。

此次超过原规定任务——8000人的4倍到5倍，约3.7万余人（在我们边区是空前的），所以此次扩军是对我们工作的总结。

第一、总结了这一段土改工作的成绩。4万农民参军是在五个

月的土地改革，群众生活的改善、政治觉悟的提高的基础上。如没有这五个月来的土改基础，也就绝不会有4万翻身农民自愿的武装上前线。另一方面，此次扩军是对县、区、村工作好坏的评判。如果群众真正发动了，扩军就容易；如地主没有被打倒，扩军便困难。

第二、注意打通干部思想，纠正对扩军工作认为是“背包袱”，纠正站在战争以外谈战争，强调站在战争以内为战争负责，参军是翻身农民的要求等，从事实上打破了领导落后于群众的思想。证明：对群众的积极方面认识不足，过低估计了群众，这是由于我们与实际结合不够，是从主观消极方面出发的原因。

第三、表现了我们相信群众，走群众路线。参军反蒋反美是翻身农民自己的事情和要求，因而把参军反蒋反美任务一层层交下去放给群众自己去讨论，自己来完成，不限数目，能扩多少扩多少。县区发起革命竞赛方法，农民大会号召群众报名参军保田，分村酝酿群众斗争，但这是建筑在土改基础上的。这是成功的第三个经验。

第四、所以能取得成绩，是我们把扩军与反地主、清查结合起来了。估计到地主在扩军中绝不放松机会进行破坏，我们就对地主加以逮捕，对地主来个镇压，使反革命言论及行动不能在群众中随便流传。因之扩军中谣言很少，保证了群众的参军热情。

目前我们处在反攻的前夜，是打出去的局面。我们动员了4万翻身农民参加野战正规军，是有战略意义的。

得到这些成绩的主要经验是什么？

这次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局面之大、范围之广、包括人口之多都是空前的。原因是什么？

第一、是由于我们公开直接提出分田分财、填平补齐、少啥分啥、穷多富少、彻底消灭封建地主的政策下得来的。证明了只有彻底代表了农民的利益，才能发扬农民的热情，制服地主。这是党中

央政策——五四指示批准了农民对土地的要求的结果，是全体同志正确执行党中央政策的结果。

第二、我们“搬石头”、撑腰、坚决镇压控制地主的工作做得很好。我们公开提出消灭地主阶级的政策，地主绝不自愿低头，而是想尽一切办法顽强抵抗到底，作拼死的斗争。这是极其尖锐的、你死我活的、白热化的阶级斗争。加上战争环境，敌军压境，更增加了地主阶级的反动性。而农民在斗争中逐渐组织壮大自己的力量，因此农民在开始及斗争中有很多困难，所以我们行政力量在这种情况下不是采取错误的旁观态度，而是直接把地主打翻在地，叫群众狠揍。这样我们政权一面对地主施以高压，一面放手让农民大动，农民才能起来，才能最后达到农民自己用自己组织力量控制地主。我们大部地区做到了这一点，所以农民就很快起来了。

第三、我们的农民大会是一个很好的创造，以集中对分散，用统一的步骤向地主猛扑，把地主打得落花流水，使之自顾不暇，不能互相支援；在农民一致行动时，则可免除群众怕孤立怕突出的顾虑，声势大，并可互相鼓励帮助。尤其后来开展的农民大会与分村斗争相结合，与党的领导相结合，就使农民大会更加圆满（过去分村斗争及支部工作注意不够）。但农民大会不能经常使用，而在工作的转变关头来使用是很成功的。

第四、组织了全体农民的彻底翻身运动，包括农夫农妇，男女老少一齐下手，集中力量分田分财。这和过去只是一半农民不同了，这就减少了内部很多麻烦，并保证了内部的统一。

第五、我们由分田到保田，把工作抓住时机及时的提高一步。有人在分田时考虑群众要不要，在保田时考虑群众去不去等问题，这在运动中已证明是脱离群众的、消极的、错误的。运动证明：分田是群众要求，是群众自己的事情，保田也是群众自己的事情，因而我们领导群众参军参战和战斗化，支援了前线，保证了战争的胜利。

第六、由共产党坚决领导农民分田，到翻身农民拥军拥党、参

军参党，这给党加强了力量，是今后建立农村一元化领导的基础。做到由翻身农民改造一切，经过翻身农民改造政权，改造党的领导机关，就是把〔使〕翻身农民中最优秀的分子参加到党的领导机关中来，成为提高工作、争取革命战争胜利的条件。

以上的成绩与经验的取得，是在五个月的复杂尖锐的阶级斗争中全体同志对人民对党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的结果。在战争战勤复杂情况下进行土改，提高了我们干部的政治觉悟（对地主反动性的认识更具体与深刻）与能力，这是今后复查中最宝贵的学问和基础。

我们的缺点有两个

第一、工作中的群众路线还是非常不够，表现在工作上放手不够，没有能很好的把我们的工作计划、党的政策大胆的交给群众，让群众自己去讨论去行动。由于对群众相信不够，因此在很多问题上落在群众的后边。只以自己主观落后的眼光来看群众，脱离了群众，形成我们工作中的保守，看不见群众创造，工作不能及时迅速提高，都是不走群众路线，包办代替的结果。

第二、相信组织与使用组织不够。这表现组织观念、群众观念不强、不完整。组织观念与群众观念是分不开的，对上级对下级，对群众对组织是一致的。由于我们组织观念不够明确，对上级指示、总结、经验介绍接受很迟钝；虽接受了，还缺乏有计划的推动组织，使用组织力量推动工作做得不够，所以在工作中还是小手小脚，缺乏力量。

不可否认的在土地改革工作上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如消灭地主还不够彻底与普遍，地主还能隐藏好多东西——土地与浮财；群众发动不够充分与普遍，在政治上组织上还留有地主的“店房”和“防空洞”——落后的群众。这些没有发动的群众隐藏地主的财物，成为地主的“店房”和“防空洞”，地主依靠他们尚可自由走来走去。因此，巩固我们的优势，提高我们的工作，必须消灭地主的

“店房”和“防空洞”，才能进一步将地主消灭。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力戒自满麻痹。这是我们今后继续执行消灭地主政策，充分普遍发动群众的关键。

第二部分 如何深入复查工作

复查工作的方针与要求

方针是：面向地主，清查地主阶级隐藏的土地、浮财、组织（地主派狗腿掌握的假农会），把地主在经济上搞得干干净净，在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孤立起来。要求经过复查，继续以填平补齐的精神来分配果实（应按原有成份来分配，不要按现有地了）。在复查中改善干群关系，干部多得群众的东西应拿出退还群众（对干部采取教育方针），求得进一步充分普遍发动群众。

只有这样，才能从经济上、政治上、组织上彻底消灭地主阶级，以群众的组织力量来控制地主，以便在今后长期复杂残酷尖锐的斗争中，最后完全消灭地主阶级。

对地主阶级的斗争是长期复杂的斗争

地主阶级本身的封建思想是无法消灭的，而没有了地主阶级的经济组织，并不等于就没有了对地主的斗争。因此我们对地主阶级的镇压控制也是长期的，对这一点我们绝对不能麻痹。由于我们的社会政策、各种制度，都是从消灭地主阶级出发的，尤其我们尚处在地主阶级思想的包围中，就决定了地主阶级对农民是反抗到底的，其斗争方式是五花八门，无所不用其极的。其最厉害的一着，也常常是我们看不到的，即利用一套传统的封建思想，来包围袭击党内或群众中存有比较浓厚的小资产阶级意识及封建思想的人，用哀告哭诉、花言巧语等手法，使之不自觉地成了为地主阶级辩护的义务律师或刽子手（如吕堤事件）。因之我们对地主阶级不应存任

何幻想，幻想对地主阶级从思想上改造是错误的想法。地主阶级的“服”，只是无可奈何的，地主阶级的“心”是不会服的。请看地主阶级对付群众的斗争办法就明白了。

地主对付我们的办法，大致有以下三种：

第一、镇压恐怖政策。如阳谷土改大运动中，周庄特务地主控制全村农民在关帝庙盟誓：“不参加农会”。其他如李坊暴动事件，昆吾陆家河地主公开打死妇会主任，强逼农会主任上吊等，借此镇压群众运动，保持其封建统治。

第二、派遣走狗打入我之组织，从中破坏；或直接混入我之组织，当帐先、指导员等，假装“进步”，掌握刀把子，借刀杀人。如吕堤事件，应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

第三、采取隐蔽软化政策。在大势已去，势在必行的情况下，企图大罪变小，小罪变无，以保存其最后最小的一块阵地，待机复辟。如鄆北一个我们认为不大坏的留在家的地主，此次敌人来时，他去迎接蒋军，并说：“你们如站不住脚，我们准备10年不讲话，如能站住脚，你们往北去，杀——杀——杀呀！”而在寿张从地主女人身上搜出了一张准备复仇的斗争帐单，地主对我们准备作长期的斗争。

彻底消灭地主的标准是什么？

分三方面谈：

一、从经济上来讲

彻底对地主查地查财，把地主剥削农民的全部血汗全部追回，消灭地主封建经济，使地主不能依靠剥削来过活，只有依靠劳力才有饭吃，并根绝其可以作反革命资本的一切资财，这就叫经济上的彻底消灭。

对地主的狠就是对群众的爱，这是无产阶级立场。狠是为了在经济上彻底消灭地主阶级，因之在复查中实行先改后留的办法。罪

大恶极的地主，交群众自己来处理，对一般中小地主及干部家属的照顾，也要交给群众去照顾。

必须充分认识查财查地是群众对地主进一步的斗争，也是地主更痛更怕的，是地主阶级舍财留命的阶段（第一步是舍地留财），因而也是更复杂更尖锐的斗争。我们要有高度的警惕，绝不要麻痹自满与骄傲。

查地查财的路线与方法：必须从地主如何对付我们的办法来决定我们的路线与方法。

（一）根据我们的了解，地主一般对浮财采取分散埋藏的办法。一种是分散到落后村和落后人的家里，或是埋在灯下黑的地方——所谓“开明士绅”和村干家里。其办法一种是公开的，另一种是秘密的偷偷的埋放到干部家里，或自己埋在野地里。这是由于我们工作不深入不普遍，以及内部思想紊乱所致。这是我们与地主阶级斗争过程中一种自然现象，所以村干发生埋藏地主财物并不足怪。所怕的是我们看不到这种现象，或者看到了表示没有办法。只要我们看到了，又能想办法（如寿张的办法：号召村干反省，使干部思想上提高一步，自觉的把东西拿出来，此外并加以组织上的保证，如不拿出来查出后就要处罚等等），即可破坏地主的这一阴谋，把复查继续下去。

（二）因此复查必须走群众路线，组织广大群众复查，也就是在清查地主土地、浮财的号召和行动中，采取放手的充分的发动群众，大胆放手交给群众来干，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用群众的组织力量，动员先进村发动落后村，动员积极分子发动落后分子，使落后分子落后村一齐参加运动。只有消灭了落后的（村与人），有90%的农民发动起来，地主的土地、浮财绝大部分可以被清查出来。所以复查运动的彻底与否，也就是发动落后群众的彻底与否。

（三）在群众一致向地主斗争复查清算下，采取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发动群众捉、哄、威胁地主等，是允许的，但少数于游进

行盲目的打或拉滑子的方法以代替群众路线是错误的。

二、从政治上来讲

主要是划清农民与地主的界限，使农民知道与地主是两个对立的阶级，并认清旧社会一切罪恶皆由地主造成，使了解在今后复查中，一切罪恶归地主。采取诉苦、追穷根等方法，要结合群众行动，启发农民思想自觉。思想启发不结合群众行动，是难以收效的。所谓思想启发，就是使每一行动做到多数人的自觉自愿。思想启发要作到大家认为是“应当！”“该！”而不是“兴这”、“兴那”，是随大流的，不是自觉的表现。

因而在今后复查中，什么“抢”、“清剿”、“扫荡”等口号字样，要一律取消。因为这些口号，阶级性不明确，容易模糊运动本身的反剥削制度、改变生产关系的政治意义。要换成“还家”、“清算”、“反复清算”，这不仅具有政治的严肃性，且对建党（生产的党）与政治上启发群众，有重大意义。

其次，要想把复查工作搞得更好，就必须提高与加强农民的无产阶级思想，加强党对农民在思想上的绝对领导，保证农民坚决跟党走，才能与地主斗得更加坚决。但这绝不依靠强迫命令，而是教育启发，行动体验，发扬与提高农民的积极面，以克服其消极落后面。思想发动是个艰苦工作，还必须依靠有系统有组织的教育，如开办短期党员训练班，加强小组会的活动，往往对思想启发提高的作用很大；尤其在工作转变关头，开办训练班更加重要。干部与党员犯错误，往往是由于政策上的糊涂所造成，尤其是下层村干部，更须思想启发。但我们却采取组织手段多，对村干教育不够耐心，这是不对的。今后党的精神必须在下层作教育启发，切实注意下层村干部及群众的思想教育，注意群众的思想发展。

三、从组织上讲

要巩固农民的优势，长期镇压控制地主，缩小地主的活动范围，关闭地主住脚的“店房”，镇死地主利用的“防空洞”，基本问题在于依靠群众，在于组织群众的大多数。过去由于我们对村级

工作注意不够，领导不强，组织力量不够强大（即缺乏多数），加以处于封建势力包围之下，村级工作长期处于起落动荡的状态中，因之今后组织大多数更加重要。中央指出：各地表现的错误，在于没有注意组织经常包括90%以上的人民统一战线。因之我们决不能满足已经组织起来的少数先进分子，而必须面向落后村、落后人，发动落后村、落后群众。必须做到联合中农与发动妇女这两件事情，农村才有大多数。

（一）联合中农问题

必须明确发动群众联合中农的政策，把中贫农组织在一起，面向地主斗争。强调天下穷人是一家，中农是自家人；强调大村照顾小村，富村照顾穷村；以小区或区为单位调剂土地还家，以避免小村贫农斗中农的现象。

分果实问题，须掌握穷多富少，少啥补啥，填平补齐，保证中贫农的团结。寿张发动中贫农算帐的办法是很好的，其内容主要解决：中农认为贫农分的多，自己分的少，对贫多富少的分果实的办法不很同意，但经过算帐后，即从中贫农家庭生活状况等，打通了中农的思想，承认了贫农应当多分的思想。

在复查中必须联合中农，不注意吸收中农参加斗争，是冒险思想。但在联合中农中仍不能忽视保持农村的贫农骨干，这是组织路线问题。

过去违犯中农利益，有以下几种原因：（1）面向地主斗争不明确。（2）片面的群众观念，光看到贫农部分，缺乏群众大多数的观念。（3）对中农政策不明确，没有明确指出对中农的联合政策。

（二）发动妇女问题

所谓妇女即是农妇（不包括地主富农的妇女），是农民中的一部分。土改复查是全体农民的要求，因之必须发动男女农民一齐起来斗争。妇女斗争的对象，主要是对地主。但必须承认妇女受着双重压迫，妇女本身有其单独的特殊的的要求，所以要有单独的组织。

因此妇女实现其本身的特殊要求，主要依靠妇女自己组织的运动，如反虐待、反推穿、土地所有权、自由婚姻等。所有这些只有妇女本身或共产党员才能提出与坚持，而不是一般农民所能提出与坚持的。所以应该尊重妇女的组织及其人格，对妇女更多的支持与撑腰，要放手的让妇女自己的组织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反虐待等是妇女目前的迫切要求，而且是充分发动妇女不可缺少的内容。有的认为目前实行反虐待、婚姻自由等，是脱离现实的说法，是不对的。因此我们认为这些妇女要求，在土改斗争中、复查中或运动后期都可以做，以便更加充实与壮大农民的力量。

“妇女独立运动”涵义比较模糊，容易引起误会，今后以不用为宜。

妇女以自己的组织去解决自己的问题，会不会造成对农民的对立？从实际工作中证明不会的，相反，由于妇女解决了自己的问题，与农民更加团结，增加了农民的力量，并未引起分裂。舍利寺的妇女说得好：“男同志进步了，女同志也进步了，街坊邻居也不吵了。”原因是由于：（1）妇女运动是共产党领导的；（2）地主被打倒后，农民进步了；（3）由于农民的进步，农民自然就看不惯对妇女的那种野蛮的虐待，这同党员看不惯党内军阀主义、贪污腐化等是一样的。那么妇女反虐待等革命斗争，怎会引起与农民的对立呢？因此在今后的复查中，我们应以发动农民的力量来发动妇女，则今后的内部问题可能更加减少。

但这些斗争（反虐待等）是不同于对地主的斗争的，这些都是封建地主阶级带给群众的副产物，因而这些斗争都应约束在政治斗争的范围之内。斗争是为了教育、帮助进步和团结，故不能牵扯到经济上的处罚。

几个具体问题：

（1）关于妇女继承权的问题。肯定妇女的产业无论离婚改嫁，由妇女自己来处理。妇女未分地的，应当分给，已分的而未明确解决妇女所有权的，应当继续解决。

(2) 反推穿的问题须要解决。这是妇女一种很大的负担与痛苦，且是妨害家庭团结和今后发展生产的一种障碍。

(3) 婚姻自由问题。在农村中目前主要是女的离男的，干部是男的离女的。但当群众尚未发动时，干部为了照顾党的影响的原则，应作等待，这是基于党员干部的自愿自觉。

“搬石头”、坚决镇压地主政策与对农民及干部的保障政策

一、对地主的镇压政策

在组织农民坚决消灭地主阶级的政策下，地主要顽强反抗，我们就须进行针锋相对的坚决镇压政策，解除农民的顾虑。只有这样，才能发动群众，贯彻土地改革。我们在这一时期，坚决杀恶霸地主，基本上执行这一政策是正确的有成绩的。

今后在复查中，杀人须要更加审慎，更加策略，以便分化麻痹地主，目的是为了农民的利益，否则工作就会吃亏。因之，今后杀人须有下列原则：

(一) 杀地主中最坏的最突出的，以及最忠实于地主的流氓死走狗，以便控制一般。否则就会逼跑或逼翻一般，使之坚决与我们干起来，对群众是不利的。杀人权仍归县。

(二) 要走群众路线。杀群众所最痛恨的最坏的地主是为了发动群众、团结群众，不能以杀人代替群众斗争。

(三) 群众对地主用刑是否对？如在大运动中，出于群众的义愤是可以的，但我们反对干部强迫命令群众对地主用刑。

镇压是多方面的，如扣押、群众性的控制都是镇压，镇压不光是单纯的杀。

二、对群众及干部的保障政策

在今后复杂尖锐的阶级斗争中，地主阶级是用各种办法来破坏我们对地主的斗争，用一切阴谋来中伤我们的组织与干部，因此今后

我们对群众及干部的处理，应万分注意。故作以下规定：对犯罪嫌疑者，侦察〔查〕权是上一级的，逮捕权是超一级的，处理决定权是超两级的；但对实行武装叛变暴动者例外。

党的政策与群众路线

党的政策与群众路线，两者本来是一致的。

党的政策是从哪里来的？是从群众的积极的方面集中起来的。开始时常常是比较突出的，和一般常常有些距离的，这种差别就叫作领导。

什么叫领导？什么叫政策的贯彻？就是把集中起来的积极面，使群众逐渐了解接受，使政策变为群众自己的而积极的去执行。如党的土地改革政策，就应依靠群众，交给群众去讨论，由群众自觉自愿去执行。这就叫作群众路线。只有走群众路线，才能提高群众，克服落后，发展新的政策。

由于群众路线和放手不够，我们常常落在群众后边，常常从群众消极方面出发，而对群众积极方面估计不够，因而是脱离群众的。如土改后群众有参军要求，有些人不了解这一点，扩军任务下去后表示无信心，困难；对上级的任务不是积极的贯彻等。

今后我们必须站在群众的前头，发挥群众的积极方面，克服其落后方面，大胆领导群众，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如果没有政策，群众不会提高；不走群众路线，政策也不会提高。群众的自觉自愿，应是从当时当地的群众集中起来的。办法有间接分散的，或公开直接的集中群众意见都是群众路线。贯彻政策基本上是放手走群众路线的问题。

第三部分 组织领导问题

党的领导问题

一、目前党内思想还有些紊乱，表现在工作步调和内容上都还不够一致，如在消灭地主、支援战争上存在着一些不同的意见。党内的统一，有了进步，但从目前工作需要还很不够，有些县份仍是问题，如部门之间不够协调等，主要是由于党的领导问题。我们对这种不统一，绝不能麻痹忽视。这是因为统一才是力量，党内的统一，是克服困难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我们必须紧紧掌握住这个武器，向一切损害党内统一的错误思想作不懈怠的斗争，来保证党的统一。

党内思想斗争不开展，组织纪律不严格，势必使非无产阶级思想与无产阶级思想分庭抗礼，弄得党内是非不明。党内缺乏严格的纪律，就不能有统一的行动，也就不能成为严格的战斗的党。党内不能树立起明确的无产阶级思想，就一定看不出是非，就很容易为地主阶级的封建思想所俘虏（如范县吕堤事件）。

二、党内思想斗争不开展，是由于党内民主与集中、个人与组织的关系还未弄清。党内的统一是建筑在民主的基础上的，所谓高度的民主才有高度的集中。目前我们党内统一不够，不少是发扬民主不够，此外是个人与组织的关系弄不清。因此在同级党委内发生了不同的意见，发生争论时，哪是组织意见，哪是个人意见，好多同志弄不清，因此也就不能发挥与使用组织力量，严格组织纪律，保持党的统一。组织意见与个人意见分野是：个人意见为多数党委同意，就成为组织意见；反之，个人意见为多数党委所反对，那么自己的意见只是个人或少数人意见，不能成为组织意见。弄不清这些问题，就不能发挥党委的组织力量，建立强有力的党的力量。

三、过去对于党对农民领导作用重视不够，具体表现在对支部工作重视不够，以致今天党的领导只限制在县区以上，而最重要

的、最基本的支部工作，严重的被忽视与放弃，形成党在领导上的脱节现象。这是党的很大损失。要认识实现党对农民在思想上的绝对领导，必须加强支部工作。经过农村支部组织在群众中的活动，才能保证农民在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把运动提高。但我们很多农村没有共产党的支部，或有而不开会、不领导。群众运动离开了党的领导，那不是不民主就是假民主。没有真正的民主，就不能团结与提高群众。

四、为了使我们的党成为严格的战斗的党，今后在党内必须开展反自由主义斗争，向非无产阶级思想开展斗争。在党内必须明确，反对什么，主张什么，反对无原则，借以严密党的组织，保证党的统一。党的领导就是：政治决定，思想打通，组织保证，三者缺一不可。只有如此，才能建设起一个严格的战斗的党，来领导目前复杂尖锐的复查斗争。

支部建设问题

一、老党员老支部问题

如何认识老党员老村干的问题？由于我们过去对支部工作注意不够，党员的政治水平及能力未能及时提高，发生老党员、老村干在新的斗争中不积极的现象，引起领导上对他们的憎恶。对支部或党员的看法，从阶级成份上出发较多。一般老村干多是民主民生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他们在过去由于多分果实上升而为中农，他们是党员或是支部负责人。所谓新村干是土地改革中的积极分子，而是过去民主民生中比较落后的分子，他们多是非党员或新党员。因此我们不能把老党员降低到中农群众的水平去衡量他。因为参加我们党的，不管他成份如何，只要参加了党，就成为无产阶级了。因此我们对老村干不是降低到群众水平，而是提高到党员的水平来看他们（因为支委是党的领导机关之一）。今天他们落后，应看成是党员与非党员，党与群众的关系，是党落在群众后边的问题。如果我们这样看问题，问题就很容易明白了。

这说明了：农村支部党的领导是无力的，是脱离群众的。但从领导上来看，对支部领导是很少的，支部没有人领导，支部党员没有训练教育。因此老党员老支部的领导作用不够，当然是党的领导问题。

其次，由于在过去工作中没有组织起群众大多数，结果地主没有被打倒，地主采取一时的隐蔽，待领导上一松气，干部缺乏广大群众支持，村干处在封建地主的层层包围中，他们的政治水平又不十分高，地主乘机反攻，村干支持不了，因之村干消极，村级工作就日趋消沉。

由于以上情况，对老村干应采取教育改造提高的方针。寿张对老党员老村干集中训练是个好办法。

在运动中，少数掉队落伍是可能的，但大多数经改造后还是有能力的，所以不能对老村干采取鄙视态度。

二、党对农民的绝对领导的实现，只依靠分委、县委是不能实现的，必须依靠支部。因此在复查中要大量发展党，在农村中建立党的组织。发展党最低限度要做到3%的人口比例。在拥党运动后，大量翻身农民要求参加党，也可形成参党运动。但手续上必须是个别发展，一定举行隆重的入党仪式。

三、为了加强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在我中心解放区，支部书记或党员的模范村干，可以共产党员的面貌公开，但党的组织是不能公开的。

四、为了加强党的领导，首先要建立与健全组织生活（即支部生活与小组生活）及召开小组长联席会、支部党员大会。

五、党员的训练问题。县委或县委宣传部在麦后可成立经常的党员训练班，时间7天到10天，不要长了。

农村组织问题

今后在群众运动已有初步发动的基础上（土改复查准备秋前完成），农村要从散漫的不严密的情况下走上组织化战斗化，把所有

力量组织到服务于爱国自卫战争中去，使农村适合于战争、土改与生产。土改后农村的中心任务是生产，否则是不能克服我们的经济困难。过去我们对动员群众积极生产不够，如不转变，则会遭受大的困难。所以我们要提高群众生产，厉行节约，减少村负担村开支，使农村组织服从战争与生产。这必须在思想上组织上贯彻这一精神。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之工作向前提高一步。为此要做几件事情：

一、建立与健全村级指挥部，支持战争。

二、小区与村成立农民委员会，统治一切，成为小区与村的政权机构，不另设政权机构。区以上，由党委民运部，联合会，政权的民、教、司成立土改委员会，政府之民、教、司在该委员会领导下进行工作。

另一种是政府与联合会合并成立政府委员会，领导土地改革。以上只是草案，各地委可研究执行。

三、为了加强农村战斗化组织化，必须加强武委会的领导，因此各级党要加强武委会的干部。

四、农村组织化战斗化支援前线，有这样几个具体要求：
（1）要适当解决给部队带路问题。（2）要主动照顾部队，解决部队住房子的问题。（3）要保证逃兵归队，对战争负责到底。逃兵一定要动员其归队，否则就是瓦解正规军。（4）站岗放哨问题。这是很大的组织工作，必须采取一把抓的方式。目前站岗有些形式，专查军装的，今后应先查便服的，进一步走入普遍的路条制度。

湖西游击战中的土改运动汇报提纲

(一九四七年六月十五日)

湖西部分县区的土改运动是3月份才开始的，迄今东边各县基本上仍未进去，只是西边几县大致弄开了局面。土改以巨南县较好，成武县土地也大致分过了，部分村庄进入复查，单虞县大部、单县一部地区都正在进行着。

一、湖西的游击战争是走了比较严重的弯路的，因之在进入土改时也作了很大的思想斗争。那时正是敌人二次打过陇海路北来一段，游击战争刚在巨南、单县、成武立脚之后，群众与干部思想均甚紊乱。五军过来咱能撑得住？我军又过黄河北，又加上地主复辟，群众虽然看到我们仍在坚持，已较前安定很多，但仍处于害怕观望和疑惑之中。因为群众有他第一次蒋军北来的痛苦经验教训。我们当时提出土改之后，干部说领导上是主观主义，环境动荡，城内有敌人，外边还有几个钉子，群众不敢要地。这种干部占大多数。我们研究，不是群众不敢要，而是干部以此来掩护自己不敢作。堵住这个思想又冒出下个思想，有的干部说已作了几次斗争，地主已经消灭了，村里没啥作了。还有的提出我们干部少（有些在黄河北后方），村里工作也垮台了。第三种思想是认为湖西被杀的多，是斗争斗的狠啦，以后再斗争，地主报复会更大，越作越危险。这三种思想总之是右倾退缩、妥协投降思想。我们分析原因，一是老敌情观念，形成走退却的老路子；二是不认识8年的群众基础、群众的力量和要求，因之就忽视土改，这面怕地主，那面就提出地主已经消灭，没啥改头；因之第三也难想到我们如坚持斗争，实行分田，群众将会怎样一手拿枪一手分田，造成热烈而广泛的群

众性游击战争。外边成熟的经验难以接受，过去反倒算的精神也无心吸取。当时我们领导上也不算明确，也顾虑群众是否要地，但决心是有。大家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干起来，提出抓紧空隙于春耕前完成，要以反“扫荡”的精神来进行。强调干部亲自带头，唱黑脸；强调政府撑腰，也带头，也唱黑脸，替天行道，一定完成任务，否则受纪律制裁。到下边做，也是如此贯彻的。一做才恍然大悟，我们太落后于群众了。

二、不同地区出现了不同的工作方式。（一）老地区：敌摧残的比较厉害，干部也认为一团糟。我们强调干部下水，一切向地主要。办法是召开村干会议，也说明不实行土改不行。又召开穷人会，表明态度，不当孬种。因为穷人正在生活困难中，这样一开会，情绪高了，群众说您留一个干部在这里也会办起来。还开了地主会，骂了一顿，叫地主与群众宣誓，执行约法三章。第二种地区是有些工作基础，但半生不熟，敌人摧残也不厉害。我们开小区的半日积极分子会议，下午召集。在同一时间把地主全部捉起来，倒粮、倒地，以前斗争过的都在内。在积极分子会议上我们向他们道歉，承认以前的错误。在群运开始我们将地主一杀、二扣、三放，放的都有悔过书、三联单、四大保证。第三种是白板区，也是游击区。我们把力量集中，武装集中，搞了这片搞那片。有时白天分散，晚上集中，一面有人放哨，一面群众分土地。成武四区、单虞莱河区均是如此。第四种是敌占区，是武装请客办法，把地主捉来，保人具结，以人头保证土改。

以上只把不同方式的特点说一说，一般性的东西没提。

三、关于地主管制。首先是政府管制，即到政府悔过自新。有的地区实行平安登记，即把地主坏分子另册登记起来，对于逃逸者明令通缉。其次是群众管制，即政府授权给群众，结合着政府登记，公开向群众宣布授权，如有反动行为，群众即按法执行。有个别地方叫地主鸡血宣誓（酒里掺鸡血），赌迷信咒。三是迫使地主互相管制，即是连环保。单县有个坏蛋在村里给敌人办公，一露头

就被打死了。这样确实给地主压力很大，有些地主不经政府批准不敢逃难他移。敌人占领金单公路要镇白浮图，有个会员害怕，把果实粮送到地主家，地主高低不敢要，磕头不起。

四、在土改中组织群众与武装。分地是群众的基本要求，分浮财是群众的迫切要求。这一段分浮财上有毛病，一是有的干部说土改是改地不改财，因之有些地方不改浮财；二是一哄而抢；三是谁缺啥要啥就给啥，不评论研究，不公平。比较慎重的一是根据东西多少，二是根据群众不同的需要，三是要分到哪些人身上。潦草的是干部分配，细密而民主的是群众讨论。

关于群众组织问题。我预先想在游击区为了减小目标，可组成互助组，但群众不满，还是成立农会。组织群众的办法，一是叫地主礼拜请群众组织，因为是他吓垮的；二是分果实时分组评议，将计就计的。这是两种较特殊的组织办法，进行组织时一般都经过怎样翻身的思想教育或讨论。

武装保田是土改后群众的要求。单虞一小区开了村干部会议，研究土改后怎么办，讨论生产、整理组织都不感兴趣，一讨论武装保田哇哇叫，组织的保田队比区队活动还积极。一个村地主正在请农会吃请，保田队和敌人接火了，把饭菜酒作慰劳品送上去了，敌人一看人多就跑了。形成群众起而保田的有两个原因，一是防备和镇压地主，二是打土匪特务，否则是不能生活下去的。在游击区就是多一个特务土匪，给群众威胁很大，不斗则已，一斗就必须得和他们干。

地道与土改可以结合。只要把地分了，为了保田都很愿挖地道。未分田前，干部不愿挖，群众也消极反抗。巨南分田后4月8号到19号，就挖了将近200里的地道，普遍大部分村庄。

五、工作上是否有毛病？有！地主说：“八路又下雷雹子雨啦！”这说明魄力很大，也说明有一阵子的思想。有的感到敌情紧，快做快走，几天的工作，于几个钟头内简单了之。也有暂时做一下，主力来了再彻底做，房子不分，积极分子不明确，当然也出

现的少。他的工作是不自觉的，所谓“等因奉此”。第二个大缺点是我们干部还落后于群众要求之后，不敢撕破脸放手斗争。最初想群众不敢要地，但贫农说：“除分爹我不要以外，啥我都要。”土改之后群众自动组织武装，有迅速的情报网。成武一个区以前3人，现在到30多人了，这都是所想象不到的。到现在干部的右倾思想还是浓厚的，阻碍着群众打蒋军挖蒋根的阶级热情。不少地方对群众思想教育就很薄弱。在巨南昌邑区我们问一个群众，他说：“虽然分了几亩地，也不敢上粪，您一走还不是毁我，还不是白给地主生产？”要进入复查，彻底消灭封建势力，还得作很大的思想斗争。尤其是本地干部，从统战环境而来，对于社会关系，很难快刀斩乱麻。

六、我们的几点体验。（一）工作是否好做，主要依赖于干部思想通不通。这一段在干部思想中突出的问题，是强调地主生活，站在地主方面替地主打算得很具体，替穷人打算得很抽象，为地主活而不管穷人。一说地主没做过活。正因为他没做过活，才是大罪犯一个哩！因不恨地主，在改革时就下不得手，下了手又不坚决彻底。正因为对地主之反动本质不了解，或是右倾害怕妥协投降，产生两保险思想。对地主仁慈，必然产生对中农狠，危害中农。我们对这种现象除教育之外，组织上是表扬好的，斗争差的，强调亲自下水，干部带头。这样作法也很合客观需要。群众思想是想要不敢说，想干没有头，最顾忌的是上级不狠，不撑腰，不批准，怕抽梯子怕孤立。因之必须坚决撑腰，和农民意志一致。方法上是不一点一点点的搞，而是一片一片的搞，引起“□啦”，“天塌砸大家”的空气。（二）一手执枪一手分田不是空口号，要行动起来，必须：（1）政权要明确站到农民方面，又出布告又亲自动手，吓倒地主，态度不免粗暴，要粗鲁农民化，对地主不需要温良恭俭顺〔让〕。（2）镇压地主、控制坏蛋要及时，先搞地主，不能先搞群众，坏的要狠狠镇压。在控制地主上，我们感到态度越严厉越好，手续越复杂越好，条件越详尽越好。（3）今天消灭地主的政策思想要明确，

肃清团结地主的统战妥协思想。锄奸上要大胆放手，不要强调手续，领导上要有决心。（4）要抓时间，抓空隙，不要光怕敌人“扫荡”，不要使敌人有时间建立伪政权。（三）开展工作如干部少，可指名向村要差，要来后训练一下，分散工作。

现在扩军很顺利，除扩补本县本区外，巨南扩1000人，成武扩600人。今后直起腰抓破脸和地主斗争，还是个大问题。

（李夫 整理）

在听取四、八地委典型汇报后 关于贯彻复查的发言（节选）

（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四日）

潘复生

一、关于领导思想与干部思想的问题

这是深入贯彻复查的先决问题。自区党委土改会议后，各区复查均有进展，但个别地区满足于表面的轰轰烈烈，大动参运，认为地主已搞得差不多了，群众情绪很高，对工作估计过高，因而在干部中产生了“差不多”和“歇一歇”的思想。这是非常危险的思想。因为我们如果认为工作已经“差不多”而松弛下来，地主就会马上用一切力量，采取一切手段（公开或荫蔽，合法或非法）向农民反攻，而且我们不能解决贫农要求，贫农就会离开我们，我们就要脱离群众，运动就要失败。所以要贯彻土改复查，必须坚决反对“差不多”的思想。

我们对中央指示彻底消灭地主阶级（社会上不准有地主阶级存在），要地主永世不得翻身的认识是模糊，对地主残暴反动、血腥统治估计不足。党领导成份贫农是不多的，没有亲身受地主的压迫，对地主阶级的残暴感觉是模糊的。有些同志对农民的行动，口头虽不说，但内心不服，那就不能诚恳的积极的支持农民斗争，而对农民撑腰不够。必须充分认识地主阶级有2000余年的统治历史，是不能一下子被打垮被消灭的。必须在党内把地主阶级阴险毒辣残暴的罪行，随时发现，随时教育。要把地主当成一个阶级来看待，地主阶级不用血腥统治，不杀人是统治不下去的（他们有钱有势，

勾结土匪，勾结政府狗腿镇压农民），不能把地主当成一个一个人来看待，认为这个地主没有当过汉奸，还不孬等，这就是阶级观点的模糊，当然就“狠”不下去，也就不能彻底消灭地主。要明确地主就是罪恶。

另外，由于我们长期脱离生产，对贫农的痛苦没有深刻体验，认为贫农今天得了些房子得了些地，已经“行了”，而厌恶贫农的“贪得无厌”，这是极端错误的。不认真调查贫农的实际生活，不去了解贫农真正的痛苦与要求，今天怎能说贫农已经“行了”呢？今天提出：“中不中，问贫农”很好，方向很明确，贫农说行就行，贫农说不行就不行。今天赤贫、贫农没有一个会说“中了”的，今天贫农最怕我们“差不多”，不帮助他们彻底翻身。因此一定要克服“差不多”思想，否则就要脱离群众。

今后复查，在组织上要肯定地成立贫农小组，“中不中，要听贫农”，把贫农的要求提高到党的政策水平。这就是复查的基本方向。领导上掌握了这个方向，就不会错，彻底消灭地主就有了保证。

二、放手撑腰走群众路线的问题

这一问题领导上应一再贯彻（不要以为这是老生常谈而有丝毫放松），要更加强调将放手撑腰走群众路线贯彻到底，不要认为我们在各方面已经做得够了。须知群众是逐渐发动起来的，群众的觉悟是在不断的斗争中逐渐提高的。中央五四指示的精神是：彻底消灭地主阶级，充分发动群众，实现耕者有其田，就是这三个问题。我们是否正确执行中央指示，就要看我们是否放手撑腰走群众路线，如果这样做了就不会有问题，否则就要犯错误。如不走群众路线，杀了地主群众还不知道，就会发生错误；强迫进行分田，就会发生没有土地问题的白板区。所以土改彻底不彻底，不只看群众是否每人分了3亩地，基本问题是：是否放手撑腰走了群众路线，哪里放手撑腰走群众路线走得好的，那里工作就好，否则就不好。只有

贯彻这一路线，才能克服“差不多”思想、自满情绪和歇一歇的现象，今后复查问题才好解决。

关于如何放手的问题，就是观念上相信群众和掌握中农政策的问题。当群众起来雷厉风行打击地主，劲头比我们大，我们如包办代替，就是不相信群众。农民积累了几千年和地主的斗争经验，对地主谁该留生活，谁该扫地出门，谁该杀，农民是有一定尺度的。放手给群众，群众会恰当处理的。

关于团结和联合中农的政策要放手交给群众讨论，要在贫农会上放手让群众讨论“为啥中贫农是一家”，使团结中农政策变为群众自己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只有联合中农，才能团结90%的群众，才不致犯冒险主义的错误。只有把中农政策交给了群众，领导上就可毫无顾虑的放手交权。这就是领导与群众相结合。

对中农利益不损害不是绝对的，如有些少数个别敌性的统治者，群众要斗我们不叫群众斗也是不对的，可以斗一下，这不能谓之损害中农利益。但联合中农是绝对的，所以农会要吸收中农，果实也应分给他一点。要承认中农、贫农这两个阶层是有矛盾的，贫农存在着朴素的均田思想，领导上就要通过群众好好解决，今天不联合中农，革命就要失败。所以没有联合中农政策，就不能放手。

撑腰要撑到底。群众向地主斗争，开始表面上看到有些地主不打人不骂人，便认为是老实，因此对某些老奸巨滑、笑里藏刀、老有经验的封建地主，要在斗争过程中竭力揭发，提高农民的认识，予以镇压。但撑腰又是群众要求，因之不能随领导上的好恶，随便捉来，随便放掉，捉放要交给群众讨论。

在运动开始，往往群众跟不上政策，一旦群众起来，群众的要求又往往超过了党的政策。这种情况下，就要坚决满足群众的要求，修改党的政策。只要真正是群众的要求，区党委坚决批准，这就是真正的群众路线。

关于倾听群众意见的问题，是群众观点的问题，我们工作好不好一定要倾听群众的意见。这次八地委调查南乐安庄贫农的意见是

很好的，但要注意，如何辨别真正的群众意见，就是说我们要倾听哪一部分群众的意见？当然我们不能倾听为地主把持的落后村群众的意见，也不能单纯倾听中农的意见，否则就会发生错误。我们倾听群众意见，主要是贫农的意见，提高到党的政策水平，作为基本方向，征求中农的意见，求得中农的同情和同意。（联合中农的具体表现即在于此，否则不征求中农的同意，怎能算做联合呢？）

三、彻底消灭地主阶级

对地主富农究竟搞到什么程度，中央局已有明确决定，要贯彻执行中央局总结。应明确阶级观点，把地主当成一个阶级来认识，须知在今天我们消灭地主阶级的政策下，地主阶级和我们坚决抵抗到底、斗争到底的。对此不能有丝毫麻痹或轻视的现象，更不能上地主哀求、哭叫的当。地主阶级有变天帐，所谓“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纸笔千年会说话，子孙三代要报仇”，地主的阴险凶狠，丝毫不能大意。肯定的应将地主阶级打到“永世不得翻身”。如果哪个村的地主没有消灭，那末领导那个村的干部要负责任，这是区党委规定的一条纪律。

但具体来说，地主究竟要消灭到什么程度，应当放手交给群众去讨论，从当时当地的群众现有水平出发，由群众具体执行。但为了供大家参考，这里对地主的处理，一般提出下列三种：

（一）一种地主，群众对他不十分痛恨，可先留给他生活。这种地主一般是少数，但须彻底消灭其地主生活。

（二）对群众比较痛恨的地主，要扫地出门，财产完全充公，交农会管理，经过群众诉苦，根据其罪恶轻重，由群众恩赐他以贫农生活，留个活路。

（三）扫地出门，一点不留，看其态度如何而后安置之。不准地主吃饭，对第三种每天可以发给一定数量的窝窝，叫他也尝尝贫农吃糠咽菜的味。但以上这些都不能当作教条，基本目的是要消灭地主，处理办法主要根据群众讨论的意见。

要把地主统统控制起来，今天要取消地主的自由。八地委的控制办法很好，把地主分散开交给党内小组或农会小组分工管制起来，地主打钟出门，不准他活动。太行山斗地主的态度，不准他高兴，也不准他哭叫。我们绝对不准地主趾高气扬，要斗服他。寿张的办法也很好，把贫农中农基本群众划入公民组，把狗腿划为候补公民组，地主斗争对象统统划到反省组。候补公民组是基本群众出身的狗腿，为了争取他们重新回来，这办法很好，但不能把思想落后的基本群众划入候补公民组。候补期长短看其进步程度由群众讨论决定。开村民大会时，候补组有发言权，没表决权，有选举权没有被选举权。这些都是办法。反省组虽名之曰组，可不是把地主组织起来，而仍是分散由群众控制，取消他的公民权。今天党对地主的政策不是肉体消灭，而是打服他，留以活路。

但这一切都不是形式主义的，要真正确实建筑在群众自觉自愿的基础上。群众真正起来，能随时随地打击控制地主，使地主扶服〔俯伏〕在地。如果是形式主义的花样，就不要搞它。

复查中从政治上打垮地主，用诉苦的方法很有效。由于在大动时没强调诉苦，复查中可以提倡，当然这也不是机械的。清丰的比过去，谈历史，叫地主也参加，农民说自己过去如何受苦，地主也说如何享福。在这种活的对比之下，对农民的刺激最深刻，启发觉悟最容易。不如此，农民对地主是狠不起来的。个别的农民虽自己有痛苦，但一般都没有看到人家更痛苦；农民也有学而后知的，也有□而后知的；把大家的苦对在一块，就能起启发和提高农民觉悟的作用，否则，不尖锐不深刻就不能激发群众对地主的狠。

农民的诉苦会就是法庭，讲理诉苦就是审讯。把地主交给农民去处理，交权的权就在这里，光说说不放权，仍然是形式的，不是真交权。

在经济上消灭地主，方向应是多想办法，到处查问，不要简单化只是一味用打或拉滑子的办法。基本方向是发动落后的问题，今天一切落后村落后人已成为地主的“防空洞”，所以“落后不发

动，封建□不尽；农民不齐心，地主不死心。”地主目前正在用一切办法在落后村落后人那里埋藏浮财，而且用毒辣的办法——公开或秘密的方式，把东西埋藏到老村干老积极分子那里，企图分化我们的阵容〔营〕。有的农民甚至经过10次、8次还能拿出东西来，因此我们不能打击埋藏东西的群众或村干，应该把农民的觉悟提高，集中斗争火力面向地主，不然就会上地主的当。应该向群众揭露这是地主分裂我们内部的阴谋，说明今天是咱们的世界，地主的的东西都归属咱们，号召大家自动自献。发动落后村基本方法是：镇压地主，撑腰“搬石头”，召开贫农会议，或组织外村贫农进行联合斗争。总之，发动落后村或落后人，要把仇恨转向地主，目标是为了彻底消灭地主阶级。

因之，我们今天不能把干群关系作为主要方向来布置，否则会造成内部的裂痕，给地主制造空隙，使我们的工作遭受损失。我们不能搬运太行的经验，太行是在复查后搞的，而在我区还是将来要做的事情。我们今天应是：一切为了农民的齐心，地主的死心。

对地主的镇压问题，主要是放手走群众路线。群众对地主有几千年的经验，农民有一定的尺度。所以群众要杀就一定杀，群众不要求杀，一定不杀；地主报复，一定还以革命的反报复。

在复查中对地主的镇压问题，一定会牵扯到党内的问题，党内一定有人叫嚣，党内一叫，外边的地主就叫得更厉害。这种党内党外密切配合以镇压农民的行动，我们要十分警惕。应在党内进行教育，否则就不要理他，以官僚主义态度来对付之，而坚决放手交给群众去处理。

镇压的对象，主要是地主阶级中罪大恶极为群众十分痛恨的；对于被地主阶级所俘虏的基本群众成份的，而且基本又不是死心塌地的，我们应该对他寄以同情。应该明确，这种当了地主尾巴的人，不是我们所要镇压的对象。如把这些人杀了，要犯错误的。但如果农民痛恨，要求非杀不可，当然是可以的，但检查起来，过去镇压非地主成份的数目相当大。当然我们不能机械的以数目上的多

少来看问题，但杀一以儆百，同样能解决问题。

在今后复查中，扣押的地主应完全放手交给农民处理，不要再把“石头”集中到县、区，不再由我们来控制。有的地区已经发现，“石头”愿意到区到县，地主最怕的是本村群众，所以我们要放手交给本村群众去处理。

当然镇压地主走群众路线，并不是说就放弃了党的领导，反之党应实现其领导。有的时候在斗争地主时，群众激于义愤，一哄而上，将地主制死了，这是有的；但有时也发生只是一部分群众动手，大部群众却不动，甚至不满，党就要密切注意掌握。因此我们放手是放给贫农，放给群众，绝对不能放给地主控制或掌握的落后村或假农会，否则地主的刀锋就要向着我们的干部和群众。

总之，在复查中消灭地主一定要彻底，从经济上、政治上、态度上，把地主彻底打垮并制服他，不彻底的一定耍搞彻底，地主留好地好房的要实行大调换，一定搞到彻底。

四、关于建立贫农组织，树立贫农骨干的问题

在复查中发动群众，主要解决贫农的组织问题——建立贫农骨干与贫农小组问题。在思想领导上要解决一切倾听贫农的意见，“中不中，问贫农”；组织上一定要解决贫农组织问题，否则复查就没有组织保证，就不能彻底。这就是说要组织贫农小组，选举贫农代表，在农会中树立贫农领导骨干。要明确：贫农参加领导机关，必须有领导地位，而且掌握领导权，贫农在领导机关不仅数量上占多数，而且要占主要领导地位。这样以贫农为骨干，联合中农向地主进行斗争。但须警惕，不要在今天一提贫农，领导上就发生排挤、踢开中农，厌恶中农的偏向，重复过去的老路，必须注意纠正和防止。这个以贫农为核心联合中农，是不分时间先后的，不是先组织贫农，后联合中农，也不是在组织贫农时把中农丢在一边，这一点领导上必须明确起来。

关于具体的村级组织形式（在寿张有些村建立人民委员会，设

主席、副主席），区党委没有具体规定，号召大家放手创造。方法应由贫农讨论，我们不要包办。组织原则是以贫农为骨干，联合中农向地主进行斗争。适合这个原则，就是好的组织，否则都不好。

我们对农会的认识是不够的，我们要充分发动群众，群众如何才能充分发动呢？只有农民组织起真正代表自己利益的团体，这个组织是任何人不能包办的，否则农民的行动就会受到约束。因此农民要翻身，首先建立自己的组织——农会，而且在翻身运动中，农会是农民的最高权力机关，一切权力归农会，农会决定一切。农会在今天就是真正的民意机关与权力机关。我们不怕农会形成第二政权，实际上就更接近于改造我们的政权。我们政权的老大迟缓，今天已不适合群众的要求，农民起来就要改造这个政权。今天交权给农会，实际上就是把权交给了农民，使农民真正意识到，今天是他们的天下，自己真正成了社会的主人，否则农民的觉悟不会提高。要大大培养农会的能力，否则由农会来改造政权会有困难。我们决心要在土改运动中把解放区的政权真正变成“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权，领导上对农会必须有明确的认识。

我们不能包办农会，不能将农会形成只是几个“巨头”在办事，而不发扬农会内部的民主，不征求大多数农民的意见，形成少数人独断专行而多数群众冷落的现象，这是不行的。这种不发扬民主，由少数“巨头”一啣咕就要办事，或是由农会长几句话，就号令群众行动的作风，就不能解决对地主的狠，就不使农会真正成为群众自己的民主组织，而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口号就会落空。今天我们要强调经过农民选举自己的代表机关，否则农会仍然会变成少数村“巨头”的，而不是广大群众的。所以农会过去不民主的，今天要经过农民选举来彻底改造。将来在中心区，党员入党要经过群众选举，而各级领导机关都要实行选举，实行真正的民主，放开手建党，这是党内的思想改造，也是党内的革命，使党真正站在群众之中。这在过去群众没有发动起来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做到的；而今后就有了这个可能，而官僚主义在群众真正起来之后，就不能存

在了。

五、贯彻填平补齐，反对富农路线的分配办法

果实问题在此次区党委土改会议上没□展开讨论，因此在这里再度强调提出：果实问题是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关系革命成败的问题（李自成、太平天国都因没有处理好果实问题而失败了），今天农民向地主斗争的基本问题是果实问题。我们对果实问题认识不足，有些轻视，因之有好些地区，果实尚没有分下去。有许多粮食、房屋、土地、牲口在农会“存放”着，或是分得不均（不是填平补齐），没有分到贫农手里。我们要大声疾呼，这种现象如不马上纠正，贫农对共产党就会有意见，就会脱离我们，造成农民内部的分裂，群众运动就要失败。我们要高度认识，果实问题是关系着群众发动□□不够，农民的积极或消极的中心关键问题。

果实分配原则，坚决反对富农路线的分配方法，如打价拍卖，按功按积极，伸手一巴掌，不实行填平补齐等。坚决执行：无条件公平合理的平均分配原则，实行填平补齐（填贫补穷），少啥补啥。原则是消灭地主、消灭赤贫、发展贫农，一定把果实分配给贫农。办法是走群众路线：以贫农意见为主，取得中农的同情，经过小组酝酿，大会讨论，对中贫农中间的矛盾，要发动中农贫农以面对面算帐比家当的办法讲个清楚。对分配不公的多分的，今天不实行倒回，而是发动群众自报，由大家评议；在今后再分配果实时，过去多分的就少分，过去少分的就多分。如果将来算总帐时仍不公平，那在将来可以实行抽肥补瘦，抽多补少以解决之。总之，要实行无条件的公平合理的平均分配，任何人不能多占一丝一毫。

果实凡没有分的，一定要分；没分完的，一定分完；农会不准存放一丝一毫的斗争果实，村中不准留下公房公地，要经过群众讨论，一律分给贫农。公地，机关生产地一律归农，这些问题必须在复查中彻底清理。

凡地主出身的干部或战士的家庭，一律经群众自觉自愿的照

顾。就是说：群众照顾则照顾之，群众不照顾则不照顾之。区党委已号召所有地主出身的干部或战士写信回家，将财产交给农民处理。强调农民自觉照顾的原则，但另一方面村干部群众的照顾多留些地，村干部群众是对的，但干部也要自觉拿出来，不要以功臣自居，以为受之无愧。今天党要消灭地主阶级是肯定的，不能在党内造成地主的“防空洞”。

六、几个具体问题（略）

冀鲁豫区党委关于贯彻复查的指示

(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七日)

目前黄河北各县正在进行复查，实际运动的开展已充分证明区党委土地会议复查方针的正确。经过大运参军，地主阶级并未低头，且乘我松一口气时，大肆活动反攻。如利用新兵军属打击积极分子，挑起军政纠纷，从中混水摸鱼，栽赃诬陷，借刀杀人，到处钻空，设“防空洞”，阶级斗争是万分紧张的。在群众发动与果实分配上，不少地区发现，对公平合理填平补齐的阶级路线并未能认真贯彻下去，贫苦农民的要求未能满足，群众发动极不充分，落后村落后人尚占相当数量，我们在农村阵地还不够巩固。这种情况是值得我们严重警惕的。要求各级党委再度敲起警钟，克服“差不多”思想，坚决贯彻区党委复查方针；要求彻底消灭地主阶级，充分发动群众。关于复查工作，除按土地会议总结精神贯彻执行外，兹就几个地区汇报所得及中央局土改会议总结新精神，特再明确补充以下几点：

(一) 树立与加强贫农领导骨干问题

在政治上必须明确认识：贫农是贯彻土改复查的基本动力。这是因为只有贫农才真正感到地少无地与财少无财所遭受的、封建地主所给予他们的痛苦与压迫。所以重视贫农要求，才能从贫农中更真切的了解地主的反动性与反革命活动。因此土改复查就自然成为贫农最迫切、最主要的要求与活动。至于中农，虽也有此要求，可以参加这一运动（必须吸收中农参加），但在积极性与彻底性〔方面〕比贫农是差的多（这是由于中农的政治经济〔地位〕所决定

的)。

在土改复查中，中、贫农不同的要求，就成为土改复查中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我们须发挥贫农的革命积极性与彻底性，去克服中农的调和不彻底的弱点；执行依靠贫农、联合中农的政策，才能把土改复查彻底实现。

从各地土改复查运动的实际经验证明：只有忠实于贫农的意见，满足贫农要求，认真的树立贫农的领导骨干，联合中农，土改才能彻底，才能公平合理的分配果实，才能实现对地主的“狠”，才能把土改复查作好，否则彻底实现土改复查成为不可能。因此在今后复查中要重视贫农的要求，并把贫农的要求提高到党的政策水平，这应是领导土改复查运动的基本方向。这是领导思想上必须掌握的。

但在组织上必须解决贫农组织问题，以便更好的启发贫农觉悟，集中贫农意见，实现贫农要求，否则复查就没有组织的保证。因此必须强调划清农村的阶级与阶层，组织贫农小组、贫农会、贫农委员会等组织，好使贫农在农会中占主要领导地位，以便树立贫农领导骨干，联合中农，向地主进行斗争。

在强调树立贫农领导骨干与建立贫农组织时，领导上必须警惕：防止厌恶中农，以至排挤中农及不要老村干、老组织的偏向，对中农必须执行联合政策。农会是中、贫农团结的组织形式。贫农的集体意见，应是贫农在农会中积极活动，经过说服中农的过程，不是强制。对老组织、老村干是团结方针，即新老结合的方针。

对老村干的缺点与错误，应是教育团结，治病救人（实行调训、组织反省等办法），使他们完全站在贫农的方面，与新的贫农积极分子共同斗争。至于个别分子落了伍，那是不足怪的。经验证明，对一时落后的老村干，经过训练教育批评后，大部是可以转变的，并且证明只有新老结合，才有力量，才能把工作搞好。

在树立贫农领导骨干与建立贫农组织中，〔应〕避免发生贫农斗争中农，以致贫农孤立。必须明确与掌握以下三个问题：（一）

要领导贫农，明确划清农村阶级。（二）掌握住面向地主，一切罪恶归地主，坚决执行消灭地主阶级的政策。（三）明确执行联合中农的政策。先要明确与掌握以上三个问题，就可以大胆的执行这种新的领导精神与组织形式。在目前贯彻复查中，对此新的领导精神与组织形式，任何犹疑、裹足不前，都会使工作受到严重的损失与困难。

关于村级的具体组织形式，区党委无具体规定，号召大家放手大胆去创造（寿张有些村建立人民委员会，设正、副主席）。方法应交给贫农讨论，征求中农的意见，求得中农的同意。组织原则是以贫农为骨干，联合中农，向地主进行斗争。适合这个原则的，都是好的组织。

应明确认识：只有以贫农为领导骨干、联合中农建立起来的农会，才真正是农民自己的、真正能代表农民利益的组织。只有这样的农会，才能成为农民的最高权力机关。我们就要把权力放手交给这样的农会，而由农会来决定一切，使一切权力归农会，使农会成为真正的民意机关与权力机关。这样就能高度发扬群众的创造性与积极性，并使农民的觉悟程度迅速提高，认识到自己真正成了社会的主人。不要怕农会形成第二政权，实际上更接近于改造我们的政权。耐心的培养和提高农会的领导能力，以便经过土改复查，使我们的政权真正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权。

（二）再次提出坚决执行填平补齐，公平合理的分配果实

果实分配合理与否是工作成败的基本关键，是能否发动、团结90%的农民中心关键。很多地区对此认识不足，很多农会的果实没分下去，分的不公或没有分到贫农手里。主要原因是没有树立贫农的领导骨干，没有把贫农的意见作为分配果实的方向。没有贫农的

核心领导，果实分配就很难分得公平合理。我们要大声疾呼：立即纠正这一现象，否则群众运动就要遭受失败。

关于果实分配原则，要坚决反对富农路线的分配方法，如打价拍卖，按功按积极分等级等；坚决满足贫农要求，贯彻填平补齐（填贫补穷），少啥补啥，无条件公平合理的平均分配原则。办法是：以贫农意见为主，取得中农同情，经小组酝酿，大会讨论，各人提出自己要求，大家评议，充分发挥群众路线。对中、贫农之间的矛盾，要发动中、贫农〔采取〕面对面的算帐、比较的方法，使中农接受填平补齐的原则。过去多分的，今天可暂不倒回，但须发动自报，再由大家评议。在今后再分果实时，对过去多分了果实的，实行少分或不分；将来算总帐时仍不公者，则实行抽肥补瘦，抽多补少。这是树立大公无私的革命道德、新的革命思想的建设；这是严格制止旧的自私自利的思想斗争。总之，坚决贯彻填平补齐，无条件公平合理的平均分配，任何人不能多占一丝一毫。目的要达到消灭赤贫，发展贫农，消灭地主，密切党与群众关系。

在复查中须将果实彻底清理，农会不准存放一丝一毫的果实。没分的坚决分下去；没分完坚决分完。村中不准留公房公地，经过群众讨论一律分给贫农。公地及机关生产地一律归农。

对军属（主要是战士家属）分配果实，不应在领导上规定给多少，对军属照顾应交给群众自行照顾（群众一定会照顾的），以免发生军属过分多分或强要现象，影响群众情绪，使军属孤立。

（三）大胆交权给农民，贯彻 放手撑腰，走群众路线

贯彻复查必须走群众路线，其中心关键是在任何时候不脱离群众。要始终贯彻发扬群众中的进步面积极面，去克服其落后面消极面。一切从积极出发，而又不脱离群众，这就必须掌握住一切工作要从当时当地群众现有水平出发，逐步提高；随着群众觉悟水平的提高

高，强化组织和纪律，这就是继续把工作提高。实际工作中证明，凡是发扬了群众的积极面，表扬了革命英雄主义——实行表模立功，控制了落后，土改运动就做得好（如昆吾）。只有这样——发扬群众的积极面进步面，而又掌握住从当时当地群众现有水平出发，才不致在工作中发生偏左偏右的错误，才可具体解决如何走群众路线，大胆放手让群众行动。

“左”的偏向的产生，往往由于不从当时当地群众现有的政治水平出发，具体表现在生硬地、形式地搬运工作，把先进区的经验与办法搬运于落后区，不去研究先进区经验的精神与实质，以及运用这些经验与办法的群众水准与工作条件。右的错误的发生，常常是由于看不到群众的积极面、进步面，往往从自己的消极面、落后面或从群众的落后消极方面出发，因此使自己落在群众的后边，脱离了群众，总担心群众“左”，对群众不敢放手，不敢承认群众的积极的创造而束手束脚。

关于放手的问题，就是观念上相信群众，掌握住贫农的领导骨干，依靠贫农联合中农的基本政策。

掌握以上原则，领导上就可毫无顾虑的放手交权。今天在放手交权问题上，仍是束手束脚不大胆，具体表现在杀地主打地主的问题上。这里应该明确：凡是罪大恶极为群众十分痛恨的地主，应大胆放手交权给群众，由群众自己作主，自行处理。但对于基本群众出身的所谓流氓、走狗，或村干、基本群众，必须经过县委（流氓、走狗）或地委（村干，积极分子）批准，否则谁错杀，谁就将受到党的严厉处分与制裁。因为地主把持的落后群众和假农会，绝对不会杀地主，地主的刀锋一定向着村干、积极分子和基本群众（如吕堤事件）。

因此我们倾听群众的意见，应弄清楚到底应该倾听哪一部分群众的意见。我们不能倾听为地主辩护的“群众意见”，也不能单纯倾听中农的意见，否则就要犯错误。我们倾听群众意见，主要是贫农意见，作为贯彻复查的主要方向；征求中农的意见，求得中农的同

情和同意（联合中农的具体表现即在于此）。这样才真正倾听了大多数群众的意见。

关于撑腰问题。在复查中撑腰要撑到底，尤其在发动落后村时，一定要贯彻撑腰“搬石头”镇压地主，这是群众的要求，也是群众路线。但也不能因此随领导者的个人好恶随便捉或随便放，应交给群众去讨论。

在运动的开始，往往群众跟不上政策；一旦起来，群众的要求又往往超过了党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要坚决满足群众的要求，修改党的政策。只要是真正集中起来的群众要求，区党委坚决批准，这就是真正的群众路线。

（四）贯彻复查的组织保证问题

目前党内发生对地主怜恤及不狠，是有其一定阶级基础与社会根源的。在党的阶级路线不能贯彻的地方检查一下，往往该地领导机构中（主要指区以上脱离生产的干部）存在着与地主阶级密切联系的分子，他们经过家庭、亲戚朋友关系与地主阶级千丝万缕的结合着。消灭地主阶级，自身先感切肤之痛，于是口硬心软，过着两重生活：口中讲的是彻底消灭地主阶级，实际所感到处处心酸；口中讲的是地主罪恶，心中想的皆是自己的“好亲朋”，无以可恨之点。他们不只狠不下去，严重的甚至包庇地主，作“防空洞”。对这种分子应严格对待，按其思想错误大小，分别教育、批评、调换、撤职以至开除党籍等，来保证领导机关的纯洁与一致。尤其对主要干部，更应严格。某些地区对此种分子（且是主要干部）抱姑息容忍态度，是极错误的，这是对群众负责不够的表现，必须纠正。要大胆提拔忠实人民，绝不中饱群众果实，忠实党的政策，能走群众路线的翻身英雄、人民功臣，选入领导机关，成为领导复查的核心。这在贯彻阶级路线上，是有决定意义的。

以上各点，系目前运动所提出而以前尚不够明确的问题，望各地委县委研究执行。

五地委民运部长联席会上 五个月来土改运动的总结*

(一九四七年七月十二日)

在五地委民运部长联席会上，地委民运部长遂昆玉同志，对该分区五个月的土改运动估价说：我们处在敌人后方，环境比较紧张，在干部存有右倾情绪的情况下，地委提出：清算诉苦与土改结合进行，发动群众，造成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五个月来，由于各县同志们的坚持和努力，在5个县里有一半以上的村庄实行了土改，一部分农民得了土地和浮财，渡过了春荒，初步建立了群众自己的组织，转变了干部和群众的关系，同时也转变了上下级的关系（经验证明：要做好土改，思想非统一不可）。而地主在行政命令下虽低了头，但发动群众自觉是很差的。以上这个局面怎样得来的呢？昆玉同志说：第一，领导上在2月里提出了土地改革与清算诉苦一齐搞的政策。第二，各地坚决的执行了土改的政策，克服了干部的右倾思想。领导上抓紧了这一关键，继续不断的在每一个环节上对干部进行教育。第三，对地主实行了严格的控制和镇压，运用了上层优势，把地主阶级打入非法。第四，大胆放手，走了群众路线。没被环境吓倒，由积极分子会议便发展到农民大会。农民大会加强自己农民团结，检阅自己力量，增强信心，起了很大作用，是领导与群众结合的好方法。第五，相信了群众的创造，表扬了人民功臣。过

*本文原载于《冀鲁豫日报》第1028期（1947年7月12日）第2版。

去看不见群众的创造，这次是多从积极方面着眼的，工作上有了变化。如果一个创造，没有领导上响亮提出，是不会形成一个运动的。功臣本身，即是在一定环节中的积极分子，他代表着某一环节中群众最高觉悟水平。坚决向积极分子看齐，就是叫落后分子学习先进分子。我们对功臣的发现，是应该爱护的，对其创造，是应该珍贵的。同时他们的创造也不是十全十美的，不要要求过高，要发现其点滴创造，也要十分珍贵，这样你一点，他一点，凑合一块，便成为一个最高的典型。对功臣要继续不断的提高，没有提高，就不能继续带领群众。每一工作都必须选模。对落后分子要加控制，树立正气，以开展立功运动。第六，由于中心区坚持了对敌斗争，造成了定曹路东较好的环境，以便利该区域进行土改。

在这一段土改中，还存在什么缺点呢？昆玉同志说：

第一、在长时期内没有搞土改。这主要由于干部的等待、盼主力，想跳圈子等思想没有很快克服了，单纯的清算诉苦，没有及时转上或结合土改。长期上层游击，如考城游击战坚持的好，但没有搞土改，因此使我们的游击战争不能变成群众性的。

第二、有的地方武装，单纯解决土地问题，而没有解决眼下群众所更需要的浮财，因此群众情绪不高。

第三、不敢放手，小手小脚，搞一个村，从下层钻，不敢开大会，不敢公开干。

第四、发动群众跟不上对地主的控制，单纯的行政命令代替了斗争。因而群众虽然分了东西，但是没有发动，地主也就不会打垮，又容易伤害中农利益。有的村我们允许了以家族为单位分田，鼓励了封建宗派，分裂了内部。地主对农民的恩施，农民对地主揭不开脸，得到手的果实很难巩固。我们光看群众的缺点，而未看见群众积极面，停止了对群众的提高。

怎样造成了以上缺点呢？昆玉同志说：

第一、主要是思想右倾，对游击战争的性质不明确，对土改为一切之本怀疑。干部只在口号上喊着是农民战争，而不在具体的游

击战争中依靠农民。我们某些同志认为进行土改好像为了我们，是利用老百姓来保护我们，这是极错误的。

第二、领导上只提出了问题，而没有检查执行，又没有发现典型及时加以普及。地委对各县的领导，强调了分散而没有集中，在工作上听其自流。

第三、不相信群众，不敢放手，目前还很严重。

第四、狭隘的经验主义，片面的群众观念，跳不出老一套的圈子，做群众的尾巴，看不见群众的创造。到村光接近老村干，以少数干部要求代替了广大农民要求，强调自己环境特殊。

总之，对敌人怕，对群众不相信，固守自己的狭隘经验主义。

谈到今后的方针，昆玉同志首先说明对今后环境应有认识：依然准备长期的坚持紧张的游击战争，同时也要认识到反攻将要到来，在反攻的过程中，要充分估计到拉锯形势的可能。今后总的方针是发动群众普遍的实行土地改革，贯彻查田查财，进一步在政治上经济上打垮地主，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

四地委县书联席会

三个月土改复查运动总结*

(一九四七年九月八日)

第一、坚决走群众路线，克服强制命令简单化作风，贯彻启发思想自觉自报运动

四地委召集各县书检查三个月来(6—8月)的大复查运动，解决了复查中的群众路线问题。大家深刻体会到：掌握群众思想情况，是使运动深入的关键。

深入群众，掌握运动环节。昆吾在全县8000村干、积极分子大会前，调查了3个村，根据大发动大参军后积极分子大部走了，群众认为地主也没啥了的疲塌情况，和村干、积极分子商量了转变干群思想的办法；大会上又由认识地主，普遍反省出“防空洞”这一事实，给领导上很大启发，在全县开展了“孤立地主，团结自己”的“自报立功”、“思想自觉”运动。卫南在干部大会布置复查后，县书、县长到三、四区各具体检查一个村，发觉干部思想问题因检讨表模解决了，工作情绪很高，但行政命令多，单纯追浮财，群众情绪热一阵(追出时)冷一阵(再追不出时)，又召开会议研究转变。边沿区泛[范]县，运动中开会检查，表扬了三、四、五区干部盟誓坚持，启发诉苦，提高觉悟，搞开复查运动的办法，检讨了一、

*本文后载于《冀鲁豫日报》第1101期(1947年9月24、25日)第2版。

二、六区单纯用行政力量追浮财，群众情绪不高的毛病，创造了边沿区“复查诉苦”运动的路。

更值得提出的是昆吾怎样发动思想觉悟较慢的群众。这一问题的实例：当“思想自觉”大复查运动到一定阶段时，县委先检查了三区一个最好的村——牛庄：全村110户，儿童不算，地主富农68人；中贫农除出外抗战的外，积极的男33人，女28，中间的男62，女73（占半数），落后的男14，女55（比积极的还多些），发现发动落后是把运动推进一步的重大关键。

各处群众创造是很多的。如濮阳花园屯，滑县张户固、梁儿庄等，挖“防空洞”都是支部内先动员自报，暂不公布，在贫农小组中酝酿，再开大会带头自报。张户固72户，地主富农11户，34户群众自报。梁儿庄200来户，自报80来户。其他如整支、分果实放手叫贫农自要等，都有宝贵的经验。但领导上及时检查广播不够，使许多村庄仍走着老路。当然我们反对硬搬别处经验，但根据当地情况分析研究别处经验，适当的采用，仍是非常必要的。

各县收复后开始土改中，感到村干一般斗争不彻底，分果实不民主，必须大力发动贫农，复查中就强调树立贫农骨干，获得了不少成绩。但领导上一般性急，对通过改造村干发动贫农嫌慢，没信心，没有启发打通村干树立贫农领导的思想，也缺少在群众中酝酿，就单纯排斥撇开村干，另树一班贫农积极分子作新的领导人，出了许多内部波折。想走直路实际走了弯路，就是这一环节上领导思想与村干、群众思想结合不够。

一个运动，一个大会，群众思想都要经过几个阶段，才能转过弯子。领导上应逐步诱导，用提问题方式，根据群众能接受的程度，先提出一个作启发，经过检讨、争论，打通思想，再转上另一个问题，这样一步步深入下去。昆吾积极分子大会，是先检讨“地主有没有开明的”。经过各村检查，举出典型展开争论、分析，觉悟逐渐提高，认识最后就统一了，撕破假开明。再检讨“地主服不服”，举出土改中许多地主杀害积极分子的事实来，大家愤恨了。

再转“彻底不彻底”，“为啥不彻底”，就纷纷反省出上当作“防空洞”，表明坚决和地主斗争，转变了麻痹疲塌思想。三区副区长王海彦同志说：“我是佃户出身，地主没一个开明的。他施一个小恩，就多一个狗腿。说谁‘开明’，谁的狗腿多。”

昆吾布置发动思想觉悟较慢群众，召开区书会。大家都感到是个大问题，研究了思想开展慢的原因和发动办法。各区先召开村积极分子会议布置，再开“老实人谈心会”动员。三区积极分子会上，先检查地主“服不服”，查出地主要饭，态度还很硬，穿的比穷人还好，很多人给他整个的馍。再检查“咱们心齐了没有”？各村就按积极、中间、落后三种来查，发现积极的太少，孤立，村干害怕了，就检讨“为啥有落后的”？反省出自己领导上很多毛病，表示决心纠正，并将各种状态的群众发动起来。

濮阳二、四区是以贫农为主（四区麦前各村就建立了50至100[100]人的贫农翻身队作骨干），先启发诉苦，揭破了假开明，情绪高了，很多群众发动较差的村也动起来。别的区是搬干部会方式，先找“开明”。群众不摸底，怕“说一句人家不好就杀了”，觉得“上级叫说咧，不说也不中”，就光诉一般的苦，不说具体人，有的杀谁才诉谁的苦。表面轰轰烈烈，回村很多消沉了。

从上面例子，可以看出群众思想转变的规律——第一步，提出问题；第二步，检讨分析；第三步，打通思想，解决问题。

对于控诉地主，应先启发群众诉苦。昆吾复查开始，各区开贫农大会，一般只诉小苦，情绪不高。领导上就表示：“这就是算帐时候，有大苦大冤，一辈两辈的都兴诉。”又因为怕有大事不说，就拉开以家庭为单位诉苦。二区北头村有一户，老头没说先哭了，说：“那一年，咱小家才娶来3天，西头地主就拿着刀子来啦……”说的老婆、他儿、媳妇全家一齐哭。十八郎一户，两个儿子，大儿被地主利用土匪杀了，二儿被逼上了吊，诉时全家也哭起来。这种进一步开家庭会议启发诉苦方式，使农民多年埋在心里的苦都诉出来了，诉出来就非干到底不可。昆吾有些假开明，起初群众还

保，觉悟后就自己动手整起来。濮阳有些“防空洞”，经启发觉悟了这是“地主临死还要拉个垫背的”，就自报出来，积极的诉苦，打□地主。

所以，一切对外（对地主）问题，都应该经过：（1）诉苦；（2）分析；（3）提高对地主罪恶的认识，斗争。农民受地主长期残酷剥削压迫，“对立”是本质，一切“可怜地主”、“当‘防空洞’”、“包庇地主”，都是地主威胁欺骗下造成的假相。干群诉出来说出来，经过检讨，揭破假相，才能露出本质，解决问题。一切不顾群众觉悟程度，少数积极分子对地主狠，单纯追浮财，对群众硬追“防空洞”，不让群众暴露思想，假相就打不破。昆吾根据以上精神来检查我们的工作，发现过去还有很多问题没解决。这些地主被处决了，浮财追了，“防空洞”拆了，但群众思想却没很好解决，彻底消灭地主还是不可能。

第二、如何解决内部问题？应启发互相检讨反省，团结一致对付地主

昆吾牛庄一家佃户，婆子对媳妇参加斗争不满意，自己得做饭，又怕在外边“破”，又嫌对自己掌柜斗的狠。她儿（小区干部）回来开家庭会，媳妇先检讨自己，开会很累，回家没积极做活不对，儿子也检讨自己照顾家不够。老婆就说：“这也不怨你们，没有你们，这地都是哪里来的，你们以后要好好的干；但对咱掌柜的太狠。”他儿说了地主怎样坏，老婆说：“外掌柜坏，里掌柜待人可不错。”她儿说：“你想想地主老婆那回叫咱纺5斤花，你因为发疖子只纺了2斤，就不叫吃饭！”老婆说：“是，里掌柜也是光说话好，心里狠。”问题解决了，现在听到街上锣声，她就催媳妇快去开会。相反的如濮阳庆祖一户，婆子对媳妇出来开会不满意，就开会斗争婆子。婆子更不满意，连妇会、农会、区干全骂了，干部就领导拉老婆的滑子，弄的很多群众不满，媳妇也觉得和初愿

（解决家内和气）相反。昆吾今天对启发教育家长克服落后封建思想也还不够，形成妇女“出门喜欢进门愁”。

事实上，很多是内外问题混在一起，如不启发诉出来，就无法检讨，分别给以解决。昆吾三区发动思想觉悟较差群众，召开4000人的“老实人谈心会”，起初大家疑惧，不摸底。领导先说了胜利形势，接着说：过去老实人开会没有说话的权利，我们也没有多征求意见，现在要大家全翻身，心里有啥苦水、难事都兴说。一个贫农就说：“过去俺村干和俺互助，自春天到现在他没下过地，他的地全是俺种的，可是分果实俺就少了。”一般对村干不满是不民主，少分果实。也有很多诉地主的苦，有哭的。接着检讨：“村干有好处没有？和旧保甲长一样不一样？”认识到咱们能翻身得到地，还是村干领导的，虽有毛病，还是自己人，和地主狗腿保甲长光压迫咱不同（分清敌我）。又检讨村干毛病是哪里来的，是地主造成的，斗地主吧（面向地主）。转上检讨：咱们不积极是不是毛病？村干发急怨谁（检讨了自己）？这时把各村积极分子叫来了，区干先向他们说明这两天会议情况，双方就合在一起开，各选出承认错误〔的人发言〕。牛庄指导员说：“我过去毛病就不少，斗俺的近门，我就不愿意，群众会满意？果实我多花了4000多。一个会员出差慢了，我叫农会捆他一顿。”肖固堆一个贫农说：“俺不积极，所以过去果实分的少，以后咱们不能再不积极。这一回虽是不积极，分的果实不少。”区干又出来说：“不怨村干，也不怨群众，怨区上领导不够，不照顾贫农！”这个贫农向大家问：“今后咋办？”大家说：“对着毛主席磕头盟誓吧！今后咱们都积极起来斗地主。”

这是解决内部问题的一个范例，可以得出一个规律：凡是内部问题，都是两面，有主导的一面和被动的一面，如区干部和村干部的关系，老村干和新村干的关系，村干和群众的关系，贫农和中农的关系，积极分子和另外部分群众的关系。应该是：（1）启发被动的一面提意见（暴露思想阶段）；（2）检讨毛病原因，追求地

主阴谋与罪恶；再检讨他有功劳没有，就确定了还是自己人（分析认识阶段）；（3）咱还有毛病没有（检讨自己阶段）？今后应该如何努力？（4）被检讨的主导方面承认错误——引起被动方面承认错误——领导上检讨自己（解决问题阶段）。三好合一，大家团结一致向地主斗争。

所以，一切内部问题，应该是：提意见——检讨——解决。大家都是被压迫被剥削的，有一个共同的阶级本质，都愿求解放。一切内部矛盾毛病，强迫命令，不民主，都是地主影响造成的现象，已〔一〕经揭露出来，经过检讨分析，就解开了疙瘩；违背这个原则，就发生波折，多走弯路。依此检查，好多内部问题还没有适当解决。如树立贫农骨干中老村干问题，只要经过启发教育反省，就能回到贫农中去，但很多地方采用了单纯排斥的办法，出了很多不应有的内部纠纷。

（李夫 整理）

认识新区特点

大力开辟新区工作*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六日)

逯 昆 玉

(一)从过去到新区打游击和这次陇海出击中,五分区开辟了大块新解放区。在新区工作的体验里,我们看到新区的特点是:一、土地集中,阶级划分明显。地主、恶霸、还乡团互相勾结,依仗武装、政权转嫁负担,增加租额,欺压讹诈,放高利贷。一般中农迅速下降为贫农。鹿湾农民说:“甲长捞不着,保长吃个饱。再朝上,地越多,官越大,官越大,钱越多。”可见群众对当权地主与保以上政权的仇恨了。二、农民饥寒交迫,分粮分财要求非常迫切。除少数因生活问题流为地主爪牙或伪军外,绝大多数无衣无食,急于寻找活路。再加上我根据地的影响和大反攻形势的鼓舞,更启发了他们要求改善生活的希望。他们分粮情绪高涨极了。贫农说:“只要有吃的,什么都敢干。”他们评论部队好坏,都是以分粮多少为标准。他们一旦了解了我们帮助他们分粮分财的态度,他们便自动报告情况,清查枪支坏蛋,帮助引路、做饭,组织贫农小组或单独与我们接头订秘密关系。这次我们全体到新区去的干部、战士以至民工,都受了新区群众分粮热情的鼓舞和教育,认为自己落后于新区群众,大大提高了胜利信心和开辟新区工作的信心。

(二)由于过去对新区特点认识不足,存在几种错误思想:一

*本文原载于《冀鲁豫日报》第1174期(1947年12月6日)第2版。

是领导上不愿把大力量开展新区工作；二是不敢大胆向前跃进，死守过去从根据地一步步向前推进的狭隘经验；三是不敢依靠新区群众坚持地区坚持斗争，没有在新解放区安家立脚的思想，以为到新区去只是分分粮食，轰轰烈烈，落个好影响，大军向后一撤，地方工作也撤兵回营；四是把新区看成殖民地，光想到那里捉几个还乡团，抓一把。以上种种，都是使我们在开辟新区上准备不够，失掉时机，走弯路，不能很快开展的主要原因。

（三）分粮分财是开辟新区的首要工作，抓不住这一环，一切无从谈起。我们到新区的干部，往往从自己主观愿望出发，不给群众东西，不发动群众热情，往往搬老区办法，首先要求捉坏蛋“搬石头”，搜查汉奸地主枪支，并且急于给养自给，因而忽视了分粮。结果，群众站在一边，躲避我们，我们两眼漆黑，啥也搞不到。我们曾这样走了两天弯路，第三天坚持转变，一切以分粮为中心，首先给群众东西，结果群众情绪非常高涨，自动与我们联系，报告情况，一切困难迎刃而解，新区工作就开展起来了。

（四）分粮以后，就要坚持游击。群众分粮以后，还有顾虑，怕地主坏蛋回来报复，要求我们不要走。离解放区近的要求我们打游击，铁路上群众要求我们安据点。我们要敢于抓住群众这些要求，与群众商量，共同武装，共同坚持；进一步揭发敌人，宣传“侵犯农民既得利益，报复群众的，就给以双倍报复”，并且提出“保卫群众果实”，反贪污，反恶霸，继续斗争；根据群众觉悟提高，提出分地口号。这样来团结群众坚持游击，打垮伪组织和敌人武装，树立革命武装政权，开辟新解放区。

（五）新区不同于老区，不能搬老区一套。我们必须走群众路线。一开初要求推平，要求有组织的分粮，群众接受不了，我们就要迁就群众水平。群众最仇恨保长以上当权地主，我们就提出反贪污反恶霸，由群众水平出发，步步提高，直到彻底土改为止。

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关于土地 改革、整党与民主运动的指示*

(一九四八年二月一日)

(一) 根据我区土地改革情况, 可以分为三类地区: 第一类地区, 地主与旧富农已经彻底消灭, 贫雇农绝大部分已经彻底翻身(占其本阶层80%以上), 土地早已平分, 即实际上早已大体实现了土地法大纲。这类地区新老中农合计占全村户数80%以上。因为这里的贫雇农一般翻身较早与彻底, 所以积蓄较多, 政治觉悟与阶级觉悟亦较高。没有彻底翻身的贫雇农, 只占极少数, 也分得了土地改革的果实, 但尚不十分满意, 需稍加填补。这类地区是我区工作最好的区域, 约占全区人口1/3弱。第二类地区, 地主旧富农大体上亦已斗彻底, 土地亦大体平分过, 贫雇农翻身程度稍逊于第一类地区, 已经翻身者约占其本阶层的60—70%, 但因其翻身不久, 故积蓄不多, 政治觉悟与阶级觉悟亦较差。这类地区新老中农合计约占全村户数60—70%, 未彻底翻身与未翻身的贫雇农亦占少数。这类地区在我区工作是中等区域, 约占全区人口1/3强。第三类地区, 虽也经过群众运动, 但因为是零星的, 不系统的, 时间较短的, 所以地主与旧富农未斗彻底, 贫雇农大部未彻底翻身或未翻身, 土地问题基本上没有解决。这类地区是我区工作薄弱的区域, 约占全区人口1/3弱。

在前两类地区中, 土地改革的彻底程度相差无几, 即大体上均已实现了平分, 主要遗留下的问题是: 有些干部党员所包庇的地主富

* 本文后载于《冀鲁豫日报》第1257期(1948年3月4日)第1版。

农没有斗彻底，有些地主富农成份的军干烈属多留土地财物，与非地主富农之军干烈属多留土地财物，以及不少干部多占土地财物。如不顾这一具体情况，只在土地问题上打圈子，再来一次平分运动，不但发动不起热烈的群众运动，而且一定会发生“左”倾错误（如硬挤封建，不给地主留生活，只给富农留坏地，乱斗中农，动富裕中农的浮财，侵犯工商业等）。因此，在前两类地区中，不应再来一次平分运动，可采取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填平补齐，动少数不动多数的办法，以解决遗留下的土地问题；而且应将填补与整党及建立从村到县的人民代表大会的民主运动结合进行；并可吸收非党员的贫雇农与中农参加党的支部大会，使党的支部大会与群众大会结合为一，借以公开党的支部，并进行查阶级、查思想、查立场、查作风与查行为，在群众意见下处理坏干部坏党员，完成整党任务。在这种大会上，把整党、填补与民主运动（实际是整党内的地主富农分子与地主富农思想及其影响）结合起来，把党内解决与群众解决、党内批评与群众压力结合起来。因为老区整党的民主运动与肃清封建残余是不可分离的一件事，而民主运动则有更广大的群众基础，离开了这个基础或机械的规定先进行土改，后进行民主，都不能有广泛的群众运动。

关于组织形式，在第一类地区，不组织贫农团与贫农小组，或只在农会中组织贫农小组，以保护少数尚未彻底翻身的贫雇农的利益。如硬要把十分少数的贫雇农（且多系老弱老实者）组织成贫农团来作核心骨干，起领导一切作用，则十分勉强，且有冒犯中农的危险。所以这类地区应只组织农会，并熟练的充分的运用农民代表会的方式。但在农会委员会、农民代表会与村（乡）政府中，以及在整党的民主运动过程中，应保证有 $2/3$ 的贫雇农和新中农参加，旧中农不得超过 $1/3$ 。在第二类地区，可组织贫农团，由未翻身与未彻底翻身之贫雇农并吸收新中农组成之，保护并代表他们的利益。同时应保证在农会委员会、农民代表会与村（乡）政府中，贫雇农与新中农共占 $2/3$ ，旧中农不得超过 $1/3$ 。在第三类地区，可

完全按照土地法大纲进行，并组织贫农团起领导一切的作用。但必须十分注意团结中农，绝不许对中农采取任何冒险政策。

(二) 各地在划阶级时，首先在确定斗争对象上一般失之过左。查阶级不是以当地有民主政权前几年为准，而是追三代（在审查脱离生产干部的思想时，追问其父亲及其祖父是可以的）。如其本人在当地有民主政权前几年即开始从事主要劳动至现在者，仍划为地主富农，是错误的；将从事脑力劳动而不依靠封建剥削的知识分子划为地主富农，也是错误的；或根据其本人政治态度不好，或两性关系太乱，或作风有毛病，就给戴上地主富农帽子，也是不对的；或为多分浮财，便故意扩大斗争面，故意将中农划为富农甚至地主，则更是错误的。今后划阶级确定成份时，只能按照各人占有生产手段与否，占有多少及与占有关系相连带的生产关系（剥削关系）为标准，再不能有任何其他的标准（如所谓政治态度如何，生活优裕与否，作风好坏等）。关于成份转化问题：地主在当地民主政权成立以前，已经转入劳动或其他成份满1年者，或在当地民主政权成立以后，已经转入劳动或其他成份满5年者；旧富农在当地民主政权成立以前已经转变为其他成份满1年者，或在当地民主政权成立以后已经转变为其他成份满3年者，应依其转变后的情况，改变其成份。地主与富农要有区别：地主是不劳动或不参加主要劳动，富农是参加主要劳动的。富农与富裕中农要有区别：靠剥削收入的部分占其总收入25%以上者为富农，25%以下者为富裕中农。富裕中农中有较轻微剥削者（如与别人合伙请羊工、牛工，雇短工或放少数债等），仍应算做富裕中农，而不能算做富农。因此，在划阶级时，必须切实防止与克服“左”倾错误，必须多多听取群众意见，采取自报公议、三榜定案的办法，不仅要经过贫农团讨论通过，而且必须经过农会讨论通过，并最后经过村民大会通报，以便达到公平合理，大家赞成。

(三) 全区干部大会后，各地对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有错误了解，强调贫雇路线时，发生盲目鼓吹贫雇农的现象。今后不可再用

贫雇路线的字眼，因他很可能放松对中农的团结，使贫雇农孤立，它会把群众路线混同于贫雇路线。群众路线即阶级路线，具体表现在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及一切反封建分子上。在建立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时，要联合一切反封建分子。因为新民主主义政权性质，不只是代表农民，更不只是代表贫雇农，而是代表一切劳动群众（工人、农民、独立工商业者、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等）与中小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以及开明士绅等。贫农团办事一定要取得中农同意，不是形式的，而是真正的同意，因此贫农团在某些问题上必须向中农让步。毛主席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讲到土改的两条基本原则时指出：“第一，必须满足贫农和雇农的要求，这是土地改革的最基本的任务；第二，必须坚决地团结中农，不要损害中农的利益。”^①以及团结中农的五项具体政策必须仔细研究，不折不扣的付诸实行。

（四）大会后强调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有成绩的。比如过去倾听贫雇农的意见不够，现在改正过来，要倾向贫雇农的意见，这是好的。但又产生盲目鼓吹贫雇农的“客里空”现象，而发生了违背马列、放弃领导的尾巴主义，对贫雇农只是盲目崇拜批准，对其错误不加批评，完全放弃党的领导。这说明许多同志有软弱病，缺乏原则性，不敢坚持真理。过去各区曾经犯过这一类似的错误，如强调放手发动群众，不泼冷水，这无疑的是完全正确的，但当运动发生了“左”倾杀人错误时，仍抱定决不纠偏的态度，使运动陷入无政府状态，无组织、无计划、无纪律，完全作了落后思想的尾巴，使我们吃了很大的亏（如豫北和晋南某些地区）。须知农民群众的意见是比较朴素、比较简单、比较生动、比较原始、比较片面的，党的任务是既要向群众学习，同时还要提高群众。比如最近发现农民在几个问题上与我们不一致：（甲）为了想多分土地、浮财，故意

^①见《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4月第1版，第1147页。

提高别人成份；（乙）对地主分同样一份土地不同意；（丙）要斗地主富农的工商业；（丁）要动中农的浮财，不给中农生产贷款，强借中农牲口车辆生产，加重中农负担等。这四个问题，为了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我们就不能与之妥协，就必须教育说服农民不要这样做。

（五）由于此次填补运动系与整党和民主运动结合进行，我们在这方面还缺乏经验，又由于春耕前土改与整党任务不可能完成（力争完成，但不可能），如果普遍发动，势必耽误春耕，且搞不彻底，对以后工作反而有害，我们考虑在春耕前，只采取有重点的推进办法。每个地委区只选择一两个县，集中该地委区的一切力量，采取突破一点取得经验，教育群众，教育干部，普及全面，波浪式的发展办法，以便将填补、整党与民主都做好，创造经验，待春耕后再全面开展运动。这种办法的好处，是既可以创造经验，少犯错误，又不致耽误春耕，并可以解决因整编队伍而造成的干部缺乏的困难。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

冀鲁豫行署布告*

(一九四八年二月十日)

中国土地法大纲和边区政府实施土地法大纲补充办法公布后，深得全区广大农民热诚拥护，并准备立即彻底实行。为防止地主富农及不法分子故意曲解、造谣、污蔑土地法及破坏、浪费、转移、变卖浮财和非法多占果实等，切实保障农民利益，特有以下规定：

(一) 地主富农不得故意曲解土地法，挑拨离间农民团结，或进行转移、隐蔽、分散财产及一切破坏活动，如宰杀牲口，砍伐树木，破坏农具、房屋、水利建筑等，违者经贫农小组、农会及政府查出，定严加法办。

(二) 所有中农在平分土地中，只有富裕中农在协商方式下抽出多余的土地，至于其他财产一律不动；中农一律不动，贫苦中农并可分得果实。所有中农并可参加农会、合作社。因此不要听信地主富农及破坏分子的造谣挑拨离间，应安心生产节约，并保持其与贫雇农的密切团结，一齐起来反对各种破坏行为。

(三) 干部多占斗争果实，在平分中必须将多占部分全部退出，在未进行平分土地前，不得转移、变卖、破坏或浪费。违者除平时仍将多占果实照数退还外，并依情节轻重给予处罚。

(四) 村内现存果实未分配者，为防止贪污、浪费、破坏、盗窃、分配不公等，应即由贫雇农小组及农会妥为登记、封存，在未执行土地法大纲前，一律不得动用。如在封存后有窃取作弊等情形，

* 本文发表于《冀鲁豫日报》第1243期(1948年2月19日)第1版。

定于严厉处分。

(五)未翻身、翻半身的雇农、贫农，如缺乏粮食、柴草及款项时，应由贫农小组及农会民主讨论，在本村封存果实中将粮食、柴草、棉花、款项，用暂借办法解决之，但一定保证借到贫农、雇农手中。

(六)所有贫农小组及农会应立即起来，对各种破坏及非法行为严加监视，一经发现，应一面制止，一面向各级政府及农会提出控诉。

(七)各级政府及农会，应站在为人民服务的立场上，切实监察督促执行以上各条，并接受农民的控诉，根据边府破坏土地改革治罪暂行条例，给一切破坏分子以严厉惩处。尤应注意立即向雇农、贫农及中农宣传、解释土地法大纲，并自觉的驳斥一切破坏分子的造谣。

此 布

主 任 潘复生
副主任 贾心斋
韩哲一

中央局冀鲁豫工作团关于 整党与民主运动向中央局并 冀鲁豫区党委的报告*

(一九四八年五月三十一日)

中央局并区党委：

送上5月15日仓上扩干会议总结（主要是民主整党部分），赵台、冀王庄两个典型村民主整党的总结报告，请予指示。从上述材料中可以看到在冀鲁豫这种半老区民主整党的特点与方法。赵台是自治陶大会下来，带有“左”倾思想，走了弯路又扭转回来的典型，至今问题尚未很好解决。而冀王庄则是代表中央局二月会议和仓上三月会议陶希晋同志传达后，以新的精神和方法试行摸索的典型。我们正在总结批判旧的和作法，研究和扶植新的作法和经验，坚持并端正政策，提倡调查研究，从当前实际环境出发，发挥创造性，注意奖励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以不断总结提高，求得更完整的经验。

此报告着重在民主整党与群众民主运动的经验，至于划阶级等其他已得经验将另作报告送上。

李菁玉

陶希晋

五月三十一日

*“中央局”即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5月9日，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与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合并为中共中央华北局。

附一： 在五月十五日扩干会议上的 工 作 总 结

一、本区基本情况和我们工作的估计

(一) 基本情况

1、本区过去社会阶级的情况

本区过去除少数可数的村庄封建统治势力占优势以外，一般村地富统治力量不强，封建势力不大。中农在政治经济上，在有些村占有优势地位。贫雇是统统处于长年受剥削、受压迫的地位。农村的经济形态是分散的小农经济。具体的说，地富阶层数量较少，阶级比重较小，一般只占本村户数3—4%，或少于此数，最多的可能到8%（如中孔、孙庄）。中农数量比较大，由30—50%，各村情形不等。其余的是贫雇及其他劳动人民。

因此，对封建的打击面较小，而人民革命力量的方面是大的。其次中农在人口以至生产上，比重都是较大，所以中农本身的政治动向及其要求，要非常注意，对中农的政策要很慎重。第三，贫雇的比重大，受苦受剥削受压迫也重，因此革命性高，应在人民革命运动中起骨干作用。

2、土改中各社会阶级的情况

1945年阳谷解放前，老区减租减息政策的影响相当地波及到本区，地富是有准备。我们尚未发动土改，有的村地富即将土地恩赐予农民，因此散播了一定的幻想（如郭庄）。前年12月土改以来，地富封建势力受到打击，一般地说，基本上是打垮了，但思想发动不够彻底，有的地方尚没有打中。大地主跑了一部分，还有的剩下的一部分被村干和小区干包庇了。斗争的烽火一般地是趋向于和区村干部无联系的中、小地主和“肉头户”的身上。特别是5月复查和参军运动，由于当时领导上阶级路线不明确，有严重的“左”倾情

绪，自上而下行政撑腰、强迫命令严重，所以没有把“狠”和“恨”打向地主，而是转向了中农，并且严重的打击了中农，伤及贫雇。所以中农被斗的、“自动”的现象很严重，且是带普遍性的，个别的且被“清剿”，扫地出门。至今年春荒，有些中农要饭无以为生者，如仓上被斗中农几占中农总户数1/3；王楼几占中农中50%；而孙集29户被斗争户，中农即占23户，占了中农之全部；吕庄斗争中农也极严重。结果造成目前中农阶层心怀不满，善后很困难的局面。贫雇从表面上看是翻身了，土地数量上还差不多，大体有了几亩地，但浮财及生产资料由于好的都为地富所外流、掩藏，利用不觉悟群众当了“防空洞”，或为干部贪污浪费掉（参军中浪费不少果实），因此没有满足，也造成目前在发展再生产上有很大的困难。再者，由于思想发动很差，在某些村庄，地富在思想上仍对贫雇有影响，农民在思想上尚未与地富完全割断联系。中农的情绪普遍的不稳定。村干一般地是脱离群众的、孤立的（也有部分的少数的好村干）。

但是应该肯定，过去的土改是有成绩的，封建大体上已消灭，土地大体上已平分，贫雇分土地要求大体上已满足，只是贫雇在浮财与生产工具上尚未彻底满足。只有少数村庄、少数或个别的贫雇土地要求还未解决，已不是普遍现象。

3、地区的性质

本着上述分析，三区是自1945年解放后，经过反奸清算、土改复查的半老区，但由于过去阶级路线不明确，所以造成工作基础较差。因此目前的工作是首先端正各种政策，经过群众路线，强调思想发动，要深入细致的解决问题。似乎不可能有像过去联合斗争那样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但是以村为单位的民主斗争的高潮仍是有的。如不认识这一点，硬去追逐与制造一个轰轰烈烈，必然会犯“左”倾冒险主义和急性病的错误。如果群众的民主自由的政治要求已满足，在继续正确解决赔补、抽补、分果实、贷款等条件下，解除了对农村生产力的束缚，必然出现一个生产的高潮。

4、目前群众的迫切要求

由于三区是如上所述的半老区的性质，因此目前群众的迫切要求首先是民主要求，且带有普遍性，中农贫农都有。特别在某种意义上讲，在某些村，中农的民主要求且是突出的。这一民主要求，主要是向村区干部要，自然组织上与生产上的民主也是要的。其次是生产资本与抽补土地，根据情况，土地抽补波动面不会很大，亦绝非打乱平分。在满足以上几项要求后，或即在其中，群众是贯穿着强烈的生产要求的，他们愿意组织生产，发家致富。但从当前土改运动来讲，这一要求是在土改运动的基本要求满足之后，解除了生产的一切障碍，大生产运动才会普遍的高度的开展起来。

(二)工作估计

中央局指示：要肯定全国土地会议及冶陶大会传达这一会议的成绩，是很正确的。这具体表现在反右，打击了地富思想，整顿了队伍，清算了过去错误，明确了阶级观点与群众观点。以后提出在具体政策上反“左”，这是根据历史及当时的情况而提出的，是进步的、发展的，绝非走回头路。

我们下来后，思想上是有“左”的偏向的，主要表现在：小资产阶级的急性病，“左”倾冒险主义思想；对过去土改成绩估计不足，片面强调缺点多，对老组织有一脚踢开的思想；有成熟的一套到村如何工作的主观主义的想法；片面的贫雇观点，对于巩固地团结中农认识不足；把土改看的较容易，不是分别地有步骤地去完成土改，对于这次土改任务的困难性、细致性、复杂性认识不足；在领导思想上，对集中力量、突击重点、创造经验认识不足，对中央二月指示亦把它看得太简单易行了。我们未下到村即口口声声反对急性病，强调调查研究，慎于开始的思想（这是起了一定的作用的），但从整个实际工作，从布置、计划上看，并未解决思想上的急性病。大家还可以记得，我们那时是“有志于全县”的，其后则是“有志于全区”，希望很快把全区搞起来；现在则是只要能把几个重点村搞好，创造几个村的经验，就算服务群众完成任务了。

自从仓上三月会议传达了中央局二月会议的精神之后，我们在认识上已有转变，但在实际工作中，问题并未完全解决。从领导上说，我们本身并未摸索到一套成熟的完整的经验，因此，也就缺乏如何走群众路线解决实际问题的办法，以致对各组的实际的具体帮助不够，使得某些乡的某些村，在某些具体问题上，发生困难不能解决，弯子转不过来。结果是谁走的快，谁就陷得深，也愈难拔出（如吕庄、柿子园）。所以有这些困难，且难于解决，除了由于领导上不够明确，缺乏指导经验外，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各乡对上级指示没有很好研究，对于本乡本村的实际情况没有很好地进行调查研究，没有根据情况来实行、发展、修正、补充或取消我们的政策。有些乡在执行政策上工作态度不严肃，这些是各乡各组同志应该自己负责，且应引为教训的，并应以布尔什维克的态度，去认识错误，采取郑重的严肃的态度。

但是我们的工作是有成绩的：

第一，初步摸索和创造了整党与民主结合的经验。冀王庄的从整党开始发动群众的民主运动，今天证明是一个新的作法，是从我区的实际环境出发的。同时，我们也有赵台、中孔、东国等村的碰了钉子而又转了回来的经验。赵台初期的情绪是代表我们从冶陶大会下来的精神，而其后则是代表仓上三月会议以后，又如何地转了过来。这些经验都是值得参考的。

第二，群众运动已有了初步发展。我们看群众运动有无发展，主要是从群众的思想有无发动上看。现在群众已由不敢说话到敢说话，不要小看这一点。坏村干部有的已经过教育，有的已经过洗刷。群众自己的组织也大部组织起来，正在发展。党的支部有的已经过整理。一般村已划了阶级（不少的村划了三榜），群众对此叫“订政治八字”，叫我们工作团是“安家队”。以上种种说明群众运动已有了初步发动的规模。

第三，社会秩序较稳定，人心没有不安的现象。直到今天不少村庄已有流亡出去的被斗户回来。群众生产情绪是高涨的。从仓

上、方庄集市的调查上看，市面经济已由恢复到发展，三个月来的税收的数字显著的增加。各组在这方面提供的材料已在会上谈了很多，这里不再重复。

二、几个问题

(一) 民主整党

1、三区党的特点

(1) 小党。小到有的村只有两三个党员(如王楼两个女党员，东国3个党员)，多的也只是十几个(如仓上18个党员)，所以在社会活动和领导作用上不大。

(2) 新党。主要是去年建立的。再加上过去领导上缺乏教育，所以党员一般地阶级觉悟和政治水平都比老区低。一般说来，党员的水平并不高于群众多少，甚至有少数的是投机分子，有少数的是混入的挂名的落后分子。

(3) 不完全当权的党。过去土改与其说依靠党，不如说是依靠自上而下的行政的力量。村里当权的是一群干部，其中有党员，有非党员，而大部党员是不当权的。群众的不满主要是集中于村干与小区干，而不是党，甚至亦不知有党。整党时，提到该村有党，群众表现愕然。

(4) 基本上是在群众运动中发展的，非从和平中发展的。他们当中多数，斗争地主或是很积极，或是很坚决。因此组织不纯的现象固然有，但并不严重，只有个别组织的个别分子不纯。但由于过去领导上阶级路线不明确，小资产阶级急性病，与少数有流氓作风的村干在思想上有了结合，强迫命令，完成任务不择手段，所以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的问题确很严重的。

2、民主与整党相结合

冀王庄从整党中发动群众的民主运动，反过来又用群众的民主运动教育了党员，教育了干部。民主与整党是相辅而行，相得益彰。这一点是和其他的老区与半老区不同的。不同之点是在于有些地区

是发动群众的民主运动来整党，冀王庄是从整党中发动群众的民主运动，二者密切结合。对于这一经验，我们有些村子是可以采用的。这主要是指有党的村庄，且党还有相当作用的情况下的经验；至于没有党的一般村或党很小没什么作用的村庄，则主要是发动群众的民主运动问题，是一般的从审干中发动群众的民主运动，党的公开可留待民主和抽补以后。在民主与抽补中，应注意发展党的组织，充实新鲜血液，将来公开党，是叫它对村庄工作起到领导与骨干的作用。

3、群众路线的整党方法

(1) 有的村采取党与非党群众共同组织整党，有的村则是由支部来领导，群众处于参加、帮助的地位，表示是相信党，依靠支部来整党（以党整党）。这两个办法都值得研究参考。

(2) 冀王庄根据党与群众的要求，在会议的形式上采取由小到大——提高群众热情和觉悟，由大到小——深入教育加强内部团结的方法，而方法又是从摸索得来的，是从群众运动中不断研究、不断提高而逐渐明确的，所以又密切联系了群众。同时在方针（治病救人）政策（区别对待）上是明确的，是结合实际情况的，因而有创造性，有灵活性。

(3) 赵台的两面教育、双管齐下的方法也是对的。因为不先在党内经过一番教育，就能立即下去反省错误，是不可能的。但这并不等于说可以关门整党。同时在群众中有少数民主运动中的偏激分子要出口气，故也要教育。本〔着〕教育改造方针，对他们不应亦不可深责，而是用多数群众公正的意见来教育和抨击少数偏激的意见。

一般地说，这种分子开始还代表群众的，故领导上不要因怕其偏激报复而不敢用他。在领导上头脑要清醒，在运动中教育他改造他，特别加强群众对于他的民主监督，但群运的领导权勿使他们少数人掌握，而是由老实贫雇和中农来领导。开始时群众常常好利用这些人打“头一阵”，但又不满意其不民主、出风头、偏激报复、

自私争权的作风。这些分子可以在群众运动中改造他，如果他民主运动中的积极性已用完，专制揽权，一贯不改，脱离群众时，特别把他自己的那部分群众也脱离了（如王楼），群众是会选掉他的。

（4）以好党员带头反省，从而大大提高和教育了党员。

（5）群众的诉苦说理与党内的批评自我批评思想斗争相结合。经验证明，这样做的结果，群众对党是爱护的，反过来，党员自报处分时，也从没有一个自愿开除。实际上这是治病救人“攻心为上”的办法。

4、依靠好党员发动群众，依靠好干部坚持工作。好些村的经验证明：好党员作用很大，日常与群众有联系，因此必须经过支部，依靠支部，在完成本村土改任务中，树立支部在各种工作和组织中的领导作用，而不是把他们一脚踢开或放下不管，不注意教育培养，提高其威信与能力。否则，等到我们将来一走，工作又垮了，那是最失败的。

5、对党员和干部的政策

（1）坚持治病救人、教育改造的方针。要严肃的态度与热情对待相结合，一经悔悟改过就应热情的对待。既要宝贵〔珍惜〕群众的热情，又必须给党员干部以民主答辩的自由，否则是片面民主，既不能教育党员，又不能教育群众，同时也就会脱离一部分老实的群众。

（2）区别对待，宽严分明

首先区别对待：①为公为私，是为完成任务（为公）或是个人主义（为私）。前者与其说是党员的毛病，不如说主要是领导上的责任，而后者则党不能为其负责。②一贯地犯错误，还是偶然地犯错误。③由于农民自私的思想（个体的私有主义的经济形态的产物）、家庭困难的原因，还是小资产阶级与地富思想。④由于党的教育不够，还是明知故犯。⑤功过分明。有功有过？功多过多？或全是过而无功？⑥悔悟改过，坦白彻底，抑顽强抵抗，坚持不改？

其次，宽严分明，不能说宽就宽得没边，严亦不能过分。太宽

使党松懈、散漫、减低战斗性，使党员降低成一个普通老百姓的水平，那是不对的。太严，惩办主义，打击干部也是错的。

整党将毕的会上，领导上要检讨一次过去的政策和领导，公开进行自我批评，承认领导上的一切应有的责任与错误，藉以解除党员为公得罪群众的一部分错误，平息群众的情绪。

最后要达到表扬好的，批评与教育坏的，淘汰那些不可救药的、坚持错误不改的少数分子（丁集此次整党中即有此经验）。

6、从整党中建党

本区党小，新建立，党的力量差，因此需要在整党中做到：

（1）提高党的威信。要使党员参加到各种组织中去，起积极的领导作用。跟着群众的反党情绪跑是错误的，对于群众的反党情绪应当给予适当的教育和批评。

（2）向党员解释，整党是为了党好，是为他自己好，使他积极工作，不要消极。开始时有些消极是可能的，但长久消极下去就错了。这里特别应注意新老干部团结的问题。

（3）发展新党员，使其在将来三区人民的生活和斗争中起决定性的作用。

（二）中农问题（下略，待续报）

附二：阳谷县三区赵台纠偏经过

一、赵台村实际情况

赵台是本区工作最早的一个村，1944年起已有群众运动，曾经过雇佃贫、反奸清算、土改复查等六次群众运动。群众已有初步发动，封建基本上已消灭，土地大体已平分。

1944年开始建党，支部是在1944年及其以后的历次群众运动中发展起来的。支部的领导人原是赵守功（1946年调任小区干，现任本区区长），谭振山（1946年调至区工会，现任本区分委委员），

现任支书赵守章（今春曾出席九地委整党会议，为贫雇顾问）；党员现有11人，9个贫农成份，2个雇工成份。党员多为主要村干，均有一般阶级觉悟，与群众有日常联系。但由于过去县、区党的领导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对农村党的教育不够，所以存在着思想和作风不纯的现象。去年土改复查运动，即是在支部领导下，结合少数非党村干、积极分子，在强迫命令作风下的群众运动。

因此，目前群众的要求是民主问题。但与本区一般村的民主要求稍有不同，一般村群众所愤恨的是区、村干部，而赵台群众则略带有直接向党要民主的性质。但与老区又不完全相同，因为支部的历史不长，党的观念在群众中尚不深，一般群众只知有村干而不知有党。

二、抛开支部，片面贫雇观点

今年2月初工作组进村工作时，首先带着否定一切的情绪，调查研究的实际目的是为了找岔子。做法是双管齐下，两头对证。一面召开支部、村干会，一面访问贫雇，而以后者为主。两头对证的结果，双方反映的问题都差不多，对于过去翻身的情况说法一致。工作组认为是“假报告”，于是抓住地亩册上个别党员、村干的多占现象，或某一、二作风问题上的突出事件，片面夸张，扩大宣传，刺激群众情绪，对于支部则远远抛开，不再过问。

在组织发动群众上，片面的强调贫雇路线，宣传“贫雇坐江山，贫雇说啥就是啥。贫农团领导一切，谁反对贫农团就叫他坐人民法庭。”对于中农根本不管（全村被“清剿”、扫地出门的中农14户，当时有的已要饭）。对于与村干比较接近的群众，称为“保皇党”或是“吃饱了的人”。对于支部将来究将置其于何地，毫未考虑。

结果，大部群众对工作组冷淡，党员、村干表示观望，而过去受过村干打击，有报复情绪或怀着个人目的的人，都起来了，紧紧贴在工作组周围，工作组认为找着了“贤”。

三、忽视慎重开始，陷入偏激情绪的圈子

2月9日，团部书面通知，反对急性病，反对不经过支部、村干的片面调查，提出应从全面调查研究入手。工作组没有接受这一精神。当着带有偏激情绪的分子贴近工作组时，工作组就在依靠他们的串联下，很快地组织了贫农团及新农会。贫农团的组织方法是由串联到打点子，由小到大，由秘密到公开；中间还开了一次集体的表决心会，把劲鼓得足足的。贫农团及其稍后的新农会，自开始串联到成立，没有吸收一个党员、干部参加，造成党员、村干的极其消极不满。

2月中旬，团部总结本区基本情况为半老区，又指出赵台等村为接近老区的一类村庄，提出慎重开始的要求，并警戒吴堤口、关门所的经验教训（因赵台与该两村近在咫尺）。工作组负责人当时仍未注意情况的分析及政策的研究，急于行动。当贫农团成立之后，即提出接收民兵武装，认为不如此“贫农团靠不住”。贫农团不同意这样的做法，说：“你接收过来，没人当！”“莫慌嘛，等咱们发展好民兵，再收回他一部分枪也不迟。”工作组认为他们“胆怯”，鼓动他们“缴吧，缴吧！”最后在上级党的督促及贫农团坚持不缴的压力下，民兵才未被缴械。

四、群众消沉，党员抵抗，工作苦闷

当时群众表现对工作组不摸底，不接近，非常冷淡。他们说：“我们村里有的是小米，让他们在村里慢慢地吃吧，够他们吃几年的！”部分中农要接近工作组而接近不上，说：“你们和我们谈谈怕啥，怕难了你们吗？”

支部党员开始是消极，至此已发生抵抗情绪。起初只是坏干部抵抗，此时则好坏党员、干部在情感上已结成一气，一致抵抗工作组和贫农团。一次，贫农团员在原农会长（党员）做活地方附近玩弄武器，偶然不慎，手榴弹爆炸，农会长便在贫农团开会时跑去威

胁，说贫农团要轰死他。双方互相攻击，大吵大骂，形成党员、村干部与贫农团委员、积极分子之间的尖锐对立。日常之间双方见面互不答腔。

从此，工作组才开始感到自己走了弯路，重新作调查研究，初步了解本村工作、支部并不是那样地一团糟，对自己这种主观的否定一切的态度开始有了否定。但当了解本村土改较为彻底的情况之后，又都认为封建及民主对象均不如其他村的问题多，“无油水了，没搞头了”，因而又发生苦闷，工作经过一段松懈。2月底工作组分出部分组员转移到别村工作，留下两个人住在赵台。

五、扭转过来，进行整党

3月上旬，团部召开扩大会议传达中央二月指示及中央局二月会议的精神。在这个会议上，团部公开批评工作组对赵台老支部不正确的观点，特别指斥工作组反对团部提拔该村老党员赵守功、谭振山为本区区干的错误意见。这时，工作组才开始接受，否定片面贫雇观点，否定对老组织一脚踢开的思想，并了解整党应从提高党的威信出发，贯彻治病救人、文明有礼的方针。对于实事求是，调查研究，全面看问题的要求，也有了新的领会，只是观念仍是抽象的。

三月会议后，就进行整党（工作组这时只两个人）。整党之前，关于整党与审干的关系，孰先孰后，抑互相结合（实即整党与民主相结合的问题），工作组曾有所争论。最后一致同意：先整党后审干，理由是，整党是党内的事，审干是群众的事。先整党有条件，党员成份好，个别的质量亦好，整党后可参加贫农团，共同领导审干，弥补过去的失策；审干是个群众的民主运动，应该放在以后做。

六、整党经过

（一）整党的方针初步确定：以党员反省为主，结合群众压

力。在步骤上，由于党员抵抗情绪很大，先作思想酝酿。办法是双管齐下，两头工作，即一面在支部内部进行教育，扭转情绪，端正态度，一面召开农会小组会，宣传政策，启发群众，作整党的思想准备。

支部会开了4天，起初是互相包庇，情绪消极；经工作组反复说明政策后，仍是怀疑，不信任。直到最后，支书赵守章从九地委整党会议回来，带头反省，以身说法，冷静和尖锐地检讨了赵台支部工作及自己的错误和缺点，反复说明自己对整〔党〕精神的体会，党员才开始觉悟，表示愿意反省。

在群众方面，宣传政策后，大部群众仍不摸底，不知整党究将走到哪一步。带有偏激情绪的分子，特别是部分贫农团委员和积极分子们，摩拳擦掌，准备斗争。工作组对此不敢作大胆的自我批评，因此说了好多好话，情绪仍未能转变。

这期间，党员与贫农团之间仍是互不通气。个别党员改变了对贫农团委员、积极分子不说话的态度，但得到的却是冷淡。两头工作实际上是三角式的，□中于工作组。

（二）公开党后，出乎群众意料之外，原来，他们以为如像赵守坡那些“五马长枪”的干部一定都是党员，哪知结果他们不是党员，党员乃是大都与群众有联系的老实农民与干部，群众思想开始有了变化，对党有了新的认识。这一反映，对于党员也起了很大的教育与鼓励作用，一致表示愿意彻底反省，改正错误。

公开〔党〕后，召开8个农会小组会，请群众提意见，一般发言尚普遍。中农大多是提出去年土改复查中挨打受气和负担不公的问题；贫农主要是暴露斗争果实分配不公；而共同的带着普遍性的问题，是作风不民主的问题。同时，从群众所提的意见中反映出这种不民主的作风，主要是来自过去县、区的领导。因此问题不大，意见不多。

（三）进行小型整党会议，决定以党员反省为主，结合群众的批评，取得群众的满意，顺利通过。但又片面地规定，只准群众提

意见，党员只可考虑，不能解释，只可反省，不可表功。会议由工作组以上级资格直接领导，党员不分好坏，一个个轮流反省，逐一通过。在群众方面，对贫农团委员和积极分子们，强调文明有礼，治病救人；对于一般群众，则着重启发发言。群众代表共29人，除了少部分情绪偏激的新干部和积极分子外，大部分为意见公正的农民。他们一开始就向党员表示：“大事忘不了，小事可能忘；大事不谈不行，小事我们可以提一提。”党员都作了反省。但有少数党员，因须遵守工作组规定的纪律，在会场的空气压力下，被迫承认了一些偏激分子的不正确的指责。当时，公正的群众代表曾在会场向党员喊：“有的事应承认，没的事可不能接受呀！”但党员始终闭口未敢作任何解释。整党会议就是这样和平地进行了4天结束了。

七、党员虽参加了领导，但又走了弯路

整党会议结束后，群众通过了5个党员立即可以参加农会，他们并且认为：“像赵守章、赵守川等人，无论如何上级不能调走工作，应留到村里领导农会。”但由于整党会议是片面民主，功过不分，致使此时党员情绪普遍低落。少数党员虽在整党会议上承认了错误，但感到是丢脸的事。一般好党员感到以后工作难办，甚至如支书赵守章，开始是他带头反省，而后他看到整党结果是如此下场，也认为对不起党员，表示无法提起大家的劲儿做工作。整党结束后，紧接着是审干。两个党员虽于此时参加了审干的领导（与贫农团委员及中农2人共任主席团），但情绪很不自然，觉得是工作组让参加的，只有勉强担任，工作中很少发言，表现胆怯。

部分群众，也因整党会议片面民主、功过不分、未解决了问题而表示不很满意，说：“我说共产党总不能卸了磨杀驴吧！”也有的因为没有出了气，表示不满。一个贫农团的委员公开在小组会上说：“什么民主不民主，我不相信那一套！”“像这样整法，审干会群众一个也不来了。”以此来威胁工作组。甚至贫农团委员会主席亲自在外庄散布失败空气，发牢骚。大部贫农团及新农会的会员，

对参加领导的党员表示傲慢的冷淡的态度。所以如此的原因，是由于工作组在工作之初对他们是盲目撑腰的。

在党员的处分问题上，工作组又犯了个尾巴主义。党员王金才是个雇工成份，南乐人，在本村地富家住长工，落了户。从前有些群众向地富借农具时，地富推给王金才，王金才不敢出借，地富落了户，群众对王金才不满；这次又加上排外情绪，因而对他提的意见多是偏激的、不合事实的。确定处分时，群众提出留党察看一年，工作组竟完全接受了。

八、说服新老干部团结工作

工作组对这一情势采取了“坚决下功夫说服解释”的方针。做法仍是“双管齐下，两头工作”。

对于表现不满的群众，工作组和他们从正面谈，讲道理。一个贫农团委员经过几次说服解释后，正面向工作组表示：“我不是不想进步，不想为人民服务，但打死我娘的事就这样算完，我心里想不开！你们来时是要天给半个，现在连个枣也不给！”

对于党员，工作组在支部向他们承认了整党时的片面民主、功过不分是不对的，承认并鼓励他们过去的成绩。同时上党课，讲解一个党员的行动是代表党，不能给党丢了脸，应该积极工作，不能消极；应该主动地去团结新干部，向他们承认整党前对抗贫农团的错误，并在工作中起模范作用……。经过几次说服动员之后，党员们表示：“哼！又来和我们打气了！”参加领导工作的党员，因为工作组的督促，也只得勉强地向贫农团的委员们承认了错误。

现在，在新老干部的关系上，由于新干部缺乏工作能力，在解决具体问题时，不得不请教这些老党员，他们逐渐对老干部表示尊敬，但在背地里同时又互相私议：“还是人家吃得开，将来天下还是人家的。”因此在表面上看，双方关系已好转，开始合作，但内心的隔膜，双方尚未完全解除。

该村现准备土地调剂。

附三：阳谷县三区冀王庄第一阶段工作总结

冀王庄从调查研究，依靠支部，串联贫雇，联系中农入手，即从整党开始由党领导发动群众民主运动，取得了新的经验。所有工作经过情形，该村工作组4月25日曾有书面详细报告，业经分别转送。现又据该组组长贾布彬同志5月12日在工作团扩干会议上的总结报告，综合整理如下：

一、该村一般情况和特点

全村222户，初步划阶级计：地主4户，富农5户，中农107户（内富中4户），贫农104户。全村土地17顷20亩，每人平均1亩6分。1945年夏阳谷解放后，该村曾断续地有过群运，进行过倒粮、增资、查“黑地”及反奸等斗争，但运动规模不大。封建势力也曾组织过假农会分裂群众，加以匪特横行，运动时起时落，直至前年冬季，工作人员尚害怕进村。

五四指示是去年春开始执行的（春夏被斗共23户），地主富农有的已闻风逃跑，分散了浮财。群运在行政命令下展开，思想动员不够，阶级路线亦不很明确。但因打垮了封建，大体上平分了土地，故群众是有了初步发动的。严重情况是在去年6月至9月的复查运动。这期间被“清剿”了10余户普通中农，而驻村小区干部崔凤魁又在强调土改结合“反特”及“控制落后”、“砸狗腿”等口号下，使约占全村半数户口的中农和贫农，或被吊打，或被扣罚，或逼“自动”，或送反省院。参党运动后好党员未当权，而混入的一些投机分子，则均被老崔委为秘密“调查员”，以致群众不敢言语。……凡此种种恶劣行为与作风，部分群众曾向区控告，但被驳斥，事泄复遭崔等一一痛打。直到去年冬季才将崔调走，群众已忍气吞声了半年。

全村18个党员，一般成份尚好，但因建立不久，缺乏教育，支

部的组织生活从未建立，组织领导机构亦不健全。好党员并未当权，坏党员系占少数，且他们在混入党前，即原为群众所痛恨的坏干部。故这里的支部并未成“一窝蜂”，党在群众中的印象很浅。

依据群众当前的迫切要求，主要是民主自由的问题，其次是调剂抽补、发展生产的问题，而贯串这两个要求的则是重划阶级的问题（实即群众的基本民主要求），以及我们在解决这些问题中，必须深入细致地贯彻党的政策教育和阶级思想的发动问题。

二、工作组进村前后其他乡的工作情况

工作组听取了中央局二月会议传达之后，于3月中旬进村。当时其他各乡工作组在反对急性病的口号下，又发现工作苦闷的情况。基本原因是：（一）不按客观情况出发，仍是一、二、三、四老一套的工作步骤。不按群众现在觉悟水准出发，逐步启发诱导提高，而生硬的灌输党的政策；又加以习惯于“阶级论”及“单打一”的作法，致使群众反而摸不着我们的底，情绪低落，说我们是“河里的船不靠边”，“老开会不解决问题”。贫雇讽刺我们说：“咱是一条老牛，你们牵不动。”（二）对旧工作基础看法仍有偏差；先入为主的调查研究；单纯民主运动，放松思想发动；对村支部、村干部的改造方针，一时转不过来，未进行整党整干，而已陷进新积极分子的圈子；也有的群众不愿当家，“选谁谁不干”，而好党员仍冷在一边，安插不进新的群团中去。眼看群众是没有真发动，工作组苦于进退两难，“群众路线怎样走法”成为当时的中心问题。

冀王庄工作组留意了上述经验教训，在初步调查研究本村情况之后，并在工作团团部的意图下，决心从新的实践中试验解决这些问题。首先确定从依靠支部、串联贫雇、联系中农的工作方针入手。其次从入手工作的实践中，继续密切结合调查研究。而后再定怎样发动群众运动。

三、入手工作的点滴经验

(一) 进行支部教育

工作组进村后，首先召开支部会和进行党员的个别谈话，从这里发现了一部分好的党员，了解到他们同样有民主要求，或翻身不透，于是抓紧对他们的启发教育，更多的与他们接近，解除他们的疑虑，经过他们了解到支部与农民翻身的情况。在支部会上则强调如何当一个毛主席的好干部，思想行动要与封建分家，并给予全体党员两个任务：了解群众翻身情况，向群众作宣传；各人检讨自己过去有无缺点。与此同时，工作组在群众中多方进行访问调查，了解的情况一般的与部分好党员反映的一致，从此证明可以依靠党员进行工作。于是抓紧先展开党员的思想斗争，在支部会上从积极方面提出，反省检讨是为了改正毛病，更好为人民服务。这样所有的党员都表明了态度，愿意跟着党走。好的党员初步讲出坏党员的某些坏作风及群众翻身不透有责任的意见。当即一面与几个坏党员个别谈话，说明政策，稳定情绪，促其反省；一面试让这几个好党员去串联贫雇。

(二) 依靠党员，串联贫雇

党员们一开始即串联了8个贫雇。为了考验党员思想及有无宗派问题，工作组均分别作了正面与侧面的审查，同时自己亦直接串联，从两方面来了解判别党员及其串联的贫雇。初步体会到依靠好党员进行工作的顺利，从而决定了继续发挥与培养他们的积极性及两方面同时串联的方针。

(三) 多点开始，波浪式的发展

开始是多点串联，即从村的东、西、后街三点同时串联，组成3个贫农小组。以后就放手有组织的波浪式的发展，办法是：找好对象，本组讨论，外组审查，本人表态（有些小毛病的坦白）。这样很快发展到70余人，成立5个小组。这时党员的面貌亦分清了。凡与群众有联系的好党员均参加了贫农组，坏党员及“两头尖”有

些毛病的，群众拒绝了他们参加或暂不让参加。同时，为了提高党的威信与培养积极分子，对各贫农组的领导暂采取由其中党员与非党小组长、积极分子联席会议的形式。

（四）组织贫雇，同时联系中农

因本村中农问题的突出，数量大，受气多，工作组去后，对我们不摸底，表现疑惧、旁观、等待、侧[测?]探、私议等态度。为此工作组在开始组织贫雇时，即采取了无组织形式的联系中农。办法是：

（1）通过中农党员去向中农说明政策，反映中农的意见。现任村干部多半是中农，其中主要的又为党员，有问题不大，一律不动并帮助其工作。（2）工作组直接召开中农座谈会，说明土地法大纲对待中农的政策，同时在各贫农组内不断进行团结中农的教育。以后贫农小组在初步揭发过去干部为非作恶时，因中农比贫农还要受气，他们自己又创造了两种形式去联系中农：①吸收好的与有苦诉的中农参加他们的小组会。②贫农积极分子主动找他的近邻中农座谈，吸收中农的意见。等到大部中农不疑惧我们及贫农组并靠近贫农之后，贫农小组才表现普遍的活跃起来。

四、发动群众民主运动结合整党

（一）思想发动，讲明政策

由于去年土改群众缺乏思想发动，并由于群众民主要求的突出，必须提高阶级思想，充分〔进行〕思想发动，以免流于偏激的单纯民主斗争。因此首先在各贫农小组的数天会议上启发与组织了诉苦。如雇工冀玉保倒出他几十年来受地主压迫剥削的苦水，觉得现在翻身了，有问题也不大了。这样提高了群众阶级思想，使群众认识封建剥削压迫与今天农民内部问题的区别，明确阶级性，引导到正确的民主要求。

其次，为了结合整党，在群众中又进行了明确整党思想和治病救人的政策教育。通过群众的思想酝酿，他们有了这样的认识：“党是一筐梨，尖儿上是好的，中间的留下，底儿的贵贱清走。”“小

毛病要原谅，包庇地主事大。”初步认识坦白反省，治病救人，不打人也能解决问题。他们说：“说理挖苦也厉害着哩！”“打人不对，会打的打一顿，不会打的打一棍。”“过去老崔打人不对，所以才整他，现在我们再打他，不是也错了？”有的小组并自动演习起说理斗争。

同时为了从运动中改造教育党员，亦须提高党员对整党的思想认识。配合群众思想教育，在党内通过查阶级进行了初步三查。再次动员教育，〔讲明〕整党意义，从正面提出治病救人，说明整党是为了改造教育自己，去领导群众，但有错误必须坦白承认。又具体讲解《告党员书》和公开党的意义。最后，党员一致同意拥护公开党，并说“有啥说啥”，“这是群众给咱看病”。

（二）依靠贫雇，由党领导

这里中农受气很大，其民主要求较贫雇尤甚，但不能因此就以中农来作为民主运动的骨干领导，进而即先成立农会，而仍必须贯彻阶级领导作用，依靠贫雇，并以党为核心，去联系吸收中农来参加。这样才能使运动获得有力的阶级基础与雄厚的群众基础。冀王庄的作法，就是首先依靠发动了贫雇，启发了贫雇的积极性，通过贫雇的思想行动去影响联系中农，一切活动都是通过贫农小组及以后成立的贫农团进行的。事实证明，在共同的利益下，贫雇是很会联系团结中农的。他们的办法是：①吸收中农来参加他们的会议，共同讨论酝酿，用贫雇的觉悟教育了中农。②贫雇积极分子主动去召集邻近中农座谈，反映贫雇意见，征求中农意见，实质上贫雇影响了中农，在思想上领导了中农。而依靠贫雇又是以党为核心，表现在：一开始即由好党员去串联贫雇，在串联的过程中，又以好党员与贫雇的非党积极分子联席会议的形式，来领导发展贫农组织与提高思想认识的工作。以后的运动过程中，又是采用党内整党委员会性质的主席团，由支部选举好党员来担任，工作组与支部混编，成为帮助性质的共同领导。贫农团的产生及其产生后的工作亦都是以好党员为其核心指导的。

（三）由小而大，由大而小，逐步提高深入运动

在运动的规模和会议的组织形式〔上〕，是依据群众的要求及思想发动的程度随时转化，不能机械的以固定形式限制群众的积极性与运动的深入发展。

冀王庄从4月初公开党后，先由党员结合群众的小型会议开始。最初群众仍不很摸底，不敢多说话，通过党员的自我检讨，党内交锋，推动并激发了群众的民主。进而问题展开，由揭发贪污到追查地主思想及地主立场，直至民主自由问题，群众情绪渐趋激昂。这样会议开了4个下午，最后群众与党员已把许多重要问题追至未到会的小区干部老崔及个别坏干部的根上，一致要求他们到场解决，领导上才根据群众情绪的高涨，改变了原拟把老崔等问题最后解决的计划，同意了群众的要求，有意识地适时地把运动引向群众性的规模。

以后进行了3个下午的大会，逐步吸收更广泛的中农、贫农参加，但以整党形式的领导运动及每晚各群众小组会议进行思想诱导的配合方式，仍是不变。大会上，中、贫农群众都充分发扬了民主说理，坏干部当众具体地承认了错误，解决了群众半年余来的积怨。同时宣告贫农团委员会的成立，立即解决群众几次经济要求及取消错戴帽子，运动即迅速由高潮转为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

由于对错误思想行为的性质和根源，一般群众和党员在认识上一时尚不很明确，必须再予以提高，最后继以5个晚上的小型会议。工作组同志列席旁听，全体党员与群众代表二三十人混在一室，他们热情地展开了一家人会议式的思想清查，为了分清是非功过，每至夜深不散。例如，对过去曾领导小农会斗争的冀太胜，群众表扬了他有功，但对他去年复查中打人问题的反省不满意，诱导他说：“你当时从谁手里拿的棍子？为啥要拿？”他答不上时，群众则说：“你是为了取得老崔的好，怕老崔打累了。”当他承认了此点时，全场结论他是“稀泥，没有主心骨”。又如批评一个本质较好的青年女党员过去打人时，她自己承认是走地主路线，但群众分析

改作的结论是：“为了争取模范”。这样就区别了错误的性质。又如对坚决不坦白，成份不好且本质很坏的女党员王月英（成份尚未定），当她反省她的入党动机是为进步，以后又随风转了时，群众马上提出：“你想想你是啥成份？你进步是为的啥？为的谁？你说你进步，为啥当去年斗争你的伯父（曾任伪乡长）时，你还哭？你家的地割给谁了？（她去年自动分散土地）”群众认为她是为护家投机入党，借着老崔的势以欺压群众。诸如此类。经过5天的小型会议，把在大会上不可能仔细解决的问题（事实的和思想的）都大致求得解决了。经过问题的解决，思想的追查，对党员作了思想总结，对群众亦作了具体教育。这样在大多数群众与党员之间，巩固并扩大了思想阵地，使运动趋于更健全的发展。

（四）在运动中建立贫农团领导，及时解决问题，鼓励群众

从3月中串联开始，至4月上旬发动群众，贫农组逐渐发展到5个。为了慎重培养积极分子，并巩固党员与群众的联系，暂不成立贫农团委员会，而以党员与各群众小组长的联席会议方式，以党为核心领导各贫农组。当4月中旬民主运动趋向高潮，干部贪污坦白并允马上交出时，群众不同意由旧农会经管，且要求清理旧存果实，并提出“要人带头”，于是才抓住火候，立即成立贫农团领导机关（选出了7个委员，其中4个是党员）。

当时民主整党一面尚在继续，而贫农团委员会则在一边结合几个中农成份的现任村干，立即处理了下列数事：（1）接收10余人马上自动交出的贪污或多占的物资及少数土地，同时清查帐目，登记旧存果实。（2）解决春荒困难，以借的名义分给了30余户的钱粮。（3）当时数片尚未分配的梨园，正值花谢结果，及时组织了数批人出发打虫。（4）曾诬为特务及狗腿的10余个人的帽子，宣布一律取消。

冀王庄贫农团委员会在运动中建立，且一出现即以联合中农代替旧农会的姿态，及时解决群众临时的经济要求和民主自由，以配合当时运动渐由高潮转为深入思想教育的过程，这样做法既鼓励了群

众，使运动趋向健全的发展，同时因贫农团内党员的核心领导，实际上也即是及时提高党在群众中的威信。

（五）调整组织，适时转入划阶级运动

当4月下旬，民主整党运动结束时，立即调整党的组织及党与群众团体的关系。（1）宣布开除群众认为“败坏八路门风”的支部内4个坏党员（两个女的）。其余党员至此有些尚未参加贫农团的，又在贫农团讨论通过下参加了贫农团，包括3个中农成份的党员在内，实际上他们都参加了工作领导。（2）支部重新选了新的支委，工作组作了支部工作教育，说明党在群众中起核心作用的领导方式及党员应有的工作责任感；同时对被处分的党员也作了说明，只要为人民立功，改正了错误，取得群众同情，将来可以重新申请，减轻或取消处分。（3）小区干部老崔经区批准开除党籍后，群众原要求送人民法庭给予行政处罚，后因其亲向遭损害最严重的10余户群众登门道歉，表示接受群众教育，群众一致同意撤销了送人民法庭的原议。（4）在民主运动与整党结束之前，工作组已进行了划阶级的准备和典型户的调查，并在宣布组织整顿及总结民主运动的群众大会上，同时提出重划阶级，并立即进行广泛宣传，适时地转入了全村群众的划阶级运动。

冀鲁豫区党委 关于整党土改工作总结

(一九四八年六月十七日)

中央局工作团于二月初到村，各地委工作团于3月底到村，区党委工作团于5月初到村；有的经过四个月，有的两个多月，有的一个月。在几个月的工作过程中，由于同志们的努力，我们取得了工作经验。特别是中央局工作团，给我们帮助很大，给我们作了典型示范。范县城的工作，也给小城镇作了示范。我们应很好研究学习，提高干部信心，打开工作局面。有的重点村，走了弯路，碰了壁，这是由于在我们思想转变的过程中，我们的指导思想不明确，对政策领会不深刻，有严重的片面性。我们应深刻检讨，总结出教训，弄清楚为什么走了弯路，则今后即不致再走错了。现根据各重点村汇报情况及经验教训，提出以下几个问题，希同志们研究。

一、河北老区半老区的基本情况

河北各县，除六地委齐禹县的边沿，四地委的浚县、卫南、延津、封丘、长垣、曲河、原阳等边沿、游击区、新区、新收复区外，其余四地委的滑县、高陵、长垣一部，六地委的东阿、茌平、博平、聊城、河西、聊阳、徐翼、齐禹大部地区，八地委的南乐、清丰、卫河、内黄、濮阳、昆吾、尚和，九地委的濮县、范县、观城、寿张、朝城、阳谷等24个县，大部经过减租减息、民主大动、雇佃贫、反奸清算、土改复查，少数县经过反奸清算、土改复查。在连续不断的斗争中，特别是经过了土改复查之后，农村阶级情况起了基本的变化。目前农村的基本情况是：

（一）阶级情况的变化

地主富农：在老区，经过民主民生斗争，土改前地富户数已少于8%（如颜村铺5%）。有的已参加劳动。半老区因斗争影响所及，地富亦分家荫蔽。但不管地富怎样逃避斗争，在土改复查中全部被斗。其情况是：少数被扫地出门，绝大部分浮财及土地被没收后，留给少数土地，少者5分，多者1亩半至2亩。军工属地主富农，有的自动，有的征收，他们留的浮财、土地一般在平均数以上（土地平均每人3亩至4亩）。地主的房屋一般已移出，但大部未分，农民没搬进去，他们生活困难，有的要饭，必须安置，不然对农民不利。

有个别村庄及极少数的地区（如沙镇一带），由于工作基础差，土改强迫命令，不深入，有假农会假斗争，地主逃亡，有的漏网，而土地、浮财亦已转移分散，因而地主阶级的封建剥削制度亦不存在。

在政治上，地主阶级几千年的统治基本打垮，并一般的向农民低头（只有极小部分的村庄打的不彻底）。

目前地主富农除逃亡者外，一般的均参加劳动生产。

总之，地主阶级已基本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已不存在。

中农：土改复查中，由于我们对中农政策存在着严重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思想，及在3亩推平的思想支配之下，严重的侵犯了中农利益，打的面宽。一种是：错划阶级，斗争了中农，有的以奸霸、政治态度等进行斗争，斗争的结果，个别的扫地出门，大部分清剿了浮财，至于土地，一般的则仍不少于贫农，或相等于贫农，或少于贫农。一种是：中农在土改复查中恐慌，自动少数粮食、农具或土地，但其土地浮财仍多于贫农，或等于贫农，个别的指块要地，所留土地质量低于贫农。

总之，错斗中农，达中农户20%到30%，占整个斗争户的60%到70%。由于打击了中农，所以中农普遍不安，生产情绪降低。这是目前端正政策，纠正“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中的最困难、最棘手

的问题。

贫雇农：土改复查中，贫雇农已大体得到相当于平均数的土地，有少数得到好地（村干），有少数地质较差，数量亦稍差（被村干排斥的少数贫雇）。唯浮财分配不公平，有的被村干贪污多占、浪费，有的没有分配，所以贫雇农仍缺少农具等生产资料。目前少数贫农，他们的土地数量较少，质量较差，要求调剂的约占贫农户数的10%，要求质量调剂者则占20%。他们都要求公平合理的分配留存的果实，要求不再斗争，能安心生产。

总之，封建剥削制度已基本消灭，贫雇农已得到相当于平均数的土地，中农除极少数被扫地出门者外，一般的在土地数量上不少于贫雇农，质量上亦较贫雇农为好，所以，不能绝对平均主义的再来一次抽补。因之，应认为土地问题基本上已经解决，既不必提平分，也不必提抽补，只在端正政策，恢复与发展生产，完成整党建党工作中，在极小范围内从农民内部进行调剂。

如果个别的或极少部分的村庄，土地尚待分配，地权尚须确定，自然应在运动中解决之。

（二）农村党的基本情况

农村支部，在组织上基本上是纯洁的，只有极少数的蜕化分子、流氓分子，及在土改参党运动中混入少数不够党员条件的（个别地富成份已在土改中清洗）。主要的是思想不纯、作风不纯，而且是比较严重的。

在老区：有一部分是好党员，成份好，作风好，不脱离群众；有一部分是一般党员，阶级觉悟不高，多占一点果实，有些特权思想；有一部分是极少数党员，多系村干支干，贪污多占，不劳动，严重的蜕化，强奸妇女，作风上强迫命令不民主，严重的脱离群众。

在半老区：一是好党员，本质好，觉悟不高，是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一般党员本质不错，水平与农民无大差别；一种是带有流氓习气，蛮干，加上我们领导上的强迫命令以及没有群众监督，即发

展为严重的新贵思想，强迫命令，不民主，贪污，多占，强奸，不劳动，脱离群众。

总之，农村支部，组织上基本是纯洁的，主要是思想作风不纯，脱离群众，所以整党民主在党内说是必须的，在群众说是群众的迫切要求。

（三）由于我们政策上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又加土地在复查中已基本平分，而我们仍主观的不切合实际的强调宣传平分抽补，致使农村中各阶层均感不安，生产情绪不高。村干怕整党民主，消极怠工，农村呈无政府状态；贫农怕抽补倒地，迫切的要求摸底，“斗争有个头”，确定地权，安心生产；中农怕抽补，再斗争；地富则等待给一份。这是目前农村各阶层的情况。如果我们不确定地权，恢复与发展生产，端正政策，完成整党民主等，则生产障碍不能扫除。所以，我们必须解决以上问题，以便提高生产情绪，恢复与发展生产。

总之，农村封建剥削制度已根本消灭，土地已大体平分，农民迫切要求：一是整党民主，端正政策，划阶级，确定地权，不再斗争。二是恢复与发展生产，发家致富。

二、工作方针

（一）区党委关于过去工作方针的检讨

中央五二五指示第三项指示我们：“必须教育干部善于分析具体情况，从不同地区、不同历史条件的具体情况出发，决定当地当时的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根据这一点来检讨，我们接受中央局整党会议的决议结合本区具体情况是不够的。

我们曾过分强调了土改不彻底，而没有客观的、实事求是的了解本区封建制度已经根本消灭，土地已经大体平分，以及1947年5月会议后复查中所发展的严重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

另一方面，同样强调了党内组织不纯，把党内个别蜕化分子一般化，而没有重视农村的党是在彻底土地革命斗争中经过改造与锻

炼了的。由估计土改严重不彻底，便推断到党内严重不纯，夸大了地富支部，组织不纯的现象；由估计党内严重不纯，又推断到土改不会彻底，从此出发来决定工作方针和工作方法。如在洽陶会议后为彻底平分、整党民主，作法是组织贫农团，停止老组织活动。

接到中央关于老区半老区进行土地改革工作与整党工作指示，及中央局关于土地改革、整党与民主运动的指示后，在区党委第一期整党会议的最后政策报告，曾区别地区及情况，提出整党民主与抽补，但由于对第一个报告，对过去土改成绩估计过低的错误，以及对土改复查中“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批判与清算不够，因而“左”倾冒险主义的思想仍然存在，未能及时纠正具体政策上的“左”倾错误，使工作走了弯路。这主要是由于我们对本区土改情况缺乏调查研究具体分析，我们有严重的主观主义，从反右到具体政策反“左”的发展变化过程中，是前进，是提高，但我们领会与贯彻不够，我们思想是混乱的，领导上与干部思想上仍有“左”倾冒险主义的残余。

从中央局二月会议到四月会议，一再贯彻具体政策反“左”，但我们对本区的基本情况仍估计不足，重点区的方针是整党民主抽补，作法是，不相信老组织，单纯强调整党民主抽补，不结合具体情况；一般区则是恢复发展生产，提出季节生产，端正政策，扫除生产障碍，不敢提整党民主，不相信一般区能搞好整党民主，不相信老组织，而另外组织领导，未解决干部思想，仍混乱，农村无政府状态未彻底转变，政策贯彻不下去。一直到这次会议，才作了清算，问题才比较明确。

总之，中央的政策是正确的，我们在领会政策的精神与实质上，有片面性，特别不能掌握党的总路线总政策，因而在执行具体政策时，往往是片面的，变成不完全的、盲目的；在思想上我们仍有“左”倾冒险主义的残余，在决定工作方针上，不从实际情况出发，不恰合具体情况，故执行后走了弯路，工作受到损失。我们必须接受这一教训。

（二）会议中讨论工作方针的分歧意见

根据我区基本情况分析，检讨过去工作方针，如何贯彻执行中央五二五指示及中央局华北解放区的当前任务的社论，会议上有两个不同的意见与看法。

一个是：更多的估计到我区强迫命令，发动群众不充分，土改中遗留问题很多，土改中很多任务未能完成，仍应按中央五二五指示，由土改到生产全部过程去依次完成。其主要论点，认为尚不能认为封建制度已经消灭，不能认为土改问题已经解决，因而不能按五二五指示第四项确定方针，不能过分强调以生产为中心，应着重整党、民主、发动群众。

另一个是：更多看到我区封建制度已经消灭，土地已经平分，农民迫切要求生产，提出以恢复发展生产为主，结合整党民主，但对发动群众，整党民主，彻底解决土地遗留问题，以便由土改过渡到生产的必经过程认识不足。

这两个看法都有其片面性：

1、封建制度是否已经消灭：我们认为封建制度已经消灭。消灭的主要标准是，土地的封建占有剥削制度消灭了，这是决定的因素。不能以其他标准，如以封建思想的影响等来作为判断的依据，因为农民思想上封建残余的消灭，将是一个长期的改造过程。

2、农民土地问题是否解决了：我们认为已经解决了。解决的标准是，贫雇农已得到大体相当于平均数的土地。不能按绝对平均主义的想法作标准，不能按生产资本（分浮财）满足与否作标准（这只有在发展生产中方能彻底解决），不能按群众发动程度如何来作标准，主要应从土地分配上看，农民是否得到相当于平均数的土地。

从这两方面看，应认为封建制度已经消灭，土地问题已经解决，不应再提彻底平分土地。今后应是端正政策，积极恢复与发展生产，充分发动群众完成整党建政，如果过分强调提出土改不彻底，封建制度未消灭，则会发生“左”的错误，使社会秩序、生产情绪更加不稳。

3、但必须足够认识土改遗留问题很多，如少数贫农土地尚须调剂，阶级成份尚须确定，政策尚须端正，地权尚须确定，群众尚须加强思想发动，组织尚须整顿，这些问题不解决，即不能顺畅的走上发展生产的道路。

总之，应从我区具体情况出发，全面的考虑问题，不能片面，不能有阶段论。如强调整党民主，忽视端正政策，恢复与发展生产；或过分强调生产为主，而忽视整党民主；或先整党民主，后恢复与发展生产；或先恢复与发展生产，而后整党民主，都是不妥当的。我们必须把它看成是从土改到生产的全部过程，在恢复与发展生产的总目的下去完成整党民主，不能有片面性或分成阶段。

（三）今后方针

根据我区基本情况的分析，根据中央五二五指示及中央局华北解放区的当前任务社论，我区当前工作方针应是：

端正政策，恢复与发展生产，完成整党建政工作与支援前线工作。

按照各地具体情况与土改中遗留问题，目前我区由土改到生产的工作过程大体是：

- 1、调查研究，了解情况。
- 2、初步整党，首先必须团结党内积极分子及较好分子共同领导。
- 3、发动群众充实改造农会、贫农团，整编群众队伍。
- 4、划阶级订正成份，确定阶级。
- 5、端正政策，调剂土地。
- 6、建立三级人代会，选举三级政府委员会。
- 7、发土地证，确定地权。
- 8、调整改订农业税。
- 9、完成建党工作。
- 10、转向生产。

我们必须认识：以上工作过程及内容是在我区贯彻党的总路线

总政策，由土改到生产的全部工作过程。

在执行中，必须结合分析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反对片面性，机械搬运，阶段论。因此我们应明确：

1、单纯民主运动，夸大组织不纯、群众未发动，企图来个民主运动阶段，完成重新发动群众的任务，不是团结党内积极分子及较好分子共同领导群众，发扬民主，整编队伍，端正政策，发展生产，而是暗访贫雇，发动群众反党反村干，这往往容易为偏激分子所掌握，结果这个民主斗争是打倒过去，否定一切，往往造成群众内部的宗派斗争或宗派情绪，带着很大的破坏性，使秩序更加不稳，生产情绪更加动荡。这是片面的。

2、单纯的整党民主，为整党而整党，整编队伍离开了行动，不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这是不了解整编队伍即是为了行动，同时必须在群众的行动中，才能更好整编了队伍，把整党民主脱离实际行动的片面的分阶段的作法是不对的。

3、单纯的端正政策，发展生产，而不注意整顿党与群众队伍，使执行政策失去了依靠，这是光行动不组织的片面性。

4、调查研究的片面性，为调查而调查，不结合运动，在运动中步步的深入了解情况。

以上是过去我们工作团或多或少的走弯路的教训，其原因是由于我们没有掌握党的总路线总政策，没有认识到这是从我区具体情况出发，从土改到生产的整个工作过程，因而变成片面的盲目性的、分阶段的作法。

三、具体工作问题（工作经验总结）

甲、调查研究

调查研究，了解情况，是确定当时当地工作方针及步骤的基本问题。过去重点村走了弯路，首先由于我们调查研究不够，特别我们不会把调查材料加以分析，找出基本矛盾，因而有材料不会研究

分析，问题就看不出来，确定方针即不明确或错误，所以必须学会调查研究。

(一) 调查研究，必须有客观的科学的态度，要全面的历史的去了解与分析问题，不能主观成见，割断历史的片面的去观察问题。

如以反村干的圈子去调查，听到对村干不满的意见就高兴，反之即认为人家有问题；如我区要啥有啥，兴啥来啥，往往一个材料，得出两个相反的结论。如过去颜村铺是地富支部，今天事实证明不是，而是组织上纯洁，思想作风不纯的老支部。

片面的去调查，割断历史的去了解，如只访贫雇，不访中农，只访群众，不访村干部，只看眼前，不问历史等。

(二) 调查研究必须结合宣传与思想发动。讲阶级，讲政策，表明态度，解除顾虑，结合解决群众当前的迫切要求，步步深入的使群众敢接近我们，并向我们说实话，我们才能深入的了解一些真实的情况。

(三) 必须多方面全面的调查研究，访贫农也访中农，访被斗地主，访好党员坏党员，访各阶层的群众。方式上是个别访问，小型座谈等，多方面全面的去搜集材料，然后加以阶级的综合分析，不要只听从少数人的意见。

(四) 要学会阶级分析的方法，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反对有调查无研究，只罗列现象，堆积材料，看不出问题。要善于掌握材料，加以分析，找出矛盾，寻找解决矛盾的办法。

调查研究是工作入手的基本问题，中央五二五指示把了解情况放到全部工作过程的第一条，我们必须注意。调查研究是唯物主义者在工作中严肃的、实事求是、追求真理的起码条件。

乙、整编党的队伍与群众队伍

(一) 整党问题

1、我区党的情况

目前各地农村整党的最大问题是不从实际出发，而把区党委第一次整党大会的一套全部搬到农村，没有根据农村党的特点去进行工作。这里必须分析一下农村党的特点：

(1) 我们的支部是在农村——党员是农民，生活环境是分散的独立的小生产者。

(2) 支部的历史。在老区一般说是大党老党（如颜村铺），在半老区一般是小党新党（如冀王庄），但他们都经过民主民生和土地改革斗争。

(3) 老区党的支部经过了抗日战争、自卫战争和土地改革斗争，这是个很大的考验。

(4) 我们过去对支部领导很弱，教育很差，党员的觉悟不高。因为我们对农村支部的特点研究不够，所以这段农村整党发生一些偏向：主要是宣布停止党员活动，有一脚踢开的思想；另外在批判了整党中“左”的偏向以后，则又有右的萌芽，对少数不可救药的，没有原则的一味姑息，如阳谷对崔凤魁在冀王庄整党中开除后，区里又请回，群众不满、恐慌。我们应警惕，在纠正整党中“左”的偏向（如一脚踢开老组织，组织处分过多过重等），错了的要改正错误，但同时必须肯定整党基本是有成绩的。防止右倾情绪的生长。坚持治病救人，分别对待的方针，实事求是的，是非分明，宽严分明，责任分明，主要本教育改造的宽大方针，但对不可救药的一定要开除。所以今后整党要反对“左”，同时防止右。

2、整党的方针

整党的方针是，治病救人，教育改造，分别对待。

根据我区农村党的特点，思想打通，加强教育是主要的。(1) 整个的要加强阶级教育、政策教育、民主教育，提高觉悟；(2) 组织调整是部分的，如改选支委，划分小组，淘汰不够党员条件的；(3) 纪律制裁是个别的，对不可救药的分子要坚决清洗；(4) 制度规定是必要的，要严格党的纪律，严格组织生活，开展批评自我批评，党员不能分裂群众团结，参加宗派斗争。

对党员的错误必须分别对待，要区别为公为私，一贯与偶然，经过教育与没有经过教育，过去的功劳与过错，土改斗争中坚决与不坚决，承认错误与改正错误的程度。这些区别非常重要。

领导上要根据情况分担责任，凡因公而强迫命令的错误，错划阶级提高成份等领导须负责任者，则领导上分担；至于那些假公济私，贪污自肥，为非作歹的行为，主要由他自己负责（当然，领导上教育不够，也是有的）。这种实事求是的责任分明，既教育与改造了党员，又能以领导上的自我批评分担部分责任，减轻党员的负担，平息群众的愤怒，改善党和群众关系。

3、整党的群众路线

（1）入手时工作组应分头在支部中、群众中同时进行工作。两面教育两面启发，党内发现积极分子、较好分子；党外串联贫农，同时团结中农，酝酿成熟，进行初步整党。

（2）采取支部会与群众会相结合，党内思想斗争与群众诉苦相结合。分清是非，实现批评与自我批评，没有群众对我们的批评及压力不可，但没有党员的思想自觉及党内酝酿成熟也不成。在进行中应根据群众情绪的变化，大会与小会、个别交谈酝酿等方式相结合。

（3）对于民主问题。由于村干不民主，因而群众中有各种各样的不同民主要求。对于农民由于村干作风不好而引起的义愤，不能认为是报复而稍有歧视，应区别其代表少数人的要求或多数人的要求，区别其革命义愤与个别野心活动。在民主运动中，有少数抱有报复或偏激情绪的人，我们对他们要有正确的态度，遇到这类分子，我们最好不依靠他，而是直接发动群众。如果他已鼓动起群众的斗争，则领导上必须慎重：①保证领导权掌握在党和贫农团或新农会手里，不被他所操纵。②领导者头脑必须保持清醒，分别是非，采取争取教育方针，说服他使他有所转变。③启发群众觉悟，实行群众的民主监督。

应注意开始必须发扬民主，在群众民主发扬到一定程度时，就

是群众已经起来诉苦时，则必须注意政策教育，强调党对党员是治病救人方针，不但要检查党员的缺点与错误，而且要全面的评定其功过，使群众头脑逐渐清醒，不至于形成反党情绪。

总之，只要按照正确政策实行党的正确领导，整党民主就能走上健全发展的道路。

我们要反对尾巴主义。盲目的追随一部群众的盲目反党情绪，把党看成一团黑，不了解大部分党员是好的，坏的是少数，不能具体分别对待的“左”的偏向，是取消党的领导的。

也要反对右的，如采取压制群众民主的办法，在群众还不敢提意见的时候，就动员不许群众“糊”（土语是一锅糊的意思），在群众中动员不许夸大，不许反党，不许报复等，不是广泛发扬民主，进行思想斗争，而采取束手束脚压制民主的办法。如清丰前张家群众刚一发扬民主，提出意见，我们即沉不住气，向群众说，干部有错也有功，结果群众认为工作组有宗派，不替群众撑腰。而提意见最积极的“二和尚”（工作组认为是报复分子）连哼也不敢哼了。

在平丁庄两面提高两面□倒，群众参加了整党七八天，群众提的意见党员也不作解答，群众说：“光提了意见，也不当吃不当喝。”群众都不参加了。党员也觉着反省到什么时候是个头，每晚也就熬油，熬到时候回家。这种不敢发扬民主、不与群众要求相结合的作法是失败了。

4、整党建党

整党到建党是个过程。整党的目的是为了建党，不是盲目地发动群众把支部打垮，而是解决党群关系，使党员回到群众中去密切党与群众的联系。提高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不是把党看成一团黑，而是分清好坏，把党员中好的较好的团结起来，成为核心，对一般的进行思想斗争（批评与自我批评），改造教育，清洗不可救药的。

在老区应注意在运动中慎重吸收个别群众积极分子入党，增加

新的血液。在半老区，小党新党，更须在运动中注意慎重的吸收一批新积极分子入党，以达建党之目的。

（二）整编群众队伍

整编群众队伍，也是个工作过程，首先由充实或改组贫农团与农会，逐渐到建立三级人代会。在整编群众队伍中要注意：

1、与整编党的队伍同样，要反对一脚踢开老组织的思想，同时也反对一头躺在老村干怀里。正确的政策是：加强思想发动，是非分明，分别对待，在初步整党中，同时由支部中的积极分子、较好党员同时去团结贫雇，联合中农。

2、扎根要正。要去串通长年劳动，为人正派，大公无私，与地主无联系的，把根扎在他们身上。避免扎在流氓或有宗派报复情绪的或野心家的身上。不然，则会造成很多困难。但同时要反对关门主义；扎根要广，注意多点连串，避免宗派。一方串通贫雇农，同时注意联合中农，以便团结多数，孤立少数坏的，“左”的关门主义必须注意克服。

如六分区在平李胡同：共104户，限定贫农团的条件是：

- （1）党员未过关不能参加，共30人。
- （2）非党员干部也不能参加，共7人。
- （3）5个闾长有2户不许参加。
- （4）被斗户及献田户不准参加，共24户。
- （5）在野村干4户，不准参加。
- （6）中农24户，贫农团组织起来才能串通。

因而贫农团，在全村只有20个人，再不能发展，结果贫雇农孤立，中农不安，工作失败。

3、要在斗争中组织群众的队伍，提高教育群众。组织与行动要结合起来，反对阶段论。这次会上有两个偏向：（1）有行动，不注意组织队伍，如颜村铺。（2）有的单纯的组织队伍，待组织好后才行动，光组织不行动，把组织与行动分成阶段。这样群众感到只开会不办事，组织就不能在行动中坚强壮大。

4、组织不组织贫农团？

在老区一般的不成立贫农团。但由于过去思想发动不充分，阶级路线不明确，必须注意培养树立贫雇农及新中农的领导骨干以便巩固的团结全体中农。

在半老区尽管土改已完成，但贫雇农的领导骨干未树立，因此仍应组织贫农团，但必须注意同时串联中农，防止排斥中农。说明组织贫农团是为了更有力的联合中农。

老区看具体情况，如果还有一小部分贫雇因各方面原因而尚未翻身，可成立贫农组。

以前不分老区半老区一律成立贫农团，现在则又有主张一律不成立贫农团，这都是没有实事求是的从具体情况出发，是不恰当的。

5、思想发动问题

无论在整编党的队伍与群众队伍中，要特别注意加强思想发动，划清与地主的阶级界线，提高觉悟。因此要广泛深入的讲阶级讲政策，内容是阶级教育，政策教育，民主教育，生产教育。

思想发动必须具体结合各种群众行动去进行，如划阶级中整党民主中结合各阶级教育、政策教育等，而不是单纯讲教条。

丙、划阶级

（一）划阶级的目的，在于分清敌我。划阶级的过程是思想发动，组织起来，生产动员的过程，是安定人心，稳定社会秩序，确定各个人的社会地位、待遇和前途，把旧的封建社会翻过来，树立剥削可耻、劳动光荣的新民主主义的新思想。

（二）划阶级的准备

1、干部要充分学习文件，掌握其精神与实质，并试划阶级与学习文件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求得精通文件，掌握武器。必须掌握划阶级的基本标准，即占有生产手段与否？占有多少？如何使用？就是占有土地多少，剥削还是自己劳动。

2、在群众中要结合具体工作，做充分思想准备，同时用典型示范，用具体例子教育群众，酝酿成熟，并在群众中训练一批当地划阶级的积极分子，使他们掌握武器，广泛深入宣传试划。

（三）划阶级的群众路线

1、首先宣传划阶级，结合各种工作用各种方式进行。如：试划几户，具体的宣传，培养与组织划阶级的积极分子，召集群众大型小型的座谈会，个别交谈等进行酝酿，方法很多，主要是充分酝酿成熟，使文件精神为群众所掌握，叫群众掌握划阶级武器，分清敌我。这是走群众路线的第一步。

2、发动群众自报公议，三榜定案

划阶级的过程是群众组织起来的过程，是分清敌我、教育自己、依靠贫雇、联合中农的过程。

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一榜，是最有决定意义的。这是慎于始，安根安正。方法上必须是自报公议，公议就是斗争，挤封建，切忌领导上的包办代替。

划阶级是思想发动，组织起来，发展生产的过程。

（1）须在划阶级中使群众分清敌我，组织起来。

（2）划阶级是恢复生产，安定社会秩序，扫除生产障碍，启发群众生产热情，发展生产力的。这样教育了农民，使人人依靠生产吃饭，而不是靠斗争吃饭。因此颜村铺“填不满的十二大穷坑”，知道专门靠斗争吃饭是不行的，而马上转向劳动生产；使中农的生产情绪安定下来，小商贩商人都各安己业；使不劳动者在群众中受到压力，树立劳动光荣懒汉可耻的思想。

要训练一批划阶级的干部，如办训练班及在重点区带徒弟，培养划阶级的骨干等，把学文件与试划阶级相结合，取得武器，以便推广。

丁、端正政策

（一）过去我们在土改复查中犯了严重的“左”倾冒险主义错

误。主要是在复查期间，表现在对地富的扫地出门，错斗中农及工商业，杀人等，以致造成党和群众的严重损失。特别是在“左”倾思想下，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而仍认为土改不彻底，提出不合实际情况的方针。接到中央老区半老区指示后，虽方针变了变，但仍未彻底清算“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思想。一直到四月会议，才比较明确的认识到“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致使错误延长时间没得纠正。结果：使农村各个阶层均感不安，造成党与群众的隔阂，脱离了群众；加上停止复查后半年来，农村工作没有明确的方针，我们埋头整党，农村工作停止，而整党空气到达农村后，村干发生恐惧情绪，消极怠工，造成无政府状态，使地主、特务及野心家乘隙捣乱社会秩序，煽惑群众进行会门活动，对群众损失是很大的。

生产情绪不高，农民表示“过一天少三晌”，无心生产；认为“有东西就是祸”，造成生产量减低，这个损失是不可计算的。所以目前端正政策恢复生产是一个迫切的工作。

我们的目标是领导群众扫清生产障碍，恢复与发展生产。这是农民最基本的要求。

我们没有根据我区具体情况确定一个明确方针，而总是动摇着，工作是盲目的，单纯的，没掌握住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

（二）端正政策中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反“左”和防右。目前主要障碍是干部“左”倾冒险主义思想在抵抗，没有深入调查而空喊困难，假设情况，不作实际端正政策的工作。不认识端正政策对贫雇是有利的，而是片面贫雇观点，认为要端正政策就得损害贫农利益，要照顾贫雇利益则不能端正政策。他不了解也不想了解贫雇农不能团结中农，则要孤立，党也就在农村中脱离多数。这是很危险的。实际上，端正政策是群众的要求，当然群众中也有一部分人在抵抗（只要领导说服群众，是可以解决的），但这是少数的。我们干部的“左”倾思想和这种抵抗情绪结合起来，于是就片面的搜集抵抗的意见，向上级反映，抵抗具体政策反“左”的贯彻。

有的认为政策是要端正，但必须先发动群众然后再端正，把发动群众与端正政策分成阶段。如果领导上督促他端正时，那他就生硬的不发动群众去端正，而是命令群众退还东西，结果造成贫雇恐慌，打击了贫雇。这些问题要反复的向干部进行教育，使他们认识到端正政策团结多数的重要性。

由于以上思想的抵抗，成绩不大，端正政策尚停留在干部中，以致只宣传不作实际工作，使中农对我怀疑，贫农有的说气话，“要饭也得赔人家”，有的恐慌，怕倒地。我们对“左”倾冒险主义思想残余必须作严格的批判与清算，否则工作要受损失。

但是另一方面已个别的发生一种右的萌芽，如地主到贫农家认东西，中农有的也去认东西，贫雇农恐慌，我们干部不加制止。我们应该认清，地主与中农有区别，我们虽不能一般的认为这是地主反攻，但如这种萌芽的偏向发展下去，是会形成地主反攻的。要把这个问题认为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对地主阶级的一切违法活动要进行制止，对个别的破坏土改，进行非法活动的应送人民法庭，村不能随便处理。我们一方面纠正“左”，但要防止右。

（三）坚决贯彻端正政策

1、在全党进行端正政策的教育，说明端正政策的重要性。并反复的向干部讲明白，使之了解允许做什么，不允许做什么。毛主席指示我们：“许多同志往往记住了我党的具体的各别的工作路线和政策，忘记了我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而如果真正忘记了我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我们就将是一个盲目的不完全的不清醒的革命者，在我们执行具体工作路线和具体政策的时候，就会迷失方向，就会左右摇摆，就会贻误我们的工作。”我们必须了解，团结90%以上的人口，孤立敌人，壮大自己，其中决定的关键就是依靠贫雇巩固联合中农，失掉中农就会失败。我们对错斗中农必须补偿，但又必须满足贫雇农的要求，不能片面的强调满足贫雇，即侵犯中农，强调补偿中农，又打击贫雇。要把党的总路线总政策讲清楚，要用典型经验向干部进行政策教育，使干部清醒，掌握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今

天端正政策尚有“左”倾冒险主义的抵抗情绪。领导上的责任，主要是我们没有讲明白。

2、端正政策必须走群众路线，反对强迫命令，反对尾巴主义。如补偿中农问题，中农是一步一步的提出要求补偿，而贫农则不愿补偿，或不愿全部补偿。这时领导上必须坚持原则，说服贫农，不能动摇。要有坚强的领导，清醒的掌握党的总路线总方针，走群众路线，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去发动群众，向他们讲明政策及具体的利害关系，说服中农与贫农要互尊互让，补偿中农损失，不致打击贫雇。这样才能提高群众，达到团结的目的。

3、几个具体政策

(1) 补偿错斗中农损失，端正中农政策。首先必须调查研究，了解中农被斗损失的具体情况，然后有分别的有步骤的去做。如有的中农，仅在政治上打击了一下，则须向他承认错误，摘掉被斗户帽子；对错划成份的中农，则须改订其阶级，并向群众宣传他是自己人，摘掉被斗户的帽子，说服贫农进行坚决的补偿；有的中农动了浮财，土地尚不少于贫农，或相等，或少于贫农，也要根据具体情况适当的补偿；也有的中农自动少数土地和粮食农具，他们一般的土地、浮财都不低于贫雇，我们可根据具体情况，说服中农贫农互尊互让，分别适当处理，达到中贫农的团结。

其次，进一步去发动群众，进行阶级教育，讲明政策，领导上必须掌握群众的思想变化。贫农开始会有些埋怨情绪，如说：“斗也是你，赔也是你，拿着俺的果实你落人情”等。贫农怕中农伸手大。必须从贫雇农目前利益逐渐诱导到远大利益，说服贫农团结中农。至于中农的情绪，他们首先要求去掉被斗户帽子，参加农会，有民主自由，再要求划阶级补偿。他顾虑贫农“吐多大口”。因而必须进行中贫农的团结教育。在补偿时，要面对面，贫雇农应主动的串联中农，一块讨论，互相体谅，最后要互相让步，协商解决。补偿中农程度最好使中农稍高于贫农，这样就会使他觉着仍比贫农高，发展有前途。但亦必须照顾贫农的利益，因而我们不能提全

部原物退还，因为实际上是不可能办到的。

其三，总的方面强调依靠贫雇团结中农，说服贫雇补偿中农，基本上要叫中贫农双方协商，达到中贫农互相让步，互相团结。补偿的来源，如未分的果实，团体地，村干退出贪污多占的等来解决。必要时，除退出少数翻身过高的一部外，不要轻易的去抽已经分给贫雇农的东西。中农自动户其土地、浮财仍高于贫雇农，则一般不必强调经济补偿，而着重中贫农的团结教育，使中农向前看，努力生产，发家致富。

其四，进行补偿时，主要依靠本村自力更生，强调在本村解决，不能强调政府贷款或外村调剂，不能依靠外援。只有这样才能从生活上、感情上、政治上、经济上解决中贫农的关系，达到团结。如果眼睛向上，向外，则中贫农的关系解决不好。

其五，在整个过程中，必须强调生产发家致富，使中贫农结成生产大军，共同向前进，恢复与发展生产。

总之，补偿中农必须有强有力的领导，走群众路线，就能克服这一困难。

(2) 端正负担政策

我区村负担极不公平，不合理，受打击最重的是中农及老实贫雇，主要表现在村干不出差，被斗户，军、工、烈属不出差，把支差负担压在少数人的身上；公粮负担，由于土地产量没有评议，公粮负担不够公平合理，但问题尚不大，主要村摊派过重，有的超过了公粮负担数目。今后应严格规定，不准村干随意摊派及支差，除规定几个少数（两三个）干部因支持工作不出差外，其余无例外的一律出差。过去对有牲口的人随牲口出差，人不算差，这是极不合理的，必须纠正。另外除军、工、烈属无劳力者代耕外，其余村干、鳏寡孤独等都不代耕，以缩小代耕面，减轻负担。

总之，负担不公平合理，又过重，群众迫切要求解决。我们应领导群众与其他工作相结合，发扬民主，自报公议，达到公平合理的解决，以便组织一切力量进行恢复和发展生产。

(3) 安置地主。给地主富农与农民同样的一份，使之生产劳动，告诉他好好劳动，将来可以变成份，有前途，应安分守己，不准有违犯政府法令的活动。在这一问题上，要说服贫雇，说明安置地主是从农民利益出发，只有使地主参加劳动，才不致扰乱秩序，这才对农民有利；并说明过去斗地主是对的，要分清阶级界线，绝不是回到地主立场上去可怜地主。如有个别坏的进行破坏活动，我们必须与之斗争，不能动摇。

(4) 工商业问题。恢复与发展工商业很有成绩，今后仍应继续努力，坚决补偿错斗的工商业，以求迅速恢复与发展。

(5) 贫雇农如土地数量质量较□，则必须进行适当的调剂。如有个别不彻底的或漏网的地富，应以征收方式分配给贫雇，解决贫雇农的不足。

戊、恢复与发展生产

(一) 目前情况

由于我们政策错误及连续不断的斗争，以及战争影响等，影响各阶层生产情绪不高。农业收获量平均较战前约降低 $1/3$ ；畜力锐减（过去平均二三十亩有一畜力，现则五六十亩，多者七八十亩一个畜力）；耕作粗糙（过去锄三遍现只一两遍）；施肥少（过去每亩三车粪，现一两车粪）；甚至有的地三季未犁的。群众怕斗争，不敢生产致富。目前群众要求缓和农村的紧张空气，不再斗争，迫切要求安心生产。所以，只要我们能端正政策，扫除生产障碍，则恢复与发展生产是没有问题的。

(二) 端正政策，扫除生产障碍，恢复发展生产

1、进行宣传政策，要宣传我区土改业已完成，地权大体确定，不再进行抽补（只有极小范围的调剂问题），要划阶级，发土地证，确定地权，安定人心，转向生产。

2、注意季节生产，不误农时（农忙时不准开群众大会），战勤支差要求精密计算，不要浪费，后方机关严禁支差，以休养民力，

恢复生产。

取消强迫互助，在自由结合、等价交换的原则下组织互助组。生产与战勤相结合，保证生产，完成战勤。整理村支差、代耕、负担，求得公平合理。

3、提倡发家致富，给农民指出发展方向，允许新的租佃、雇佃、借贷关系；组织半劳力(妇女)参加生产；提倡节约生产，恢复与发展副业；奖励买牲口，提倡积肥，取消一切限制生产的障碍，以准备明年的大生产。

4、各级党委必须在一年内，以六个月的时间领导恢复与发展生产，充分研究重点村有关恢复与发展生产的具体问题，取得生产知识，学会领导生产。

总之，要善于在整个工作过程中完成整党建政工作，端正政策，扫除生产障碍，逐渐组织群众恢复与发展生产。必须使每一个同志了解中央1948年土改与整党指示的全部过程，避免片面性和阶段论的错误做法。

四、领导问题

(一) 区党委领导检查

1、从反右到具体政策反“左”的整个过程中，区党委在指导思想不明确，没有彻底清算“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思想。在四月会议上，对具体政策反“左”不坚决，形成初步端正，结果未能贯彻下去。不相信现有组织、现有村干能整党、民主。在一般区，只提出端正政策，恢复发展生产，没提整党民主(有重点的作迟点可以)，结果村组织村干部的问题未解决好，农村无政府状态未能彻底纠正，工作无力，被动。

重点区工作方针开始是整党、民主、抽补，后来又提出整党、民主结合端正政策、发展生产，但未讲明白，以致各工作团工作方针不明确，走了弯路(基本仍是“左”倾思想残余未肃清)。

2、四月会议有经验主义，老一套的开会，事先没有充分准备，

会后一级一级的传达。区党委没有召开县干会，反复的把政策讲明白，而只召开了地书联席会议，结果下达到村，有的一个月，有的一个半月。这时农村无政府状态没有克服，工作没有方向，而我们则一切停留在会议上，及传达到村，把基本精神变了质。如有的提出全部原物退还中农，有的只是提高干部情绪，没有具体政策反“左”的内容，要检查领导责任，则是区党委没有把一切问题讲清楚，正面提出问题，并具体布置，经验主义的领导使工作受了损失。

3、四月会议后，工作中的强迫命令打倒了，而新的走群众路线的经验又没有，这时必须用典型指导一般。但区党委工作团下去太晚，未起此作用。中央局工作团（开始走了点弯路），有冀王庄的经验，因各种原因未及时传播，关门口工作碰了壁，教训没很好总结，传播全区，结果地委工作团又重新走了弯路。

4、对工作团的领导（包括地委在内）

（1）开始过于铺张，重点过多，骨干不强，分散了力量。这主要是由于急性病，想在麦前搞开局面。

（2）党委领导同志没有亲自下手在一个村或两个村搞出经验指导其他，而是满天飞。下边不知怎样做，领导上也无办法，工作呈现苦闷的局面。

（3）工作团不善于总结与交流经验。两个月的重点村工作，没有很好总结，看不出问题，得不到提高。

（二）干部问题

目前有部分干部情绪不高，其原因很多，但主要的是：

1、在第一期整党中，对干部本身优点成绩肯定不够，使干部感觉全是毛病，没有发展方向。特别思想结论与组织处分不恰当，最后处理又拖到现在没有处理，因而很多同志背着包袱做工作。

2、工作处在从反右到具体政策反“左”的转变过程中，思想混乱，没有典型指导一般，觉得工作没有路，也是形成苦闷的原因。

3、工属不代耕，对农民出身的干部震动较大。特别是区及小区

干，家庭无劳动力，生活无法解决，影响情绪。区党委没有重视这一问题，对干部的困难体贴不够。我区小区以下干部多是农民出身，他们脱离生产，家庭确有困难，这一问题如不解决，不仅影响目前干部，而且也影响到将来提拔干部。

为解决这一问题，今后应：

(1) 区党委在四月会议上对第一期整党的检讨基本上是正确的，对第一期整党中的偏向区党委已经检查了，但必须肯定，第一期整党成绩是主要的；至于偏向，我们也必须纠正。所以决定在组织问题上作重新、最后的结论，但由于领导未抓紧，干部分散，至今未完全处理好。今后河北各地委，河南除三、五地委外，一律应于7月底，由各级党委组织部负责处理完毕。

(2) 工属代耕问题

应根据具体情况分别对待。工属没有劳动力，生活困难者，我们必须予以照顾。为解决这一问题，暂确定：

① 军、工、烈属没有劳动力者，一律代耕，但必须严格代耕条件，自报公议，正确处理之。

② 军、工、烈属只有一个劳动力者，不支长差。

(3) 干部使用问题。第一期整党受处分的干部，必须大胆使用，把整个干部调整配备一下，加强县区两级的领导。另外要大力培养干部，现在县区两级干部十分缺乏，如不注意，则工作脱节。为帮助区级农民出身的干部，每一区委可配备一个高小或中学生作为秘书。

(三) 领导与作风

1、这次方针，重点区和一般区是一致的。在一般县，每一个区搞一个重点村，县区主要负责干部亲自掌握，创造经验。从一个村取得经验后，再波浪式的推进。

紧缩重点区。重点区的干部紧缩到最多不超过100人；重点村五六个，不要多。地委同志必须亲自搞一个村，下定决心创造经验，要求不再走弯路。提高干部情绪，实行典型示范，要求大家在

党的总路线总政策之下，尽量发扬积极性与创造性。

2、要学会调查研究和总结工作。目前深深感到我们不会总结工作，不会调查研究，今后我们要很好学习。办法是，作一个村，就要把这个村的调查研究和经验教训写出来，这就要用思想，开动机器，学会科学的、阶级分析的方法。

3、在全党提倡学习，打破过去不学习的作风。各级党委宣传部要组织干部学习，造成学习空气（另有指示）。

4、严格事前请示事后报告制度，不准闹独立性，不允许以任何借口，不请示不报告。这一时期，各地委县委报告制度的建立，是有成绩的，今后要更加密切。各地委月终报告，必须于每月25日前送区党委，平常5天一次联系，把地委5天内发生的问题报告区党委。为了密切上下级联系，及时了解情况，地委可派巡视组及时收集与了解下层的实际工作情况。

5、严格纪律，反对无政府主义。在党内提倡原则性，全党同志要和一切无原则的不正确的思想作不调和的斗争，发扬批评和自我批评，加强纪律，在党中央领导下，团结起来，争取全国的胜利。

冀鲁豫区党委关于会门问题报告

(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七日)

中央局：

我区会门及群众烧香事件，各地曾续有起伏，谨将其分布区域及波及范围列图附上，借资窥见全貌；今将各地已得材料汇报如下，图（略）：

一、迷信活动之一般情况

会门及群众迷信活动，于4月初在尚和五区李家庄、皇姑冢，南乐五区吴村仓颉庙发现，截至6月下旬，一、二、四、六、八、九6个分区，长清、郛北、封邱、长垣、曲河、滑县，浚县、高陵、茌平、博平、齐禹、河西、筑先、聊阳、徐翼、尚和、昆吾、濮阳、清丰、南乐、内黄、卫河、濮县、阳谷、寿张、范县、南峰等27县，百余村庄（小村及波及村庄未计）均发现迷信事件，如“神水”、“神火”、“神土”、“古庙古冢”显灵等，群众求神治病者颇多，此起彼落。此等迷信传说多出现于六、九分区，其中除“神水”说系来自冀南武训、临清等地外，其他均发源于本地。自我加强一般区工作后，目前各地大体已趋于平息，惟尚有余波，尚和五区皇姑冢仍在烧香。会道门共约30种左右，自始迄今，除封邱之白孝衣会外，多系秘密性质。此等迷信组织多出现于四、八分区原有会门基础村庄，因系秘密活动，影响及波及范围较小（多者四五村，少者一二村），但其政治性较为明显。如内黄一区窦公集一贯道宣称：“共产党好拉滑子，杀人，国民党好抢老百姓的东西，两党都坐不了天下，待一贯道之兵发来，国共两党之兵不打自退。”南

乐大清集红会首领李振海（道号刘宗先）竟收买钢铁，准备武器，并秘密部署“二月二、三月二”或“早晚有一天”要起事。其他有的会门活动区域，曾谣传“毛泽东已死”，“刘伯承投降”，“原子弹厉害”，“第三次世界大战快要爆发”等无稽谰言。现此等会门仍多秘密活动，各地破案者尚少。

另，清丰、濮阳之天主教、耶稣教近曾利用我解放区“信教自由”大肆活动，该教均先后召开郟、鄆、濮、观、清、南、卫、内等地教首会议；清丰天主教曾于5月中旬聚徒300余实行“跪命”。

二、发生事件之基本原因

前已两次电告，主要由于过去政策错误没有端正，错斗中农、负担不合理等；土地法大纲颁发后，我区土改业已完成，但仍宣传平分；整党后一脚踢开老组织，村干疑惧，形成无政府状态，第一期整党后对干部组织处分过重，背着包袱做工作，情绪不高；从反右到反“左”的转变过程中领导思想不明确，提出端正政策发展生产后，遇到干部“左”倾抵抗，故一般端正政策仍未贯彻下去；加以入春以来疫病流行，工作长期停顿，工作无方向，群众迷失前途，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地主分子结合流氓分子，制造荒谬无稽谣言，积极活动，加上国民党分子的策动。四分区封邱已破案之白孝衣会（该会身著白衣，头戴白帽，手摇白幡，故名），则系公开国民党头子支持（据我俘获之国特分子王抚国及该会头子齐永增、袁国福等供称：该会系奉国民党第四绥靖区蒯、定、曹、考、东、长联庄会长杨普何之命组织的。王系国民党之编余军官，后改做此工作，齐、袁均系封邱多年会门头子），其他据侦察亦多有国民党分子之牵连。如八分区卫河四区高骆楼及清丰城区水坑中发现有潮口（又名洋冰），传为“神水”、“可治百病”，最先取水者为日伪翻译王尽善之妻。王现住清丰，过去曾开新生药铺。尚和五区李家庄、皇姑冢烧香事件，据侦知有濮阳一区陈庄后天道首领刘二重功背后掌握。刘系富农成份，华美中学学生，土改时被斗，后隐居

其舅家，专从事会门活动，旧历年关前后曾聚道徒300余准备暴动，因其同谋田同禄(雷庄人)被我捕获，阴谋未通[遂]；现有谓刘已逃跑者，有谓仍在其家地洞中隐蔽者，但无确证。4月1日皇姑冢曾聚众3000余，公开宣称：“杀人者偿命，欠债者还钱”，“往东观，血水滚滚流东海；往西观，杀死的人儿好可怜；往北观，黎民百姓受苦难；往南观，没有太平年”等口号。六分区聊阳坑水中据报亦有人下药，诱骗群众。

三、各地对这一问题的处理过程

1、开始的强迫命令。在会门及群众烧香事件发生伊始，除[个]别地区予以应有重视及时发现及时注意解决外，多数县区曾表现麻痹，认为老区半老区曾有我多年工作基础，并经过土改复查，群众有相当觉悟，而群众烧香事件又多系无组织性的活动，即有个别野心分子从中播弄是非，亦无足挂虑(如南乐五区干部最初曾至仓颉庙看热闹)；及烧香迷信活动愈演愈广，乃表现惊慌失措，手忙脚乱，不从政策上、工作上、作风上检讨根源，竟出之以简单地强制与镇压。如一分区长清柳行头流血事件；六分区齐禹赵堂闹“神水”，区村干部斥取水群众为“特务”，并着小学生在坑中拉屎；白庄闹“神土”(谣传一已死80余年之道门师傅贾立学显灵，群众纷纷取其坟土治病)，我工作员“撕毁神像，平除坟墓，没收香纸，向香炉中撒尿，并扣押群众百余人”；河西县盐古墩村干接区禁令后，见群众取水时，“向坑中抛粪，并打坏瓶子”等，致“激起群众对我不满，越强制谣言越多”。

2、区党委关于会门问题指示下达后，各地处理方针逐渐明确(端正政策，争取群众，揭破迷信，解决群众困难)，在消弭迷信活动上曾收到某些成效，兹介绍三类典型例如下：

(1)六分区茌平闹“神水”，谣传有神显灵，坑水能治病，群众纷纷到坑中取水。县委为解决这一问题，乃集中一批医[生]开会，主动带药给群众治病；一面并列举事实，宣传有“喝神水后

病重病死者”，而群众服神水后确有病重病死的（如九区高岭村吴丙祥之妻，用神水洗疮，愈洗愈重；王楼翟春生服神水治腹痛，愈服愈膨胀等），神水事件遂趋平息。

（2）在平四区丁莫庄丁李氏（其夫丁钦岱系国民党员，于民国35年逃亡济南未回）发火事件破案简情：该庄自古历三月一至十八日曾发火25起，被烧5户，只伊家即着火20余起。闹火期间丁李氏曾大事宣传说是“神火”，并请来一阴阳仙谣传“神火”，说是“因去年拆了镇武庙，神见了怪”，“庄前有一海眼通聊城古楼，现被平毁，风水堵死，庄上才破落”等。村民都信为“神火”，曾动员人工修庙，挖海眼（据称须挖72丈深），但被烧户丁钦朋、丁荣生等却不认为是“神火”；县公安局派员调查，暗着一干部藏至丁李氏家，于5月6日上午12时见其女玲官（14岁）持火柴将豆秸、高粱尖子燃烧，丁李氏即说神火又着了，于是乃将其母女逮捕。据供：所有火都是自己发的，发火动机一是与丁钦朋、丁荣生等三人有仇恨（前她被斗时，该等曾提过意见），一是群众要换她之房子，企图以神火来威吓群众，宁将房子烧掉，也不让群众住。根据以上情节，县局乃着丁李氏在三、四两区村干部大会上作自我揭发，并承认错误。自此事件破案后，该村未着过一次火，群众咸认为是地主搞鬼。从此，修庙、挖海眼、烧香等活动均告停止。

（3）筑先公安局破获城区王小辫“神水”事件简情：王小辫，城区荣崔街人，现年52岁，目盲，奉圣贤道30余年，地5亩，由乃兄租耕。王终年传道，依欺骗为食。邻村陈庄信奉该道者颇多。他传道只传女子不传男子，年青时曾奸淫过女道友，故本街无信之者。5月上旬彼曾造谣“城城北坝坑中有神水”，并谓“王母娘娘，吕祖纯阳，七星临凡，药系药王所下，来救活世人”，致聊城周围及博平、东阿群众纷纷来北坝取水；待北坝坑水取尽，彼又造谣“城内礼拜寺街药王庙坑中有神水”，致自5月16日至26日方圆50里（东阿、博平、堂邑等地）群众来取水者每日达500之众。经公安局派员了解后，确证其系故意迷惑人心，乃于5月26日上午将

其逮捕，押至县局。彼曾于当日下午下神5次，并唱出许多魔语。讯问中据彼自供：“我是装的，实际说一点神也没有，我完全是迷惑人，混点饭吃”，并谓“真神不能说来就来，说附体就附体”等。讯问后乃由其本人到集市上和坑边进行自我揭发，承认造谣惑众之错误，并着其当众求神附体，以事实证明其伪装。取水群众见王窘态毕露，咸称“再不上当了”。

(4)九分区南峰二区谢楼谢连科，借烧香看病骗诈民财(每日约达四五千元至七八千元之多)，经区两次制止无效，复经县晓以“看病须用药或打针，求神无用”，并晓以“生产重要”，彼乃由公开转入秘密。古〔历〕三月十九日，有申庄申平安者，请谢为其女儿治病，谢欺骗说：“这病须夜里上供，室内挂刀，摆三杯酒，老母若用酒，至内乱响，即给看病，否则即不给看”等。申一一照办，并等候通夜，室内毫无动静。谢复欺骗说：“老母不给你女儿看病”，并谓“廿六日即死”；既廿六日已过，病仍如前，申甚气愤，拟向政府控谢。另有两个妇女求谢为其拴孩子，祈祷多日无效，谢无以对，谓人家“命苦”，后经该村妇会主任当众揭发，烧香看病事件便告沉灭。

他如六分区河西县召开村干教员会议，布置宣传，由求神治病上当者在群众中揭发；组织人民医院免费看病。八分区昆吾根据不同烧香对象采取不同对策，如解决军属代耕、灾民救济，安置荣退军人；恢复被斗药铺，召开医生座谈会分工看病；对一般男女巫神、会门领袖实行规劝并指出其非法，让其从事生产；对某些野心分子与会门头子进行揭发与孤立，待孤立后，发动群众予以打击。这样均曾收到很好效果。

四、目前发展趋势

按全区形势来看，在区党委端正政策，发展生产，紧缩重点，加强一般工作，推动老组织老村干以生产为主，端正负担政策，解救强迫互助，端正工商业〔政策〕之后，召开村干会，村干的睡眠

状态转变，各阶层人心逐渐稳定，一般区群众烧香叩头事件稍减。如六分区之茌平、博平、聊阳，八分区之濮阳、清丰、昆吾、南乐、卫河，九分区之濮县、南峰等地，召开村干会议，群众情绪逐渐稳定，烧香叩头事件亦稍减。但个别地区如尚和五区李家庄、皇姑冢，南乐二区大清集，昆吾六区徐镇，阳谷四区八里营及寿张、范县等地，却仍在继续发展。其中以尚和李家庄活动为烈（麦收期间亦未停止）。烧香群众由附近村群众参加，以及于邻县群众（如濮、范、鄄等地）。

五、今后处理方针

基本上坚决端正政策，恢复发展生产和一般区工作的恢复，进行整党建政工作，宣传土改已完成不再抽补，稳定村干与群众情绪，安定人心，使迷信活动失去依据。具体工作：

1、开展宣传攻势，说明我之胜利形势，宣传政策，讲阶级，补偿中农，不再抽补，只在极小范围内进行调剂，宣传发家致富，使群众有发展方向。

2、以典型例子揭穿会门头子及地主分子反革命活动，使群众勿再上当，对少数会门头子及坏分子劝其改邪归正，予以宽大，否则，执迷不悟，送政府法办。

3、建立情报工作，进行内线工作。

冀鲁豫区党委关于建立 青年团工作的指示

(一九四八年十月十五日)

中央指示要我们建立新的青年积极分子的核心组织——毛泽东青年团。根据我区情况，提出几点意见，希研究执行。

一、我区青年在八年抗战、两年解放战争以及各种群众运动中，在协助党与政府工作中，在消灭地主阶级的农村大革命过程中，曾有很大贡献。过去的青救会、青抗先、儿童团，都起了它一定的作用，并涌现了一部分青年积极分子。不过由于当时阶级路线、阶级观点不明确，强调了青年组织的统战性、独立性，以致未能得到很好发展，使青年工作趋于消沉。

二、为了以毛泽东思想团结、教育、提高广大青年，成为反美、反蒋、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一个新生力量，培养党的后备军，要求我们建立青年的核心组织——毛泽东青年团。这是各种劳动青年组织的核心，也是个青年的政治组织，培养与建立青年的新人物、新气象、新作风。它的总纲领为尊奉毛泽东思想，为实现新民主主义，消灭封建，打倒美国走狗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并在各种事业中、运动中，不管是动员性或改革性及建设工作中，发挥青年的积极作用及英勇果敢的突击精神（团章另发）。根据中央指示，青年任务有三：

第一，在党与政府所号召的各种运动中（土改、生产、参战、参军等）、各种事业中，组织和发动广大青年参加，并发挥青年的积极作用。估计到今天的战争情况，军事的工作应当是主要项目之一。

第二，为广大青年的特殊福利和切身需要服务。

第三，除实际斗争和事业的锻炼、学习外，进行经常的政治思想教育教育工作。

三、执行中央关于1948年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指示中结合建团工作。

1、目前是处在建设华北、支援前线、争取全国胜利的斗争中。毛主席的号召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这是党的战略口号。我们1948年的任务是结束土改，恢复发展生产，完成整党、建政、支援前线。在完成这个任务中，不能忽视青年的积极作用。因为青年接受新事物较快，有很大的创造力与突击精神，在生产战线上与支援战争中是个极端重要的力量，特别在民主建设中，培养新人物、新作风、新气象，贯彻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坚持真理，反对封建，反对官僚主义，发扬民主，开展文化、生产运动中，青年工作更有其重要意义。因此，青年工作必须在执行1948年指示中建立起来，发动青年参加，以加强中心工作。

2、在结合中心工作中，如何具体进行青年工作，我们认为应从以下这几方面去发动青年群众：

①发动青年参加生产运动，努力节约，积极生产，使青年在生产中活跃起来，贯彻毛主席“组织起来”的教育。

②整党建政工作中，进行民主教育，发动组织青年，因为青年有民主要求，在反对自私自利、贪污腐化，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上，号召青年主持正义。

③加强青年的文化教育，从提高青年文化教育中发动青年。特别在今年冬学运动中，应很好的进行这一工作。

④进行革命战争的教育，反美、反蒋，支援前线，争取全国胜利。发动青年在支援前线中起模范作用，保证完成任务。

在上述工作中，发动组织广大青年积极参加，起带头模范作用，而将其中的积极分子吸收入团。

3、为建立青年工作，必须首先建立各级青委组织，地委、县

委、区委的青委书记及必须配备的干部，应迅速配备建立起来，人员必须固定，以便建立系统的领导。青年干部必须是工作积极、作风正派、有发展前途的，以便给广大青年树立典范。

4、目前对青年工作的要求是，先有重点的进行，取得经验，再行普及。各地委青委要掌握一个重点村。各县、区青委也应如此，并与原重点村相结合。青委同志除参加中心工作、重点工作外，应及时检查总结青年工作，将工作进行情况报告上级青委。这是各青委的业务。

5、在建团工作上应注意事项

①要在运动中建立毛泽东青年团，开始时以支部中比较正派的青年党员为骨干，逐渐发展团的组织，但党员一定过党的组织生活。

②在青年工作上要群众化、青年化，一定明确阶级性，首先吸收运动中的贫雇青年入团，并团结、吸收中农青年中的积极分子入团（不能犯关门主义）。在领导成份上，要保持贫雇青年的优势，但必须吸收中农青年参加领导。

③发展团员一定是纯洁的，大公无私的，作风正派的，在工作中积极的。吸收入团时，应个别吸收，不要集体吸收。

④毛泽东青年团建立后，根据青年的需要，建立批评与自我批评制度。

以上意见，希接到后，立即讨论执行，并将执行情况按时报告。

冀鲁豫区党委关于 整党与结束土改工作的综合报告

(一九四九年一月)

一、一般概况

9、10月份工作重点动生产之手，所有重点村结合进行了结束土改与整党政策的宣传教育及调查研究工作。

秋征结束后，老区半老区即全部转入整党、结束土改，结合秋耕与冬季生产。经两月工作，目前情况如下表（略）。

从这段工作中看，结束土改工作在方针上政策上已趋明确，一般不会再有大的偏向，主要是组织力量坚持执行问题。老区完成结束土改问题不大，半老区基础不好，则需组织大力量进行，才能争取于春耕前结束。但运米、归队、支前等工作，使干部力量分散，增加了完成的困难。整党工作，干部已取得一些经验，但仍很不够。目前在整党的思想指导上，主要毛病是：自整党纠偏以来，肯定成绩不够，干部思想上未分清是非界线，对整党发生右的情绪，工作中束手束脚，顾虑很大，整党怕党员躺倒，发动群众怕群众偏激，这是整党进度的主要障碍。经过反复的说服教育纠正及实践，现已逐渐明确了道路。

在组织领导上，去年春采取工作团的方式，后来发生主要偏向是死守重点村，不带领一般村，后来纠正，坚持重点突破波浪式推进的方法，各级领导深入农村，亲自动手，突破重点取得经验是好的，但取得经验仍是不够的。目前个别地区已发生急性病，认为时间短，任务重，想用普训村干、支委、积极分子，取消重点，各村

一齐起的方法。我们即及时提出反对死守重点不带领一般村，防止一齐起取消重点。正确的方法是，坚持重点突破，波浪式推进。

二、整党、结束土改的过程与经验

批判六月会议前整党中一脚踢开老组织的“左”的偏向后，又批判了整党中怕支部躺倒而无原则迁就的右的观点。目前全区整党主要仍是右的偏向，但已经不是取消整党或不敢提整党，而主要是在整党时对党员的困难过分体贴迁就，发动群众不够，群众提意见不够充分。批判了孤立整党，又批判了只搞土改不结合整党，逐渐找到整党与结束土改相结合的较正确的道路。根据工作较好村庄的经验，认识到中央1948年指示的10项程序，是整党与结束土改的基本过程，而又必须密切结合的发展过程，不能机械划分阶段。

其次，在秋季下乡前，由于去春以来整党空气，工作团整党，农村党员虽有顾虑与误解，但经过纠偏时退出多占，各县训练班，村干会讲解政策，党员初步反省等工作后，顾虑已经减少，且在党员思想上都有些酝酿和准备。工作组进村后，党员表功，但也说自己一些错误，这是一个极重要的情况。

根据这段工作，各地报告及检查，以范县、濮县、清丰、南乐较好。在这些县的整党中，我们有以下体验：

(一) 初步整党的中心问题是经过党内初步整顿，发现党内积极分子与较好分子，共同领导。成绩必须肯定，但坏作风必须批判与克服，但不是单纯算老帐。一般经验：

1、了解情况，讲明政策，端正党员对整党的态度

了解过去土改及其他较大斗争中党员、支部的作用、表现、民主作风、分果实情况。在党内外充分宣传整党与结束土改全部过程和政策，目前形势，今后工作和前途，结合不拘形式的个别交谈，以求得领导上全面的了解党员情况，党员能了解政策，解除顾虑，澄清思想，初步端正对整党的态度，思想上的酝酿成熟，使整党与结束土改政策为大多数党员所了解，是把整党形成群众性运动的先决条

件。有些区村，不敢把党的全部主张政策告诉党员，怕影响党员情绪，怕群众偏激，哄着走，做一点说一点，是错误的。

2、总结检查土改，检查支部领导，逐步开展批评

召开党员会、支委会、组长以上党员会，检查总结过去土改，检查支部领导，谈成绩也谈错误，谈优点也谈缺点，实际上也是摆材料，一面是继续了解情况，一面求得从暴露中初步开展批评。这些成绩与错误，不能分开，而是从总结工作中加以分析，从分析具体事情而后联系到每个党员。有些区村，只孤零零的互相提出几条错误，就很难全面认识一个党员。

3、进一步的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经过以上工作，党员一般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过去工作积极、正派、错误较少，反省会也较坦白，敢于提意见。二是过去工作积极，错误较大，对整党消极抵抗，仍有顾虑。三是觉悟低，毛病不大，工作亦不积极。四是有报复偏激情绪的党员，对错误大的党员提过苛的批评与要求。五是个别不可救药的党员，但占少数。中心问题是团结第一种党员带头反省与展开批评，争取全党大多数党员展开批评与反省，造成全党坦白、反省、互相批评的空气中的情况下，才能扭转一些错误较大的党员的消极抵抗态度。这里一般必须解决：

一是领导上的正确态度。领导上有错误必须虚心共同检讨，但党员的错误亦必须坚持原则，不能迁就，功劳需要肯定，错误必须承认与改正，及时表扬好的，批评坏的，树立正气，逐步严肃的开展批评。

二是必须分析与提高。如有些党员，虽反省多占不对，但思想上仍认为积极应该多分，因此须从分析具体问题中，贯穿共产党员所应具备的基本观点，进行教育，党员才较虚心检讨与衡量自己。

三是分别党员错误大小。支委与一般党员有重点的开展批评，支委、村干应比较严格，一般党员不必一个个过关。有些村形式主义，个个过关，反使党员感到厌倦。濮县、南乐、清丰，是支委、

组长以上党员和村干党员首先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整顿,经过分析,初步把自己反省的材料加以系统,或者把几个重要错误弄清加以系统,开党员大会作反省。坦白反省的党员,反省后(对不坦白者是一个对照与压力,对一般党员以启发,而且自己反省坦白,别人才更敢于提出批评)结合个别交谈。展开批评,经过党员在检查支部领导,对支干提出批评,并反省自己之后,党内批评即近结束。

4、总结党内检查

领导上适当的承认自己的缺点,对每个党员具体的肯定成绩与批评错误,号召大家为群众服务。党员表示自己态度,一般的是表示自己积极工作,向群众坦白反省,听取群众意见,以巩固党内初步检查的成果。

5、初步整顿党的组织及初步酝酿对犯错误党员处理的意见,准备公开党

党内初步酝酿出对贪污、多占党员的处理意见,并在组织上加以初步整顿。去年集体大参党中觉悟很低教育无效的党员,应劝其出党;躲风避雨而入党,或组织上不纯分子,党内应暂停止其党籍;对坚持错误或不可救药或错误较大的党员干部作初步的改选,吸收积极、较好分子参加领导。至于一些不影响结束土改工作,纯属内部问题一时又难解决的悬案和历史问题,则可留待以后解决。准备公开党。

有些地方不敢做初步处理而原封不动,是不妥当的。

(二)公开党,结束土改,贯彻整党

公开党后,一方面贯彻整党,一方面领导结束土改。

1、公开整党

党内批评,但是初步,不可能彻底,因此必须充分发扬民主,群众提意见帮助整党,继续扩大整党成果。其次反省并不等于纠正,在真正退出多占贪污果实,尚须经过思想斗争,工作中贯彻才能巩固。

(1) 与党内检查同时，必须在群众中进行酝酿准备

因长期缺乏正常民主生活，所以群众在问题没解决之前，背后反映意见扩大，但真正参加整党，当面提意见，顾虑又很多。因此，一面要区别积极分子与偏激报复的群众，区别这些意见的真实程度，提倡群众全面的检查党员工作，初步端正群众态度。南峰有些村不加区别，形成整党时群众追问党员为什么报告他“防空洞”，说党员“动员参军是坏良心”等，是极端错误的。但主要一面是解除群众顾虑，启发鼓励群众提出意见，保证党员不报复。党员经过党内批评，勇敢反省自己一切不可见人的错误，固然可以减少群众顾虑，但工作组必须在群众中进行工作。有些区村不敢在群众中启发、酝酿，怕群众报复、偏激，党员躺倒，是错误的，结果党公开后群众提意见很少。

(2) 及时公开党，沟通党群关系，群众选代表参加整党

经过党内检查后，群众酝酿成熟，即应公开党，以沟通党群关系。有些地方过分迁就一部分怕公开的党员，党内检查后即认为初步整党完成，是不对的。但有些地方在党内外均无准备的情况下即行公开，也易造成党内外思想混乱。

群众代表，一面教育群众选正派积极的人，一面必须反对某些村庄采取“党员保证”指定谁当代表的不民主现象。群众代表的数目，濮县提出一般不能少于党员 $\frac{1}{2}$ 与 $\frac{3}{5}$ ，是很对的。因为过去长期缺乏正常民主生活，群众顾虑很多，如群众代表人数过少，势必影响其发言，增加其顾虑。内黄四区有党员七八十的村庄，仅选六七个群众代表参加，是不妥当的。

(3) 召开有群众代表参加的支部大会，开展批评。这里必须解决：

第一，教育党员充分听取群众意见，不要怕群众意见有些刺激、过分和误解。

第二，贯彻提高党员群众的觉悟，有些党员虽多占贪污，亦认为群众落后，自己积极，应该多分。而有些群众也往往只注意贪污，

不民主，搞女人，而不注意阶级立场、投敌叛变等原则问题，往往以群众自己的水平去衡量党员。因此必须从分析这些具体问题时贯彻共产党员应具备五大革命观点的教育，提高党员与群众觉悟。以此标准，党员才能虚心检查自己，群众也开始批评并分清八面光、落好人的党员，立场不稳、投敌叛变党员并不是好的党员，而不去过分追究通奸、搞女人等小事。有些地方不去提高党员群众觉悟，反而做了党员与群众落后思想的尾巴，是错误的。

(4) 党内进一步根据群众意见展开批评，分清是非，向群众代表反省与检讨自己，错误的承认，误会的解释，党员成绩加以肯定，根据党内酝酿的初步处理意见和群众意见，做出关于贪污多占问题的处理的结论。而这些党员除个别错误严重须马上处理以息众愤外，一般不应过早做结论，一面给党员以考验转变，改正错误的机会，一面群众还有些意见不是一下可以提出，常是群众在党员反省下，鼓舞群众会更多提出意见。因此，今后工作中必须贯彻发扬民主。有些党员，认为整党已经结束，群众再提即不满意，是不对的。

2、建立临时人代会，领导结束土改

(1) 党群关系主要是土改中的问题，因此应尽量从结束土改着手，在整党中即应了解情况，酝酿结束土改的方案。

(2) 初步整顿群众队伍，成立临时人代会。在整党中结合提高群众觉悟后，应在划阶级〔中〕求得继续提高，反对划阶级的单纯技术观点，批判群众中一些逃避战勤、变天思想，进行组织整顿。这包括：吸收经过审查的错斗中农参加农会，清洗极个别的一贯地主走狗，改选一些不称职的组长委员，选举临时人代会。在选举中，群众提出对候选人优点和缺点的意见非常重要，是提高群众觉悟，代表为群众所监督的重要步骤。

(3) 调剂土地、房屋、宅场果实尾巴。应注意：一是慎重制定方案，一次处理，互相调剂搭配，以求得照顾各方面；二是注意克服有些村犁耙、大车、磨等农具都要一个人分一份的绝对平均主义思想。

(4) 党员已反省贪污多占的处理，必须在结束土改中贯彻并继续发扬民主。

(5) 丈量土地要从群众要求出发，自报、抽丈，调解与丈量相结合，填发土地证，确定地权房权。

(6) 检查总结土改，正式改选支部领导。

3、按自然条件、群众习惯，建立以200—500户的行政村组织。健全村级领导，建立民主生活与制度。

4、评产量准备在县区临时人代会成立后，统一领导进行，以避免各村土地产量标准不统一。

以上是整党与结束土改的大体过程与经验。

三、工作中的偏向

目前主要偏向，仍是右倾偏向，但主要已经不是不敢提整党（个别亦有），而是在整党工作的右倾，主要表现在：

（一）有些地区，如八地委一些县过分强调相信党员村干，因之过分相信党员自觉，以为支部自己不用领导即可进行整党，忽视了整党必须有强有力的领导。

（二）有些地区，在把以区为单位集训党员叫初步整党，有些在党员反省中关〔联〕系党与群众关系的问题很少，有些地区把肯定成绩当成一条主要经验。

（三）对个别的错误极端严重的党员不敢处理，对大参党中集体入党不觉悟者经教育无效或不纯分子，不加清洗；初步整党后，支部领导不加初步改组；贪污多占反省后不加处理。

（四）过晚公开党，即使公开，群众代表数量过少，且在群众中酝酿少，群众提意见不多。

（五）在工作中未贯彻整党。

但“左”的偏向在个别地区仍存在，如在党内外无准备情况下公开整党，整党中作群众尾巴等现象。

四、组织领导

目前主要仍是死守重点的偏向，但个别地区已发生急性病，一齐起，以集训村干代替初步整党，过分强调党员自觉，认为没有工作组领导，支部也可以把整党做的很好。根据一些工作较好区、县的经验，一般的是：

（一）首先在配备干部上，一些重点区、小组和重点村配备较强干部，一般村、区也进行工作，即是以重点村为主的创造经验，一般村也进行酝酿准备。

这时小组召开所属各村的村干、支委、积极党员会议，但这些会议只能做到解除顾虑，讲明政策，做整党思想准备，造成进行整党的顺利条件。这时党内批评尚未展开，是非尚未分清，积极较好分子尚未被全体党员所审查与公认，主要是依靠工作组领导初步整党。有些地区提出，相信支部党员可以自动整党，而且整的很好，是不对的。

但工作组的干部，首先又依靠重点村突破，经过领导上亲自动手，取得经验。这时各村在初步开展党内批评问题上，大体也得到一些和重点村类似的经验，但不明确、零碎，领导上又需加以系统、明确、肯定与批判。

所以在工作开始，领导上亲自动手非常重要，主要是创造具体经验，给大家找出具体工作道路，同时又需要帮助干部系统的总结自己的经验。

（二）在重点村取得初步经验之后，领导上要强调两个方面：一是强调及时汇报情况，工作计划经区或组批准，工作步骤经区或组讨论；二是强调检查，这时一面要坚持重点工作的继续发展，一面要强调检查，不怕一天跑几个村或组，满天飞一下再回来。领导干部一定要亲自到各村看看，这样才能使区和工作组的领导，重点村和一般村的经验交流，更加密切，以便更稳当的掌握运动的发展。有些县区，工作已开始了以后，不检查不汇报不总结，结果一

个村搞一个样，好的不能提高，坏的已经发展下去，使运动自流，是错误的。

（三）逐步发现与培养积极分子。党经过初步整顿之后，就逐步更多的依靠这些积极的村干党员、支委来研究与讨论工作。小组召开的积极分子村干、党员会，就不仅是解除顾虑，而是逐渐依靠他们推动工作。经过一段工作之后，成立行政村的临时组织，工作组也逐渐抽调一批干部到外区，这样波浪式的推进。

（四）但是许多县区经验，重点带领一般村，只能是情况大体相同的村庄，而情况差别很大的村庄，必须有自己的经验。

附表说明：

河北4个地委，应结束土改与整党的9168村，结束土改已完成或将完成的1815村，正在进行或剩下问题不多的，有3413村，其余3940村尚待进行。这些村已完成初步整党建党或即将完成的有1588村，正在进行的1951村。

表（略）

冀鲁豫区第一届青代大会

关于目前青年运动任务的决议*

(一九四九年四月十日)

大会完全同意冀鲁豫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筹备委员会关于目前我区青年运动底方针与任务的提议，并号召各地青年组织团结全区120万青年，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

(一)目前我国人民的解放斗争，已获得空前伟大的胜利，全国解放的时日即将到来。我区人民在配合解放大军，最后地驱逐了蒋军武装之后，正以无比的热忱，继续组织后备，支援前线；正以兴奋的心情，迎接生产、土改与新的建设工作；正以清醒的头脑，做着一切准备，和全国人民一起，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新国家。大会认为：团结教育广大青年，使其脱离封建的与资本主义的思想影响，成为具有新的作风和掌握现时代科学知识的崭新的一代，在争取全国解放与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建设工作中，发挥更大的积极与创造作用，是一件具有时代意义的与极其重要的工作之一。

(二)大会认为：能够胜任愉快地担当新民主主义国家建设任务的青年，必须是新型的青年。这样的青年，应该用先进的思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他清醒地知道社会的发展规律与我们国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这样的青年，应该具备高尚的革命品质与革命道德。他们忠诚于劳动人民，愿为劳动人民最好的儿子。他们认为劳动光荣，剥削可耻。他们鄙视一切自私自利的

*本文发表于《冀鲁豫日报》第1611期(1949年4月10日)第2版。

恶劣思想，他们能够为着劳动人民的利益，牺牲个人利益，不去计较个人的得失。

这样的青年，应该有求实精神与革命热情相结合的工作作风。他们敢于坚持真理，也敢于服从真理，他们在发现了自己错误之后，敢于作自我批评。他们有克服困难、见义勇为的英雄气质，在黑暗面前不怯懦，不屈服。

大会认为：我区在八年抗日战争、二年解放战争与历次的民主、民生、土改、整党、生产、文化运动中，曾出现了不少的这样的青年积极分子，他们被人们誉为青年的战斗英雄，青年的工作模范，青年的人民教师，青年的群众领袖！他们在青年中，有着很好的影响与较高的威信，他们有较强的政治要求与组织要求，在工作中，起着先锋与带头作用。大会号召全区青年向他们看齐，号召各地青年团体、青年的组织者与领导者，为树立这个新的方向，培养新的青年一代，在青年中努力工作，创立青年运动的新的局面。

（三）大会认为：为了团结教育青年一代，必须将先进的青年积极分子组织起来，作为骨干。因此，大会完全拥护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决议与该项决议中所提出的一切建团的方针、路线和政策。事实上这个决议在我区公布之后，已经受到广大先进青年积极分子的热烈欢迎与广大青年的拥护。

大会认为：在我区有了这样的团，正是我区青年运动的伟大胜利，是更好的团结、教育全区青年，为战争、生产、文化、土改运动各项新民主主义建设服务的有效方法。因此，建团工作是今后我区青年运动的中心环节。我们希望全体革命同志重视这一工作，予以有力的协助。各地青年组织，必须领导青年努力提高觉悟，推荐先进青年积极分子入团。

（四）大会认为：青年的基本任务在学习。我们必须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文化、科学、生产与军事知识，学习业务与技能，而所有这些学习，应在实践中、在实际参加各种革命运动

中进行。目前我区各种青年组织任务与全区任务一样，这就是：
（甲）贯彻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教育，积极支援前线，作好归队参军工作与烈、军、工属的优待工作；（乙）开展大生产运动，将工农业生产提高一寸；（丙）开展文化教育工作，提高群众的文化与科学水平，建立农村文化生活；（丁）没有结束土改的地方，应该围绕生产贯彻土改、整党。在为实现以上任务中，必须加强青年的活动。我们的青年团体，在支援前线工作中应起积极模范作用，在所有青年组织中要深入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教育，结合检查支援前线的思想与工作，切实有效地进行优军工作。在生产运动中，应该加强青年发展生产的各种政策教育，宣传与提倡发家致富，扫除生产顾虑，应当教育青年树立劳动光荣的观念，积极生产。应当发动青年首先接受新的生产知识，打破迷信靠天和一切保守的经验主义，研究选种积肥，深耕细作和掌握一切新的生产技术。应当在青年中进行组织起来的教育，使他们认清前途，按照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道路前进，发动他们在自愿与两利的原则下参加互助组，参加合作社，帮助他们制定生产计划，开展生产竞赛，为完成与超过政府的生产计划而斗争。

伴随生产运动，必须开展文化教育运动。青年要成为学习文化科学知识、消灭文盲中的积极分子，青年积极分子应该投入这一运动，为工农服务。

未结束土改地区的青年组织，除了参加恢复与发展生产运动外，必须积极参加土改与整党工作。在土改中，应该发动青年积极学习与宣传土改政策，积极参加反封建斗争。应该在整党运动中，成为反官僚主义的积极分子。

一切新区的青年组织，应该积极发动青年，配合人民政府肃清一切敌伪残余力量，安定社会秩序，应该不断地提高自己和人民的觉悟，逐步地进行社会改革工作。

一切公营工厂中的青年组织，必须发动青年工人努力学习政治，掌握科学与技术，树立新的劳动观念，巩固劳动纪律，为支援

前线、供给人民生活的需要而积极生产。

一切私营工厂中的青年组织，必须在青年工人中进行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教育，积极发展生产；同时注意工人的各种福利，解除厂方无理加诸工人的思想上、人格上、经济上、劳役上各方面的压迫与束缚。

一切学校中的青年组织，必须团结师生努力提高文化、政治水平，加强与工农相结合、为工农服务的教育，克服强调社会服务活动，忽视文化学习和强调文化学习而造成关门读死书的偏向。

一切青年的机关工作者，必须以高度的革命热情，积极提高工作效率，完成任务，提高政治与业务水平，培养自己成为一个有能力的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

一切青年的文化工作者，必须提高政治与艺术的水平，树立坚强的为政治服务、为工农服务的观念，面向现实，面向群众，加强农村剧运，为推动群众文化思想上的翻身而努力工作。

所有青年组织，在人民各种运动中，在国家的各种建设事业中，必须根据需要与可能的条件，随时注意青年的学习、健康、文娱、婚姻等基本的与特殊的福利。大会号召，所有青年组织应和人民一起，为着世界持久和平和人类的彻底解放，为着我国人民解放战争的最后的胜利，为着我们国家建设工作的胜利开展，为着团结教育青年一代，为着培养成百、成千、成万无数个优秀的年青战斗英雄，年青的劳动英雄，年青的工作模范，年青的熟练工人，年青的人民教师，年青的文化工作者，年青有为的国家职员，为着培养新的工作作风、新的思想和现代科学知识的有教养、有朝气的崭新青年一代而努力工作。

忆冀鲁豫中心区的抗战活动

安法乾

1937年我在河北省立保定师范读书，因日军在卢沟桥搞军事演习，平、津、保比较紧张，学校提前在6月就放假了。那一年雨水很大，从大名到濮阳平地行船。我回到家里以后，消息很闭塞，对外边的情况很少知道。大概是旧历八月底九月初，马村的冯叶莘找我，他说平杰三在清丰简师召集开会，要我去参加（那时冯在大名师范上学，我们都是比较进步的青年学生）。到了清丰城里就在简师图书馆开会。参加会的有谷平方（系图书馆负责人）、冯叶莘、一高教师任长太，还有几个人，名字记不清了。平杰三讲了抗战形势，然后说我们要建立抗日救国十人团，团结青年抗日救国。任长太发言说：我们经过交换意见，大家都很赞成。这说明他们事前已经酝酿过了。接着讨论谁当十人团的负责人。任长太提议叫平杰三当团长，平说他不是本地人，不如推选一个有威望的本地人为好。于是又提出让金力更担任，大家都同意。因为金力更是清丰一高校长，有点名气。我任副团长兼巡视员，平杰三担任秘书长。实际上具体工作由秘书长主持。从此我就各处奔跑发展抗日救国十人团。

关于抗日救国十人团这个组织的来历，当时我也不清楚，事后才知道是国民党河北民军司令张荫梧为了笼络知识青年，扩大他的力量，成立了十人团。我们利用了它的名称。为此，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认为我们的抗日救国十人团是个反动组织，其实不是。1981年政协开会时，由河南、河北两省党史资料办公室负责人在河北省办事处召集王从吾、王卓如、刘大风、刘汉生等同志座谈，证明这组织是我们特委领导的，为了便于开展活动，利用国民

党的合法名义。张玺同志指示刘大风与张荫梧接过头，经过张玺、刘大风、晁哲甫研究，由平杰三在清丰搞起来的，而且前边还加上了抗日救国几个字，实际上是我们党的外围组织。据刘大风同志说，我们与张荫梧的十人团没有组织联系，也没有花过他们的钱，只是用了他们的名称，性质完全不同。

时隔不久（大约是旧历十月间），大名县城失守，刘大风、晁哲甫、赵继彬等相继来到清丰，住在衙前街晁哲甫宅子里。刘大风是代表特委的，刘汉生也去了。原来我是住无定所，这里住一天，那里住一天，这时我就在晁老那里落了脚，白天外出工作，晚上回来就住在晁哲甫的宅子里。没呆多长时间，刘大风同志找我谈话，他说准备成立清丰县委，要我当委员。我当即告诉他，我还不是共产党员，但是早就有入党的愿望。他说：“那好办。”我还提出参加县委冯叶莘是否比我更合适。这次谈话是夜间在晁老的北屋里。第二天吃过早饭就在东屋开会，由刘汉生主持，指定由王冠儒任县委书记，晁银田任组织部长，我做宣传部长。刘汉生在讲话中指出：县委的主要任务是恢复党的组织，开展抗日救国活动，以后还要建立游击队。本来我想入党要办个手续，结果一开会就宣布让当部长，觉着再提办手续恐怕不合时宜，就没有再提。那时为什么让我参加县委呢？我想可能是在组织抗日救国十人团过程中，我比较积极。团长金力更是一高校长，地位比较高，不能到处跑，平杰三很少出城，冯叶莘出去也不多，我是整天在外边，除清丰外，还去过南乐、濮阳等地。

县委成立之后，晁银田就回六塔集他家去了。王冠儒家离城近，不在城里住，实际上也不主持县委工作。恢复党组织的活动就是我去跑，由王冠儒、刘大风他们提出些线索，晚上回来给刘大风汇报，他再做些指示。那时东北区是先找的刘镜西，通过刘镜西恢复了翟林栋、巩希贤，还有吉村的几个党员，还找过大张冢的王汝林。东南区是找的王志刚，他原名朱之纯，经他们的介绍又找到大汉寨的张廷璇、双町的何学文，还有杨楼的杨培山。我又发展了单

拐的陈希均，他后来改名陈平，“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死了。经陈平又发展了他姐姐陈友菊，现在叫肖琳。西北区主要是梁村，支部书记马保寅，那时就有60岁左右的样子，是个老党员，很坚决。有个小学教员叫马彩三，还有马怀玉、马子英等约十几人。梁村这个支部在清丰县党组织破坏后是始终保存下来的。他们又介绍了后张六村的王平公，前张六村有个人叫什么名字记不得了。古城北边王庄有王崇谦，现在贵州。古城集马冠群。古城东北有个夏树屏，还恢复了店上的溷昆玉等。在这段时间内，清丰县的村庄，大部分我都去过。

对于这届清丰县委，有些同志不知道。1981年在河北省办事处，王从吾、刘大风、刘汉生都在的时候，我提出这个事情，他们都忘啦！我把当时的情况谈了之后，刘汉生说有这个印象，主持过这次县委会议。因为我是第一次参加党的会议，记忆比较深，连王冠儒、晁银田穿的什么衣服还记得清清楚楚。10月间，刘大风和晁哲甫等同志研究，在清丰、南乐以抗日救国十人团为基础，联络进步学生建立抗日武装。大名县城失陷后，国民党军一八一师石友三部退驻南乐城西刘古师。石友三部有个学兵队，队长张克威，副队长袁也烈都是共产党员。我们通过他们的关系见到了石友三。开始他想叫我们完全听从他的，我们不同意。经过讨价还价，他答应给一个一八一师游击队第四支队的名义，枪支、弹药、给养什么都不管。我们在学兵队的支援下，于10月底在南乐县的留固店集合成立游击队。因没有通知好，去的人不多。第二次是在清丰古城集合，住在古城高小，很快发展到100多人。张克威兼任队长，刘大风任副队长，袁也烈任参谋长。不几天，一八一师向南撤退，张克威、袁也烈随军南下。河北民军司令高树勋进驻清丰，我们即同意高的副参谋长共产党员唐哲民兼任支队长，刘大风任副队长，高树勋还给了一部分枪支和钱。不久，日军攻陷南乐，高部南退。这时中共北方局的朱瑞同志派了肖汉卿、陈耀元、漆汉臣三位红军干部到四支队，加强了四支队的领导。当时直南特委是随四支队活动的。

四支队在古城驻的时候，王卓如从新乡来传达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同志的报告（刘少奇当时化名胡服），主要是讲抗战形势、统一战线和开展游击战争问题。我听了这个传达。由于日军大举南下，南乐失陷危及清丰，国民党军星夜南撤，清丰县有些知识分子也吓跑了。晁银田不辞而别过了黄河，冯叶莘带着他爱人也走了。这时王冠儒又确定调到四支队当民运科长，县委就剩下我一个人。我把情况给刘大风讲了之后，他说：“他们都走了，你就是县委书记。”

四支队建立之后，晁哲甫就和晁涌光等人去山西华北军政干部学校。春节后回来时，清丰、南乐县城已为日军占领。为了便于开展工作，特委决定分别建立边东、边西县委。清丰、南乐的东部为边东；清丰、南乐的西部为边西。由刘大风主持会议，宣布边东县委书记晁哲甫，我任组织部长，委员有刘镜西、王志刚、郭献瑞。当时的分工是郭献瑞分管南乐东部，刘镜西分管清丰东北，王志刚分管清丰东南，我协助晁老做全面工作。县委机关设在六塔集，驻在晁老家里。我就在晁老家吃饭，出发时他给我路费。边西县委是刘桐方，南乐县五花营人，他是比较早的党员。其他委员我不知道。机关驻在梁村。

边东县委成立之后，为了给抗日战争培养干部，晁老在六塔集开办了抗日军政训练班。第一期人数不太多，约三四十人。讲课的有晁老、晁涌光，还有李茂林。主要讲抗战理论和统一战线，我讲群众工作，李茂林讲军事知识。第二期人比较多，有七八十人，多数为中小知识分子和小学教员。通过训练大量地发展了“民先”队员，个别地发展了一些党员。办训练班的费用、吃饭、花钱，第一期都是晁老个人支付的。

同时，晁老联合地方绅士，建立了民众抗日自卫团，把分散在地主手里的枪支收集起来，发展抗日武装。每个较大的集镇都驻一个排，如六塔集、瓦屋头、卫城、仙庄、王毛集、巩营、理直、吴村、主堡寨等。因那时土匪较多，三五条枪也称司令，社会秩序很

乱。自卫团有效地维持了社会秩序。为了逐步地改造和掌握这支武装，我们把经过训练的一部分“民先”队员和共产党员派进去做指导员或队长，向战士灌输抗日思想，开展政治工作。如于秀绂、孙建华、郝绍先等，都是自卫团的骨干。另一部分人则让他们回到村里，组织抗日救国会。过去小学教员在农村挺有威望，他们给群众一讲，群众很快就起来了。小学生也组织起儿童团、姐妹团，到处可以听到抗日歌声。这个时期直南特委书记是朱则民，他们执行的是“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路线。他极力让四支队向国民党濮阳专员丁树本靠拢，他就在丁树本那里。后来的事实证明，我们跟丁树本搞统一战线是对的，而向他靠拢受他的限制是不对的，因为这样做妨碍了四支队的发展。丁树本原是冯玉祥的部下，在蒋介石那里吃不开，日本进攻，他没有过黄河，跑到濮阳东南的文留、白堍一带。国民党的县长都跑了，他是个空架子，没有多少分量。丁树本是濮阳专员兼县长。那时国民党的专员叫督察专员，是武官衔，对地方各县是指导而不是领导关系。他的职责是统一指挥各县的保安部队、民团，所以专员都兼保安司令，是对付共产党的。政府方面是省政府直接领导各县。在日军进攻清丰、濮阳、南乐的时候，国民党的军队不战而退，各县的县长弃职南逃。不久，日军又退据大名，我们那里便成了空白地带，既没有国民党的政府，又没有日军驻扎。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的四支队不受丁树本的约束，独立地展开战斗，及时地把我们的政府建立起来，让晁哲甫、刘大风、平杰三、刘汉生等分别担任这几个县的县长，我们的工作就会更主动，形势会发展更快。当时没有这样做是最大的失策。

1938年4、5月间，我们发现丁树本对联合抗战没有诚意，想借助我们的力量在蒋介石那里捞取政治资本，并策划改编四支队，企图把我们吃掉。于是根据上级指示，把四支队开到南乐，脱离了丁树本，并确定改编为东进纵队第七支队，编入正规军。就在这个时候，特委在南乐近德固召开了一次县委书记会议，朱则民书记，王从吾组织部长，刘晏春宣传部长都在。边东县委因晁老年龄

大行动不便，我去参加了。边西县委是刘桐方，濮阳是王镜如，濮阳西门一带是蒋中岳，滑县是张惠僧参加了。朱则民在会上讲了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又讲了关于处决王冠儒和李素若的问题。还表扬了边东县委是模范县委，说边东县委恢复发展了组织，开办了训练班，建立了武装，组织了救国会，群众工作开展得好，号召各县向边东学习。会后朱则民调冀南区党委任宣传部长，王从吾继任特委书记。

王冠儒的问题，已经正式平反了，中央组织部的同志到我家里让我看了文件的草稿，并问了李素若的情况。李素若的孩子向组织部写了信，名字写得不对，组织部的同志也搞不清了。关于李素若的事情刘汉生同志讲过一段情节，就是在四支队成立时，托派头子张慕陶曾到过清丰、濮阳，要见一见四支队的人。李素若可能和张认识，经李素若从中搭桥，四支队派刘汉生见了张慕陶。张和高树勋是儿女亲家，李素若知道他们这个关系，就跟刘汉生说：到那里要说得大大的，说我们有几千人，要多少枪，要多少钱等。张慕陶就领着刘汉生去见了高树勋。高树勋答应把番号改为河北民军第四支队，并给了一部分枪和钱，让唐哲民兼任支队长。可能这是引起怀疑四支队有托派，甚至怀疑刘大风的重要原因。李素若入党比较早，是北方局派到直南作党的工作的。尽管他在七七事变前叛变了，但没有确凿证据说他是托派。而且他跑前跑后，想叫高树勋多给枪多给钱，都是为了抗日。在这个意义上说，杀他是没有理由的。

1938年5月，直南特委宣传部长郭超同志从梁村去濮县，路过六塔，指示边东县委具体由我负责，召集各县开会成立冀鲁豫抗日救国总会。我们就在六塔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到会的有内黄、濮阳、大名、边西、边东、濮县、东明、长垣，滑县有没有代表我记不清楚了。到会代表20余人，讨论起草了一个章程，发表了一个宣言，冀鲁豫抗日救国总会就成立了。我既是县委的负责人，又是总会的负责人，同时还是冀南“民先”分队部的负责人，几个公章

都由我拿着。这时由于日军已撤出清丰、南乐县城，我们就撤销边西、边东，恢复了南乐县委和清丰县委。晁老调特委做统战部长，我任清丰县委书记，组织部长姚伟杰，宣传部长王志刚，刘镜西、袁士先都是委员，我们就从六塔搬到了清丰县城里。接着在城内简师院内又办了第三、四期训练班。这两期人数很多，把全县的小学教员、中学生、高小毕业生基本上都训练了一遍。经过训练之后，清丰县抗日救国的劲头非常大，情绪非常高，各区、村的救国会都普遍地建立了起来。训练班结束以后，冀鲁豫抗日救国总会在清丰城里又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袁士先担任了清丰县救国会主任。而后我们又在县、区建立了半政权性质的动委会，实行累进税，合理负担，负责征粮、征款、送给养，还管组织自卫队，维持地方治安。那时还没有民兵这个词，叫做自卫队。当时我们建立动委会主要是为了跟国民党争权，因为救国会是个群众组织，不能抓政权的事情，我们就搞动委会。结果我们力量大的地方权力就争到了。如清丰县粮草的征收供应完全由动委会掌握，国民党的县长也不得不依靠我们。力量小的地方就争不到，如濮阳、东明、长垣就不行。清丰县动委会建立之后，各区都设有相应的组织，加上区救会，起码有十几人，我们区委就设在里边。这样一来，虽然县里是国民党的政府，区以下则基本上是我们的政权。刘镜西是负责动委会工作的。

1938年8月宣布我调离清丰，到特委任民运部长兼冀鲁豫抗日救国总会的负责人，搬到濮阳城里。总会的办事人员大部分是清丰县的人。我走后，由王志刚接任县委书记。本来那时活动能力比较强的是刘镜西、袁士先，因动委会、救国会行政职务，又是公开的，直接同各方面接触，所以县委书记由王志刚担任。至1939年初，贯彻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直南特委改为直南和豫北两个地委。豫北地委驻濮阳沙木村，书记由王从吾兼，组织部长吴兰田、宣传部长唐克威，民运部长由我兼，副部长许敬贤。直南地委仍驻梁村，地委书记郭超，组织部长王志刚，宣传部长白潜。因为我在

总会就兼任两个地委的民运部长。王志刚调地委后，由姚伟杰接任清丰县委书记。

大约是1938年10月，国民党鹿钟麟来冀南各县建立国民党部，朱瑞同志叫我们协助他。当时晁老不通，亲自去见了朱瑞，朱向晁老做了工作。为了有利于统一战线，使我们能够控制它，经我们研究，叫岳图南做清丰县委党部书记长，王照临做濮阳县党部书记长。当时他们都不想干，是我们做工作叫他们干的，所以开始他们都很听我们的。至1939年春洛阳会议之后，丁树本公开反共，岳图南、王照临也随着变坏了，晁老曾指着鼻子骂他们。当时国民党的口号是“党教民合一”，在教员和学生中发展国民党员。

这时丁树本抛弃抗日救国的主张，按照蒋介石限制异党活动的指示，对我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实行限制和打击。首先是在他们的政治部解除了罗士高、晁哲甫的正、副主任职务，把没有参加国民党的办事人员都赶了出来，并增派了党务专员。其次是限制救国会活动，取消救国会供给。其三是剥夺动委会的权力。所以，我们同丁树本的斗争也就越来越激烈。至1939年底，国民党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到处制造摩擦，张荫梧、石友三等部公然向我军进攻。遵照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我军给以坚决还击，由程子华和宋任穷指挥，在冀中打了一仗，消灭了张荫梧部。又在冀南打了一仗，石友三率部南逃清丰、濮阳一带。我军追击南下，冀鲁豫部队杨得志、杨勇也进行了围击，石友三残部即向东南菏泽、曹县跑到陇海线去了。因丁树本有反共罪行，见我们打石友三，他就慌了，在准备逃跑之际，给当时在家的晁哲甫写了封信，让王照临送到六塔，意思是说我军打石友三有碍统一战线，让晁老出面做些工作。晁老对丁树本反共非常恼火，没跟地委商量，即回复了丁树本说：你是种豆得豆，种瓜得瓜，过去统一战线哪里去了？临时抱佛脚岂能有灵？于是丁树本带着清丰、南乐的县长仓皇向西南逃走。接着我们就建立了清丰、南乐、濮阳等县的抗日民主政府。袁士先被选为清丰县长。4月由冀鲁豫抗日救国总会筹备，在安庄召开军政民

代表大会，建立冀南六县行政督察专员公署，选举我为专员。继而在西王什召开党的会议，建立了冀鲁豫区党委，书记王从吾，副书记张玺（因王从吾去延安，由张玺代理书记），组织部长信锡华，宣传部长刘晏春。这时，由于日军大“扫荡”很快开始，我们到1940年底才在内黄县的张固召开会议，成立了冀鲁豫行政公署，行署主任晁哲甫，副主任崔田民、贾心斋，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政委崔田民。至此，我们这个地区的党政领导机构才算全部建立了起来。

1941年大约7、8月间，冀鲁豫区党委和鲁西区党委、湖西区党委合并，仍叫冀鲁豫区党委。合并后，区党委书记张霖之，张玺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张承先任宣传部长；行署主任晁哲甫，副主任段君毅；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政委苏振华。

由于清丰县的工作基础比较好，所以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成为一个活动中心。除地委、专署和行署、区党委转战在清丰境内，还有一些上级领导机关在清丰活动。1939年春，彭德怀副总司令和二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来清丰住在韩村，冀南区党委也同时来到清丰驻在韩村附近。区党委书记李菁玉，组织部长于光汉，秘书长郭森。区党委通知我到了韩村，做了一些汇报，然后就去一二九师师部开会。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都参加了，主要是研究冀鲁豫一带的情况，做了些指示。第二天，区党委又通知我去师部找师长。到师部后，刘伯承同志领我去见了彭总。彭总待人和蔼可亲，他向我询问了一些情况。我向他提出，我们的人都从国民党里退出来有点舍不得，是否可以埋伏几个人？他说：个别的可以，但必须保守秘密。那时，他们都感觉到清丰、南乐的群众基础比冀南好。

1940年4月在建立冀鲁豫区党委的同时，上级决定派二纵队到这个地区来。二纵是以原三四四旅为基础的，政委黄克诚，副旅长杨得志，政治部主任崔田民，副主任唐亮。他们驻在清丰双庙，在黄克诚主持下召开了军政委员会。参加会议的军队方面有黄克诚、

杨得志、崔田民，区党委有张玺、信锡华，政府方面有晁老和我。会议研究决定了区党委建立后的大政方针，并确定了4个地委和军分区领导机构。黄克诚兼任军区司令员。

1944年，冀南区党委与冀鲁豫区党委合并，成立中央平原分局，书记黄敬，司令员宋任穷兼组织部长，宣传部长李菁玉，组织部副部长兼民运部长张霖之，秘书长张玺。委员有黄敬、宋任穷、杨勇、苏振华、李菁玉等5人。1945年日本投降以前，平原分局在清丰单拐驻了半年多。我是3月从太行山整风回来的，在濮阳柳屯附近又搞了一段，至6月份刚割完麦子，被调到平原分局做办公室主任。这时黄敬有病去延安，宋任穷主持工作，苏振华、杨勇、李菁玉都在。

在我们下山时，邓小平同志和北方局的全部人员下山来也驻在清丰单拐。小平同志是书记，组织部长刘锡五，宣传部长李大章，小平同志还给我们做了报告。中共“七大”以后，中央要开一中全会，小平同志就走了。他骑马到了大名，中央派飞机从大名机场把他接走，时间大概是6月份。日本投降后，中共北方局和平原分局就由单拐搬到了濮阳城里。不久北方局组织部长刘锡五、宣传部长李大章就被调到东北去了。

关于晁哲甫，前边已说过一些，他1927年入党，在大名七师和谢台臣培养了不少人才，把七师办成了红色学校，1939年由于不同意执行“左”倾路线被开除党籍。这个问题在延安时已经平反，做了结论。晁老非常注意马列主义的传播和对青年学生的教育。在大名七师教学时，向清丰民众教育馆赠送了很多进步书籍，当时我曾见到不少书上写着“晁哲甫先生赠”。

七七事变前，晁老二次去七师，同托派进行了激烈的斗争，使得托派分子林琴南独霸七师的企图未能实现，所以晁老曾被托派刊物点名攻击。

事变后，晁老对于稳定清丰局势、扩大统一战线、建立武装、培养干部以及党政建设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曾担任清南边东

县委书记、地委统战部长、冀鲁豫行署主任，以后又做过晋冀鲁豫边区教育厅长、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长、平原省主席。他一生重视教育和培养人材；在工作上他多谋善断，坚持原则，敢于提意见；对人是温诚忠厚。高镇五对他非常赞赏，说他是“诣深才高，耿直肃严”。

一九八二年五月

（于秀庚 肖天秀整理）

关于冀鲁豫边区 抗日救国总会和妇女抗日救国总会 成立前后的一些情况

安法乾 范世钧

(一) 关于冀鲁豫抗日救国总会

1938年4月间，中共直南特委委托边东县委（清丰、南乐城以东为边东县委，驻清丰县六塔集）筹备成立冀鲁豫抗日救国总会，由晁哲甫和安法乾负责总会的筹备工作。特委通知要求清丰、南乐、大名、濮阳、濮县、内黄、滑县各派两三名代表参加大会。在清丰县六塔集十字街西一个四合院举行了总会成立大会，会期一天，到会代表共二三十人。这是第一次代表大会。会上通过了总会章程和宣言，选举了总会委员，确定总会为常务委员负责制，由常务委员会主持（没有总会主任）总会工作。同时设立了总务、组织、宣传、青年、妇女儿童和武装6个部（没有成立农民部）。特委确定安法乾任总会党团书记，杨均任妇女儿童部长，杨均走后由陈友菊（现名肖琳）负责。委员和部长虽然确定了，但是因工作关系，多数人都是常来常往而不住机关，真正常住机关的主要是安法乾一人（晁哲甫是总会的组织者之一，但没有选进总会工作）。

初期，救国总会工作人员主要是县委军政训练班的学员。当时县委的一项主要工作就是办军政干部训练班。麦前，在清丰县六塔办了两期；麦后，国民党清丰县政府从六塔搬到清丰城里，我们清丰县委连救国总会也都搬到清丰城里去了。去城里前，国民党县

政府任命晁老为县政府的民训科长。到城里后，又开了两期训练班，规模比上两期增大了，共约五六百人以上。安法乾是训练班的政治工作负责人之一。训练班讲的中心内容是抗日，其中包括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统一战线，怎样做群众工作，怎样组织救国会、自卫队、儿童团、姐妹团等，还教唱抗日歌曲。安法乾就是那时学会唱歌的。六塔的两期训练班是以晁老个人的名义举办的。清丰城里的两期是以县民训科的名义举办的。从现在来说，这4期都是县委领导下举办的。经过这4期训练班，抗日干部大大增加，全县的教员、中学生（主要是小学、高小教员，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基本轮训一遍。第1、2期中没有妇女参加，3、4期中妇女不少，数字记不清了。我（安法乾）记得训练班开小组会，城里没有那么多的地方，就到城东北角麦茬地里开。这两期训练班后，救国总会充实了人员。

随着训练干部的增多，各地农、青、妇救国会，儿童团、姐妹团都普遍建立起来。总会刚成立时，和清丰县救国会并没有分开，工作是在一起的。7月间，救国总会与清丰县救国会分开，袁士先为清丰县救国会主任。总会为了健全组织，在清丰县城里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用了两三天时间讨论了当时的工作，选举了委员。这时逯昆玉、许敬贤、陈友菊和安法乾都在总会工作。陈友菊任妇女儿童部长。8月份，宣布安法乾任特委民运部长，专做救国总会的工作，不再任清丰县委书记。不久，总会机关驻地从清丰县搬到濮阳县城以后，又有郭子光、刘衍州、李成安、袁冠卿、张巧凤、唐旭等同志到总会工作。到濮阳后，开始驻东大街路北，后搬到西大街路北，最后挪到御井街。到濮阳后，我们总结了清丰、南乐的工作经验，认为办训练班是开展工作的好办法。因此，1938年底和1939年初，总会就在濮阳城内办了三四期训练班，由罗士高、晁哲甫、晁涌光等同志讲课。这几期训练班有女同志参加，也有东明、长垣等县的人参加。训练班结束后，学员史向光、宗凤鸣、李率真等留在总会工作。

进驻濮阳县约一个月，陈友菊同志调去特委办刊物。9、10月份吴莲如到总会工作了一段时间。11月份特委又介绍范世钧到总会工作。随后，范世钧在秤钩湾主持办了一段时期的训练班。

(二) 关于妇救总会

1939年底，特委指示妇教会、农教会均单独成立组织。妇救总会是由救国总会组织筹建的。农、妇共同召开了代表大会，共有代表二三百人，是在丁树本的县政府大堂上开的。会议开得很隆重，墙上写了不少大字标语，各地各界代表都赶来参加。在街上还召开了群众庆祝大会。根据特委意见，妇女主任由劳动妇女担任，故选举付秀香为正主任，范世钧为副主任。妇救总会设立3个部，以后又来了两位女同志——组织部部长申超臣和宣传部部长申戈军。生活改善部部长由申超臣兼任。

妇救总会全称“冀鲁豫边区妇女抗日救国总会”。付秀香选为主任后，就回清丰工作没有回来，实际上妇救总会工作是由范世钧主持的，一直到1940年政权建立基本没有变动。妇救总会建立后，范世钧主持在濮阳城内举办了三四期妇女训练班。濮阳县是在丁树本眼皮底下，又是天主教徒较集中的地方，妇女工作不易开展。于是，就把训练班的学员组成工作队，去城关挨门发动妇女。有时要穿上学生服，扮成学生去发动群众。以后就采取组织妇女中的积极分子开小型会议的方法进行培训。

农会主任是姚恒光，下边有个吴存林，其他的记不清了。到后来，因老姚跟丁树本打交道显得弱些，便叫许敬贤任农会副主任（逯昆玉曾干过一段，对外的名义逯昆玉是总务部长），安法乾是组织部长，郭子光是宣传部长，武装部长张晓民。当时的工作除抗日救国外，就是做丁树本的统战工作。1940年丁树本反共以后，安法乾就做政府工作了。

1940年成立了专署，设有4个地委，“五五大扫荡”后，合并为3个地委。1941年1月冀鲁豫行署成立，1941年秋鲁西与冀鲁豫两

区合并后，设立了妇委，刘晏春为妇委书记，范世钧为副书记。

（三）关于七七事变后，总会成立前的妇女活动

1937年的11月份，杨均（天津南开大学学生）到清丰县，先住在古城，后来与朱则民一同住在县城里付秀香家。付秀香能够较早地参加革命，是受朱则民、杨均二人的影响；再加上她有一定活动能力，所以一经发动，她能很快起来抗日。

1937年冬（11、12月份），安法乾在清丰县梁村召集妇女开过一次会，主要是宣传抗日。范世钧走后，梁村的刘玉英在清（丰）南（乐）大（名）救国会做妇女工作。1937年妇女工作总的来说没有大开展，真正开展是在1938年开办训练班后。

四支队里的女同志主要有董维华（东平人，来自一八一师学兵队）、李梅云（刘志良的爱人）等，她们跟着部队行军，也做了一些妇女工作。

一九八四年四月十一日

对清（丰）南（乐）大（名）内（黄）

抗日救国会的回忆

谷剑侠 马毅之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中国，国民党军政官员纷纷率部南逃，濮阳地区专员丁树本也窜到封丘准备渡河逃跑。直南豫北地区社会秩序异常混乱，人心惶惶，不仅有大水、蝗虫等自然灾害，使人民不能安居乐业，而且还有国民党杂牌溃军、汉奸地痞、土匪、流氓武装为非作歹。他们任意派粮、要款，到处扰乱人民，不管人多人少，头头都是“司令”、“队长”，真是“司令多如牛毛”，“队长到处都有”。人民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处境极为艰难。比较好的村庄，有人主张联合起来，保家卫国；一般的村庄，多数人在观望、等待，看形势如何发展；有“恐日病”的人想渡河南逃。究竟怎么办？人们都在想都在议论这个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我党北方局先后派出不少干部来到直南豫北地区工作。1937年10月，刘大风同志遵照北方局朱瑞、张玺同志的指示，先后在南乐县留固店、清丰县古城集号召组织抗日第四支队，不少党员和进步青年积极加入到这支部队中来。到1937年12月，又成立了直南特委，朱则民为书记，刘大风为副书记。1938年初，边西县委成立，刘桐方任县委书记。

边西县委成立后，首先是发动和组织群众，进行抗日救国活动。在刘桐方同志的领导下，在梁村（直南特委驻地）成立了清（丰）南（乐）大（名）抗日救国会。负责筹建抗日救国会的还有马彩三、李升阁等同志。他们跑了许多村庄，深入到群众中去，做

了大量的宣传发动和组织工作。其范围：在清丰西北，东到清南公路以西，南至韩村一带，西至内黄边境和卫河以东，北至清南边界，大约140多个村庄；南乐县西南，东至城西，南至南清边界，西至卫河以东，北至卫河两岸，约100多个村庄；大名县的西南，东至大南公路，南至卫河两岸，西至大名边界，北至城西，约50多个村庄；还有内黄县约40多个村庄。总计约有350多个村庄先后开展抗日救亡运动。1939年4月直南特委分为直南、豫北两地委，抗日救国会受直南地委机关直接领导。

清南大抗日救国会成立后，马彩三同志任会长。1938年5月，边西县委撤销，刘桐方同志调走，抗日救国会日常工作由马彩三和李升阁同志主持，对他们二人群众称为会长和主任。组织部长是清丰县梁村的马保寅和马建英，宣传部长是南乐县的王镜如、石一彬同志，宣传队长是清丰堤洼的张圣瑞，指导员是古城集的张希孟，青年部长是清丰梁村的刘元善同志，妇女部长是刘翠琴、马玉珍同志。这时，原来的清南大抗日救国会也改为清南大内（黄）抗日救国会，并加强了对各村抗日救国会的领导。具体形式，开始时是由清南大抗日救国会的领导同志亲自到各村进行活动，直接领导各村的救国会；同时各村救国会负责人也直接到梁村清南大救国会联系工作。但是，清南大救国会毕竟领导人员太少，工作又很多，不可能到每个村庄去。这样过了一段时间后，针对工作实际，又采取了巡视员制度，把巡视员分派到各村进行联络工作，既传达上级指示，又布置有关工作，了解情况，帮助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在沙区和内黄东北一些村庄，由清丰后张六村的王平公任巡视员，他调走后由刘元善接他的工作；在韩村一带，由清丰马庄的马千里任巡视员，他调走后，谷剑侠接替了韩村、古城集一带的工作；负责大名县和清丰阳郡巡视联络工作的是马毅之同志，他并且还兼任清丰县西北区民团教导员；南乐县的联络工作主要是由胡通三等同志负责。另外，在一些基础比较好的村庄，还设有不脱产的巡视员（多是党员同志），任务大体相同，在附近的村庄开展工作。如古城集的马

学诗、杜善瑞、张千楼，王村的王朝卿，南乐县留固店的胡通三等同志。巡视员的工作很繁重，经常到各村开展工作，不仅宣传、讲解抗日救国道理，而且还进行战地动员，慰劳军队，动员枪支，扩大武装，并做统一战线工作。其中心就是组织发动群众，团结各阶层人民共同抗日救国，保卫家乡。

随着形势的不断变化，清南大内抗日救国会经受了許多严重的考验。1939年国民党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国民党濮阳地区专员丁树本也日益反动起来。为了反击国民党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我党在直南豫北各县都建立了组织，救国会人员相继调出。救国会组织缩小，机关由梁村迁往后囤上村，1939年冬又搬到古城集南街，和清丰县西北区动委会合署办公，受清丰县委领导。1940年3月，清丰县抗日政府成立。至此，清丰县西北区地委会和救国会同时撤销。

从1938年初清南大抗日救国会成立，到1940年3月撤销，在两年多点的时间里，清南大内抗日救国会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工作：

一、大力宣传抗日救国、不做亡国奴的道理，使群众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心。救国会在梁村和其他村庄办了多期积极分子训练班，培养干部，对他们进行系统的抗日救国教育，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同时，清南大抗日救国会宣传部还编印出刊《火星报》，发消息，谈形势，讲道理，特别是平型关战斗和台儿庄战役的重大胜利，以及我四支队小濮州战斗的胜利消息，大大鼓舞了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救国会除编印《火星》三日刊外，还编印大量宣传品，印刷时事小册子，如抗日识字课本、救亡歌曲等资料，宣传党的抗日救国方针。1938年8月成立了一个脱产的宣传队，经过短期训练和教育，就能够以唱歌、跳舞、演戏等形式，到各村进行活动，起到了宣传、启发和教育的作用。不少村庄也组织了宣传队，不脱产，随时可以进行宣传，很受群众欢迎。那时，到处都可以听到“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的歌声，极大地鼓舞了群众抗日救国的热情。

二、利用各种形式把群众组织起来，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开始，在较好的村庄成立抗日救国会，后来不少村庄相继成立，并逐渐发展壮大。虽然成立的有先有后，但发展都很快。清丰县西北，南乐县西南的很多村庄，尤其是清丰县西北更快一些。首先是组织简单的抗日救国会，以后则发展成农会、妇会、青会、自卫队、儿童团、姊妹团，不少村庄还成立了读书班、识字班学文化，大家都很积极、认真。白天有妇女、儿童站岗放哨查汉奸，晚上有自卫队打更、守夜，维持秩序。我们的干部和村救国会负责人利用各种机会向群众宣传党的抗日救亡政策，组织群众，发展党员，建立村党的基层组织，使群众都行动起来，很快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精神面貌有了很大变化。当时群众高兴地把清丰县梁村称为“小延安”，国民党丁树本部则说清丰县又出了个“梁村县”。

三、做好支前和战地服务工作。在两年多的时间里，特别是后一年，八路军和冀鲁豫区地方部队不断打击敌伪，歼灭日军。直南特委指示：必须把支前工作做好。救国会的马彩三、李升阁同志即开会动员，统一认识，部署工作，组织各村群众进行破路、打狗、扒寨工作。这样既破坏日伪军的“扫荡”活动，又有利于我军打击敌人，建立抗日根据地。各村干部收派粮、草、柴，有时还有款，保证军队有吃有穿，牲口有草料。每当我军同敌人作战之后，农、妇、青会还进行募捐，慰问军队，鼓舞战士杀敌立功。

为了做好支前工作，救国会提出“抗日救国，人人有责”的口号，本着“有粮出粮，有钱出钱，有人出人”的精神，进行合理负担，富者多拿，贫者少拿，特贫者不拿，对于高利贷出租者进行减租减息。由于各村情况不同，所以形式也不完全一样，没有作出统一的规定。

四、动员民间枪支，成立抗日武装。1937年底，在清丰、南乐、内黄县成立了抗日第四支队。四支队调往冀南后，直南特委又马上指示，利用各种关系，继续动员民间枪支，组织抗日武装。马彩三、李升阁、马毅之等同志遵照特委指示，亲自到各村救国会和

有关人士中进行广泛动员，不长时间就动员了100多人、枪。1938年6月，原四支队吴近仁同志从冀南带回一个连，与动员出的这100多人、枪合并在一起，正式成立了八路军黄河支队，下编4个中队。支队司令员卢德明，政治委员张伟，参谋长吴近仁，政治部主任先后由王鹏程和刘培岑担任。黄河支队成立后，立即在梁村、张六村一带进行政治、军事训练，而且还担负直南特委的警卫工作。9月份，部队开到濮阳、滑县一带活动，但是由于该部领导人警惕性不高，缺乏统战经验，突然被丁树本部收缴了枪支。经八路军濮阳办事处主任王鹏程同志和八路军六八八团团团长韦杰同志多次与丁树本进行斗争，丁树本才被迫将大部分枪支交还。10月，清南大抗日救国会的马毅之同志（当时他兼任清丰县西北区民团教导员）和直南特委的袁声同志，共同将民团的两个连近200人、枪，以及清南大抗日救国会宣传队的30余人充实到黄河支队，壮大了部队的力量。以后，这支部队编为冀鲁豫支队第三大队。皖南事变后，黄克诚同志率领该部南下苏北，改编为新四军第三师第二十四团。

五、做好统战工作，团结各阶层人士共同抗日。随着抗日战争的到来，中华民族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因此，我们党的方针是团结除汉奸以外的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最终打败日本侵略者。

统一战线工作是极为复杂的。在农村，主要统战对象是上层绅士、地主，所以政策性很强。在这方面救国会的同志做了大量艰苦的工作，特别是对丁树本的统战工作，将直接影响到濮阳一带抗日救亡活动的开展。丁树本前后政治态度的变化，对救国会的工作也有很大影响。开始，由于我党统战政策的影响和晁哲甫等人的深入细致的工作，丁树本从封邱回到濮阳，那时他一度表现进步，准许成立抗日救国会，我们就拥护他抗战到底。1939年初，国民党在洛阳召开了军事会议。会后，其政治态度由积极抗日转变为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濮阳的丁树本这时也开始变化，他散布一些“共产党上边好”，“八路军游而不击”等诬蔑我党的言论，并鼓吹国民

党的“动委会比较好”，企图限制或取消救国会，成立动委会。针对丁树本态度的变化，我们的统战工作则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策略，针锋相对同他进行斗争：既不让他取消救国会，我们又得要积极掌握动委会，使动委会成为我们掌握的组织。动委会是半政权性质，行政、财粮、民运、武装都由它管，我们就有计划地派一些干部去掌握这些工作。李聚五、焦东五、七步梁和武莲如同志都是这时加强充实到动委会的。当丁树本真的把大名县二区的抗日救国会取消了，对其他救国会也进行限制不给饭吃的时候，我们就依靠掌握的动委会，来保障救国会人员照常吃饭、办公、开展工作，而且军队的粮、草、柴、款各项也照常供应。

两年多来，清南大内抗日救国会在抗战初期的直南豫北地区，为组织发动群众进行了艰苦不懈的工作，为后来群众运动的开展奠定了基础，为抗日政府的成立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1940年1月至3月，清丰、南乐等县的抗日政府相继成立。至此，抗日救国会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救国会的干部也作了新的调整，又都奔赴新的岗位去工作去斗争了。

肥城“红五月”运动

中共肥城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1940年5月，泰西地区在党的领导下，掀起了一场以减租减息、增资借粮斗争为中心内容的农民群众运动，时称“‘红五月’运动”。

肥城县位于泰西抗日根据地中心地带。泰西地委为了总结经验，指导面上的工作，于1940年初在肥城安临站一带创建了“实验区”（县级区），加强了对肥城县的领导。因此，肥城县境内“红五月”运动开展得更加广泛，更加深入，内容也更加丰富。这场运动规模宏大，影响也较深远；然而，这场运动留下的经验教训，也是值得认真汲取的。

一、“红五月”运动的历史背景

1940年，日本帝国主义对国民党采取军事、外交逼降和政治诱降双管齐下的政策。国民党顽固派于1939年底至1940年初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汪精卫集团1940年3月在南京成立了伪中央政府，公开充当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帮凶。在这种形势下，泰西抗日根据地各级党政组织和群众团体，认真贯彻党中央“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发动和领导各地群众开展了反对顽固派和投降派的斗争，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肥城县由于日本侵略军安设据点不多，广大山区更是敌人控制薄弱的地方，因此，我党基本上能公开活动或半公开活动。1940年春季，有的农会为了解决群众的生活困难，根据群众的要求，发动农民向地主富农开展了借粮斗争。随后，这场斗争便蓬

蓬勃地在全县范围内开展起来。

二、“红五月”运动的发起

1940年2、3月间，泰西地委召开了规模较大的活动分子会议。会议由地委书记袁振主持，并作了总结报告。会议中心议题是：反对右倾思想，并提出了“反对右倾改良主义”的口号。会议中间，组织与会者围绕反右倾问题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大会讨论了坚持抗日根据地的斗争问题。肥城、长清、泰安、东平的个别区委书记在讨论中介绍了本县一些地方开展借粮斗争的情况。介绍得比较具体的是肥城三区（今安站）。大家认为，开展借粮斗争，不仅能解决群众的生活困难问题，而且有利于更广泛地发动群众。搞好这一斗争，对于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坚持对敌斗争，具有重要意义。会议做出了在全区开展减租减息、增资借粮斗争的决定。会后，肥城县委认真贯彻了地委会议精神，很快掀起了群众性的借粮运动。

在贯彻地委活动分子大会会议精神的过程中，肥城县五区（今王瓜店）首先打开了局面。区委书记刘子重、区长李森堂发动群众选择东尚里村（今新城镇）大地主李子英为突破口，发起了借粮斗争。在区委干部的带领下，农民群众浩浩荡荡地向李家涌去。当时大地主李子英在外地居住，家里只有管收租的管家。他们先是紧关大门，不让群众进家，后来见群众声势浩大，不得不打开了大门。农民群众蜂拥而入，和他们开展了说理斗争，要求借粮渡荒。在群众运动的震慑下，他们被迫答应借粮。经过斗争，从东尚里村几户地主家里借出了9万余斤粮食，分给了缺粮断炊的贫苦农民。同时，还从大地主李子英家里借出1万元大洋。借粮斗争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群众。之后，全区的借粮斗争很快形成了高潮。杨庄、顾庄、东里村、西里村、冉庄、聂庄、王瓜店、东富村、西富村等，都先后掀起了借粮斗争，并取得了胜利。在五区开展借粮斗争的同时，二区（今仪阳乡）、三区、四区（今王庄）大部分村庄

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借粮运动。到5月份，运动发展到高潮。

三、“红五月”运动的内容扩展

“红五月”运动以借粮斗争为先导，带动了减租减息、增加工资、合理负担等项工作的深入开展。运动初期以经济斗争为主；运动形成高潮以后，在各级党组织的引导下，“红五月”运动变成了一场以巩固抗日根据地内容的政治运动。当时，肥城县委针对本县的实际情况，领导群众主要开展了反顽斗争、反封建斗争和反特锄奸斗争。

1、反顽斗争。国民党发起第一次反共高潮以后，泰西地区的国民党势力大搞反共磨擦。为了粉碎顽固派的进攻，肥城县委根据上级的指示，发动了“反对顽固分子”的斗争。通过这一斗争，打击了顽固派和投降派的嚣张气焰，坚定了人民群众的抗战信念。但是，这一斗争发展到高潮时，混淆了敌友界限，工作中出现了失误。四区固留村（今属桃园镇）董羽生，是全县知名的上层士绅。抗日战争初期，他在我党统战政策的感召下，以民族利益为重，同情和支持我党的抗日主张，思想倾向进步，为革命作出了有益的贡献。“红五月”运动中，由于他看不惯一些过头行为，发表了一些不满言论，被认为是顽固分子，当作顽固派典型进行了斗争。当时，县里曾提出了“大张旗鼓地反对顽固分子董羽生”的错误口号，并在四区焦庄（今王庄乡）召开了万人群众大会，对董羽生进行了批判，戴高帽子游了街。在反顽斗争中，还有一些倾向抗日的民主人士，如西里村（今属桃园镇）的李西庭等人，也被揪斗游街。

2、反封建斗争。“红五月”运动把广大妇女群众也发动了起来，各地纷纷成立了妇教会，发起了妇女解放运动。五区的青年妇女群众提出了“反封建”、“反虐待”的口号。她们在区委的支持下，选择了一名虐待儿媳的典型，召开了反虐待控诉大会，发动妇女群众对封建礼教进行了控诉。接着，县妇教会在西里村召开了更

大规模的以反封建反虐待为内容的控诉大会。县妇救会主任李虹讲了话，动员全县广大妇女群众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积极参加抗日斗争。经过几次大会，全县的妇女运动形成了高潮。有的妇救会在集市上检查过路赶集的妇女群众，发现缠足者，当众解除裹足布。有的地方还开展了妇女剪发等活动。其间，青救会、儿童团发起了禁烟运动。但也有的儿童团不分大烟和旱烟一律予以禁止，发生了“拔烟苗”、“撕烟袋”等现象，从而引起了群众的反感。

3、反特锄奸斗争。“红五月”运动之前，肥城县农村就有了党的基础。但是，由于党员队伍没有经受严峻阶级斗争的考验，难免良莠不齐，鱼龙混杂。为了纯洁党的队伍，提高党的战斗力，肥城县委在“红五月”运动中，开展了反特锄奸斗争，提出了“打倒汉奸”、“打倒准汉奸”的口号。锄奸斗争是必要的，也是有成效的，但是，打倒“准汉奸”这个口号界限不明确，也不好掌握，因而出现了杀人多的问题，有的甚至错杀了。肥城六区第一任区委书记路雇农（原名路明堂，湖屯张店人），于1940年春被汉奸头子张相兰抓走，后经其父周旋保释出狱。路雇农获释后，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就被宣布为投敌叛变，将其枪决。肥城独立营文书王鸿乾（今桃园镇上固留村人）在回家探亲时，被坏人诬告为“特务”，也在没有详实证据的情况下，将其贸然杀掉了。

四、“红五月”运动的功绩

以阶级斗争为主要内容的“红五月”运动，在肥城的历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

1、通过借粮斗争，鼓舞了广大农民群众的革命斗志，巩固了抗日根据地。全县借粮几百万斤，帮助群众渡过了春荒。没有借粮斗争的胜利，没有通过借粮斗争激发起来的群众积极性，其他政治斗争是难以开展起来的。实践证明，泰西地委当时作出的“借粮渡荒”这一决定，体现了广大农民群众的意愿和要求，把党的领导和群众的切身利益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一决定

的贯彻实施，动员了群众，团结了群众，使我党的群众基础更加广泛，更加牢固，对于巩固抗日根据地，坚持抗日斗争，起了重要作用。

2、沉重地打击了封建顽固势力，促进了人民群众的思想解放和思想觉悟的提高。“红五月”运动中开展的反封建斗争，矛头直指封建势力，动摇和摧毁了农村的封建统治，把广大农民群众从封建枷锁中解放出来，引导他们走上革命道路。特别是发动妇女群众开展的“反虐待”和“放足”斗争，得到了广大妇女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广大妇女群众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纷纷走出家门，加入了革命队伍，壮大了革命力量。

3、促进了建党建政工作的发展。在轰轰烈烈的“红五月”运动中，涌现出了大批积极分子，为建党建政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仅五区在“红五月”运动中就发展了200多名党员，全区党员总数达四五百人。在发展党员、建立基层党组织的基础上，大力开展了建政工作，对旧政权进行了改造整顿，把村政权掌握在党员、积极分子或进步人士手里。与此同时，群团组织更加巩固，并有了很大发展。许多村庄的自卫队、青救会、农救会、妇救会和儿童团，在革命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总之，“红五月”运动对于广泛发动群众，组织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对于打击顽固势力和投降势力，解放人们的思想和提高人们的觉悟，对于促进建党建政，巩固发展抗日根据地，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五、“红五月”运动的教训

“红五月”运动的功绩是巨大的，也是主要的，但是教训也是极其深刻的。“红五月”运动的主要错误在于阶级斗争扩大化。首先，借粮斗争发动起来以后，各级党组织对运动失去了控制，出现了侵犯中农利益的过火行为。有的地方，本村借完之后联村到外村去借。有的甚至借不到粮食就借家具、财物，使借粮斗争偏离了正确轨道。如涝洼村（今属桃园镇）曾两次组织群众到黄庄借粮，没借

粮食就借家具。这些行为引起了中农的不满和恐慌，有损于党在农村阶级政策的贯彻落实。其次，“红五月”运动中，有些行动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党的统战政策。特别是在反顽斗争中，把一些统战对象当作斗争对象，进行批斗游街，是十分错误的。这样做的结果，“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有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第三，在反特锄奸斗争中草菅人命，曾在党员、干部和军队中引起了骚动，几乎酿成事变。路雇农和王鸿乾等人的问题直到40年后才得到纠正和澄清，其家属和子女蒙受了几十年的不白之冤。第四，反封建反虐待斗争方向是正确的，斗争成果也是显著的，但犯有扩大化的错误。如反虐待斗争的普遍化，妇救会在集市上解妇女群众的裹脚布和剪头发。儿童团拔烟苗、撕烟袋等行为，都曾引起过群众的愤怒和不满。由于“红五月”运动有这些“左”的错误，给敌人以可乘之机。当时敌伪军和顽固派利用我们的错误和缺点，大造舆论，蛊惑群众，攻击反顽斗争为“指老翁为顽固”，攻击反封建斗争为“男女苟和，谓之自由；父子反目，谓之平等”，借以煽动群众的不满情绪。有些反动地主、绅士则采取“上统下战”的手段，抓住“红五月”运动中我基层干部的失误，到我们的县政府和专署告状，借我党的上级之手，打击我党的下级力量。更为严重的是，敌人利用“红五月”运动中的错误，挑拨离间了我党群关系，组织了“红枪会”暴动，反对我们。1940年夏天，反动“红枪会”暴动后，我们动用了军队才镇压下去。是年秋，“红枪会”袭击我泰西军分区，使我军受到了一定的损失。“红五月”运动中的错误，曾经受到当事者的抵制和纠正，但在当时没有引起地、县委的高度重视。1940年7月八路军山东纵队司令员徐向前同志路过泰西赴延安时，开始对“红五月”运动中的错误进行纠正。以后，东进抗日纵队司令员肖华同志路过肥城时，指出了泰西地区“红五月”运动失去控制的问题，从而开始了对“红五月”运动中的错误进行全面纠正，轰轰烈烈的“红五月”运动也由此告一段落。

（赵学法 执笔）

忆抗战时期

范县的民主民生斗争

成 润

我是在1942年被派往范县工作的，当时抗战正处于最艰苦的时期。从全国来说，正是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又一个高潮。侵华日军得以集中兵力，在华北“强化治安”。华北各抗日根据地都先后经受了残酷的“扫荡”。冀中于“五一扫荡”后，几乎全部变质。冀南、晋察冀也部分变质。主力大部队和党政军领导机关为避免损失，不得不大范围地进行转移。冀鲁豫地区由于地理位置比较偏僻，离日本战略据点较远，加之日军兵力不足，不曾像对冀中那样调用多数兵力，分散占领；但“扫荡”频繁，同时在战略上采取积极“蚕食”政策，致使我卫东、泰西、平阿、湖西、鲁西南、沙区等地区根据地日益缩小，敌占区日益扩大。如卫东根据地只剩下几十个村庄、宽一二十里的狭长地带。范县、濮县、观城因交通不便和日军兵力不足，成为抗战8年始终未被日本占据的完整县，因而一直是鲁西、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区。所以濮范观当时除一年几次的合围“扫荡”时期外，还是相对稳定的中心区。部队休整，党、政、军、群各部门的后方机关，大都安置在这一带。特别是范县，成了中心区的中心，几乎村村都有后方机关，县政府转移地点的选择，就有困难。

从全区来说，各根据地区域缩小了，财粮收入减少了，但抗日武装、地方脱产抗日工作人员并未减少。因财粮（包括烧柴、布匹等）供给极度困难，为了坚持抗战，不得不节衣缩食，渡过困难。另一方面，由于长期战争，社会动乱，广大农民特别是敌占区和游

击区的农民，无心也无力从事农业生产。冀南许多县及冀鲁豫的南乐、清丰、濮阳和东部的昆山、寿张，直到湖西等广大地区又遭到连续3年的蝗旱灾害，群众无衣无食。特别严重地区已出现老无人养、夫妻不相顾、易子而食的凄惨局面，大批人离家逃荒乞食。正是这几年，濮范观鄆北这个连片的中心区，在共产党和抗日政府的领导下，群众生活比较稳定，农业生产还取得相对的好收成。正因为这样，周围各县的灾民大批涌向这个中心区。特别是范县，接待灾民超过本县人口总数1倍还多些。这对于争取敌占区群众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也加重了中心区的群众负担，增加了中心区各县抗日政府保证抗日供应的困难。

这一段可以说是抗战8年中最艰苦的一个时期。粮食定量部队减少了50%，地方党政工作人员减的更多一些，最艰苦的时候曾减到每天4至5两（16两1斤），不足部分以野菜、树叶充饥。在此情况下，冀鲁豫区党委为了坚持抗战，根据中央指示，采取积极反“蚕食”反封锁，以主力部队为骨干，小兵团作战，打出去，深入敌占区、游击区，扩大根据地的方针。根据地的党、政、群大力深入发动群众，巩固根据地，变被动为主动。事实证明，贯彻执行中央这一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为了贯彻这个对敌斗争的战略方针，在地方工作方面，强化中心区几个县的党、政府和群众团体工作，对各部门的领导班子予以调整是完全必要的了。

范县是中心区的中心，是当时冀鲁豫区党委、行署直接抓的重点县。自1942年9月初开始，先后改组了范县县委和抗日政府。除由沙区调派陈瑞同志为县委书记，由行署调我到范县任县长外，其他领导成员几乎都是区党委、行署选派的。同时，区党委又从在党校学习的党政军干部中抽调200余人，组成一个较庞大的工作队，根据区的数目分为8个区工作队，遍布全县各区村。之后进行的第一个工作，是从工作队中抽调一部分干部到区委、区政府和区抗联担任实际职务，调整改组区级领导班子，为下一步深入发动群众，改造

村政权，提供了较好的领导条件。

范县本来是个老根据地，由于过去几年对于根据地建设工作的经验不足，有些工作走了过场，各个环节工作都未作透。群众油了，干部累了，各项工作虽样样俱到，但无声无色。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我们认为这样的“夹生饭”必须“彻底返工”。当然，我们也有足够的思想准备，重烧一锅“夹生饭”比烧一锅新的问题更多些。

范县工作上存在的问题最根本的有两条：一条是群众未发动起来，基本群众在农村的优势未树立起来，地富及其代理人依然统治着广大农民，很多农会是地富代理人领导的假农会。第二条是基层政权未改造，村干部多系地富代理人，有的本身就是恶霸、坏分子，欺压群众，作威作福，通匪通敌。这两种人的共同特点，是在敌我之间采取两面态度，对于党的政策和政府法令消极应付或按地富意见变质执行。因之基本群众没有真正感到共产党对他们的好处，对党的感情不深。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前县、区政权软弱无力，政府工作经验缺乏，在抗日统一战线局面下，阶级斗争观念淡薄，对于代表地富利益的士绅等大小头面人物只团结，不斗争，只迁就恭维，不进行必要的教育，致使这些人气焰很高，抗日政府在他们面前已无权威可言。政府通知开会，他们之中为首者所谓参议室主任，非三请不到，以致抗日政府究竟是谁家的政府，在基本群众心目中日益模糊。

这个问题直接反映到财粮征收，特别是粮食征收上。由于县区粮食管理部门的干部业务工作经验不足，专业人员少，制度混乱，加之冀鲁豫区开始时粮票制度本身有缺点，旧村干部钻空子，以村中的白条、用过的粮票重顶新征任务，所以，一季征收所得现粮无几，严重影响中心区县政权的抗日军粮的供给任务。成百万斤的粮食不翼而飞，地富阶级通过其村庄的代理人从中捞到不少便宜，把我们抗日政权工作人员当作一批糊涂虫来愚弄。

针对上述情况，为了把范县这“一锅夹生饭”煮熟，基本上建

成一个像样的根据地，我们根据党委的指示，把以下两项作为全县党政军群共同的中心工作。

(1) 开展民主民生斗争。首先由减租减息开始，深入发动群众，树立基本群众的优势，在斗争中整顿党，建立农青妇等群众组织。

(2) 县区政府在民主民生斗争中，要态度明朗地支持群众，政治上刹住地富的气焰，经济上削弱地富阶级。在群众发动起来的基础上，改造村政权，进一步肃清土匪、汉奸，安定社会秩序。

根据上述总的工作部署，我们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主要进行了以下几项工作：

(一) 大力开展民主民生斗争

所谓民主民生斗争，是在当时抗日统一战线范围内进行的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斗争。革命对象主要是地主、富农及其代理人 and 恶霸等。对地富的斗争策略是在政治、经济上削弱他们，而不是当作一个阶级来消灭，所以斗争要有理、有节。通过这个斗争取得的经济成果用作改善基本群众的生活状况，在政治上树立基本群众的优势。为了把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不走过场，不搞形式主义，在领导上必须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包办代替，不能对群众抱恩赐观点。要使群众在斗争的实践中认识到，一切胜利都是群众自己团结起来战胜地富、坏蛋所取得的成果。只有如此，才能通过斗争提高群众政治水平和组织水平，使群众经得起风吹雨打，把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为了把这个工作做得更好，必须在县委统一领导下，政府和群众团体从不同的角度采取不同的姿态来扶持和领导群众斗争。

第一个战役是减租减息。这个运动在范县抗日政府建立初期也曾做过，但由于没有认真发动群众，地区上不普遍，在群众中未曾造成一定声势，结果走了过场。凡已减的多系明减暗不减，一阵风过去也就烟消云散了。后来和群众谈起来，大家印象不深，有的尚

不知有这回事。

党政群的干部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之后，政治水平、领导水平也相应提高了。因之，这次群众组织、动员得较好，思想教育较深入，经过如“过去旧社会中地富和农民究竟谁养活了谁”的讲解、辩论等，群众觉悟大大提高了。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减租，群众会开得比较好、思想发动工作做得比较好的村庄，群众敢于和地富面对面进行说理斗争。在斗争中，绝大多数的干部和积极分子都能比较正确地掌握斗争的分寸，让地富认罪服气，而不把他们推向敌人一边。减租后倒粮也注意到时间不要太长，数量不要过多，使他们倒粮后的生活还能相当于群众生活平均水平或稍优于群众的水平。这些具体政策都以县政府法令形式公之于众，一则防止群众过左的行动，过高的要求；另一方面是告诉地富，群众的活动和要求有政府法令根据，是合法的，以此为群众撑腰；同时作为对个别双方有争议的地方由政府出面调解时的法令政策的依据。斗争中根据各户不同生产关系所建立的租佃关系，都立字为证，成为正式的契约。这种租佃关系一直维持到土改。

根据新确立的租佃契约，向过去倒算3年或5年，由地富将多收部分退给群众。这个数字是不小的。这些斗争果实，是群众得到的现实利益，改善了群众生活，激发了群众的积极性。减租斗争范围大，在群众中利害关系面广，使这次斗争成了发动群众关键性的战役，对于范县群众中阶级关系的改变，群众精神面貌的大改观，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但在这次斗争中也发生过几个问题：

(1) 少数村庄在群众发动起来之后，领导跟不上。在斗争会上说理不够，而采取了戴高帽游街、人身侮辱等偏激行动。虽然通过对群众的政策教育这些现象有所纠正，但既然已经出现了，在地富阶级中也引起一些惊慌，出现对党对政府和农会不满的流言蜚语。

(2) 关于减租、退租的时间数量，在群众起来之后，要求逐渐提高，冲破了政府开始公布的限额，用当时话说，就是“水涨船

高”。政府为坚持法令限额，一方面束缚了群众的积极性，给群众泼冷水；另一方面，政府成了地富的保护人、代言人，使政府陷于被动的境地。在此情况下，一方面要对群众进行统一战线政策教育，一方面进行调查研究，对原公布的法令进行适当修改。这种修改共两三次。政府采取这种灵活态度，从大力扶持群众这一中心政治任务来说是完全必要的，至于对来自地富阶级的流言蜚语，如“共产党立法不算法”等，只能理直气壮地顶回去，在适当的场合对他们进行批评教育。

(3)也有一些村庄，由于新产生的村干政治素质不好，群众发动不充分，地富势力比较强大，对村干或原佃户施展谣言恐吓、小恩小惠、攀亲拉友，有的甚至施展美人计等卑劣手段，软化腐蚀干部或农民，以致出现明减暗不减，或白天退租，晚上又偷偷送回的假相。对这些村庄，经过调查，都进行了对地富丑恶伎俩的揭发，进行阶级教育，重新发动群众，重新进行减租减息的补课。

第二个战役是反“黑地”斗争，是在前一个战役取得胜利，总结经验，巩固群众组织之后展开的。

范县（未划省界，并县以前的老范县）全境几乎都属于黄河北、金堤以南直到黄河边的黄河滩区。当时临黄堤很小，遇黄河较大洪水时，濮、范、寿张下堤都是黄河漫滩后的引洪、滞洪区；加之黄河河身北迁南移不定，临黄土地非常不稳定，所谓“三年河东，三年河西”，“三年穷，三年富”。地主、富农、恶霸往往强占黄河淤地，以致造成偌大的范县，地亩册上只有7777顷，实种地却远远超过此数。且由于过去长期地富乘贫苦农民之危，买地不带粮，造成当时地富粮（向政府交纳田赋的数字）少地多，贫苦农民粮多地少，甚至有粮无地等极不合理现象。“黑地”主要受益者是地富。群众迫切要求八路军、共产党彻底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分析了群众情绪，为合理解决抗日负担，增加政府的财粮收入，认为反“黑地”是对抗日对贫苦农民两利的措施。对地富，种多少地缴纳多少抗日负担，也是完全合理的。据此，我们第二个战役就在反

“黑地”这一口号下展开了。

“黑地”，是全县性社会问题，几乎各区各村都有这个问题。在各区工作队的组织发动下，没用几天，这一运动就在全县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由于经过第一个战役，基本群众的组织优势、政治优势已初步树立起来，地富的气焰已有所收敛。尤其“黑地”是一家一户的事情，斗争形势很自然地形成对地富的各个击破，“联合对抗”组织不起来了。特别是土地是公开摆着的东西，隐藏比较困难，只要把地契和“完粮单”与现实种的地一对照，大体就清楚了。当然也有地富为了逃避追补公粮的数目和减轻今后正式抗日负担，千方百计欺骗群众，以多报少或隐瞒外村亲友代管的“黑地”。这一切都是经过提高觉悟组织起来并与“当家的”划清界限的长工、佃户和外村群众的揭发，才迫使地富低头认罪的。个别极端顽固分子，是在群众组织起清丈地亩小组清丈之后才不得不承认的。

另外还有一个政策性较大的问题，就是“黑地”不仅地富有，少数继承祖业、现已下降为富裕中农或中农的也有些问题。为了团结中农，政府明确宣布，中农有“黑地”，只要如实报出，只在今后按数缴纳抗日公粮和其他负担，不追补过去，不处罚，动员中农响应政府号召，和基本群众站在一起，不要受地富豪骗。这一切通过工作队的个别说服动员，基本上使地富不能拉中农和我们对抗。

经过两个多月的反“黑地”斗争，群众又一次分得胜利果实，全县土地面积得到初步落实，抗日负担面积大大增加，历来地富向贫苦农民转嫁负担的现象基本上消失了，抗日负担各阶层的分配进一步合理。

通过以上两个较大的战役，基本群众发动起来了，扬眉吐气，在村里说话算数了，抗日根据地的党群关系、军民关系显著地变化了。

(二) 彻底消灭土匪，安定

根据地社会秩序

范县地处黄河滩地，在国民党花园口扒口黄河改道之前，每年汛期黄河洪水经常上滩，利用这个地区蓄洪滞洪，农民生产极不稳定，群众生活无保证。且地处边区，国民党统治较弱，破产农民无外出谋生出路者，留在当地往往流氓化，成为地富统治农村的爪牙，或铤而走险当了土匪。所以，虽然范县当时成为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区已四五年之久，但社会秩序仍不好，抢劫事件时有所闻。这些土匪虽无“大杆”，但三三五五出外或在本县作案，在本村或近村“窝票”。我们公安部门虽掌握一些材料，不过，过去由于群众未真正发动和组织起来，有的和这些坏人划不清界限，有的看不到自己的力量，出于对坏人的恐惧心理，所以明知坏人坏事，也不敢向抗日政府揭发检举，以致几年来社会治安问题未得到彻底解决。只有在民主民生斗争几个战役打过之后，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在斗争中看到了自己组织起来的力量，也看到共产党、八路军、抗日政府是真正为贫苦群众办好事的，才一心一意地和我们站在一起，向坏人展开了斗争。他们以各种方式向抗日政府揭发检举，坏人无藏身之地了。组织起来的群众积极协助公安部门，有的亲自作向导，在不长的时间内，过去潜伏在群众之中的坏分子一个个束手就擒，对其中罪行严重、民愤较大的依法枪毙了。经过几个这样典型事件的处理，在全县各阶层群众中震动很大，也教育和挽救了一些曾和坏人坏事有牵连的人。人们在事实面前相信，无论谁办坏事都逃不出广大群众的手心。从此，多年未能解决的社会问题，群众起来之后，不用几天就解决了。

(三) 反资敌斗争

范县是我们根据地的中心区，全县境内无日伪据点。我们决心

把这个中心区的县建设成完完全全的共产党、八路军领导的县，不允许有暗中给敌伪送财粮的两面派性质的村政权，或背着我们资敌的地富暗中代理人。这是我们中心区对敌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

当时范县境内虽无敌伪据点，但鄆城境内的侯集距范县东南边境只有20余里，这是大汉奸伪县长刘本功经营的面向范县中心区的重要前哨据点。范县东南部部分村庄（即杨集以东、东北，直到旧城以东、以南）的某些地富分子、小士绅等，和侯集据点伪政权有秘密联系，作为一旦范县环境恶化时他们的退身之地；同时，也是据点的敌伪取得我中心区军政情报的主要线索。关于资敌情报问题，我们曾多次在群众会和绅士代表会上进行过教育，不点名地警告，并曾约法三章。对这些，他们并未认真重视，总认为他们偷偷干的坏事我们不会知道。实际上通过我们的情报工作，特别是据点内的情报，对于他们的所作所为，给敌人送了什么东西，什么情报，我们掌握了一些。但当时对他们还是以争取教育为主，“未开杀戒”。敌“九二七大扫荡”是规模空前的“扫荡”，遍布中心区的军政后方机关，对应付这样“铁壁合围”式的“扫荡”尚无经验，连同未突出包围圈的部队、剧团、学校等受到一些损失。这时，那些短见的地富分子、小士绅们，认为我们大势已去，真的要变天了，有的即主动给据点送粮送肉，以求得参与“扫荡”的伪军的“关照”。这些情况我们是了解一些的。待“扫荡”结束以后，我们除进行了打扫战场等善后工作之外，便利用“扫荡”后的战机，对资敌情况严重的逮捕几个，经过审讯，核实了罪状之后，轻的教育取保候审，选择其中罪恶大、几年来一直资敌的，留在群众大会上作反面教员。

我们先后在旧城、杨集两处召开数千人的群众大会，对于在反“扫荡”中立场坚定，保护公家物资、掩护伤病员有功的，由县长给戴红花，并代表共产党、八路军、抗日政府和全县抗日群众向他们致敬；对于在反“扫荡”中给敌人送粮或其他物资资敌的，经向群众宣布罪行后，立即执行枪决。这次杀人不多，但用这种对比的

教育方法，对手脚不清、和敌人勾勾连连的人起到了震慑作用，对广大群众的教育作用是大的、影响是深远的。这场反资敌斗争，收到良好效果。当然，周围有敌人存在，资敌问题不是一两次大会就能彻底解决的，需要我们继续提高警惕，两眼紧紧盯住敌人，经常加强对敌斗争的领导。

（四）1943年麦季公粮自缴运动

粮食是支持抗日战争最重要的物资，特别是我们中心区，部队的休整、党政军后方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伤病员的供应，都需要范县群众更多的负担。抗日政府每年都要把公粮的征收工作当作中心工作来突击。但是由于过去我们政府中县区粮食部门负责人业务生疏，管理工作一塌糊涂，加之群众又未真正发动起来，村政权未改造，地富及其代理人在村内统治一切，他们上下其手，蒙混、欺骗我们粮食工作人员（每次开始征收公粮，他们便以白条抵新帐，结果是只见条子不见粮，糊里糊涂地就完成了征收任务），以致我们的粮食供应工作长期处于紧张状态，给抗日工作造成不少损失，而地富及其代理人都得以逃避或减轻抗日负担。

经过1942年下半年深入发动群众，改造村政权，群众觉悟大大提高。在这个基础上，又进行了反“黑地”斗争，每个村地亩数字基本上搞清楚了，按合理负担办法，重新整理制定了合理负担地亩册。这样，抗日负担地亩数大大地增加了，各阶层之间的负担更符合“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精神，更加合理了。粮食征收管理办法方面的准备工作，政府明确宣布：“旧粮食帐继续清理。自1943年麦季起立新帐，一律不准以旧抵新。”这一快刀斩乱麻的办法，得到广大群众和基层干部的赞同和支持。与此同时，将新征收办法和每个村户应缴数字一律和群众见面，交群众讨论。农会、妇会、青抗先等组织分系统结合讨论，进行组织发动和思想工作。经过一系列的准备工作之后，政府号召群众自觉自愿缴纳抗日公粮，支持八路军、抗日政府抗战，保卫根据地。所有到村工作的粮食干

部，只帮助群众办理手续，验收粮食，一律不向群众催缴。所有缴纳事宜，均由群众团体领导自觉办理。农会基于对群众的信任和依靠，号召群众一定要把粮食晒干扬净，以最快的速度，把最好的粮食交给抗日政府，并在村内各户间发动竞赛，向临近村发起挑战，在全县范围内掀起了一个轰轰烈烈的公粮自缴运动。多数村庄一天之内就完成了任务，速度之快，粮食质量之好都是空前的。从这以后，范县开始进入以现粮供应的阶段。

以上回忆的只是1942年至1943年间，在冀鲁豫区党委和行署直接领导下，范县县委正确贯彻执行重新发动群众，巩固根据地这一正确方针，根据范县的具体情况所进行的几项主要工作。通过这些工作，才把范县群众积极性发掘出来，在抗战的艰苦年代，给抗日作出较大贡献，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忆冠县的减租减息与 民主民生斗争

司洛路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冠县的国民党县长跑了，县政府作鸟兽散了，地主、豪绅、土匪、流氓成立的所谓抗日义勇军，在日军“扫荡”之下，骚扰了一场，也大都溃散了。这时，巍然屹立的只有我党创立的抗日游击部队。在八路军的支援下，这支部队开创了抗日民主根据地，建立了抗日民主政府，组成了工人、农民、青年、妇女与文化界的抗日救国会，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参军参战，开展民主民生斗争，改善人民生活，改造乡村政权，安定了社会，发展了生产。

反贪污，反恶霸，改造乡村政权

乡村政权多为土豪劣绅把持，借以欺压农民，维持其封建统治。他们对抗战是消极观望，对群众运动不支持。这些乡村政权又多数有贪污行为，不少还是恶霸当权。群众发动起来后，自然首先对准了这个目标开展斗争。因而在1938年下半年与1939年约有两年的时间，逐个地先后进行了反贪污、反恶霸运动，把所有乡村政权普遍进行了改造，把恶霸打下去了，对贪污者罚了款补了粮，一律实行民主选举，由共产党员或抗战积极分子当了乡长、村长。这不但在政治上削弱了地主阶级的势力，也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其欺压行为，甚而有的地主在经济上也受到了削弱。像吕庄村长牛成明贪污被斗后，叫他全部退出贪污的款粮。贾六庄的侯俊峰本是大地主侯新奎盘剥群众的大总管，群众对他是有一肚子气的。他在抗战初

期群众运动高涨的情况下，狡猾地伪装老实起来，服服贴贴地当老百姓，可是一到抗战艰苦环境到来，他见有机可乘，又暗中蠢动，串连落后分子竟要干资敌勾当。这就惹起了广大群众的愤怒，新帐老帐一齐算，全村群众召开大会，狠狠地批斗了他一通。这不但坚定了群众抗战的决心，也使这个老狐狸从此再也不敢闹腾了，可谓永世没再翻过身来。

减租减息，合理负担

乡村政权改造后，群众组织起来，人民当家作主了，接着就开展减租减息增资增佃运动。

二五减租是我党吴玉章同志于1925年在广州联合国民党左派何香凝等提出，经国民党执监委联席会议决定的。经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运动，促使国民政府于1926年在其“政纲”中提出二五减租办法，但为地主阶级所反对，所以一直未实行。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苏区本来实行没收地主富农土地、“耕者有其田”的政策，为了团结抗日，在土地革命战争转为抗日战争的情况下，我党改为实行减租减息的政策。

1938年下半年，中共冠县县委与县政府根据“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与农民群众的要求，提出实行二五减租、分半减息与五一增资的口号。党与政府的这些有关改善人民生活、减租减息、增资增佃的政策与法令，在全县进行过反复多次的宣传解释，取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热切拥护。

双减双增经过1940年与1941年两年的时间，在全县普遍执行了。租佃二五减交，即1斗租子改7升半，三七的改为二二五与七七五；雇工实行五一增资，即10元工资改为12元；债息是分半减息即3分利息的改为1分半。

这样实行的结果，佃农、雇工与不少贫农获得了利益，剥削减轻了，生活改善了，生产劲头大了，参加抗日的积极性高了；同时交租交息，保证地主富农的一定利益，对团结抗战也起了积极作

用。

在这些活动中，不少地主富农按法办事，是进行了减租减息与增资增佃的，有的开明士绅还起了带头作用。像苏胡町的苏绍泗，在增资活动中他是带头执行的，并且在工会召开的雇主座谈会上发言，讲他如何响应政府号召，执行法令，进行增资，团结雇工共同搞好生产与积极进行抗战工作的。可是也有蔑视群众团体，拒不执行政府法令的，像张货营一个姓郭的富农，无论怎么对他宣传劝说，他就是不给雇工增加工资。后来工会召开了雇工大会，对他展开了说理讲法斗争，他才低头认错执行了增资。掖庄地主马代林拒不执行增资法令，后来在桑阿镇开了六七十人的雇工会斗争他，直到他承认增资才了事。张平与刘寺地的地主拒不执行增资法令，工会分别开了七八十人的斗争大会，在群众的威力下，这两个村的地主才增加了雇工的工资。

不断出现的这些拒不执行双减双增事件之外，还有威吓群众的，说：“谁减老子的租，老子要谁的命！”还有一些地主富农歪曲政策，拖延不办，或者明减暗不减，明增暗不增；更有借故退租退佃与解雇工人的情况；也有的逼迫佃农白天减了租夜间又送还的；也有今年增了减了，明年他又不增不减的。在这种情况下，不压倒一些顽固地主的气焰，双减法令是很难彻底贯彻的。1940年双减运动开展不久，二区的群众团体就召开5000多人的群众大会，斗争了唐寺的恶霸地主孙长贵。孙长贵现实的罪行是破坏双减双增政策，但他又是一贯欺压人民群众的一个“地头蛇”。他诬蔑诋毁群众团体，骂妇救会的干部是“缝兵”。人民群众恨他，干部也认为他是个十恶不赦的坏家伙，一时间很多群众与干部向政府告他，要求政府逮捕、枪毙他。当时，王化云县长同县委商量后，叫群众狠狠地斗争他，于是就开了斗争孙长贵的大会。参加大会的除农民群众之外，还有不少看热闹的地主富农。在斗争大会上群众揭发了他破坏双减的罪行，揭发了他诬蔑抗战工作人员的罪行，对他进行了说理斗争。有的说：“他夺占了我家的土地。”有的说：“你放高

利贷，驴打滚的利，我还不上，你就霸占我家的房子，逼着我住庙堂。”一位老大娘爬上台去泣不成声地说：“你逼得我儿子逃关东，至今还没有信，叫我这老妈妈子到处讨饭，没法过活。”斗争达到高潮、群众气愤到顶峰时，妇女干部赵小豆上前打了他的耳光，责问他还喊“缝兵”不！说理斗争之后，群众把他父子（他儿子孙金峰也欺压群众）二人五花大绑捆起来游街。浩浩荡荡的群众队伍敲锣打鼓，扛着长枪、短矛，喊着口号：“打倒破坏减租减息的孙长贵！”“枪毙恶霸孙长贵！”游了这村游那村，参加游行的人越来越多，像长蛇阵一样摆了几里地长。群众游行示威直到天黑，才把孙长贵送交政府处理。斗争孙长贵的事很快在全县广为传开。这场斗争煞了孙长贵的威风，教训了全县的地主富农，使他们感到不执行减租减息不行了，欺压群众不行了，诬蔑抗战工作人员不行了。这时候有一个地主作了一首秋蝉诗，说：“田字昔为富字足，今日乃作累字头。只知田字能作富，谁知田多累累愁。”所以这场斗争对双减双增运动的开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也提高了群众团体的威信。但是斗争到此并未结束，在双减双增运动中，那些死顽固抗拒的不行了，但又出现了有高招的顽固分子。大庙刘庄有个姓许的地主，有大片土地出租，他依仗一个有势力的绅士作后台，用吃吃喝喝的手段拉拢我县政府中一个以民主人士身份任职的民政科长谷新周（此人后来腐化堕落，离开了抗战阵营），以国民党法令拒不执行减租。他说国民党政府六法全书中有规定：地租不得超过收获物的375%。他说姓许的地租不超过这个375%的规定，所以不实行减租。我们说，不得超过375%的规定是租子的最高限额，并不是一定要到这个限度，这个规定也没说不要减租。可是这个谷新周是县政府的堂堂大科长，大庙刘村的农民在县政府打不赢这场官司，就上告到鲁西北的专员公署。专员接受了这个控告，批驳了冠县县政府的错误判决，要县政府重新审理此案，要执行二五减租。这时地委也向县委打了招呼，说：自己错了自己进行改正，这不但降低政府的威信，还会提高在群众中的威信。苏群县长就

按照专署的命令，推翻了谷新周的判决，指令那个姓许的地主执行减租了事。

实行合理负担（也叫公平负担），这也是削弱地富、有利农民的政策。这个政策在冠县于1940年就开始执行。政府征收军需粮秣，按惯例是按亩计征，这不合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抗战原则。于是政府制定办法，下达命令，在群众团体督促下，各村普遍实行合理负担。办法是每户每人除去基干地1亩不计征负担，每人平均1亩地以下的不负担，地多的地主富农就按累进率多交粮秣。所有农村的摊派皆按此办法执行。这对抑富扶贫起了不小作用。后来北寺地等村的农民派干部去找动委会给予声援，请求政府按土地肥瘦分等负担。政府采纳了群众意见，于是评议土地，按肥瘦分等折成标准亩，好地1亩算1亩；孬地有的算8分，有的算6分、4分。这样一来，路、坑、壕、宅、场、坟不长庄稼的地方，以及沙、碱不毛之地也不负担了，而顶好土地有折成1亩2分的。地富家肥沃地多，这样就要多负担；穷人孬地多，自然就少负担了。这普遍地对贫苦农民有好处，特别是沙碱地区的群众减轻了负担。

查“黑地”

“黑地”就是不完粮纳税，也不负担一切摊派的田地。“黑地”是富户家多，这也是地富转嫁负担于贫苦农民的一种方式。而一般群众也有有“黑地”的，但为数少。“黑地”形成的原因，一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黑地”，说不清是怎么形成的。二是冠县城西南、城西、城北都有大片沙窝地，有的长些荆条，有的只长茅草，有的常年不毛，这种地自古以来不在帐册，不完粮纳税。这本是正常现象。可是从中出现了刁钻之人，这刁民卖掉这种沙地，过走好地的粮税给买户，把好地换成不完粮的了，不在公家帐册了，当然不纳税，就变成“黑地”了。因为这种情况就不花钱或者花钱很少，甚至还有卖地户倒贴给买地户一些钱的，因此就有的穷人遇到穷困难过或者春节过不下去了，就托人买地主富农一部分这样的

地。“过粮就过吧，虱子多了不痒，债多了不愁，反正是完不起粮，纳不起税，粮税多就多去吧。”这样长年下来，就出现了好田地有不完粮税的“黑地”的情况。三是，1937年11月27日石洪典的义勇军占领县城后，把全县的总地亩帐烧掉了。1938年抗日民主县政府成立之后，征收田赋没有依据，就叫各乡村自报田地亩数。自报的时候普遍地少报了土地数目，不当完粮拿税的沙碱不毛之地原来有田赋的不报了，这当然是合理的；而不少好地也少报了，多半是办公人在当权的地主操纵下领着全村各户商量着报的。老实人少报的少，胆大的少报的多，有的村是按一九报，也有按二八报的，这就是少报了10%或20%。这在全县来说是少报了好多的，这就造成了普遍有“黑地”的情况。抗日民主根据地建成后，政府发觉到这一情况，就制定法令，号召自报，进行检查。自报的可免交过去漏交的公粮田赋；如若不报，一经查出，要补交漏交的粮赋，还予以1倍或2倍的处罚。这种办法公布宣传之后，当然有自报的，但是很少。于是发动党、政、军、群众团体等一切抗战工作人员普遍进行查“黑地”的工作，并且还规定过，政府不发供给的粮食了，叫大家吃查出来的“黑地”交罚粮食。用这个办法，当然也查出一些“黑地”来，不过也收效不大。因为这都是从上边查，没发动群众，群众不知道查“黑地”的意义，还怕自己没“黑地”了多负担，天塌砸众人，反正不是我一家有“黑地”，查出来再说吧。于是从1941年开始，改变办法，发动群众，党员村干部带头，讲明“黑地”不合理不合法，是地富沾光，穷人吃亏，应当完全报出，大家真正公平负担，合理负担军需。并规定自报者不追交漏欠，而且把追查地富的“黑地”漏欠粮赋全部交贫苦农民分配，政府不交一点，只是都从今后交纳粮赋。冠县从1938年、1939年就实行征收公粮了，当时每年每亩公粮10斤，柴草20斤，追罚起来，其数目也是很可观的。这样发动查“黑地”，对群众是有很大政治意义与经济上的好处的。

这个运动首先从三区东大里村开始。党支部研究之后，先由村

青救会干部赵金贵找到东头前街一个知情的富农讲出了当时隐瞒“黑地”的情况，说1938年报地的时候，全村是按二八报的，各家都少报20%。这村田增印与田贵银是地多的大地主，他们隐瞒的“黑地”最多。于是召开全村群众大会，讲明意义后，号召自报“黑地”。党员带头报了，一般农民也报了，那个知情的富农也报了。当场对自报的就宣布，免追过去漏交的，今后照章完粮纳税。地主就是不报，群众于是就检举他们的“黑地”，报告区公所，算清他们几年以来欠纳的粮秣款项。在恳求之下，对姓赵的地主是补交拖欠了事，对田家追罚之外，还进行了处罚，追罚的粮款全部由贫苦农民分掉。公家得到的是土地，全负担了，没有“黑地”了。东大里村的查“黑地”经验一传播，三区普遍展开了，全县也随之展开了。经过1941年与1942年上半年一年多的时间，把全县的“黑地”解决了，增收了公粮，贫苦农民也得到了一部分利益，打击了贪心的地主，使群众进一步得到发动，地主阶级的势力又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

查“黑地”运动中，曹里村群众揭发地主曹二黑（曹光印）霸占一个外逃农民2亩地。他通过县政府司法科一个号称民主人士的路志诚（后来此人被捕后降服于敌人，任了伪职），拿出国民政府的六法全书抵赖，说田产被人占有20年即为其所有，说此田地已由曹二黑占有20年以上，按法就应是曹二黑的了。群众对之不服，与之说理，说曹二黑是以非法手段霸占的，虽然事隔20多年了，但曹二黑当时是仗势欺人，那个农民是在无力抗拒之下被他占去田地的。曹二黑与路志诚在理屈词穷之下，只好承认是霸占田产，把那2亩地归还那个农民。

借 粮

1942年华北空前大灾荒，一来是为敌伪叛匪顽所闹，群众生产不好，整天被抢被砸，再者是那一年异常干旱，不但麦季歉收，秋禾早死，颗粒未见，而且秋后又没播种麦子，所以形成大灾荒。贫

苦农民饥饿难忍，而为富不仁的地主富农匿粮不贷，囤积居奇，企图乘机发财。这时抗日根据地已经发动组织起来的贫苦农民，在不少村庄每到吃饭的时候就有成群结队的老弱妇孺到地主家去讨饭吃。而大里村的党员村干聚集在村西大庙里酝酿，可否发动群众去地主家借粮？意见反映到地委，地委认为，这是解救农民的可行办法，可以发动群众向藏粮富户借粮，但要由政府作保，有借有还。县委接到地委指示后，便由党内到党外普遍进行发动，向地主富农借粮了。首先又是东大里村开了头，先向田增印家借。全村贫苦农民集合起来拥到田增印大院内。他不但蛮横地不借，并且拿出一个手榴弹向人群中扔去。群众一见扔手榴弹都吓跑了，可是手榴弹是个哑巴的，没有炸。群众一看手榴弹没爆炸就又都回来了，抓住田增印讲理，说你不借粮食给庄乡吃就不对了，还扔手榴弹要炸死穷人，真是岂有此理！他在气势汹涌的人群面前也害了怕，又感到威吓没成，只好乖乖地由群众带着送交县政府。马景汉县长狠狠地把 他训斥了一番，叫他老老实实地把粮食借给群众了事。东大里村田增印这个大户的粮仓打开了，各区各村陆续进行了借粮活动，这对解救当时不少贫苦农民的饥荒起了不小作用，也使不少地富想乘机发财的欲望受到挫折。

借粮运动到城南雨淋头富农赵家，他就藏粮不借，光说是没有存粮可借，等群众把他家的粮仓扒开后，他仍坚持不借。他家户大人多，一时之间群众也没办法。在这相持不下的时候，城内伪军听到了，就来抢走了。这样群众没有借到他家的粮食，他家的粮食叫伪军抢走了，连归还的指望也没有了。这是敌人给富农上的一堂“政治课”，有些富农接受他的教训，借了粮。

赎 地

1942年全县大灾荒中，不少农民被迫卖掉了土地，有的贫苦农民把地卖光了，并且大家是在挨饿难熬的情况下贱价出卖的。如田村百十户人家，因渡荒卖地的有85户，其中王振友等16户把田宅卖

光，寸土未留。贫农吕同有不仅把自己的土地卖光，还将5户外逃的近族邻居家20多亩地卖光吃光。当时土地之贱也是难以想象的，最初1亩地能换1斗或2斗粮食，后来2斤馍馍甚至1斤麦面条就卖掉1亩地。如中农吕连耕每卖1亩地吃两顿饭，吃了40顿饭就把20亩地卖光了。此时地主富农趁火打劫，如索庄一家地主从班庄一个村就买地20顷之多。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外逃了，有的人逃不出，在家饿死了，致使城东一大片地区成了无人区。1943年秋天下了透雨，党与政府于是发动生产救灾，进行种子、农具、耕牛、吃食各种贷款贷粮，动员外逃人员回来重建家园。对灾荒期间停夫改嫁的妇女，按冀鲁豫行署命令，解决了与原夫复婚团聚问题。但好多人家失去了土地，是一个极大难题。农民没了田地怎么过呢？冀鲁豫行署发布命令，认为这种特定时期，农民是在极端穷困条件下，以很不合理的价格卖掉土地的。为了维持农民利益，应合理解决这个问题，于是制定办法可以实行赎地，规定：凡地主富农汉奸所买农民土地，准许全部赎回。这个法令传达到冠县灾民之后，群情振奋，各乡村由农会纷纷成立赎地小组，按行署法令把灾期所卖土地全部赎回了。当然也有抵抗的，像赵庄的买地户就是不交回文契，买班庄土地的人硬是不准赎，官司打到县政府，打到专署，才赎了土地。经过一年多的斗争，到1944年完成了赎地，解决了农民特别是贫苦农民丢地户一个大问题，使想借机发财的地主富农也得到合理的报酬，圆满地解决了这种不合理问题。

莘县境内的借粮斗争

中共莘县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1943年春，现莘县境内的莘县、朝北、朝城、莘朝边、观城等县的党组织，为战胜困难，巩固自己，领导根据地人民展开了借粮斗争。

一、借粮斗争的历史背景

借粮斗争发生在1943年春的莘县不是偶然的，是有其各方面的原因的：

1、敌人四面包围，步步“蚕食”，根据地的坚持遇到了严重困难。随着1938年11月聊城失陷，范筑先将军牺牲，抗战初期形成的以范筑先将军为旗帜的、国共两党合作所建立的鲁西北根据地丧失，我党担负起独立领导鲁西北抗战的责任。鲁西北地方党先是开辟了冠（县）馆（陶）丘（县）抗日根据地，后逐渐转移到以朝北（原朝城县老五区）为中心的莘、冠、朝交界地区，领导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狠狠打击了敌人。

从1941年开始，日军在华北推行所谓“治安强化”运动，实行“三光”政策、“囚笼”政策，向根据地大举“扫荡”，步步“蚕食”。那些混在抗战营垒中的国民党顽固派，也为虎作伥，向根据地人民进攻。

1942年底和1943年春，鲁西北根据地被敌人分割成两大块：南部的观城和朝城与范县、濮县连在一起；北部的莘县、朝北、莘朝边与冠县南部连在一起，是鲁西北党、政、军机关活动的地方。这时鲁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形势是十分严峻的，四周布满了敌人的重

兵。北边，冠县驻有大批日伪军；东北方向，有公开投敌的顽军齐子修部3个旅占据了莘县、堂邑、冠县交界地区；东边，莘县有日军一个小队，汉奸刘仙舟的伪军发展到14个中队，在城内和城外的重要集镇燕店、河店、张屯、王化、马厂、十八里铺等地修建据点碉堡20个；向南，日军一个中队占据了朝城，原十军团教导师副师长文大可投降了敌人，被编为绥靖三十一师，辖两个旅，总兵力三四千人，在朝城周围地区建据点碉堡80余个；西南，南乐县驻有日军和李铁山的汉奸队；在西部的河北省境内，大名、元城、金滩镇都有敌人的重兵。敌人在鲁西北根据地南北两端修通了堂邑经冠县至馆陶和朝城至南乐的封锁沟，沿沟修建了碉堡据点，以切断鲁西北与冀南、冀鲁豫两大战略区的联系。敌人以公路、封锁沟和碉堡据点为依托，向根据地步步紧逼。在1942年底的最困难时期，鲁西北所属的根据地，只有朝北县一个完整县份，莘县剩马颊河西十几个村子，冠县剩南部几十个村庄，莘朝边区十几个村子。朝城县被敌人朝南封锁线切开，县委、政府在南部马集、城望、王店等10余村坚持着。

2、连年灾荒，粮食歉收，又被敌人围困封锁，解决吃饭问题成为当务之急。1941年秋季开始，旱情特别严重。1942年夏季小麦歉收，秋季禾苗大批旱死，许多土地绝产。据对接敌区莘县天齐庙村的调查，1941年平均亩产为170斤，1942年平均亩产仅40斤。这个村土质和水利条件较好，产量尚如此之低，根据地的沙丘地其产量可想而知。在敌占区，由于敌人的蹂躏和盘剥，群众把树皮都吃光了，青年外出逃荒，老弱妇孺饿死无数，鸡犬无声，耕畜绝迹，景象十分凄惨。许多村到了户户绝的地步，形成了大片大片的无人区。在根据地，虽然景况比敌占区要好得多，但粮食问题也是摆在各级党组织面前的突出问题。为坚持抗日根据地，党采取了正确的政治、军事、经济政策，以打破敌人的封锁围困，解决党政军民的吃饭问题。比如，精兵简政，压缩非生产人员；压缩供应标准，战斗部队的粮食由每天1斤半小米压缩为1斤原粮。为生产救灾，冀鲁

豫区党委从收成好的濮范观拿出350万斤粮食支援冀南和鲁西北；根据地各县组织运粮队，以工代赈运粮，每个劳力每次可得到十几斤粮食；政府贷款、贷粮，组织群众开展淋盐、纺织等救灾活动。尽管如此，仍然不能完全解决基本群众的生活问题。到1943年春天，青黄不接，许多群众揭不开锅，准备外出逃荒要饭。据朝北县调查，借粮开始前的南庄，10天有9名群众病饿而死。北安头村，有5户19人要饭；完全吃糠咽菜也不能维持的有7家30人；糠菜中掺很少粮食的有21家61人。群众的生存，根据地的生存，面临着严峻的威胁。

3、刘少奇同志对冀鲁豫工作的指示促成借粮斗争。1942年9月，刘少奇从新四军返回延安途中，在冀鲁豫根据地的中心区——观城红庙住了几天，听取了区党委的工作汇报，肯定了冀鲁豫边区的工作成绩，同时严肃批评了冀鲁豫没有充分发动群众的缺点。他说：你们的工作不错，到现在没有认真的做发动群众的工作，群众还给你们饭吃，没有把你们饿死，也没有把你们赶走，这是很大的成绩。但是，我们对敌斗争的形势，是日益复杂严重，艰苦的局面还在后边。如果不迅速地把群众发动起来，给群众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根据地就不能巩固。因为得不到群众的支持，总有一天，敌人会把你们挤掉、赶走。没有牢固的群众观念，不搞减租减息，就是机会主义。少奇同志的指示，为冀鲁豫边区彻底发动群众，巩固根据地指明了方向。为贯彻刘少奇发动群众的指示，区党委在观城红庙召开了全区各地、县委书记会议。之后，冀鲁豫三地委——鲁西北地委召开了地委扩大会议，研究实行减租减息、充分发动群众问题。

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借粮斗争首先在鲁西北根据地中心区的朝北开展起来。中共朝北县工委在领导群众开展“双减”运动中，发现群众情绪不高，“双减”搞不起来。究其原因，主要是基本群众无力渡过灾荒，他们要求最迫切的是解决眼前的吃饭生存问题。正当工委为如何帮助群众渡过灾荒，进而发动群众而苦苦思索时，

元庄群众自发地向一户姓吴的地主借出了余粮。工委认为，在一部分群众严重缺粮，而有的地主富户却存有余粮，囤积居奇，廉价换取农民的土地的情况下，发动群众借粮，是发动群众的一个好办法。工委对元庄的借粮经验进行了总结，接着他们又指导玉庄进行了借粮斗争，获得成功。与此同时，冠县大李村党员干部向地委提出了借粮问题，但要有政府做保，有借有还。在冠县县委的领导下，大李村的借粮也获得了成功。元庄、玉庄和大李村的经验通过鲁西北的报纸、会议介绍，借粮斗争便以不可遏止之势，在朝北、莘县、莘朝边、朝城、观城开展起来了。受中心区的影响，与莘县相毗邻的丘县、范县也开展了借粮斗争。

二、党对借粮运动的领导和 借粮斗争的发展过程

由于借粮斗争来势迅猛，各级领导缺乏在统一战线内部开展阶级斗争的经验，思想准备不足，因而在运动之初大多采取了既不发动也不制止的态度，随着运动的发展，逐步加强了领导。原莘县开展借粮村30个，党委掌握的14个，占47%，中途掌握的11个，占36%，没有掌握的5个，占17%。朝北八区在18个村进行了借粮，其中党委掌握的11个，占总数的61%。莘朝边借粮村24个，党委掌握和领导的13个，占54%。莘县、朝北八区、莘朝边共有借粮村72个，党委掌握和领导的有49个，占总数的68%。

党对借粮工作的领导，是通过县区干部驻点包村和通过党支部的核心领导来实现的。在党委掌握和领导下的村庄，由于领导得力，政策和策略对头，大都取得了胜利。

例一：党完全掌握的朝北张鲁集。张鲁集是朝北最大的集镇，分东、西、南、北、中5条街，800多户，5000多人，以回民为主。该镇党的领导坚强，回民支队长运科长金民、朝北回教会主任沙朴等同志与张鲁中心支部的同志一起领导了借粮斗争。在此养伤的朝

城县委书记赵西岳也参加了借粮工作的领导。他们对镇上的存粮情况进行了深入调查，对被借户逐一摸底排队，确定15户为借粮对象，并初步定出借粮数目，研究了借粮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之后，党员和积极分子分别进行宣传活动，把借粮群众组织起来，选出代表和领导机构，决定了各街先借各街的，一方遇到困难，其他群众支援的行动办法。在此基础上，各街借粮群众同时集合，分别到被借户家门口开会，选出代表出面和被借户协商交涉，讲明现在青黄不接，贫农雇农眼看要饿死，他们给你们种地，又是街坊近邻，能见死不救吗？如果都饿死了，谁给你们种地？谁去支前打日本？当了亡国奴，你们要东西还有啥用？等等。通过交涉，南街比较开明的地主郭绍太主动向代表报出借粮数字，与中心支部研究的数字差不多，群众比较满意。郭绍太开了个好头，其他被借户也纷纷报了借粮数目。而西街的地主安金学，把粮食埋起来，又哭又叫，装作没吃的样子，软磨硬泡，就是不借。经过借粮代表的交涉，他看实在拖不过去，拿出了5布袋掺秕子的谷子和高粱。中心支部及时进行了研究，决定不借掺杂的粮食，原定的借数不变，遇到硬茬决不能退缩，一定把斗争进行到底。党员和积极分子带领饥饿群众拥进安家，支起锅来，准备找粮做饭。这时安金学沉不住气了，乖乖地拿出1500斤存粮。经此一战，原来不想借的户，看到软硬拖不过去，也都向代表报了借数。经过3天的斗争，就借出了粮食13800多斤，救济了2000多人。

例二：党委中途掌握的莘朝边东涵丈。该村特点是富户多，贫富相差悬殊。全村102户，502人，其中地主11户，富农8户，中农41户，贫农42户。首富为杨清甫、杨清元，家有存粮100石以上。地主利用其经济优势，掌握和左右了村政权，压制和打击贫苦群众。借粮之前，该村刚进行了反贪污斗争，但走了过场，基本群众没有得到实惠，有19家揭不开锅。受朝北借粮斗争的影响，在死亡线上挣扎的贫苦群众自发地组织起来借粮。地主不敢说不借，但却在暗中破坏捣乱。他们先是放出风来，说什么“反贪污中的果实富

户不要了，实在不够4月份再借”，企图推脱拖延。当群众再一次组织起来要求借粮时，他们拿出3石，让参加借粮的部分群众分了，以分化瓦解借粮队伍，压制打击另一部分群众，使借粮的第一个回合失败了。

莘朝边工委及时对东涵丈进行了掌握。他们在发动群众、鼓励群众坚决起来斗争的同时，帮助群众重新选出代表，组织队伍，讨论了借粮对象，决定从4家最大的地主家里每户借5石，而首先打击最大的地主杨清甫、杨清元。农会还布置了一些人侦察了解地主的动向，一部分人去争取中农和不作为借粮对象的富农及其他地主的同情。代表找杨清甫、杨清元交涉，提出借粮数目，限几天拿出。在限定时间到了以后，地主仍不肯借粮，代表则带领群众在地主家吃饭。地主先后两次到政府，要求派人管一管，区长借口工作忙，离不开，不到村里去，同时规劝地主把粮食拿出来救济穷人。在这种情况下，杨清甫、杨清元拿出了11石粮食，另外两家地主也按农会要求借出了粮食。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借粮斗争基本上是党委领导，抗联出面，农会为主，政府调解来进行的。在党所领导和掌握的村庄，大体经过了三个阶段：

第一、准备阶段。县区干部和支部同志进行摸底调查，了解各阶级状况和社会关系，摸清要求借粮的群众数量、成份，被借粮户的成份、存粮数目等，分析排队，确定组织哪些人，向谁借。之后，把借户按照居住地域划分小组，选出组长和出面与借户交涉的代表。在进行组织工作的同时，进行思想动员，交待政策，统一行动的口号和斗争方法。

第二、斗争阶段。当群众得到充分发动，一切准备工作就绪以后，即在村里最显眼的地方召开全体借粮群众大会，代表向群众宣布借粮对象和借粮方法。有的并且宣誓，表示坚决团结起来，不取得胜利决不收兵。有开明一些的士绅，看到贫苦群众团结起来了，就主动地拿出粮食来，但大多数是经过斗争取得的。

斗争的方法，一般是先礼后兵，即通过代表找被借户交涉，动员他们拿出余粮来；交涉不成，则进行斗争。其方式：一是群众集合起来找地主算帐、评理；二是吃地主，把借粮群众集中起来吃地主的饭，或在地主家里支锅，找粮做饭；三是强借，地主如果锁门躲避，群众则在证人的监督下，开门借粮，尔后留下借据；四是翻粮，遇有地主藏匿不借，群众手持三齿、铁锨去翻。被借户不服，往往找抗日政府告状，各级政府采取调解的办法。地主在上下两层压力下，被迫拿出余粮，随即借户与被借户订立无息契约。至此，斗争阶段结束。

第三、善后处理阶段。斗争胜利后，果实的分配各村大多采用人均分配办法，使所有参加借粮的群众都得到利益；也有的划分等级，以贫弱孤寡为头等，贫而有生产能力的为二等，斗争中消极和家境稍好一点的为三等；还有以年龄和土地占有多少来划分等级的。分粮之后，各地党组织趁热打铁，对群众进行只有团结才能胜利的教育和节约用粮教育，使广大群众认识到：穷人和富人是两个阶级，穷人只有团结起来，才能在与地主、富农的斗争中取得胜利；农会是穷人的组织，是为贫苦群众说话的，农会力量强大了，地主富户就不敢再欺压穷人；这次斗争的胜利来之不易，所以粮食一定要省吃俭用，渡过灾荒。各地在借粮之后普遍对农会进行了整顿，并适时地领导群众转入查“黑地”斗争，以保持群众的斗争热情。

三、借粮斗争的结果

在党委掌握和领导的村庄，借粮斗争都取得了政治上、经济上的双重成果，对根据地的巩固有重要意义。

(一)救济了奄奄待毙的群众，提高了党和抗日政府的威望。据统计，朝北八区18个村共借出粮食20810斤，人均粮食最多者72斤，最少者16斤；莘县30个村共借出粮食25872斤、花生饼6286斤、棉花籽3376斤、花生600斤、糠990多斤；莘朝边党委掌握下的13个

村统计，共借到粮食11936斤，平均每人借到粮食14斤。这些粮食在今天说来是微不足道的，而在当时却是救命粮，使许多濒临死亡的贫苦农民渡过了难关。由于借粮的胜利，提高了党和政府的威望，群众的抗日积极性空前高涨。许多群众说，要不是共产党八路军，早就饿干巴啦。张鲁中街蔡景清激动地在十字街口写下了“共产党是贫苦群众的大救星”的标语，表达了他内心的感激之情。

（二）削弱了封建势力，初步树立了贫苦农民的政治优势。借粮之前，我们虽然实行了合理负担、减租减息等政策，但由于人民群众没有充分发动，这些政策执行得不彻底，地主阶级利用其经济上的优势，对基本群众实施统治。借粮斗争使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并且认识到团结起来进行斗争的重要性。许多村的农会得到迅速扩大。莘朝边党委掌握下的13个村，新建农会的有8个村，通过斗争整顿农会3个。朝北八区18个村中，通过借粮恢复了8个村的农会组织，农会会员总数达2287人，很多群众集体加入农会。农会在一部分村庄成为统治力量，成为权力的象征。地主的威风被打掉，贫苦群众扬眉吐气，各项抗日工作更加落实了。

（三）锻炼了干部，培养了骨干，为全面开展群众运动开了个好头。借粮斗争是在统一战线内部开展的阶级斗争，政策性很强。县区干部和各村党支部注意了政策和策略的运用，适时提出鼓动宣传口号。比较普遍的口号有：是借粮，不是均粮；有借有还，再借不难；我们是歉借丰还；只借余粮；不借口粮和种子粮。为最大限度地团结和发动群众，提出了不限制借粮群众的数量，参加借粮的群众越多越好。在确定被借对象的时候，说服群众不要向多户借，“多借一家便会多一个仇人”。对未参加借粮的群众则提出，“放着大囤粮食饿死人，真不够理”，“但有一线生路，谁干这呀？”“这种年头不能看着穷街坊饿死”，“好时候谁借过他一升一合呀！”以争取舆论的同情，争取中间力量。在向被借户普遍提出借粮数目之后，提出“打虎先拔牙”，先从民愤最大，对群众剥削压迫最重的户开始借。对于主动拿出粮食的开明士绅，进行表扬，并

减少借粮数目，造成“谁开明，有名又少拿；谁顽固，丢人又多拿”，“挨了板子，免不了过河”的舆论。这些政策和策略的实行，对于干部和骨干分子水平的提高起了很大作用，为接着进行的查“黑地”、赎押地等民主民生斗争提供了经验。许多同志反映，鲁西北的群众运动是从借粮斗争开始的。

总之，借粮斗争对于解救基本群众的生活困难，巩固抗日根据地，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在这场斗争中，党委没有及时制定出明确的政策界限，加上对运动的掌握不够全面，一些村庄斗争重点不突出，提出的借粮户过多，发生了乱借乱斗的过火行动。原莘县被借粮的户多达214户，其中地主24户，占11.6%；富农77户，占36%；中农113户，占52.4%，平均从每户家中借出粮食不足100斤。1943年冬，我党领导群众开展了还粮工作，按照契约还了部分中农的粮食，使基本群众与中农的关系有所缓和。但大部地区这一工作没有进行彻底，借粮实际上变成了均粮，这一方面影响了中农的抗战和生产的积极性，同时也助长了干部群众的平均主义思想。

一九八七年二月

冀鲁豫边区群运史上的一项创举

——试述滑县雇佃贫运动

中共滑县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1944年，中共滑县县委在中共冀鲁豫区党委和四地委领导下，大胆放手地在滑县中心区展开了雇佃贫运动，创造了深入发动群众开展民主民生斗争的成功经验。中共北方局代理书记邓小平对此曾给予很高评价，使滑县创造的经验对边区群众运动的发展和农村政权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运动的背景

1942年7月，处于抗日战争最艰苦时期的中共冀鲁豫区党委，决定在冀鲁豫边区发动群众进行减租减息，以减轻地主对农民的剥削，战胜困难，渡过难关。9月，刘少奇从华中回延安路过冀鲁豫边区，指示区党委参照华中盐城地区开展民主民生斗争的经验放手发动群众。1943年初，冀鲁豫第四军分区部队相继收复了卫南，开辟了滨河县，滑县、卫南县变成了中心区。3月5日，四分区二十一团协助滑县县委瓦解了盘踞在滑县中部地区的万集反动会团势力。7月，伪六军杜淑部进犯滑县与卫南，冀鲁豫军区部队发动讨伐杜淑的卫南战役，将杜部大部歼灭，将其残部赶出解放区，滑县、卫南两县开始呈现出相对安定的局面，为开展群众运动创造了客观条件。于是，区党委决定抓住这个有利机会，以滑县为重点开展民主民生斗争，并派边区青救会组织部长纪登奎（四专署抗联副主任兼滑县抗联主任）和妇救会梁伯琪到滑县蹲点。但由于忙于敌人“扫荡”前后的战备和善后，以及扩兵、拥爱、组建人民自卫武装、抗伪钞、

救灾等临时中心工作，到1944年2月仍未能集中时间和精力于群运工作，只是一般地组织部分村庄群众开展了反贪污、查“黑地”、合理负担和减租减息斗争。但是不法地主却不能容忍农民这种初步的有节制的斗争，他们张牙舞爪，向群众进行了猖狂的反攻倒算。寺台村全村20户佃户就有7户被退佃，19名佃工就有14名被解雇。高平、梁二庄的地主甚至公开威胁政府，恐吓佃雇，说什么“天天唧咕，唧咕个啥？”“别看眼下把佃户雇工的小辫儿提得直耿耿的，环境一变，一脚就把你踢到河里去！”佃雇们要求农会解决问题，农会置之不理。佃雇们牢骚满腹：“斗争时农会让开会就开会，让喊口号就喊口号，现在被退佃解雇，你们看着不管！”他们骂农会干部是“新贵”、“走里分子”。农会干部对他们更加疏远。农会和群众之间出现了紧张气氛。

这种严重情况，引起边区、地、县领导的高度重视。他们通过调查发现，在前段的斗争中，广大贫苦农民还没有真正发动起来，中农、富农等中间势力依然掌握着农村政权。冀鲁豫区党委书记黄敬曾在《在濮县、范县工作总结大会的发言》中透辟地指出，这些中间势力虽然也有民主和民生的要求，但他们对地主的斗争往往是脆弱的和不彻底的，一遇到顽固分子的抵抗和反攻，就“很容易妥协”，甚至“会出卖这一斗争”，导致民主民生斗争的夭折。因此，必须把农村中最贫穷最革命的无产者、半无产者雇佃贫农充分发动起来，使他们在斗争中凝结成一支独立的力量，树立起农村的领导核心，彻底改造村政权，才能从根本上打退不法地主的猖狂进攻，夺取民主民生斗争的决定性胜利。由此区党委、四地委于1944年3月决定由四地委副书记赵紫阳带领地委机关60多名干部、筑先师范20多名毕业生，连同地委机关一起进驻滑县，以三、六区为试点，具体指导和协助滑县县委开展以雇佃贫为中心的民主民生斗争。

二、运动的主要内容和基本过程

滑县雇佃贫运动，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一) 清算不法地主恶迹的民主斗争(4月15日—7月7日)。这一阶段主要是发动贫苦农民特别是贫农联系各自身受地主剥削压迫的具体仇恨开展诉苦和说理斗争。边区、地委工作队和中共滑县县委通过调查访问发现, 贫苦农民对地主不但有贪污公款、转嫁负担等一般的公仇公恨, 而且有各自身受地主特殊压迫和剥削的“私仇”和“私恨”(如被诬告、打骂、侵占庄院土地、讹诈勒索、杀父夺妻等等), 而这种“私仇”和“私恨”正是地主阶级压迫贫苦农民的具体表现。贫苦农民对这种仇恨感受最直接、最具体、最深刻, 一遇机会就要设法报仇雪恨。因此, 要把贫苦农民发动起来, 使之得以翻身, 就不单要支持鼓励他们清算“公仇公恨”, 而且要着重支持和鼓励他们勇于报那些所谓“私仇私恨”, 使他们能够吐诉多年的不白之冤, 报多年想报而不能报的仇恨。为此, 滑县县委首先选择了横行乡里、恶贯满盈的不法地主代表人物作为首批斗争对象。在六区岳营3000群众斗争了恶霸地主岳朝中, 无情地揭露和控诉了他贪污肥己、敲诈勒索、霸占妇女等罪行。大会一致决定罚其粮食300石, 使一向耀武扬威的岳朝中威风扫地。接着地、县委又从调查中发现寺台大地主、大恶霸都博卿(外号都老拔), 是日伪“五五扫荡”中全县反攻倒算的首恶之一, 并曾贪污粮食50余石, 奸污妇女60余人, 逼死人命20多条。据此, 地、县委联合三、六、七区22个村共1.5万余人召开了斗争大会。会上, 早已压抑不住满腔怒火的受害群众纷纷起来揭发控诉都老拔的严重罪行, 台上台下怒斥声、喊声、哭声连成一片, 斗争会一直开了一天半。群众强烈要求立即枪决都老拔, 向他讨还血债。滑县抗日民主政府当即批准了群众的要求, 将都老拔就地正法。这一行动大大鼓舞了贫苦农民的士气, 大灭了不法地主的威风。此时, 地、县委及时因势利导, 对愿意低头认罪的恶霸地主采取了罚而不杀的政策, 并在六区今古营进行了典型示范, 使民主民生斗争迅速打开了局面, 而且又在较短时间内很快稳住了局面。十几天时间里, 三、六、七三个中心区先后斗争了28个罪恶昭著的恶霸地主, 罚粮25870.8石、大洋35.05

万元。

(二) 佃雇独立运动(7月上旬——9月底)。地、县委领导同志从麦前清算不法地主的民主民生斗争中察觉到,由于过去对佃雇农增资增佃斗争估计过高,在此次民主民生斗争中把这项工作当作了附属工作,佃雇农的切身利益(即减租增资,减轻债务负担)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致使他们的革命积极性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使整个运动的深度和广度受到了明显的影响。地、县委认为,这是引导群众运动向纵深发展必须解决的一个关键性问题。雇农和佃农斗争目标一致,没有直接的利害冲突,一旦把他们发动和组织起来,就可以从根本上削弱地主阶级的封建统治。因此,地、县委决定从检查减租减息(简称“查减”)工作入手,以滑县七区为重点,以民生斗争为主要内容,开展了佃雇独立自主运动。主要斗争目标有以下四个方面:

1、进行彻底的减租减息。在过去减租减息斗争中,只清算了当年的租息和工资,很不彻底,有不少村庄还搞了明减暗不减,佃雇在经济上受惠甚微。此次佃雇独立运动的目的,是按照“二五”减租、“分半”减息、“五一”增资的法令规定,往前追算自1942年初边区抗日政府正式颁发减租减息法令之后,地主、债主违法拒减的租、息和拒增的工资(一般往前追算3年)。这样,佃雇农可以得到数量相当可观的物质利益。

2、取消超经济剥削。所谓超经济剥削,是指超越种田做工范围之外的剥削行为,比如佃雇给东家出粪、铡草、泥房子、担水、打扫院子、赶集、走亲戚、烧锅、抱孩子及支差等,而地主不增加分文报酬,于是就形成了超越正常经济剥削之外的额外剥削。佃雇运动中对这些额外剥削要进行清算,并要求政府形成法令,明令取消。边区和县政府法令规定,凡与生产有关的额外活,如推土、拉粪等,佃主、雇主必须管饭;凡与生产无关的额外活,如赶集、泥房子、支差等,除管饭以外,必须发给工资,否则,有权拒绝。

3、恢复有利习惯。地主们在长期剥削佃雇的经营中,发现适当

地给佃户雇工们一点小恩小惠，如分给点垛垛粮，天热发顶草帽，中秋节请吃一顿好饭等，能够刺激佃雇们的积极性，从而得到数倍于此的报偿。这是问题的一面；问题的另一面，佃雇们倒也能从中多少得到一点实惠，特别是对于刚刚从1942年大灾荒复苏过来、仍然食不果腹的农民来说还是有利的。但是，经过前段初步减租减息后，有的地主拒绝实行这些作法，引起了佃雇们的不满。独立运动一起，佃雇农便强烈要求恢复，甚至提出亦往前追算3年的要求。通过斗争，恢复了有利于佃雇的一些传统习惯，如分铡草粮、垛垛粮；农忙雇短工双方负责；借月粮、垫底粮、开镰粮；每年夏天给雇工发草帽一顶、手巾一条，冬天发大腰带一条（5尺布），女雇工发给鞋面布；吃开镰饭，中秋节请佃雇吃饭等；对前段中断上述习惯给佃雇造成的经济损失也给予了补偿。

4、调整股分。地主过去为了榨取佃雇的脂膏，在股分问题上搞了许多鬼名堂，如佃户给地主喂养、使役牲口不算股分，不给报酬。地主还不择手段地增加、抬高家人的里搭股，甚至把已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或根本不参与生产的家人也算了里股，被佃户们讽为“养老股”。与此同时，地主们还竭力压低外搭股。因此，运动中佃雇们一致要求：第一，合理减少里搭股，坚决取消“养老股”，适当提高外搭股；第二，喂养、使役牲口是重活，应顶整股帐，凡过去未算股的应算股，算了股但太低的要调成整股。

由于佃雇运动斗争目标集中而又明确，直接关系到每个雇佃农的切身利益，他们以前所未有的革命姿态勇敢地投入了运动，并很快形成了一支强有力的独立力量，把农村封建秩序打了个七零八落。地、县委由此提出了在发动群众步骤上“先民生后民主”的新构想。边区党委民运部长张霖之称赞滑县佃雇运动“打下了乡村，对贫苦民众领导权的树立有了新的启发”。区党委书记黄敬特邀纪登奎、梁伯琪详细汇报滑县七区（高平）的佃雇运动情况。此后，区党委仔细地研究了滑县发动群众的经验，并在全区予以推广。

（三）“民主大动”（9月至1945年1月）。佃雇运动的迅猛发

展，使佃雇农得到了明显可观的物质利益，并部分地解决了诸如参政、当民兵等民主要求，这就深深刺激和鼓舞了贫农群众。他们对佃雇斗争的胜利既羡慕又眼红，提出了利益均沾、平分斗争果实、轮流当佃户雇工的强烈要求。地、县委及时地觉察到这种新动向，屏弃了某些消极调整佃贫关系的错误主张，果断地引导贫农与佃雇一道开展民主斗争，明确地提出照顾贫农的方针，从多方面满足贫农日益增长起来的要求，并使之在运动中经受考验和锻炼，培养出贫农自己的领袖，与佃雇农一起形成农村的领导核心，进而逐步团结中农，建立起农村基本群众的强大优势，牢牢地巩固我党农村抗日根据地。于是，滑县县委在中心区120个村掀起了以雇佃贫为主要力量的更大规模的民主运动，人们习惯地称之为“民主大动”。他们反贪污、查“黑地”、倒利息、倒看青粮，诉受剥削之苦，报受压迫之仇，并改换村长，选举农会干部。当时的县委书记张华和宣传部长连治洁曾经这样描述“民主大动”的情景：“群众动的充分、有劲、普遍，规模之宏大为过去所未有。村村斗争，村村运动，斗了大的（地主），斗次大的；斗争了前街，再斗后街。农民斗争以后，妇女斗；妇女斗后，又是儿童斗，斗争像连珠炮似的开展着。……年前（指1944年）一个半月，5个区斗了500多次。”^①这种广大群众的“民主大动”，从根本上打乱了农村的封建秩序，把农村变成了穷人的天下。

但是，无庸讳言，也正是在这“大动”的群众运动高潮中，部分村庄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一些偏差和问题，如对地主斗争的面太大，罚得太重，产生了“消灭”地主和“推平”土地的“左”的倾向，甚至出现了斗争地主时摔红薯、鸡子的过火现象。这就引起了部分地主的恐惧和不安，以致逃亡和投敌。同时“大动”中一部分富裕中农被斗被罚，影响了革命队伍内部的团结，损害了中农的经济利益，挫伤了他们的革命和生产积极性。地、县委及时发现了上述问题，迅速纠正了斗罚中农的错误行为，并因势利导，逐步纠正了对地主重斗重罚和动辄武斗的偏差，使运动健康顺利地向纵深发

展。

三、运动的领导方法

在发动雇佃贫运动中，地、县委倡导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这套工作方法有三个突出的基本点：

（一）切实从群众当前的要求和水平出发。发动群众，不能脱离群众当前最迫切的要求，超越群众的实际觉悟水平去硬让他们做我们所希望做的事情，那样势必产生包办代替或者与群众顶牛的不良后果。正确的方法是从实际出发，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上来，坚持下去的领导方法，先搞试点，拿出样子，然后引导群众去做，并在做的过程中逐渐提高其觉悟和水平。如在民生斗争进入高潮之后，群众往往要求对地主实行经济重罚，一罚几百石，有些地主即使扫地出门也拿不出。一些好心的工作队员过早地或过于生硬地按照上级法令进行了干预，结果使农会群众和工作队干部发生了尖锐对立，有的工作队员甚至被骂为“地主走狗”，险些被赶出村。面对这种情况，县、区领导并不急急忙忙去批评群众，而是先培养典型，召开从轻处罚态度较好的地主的现场会议，用农民自己的“现身说法”来引导群众自觉地在斗争实践中去认识并改正错误。通过这种耐心而又积极的等待与引导，绝大部分村庄的农会在运动后期都自觉地纠正了重罚地主的过左现象。

（二）最大限度地依靠群众，相信他们能够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在民主斗争的发动阶段，工作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包办代替现象，他们总是担心农民不会斗争，从调查地主恶迹到主持开会、呼口号，一切都由工作队包办，结果弄得地主不服气，群众的“苦水”倒不出来。六区岳营第一次斗争地主恶霸岳朝中时，工作队事先将发言内容和顺序安排停当，但会上岳朝中把眼一瞪，吓得一些佃雇把头藏进怀里，不敢发言，斗争会没有斗起来。第二次改变了工作方法，让群众领袖自己主持会议，大伙一齐跟岳朝中讲理，几位被岳朝中奸污过的妇女一齐冲上前去哭诉受辱之恨，把岳朝中斗得

无地自容，低头认罪。

值得称道的是，佃雇农在自己的斗争实践中创造了一套很好的斗争方法：第一步，分片召开佃雇联合大会，民主酝酿斗争的内容、步骤和方法；第二步，分村进行斗争，说理算帐，倒粮倒柴。他们往往先抓住地主的短处，如讲过顽固话，亏待过穷人或与某女人有不正当关系等，“用小抓钩抓住地主的顶门盖儿，让东家说不出话来”，首先从气势上镇慑住地主，使之不敢“再鸟理”，然后一项一项地算帐、说理，迫使地主顺利答应群众的要求。若遇到个别顽固地主敢于抗拒，就联合附近村庄的农会员一齐斗争。高平两户原来试图顽抗的地主，一听说百名佃雇眼看就要拥到门口，吓得未敢出门，就在屋里答应了佃雇的全部要求。第三步，修订减租增资契约，即用约法形式把佃雇的要求固定下来，使斗争成果合法化。第四步，召开庆祝大会，总结交流经验，商讨保卫胜利果实的办法。届时佃雇们高唱路戏和歌曲，敲锣打鼓拥入会场，把胜利品陈列起来，相互比较，相互参观，夸赞共产党是他们的大救星。

（三）坚持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方法。运动的实践使地、县领导清醒地认识到，在群众运动中既要相信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又不能迷信群众自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群众运动中的一切都是天然合理的。他们对于群众在运动中出现的偏差，旗帜鲜明地予以引导和教育，帮助他们掌握党的政策和策略。当群众发动起来后，引导群众认真执行政府法令，不“出圈儿”。如七区高平集有一些佃雇提出抬垫脚要管饭，冬天要棉衣，除夕要压岁钱，倒生病药钱等要求，工作队干部通过佃雇领袖黄守义耐心说服大家收回了这些过高的要求。在运动高潮过后，地、县委遵照党中央关于先打后拉、有打有拉、打中有拉的指示精神，及时地说服群众调整了农村阶级关系，落实了党的有关政策。对于一般地主，少斗轻罚，尽快了结，使其安下心来；对过去处罚过重的，对所罚粮款拖欠部分适当减免，并视其在“扫荡”和对敌斗争中的表现酌情免去；对于开明地主，加以表扬，政治上给予出路，吸收其参加“三三制”政

府；对于地主子女，尽可能地争取他们参加抗日工作。与此同时，还教育佃雇农努力生产，按照法令规定继续向地主交租。上述政策实施后，滑县局势很快稳定下来，还出现了贫雇农帮助地主空室清野、藏粮埋物的新鲜事。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邓小平对此十分称赞，他说：滑县的佃雇运动做得很好，正是因为他们不仅是放手形成了广泛的群众的自己的运动，更重要的还在于领导与群众结合得好，及时注意把运动经验集中起来，用以指导一般；大胆相信群众又发挥了指导作用，所以运动的结果很好，收效很大。②

四、农村的显著变化

滑县雇佃贫运动虽然只经历了从1944年4月至1945年2月不到一年的时间，但却在农村引起了显著的变化。

（一）贫苦农民生活大大改善。雇佃贫通过彻底的减租减息、增资增佃，倒回超经济剥削和清算贪污、“黑地”，得到了相当数量的粮、款、物，生活状况有了显著的改观。六区12个村联合行动，共倒出粮食124.6石、柴47890斤、钱11500元（边币）。12个村共有雇工172人，每人分钱67元多，可折合3至4年的年薪。三区路寨“头鞭”雇工兰日乾，原来年薪18元，运动后增加20%，又往前追补3年，加上恢复犁地、赶车、请吃饭等有利习惯的折款，共倒回了20多元，他买了3亩多地，日子就好过了。路寨佃户领袖钞进学，追倒租子达15石，地主“方二班”一时拿不出，就算给他6亩土地。这样，钞进学的经济状况很快好转了。

特别是在各阶层群众大发动之后，农民随着土地的增加，其生活得到了更显著的改善。据1944年底对滑县70个自然村佃雇贫农调查，其中大部分的成份都有明显上升。在1066户佃户中，原有赤贫156户，运动后仍为赤贫者只剩27户，升为贫农者106户，升为中农者23户；原有贫农809户，运动后仍为贫农者582户，升为中农者227户，还有少数上升为富农。在587户雇工中，原有赤贫129户，占23%，贫农449户，占77%；运动后仍为赤贫的只有42户。在449

户贫农中，仍为贫农者剩305户，升为中农者144户。佃、雇、贫的成份总的上升率高达40%。

(二)初步改变了土地高度集中在地主手里的历史现象。贫苦农民从祖祖辈辈痛苦经历中深知，土地高度集中在地主阶级手里是他们一直遭受残酷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的总根子。所以他们通过民主民生运动，倒出了可观的粮和钱之后，很自然地产生了置买土地的强烈要求。而地主一时付不了（或不愿意付）被佃雇倒去的和被罚的钱，加上他们之中有些人敏感地看到形势的发展对土地的大量拥有者极为不利，有可能吃更大的苦头，就乐意将被倒去、被罚的粮款折成土地抵卖给农民，或者直截了当地出卖土地。这就产生了历史上罕见的奇迹：土地开始从地主手里转向它的真正主人——农民，土地高度集中在地主手里的封建制度被打开了一个致命的缺口，从而导致其最终解体。

据当年年底滑县县委宣传部的调查，六区黄庄共有地主5户，人33口，占有土地789亩，占全村土地的20%。运动后剩下4户地主，28口人，占地431.4亩，只占全村土地的12%，土地占有量下降了45%。相反的，贫农从占有15.3%上升到18.3%。

(三)树立了贫雇农优势，初步建立了农村领导核心。农民群众为了夺取并保卫斗争果实，在运动中改选了村长并建立了很多群众组织，诸如农会、雇工会、青会、妇会、儿童团、姊妹团、民兵和合作社等等。这些组织从不同角度取代了农村旧政权，几千年被压在农村社会最低层的雇佃贫农开始走上政治舞台，并开始建立自己向往已久的新生活。人们亲切地称赞自己的解放区为“小延安”。一些受到群众冲击而态度有所转变的地主富农，也支持自己的儿女参加农会、青会、妇会，农村的阶级关系开始了新变化。

通过上述组织的活动和斗争，雇佃贫农逐步形成了领导核心，涌现出大批土生土长、为群众所拥戴的领袖人物。如七区雇工黄守义、王明月，三区路寨佃户钞进学等，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他们可以在一个片(组)、一个区指挥成千上万的群众。有理、有利、有

节地向地主进行顽强的斗争。这些领袖人物在斗争中日趋成熟和老练，后来分别走上了领导岗位，为我们党增加了与广大农民有血肉联系的本地干部。

（四）封建宗法观念和伦理道德受到了批判，农民政治思想发生了崭新的变化。运动开始时，相当一部分农民群众认为租地交租、借钱付息，老辈子都是如此，现在要倒粮倒息，总认为“不合法”，理不直，气不壮。通过说理、算帐的斗争实践，他们很快认清了地主阶级剥削劳动人民的反动本质，理直气壮地向地主们进行顽强的斗争。

而地主方面，原来对倒粮倒柴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法与群众对抗，甚至企图待机报复。群众大发动之后，在革命洪流的冲击下，深感大势已去，他们终于不得不承认群众的力量和新建立起来的革命秩序，从不服群众到想法接近、讨好群众，并且开始参加劳动。

农村政治思想上的剧烈变化和旧传统观念的被荡涤，使雇佃贫思想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他们开始以主人翁的姿态在农村出现。饱受封建压迫的广大妇女也以崭新的风貌积极参加斗争行列，开展反虐待斗争，反对娶小老婆，蓄童养媳，反对包办婚姻，要求男女平等，给女雇工增加工资，为妇女解放运动史写下了灿烂的一页。

五、滑县雇佃贫运动在边区的影响

滑县雇佃贫运动卓有成效的开展，很快引起了中共中央冀鲁豫（平原）分局和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注意。分局党委书记黄敬、民运部长张霖之等不断到滑县调查研究或听取情况汇报，帮助地、县委总结经验，共同研究、解决运动中出现的新问题。1944年10月，赵紫阳撰写了题为《滑县群众是如何发动起来的》文章，由《冀鲁豫日报》发表，后又由《平原》二期增刊铅印专辑，发至全区。《冀鲁豫日报》还相继刊登了滑县县委宣传部长连治洁的文章《滑县群众大发动前后的农村变化》、县委书记张华的文章《滑县如何从民主民生

运动转上了生产运动》，还在冀鲁豫分局的内部刊物《工作通讯》、《群运材料》上发表了纪登奎、梁伯琪介绍的《滑县七区高平十一村的查减运动》，张华的《滑县一年来发动群众的领导方法》等文章和谈话，使滑县创造的经验得到广泛介绍和推广。1944年冬，我军收复了濮阳全境，九地委（1944年5月冀鲁豫与冀南合并，冀鲁豫四地委改名九地委）便依据滑县经验，在那里成功地开展了民主民生斗争，仅用半年时间就完成了发动群众、树立农民群众在农村优势的任务。与此同时，鲁西南地区阳谷等县借鉴滑县经验，迅速打开了民主民生斗争的新局面。

1945年春，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邓小平到冀鲁豫分局巡视工作时，就听到了人们关于平原地区群众运动两种不同认识的议论，一种认为是成功的，一种则认为有偏向。邓小平为了掌握第一手材料，正确地总结本地区的群众运动经验和教训，用以进一步指导本地区的群众运动，遂指示冀鲁豫分局派遣一批机关干部到滑县、濮县、濮阳3县进行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并邀滑县县委书记张华、县长程建明作了专题汇报。从调查到酝酿到分局讨论，历时一月有半，随后于6月6日又召集了分局群众工作会议。会上，邓小平就冀鲁豫区的群众运动问题作了长篇讲话，首先指出这次运动是在中央正确路线下进行的，而且获得了很大成绩，抓住了当前运动的中心环节，解决了我们想解决而多年未能解决的一个中心问题。^③同时透辟地分析了运动中的弱点和偏向，并说明这些弱点和偏向都是在执行党的正确路线下所产生的偏向，有些是在大运动中不可避免的弱点。邓小平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滑县创造的经验，并严肃地批评那些学经学歪了的同志，指出他们对于先进地区（如滑县）的好经验没有真正接受，反而把有些不好的东西普遍采用起来。每斗必打成为风气，游街，戴高帽，摔红薯、鸡子，抹屎、拉尿，这样极易丧失社会同情，使顽固地主不能孤立，以致影响群众运动的充分发动。邓小平最后号召，各地应认真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务求减租减息的政策贯彻到底。^④

在冀鲁豫分局群众工作会议前后，冀南、鲁西南大片地区相继为我军光复，这些地区大都直接或间接地运用和借鉴滑县经验，发动群众进行了民主民生斗争，使滑县人民的创举在整个边区绽开了灿烂之花。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滑县创造的群运经验已不能完全适应新区，新区则开辟了通过反奸诉苦发动群众的新路子。但是，滑县经验的精髓——建立贫雇农领导核心，已深深植根于冀鲁豫解放区几乎所有的群众运动之中，对农村基层政权的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注释：

①张华、连治洁《滑县“群众大动”中的几个问题》，原载中共中央冀鲁豫分局民运部《工作通讯》第10期。

②③④1945年6月6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共冀鲁豫分局群众工作会议上的发言》。

（刘守森 整理）

忆抗战时期湖西地区的妇救会工作

季 凯

一、关于湖西地区妇联的组织情况

1939年，湖西地区称苏鲁豫边区，妇联也称苏鲁豫边区妇联。妇联主任是孔贞，副主任金彩凤，委员有李伟民、刘莹、庄云仙、郭仙云等同志。苏鲁豫区党委所辖的各县、区都有我们的妇女组织。我记得当时砀山县妇联主任是张淑贞，丰县妇联主任高潮（后是张佩贤），沛县妇联主任朱慕兰。单县叫妇女工作团，团长是蔡效慈，妇女干部还有刘波、韩志远同志。湖边地委妇联主任常俊亭，鲁西南地委妇联主任赵淑林。

1939年秋，骇人听闻的“肃托事件”发生了。我们湖西地区的妇女干部也未幸免。大部分妇女干部被集中起来，办了一个“妇女训练班”，在她们中间大搞“逼、供、信”，抓“托匪”。孔贞、金彩凤、郭仙云等几个同志被逮捕。在对他们审讯时，王须仁等人使用了极为野蛮的酷刑。在这次“肃托”中，常俊亭同志被杀害，孔贞、金彩凤二同志受到了党籍处分。又过了一段时间，孔贞、金彩凤离开了湖西地区。

“肃托”以后，湖西区党委的地盘缩小了，1940年11月苏鲁豫区党委改成湖西地委。地委为了加强对妇女工作的领导，成立了妇委会，由地委书记潘复生同志兼任妇委书记，委员有赵玉琴、苏健、张淑贞和我。这时地区妇联主任是赵玉琴，委员有戴洪慈、李伟民。1942年，为了体现统一战线关系，联合各界妇女抗日救国，地区妇联改称为“各界妇女救国联合会”。1941年5月，我从鱼台调到丰

县任妇联主任。大约是1942年的2月份，我和单县的妇联主任张淑贞调到地区妇联工作。这时地区妇联主任是赵玉琴，宣传委员是张淑贞，我任组织委员。由于赵玉琴同志长期生病，不能坚持工作，地委从丰县把高潮调来，主持地区妇联的工作。1944年，高潮同志调走，张淑贞调到单虞县任妇联主任，地委又从金乡把苏健调来任宣传委员，王子香同志去金乡接任妇联主任。这时地区没有妇联主任，我和苏健一个负责组织，一个负责宣传。1945年，我调到苏北办事处任妇联主任。时间不久，苏健同志去地委党校工作，地委又把我调回湖西地区妇联。这时地区妇联就我自己坚持工作，也没明确我主任职务。1946年，我就离开了湖西。

下面讲一下湖西地区缩小后的情况。1940年至1941年初，我在鱼台，先是在三区（三区以谷亭为中心），后任鱼台县妇委书记、妇女科长。当时，二区以罗屯为中心，妇联主任徐国祥；四区以常李寨为中心，妇联主任邵静如；五区的妇联主任是李钊；一区为敌占区，无妇女组织。1941年5月以后，我调到丰县任妇联主任。丰南有几个区属敌顽占区，无妇女组织。丰北有3个区，丰县的妇女委员是李侠、张庆民；顺里区妇联主任是孟素云，委员薛步光；三区妇联主任孙秀荣，委员有陈秀兰；四区妇联主任张正莲，委员王玉秋。单县有终兴、郭堂两个区，县妇联是徐国祥、郝莲芳负责。金乡有曹马、鲍楼两个区，县叫曹芳办事处，妇联由苏健、王子香同志负责。“肃托”后的湖西地区，实际上也就剩下这么几个区。

二、关于妇女工作的开展情况

（一）培训干部

从1938年开始，王文彬同志到丰县以后，就办起了“妇女训练班”。训练班设在丰县城里。参加受训的干部，我能记起名字的有王子香、傅玉梅、朱慕兰、徐国祥等同志。1939年苏鲁豫区党委成立以后，又办起了3期训练班。第1期是6至7月份；第2期是8月

份，我参加了这期学习，时间是两个星期；第2期结束接着又办起了第3期，这期训练班还没结束，湖西就开始了“肃托”。训练班为我党培养了一批精干的妇女干部。这些人毕业后，都分到了各县各区去做妇女工作。张淑贞分到碭山，高潮分到丰县，朱慕兰分到沛县，苏健分到金乡，徐国祥、孙大成和我分到单县。

（二）建立妇救会

苏鲁豫区党委建立后，所属的各县各区都已建立了妇救会。参加训练班的这批干部下去之后，就开始建立各村里的妇救会组织。他们积极工作，广泛宣传，动员妇女起来抗日，加入妇救会组织。广大妇女积极响应，妇救会建立非常快，哪里有我们的妇女干部，哪里就有妇救会组织。

我们妇救会的工作为什么能够这样迅速地开展起来？主要的原因是人民深受三座大山的压迫，特别是日本侵略军烧杀、奸淫、无恶不作，激起了人民的义愤。这时，日军大举进攻，国民党败退，逃之夭夭；汉奸、土匪趁火打劫。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民群众，一致要求抗日，消灭汉奸、土匪。正在这紧要关头，我八路军一一五师六八五团来到湖西地区，在丰北及单东的崔庄、汪楼等地一举把汉奸王歪鼻子的军队大部消灭，声威大震。人民群众喜气洋洋，称赞八路军是“天降神兵”。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提出把群众组织起来抗日救国，是符合群众心愿的，所以一呼百应，各级妇救会很快建立起来。

当然工作中也有些困难。当时群众的封建思想比较严重，特别是鲁西南地区就更加突出，什么“男女授受不亲，妇女大门不出，二门不到”呀，这些封建礼教、旧的传统观念，很难彻底摆脱。因此，我们在各村建妇救会的工作，开始阻力是比较大的，遇到不少困难。我们首先利用旧政权的村长，把妇女组织起来。开始是些老年妇女出来的多一点。不管组织起多少人，我们照样开会，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我们给群众讲抗日救国的道理、妇救会的作用等，

启发她们的觉悟，使她们懂得了，要赶走日本帝国主义，消灭汉奸卖国贼，妇女真正得解放，过上好日子，必须组织起来才行。这样，先是老年妇女参加了妇救会，以后她们的女儿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也纷纷出来了。于是我们就把这支很有生气的力量组织起来，成立了姊妹团。接着我们就充分发挥姊妹团的作用，把她们的嫂子动员出来，参加妇救会。当时我们还发动了“小媳妇”运动，搞得很热火，小媳妇们也都参加了妇救会。妇女们提高了觉悟，冲破了旧的传统观念，所以各村的妇救会组织像雨后春笋迅速建立起来，形势发展很快很好。不想，天有不测风云——湖西“肃托”开始了。

（三）妇女运动的方针

湖西“肃托事件”纯属暗害分子王须仁等人制造的冤案。它给湖西人民带来了灾难，致使敌人四面夹击，形势恶化，我们的工作处于最困难时期。可我们做妇女工作的同志，没有因为形势恶化而意志衰退，停止活动。我们利用现有的区、村妇救会组织，积极开展工作。

当时，我们妇女运动的方针是以抗日救国为中心，并进行反对封建意识、解放妇女的斗争，把民族斗争与解放斗争结合起来。中央号召：“只有民族解放，妇女才能解放；只有妇女解放，民族才能彻底解放。”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同志讲：“妇女解放是民族解放的标志。”可见，妇女解放和民族解放是密不可分的。为了把妇女从封建枷锁中解放出来，组织妇女搞好抗日救亡活动，我们提出：家庭和睦，尊老爱幼，尊老爱媳，搞好团结，搞好生产，多打粮食，支援抗日军；对那些虐待妇女的行为进行了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进行了斗争。这样，妇女们的社会地位逐步提高。湖西地区的广大妇女在抗日救国的斗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为党和人民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四) 妇女们的十大作用

1、救护伤病员。只要有战斗，就难免有伤亡。当时我们的条件比较差，根本没有什么医院，有了伤员怎么办？只能送到老乡家里，全靠妇女们护理。她们不怕脏，给伤员们缝补鞋袜、洗衣做饭等，为的是让他们早日痊愈，奔赴战场，消灭日军和汉奸。

2、送郎参军。在战争环境里，能支持丈夫参军打仗是很不简单的。家庭关系的好坏，也会直接影响参军工作，影响战士们的情绪。在这方面，妇救会发挥了很大作用。经过工作，广大妇女懂得支持丈夫参军打仗光荣、拉后腿可耻的道理，因而参军参战工作很快形成了高潮。

3、掩护干部。“肃托”后，湖西根据地剩下了很小的一块，我们党处于最困难时期。日本侵略军、汉奸经常“扫荡”我们的根据地，捕杀我们的干部。由于汉奸的指点，敌人往往晚上偷袭。有一次，我们在丰县范马庄被敌人包围，其他同志在老乡们的掩护下都脱了险，只有县公安局长王实同志因病重没有出来。我们的一位青年妇女就让他赶快睡在自己床上，扮成夫妻，殷勤照料。敌人盘问了一番，没看出什么破绽。就这样，这位青年妇女保住了王实同志的生命。有的老太太把我们的干部认作儿子、女儿、女婿等，掩护脱险。像这样的例子确实不胜枚举。

4、传送情报。妇女容易化装出入关卡，敌人不太注意，所以相比来说她们传送情报和收集情报比较及时、准确、安全。有时她们从城里取回情报，放在头发里，有的放在月经带里带出来，冒着生命危险与敌人周旋，保证情报安全。

在搞敌人的情报方面，我记得有这么一件事。丰县有个汉奸叫王狗，是一个无恶不作的家伙。他掌管一伙人，整天收集我们的情报，对我们危害较大。于是，丰县县委决定秘密处决他。为了搞清确实的情报，必须派人跟踪，县委书记吕英同志就派了李新华同志去完成这项任务。李新华同志是一位机智勇敢的女情报员。她首先

想法搞了一张“良民证”，扮成了一个卖丝线的妇女跟踪王狗，一连跟踪了几天，未被发现。有一天，王狗突然自己回家（他家在王堂），李新华同志马上报告了县委。县委马上集合了几个人，没费多少枪弹，就处决了王狗，除了一大害。

5、拥军拥政，支援抗战。妇女群众待我们党的干部如亲人，处处给予方便。在慰问伤病员方面，有的老大爷、老大娘将家里的鸡蛋留给伤病员们吃。为了使伤病员们早日康复，老大娘有时偷偷地把母鸡杀掉，煮鸡汤给他们吃，待伤员如亲人一样。我们的部队来了，她们赶快把自己的房子打扫得干干净净，让部队驻，同时还帮助战士们洗衣做饭。不过，我们在地方工作的妇女干部，到一个地方开展工作时，起初有些老乡不大敢接近我们，认为我们出来工作的都是些无管教的女孩子。后来经过主动接近，靠上去做宣传教育工作，群众觉悟了，对我们有所了解，逐渐建立了感情，就愿意和我们来往了。那时，我不太会做鞋子，都是他们帮我做。这双鞋子还未穿破，那双鞋子又给做好了。我们整天在一起说说笑笑，无话不谈，形同姊妹，亲如一家。我在鱼台工作时，有一次日军“扫荡”，直向我们扑来。群众发现后，首先想到的是我们，很快准备了船只，把我们送进湖里隐蔽起来。

6、监视敌人，协助锄奸。我们开展锄奸工作，打击的对象是汉奸、恶霸。群众早就恨透了他们，所以很快就发动起来了，妇女们也积极参加了这项斗争。她们心细，有互相串门的习惯，谁家来了可疑的人，她们很快就会知道，并很快报告我们。有的汉奸从敌占区来，装着走亲戚隐蔽下来，但却难以瞒过这些妇女的眼睛，很快就会被她们识破。这样就有力地配合了锄奸工作，因而，我们的锄奸工作搞得比较好。

7、参加运动，积极斗争。我们党广泛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实行合理负担，妇女们踊跃参加。谁家有多少地，收入情况如何，是她们最熟悉的情况。特别是“黑人黑户”更瞒不了她们。她们给我们提供了比较详细的情况，有力地配合了我党工作。

开展诉苦运动，启发群众的觉悟，斗地主、分田地、搞合理负担。妇女们受欺压比较重，所以成了诉苦、斗地主的主力军。那时，丰县国庄有一个大地主，以后又当了汉奸，在乡里横行霸道，肆意对妇女进行污辱。他规定，不管谁家新娶的媳妇，他都有“初夜权”，群众对他恨之入骨。我们就召开了群众大会，对他进行斗争。妇女们痛哭流涕地揭发他的罪恶，会上我们又宣布全部没收他的财产。这样一来，恶霸地主的威风扫地，局面很快打开了。

8、帮助我们做大量瓦解伪、顽军的工作。当时李仙洲的部队驻在这一带，士兵大部分驻在老乡家里。于是，妇女们就给他们拉家常，乘机作瓦解顽军的思想工作。如问他们：“为什么当兵卖命？想家吗？老婆孩子怎样生活？……”他们说：“我早就想家了，不想干了，可又有什么办法？跑不掉……”妇女们就表示关心地说：“想走我给你们帮忙。”于是，就把自己丈夫、儿子的衣服拿出来，让他们换上逃跑，有的还要掩护他们逃跑。这样士兵们偷偷串通，熟人老乡互相动员，因而李仙洲的士兵开小差的很多，战斗力非常差。

9、搞好生产，支援前线。敌人对湖西地区四面封锁，部队的吃、穿、用成了大问题，特别是布匹更进不来一点。这里的妇女有纺棉花织布的好传统，我们就动员妇女纺棉花织布，支援部队。当时大家编了一支纺棉花歌：“老大娘、大嫂纺花真正好，吃饭睡觉都忘了。纺车转得欢，一天能纺半斤线。织出布来送前线，我们个个真喜欢，真喜欢！”为了保证供应部队，我们办起了鞋袜厂。丰县有一个厂，有30多人，由妇联的干部闾成香、孟淑云同志负责。地区办了一个厂，有100多人，工人大部分是干部家属，由地区妇联的干部负责。这样一搞，我们和部队的穿衣、鞋袜的困难就基本上解决了。

10、发展党员。我们在搞好其他工作的同时，并注意了从妇女积极分子中发展党员，使之成为妇女运动的中坚力量。1940年我们在湖西搞了建党工作，在南阳庄、鲁堰两个地方发展了几个党员。

我们还在妇女干部中发展党员，如朱秀英、景全书二同志，就是发展入党的。

（五）关于宣传教育工作

我们能够最困难的时期坚持斗争，取得胜利，最主要的一条还是我们宣传教育工作开展得好。我们一方面以马列主义为指针，结合当前的形势宣传教育群众，一方面加强妇女干部自身的学习，坚定革命的信心。首先，我们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和《论统一战线》等方面的论著，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心，明确了抗战必须联合各阶层的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才能取得胜利。其次，我们学习关于妇女运动的任务，明确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压迫，争取妇女解放，争取民族解放就是当前的任务。再次，我们宣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情况，介绍了社会主义社会人民的幸福生活，真正明确了长期奋斗的目标，工作起来干劲更大了。我们在搞好自身学习的基础上，还给群众大讲抗战必胜的道理，大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如讲社会主义没有压迫，没有剥削，土地公有，集体生产，人人都过上好日子，老人有养老院，小孩有幼儿园，全国实现电气化，那就是“电灯电话，洋犁子洋耙，一个社会主义的新型国家”。我们讲得绘声绘色，群众眼都听直了，向往未来。接着我们又进一步动员：要过社会主义的新生活，目前，我们首要的任务是打日本，解放全中国；要解放，争自由，全靠我们自己的努力，靠千百万群众组织起来。这样一来，就坚定了群众抗战胜利的信心，使他们不怕困难，努力奋斗。

当时进行宣传的形式主要是开会。我们形成了严格的会议制度：地区妇联一个月集中开一次会，县妇联两个星期开一次会，农村妇救会一个星期开一次会。有时有任务安排，随时就开会。我们还利用多种多样的形式开展宣传活动，例如组织文艺宣传队、高跷队，在集镇、乡村进行演出活动。在金乡、单县、丰县都利用姊妹

团组织起了宣传队，她们唱歌、跳舞、演戏，对宣传群众、动员群众起了很好的作用。

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湖西地区的妇女运动在党的领导下不断蓬勃发展，为支援抗战、民族解放，为打败国民党反动派，建立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做出了贡献。妇女所发挥的巨大作用，绝不仅是以上提到的10个方面，我所谈的只是我所知道的点滴情况，当然不能包括妇女运动的全部功绩。但希望从此“窥豹一斑”，反映当时妇女运动的一个侧面，为书写湖西地区妇运史提供一些材料，这便是我的心愿。

忆抗战时期 湖西地区的青年运动

张世珠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年代的湖西地区，包括苏北的丰、沛、砀和山东的金、单、鱼、巨、成武等县，还有原河南虞城的一部分。1941年以前，称苏鲁豫区党委，属山东分局领导。“肃托事件”后，改为湖西地委，属冀鲁豫区党委领导。

抗日战争之前，领导我党青年运动的组织，称共产主义青年团。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为了更广泛地团结一切可以抗日的力量，改称抗日救国青年团。抗日战争期间，领导湖西青年工作时间较久的葛步海同志和我，都是苏北沛县人，我们都是1937年在沛县中学加入青年团的。和我们一起做青年工作的还有胡光耀（王光中）、张德超、陈文华、高兴甲、张含广（已牺牲）等同志。当时我党领导的抗日救国青年团，简称青救团。同时还有国民党领导的三民主义青年团，简称三青团。1939年国民党发动反共高潮以后，三青团也追随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在敌后和我们争夺青年一代。但国民党、三青团代表的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因此跟随他们跑的仅仅是上层阶级中极少数青年人（那时地主、资产阶级中的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也积极追随共产党，从事抗日救亡活动），而广大青年群众，尤其广大劳动人民中的青年人，是站在共产党和青救团一边的。因此抗日救国青年团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是党从事抗日救亡活动的主要助手，是活跃在敌后的一支重要的先锋力量。

湖西地区领导青年运动的负责同志几易其人。在“肃托事件”之前，是孙衷文同志，他是苏鲁豫区党委的青年委员。“肃托事件”之后是刘剑同志，同时在湖西青联做领导工作的还有孟广彬、张德超同志（也是沛县人，我的同学）。刘剑同志之后是高诚同志。1941年之后由葛步海同志领导湖西青联的工作，同时还有王玉书同志任组织部长。但党内有一个青年工作委员会，青委书记是当时的组织部副部长陈璞如同志（原名霍国栋）。1940年以前，我在沛县青年团工作。1940年“六一三事件”后，我调任金乡县青年团主任。1942年春，我到山东分局参加山东省第二次青年代表大会回来后，到湖西青联做领导工作。开始当宣传部长，葛步海同志调任湖西地区联合会主任后，我任青联主任。中间在1943年，我到单县担任了一年县联合会主任，又回湖西青联工作，直到抗日战争结束。解放战争打响后第二年即1947年，地委先派我到单虞县委任民运部长，后调碭山县任县长兼大队长，直到南下。这样，从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开始做青年工作起，到1947年离开青年工作岗位，前后共11年，其中在湖西青联做领导工作约7年的时间。

关于去山东分局参加山东省青年代表大会的情况：1941年秋，山东省青联决定召开第二次全省青年代表大会。湖西地委决定，派当时地区青联负责人高诚同志和我，还有马玉伦同志3人前往山东分局参加这次代表大会。另外还有一名代表叫赵瑶烈，他是军队系统的，战斗英雄，当时他已在山东分局学习。我和高、马二同志在1941年9月底从单东出发，在秘密交通员引导下，穿过沛县敌、顽占区，越过微山湖，登上微山。当时微山岛上驻着我们湖上游击队的一部分队伍。我们在那里住了几天，又在他们派人护送下，越过津浦路，进入鲁南根据地的峰南县，在那里过的中秋节。然后越过苍马山、沂水和沐水而进入滨海地区的临沭、莒县一带。过了鲁南山区，交通员就没有再送我们了，是我们三人自己行走。滨海地区大部分是解放区，多数是白天行走。从滨海又折回头向西走，进入鲁中地区，大概是在青驼寺、垛庄一带找到了山东分局。当时山东

分局的负责人是朱瑞、罗荣桓，还有保卫部长刘居英、组织部长李林等。战工会（战时工作委员会，相当于省政府）主任是黎玉，教育部长孙陶林。当时山东省青联的主任是杨涤生，副主任刘导生，宣传部长陈放（陈琳瑚）。

我们到山东分局后不久，就遇上日军对鲁中沂蒙山区大“扫荡”，因此青年代表大会当年冬天没召开。开始，我们随着山东分局在鲁中一带打游击，曾经在孟良崮、新泰、莱芜一带打过几仗。后来敌情越来越严重，分局就把我们青年代表组成一个游击队，由省青联宣传部长陈放、战工会教育部长孙陶林等带领，到沂水县南部、费县北部的蒙山山区打游击。在军事上由湖西青年代表、战斗英雄赵瑶烈同志担任队长，领导我们在西蒙山一带和敌人周旋。西蒙山长满了苍松翠柏，有稠密的树林覆盖着，打游击很方便。我们在这里渡过了整整一个冬天。开始有村子驻，后来敌人实行“三光”政策，老百姓的房子都被烧光了，我们就驻在山洞里。没有棉衣穿，吃的也很困难，有时完全靠吃野菜过日子，白天还要打仗，生活很艰苦，但同志们的战斗情绪非常饱满，再苦也没有谁发过一句怨言。中间我们曾经有一次到东蒙山去寻找山东分局机关，找到了，但当天就遇上了沂蒙山大“合围”。分局转移，我们又冲出重围，跑回西蒙山继续打游击。直到冬天过去，春天到来了，我们才奉命返回鲁中山区，找到山东分局，在鲁中的青驼寺参加了山东省第二次青年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总结了前一段的工作，布置了下一段的战斗任务，并选举了山东省青联的领导机构。

全省青代会结束后，我们便随着当时湖西地区负责人张国华同志的部队（他当时在山东分局开会，带着一个连返回湖西）一起回湖西，由鲁中越过津浦线，直奔微山岛，再回到湖西根据地。在战争时期，开一次代表会很不容易。我们这次开会，前后历时半年之久，来回行程近2000里，但我们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平平安安地都回来了。回到湖西的单东根据地之后，地委负责人潘复生、郝中士、陈璞如等同志，请我们饱饱地吃了一顿饭，算是欢迎我们胜利

归来的大会餐。

抗日战争时期的青年运动，主要任务是发动广大青年群众积极投入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洪流；其次是动员青年积极从事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民主建设事业。从具体工作来说，是随着党委的中心工作而转移的。大体上有这样几个方面：

一、发动青年抗日救国

当时在抗日根据地的群众团体，有抗日救国青年团、农民救国会、职工会、妇女救国会。1942年以前，各群众团体直接由党委领导，党内设民运部。1942年以后，为了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由工、农、青、妇、文（文化协会）各群众团体联合组成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抗联），由党内的民运部长兼任联合会主任。各群众团体在联合会统一领导下，仍是独立的群众团体。从地区到县、区、乡、村各级都有群众团体的组织机构和专职干部，乡以下的干部基本上是不脱产的。

要组织青年团体，首先就要向广大青年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然后才能逐步建立青年组织。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环境非常复杂，有敌伪、顽（国民党顽固派）、我3个方面的势力，这3种力量常常犬牙交错，互相拉锯。日军、汉奸和国民党顽固派，把各群众团体的干部视为“土八路”，恨之入骨，抓住他们也和对待八路军一样，是要杀头的，所以当时青年参加群众团体，并不是毫无顾虑。团的干部大多数时间是分散在农村，和群众生活在一起，利用白天生产和夜晚休息的时间，向广大青年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鼓舞他们的抗日热情，组织他们参加各种抗日救国的活动。宣传、组织的形式有：召开群众大会、小型座谈会，办读书班、识字班等。

二、动员青年参军参战

在敌后抗日根据地，中心工作就是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一切工作都要围绕着战争，为战争服务。青年工作也不例外。在某种意

义上说，青年是抗日部队的主要组成力量，青年团在这方面的任务更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差不多每年的冬天要有一次动员参军的任务，这时工、农、青、妇各种群众团体都围绕这一中心工作进行活动。青年参加八路军的热情是高的，但是群众中也有各种各样的顾虑，如老人怕儿子参军后影响生产，怕打仗牺牲，青年妇女怕丈夫远离有危险，因而扯后腿，等等。这时就要在群众中进行耐心细致的爱国主义教育，进行忆苦思甜，保卫祖国，参军光荣等思想教育，鼓励青年踊跃报名参军，教育家人不扯后腿，最后召开热烈而盛大的欢送青年参军的大会。差不多每年都出现一些父母教子参军、妻子送郎参军等生动范例。湖西地区共有300多万人口，青年约占1/4，即80多万。而湖西地区抗日的部队，经常保持在正规军1个旅（3个团）、地方部队每县1个大队，共约5000人左右的水平。由于战争的需要，这些部队每年都要有一部分“升级”到大部队中去，加上战争的伤亡，每年都要动员青年参军，以补充部队之不足。十几年的战争环境，全地区到底动员了多少青年参加抗日部队，已记不清楚。我想，抗日战争加上解放战争共10多年，全地区积极投入部队、为祖国而浴血奋战的青年不会下于数万人。这是我们应该永远纪念的。青年团在其中做了相当大量的工作，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仅仅靠正规部队是远远不够的，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便是分散在广大农村的民兵。当然民兵不光是青年人，但大多数是青年。他们在平时维持地方上的社会治安，镇压地主、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给大部队送情报，有时也与小规模出动的敌人作战。在反“扫荡”战争或大的战役中，作为主力部队的助手，侧翼作战，是一支重要的力量。在当时的敌后战争环境里，无所谓前方和后方，地方干部和部队干部也只是分工的不同，大家都要一样拿起枪来，随时准备作战。不过地方干部穿的是便衣，多数用短枪，便于和群众在一起生活和战斗。我们青年团的干部，差不多每人都有一支短枪。我这里就有一张照片，是1942年我们湖西青

联的葛步海、我、马玉伦、张德超和武委会的干部吴瑛同志，在单县的王小庄合照的。在这张照片上，我们都突出地把自己的盒子枪放在胸前，说明我们青年团的干部随时准备为祖国而战斗。当时根据地有一句谚语：“抗日三大宝，钢笔、手枪、表。”其实当时有表的干部很少，只是团以上的军事干部，才由上级配发一只战争中缴获敌人的旧表。但是钢笔和手枪几乎是人人都有的。这两件宝，一文一武，一个打仗用，一个做工作笔记。

由于湖西处于山东的西南边缘地区，斗争的最前线，所以敌、顽、我三角斗争比较激烈，战斗频繁，因此民兵的战斗力也比较强。例如山东单县的吴溜、蔡堂、大张寨、韩溜、王小庄、高楼、终兴集、八大庄，金乡的鲍楼、大冯庄、张湾以及巨野南部的大田集等地的民兵，我都比较熟悉，指挥过他们的对敌斗争，确实是一支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人民武装。平时他们都分散在生产岗位上，有了情况，一声令下，马上可以集合一个连、两个连，甚至更多的民兵。记得1942年我在单县的大张寨蹲点时，砀山县的伪军突然北犯根据地。在没有主力部队作战的情况下，我们马上集中了大张寨、韩溜一带的民兵约两个连队，我和当地区委的干部侯采苓、徐瑞林等同志一起指挥，分两路迎击敌人，很快粉碎了敌人的进攻，保卫了根据地的安全和群众的利益。

在犬牙交错的敌后抗日战争中，民兵始终是保卫解放区的重要力量，而青年是民兵队伍的骨干和中坚。

三、组织青年投入双减、反霸

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在抗日根据地实行的经济政策，不是没收地主、富农的土地，而是实行二五减租，分半减息，对雇工和手工业者（当时根据地很少有资本家开设的大工厂，而多半是一些小规模的手工作坊）适当增加工资的政策。这种减租、减息、增加工资和反霸的群众运动，对发动广大群众站在共产党、人民政府一边，提高人民的阶级觉悟，调动人民的抗日积极性，有着重大的作用。

因此，当时在根据地，除了打仗、反“扫荡”、支援战争的任务外，一年到头，中心的任务就是搞群众运动，并且在群众运动中培养大量的积极分子，进行建党建政，同时逐步加强工、农、青、妇等各种群众组织的自身建设。这些群众运动，都是由各级党委统一领导的，而青年团是这一群众运动中积极、活跃的先锋力量。

1947年夏，我调任砀山县县长兼县大队长，开始脱离青年工作的岗位而从事党、政府和军队的工作，直到淮海战役后渡江南下。

鲁西北和冀鲁边“民先”

总队部始末

徐少岩 张汝琦 许法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下同），是1936年2月在北平成立的。它是继共产主义青年团（C·Y）之后，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主要是在知识界和青年学生中建立的一个最靠近党的外围群众组织。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平陷入残酷的白色恐怖之中。在此情况下，除一部分共产党员、“民先”队员转入地下外，大部分学生离开北平。平津“民先”队员有计划地向全国疏散，开展更加广泛深入的抗日救亡运动。当时投奔的方向，主要是延安、济南、太原、武汉等地。很大一批学生到了济南。“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由天津乘轮南下上海的海运中断，大批学生在山东烟台、虎头崖一带登陆转道济南。“民先”总队部负责人李昌来济南，传达了北方局关于建立“民先”山东省队部的决定，由孙陶林任队长。

“民先”山东省队部成立后，成立了“平津流亡学生会”，负责接送和动员组织平津流亡学生参加抗日工作，平津各学校的“民先”队员指定专人登记。这时，平津流亡学生会驻在城里院西大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简称“一师”）和省立高级中学校（简称“济南高中”）两个地方。凡持有平津流亡学生会卡片的都可以就餐、住宿。

8月下旬，平津流亡学生会在一师院里开大会，提出“保卫山东，保卫华北，收复平津”的口号。共产党员、“民先”队员根据党组织就地参加抗战的指示，有的去石友三部队，有的去于学忠部

队，不少学生参加了韩复榘办的第三路军政治人员训练班（简称“政训班”）。政训班是我党通过统一战线工作成立的，党中央先后派张经武、张友渔等和韩复榘谈判，而后在第三路军建立政训处和政训班，实际上是在我们党领导下的。张友渔、黄松龄、张郁光、许德瑗、齐燕铭、陈北鸥等北平著名教育界人士都参加工作或授课。山东省委还组织一批党员、“民先”队员、平津流亡学生、进步青年参加战地服务团、巡回宣传队、移动剧团工作，分赴第五战区和李宗仁所属各部及东北军、西北军中去推动抗日。

9月间，政训班先后分派学员到胶东、惠民、鲁南各地工作。10月，分派240名学员（其中有共产党员、“民先”队员）分3批到鲁西北聊城一带工作。徐少岩在政训班不到一个月的光景，山东省委派夏秋水去和徐接上党的关系，并介绍共产党员李育仁、高恒书（高衡）和另一人去和徐编为一个党小组，李育仁为组长。10月中旬，夏秋水通知他们到聊城工作。到达聊城后，适逢专员范筑先奉命撤退黄河南，政训处长兼代理聊城县长张维翰和42个来聊城的政训班学员坚持留下守城。齐子修乘机进城抢劫，有28名学员（均系共产党员和“民先”队员）坚持在聊城抗战，被誉为“二十八宿”。这一壮举深深感动了范筑先，深受范筑先及其僚属敬佩，对范筑先班师回聊城抗战也是一个推动。

11月，鲁西北各县（当时第六专区辖12县）相继建立第六专区保安司令部政训处、办事处，有些县的县长是共产党员担任。遂即在这些县的政训处内，尔后在政训处举办的各种训练班、群众组织中发展“民先”队员。当时“民先”尚未公开组织，队员是秘密发展的，有的地方是单线联系，队员之间不发生横的联系，组织纪律也是严密的，实际上是党的化身。鲁西北“民先”的工作由刁子言（即邵子言）、成润、徐少岩负责。同时，中共山东省委为加强鲁西北的工作和对范筑先的统战工作，特派组织部长张霖之为省委代表常驻聊城，并重新建立鲁西北特委。当时特委以政训处为公开办事机关，特委组织了一个编辑室，由徐少岩、黄白莹负责，后来又

增加了李育仁，主要任务是印刷党的重要文件，发给各县党组织。曾印过毛泽东《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反对自由主义》等。在编辑室里用“民先”名义出刊发行了《先锋》。张霖之直接领导编辑室（也叫编辑部）。

1937年底或1938年初，张霖之找徐少岩和张承先谈话，其主要内容：“民先”是党的外围组织，党组织尚未公开，要很好地发挥“民先”的组织作用和骨干作用。因此决定成立鲁西北“民先”总队部，各县成立分队部。由于抗战形势的发展，青年特别是知识青年积极要求参加抗战。鲁西北特委交给“民先”一个任务，即广泛地团结和吸收青年参加抗战，凡愿意和要求去延安学习的，由“民先”负责输送。第一次输送了100多人，由总队部秘书郝士杰带队到南官，随八路军一二九师经山西去延安。还有一二十人、十几人等零星送去延安的。辛明带领济南乡村师范一批学生到鲁西南，张霖之派徐少岩把他们接到聊城，其中有一些“民先”队员，随后即转送南官一二九师。这批学生在部队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政治部主任刘志坚和参谋长文建武对徐少岩说，今后希望你们多送一些这样的青年到八路军里来，提高部队的政治文化素质，增强战斗力。这时，“民先”总队部派秘书高恒书去南官深入到八路军的连队了解练兵、学习和战士生活等情况，写出访问记刊登在聊城《抗战日报》上，使广大青年了解八路军，号召青年参加八路军，壮大抗日队伍，坚持敌后抗战。

1938年5月，第六专区保安司令部政训处在聊城召开全区扩大的政治工作会议。会后，政训处改为政治部。与此同时，召开了鲁西北“民先”代表会议，正式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鲁西北总队部，选举徐少岩为总队长，熊义吾（兼武装部长）、李铨为副总队长，高恒书、张毅（张汝琦）先后任秘书，组织部长为吴鸿渐（吴宏剑），宣传部长先后为黄白莹、许法。5月以后，各地“民先”根据情况逐渐公开。总队部首先把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鲁西北总队部的牌匾挂在驻地的大门口，每次群众集会，“民先”总队部的旗帜

高高飘扬在会场上。各县、各支队（当时，经范筑先收编和统辖的部队有35个支队和3路，其中有些是土匪武装收编过来的）、各学校、各群众团体内部建立了“民先”。1938年初夏，鲁西北特委和政训处为了团结鲁西北各地妇女抗战，决定派出共产党员、“民先”队员组织妇女战地服务团，金维任团长，张扬任政治指导员，有五六十名团员。她们经常在莘县、阳谷、长清、范县、濮县进行战地服务工作，向群众进行抗日宣传工作和救护伤病员工作。

1938年7月，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来鲁西北，首先到了东阿县。东阿县“民先”队打着“民先”的大旗，一方面表示欢迎沈鸿烈来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另一方面迫使他承认“民先”是抗日群众团体，要求他发枪、发经费。沈鸿烈到鲁西北来大举破坏抗日救亡运动，阻挠、破坏“民先”的活动，叫喊解散“民先”组织。鲁西北“民先”总队部与之进行了坚决斗争。在聊城的群众集会上，徐少岩常出面讲话，对沈鸿烈的荒谬言论予以针锋相对的痛斥，并发表了《告鲁西北各界同胞书》。范筑先大力支持“民先”的行动，鲁西北“民先”总队部聘请范筑先为顾问。沈鸿烈不得已也假惺惺地承认“民先”是一个合法的青年抗日团体。“民先”在鲁西北十分活跃地发展起来。范筑先还曾派徐少岩去南宫向一二九师副师长徐向前请教如何巩固部队的问题。范筑先要了解八路军为何在游击战争中能“化整为零，化零为整”，为何能把部队分散活动，又能很快地集中起来。他要徐少岩在南宫设立办事处，给了徐100元银洋作为路费和活动费，还给了徐一份电报密码，嘱咐徐有要事即发电报给他。徐少岩向张霖之汇报后，张写信给南宫的李菁玉介绍徐少岩前往。徐到南宫后，徐向前、宋任穷、陈再道、刘志坚接见了。徐少岩说，范筑先要他来八路军取经，了解八路军如何巩固部队的，有什么好办法。大家听了以后都哈哈大笑。宋任穷幽默地说，有什么灵丹妙药？！我们八路军连队里都有一个共产党的支部，所以打不散。你（指徐少岩）问他要不要共产党的支部？我们送给他共产党的支部。刘志坚接着说，你告诉他，部队里要发展

“民先”，这些青年是爱国的，不怕死的；还要告诉他，要拆城墙。敌人打来了，我们不死守城。现在我们八路军都驻在城外农村，日军来了，我们在农村和敌人打游击，坚持平原游击战争。徐少岩把拆城墙及开展平原游击战的意见电告范筑先。

鲁西北各地、各级“民先”组织的主要工作是：（1）发展和管理“民先”组织。发展队员在开始时需有1至2个介绍人，在“民先”公开后，由于形势的发展和广大青年的要求，改为不论男女，不分阶级成份，均可参加。凡自愿参加者，到“民先”队部报名登记即可为队员。这样，把党的外围组织变得更加群众化，“民先”有了更大的发展。参加“民先”要举行宣誓、填表等手续，入队后有严格的组织生活和纪律，特别在未公开前是如此；并从“民先”队员中发展党员。（2）宣传和动员组织群众抗战。“民先”队员通过各自的工作岗位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利用各种宣传、文化形式进行宣传、动员工作。总队部出版了两种刊物：《抗日先锋》（半月刊）和《一周间》（周刊），由黄白莹、李育仁负责编印出版。通过编印的刊物和材料进行群众宣传和加强队员的教育工作。（3）开办训练班培训骨干。各县、各支队的“民先”队部经常开办各种形式的训练班，培养骨干和积极分子。另外，先后派出几批队员赴延安、太行山、冀南学习。（4）广泛开展群众工作，组织队员对各阶层群众进行工作，开展统一战线活动。团结广大青年和各阶层人士积极参加战争动员工作和战地服务活动，主要是动员有钱出钱，有人出人，有枪出枪，有力出力，地无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全民动员，实行全面抗战。在聊城召开的纪念大会、祝捷大会和其他群众集会上，鲁西北“民先”总队部的巨大横幅飘扬在会场上，“民先”的代表在每次集会上都登台讲话。这些都显示出“民先”是一支生动活泼的青年抗日骨干力量，表达出先进抗日青年的意愿和心声。

鲁西北“民先”总队部是会合了第四专区一批“民先”队员组成的。1937年9月15日，第三路军政训处从政训班里抽调一批学员赴

临清的第四专区工作，每县20至25人不等。许德瑗被委任为第四专区保安司令部政训处处长，政训大队总干事为王玉林（即王同），党的负责人为魏震。政训大队内有共产党员、“民先”队员杨士法、黑伯里、王乐亭、王哲等。同时，派周子明（即周自睿）、李铨（均为共产党员）等到恩县工作。他们于“九一八”6周年纪念日那天从济南出发，计有禹城、恩县、平原、高唐、清平、夏津、武城、德州、临清、邱县、馆陶等十几个县的政训处服务员200多人。周子明、李铨、杨丕诚、舒天巩、张书阁、张叔诚、解树魁、方象岭等25人分派去恩县政训处。不久，日军占领德州，又进占恩县东北20里的四女寺镇。国民党军队和专、县政府南撤。第四专区和各县政训处亦随之南撤。周子明、李铨等到了齐河找到许德瑗后，又转回聊城。范筑先委任周子明为高唐县县长。其他干部（包括第四专区政训处的部分干部，其中有共产党员和“民先”队员）由第六专区政训处分配工作。李铨是北平大学法商学院的学生，七七事变后到济南，党组织分派他负责登记法商学院的“民先”队员，他随周子明赴高唐任县政府秘书。

聊城原来已建立过“民先”组织。1936年冬，聊城师范学生姜作军、耿伟、邵汝群（原名邵玉琢）曾在该校建立“民先”组织。七七事变后，聊城师范奉命南撤，“民先”队员分赴各地，“民先”组织随之消失。因此，鲁西北的“民先”组织主要是由平津流亡学生中的“民先”队员经过第三路军政训处派到鲁西北后组建的，并会合了一部分派到第四专区又转到聊城来的队员。

在鲁西北“民先”总队部诞生后不到半年时间，冀鲁边“民先”总队部也宣告成立。1938年1月和4月，八路军一二九师先后派出东进纵队和骑兵团进入冀南，协同地方党组织领导人民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创建冀南抗日根据地。1938年3月，以南宫为中心的冀鲁豫边区省委建立，鲁西北党的工作划归该省委领导。同年6月14日，第六专区专员范筑先在南宫会见了一二九师副师长徐向前、政治部主任刘志坚。7月6日，第十八集团军总部命令鲁西北军事斗争归

一二九师领导。9月22日，范筑先参加了在南宫召开的冀鲁两省军政联席会议，确定了冀南与鲁西北加强协作、联防对敌的方案。因此，冀南和鲁西北的关系更加密切起来了。为了进一步加强“民先”的组织领导，决定成立冀鲁边区“民先”总队部。

1938年10月2日，冀鲁边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在南宫成立。徐少岩任总队长，崔克为副总队长兼组织部长，宣传部长丁哲民，妇女部长暂缺，干部王贞元、夏杨军，秘书张扬，还有北方局代表朱瑞派来的3人协助工作。先是在冀鲁两省军政联席会议上，徐少岩代表“民先”和各群众团体提出组织各种形式的抗日群众团体，武装1万青年，组织青年先锋师、军抗日，并向参加冀鲁两省军政联席会议的河北、山东省政府主席鹿钟麟、沈鸿烈提出发给枪支、弹药、经费等要求。接着冀鲁边区“民先”总队部召开成立大会，邀请冀鲁豫边区省委代表李菁玉、冀南行政主任公署主任杨秀峰、第六专区专员范筑先、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沈派代表出席）参加并讲了话。

成立大会后，又召开了代表会议，讨论通过了章程、成立宣言和告各界人士书。根据冀鲁豫边区省委指示，决定并号召成立“民先”师。河北省巨鹿县首先响应，会后迅速组织了一个青年营。冀鲁边区“民先”总队部立即号召各县学习巨鹿成立青年营的经验，建立与扩大青年武装。

1938年11月15日，日军侵占聊城，范筑先壮烈殉国。鲁西北“民先”总队部随第六区政治部转移到冠县境内继续工作。徐少岩调离后，李铨任总队长，张毅任副总队长。“民先”总队部在冠县城内开办了一期队员训练班，约四五十人。训练班结束后，根据形势的需要，由李铨、张毅、吴鸿渐、许法等共同起草并散发了以鲁西北“民先”总队部名义发表的《告鲁西北各界民众书》，揭发顽固派王金祥勾结日伪汉奸，出卖范筑先，临阵脱逃，断送聊城于敌手的罪行，号召各界同胞团结起来，坚持抗战，对王金祥等开展坚决斗争。

“民先”为全国、冀鲁边区、鲁西北的抗日救亡运动作出了贡献，但是国民党顽固派却害怕全国人民起来抗战，于1938年8月下令解散“民先”组织。11月，在中共中央领导下，西北青年救国会在延安召开了全国青年代表大会。代表们一致同意中央关于采用各种组织形式团结广大青年的指示，“民先”至此已光荣地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任务。1938年冬，青代会闭幕，冀鲁边区“民先”代表辛明返回南宫，传达了冯文彬在全国青代会上的报告《青年运动的方向》和会议情况。

针对当时日军不断“扫荡”，我军在广大农村开展游击战争，环境更加艰苦的具体情况，根据边区省委指示，各级党委成立青委，各支部设青年委员，各地成立青年救国会，成立半脱产的青年抗日先锋队（青抗先），团结广大青年开展抗日救亡运动。这些措施，更广泛地吸收和组织了爱国青年参加到抗战的行列里来。河北省的枣强、武邑、衡水、南宫、清河、冀县、晋县、束鹿、藁城、赵县、栾城等许多县都建立了青委、青救会、青抗先。冀南、鲁西北“民先”组织遂为青救会、青抗先等所代替，鲁西北“民先”总队部亦于1939年2月结束。

（此稿是根据徐少岩、张汝琦、许法等的座谈回忆，由许法执笔整理而成，后又参考了李铨、吴银居、吕保明等的文章进行了补充修改。）

一九八五年五月二十六日

一九三八年至一九三九年 直南地区“民先”组织概况

安法乾 李靖轩

直南地区的“民先”组织是在1938年开始建立的。这年春天，在中共清（丰）南（乐）边东县委于清丰六塔集开办的抗日军政干部训练班上，清丰县率先发展了“民先”的组织。当时，我们要发展党的组织，建立抗日武装或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救国会，都面临着缺乏干部的问题。因此，在边东县委建立后，第一项工作就是吸收知识分子在六塔集举办抗日军政干部训练班。办训练班的直接目的就是为建立民众联合抗日自卫团培养政治工作干部，为地方抗日救国会培养骨干。但是，要把受训的这些知识分子和小学教员都组织起来，总得有个组织形式。把他们都发展成党员不一定完全够条件，于是就把个别够条件的吸收为党员，而把大部分积极分子发展为“民先”队员。当时党的组织，上有县委，下有支部，后来又有区委，而“民先”则没有单独的领导机构，都是由各级党委来领导的。直南特委（当时在清丰梁村）指示“民先”工作由边东县委来抓。到六塔集训练班后期，特委还经常把冀南区党委下发的关于“民先”的文件和党的文件一起转给我们。我认为，“民先”是抗日的青年积极分子组成的党的外围组织，是党的后备力量。“民先”队员在训练班上学习抗日理论、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以及群众工作和游击战术等军事知识，初步树立了抗战的信心和决心。训练班结束后，年轻的、表现较好的都被派到民众联合抗日自卫团当了骨干；大部分则回到各村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救国会。特别是一些小学教员，他们在农村有威信，再把学生组织起来，采用灵活多样

的形式宣传抗日，很快就把群众发动起来了。

在清丰成立民众联合抗日自卫团和办军政干部训练班的同时，归边东县委领导的南乐东部，在县委委员郭献瑞主持下，也办了军政干部训练班，同时也发展了“民先”。因此清丰和南乐县的“民先”，几乎是同时建立的。

4月间，特委宣传部长郭超从梁村到六塔集传达特委指示，成立了冀鲁豫边区抗日救国会，总会和“民先”的工作都由我（安法乾）负责。同时，因日军已撤出清丰、南乐，特委便撤销了边西、边东县委，恢复了南乐、清丰县委。原边东县委书记晁哲甫已调特委任统战部长，安法乾任清丰县委书记，郭献瑞任南乐县委书记。我们县委机关和总会机关都由六塔集搬到清丰县城里，接着在简师院内又办了两期抗日军政干部训练班，基本上把全县小学教员、高小以上的学生普训了一遍，在学员中又发展了一些党员和大批“民先”队员。在这同时，因统战关系被派到丁树本部队做政治工作的罗士高、张伟等同志，在丁的部队里，也通过训练班的形式发展了一些党员和“民先”队员，这些“民先”队员直接归政治部领导。

总之，在这段时间里，清丰、南乐一带在党的领导下，经过广泛深入的宣传活动，群众的政治觉悟大大提高，抗日救亡的热情相当高涨，各区、村先后都建立了抗日救国会和农教会、青教会、妇教会以及自卫队、儿童团等，迅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这种大好形势的到来，“民先”队员们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1938年8月以后，安法乾担任了直南特委民运部长，主要负责冀鲁豫边区抗日救国总会的工作，“民先”也归我负责。这时，根据特委的决定，总会机关由清丰搬到濮阳，又由总会开办了两期抗日军政干部训练班，训练了几百人，发展了一些党员和“民先”队员。除留下少数人充实到总会机关外，总会还组成几个工作队，分别派到濮阳县各区去开展救国会的工作。其余大部分作为骨干分配到各区、村，发动群众，组织各地方的抗日救国会。

到1938年11月份，清丰、南乐、濮阳一带的“民先”组织有了

很大的发展，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机构来领导这部分力量。另一方面，当时我们同丁树本搞统一战线，是有联合有斗争的。同丁树本作斗争，我们多一个组织就多一个席位，多一份力量。基于这些考虑，特委同意我们成立“冀南民先分队部”。为什么叫这个名称？因为直南特委归冀南区党委领导，冀南有个“冀南民先区队部”，我们也就叫“冀南民先分队部”。成立分队部的筹备工作由直南特委领导，参加筹备工作的有安法乾、罗士高、梁伯琪、刘衍周、李靖轩、郭紫光等人。特委并派李靖轩与丁树本谈判了五六次，征得了他的同意，并邀他参加成立大会指导和讲话。当时他答应前去参加会议。谈判期间，适值日军轰炸濮阳，投弹千枚，但谈判没有中断。为免除丁树本多疑，说我们的“民先”分队部和总会是一回事，都是那几个人，特委就另派宣传干事梁伯琪（丁树本不认识梁）以冀南“民先”分队长的身分穿着军衣，骑着马去参加了分队部成立大会。大会是在濮阳城内东北角空地上召开的，声势很大，就地搭了台子，大街小巷贴了标语，与会群众上千人。各县“民先”负责人、各界代表参加了大会，同时邀请国民党地方政府各部门代表出席并讲了话，共收到贺幛10多幅，丁树本派秘书送来一幛由他具名的大幅贺幛。大会由梁伯琪宣布“民先”分队部正式成立，安法乾代表总会讲了话，有关人士也讲了话。实际上梁伯琪并没有留在“民先”分队部工作，开完会她就回特委了。分队的工作由副队长李成安（李靖轩）主持。“民先”分队部的牌子挂在冀鲁豫抗日救国会的对过，与总会的人员在一起办公。

队部成立后，很快发展了一批队员。队员的条件不分职业、性别，只要本人历史清白，积极参加抗日救国活动，且愿意参加“民先”组织，有队员1人介绍即可以成为正式队员，并参加其组织活动；由抗日团体推荐入队也可以。后来，在丁树本司令部也发展30余人，成立了分队部；在濮阳东关天主堂医院发展了几人，建立了基层组织；南乐、清丰建立了县队部。队员们在宣传抗日、动员参军参战、组织抗日救国会等各项工作中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

1939年春，丁树本到洛阳参加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召开的反共会议后，政治态度急剧变坏。他抛弃了自己承认过的“抗战到底、统一战线、军民合作”三大主张，推行“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政府、一个领袖”的反动纲领，按照蒋介石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实行“限共溶共”的反动政策，千方百计地对共产党进行限制、排斥和打击。首先他改组了政治部，解除了共产党员罗士高、晁哲甫的政治部正、副主任职务。接着，在部队成立了国民党特别党部，开办军政人员训练班，强迫部队内的“民先”队员自首，集体加入国民党。这时候（大概是1939年的5、6月份），正值冀南区党委组织部长于光汉来濮阳检查工作，住在八路军办事处。我找到于部长，问我们在丁树本部队的党员和“民先”队员怎么办？于部长指示，个别已公开的党员撤出来，没有暴露的继续留在丁的部队里。我们根据这个指示，对这批“民先”队员作了安排，保留了一大批力量。

在这个关键时刻，中央根据形势的需要，决定要有一个更广泛的群众组织起来代替“民先”，在抗日根据地由青救会来统一领导。冀鲁豫边区抗日救国总会成立了青年部，杨泽江任部长，统一领导边区的青年工作。根据中央的精神，边区总会派青年部长杨泽江传达了中央撤销“民先”组织的决定，具体工作移交青救会管理。“民先”组织至此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我们公开宣布解散“冀南民先分队部”后，并把主持“民先”工作的李成安调救国总会工作，这是我们从当时实际出发采取的一个以退为进的策略。我们解散了“民先”分队部，没有“民先”组织了，你丁树本就没有理由再强迫“民先”队员自首了。我记得在解散“民先”分队部时，刘晏春同志还提出过不同意见。他说：“你解散了‘民先’分队部，丁树本就把矛头对准咱们救国会了。”其实，丁树本把矛头对准“民先”还是救国会，这只是个表现形式，根本问题是丁树本已经反共了，这是他反对一切抗日救国会团体的根本原因。

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变化，参加“民先”的青年知识分子思想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有的逐渐成熟起来，参加了共产党；有的根据党的需要，到各救国会去工作；也有个别人，跑到国民党那里去了。

直南“民先”组织虽然只存在了不到两年时间，但它发展之快，作用之大是显而易见的，是我们至今难以忘怀的。回忆和研究它的发展始末，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到处于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中心区的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为争取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原稿由清丰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根据安法乾同志口述整理。本文系1987年3月根据李靖轩同志提供的回忆资料，由冀鲁豫边区党史工作组河北省联络组在安法乾稿的基础上，补充整理而成。）

一九八七年三月

活跃在鲁西平原上的 济南乡师学生抗日教导队

刘少俊 朱德兴 王克宗 明

抗战初期，在鲁西大平原上活跃着一支青年抗日武装，这就是以济南乡师学生为主体的教导队。这支队伍成立于鲁西南的菏泽县，后来到了鲁西北的冠县一带。她是中国共产党直接掌握的一支抗日武装，为抗日战争培养了一批干部。

济南乡师的共产党支部，是山东省党组织的一个战斗堡垒，工作基础一直比较好，学生中抗日救亡的热情十分高涨。七七事变爆发后，不平静的济南乡师更加沸腾了。有些人回到家乡发动抗战，有些人到了石友三部队的学兵队，有些人暂时留在济南，进行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宣传，并进行了募捐和慰问伤兵的活动。

1937年9月，沧县失陷，日军逼近德州，济南告急，山东省政府教育厅通令学校南迁。共产党支部便动员一部分党员和“民先”队员随校南下，在同学中进行思想工作，根据党中央关于脱下长衫到农村打游击的指示，动员大家留在山东，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

9月下旬，在钱振东校长率领下，有师生108人（号称“一百单八将”）打着“济南乡师战地服务团”的旗子，唱着《义勇军进行曲》，离开了济南，经长清、肥城、宁阳、汶上，到达济宁。休息几天后，又继续步行经嘉祥到达巨野县城。

在南下途中同学们进行了一些宣传工作，在济宁时还准备了一些宣传节目，到巨野驻定后，便运用各种各样的形式，广泛地开展了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利用原有的戏台，演出了抗日的话剧、歌

剧、哑剧、双簧以及抗日歌曲大合唱。宗金箱因会耍几下大刀，与张晋德、王丕良等演出了《战恶魔》。在《盟誓杀敌》中，朱法圣（德兴）扮演了张学良，张子源扮演了开明士绅。郇正华（郑华）、王宗孟（王克）、臧训之、路默华、靳成畴等还演出了青年农民被日本侵略者逼上梁山的《参军》。这些演出都很吸引群众。此外，还演出了“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辛明允（辛明）扮演卖艺老人，王宗孟扮演香姑娘，朱法圣扮演青年观众。在演出达到高潮以后，及时把演出变成了讲演会，向围观群众进行抗日救亡教育。最后，大家的情绪十分高涨，一起振臂高呼：“誓死不做亡国奴！”“把日本侵略军赶出中国去！”

到巨野后，党支部即与中共鲁西南工委取得了联系，并在其领导下进行工作。工委书记、乡师同学孙志谦经常指导工作，了解同学情况，传达上级指示。为了掌握武装以坚持敌后抗战，孙还亲自去菏泽，通过统战关系介绍了十几位同学参加菏泽专区民团政训处训练班。当时听说钱校长与专区的高赞非交往密切，也请钱给高写了一封信。到专区民团政训处的同学，计有宗金箱（宗明）、张敬一、王福五（肃武）、臧训之（育生）、郇正华、王玉显、刘茂棠、李鸣岐、张晋德、刘振光（周泉）、刘安仁等。这时，钱振东接到通知，学校要继续南下去河南省，据说到江西南昌成立联合师范。由于党支部自离开济南以来的一系列工作，大多数同学都响应了党支部的“山东人不离开山东，就地发动群众武装抗日”的号召，留在了山东。随校南去的只有8个同学，主要是刚刚入学、年纪较小的九级学生，连教师在内还不到40个人。在宗金箱等去菏泽之前，有些同学如周维岳、刘效成、张永锦、吕子文等到于学忠部队的学兵队去了。留在巨野的同学，现在想起来的有窦长祥（于杰）、辛明允、朱法圣、王宗孟、张子源、王丕良、王玉坤、张明谦、唐茂乾、王成业、许世杰、李庆文（明实）、靳成畴（靳毅）、路默华、侯承寿、王光钧、孙昌繁、李玉华、曹允先、刘茂春、毛正新等。

在巨野的一段时间内，进行了共产党员和“民先”队员的发展工作。当时的党支部书记是窦长祥。钱振东南下以后，窦和王玉坤等回到鲁南老家抗战去了，支部书记由辛明允继任，支部委员有朱法圣、王福五、张子源等人。

1937年12月底，孙志谦同志受中共鲁西南工委的委托，率领济南乡师留守巨野的全体同学到了菏泽，利用统战关系，编为山东省第二专区（菏泽专区）教导队（驻在红庙），发了棉军装，但是没有发枪。这时，先到菏泽的同学，除到二团连队任政治指导员的宗金箱、张敬一、张晋德、刘安仁等人随第二专区专员孙则让的第二团南下外，其他同学均与后边来的同学聚在了一起，共有近40人。过了一些日子，宗金箱等几位同学也先后回到菏泽，同大家汇合了。只有张敬一同学被鲁西南工委分配去了中共郓城中心县委。

1938年元旦，菏泽专区召开民团大会，进行团拜。事先孙志谦与第二专区的有关负责人商议好，确定在此次大会期间，用准备解散的民团的枪支来武装教导队。我们是最后进入会场的。按照孙志谦的嘱咐，主席台上第二个人一开口讲话，我们这些坐在会场后边的人就三三两两撤到了会场以外的预定地点，然后迅速到达民团所驻的草棚营房内，全体人员一齐动手，先挑选一部分枪支、弹药和大刀、手榴弹等，搬到事先准备好的牛车上，再武装自己每人一支步枪、两袋子弹、四五个手榴弹。大家跟随军火大车转移到一个柿树成林的小村庄，吃了牛肉泡馍后，回到了城内的第六中学。

第三天正式编队，宣布张汉才为第二专区教导队第一中队队长。教导队大队长是乡村建设研究院的教务主任高赞非，下设3个中队。第二、三中队由乡村建设研究院的学生组成。第一中队以济南乡师同学为主，吸收了当地学生近10人，如苗德茂、王同昌、穆虹等。第一中队有3个小队，每队15人左右。第一小队有朱法圣、王福五、王宗孟、王成业、李成文等人；第二小队有王玉显、宗金箱、张晋德、郇正华等人；第三小队有路默华、刘振光、王丕良、靳成畴等人。3个小队中都有共产党员、“民先”队员为骨干。听

说张汉才是刚刚出狱不久的共产党员，还没有恢复党籍。随后又从西安来了一位程牧，担任第一中队副队长。

教导队第一中队的3个小队初建时，曾分散驻到区乡政府（乡农学校）内。教导队的队员和区乡的武装人员很融洽，和他们谈家常，谈抗日救亡，谈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还天天教他们唱抗日歌曲，彼此关系越来越密切。他们的觉悟也有提高，但是，还不到发展他们为“民先”队员的程度。为了扎根群众发动抗战，第一小队的同志搞了个封建色彩的东西，和区乡的武装人员结拜盟兄弟。如王福五、朱法圣、王宗孟3人和一个区乡武装人员朱××结拜了盟兄弟，排了大哥、二哥、三哥和四弟。朱法圣、王宗孟俩人还到这个盟兄弟家住了一夜，食宿优厚，情真意切，犹如手足一般。不久，教导队调离乡农学校，集中到城北的高庄集进行军事训练，室内讲课，院内瞄准，野外实弹射击，连队、班排的进攻和防御，还有单人训练等等。同时，继续以戏剧、歌咏、讲演等多种形式对附近群众进行了宣传工作。

1937年12月底济南沦陷。1938年1月初，曲阜、兖州等相继失守，省政府主席韩复榘率10万大军狼狈逃跑。老百姓称他们对日本侵略军是“闻风四十里，枪响一百一”。孙志谦同志前来告诉我们，刘汝明部将很快撤退到菏泽，要当心教导队被他们吃掉，教导队便于1938年1月底以军事演习的名义，从高庄集转移到黄安、红船一带。据说高赞非通知当地政府，负责供应教导队的给养。高赞非的弟弟高盘九到教导队担任军需，同他一起来的还有一位青年名叫陈先武。当时张、程队长与队员之间的关系不够协调，我们便派了辛明允作为队员的代表，到队部协助队长工作。到黄安、红船后，我们继续进行抗日宣传活动。有一次我们先唱抗日歌曲以集合群众，当唱到《在松花江上》时，不少人感动得流下了眼泪，接着便进行口头宣传，激发了群众的抗日热情。过春节时，我们全体队员给红船居民拜年，也到钱振东家去过。经过这些工作，教导队同群众的关系很好，特别是少年儿童们，开始对我们有些惧怕，以后

经常围着我们转，有的忘记了吃饭，家长去喊几次才回去。

在红船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同黄河以北中共鲁西北特委取得了联系，特委派乡师同学郭超来看过我们。2月中旬，特委军事部长、十支队政治部主任王幼平同志派马骏、徐少岩等同志来接我们，教导队便离开红船，向聊城专区的寿张县城进发。同学们一路上激情满怀，歌声嘹亮，忘记了行军的疲劳，连脚底磨起的水泡也成了大家谈笑的资料。从郓城县的野猪淖渡河时，歌声、笑声、欢呼声与浪击木船声交织在一起，激荡着每个人的心弦。在中华民族的摇篮——伟大黄河的怀抱里，大家深感重任在肩，“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的决心更加坚定了。

教导队到达寿张后，给我们讲话的第一位领导干部，就是王幼平同志。他的讲话语言生动，内容深刻，使大家很受鼓舞。过去对红军干部只是抽象敬佩，现在充实了亲身体会。当时的县长是管大同，他经常来看望我们，问寒问暖，照顾周到，每人还发了一套灰色军装。以后，王幼平同志还派姜威扬同志来教导队，帮助处理了一些队员与队长之间的关系问题。

在寿张期间，我们天天进行操练，也经常进行群众宣传工作，并且吸收了新的队员。回民青年靳朝滨和郭永昌、张洪芝（燕翼）就是在寿张参加教导队的。济南乡师五级同学李相三（李飞）这时也来到了教导队。有一天接到命令，说有一股日伪军进犯范县，山东第六专区（聊城专区）专员、抗日游击司令范筑先亲自率领部队出击，让教导队作预备队。我们从寿张县城出发，沿黄河北岸大堤西行，中途宿营在某村待命。在朱法圣查哨时，李庆文在哨地上倾谈了他过去参加“C·Y”时被捕入狱和出狱的情况，出狱后与党失去了联系，希望找到党的组织。次日，朱法圣将李庆文的情况和意见向领导上作了汇报。在到达冠县以后，恢复了李庆文的组织关系。

教导队抵达范县县城，驻到县政府大院内，任务是帮助打扫战场。范司令率队追击敌人去了，解除了我们预备队的任务。教导队

分三五人为一个组，到居民区、大街小巷去活动。有的目睹了被敌人刺死的女尸，赤身仰卧地上，满身血迹；街巷两旁房舍无人，门窗被烧，满地狼藉，令人惨不忍睹。县城内有抗日民主政府组织群众清理积物，掩埋尸体。商铺、饭店、摊贩，没有一家营业，颇像一座死城。经过一系列的善后工作，第二天便恢复了县城市容，开始了正常的生活。

教导队在返回寿张途中路过居民点时，高歌猛进，到了开阔地区还进行军事演习，时而快速前进，时而散开卧倒，时而就地休息。说是大休息15分钟，小休息5分钟，但都没有表，只是大体估算。路经“子路堤”时，还访问了该村群众齐心协力杀日本兵的情况，也目睹了日军疯狂报复杀害群众的惨状，大家受到了深刻教育。

3月上旬，中共鲁西特委决定将这支教导队改为山东省第六专区抗日游击第十支队（中共领导的一支队伍）的教导队。我们先到聊城驻了10来天，然后去十支队司令部驻地冠县一带。到达冠县后，上级派赵晓舟同志来任队长，张汉才与程牧调出教导队，高盘九也随同调出，不久上级又派从“陕公”来的郭强同志任指导员，这就使教导队进入了全新时期。成立了军人图书馆（宗金箱负责），出版了《冲锋》旬刊（朱法圣负责，后来成为十支队的《冲锋报》），组成了“冲锋剧团”（王宗孟负责），各方面活动都更有计划，更有准备，效果也更好了。

6月间，赵队长奉命带领教导队去黄河南岸野猪淖一带，运回12挺轻机枪，武装了共产党员刘志远那个营，该营即改为机枪营。这是鲁西北装备最好的一个营，在对敌斗争中战绩卓著。在这以后，我军收复馆陶县城，教导队第二小队在小队长宗金箱和郭强指导员的带领下，前往进行善后工作半月左右，密切了军民关系。有一次范筑先司令到达冠县，教导员参加了欢迎行列和欢迎大会，听取了上的讲话。

从离开济南到寿张县，党的组织一直是秘密活动，“民先”组

织基本上也是不公开的。到十支队后，王幼平和熊义武（十支队政治部组织科长）同志建议，可以公开“民先”队，但不说谁是队员。自离开济南后的这一段时间里，党支部发展了少数党员，也发展了一些“民先”队员，但总的来说有些保守。当时党的活动是秘密的，都是个别的单线联系，“民先”的活动也只能说是半公开。一切重大的事，都是通过共产党员和“民先”队员在群众中发挥作用。

当时抗日根据地形势大好。7月初，从教导队调了几个共产党员去中共冀鲁豫省委党校学习，其中有辛明允、王福五、朱法圣、宗金箱、臧训之、郇正华、李相三等。党校结业后，他们都留在冀南分配了工作。此后一两个月内，教导队的队员都陆续分配了工作，成为鲁西北地区我党主力部队十支队干部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的到连队当连长，如路默华、靳成畴等。有的去连队当指导员，如王玉显、唐茂乾、刘振光、张洪芝、刘安仁等。这些同志分配到连队以后，英勇作战，表现很好。如王玉显参加了围歼王来贤匪部的夜战，张洪芝在金滩镇参加了阻击卫河西岸国民党专员丁树本的东犯。他们在战斗中都冲锋在前，身先士卒，受到官兵们的好评。之后，唐茂乾在任平金河庄战斗中，与日伪军激战一天，双眼被打穿后光荣殉国。路默华在朝城县耿楼战斗中，率领全连与日军奋战，据说他在同敌人肉搏中牺牲后还扭抱着一个日本兵。有的留在政治部工作，如张子源、刘茂棠、张晋德、许世杰等，李庆文、侯承寿二人去司令部当了参谋。以后听说刘茂棠在战斗中被俘，英勇就义于山西太原。最后的一部分队员建立了第十支队宣传队，王宗孟担任党支部书记、队长兼指导员，也是“冲锋剧团”的团长，李鸣岐任宣传队副队长，王丕良任剧团主任，王成业、王光钧担任中队长，靳朝滨担任总务。他们学习了一二九师东进纵队宣传队的一部分节目，自己也创造了不少节目。王宗孟还将当时所能收集到的抗日歌曲汇编了一本厚厚的《冲锋歌集》，以后在宣传队帮助工作的张晋德同志也汇编了一本《抗日吼声》（皆为石印），都在宣

传工作中起了积极作用。在鲁西北抗日游击总司令范筑先坚守聊城壮烈殉国后的悼念活动中，王宗孟创作的《安息吧，范总司令》悼歌，和张晋德绘制的范筑先画像，都印发到连队，激励了部队战士保家卫国、奋勇杀敌的决心。教导队的建制没有了，教导队培育出来的队员们都在新的战斗岗位上做出了他们各自应有的贡献！

在将近50年后的今天，回顾这支教导队的战友们，他们有的在战斗中英勇献身了，如唐茂乾、张子源、路默华、刘茂棠、王成业、曹允先、王同昌等同志；有的负伤致残或积劳成疾，抗战期间就被病魔夺去了生命，如王福五、王玉显、靳成畴、刘茂春等同志。他们都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我们这些战争中的幸存者，虽然大多已届古稀之年，已经退出了紧张工作的第一线，但也要抖擞精神，奋勇向前，“量力而行，尽力而为”，为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一九八七年三月

我对冀鲁豫边区 青抗先的几点回忆

郭乐天

冀鲁豫边区青年抗日先锋队（以下简称青抗先），是在我党发动群众起来抗日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一支农村青年武装组织。我是1941年7月调到冀鲁豫边区青年抗日先锋队总队部的，任总队长兼边区青救总会军事体育部部长。任职初期只有我一个人，人地两生，工作不熟悉，心里很不踏实。后来，在军区武装部、青救总会的关心帮助下，先后调来了政治部主任梁××（后是王黎之同志），还有七八名青年干部。从此，青抗先总队部正式成立。

青抗先总队部设组织股、宣传股，还有一名负责行政事务的管理人员。总队部设在军区武装部。当时，军区武装部部长是张西行，副部长乔明甫；青救总会主任是王克，副主任杨泽江。他们对青抗先的工作都非常关心，我们有什么问题，他们都帮助解决。青抗先总队部刚刚建立，困难很多。青救总会知道我们的难处，专门派青救总会组织部副部长纪登奎同志协助我们工作，对青抗先工作推动很大。军区武装部对青抗先工作同样关心备至。青抗先总队部办学习班、开会，基层组织出现什么问题，他们都用心地给予帮助、解决。军区领导同志更是可亲可敬，不管大小事，只要找到他们，他们都是想方设法地帮助我们。有一次，我们听到太行区青抗先总队部有关防大印，便找到军区政委崔田民同志，崔政委找到下边的有关同志很快也给我们刻制了一枚。我从军队下来，没带手枪，找到杨得志司令员，杨司令员从他们警卫连里抽出一支手枪给我。领导同志对青抗先工作的关心照顾、支持与帮助，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1941年12月12日，军区在观城县朱家庙村集合了几千名自卫队员进行大检阅。杨得志司令员在大会上号召全区人民武装起来，成年人参加抗日模范班，青年人参加青抗先。我受上级委托，在大会上将队旗授给各分区。军区武装部长张西行同志在大会上作了精彩的武术表演，自卫队员们受到了很大鼓舞。

自卫队大检阅之后，青抗先、模范班在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蓬勃发展起来。凡是有青救会的地方，都建立了青抗先区队部，县成立青抗先大队部，县辖区成立青抗先中队部，村成立村队部。青抗先队员发展到近万人。

为了壮大干部队伍，青抗先每年举办两期学习班，主要是培养中队一级的干部。每期三五十人，学习七八天。讲抗日形势和任务，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讲游击战术。没有现成课本，都是自编自讲，讲完讨论，而后针对学员的思想情况请领导同志做一次动员报告。学员的文化都不高，多是初小程度，有的是文盲半文盲。他们年轻，有朝气，思想单纯，学习努力，接受教育快。他们到工作岗位上，表现积极勇敢，不怕苦，不怕死，服从组织纪律，在青抗先队员中颇有威信，群众也很喜欢他们。

青抗先比较活跃的县有沙区的南乐、高陵，中心区的昆山、范县、观城，泰西区的阳谷、寿昌，湖西区的单县、鱼台，鲁西南的齐滨。他们白天种田监视敌人，夜里开会、唱歌、练操、巡逻，进行抗日宣传活动。有时配合模范班深夜扰乱敌人，没有机枪，就用鞭炮代替，把鞭炮装在铁筒里，“噼噼啪啪”地乱响；没有大炮，就用土炮代替，把火药、破犁铧碎片装在炮筒里，轰击敌人的碉堡。有时对敌人喊话：“我们是八路军，缴枪不杀！”“中国人不打中国人！”闹得敌人夜里睡不好觉，疲于应付。昆山县青抗先组织发展得较早，青抗先总队没有建立前，他们在青救会的领导下就已经建立起来了。1941年的春天，昆山县成海、王楼一带的青抗先组织七八十人，在杨甫同志的率领下，携带着长矛、大刀、手榴弹，配合该县县大队攻打凤凰集。青抗先队员表现很勇敢，受到

大队和当地群众的夸奖。

1942年9月27日，日军集结强大兵力在濮阳、范县、观城进行大“扫荡”。当地青抗先队员积极保护干部，掩护群众转移，主动打击敌人。据不完全统计，当地青抗先队员在这次反“扫荡”中缴获日本钢盔9顶、日本旗十几面、步枪3支，后在《冀鲁豫日报》头版上栏刊载了这一战果。

1943年的秋末，获悉敌人又来中心区“扫荡”，边区领导机关疏散，我和通信员任忠信同志到了南乐县以东的李家村。第二天的上午，朝城日伪军300多人出动汽车、大炮占领了观城县的田海村。田海村位于李家村以南，相隔三四华里，据说敌人在这里安了据点。李家村的青抗先、模范班为了阻止敌人的侵犯，掩护群众安全转移，三三两两地顺着“抗日路沟”向田海村不断放枪。敌人惶惶不安，如临大敌，把田海村的树砍了不少，堵住村路口，准备固守。当天夜里，观城县青抗先大队长何涛同志，在当地组织了三四十名青抗先队员，配合该县县大队袭击了这个村庄。敌人乱成一团，第二天一早天不亮就逃跑了。

在当时情况下，接敌区、敌占区的不少村庄成立了青年武装组织，没有公开的组织名称，在当地党委的领导下进行隐蔽的武装斗争。如翟村铺（前后翟村）是南乐县西有名的大村庄，全村共五六百户人家，1941年前还是个抗日游击区。当时只有大名、南乐两县城有日伪军。大名位于翟村铺以北18华里，离敌人比较远，是南乐县西的北八村（袁庄、孙村、韩庄、张庄、吴家庄、玉皇庙、前后翟村）的抗日活动中心。1941年，国民党丁树本部杨发贤投敌叛变，任东亚同盟自治军第三旅旅长，下属3个团，共2000余人。他们在翟村铺周围先后安设了不少据点，西边的二马村、安庄、边马集，南边的元村、千佛、邵家庄，东边的北渠头庄都驻上了日伪军，远的十几华里，近的五三华里。从此，敌人经常出没于翟村铺，这里基本上变成了敌占区。在敌人的严重包围下，翟村铺的党支部很坚强，组织了30余人的青年武装，年龄大的二十一、二岁，小的十几岁。他们

自己拿钱买枪，购置“底把盒子”十几支，主要任务是保护地下工作同志。当时因行政区调整，翟村铺分属卫河县管辖，县委书记魏明光，宣传部长陶鲁政，区委书记赵东甫，区长李敬轩、李旗等同志都在这个村庄活动过，此村成了他们从事地下工作的落脚点。为了保证地下工作同志的安全，维护当地群众利益，锄奸工作搞得很不错。安庄的王金是敌人的侦探，向敌人通风报信，干了不少坏事。翟村铺的青年武装发现后，于1943年10月配合当地区队除掉了这个坏蛋。邵家庄驻扎杨发贤的一个团，伪团长袁志儒就是翟村铺人。翟村铺离邵家庄不到5华里，袁志儒经常带着他们的喽罗到这个村中来，与该村地主分子周兴斋（系国民党员）相勾结，清乡、查户、抓人、要粮、作威作福，群众非常气愤。翟村铺的青年武装在上级党委的指示下，于1942年的冬天夜里与卫河县大队相配合，除掉了这个坏家伙，群众拍手称快。此外，他们还破坏敌人的交通，到五花营割敌人的电线，配合区队打安庄的炮楼。因为翟村铺位于冀南、冀鲁豫西区的边界，是两地联系的纽带，因此，护送干部，传递情报，是青年武装经常做的事情。他们做这些事情，从来没出现过任何差错。翟村铺的青年武装从1941年一直坚持到1945年的抗战胜利，作了大量的有益于抗日的工作。他们英勇抗战，不屈不挠，在群众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一九八七年八月十七日

聊城地区民兵斗争述略

杨明坤

抗日战争时期的自卫队（团）、 青抗先、模范班和民兵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卢沟桥事变。7月8日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表了号召抗战的宣言，要求全国人民用全力援助神圣的抗日自卫战争。不久，我们党就在洛川会议上通过了著名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在十大纲领的指导下，中共鲁西北特委向各县派出干部，开展抗日宣传组织工作。在共产党的感召下，国民党聊城专员范筑先拒绝了国民党反动派南撤的命令，决心抗战。从此，鲁西北组织了6万多抗日大军，几十万抗日民众，在鲁西北形成了抗日统一战线的局面。这引起了日本和国民党顽固派的极端仇视。1938年11月，在日军重点进攻、国民党顽固派阴谋陷害的情况下，聊城失陷，范筑先牺牲，鲁西北广大地区被敌占领。在这种险恶形势下，我八路军一一五师、一二九师英勇地深入鲁西北区；鲁西北各级党组织也公开地站出来领导抗日斗争，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坚持了独立自主的抗日游击战争。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我们党的坚强领导，聊城民兵不断发展壮大，成为进行人民战争的坚实基础。

（一）从无到有，从小到大

抗日战争时期，聊城民兵组织的建设与发展，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抗日自卫队阶段（1937年至1938年）。七七事变以后，我党派部分干部深入鲁西北区，积极争取范筑先抗战，主动配合范筑先发动群众，武装人民，建立鲁西北抗日根据地；同时，做了大量的争取绿林武装和武装民团的工作。另外，我党各级组织注意在广大贫雇农中宣传党的抗日政策，组织群众武装。许多地方在共产党支部的领导下，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组成游击小组或武装民团。如冠县在共产党员赵健民、刘致远、许梦侠等同志领导下，组织了近200人的义勇军九队，郭英同志组织了近150人的农民游击队；在茌（平）禹（城）边界，共产党员乌亚屋同志组织了几十人的华山工作团；馆陶县建立了3个各30人左右的基干队；临清建立了各30人左右的农民游击队。1938年11月15日聊城失陷，范筑先牺牲后，聊城地区相继被敌占领。此时土匪蜂起，“司令”多如牛毛，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年底，八路军一一五、一二九两师先后挺进鲁西北地区，帮助各县建立抗日政权。在这种情况下，广大人民群众纷纷要求组织起来，进行武装自卫。于是，在党和八路军工作团的领导帮助下，觉悟了的广大人民群众纷纷参加抗日人民武装组织。有的叫自卫团、自卫队、青抗先，有的叫基干队、模范班、钢枪班，也有的叫联防队、游击小组等等。如原临清下堡寺一带、馆陶河西寨一带，建立了青抗先、模范班，各村人数10至30人不等，其中临清从模范班抽调45人参加东方游击队。莘县的燕店、张鲁、十八里铺等地，由共产党员组织游击小组，夜聚日散，进行秘密活动，宣传党的抗日政策，散发传单，张贴标语，侦察敌情，破敌交通，割敌电线，打击亲日分子等。此时，东阿、茌平、阳谷、冠县等县的部分村庄即有了民兵联防。但这时人数少，武装差，加之土顽武装各称雄一方，群众性的游击战争还处于初级阶段。

第二，民兵创立阶段（1940年至1942年）。这个时期，由于日本侵略军对我鲁西北抗日根据地实行“治安强化”、“囚笼”政策和“三光”政策，根据地日益缩小，斗争十分残酷。面对这一严重局势，上级军区、党委于1940年8月正式提出了“建立民兵制度，开展

“群众性游击战争”的口号。同时，建立了军分区，专区和县的民主政府也相继成立起来，并设立了群众武装的领导机构（县设武装工作科，有的县亦称武委会，后统称武委会），从而加强了对民兵等群众武装的领导。1941年底，冀鲁豫、冀南区党委和军区都根据中央军委1941年11月关于“人民武装（民兵、自卫队）应包括人民群众的大多数，其中民兵数量应超过主力军、地方军的总数”的指示精神，为人民武装的建设连续发出了一系列的通告和训令及有关组织条例，号召广大人民群众踊跃参加民兵和自卫团。鲁西北各地根据上述指示精神，抽调大批干部，结合减租减息、精兵简政等政策的贯彻执行，广泛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大力开展民兵工作，并在青救会、农救会和自卫队的基础上，普遍建立和扩大民兵力量，大批民兵干部受到了训练。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广大民兵组织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民兵组织的任务和作战范围，也更加明确。这时，民兵已成为一支很活跃的战斗组织，特别是经过1942年的反“扫荡”，广大民兵普遍得到战斗锻炼，威信也逐步提高。

第三，民兵组织的巩固阶段（1942年至大反攻）。这时，在不断粉碎敌人的“蚕食”、“扫荡”、“囚笼”政策之后，为了切实搞好民兵建设，进一步开展对敌斗争，冀鲁豫和冀南区党委、军区及各地委、分区都发出了多次指示和训令，对于民兵的政治工作，创模立功，民兵和自卫团的编制、领导、指挥关系、经费、武器以及各级武委会、村团部的工作等等，都进一步做了明确的规定。我区还结合贯彻执行中央土地政策的群众运动，提出了发动群众与武装群众相结合的方针，重新组织与扩大了民兵组织，纯洁了民兵队伍，清除了混入民兵组织和民兵干部中的坏分子，进一步巩固与完善了民兵制度。同时，建立了农村党支部对民兵的领导，民兵中违反纪律和脱离群众的现象大为减少，人民群众对民兵更加关心爱护，广大民兵的情绪也更加稳定，民兵组织的任务和作战范围也更加明确。至1942年，全区的群众武装绝大部分改为民兵和自卫团两种，民兵的人数已由1941年底的4万余人发展到8万余人。在编制

上，实行了县大队、区中队、村小队制。在作战指挥上，以小队为单位，以村小队和联防为指挥单位，建立了联防与各级战时指挥部。在战术上，则以地雷战、“麻雀战”和破击战为主。

第四，民兵组织的大发展阶段（1945年7、8、9月间）。各抗日根据地实行大反攻以后，随着根据地的迅速扩大，民兵组织蓬勃发展，日益活跃。此时，不仅老区的民兵组织有了大发展，在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中，新区也普遍建立了民兵组织，民兵已发展到153076人，加上自卫队，有60余万人。广大民兵和自卫队既能够随时歼灭小股敌人和击退大股敌人，又能够大批地随军支援外地作战，并能帮助新区群众开展民主运动与对敌斗争。

在上述四个阶段中，我区民兵建设的基本特点是：党政军民一齐动手，发动群众办民兵，并以青救会为主组织青抗先，以农救会为主组织基干自卫队；同时，各地还选派有威信的领导担任民兵的领导工作。在民兵组织的发展过程中，各地都利用作战间隙，对民兵进行了整理与训练。1942年，在平县抗日政府与华山工作团分批对1000余名民兵联防队员进行训练，每三个月一期。特别是1942年的群众运动和减租减息斗争，更加锻炼了广大民兵。在运动中，许多民兵提高了阶级觉悟，认识到枪杆子的重要性，民兵中贫苦农民的成份增加了，同时很多共产党员都参加了民兵并掌握了领导权，因而民兵的战斗大大增强，各地不断取得新的胜利。如冠县民兵到1945年8月就对敌作战540次，扰敌、埋地雷1490次，破坏围寨、交通120次。在武器装备方面，也有了很大的改善。

在民兵建设中，我区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建立和加强民兵的政治工作，坚持实事求是，简化层次，注重实效，不图虚名的方针。我区坚决响应上级关于加强民兵政治工作的指示，明确规定民兵政治工作的任务是：（1）密切与群众的血肉关系，克服一切脱离群众的现象；（2）提高政治质量，树立参军光荣的思想；（3）保证民兵战斗力的提高与一切战争任务的完成；（4）积极参加生产，争当生产的模范；（5）瓦解敌伪军。同时，广泛开展创模立功活

动，从而使民兵武装的组织更加统一了，战斗力也大大提高了。

（二）在反“扫荡”、反“蚕食”、“反清乡”、反“磨擦”中大显身手

鲁西北抗战，是最艰难的战斗。日本侵略者震慑于鲁西北敌后军民的伟大力量，推行了3次“治安肃正”计划和5次大规模的“治安强化”运动。在“治安强化”运动中，日军分别采取三种不同的政策：对于敌占区，他们就以“清乡”为主，强化保甲制度和“连坐法”，用圈村的办法进行大编乡，肃清所谓“不稳定分子”，掠夺粮食物资，用一切手段巩固其占领区。对敌我争夺的游击区，就以“蚕食”为主，恐怖与怀柔政策兼施，强迫居民搞“维持会”（即充当汉奸，维护日本的反动统治），或制造“无人区”；同时，广修封锁沟墙与炮楼，以阻止我军和群众武装的活动。对我抗日根据地，就以“扫荡”为主，进行大举进攻，到处实行野蛮残酷的“三光”政策，并制造严重的物资困难和失败情绪。而“清乡”、“蚕食”、“扫荡”三者又密切配合，其根本目的就是摧毁我抗日根据地，消灭我武装力量，巩固反动统治。

针对敌人的野蛮政策，聊城广大民兵在党的领导下，积极配合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在对敌斗争中大显身手，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1、在反“扫荡”中的积极作用。1939年春，日军首先在华北颁布了所谓“治安肃正”计划，9月又提出“囚笼”政策。在鲁西北区，敌伪用据点、交通线、封锁沟墙等割裂封锁我根据地。特别是1941年至1943年上半年，日军实行了残酷的“扫荡”。据1942年一年的不完全统计，敌在全区实行较大规模的“扫荡”40余次，“扫荡”的规模也越来越大，什么“铁壁合围”、“捕捉奇袭”，“反转电击”、“辗转抉剔”以及“拉网战术”、“梳篦战术”、“毁灭扫荡”、“抢粮扫荡”等等。日军铁蹄所至，人畜、财物、房产

一扫而光，许多村庄变成废墟。抗战时期，全区被残杀、毒打、逮捕、奸污者达10余万，冠县、堂邑、馆陶3县接合部造成数十里的“无人区”。不屈的聊城抗日军民在党的领导下，坚决反抗日伪的反复“扫荡”，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广大民兵在反“扫荡”中，为配合主力部队作战，秘密岗哨一直放到敌人的碉堡跟前，秘密情报员一直侦察到敌人的据点里面。敌人出动时，往往先遭到民兵阻击，使其不能按时到达合击点；待其精疲力竭要撤退时，各村民兵又从四面八方围拢过来，到处打击敌人。在这方面，民兵创造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比如1941年，聊城、茌平、博平、东阿4县的日伪军，每月都对我茌平南根据地进行“扫荡”。大白庄、朱庄、丁庄等十几村的民兵和群众为配合部队反“扫荡”，挖了村村相连的交通沟300余华里，有的民兵家里都挖有地洞，当敌人来“扫荡”时，到处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1941年10、11两个月内，我在南根据地的民兵就对敌进行大小战斗73次，歼敌300多人。1942年7月某日拂晓，顽军齐子修和李岐山集结众多匪兵“扫荡”我在南根据地。1000多名民兵配合分区部队和肖华支队七、八团，在迟桥、孟尝君庙一带与敌展开激战，打退了敌人4次大规模的进攻，打死敌人200多人，粉碎了敌人的“扫荡”。又如1943年4月，日伪军4000余人对我冠县根据地进行“扫荡”，申小屯的民兵积极配合部队作战，打死打伤敌人多人，光民兵就俘敌30人。就这样，全区民兵在抗日战争中配合部队粉碎敌人“扫荡”数百次，其中万人以上的“扫荡”5次。在各次反“扫荡”中，民兵和群众利用人熟地熟的有利条件，到处打击、袭扰敌人。另外，民兵站岗放哨，防奸反特，传送情报，解救群众，掩护干部和伤员的事迹，更是不胜枚举。

2、在反“蚕食”中的积极作用。“蚕食”政策，是日军向我根据地进攻的另一个主要手段。其办法是在我边沿区安设据点、炮楼，然后向我根据地进逼；同时，在被敌占领的交通线两侧，大筑封锁沟墙。此外，还组织“维持会”，进行奴化教育，等等。为

此，破坏敌人的交通线，拆除敌人的炮楼，推平敌人的沟墙，把“挤”进来的敌人再“挤”出去，便是对敌人的有效措施。广大民兵则是进行反“蚕食”斗争的重要力量。在党的领导下，广大民兵和群众创造了许多有效办法。比如：以民兵为骨干，开展大规模的破击战，发动广大民兵和群众用“敌进我进”来反“蚕食”；通过围困封锁，把敌人从根据地边沿挤出去，等等。全区民兵涌现了不少的典型范例。1941年7月，日伪军在茌平南大吴、小马庄、朱庄、丁庄等处安设了据点，不到两个月，就被我县大队和民兵拔除。在茌、博沿线，仅在平大王楼民兵就先后破坏敌交通10余次，砍线杆510根，割电线近3万米。高唐县的民兵在几天之内就割断了敌人通往夏津、禹城、齐河、聊城、茌平、临清和各区电话线，使敌人变成了聋子。莘县民兵在1943年配合回民支队进行朝城战役中，采取分散围困，重点攻击的战术，断敌水路粮源，迫使敌人缴械投降，几天之内，攻克朝城、莘县周围据点30多处，烧毁岗楼碉堡40多个，取得了反“蚕食”斗争的重大胜利。1942年，敌人强迫群众沿公路和在碉堡周围挖宽2.5丈、深2丈的封锁沟。如果让敌人的封锁线修成，确实能把我们的根据地割开，将我们困在“囚笼”里。民兵采取的对策是：一方面教育群众应付敌人，尽量少出入，去的人也要磨洋工，使工程进展缓慢；另一方面白天挖，晚上平。后来敌人从敌占区赶来很多群众，施以武装监督，企图在极短时间内修成封锁线。民兵看到公路上人山人海，就派出多个小组，带上手榴弹混入工地，当敌人不注意时，就向没人处投上两颗手榴弹。其他小组也趁混乱向没人处投手榴弹，并大喊：“快跑哇！”群众也边喊边跑，像潮水般逃离工地。几万名群众20多分钟就跑得无影无踪了，连监工的敌人有的也被人流带着跑，有的被群众乘机按在地上踩死踩伤。后来，敌人只是在据点附近完成了封锁线，反而对他们起到了封锁、分割作用。

全区民兵在破坏公路、平毁封锁沟墙的同时，挖起便利我军行动的交通沟，使敌人的快速部队不能顺利前进。仅冠县抗日交通沟

总长就达7000余华里。各地民兵还针对敌人先安插特务、汉奸，建立“维持会”组织，然后修筑据点，实行“强化治安”的特点，首先把敌特、汉奸和“维持会”搞掉，然后再动员群众拒修或拔除据点，使敌人的“强化治安”无法实行。据阳谷1942年统计，共摧毁伪政权和“维持会”50多个。观城的民兵英雄赵启明，带着一个民兵小组，经常出没于敌人碉堡、据点之间，摸清敌人的“蚕食”计划，以争取瓦解与镇压相结合的方法，解散40余村的伪政权组织，收缴10余个据点的枪支，争取自首或停止参加“维持会”活动的100多人。由于广大民兵积极开展这一工作，敌人的“蚕食”政策破产了。1939年，全区只有冠（县）馆（陶）丘（县）莘（县）一小片根据地，到1943年下半年，已建成大小10块根据地，并互相联结在一起。

正因为这样，在反“蚕食”斗争中，各级党政军领导特别注意发挥民兵的作用。到1942年底，仅寿张就有4000多民兵和自卫队员活跃在反“蚕食”战线上。他们经常出没在敌人的鼻子底下和边沿区内，既配合了部队作战，又单独打击了敌人。

3、在反“清乡”中的积极作用。日军对某些对它威胁较大的地区和我抗日根据地，曾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清乡”和“政治清乡”，以稳住其占领区。“军事清乡”就是集中大量兵力封锁某个地区，然后挨家挨户进行搜查、登记，发“良民证”，如一人反抗，即把全家全村杀光。“政治清乡”，就是在“军事清乡”之后，再抽调大批警察、特工队和伪行政人员，推行保甲长制度，以建立残暴统治。

民兵为了对付敌人的“清乡”，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积极带领群众，密切配合部队，采取公开和秘密的，“合法”和“不合法”的，武装和非武装的各种形式，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为了粉碎敌人的“军事清乡”，民兵首先积极配合部队打破敌人的“清乡”封锁线。我聊、阿边界的民兵，接二连三地破坏敌人的封锁沟墙，割敌电线，使敌所谓的“清乡”难以进行。其次，是广泛开展

群众性的锄奸斗争。敌人“清乡”开始时，各地民兵都积极响应党的号召，采用多种方式捕捉和镇压敌人。冠县民兵在反“清乡”的几个月中，就打击镇压了200多名罪大恶极的特务、汉奸。三是广泛地开展游击活动。据不完全统计，全区民兵在反“清乡”中先后作战800多次，参战民兵1万多人，毙、伤、俘日伪军900多人，打乱敌人的“清乡”部署，加速了敌人这一阴谋的破产。

为了粉碎敌人的“政治清乡”，各地民兵也总结出一套切实可行的办法。阳谷、聊城、东阿、茌平、莘县、冠县的民兵，积极开展宣传活动，揭露敌人实行保甲制的政治阴谋，组织群众疏散隐蔽，使敌人找不到编查对象；组织民兵战斗小组，打击敌人的“编查保甲委员会”和下乡编保甲的日伪军及汉奸等骨干分子。采取这些方法，对于粉碎敌人的“清乡”起到了重大作用。高唐、临清民兵积极开展向敌伪军喊话、散发宣传品、点红黑点、记善恶簿等活动，也起了很好的作用。高唐民兵在县委的领导下，把运河西革命根据地大印刷厂铅印的传单和运东专署的大布告，贴满了高唐县城的大街小巷和日伪警察局、日军“红部”（司令部）、伪军大队部的院内，搅得敌人惊慌不安，以为是我八路军主力埋伏城外，不敢贸然出城“清乡”了。

4、在反“磨擦”中的积极作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顽固派始终坚持反共反人民的立场。从1939年底到1943年7月，在鲁西北区，国民党杂牌军分布在濮、范、观、朝、聊、堂、高、临、清等县，号称10万人，向我进行军事、政治“磨擦”。特别是盘踞范县、观城一带的石友三第十军团经常向我挑衅。我一再让步，争取其共同抗日，但他配合日军，不断制造“磨擦”事件。在这种情况下，全区军民除反对日伪军疯狂的“扫荡”、“蚕食”和“清乡”以外，还面临着反“磨擦”的严重斗争，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给顽军以打击。全区广大民兵和群众在这个斗争中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

首先，民兵在保证后勤运输、侦察敌情、配合作战方面发挥了

重要作用。如1940年1月，石友三两个团3000余人向我寿张根据地进犯，我民兵和群众积极侦察，送情报，担任警戒，有1000多民兵配合我东进挺进纵队、先遣纵队骑兵团作战，歼其大部。3月间平汉线以东的部队发起了反石友三的战役，并彻底取得了击败国民党进攻的胜利。而胜利的取得，又是与广大民兵、群众的配合和支援分不开的。在战斗中，参加支前的民兵、民工人山人海，为反“磨擦”斗争的胜利作出了很大贡献。我冀鲁豫军民在围攻古云集第十军团一八二师的时候，就得到了范县、观城、朝城等地民兵的支援。在围攻还未开始时，观城县的县长就带着民兵、担架队、战勤队等前来接受任务。经过5天战斗，歼其一部，残敌狼狈逃窜，我冀鲁豫地区更加扩大了。

在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中，民兵在单独作战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如石友三军团为了向我抗日根据地进攻，在我鲁西北抗日根据地设了很多招兵处，这些招兵处整天向群众要粮要款，鱼肉百姓，奸淫讹诈，无所不为。冀南、冀鲁豫区党委和各县委都发出捣毁招兵处的号召，广大民兵积极参加这一运动。石军团招兵处在广大民兵和群众的声讨和打击下，被迫撤离我根据地。又如，古城国民党区党部，平日里刺探我情报、制造谣言，并经常杀害我干部群众，民兵游击队决定将其拔掉。1940年2月一天夜里，首先割断古城与范县的电话线，煤油筒内装上鞭炮当机枪，虚张声势，使该部在仓皇失措的情况下，全部投降，民兵缴获长短枪34支、轻机枪2挺。

5、在配合我军大反攻中的积极作用。1943年下半年，全区即转入局部反攻。至1944年10月，就解放了莘县、冠县、朝城、寿张、张秋等县、镇。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后，全区军民普遍地向敌伪军开展了猛烈的进攻。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全区军民执行毛泽东同志关于举行全国规模进攻的号召和朱总司令关于向一切敌占交通要道展开积极进攻，迫使日伪军投降的命令，举行了全面的大反攻，先后解放了聊城以外的鲁西北的所有城镇。这

期间，各级党组织和武委会为了充分发挥民兵的积极作用，组织了成营的民兵配合部队作战，并配合主力部队到邻区、邻县打击消灭敌人。华县、聊城、茌平等县各有1000多民兵参加了解放临清、堂邑、郭庄、吴海子、莘县的战斗。在参战时，十几名民兵神枪手打死200多敌人，并在临清活捉匪首吴连杰。有些地方，反攻大军尚未到来，民兵和群众就自动围攻敌据点，开始和敌人进行了搏斗。寿张民兵就曾首先围困了史堂据点，35颗子弹打倒32个敌人。夜间，敌人在岗楼里挑起红灯笼壮胆，李延荣5枪打灭5次，迫使敌人缴械投降。

在大反攻阶段，全区民兵还踊跃参军上前线，壮大我军力量。比如，朝城、寿张、范县的民兵，就曾大批入伍。寿张三区关门口民工模范班长李登芳，听到扩军的号召，立即响应，并带领全班一齐到达部队。

全区广大民兵除在上述五个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外，还在劳武结合、生产自救和保卫抗日根据地、维护地方治安、巩固民主政权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鲁西北民兵在八年抗战中，单独作战或配合作战4000余次，歼敌2526人，拆除、拔除碉堡数百个。这光辉的战绩，充分显示了鲁西北人民的富有传统的斗争精神，显示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而民兵和群众战斗力的源泉，在于党的领导和毛泽东同志人民战争思想的正确指引。

（三）运用各种灵活机动战法，积极打击敌人

聊城地区的人民武装，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结合本地情况创造了不少灵活机动的战法，主要是“麻雀战”、地道战、地雷战、破击战、伏击战、围困战等等，而各种战法又往往结合运用，出奇制胜地打击敌人。

“麻雀战”是民兵和群众进行游击战争的主要战法。冠县赵庄（现属梁堂乡）一带的民兵，在对敌斗争中摸索到：大股敌人行动中，常有一些散兵脱离队伍或尾随后面伺机掳掠。于是他们利用本

乡本土人熟地熟的有利条件，常以三三两两的活动，对大股敌人则袭扰，对小股零星敌人则歼灭。在战斗中，或是伏击，拦头斩腰打尾巴；或是阻击，用冷枪杀伤进犯之敌。他们用这种办法杀伤不少敌人，小股敌人轻易不敢出来行动。

地道战、地雷战也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一大法宝。临清民兵爆炸英雄丁元朴创造了埋设地雷与改造村形相结合，真地雷与假地雷相结合，布雷与射击诱敌相结合等方法，在村头、房门、道旁、坟地到处埋设地雷，使来犯之敌处处挨打，寸步难行。侯寨子民兵在本村挖掘大小地道96条，并学会了制造手榴弹、地雷的技术。伪军头子李世增两次进攻该村，都吃了地雷、手榴弹的亏，第三次纠集了伪军1000余人，带大车200辆，企图彻底消灭侯寨子。英勇机智的民兵，一面阻击敌人，一面指挥群众转入地下，由早晨战斗到黄昏。待敌人打进村子，各户空无一人，迎接他们的是到处开花的地雷、炸弹，炸得敌人血肉横飞。敌人慌忙撤退，民兵又跟踪追击，给敌人以有力打击。

破击战是民兵和群众经常运用的重要战法。冠县井村、赵庄、东西周、六庄、梁堂等16个村的民兵，夜间经常派出民兵小组破坏敌电话线，袭击护线之敌，并切断电线70多次，重7000多斤。一次他们集合了350名民兵，分成掩护组、警戒组、割线组、伐杆组，一夜割敌电线5公里，使敌7条线路中断联系。又如1945年5月，聊城、阳谷公路破击战，有1万余名民兵参加，连夜拔除据点10余处，破坏公路百余里，从此割断了聊城与南、北、西三面敌人的联系。

伏击战也是民兵经常运用的一种战法。聊城县第一区民兵联防队，摸清了双庙据点的伪军每天早晨跑步，日本兵和伪军官晚上喝酒打牌、早晨睡觉的规律，就于天亮前埋伏在伪军跑步的道路两旁的玉米地里，活捉了20多个伪军。然后，民兵换上伪军服装，直扑敌据点，19个日本兵和伪军官有的被打死，有的当了俘虏。又如任平县张楼游击队郭庄伏击战，创造了用半小时击毙敌伪团副以下30余名，俘敌80余名，缴长短枪100余支、子弹3000余发的战绩，受到分区

和县委、县政府的表扬。

围困战是抗日战争后期民兵经常运用的重要战法。1945年7月，东阿、茌平民兵联防队11个连1200余人，将刘望山据点冯太恒团400余人围困，在据点周围布上地雷，组织神枪手打击敌人，并开展政治攻势。敌人没柴烧了拆房子，没面吃了煮谷子，没谷子了吃皮带，最后有90多名敌人不得不投降。其余敌人突围时已是有气无力，大部被我消灭或当了俘虏。

在抗日战争中，聊城地区广大民兵和人民群众用以战胜敌人的方法是多种多样、千变万化的，除上面所举的一些巧妙的战法外，还有攻心战、联防战、“坚壁清野”等等。这些巧妙的战法，只有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才能产生；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运用；只有野战军、地方军和民兵这三种武装力量紧密配合，才能发挥其强大威力。可见，我党聊城地区的抗战史，就是人民战争史、人民英雄史。

解放战争时期的民兵

解放战争时期，全区民兵得到了空前发展，至1949年初，已达327800余人，此外，还有几十万农民自卫军。

（一）民兵建设进一步加强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区党政军领导机关根据上级有关指示精神，普遍对民兵组织进行了整顿，抓紧了军事、政治训练，为保卫解放区培养了一支强大的人民武装力量。

第一，明确新形势下民兵的任务。在国共两党举行重庆谈判和签订停战协定后，有些民兵产生了和平麻痹思想，甚至出现了退队的现象。在这种形势下，我区各级武委会和军事领导机关普遍地召开了民兵工作会议，认真地学习了中央领导同志关于加强民兵建设的指示，做出了加强民兵建设的决定、决议，使广大民兵进一步明确：民兵是我们农村中的人民军队，这支队伍在抗战中起了极大的

作用，在解放战争中，民兵应成为参军参战的模范，积极地支持战争，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同时，民兵又是生产的积极组织者与参加者，应该积极地参加土地改革，帮助劳动人民翻身，保卫既得的果实。这就是我区民兵的光荣任务。

第二，重新整顿民兵组织。我区对民兵组织的重新整顿，是紧密结合土改、整党以及其他群众运动进行的。各级党的组织，也都把整顿、发展民兵组织，选拔、配备民兵干部，审查、教育民兵，纠正存在民兵建设中的问题等，当作各项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这就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保证了民兵的健康发展与民兵组织的纯洁与巩固。

在整顿民兵组织中，各级党组织还加强了对民兵组织的领导。比如：要求农村党支部应坚持“党员军事化”的口号，党员要带头参加民兵，武器要掌握在党员和可靠的基本群众手里；各级党委要经常讨论民兵工作，要加强对武委会的领导；地方军要大力扶持民兵的发展，退伍军人应尽量参加民兵；政府要注意对民兵多方扶助，及时表扬民兵英雄和干部，重视民兵伤亡抚恤，注意解决民兵家庭生活困难；群众团体要把发动群众与武装群众结合起来，动员会员大量参加民兵，使民兵组织真正成为人民自己的武装组织，等等。同时，还注意纠正了有些地方在发展民兵上存在着的只图数量，不顾质量或产生的“关门主义”等现象，保证了民兵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壮大。

我区还适应形势需要进行民兵编组，使民兵组织更适应战时需要，更具有战斗力。一般根据民兵保卫村庄和配合主力远征支前的任务，编为野战队（担架队、运输队）和警卫队。民兵野战队担负远征支前任务；民兵警卫队担负保卫村庄任务。野战队的编制是：每村编1个班或排，几个村编1个排或连，每区编1个连或营，以县为单位编为若干团。

第三，开展军事、政治大练兵。1945年底，毛泽东同志提出了解放区的工作方针。我区遵照毛泽东同志和上级指示，把努力粉碎

国民党的进攻作为中心任务。我区工作注意了以下几点：（1）粉碎国民党的进攻，解放聊城；（2）开展“高树勋运动”；（3）练兵；（4）减租；（5）生产；（6）财政；（7）拥政爱民和拥军优属；（8）救济；（9）爱护本地干部；（10）一切作持久打算。在这一方针中，我区把军队和民兵的练兵当作一项战斗任务，利用一切机会，一切间隙，进行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借以提高战斗力和觉悟性。练兵项目，仍是以提高射击、刺杀、投弹等项技术程度为主，提高战术程度为辅，特别着重于练习夜战。练兵方法，是开展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群众运动。

组织短期训练培养骨干。1946年，各县、区武委会开办民兵训练队，每期几十人至百余人不等，时间一个月。县普遍利用农闲季节，以流动方式训练村干部，时间多为半日制。寿张三区开办了训练队，集训了民兵中队长、指导员、班长和准备提拔的民兵骨干500多人。在训练中，除了学军事、学政治外，还针对新干部多的特点，增加了关于民兵的性质、任务以及组织领导、工作方法等教育内容。临清县武委会还专门开办了爆炸训练班，使民兵普遍掌握了爆炸技术。

结合执行战时勤务，因地制宜地开展练兵活动。各级党委和人民武装领导机关，都把普训民兵、自卫队的工作当作中心任务来抓，一面举办训练班培训骨干，一面组织广大民兵紧密结合生产和利用生产间隙开展了练兵活动。许多地区强调了在执行战时勤务时进行训练，如怎样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在执行担架任务时，怎样抢救、运送和照顾伤员；在执行运输任务时，怎样作好伪装和避开敌机轰炸；在押送俘虏时，怎样执行政策，等等。

在政治训练中，主要是在翻身运动和土地改革的基础上，把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结合起来，把反内战与保卫翻身、保卫已有的土地联系起来，对民兵进行革命形势、战备任务和政策纪律的教育，并着重教育民兵认清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本质，提高警惕，随时准备参军参战，为保卫抗战胜利果实，保卫解放区而斗争。通过教

育，广大民兵不仅增长了对敌人的仇恨心，有了随时去参军支前的准备，而且对武器也更加爱护了。在教育中，还针对少数民兵中存在的多分多占胜利果实、打人骂人、包庇坏人等问题进行了教育。有些县、区武委会还制定了民兵纪律和奖惩制度，开展了立功运动。对于坚决执行命令，在困难情况下完成任务，自动积极配合部队，或单独作战，英勇沉着、机智灵活毙俘敌匪人员，缴获胜利品的；或在被俘后不投降不动摇，富有高尚的革命气节，保护群众利益，爱护组织和干部的；或在锄奸、救护等工作上有显著成绩的民兵与干部，视其情形分别给以奖励。凡违犯上级命令逃避战斗，不服战斗勤务与战争勤务，故意破坏、遗弃、盗卖、贪污、浪费武器弹药，故意不帮助不配合部队作战，或故意不进行操课的民兵与干部，视其情形给以惩戒。通过上述教育，进一步提高了民兵的政治觉悟，绝大多数都增强了政策、纪律观念，改进了作风，较好地克服了和平麻痹思想以及怕参军、参战、支前误工的思想。广大民兵情绪更加饱满，精神更加振奋，积极参军参战，努力生产支前。

（二）适应形势要求，为人民解放事业做贡献

1、参军参战，积极支前。内战爆发以后，我区民兵怀着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刻骨仇恨，响应“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号召，踊跃参军参战，积极支前。当时民兵中的口号是：“自己的门自己看，自己的队伍自己干”，“要想大家翻身，只有去参军”。在平大张楼英雄村的民兵辞别家乡、奔赴前线时，为使他们记住大张楼人民的血海深仇，全村父老乡亲抬着香码祭品，到抗日斗争中牺牲的烈士墓前祭奠英灵。为替父亲、弟弟报仇参军的张同马代表出征的战士宣誓：“为杀敌报仇，不打倒蒋介石决不还乡！”原寿张县何海村24名民兵，在队长张怀恩的带领下，在欢送亲人远征的同时，接过亲人手中的武器，组成了两个妇女民兵班，担负起亲人在家时负担的任务。全区在解放战争中，进行了4次大参军运动（1946年一次，1947年两次，1949年一次），都顺利地完成了任

务。如东阿三区360个新兵任务，参军600多人；任集村20个新兵任务，参军50人。1947年上半年大批民兵走上前线。东阿、茌平、寿张等县均有50%的民兵涌入部队。据不完全统计，解放战争中参军的有275600人。其中父送子、妻送郎、未婚妻送未婚夫的模范事例，数不胜数。

支前是民兵的又一个重要任务。为了保证战争胜利，我区民兵组织了担架团和运输队，部队到哪里，担架团、运输队就到哪里，哪里有部队，哪里就有民兵抢救伤员、运输物资、押送俘虏。我区民兵曾转战于陇海路南北及大别山区等地，西至太原，东至东海岸，走遍苏、鲁、豫、皖、鄂、晋、冀7个省份，先后参加睢杞、亳州、阜阴、黄口、郟城、羊山、陇海战斗以及举世闻名的淮海战役。广大民兵不怕牺牲，英勇顽强，谱写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原东阿第一担架团1214人，1947年1月出发，1948年1月底返回，行程3000余里，抢救运送伤员305名，送弹药243箱，挖成3里长的工事，拆除13里长的铁路。队员谭丙之在一次战斗中连续3次到火线上抢救伤员，最后光荣负伤。在参加民权战役时，他爬到围墙里边去抢救伤员。过围壕时，他的手被冻伤失去知觉，搂不住伤员，他硬是用牙齿咬住伤员的袖子拖出战壕。他们是担架团，又是工作队、宣传队，走到哪里，宣传、生产、劳动到哪里。他们在郟城南张之门一带，5天帮助群众开会23次，写标语428条，帮助群众割豆子898亩，种麦子1683亩，拾柴143万斤，对开展新区工作起了很大作用。原聊城市淮海战役支前营600人200付担架随军南征，仗打到哪里就跟到哪里，有时昼夜不停地转送伤员，保证了战役的胜利，荣获“冀鲁豫担架支前模范营第二营”锦旗一面。冠县在1946年底为配合正规军作战，出动了民兵14500人。据不完全统计，我区解放战争时期共支前477477人次，出担架8850付，做军鞋15万双，参加过鲁南、安阳、陇海、淮海等6次较大战役支前的，有87015人次。

2、固守黄河，抗击敌人。黄河是我区南部的天然屏障。为保证

我区不受侵犯并牵制敌人兵力，支援我军主力集中作战，在长达300里的河防线上，经常有6000名民兵、1万余名自卫队员防守。开始以区为单位分段负责，后来以分区、县为单位，统一组织河防团，昼夜守护在河防线上。河防线上挖有交通沟、盖沟和单人掩体，每里设1班，重点地段如孙口、十里井、鱼山、李桥等地段设团部或营部与敌隔河相持。具体任务是：（1）阻击渡河进犯之敌。如1947年国民党五十五师一个尖兵排两只小船在炮火掩护下，由孙口强渡，被我民兵击毁，22名敌人被打死或淹死。我固守在河防线上的民兵经常抗击着国民党2至3个整编师的兵力。（2）封锁黄河，盘查行人。1947年，原寿张一县即查获敌特62名，逃亡地主108名，国民党逃兵2182名，以及大批银元、法币、敌货等。（3）渡河袭击敌人。河防民兵为争取主动，不断渡河袭击敌人。1947年，原冀鲁豫六分区河防民兵在坚守黄河及渡河袭击敌人斗争中，毙敌449名，伤敌615名，俘敌305名。1948年，又配合作战280次，单独作战1210次，毙敌652人，伤敌914人，俘敌390人。（4）配合刘邓大军强渡黄河。河防民兵一面筑固河防，一面监造船只，挖船坞，修码头。仅阳谷河防团就准备了150只船，为大军渡黄作战创造了条件。由于民兵的紧密配合，使刘邓大军于1947年6月30日拂晓自孙口、十里井、鱼山等处顺利渡过黄河天险，突破蒋介石所谓40万大军的封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消灭敌人7个半旅，进军大别山。在此次渡河中，有2000多名民兵水手支援大军渡河，表现了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精神。特等英雄水手吴从敬、黄绍法等连续摇船送大军过河16趟不换班。原四分区指挥部的聂延进、马冠五等50名水手被评为水上英雄，并获了奖。刘、邓首长颁发了嘉奖令，赞扬了水手们的英勇顽强。

3、防奸反特，保卫胜利果实。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聊城绝大部分地区都变成了解放区，自1946年起先后进行了土地改革。这时，残敌逃到敌占区，组成武装特务，不断流窜到我解放区。如高唐、平原边界的5个区95个村中，就有武装特务7股223人，有长短枪230

支。这些匪特窜入解放区后，催粮要款，破坏我基层组织，残杀我积极分子和零星军政人员。其活动方式大都是化整为零，流窜小村庄和高粱地。如1947年8月6日特务大队长门六带28人，趁晚上下雨突入高唐扈庄，杀害区干部刘汉杰等多人。为此，我区民兵积极行动起来，配合公安局和部队，随时打击出犯小股匪特。如1947年7月，高唐赵寨子暗藏特务掌握了大部分被斗户，阴谋于17日暴动。我民兵获悉后，立即报告了上级，并配合分区独立二营，将敌人全部俘获。据高唐5个区1948年7、8、9月这三个月统计，民兵就配合或单独与匪特作战10次，歼敌30多名。全区广大民兵在党的领导下，开展了伪军自首、反奸清算等运动，同时组成了民兵联防，掀起了群众性的反特斗争，沉重地打击了特务气焰，匪迹稍敛。

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广大民兵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带头揭发地主富农的剥削罪行，斗争恶霸地主，没收其土地和财产分给贫苦农民。他们白天开会，晚上站岗放哨，严密监视恶霸地主的行动，镇压不法分子，追捕逃亡地主，有力地保证了土改顺利进行。如在土改中，东平县张楼庙富农分子暗中串连，破坏土改，民兵在党支部领导下，对他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们将地富分子的活动了解清楚后，连夜向区委进行汇报，在区委的领导下，发动群众，揭露敌人，使反动富农落入了人民的法网。

关于鄆北抗日民兵联防的回忆

李 勋 臣

鄆城县城被日军和汉奸王文宪占据后，日伪不断进犯我鄆北抗日根据地。鄆北人民群众自动组织起来，在县城以北筑起了一道半月型的群众抗日联防线。各村联防民兵严密监视敌人，敌人一出动，就遭到我联防民兵和县、区基干队的打击。因此，敌人多次进犯均未得逞，而我县、区基干队却围绕县城不断袭扰和打击敌人。

鄆北民兵联防在鄆城人民抗日斗争中做出了巨大贡献，谱写了一曲英雄凯歌。

一、我抗日县政府转移鄆北

1940年3月，我鄆城县抗日政府刚刚建立，鲁西地区日军独立混成第十旅团300余人进逼鄆城。我抗日县政府得知这一情况后，县长郭元和秘书范海波指挥政府机关撤离县城，转移到了鄆西北姜楼、大李庄一带。日军进入鄆城扑空后，当日向我转移方向“扫荡”。我政府又转移至鄆北十三庄、周庄一带，展开了敌后游击斗争。

1940年6月，我黄河支队二团奉命开往湖西地区，县大队和张超的游击队升编为主力部队，随二团开走。鄆城县的抗日武装只剩下新建的县政府保卫队和二、三、五、六等四个区队，总共不到200人。在这种情况下，王文宪叛变投敌。王原系国民党濮县县大队的一个中队长，1940年3月我黄河支队二团解放鄆城时逃往河西，经我方争取加入了我军，其队伍改编为二团独立营，王文宪任营长。二团去湖西不久，王文宪率独立营叛变投敌，充当了鄆城县伪

军大队长。与此同时，鄆城县一带的反动会道门组织“快道会”也加紧活动。反动道首以保家护院为名，欺骗群众，组织武装，暗中与日伪勾结，与人民为敌，牵牛架户，拦路抢劫，袭击我抗日干部。盘踞在濮阳以东和濮县一带的国民党三十九集团军石友三部几万人，时常出动整营兵力到鄆城西北部沿河村庄抢粮抓人。我鄆北抗日根据地东有鄆城日伪军在肖垓、傅庄安设据点，威胁箕山以东地方；南有鄆城日伪军威胁旧城、许堂以南地方；西有石友三顽军威胁武西庄至李黄庄沿河一带。在敌人包围中，我县县委和县政府只能在李进士堂周围沿大堤两沿的几个村庄秘密活动。

二、团结抗日，建立联防

1941年春，根据对日伪斗争的需要，上级决定将我县红船、引马区划归鄆南县，将鄆北的城关区、箕山区、旧城区划成7个小区（一区凤凰、二区徐垓、三区箕山、四区陈良、五区许堂、六区旧城、七区周桥）。以后又将什集、郑营、彭楼划归巨荷办事处，临濮、董口、葛庄划归鄆西办事处。那时，鄆城县实际只辖鄆北一带。区划变动后，将刘传朋领导的原六区（旧城）区队升编为鄆城县大队，各小区重新组织区队，地方武装有所加强。再加军区主力部队教三旅七团常在鄆北一带活动，鄆城形势一度好转。我抗日武装主动出击，使鄆北抗日根据地从旧城、许堂、箕山一线向南推进十几里。西起康屯、西高庄、东西刘楼、魏李庄、东西店子、杨老家，东到张大庙一线以北地区，完全被我控制。我抗日政府实行合理负担，农民负担有所减轻，人心向我，地方武装力量逐步扩大，为抗日联防的建立创造了条件。

同年春天，鄆城伪军队长马子良经常率队夜间出动，袭扰我根据地，牵牛架户，残害群众。麦收后深入我根据地，将赵庄村两户地主赵文芳（军属）、赵守道二人架到了王胡同。两家地主托人花钱，几乎弄得倾家荡产，才把人赎回来，赵庄村人人害怕。为了对付伪军的袭扰和勒索，村长赵文奎（中共党员）召集地主和群众代

表会，一致同意武装起来，抗日保家。他们把男壮年组织起来，收集枪支，打更放哨。为了吓唬出来活动的伪军，还修造了几门土炮，每天夜间放几炮，十几里地以外都能听到隆隆的炮声。这样，伪军再不敢袭扰赵庄了。离赵庄3里远的申庄见这个办法有效，也干了起来。两村一东一西，互相配合，声威大震。杨河口、西仪楼、西栗屯等村，见此光景，也跟着干起来，使东西连成了一片。以后村村串联，像滚雪球一样，一村接一村，防线越联越长。七区的康屯、西刘楼，三区杨老家、东仪楼、张大庙，四区的陈良、吕庙、周楼等村都组织起来，形成了一条东西长70余里的防线。

群众抗日保家的积极性变成自觉行动后，县委和政府及时研究了这一新形势，提出了加强领导的三条措施：一是党政军的各级干部，要热情支持群众的活动；二是想尽一切办法，不使先组织起来的村庄遭到敌人的镇压；三是按村庄远近组成联防，互相配合，互相支持。各区根据县委指示，按照村庄远近，3至5村划为一联防区，并组织成联防队，选出正、副队长。各联防队召开各村联防队员代表会议，共同商议制定联防公约。规定：站岗放哨，一村有事，他村支援，违者受罚；联防组成后，枪支由各村购买。枪支分公枪和私枪两种：全村按“合理负担”买来的枪交枪班使用，称为公枪；100亩以上土地的大户买钢枪一支，50亩土地以上的户买土枪一支，留自己使用，称为私枪。枪支的来源，一是通过关系从石友三部买，二是通过关系从伪军里买，三是富裕大户把私有的枪献出来。枪的种类很多，有“三八大盖”、“苏式水连珠”、“湖北造”、“老套筒”、“中正式”、“老铅牛”、“单打一”等。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各村都筹集了枪支，90%的村庄超过十几支，形成了一支纪律严明并有一定武器装备的抗日联防队伍。

三、整顿组织，战斗成长

联防建立不久，伪县长王文宪妄图将联防队扼杀在摇篮之中。1941年9月，王文宪配合日军出动500余人，进犯我东西刘楼和赵庄

一带。联防队和区队坚决抵抗，直到子弹打光。赵庄农会长急中生智，背着一架大鼓，跑到寨墙上咚咚击鼓。敌人摸不着头脑，以为是联防队反攻，便退回城里，这样解了赵庄之围。10月份，敌人又出动500余人，一路进犯魏李庄、西仪楼，另一路进犯徐王庄、东刘楼、栗屯、杨河口、仪楼等村。自卫队在张耀武、仪海川等人领导下，经过顽强战斗，将来犯敌人击退。西路敌人被六区区队和葛楼、赵庄等村自卫队阻击在小陈楼，不能前进。王文宪妄图消灭我抗日联防的阴谋破产。

日伪军的连续进攻教育锻炼了群众，使群众增强了对日伪军的仇恨，抗日积极性越来越高。但在联防中也暴露了一些问题：一是联防队员怕打烂自己的坛坛罐罐，只愿打阵地战，不愿打游击战，战斗中死打硬拼，不后退；二是联防组织不严，枪支无专人保管，不能充分发挥枪支的作用；三是弹药不足。县委针对出现的新情况，确定整顿联防组织。18岁以上55岁以下的男性青壮年，一律加入自卫队；从自卫队中挑选优秀人员编为模范班，每人配武器一件；从青救会中挑选优秀青年编为青抗先，每人发给武器一件。模范班和青抗先的任务是打仗，除担负本村战斗外，并负责支援外村作战。模范班、青抗先出村作战，伙食由全村负担。经过整顿，联防前进了一大步，枪支固定专人，参战人员不再轮换，组织较前纯洁，纪律进一步加强，不但黑夜站岗放哨，白天也有专人观察敌情。鸡毛信一村接一村，迅速传开，各村模范班、青抗先立即准备出击。群众为了坚持斗争，除“坚壁清野”，还积极改造地形，村与村之间都挖5尺深的路沟，沟内能走大车，地面上看不到沟里的行人。有些村庄还挖了地道，院落之间互相联通，只要进入一家，就可串遍全村。各村基本上做到：敌人多了，男女老少通过地道路沟向后方转移；敌人少了就打，不叫敌人进村。

1942年4月，形势急剧变化，日军三十五师团及伪军万余人“扫荡”鄆城、濮县、观城一带。国民党三十九集团军高树勋部由黄河西濮县退到我鄆北根据地，日军也随之进入我联防区。几万名

国民党军和数千名日军云集在鄆北这一小块根据地内，汽车、坦克、马队混作一团。日军追着国民党军来回转圈子，所到之处，抢劫财物，杀我抗日群众。仅在彭庙一带就杀死我无辜群众87人，伤30余人。在此情况下，我联防区各村模范班白天分散，夜晚联系，不但没有损失，反而帮助高部收容了不少被冲散的部队及枪支弹药。日军撤后，我联防又立即恢复起来，而且较前壮大活跃了，鄆城日伪军仍然不能奈何联防。

四、坚持斗争，渡过难关

日本侵略军为了摧毁我以濮范观为中心的冀鲁豫抗日根据地，1942年秋天先在鄆城地区设了29处据点，对我鄆北根据地实行“蚕食”。这29处据点形成了一道封锁线，切断了鄆北地区与我巨野办事处的联系。敌伪设在张殿庄、两丰张庄、尚庄、高屯、霍庄、付庄和肖垓据点，与我联防前沿村庄相距不到5里，最近的只有2里。我联防区前沿村庄“抬头可见炮楼，天天听到枪声”。伪据点为三角形，每角有一座4层高的炮楼，炮楼之外有高大围墙，墙外有宽3丈、深2丈的壕沟，设有大门和吊桥，可以随时放板，戒备森严。据点里一般驻着伪区、乡政权机关和几百名伪军。他们白天出来抢庄稼、拉耕牛，晚上出来偷袭我联防村庄。我鄆北联防处于斗争艰苦的困难时期。

我冀鲁豫军区教三旅七团在王秉章、曾思玉、李觉同志带领下，来到鄆北开展反“蚕食”斗争。9月14日，在我地方武装和联防队的配合下，发起了对敌张殿庄据点的进攻。组织联防队所用的土炮十几门，一齐向伪据点开炮，战斗打得很激烈。鄆城日伪军出城增援，我主力撤出了战斗。这次毙伤伪军30余人。我七团政委杨俊生同志腿部负伤，六区区长董复平同志壮烈牺牲。

8月27日，日伪军万余人分兵8路合围我濮、范、观中心区，妄图消灭我边区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摧毁我冀鲁豫抗日根据地。鄆城伪县长王文亮也于当日率伪军500余人尾随日军之后，到我联防

村东店子，妄图乘机摧垮我联防前沿阵地。我从东店到西店，组织五区队和联防队阻击，从上午开始一直打到下午3点钟，敌人不能前进，只得掉头回城。当敌人路过梅坊村时，气极败坏，放火烧毁该村房屋100余间。

1943年1月13日深夜1点钟，张殿庄据点的伪军60余人潜到梅坊南点燃毒瓦斯弹，妄图毒死梅坊联防队员和群众。敌人刚点燃一枚毒气弹的导火索，就被站岗的队员梅青连发现，立即开枪射击。敌人中弹负伤，其他联防队员立即进入战斗。60余名伪军丢下3枚毒弹和打火机逃回张殿庄据点。

1943年2月25日凌晨，伪县长王文宪带伪军500余人攻打我梅坊村。我县大队两个连，五区区队和栗屯、仪楼、店子等村联防队立即赶来支援。我们的部队从魏庄出发，直插苏楼，以图截住敌人退路。伪军见势不妙，慌忙撤出战斗。我县大队和各村联防队撤走以后，敌人再次攻我梅坊。当时梅坊有3个联防班，二十几棵枪和几门土炮。他们和敌人展开了顽强的战斗，一部分掩护群众往北转移，一部分坚守村西和村南两面寨墙，同伪军展开激烈战斗。当时坚持战斗的王立德、梅合信、王立本、梅青连、梅青江、王兴福、史恩东、史恩孟、史风朝、史信福、梅合藻等队员在土炮里装上铁钉、耙齿，轰击往寨墙上爬的伪军。在1小时内，攻寨敌人被我联防队打死打伤18人。伪县长王文宪见久攻不下，便脱光上衣，赤膊上阵，带领伪军往上冲。这时，我群众完全转移到栗屯，我联防队员撤出了战斗。敌人进村后，什么也没捞到，又是气极败坏，放火将梅坊400余间房子全部烧毁。

1943年2月，根据上级指示精神，为加强武装斗争的领导，建立了县、区、村三级武委会。刘传朋任县武委会主任，葛立焕、仪汇泉（仪海川）任副主任。各区、村武委会也相继建立并配齐了武装干部，模范班、青抗先改称民兵，由各级武委会领导。在鄆北许堂召开了县、区两级党、政、军、民主要干部会议。地委书记段君毅、副书记万里，军分区司令员曾思玉到会讲了话，肯定了鄆北联

防斗争的成绩，指出了存在问题。为在鄆北根据地内开展民主民生斗争，改造村政权，整顿民兵组织，地委抗联负责人杨节，青救会主任纪登奎，县抗联主任陈东升、副主任李夫等，分头下到各村开展工作。会议还决定从每年征收地方粮总数中提取20%作为民兵联防活动经费，民兵出村作战所需给养和弹药由县武委会统一报销，以减轻各联防村的经济负担。

经过民主民生斗争，农村基层党组织、村政权和群众团体普遍建立了起来。依靠党组织和村政权发动群众，整顿健全各村的民兵组织，使不坚定分子退出民兵队伍，将枪交给政治上可靠的人掌握，当时叫做“枪换肩”。经过这次整顿，各级民兵联防队都成了在党支部领导下、以贫苦农民为骨干的抗日武装。

1943年6月9日，我主力部队七团在民兵联防队的配合下，第二次攻打张殿庄据点。经过激烈战斗，击毙伪区长陈德武以下18人，生俘伪军1个中队、1个区公所和3个乡公所，共计168人。伪据点攻破后，鄆城失去前沿屏障，直接暴露在我联防区前沿，时时受到我联防民兵的威胁。日伪军为了巩固其占领区，于8月下旬出动大批部队，不惜一切代价攻占张殿庄，第二次在张殿庄安设据点。我联防民兵虽然几次破坏，因敌众我寡，终未拆除。我前沿村庄苏楼、常楼、刘双楼等村距据点只有2里，为确保这些村庄的生产和安全，我民兵联防队与敌开展了针锋相对的斗争。9月的一天，六区联防队深入到张殿以南征收公粮，队伍从张殿庄敌据点附近去王清庄。据点的伪军出动，埋伏在张殿庄村东头，妄图在我联防队返回时打伏击。五区联防队在队长李登峰带领下，从刘双楼出发，直奔张殿庄。埋伏在村东头的伪军见势不妙，慌忙向据点撤回。据点里留守的伪军怕我们抢攻据点，不顾外面的伪军，立即收起了吊桥。我五、六区联防队一齐向壕外的敌人开火，狠狠地教训了他们。一次，我们得知张殿庄敌人出来抢粮，我六区区队和民兵50余人于拂晓前埋伏在阎庄村。天大亮后，伪军两个班共30余人向阎庄而来，当进入我伏击圈后，十几颗手榴弹同时投入敌群，打得伪军四散逃

命。联防队紧追不放，活捉了伪新民会主任和1名伪军，得步枪2支。10月的一个黑夜，六区联防队40余人埋伏在张殿庄西寨门下，天亮后敌人两个班外出抢粮，当走到西门时，几十支枪同时开火，两个伪军被打伤，其余的逃回据点。经过几次战斗，张殿庄的伪军龟缩在据点里，再也不敢轻易出来活动了。

五、建立连队，积极练兵

1944年初，日军为了控制已占领的地区，组织一个有几百名日军和500多名伪军的“讨伐队”，来往在鲁西地区“讨伐”，对我民兵联防造成很大威胁。2月，我鄆西办事处撤销，所辖地区大部划归鄆城。我民兵联防线拉长，经鄆西的董口，向东北延伸到鄆城东北方向的陈良集，长达140多华里。由于战线太长，薄弱点增多，防守中多有首尾难以相顾的困难。为了适应新的形势，联防变以村为单位的分散战斗的组织形式为以区为单位组成民兵连，并在全县范围内开展练兵活动。县武委会在杨河口村搞了训练试点，在芝麻刘庄召开了民兵比武大会，进行了3天实弹射击和投弹比赛。接着又举办了两期武装干部训练班，为各级培训了民兵教员。在梅坊村还举办了地雷学习班。在训练中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边训练边战斗。我武委会干部孟吉祥带领5名民兵到敌张殿庄据点门口埋设地雷，封锁敌人出口。通过训练，民兵们不但投弹、射击技术大大提高，而且组织纪律性也大大增强。

1944年8月5日，我冀鲁豫八分区部队及所属11个县大队在鄆、鄆接合部发起了讨伐鄆城伪县长刘本功的战役。鄆城各区民兵连第一次参加联合作战。他们的战斗任务是：负责牵制鄆城日伪军，阻止其向鄆城增援，并乘机拔掉鄆城境内的敌据点。任务下达之后，县大队3个连和二、四两个区民兵连由崔玉杰指挥，将尚庄据点包围。五、六、七、八区民兵连和鄆北区队（实际上是大队1个连）由魏新民指挥，将张殿庄据点包围。尚庄据点被包围的第二天，伪军缴枪投降，据点被拆除。张殿庄被我4个连包围后，鄆城

日伪军300多人来支援，当到达王清庄以北，距张殿庄不到2里处时，被我民兵连击退。第三天我县大队从尚庄调来1个连，抬着云梯到达张殿庄。据点里的伪军趁天黑放弃据点，落荒而逃。经过这次战斗，鄆北、鄆东、郟巨的敌据点一扫而光，封锁沟全被填平，鄆北与郟巨等县交通无阻，致使日伪军只能在鄆城到菏泽一线的据点里死守，不敢轻易出动了。

1944年11月中旬，我八分区部队发动了歼灭顽军孙秉贤的战役。鄆城民兵的任务是保证高屯到顺城集一线的交通和高屯总兵站的安全。在仪德和魏新民同志指挥下，六、七区民兵连和鄆北区队驻许集，一、三、四区民兵连驻徐垓，五区民兵连驻凤凰店，保卫高屯总兵站。日伪军为了同孙顽相配合，在我军对孙部发起攻击的第二天，日军“讨伐队”到鄆城，妄图逼近高屯总兵站。次日拂晓，在李庄以南与我五区民兵打响后，敌700余人直奔徐垓，与我一、三、四区民兵大战。我民兵勇敢战斗，从早晨一直打到中午。高屯总兵站转移后，我民兵撤出战斗。在这次保卫兵站的战斗中，我一区武委会副主任仪顺卿英勇牺牲。此次讨顽战役，我分区部队在顺成集、安兴集一线歼顽军孙秉贤、张小刚部2300余人，其余顽军大部溃散。

1945年初，正当群众筹备过春节之时，伪县长王文宪与日军“讨伐队”带着几十辆大车向我苏常楼一带进犯。驻在苏常楼的民兵在掩护群众安全转移后，主动撤出苏常楼，埋伏在村西、北、东三面的抗日沟里。午后，县大队两个连在副政委崔玉杰和总支书记赵克显带领下，从鄆西赶来，会同民兵把敌人四面包围，吹起冲锋号向敌人发起猛烈进攻。敌人伤亡十人，丢弃大车及牲畜，狼狈逃回鄆城。

六、赶走日伪，投入反攻

1945年5月，地委、专署、军分区为了加强全区人民武装建设，在鄆北大石庄召开了全区各县武委会主任现场会。分区武委会

主任孙正乾任大会秘书长，地委书记段君毅、专员成润、军分区司令员曾思玉轮流主持大会。会上，魏新民同志代表鄆城县委、县政府、县武委会，介绍了鄆北民兵联防发展情况，总结了鄆城人民武装斗争的经验和教训。鄆城县武委会主任刁震川、清丰县武委会主任赵达、南乐县武委会主任武素、观城县武委会主任郝绍毅等6县的同志发了言。最后段君毅同志代表地委、专署和军分区做了总结，肯定了鄆城民兵工作经验，进一步强调了民兵工作的重大意义，号召大家学习鄆城经验，进一步搞好民兵工作。大会共开了10天，对全区群众性的武装斗争工作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地委书记万里、军分区司令员何光宇来到鄆北大石庄，在村东柏树林内帮助县委召开了紧急会议。县委书记刘镜西，委员阎迎瑞、芦川、王平波出席了会议，魏新民、仪见闻列席了会议。会上根据国内国际战争形势，决定鄆城民兵组成反攻营，由魏新民任营长，杨汝连任总支书记。还决定组织民兵围攻县城，用自己的力量把日伪军赶出去。具体方案是：县委委员分头下去，分3片动员组织民兵，在围城指挥部统一指挥下，围攻县城，进城后在城内召开反攻营成立大会。8月17日下午，按预定计划，2000余名民兵编成12个连队，同时开到了县城附近。五、六、八区民兵驻鄆北潘庄以南，二、七区和临濮民兵驻城西尹楼以东，一、三、四区民兵驻城东万全庄以西，将县城包围。伪县长王文宪于20日深夜带日伪军弃城逃往菏泽。我民兵队伍拂晓进入城内，鄆城县城解放。22日县委、县政府、县联合会、县武委会在城内召开万人大会，庆祝鄆城解放。会上，魏新民同志做成立反攻营的动员报告，当场报名参加反攻营的干部和民兵就有500多人。反攻营组成后，集中整顿训练。鄆城县大队升级，编入一纵三旅二团；反攻营被编为一纵一旅三团。这两支队伍共800余人，相继在8月底和9月初开赴平汉线，投入了全国大反攻。

（本文系根据魏新民、赵文奎、刘镜西等人回忆材料和原民兵联防干部、联防队员多次座谈整理而成。）

回忆解放战争时期 濮阳县五区党的主要工作

杨敬仁

濮阳县五区的地理位置是以子岸集、十八里堽堆为中心，北到城南边东、西八里庄，南到付将营，西到东沙窝，东到河沟、五星集，共100多个村庄。

我是在1945年7月被调到濮阳五区任抗联主任的。当时区委书记是刘建国，区长是刘竹铭，区妇联主任是王山林。8月日本投降后，上级为了开辟封丘、延津、卫南等县新解放区，将刘建国和他爱人王山林等一批同志调走。这时，我被任命为区委书记，县妇联主任程墨之兼任副书记。区长仍是刘竹铭。区抗联主任王建元，1946年春是蒋振武，土改后是王玉岭。区妇联干部赵培林。

我在濮阳五区一直任职到1947年7月。在这两年里，经历了对日军的最后一战，经历了支援邯郸我军粉碎国民党军进攻解放区的战役，经历了“双十协定”后的短暂和平时期，经历了解放战争开始后发动群众支援前线的工作，经历了1946年11月国民党五军侵占濮阳城后我开展游击战争阶段，经历了土地改革运动等，所以，对这两年间五区党的主要工作情况我是熟悉的。现特回忆如下：

一、解放战争开始前濮阳五区简况

濮阳五区是在1944年春对敌斗争形势好转之后新划的一个区（当时小濮阳县只4个区）。1944年10月，日军为掩护伪二方面军孙逆良诚移苏北，由敌首骑兵第四旅团长铃木亲自指挥，从冀鲁豫边区周围各地抽调近万名敌伪军向我边区进犯。我军将其击溃后，

乘胜攻克了濮阳县城，其外围柳下屯（柳屯）、文留、清河头、八公桥、徐镇、两门等大小30余个敌伪军据点全部为我收复。至此，濮阳县全境，包括在1941年春为便于对敌斗争在濮阳东北部划的尚和县和在东南部划的昆吾县在内，共1万平方华里的国土，700余个大小村庄，数十万同胞全部得到解放。自此濮阳县和东部的濮（县）范（县）观（城）老根据地与先后被我解放的鄆城、朝城、莘县、清丰、内黄等9个完整县和数万平方华里的国土联在一起，威胁着津浦、平汉、陇海、德石等日伪军仍在占领的重要铁路线。

由于形势大大好转，根据上级指示，尚和县建制撤销，其二、三、四区划归濮阳，五区划归昆吾县，紧靠濮阳县城的一区划归濮阳县，改为濮阳县七区，而原归顿丘县的城北胡村、安庄、波头一带划归濮阳，改为濮阳县六区。日本投降后，濮阳城关区改为濮阳市。解放战争开始后，濮阳市撤销，又改为城关区。

当时的濮阳县党政群机关领导是：县委书记史向光，副书记赵振邦，宣传部长刘淮，组织部长王志广，以后是夏树屏，县长李松延，日本投降后是郭绍汤，县妇联主任江岩，以后是程墨之，再以后是陈伯仲。

濮阳五区在七七事变前就有我地下党的活动，五星集、前五星、河沟村就有党的组织。而刘晏春（曾任冀鲁豫区党委、平原省委组织部长）、张泽民（曾任冀鲁豫四地委、以后焦作地委组织部长）二人的家就在五星集和前五星。他二人是表兄弟。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及日军侵占濮阳后，地下党组织带领群众先后向国民党反动派及日、伪、顽军进行了英勇的斗争。

1944年10月底，濮阳县全境解放，五区和全县广大群众欢欣鼓舞，都认为“熬出头来了”，决心清算恶霸地主的罪行。他们在周围老解放区民主民生斗争影响下，纷纷自动起来要进行斗争。在这种情况下，区委在县委的领导下做了积极的准备。县委还召开了全县干部大会，总结了过去，确定了方针政策，统一抽调并训练了大批干部到各区参加民主民生斗争。各区还培训了各村的贫、雇、佃

农的积极分子，依靠他们回村发动群众。在1944年11月至1945年3月，以减租减息、雇工增资、回地、反贪污、反恶霸为内容的民主民生斗争，便由点到面地在五区和全县各区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真正达到了村村诉苦报仇，处处“点火”，村村“冒烟”，家家分胜利果实，抗日歌声响彻濮阳上空。在斗争中，我们正确贯彻了依靠贫雇佃、团结中农、削弱地主阶级的政策。通过开展民主民生斗争，严重打击了恶霸地主，普遍地削弱了地主势力；广大农民在政治上得到了解放，在经济上也有了翻身，初步改善了生活；而农会、妇会、青会、儿童团、民兵普遍建立；大批优秀分子被提拔为干部，并从中发展了一批党员，达到了村村有党员，大部村庄有党支部；而村政权也都通过选举掌握在贫雇佃农手里。这样，农村的局面改变了，贫、雇、佃农优势树立了起来。在此基础上，在拥军和抗日救国的口号下，在保卫胜利果实的口号下，掀起了参军热潮。不几天，村村欢送新战士，锣鼓喧天，全区几十名好青年入了伍。接着全区内就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生产运动，种秋收麦，力争多打粮食支援前线。

8月，抗日战争的大反攻到来了。在上级领导下，五区迅速转入支前斗争，组织民兵反攻营、担架队随大军奔赴前方，磨面运粮支援军队，慰问八路军，慰劳伤员，鼓舞士气。另外还抽调了区委书记刘建国等十几名干部，随县委副书记赵振邦率领的全县干部队（共80余人）去支援、开辟新解放区。后方人民积极生产，多打粮食，支援反攻，全区处在热烈的生产和支前斗争中。

1945年10月，蒋军数万人在平汉路邯郸地区向我进攻，被我全歼。高树勋率部起义。濮阳五区人民和全县人民一起支援了这一斗争。最主要的是邯郸战役前在濮阳各区掀起了参军热潮。五区区委组织委员赵××和几个干部带头参军，各村很多好青年踊跃参军。这批新战士编入正规军后，都参加了这一战役。

解决战争开始后，濮阳五区人民和全县人民一起，进入了全力支援解放战争，以实际行动回击国民党军进攻的阶段。

二、濮阳被敌占领前五区支前和备战情况

这一段自1946年7月至11月。

(一) 层层进行传达动员

1946年7月解放战争开始后，中共濮阳县委在濮阳城内召开了各区区委以上干部会议，由县委书记史向光传达了党中央关于进行自卫解放战争，发动解放区军民大力支援前线，争取最后胜利的指示。另外，县委还对全县各区如何发动群众支援解放战争做了具体部署。

会后，五区区委首先对区一级党、政、群全体干部进行了传达、动员，然后对各村党支部，对农会妇会青会干部、村长、民兵干部进行了发动，然后依靠区村干部对全区群众进行了发动。

首先在揭露美蒋阴谋方面，在激发对蒋介石国民党的仇恨、提高阶级觉悟方面，都注意了与控诉本村地主对贫、雇、佃农的剥削压迫结合进行。

在此基础上，使干部、群众认识到，地主阶级之所以敢对贫、雇、佃农剥削压迫，就是因为有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头子蒋介石的支持，而要保卫群众民主斗争的胜利果实，要在经济上、政治上彻底翻身，就必须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这样，使各村干部、群众进而掀起了对蒋介石国民党的控诉。不少村还扎了模拟蒋介石的草人，面对面地进行揭发控诉。不少群众在控诉到最气愤时，不仅上前打了草人蒋介石，有的还用刀子刺进他的心脏。通过揭发控诉活动，激发了广大群众对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的阶级仇恨，提高了阶级觉悟，因而广大群众都决心支援前线，为打败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而奋斗。

在宣传我军必胜、蒋军必败方面，在宣传我军作战方针，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敌，主要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不计较一城一地得失方面，我们是结合党的历史（红军时期、抗战时期），结合我党我

军在敌后对敌斗争的历史、在濮阳打游击的历史进行的。当时我党我军力量还小，敌强我弱，但都在毛主席领导下，在广大群众支持下，由小到大，由弱变强，经过艰苦奋斗，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在日本投降后，又取得了上党战役、邯郸战役的胜利。因濮阳县广大人民群众都经历了抗日战争的考验和锻炼，再加上我们这样教育，并通过宣传我党战胜蒋介石的有利条件，特别是通过宣传解放战争开始后我军在苏中解放区七战七捷，消灭蒋匪军6个旅、5个交警大队和刘邓大军在菏泽、定陶、曹县歼灭敌军4个旅等胜利战例，大大提高了广大群众战胜蒋介石的信心和决心，鼓舞了广大群众的斗志。

（二）积极支援前线

解放战争开始后，我刘邓大军为了配合中原、华东人民解放军作战，于1946年8月10日至21日分数路向驻在陇海路上开封至徐州一线的敌军出击，先后占领了砀山、兰封等10余个城镇，歼敌1.6万人；接着自9月3日至8日我刘邓大军又进行了定陶、曹县战役（大杨湖战役），消灭敌军4个旅1.7万人。在这个战役中，濮阳五区组织了支前担架队，每次60付。全县每次组织250付（每付担架8人，每3付为一班，30付为一排，还配备有民兵，都有区干部带领）。第一次是在县委组织部长夏树屏带领下随大军奔赴前线的。夏树屏本人在枪林弹雨中亲自背下一位伤员，受到了濮阳县委的表扬，全县干部并开展了向夏树屏学习的运动。当时的《冀鲁豫日报》还在头版刊登了“向夏树屏学习”的特大号标题的消息。以后在10月豫北上官林、邵尔寨战役中，五区也组织了50付担架奔赴前线。另外，为了支援前线，五区和各区还组织了接送伤员、慰问伤员，出动大车小车（数字已记不清）送军粮军衣，送作战物资等。支援前线的干部、民兵回来后，都带回我军胜利的喜讯，更进一步鼓舞了广大群众的斗志，坚定了胜利信心。

(三) 动员党员、干部、群众积极备战

由于战争迫近濮阳，而我军采取的是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原则，并不计较一城一地的暂时得失，而是诱敌深入，寻机歼敌，因此，濮阳县城和大的集镇就有可能暂时被敌军占领。为此，县委在一区苏家楼村召开了会议，各区区委书记以上干部都参加了。会议具体部署了备战工作，提出要动员一切力量，在濮阳县境内开展反对国民党军的游击战争，要“县不离县，区不离区”，领导干部、党员要起先锋模范作用，要亲自带领民兵战斗，以达到控制广大农村、保卫群众利益、打击反动派活动的目的。同时，要通过开展游击战争，扯住更多的敌军主力在濮阳县城圈内，而使我军寻机歼敌，以最后解放濮阳县城。

会后，五区和各区一样，除一面组织力量继续支援前线外，留在区里的干部都以抓备战为主。具体作法是：

首先对干部、党员、群众、民兵继续进行“我军必胜、蒋军必败”的胜利前途教育，说明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不计较一城一地之得失的战略战术意义，讲清了坚持开展游击战争的有利条件和实际困难。号召区村干部、党员、民兵在敌军暂时占领濮阳期间，积极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保卫群众利益，打击反动派的活动，要做到“县不离县，区不离区”，千方百计就地坚持，直到胜利。号召区村干部、党员都拿起武器，带头参加战斗，要以打好游击战来配合主力部队作战，为解放濮阳，最后打败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而做出贡献。

其次，为了控制地主、汉奸、敌军家属和可能通敌的分子在敌暂时占领期间进行破坏活动，五区干部还分别把他们召集起来，向他们指明“我军必胜、蒋军必败”的前途，向他们指出，敌人的占领只是暂时的，在这期间，我们五区干部、基干武装和广大民兵决心就地坚持，打游击，警告他们要老老实实，不许搞破坏活动，不许通敌资敌，不许当还乡团，不许反攻倒算等。不少地主、敌军家

属都作了保证。以后事实证明，在敌军占领期间，只有少数地主、敌军家属、惯匪、流氓参加了还乡团，进行了破坏活动，而大部分地主则没敢动。

另外，为了就地坚持游击战争，我们抓了武装建设。首先建立了区基干队武装（属地方武装）。通过动员，有20多名青年踊跃参军。上级还派来专职武装干部张存善任区基干队副队长，武器也配备了。另外，上级还派来区武委会主任麻××，专职领导民兵战斗。区基干队长由区长兼任，政委由区委书记兼任。此外还建立了脱产民兵反蒋营（有150人）。为提高区队、民兵士气，除专门进行战争动员以外，还开展了控诉蒋军罪行的活动，激发了战士、民兵对蒋介石的阶级仇恨。大家斗志昂扬，纷纷表示决心打好游击战争。

此外，我们还开展了挖地道活动，准备进行地道战。当时五区决定在区南半部动员村干、民兵、群众挖地道，要求地道高1.5米左右，宽1米，进口在村内某户家中，出口在村外200米以外的树林里或坟头边或路沟边。要留枪眼，要储存粮食和水，要有照明设备，要易攻易守。如条件许可，可几家挖通。要动员苦大仇深的贫雇农参加，地道口应选择在最可靠的勇于献身的贫雇农党员家里，并且要保密。除一般号召外，县委、区委还各确定了一个点儿，自己组织力量秘密挖。县委负责的点儿在段河沟，区委负责的点儿在小汪掘地村汪涌波（区干部）家。整个挖地道工作自10月份开始，到11月还未挖好，国民党新五军就来了，所以大部分地道无法利用，仅利用了两个秘密挖的点儿。

三、敌占濮阳城后，我开展游击战争的情况

1946年11月中旬，国民党新五军侵占了濮阳县城，在大集镇如两门、大桑树、五星集、子岸集、高寨、张良庄、沙垌堆、桥上、胡状、清河头、新习等都安了据点，驻有重兵。仅五区中心子岸集就驻了一个团。在高寨还设有外围据点。在城南边东、西八里庄一

带还驻有还乡团等。随蒋军一块来的有还乡团逃亡地主、恶霸、惯匪、杀人刽子手和国民党特务、汉奸等。反动头子丁树本也卷土重来，梦想重新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他们来后迅速建立区乡反动组织，拉拢土匪，招兵买马，成立反动武装，建立据点，进而迫害进步人员。一些当地的土匪、流氓、反动地主分子也跃跃欲试。动摇投机分子在敌人的威胁下也想倒过去，有的已叛变投敌。

在这紧急的情况下，五区区委决定：除留汪涌波、王常本、王金山等7同志依靠群众，利用地道就地坚持外，区基干武装、脱产民兵（包括拿起武器和民兵编在一起的区干部）在区委书记杨敬仁、区长刘竹铭带领下暂时转移，先到城东北七区，再转到清丰东边。这时，区委决定从这个队伍中挑选40人，组成精悍的武装作为先遣队（实则武工队），由杨敬仁、刘竹铭、县委组织部长夏树屏带领，设法迅速钻进敌后（濮阳城南）本区打游击。其余干部、武装由区委副书记蔡鸿儒带领，暂留后方待命。这支先遣队由清丰北边（也被蒋军占领）转移到清丰西南沙区，在11月23日夜间冲破敌封锁线，经过濮阳二区插进五区。当夜和在小汪掘地村钻地道的汪涌波等同志取得了联系，了解到子岸集、五星集、高寨、大桑树等都是敌人据点和敌人兵力等情况后，就开始依靠群众就地打游击。

我们这支先遣队钻进五区后，就驻在子岸集南边、东南边六七华里的杨村、河沟一带。开始是隐蔽的，夜间到一个村后，找村边易守易走、地形好的老乡家住进去，第二天下午、晚上就开始公开活动，了解各村被敌侵占的情况，召开干部会、群众会。群众对我们钻回来打游击都很欢迎，纷纷给我们提供情况，给我们解决粮食，为我们保密。经过几天活动，了解了敌人的活动规律后，我们就准备打击出来抢粮的小股敌人。1946年12月初的一天上午，刘竹铭同志率领先遣队一部分队员在杨村北边隐蔽。这时，子岸集蒋军30余人出来抢粮。刘区长率众迎头痛击，把这股敌人打跑了。区长的枪托上被打了一个洞。这个小战斗鼓舞了群众，提高了先遣队的士气，当时还登在《冀鲁豫日报》上。12月中旬，区武装还在杨岩

设伏，打得还乡团狼狈逃窜，还活捉了5人。

在这一时期，县基干大队在县委书记史向光、大队长张连兴带领下，也打了几个胜仗。周围各区，特别是二区武装，在区委书记徐志一领导下，在七公寨等村打了几个胜仗。这些对五区广大群众都有很大影响。

经过以上战斗，扩大了我党我军影响，打击了敌人的反动气焰，小股敌人再也不敢轻易出来了。自此，我区武装不仅下午、夜间能公开活动，而且上午也敢公开活动了。我们有时集中，有时一分为二，到各村宣传我军必胜，蒋军必败，揭穿敌人造谣、欺骗的阴谋，坚定群众的胜利信心，同时恢复各村党组织和农会、妇会、村长等的活动，稳定群众，巩固农村阵地。

1947年元旦之夜，由区委副书记蔡鸿儒带领的暂留后方待命的大批干部、武装也钻回了五区，和先遣队会师了，从此开始了更广泛的活动。元月，为了巩固我们经常活动的农村阵地，我们镇压了勾结敌人、欺压群众、给敌人送情报的×河沟村惯匪×××和五星集的地头蛇×××（姓名均记不清了）。然后，我们在这两个村召开了群众大会，宣布了他们的罪状，使该村和周围村庄的广大群众人心大快。

2月某日下午，我区干部和武装在子岸集北边小汪掘地、史掘地等村活动，与从濮阳出动的还乡团遭遇，当即给了进犯之敌以痛击。敌人狼狈逃奔濮阳城，我区武装一直追击到安寨以北8里地远。

2月，冀鲁豫四分区武装两个连在分区干部楚银锋带领下，来我五区活动。我区武装奉命与分区武装联合行动。中旬一天的拂晓前，五区武装埋伏在阎岗村，分区武装埋伏在葛邱村，联合伏击从濮阳城里出来的敌人。上午11点，濮阳城里一股敌人50余人列队进入我伏击圈。但我们尚未行动，敌人就发觉了，慌忙北逃。我五区干部、基干武装和民兵全部勇敢地追了上去，直追到八里庄。敌人利用土墙作掩护，对准五区追击的队伍集中射击。但在我区武装勇猛冲击下，在分区武装机枪扫射下，敌人又溃退了，向濮阳城里逃

去。这次战斗打伤了几个敌人。

以上两个小胜仗，对五区全体干部和武装是个很好的锻炼和考验，进一步增强了他们的斗志，同时，进一步稳定了群众情绪，控制了敌据点以外的广大农村阵地。

在此期间，我们还在夜间深入到濮阳城边八里庄割了几次电线，其中一次从八里庄至邹铺就割了6华里的电线，切断了濮阳敌人和子岸集、两门等据点之间的联系。

2月下旬，濮阳敌人还乡团二十几人在其头子王涌才带领下到了村一带抢粮。五区武装闻讯后跑步前往，打退了敌人，活捉了王涌才等几人。王是西掘地人，抗日初期曾给我濮阳第一任抗日县长王卓云当警卫员，以后叛变。这次蒋军侵占濮阳后，他认为机会到了，就招兵买马，拉起一支土匪、流氓队伍，随蒋军进了县城。他时常带领还乡团出来欺压群众，当地群众对他痛恨已极。这次把他活捉了，群众非常高兴，都要求给他严厉处置。这时，我解放军主力一部也来濮阳五区活动，驻在河沟一带。我们就趁这个机会，请示县委批准后，在河沟村召开了万人大会，经过群众对王涌才揭发控诉后，将其枪毙了。这一举动大快人心，政治影响很大。

由于打了几个胜仗，濮阳五区局面进一步打开了，所以区委决定区干部和武装分三摊活动。由区长带领一部分武装到敌据点子岸集南边一带活动；由区委书记带一摊仍在河沟一带活动；另外，由于县委布置了要抓土地改革，“一手拿枪，一手分田”，所以决定由蔡鸿儒带一部分干部负责培训土改积极分子的工作。

由区委书记杨敬仁带领的这部分武装，由于前一段接连打了几个胜仗，思想上有点麻痹了，所以在河沟村召开万人大会后没及时转移，驻到第三天天明，就遭到驻县城敌人正规军的三面包围。如果不是同志们勇猛冲杀，乘敌人还差1华里合拢包围圈的机会冲出来，真不知要遭到多大的损失呢！

1947年3月，解放军主力来濮阳活动。我刘邓大军发起了浚（县）淇（县）战役，消灭了敌人一个快速纵队。濮阳敌人怕被我

军歼灭，便往滑县、新乡方向逃窜，却在途中被我全歼。至此，濮阳县城和县内各敌据点全部解放。

四、土地改革情况

1947年3月，五区和各区游击战争开展得很好，打了不少胜仗，控制了敌据点以外的广大农村，稳定了群众。东边昆吾县已没有敌人，濮阳三区（八公桥一带）已完全被我控制，有了巩固的后方。这时县委布置要进行土地改革，平分土地，要“一手拿枪，一手分田”。区委决定由蔡鸿儒专抓这一工作，主要是培训干部和积极分子。当时召集了部分村庄农会干部和苦大仇深的贫、雇、佃农中土改积极分子在濮阳三区某村开会，讲了党中央关于土改的指示精神和县委的部署，讲了要坚决依靠贫、雇、佃农，团结中农，消灭地主阶级的政策，并用典型事例讲了地主压迫剥削贫雇农的滔天罪行，指出只有贫、雇、佃农起来，团结中农，坚决地向地主进行斗争，进行土改，平分土地，消灭地主阶级，才能使贫、雇、佃农在经济上、政治上彻底翻身解放。这些干部和积极分子经过培训，都提高了阶级觉悟，决心回到本村后发动群众搞好土改。

3月底濮阳全县解放，五区和全县各区除继续组织人力物力支援前线外，大部力量转向土改。区里以区委、抗联为主负责土改，全区分四个小区，各有个工作组负责本小区的土改工作。县里也派来妇联主任陈伯仲等几个同志来五区帮助和参加土改。各小区工作组都依靠各村农会干部，吸收苦大仇深的贫、雇、佃农土改积极分子参加，来领导本村的土改运动（以后改叫贫农团）。各小区都抓了培训积极分子的工作，学习党中央关于土改的指示精神及方针政策，学习划分阶级成份的宣传手册，进行阶级教育，提高阶级觉悟，在此基础上全面铺开。就这样，在很短的时间内，一个消灭地主阶级的伟大斗争——土地改革运动，在“中间不动两头动”（即中农不动，将地主霸占的土地归还贫、雇、佃农）、“填平补齐”的策略指导下，在全县范围内普遍地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6月初，冀鲁豫四地委在濮县二区湾子村召开各县县委和区委委员以上干部会议。地委书记赵紫阳传达了党中央和区党委关于土改和扩军的指示精神，总结了四地委农村工作和土改工作经验，肯定了昆吾县土改的经验，最后总结时，对各县区进一步开展土改运动做了具体部署。会后，各县区土改运动就更加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濮阳五区还开了万人大会，几个苦大仇深的贫雇农上台揭发控诉了地主的罪行，有的边哭边诉。“打倒蒋介石”、“打倒地主阶级”、“坚决搞好土改”、“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响彻云霄。会后，土改运动进入高潮，村村斗地主，村村算帐烧地契，平分土地，分配地主房屋和财产，使贫雇农住上了瓦房，盖上了棉被，穿上了新衣服，并且还有了过冬的棉衣。群众兴高采烈，欢欣鼓舞。在这期间，有些残酷剥削欺压农民的恶霸地主，如大汪掘地的汪再林、五星集的刘芳星等，通过群众揭发控诉后镇压。这样解除了群众的顾虑，使贫雇农不仅在经济上翻了身，并且在政治上也翻了身。因之，群众的斗争积极性更高了，决心跟着共产党走。

1947年6月下旬县委决定：为了密切党和群众的联系，每个区公开一个党员，区委书记党员身份公开。（过去区委用区工作队名义，区委书记用区指导员或区政委名义，而各村党支部、党员都是秘密的。村党支部、党员公开是在1948年整党以后进行的。）濮阳五区当时的区委书记杨敬仁的共产党员身份向全区群众公布后，各村自发地掀起了拥党活动，群众表示拥护共产党，坚决跟着共产党走。村村户户都买了毛主席像，有的村没买到，还到区委会去要。五区在大汪掘地召开了全区万人拥护共产党大会。各村农会会员都敲锣打鼓，吹着唢呐，举着毛主席像，举着写有“拥护共产党，拥护毛主席”、“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字样的旗帜，列队进入会场。有些村的贫农代表上台给区委书记戴上了大红花，有的村贫农代表上台，用红绸子绿缎子交叉着给区委书记披挂在身上，名之曰“披红戴花”。区委书记身上一下子就披挂了好几套。有几

个村子的贫农代表还上台表示了坚决拥护共产党、坚决跟着共产党走的决心。有的还表示：“决心搞好生产，搞好支前，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贡献自己的力量，以实际行动来拥护共产党。”区委书记也讲了话，向全区群众表示了决心。整个会场上，“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震天动地，拥护共产党的气氛达到高潮。

区拥党大会后，各村贫雇农土改积极分子又掀起了申请参加共产党的热潮，他们纷纷找区委书记，要求参加共产党。对此，区委向各村党支部做了布置，对在土改中涌现出来的贫雇农积极分子要进行培养和审查，对其中够标准的要按照党章的规定吸收入党。就这样，很短的时间内，大批够党员条件的土改积极分子被吸收为共产党员，有的村原来没有党支部的，也建立了支部。

通过土改，各村广大群众也积极地投入了生产运动。过去是给地主种地，现在是在自己分得的土地上种地，因此农民群众积极性很高，决心多打粮食，支援解放战争。大家还在“保卫胜利果实”、“支援前线”的口号下，积极参加了支前斗争，组织担架队、大车队、小车队运粮运作战物资奔赴前线，有力地支援了1947年7月刘邓大军过黄河，在金乡地区消灭敌人9个半旅之后向大别山的进军。

1947年10月，为扩大人民武装，迎接全国解放，濮阳五区遵照上级指示，在土改胜利的基础上，深入发动群众，掀起了群众性的参军参战热潮。新上任的区委书记蔡鸿儒带头参军（原区委书记杨敬仁调浚县任县委宣传部长）。在党员干部带动下，各村广大青年踊跃报名参军，父母送子妻送郎的动人场面到处可见。据统计，仅五区参军的就有760多名，全县共有1.1万多人参军，成立了新兵旅，还开了誓师大会。新兵们都决心练好杀敌本领，奔赴前线，不推翻蒋家王朝决不回家。

以后濮阳五区还进行了土改复查，学习和贯彻了土地法大纲，整党，党员公开，抽调干部和翻身农民去支援新解放区的土改斗

争。1949年初，区委、区政府和各区一样，包括县委、县政府都一分为二，抽一半干部，在县委书记夏树屏领导下随大军渡江南下，解放全中国（冀鲁豫边区干部主要是开辟贵州省）。由于当时我已调离五区，详情就不知道了。

关于濮阳五区的土改斗争，基本上是健康的，成绩是很大的。但也有缺点：（1）由于组织不够纯，有的村土改不彻底。（2）“搬石头”，把日本投降前开展民主民生斗争时涌现出来的农会干部撤开，而改用土改中涌现的积极分子为各村农会干部，这种作法不妥。因民主民生斗争中涌现的积极分子干部也是贫、雇、佃农，他们在土改中大多数也是积极分子，所以他们不是“石头”，不应搬开，不应大换班。正确的作法应是新老农会干部团结合作，共同战斗。（3）我们的任务是消灭封建制度，消灭地主阶级，而不是消灭地主个人。但当时杀人多了些。另外，有些村还伤害了富裕中农，执行政策上有“左”的偏向。

冀鲁豫边区群众运动大事记

田苏苏 王 潮

1937年

7月7日 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

9月 中共山东省委书记黎玉向到济南请示工作的中共鲁西北特委负责人徐运北、刘仲莹传达了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指示，要求共产党员深入敌后，开辟鲁西北抗日根据地。

9月 共产党员金谷兰、马凤元、尉景平、杨中一等在禹城、高唐一带组建了一支抗日武装——冀鲁抗日游击队第七大队。

9月 中共临清特支李葵元等以临清县为中心，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被分配到国民党山东第四区政训处的周子明（周自睿）等数十人，在与临清特支取得联系后，分赴恩县、丘县、唐县等地，发动群众，组建抗日武装。

9月 北方局军委书记朱瑞到豫北、直南领导抗日斗争，在新乡开办抗日游击训练班，后改为华北抗日军政干部训练所，共办5期，训练青年干部2000余人。

10月 北方局决定撤销中共平汉线省委，原中共直鲁豫边区特委和中共冀南特委所属地区的工作，由朱瑞代表北方局直接领导。

10月 曾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以下简称“民先”）的清华大学学生马继孔，同北平大学学生左平返回泰安县家乡，与张侯乡乡长安春华、孙伯乡乡长许梅村等，在青年学生中宣传抗日，从中动员30余人建立抗日游击队。翌年2月2日，马继孔到肥城与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汇合，2月5日，和宁阳原有的两支抗日武装汇合，并收复宁阳县城，消灭宁阳县伪维持会，俘伪军70多名。

10月 共产党员万里在东平的小学教师和学生中发展“民先”队员，成立抗日救亡协会，编印《抗日救亡周报》，组织青年去延安抗大学习。

10月 山东省委通过第三路军政训处长余心清，从第三路军政训班平津流亡学生中挑选以共产党员和“民先”队员为骨干的政训服务员240名，分3批到范筑先部工作。他们被分配到各县政训处、动委会、游击支队，宣传动员群众。

10月 国民党第五战区民众总动员委员会成立，李宗仁任主任。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书记郭子化以社会名流、学者的身分参加动委会。共产党员郭影秋任组织部总干事，并以动委会的名义，在各地开办游击训练班，普遍建立抗敌后援会、“民先”、抗日救国会、青年救国会等，其中开办两期训练班，有300余名进步青年经过训练派往各县。

10月 齐河县华集村附近几十个村庄上万群众，在“抗日打东洋”的口号下，以大刀、红缨枪、棍棒、铡刀为武器，将进犯华集村的日军300余人包围。农民华卓廷奋勇冲入敌阵，用红缨枪将日军机枪手刺死。经激战，毙日军10余人。

10月 在我党营救下，共产党员张北华、赵健民、潘复生、远静沧（原静沧）、崔子明先后出狱来到鲁西、泰西地区，发动群众抗日工作。共产党员王从吾、刘汉生、徐麟村等也陆续越狱或获释，到冀鲁豫发动群众抗日救亡活动。

10月 共产党员晁哲甫、平杰三等在清丰、濮阳、南乐一带组织“冀南抗日救国十人团”，平杰三任总团长，安法乾、冯叶莘分任组织委员、宣传委员。“十人团”分别在清丰县、南乐县和濮阳县建立了3个分团，团员迅速发展300余人。

10月 中共泰安临时县委组织泰安县各界抗敌后援会和泰安县民众总动员委员会，进步人士范明枢为主任。同时，在鲁宝琪、马馥塘、于一川、朱玉干等推动下，成立泰安县人民抗日自卫团，马馥塘任团长。

10月 长清县人民抗敌后援会成立，张耀南任会长。不久，共产党员魏金三、夏页文和张耀南等，在长清县坦山组建了一支30余人的抗日游击队，后发展为六七十人。主要成员为“民先”队员和抗敌后援会宣传队成员。翌年2月4日，长清县抗日游击队正式命名为山东抗日军。同月，改编为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第四大队，冯晓云任大队长。

11月 山东省委派张霖之主持鲁西北工作。张霖之指示鲁西北各县党组织，动员青年农民和知识分子参军参战。同时，鲁西和鲁西北两个特委合并为中共鲁西北特委。

11月 堂邑县办事处共产党员解彭年、李福尧等，同当地党组织负责人王晋亭、鲍廷干、于少畬等，动员一部分小学教员、青年学生和青年农民，以一二十条枪组建了一支抗日游击队，由鲁西北特委派红军干部洪涛任队长，活动在凤凰集、肖香坊、大觉寺一带。以后，以这支队伍为基础，组建了由鲁西北特委直接领导的武装——范筑先第十支队。

11月 鲁西北特委吴鸿渐等到冠县，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农民中发展“民先”队员，建立抗日救亡小组。

11月 被关押在国民党监狱的原邹县党组织负责人彭建华、冯起等人于10月中旬出狱后，恢复中共邹县县委，并建立起一支抗日游击队。至11月底，这支游击队发展到300余人，在邹县西部南亢正式组建为鲁西南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冯起任总队长。邹县县委还在济（宁）东、兖（州）南、邹（县）西和鱼台一带组织起近百个村庄的抗日自卫团，在南亢设立鲁南人民抗日自卫团团部和政治处，冯起任团长，彭建华任政治委员。团员约2000余人。

11月 中共鲁西特委书记刘晏春指挥濮县二、三、四区的地下武装，在高堤口乡乡长马功臣等的配合下，收缴该乡东池子村民团的90余支枪，正式组建了濮县抗日游击队，刘茂斋任队长，刘培岑任指导员。同时，范县和观城县党组织也建立了抗日游击队。这几支队伍到清丰县后，合编为直南民军第四支队四中队。

冬 中共禹城县委在连五高庄小学成立青年救国会，有长短枪10余支。1938年夏，改为八路军一二九师独立旅武装工作团。

12月 济南乡师撤至巨野的部分学生50余人组成山东省第二区（菏泽）教导队。翌年初北上抗日，编为范筑先部第十支队教导队。

12月 共产党员高元贵在博平举办军事干部训练班，中小学教师等爱国青年40人参加。

12月 共产党员申云浦在阳谷举办政治人员训练班，组织抗日巡回宣传队，400人参加。

12月 日军侵占济南，继而侵占泰安、曲阜、邹县。范筑先部据守在鲁西北，成为全国瞩目的敌后抗日根据地。

1938年

1月1日 张北华、原静沧、夏振秋、程重远等率一支10余人的群众武装在泰安西南的夏张镇一带举行抗日武装起义。11日，与王仲范、张韶三、张魁三、李文甫、徐麟村、葛阳斋等组织的几支抗日武装汇合，正式成立了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张北华任主席，葛阳斋任副主席，原静沧任政治部主任。17日，自卫团冒雪袭击肥城县城，处决伪维持会长范维新等，缴获长短枪10余支。28日，自卫团突袭津浦铁路上的界首村敌据点，毙日军18人。自卫团在以后的三个月内很快发展到17个大队、1个先锋连、1个特务队，共1000余支枪，2000余人。

1月 堂邑县的第一游击大队，与冠县、博县、范县、寿张等县的抗日武装合并，建立第六区游击司令部第十支队。

1月 中共直南特委在清丰县古城成立。

2月5日 汶上、东平两县百余名青年学生、教师和农民等，在汶上县永安寺举行抗日武装起义，成立了汶上县人民抗日自卫队。

2月 直南特委向各县党组织提出三项任务：（一）发展党员，宣传抗日的有利条件和前途，提高群众抗日信心；（二）动员

坚定的农民、学生和“十人团”的骨干，携枪参加和支援四支队，扩大抗日队伍；（三）贯彻党的统战政策，争取士绅、民团参加抗日，防止地主武装汉奸化。

2月 晁哲甫回清丰县任中共清（丰）南（乐）边东县委书记，同安法乾、刘镜西、郭献瑞、王志刚等成立了清丰县抗日民众自治委员会，并改造地方民团，建立抗日民众联合自卫团，团员1300余人。晁哲甫自筹粮款，在清丰六塔集开办4期抗日军政干部训练班，发展了一批“民先”队员和共产党员。

2月 中共单县县委根据中共鲁西南工委指示，于张寨举办抗日骨干训练班，在周围数十村组织起抗日自卫团。

2月 平原乡师学生、共产党员赵振清在家乡临清组织青年抗日救国团，并从中发展党员。

3月中旬 中共冀鲁豫边区省委在南宮县成立。鲁西北特委、直南特委均划归冀鲁豫边区省委领导。

3月 郭影秋以第五战区民众总动员委员会组织部总干事的身分召开青年代表大会，成立青年救国团。该团迅速发展苏、鲁、豫、皖4省的30多个县，参加者万余人。

3月 直南特委建立清（丰）南（乐）大（名）抗日救国会，马彩三任会长。救国会派出巡视员深入农村宣传组织群众，建立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自卫团等。

3月 共产党员王笑一在临清县建立了民族解放战争临清县总动员委员会。

3月 中共郓城中心县委在郑集举办3期抗日救国训练班，训练青年百余人。

3月 曹县成立青救会。国民党人王子魁任会长，共产党员刘齐滨为副会长。中共曹县县委举办青年训练班，培养骨干200余名。

3月 高元贵到冠县与当地党的负责人郭英建立冠县政训处，培养青年抗日骨干。

4月 直南特委组织部长刘晏春召集濮阳、滑县、东明、长垣

4县党的负责人，于濮阳张祿湾举行会议，建立了濮滑东长4县边抗日救国会，牛万里任会长。

4月 民主人士聂峨亭在共产党员马霄鹏、郭耕夫等动员下，在鱼台县成立抗日救国司令部。

5月1日 “民先”鲁西总队部成立，下设组织、政治、青年、妇女、儿童5个分部，徐少岩任总队长。鲁西北各县先后建立“民先”分队部，范筑先部的多数支队中亦建立了“民先”中心队。8月底，“民先”队员发展到2500余人。

5月 5月1日鲁西北特委召开全区政治工作会议后，第六区抗日游击司令部政训处改为政治部，开始组织由政治部领导的各种群众抗日团体。各县相继建立了农民互助会、自卫队、回民救国会、文化教育抗日救国会以及妇女、青年抗日救国会和战地服务团、青年记者团等。

5月 清丰县抗日战争动员委员会成立，晁哲甫任名誉会长，下设总务、组织、宣传、动员、分配、武装、锄奸、青年、妇女、农民等部。

5月 直南特委在清丰县六塔集召开各县救国会代表大会，成立了冀鲁豫抗日救国总会，安法乾为总会负责人。总会下设总务、组织、宣教、农民、青年、妇女儿童、武装等部。

5月 “民先”鲁西北总队部创办的《先锋》和各抗日团体创办的《行军日报》、《战地文化》、《战线》等报刊先后出版发行。范筑先在聊城建立第六专区政治干部学校，培训抗日干部。

5月 曹县西北义合乡共产党员郭心斋，建立四五十人的抗日自卫大队，东明、长垣县有些村庄群众参加了自卫大队。

5月 朝城回民抗敌救国会成立，会员约1500人，发布抗战行动纲领与成立宣言，号召回民组织起来，参加抗战。临清、冠县、丘县也建起了回救组织。

5月下旬 沛县人民抗日义勇队与苏鲁人民抗日义勇队在滕县、峄县边的南塘、凤凰庄、善埕一带会师，正式组建为苏鲁人

民抗日义勇队第一总队，下编3个大队，共600余人，张光中任总队长。

5月 由40名妇女组成的聊城战地服务团成立，负责人是金维、许可、张扬、范晔晴。

6月10日 中共河南省委组织部长吴芝圃和省委军事干部王海山，将杞县中心县委和睢县县委组建的抗日武装编为睢杞抗日大队，共200余人，王海山任大队长。睢杞抗日大队在吴芝圃等指挥下，先在杞县花胡寨附近袭击抢粮的日军骑兵小队，后攻占睢县地方顽军张心贞盘踞的长岗集，声威大振，部队迅速扩大到1800余人。在此基础上，正式组建了豫东抗日第三游击支队，吴芝圃任支队长，王海山任副支队长。同时，西华地区党组织负责人沈东平等建立了第一战区自卫军第七路，共1500余人。

6月11日 郝中士等人领导的沛县抗日武装，李贞乾领导的丰县抗日武装，孟宪琛领导的砀山县抗日武装，高文甫、王华瑞领导的单县抗日自卫团等部在丰县组建苏鲁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

6月 鲁西北特委重新分为鲁西、鲁西北两个特委。

6月 丰县各地成立了青年抗日自卫团等群众团体。李贞乾在其家乡李新庄开办农民训练班，集资购买枪支弹药，组建起60多人的抗日游击队，不久发展到900余人（枪）。

6月 中共铜山县工委组建了农民抗日自卫队。宿县抗敌社动员群众，在宿县西北举行武装起义，组建起抗日游击队，并很快发展到1000多人。萧县、沛县、砀山、永城等县都分别建立了抗日武装。

7月10日 滑浚淇3县抗日自卫军成立，共800余人。孙紫方任司令员，刘耕夫任副司令员，王舒苗任政治部主任。

7月下旬 直南特委将原四支队一个排与濮县、范县的冀鲁豫边区民众抗日义勇军、清丰县抗日救国会等武装合编，组成黄河支队，鲁德明任支队司令员。

7月下旬 豫东新黄河西岸的抗日部队组成东进支队，并深入

睢（县）杞（县）太（康）地区，与吴芝圃所率第三游击支队共同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8月初 鲁西南抗日救国总会成立，刘齐滨为会长，程力夫任副会长。在总会领导下，菏泽、考城、民权、曹县等地先后建立了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等。同时，中共曹县县委以动委会名义举办两期青年训练班，培养了200多名青年抗日骨干。

8月 冀鲁豫抗日救国总会迁入濮阳县城。为充实领导机构，安法乾任组织部长兼党团书记，许敬贤、逯昆玉分任宣传、总务部长，陈友菊、范世钧先后任妇女部长，王师然、杨泽江先后任青年部长。

9月下旬 中共冀鲁豫边区省委在南宮县韩庄举行活动分子大会，省委所属各县的战委会主任同各特委、县委书记，专员和县长一起参加了会议。

10月中旬 八路军黄河支队汤阴县抗日政府武装两个连，合编为八路军游击队第二支队。11月初，滑县抗日自卫军亦编入第二支队，陈曙辉、鲍启祥先后任支队长。支队整编为3个营，共900多支枪，1300余人，主要在豫北一带活动。

10月 考城县抗日民主政府从当地抗日自卫队中选拔60余人组成县大队，张耀汉任大队长，于子元兼任政治委员。并在考城、曹县、东明3县交界处召集了50余村群众代表和进步人士座谈会，宣传抗日政策。

10月 “民先”冀鲁边区总队部在河北省南宮县成立，下辖冀南和鲁西北两个队部。

10月 “民先”冀鲁豫边区总队部在河南濮阳县成立。总队长徐少岩。全区共有队员4000人。

冬 直南特委根据中共中央发布的《目前形势与华北党的任务的决定》中“在游击战争中必须建立工会、农会、民先、妇救会等系列组织”的精神，决定边区妇女会、农救会均单独成立组织，由边区抗日救国会负责筹建并主持召开边区妇女与农民代表大会。

11月 冀鲁豫边区省委改为中共冀南区党委。

11、12月 冀鲁豫边区农民救国会成立，姚恒光任主任；冀鲁豫边区妇女救国会成立，付秀香、范世钧任正、副主任；“民先”冀南分队成立，梁伯琪、李靖轩任分队长。

12月 中共濮阳县委在濮（阳）滑（县）东（明）长（垣）抗日救国会自卫队和滑县甘露寺抗日救国会自卫队基础上建立独立大队，江鸿楚任大队长。

12月 中共博平县委在徐家河口一带成立聊（城）博（平）茌（平）堂（邑）抗日武装工作队，有二三百人参加。

1 9 3 9 年

1月7日 苏鲁豫区召开各县青年救亡团体代表联席会议，共有9个团体、20多名代表出席会议。会议商定建立苏鲁豫区青年抗敌救亡协会（中共苏鲁特委委员李毅负责），选举金乡、鱼台、单县、丰县、沛县等5县代表组成执行委员会。接着，苏鲁豫边区的妇女救国会（孔真任主任）、农民救国会、职工救国会相继成立。

1月15日 中共鲁西区委员会成立，徐运北任民运部长。

2月 直南特委改为直南、豫北两地委，这两个地委的民运部长均由冀南各救总会负责人安法乾兼任。两个地委均设立了专门做会道门工作的委员会。

3月 八路军一一五师挺进泰西，创建泰西抗日根据地。

4月 我党邀请沛滕边界人士建立了沛滕边联合办事处。工、农、青、妇、儿等各抗日救亡团体相继建立。

5月5日 鲁西区军政委员会书记罗荣桓在干部会议上做报告时指出：要发动群众建立农会，动员更多的人力物力帮助军队。

5月14日 苏鲁豫特委改为苏鲁豫区委员会。

5月 苏鲁豫边区总动员委员会成立，主任王文彬，统一了对各级工、农、青、妇和自卫团等群众抗日团体的领导。到7月底，苏鲁豫边区群众抗日团体会员达17万人。

5月 在动员群众参军的基础上，中共滑县县委组建豫北大队，彭永清任副大队长，到年底发展到2000余人。

8月下旬 鲁西区党委在东平湖内小安山召开会议。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在会议上指出：只要坚决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创建和坚持平原抗日游击根据地就是可行的。会议作出了创建平原游击根据地的决定。据此规定，一一五师独立旅旅长杨勇和区党委民运部长徐运北，同运西地委书记梁仞仟等，到运西地区广泛发动群众进行破路和改造地形。

10月 泰西青救分会成立，主任张延积。

10月 鲁西区党委分别召集全区青年干部和妇女干部会议，决定在各级党委建立青委会和妇委会。

11月1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深入群众工作的决定》，要求在我军活动地区实行减租减息与改善工人生活等。据此，冀鲁豫部分地区开始实行合理负担、改善群众生活等政策。

11月2日 鲁西区党委做出《关于群众宣教工作的报告》，特别指出：开展群众工作主要还靠下层的发动与民主生活的改善，造成改善与参加抗战的热潮，这样才会有力量。

11月 冀鲁豫边区抗日救国总会决定在濮阳召开代表大会，遭到国民党第十七专署专员丁树本的干扰破坏。我各县抗日救国会发动群众声援总会，并组织了大规模游行示威，迫使丁树本同意总会代表大会在濮阳召开。中共冀南区党委派杨俊亭为首的代表团参加为代表大会胜利闭幕举行的庆祝大会。

年底 冀鲁豫区各地普遍建立和扩大了县以下的工、农、青、妇抗日救国会和自卫队。直南、鲁西南、鲁西有组织的群众达50余万，成立了边区抗日救国会；湖西成立了总动员委员会及工、农、青、妇联合会，统一了群众工作的领导。

1940年

3月8日 鲁西妇女救国总会成立，选举郭军为负责人，并提出

促进宪政、加强生产建设两大任务。

4月4日 鲁西青年救国总会成立，主任王克，副主任张延积。

4月5日 鲁西农民救国总会成立，郭英任总会会长。在此前后，鲁西区的泰西、鲁西北、运西、运东地区及长清等25个县农民救国会相继建立。

4月18日 中共冀鲁豫区委员会成立。

5月1日 鲁西职工救国总会成立，选举王震宇为总负责人。继而泰西分会、鲁西北分会和泰安、肥城、冠县、朝城等县职工救国会先后成立。

5月4日 中共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发表《山东青年的当前任务》一文，谈道：“在组织青年和培养干部上，山东有两个模范县，这就是肥城和长清！”肥城有青年约6万，已组织起来的1.2万人，两个月培养青年下级干部360余人。朱瑞号召学习肥城的做法。

5月 冀鲁豫区召开了青年抗日救国会代表会议，选举成立了青年抗日救国总会，杨泽江任主任，洪学义任副主任。下辖直南、豫北、鲁西南3个分会。

5月 泰西地区党组织根据鲁西区党委指示，以肥城、宁阳、长清等县为中心，领导群众向地主展开借粮斗争。是为“红五月”运动。

7月19日 鲁西文化界救国总会筹委会与青年记者学会鲁西分会成立，鲁西良和刘子毅分任两组织的主任和理事长。

7月20日 北方局致函鲁西区党委，指示：群众工作极其薄弱，是鲁西工作中最薄弱的一环。工、农、青、妇各种救亡团体在形式上虽然都有了，但缺乏真实的下层群众基础。

7月 山东省第一次青年代表大会举行。鲁西、湖西的青年代表王克、张延积、李学智、田园、张德超等当选为山东省青救总会执委。

8月中旬 国民党地方顽军王子魁等部6000余人，对我三地委活动区域进行“蚕食”，我被压缩至曹县西北刘岗、曹楼、倪庄为

中心的十几个村庄，依靠群众固守三村，打击敌人，坚持斗争120余天。后称“三村斗争”。

夏 鲁西青救总会和泰西、鲁西北、湖西青救会编印青年刊物《鲁西青年》、《青年战线》、《泰西青年》、《青年战士》和《光明青年》。

9月 肖华在《关于鲁西工作报告提纲》中说：鲁西的群众工作，是在军事胜利影响下，自上而下地开展起来的，基础不够巩固……仅可说是在发动时期，“各群众团体的组织，比较坚强的为妇救会、其次是青救会……”“工作比较好的泰西、冠县等地，特别是冠县”。

10月 北方局青委派出以彭梦萸为组长的工作组到鲁西帮助工作。

秋 冠县青救会以青年锄奸小组为基础，组织脱产的青年武装——青年连。莘县、丘县等县青救会也建立自己的青年连。鲁西北青救分会建立200余人的青年抗日救国团，团长王俊生，政委王黎之。

12月 冀鲁豫区军政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研究部署发动群众、减租减息、合理负担、实行统一累进税等工作。

1941年

1月6日 皖南事变。事后冀鲁豫区各地纷纷召开各界群众大会，声讨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战、分裂倒退行为。

1月中旬 鲁西、冀鲁豫、湖西各抗日根据地公布中共中央颁布的《减租减息暂行条例》和《优待抗日军人家属组织条例》。各县开始进行试点工作。

1月 鲁西青救会在郛城召开青年工作会议。因日军“扫荡”，会议中止，与会同志就地疏散。

2月 鲁西区党委召开民运工作会议，要求认真开展民主民生群众斗争。

4月12日至19日 日军在以内黄县为中心的沙区进行灭绝人性

的“四一二”大“扫荡”，当地民兵积极配合部队掩护领导机关和群众转移，并配合部队坚持腹地斗争，毙伤敌伪军100余人。

5月 鲁西区农救总会召开扩大会议，制定了6、7、8月工作计划。

7月1日 冀鲁豫、鲁西两区党委合并，仍为冀鲁豫区党委。

7月1日 冀鲁豫军区召开高干会议。决定加强军区工作，单独建立军区工作系统，使之专门担负起地方武装、民兵、自卫队的组织领导责任。

7月 冀鲁豫军政委员会召开第三次会议，指出：巩固根据地的中心工作是武装斗争，要深入发动群众，改造村政权，整理党支部。

7月 随着冀鲁豫抗日救国联合总会的建立，各地都设立了分会，对农救会、妇救会、青救会、儿童团、民兵等群众组织实行统一领导。抗日救国联合总会主任为高元贵。

9月中旬 冀鲁豫、鲁西两区的群众团体合并，王震宇为工救总会主任，高元贵为农救总会主任，郭军为妇救总会主任，王克为青救总会主任，鲁西良为文联筹委会主任。

9月中旬 《鲁西青年》改为《新青年》。

9月 鲁西区农救总会召开主任联席会议，总结了5月扩大会议以来的工作，认为三个月里统一了鲁西各地农会的领导，开展民主民生运动、培养干部和对外宣传都取得了显著成绩。

10月5日 冀鲁豫农、工、青、妇、文等群众团体联合发出《政民配合的指示》，要求政民密切配合，做好优抗、抵制日货、囤积秋粮、破路等工作。决定自10月15日起一个月为破路月。

秋 为加强对各学校学生抗日救国会的统一领导，边区青年救国总会召集各校救国会代表座谈会，决定成立边区学生救国联合会，青联主任王克兼任筹委会主任。

秋 冀鲁豫边区青抗先总队部成立。分区成立区队部，县成立县大队部，区成立区中队部，村成立村队部。总队长郭乐天，政治

部主任王黎之。

秋 运东青救分会领导青年游击队在聊城敌人据点附近，一夜割电线5华里，受到地委的表扬。

秋 冠县在反分割、反封锁、反“蚕食”斗争中，建立青抗先，队员2000余人。

11月7日 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冀鲁豫军区武装部为贯彻军委的指示，召开了各分区武装干部专门会议，着重解决扩大民兵队伍，健全各级人民武装机构等问题，提出了自卫队先进分子参加模范班，青救会先进会员参加青抗先。

11月 冀鲁豫边区工人抗日救国会第一次分会主任联席会议召开。边区工会负责人高光宇做《今后边区工运的任务》的报告，提出目前工运总任务是深入工人民主民生运动，改善工人生活，大量发展新组织，广泛动员工人参战参军，开展对敌武装斗争，造成群众性游击战争。

12月 冀鲁豫军区在观城县朱家庙举行民兵大检阅。杨得志司令员作了关于扩大民兵队伍，发展人民武装的重要讲话。

1942年

1月28日 中共中央颁发《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进一步指出党在根据地土地政策是：一方面实行减租减息，一方面实行交租交息。

2月6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如何执行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的指示》。根据此次和1月28日指示，冀鲁豫区开始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发动群众实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与开展反奸、反霸、反资敌斗争。

3月15日 冀鲁豫区党委发布《关于青抗先领导关系的决定》，强调要明确认识青抗先的性质与任务，建立正确的领导观念，切实树立青抗先系统工作。

3月18日 冀鲁豫文联成立，巩固任主任，鲁西良任副主任。

3月25日 冀鲁豫边区政府和边区青联发布《关于儿童团与教育行政小学教师，青救会儿童团部与各方面关系的决定》。

4月1日 冀鲁豫区党委青年运动委员会为迎接华北青运统一发布指示，指出统一华北青运，成立华北青联筹委会的实际意义，并要求为此做积极准备工作。

4月20日 冀鲁豫边区青联发布《关于加强青联与军队朱德青年队联系的决定》。规定：部队的朱德青年队可参加各级青联为团体会员，地方青年组织和部队青年组织应互相帮助，密切配合。

春 日军对观城县邵庄屯一带“扫荡”，冀鲁豫边区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总会机关部分领导遭敌包围，近20人被捕，其中1人受伤。泰西青救分会主任雷清亮和边区文联李育仁牺牲。

6月30日 北方局发布对冀鲁豫边区工作指示，指出：在基本区坚决实行减租减息，改造村政权，整顿或建立党支部；在接敌区发动群众，须从保护群众利益，减轻群众负担开始，号召群众武装自卫。

7月28日 北方局青年运动委员会发布《对于今后冀南青年运动的指示》，要求发动广大青年积极参加冀南平原抗日游击战争。同时希望冀南区党委加强对青委的指导。

7月 南乐县东节村民兵在县大队配合下，一举拔掉日军炮楼，毙日军9人。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传令嘉奖。

7月 冀鲁豫区党委召开民运工作会议。会议总结了1940年以来未能在全区认真实行减租减息、发动群众的教训。北方局宣传部长刘大章讲话指出：目前广大群众最迫切要求解决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是“民主民生工作的彻底执行”，群众运动、巩固党、发展人民武装三大任务都是“以民主民生问题的解决为基础的”。

8月31日 中共山东分局对湖西地区发布指示，强调党政干部要把基本群众团结在自己周围，提出了“永远和湖西人民在一起”的口号。

8月 刘少奇由山东分局经湖西去延安，对湖西工作做了重要指示，强调必须深入发动群众，实行减租减息，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为贯彻刘少奇指示，中共湖西地委很快组成地、县工作队，在单县做减租减息试点工作。

9月1日 冀鲁豫区党委发出《关于支部对民兵领导的决定》，加强了党组织对民兵的领导，建立了民兵的政治工作。

9月5日 冀鲁豫区党委做出《关于组织各级抗联的决定》，决定组成统一的各级工农青妇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抗联”）。县以上工、农、青、妇合并为抗联后，取消原独立的领导系统，设立各级抗联执行委员会、常委会，下设组织部、宣传部、妇女部、青年部和秘书处。

9月13日 冀鲁豫边区抗联发出《关于减租减息工作的指示》。指出减租减息是改善农民生活的基本办法，并就减租减息斗争等提出了具体要求。

9月下旬 冀鲁豫区党委从党校、行署行政干校、军区陆军学校和边区抗联总会举办的干部训练班中抽调干部500余名，组成政民工作队（亦称濮范减租减息工作团），由信锡华、孙光、刘星、高元贵率领，到濮范中心区开展以减租减息、反贪污、查“黑地”、合理负担、改造区村政权为主要内容的民主民生群众运动。

9月 《冀鲁豫边区各级工农青妇抗日救国联合会组织大纲》颁布，对各级抗联名称、组织与职权做了具体规定。

9月 边区抗联做出《关于今后妇女工作的指示》，提出今后边区妇女工作方针是：“在发动农民的基础上广泛动员与组织妇女参加生产，从生产中加强妇女教育，提倡家庭和睦，改善妇女生活”。

9月 边区抗联通过了边区青年抗日救国会联合会8月所做的《边区青年运动的当前任务》的决议，指出：开展民主民生运动，改善青年生活，发动与武装青年，开展游击战争，是边区青运的总方针。

9月 刘少奇由山东分局返回延安途中，到达边区中心区，对冀鲁豫边区作重要指示，强调要树立牢固的群众观点，指出边区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不够。

9月底 冀鲁豫区党委宣传部长张承先到鲁西南领导发动群众工作，并任地委书记。

秋 清丰、卫河、顿丘等县旱情严重，区党委和行署大力领导群众抗旱救灾。

秋 纪登奎、金凤、杨节、陈东生等在鄄北发动群众运动，开展双减运动，创造了新经验。

10月20日 湖西划归冀鲁豫边区。

11、12月间 黄敬主持召开了全区高级干部会议，并根据北方局和刘少奇的指示，以及自己的调查研究，在会上作了《边区的形势与任务》的报告，分析了边区的形势，正确地提出了边区的中心任务是发动群众。会议还对全区发动群众工作做了全面部署。

12月 冀鲁豫区全面展开大生产运动。

冬 民主民生运动深入发展，为了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适应群众运动的需要，各级人民武装组织改称临时人民武装委员会（简称武委会）。边区武委会主任乔明甫。原部属的科改为部，军事部长粟森。青抗先、模范班统称民兵，青抗先组织就此取消。

年底 冀鲁豫边区颁布了《人民抗日联防组织条例》，规定根据地中凡年龄在50岁以下16岁以上者，不分性别一律参加联防（妇女自愿），进行抗日、锄奸、防匪、保卫根据地。

1943年

1月20日 冀鲁豫边区抗联《工作研究》创刊。

1月27日 冀鲁豫行署颁布《清理“黑地”奖惩暂行办法》。各地立即按照暂行办法发动群众，进行清理“黑地”的说理斗争，实行减轻群众负担的政策。

3月18日 冀鲁豫行署颁布《简易合理负担暂行办法》。制定累

进计算法，以保证群众在合理负担条件下确保抗战供需。

4月1日 冀鲁豫区党委发出《关于非灾区的基本区借粮工作指示》。

4月 从1月到本月底，湖西各地党政军民在尖锐的反“清剿”、反封锁斗争中，发动群众8万余人，破路140余次，平毁封锁沟290余华里。

4月 黄敬在濮县、范县工作总结大会上指出：反贪污、合理负担、查“黑地”性质基本上是民主斗争，也就是说基本上是政治斗争。同时指出：发扬民主主义精神和作风，是保证群众运动发展与深入的中心一环，也是一切胜利的保证。

春 冀鲁豫区党委、四地委决定将滑县作为发动群众的试点。

春 各地在行署指示下展开生产救灾运动。战胜灾荒后，群众抗日热情倍增。

春 冀鲁豫区党委组织以高元贵、逯昆玉为负责人的鲁西南减租减息工作团。

6月 水东抗日联防办事处颁布赎地法令，对灾荒期间（1942年10月至1943年麦收）穷人贱价出卖的土地及其他物产赎回事宜作了规定。

夏 根据征收公粮合理负担原则，各地举办了由财粮干部、地方工作人员、群众积极分子、学校教师参加的训练班。由于进行了民主民生、救灾生产等运动，群众生产热情高涨，许多县超过了麦季征收计划，保障了军需民食。

7月8日 冀鲁豫行署发布《一九四三年下半年工作方针》，指出巩固根据地中心一环是发动群众，改造与建设政权。

7月18日 冀鲁豫区党委发布《关于取消各级民运部成立民运工作委员会的决定》，自区党委以下各级民运部一律取消，民运部长应通过各救团体公开系统被选为各救团体主要负责人，民运部工作人员一律分到各救团体工作。

7月19日 冀鲁豫边区各群众团体及开明士绅，分别发出通电，

呼吁团结抗日，反对内战。

7月30日 冀鲁豫行署、军区发出《关于1943年下半年人民武装工作的方针和指示》，要求大量发展民兵，并从斗争中和民主民生运动中提高民兵的军事技术、政治素质，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准备配合部队实行大反攻。

8月 冀鲁豫区党委副书记张霖之带一批干部到曹县、卫南开展群众工作。

9月17日 冀鲁豫行署发布《为发起社会募捐，动员群众，帮助流亡儿童解决冬衣问题》的训令，后又发布了安置灾民的训令。

9月18日 冀鲁豫军区政治部与冀鲁豫区党委发出《关于建立青年武装的决定》。指出：在现有青救、青抗先的工作基础上建立边区独立的青年武装已是十分必要的和可能的。青年武装是青救会的组成部分之一，政治上受青救会领导。同时青年武装是地方性的正规军，军事上受军分区领导。目前以县为单位分散发展，与县基干大队配合活动。

9月底 原山东分局书记朱瑞赴延安时对湖西工作做了指示，指出要深入开展以减租减息为中心的群众运动。

10月1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出《关于减租、生产、拥政爱民及宣传十大政策的指示》，要求各根据地贯彻实施。

11月26日 冀鲁豫区党委召开高干会议。会上针对1944年工作提出了大力发展生产、掀起全区性生产运动的高潮，深入发动群众、树立基本群众优势，开展拥军爱民运动等具体要求。

11月 中共冀鲁豫分局成立。

12月31日 冀鲁豫区党委发布《关于拥军优属、拥政爱民运动的指示》，全区掀起拥军爱民热潮。

年底 各救国会组织发展到12万人以上，灾民合作社社员3万人，民兵达到1.2万人以上。

1944年

1月1日 北方局发布1944年工作方针的指示，指出实现方针的关键，在于进一步把群众发动和组织起来，更好地团结群众进行斗争。

2月20日 冀鲁豫区党委做出决定：区党委设青委，地委以下不设青委。工农青妇各救会未恢复独立组织时，抗联设党团，无条件地执行同级党委的决议。

2月 冀鲁豫边区青联发出《对1944年边区青运任务的指示》，指出：边区青联的任务是发动与组织广大青年。1944年上半年的任务是：扩军、生产和庆祝“五四”中国青年节。

春 从年初开始，滑县县委进一步加强发动群众的力量，深入开展民主民生运动。中共冀鲁豫分局总结了滑县在发动群众步骤上先民生后民主的经验。《冀鲁豫日报》以《滑县的群众运动是如何发动起来的》为题，对此经验做了专门介绍。

春 根据地基本区广泛实行了减租减息，开展了破路挖沟等运动。同时，根据中央和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指示，全区普遍展开大生产运动，同时发动妇女搞好纺织等家庭手工业。

5月4日 冀鲁豫边区青联总会、运西青联分会、行署文教处等组织，为发动青年抗战，召开边区各界青年大会。黄敬、宋任穷、徐达本、杨勇先后到会讲话。

5月4日 冀鲁豫边区各界青年在范县龙王庄举行纪念“五四”青年节大联欢。机关、学校、部队青年5000余人参加。

5月11日 冀鲁豫、冀南两区合并，两个区党委取消，各地委直接由分局领导。冀鲁豫、冀南两区专门设立工作委员会。

5月11日至17日 昆张县的民兵配合部队向伪军展开了强大的政治、军事攻势，先后拔除了3个村的据点，攻克51处碉堡，毙伤伪军150余人，俘1000余人，解放了昆张的大部分地区。

5月 冀南、冀鲁豫行署指示，把开展生产运动作为下半年中心

任务。群众未发动地区，主要贯彻民主民生政策，接敌区、敌占区进行反资敌、反掠夺斗争，减轻群众负担。

夏秋间 冀鲁豫、冀南行署大部分县发生蝗灾，各级党组织和抗日政府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捕蝗运动。

9月21日 冀鲁豫行署和军区发布训令，要求发动群众，掀起破路热潮。

10月14日 冀鲁豫行署做出《关于处理因灾荒买卖人口纠纷的规定》，对灾荒年出卖人口回赎问题、婚姻变动纠纷等做了规定，深得群众拥护。

12月2日 万里发表《继续贯彻大胆放手的领导方法》一文，要求大胆放手发动群众，深入群众教育组织工作。

12月 冀鲁豫分局作出对中农政策的指示，指出：为使贫农和赤贫农得到果实而损害中农，这是挖肉补疮的办法，必须纠正。在土地分散，没有地主、富农的村庄，应以贫农为骨干，团结中农，共同发展生产。

年底 张霖之在《冀鲁豫日报》上发表《站稳脚跟，放下圈子》的文章，要求各级领导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深入实际，站稳脚跟，放下“圈子”，真正贯彻大胆放手，并要防止群众运动中出现的偏向。

年底 冀鲁豫边区学生救国联合会成立。胡绍华为学联负责人。

1945年

1月23日 中共中央做出指示，提议北方局即时进驻冀鲁豫根据地，从太行、太岳抽调一批有减租减息经验、作风好的干部到冀鲁豫，普遍发动群众，彻底进行减租减息，以使根据地更加巩固。

2月 冀鲁豫分局作出了《关于纠正执行大胆放手中的偏向的指示》，强调指出：大胆放手是针对着边区群众工作中领导不相信群众和包办代替提出来的，要求各级党委认真研究党的土地政策和中

农政策，细心地冷静地检查自己工作中这种倾向并加以迅速纠正。

3月1日 冀鲁豫边区在濮阳召开第一届群英会，到会英模267人。抗联代表也参加了会议。

3月14日 冀鲁豫区参议会召开。行署主任孟夫唐在开幕词中强调：要发动群众，群众翻了身，根据地才能巩固扩大。会议最后做出了扶植群众运动、负担公平合理等决议。

4月 杨泽江被选为冀鲁豫边区的正式代表，到延安参加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春 北方局派干部分赴滑县、濮县、濮阳3县进行调查研究，并听取滑县县委书记张华、县长程建明的专题汇报。

5月1日 冀鲁豫区各地佃雇农集会纪念“五一”节，强调加强内部团结，建立单独组织，为改善生活而奋斗。

5月4日 冀鲁豫、冀南行署合并为冀鲁豫行署。

6月6日 冀鲁豫分局召开群众工作会议，北方局代理书记邓小平参加会议，对边区前段发动群众开展民主民生运动做了总结，要求仍以发动群众为中心，彻底贯彻减租减息政策。

6月11日 中共“七大”闭幕。冀鲁豫区群众纷纷集会庆祝。

7月 冀鲁豫行署副主任徐达本在专员联席会上做群众工作总结报告，指出：就全区范围来说，发动群众仍是今年中心任务。党政军民必须用最大努力先把根据地群众发动起来，而边沿区也必须进行发动群众。

夏 正式建立冀鲁豫边区武委会。主任乔明甫，军事部长栗森，敌工部长郭乐天、副部长冯培昌。

8月12日 冀鲁豫边区行署、武委会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全区民兵、自卫队紧急动员起来，武装起来，迎接新形势新任务。

8月中旬 冀鲁豫三路大军对日伪展开反攻。我边区民兵积极支前，同时，积极配合地方武装围困腹地城镇的日伪据点。

8月15日 冀鲁豫边区各救总会为紧急动员参军、参战，发布《告各救总会会员、儿童团员、姊妹团员书》。

8月17日 冀鲁豫行署颁发《为使各级学校参加进军总动员工作的训令》。

8月 冀鲁豫分局和北方局撤销，成立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

8月 冀鲁豫边区各救总会号召青年参军参战，收复失地。

9月2日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秋 冀鲁豫工农青妇联合总会成立，张承先任主任，姚会宾、王萍、范世钧分别任工农部、青年部、妇女部负责人。

10月5日 张霖之在地委书记座谈会上做《边区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指出：中心区下半年主要是扩军，开展大生产运动；新解放区要放手发动群众减租减息，建立政权与武装。

10月 根据晋冀鲁豫中央局的决定，冀鲁豫与冀南正式分开，并分别恢复区党委和行署。

10月22日 冀鲁豫区党委指示各地委要立即掀起战争动员工作及扩军、参军热潮。

11月7日 中共中央发出《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的指示，要求在最近几个月发动一次大的减租运动。

11月10日 晋冀鲁豫中央局在河北峰峰召开第一次扩大的全体会议，确定冬春两季在全区展开大规模减租运动，组织好明年的生产。

11月13日 冀鲁豫行署工商局会同菏泽8家烟厂经理，征求工人意见，决定提高男女工工资待遇。

12月15日 中共中央发出《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指示，要求各解放区搞好减租、生产、练兵、拥政爱民和拥军优属等工作。

12月28日 冀鲁豫区党委发出开展拥爱运动的指示。

12月30日 冀鲁豫行署在濮阳召开反内战座谈会。各单位、各群众团体代表、社会名流踊跃发言，声援昆明爱国学生运动。

12月 聊城伪军赵振华、郭培德部同国民党地方部队马逢乐部

疯狂残杀我干部群众。人民群众奋起联防自卫。

1946年

1月10日 国共两党签订停战协定。12日，冀鲁豫军区向所属部队及民兵发出停止一切军事冲突的命令。

2月1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指示，指出要抓紧时机发动群众，减租减息，加紧生产。

2月4日 菏泽市建立。冀鲁豫区党委和菏泽市委立即着手发动工人、市民展开反奸诉苦、增资减息等民主民生斗争。

2月12日 冀鲁豫行署发出指示，规定所属学校、机关等努力实现生产自给。当天区党委直属机关召开生产动员大会，区党委书记张玺做了动员报告。

2月14日 冀鲁豫区党委根据中共中央2月1日的指示精神，写信给各地委，要求各地集中力量发动群众彻底实施民主民生政策，并抓紧领导群众生产。

3月26日 晋冀鲁豫中央局发布《关于进一步发动群众工作的指示》，决定：老解放区以生产为主（未发动群众地区仍以发动群众为主），新解放区以减租为主。各区党委均出《群众通讯》，交流各地经验，推动减租、发动群众工作。

4月1日 蒋介石公开撕毁停战协议，进攻我解放区。边区武委会为此向民兵发出训令，要求民兵配合部队，坚决消灭来犯之敌。

4月6日 冀鲁豫区党委、冀鲁豫联合会总会召开群运座谈会，检讨了发动群众工作。会议16日结束，张玺作了总结发言，指出了边沿区、老区和新区发动群众工作的新任务。边区群运由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4月10日 冀鲁豫区党委发出《对目前工作的补充指示》，要求争取在六个月内放手把群众发动起来。

5月1日 《冀鲁豫日报》发表《当前新区群众运动的道路》的社论，要求在短期内迅速将新区群众发动起来。同日，区党委、行

署、军区抽调干部300余人分赴定陶、南乐等地开展群众运动。之后，各地区陆续抽调大批干部到新区发动群众。

5月2日 冀鲁豫行署发布指示，各级政府人员要积极参加群众运动，在新解放区注意肃清敌伪残余势力。

5月4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指出：解决解放区的土地问题是党目前最基本的历史任务，是目前一切工作的最基本环节。同日，《冀鲁豫日报》发表《组织起雄伟的力量向新解放区进军》的社论。从此，新解放区以反奸诉苦、清算为中心的群众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5月7日 冀鲁豫区党委向各地委、军分区通报敌情，要求在发动群众过程中充实民兵自卫队。

5月8日 冀鲁豫二地委发布《关于新解放区群众工作再次指示》，要求注意加强党在群众运动中的活动。同日，地委《群运通讯》出版。

5月 根据中央“五四”指示精神，大批青年干部到农村参加土改。

5月 南旺县（梁山）荣庄青年民兵配合县大队截击敌军车，歼灭敌军一个连。

6月4日 冀鲁豫二地委召开新区活动分子会议，检查四个月新区群运。据不完全统计，全分区新区4120余村内，已发动起或初步发动2775个，四个月斗争4997次，斗争对象1673个。会议于23日结束。

6月10日 为研究贯彻中央“五四”指示，晋冀鲁豫中央局在武安县冶陶召开土地会议，确定在腹心区立即展开土改运动，解决贫雇农的土地问题。在边沿区集中力量斗争汉奸、恶霸，继续进行减租减息。全区要结合土改，进行保卫边区的教育，大量发展民兵。

6月15日 冀鲁豫行署发出《关于发动群众工作的再次指示》，对反奸清算运动做出具体规定。同时要求各地在群运中注意乡村政

权的建设。

6月26日 国民党撕毁停战协定，进攻中原解放区。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指示各地动员群众做好战争准备和战勤工作。

上半年 冀鲁豫区文联在菏泽市成立，王亚平任主任。同时出版《平原文艺》，王亚平任主编，邢立斌任副主编。

7月7日 菏泽市2万余人集会纪念“七七”。张玺号召群众组织起来，做好战争准备。大会通电全国人民反对内战。会后全市掀起抗议蒋介石发动内战的万人签名运动。

7月12日 冀鲁豫行署发布《关于妇女参政问题指示》，要求积极欢迎妇女同志到政府来，帮助其提高工作能力，经常有计划地吸收培养妇女干部。

7月20日 冀鲁豫后方总指挥部成立，段君毅任司令员，并即通知各地组织好大车队、担架队，准备好粮食、油盐、鞋袜，以备战争之用。

8月10日至22日 我军发动陇海战役。冀鲁豫二、三、五地委出动15.6万民工，胜利完成了支前任务。齐滨县长李荣村亲自带领担架队抬运伤员，受到行署通令表扬。

8月15日 冀鲁豫区党委发布告全体党员书，号召全区党员干部带头参军参战，紧张工作，保证前方供应，大力完成战争动员与扩军任务。

9月3日 冀鲁豫区党委发出战争动员工作补充指示，要求全区党组织反复宣传群众，自觉完成参军参战任务。

9月29日至10月7日 我军发起巨野战役。冀鲁豫区出动民工335万余个工，保证了前方供给和伤员运送。

9月 冀鲁豫区党委决定潘复生、段君毅、刘晏春等留在黄河北地区抓土改工作；张玺、赵健民、徐运北等在黄河以南领导游击战争。

10月2日 冀鲁豫行署和军区联合发布训令，要求全区群众在支前的同时突击种麦。

10月28日 我军发动邯郸战役。边区民兵、民工10万人，昼夜支前、送粮、送弹、抢运伤员，民兵营、民兵团在部队统一部署下配合作战。

10月29日至31日 鄄南战役。冀鲁豫区出动民工计14.99万多个工。

10月 三个月来，冀鲁豫区发动支前群众达60万人次，支前粮3200余万斤，有10.2万人参军。

11月19日至22日 滑县战役。冀鲁豫区出动民工16.4万多个工支前。

11月20日 冀鲁豫区党委发布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再次指示，要求干部在敌人占领地区领导群众斗争，提高群众斗争信心。

11月 冀鲁豫区党委对全区土地改革运动作了认真研究部署。明确指出：不管在敌后坚持游击战争或正在准备游击战争的地区，不能以任何借口忽视或停止进行土地改革。

12月10日 冀鲁豫区党委发出《关于贯彻实行耕者有其田几个具体问题的指示》，要求各地县立即组织力量，充分发动群众，大胆放手地实现耕者有其田。

12月22日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发布布告，强调实行耕者有其田，保护人民群众斗争果实。

1947年

1月1日 我军发起巨（野）金（乡）鱼（台）战役，历时16天。冀鲁豫区出动民工773万多个工。

1月13日 冀鲁豫区党委及工农青妇联合会总会通电声讨蒋介石水淹解放区的罪行，号召群众自卫自救。

1月14日至17日 冀鲁豫区党委召开民运工作会议，潘复生做了总结发言。会议确定除游击区外，一律于春耕前完成土改任务。

1月20日 潘复生在民运部长联席会上做总结发言，指出要重视群众的创造，使边区工作活跃起来。

1月24日 《冀鲁豫日报》发表《打破土地还家的思想障碍》的社论，号召向阳谷、河西、济北、观城学习，领导农民搞好土地还家运动。

2月1日 冀鲁豫行署发布迅速实行土地改革布告，规定：没收敌伪公地、大汉奸土地及地主“黑地”，分给无地少地的贫农及贫苦的军、工、烈属；但不得连带清算地主之工商业。

2月4日 从上月24日开始的豫皖边战役结束。冀鲁豫区共出动担架2.78余万付，民工7.5万人，架起归故后黄河桥5座。

2月8日 冀鲁豫战勤总指挥部通令嘉奖完成战勤有功的郛城县。该县在7次战役中共出担架1100付，3天供给米、面14万斤，木炭5000斤。

2月20日 冀鲁豫区党委指示沿黄河各县麦收前修补大堤，整理金堤为二道防线。各县立即行动，动员23万人力、大车45万辆，完成土方1300多万平方，献石15万平方，征用柴草6700万斤。

2月27日至28日 冀鲁豫区党委机关召开英模和模范工作者大会。

3月2日 张玺书面总结冀鲁豫区1946年9月至1947年1月共五个月游击战争，表示要把游击战与保粮、保地、保命、反倒算、镇压反动分子结合起来，以游击战支持群众。

3月12日 冀鲁豫区党委发出《关于深入土地改革群众运动的指示》，强调充分发动群众，把土改搞彻底，消灭封建势力，但不侵犯中农利益。

3月18日 《冀鲁豫日报》发表社论，号召全区1200万人民奋起完成保田、保家、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等任务，以实际行动保卫毛主席。

3月20日 冀鲁豫区党委发出《关于在土地改革和参战中加强民兵工作的指示》，对民兵工作提出了几点意见。

3月28日 冀鲁豫区行署、武委会发出《关于生产与战勤工作相结合的联合指示》。

3月22日至5月25日 我军发起豫北战役。冀鲁豫区出动民工21348900多个工、畜工126万个。

3月 昆吾民兵通讯班在参战支前中工作出色，受到四分区指挥部的通令表扬，领队姚志思同志记功一次。

3月 临泽县三区（菏泽）武工队，号称“铁孩子”，配合军分区、县大队伏击敌人，缴获美制十轮卡车18辆。

4月29日 冀鲁豫区党委向晋冀鲁豫中央局报告了土改主要经验，同时总结了妇女运动的经验，指出：必须进行教育与斗争，求得在思想上组织上的统一，才能彻底完成土改。

4月30日 冀鲁豫区后方总指挥部通令嘉奖张秋民兵连，每人记功一次。

5月5日 冀鲁豫区武委总会发布《关于人武干部民兵自卫队开展“立功杀敌运动”的暂行办法》。

5月上旬 冀鲁豫人民群众掀起保家、保田、参军热潮。共有4万人参军，妇女报名者5000余人。徐运北总结此次参军时指出：保家、保田、参军是土改运动的继续提高，要搞好土改，推动参军运动。

5月17日 张霖之在冀鲁豫区党委土地会议上做总结报告，要求进一步搞好土改复查，改善干群关系。

5月27日 冀鲁豫区党委、军区发出贯彻土改复查的指示，要求把贫农意见作为复查的主要方向。

5月 冀鲁豫区党委召开土地会议，总结五个月来边区土地改革运动，布置下半年土改复查工作。

6月10日 冀鲁豫区党委发布生产节约、防旱备荒指示。

6月15日 冀鲁豫区党委决定，将武委会系统并入军区、军分区，成为军区所属的武装部，主任改称部长。区、村一级的武委会，改在党内设武装委员，领导民兵和自卫队的工作。

6月15日至7月23日 黄河北岸修堤工程先后完工，共出动民工30万人。

6月21日 《冀鲁豫日报》报道“李汝泰武工队”事迹，并为此发表《树立武工队的旗帜》的短论。该武工队利用集市、大会宣传近300次，使10多万群众了解了形势，在40多个村庄领导群众反奸诉苦，倒回土地700多亩、粮6.7万斤。

6月24日 冀鲁豫区党委发出《关于彻底复查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放手给群众撑腰，走群众路线，树立和加强贫农骨干，联合中农和地主进行斗争。

6月30日 刘邓大军进至鲁西南，当地人民共出动人工500多万个、畜工15万多个，组织了大批木船、水手送大军渡河。

7月20日 冀鲁豫区党委致函各地委，要求用全力组织配合反攻和进行土改，并把二者结合起来。

7月 为配合刘邓大军南下作战，边区武委会从东阿、博平、聊城3个县调出3个民兵团，组成民兵支队，随同华野部队在单县、鱼台、金乡、成武一带与国民党周旋作战，胜利完成了支前任务。

8月15日 冀鲁豫区党委就黄河南的斗争形势和工作，再次发出指示信，要求这些地区“大军来了配合作战，大军走了独立游击”，配合作战时主要是战勤与土改相结合。黄河北主要是土改复查，不要因形势的任何变化而中断，并从思想上把土改复查与黄河南的战斗结合起来。

9月5日 冀鲁豫区党委就冀鲁豫目前形势与年前工作任务再次发出指示，指出黄河以北地区中心工作是贯彻土改复查与长期支援战争的任务相结合，黄河以南地区基本工作仍是坚持游击战争。

10月22日 冀鲁豫战勤总指挥部河北分部发出通知，建立常备随军担架和常备民夫，以节省人力，及时完成任务。

11、12月间 冀鲁豫区发动大规模参军运动，有16万人报名参军，共批准了5万多人。

11月 冀鲁豫全区又有5万青年参军，绝大部分是民兵自卫队员。

年底 据不完全统计，全区共有民兵107728人，其中男民兵73729人，女民兵33999人，装备步枪44590支，轻机枪28挺，掷弹筒74个，六〇炮15门，短枪1175支。

1948年

2月1日 晋冀鲁豫中央局发出《关于土地改革、整党与民主运动的指示》，规定在占全区2/3以上的斗争彻底或基本彻底的一、二类地区，不再进行平分土地，只进行抽补调剂，填平补齐。

3月 冀鲁豫区党委积极贯彻中共中央《关于老区、半老区进行土地改革与整党的指示》。区党委和各地委都组织了工作团进行试点工作，由张承先率领的区党委工作团到范县进行试点。

4月 冀鲁豫区党委召开地委书记会议，贯彻中共中央和中央局关于纠“左”的指示和精神，明确提出下一步的工作方针是：以组织群众生产为中心，宣传政策，解除群众顾虑，具体纠正土改、整党政策上的错误，提高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6月17日 冀鲁豫区党委召开重点区工作会议，学习了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指示，确定黄河以北24县不再提土改整党，也不再搞“抽补”土地。

6月17日至7月2日 豫东战役。黄河南地区共出动担架1.7万余付、大车1.3万余辆，供应粮食600余万斤，总共动用人力16.8万人。

7月 黄河进入汛期，冀鲁豫党政军民1.2万多人一面阻击蒋军，一面投入抢险斗争。

8月7日 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开幕，冀鲁豫区88名代表出席了会议。

8月8日 冀鲁豫区党委召开黄河北县委干部会议，传达彭真关于土改、整党政策问题的报告。会议确定未做好端正政策工作的地方，继续做好结束土改、完成整党的工作。

8月底 根据行署发表的统计数字，两年中在冀鲁豫区及附近

地区共进行的25次大战役中，动用支前民工6517万多个、畜工658万多个。

9月28日 冀鲁豫区职工总会筹委会成立，蒋中岳、袁重新分别任正、副主任。

10月15日 冀鲁豫区党委发布指示，要求建立青年的核心组织——毛泽东青年团。指出青年团的任务是：在党与政府所号召的各种运动中发挥积极作用，为广大青年的特殊福利和切身需要服务，进行经常的政治思想工作。

10月15日 冀鲁豫区党委发出《关于建立青年团工作的指示》，要求建立各级青委，有重点地进行建团，取得经验，再行普及。张承先任区党委青委书记。

11月6日至翌年1月10日 淮海战役。我区发动200余万名妇女碾米、磨面、做军鞋；出动民工30余万人，担架1万余付、大小车15万辆，运送小米9000余万斤。

11月12日 冀鲁豫行署改为行政公署。

12月4日 行政公署发出《关于颁发土地证工作的指示》，指出：土地证颁发后，旧地契一律作废，并收回由政府销毁。

12月7日 行政公署发布指示，指出：大力动员争取在乡知识分子已成了我们的重要任务。

12月28日 冀鲁豫区学生代表大会召开，选举成立全区学生联合会。

12月30日 冀鲁豫军区人民武装部公布全区民兵1947、1948年两年战绩：共作战9532次，参加民兵24000人，歼敌12419人，其中配合部队作战3125次，单独作战6407次，完成了坚持腹地斗争，配合野战军、地方军全部解放了黄河南部地区，保卫黄河500华里堤防，镇压特务、破坏分子和反动道门的活动，支援前线，掩护运输，保护兵站、粮站等任务。

1949年

1月18日 冀鲁豫区党委召开青年工作干部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决议》，明确了青年工作的方针，讨论了建团方针等事宜。

1月 冀鲁豫区党委作出了《关于成立各种委员会的决定》，要求地委、县委选派干部，组织工会、青年团、妇女联合会，积极支持他们的工作。

2月5日 冀鲁豫区召开妇女代表大会，选出出席全国妇女代表会议代表13名，改选了冀鲁豫妇联领导机构，讨论明确了今后妇女工作方针。

2月15日 冀鲁豫区党委对黄河南土改整党做具体政策规定，指出：封建、半封建的土地制度必须消灭，但必须将地主与旧式富农，以及大、中、小地主等区别对待。

2月 全区展开参军归队运动，至4月共有1.4万余名青年参军，1600名离队战士归队。

3月26日至29日 全区第一次青年代表大会在菏泽市举行。大会选举葛步海、梁步庭、黄明吾、史杰、张大乙、高桓、洪学玉、钤凤楼、王洪山等9人为代表，参加全国第一次青年代表大会；选举葛步海等17人、梁东峰等2人分别为区青联会委员和候补委员，并通过了《关于目前青年运动的任务的决定》。

3月 冀鲁豫区党委、地委、县委三级青年团筹委会全部成立，青年干部基本配齐。

3月 冀鲁豫区党委召开地委青委书记联席会议，张承先在总结报告中讲到：全区已配备360名青年干部，建立了青年工作系统。

3、4月 第四野战军南下路经我区，受到当地政府、群众组织迎送。濮阳、清丰、寿张组织群众抢修平（北平）大（名）兰（考）公路，赶修黄河浮桥，保证了大军通过。

4月8日 冀鲁豫区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召开，历时7天。会上成立了冀鲁豫区职工总会，选出出席华北职工代表大会的代表和冀鲁豫区职工总会执行委员，明确了今后职工运动的具体方针。

4月14日 冀鲁豫行政公署召开黄河南第二、三、五、七专署生产救灾会议。会后，向各直属单位发起援助灾胞的募捐运动。

7月 《冀鲁豫日报》载：在三年解放战争中，冀鲁豫区人民做出了巨大贡献。据不完全统计，先后出动担架10万余付、大小车39.7万辆，总计用民工294.6万余人、牲口94.7万余头。物力方面，仅1948年南援陇海北援平津，即碾米1亿斤支前，援四野南下，有30余万民工日夜抢修公路千余华里，使大军迅速过河南进。

8月13日 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千余名毕业学生到冀鲁豫参加建设工作。

8月20日 冀鲁豫区撤销，成立平原省。

后 记

根据冀鲁豫边区党史工作组的决定，冀鲁豫边区“群众运动专题”的征编任务由河北省承担。工作组副组长徐运北、张承先、郭超、王克东、杨泽江等领导同志负责。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谢忠厚及张圣洁等同志承担了征编任务，组成了专题编写组，并约请高元贵、安法乾、乔明甫、李进宝、王克、吴亚南、范世钧、鲁西良、杨节、方玉亭等老同志为指导组成员。几年来，冀鲁豫党史工作组在承德、洛阳、济南、北京等几次会议上对群众运动进行多次研究和讨论；专题组的同志根据工作组的意见，征集了600余万字资料，编印了5辑《冀鲁豫边区群众运动资料》，内部刊行，使这些历史文献、资料得以利用和保存下来。在此基础上，编纂《冀鲁豫边区群众运动资料选编》，列入《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丛书》系列。

《冀鲁豫边区群众运动概述》，是边区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群众运动的重要总结，是全书的总论。在中共河北省委及党史研究室和杨泽江同志具体指导下，八易其稿，1988年印发了“征求意见稿”，分送有关领导同志及指导组和各省原在冀鲁豫边区工作的部分老同志审阅。1989年4月在保定召开了审稿会，徐运北、张承先、姜思毅、许梦侠、苗春亭、张增敬、罗定枫、吴肃、陈越平、张赤侠、白桦、金凤、白林、逯昆玉、刘镜西、王克、黄文、王传忠、夏川、李明实、周子明、方玉亭、冯培昌、杨泽江、王克东等40多位老同志参加了会议，提供了很多史实，对《概述》提出了很多修改意见。根据会议精神，对《概述》进行了修订，1989年10月、12月，又两次分别在北京请杨得志、段君毅、赵健民、徐

运北、张承先、姜思毅、高元贵、李进宝等同志座谈审定。这样前后又修改了4次，于1990年4月拟定了“送审稿”。1990年底经段君毅、徐运北、张承先同志审查定稿。《概述》经过12次修改，尽力吸收了各方面的意见，反映了群众运动的实际情况。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概述》是边区群众运动的一个全面总结，是老同志和研究人员的集体科研成果。

为全面反映边区群众运动的面貌，又按原来群众工作范围——工、农、妇、青、文、武几个团体，分别进行专题总结。边区工会只有方玉亭一人健在，他写了一篇总结性的资料，概括地介绍了工会的情况。文联方面鲁西良写了边区文联活动的基本情况，现在已成遗作。农会和农民运动是当时群众运动的基本内容，《概述》叙述得比较详尽，未再专题总结。青运方面由王克、史杰、常邦国、高桓等同志经过几年的时间，写出了《青运史纲》，在山东省委、省团委和省顾委主任梁步庭同志及有关方面支持下，1989年5月在济南召开了原冀鲁豫边区青救会主要负责同志10多人参加的审稿会，审定出版。妇运专题的编写由范世钧等几位老大姐负责，范大姐以坚强的毅力，亲自征集资料，亲自动笔，几年来辛勤耕耘，写出了《妇运史纲》，令人钦佩。人民武装工作方面，由郭乐天、白晶五、冯培昌等同志经过几年时间，几易其稿，编写出了《人民武装史料》，在中共贵州省委、省政府及申云浦等老同志和有关方面的支持下，于1990年8月在贵阳召开了审稿会。曾宪辉、乔明甫、夏德义、金凤、杨泽江、白晶五、冯培昌等15人参加了会议，提出了很多修改意见，经过修订以后，由原军区武装部长乔明甫同志审核定稿。这些资料都是老同志自己动手，分析总结，内容真实、生动、活泼，充分反映了边区群众工作的面貌，是边区《群众运动资料选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的历史的宝贵遗产，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和可读性。在收入本书时，我们对标题和文字作了一些必要的修改。

在《冀鲁豫边区群众运动资料选编》的编纂过程中，冀鲁豫边

K 269

10

:2

区党史工作组领导同志的关怀和支持,以及在史实、政策方面严肃认真的态度,使编辑人员深受鼓舞。冀鲁豫边区党史办公室,原边区所在省、地、市、县委党史部门、档案部门及有关方面的积极支持,热情提供资料,是编纂工作得以顺利完成的有力保证。尤其是边区原从事群众工作的老同志现均年事已高,但他们亲自动手,提供资料,总结历史经验,惠示后人,这种对历史负责,对党奉献的精神,令人敬佩。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单位的同志在正常工作之外,承担了征编任务,几年来,辛勤劳动,精神可嘉!河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从人力物力上给予我们大力支持。因之,值此本书梓行之际,特向冀鲁豫边区党史工作组,边区党史办公室,边区所在省、地、市、县的党史部门、档案部门及原边区老领导、老同志以及中共河北省委、省政府及省委党史研究室、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和河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表示感谢之忱。

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工作组

河北省联络组

一九九一年一月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冀鲁豫边区群众运动资料选编 (下册)

作者 = 谢忠厚主编

页数 = 1054

SS号 = 80400371

DX号 =

出版日期 = 1991年06月第1版

出版社 = 河北人民出版社

书名
前言
目录
目录

出版说明

第一部分概述

冀鲁豫边区群众运动概述 谢忠厚周振印

第二部分专题资料

抗日战争时期冀鲁豫边区工人运动简况 方明

冀鲁豫边区妇女运动概况 范世钧

冀鲁豫边区青年运动概况 王克等

抗日战争时期冀鲁豫文联工作简况 鲁西良

冀鲁豫边区人民武装斗争概况 郭乐天白晶五冯培昌

冀鲁豫边区学生运动简况 陈惠敏

第三部分历史文献

鲁西区党委关于群众工作宣教工作的报告（节选）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二日）

如何进行会门工作王从吾

（一九四一年一月三日）【见《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

料选编》第二辑·文献部分（上）第136页】

在鲁西区党委民运工作会议上的报告 张霖之

（一九四一年二月）

鲁西妇救总会关于今后妇女工作的决议

（一九四一年三月）

鲁西农救总会九月主任联席会总结报告

（一九四一年九月十五日）

冀鲁豫边区各救总会关于政民配合的指示

（一九四一年十月五日）

今后边区工运的任务（节选） 高光宇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

冀鲁豫各救总会关于开办民运干部学校的决定

（一九四二年一月五日）【见《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

料选编》第二辑·文献部分（中）第197页】

冀鲁豫区党委关于青抗先领导关系的决定

（一九四二年三月十五日）

冀鲁豫区党委青年运动委员会关于迎接华北青运统一准备工作的指示

（一九四二年四月一日）

冀鲁豫边区青年抗日救国联合会关于边区青年运动的当前任务

- (一九四二年八月)
- 冀鲁豫区党委关于组织各级抗联的决定
(一九四二年九月一日)
- 冀鲁豫边区各级工农青妇抗日救国会联合会组织大纲
(一九四二年九月)
- 边区抗联关于今后妇女工作的指示
(一九四二年九月)
- 鲁西南三个村的斗争是怎样坚持的？ 苏振华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 冀鲁豫边区人民抗日联防组织条例草案
(一九四二年)
- 冀鲁豫边区人民武装抗日自卫队暂行条例草案
(一九四二年)
- 谈谈群众团体干部的立场问题 杨泽江
(一九四三年一月一日)
- 减租增佃工作中的几个具体问题 元贵
(一九四三年一月)
- 在濮县、范县工作总结大会上的发言(节选) 黄敬
(一九四三年四月)
- 冀鲁豫边区抗联关于村级工作的指示
(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一日)
- 冀鲁豫区党委关于取消各级民运部成立民运工作委员会

的决定

- (一九四三年七月十八日)
- 冀鲁豫区党委关于深入检查群众工作的指示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六日)
- 一年来的党与群众工作(节选) 张霖之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二日)
- 濮县、范县四个月群众工作总结
(一九四三年)
- 冀鲁豫边区抗联关于改善团体领导的指示
(一九四三年)
- 冀鲁豫边区租佃关系的调查与研究郭绍汤
(一九四三年)【见《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
第二辑·文献部分(中)第783页】
- 鲁西南租佃关系与雇佣关系的初步调查陶力

（一九四三年）【见《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
第二辑·文献部分（中）第769页】
冀鲁豫边区青年抗日救国联合总会在一九四四年边区青
运任务的指示 * 463++（一九四四年二月六日）
冀鲁豫区党委关于党对群众团体领导关系与组织的决定
（一九四四年二月二十日）
在二地委（原冀鲁豫）关于发动群众及目前中心工作问题
的发言 黄敬
（一九四四年四月二十五日）
冀鲁豫、冀南行署关于减租增佃几个问题的决定
（一九四四年七月七日）
冀鲁豫、冀南行署关于赎地问题的决定
（一九四四年八月十一日）
继续贯彻大胆放手的领导方法 万里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日）
站稳脚跟放下圈子 张霖之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冀鲁豫分局关于对中农政策的指示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濮县的农民运动及组织领导的经验 黄文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
关于冀鲁豫群众运动概况及意见 张霖之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
滑县查减运动简报 纪登奎
（一九四四年）
冀鲁豫分局关于纠正执行大胆放手中的偏向的指示
（一九四五年二月八日）
对泰运工作的发言 黄敬
（一九四五年四月）
农民发动起来，要迅速坚决的转入生产运动 高元贵
（一九四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在冀鲁豫行署专员联席会上的总结报告（节选） 徐达
本
（一九四五年七月九日）
南旺接敌区发动群众的几点经验 李哲
（一九四五年八月七日）
冀鲁豫边区各救总会为紧急动员起来参战告各救总会员
儿童姊妹团员书

-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
民兵是农民自己的武装 粟森
(一九四五年八月)
在分局党校关于土地政策在边区的具体执行情况的报告
(节选) 张霖之
(一九四五年)
冀鲁豫分局民运部关于老区和新区发动群众问题的工
作
通报
(一九四五年九月十四日)
减租与生产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新区情况研究 李进宝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九日)
清平新解放区(三区)的雇佣运动 张延积
(一九四六年二月)
冀鲁豫区党委、联合会总会召开边区群运座谈会，确定新
区清算诉苦方针
(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一日)
开展深入与普遍的反奸诉苦运动 郭超
(一九四六年五月十七日)
对菏泽市当前群运的意见 刘镜西
(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日)
大胆使用各种积极分子 张承先
(一九四六年六月七日)
二地委总结群运 张耀华
(一九四六年七月五日)
冀鲁豫行署关于妇女参政问题的指示
(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二日)
鱼台一月来清诉运动总结
(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四——二十六日)
定陶政权干部怎样参加了群运 孔百川
(一九四六年八月三日)
晋冀鲁豫中央局为贯彻五四指示，彻底实现耕者有其田
的指示
(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日)
冀鲁豫区党委关于贯彻实行耕者有其田几个具体问题的指
示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日)

-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布告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冀鲁豫区的减租增佃概况
(一九四六年)
在民运部长联席会议上的总结发言 潘复生
(一九四七年一月二十日)
冀鲁豫区党委关于深入土地改革群众运动的指示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二日)
冀鲁豫区党委关于土改主要经验向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
的报告
(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九日)
在冀鲁豫区党委土改会议上的总结报告提纲 张霖之
(一九四七年五月十七日)
湖西游击战中的土改运动汇报提纲
(一九四七年六月十五日)
在听取四、八地委典型汇报后关于贯彻复查的发言(节选)
) 潘复生
(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四日)
冀鲁豫区党委关于贯彻复查的指示
(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七日)
五地委民运部长联席会上五个月来土改运动的总结
(一九四七年七月十二日)
四地委县委书记联席会三个月土改复查运动总结
(一九四七年九月八日)
认识新区特点,大力开辟新区工作 逯昆玉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六日)
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关于土地改革、整党与民主运动的指
示
(一九四八年二月一日)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冀鲁豫行署布告
(一九四八年二月十日)
中央局冀鲁豫工作团关于整党与民主运动向中央局并冀
鲁豫区党委的报告
(一九四八年五月三十一日)
附一:在五月十五日扩干会议上的工作总结
附二:阳谷县三区赵台纠偏经过
附三:阳谷县三区冀王庄第一阶段工作总结
冀鲁豫区党委关于整党土改工作总结

(一九四八年六月十七日)

冀鲁豫区党委关于会门问题报告

(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七日)

冀鲁豫区党委关于建立青年团工作的指示

(一九四八年十月十五日)

冀鲁豫区党委关于整党与结束土改工作的综合报告

(一九四九年一月)

冀鲁豫区第一届青代大会关于目前青年运动任务的决议

(一九四九年四月十日)

第四部分回忆资料

忆冀鲁豫中心区的抗战活动 安法乾

关于冀鲁豫边区抗日救国总会和妇女抗日救国总会成立前
后的一些情况 安法乾范世钧

对清(丰)南(乐)大(名)内(黄)抗日救国会的回
忆 谷剑侠马毅之

肥城“红五月”运动

中共肥城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忆抗战时期范县的民主民生斗争 成润

忆冠县的减租减息与民主民生斗争 司洛路

莘县境内的借粮斗争 中共莘县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
室

冀鲁豫边区群运史上的一项创举——试述滑县雇佃贫运动

中共滑县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忆抗战时期湖西地区的妇救会工作 季凯

忆抗战时期湖西地区的青年运动 张世珠 * 9 4 3 + +

鲁西北和冀鲁边“民先”总队部始末 徐少岩张汝琦许法

一九三八年至一九三九年直南地区“民先”组织概况

安法乾李靖轩

活跃在鲁西平原上的济南乡师学生抗日教导队 刘少侏朱
德兴王克宗明

我对冀鲁豫边区青抗先的几点回忆 郭乐天

聊城地区民兵斗争述略 杨明坤 * 9 7 5 + + 关于鄆北

抗日民兵联防的回忆 李勋臣

回忆解放战争时期濮阳县五区党的主要工作 杨敬仁

冀鲁豫边区群众运动大事记 田苏苏王潮

后记